戰斗文選

祝君健康常勝

樣書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
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
昔者常相近，邈若胡与秦。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
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罇酒，欲以赠远人。
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蛇弓白羽箭，鹤辔赤茸秋。
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

荒垒三秋夕，穷郊万里平。海阴凝独树，日气下连营。
戎旆霜疑重，边裘寒更轻。将军犹转战，都尉不成名。
折柳悲春曲，吹笳断夜声。明年汉使返，须筑受降城

春生秋杀，虽死无悔

排除非宜居地区（如西藏和新疆的偏远地区），中国适宜居住地区的总人口密度可以大致估算为：

全国总人口：约 14 亿（2020 年数据）。

中国国土面积：约 960 万平方公里。

非宜居地区：如果我们大致估算非宜居地区（如西藏、新疆的偏远地区）占总面积的约 20%（约 192 万平方公里），那么适宜居住的地区面积约为 768 万平方公里。

计算适宜居住地区的平均人口密度：

适宜居住地区人口≈14 亿人−非宜居人口≈13.5 亿人

适宜居住地区面积≈768 万平方公里

适宜居住地区平均人口密度≈13.5 亿 768 万≈1,759 人/平方公里

因此，排除非宜居地区后，中国适宜居住地区的总人口密度大致在每平方公里 1,700 至 1,800 人之间

一，总论

民族社会主义
本论
世界观与党
卐字哲学
《为世界观而战》选
科茨沃尔德宣言
民族社会主义的政策基础
介绍北一辉
民族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形式
对抗时间
民族社会主义
法西斯主义在英国
J.O.N.S.西班牙长枪党的宣言
为什么德意志工人党必须出现？
论法西斯蒂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法西斯之教条
NSDAP 的纲领
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的目的
军团教义
俄罗斯法西斯主义之基础
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概念
社会主义的现实
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
雅利安革命实用指南
民族社会主义——一场左翼运动

二，世界观的斗争

与赤色势力的冲突
步入人生
进步与混乱
政治异见
女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对以劳动为导向的人文主义理想
关于民族社会主义的未来
帝范
道德的世界秩序
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性
今天进行的心理政治战争
德意志内外之自由
民族社会主义还是布尔什维主义？
会场战斗
施图姆的觉醒
关于未来任务的思考
民族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
自由主义的谬误学说
屠杀人民的阶级斗争
作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组织
我的政治觉醒
在第二届大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者国家间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当一天结束时，法西斯开始工作
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
民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民族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民族社会主义和自然法则
第两千年
禁令并未扼杀民族社会主义！

三，国家理念

人民与国家
议会还是理事会？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司法行政
国防与经济
国家和法律
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
民族社会主义与民主
慎言选
墨索里尼论职团制国家
德国法律和立法
政府
职团国家
罗马尼亚国家

四,经济理念

责任社会主义
社会经济
民族社会主义经济大纲选
资本主义与犹太教
民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原理
牺牲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国民”经济
NSDAP 的紧急经济计划
1930 年 3 月 6 日，民族社会主义党对农村人口和农业的立场党官方集会，慕尼黑
民族社会主义农业政策的目标和道路
劳动货币
BUF 经济政策
资本主义力量
经济改革还是革命
农业
劳动、劳动者、社会政策
全球经济危机的最终原因
反对资本主义
1939 年的德国经济政策
资本主义奴隶市场
资本主义
论资本主义的性质
打破利息奴役制
劳动与面包
雅利安人的国家与经济秩序

五,种族理念

民族社会主义种族思想
种族与人口政策
国家政策造福整个种族
民族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
民族社会主义种族政策
作为领导者建设者的种族
传统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
革命必剖清人种
革命之教育
论种族与人民
血与土：民族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农民与国家
国际的欺骗
欧罗巴阵线
国家政策造福整个种族
血与土
子孙
生命法则
前后汉书选
民族是一个有机体
同性恋问题
民族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基础
人口和人口统计
民族社会主义—生物学的世界观

总论

民族社会主义 阿道夫-希特勒

一：为了生存而战的战争与和平

政治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本身就是对一个民族为生存而战过程的描述。我之所以有意使用“为生存而战”，是因为实际上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每一次为每天的面包而进行的斗争都完全是一场无休止的、受到千万次阻挠的战争，就像生命本身就是一次面对死亡的斗争一样。究竟为什么要生存，和世界上任何一种生物一样，人类对此也知之甚少。只有生存才满足了自我保护的渴望。初级生物只知道自我保护的本能，高级一点的生物则会把保护意识扩展到老婆孩子，更高级一点的生物则扩展到所有本能。但同时人类在扩展其自我保护的本能方面显然少有的有利于物种而不会遭到舍弃，实际上最终人类把自我保护奉为至高无上的本能。因为只有在舍弃个体的过程中，保护生命才常常有益于保护整体，并且也因此有益于保护个体。母亲保护幼儿所爆发出的勇敢和男人保卫人民的英雄气概就是如此。与自我保护本能的伟大相呼应的，就是生命中最强有力的两个本能：饥饿与情爱。消除饥饿保证了生命的自我维护，满足情欲则确保了生命的延续。

实际上，这两个本能才是生命的主宰。当一个没有肉吃的唯美主义者对这样的观点提出异议的时候，那他自己个人的生存现状和他所提出的异议就已经自相矛盾了。**由血和肉组成的生命是永远都摆脱不掉决定其生长的法则的。**正如人类的精神会相信，并且并不介意会消灭那个承载精神的真实存在。适用于一个人的法则，同样也适用于所有人。**一个民族是同样个体生物或多或少的集合体。它的强大取决于所组成的个体本身和物种，以及同样的分布范围的价值所在。相同的、决定个体生命并由个体生命所服从的法则同样对一个民族有效。只要一个人的身体还对健康有所需求，那么自我那么自我保护和延续生命是每个人行为的最大的本能。**

因此，既然对各个不同民族的普遍生存法则的结论是相同的。对于地球上每个生物来说，如果以维护生命和延续生命两个目标的自我生存本能呈现出最为原始的力量，自我满足，可能受到限制的话，那么不言而喻的结果就是其为了维护生命的可能，以及满足自我生存的本能，而以一切形式进行战斗。地球上的生物种类不计其数，每个生物的自我生存本能以及延续生命的欲望是不受限制的，相反其整个生命

过程在空间上都将会受到限制。这是一个地表面积，经过精确计算的球体，就在这个地球上，成千上万的个体生命为了生存和后代进行着争斗，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就有为生存而战的紧迫感，为生存而战以求得进化的前提条件。世界历史在还没有人类的年代里，先是一种地质学上所描绘的画面，自然界各种力量彼此之间的争斗，星球上可居住地的形成水和土地的显露山脉，平原和海洋的呈现。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世界历史。这以后随着有机生物的出现，人类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千奇百怪的物种的形成与消亡上面。并且再以后，人类自己最终也明显地在世界历史这个概念之下开始首先更多的只关注自身形成的历史，也就是说去了解自身的进化过程。这个进化过程是通过人与动物之间以及人与人自身的争斗来体现的。

从个体生命迷蒙的杂乱无章中，最终出现了群体、氏族、部落、民族、国家，单单是人类的诞生与消亡，就是一个人类永远为生存而战的不断再现。如果将来的历史就是政治，并且历史本身就是人类、民族为了自我生存和自我延续所进行斗争的描述，那么政治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为生存所进行的战斗。但政治因此也并不只是一个民族为了自身的存在而进行了战斗，而是为为了我们人类而进行战斗的一门艺术。

同时，历史本身就是从古至今民族为生存而战的叙述以及同样是当时政治石化般的重现，那么，历史因此也就是我们自己政治政治行为的最合适的老师。如果政治的最高职责是维护和延续一个民族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就要永远地投入到，并且还要坚定不移地捍卫和支持为了政治而战斗和拼搏当中去。因此政治的职责就是要维护一个由血与肉组成的实实在在的生命，政治的成功，就是能够维持生命，甚至的失败就是生命的消亡，也就是血肉之躯的消失。那么政治始终就是为生存而战的领袖，领导人，组织者，并使其成为现实，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决定一个民族生与死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和平时期的政策和战争期间的策略，这样两个概念很明显立刻就会变得一无是处。因为通过政治所进行的搏斗所需要的往往就是生命，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结果都是一样的，也不在乎政治是试图用什么手段来维护一个民族的生命的。**和平时期的政策出了毛病同样会导致一个民族的消亡，也就是血肉之躯化为乌有，这和战争期间策略的不走运的是一样的，只有一种情况下，生存条件的剥夺才和其他情况下民族消亡的原因一样，因为民族是不会再战场上灭绝的，而是失败的战役导致他们失去了维护生存的手段。更准确地说，失败的战役导致他们失去了维护生存的手段，或者说是无法阻止导致战役的失败。**

直接由战争所产生的损失，完全和一个民族自己非健全的、不健康生命的丧失没有关系。最近在十年里由於饥不择食和不良恶习比过去 1000 年里因为战争死的人还要多。

可是最残酷的战争，恰恰就是最为和平地展现给当今人类。正是这样的经济之战所导致的牺牲和世界大战所消耗掉的最终结果是一样的。这样的战争不仅会波及到活着的人，而且尤其还会殃及到未出生的孩子。在战争期间，哪怕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未出生的孩子死掉了，那也是对未来的谋杀仅仅就在一年里，欧洲因限制出生而死掉的人口比自法国大革命至今，在欧洲发生的所有战争，包括世界大战内阵亡的人数还要多这就是经济政策所导致的欧洲人口过剩而又没有对一定数量的国家提供可以健康持续发展保障的后果。

总体上应该做以下的说明：就像一个民族忘记了政治的职责是用一切手段和尽所有可能来维护其生存一样，但政治要是服从某一种工作方法，那就会破坏了这项艺术是**引导一个民族为了争取自由和面包而战斗的核心意义。**一项其原则上是战争性质的政策，将会使一个民族远离无数的恶习和疾病，并在数百年的过程中，将无法阻止其核心价值的改变。如果是持续发生的战争，其本身则具有一种内在的危险，并且这种危险表现得越多，那么由此而组成一个民族体魄的种族基本特征，也就越来越不同。

这样的事情在古代我们已知的国家已经产生过作用，并且在今天特别对所有的欧洲国家还在产生着作用。**战争的本质就是导致在千百种个体进化的过程中，在一个民族中间选择出优秀的种族，这意味着优秀的人优先被消灭。在无数的个人成长过程中，民族中最有价值的优秀分子会在勇气与胆量召唤的响应下一再地自愿去完成特殊的使**

命，或者是有特殊人群组成组织机构的方法有计划的进行培养，战争的指挥一直都在考虑组建特殊的军团、特定的精锐部队和近卫军团的想法。波斯的宫廷卫队、亚历山大的精锐部队、古罗马护卫军团，不能指望的雇佣兵、拿破仑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近卫军团、突击队、世界大战时的潜艇部队和空军部队，多亏产生了这些类似的想法和差不多的用途才选拔出来许多适合特别高要求的、具有相应杰出才能的人才，并且组合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近卫军本来就不是训练用的，而是战斗部队。属于这样一个团体的高尚荣光，就会形成一种军队的精神，一种能够继续凝结，因为了最终可以发扬光大的精神。可就是因为如此，这样的一群人才常常承担着最为重大的伤亡，也就是说，**从无数的人当中选拔出最有用的人集中起来提供给了战争。**

因此，一个民族最优秀的人伤亡不成比例的增加，**同时，与此相反的是，最劣质的人的比例在很大程得到了保持。与这些准备好为了民族而献出生命的优秀分子相对应的，就是那些可悲的把维护自己个人生命看作纯粹是最高使命的自私鬼。英雄死去，而罪犯活着。**还有一点，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特别在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出来，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这样很好，因为这是一个民族总还有些价值的证明，真正的政治家必须要认真地看到和考虑到这样的事实。**毕竟在一场战争中能够轻易忘怀的东西，会让一个民族最优秀的那部分人在上百场的战斗中，慢慢地把血流干。因此，人们争取到了胜利，可最后配得上这个胜利的族群却不在了，而后世的可悲就在于有些人常常会对前世的成果表现出的不可理解。**

所以，一个处在战争中的民族，其明智的政治领导人绝不会以一个民族的生命为目的而是要为了民族的生存找到一种方法。政治领导人必须受到最好的教育，才会最认真的管理所托管的人类财富。为了民族的生存，如果有必要的话，要不惧怕敢于奉献出鲜血，还必须要始终想到和平是用奉献出的鲜血才再次换回来的。**为了某个目的的而拼死到底的战争，其本质是无法保证用流出的鲜血去换回所需要的东西的，这样的战争就是民族的罪孽，就是对一个民族未来的侮辱。可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将会对一个民族形成一种巨大的危险，那就是在其种族种类的组成当中具有如此之多不同品质的人，以至于其自身当中只有一部分人才可以看作是维护国家和创造文明的人。**

欧洲国家的文明是建立在千百年来北方民族血统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北方民族的血统最终被征服一样，欧洲文明的面貌也随之被改变，这些国家的价值观也相应的接受了衰落，影响其原则上是和平性质的政策，那么首先就是要违背维护民族优秀血肉之需的可能，还有教育这个民族变得总有那么一天不得不放弃的懦弱，甚至还要表现出要威胁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那么人们就不会为了每天的面包去战斗，而更愿意把面包切小一点，或者更有可能来限制自己的人口数量，为了避免走上人口过剩的困境这条路，要么通过规规矩矩的移民，要么通过限制生育。因此，一项原则上是和平性质的政策，对人民来说，就像是一条皮鞭。因为一方面担心连年不断的战争，另一方面则担忧移民。而通过这样的政策就会在成千上万个生活不幸的人们当中慢慢的夺走一个民族中最优秀的血肉之躯。我们整个国家政治的智慧之处，即使是完全看不到移民过程中的好处，顶多对自己国家人口数量的不足表示出一些遗憾，或者在最好的情形下是谈及到了其他国家哺育文明的养料。**

知道这些是很让人伤心的。没有认识到才是最糟糕的。移民并不是区域性的发生，也不会按照年龄分配来进行，而是听任命运的自由安排，但却总是把民族中最勇敢、最坚强、最果断、最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给带走了。

150 年前移民去美国的农家小伙儿也曾经是村子里最果断和最大胆的，就想今天去阿根廷的那些工人，而胆小鬼和病秧子则宁愿死在家里，也没有勇气去陌生的地方自谋生路。不管是贫困、不幸，还是政治压迫、宗教束缚这些强加于人的负担，总是那些最健壮的，最具有反抗精神的人才能够起来反抗。

病秧子总是最先被战胜，维护这些人的生命，对于胜利者言一般来说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就像发育不全的人，对于国家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好处一样。

因此，商业法则常常从宗主国转移到殖民地国家，因为这样才会自然而然地聚集起人类的最高价值所在，对于新国家来说来说有利的好处，因此也就是宗主国的损失。正如一个民族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移民以后，才会失去他们最优秀的、最强壮和最具有人类天性的有生力量，我更糟糕的是，在这苦难的年代里，面对如此的厄运必要进行必要的抗争却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力量。那最好还是采取限制出生的办法。

关键这不仅只是人口数量的减少，而是通过限制出生，把一个民族有可能是最优秀的人，从一开始就给灭绝了。因为一个民族的伟大和未来取决于其在所有领域与里获得最高成就的能力。可这就是个人品质的价值所在，好像也并不和长子继承制有什么关系。

从我们德国的文化生活中，从我们的科学研究中，是的，从我们全部的存在本身，把我们德国人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抹去，那么德国差不多就是个巴尔干国家了。

同时还要想到，即使在那些为了他们的民族而做出巨大成就的人们当中，有的是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那么也要看一看他们的先辈当中是不是至少有一个不是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呢？因为如果在他的全部的祖先排序里也出现过那么一次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没有延续下去的情况，要是我们的祖先还总是热衷于坚持这样一个原则的话，那么它也属于那些没有成就的人了。但是在人类生活中是没有以往的恶习，成为现在的法律这种事情的。

因为执行一项原则上是和平性质的而随之却导致通过移民和限制生育而栖干民族鲜血的政策，越是关系到一个在种族上不是由同类人组成的民族，那么其命运就越发的悲惨。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移民首先夺走了民族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同时，通过在本国国内的限制生育同样也会首先涉及到由于其种族品质而努力爬上去的社会阶层。那么渐渐地他们就会被吸干了血的劣质的大多数人所补充，并且最后在数百年后导致整个民族品质水平完全下降。**

而这样的民族机体里面也就已经不会再具有真正的有生力量了。因此，一项原则上是和平性质的政治和指示，到战争是唯一武器的政治完全一样，都是有害和可怕的。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和一个民族的生命，政治要为此而奋斗，同时必须还要为了把生命奉献为最高意志的战斗选择武器。因为人们不是为了死去而从事政治，有时候做出牺牲是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目的是维护生命，不是英勇就义也更不是胆怯偷生。

二：是战斗，而不是靠经济来保障生存

一个民族为了生存而战，首先要以以下的事实来确定：无论如何，不管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有多高，其生活所需之首就是为了每天的面包而奋斗。一个民族天才的领导人，无疑会向人们指出远大的目标，以至于人们会更多地被物质的东西所引诱，而不去服从于高尚的精神理想。只有在理想的精神观念消失的时候，才会相应地只对物质利益进行追求。人类的精神生活越低级，那么就会越突显出其动物本能，直到他最后发现吃东西才是他生活唯一的目标。因此，也许一个民族能够忍受物质方面的某些限制，只要在精神上给他一个可以支撑的理想。

只不过，就算不是这个理想，会导致一个民族的沉沦他们绝不可以单方面提及物质供给的费用事宜，就好像这样做会威胁到一个民族的身体健康似的。毕竟一个饿得要死的民族，要么因为营养不良而身体垮掉，要么就是导致其生活状况的改变。**而身体垮了，精神早晚也会随之垮掉。然后所有的理想也就结束了，所以只有在可以帮助且有利于一个民族加强内心和基本力量，而根本因素还就是为生存而战的时候，理想才是健康和正确的。**无法实现目标的理想，即使是表面上显得光彩万分，那也会令人生厌，因为这样会使一个民族一再的远离现实生活。

而一个民族为了生存所需要的面包，则取决于其可利用的生存空间。一个健康的民族至少总是要尝试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满足自己的需要。其他另外的处境则是病态和危险的，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可能会培育一个民族几百年。**世界贸易、世界经济、对外交往等等，诸如此类都是暂时可以培育一个民族的手段，这些都和一部除去民族的人口预测，另一部分则除去民族生存能力的因素密切相关一个民族生存最有保障的基础一直以来都是自己的土地。而且还要考虑到以下因素：一个民族的人口数量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因素，一个健康的民族其人口数量是上升的。是的，按照人口预测，人口增加本身就可以确保一个民族的未来。可这样同时也要促使生活用品的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提高国内生产只是要满足人口不断增加的需求，而绝不只是不断的增加的人口数量。**这一点特别有所指的是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在近百年来，特别是最近以来，及生活需求的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按照每年最好的情况所计算的欧洲土地收成的增长几乎无法匹敌一般生活需求增长本身，人口数量的增加，只能通过增加或者说扩大生存空间来进行弥补。

现在，一个民族的人口数量是可变化的，但土地本身却是保持不变的。也就是说，人口的增加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同时也是自然的过程，那就不会被认为是非正常的过程了。与此相反的是土地的增加则是有条件的通过对世界的瓜分、暴力推翻、特别事件等等得到的，**那么就是说养育人民容易，增加土地极其困难。并且，协调人口数量与土地面积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是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一个民族为生存而战，实际上完全就是为了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确保所需的土地，来作为养育人口的基本条件。毕竟人口的数量是在不断的增加的，而土地本身则是相应不变的，这样渐渐的就会出现彼此之间的紧张，首先是出现物资匮乏，这就需要通过加倍的努力，更加巧妙的生产手段，或是特别的节约措施，才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得到平衡，而这也正是一个为生存而战的民族的领导人的职责，那就是要基本上消除这种不堪重负的关系，也就是说，是这种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之间重新产生的不堪重负的关系。

在人类生存过程中有几个改变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之间不协调关系的方法。**最自然的方法就是在一段时间让土地适合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这就要求勇敢的战斗和鲜血的付出。即使是这样，那么对于一个民族来，所付出的鲜血也是唯一的、合理的付出。因为，就在用他的鲜血而赢得了为了一个民族人口的增长所需要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你就得到了几倍于在战场上人力投入的补赏。**

从战争的困难中获得的是和平的面包。剑就是开路的犁，如果要谈论什么人权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赢得了最高的权力，**是战争给人民乐于辛勤耘耕、养育子女的土地，因为这片土地不是分配的，也不是馈赠的，或许是上天给予的封地，人们才敢于拥有并助著力保护和心情照料这片土地。**

因此，每一个健康的、征途长的民族在获得土地的过程中都会看到不是邪恶的，而是自然的东西。可首先必须要指责的就是那些追求时髦，否定这种最神圣权利的和平主义者，因为至少他们自己是靠以往的错误活着的。接下来，就算地球上没有一块地方确定为一个民族的永久居住地的话，那就已经将大自然对人类几千年的统治进行变成了永远的放逐。今天对地球的瓜分最终不是通过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来进行的，而是通过人类自己。可我从来就没有把人类所考虑的解决办法看作是上天拿来保护起来，并且还奉为未来法典的永恒价值，所以就像地球表面，永远在承受着地质变动一样，有机生物也在不断转化的形式消亡，以便创造出新的生命，那么，人类居住地的界限也会遇到不断的改变。

也许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有些民族很可能会有兴趣将世界上现有已经瓜分土地看做是不可更改的，在将来也会永远受法律的保护，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那么处于这种状况下的其他民族总还是能够看到和谈及他们眼下的不满，并且因此而必须利用所有人为的办法得以改变的普遍符合人性的一些东西的。**谁要是想从地球上永远的废止这样的搏击，也许就会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只是因此被消灭的还有人类发展的最为崇高的驱动力，也正是如此，就像他在日常生活中想要永久的保存某个人的财富，维护某个生意的规模并以此为目的而排斥自由力量之游戏，即自由竞争一样。其结果就是一个民族的不幸。**当今对世界的瓜分以单方面的方式使得某一些民族必须占有理所当然的利益，对当时所分得的土地不许有任何的改动。光是这些民族在土地上的巨额财富所对应的，就是其他民族的贫困，尽管他们勤劳努力，但还是无法获得维持生计，每天所需要的面包。当他们也提出对保障他们食物的土地面积的要求是，以何种更高的权力来进行反驳呢？**不！这个世界上人类的第一项权利就是生存权，只要是人们对此还赋予力量。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就要为此项权利一直要寻找到适合其人口数量的土地的办法。**

就如同一个民族，不管是由于贫弱，或者是因为糟糕的领导人而无法克服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和不断缩减的土地之间的矛盾，但又无法再增加土地面积。大自然本身就会让人口数量去适合不足与养育自己的土地面积。贫穷和困苦就是他的辅助工具。这样就会使一个民族大量减少，因此实际上也就中断了人口数量的增加。大自然让人口数量适合土地面积的结果往往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就是开启了彼此之间激烈的生存之战，只有最强壮的和最具有反抗能力的单独个体才会存活下来。一方面是大量的儿童

死亡，而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的老龄人口，这就是当时那个对个体生命很少关怀的时代的主要症状。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体弱多病人都被贫困和疾病夺去了生命，而只有最健康的存活了下来，大自然让一个优秀的品种出现了。因此，一个民族的人口数量是很有可能会受到限制，但是其内在价值保留了下来，是的，得到的是精神的升华。可是这样的过程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不然的话，贫困也就有可能变成其对立面。**在种族特性上并不完全相同的高贵民族当中，因为长期的食物短缺最终会造成愚钝的结果，而开始陷入到一种紧迫感而渐渐地变得松懈，并将优秀民族所要求的战斗取而代之以慢慢变得颓废得危险中。为了克服经常发生的贫困，人类本身就将人口数量的增加视为毫无意义的事情并且采取限制出生人口的办法，因为在这个时候人类本身就走上了一条相反的，连大自然都要毁掉的道路。同时，就在大自然由于大量出生的生命而在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没有给少数的最健康和最具有反抗能力的人们留下什么东西的时候，人类则限制人口的出生，而且还不考虑实际的价值和其内心对生命的尊重去尝试保留那些生出来的生命。**

其人性所在，也就是只为弱者服务，而实际上则是对人类生存最残酷的毁灭。如果人类自己想要限制人口数量，而不出现由于通过限制人口出生所产生的可怕结果的话，那么就必须解除已生出来还活着的来计算的出生数量的限制。针对这样一项明智的措施，古时候的斯巴达人有能力做到，而不是我们今天的那些谎话连篇、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东西。6000 个斯巴达人统治的 35000 个奴隶，要想到这是缘由斯巴达人的高贵品质。

这种高贵品质是有计划的维护种族生存的结果，才使得我们看到在斯巴达克城邦里最初的种族品质。将体弱、多病、畸形的儿童遗弃，也就是说将他们消除掉已更符合人类的价值观，并且实际上比我们当今时代可悲的精神错乱去养活那些病秧子更加人道上千倍，况且还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去养活他们，由于限制生育或者打胎手术却夺取了成千上万健康儿童的生命，并且接下来就可培育出由于各种疾病而造成变异的后代。一般可以这样说，通过贫困和人为的救助来限制人口数量也许可以差不多适应不足的生存空间，只不过现存人口的品质却在不断的下降，是的，结果就是使其衰落。第二种尝试就是让人口数量适合土地的面积，这取决于不像他们祖先的，所剩余的人性也失去价值的移民。**限制人口出生消灭了人类高贵品质的载体，而移民又毁掉了人类的平均价值。**现在，一个民族还有平衡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之间不相称关系的其他两条出路。

其中第一条本和国内垦植毫无关系的，增加国内的土地收成。第二条就是提高产量和将国内经济调整为出口类型的经济。增加画在国境线以内的土地收成的主意是一个古老的想法。人类田间耕作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取得进步，不断进行改进并且不断提高产量的过程。取得进步的第一阶段是土地的耕作和耕种，第二阶段则是通过应用宝贵和稀有的养料人为的增加产量，提高土地使用价值。从以前的锄头到现在的拖拉机，从过去的牛粪到现在的化肥，遵循的就是这样一条路线。

毫无疑问，土地收成因此可以无限的增长。同样毫无疑问的，还有国境线也可以，什么地方都随便画了。尤其要考虑到的是具有高度文明人类的生活水平应该是以一种

普遍的水平，不是由一个民族拥有，并且分配给每个人财产数额来决定的，而是完全要让周边国家来进行评定，并且反过来通过他们国家的情况来决定。现在的欧洲人梦想着一种从欧洲的前景推演出和美国的实际情况一样的生活水平。民族之间的国际关系，通过现代化的技术以及由现代化的技术所实现的交通变得如此轻松和密切，以至于欧洲人把自己的生活作为标尺去衡量美国人的生活状况，他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些，同时还忘记了美洲大陆的**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的比例**，比起欧洲各个国家类似的情况和与其相应的生存空间，那里可是一望无际，再好不过了。

不管是意大利，还是我们德国实行国内垦殖，就拿美国的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来做参照，但不管通过加大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工作来增加土地收成，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的不相称却依然存在。对于德国或者意大利来说，如果通过辛勤努力可以使人口数量有一些增长的话，那么在美国恐怕就会有可能会增加好几倍了。就算在欧洲的这两个国家最后不可能有人口的增长，直到最后达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比例。特别是国内垦殖，从所期望得到的效果来看，这是建立在一个谬论的基础之上。那种通过国内垦殖能够带来大量土地增收的观点是错误的。

不管怎样，比如在德国的土地分配方面，不论是田庄的大小，还是小块土地的种植者，都改变不了，平均 136 人分摊一平方公里土地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比例是不合理的。以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是不可能养育我们这个民族的是的，如何把国内垦殖的通栏标题暂时在民众面前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联想到这是找到了一个消除目前贫困的解决办法，这样就只会把人搞糊涂了。可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国内垦殖不是以错误的方式来分配土地的结果，而是我们民族现在所拥有的是一个不合理的生存空间的结果。

因此，通过增加土地收成或许在某一段时间里可以减轻一个民族的生活负担，但从长期来看，这绝不是一个推卸掉让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与其人口数量变得不合理的责任的办法。在最有利的情况下，通过国内垦殖本身也就只能对社会理性、社会公正方面做些改善。要是为了养育一个民族，国内垦职责没有一点重要性。

对于一个国家的外交立场还会造成损害，因为会让一个民族脱离实际的想法。诚实的普通市民会真的相信，通过辛勤努力和合理的土地分配，即便是在家里，他都可以得到每天的面包。但是却不懂得，**一个民族必须齐心合力才能赢得新的生存空间。特别是今天被许多人当做脱离贫困、忧虑、饥饿和苦难拯救者的经济，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给予一个民族不取决于其自己土地比例的生存可能。**

当然，这里还有一些我必须简短提到的前提条件。这种经济所谓对的意义所在，就是一个国家生产出比其自己所需还要多的某一种生活用商品，剩余的商品除了在国内销售以外，还要从销售收益中拿出钱来购买自己所缺少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原料。因此，这种形式的经济不只是生产的问题，而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销售的问题。现在人们特别会谈到提高生产，但是却完全忘记了，**提高生产的价值所在就是有顾客的存在。在一个国家经济生活内，只有当所增加商品的数量能够具体落实到每个人的时候，提高生产才会带来效益。一个国家工业生产的提高理论上可以使商品降价，从而促进消费，让每一个国民拥有更多的商品。而实际上，这些改变不了由于没有足够的土地而不足以养育一个民族的事实。**某一项工业生产是可以增加的，可以翻倍的增加，但是粮食

生产却无法做到。正如我们的人民遭受着贫困，要消除这样的贫困就只有把一部分工业生产剩余的产品能够运往国外，为的是再从后国外可以换取国内没有的商品运进来。所以，以此为目的的提高生产只有当找到了买主，而且还是国外的买主可以取得所期望的成就。所以，能不能卖出去，也就是销路问题才是我们面前更加突出的问题。今天这个世界的销售时长并不是没有界限的。从事工业生产国家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在遭受人口数量与土地面积比例不合理和不满意的困扰，并且因此而瞄准向国外出口。最近，这些国家中还要加上美国和东方的日本。

所以，为了有限的销售市场自己就开始了争斗，争斗越激烈，从使工业生产的国家就会越多，反过来又使得销售市场变得越来越小。因为，一方面随着争夺国际市场国家的增多，使得销售市场渐渐地萎缩，一部分是由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工业化，一部分是通过连锁式企业经营模式，纯粹处于资本主义利益在这些国家越来越多地建立了起来。因为要考虑到：比如说德国一直有兴趣在德国的造船厂给中国造船，因为这样就有可能养活一定数量我们国家的人，而由于我们国家自己土地的不足，这些人是养活不了自己的。

我们说德国人是不会有兴趣在上海成立一个什么德国金融集团，或者什么一个德国工厂也去建立一个雇用中国工人、使用外国钢材、为中国造船的所谓的分厂，即使是这单生意本身通过付息或者红利也获得了一定的利润。

相反，这样的结果也只能是一个德国金融集团反正是获得了上百万的利润，只不过德国经济因为失去的合同却流失了数倍于该利润的收益。现在资本主义利益越是开始更多的决定今天的经济，尤其是一般的金融和股票交易所的观点就会越来越获得决定性的影响，也就会越来越吸引连锁是企业经营模式，以便可以人为地进行以销售市场为目标的工业化，特别是可以削减欧洲宗主国的出口规模。今天还能有些人对未来的发展进行嘲笑，可随着这样的发展，30 年后就该会对在欧洲不堪的后果表示叹息了。

产品销售困难越是增多，为了剩余市场的争斗就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如果最初的战斗武器取决于价格制定和产品性能，并且用于相互之间试图讨价还价的话，那么最终的武器就是用剑了。所谓和平经济征服世界只有当这个世界纯粹由农民组成，并且只有一个从事工业的国家时才会发生。可是因为现在所有伟大的国家都是工业国家，所谓的和平经济征服世界也无外乎就是使用只要还是和平方式的，只要更加强大的国家还能够相信使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取得胜利的战斗。

也就是说，事实上就是以和平方式的经济能够把其他国家置于死地。因为这就是一个民族与和平经济的手段战胜另一个民族而得出的实际结果。一个民族以此获得了生存的可能，而其他民族则因此被淘汰掉。在这里投入战斗的本钱就是我们称之为民族的血肉之躯。

相信会有那么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国家，另一个国家则是无法用和平经济的手段能够战胜的。或者说，一个经济稍弱的国家不让一个经济较强的国家给消灭掉，但同时这个国家生存的可能却被慢慢的断绝了，接着，这两个国家和平经济谎话的迷雾突然被撕开，而战争，也就是使用其他手段的政治延续则取而代之。对于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危险性，从其本意上来谈恰恰就在于容易使人相信其命运终究可以通过从次要到主要地位向前发展的经济来创造，并最终甚至可以视为建立国家的动力，**还可以给这**

些个国家带来道德高尚、品质优越的人，最后使得这个国家和人民能够维持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而一个国家所谓的和平经济政策特别的危险之处就在于，通过执行这样的政策首先有可能增加最终不再和在自己土地上粮食收获成比例的人口数量。

同时这样在不足够大的生存空间内过度的充斥人口常常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性灾难，人们被集中在文化设施很少，身上脏包挺多的地方一起劳作，好像所有令人生厌的恶习、劣行、疾病都聚集到他们身上似的。尤其是他们这些人，就是混血和杂交的滋生地，大部分的结果就是人种质量的下降，以便给那些国际犹太人在那长脏的地方繁殖并最终消亡。

可正是如此，才使得这样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力量迅速消失，导致所有种族的、道德和伦理价值观的毁灭，理想分崩离析，最后因此而消除了一个民族所必须的，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搏击时能够坚持到底的前提条件，这样的衰落不可避免。这些被恶贯满盈的和平主义弄得虚弱无力的民族是不会准备为了销售他们的商品去进行战斗而付出血的代价的。就好像是一个强国使用政治权利真实的力量取代和平经济手段，这些国家就会土崩瓦解。接着就是遭受到他们自己错过的报复。

这些国家人口过剩，并且现在由于失去了所有能够养育过量人口可能的实际前提条件，而没有了实力去挣脱敌人的锁链，而且也没有了精神力量有尊严的去承受命运的安排。他们曾相信，为了能够生存，是多亏了从事和平经济活动，可以放弃暴力。命运教会他们懂得只有当人口数量和生存空间之间存在一个合理和天然比例的时候，一个民族才最终得以存活。这种比例还必须随时进行检查，使其之间的关系处在可以延缓土地面积不利，并且又可以重新恢复人口数量利益的范围之内。为此，国家就需要武器。

因为获得土地总是和使用国家力量紧密相连的可是，如果政治的责任就是要执行一个民族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那么一个民族为生存而战的最根本理由就是要确保养育其人口数量所需的空间范围而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民族使用国家权力的问题，那么最终的结论就是：政治是执行一个民族，为了在地球上生存而进行战斗的一门艺术。外交是确保一个民族所需生存空间的大小和好坏的一门艺术。内政是维护一个民族的种族品质和人口数量所需要使用国家权利的一门艺术。

三：种族、战斗和权力

资产阶级所认为的国家权力通常只不过就是一个国家目前的武器库存，并且还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军队也许就是一个组织机构而已。

在此我想要对这些观点进行剖析。就算是这些人的观点是对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真的就是拥有武器和取决于军队本身的话，那么想必这个不管通过什么样事件的发生而失去武器和军队的国家就会永远地给消灭掉了。但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自己对此几乎是不相信的。仅仅从他们对此表示出了怀疑来看，他们就同意像武器和军队组织这样的东西是能够被替换的，同时这些不是最初自然的东西，而是有超越自然的东西存在的，并且至少也是有国家权力根源的东西存在的，国家权力也是如此。武器和军队形式是可以摧毁和代替的。也许对于目前来说，国家权力的意志很伟大，也受到限制，但从长远来看，则是会受到重视的。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最终的明确意志就是自我维护，同时还有活生生的劳动力供其使用。武器会生锈，军队形式也会过时，但意志本

身却可以把这两样东西一再的进行更新，给人民创造出目前贫困所要求的国家形象。我们德国人必须交出我们的武器，这没有太大的意义，在我看来不过是物质方面的损失。

并且这也是我们那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们所看到的唯一的东西，这种让我们交出武器的强制做法顶多会引起由此而产生的，按照我们的理解有可能产生的麻烦，以及在执行过程中，我们所经历过的卑鄙的方式。更糟糕的则是体现在对我们军队组织的破坏。在此即便是不把对我们国家持有武器体系看作是最大的不幸的话，那么更大的不幸应该是解除了培育我们民族的，世界上别的民族都没有的，比起我们德意志民族来说也许别的民族根本就不需要的英雄气概的组织机构。

我们旧有军队在普遍原则性方面对我们民族在所有领域取得的最高成就的功绩是不可估量的。就在对我们内在的种族品质不断地进行摧残，就像我们赞美英国人那样，而使得我们民族特质消失殆尽。**较之于其他民族，在危险的年代里，恰恰就是我们民族坚定不移的团结一致，至少还有一部分符合自然和本能的天性通过在军队的培育过程中保留了下来。那些愿意谈论社会主义人们完全不会懂得社会主义的最高组织机构，根本就不会是德国的国防军。因此，那些典型的具有资本主义特性的犹太人，对于这样一个组织机构，其立场、尊严甚至是名誉与金钱不可同日而语，而是对功勋和因为某种功勋而属于人们的名誉比资产和财富评价更高，犹太人对这种组织机构的巨大仇恨，同样也是如此。那种好像对犹太人既陌生又危险的看法一旦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认知，那就意味着是一种针对犹太人危险继续存在的不可侵犯的保护。比如在军队里想要花钱买一个军官的位置，对此，犹太人很是理解。一个组织机构，一个给予一个人以名誉的组织机构，这个人要么完全没有财产，要么他的收入只是别人的一部分，就是他在这个组织机构里还没有得到任何名誉或者表彰，而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他就不理解，非常地不理解。并且以前这个组织机构无可匹敌的主要优势，只可惜在最近 30 年的和平时期里，肯定也会慢慢地受到侵蚀的危险。就如同这也变得时髦一样，每一个军官，除了那些和犹太女店主鬼混的以外，特别是贵族出身的军官，对于现有的军队来说，随着自己的进步则同时也晋升成了一种终有一天会四处恶性蔓延的危险。对这样的事情同样在威廉一世时期没有出现表示理解。**

一句话，这是因为在世纪之交时的德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组织，对于我们德意志民族来说，其作用堪比是造福于社会的机构。是德国人讲原则，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卓越，德国人率直真挚、英勇果敢、有瞻有识、不屈不挠和坚定真诚的发源地。对这一点的真知灼见，慢慢而不知不觉的成为了整个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这个组织机构被《凡尔赛和约》毁掉了，对于我们德意志民族来说，这比我们的敌人，因此而心中感到其阴谋终于可以得逞，可我们无能的资产阶级缺乏聪明才智和应变能力，以及无法找到最起码的补救措施还有糟糕的多。

因此我们德意志民族最终**失去了武器和拿起武器的人**，尽管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但没有类似这种原因的。相反，没有什么比失去武器和重新建立或者更新组织机构形式更会轻易得到赔偿的了。一个民族所奉献出的鲜血、所消亡的内在品质，才是无可替代的。今天的资产阶级认为是《凡尔赛和约》让我们的民族没有了武器，我只能表示反对，真正失去武器是因为我们受了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的毒害，以

及将我们民族最高尚的力量源泉进行摧毁和毒害的国际主义思想，因为一个民族所有力量的源泉并不在于其武器的占有，而是在于通过其种族的重要性，也就是一个民族本身的种族价值所在，通过其现有的最优秀的个人品德，以及通过其维护自我生存的合理观念所体现出的内在品质。

作为民族社会主义党党员，如果我们以这样一种民族真正力量的观点面对公众的话，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整个公众舆论就会因此而反对我们。仅仅这一点就是我们新的学说最深层的意义所在，也就是说，作为一种世界观我们要和别的学说分道扬镳。同时从基本原则出发，我们认为民族和民族是不一样的，民族品质和民族品质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到民族品质和民族品质是不一样的，那么每一个民族不论是基本特征，还是唯独属于自己而完全不同于其它民族的特殊价值都会因此而忽视及人口数量。每一种特殊民族品质的影响都是非常不同的，并且会出现在不同的地区，总的来说就是完全呈现出衡量一个民族普遍品质的标准。这种普遍品质的表达方式就是反映出一个民族优秀品质耀眼光芒的总和，或者说是种族汇集特征的历史文明写照。

这种特殊的民族品质可绝不只是美学意义上的文明品质，而是通常所说的生命价值本身。因为这种价值建立起一个民族的生命，并将其打造成型，还要赋予一个民族克服艰难险阻应该投入的所有力量。

因为每一次文明的行为，如果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就是战胜直到现在还依然存在的野蛮，因此，每一次为了文明而做出的牺牲，就是对人类跨越其目前所划定国境线的一次帮助，并且因此是对人类社会地位的加强，也就是事实上维护生命的力量存在于所谓一个民族的文明价值之中。所以，一个民族朝着这个方向的内在力量越强，那么在所有地区为生存而战来维护生命的无以数记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一个民族的种族品质就越高，那么在和其他民族的战斗和搏击过程中，为了利于生存所投入的普遍的生命价值就会越大。只有当一个民族认识到其优秀品质的价值所在，并给予适当的评价和尊重，其重要性才会完全发挥作用。

那些无法理解或者缺乏天然秉性，且再也毫无感觉到其优秀品质价值的民族，也就因此而立刻开始失去这样的品质。混血杂交以及人类质量下降，常常是在开始时通过所谓喜欢外国人所导致的结果，相比起外国的而言，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文明价值的蔑视。

就像一个民族，开始不再尊重自己用鲜血换来的精神生活的文明表达，或者甚至对此感到羞愧，为了用外国的表达方式来解释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就放弃了融入其血液当中并且因此绽放出文明之花的生命力。这样会撕碎，动摇其世界观的判断力及其表达方式，使其失去对自己的奋斗目标的认知和感知能力觉而代之的则是国际主义的假想、观念的胡思乱想，以及由此沉淀出来的文化糟粕。然后犹太人就会以任何一种方式开始登场了，而这位擅用毒计和种族灭绝的国际大师在没有完全根除并且毁掉像这样的一个民族之前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结果就是一个民族失去了其所特有、的统一的品质而最终走向衰败。因此，当一个民族不知道还能否想得起来，并且非常细心的呵护其所有的期望，要首先以此为支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时候，一个民族现有的种族品质也就会失去影响。所以要把国际主义观念看作是这种民族品质的死敌。**取而代之的是必须要认识到自己民族的品质才是能够满足一个民族全部的生存所需并当作**

其行为准则。当无法首先唤起一个民族沉睡的力量和天赋的时候，现在很想要在民族品质当中寻找对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重要性真正永恒的要素，那么这种品质本身在其整体当中的影响就是很小的。

毕竟人性所具有的同等平均值是很小的，而且好像还是从不同的种族品质拼凑而成的，一个民族中的个人品质在其所有亲属具有同样品质的人也是很少的。一个民族每一种行为举止兴许都来自，并且永远都属于某个地方，这就是个人品质奉献的结果。**仅仅只是遭遇到贫困的人们有找到消除贫困方法的愿望，那就没有了贫困。只要这个普遍的愿望在为这项使命从一个民族中选出来的人的行为举止中，找不到拯救的办法，那就有贫困。大多数的人是绝不会创造出成就的。**

大多数的人是绝不会奉献出人类发明的。而总是只有那么一个人成为了人类进步的奠基者。一个具有某种内在种族品质的民族，只要这种品质在其文明或者其他成就中是完全可以看到的，总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个人品质，因为没有个人品质的出现及其创造性的行为，像这样一个民族的文明景象就绝不会形成，并且因此也就缺少推断出像这样的一个民族具有内在品质的可能性。

同时我所提到的一个民族内在的种族品质，除了我所看到的人类成就的总和，我认为这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民族作为种族品质的代表和创造出文明景象的个人品质。

那么这样好像就把种族品质本身和个人品质彼此联系了起来，因为一个种族品质缺失的民族，至少从种族品质的根源里是无法得到重要的具有创造力的个人品质的，与之相反好像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具有创造力的个人品质，以及由此所取得成就的缺失，是和一些现存的种族品质有关联的，但是一个民族就还是有可能通过建立及组织机构的办法，民族共同体或者称为国家，使其个人品质作用的发挥得到促进，或者至少得到减弱，或者甚至得到的阻碍。就像一个民族的大多数开始要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那样，也就是引进了当今西方的民主观念，但这却不只是损害了个人主义观念的重要性，而且也无法阻止个人品质去发挥作用。通过个人生活表面形式的建立却阻碍了具有创造力个人的形成和发挥。因为这就是对现在居于统治地位的民主议会制的加倍的诅咒：不只是自己的无能，真正去创造成就，而且还阻碍那些超越平均水平的，不论如何还有些强势的突出人物的步步高升。毕竟自古以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有些人就是显得特别的具有威胁性，因为他们的伟大是超越普通一般人的愚蠢、无知、胆怯的，还是有些骄傲自大的。另外，通过民主近似于合法的程序，不得不让品质低下的人成为了领导人，这就使得这种一直使用随便一个什么人都可以的机构，还有那些还算谈得上领导人的制度也失去了价值。

这些都是因为源于不负责任的民主的本质。大多数人很少具体表现出他们好像不管怎样都是能够担负起责任似的。由他们这些人所推举的领导人事实上只不过是大多数人意愿延伸出来的执行者。因此他们的任务则是很少去制定一些完美的计划或想出什么绝妙的主意，以便得到现有管理机构的支持去贯彻执行，而更多的则是把那些认为有必要执行某些特定意图的大多数人召集起来。不管这种行为的结果如何？

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对此具体负责任的人。像这种本来是真正做出的决定倒成了无数次妥协的结果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而这种决定也反映出妥协本质和含义，可是到底该对谁负责任呢？现在纯粹个性鲜明的责任感一旦被清除，就会产生出形成强有力的领

导人作风的无法反驳的理由。要是把将个人权威和责任置于最高地位的军队组织和我们民主的平民机构做一个比较，而且只涉及到双方领导人受教育的情况，那么结果会叫人吃惊的。那么一种情况就是一个组织，有勇敢的、有责任心的、专业的人员组成，而另一种则是一群胆小怕事的无能之辈。

在四年半的时间里，德国的军队抵御住了历史上最强大敌人的联军。而被平民的民主破坏了国内领导机构，事实上，一开始就被几百个流氓和逃兵给摧毁了。德意志民族真正地失去了其伟大的领导者可以在其极为简短的，是我们自己通过将我们整个公众生活慢慢的侵蚀掉的民主议会制度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支离破碎的帝国解体声明中可略见一斑。人民必须自己做出决定，要么他们同意大多数，要么支持领导人，但又不会把自己托付给双方。可是至今为止，在这个世界上伟人总是由领导人来创造的，而且他们所创造的当然又会被大多数人再次给消灭掉。所以，一个民族因为其普遍的种族品质，也许拥有合理的愿望能够诞生出真正的领导人，只不过接下来必须要在体格培育方面寻找出一种不是人工培育的，而是有计划的，禁止对这些领导人产生作用的方式，要建立起一道防止愚昧的隔离墙，也就是不要让愚昧发挥作用。否则的话，一个民族强有力的权力根基就会受到动摇。作为一个民族内在力量的第三个因素就是自我生存的教育。

一个民族内在力量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其健康的、天然的维护自我生存的本能。由此才产生出无数的让一个民族自己为生存而战的英雄品德。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但又十分胆怯和无耻的自己占用这些利益，却能够取得巨大成就。

当然，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自己不进行英雄主义的教育，却可以期待人民具备英雄主义气概。所以就像国际主义损害了，并且也削弱了现存的种族品质一样，民主则破坏了个人品质，所以和平主义则麻痹了人民维护自我生存的天然力量。这三个因素就是民族品质本身现存的个人品质和健康的维护自我生存的本能是力量的源泉，由此才能够产生出维护民族自我生存而有必要一再拿起武器的、明智大胆的内政政策。军队的建立和武器的技术性问题就会马上找到适合人民在为了自由和每天的面包而坚持坚苦卓绝战斗的解决办法。

要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领导人对这样的观点视而不见，或者相信只从武器的技术性能方面来为战斗进行装备的话，那么他们只能够取得眼前的成绩，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未来是不会属于这样的一个民族的。因此，世界上所有真正伟大的立法者和政治家的职责绝不是限制战争的准备，而更多的则是无限制的对人民进行心灵上的精心培育和教育，以至于好像可以按照所有人类思想把国家几乎合法的保护起来。接着战争也就失去了其所独有的，至少是巨大震荡的特征，而是把自己列入了一个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国家基本的、稳固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当中去了。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不太重视这个观点，部分是因为民主的本质。这些人对民主的存在也表示感谢。另外还因为国家变成了纯粹形式上的，对国家领导人而言好像就是目的的本身的机械主义，而没有保护一个民族最起码的利益。民族和国家变成了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使命就是为了德国进行根本的转变。

本论 欧阳修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为治者有先后。尧、舜之书略矣。后世之治天下，未尝不取法于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后也。

三王之为治也，以理数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国，以井田域民，以职事任官。

天下音定数，邦国有定制，民有定业，官有定职。

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简而不劳。

财足于用而可以备天灾也，兵足以御患而不至于为患也。

凡此具矣，然后饰礼乐、兴仁义以教道之。

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风俗淳厚，而王道成矣。

虽有荒子孱孙继之，犹七八百岁而后已。

夫三王之为治，岂有异于人哉？财必取于民，官必养于禄。

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与后世之治者大抵同也。

然后世常多乱败，而三王独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后，而为之有条理。

后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劳而政益不就，認認然常恐乱败及之，而辄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后。

而于今之务众矣，所当先者五也。

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则未之思也。

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财；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

此有司之所知也。

然财丰矣，取之无限而用之无度，则下益屈而上益劳。

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则兵骄而生祸。

所以节财、用兵者，莫先乎立制。

制已具备，兵已可使，财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

是故均财而节兵，立法以制之，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厉贤，此五者相为用，有天下者之常务，当今之世所先，而执事者之所忽也。

今四海之内非有乱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时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

以晏然至广之天下，无一间隙之端，而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生齿之数日益众，土地之产日益广，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实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备故也。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

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

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

方今承三圣之基业，据万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尽大禹贡赋之地莫不内输，惟上之所取，不可谓乏财。

六尺之卒，荷戈胜甲，力彀五石之弩、弯二石之弓者数百万，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谓乏兵。

中外之官居职者数千员，官三班吏部常积者又数百，三岁一诏布衣，而应诏者万余人，试礼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择，不可谓乏贤。
民不见兵革于今几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内修法度，兴德化，惟上之所为，不可谓无暇。

以天子之慈圣仁俭，得一二明智之臣相与而谋之，天下积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礼，作乐，可如成周之盛；奋发威烈，以耀名誉，可如汉武帝、唐太宗之显赫论道德，可兴尧、舜之治。

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

世界观与党 阿道夫-希特勒

1920 年 2 月 24 日，新运动主持下的首次大型群众集会举行。在慕尼黑皇家啤酒屋宴会厅，我们向近两千名听众阐述了新党纲的 25 条纲领，每一条都受到了热烈欢迎。

因此，我们向公众介绍了这些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并据此开展新的斗争，以消除混乱的、陈旧的思想和观点，它们具有晦涩且往往有害的倾向。一股新的力量将在胆小懦弱的资产阶级中崛起。这股力量注定会阻碍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前进，并在命运战车即将抵达目标时使其停滞不前。显而易见，只有从一开始就成功地唤起追随者心中的神圣信念，即这不是在政治领域引入新的选举口号，而是必须推广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全新世界观，这场新运动才能获得公众的关注和支持，这是如此巨大斗争的必要前提。人们必须努力回忆起那些通常被称为“党纲”的、混杂在一起的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如何被不时地重新包装或打扮成新的形式。如果我们想正确理解这些纲领性的怪胎，就必须仔细调查那些激励普通资产阶级“纲领委员会”的动机。

当这些人将新事物引入他们的计划或修改计划中已有的内容时，他们总是受到同一个问题的困扰。这个问题就是下一届选举的结果。当议会政府中的这些艺术家们隐约感到他们所钟爱的公众可能准备摆脱旧有政党的束缚时，他们就开始给轴涂上新的颜色。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占星家，即所谓的“有经验的人”和“专家”就会站出来。他们大多是议会中的老手，丰富的政治经验让他们积累了大量经验。他们还记得以前群众失去耐心的迹象，现在他们诊断出类似情况出现的威胁。他们采用老办法，成立一个“委员会”。他们四处走动，倾听公众的心声。他们仔细阅读报纸，逐渐开始了解他们所钟爱的广大群众的愿望、拒绝的东西和希望的东西。对每个行业或企业所属的团体，甚至办公室员工，都要进行仔细研究，调查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现在，那些来自反对派的“恶意口号”突然被视为值得重新考虑，而且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这些口号令最初提出和传播它们的人感到非常惊讶，现在看起来似乎毫无危害，而且确实存在于旧政党的教条中。

于是委员会开会修订旧方案，并制定新方案。

对于这些人来说，改变信念就像士兵在战争中换衣服一样——旧衣服被虫子咬穿了。在新方案中，每个人都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农民们确信农业利益将得到保障。实业家们确信他们的产品将得到保护。消费者则可放心，他们的利益将在市场价格中得到保护。教师将获得更高的工资，公务员将获得更好的养老金。寡妇和孤儿将获得国家

的慷慨援助。贸易将得到促进。关税将降低，即使不能完全取消，税收也将几乎取消。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部分公众被遗忘，或者公众提出的要求之一没有传到政党的耳朵里。如果有任何空间，这也会被匆匆忙忙地修补到整体上：直到最终人们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包括他们的妻子在内的所有庸俗的人都能消除焦虑，再次露出满意的笑容。因此，在内心深处，我们坚信上帝的仁慈和选民的愚昧，现在可以开始所谓的“重建帝国”的斗争了。

当选举日结束，议员们举行了未来五年的最后一次公开会议，当他们可以离开让民众服从命令的工作，现在可以投身于更高、更令人愉悦的任务时——委员会解散，公共事务的逐步重组再次成为谋生手段，对议员而言，这意味着出席议会，以便领取每日报酬。议员们日复一日地前往议会，虽然他们可能无法进入会议厅，但至少会到达前厅，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签到簿，上面记录了出席议员的名字。作为对选民的义务，他们将自己的名字登记在册，作为回报，他们可以领取一笔小额补偿，作为对他们不懈努力和辛勤工作的回报。

四年过去了，或者在此期间，如果议会公司面临被解散的危险，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会突然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就像蛆虫无法不变成金龟子一样，这些议员蛆虫离开了伟大的木偶之家，振翅飞向心爱的公众。他们再次向选民发表演说，汇报他们完成的巨大工作，并强调对手的恶意顽固。他们并不总是得到感激的掌声；因为有时愚昧的群众会当面说出粗鲁和不友好的言论。当这种公众不感恩的精神达到一定程度时，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挽救局面。必须再次提升政党的声望。必须修改计划。委员会再次成立。骗局重新开始。一旦我们理解了公众难以理解的愚蠢，就不会对这种策略的成功感到惊讶。在媒体的引导下，被新方案的诱人外表再次蒙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选民忠实地回到共同摊位，再次选举他们的老骗子。“人民代表”和劳工候选人现在又变成了议会里的蛀虫，他们贪婪地吮吸着公共生活之树上结出的果实，变得又肥又圆——四年后，他们又摇身一变，变成了光彩夺目的蝴蝶。

没有什么比在清醒的现实里目睹这个过程，成为这种反复出现的欺诈的见证人更令人沮丧的了。在这种精神训练场上，资产阶级力量不可能发展出与马克思主义的有组织力量进行斗争所需的力量。事实上，他们从未认真考虑过这样做。尽管这些代表白人的议会庸医通常被认为智力低下，但他们足够精明，知道他们不可能真的寄希望于使用西方民主的武器来对抗一种学说，而西方民主及其附属品正是被用来达到这一目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民主来麻痹对手，从而放手实施自己的方法。当某些马克思主义团体暂时利用其聪明才智让人们相信他们与民主原则密不可分时，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关键时刻到来时，这些先生们对西方民主所理解的多数投票决定原则不屑一顾。在那些日子里，资产阶级议员们因为短视而相信，帝国安全是有保障的，因为帝国拥有压倒性的多数支持，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毫不犹豫地抓住最高权力，他们背后是一群游手好闲的人、逃兵、政治投机者和犹太人。这对许多议员所信仰的民主制度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只有那些轻信议会魔术师、代表资产阶级民主的议员们才会相信，那些一心想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世界毒瘤的人（他们就是这种毒瘤的载体）的野蛮决心，现在或将来，都无法被西方议会制度的魔法公式所遏制。马克思主义将与民主并肩前进，直到它间接地为自己的犯罪目的争取到那些思想以国家为导向的人

的支持，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要消灭这些人。但是，如果有一天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相信，我们的议会民主制就像巫婆的大锅，可能会通过多数票产生一种危险，这种多数票凭借其数量上的优势，有权制定法律，并可能认真利用这种权力来打击马克思主义，那么整个议会魔术就会结束。

红色国际的旗手们不会诉诸民主良知，而是会立即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发出愤怒的号召，随之而来的斗争不会在议会的平静氛围中进行，而是在工厂和街道上。 然后，民主将立即被消灭。在议会中代表人民的使徒们凭借智慧未能完成的事情，现在将由愤怒的无产阶级群众用撬棍和大锤成功完成——就像 1918 年秋天那样。他们一鼓作气，将唤醒资产阶级世界，让他们看清犹太人征服世界的疯狂想法，而西方民主制度恰恰是反对这种想法的有效手段。

正如我所说，只有非常轻信的人才会认为有必要遵守游戏规则，而当他面对的对手只是把规则当作幌子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时，这些规则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意味着，一旦这些规则不再符合他的目的，他就会弃之不顾。所有宣称奉行所谓资产阶级原则的党派，实际上都将政治生活视为议会席位的争夺。一旦他们的原则和信念不再适用于这场斗争，他们就会像沙石压舱物一样被抛弃。而纲领的制定方式也决定了它们可以被如此对待。但这种做法会相应地削弱这些政党的实力。它们缺乏强大的吸引力，而吸引力本身就能吸引广大民众；因为民众总是对那些对所提出的理念抱有绝对信仰的人所发出的强大号召力做出回应，再加上为捍卫这些理念而战的不屈不挠的热情。

当一方凭借系统的人生观（尽管这种人生观在许多方面都是错误的）所激发的战斗力量对既定秩序发起攻击时，另一方如果能从新的信仰中汲取力量，就能抵御这种攻击。这种信仰必须取代软弱懦弱的防御命令。我们必须发出勇敢无畏的进攻的呐喊。我们目前的运动被指责为革命，特别是被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内阁部长们——例如巴伐利亚的中间派代表——指责为革命。对于这些政治侏儒，我们只有一个答案。我们对他们说：我们正在努力弥补你们因愚蠢而犯下的错误。你们在议会中的投机行为已经把国家拖入了毁灭。但我们通过积极的政策，正在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我们将以不屈不挠的奉献精神捍卫它。因此，我们正在建立台阶，让我们的国家再次登上自由的殿堂。

因此，在建立我们运动的最初阶段，我们必须特别小心，不要让我们的激进组织堕落为一个促进议会利益的社会，而该组织是为建立一种新的崇高的政治信仰而战的。

第一项预防措施是制定一个纲领，纲领本身应倾向于培养某种道德上的伟大，从而吓退那些构成我们当前政党政治家主体的小人弱者。

那些最终导致德国衰亡的致命缺陷，最清楚地证明了我们考虑制定明确、清晰的纲领性目标是多么正确。

由于我们认识到了上述缺陷，我们意识到必须形成一种新的国家观念，这种观念本身也成为了我们新的总体生活观念的一部分。

在这本书的第一卷中，我已经讨论过“民族主义”一词，当时我说过，这个词的含义不够精确，不足以构成一个紧密团结的激进社区的核心。目前，各种各样的人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打着各种不同的观点招摇过市。在讨论民族社会主义劳动者党的宗旨和目标之前，我想先让大家清楚理解“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的含义，并解释它

与我们的政党运动的关系。民族主义这个词并不表达任何明确的概念。它可以有多种解释，在实际应用中，它就像“宗教”这个词一样笼统。无论是作为理论概念还是作为实践生活中的指导原则，我们很难赋予“宗教”一词任何确切的含义。只有当“宗教”一词与一种独特而明确的形式联系在一起时，它才具有确切的含义，这种形式将概念付诸实践。说一个人“虔诚地信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措辞，但总的来说，它告诉我们很少或什么都没有。可能有一些人满足于这种模糊的描述，甚至有些人认为这个词或多或少地描绘了被描述者的内在品质。但是，由于大多数人不是哲学家或圣人，这种模糊的宗教观念对他们来说，除了证明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思考和行动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它不会带来那种实用的信仰，只有当它脱离一般形而上学思想的范畴，并形成一种确定的教条式信仰时，内心的宗教渴望才会转化为这种信仰。这种信仰本身当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手段，就永远无法达到目的。然而，这个目的不仅仅是理想的东西，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是非常实用的。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一般来说，最高理想总是某种深刻生命需求的结果，正如最崇高的美归根结底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最美形态就是最适合其目的的形态。**

通过帮助人类超越单纯的动物生存水平，信仰真正有助于巩固和保护其自身的存在。以人类今天的存在为前提，考虑到人们普遍持有的宗教信仰，这些信仰通过我们的教育得到了巩固，从而成为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标准，如果我们现在取消宗教教育，而又不代之以任何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那么人类生存的基础将受到严重动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更高的理想，这些理想反过来又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此，这是一个循环。

当然，“宗教”一词意味着一些基本的观念和信仰。其中，我们可以认为灵魂是不朽的，灵魂在未来将永恒存在，相信有更高的存在，等等。但无论个人对这些观念的信念多么坚定，任何人都可以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并据此接受或拒绝，直到情感概念或渴望转化为一种由明确界定的教义信仰所支配的积极服务。这种信仰为宗教情感提供了表达自己的实际出口，从而开辟了将其付诸实践的道路。

如果没有明确的信仰，宗教情感不仅对人类生存毫无价值，甚至可能因其模糊和多样的倾向而造成普遍混乱。

我对“宗教”一词的描述同样适用于“民族主义”一词。这个词也隐含着某些基本理念。尽管这些想法确实非常重要，但它们具有模糊和不确定的形式，在成为政党结构中的构成要素之前，不能被视为比单纯的见解更有价值。因为，为了赋予从世界观中产生的理想以实际力量，并满足这些理想所导致的合理要求，单纯的情感和内心的渴望并不能提供实际帮助，正如不能通过普遍渴望自由来赢得自由。不，只有当对独立的理想主义渴望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能够以军事力量为理想而战时，一个民族的迫切愿望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现实。

任何世界观，即使对人类无比正确和有益，只要其原则尚未成为军事化运动的集结点，就无法为维护一个民族提供实际服务。而且，就其本身而言，这一运动在将其理想转化为胜利并将党的理论转化为最终形成国家的新基础之前，仍将只是一个党派。

如果抽象的普遍性概念要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础，那么首要前提是明确理解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和范围。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运动，从其原则和信念的

内部凝聚力中汲取必要的战斗力。必须从一般性思想中构建政治纲领，而一般性世界观必须带有明确的政治信仰的印记。由于这种信仰必须指向在现实世界中必须实现的目标，它不仅必须服务于总体理想，还必须考虑到为实现理想而必须采取的手段。在这里，政治家的实践智慧必须为抽象的理念提供帮助，而抽象的理念本身是正确的。这样，永恒的理想作为人类前进的指路明灯，必须适应人类脆弱性的需求，这样，其实际效果就不会因为人类普遍存在的缺点而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真理的倡导者必须与对人民灵魂有实际了解的人携手合作，以便从永恒的真理和理想的领域中挑选出适合人类本性能力的部分，并赋予其实际形式。从建立在坚实真理基础上的世界观中提取抽象而普遍的原则，并将其转化为一个拥有相同政治信仰的激进团体——一个定义明确、组织严密、思想统一、意志坚定的团体——这种转变是所有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项；因为能否成功实现这一理念取决于能否成功完成这项任务。在数百万感受到这些理念的真谛，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它们的人中，必须有一人脱颖而出。这个人必须具有以清晰明确的形式阐述一般性理念的天赋，并且必须从大众脑海中浮现的模糊理念中提炼出清晰坚定如花岗岩的原则。他必须为这些原则而战，因为它们是唯一正确的，直到在飘忽不定的思想之浪中浮现出一块坚实的共同信仰和共同意志之石。这种行动的一般理由在于其必要性，而个人的成功则证明其合理性。

如果我们试图深入探究“民族主义”一词的内在含义，我们会得出以下结论：

当前的世界政治理念认为，国家虽然拥有建设文明的创造力，但与作为国家基础的种族概念毫无共同之处。国家被视为经济需求的结果，或者充其量是政治力量和冲动发挥的自然结果。这种对国家基础的概念，连同其所有逻辑后果，不仅忽视了构成国家基础的原始种族力量，还导致个人重要性被最小化的政策。如果否认种族在文化创造力方面存在差异，那么这种错误观念必然会影响我们对个人价值的评估。认为所有种族都一样的假设会导致认为国家和个人彼此平等的假设。国际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将普遍的人生观应用于特定的政治信仰而已；但实际上，这种普遍的人生观早在卡尔·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不是已经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教义就不可能取得惊人的政治进步。实际上，卡尔·马克思与数百万受其影响的人的区别在于，在一个已经逐渐瓦解的世界中，他利用敏锐的预见能力，发现并提取了致命的毒药，并像巫师一样，将这些毒药浓缩在一种溶液中，从而迅速摧毁了全球独立国家。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种族。

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今普遍生活观念的集中体现。仅凭这一点，认为所谓的资产阶级世界能够有效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想法就是不切实际的，甚至荒谬可笑。因为资产阶级世界充斥着同样的毒药，其总体生活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仅在于程度和持有者的性格。资产阶级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相信某些群体——即资产阶级——能够统治世界，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则系统性地致力于将世界交给犹太人。

与此相反，民族主义的世界观认为，原始种族元素对人类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原则上，国家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这一目的是维护人类的种族特征。因此，根据民族主义的原则，我们不能承认一个种族与另一个种族是平等的。民族主义认为种族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将人类划分为优劣不同的种族。基于这种认识，它认为必须符合主宰宇宙的永恒意志，即假设更优秀、更强大的人会取得胜利，而更差、更弱的人则处于

从属地位。因此，它向自然界所有运作背后的原则即贵族原则表示敬意，并认为这一法则甚至适用于最微小的个体。它从大众中挑选出个体价值，从而作为组织原则发挥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则起到瓦解的作用。民族主义认为人类必须拥有理想，因为理想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但另一方面，它又否认道德理想有权凌驾于种族之上，如果它危及到作为更高道德理想旗手的种族生存的话。因为在一个由混血儿和黑种人组成的世界上，人类所有关于美丽和高尚的理想以及人类对理想未来的所有希望都将永远消失。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类文化和文明与雅利安人的存在密不可分。如果雅利安人被灭绝或征服，那么地球将笼罩在野蛮人时代黑暗的阴影中。

在那些相信民族观念是人类生存基础的人眼中，通过消灭人类文化的创始者和守护者来破坏其存在，将是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任何敢于对上帝在造物中的最高形象举起亵渎之手的人，都将犯下对这位奇迹创造者的亵渎，并将被驱逐出天堂。

因此，民族的世界观与自然的意志高度一致；因为它恢复了各种力量的自由发挥，这些力量将引导人类经历持续相互教育的各个阶段，最终走向更高级的类型，直到人类中最好的一部分拥有地球，并自由地在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工作，甚至到达地球以外的领域。

我们都觉得，在遥远的未来，许多人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人类中更优秀的种族才能解决，这个种族注定会成为所有其他民族的主人，并拥有整个世界的资源和手段。

显然，对民族世界观的这种概括性描述可以有千百种不同的解释。事实上，我们最近的政治运动几乎没有一个不在某种程度上参考这种世界观。但面对其他各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存在，这证明它们看待生活的角度与此截然不同。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由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中央组织主导，而与之相对的是各种杂乱无章的观点，面对敌人所组成的坚固方阵，这些观点显得微不足道。如此薄弱的武器无法取得胜利。**只有当国际主义思想（在政治上由马克思主义组织）与民族思想（同样井井有条、同样领导有方）交锋时，一方的战斗能量才能与另一方势均力敌；胜利将属于永恒真理的一方。**

但只有当对生活的一般性概念进行精确、明确的表述时，它才能得到有机的体现。教条在宗教信仰中发挥的作用，与政党原则在建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因此，对于基于民族观念的生活理念，有必要锻造一种工具，用于为这一理想而奋斗，类似于为国际主义扫清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

这就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劳动者运动追求的目标。

因此，必须明确地提出民族概念，以便将其有机地纳入政党。这是这一理念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反对将民族理念与政党原则相融合的人的间接承认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那些从不厌倦地一再坚持认为基于民族观念的生活理念不可能成为单一群体的专属财产的人，因为这种理念在无数人的心中潜伏或“活着”，他们自己的言论恰恰证实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这种理念在数百万人的心中普遍存在，但不足以阻止以阶级冲突为原则组织的政党所倡导的反对理念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德国人民应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不是发现自己处于深渊的边缘。国际意识形态之所以取得成功，

是因为它组织在一个好战的政党中，这个政党时刻准备着发动进攻。如果迄今为止，与国际概念相对立的观念不得不让位于后者，那是因为它们缺乏一个为他们的事业而战的统一战线。一种形成明确人生观的学说，不能允许对其一般教义进行自由解释，而只能通过在必须接受的某些信仰条款中定义教义，并将其纳入政治组织，才能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

因此，我认为我的特殊职责是从一般世界观广泛而模糊的内容中提取出至关重要的思想，并赋予它们或多或少教条的形式。由于这些思想具有精确而明确的含义，它们适合团结所有愿意接受它们作为原则的人。换句话说：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劳动者党从基于民族观念的世界观中提取出基本原则。在这些原则上，它建立了一种政治学说，这种学说考虑到了当今的现实、时代的本质、可用的人力资源及其不足之处。通过这种政治学说，可以将大量民众纳入到一个尽可能严密的组织中。这样的组织是实现这一理想最终胜利的主要前提。

斗字哲学 萨维特里-德维 选自《熔炉中的黄金》一书

“你让每个人各司其职。你让他们在形体、言语和肤色上有所不同。作为划分者，你划分了异族。”——阿肯那顿

“种姓混乱源于女性的堕落；种姓混乱源于记忆的丧失；记忆的丧失源于理解的缺失；而这一切都源于邪恶。”——《博伽梵歌》

“过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消亡了，因为最初富有创造力的种族因血统中毒而消亡了。”——阿道夫·希特勒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注定会吸引数百万人，但并非每个追随者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只要运动取得胜利，这一点并不重要。追随者越多越好。

即使是那些为了物质利益而加入党的人，也可以加以利用。至少，他的孩子——只要血统无可挑剔——可以被培养成比他更优秀的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但是，只有那些为了重要的根本性原因而坚持民族社会主义理念的人——只有那些在其中找到了自己毕生哲学的完美表达的人——才能指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这一理念。我并不是说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坚持这一理念。责任感、对辉煌历史的骑士式义务感、对曾经赋予他们巨大特权的政权的感激之情，当然可以促使成千上万的人在难以言喻的艰难困苦中保持忠诚。我们应该赞扬这成千上万的人。然而，没有任何忠诚是值得的，除非这种忠诚是基于背叛自己本身，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人们无法通过武力杀死世界观——对宇宙的看法；哲学——只能通过另一种世界观的积极影响来杀死。”**

这是民族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原话。 25 年后的今天，这句话是多么真实！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那些能够（并且将会）抵抗并最终击败暂时胜利的世界联合力量的人——他们不仅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政治方面，而且对民族社会主义的人与生活的概念都如此自然，以至于任何其他“世界观”都无法吸引他们，无论那些假装懂得内外广告艺术的人如何巧妙地宣传。

民族社会主义对人和生活的理解绝非“新潮”。它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的拥护者可能就是人类最古老的先知，其基本原则与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只有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是新的。它不仅新颖，而且独一无二。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它是在坦然承认决

定种族发展和文化创造的永恒法则的基础上，有系统地尝试建立国家——不，是组织一个大陆——的唯一尝试；是阻止优秀种族衰落和随之而来的混乱的理性努力。这是卓越的“与时间对抗”的运动——与历史悠久的衰落趋势对抗的运动——意识到摆脱我们堕落时代的邪恶和丑陋的唯一出路，回到每一个伟大开端带来的喜悦和荣耀，并勇敢地推动西方最崇高的人民沿着这条路前进。但为了欣赏其新颖性和美感，人们应该牢记其背后的永恒哲学，即我所称的“卐”哲学。

这不是任何人的哲学。在真正伟大的人们的清醒意识中，从吠陀和后吠陀印度最古老的雅利安立法者到今天的阿道夫·希特勒，他们都能感受到宇宙的智慧、太阳的哲学，以及地球的父母。因为人只是宇宙的一部分——正如一位杰出的英国作家所说，人只是“太阳的产物”！他不能无视那些管理整个生命的永恒法则，为自己制定法律。

特别是，他不能无视那些管理育种和种族进化的法则，并期望逃避迟早会出现的后果，即“违背造物主意志的罪过”和“身体和道德的堕落”。基督教哲学——不，所有国际宗教的哲学，其信徒“任何人”都可以与所有其他信徒平等地成为信徒——强调人的思想、“灵魂”和“非物质”的一面（被认为是永恒和宝贵的），而牺牲了短暂的事物：身体。它忘记了身体作为传递生命的载体，也具有神圣的永恒性；它不仅是“圣灵的殿堂”，也是圣灵在个人、个人后代乃至整个种族中的意识的创造者。

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它们都不是“国际性的”，但都适用于它们在其中孕育出超人类智慧的族群——都强调人的身体的重要性；生命行为的圣洁；身体不仅对作为发展工具的个人“灵魂”，而且对过去和未来世代；**对种族，即对种族所属的宇宙，都负有义务和责任。他们坚持对每个人祖先的私人崇拜和对每个民族英雄的公共崇拜**，禁止反对的婚姻，认为这是对死者、对未出生者——对永恒生命的亵渎。他们理所当然地承认人类之间存在根本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源于不可估量的原因；承认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以及两性之间的绝对差异。我们没有复制古人。任何生物都不是“复制”。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如果有什么的话，是活着的；尽管其敌人暂时取得了胜利，但它仍然是生命中真正的一股力量

希特勒——再次意识到没有智慧，生命必将衰败；**从历史之初开始，人类逐渐堕落**，尤其是雅利安民族的衰落，正是逐渐遗忘智慧的结果。我们再次意识到“上帝只眷顾纯种血统”这一事实。

至少从过去 1500 年来主导西方意识的人为宗教和以人为中心的道德观中，我们回归到以生命 以生命为中心的宗教观，以个人和种族权利不平等和义务多样性为基础的道德观，以及宣扬优秀种族和优秀个人统治权利和义务的政治理念。我们开始让这个世界首先成为优秀者——人类种族精英——的安全之地，然后成为所有生命在优秀者保护下的安全之地。

事实的确如此，在世界上，印度是雅利安人贵族传统从未被淹没的地方，**尽管这种传统在几个世纪中可能已经变得僵化**，但印度的聪明而正统的代表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判断比德国以外的大多数欧洲人更清晰。如果让许多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知道，在最近的那场战争中，元首的胜利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受到了多么热烈的欢迎，他们一定会感到惊讶。毫无疑问，其中表达了对英国统治的强烈敌意。但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这是对公平、强大、真正卓越的雅利安人（Aryans）六千年来坚定不移的

忠诚，他们崇拜太阳和北极光，曾将《吠陀经》从他们久违的北极故乡带到了这里，并建立了文明，直到今天，在印度，仍然带有他们的印记；认识到那些古老的、神圣的雅利安人的精神终于在他们最真实的传统中觉醒，这是人类永恒的种族所赐予的古老礼物。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表达出来，但许多人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已经有不止一位高种姓的印度教徒意识到了欧洲冲突的本质——不是德国与英国之争，**而是民族社会主义与各种形式的民主之争；真正的雅利安人观与犹太人观之争**——我已经说过，已经有不止一个人将西方复兴的推动者阿道夫·希特勒视为“Devata”，即“闪耀者”，一个超越人类的存在，是永恒救主的现代化身。我听到过他们这么说，其中一些人是在公开场合说的。但就在那个年代，在印度文盲群众的朦胧意识中，也涌现出了非凡的直觉。我永远记得一个年轻仆人——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在辉煌的 40 年代对我说：“我也崇拜你们的元首。”当我问他是否只是因为元首的胜利才崇拜他时，男孩回答道： “哦，不！我钦佩他，爱戴他，因为他正在努力用《博伽梵歌》取代西方的《圣经》。”他是在加尔各答鱼市的一次谈话中得知这一非同寻常的信息的。我惊呆了。虽然这信息听起来有些异想天开，但精神实质却完全正确

我脑海中浮现出古老的梵语经文：“种姓混乱源于女性的堕落；种姓混乱源于记忆的丧失；记忆的丧失源于理解的缺失；而这一切的根源则是万恶之源。”**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不加区分的繁殖导致不平等种族的混合（ 总是对优秀种族不利）；从这种混合中，产生了种族记忆的丧失——对自己的祖先是谁以及自己是谁的无知——由此导致对自己权利和义务——自己在世界上的自然地位——缺乏理解，其后果是： “一切罪恶”，衰败；死亡。是的，“欧洲新秩序”的确意味着恢复这篇远古文献中表达的雅利安人世界观，与所有平等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相对立；意味着卐字哲学战胜十字架、新月、锤子和镰刀，终结“一切罪恶”的原始根源：可耻的繁殖。**

确实，阿道夫·希特勒发动战争是为了捍卫新秩序，抵御那些企图摧毁新秩序的分裂分子。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几个世纪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在生活和奋斗中做到绝对无私和超然——实际上，他做到了这一点，正如《博伽梵歌》所教导的那样。令人惊叹的是，相隔如此遥远的人们，竟然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句子来表达这个真理。

民族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伟大之秘在于种族固有的品质，而种族固有的品质则源于血液的自然高贵。问一个种族为什么比另一个种族更有天赋，问一个种族为什么有创造天赋而另一个没有，都是没有用的。这就像问一棵梧桐树为什么不是一棵橡树一样愚蠢。

太阳本身，负责人类和其他生物物种之间的所有差异，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它决定了这个星球上哪个种族是卓越的创造者。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太阳象征——卐字——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阿道夫·希特勒决定如此，其背后是太阳的神圣意志。希特勒关于雅利安人在全世界、各个时代至高无上的所有言论在历史上都是正确的，这一点尤其令人惊讶——更何况，在他写下那本著名著作时，这位元首对德国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士兵参战的伊普尔战场和其他地方），也从未有时间成为学者。他写出了自己的心声。然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奇特的纪念碑在椰林中拔地而起，在奇异的天空下勾勒出雄伟的线条；用奇特的语言吟唱赞美诗

和诗歌；古老记忆和神圣传统在奇特的民族中流传——其中一些，也许在 1923 年他还不知道——都印证了他所写下的真理。南印度寺庙中的绘画和雕塑、马拉巴尔海岸的神圣舞蹈剧、吴哥窟废墟上的壁饰、流传至今的印度、爪哇、巴厘岛故事，都颂扬着雅利安英雄拉玛的丰功伟绩。拉玛的事迹曾让东方和南方为之惊叹，被征服民族的后代至今仍将其奉为神明。当人们回想起这些艺术作品和传统背后的灵感时，不禁惊叹于现代雅利安人种族拥护者在莱希河畔兰茨贝格堡垒中写下的对人类进化的大胆总结的精确性：《我的奋斗》第一部分第十一章。事实上，无论人们在哪里欣赏伟大文化的有形遗迹（只要人们愿意花时间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去），最终都会追溯到辉煌的北方创造者种族，包括梵语史诗中歌颂的（以及南方崇拜者用他们的技术描绘的）德瓦利安寺庙和柬埔寨宫殿墙壁上的美丽战士，以及《我的奋斗》的作者本人和他所热爱的民族。整个亚洲或多或少都受到印度思想的影响。

而印度思想——梵语思想——不过是热带环境中雅利安人或北欧灵魂之花。如果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人们也可以证明同样的影响催生了古老美洲的文化，而“卐”符号在美洲文化中也是神圣的——同样的事实，即“原始创造者的种族”因混血而逐渐消失，导致了他们的衰落——那么，人们只能证明希特勒对历史的直觉是多么非凡，以及他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的基石是多么稳固。

有人说，阿道夫·希特勒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唤醒了德国人的爱国主义，这是前所未有的。那些憎恨德国的人——那些试图打压德国的人，或者认为他们有此兴趣的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憎恨他。但实际上，他的伟大之处远不止于此。他所激发的德国爱国主义**并非欧洲每个孩子在学校里都学过的传统爱国主义，而是更广泛、更深刻、更自然的一种情感。**这是德国人民对全世界雅利安人意识的表达——他们是最早有机会在西方恢复这种意识的民族——这种意识超越了国界；这是对所有那些人的集体自豪感的表达，无论他们现在离他们最初的北欧家园有多远，他们声称属于这个真正高贵而美丽的种族，而世界上的优秀文化都源自这个种族。在希特勒极具个人魅力的感召下，德国人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重获胜利的青春迸发；欢歌载舞，自由万岁，规模达到数百万——尽管德国人民遭受了长达 1500 多年的精神摧残。

但这并不是“德国奇迹”的全部。它还在于——甚至可能更在于——全世界的雅利安人（诚然，他们为数不多，但都是精英）都把希特勒和德国视为他们权利的捍卫者，视为注定要最终实现他们古老愿望的人和国家。事实是，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人为民族社会主义理念甘愿在本国的集中营中受苦；与德国交战的多个外国人民——包括一两个法国人——为此献出了生命；1942 年，在遥远的印度，一些男男女女满怀喜悦地等待着德国军队从俄罗斯穿过阿富汗，沿着六千年前第一批雅利安征服者走过的凯布尔通道的胜利之路，与日本盟友在德里会师；这场战争结束后，仍然（并且仍然存在）一小部分非德国雅利安人，他们愿意在被占领的德国土地上面对酷刑和死亡，以反抗民族社会主义的迫害者。阿道夫·希特勒在世界范围内的号召力充分表明，尽管现代形式的民族社会主义起源于德国，而且不可能起源于其他任何地方，但民族社会主义的教义超越了德国。正如我所说，这是从北欧种族的角度理解的生命法则和人类种族进化永恒的真理。毫无疑问，北欧种族是天然的贵族。首先是一个身体上的贵族。

要确认这一点，只需看看其代表人物，尤其是德国人和瑞典人中血统最纯正的日耳曼人，他们也许从外表上看就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从整体上看，他们也是品格高尚的贵族。人们只需与斯堪的纳维亚人、德国人或真正的英国人生活在一起，在经历了多年与不太纯正的雅利安人或完全不同种族的人相处之后，就能发现这一点。他们也是善良的贵族——这是他们最吸引人的优越之处。这是事实。最好的证明是，大多数纯种北欧儿童对动物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同情，甚至在他们被教导之前。与其他种族的孩子相比，他们天生的残忍行为几乎毫无例外：五岁的德国或英国孩子会停下来抚摸一只猫，或者给街上的狗喂食。而来自地中海地区或中东的五岁孩子却会向狗扔石头，扯猫的尾巴，甚至做出更恶劣的行为。除了北欧血统明显占主导地位的少数地区，世界各地的大人对动物的痛苦都漠不关心，这已经足够令人震惊了，更不用说大多数孩子与生俱来的恶劣行为了。仅此一点就足以证实人们相信纯种雅利安人的优越性，并增强人们的希望，即经过三四代人的适当训练和开明的育种，这个种族可以成为超人的种族，创造一个值得尼采梦想、值得希特勒热爱的新的黄金时代文化。这足以证实一个人的信念，即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所承担的任务——系统地加强欧洲的主导种族，使其能够延续无与伦比的超级文明——过去和现在都是值得的。

众所周知，这项任务始于德国，颁布了一系列旨在阻止一切不良繁殖（从而防止种族在身体和道德上进一步恶化）的健全法律，并开展大规模的新教育。当人们想起阿道夫·希特勒于 1933 年执掌政府，而英国作为国际犹太人的忠实工具，于 1939 年向他宣战时，人们不禁惊叹他在六年内取得的巨大成就。任何神灵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然而，如果没有新的或古老的宗教观，没有重生北欧灵魂的表达，没有与民族国家并肩成长，那么实际采取的措施将不足以使人民在数个世纪内保持理想的道路。运动中的杰出人物——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不仅仅是像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样的理论家，以及恩斯特·伯格曼等新思想教授，就连戈培尔博士这样冷静而务实的人也一再强调，**如果民族社会主义要取得持久的胜利，就必须消除各种基督教教派的影响。事实上，由于与犹太人外国代理人之间的战争，我们无法对与教会，特别是与天主教的斗争给予足够的关注——天主教是德国国内所有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中最顽固的反对者——我认为，这一事实必须被视为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教会战后对战败的民族社会主义主义的态度充分证明了它们在民族社会主义战败中负有的责任，以及它们希望在民族社会主义废墟上获得多少权力。但除了我们本能地讨厌他们之外，我们还有更深层次的意识，知道我们代表什么。教会作为世俗组织，商业化且权力欲强，已经够糟糕的了。基督教“世界观”本身才是民族社会主义主义的更可怕的敌人。试图掩盖事实以“不吓到”人们是徒劳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和基督徒。说一个人可以这样做是胡说八道。指出一些确实身兼两职的人的具体例子是在浪费时间。这样的人要么是坏基督徒，要么是坏民族社会主义者，要么两者都是；他们要么是真诚但不讲逻辑的人，要么是自欺欺人的骗子，要么是试图欺骗他人的狡猾之徒。**

人们只要花五分钟时间思考，就会发现，以种族和个性为中心的教义不可能与宣扬在上帝眼中所有灵魂都同样宝贵、上帝憎恶骄傲的教义并存。如果教会认为合适，也

许有一天会考虑与我们妥协的可能性。但基督教——顺便说一句，**任何以人为中心的平等宗教——与民族社会主义哲学之间绝不可能有任何妥协。**如果我们要最终取得胜利，那么基督教就必须消失——无论我们那些至今仍带有基督教教养烙印的朋友是否乐意。基督教必须消失，这样，它在一千多年前所扼杀的北欧灵魂才能以焕然一新的力量和自豪感再次焕发生机；这样，德国以及所有仍有雅利安血统的国家才能发展出自己的宗教意识——如果罗马和耶路撒冷从未干涉过他们，他们本应拥有的意识。重生的雅利安人的宗教与欧洲北部基督教之前的宗教自然有许多共同之处，而印度的吠陀传统中也有类似的起源和精神，并一直延续至今。首先，它必须是一个健康、自豪、自立、习惯战斗、随时准备牺牲、同时乐于生活、并坚信自己将在永无止境的竞争中永存的民族的宗教；**它必须是一个以崇拜生命和光明为中心的宗教——以崇拜英雄、崇拜祖先、崇拜太阳为中心的宗教，太阳是地球上所有欢乐和力量的源泉。事实上，它必须是一种充满欢乐、力量和爱的宗教，而不是那种病态地爱着病态和罪恶的“人类”，而牺牲了更值得钦佩的自然，而是爱着一切美好的生命：爱着森林和野兽；爱着健康的儿童；爱着在各个领域中忠诚的 各个领域的忠实伙伴；敬仰自己的领袖和神明；最重要的是，敬仰至高无上的神，敬仰太阳中的人格化的生命力，引用古代最伟大的太阳崇拜者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来说，就是“圆盘中的热与光”。**

再生雅利安人的宗教必须让基督教的“罪恶孕育”理念让位于高尚种族中荣誉和喜悦的孕育，唯一的“罪恶”（以及各种形式的懦弱和不忠）是可耻的生育——对种族致命的罪恶。在我们这个时代，**民族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冲突**只是长久以来两种信仰之间斗争的一个方面。这两种信仰分别是：一种接受人类种族和个体自然等级的信仰，这种信仰认为人类与动物物种一样，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以及以人为中心的信条，后者否认不同人类之间不可逾越的素质差异，同时却人为地将“人类”整体与其余生物区隔开来。**当今最卓越的以人为中心的信条——共产主义——不过是基于“多数人的声音”的西方民主的自然和合乎逻辑的结果，正如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多次指出的那样。但西方民主反过来又是数百年基督教教义的自然和合乎逻辑的结果。**

卢梭的所有感性胡言乱语以及后来关于所有人“平等权利”的无稽之谈（法国大革命正是凭借这些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了声望）在未受犹太教影响的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犹太教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关于所有人灵魂平等权利的原始犹太胡言乱语的影响，也没有受到后来在博爱上帝眼中“人人享有尊严”的影响。

我们当中那些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以及那些认为我所称的“民族社会主义哲学”——他们内心深处渴望的表达——是唯一令人满意的哲学的人，能够平静地面对现在和未来的困难。任何民主、人道主义或基督教宣传，无论是直言不讳还是变相的，都无法改变他们。他们构成了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少数派，在未来的崩溃之后，有一天，不屈不挠的雅利安人种将聚集在他们周围，在希特勒不朽的鼓舞下，开启新的历史周期。

《为世界观而战》选　阿尔弗雷德 罗森堡

1918 年 11 月，当士兵们从世界大战中归来时，他们和千百万经历过艰苦岁月的人们一样，只有一个愿望：重新投入到自己的职业和个人生活中去。但很快，人们就发

现，整个外部和内部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大战在两个时代之间造成了鸿沟，而这两个时代之间不再有任何深刻的联系。1914 年之前的生活形式似乎无法理解；战前的肤浅乐观主义与现在格格不入；纯粹的商业心态毫无意义。如果说在胜利的国家里，对过去的疏离感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来，但由于他们沉醉于所获得的物质力量，对旧世界的内在抵抗力却在增强，尤其是在战争的结果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甚至绝望的地方。

今天，在我看来，千百万人的灵魂深处正在唤醒一种日益增长的意识，这种意识表达了一种深刻的认识，即我们正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动荡之中，生活在一个不仅在某些生活领域，而且在整个生活意义上都意味着深刻转折的时代。在我们所到之处，旧的原则已被人们淡忘，旧的领导层已不复存在。

在公共生活中，我们看到许多不久前还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如今已不复存在。在千百万人的思想和心灵中，各行各业和社会各阶层的评判和偏见已经消失。在政治领域，看似根深蒂固的旧党派已从生活舞台上消失。

它们都是事实的外在见证，即它们的背后从未有过强大的前景，在它们周围聚集着十九世纪的庞大组织：**工业和商业的力量，大量金钱的集中。归根结底，这些力量的退却只是意味着他们内部已经不相信，他们不再拥有内在的抵抗力量，无法积极面对新时代及其问题。**

今天，数百万曾经追随所有这些逝去的原则和派别的人正在寻找新的生活。这也是民族社会主义者在这 14 年中取得成功的秘诀，即：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攻击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党派，而是对所有团体、党派进行了直接根本的颠覆。因此，这场斗争不仅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是合理的，最重要的是在世界观上也是合理的。单靠政治上的胜利永远无法使我们的运动实现其预期目标。如果今天我们满足于纯粹的国家政权，那么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就无法完成其使命。

如果这仅仅是一个政治力量更迭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道义上的权利要求人们在这 14 年里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我们就不能容忍人们为这场运动和他们的元首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即使我们可以说，今天被推翻的政治体制已经腐朽，我们为政治革新而斗争是正确的，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说，除非我们能够用伟大的思想、坚定的信仰、我们整个生命的创造性内容来熏陶和渗透它，否则这种新的政治发展不可能比我们自己的生命更持久。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久经考验的国家和民族精神代代相传，才能永远打败被推翻的恶势力，使其永远不再压迫德国人民。

我们都处在一场精神体系截然不同的斗争中。往往具有截然相反的本能的世界观在争夺每个德国人的灵魂。我们把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世界观称为自由主义世界观，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十九世纪末出现，我们最终从所有这些赝品中发现了中世纪的残余。

我们所反对的自由主义世界观是德国人，不仅是德国人，而且是所有欧洲人日益城市化的结果。**由于日益脱离血缘和土壤，大城市的居民逐渐丧失了评估其行为是否合宜的能力。有创造力的农民或工匠，面对自己劳动的最终成果，可以随时检查自己的活动手段和方法是否恰当和正确，即是否富有成效。而机器之人，十九世纪末大型工业企业的奴隶，却无法正确判断自己职业的目标和手段。**因此，最初的自由主义个人

完美论最终导致了大城市不流血、不接地气的知识分子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与这种与世界和人民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主义相伴而生的，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广大工人阶级，他们在那个时代找不到能够照顾其精神和物质命运的保护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一长期发展的结果：毫无根据的知识分子与不再有血缘关系的“无产者”的结合。这两个同样不幸的阶级成为了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敌视人民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正如吸食鸦片的人在陶醉的瞬间看到最美丽的城堡并大胆地梦想统治世界一样，世界上所有人民、所有城市的广大群众也被这种马克思主义鸦片所陶醉，背叛了他们自己的天赋利益。整整十四年来，我们在德国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座城市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进行了斗争：今天，我们在政治和国家层面上粉碎了这一教条。然而，时不时地回顾这些理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就在今天，当我们处于政治权力的顶峰时，我们并不满足于这 14 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根深蒂固还存在着许多先决条件，因此，仍然有必要与这些世界观原则进行斗争。

因此，我想在这里概述四个要点。

1. 当马克思主义谈到全世界所有无产者的团结时，它并没有因此而宣布一个为工人谋利益的口号，相反，它破坏了德国工人的重要根基：只要民族还活着，工人、农民或手工业者就会被他的命运与血缘和土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自从世界存在以来，只有富人才有机会到许多国家旅行，结识外国人民。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工匠，从来都不是国际主义者，而只是魔术师、江湖骗子和江洋大盗。

2. 因此，正是这些类型的社会在大城市的发展中脱颖而出，这绝非偶然。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理论是宣扬阶级斗争。通过它对工人进行了第二次打击，因为鼓动有机体的一部分反对同一有机体的另一部分，然后承诺治愈整个身体，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对工人内在的、有机的和外在的最大欺骗。即使我们意识到，千百万人在这一口号下游行，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另一场针对他们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从上面针对他们。因此，历史的判决将谴责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斗争，就像谴责自下而上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一样。两者都是德国人民不幸的罪魁祸首。

3. 宣扬和平主义是混淆这两个概念的必然结果。这股思潮的含义不外乎是将已经受到严重破坏的人民大众交到敌对的外部世界手中。这种形式的和平主义——绝不能与真正的爱好和平混为一谈——是一种叛国的号召，是一种联合德国的所有敌人并剥夺德国人民抵抗能力的手段。近年来，我们看到了这一口号在外交政策上造成的后果，它把我们拖进了赔偿的奴役中，拖进了我们整整十四年来深陷其中的被忽视的外交政策中。

4. 最后，一种特别深刻的精神毒害是对财产概念的否定。我们很清楚，财产概念在 19 世纪的表述和理解完全违背了德国人的感情。然而，马克思主义拾起并使用了普鲁东抛出的这个词，并宣称：财产意味着盗窃。因此，它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态度领域否定了内在的冲动和创造力：因为它原则上否定了每个艺术家和发明家对其天赋和创造力成果的所有权，并剥夺了农民对其工业成果的所有权。因此，马克思主义宣扬

普遍的劣根性，把每一个伟大的人物贬低到最没有生产力和最没有价值的个人的水平。我们反对以诚实或不诚实的方式获取财产来决定财产价值的观点。

因此，对我们来说，财产的概念不是一个苍白的理论之争，而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生活的敌视在马克思主义实践中表现为：**不是财产被宣布为盗窃，而是最大的盗窃被宣布为正当财产。**

战前的人们，除了极少数例外，都认真对待强加某种思想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实际后果，嘲笑尼采、瓦格纳、拉加德和杜林等失败的预言家，让他们陷入痛苦的孤独，或者把他们逼疯。他们从事世界贸易和技术活动，武装自己，但却过着肤浅的乐观主义生活，没有感受到厄运即将来临的沉重。直到 1914 年 7 月，乌云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暴风雨终于来临。直到那时，整个世界才突然意识到，**生活的本质不在于做交易，而在于完成任何国家都无法逃脱的伟大命运。**这些年震撼了德国，也震撼了所有国家的核心。

1914 年，德国人民摆脱了一切外国的糖衣炮弹，1914 年 8 月，德国革命开始了。但是，四年的苦难、最宝贵力量的连根拔起、精神力量的耗费，尤其是 1918 年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失败，将德国推向了悬崖。

于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后结果，同时也是可怕的世界灾难的第一个预兆，共产主义革命兴起了。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运动不是一种经济理论，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力量，也是文化衰落的可怕象征，是人类灵魂被迫捍卫已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形式的绝望象征。在这里，恰恰是这场共产主义运动触及欧洲最神圣的民族的地方，它必须表明在哪里还存在着克服这些世界观和政治危险的抵抗力量。如果我在发言一开始就如此详尽地论述马克思主义，那么我是深信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幸免于面对这一危险作出明确决定的需要。

的确，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命运也各不相同，**但“民族性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必须由所有民族来解决。**几乎所有欧洲中心都爆发了明显的经济罢工和激烈的政治动乱，这表明，对所有欧洲人来说，而不仅仅是对他们来说，伟大的时刻已经到来，所有欧洲人都应该直视二十世纪，从更高的角度出发，根据每个民族的永恒价值观和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迄今为止相互敌对的运动统一起来。不愿意看到这一点的人将不得不为这种忽视问题的行为付出代价，并因此无法通过可怕的血腥和致命的骚乱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我们这个世纪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果断地指出，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初露曙光之时，德国的那些力量首先被要求捍卫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及其民族生存的本质，但事实证明，它们没有能力进行任何真正的抵抗。

除了少数英勇的个人表现之外，世界文化机构只满足于一些毫无结果的抗议行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自以为高高在上，不敢低声下气地号召整个民族进行抵抗。此外，他们还通过各自的政治团体——天主教中心和自由党——甚至承认马克思主义为联盟伙伴，以此表明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合作。我们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严厉批评过去，也不是要揭开旧伤疤，而只是为了维护民族社会主义与生俱来的权利。

我们深信，如果说在 1918-1921 年战败的危险中，志愿军战士组织起来镇压共产主义骚乱，那么他们在保护宗教和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要远远超过那些后来在富裕生

活的高峰期以最残酷的方式迫害这些战士的人，也远远超过那些今天在谈论民族社会主义时不提及元首讲话或民族社会主义文献的人。我们深信，民族社会主义革命赋予了这种防御性斗争以世界性的形式，并将其转变为对德国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全线积极反攻。

任何世界观的力量都取决于其捍卫者的意志。这是评价世界历史斗争的唯一标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在其诞生之初就变得坚韧。它作为一项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崇高事业，在当年的混乱中成长起来，从而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今天，如果我们期望民族社会主义的观点能在政治胜利之后很快成为所有德国人的精神领域，那就未免太过奢望了，因为国家政治革命确实已经完成，但精神革命才刚刚开始。在这最初的岁月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个人内容，而是将性格与命运、政治和文化力量联系在一起。这种坚定性是民族社会主义在所有领域的特点，我们称之为英雄主义，我们所说的英雄主义完全不是指军国主义的姿态，而是一种内心的真实和回答问题的勇气，即使这与旧习惯和看似自信的思想形式相矛盾。这种英雄主义的行为来自于一个唯一的、决定性的信条。它认为，血统与性格、种族与灵魂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在胜利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血缘的深刻奥秘被揭示了出来，它在世界大战期间似乎已经消亡，现在又在这场新的运动中复活了。在它的指引下，德国的灵魂和德国人民得到了恢复。那些希望为新德国和伟大的新时代而战的人们，围绕着这愈合、复兴的血液，思潮涌动。

与这一经历相伴的是一门新科学的诞生，一项新的科学发现，我们称之为 “种族科学”。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人种学的深层意义不亚于德国人大规模的自我意识尝试。德国人回到了自己、德国社会和欧洲民族大家庭的原始源头。他们研究了这些群体的身体规律和精神要求，发现精神和身体是不可分割的，身体遗传的规律直接反映在某种人类类型的精神行为和内在毅力中。这一新的生物学知识并不像近年来被驳斥的那样仅仅是唯物主义，而是标志着人类的一次伟大觉醒，就像欧洲自然科学在经历了古希腊世界毁灭后的 1500 年“死亡时代”之后，开始认识到星座旋转的规律和人体血液循环的规律性一样。

当时，对自然的研究遭到了当时各种势力最猛烈的反对，但它坚持自己的主张，超越了一切暴力，因为它具有内在真实和无畏的英雄特质，这种特质甚至成为我们今天种族和灵魂学说先驱者的特征。我们大学中的许多自由主义学者，他们可以自由地宣称自己的信仰，同时又否认种族学说，他们却忘记了，在他们的安全地带，**他们是 500 年前英勇斗争的继承者，而这场斗争从来都不需要如此多的鲜血和牺牲。**

如果说近年来有人宣称种族科学是反基督教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满意地注意到，天主教堂和新教教堂的上空都飘扬着带着破碎十字架的旗帜；这是一种外在的承认，教会已经准备好给予这门新科学以应有的待遇。然而，如果在这种承认之后，又有人宣称种族研究不应该反对基督教，那就必须说，它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顺便提一句，自然研究不能以研究结果是否与某种世界观相悖为其活动的前提，而只能以前提是真是假为其活动的前提。没有无前提的科学，也一直存在有前提的科学。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源于杰出人才精神的前提是否得到了研究的证实。**去年，有人指责民

族社会主义运动和我国压制科学自由。我们必须声明，这种不公正的指责让我们特别痛苦。

事实上，我们赞成研究自由，认为它是欧洲精神最宝贵的遗产。然而，我们强调，这种研究自由不应与在德国大学的讲台上咒骂德国过去的伟大或贬低伟大的德国人的自由混为一谈，不幸的是，在过去的 14 年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我们深信，这一观点将在整个学术界逐步实现，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在所谓的民主制度下，真正的自由从未存在过。在这个时代，在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的教席上，几乎只坐着这样一些人：他们宣扬自由主义经济学，支持国际金融资本，并将部分由王朝决定、部分由纯粹的教派观点决定、最后由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抽象理论决定的历史观强加给德国。

胜利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为自己保留了逐步将我们的精神代表安置在德国大学适当位置的权利。因为民族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完成——让我们再次重复这一点——但在精神上和历史上却刚刚开始。

灵魂与种族、无个性与种族混乱是互为条件的，灵魂与种族同生共灭。因为历史并不是罗列事件的编年史，就像现在失去生命的时代试图证明的那样，历史的真正内容始终是一种判断。一个时代如何看待过去，就如何塑造过去。一个时代根据人们为其信条所取得的成就来评判他们，另一个时代则根据历史名人为增强王朝或共和原则的力量所做出的贡献来评判他们。

科茨沃尔德宣言

摆在你们面前的是《科茨沃尔德宣言》，这是 1962 年在英国小镇科茨沃尔德起草的复兴民族社会主义宣言，它标志着民族社会主义者世界联盟的成立，也标志着我们的理念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国际阶段。应英国民族社会主义联盟负责人科林-乔丹的邀请，欧洲和美国民族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来到科茨沃尔德营地。因此，林肯-洛克威尔（Lincoln Rockwell）代表美国，萨维特里-德维（Savitri Devi）代表法国，布鲁诺-卢特克（Bruno Ludtke）代表西德。

I. **我们相信，一个诚实的人，如果没有一个高于自身价值并愿意为之牺牲自私自利的目标，仅仅追求物质利益和便利，是不可能幸福的。**这就是原教旨主义宗教以前所设定的目标，但科学知识和破坏已经削弱了所有传统宗教，并给人类灌输了如此多毫无根据、目光短浅的傲慢，因为他“拥有超越自然的力量”，以至于他实际上成了自己的上帝。他的精神已经迷失，尽管他不愿承认这一点。我们认为，唯一可行的目标是为人类的进步而战，为人类的普遍福祉而战，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摆脱目前悲哀的自爱，走向牺牲的理想主义的光辉。

II. 我们相信，只有作为一个有机体，社会才能成功地运作，从而造福于大众；当每个部分发挥其最适合的功能时，所有部分都会受益，并产生一个统一的、有目的的整体，然后，这个整体获得了比每个单独的部分更强的能力，**因此，整体不可估量地提高了所有相互作用的部分的能力，各部分也因此向整体交出了一定的个人自由；整体必然灭亡，其所有部分也必然灭亡。**

III. 我们相信，只有人类以谦卑的态度对待自然，承认并应用自然的永恒法则，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傲慢地无视或征服自然，构建环境影响超越种族遗传真理的理论，为人类独创生物平等的特殊法则，肆无忌惮地否认私有财产这一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制度，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进步。

IV. 我们相信，斗争是一切进化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生命的本质所在；只有通过斗争，我们才能获得超越地球上其他动物的力量，并保持这种力量；因此，我们应该欢迎斗争，将其作为检验和完善自身的一种方式，并鄙视逃避斗争的弱者。**我们相信，生命本身是大自然给予那些为之奋斗并获得生命的人的奖赏，而不是给予那些梦想或要求获得生命的人的某种“权利”。**

V. **我们相信，任何人都无权享用其同胞的服务或劳动成果，除非他至少以自己制造或发明的同等数量的商品和服务作为回报。我们认为，任何社会成员的贡献，如果只是用被称为“金钱”的象征性符号来表示，都是对其同胞的欺骗，并不能免除一个有能力诚实劳动的人生产其贡献部分的义务。**

VI. **我们相信，确保每个诚实的人都有充分发挥其潜力的自由和机会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为此，有必要保障他的健康，保护他免遭不可预见的毁灭性灾难，在适合他能力的领域对他进行全面教育，并保护他免受政治和经济剥削。

VII. 我们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是无法解释的上天赐予这个濒临犹太复国主义-布尔什维克灾难边缘的世界的礼物，只有这位英雄的火热精神才能给予我们力量和灵感，让我们像第一批基督徒一样，从迫害和仇恨的压迫中站起来，让理想主义的光芒、真正的和平、国际秩序和全人类的社会正义重现人间。我们的信仰就建立在这七项原则之上。有了它们，我们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所采取的政党纲领可以而且将会随着事件和事实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我们寻求更好的方法而变化。但这七项原则是基本的、完美的和永恒的真理。它们不会改变。**我们将永远无条件地坚持这些理想，并为把它们确立为人类社会唯一科学和可行的基础而奋斗。**

民族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形式 约瑟夫-戈培尔

在有限的篇幅内，我们无法全面解读民族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一股以强劲势头闯入德国公共生活、彻底改变人们之间所有条件和关系的运动和理念。

此外，民族社会主义尚未成为定论，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不断变化和转型，因此无法被完整定义。我们无意讨论民族社会主义的整体。我们想解释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概念，并阐述我们的意识形态结构所依赖的思想支柱。我们想表明，民族社会主义的现实是建立在这些基本概念之上的，而且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像每一个伟大的意识形态一样，民族社会主义也是基于一些具有深刻内在含义的基本概念。过去十四年德国政治中所有根本性错误的简单解释在于，我们德国人从未讨论过我们的命运问题，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组织或政党。

我们讨论过一些术语，但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就我们的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因为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这些术语。一个人理解的“民主”在另一个人看来是“君主制”；一个人说“黑、白、红”，另一个人说“黑、红、金”；一个人理解的“专制国家”在另一个人看来是“议会制”。我们讨论了这些术语，并争得面红耳赤。如果

14 年前在政治争端开始时，我们努力澄清这些政治术语，并确定个人对“民主”或“君主制”、“制度”或“专制国家”的实际理解，那么我们德国人就会发现，我们虽然对基本原则意见一致，但给出了不同的名称。民族社会主义简化了德国人民的思维，将其还原为最原始的公式。它将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固有的复杂过程简化为最简单的公式。

这样做是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重新参与政治生活。为了在群众中寻求理解，我们刻意推行贴近民众的宣传。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向人们展示了原本只有少数专家和学者才能了解的事实，并把这些事实牢牢地印在了小人物的大脑中。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一切，即使是最原始的头脑也能理解。我们拒绝使用模糊、淡化、不清晰的概念，而是赋予所有事物明确的含义。这是我们成功的秘诀。

资产阶级政党认为自己比我们“原始崇拜”更优越，因为他们缺乏理解；他们以高傲的知识分子的姿态对我们进行评判，并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他们是政治家，而我们只是鼓吹手。他们最多把我们视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鼓吹者和拥护者。但我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不仅仅是征服摇摇欲坠的王位，以便在做出决定后慷慨地将其交给他人。

由于我们有能力清楚地看到并阐述德国局势和德国社区生活的基本原则，因此也有能力为这些新近提出的政治生活原则和基本公式而动员广大人民。这种纯粹的鼓动过程在权力政治层面并非没有深远的影响。我认为，这一成功是德国人之间以及德国人民与部分民主、法西斯或布尔什维克国家之间达成政治谅解的前提。如果我们不在所有地方采用相同的概念澄清过程，那么统一是不可能的。任何政治争论的首要前提都是基于对术语的定义和对原则的声明，重要的是，人们能够从“定义”部分轻松地预见政治实践。任何清楚地认识到基本概念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政治实践几乎自然而然地、不言而喻地从这些概念中产生。政治发展必须走向何方，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因此，自民族社会主义革命之初在德国展开的进程不能被视为已经结束，而必须继续下去。只有当民族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彻底更新，并充实到德国整个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时，这一进程才能结束。

今天，德国人会说："我们进行了一场革命。"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场革命的具体含义，以及它从动态、历史和发展角度所代表的意义。甚至有些同胞根本不愿相信德国发生了革命。什么是革命？在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之前，“革命”一词通常与某些特征联系在一起，而这些特征与革命的原始含义有着直接联系。

“革命”一词被用来描述借助某种力量手段在街垒上发生的、反对现行法律的政治进程。他们只了解可见的过程，即通过暴力手段强行剥夺统治阶级的权力，由新的团体夺取政权。但革命的隐形实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街垒的概念不是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也不一定是真正革命的标志。革命可以不流血且合法，掌权集团也可以不考虑革命而采用街垒战术。革命是一个动态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旨在将反对派先前的特权转化为国家法律。实现革命的手段与革命本身无关。在描述革命时，使用暴力或合法手段并不重要。德国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是合法进行的，严格遵守了现行法律，却带来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思想、文化、经济和社会动荡。这是由于一个特殊的特点，即德国革命是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革命有由上而下的，也有由下而上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所征服的权力范围，而在于它们能够维护这一权力范围的持久性。由上而下的革命是无机的，通常没有多少历史意义。而自下而上的革命是有机的，可以

持续数百年。**如果人民没有思想准备,那么自上而下推行新的法律体系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自上而下的革命通常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相反,自下而上的革命则不然:其合法性并非由少数上层人士发明并强行实施,而是由底层人民亲身经历并带到上层以实现发展。如果人民没有为革命做好准备,那么革命团体即使夺取了政权,也怀有最美好的初衷,但不会长期掌权。自上而下的革命通常发生得非常迅速。少数将军或政治家联合起来,推翻政权并夺取权力。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革命则从底层发展起来;它们从人民最基层的细胞中发展壮大,从 10 个革命者变成 100 个,从 1000 个变成 10000 个,当革命反对派的活力超过逐渐被孤立的国家机器时,革命就已经在思想上取得了胜利。随着权力的夺取和国家机器的结合,自 1933 年 1 月 30 日以来,我们在德国所经历的一切都发生了。这不是“革命”本身,而是革命行为的最后一部分。革命的合法性、思维方式和发展动力——从人民力量的深处扎根,历经数十年——明显地转移到了国家。

我们德国人见证了奇迹:没有流血、没有路障和机枪,一场革命在我们 6000 万人民中发生,其势头势不可挡,席卷了所有领域,其合法性统治了一切。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革命者确定了变革的步伐。结果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事实上,除了将革命合法性转移到国家之外,没有发生任何其他事情。**民族社会主义当局现在是国家的当局,革命的法律成为国家法律,民族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成为国家的思维方式。在德国,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逃脱这一历史进程的合法发展。如果革命仅仅受到一群没有内在思想意识、只是篡夺权力的人的煽动,那么革命永远不会成功。在民族社会主义革命中,世界观已经突破了! 世界观(Weltanschhauung)具有其最重要的特征,即与知识无关。一个贫穷、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即使知识储备不多,也可以倡导一种世界观,而一个博学多才、精通各领域的大学教授则未必如此。**

经验甚至表明,知识越多,捍卫世界观的勇气就越小。世界观——顾名思义——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特殊方式。其前提是,看待事物的方式总是从同一个角度出发。代表世界观的人对经济和政治采用同样的标准,而文化生活则被视为与社会生活以及外部政治形势有着有机联系,与国家的内部政治状况有着有机关系。世界观意味着人们必须始终从同一个角度看待人与世界、国家、经济、文化和宗教的关系。这个过程不需要一个伟大的计划,通常可以用一句话来定义。这句话是对是错才是决定性的问题。如果是对的,它就能给一个国家带来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福祉;如果错了,由此产生的制度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历史上所有伟大的革命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革命从来不是由一本书或一个草签的计划引发的,而总是由一个口号引发的,这个口号笼罩着整个公共和私人生活。因此,基督教伦理和宗教的广阔范围并不是由其主人自己定义的。基督只阐明了爱邻人的基本概念;其他一切都是教父们的作品。爱人的概念与古代世界的概念截然相反,两者之间没有交集,要么古代世界必须消除基督教教义,要么基督教必须消除古代世界。革命者无意陷入理论的泥潭,而是从理论走向实践,他们清楚地看到发展,因此任何关于实现其口号的讨论都是多余的。就像基督教和法国大革命的教义一样,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也将实现。

过去,德国的资产阶级世界嘲笑道:“民族社会主义纲领意味着没有纲领。” 另一方面,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并不把自己视为教父,而是我们教义的鼓动者和拥护者。我们

的责任不是将世界观建立在科学原则上，而是将教义付诸实践，而让后人接受实践，将其作为实现理念的对象。以理论方式确定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从来就不是法学家的任务。**写在纸上的宪法永远无法赋予一个民族宪法。自然超越了科学，塑造着自己的生命。民族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就在我们上台前不久，科学界试图证明这个或那个革命进程不符合现有法律，他们甚至不惜将国家政策争端提交至最高法院。我们当时只是笑了笑，因为尽管科学界声称不应该如此，但事情早已尘埃落定。科学只能从现有条件中解读新的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通过将我们的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合法性转移到国家而产生的条件是法律。它代表了人民的新常态，并无视科学的批评。革命已经成为现实，只有可笑的反动分子才会相信我们所创造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推翻。**

民族社会主义正在德国逐步稳定革命性的新法律体系。它与旧的法律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旧体系中的批评方式也无法对它产生影响。如果民主允许我们在反对派时期采取民主手段，那么这必须在民主制度下进行。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从未声称自己是民主观点的代表。我们公开宣布，我们使用民主手段只是为了获得权力，在夺取政权后，我们将无情地剥夺对手在反对我们时所给予我们的所有手段。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宣布，我们的政府符合完善民主的法律。我们一直是批评的主宰者，今天我们可以团结一致地站在批评权的立场上。唯一的区别是：批评权要想有意义，而不是民主的荒谬，只能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让步，而国家利益必须永远优先于一切政治考虑。只能让聪明的人而不是愚蠢的人让步，而决不能反过来。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显然在反对派时期更聪明，这一点还有待证明。反对派掌握着权力、军队、警察、官僚机构、金钱、党派和议会多数席位。他们控制着舆论、媒体、广播——简而言之，一切可以用“权力”一词概括的事物。**如果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小团体在 14 年内成功地用批评的权利挑战了另一方的权力，那么很显然谁更聪明。**如果另一方更聪明，那么它必须找到阻止我们罢免他们的方法和手段，因为成功的手段分配如此不均。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相反，尽管它成功地将革命的有机实施推迟了一段时间，但新的合法性还是取得了胜利。当德国革命于 1933 年 1 月 30 日明显出现，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与权力结合时，它希望看起来好像只是在这一天才爆发。然而事实上，它早在战争爆发和《凡尔赛条约》签署时就已开始萌芽。它经过多年发展，赢得了支持者的拥护，塑造了追随者的社区生活，创造了新的权威、新的生存形式、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和新的风格，并在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将其转移到了新的国家。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14 年 8 月 1 日是分界点，即使当时，任何有历史感的人都会明白：“大战之后，我们今天所停下的地方，就无法再重新开始。”九百万德国人经历了最可怕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他们经历了人类苦难、痛苦、顺从和抑郁的所有炼狱。对他们来说，想要回到四年前的状态是不可能的。不，这些人从战壕里带回了新的思维方式。面对可怕的逆境和危险，他们体验了一种在繁荣时期永远无法拥有的新的社区。他们开始了解死亡至高无上的平等主义，并了解到最终只有品格的价值才能留存。在外部，它不取决于财产、教育或贵族姓氏；子弹飞行时不受任何因素影响，在永恒的平等主义中，子弹不分高低贵贱、贫富、大小，一律击倒。在男人之间，只有一种区别：个人价值。当一个人勇敢而另一个人胆小，当一个人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并投身战斗而另一个人却试图逃

避时,军装永远无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战壕里的价值观转移到后方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些呆在家里对这种新态度毫无感觉的“政治家”们对此感到不满。

但根据自然法则,年轻、坚强、勇敢的人战胜年老、沮丧的人只是时间问题。九百万德国前线士兵深知他们为了国家不惜生命捍卫的政权是如此脆弱。他们目睹了全世界奋起对抗德国,意识到只有动员所有力量才能避免这种威胁。很明显,即使是最贫穷的同胞也宣称自己是德国人,尽管他从未有过这种体验。他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价值一无所知;他只听说过瓦格纳、贝多芬、莫扎特、歌德、康德或叔本华的名字。他本可以这样说:"我们想要征服的矿山和矿坑与我无关,因为对我来说,为德国老板还是法国老板工作可能完全无关紧要。”

然而,人们看到这些人为了一个他们甚至不知道其大致轮廓的理想而奋斗。后来,当最严峻的考验到来时,数百万人又因为无知和软弱而背离了这个理想。但我们不是一个人民的国家,因为这样的国家是在危险中成长起来的。人民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国家。**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恰恰相反。在危机时期,背弃运动的从来不是党员,而是他们的支持者和选民。而党员们则更加积极和好战,以弥补这一差距。**一个清楚地认识到民族国家价值和拥有的国家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如果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作战的人对他们所捍卫的国家的伟大、价值和成就有所认识,他们绝不会允许国家在关键时刻被政治骗子和投机者夺走。他们本会以狂热的精神进行抵抗,绝不会容忍在战场上做出的可怕牺牲在一天之内就被赌掉和挥霍掉。我们德国人从来不是世界强国,因此没有参与世界政治。战争爆发时,国家由一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哲学家的人领导。后来,德国政治家们逐渐老去,而对手却越来越年轻。掌权者都是真正的男人,他们残酷地追求权力,不为感情所动,无情地使用国家权力工具。

他们不会让议会花数周时间讨论是否应该枪毙一名叛乱的水手,而是敢于直接枪毙有罪之人。从军事角度来看,我们德国人赢得了战争的辉煌胜利,但在政治上却全面失败。我们没有战争目标,也不参与世界政治。无产阶级本应该为混乱的战争目标而冒着生命危险。结果我们的前线动摇,国家分裂,民族国家的概念无法经受住历史发展的严峻考验;在英勇无畏地进行了战争之后,可怕的灾难还是发生了。在 11 月灰暗的数周里,正直而优秀的德国爱国者对人民的未来感到绝望,许多人因此丧生。今天,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已经不同。我们认识到这一发展的有机联系和目的性,并理解莫勒·范登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的预言:“我们必须输掉战争才能赢得革命!”

如果我们从战争本身就是革命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出发,那么革命的影响不是体现在环境上,而是体现在人身上,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幕中反思自我,我们必须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失败,但最终还是会取得胜利!战争结束后,敌对方为德国制定了一份和平条约,该条约经过精心设计,旨在摧毁德国民族,使其永久退出世界强国之列。魏玛体制的各方从未承认这一点。甚至在几年前,德国的资产阶级媒体都不敢使用“贡品”这个词,人们认为,仅仅提及可耻的《凡尔赛条约》就足以毒化“友好团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多年来一直在解释敌人奴役我们人民的复杂事实。如今,德国的每个小学生都熟知凡尔赛条约的可怕后果,没有哪个德国人不知道《贡赋条约》的影响。但就在 15 年前,那个叛变的德国总理竟然能够站在全国人民面前,面对这份可耻的条约,说出“德国人民已经全面获胜!”这样的话。

在这 15 年的斗争中，发生了多么巨大的转变。的确，可以说国家并非总是相同的，善恶的条件都存在于国家内部，国家选择善恶取决于其领导层！今天的德国人民不能与 1918 年的德国人民相提并论，正如 1918 年的群众不能与 1914 年的国家相提并论。这两个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思维方式、新的集体意识和不同的内在凝聚力。我们已经描述了征服权力的方法，并解释了我们存在的根源。现在，我们还需要澄清一些基本概念，以便最终理解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世界。公众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民族社会主义想要一个完全的国家！"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民族社会主义并不追求国家的整体性，而是追求思想的完整性。这意味着完全贯彻我们在过去十年中为之奋斗并赢得胜利的思维方式。它适用于国家的整个公共生活，并不止于经济、文化或宗教领域。在德国，任何情况都不能与民族社会主义的观点相悖。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认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将要解散，因为它已经掌握了权力，并摧毁了所有其他政党。

这种观点认为，今天我们都是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国家可能以军事方式思考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需要军队作为培养军事态度的实际中心。正是军队维护着传统、组织和军事生活的经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整个国家才会成为士兵；通常，这仍然是少数人的特权。另一个例子：剧院导演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观看他的戏剧。但让每个观众都上台取代演员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权利不是勤于看戏就能获得的，要想进入艺术创作者的小圈子，必须通过努力奋斗。不是每个人都能披上英雄的外衣，或者——从政治角度来说——佩戴党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一个门外汉穿上长袍，远称不上伟大的悲剧演员。相反，伟大的悲剧演员即使不穿长袍也能被认出，而业余演员之所以穿长袍，是因为他缺乏悲剧演员的才能。因此，党必须始终是民族社会主义领导层的等级制度。其少数派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指导国家的特权。它必须为希望加入其队伍的德国青年敞开大门。但最重要的是，其等级制度拥有的特权少于义务！它负责国家的方向，并郑重地从人民手中接过这一责任。它有责任为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领导国家。如果我们把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与过去的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相提并论，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为自己设定了摧毁所有其他政党并使人们摆脱其腐败影响的目标。因此，今天，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最基本的纲领性前提没有任何改变。它对未来发展的看法在其纲领性内容的制定中依然清晰明确；**它依靠的是坚定不移，而不是大众性格中易变和摇摆不定的力量。**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被要求暗中修改纲领中的某些术语。人们说："你们为什么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社会'这个词就足够了！毕竟我们都是社会人！去掉这个词的尖锐刺耳之处，我们就能完美地团结在一起了。"不，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不能这样做，因为"社会"或"社会主义"与"国家"或"民族主义"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通常情况下，"国家"一词后面会跟着"主义"一词，这是关键所在。这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然而，对于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对方强调的"民族"态度特征毫无意义。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外在因素，而是全心全意地奉献给有血有肉、有身体有灵魂的人民。**

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绝不会说出空洞的口号："为国捐躯是光荣的。"他太诚实了，不会为了在庸人面前夸夸其谈而贬低自己永远准备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品格。社会主义的概念也是如此。"我是社会主义者！"这是银行董事、企业律师、工厂主或高级公务员通常会说的话。他们希望建立医院和教养院来帮助穷人；他们承认现状无法继续，必须做

出改变。社会主义者首先就是如此。他认为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国家才能经受住考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都属于我的民族，分享他们的快乐和悲伤。我不分阶级，只忠于国家。

民族社会主义丝毫不认为德国人民应该平等，并认可任何使一个人超越同时代人的成就。但基本上，在死亡、危险和考验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当我们彼此表达信仰时，我们要表达这种平等，绝不允许在我们之间出现鸿沟；因为总有一天，我们的民族将在危险时刻依靠其内在的团结。备受争议的犹太人问题也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是个别受害者，而是国家利益。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执政已经一年半了。当我们接管政府时，我们向德国人民承诺，将在四年内建设国家。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以上，没有人能说这四年白费了。

当然，如果恶意地、辩证地看待问题，我们可能会因为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而受到指责。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

我们没有承诺创造奇迹，因此没有人会期待奇迹。我们试图修复时间的损害，并防止其发展，一步一步地，不顾后果。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解决了德国被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改革帝国、重组庄园、解决党内不团结以及在政治、精神和意识形态方面建立民族团结。我们的政府成功地解决了失业问题，这在旧体制下从未发生过。它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应对了冬季的困境，并将在未来继续不懈地与可怕的现代失业问题作斗争。

在过去的一年里，德国人民从民族社会主义中得到了最好的教训。那些以前对我们充满敌意和怀疑的人现在相信，我们正在以诚实的态度成功解决最棘手的问题。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以青春活力迈向未来，尽管有苦难和艰辛，但德国人民没有理由绝望，因为他们再次站在了自己力量的坚实基础上。

“只要我们有勇气战胜将我们击倒的逆境，德国就不会灭亡。

对抗时间 萨维特里-德维

摘自**《熔炉中的黄金》**一书

我所创造的四个种姓中品质和义务的分配.....

——《博伽梵歌》

当社会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财产确保了地位，财富成为美德的唯一源泉，激情成为夫妻间唯一的纽带，虚假成为人生成功的源泉，性成为享受的唯一手段，当外在的属性与内在的宗教混合在一起时.....我们就进入了卡利尤加——黑暗时代。

——毗湿奴-普拉那

我们的星球已经在没有人类的宇宙中运行了数百万年，而且它还会继续运行下去、**如果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本体并不是来自于邪恶的意识形态，而是来自于对自然的理解和运用。**

——阿道夫-希特勒

在我们这个时代，全世界各地的人的素质都很低，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是处。毫无疑问，如果宣传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尽可能多的人，而不论他们的种族、健康状况、性格和思维能力如何，也不论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价值如何，那么共产主义就比民族社会主义有巨大的优势，也更有可能立即取得成功。

首先，它满足了人类最基本、甚至是最简单的愿望——“过上好日子”的愿望，即过上舒适富足的生活。

“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人发出了这样的号召。为了什么而团结？从剥削你们的人手中夺取权力，改善你们的命运；每天吃饱饭；在更健康的条件下生活；从你们迄今为止为他人创造的财富中分得更多的份额。

当你拥有了这一切，然后呢？那就是“生活”——为了自己的快乐，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吃喝拉撒。个人的快乐，如果不妨碍邻居同样正当的快乐，就是这种哲学的最高目标，也是生活的主要任务。

在共产主义看来，唯一重要的既不是国家，也不是种族，而是“人类”，是人类个体的整体，他们仅仅因为自己的“人性”，也就是因为他们只有两条腿没有尾巴，就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义务；享有“享乐”的权利，也有义务通过劳动来获得这种享乐。而经济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世界上所有人享受快乐的能力，它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问题，因为幸福（物质的或无论如何总是只受物质条件制约的）本身就是目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角度来看，人只是一种享有特权的动物；用著名的生物进步理论的追随者的话来说，“是猿猴的远古后裔”。（如果我能像共产主义者一样，将全人类视为一个可互换的整体，我也会称他为“神的退化后裔”，而且很快就会变成猿猴）。

乍一看，似乎很奇怪的是，这样一种哲学的信徒，至少和基督徒一样，都强调人——我们唯一应该对其负有“责任”的存在——与动物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当然，共产主义者不是用人的不朽“灵魂”来解释这种区别，而是用人的语言能力和“理性”来解释。他们对这种宝贵的“心智”大肆宣扬，而许多来自低等种族（可惜也常常来自高等种族）的共产主义新兵似乎极度缺乏这种“心智”——这种喧嚣简直难以想象。但人们越是思考，就越不觉得奇怪。基督教、人文主义自由思想——对基督教的半反动，换句话说，为现代民主和共产主义提供哲学基础的基督教的堕落形式——本质上都是以人为本的信条。同样，伊斯兰教也是如此。显然，所有直接或间接源于犹太教或受其启发的教义——以及显然大多数源于非雅利安人的教义，即使它们与犹太教毫无关系——都是以人为中心的。

至于古今中外所有以生命为中心的教义是否都源于雅利安人，或至少曾经受到过雅利安人的启发，那就更难肯定了。如果有人能证明这一点，他就能为雅利安人种的先天优越性提供最有力的论据，而这一民族社会主义的基本教条在我们圈子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受到了如此激烈的挑战和批评。

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犹太起源已不是秘密。因此，我们必须假定这种哲学是以人为本的。既然在这方面，它似乎比任何其他哲学——尤其是那些极力强调人类“灵魂”尊严的其他世界的信条——更具有嘲讽性，那么它对真正艺术家的眼睛来说就越令人厌恶，但对人类动物，也就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就越有吸引力。人类动物——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变成动物的人——非常高兴地接受这样的暗示，即它对动物状态的渴望是自然的，也是值得称赞的，它比其他动物优越的地方仅仅在于，由于它的“理性”，它可以比其他动物更充分地享受这个世界上的物品，尤其是比其他动物更有效地利用它们（动物），而不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可以利用它所猎杀的物种。高级种族的普

通成员认为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承诺是高尚的。他可能会自发地相信自己有责任善待一切生物，但几个世纪的基督教教养却在他的潜意识中强加了这样一种观念：他当然“必须”把自己“首先”奉献给“所有人”。劣等民族的同志热情地接受了平等化的、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这种哲学给他灌输了一种错觉，即他什么也不受任何东西的支配，而所有人类之前的大自然都在他之下，从属于他，只是为了他的需要和他的快乐而存在。**顺便提一下，在我们的世界上，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总是比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更成功。**

那些被灌输了以生命为中心的宗教的劣等民族通常从不按照这些宗教生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低等种姓对待动物，甚至是牛的态度。不幸的是，**高等人种往往放弃以生命为中心的宗教，转而信奉以人为中心的宗教**，北欧大规模皈依基督教就是最好的证明。共产主义当前的吸引力很像一千五百年前基督教的吸引力。**幸运的是，它的统治地位不会持续那么久，因为我们现在正接近当前历史周期的尾声，因此事件和思想路线的变化更加迅速。此外，等级制生活的永恒宗教最终将以一种形式重新确立并取得胜利，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然而，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短暂的考验和准备时期，共产主义注定会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尽管这种成功是廉价的。

共产主义宣传的对象不是精英阶层，而是所有种族、所有文明、所有传统的所有人，尤其是那些有理由相信自己受到剥削和压迫的人，也就是人类的绝大多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源自犹太教的两大国际性平等宗教，法国大革命中流行的民主学说也是为了“解放所有民族”，以此为榜样，该主义主张，**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因血统不同而产生的不可逾越的自然差异，只有因环境和教育不同而产生的人为差异，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原因不同。换句话说，我们最可怕的敌人认为，如果一个年轻的黑人、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一个年轻的爱斯基摩人和一个年轻的犹太人在英国或德国从小一起长大，并在同样的英国或德国中小学和大学里接受教育，那么在同样的环境下，他们的反应实际上会与接受同样教育的任何英国人或德国人一样。**相当多的非雅利安人种对通常所谓的“现代”生活——即对欧洲雅利安人的科学天才发展出来的有组织的生活方式——似乎具有无限的适应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千上万头脑清醒的人对这种荒谬的观点充满信心的原因。至于这种适应性在多大程度上是表面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纯粹外在的，似乎没有人搞得清楚，这或者是因为人们已经丧失了区分本质和次要的能力，或者更有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外在的——次要的——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把外在的——次要的——视为本质，在他们的头脑中不由自主地颠倒了自然的价值尺度——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衰落的另一个标志。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最容易“适应”的——外在的——人就是犹太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冰岛，犹太人所到之处，都会因其非凡的灵活性而受到当地居民的赞誉。**“就好像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在冰岛，他吃冰岛食物，喜欢冬季运动，也喜欢冰岛女孩；而在印度，他却能成为最糟糕的印度人的“伴侣”——不加批判的“西方”教育下的无种姓产物——并对印度的一切事物都乐在其中、从梵语哲学（无论他多么博学，都无法领会其中的精神）到咖喱酱、印度糖果和牧民的生活方式，他对印度的一切事物都乐在其中。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因此，人们普遍存在一种错觉，认为犹太人可以冒充他选择定居的地方的本地人，而当少数有种族意识、聪明而自豪的雅利安人提出相反的说法时，人们就会感到惊恐和愤怒。国际

主义神话和“可怜的犹太人”的传说与“人”是一个智力同质的物种的观点相辅相成，所有单位都拥有相同的能力，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黑人、中国人、马耳他人、苏格兰人、纯德国人还是瑞典人。

共产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一谎言的基础上并取得了成功。几千年前，这样的谎言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时，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骄傲；意识到自己在宇宙整体秩序中的独特地位，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然而现在，基督教——另一个犹太人的产物——在两千年的时间里，以另一个世界的理想为名，缓慢而坚定地剥夺了大多数人的种族尊严感，多年的民主教育又在淳朴的人们中间灌输了对“智慧”不健康的崇拜和对“个人主义”同样不健康的渴望：这种哲学不再像基督教那样压制身体，而是蔑视身体；把身体视为纯粹的经济单位——食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个人享乐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者宣称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平等的权利，并否认人与人之间种族的自然等级、但人类的自然贵族只是少数。而那些承认自己是优越种族成员的人更是少数。

绝大多数男人和女人——**尤其是那些低等种族的男人和女人——喜欢的哲学是否认种族等级制度，把杰出的人格（这一点不容否认）仅仅视为纯粹经济因素与环境作用相结合的产物。**他们喜欢她，因为她能奉承他们。因为任何一个接受了这种思想的人形蠕虫都有权认为自己有可能与任何人平等，并对自己说："如果当时的环境稍有不同，谁知道我会成为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呢？“**在每个人的眼中，千百万卑贱者的可悲自我立即变得不再那么可悲。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这不仅是所有人的经济救赎，也是可怜虫们在自己眼中的道德救赎；这是一种伟大的幻觉，既能满足亚人类大众的胃口，又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这正是劣等民族的理想。难怪劣等民族会像苍蝇吃蜂蜜一样趋之若鹜——与他们一起趋之若鹜的还有许多心地善良的“人道主义者”，以及那些属于优等民族的不懂事的高雅宣传的受害者。如果这些人能够意识到，在“向全人类”发出的雷鸣般的号召的背后，在自由、无阻碍的个人发展、物质繁荣、“启蒙”和享乐的言论的背后，潜藏着多么严峻的现实，他们就不会如此匆忙地去迎合它了。

俄国在德国占领区的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共产主义的狂热中首先把俄国人当作“解放者”来迎接——都会一致地告诉你这一严峻的现实是什么：最恶劣的奴役；强迫劳动，却没有知道自己正在造福于自己所爱的人或事的愉悦感；为遥远的、未知的、贪得无厌的外国势力劳动；强迫休闲，提供典型的娱乐；强迫典型的“文化”；不仅降低了资本家和所谓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降低了那些有机会尝到物质文明成果的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在他们和那些从未享受过最简单的现代舒适生活的人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人为的、令人憎恨的平等。另一方面，一切原创性、一切创造性思想都将消亡。来自俄国地区的男女工人会告诉你，俄国侵略者在看到“奢侈品”时是多么的目瞪口呆，而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即使是最卑微的技工也拥有这些“奢侈品”。

他们一直被误导，以为苏联境外到处都是贫困、饥饿、无产阶级受压迫等等。当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甚至在其物质崩溃的时候，也向他们展示了事实并非如此的最清楚的证据时，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幼稚地把所有德国人都看成是资本家。德国劳苦大众视他们为野蛮人，视他们的制度为可憎的东西，他们甚至在最可怕的噩梦中也无法想象这种制度的相似之处。当然，德国以及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法国

的劳动者在数量上只是世界上的极少数。共产党人以议会民主制国家为榜样，依靠群众取得胜利。

在他们看来，少数派无论天生多么宝贵，只要是作为反对派的少数派，都是不重要的。我们的敌人希望，群众的压力会很快剥夺他们的重要性，或者将他们彻底摧毁。德国的劳苦大众可能在抱怨，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在俄国地区禁止抱怨），他们在内心深处憎恨和诅咒共产主义。

但是，中国苦力、可怜的印度清扫工、在吉里贾煤矿挖煤的男人、在加尔各答街头拾粪并把它作为燃料卖掉以换取每篮几尼的妇女、在印度的沼泽地里劳作的工人，以及在印度的沼泽地里劳作的工人，都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在阿萨姆的茶园、马来亚和印度支那的橡胶园、爪哇的蔗糖园里劳作的工人；新加坡、西贡和黄海港口的港口工人和人力车夫——所有这些人都称赞——或者很快就会称赞——共产主义哲学和实践是伟大的。谁会因此而谴责他们呢？除了最聪明、知识最渊博的人，谁不会在他们的位置上做同样的事情呢？我们决不能忘记，无论他们看起来多么可怜，无论他们个人多么一无是处，他们都是大多数；**他们是“各国无产者”，著名的联合起来的号召就是向他们发出的；他们是“人类”，共产主义正在为他们准备更美好的生活。我们的自然精英思想、我们的骄傲和力量哲学、我们的神一样的人类梦想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也永远不可能对他们有吸引力。但《共产党宣言》对他们有吸引力。**

要成为一名民族社会主义者，首先绝对必须是一名雅利安人，一名健康、聪明、完全清醒的雅利安人，一名高等人类的合格代表。另一方面，要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只需要是一个“人”，一个用后肢活动、没有尾巴、能够说话并被认为“聪明”的哺乳动物，而几乎不考虑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如今，没有任何有价值特质的双足哺乳动物的数量以百比一的比例超过了血统纯正的雅利安人，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堪称“人类精英”，在纯正的雅利安人中，那些任由“人文主义”宣传误导的人——**因为几个世纪的基督教和随后长期的民主教养扼杀了他们的种族自豪感**——也远远多于那些保留了独立思考能力和像雅利安人一样思考的人。犹太人的宣传以各种形式对我们进行诽谤，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而我们却没有成功地牢牢掌控所谓的“世界舆论”，这难道不奇怪吗？俄罗斯人在共产主义的帮助下赢得了战争，现在正在建立自己的力量，而牺牲的却是被他们愚弄的傻子，即几十年来一直顺从地为犹太人服务的西方堕落的雅利安人，这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吗？

这不仅不足为奇，而且正如我在另一本书中试图说明的那样，符合事物的自然规律。

如果不牢记过去六千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四大时代中的最后一个时代，就无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暂时失败和被迫害，古代圣贤一致同意将每一个完整的历史“周期”，即每一个完整的世界创造，或者说世界在时间中的化身，从其完美的开始到其最终的解体，分为四大时代。在把握当今事件的本质时，我们不可能不同时意识到，我们今天已经到达了“周期”自然发展的最后、最短和最凶猛的时间间隔的最后阶段，即梵文经文所说的“Kali-yuga”（即黑暗时代）的末期。在此之前，整个人类注定会变得越来越像猿猴，越来越热衷于听从死亡力量的新指令。共产主义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深刻、更全面、更典型地表达了人类对腐朽的诱惑；它是最合乎逻辑、最激进的死亡哲学。民主主义和古老的基督教——正如我所说，民主

主义只是其腐朽的形式——也是死亡力量的产物，但没有那么愤世嫉俗，也没有那么复杂。当它们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卡利尤加还没有这么“先进”。它们仍然具有某种救赎性的不一致性。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中，种族自豪感仍有存在的空间（尽管它本质上与基督教教义相悖）；在现代民主文明中，直到 1939 年，至少还可以表达自己对自然价值哲学——“乐”字哲学——的坚持，而不会有因此入狱的危险。今天，在悲惨的被占领德国之外，这种机会在很小程度上依然存在。虽然公开出版书籍和发表演讲支持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私下里坚持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躲避任何邻居，甚至不躲避反对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最后一丝自由的曙光——还是有可能的。**只要是在腐朽的连续理念激励下建立起全能的政府机构的地方，自由的曙光都已经消失了。这是自然而然的，符合历史进化的无情逻辑。不可能不是这样。同样自然和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堕落的人类将宁愿接受共产主义的枷锁，也不愿接受我们对真正自由的呼唤。

就其目前的状态而言，它无法理解我们所理解的“自由”，就像猴子无法理解他们在任何有学问的社会中的成员身份一样，如果他们获得了这样的荣誉的话。

共产党将取得胜利，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取得胜利，至于是通过武力还是通过他们的宣传影响，这并不重要。这也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绝不能陷入绝望。**

他们——与时代潮流相一致的哲学的追随者——会胜利，也会灭亡：时间会摧毁他们。

我们，我在其他著作中称之为“与时间对抗的人”的追随者，黄金时代哲学的追随者，将在他们秩序的废墟上崛起，重新统治世界，不是猿人的世界，而是重生的、神一样的人的世界，完全意义上的雅利安人的世界。

虽然共产主义在立竿见影方面比民族社会主义有许多优势——虽然它的宣传集中在人类最简单的需求和愿望上；虽然它接纳所有人加入它的大家庭；虽然它把欺骗作为最有力的武器，给人们以自由的假象，实际上却比任何古代专制主义更彻底地奴役他们——但它迟早还是要灭亡的。一切不以永恒为基础的东西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在所有现代“主义”中，只有希特勒的美丽学说——“乐”字哲学——建立在永恒之上。只有它经得起迫害的考验，更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再说一遍，它是我们这个黑暗时代中的黄金时代的哲学，是那些英勇地反对历史倒流——对抗时间——的人的哲学，因为他们知道，盘旋前进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拾起他们的崇高梦想；那些少数人的哲学，他们不被历史的洪流冲走，忘记了永恒回归的希望，而是宁愿参加一场完全不平等的战斗，如果有必要，他们宁愿灭亡，因为他们知道，为了行动之美，他们神奇的行动美德的力量将照亮新的黎明；如果这道曙光注定不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照耀大地，他们仍将行动起来，与日益增长的平庸和庸俗潮流抗争，这完全是为了英雄天性在实现其内在法则时所感受到的喜悦。

从世俗成功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学说中那些现在看来最容易被他打败的特征，恰恰是那些证明他是永恒真理的后来表达者的特征，而正是这些特征迟早会引导他走向胜利和统治。首先，它具有雅利安人的排他性；它对人类中最优秀、最纯粹的精英——它的所有追随者生来就属于这些精英——以及每个追随者最崇高、最英勇、最无私的情感发出号召，这符合众所周知的自然等级原则——也就是它所依据的自然特权的区

别原则——种族和人格原则。**如果说民族社会主义没有满足人类追求更健康、更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合理愿望，那肯定是荒谬的。**民族社会主义确实满足了这一愿望，而且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满足这一愿望。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骇人听闻的失业问题威胁着整个德国经济，希特勒立即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可能是该运动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

德国在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的物质繁荣以及颁布和实施的优秀社会法律（如儿童抚养和教育法），至今仍被这个饱受磨难的国家视为失落天堂的恩赐。“在希特勒统治下，我们生活得很好。“在希特勒统治下，我们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国家帮助我们养育他们，甚至为我们养育他们——多好啊！”“在希特勒统治下，食物便宜，法律明智且应用得当；那时生活富裕，秩序井然。那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时代"。“我们从未像在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那样生活得如此幸福“——今天，在每一个”地区"[占领区]，只要你设法取得人们的信任，你就会随处听到这样的谈话。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从许多德国人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民族社会主义政权的憧憬似乎只是对物质繁荣时代的向往：价廉物美的食物、漂亮的衣服、优越的住房、财富和欢乐。但这些人不是——也从未是——民族社会主义者。他们现在是——在他们上街欢迎元首的时候就已经是了——只是人类中绝大多数动物的代表，他们能够而且确实靠“仅靠面包”生活，除了自己的胃之外，他们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没有真正的忠诚。我们没有必要轻视或蔑视他们。他们能够生出健康、血统纯正的孩子，有朝一日能够为更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他们自己能够为自己身体所代表的更美好的人类而奋斗，这本身就已经是对他们有利的巨大优势。但不要称他们为民族社会主义者。他们不是。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某种诉求远远超出了这些人的心理和情感构成。它诉诸于最优秀的性格特征：无条件的无私——为了比我们渺小的人格更伟大的东西而牺牲自己的渴望；勇气和毅力；为了真理而坚定不移地热爱真理；热爱人类最优秀的部分——雅利安血统的高尚兄弟情谊——因为它与生俱来的价值，因为它的全面之美和无限可能性。**

它诉诸于思想——真正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垃圾读物——诉诸于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对生活现象得出自己结论的能力；诉诸于人从世界历史的洪流中得出存在意义的能力，以及从过去所有时代的悲剧中发现阿道夫-希特勒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宣扬的基本永恒真理的能力。它诉诸于人类的美感，诉诸于人类对完美的美和包罗万象的真理的追求，这种美和真理在存在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都是永恒不变的。换句话说，尽管任何德国人都可以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者协会的成员，尽管任何雅利安人都可以而且仍然可以以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作为其种族的自然信条而感到自豪，但只有具有雅利安血统的优等人——无可挑剔的男人和女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完全的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愚蠢、小气、卑鄙、懦弱——各种弱点——都与我们光荣的信仰格格不入。有人曾告诉我，在整个德国，完全可靠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不超过两三百万人。

在欧洲其他地方，这样的人可能不超过一万，而在全球非日耳曼雅利安人中，这样的人也不超过两百。但这一事实——如果它是事实的话——绝不会使我们降低一个人的道德和身体标准，如果他或她希望有权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话，他或她就必须按照这一标准生活。因为在这个崇尚数量的时代，只有我们始终坚持黄金时代的理想——质量至上。而放弃这一理想，甚至对当前的对立人生观做出让步，就意味着放弃

我们自己，放弃我们的运动，放弃我们神圣的元首的使命。个性的价值是非常罕见的。但是，许多不具备这种价值的人却自以为是。因此，强调个人重要性的哲学不会不受欢迎，恰恰相反。但我们的教义也强调血缘的重要性。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所说的那样，这是生命与光明的永恒教义，是雅利安人在现代世界的技术成就中所体现的，而雅利安人最纯粹的代表就是北欧人或日耳曼人。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一种北欧哲学，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正因为如此，它才如此不受欢迎，不仅在东方的众多非雅利安人中如此，在许多欧洲人中也是如此，他们的血液中虽然没有一滴犹太血统，但显然不是纯粹的“北欧人”。人们一般都不喜欢被告知——或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天生不如享有特权的外来者。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哲学，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共产主义及其对所有种族的所有人不加区分的吸引力。

每一个妄自尊大的劣等人类的代表都会意识到，有了这样一种舒适的理念，他（或她）就能“作为一个人闯出一条路来”，而在一个由我们主宰的世界里，他将永远处于少数特权阶层之外。但是，黑暗时代——我们的衰败时代——的特征之一恰恰是，无用的个人和劣等的种族都越来越不愿意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当有人提议用武力把他们送回原地时，他们也越来越反感。从中非原住民到阿萨姆山的土著人，世界上所有劣等人的后代，基督教传教士曾教给他们所有人的灵魂“尊严平等”的教义、拉丁字母和怨恨，而他们却最先抓住了共产党人提供给他们的新机会。他们相信，或者很快就会相信，共产主义就是应用基督教。这能怪他们吗？他们是对的。在目前的物质条件下，基督教的逻辑结论只能导致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犹太教义在我们的历史进化阶段是“大卫之子”、犹太人之王耶稣的教义的延续。是的，耶稣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与（至少在理论上）共产主义天堂不同。但它也是自然的。因为，正如我所说，历史是自上而下发展的。说实话，虚荣心几乎是所有男人和女人最喜欢的恶习，**而能够冷静地看待事实并捍卫真理，哪怕是违背自己的利益，则是极少数人的特权。**

事实上，民族社会主义的哲学适用于所有人——如果我们的星球上有人类的话，它也适用于人类之外的所有有思想的生物——因为它是一种真正的学说。真理并不取决于能够感知真理的人的特征。是个人或集体的虚荣心阻碍了人们领悟真理。虚荣，还有嫉妒；憎恨那些比他们强的人，这同样源于受伤的虚荣心。

我已经说过：只有拥有雅利安血统、在各方面都比别人优秀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只有拥有雅利安血统的人才能把民族社会主义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

但是，所有有思想的人都能够认识到民族社会主义原则的正确性；认识到我们的元首在规划新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时所遵循的自然秩序的永恒性。即使是非雅利安人也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有些人已经认识到了，尽管为数不多。但是，他必须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人，而且是他的种族的杰出代表，或者至少是一个在真正的传统精神中成长起来的人，这种传统与通过基督教文明强加给欧洲的传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传统恰恰是建立在我们永恒的原则之上的，即神所确立的种族等级制度。**

我已经说过：只有在各方面都很优秀的雅利安血统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也只有雅利安血统的人才能把民族社会主义作为他们与生俱来的财产。但是，所有有思想的男人和女人都能够认识到民族社会主义原则的正确性；认识到我们的元首在规划新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时所遵循的自然秩序的永恒性。**即使是非雅利安人**

也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有些人已经认识到了，尽管为数不多。但是，他必须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种族代表，还必须是一个特殊的种族代表，或者至少是一个在真正的传统精神中成长起来的人，这种传统与通过基督教文明强加给欧洲的传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传统正是建立在我们神圣的种族等级制度的永恒原则之上的。真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既不是德国人，甚至也不是北欧欧洲人——比如说，一个来自地中海沿岸的纯正的阿里乌派教徒——他欣然承认，作为种族标本的纯正的北欧类型的男人或女人比他自己和四分之三的同胞都要好，这种人是相当罕见的。

因为这种客观的态度所要求的公正性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但是，一个非雅利安人能够认识到《我的奋斗》中阐述的生物学真理，并清楚地意识到他（或她）永远不可能在人类的自然精英中获得哪怕是次要的地位——这种人很可能更加罕见。然而，这样的人确实存在。

在本书的开头，我提到了一个来自西孟加拉邦的年轻印度仆人的故事，他属于马赫希亚种姓，在战争的第二年，他对我说他说："Memsaib，我也很钦佩你们的元首，不仅仅是因为他打了胜仗，还因为他正在为用《博伽梵歌》取代西方的《圣经》而战斗。"当然，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用植根于种族等级观念的古老智慧的精神取代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精神，那就非常正确了。"但是，"我反对这位年轻人，"因为你不是雅利安人；印度人认为只有婆罗门和刹帝利才是雅利安人。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来自孟加拉的文盲村童回答说："我可能不是雅利安人，但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所有的灵魂都会在他们应得的躯体上重生。这并不能改变经文的真实性，也不能改变人们被划分为不同种姓、不同种族的事实，每个人都必须首先守护自己血统的纯正。如果现在，在这一生中，我诚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也许有一天我会出生在高级种姓中，只要我配得上成为雅利安人"。

七年多以后，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豪华餐厅里，我遇到了一位纯正的北欧女人——她的身体是最完美的雅利安人类型——她注意到我的双耳上闪烁着民族社会主义的神圣标志——太阳轮，便问我："你为什么戴着这个'邪恶的象征'？你的耳环真'吓人'。我立刻想起了那个来自热带的男孩那张黝黑的脸和他说过的话——那是千百万生活在与民族社会主义原则相同的社会制度下的原始人的信仰告白："我不是雅利安人，但我知道自己的位置——我知道真理；我钦佩你们的元首。也许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憎恨过这种平等的宗教，它脱胎于犹太教，最初由犹太人宣扬，世世代代扼杀了北欧人类古老的骄傲。也许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雅利安人——尤其是纯日耳曼血统的雅利安人——的耻辱，他们拒绝接受上帝赋予他们的优越感，放弃他们的特权，而在种姓分裂的印度，数以百万计的非雅利安人幸运地摆脱了基督教和民主教养的影响、在一个种族等级森严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将"认清自己的位置"——就像那个印度男孩一样，向那个在衰败的浪潮中独善其身、在我们的时代重申自然秩序永恒原则的人致敬——这样的世界是可能存在的。而且，它一定会在最后的混乱时代结束时出现，总有一天会结束这种循环，在共产主义一定会导致的混乱时代后。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每个民族，无论是雅利安人还是非雅利安人，都将组织在一个民族国家之下。每个种族都会有自我自豪感和责任感，**作为身体和道德罪恶最大根源的混血将被排除在外。**

最崇高的非雅利安种族将成为雅利安人的盟友，在服从永恒自然法则的深刻意识的激励下，建立并维护世界秩序。德国和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结盟是一个象征，预示着这种友好和崇高的合作，**同时在繁衍后代方面也有必要的分离；尽可能地相互理解和熟悉对方的文化，而不是愚蠢地相互模仿。**在一个以我们的原则为基础重新发展起来的世界里，我们这个腐朽时代的“国际主义”倾向将会——而且总有一天会——被一种今天看来完全是乌托邦式的——不可能的——“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的心理所取代。我还记得，在我受审前夕，当被派来检查我的精神病医生问我“为什么”认为为了一个“外国”的国家而冒着自由乃至生命的危险是明智之举时，我的回答是：首先，我认为自己是“雅利安人，感谢德国为唤醒雅利安人的意识和我种族中每一个有价值的人的自豪感而付出的一切”，此外，我还是“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

但就在这句奇怪的话中，隐藏着非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和非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全部区别；隐藏着共产主义一举成功而民族社会主义暂时失败但最终胜利的秘密。德国民族社会主义首先是德国爱国者。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可以是“国际主义者”，但也可以是——从苏维埃俄国的报道来看，往往是——俄罗斯爱国者，他利用在俄国境外如此流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俄罗斯帝国主义谋利益，误以为这种意识形态可以以这种精神加以利用。

然而，外国共产主义者主要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相信“人类”高于国家，认为人类是一个特权物种，可以团结起来（无论以可耻的混合物为代价），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这最终意味着最廉价、最粗暴的快乐——而越来越多地开发大自然。

而外国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要么是雅利安人，其种族意识从属于并吸收了狭隘的对祖国的依恋；要么——在少数中的少数的情况下——当然也是雅利安人，同时又是“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世界历史有着清晰的认识，钦佩希特勒反复宣扬的那些永恒原则的体现；他了解不同时代的多种文化，直观而直接地确信人类能够实现其最高目标。这样的人也会把德国尊崇为元首的国度；在我们这个充满敌意、腐朽的时代，只有这个雅利安民族见证了这些真理，并为之付出了物质层面的生存代价；为此，他（或她）会欣然接受德国的领导，将其视为这些雅利安人神圣权利的体现，因为他们已经证明自己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不用说，非俄罗斯共产党员的人数远远多于非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人数，而且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新的一天照亮当前世界秩序的废墟——用《霍斯特-韦塞尔之歌》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话来说，就是“面包和意志的一天”；**这是物质繁荣的一天，同时也是健康美丽的一天，是人的思想和人的欢乐的一天，是在秩序范围内真正自由的一天，是最好的至高无上的一天**，民族社会主义德国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奋斗，为这一天的到来而衰落（在其外在表现形式上），并将在荣耀中从死亡中复活。

到那时，许多人都会对希特勒热爱的民族产生崇拜之情，就像今天我和其他少数外国人在受迫害的黑暗时代对希特勒产生的崇拜之情一样。

然而，我们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不受欢迎，不仅因为它的贵族生活观和种族排他性，还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目的和目标——以及方法——的完全坦率；**因为我们从未试图隐瞒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以及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准备做什么（或已经做了什么）。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民族社会主义是一种黄金时代的哲学，**

而现代人类正处于其堕落道路的最后阶段——黑暗时代最黑暗的一段——很显然，我们想要的并不是几乎所有其他人想要的。几乎所有其他人都想要一个“安全”的世界——一个每个人都能安安静静地享受自己的小乐趣的世界。而我们则主要想要一个美丽的世界。这两种理解经常发生碰撞。就让它们碰撞吧。我们并不讳言，只要我们同时代的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还和我们所认识的一样，这两种理解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

我们绝不是想通过虚假的言论来诱导他们同情和合作。要想保持这种合作，我们就必须无休止地撒谎，而我们中的一些人最终会忘记真理作为一盏明灯所赋予我们的光明、永恒不变的理想。与亚人类合作不值得冒这种风险。

此外，我们鄙视把谎言作为一种武器——除非绝对必要。我们更喜欢公开、残酷的武力，这是真正战士的武器。当真正的战士暂时筋疲力尽、受伤或被镣铐锁住时，他们不会诉诸谎言，只会默默地恢复体力——然后等待。我们从未试图掩盖我们的无情，也从未试图为我们的无情辩解，这源于我们的真诚。相反，我们总是说，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使命，那就是见证黄金时代的真理，反对我们这个堕落时代的精神。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用行动证明了我们的诺言。我们准备再做一次。人们不喜欢我们的这一特点。

他们称我们为“怪人”，甚至“怪物”。也许共产党人不是“怪物”，因为他们从不说他们打算做什么，也从不做他们说过的话。还因为在与对手交手之前，他们从不告诉对手自己有多么憎恨和鄙视他们。在与敌人交战之前，他们从不挑战敌人，就像战士们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他们——或者说激发他们运动的犹太人——想要的东西和大多数人想要的东西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安全"——是的：犹太人、那些无知地为犹太人利益服务的共产党人以及普通的一般人——他们都想要安全。但是，普通的市井小民想要它，是为了无忧无虑地享受他那毫无价值的琐碎生活；而共产党人则把它作为人类的最高目标来追求，对他们来说，生活的经济方面就是一切，因为他热爱现在的人类，或者——如果他是俄国共产党人的话——也许是因为他被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东方政策”所吓倒了，在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德国的自然扩张对他不利。犹太人要的是“安全”，这样在温顺、不假思索且总是心满意足的大众中，他的种族才能永远“高高在上”。这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它可以被称作——而且已经被称作——同一个词，并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来，让人觉得是同一件事。从本质上讲，共产党人和民主党人的统治方式都不过是向人们灌输一种“自由”意识，同时在不知不觉中胁迫他们做出顺从的傀儡行为；让他们相信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感觉行事，而实际上他们的想法和感觉一直都是按照体制的指导力量通过报刊、广播、电影和其他渠道告诉他们的那样，按照体制的指导力量希望他们做的那样行事。这个系统的指导力量就是看不见的犹太人。我还要说：这是所有破坏性世界观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自然形成的统治模式。这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基督教会对人民拥有力量的秘密。

因为基督教也是同样类型的世界观。与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样，它也是建立在谎言之上，而且是建立在犹太人的谎言之上。一位不乏名气的女作家和民族社会主义的谴责者曾经告诉我——在她意识到我是谁之前——她认为“犹太人的主要谎言”是什么：第一，他们是被选中的民族；第二，《圣经》是他们不加区别的书；第三，他们种

族的人是“上帝的独生子”。她相当聪明，能够识破这些谎言。**但是，犹太教的其他谎言已经如此彻底地占据了她的思想，而她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至于她不可能摆脱基督教民主主义关于“所有人的尊严”等的胡言乱语，也不可能摆脱关于“不允许”蛮力（当然，只是在我们使用蛮力的时候）的胡言乱语。这就是为什么她是我们的劲敌。**

共产主义显然比犹太精神的旧哲学更具欺骗性，尽管它现在被俄罗斯帝国主义者而不是犹太人所利用。它仍然具有固有的犹太特性。这是它与我们的哲学不同的力量源泉。**不仅是一般的市井小民，就连最优秀的外国共产主义者也会为隐蔽的俄罗斯帝国主义而战，就像其他人为隐蔽的犹太资本主义而战一样——却浑然不知。而外国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则愿意为德国人战斗和献身，因为他们是希特勒的同胞和第一伙伴，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即使共产主义力量所赖以生存的这种欺骗，现在因为数量问题而成为一种优势，迟早也会被证明是灾难性的，也许会导致我们这一天的到来。是的，数百万人准备为根本不符合他们利益的东西献身，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坚信他们是在为他们真正关心的其他东西献身的话。然而，“你不可能一直愚弄所有的人”——甚至不可能一直愚弄大量的人。**

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自己被愚弄了。有些人已经或多或少地发现了这一点。自从斯大林掌权以来，共产党内就不断进行“清洗”，令人奇怪的是，在被清除的人当中，有数量惊人的犹太人“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强调的是“世界革命”，而不是苏维埃国家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原则无疑仍在那里的每个人脑子里敲打着。原则不像人那么容易摆脱。尽管如此，那里仍然存在着一种愿望，即使不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个曾经被赋予这个词的意义，至少也是有计划地加强构成苏联的那个奇特的欧亚集团（与其说是欧洲集团，不如说是亚洲集团）的愿望——这种愿望有朝一日很可能以泛蒙古政策而告终，这让许多头脑简单的雅利安和犹太血统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主义者”感到失望。

另一方面，个别德国共产党人仍然持有与其所谓信仰完全不符的民族主义观点。至于种族区分，我听说如今在一些德国“共产主义者”圈子里已经开始流行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如我上文所述，变相的民族社会主义，那么共产主义加上种族区分以及在以雅利安人为主的人群中又是什么呢？正是可恨的民族社会主义！**

当然，历史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大的笑话”，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如此。最终——也许比我们自己所希望的要快得多——我们的坚定坦率将结出硕果。我们的元首曾经说过“**总有一天，世界会知道我是对的"。即使今天我们和我们的世界观仍然不受大众欢迎，他的话也会在时间的长河中得到生动的印证。**

为了充分理解我们时代的重大事件，我们必须始终参照历史周期理论。我再重复一遍——因为我认为这一事实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我们的人生观、社会政治观点和领导思想并非“不合时宜”——它们主要是“与时代背道而驰”，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对于那些从狭隘的、纯粹的政治角度来评判民族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无论这听起来多么奇怪，但它却是一种永恒的生命宗教——一种亘古不变的生命真理，对于任何一个黄金时代的人来说都是一清二楚的——它是在离完美时代最远的时代：在伟大的历史周期的末期实现的。**它注定要被误解、憎恨、背叛、诽谤和排斥；它注定要遭受彻底**

的外部崩溃。古老的恶性趋势，即衰败的激情，是所有时代进化的内在动力，今天注定要以民主的形式取得胜利；明天，它注定要以共产主义的形式取得更加彻底的胜利，共产主义是民主原则在技术先进时代合乎逻辑的、不可阻挡的终极表现形式；这一制度的基础是重数量轻质量；重经济轻生物；“人”的理想是为最多的无价值的人提供最大的物质利益的机械生产者。

我认为，破坏的力量注定要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仍然注定要取得胜利。但这只是暂时的——直到这个垃圾人类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新的一天才会到来。因为没有什么能打破生与死、死与生的无尽循环；没有什么能打破永恒回归的法则，这在社会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都是如此。就像明早太阳必然升起一样，民族社会主义将再次掌权。就像春天的绿草必然会复苏，紫罗兰和果园必然会开花，嫩谷必然会在大自然假定的冬天死亡之后萌发一样，我们对健康、力量和美丽、秩序和男子气概的理想——阿道夫-希特勒的理想——将再次激励世界的自然贵族。在毁灭与创造的无尽宇宙之舞中，死亡必然伴随着生命，殉难的德国将再次从尘埃中崛起，再次领导雅利安种族。尽管有人企图肢解她，但她仍将团结一致；她将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神圣使命；她将充满永恒青春的力量——这种“权力意志”使她的人民从很久以前的冰川时代一直杰出到今天——她将再次崛起，再次前进，充满激情，肆无忌惮，势不可挡。《霍斯特-韦塞尔之歌》现在甚至在他的祖国也被禁止，但它将再次响彻国际大通道和被征服国家首都的大街小巷。我们不会“改造”、“改革”或“再教育”这些亚人。哦，不！他们的楷模，我们今天的迫害者，可以确信这一点。

铭记 1945 年以来我们在下等人的权力下所承受的一切——欺骗和诽谤的权力、威胁和贿赂的权力——铭记我们的同志在他们的集中营中遭受的酷刑；铭记纽伦堡殉难者和其他一百个不公正的“战争罪”审判的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和死亡；整个德国的殉难；我们亲爱的元首目睹了这些可怕的日子，独自面对他想要拯救的这个忘恩负义的世界的强烈仇恨，他的精神痛苦：“要么希特勒，要么下地狱！“我们将让那些自以为聪明、企图公开或秘密反抗我们的人下地狱。但他们的地狱不会像我们已经经历过并仍在经历的地狱那样长久。

因为他们对自己事业的信念不会像我们对民族社会主义的信念那样支撑着他们。他们的地狱也不会如此可怕。因为在控制了地球之后，我们将允许自己有仁慈的奢侈——我们将尽快除掉那些给我们带来麻烦的傻瓜。然后，当所有的抵抗都被瓦解——如果还有抵抗的话；**据我所知，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可能就没有抵抗了——我们的时代就会来临；同样是新周期的黄金时代；等级森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再生的种族和动物物种都将健康、快乐和美丽）将由少数化身为雅利安神的人按照永恒的民族社会主义原则来统治。

我们敬爱的元首——无论是肉身（我希望如此）还是精神——将成为世界领袖[Weltführer]，{并将获得一种}更具包容性和持久性的权力，就好像他在 1942 年率领德国军队穿过俄罗斯，越过亚洲山脉，进入德里，在著名的孔雀宝座曾经矗立的金碧辉煌的大理石大厅里，东西方都向他宣誓效忠一样。一个绚丽而疯狂的梦想？当他们环顾四周，看到这个被肢解的国家——“恐惧之地”——目前的悲惨状况时，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在这里，希特勒的名字只在耳边低语。如果我不是坚信时间的循环规律，如果

我不是坚信这个堕落的人类的终结和随之而来的新开端即将到来，我自己也会这样想。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愈发坚定了我的这一信念。这种信念帮助我在看到德国成为一片废墟时不至于失去信心。

我曾经说过："你需要灰浆和石头，""一切都可以重建。只要民族社会主义精神还在，一切都不会失去。"我努力让这种精神保持活力，反对迫害我们的人的指使，**以我内心的指使、不屈不挠的内在法则以及优越种族繁荣和统治的固有权利的名义。**从表面上看，我输了，我们也输了。我所得到的只是三年的牢狱之灾。但是，我内心深处有一种万能的确信，告诉我我没有输（我们也没有输）；告诉我，在未来的三百年里——也许会更早——整个雅利安世界都会向阿道夫-希特勒致敬，就像我一生都在向他致敬一样，并向他的民族致敬，我在这个畸形的时代来到这里，是为了证明我对这个民族的爱。今天，我是未来雅利安世界对其救世主的爱和尊敬的第一颗果实；是感恩的世界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第一份敬意。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举起右手，站在萨尔河两岸布满葡萄园的山丘上，站在三年前被美国侵略者炸毁的一座"碉堡"的废墟上，他们在欧洲进行"十字军东征"，捍卫基督教和民主价值观，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异教，雅利安异教。我面向东方——德国——站着，唱着那首不朽的歌曲："高举旗帜！紧紧靠拢！冲锋队迈着沉着自信的步伐前进。被罗斯福阵线和反动派枪杀的同志们正隐身在我们的队伍中前进"。**太阳用它的光芒照亮了我。我的脸上闪耀着反抗的喜悦，还有胜利即将到来的喜悦。**

"黑暗势力的十字军炸毁了这座碉堡和其他数百座碉堡，用火焰和硫磺淹没了整个德国。但他们能禁止禁歌的歌词在这片蓝天下、在这片阳光普照的土地上响彻云霄吗？他们能禁止我——一个非日耳曼雅利安人——在希特勒的德国战败、毁灭和殉难的情况下，仍然忠于它吗？将来有一天，他们会不会扼杀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对元首、对元首的理想和对元首深爱的人民的忠诚——这种忠诚是我以卑微的身份预示和体现的？这首歌的旋律像魔咒一样从我的心底涌出——就像以未来雅利安人类最高正义的名义向德国的迫害者宣判了死刑。雅利安世界的正义就是未来的正义，今天我呼吁反对那些仇恨我们的人的独裁。雅利安世界对元首的忠诚是我一生的挚爱，它将在未来和今后的许多世纪里拥抱千百万人，它是最伟大的"德意志奇迹"。即使在物质意义上，我已经失去了这个时代。但我是德国诸神送来的奇迹的第一个标志，是爱的象征；是不远的将来和遥远的未来对最美好的无尽赞美的承诺。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暂时的失败和屈辱中，我是她永恒胜利的鲜活象征。

与表面现象相反，我们没有输，我们不会输。

真理永不言败。希特勒万岁！

民族社会主义的政策基础 戈特弗里德-费德

基本观点：本手册的目的不是详细阐述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理念的社会学、政治哲学、思想和结构基础，这将是本系列手册中后续手册的特殊任务。

相反，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简单明了地提炼出基本观点。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也不必涉及各种其他政治诉求及其在政党和社团中的代表——这也将是另一部作品的课题

——而是首先介绍我们意图的核心要点。世界从混沌中诞生，从无序中诞生，从混乱中诞生，从有机中诞生。

今天，混乱统治着地球，混乱、斗争、仇恨、嫉妒、争执、压迫、剥削、粗鲁、自私。**兄弟不再理解他的兄弟。同胞们互相攻击，仅仅因为对方佩戴民族社会主义标志就将其殴打致死。**他们承受着同样的负担，同样的匮乏，但过去几个月里，**哪里听说过马克思主义工人攻击并殴打致死他们的雇主、他们的政党大佬、甚至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大吸血鬼之一或大骗子？**混**乱的受害者是简单、朴实、诚实的工人。头脑混乱的是那些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拥护自己阶级中最伟大的剥削者，在煽动和残酷的对待下，转而反对自己队伍中的救星。**

民族社会主义者、爱国团体、右翼政党——努力进入政府或与否定和破坏国家理想的势力同流合污，从而丧失了荣誉和品格。军事协会想要“进入国家”，即塞弗林和格热辛斯基的国家。他们相信自己可以与和平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犹太人共同执政。思想混乱！所谓的法律界人士看不到，在鹰和蛇之间、牛和狮子之间、人和霍乱杆菌之间，永远不可能有友谊与合作——因此他们用他们的力量、用他们的意志来支持混乱，让混乱变成“秩序”，让政治混乱、政治无能为力变成现实。但他们反对民族社会主义者，这些“狂热分子”。他们把政治混乱的拯救者赶走，把他们视为“现实政治家”，尽管他们之间存在某种亲缘关系，但他们同样憎恨他们—— 内心充满疯狂恐惧，担心民族社会主义者会剥夺他们之前的一些特权或地位。

他们忘了自己已经失去了一切，却还希望从国家战利品中分一杯羹！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重工业还是小型企业，经济只有一个目标：“利润”；只有一个愿望：“信贷”；只有一个冲动：“反对税收”；只有一个恐惧和莫名的敬畏：“银行面前”；只有一个对民族社会主义者“打破利益束缚”的要求不屑一顾的耸肩。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负债。银行通过贷款资本轻松地榨取暴利，这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人们组建自己的“经济党派”，投票支持道斯计划，而该计划正是导致税收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他们陷入沉重的利息负担，抱怨税收和利息，对银行家和股市海盗充满敬畏。

头脑混乱！**整个经济体系已经贬值、去人格化，变成了股份制公司。工人将自己交给了他们最大的敌人——金融资本。负债累累的车间、工厂和办公室的价值创造者只能得到微薄的工资；工作的每一份收获都作为利息和股息流入匿名金融巨头的腰包。那些将经济理性作为租赁的人不知道如何驯服由此产生的混乱。他们被税收和利息榨干，被被欺骗的工人群众的地下隆隆声威胁，他们疯狂地幻想金融资本及其“国家”，他们被当今混乱中的投机者和剥削者容忍，只是作为对劳动人民群众的奴隶主。但他们愤怒的对象不是德国经济的屠夫，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疯狂——不，而是崇敬民族社会主义党徽的人。**他们忘记了，只有我们预见了德国经济的悲剧，并适时地预测了这场悲剧，并展示了如何依靠自身力量重建整个经济。协会、利益集团、专业协会、公务员协会、雇员协会、储蓄保护协会、小养老金领取者协会、帝国银行债权人协会、国防协会、退伍军人协会、行会、俱乐部、合作社、工会、农民和土地联合会、俱乐部，以及这些奇怪机构可能拥有的任何其他名称——这些机构的基本理念是合理的，但在当今混乱的公共生活中毫无意义——都在试图恢复秩序。但徒劳无功，因为它们没有有机地融入社会，融入更高层次的人民整体。它们只热衷于为自己的阶层谋取小

利，缺乏任何伟大的政治或经济指导原则，无奈之下只能向尽可能多的政党求助，承认国家经济目前的形式，对所谓的权威唯命是从。他们耗费了德国人民无尽的财富，养活了无数的律师、工会领袖、董事和闲杂人等，但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通货膨胀这一罪恶的革命措施侵吞了所有国库，掠夺了储户、俱乐部会员、同志和行业。

一项税法，一项在真空中制定的措施，摧毁了多年工作的成果——这是一方面，经过无休止的会议、讨论、提交、向政府和国会陈述，以物易物，才取得的优势——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或下跌，大部分早已过时。

困惑！人们感到困惑：如果农民受到虐待和困扰，他如何生存；如果中间贸易抬高了物价，工人如何购买；如果生活成本指数以百分比计算上涨得更快，公务员和员工最终获得的工资和薪水增长又有什么用。但他们仍然忠实地期待国家提供帮助，而国家正是导致人民贫困和压迫的罪魁祸首，它绝非“国父”，而是压迫者，为有钱贵族收取利息和税款。

因此，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转向老牌政党，同时宣称自己“不问政治、不偏袒任何党派”，从而更加屈从于最悲惨的党派政治。公共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呈现出同样的混乱景象，无论是艺术、文学、戏剧、电影、广播、教堂、学校，到处都充斥着“腐败的发酵”，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是腐败和破坏的罪魁祸首，他们或明或暗地出现在最重要的地方在幕后操纵着一切，他们或伪装成施特雷泽曼或谢德曼，或毫不掩饰地以雅各布·戈德施密特、沃伯格、瓦瑟曼、莱维和其他人的身份，利用媒体和高额利息剥削和愚弄德国人民。

民族社会主义为自己设定的艰巨任务是：形成意志、消除混乱、恢复世界秩序、维护秩序（在柏拉图式的最高意义上）。

必须明确的是，我们既不承认警察国家表面上的外部秩序为“秩序”，也不承认金融资本惯常的做法和法律允许的突袭为“秩序”，更不承认辛迪加和信托的协议以及其他“有组织”的欺骗民众的措施为“秩序”，无论它们如何“运作”。一群强盗也有自己的“秩序”，一座监狱也有“监狱秩序”。但从一个有机结构的国家整体来看，我们整个公共生活中的几乎所有现象都是极度扭曲、不自由、受压迫、不真实的，从高处俯瞰，呈现出一幅完全混乱的画面，一幅所有人相互斗争的画面。

政府与人民、党派与党派之间形成最奇怪、最不可能的联盟，议会与政府、雇员与工人、消费者与生产者、商人与生产者和消费者、业主与租户、工人与农民、官员与 公众、工人阶级对抗资产阶级、教会对抗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攻击他们当前的对手，而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个人利益**、权力地位、自我利益、钱包里的钱。**没有人考虑过他人也有生存的权利，没有人考虑过对私利的无情追求只能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没有人考虑过同胞的福祉，没有人考虑过对社会的更高责任，没有人停止过对个人财富的无休止追求。为了出人头地，你肘击邻居的肚子，为了达到目的，你甚至不惜踩着尸体——你考虑过什么？这就是现代经济态度。**

于是，众人开始追逐、愤怒、咆哮、尖叫，强者推搡、踢打弱者，将后者撂倒在地，卑鄙者变得厚颜无耻，高尚者变得残酷无情——**对享乐的贪婪扼杀了正直，暴力战胜了正义，党派利益压倒了公共利益，偷窃、欺骗和欺诈战胜了诚实劳动。一场前所未**

有的、由所有卑劣本能引发的可怕战争；人们不由自主地想起古老的神话预言：“当法律和习俗被打破时，狼和斧头的时代就开始了；大海汹涌，天火降临，人神俱灭”。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我们确实正站在世界转折点的中间，可以理解的是，单纯的心灵、迷茫的灵魂无法从当今的混乱中找到出路，他们绝望地寻求死亡，或者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甚至加入围绕金牛犊的疯狂舞蹈，忘记一切羁绊，也投身于疯狂的漩涡。“趁现在好好享受吧——洪水过后，便是我们！”只有当整个社会的精神基础被摧毁或变得虚假时，才会出现如此深刻的国家结构动荡，而且这种动荡是可以解释的——**事实上，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家、经济学家和公共生活领袖都同样推崇个人主义这一世界观。**

个人利益是唯一的动机，为自己所属阶层、专业团体谋取利益是唯一的目标。在此，我必须再次提及本系列中的后续作品，它将从根本上探讨社会结构中的最后几个社会学问题。在这里，我们仅通过举例说明，来展示当前国家与当前经济中的结构或缺乏有机结构与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结构之间的根本区别。当前流行的理论是：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从最好的意义上讲，国家是出于特定目的而由各种个体或团体组成的联合体。石堆与这种社会结构学说相对应；其中，单个石头和石块才是唯一真实的东西，而外部形态则是偶然的，石头是放在上面还是下面，对石堆来说并不重要——它始终是石堆，由机械地由多少个单独的石头组成。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民族社会主义社会学说和国家哲学中的国家形象：房子。从机械、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房子也是由许多砖块、碎石、水泥、横梁、窗户、门、地板等组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房子、房间比一堆砖头等简单加总的东西更高、更有自己的规律、更具有新意、更完整。每个人都明白，房子不是由许多单独的部分随意拼凑而成的，而是只有根据计划将这些单独的部分有意义地组合在一起，房子才能建成。只有到那时，新的、更大的、精神上的上层建筑才会出现。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只有当混乱有序地、有机地被组织起来，当形式根据一定的计划从混乱中产生，当单纯的物质变成一个有意义的结构整体，只有到那时，各个部分才能真正有意义地存在，只有到那时，真正的国家才能出现。维也纳大学前校长奥思玛·斯潘（Othmar Spann）以无与伦比的精湛技艺，在《真实状态》（The True State）和《社会教义》（Social Doctrine）中，以科学的方式论证了当今个人主义构建的社会形态的社会学基础，与普遍主义社会秩序的崇高目标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只是用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方式表述了这一点：**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只有服务于公众，只有作为国家整体框架内的服务成员，个人才能唤醒更高的生活。**

只有这样，他——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才能真正融入国家更高的整体性。只有这样，他才能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社区意识**、真正的生活，才能获胜。只有在这种基本理念的统治下，个人才能获得安全感，并认识到只有在这种统治理念下，才能从当今的掠夺性经济中产生结构完好、有机的国民经济，从而造福于整个社会，进而造福于每个人。

今天，个人是各种势力争夺统治的无助猎物，他的结社对他毫无用处。真正的敌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明确而正确地识别出来。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大肆鼓吹反资本主义，尽管中间党派信誓旦旦，尽管经济界大肆宣扬税收和利息负担，但世界上的敌人——大资本及其代理人犹太人——仍然笼罩在阴影之下。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不得不忍受利息之鞭的抽打，收税员紧盯着各阶层的人，但谁敢与银行和证券交易所资本的无穷力量对抗？与所有其他世俗经验相反，借贷资本的无穷力量表现为，它无需付出努力和劳动，通过利息、股息和年金，可以说自身就能增长，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大。谎言的恶魔原则战胜了创造性工作的秩序原则。打破利息的束缚是我们在这里的战斗口号。我知道，即使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这一基本要求也没有被充分理解和理解其巨大和根本的意义。例如，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演讲者中很少有人敢于谈论这个核心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核心问题，我们大多数党员都听说过“与股市和借贷资本作斗争”这句话。但“利息束缚”实际上包括什么，它如何影响个人和国家的实际生活，哪些金融技术将人们变成了“利息奴隶”，甚至哪些实际措施是合适的 ，打破利息束缚的后果对整个人口的影响是什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问题都太模糊了，以至于他们无法用自己的语言向他人解释。

在《我的奋斗》第一卷第 224/225 页中，阿道夫·希特勒用以下言论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我听到戈特弗里德·费德关于‘打破利益束缚’的首次演讲时，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理论真理，对德国人民的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反对国际金融和借贷资本已经成为德国民族争取独立和自由计划中的最重要的一点。”所有真正严肃的民族社会主义者都抱有这一信念，因为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意味着解决犹太人问题，这可以转化为理性——以及更多。**可以说，反犹太主义是我们运动的情感基础。每个民族社会主义者都是反犹太主义者，但并非每个反犹太主义者都会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者。反犹太主义纯粹是消极的。反犹太主义者已经认识到犹太人是各国祸患的根源，但通常这种认识只会转化为对犹太人的个人仇恨和对犹太人在经济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仇恨。在最好的情况下，反犹太主义会导致要求将犹太人从我们的国家和经济生活中清除出去。**

普通的反犹太主义者不会过多考虑如何做到这一点。如果犹太人统治的智力基础，即“以利己主义取代公共精神”，以及犹太人权力的物质手段，即犹太人的银行、贷款和信贷体系，即使在犹太人被驱逐后仍然存在，那么就不会缺少犹太混血儿或“正常”的德国人 在可悲的种族混合中取代犹太人，他们对自己同胞的愤怒不会比今天异族的犹太人少，也许我们甚至会在犹太人曾经坐过的地方看到一些“反犹太人”。另一方面，民族社会主义的主要诉求是打破利益束缚，这确实具有建设性。这一诉求本身意义深远，影响广泛。在我题为《我们纲领的核心》（载于《1927 年民族社会主义年鉴》）的短文中，我指出了这一要求在所有党派和协会中的特殊地位。在我们纲领的其他要求中，我们发现部分类似来自右翼党派，部分来自左翼党派，它们有着相似或相同的努力。只有这一主要要求在任何其他党派中都没有对应物。**我们都知道，左翼党派谎称“打倒资本主义！”的喧嚣，以及右翼党派冠冕堂皇的爱国口号，都无法开启新的世界纪元，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反动主义的要求都无法改变我们整个经济的本质，它们只会像俄国共产党一样被粉碎，而不是被建立起来。“利息奴隶制”是什么意思？指在犹太人主导的高利金融控制下的国家状况。如果农民不得不“贷款”来为他的生意融资，**

并且不得不支付如此高的利率，以至于利息吞噬了他的劳动收益，或者已经贷款并且不得不继续贷款，并且不得不背负抵押贷款债务作为永远的累赘，那么他就处于利息奴役之中。

工人以微薄的工资在工厂和车间创造价值，却受制于利息，而股东却无需付出努力或劳动，就能获得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股息。整个商业中产阶级都身负债务，几乎只能靠工作来偿还银行贷款利息。所谓“利息束缚”，是指所有必须通过脑力或体力劳动来赚取收入的人，而一小部分人无需工作或付出努力，就能从利息、银行和股市利润、金融交易等渠道获得巨额收入。——不考虑那些领取养老金和储蓄的人，他们的利息收入也来自一个存在根本缺陷的机构——但他们一生中都被剥夺了小笔利息的数倍甚至百倍，或征税，或以其他方式被剥夺，这样在他们年老时，他们以前被剥夺的劳动的全部收益的一部分可以很容易地支付给他们——从而赢得了大量似乎对当今的利息资本主义制度感兴趣的人。（这一点将在其他地方进行更全面的解释。）在“利息束缚”中，实业家通过艰苦的工作建立了自己的事业，顺应时代潮流将其转变为“股份公司”，但他不再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必须满足“监事会和股东”对利润的贪婪，否则他就会被自己的事业解雇！。

每个通过“贷款”满足其金融需求的国家都陷入了“利息束缚”。每个将最重要的国内主权权利交给金钱、银行家、货币体系（金融主权）、铁路（运输主权）以及最重要的税收和关税监管的国家，都将在“利息束缚”中消亡。德国通过接受道斯法案（Dawes laws）就属于这种情况。**所有屈服于借贷资本的国家及其政府都陷入了“利息束缚”。所有将金钱置于优先地位的生产性劳动都陷入了“利息束缚”，以至于今天，“金钱”这个“经济的仆人”成为了“劳动的主人”**，事实上，它是最残酷的暴君。“利益束缚”是正确的事实术语，用于描述“资本与劳动”、“鲜血与金钱”、“创造力与剥削”之间的对立。

因此，在我们意志中，力量与诡计、精神与物质、自由与束缚、光明与黑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就像闪电一样。“废除利息奴隶制”的要求规模如此庞大，对我们的国家和种族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我们国家能否从最深的奴役和耻辱中恢复过来，能否复兴、幸福和繁荣，能否 “打破利益束缚”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它远不止是一个金融政治需求，它的前提和影响深刻地介入政治和经济生活。它也是经济意识的核心问题，因此也深刻地介入每个人的个人生活。它需要每个人做出决定： 为人民服务还是无限地积累私人财富——因此，它意味着“解决社会问题”。每个“世界问题”的本质在于，它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词就像一团火焰从混乱中升起，一千本书和一百个先知都无法详尽地阐述这个想法。因此，关于民族社会主义这一强大的基本理念，目前我们已无话可说。在我之前的小册子《打破利息束缚宣言》（1926 年慕尼黑，已绝版）和《拯救国家破产》（1919 年迪森，约瑟夫·C·出版社）中，我已经阐述了这一理念。

要熟悉这个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过去五十年中，经济的实际组织完全被基于利益的资本主义理念所主导，这意味着所有在这些理念下成长起来的人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定位，摆脱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具体内容将在不久后出版的特别小册子中给出，该小册子将讨论如何打破利益枷锁。除了我们计划中的这两个伟大而崭新的基

本理念外，还有一些与之相关的原则必须提及。这些原则将指导国家的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和文化政策，并将作为计划中各项措施的基础。我们的国家政策基本原则非常简单：“德意志帝国是德国人的家园”。这一国家政策基本原则涵盖了整个外交政策领域，包括德国的政治解放、所有种族政治诉求以及公民后果和定义。

我们的经济政策基本原则是：国民经济的任务是满足需求，而不是实现贷款资本的最大回报。这一经济政策原则表明了民族社会主义在私有财产、经济结构（小型、中型、大型和巨型企业——辛迪加、信托）以及重大道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如果“国民经济”不想成为剥削和纯粹追求利润的经济，那么这些问题就必须在经济中得以体现！在金融政策领域，我们的原则是：货币体系为国家服务；金融势力不得形成国家内部的势力。这一原则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要遵循的路径包括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打破利益束缚”、将货币体系国有化、终结债券经济、建立建筑和经济银行等。

就计划而言，每项任务都至关重要。另一个领域是整个税收立法领域，其看似不可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取消税收来废除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我们的指导原则是：共同利益是最高法律。在这方面，我们与当前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当前的实践中，每个行业、每个阶级、每个专业协会都努力在社会政治领域为自己的群体谋取利益，而不考虑共同利益。**我们还必须消除住房短缺和经济困境，并建立全民养老金计划。在文化政策方面，只能确立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所有文化政策工作都必须从纯粹的德国民族的角度出发。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智力力量能否带来新的文艺复兴，能否迎来一个所有艺术都达到经典水平的时期，这无法掌控、强制或实现。

另一方面，我们德国文化和知识生活在犹太人独裁统治下所遭受的深刻创伤可以通过适当的措施来治愈，特别是通过新闻解毒。除了这些最重要的公共生活领域之外，当然还需要实施其他各种重大改进。显然，我们的法律体系必须与多种创新保持一致，进步到公法的版本。议会民主投票权的荒谬之处将被废除，正如在独裁统治过渡期结束后，国家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将变得清晰明了。但是，从这一简短概述中，人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些问题与我们纲领基本原则的关联程度。君主制或共和制对我们来说不是根本问题。我们是否有五个或二十五个联邦州或者省并不重要，只要所有德意志族群团结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下，成为对外国坚如磐石的存在，德国公民能够在国内幸福、满足地生活。

介绍北一辉

日本经常与原子弹、战争罪行和曾经强大的军队联系在一起。然而，导致这些联系的历史历程和其中有影响力的人物经常被忽视。其中一位人物就是北一辉，他被公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他的遗产被争议和误解所包围。北一辉仍然是日本历史上最具两极化的人物之一。作为一名政治思想家，他设想了一个彻底重组的日本，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佛教和军国主义交织在一起。在动荡的 20 世纪初，北一辉的著作是一份革命蓝图，倡导广泛的土地改革、经济国有化和“昭和维新”，以恢复日本的强大和统一。虽然他的思想在年轻军官中赢得了狂热的忠诚，但也引发了重大争议，最终导致他被处决。本文探讨了北的重要作品、它们所塑造的意识形态及其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和战争轨迹的持久影响。

早年生活与影响

北于 1883 年出生在日本秋田县佐渡岛的一个武士和商人家庭。虽然他的家庭相对简朴，但这样的背景让他很早就接触到了日本农村的挑战以及明治维新加剧的不平等。这也让他养成了叛逆精神。这些经历激发了他解决社会不公和不平等问题的热情，他认为这些不平等正在从内部腐蚀日本社会。北上了大学，但很快就失去了希望。他博览群书，通过独立学习和哲学探究自学，特别是探索社会主义、儒家思想和西方政治思想。受柏拉图、卢梭和马克思等西方哲学家以及日本民族主义者和改革思想家的影响，北对社会改革形成了独特的见解。

1889 年明治天皇颁布日本新宪法

他的思想成长与明治时代日本的快速现代化和工业化相吻合，当时日本在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中遭受了侮辱，正努力追赶西方。虽然日本的现代化取得了成功，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收入不平等、社会紧张和西方帝国主义压力。这些问题强化了北的信念，即日本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来保护其利益免受西方列强的侵害，并通过经济改革照顾其人民。他每天吸食可卡因，这是他为了缓解童年受伤所造成的疼痛而养成的习惯，这也为他独特的世界观增添了色彩。这种瘾很可能影响了他对社会和治理的强烈甚至有时激进的看法。

1905 年 9 月，北从家乡佐渡返回东京，当时日比谷暴动爆发，抗议《朴茨茅斯条约》。该条约由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谈判达成，结束了日俄战争。条约中包含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野心的条款，承认日本对俄罗斯控制的中国和朝鲜部分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权。日本的这次胜利是**黄人种族首次在与大国的对战中取得重大胜利**，使日本不再是像中国一样的受剥削国家，而是可以与世界其他大国坐在谈判桌上。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果，但激进团体认为该条约是一次耻辱的失败，引发了大规模骚乱。北与抗议者一样渴望提高日本的国际声望，但他不同意他们关于国体的价值观，他认为国体是“寡头手中的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写了他的第一本书《国体论与纯粹的社会主义》。

乔治·威尔逊（George Wilson）总结了背景：

“北是在民众对日俄战争结果普遍不满的背景下写下他的第一本书的。”

— 乔治·威尔逊，《日本激进民族主义者：北一辉 1883-1937》

骚乱标志着日本暴力政治起义的兴起，与北的激进政治意识形态相一致。《国泰论》是北的第一本政治题材的书，反映了他早期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丹尼·奥巴赫将这一阶段描述为北的“社会主义、世俗和理性阶段”。奥利维耶罗·弗拉托利洛认为，北之所以写《国泰论》，是因为他同辈的知识分子缺乏批判精神。

Frattolillo 指出：

“北特别批评了某些知识分子对体制的顺从态度，他们卑躬屈膝地接受从西方引进的新理论和新知识形式，并将其翻译、移植到日本。”

— 奥利维耶罗·弗拉托利洛（Oliviero Frattolillo），《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超越西方：探寻世界历史的新主体性》

北旨在通过他的作品批判社会的缺陷并提出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北的第二本书《中国革命非正式史》批判性地分析了 1911 年中国革命。北被 1911 年中国革命事业所吸

引，加入了宋教仁领导的同盟会。他前往中国，意图帮助推翻他认为是西方列强傀儡的清朝。然而，北也对革命民族主义感兴趣。1901 年成立的民族主义团体国龙会（黑龙会）与他对俄罗斯和朝鲜的看法相同，导致他加入了该组织。作为国龙会的一名特别会员，北被派往中国为该组织撰稿，报道 1911 年辛亥革命期间的持续局势。 1920 年 1 月，北回到日本时，他对中国革命及其为实现他当时所设想的变革而提供的策略感到失望；他认为日本的表现与西方剥削者相同甚至更糟。他与大川周明等人联手成立了“友存社”，这是一个民族主义和泛亚主义组织，致力于写作和政治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为二战前日本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哲学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经历了经济增长，但这种繁荣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随着昭和金融危机的爆发而结束。随着社会日益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加剧，一些家庭因贫困而不得不贩卖女孩等问题成为经济上的必需品。工会越来越受到工团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日本的工业和金融领袖则继续通过与政客和官僚的密切联系来积累财富。军方被视为没有政治腐败的“清白”，其中有些人渴望采取直接行动来应对他们认为自由民主的弱点和政治腐败对日本的威胁。

他的最后一部主要政治著作是《日本改组大纲》。该书最初在上海写成，但在 1919 年被禁，1923 年由《海造》杂志的出版商海造社出版，但随后遭到政府审查。他早期和后期的政治著作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国家政策（Kokutai）的理念，他认为这将有助于日本度过迫在眉睫的经济或国际危机。他想象日本站在统一和解放的亚洲的前沿，通过整合日本化和普世化的亚洲哲学来协调全球文化。这旨在为一个对于确保未来世界和平至关重要的单一超级大国的崛起铺平道路。这一愿景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摒弃自由民主和泛亚主义。

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

北的意识形态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来自不同来源的多种元素混合到他独特而又令人困惑的意识形态中。这导致他的意识形态被曲解，并被贴上其他不稳定且无益的标签，例如极右翼。北的意识形态经常与当时的主流思想相矛盾，并挑战左右翼政治光谱。

乔治·威尔逊（George Wilson）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然而，我本意是，北一辉革命理论的复杂性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像右和左这样的术语是否真的有助于对 20 世纪早期的日本思想家进行分类。左右分析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后来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用于指定某些广泛的政治倾向：右派表示希望保留现有制度并加强传统社会联系，尤其是爱国主义和家庭纽带，而左派则表示愿意转变为支持政府在人民事务中发起的大规模改革。左派最常与下层阶级的支持联系在一起，而上层阶级的利益则支持右派事业。两者都能够从温和的形式转变为极端的形式，以实现他们的目标。接受这些标准是关于政治连续体的相当典型的假设，我们可以说——预见我们的结论——北一辉不符合右派的标准形象。“

— 乔治·威尔逊，《日本激进民族主义者：北一辉 1883-1937》

关于北对国体的看法，北的观点与宗下的观点相似，将天皇设想为一个父亲般的、充满希望的、精神领袖，让每个人都团结在天皇身后。在那个时代的日本，明治天皇放弃了绝对统治，引入了宪政，从而产生了“国体论”的政治概念。这一概念由美浓

部达吉提出，将自由国家或国体定位为至高无上的，甚至天皇也只是通过宪法结构定义的“国家机关”，而不是超越国家本身的神圣权力。美浓部用人体头部的比喻来描述天皇的角色。这一论点受到了德国法哲学家格奥尔格·耶利内克（其著作《国家通论》于 1900 年出版）和英国君主立宪制概念的影响。美浓部警告说，如果日本最终没有形成双重政府，军队将完全独立，凌驾于法治之上，不受文官当局的监督，那么日本国会必须谨慎限制天皇对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他创建的体制最终将实现这一点，当时元老在政府大正危机期间帮助推动了军事力量的发展，因为天皇对军队缺乏制约。

北一辉不同意国泰论，他主张绝对主义和柏拉图式的父系君主制，希望恢复明治维新精神，实行绝对统治，但不受元老和财阀的束缚，也不受西方列强的虚假承诺。分歧的主要点在于他对极权主义的使用。北对极权主义的理解源于他对柏拉图《理想国》的广泛阅读，这启发他效仿其思想。

“这些日本激进分子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西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基础。因此，该文本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社会革命的蓝图……”

– Hyun Jin Kim,《柏拉图在东亚吗？》

北的哲学的另一个核心要素是他对日本统治精英的批评，他认为这些精英腐败且脱离了普通民众。他批评财阀（大型工业集团）剥削工人并与政府建立密切联系，他认为这损害了日本人民的福祉，以造福财阀。佛教、拉萨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融合体现了他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激发了他希望日本由致力于人民福祉而不是私人利益的领导人来统治的愿望。北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他经常使用“社会民主”一词，指的是费迪南德·拉萨尔倡导的版本。乔治·威尔逊在以下背景下阐述了拉萨尔和马克思对北的影响：

“佐渡岛和其他地方一样，世纪之交带来了一波新思想。社会主义继承了民粹思想家曾经披着的抗议外衣。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倾向于浪漫主义，更多地受到热情洋溢的费迪南·拉萨尔的影响，而不是卡尔·马克思的影响…… ”

— 乔治·威尔逊,《日本激进民族主义者：北一辉 1883-1937》

然而，现代自由主义者和某些批评家认为这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承认。北一辉虽然钦佩马克思，但他在诸如缺乏灵性等方面与马克思意见相左。不过，在其他领域，比如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北一辉是第一批赞扬马克思的人之一。

“虽然北在一些关键观点上与马克思意见相左（例如，他强烈反对马克思的价格理论），并强调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独立解释，但他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从《国泰论》开篇，他就宣称自己准备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批评者，并在随后的所有著作中赞扬马克思对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他甚至断言，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是掠夺的积累”这一思想是“与万有引力定律同等不变的真理” ”

— 丹尼·奥巴赫,《日本先知：北一辉思想中的末世论与认识论》

在他的政治议程中，政变被认为是在强势人物的直接领导下实施紧急状态制度的必要手段。由于天皇在日本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北条认为君主是中止宪法、建立由天皇发起的委员会以及从根本上重组内阁和国会的最佳人选，其成员由民众选举产生，不受任何“有害影响”。这将实现明治维新的真正本质。新提出的“国家改组国会”将根据天皇的草案修改宪法，对个人财富、私有财产和公司资产施加限制，并创建由政

府直接管理的国家实体，例如日本政府铁路。土地改革将把所有城市土地转为市政所有，这与毛泽东后来在中国实施的重大改革如出一辙。

“私有财产限制：日本家庭不得拥有超过一百万日元的财产。日本公民在海外拥有财产也应受到类似限制。任何人不得将财产赠予有血缘关系的人或他人，或以其他方式转移其财产以规避这一限制。”

“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大片的森林，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未开发土地，最适合大面积耕种的土地，应当属于国家所有和经营。”

— 北一辉，《日本改组纲要》

新国家将废除家族贵族制度、贵族院和基本税制以外的所有税制，确保男性享有选举权、自由、财产权、教育权、劳动权和人权——所有这些概念都借鉴了他对拉萨尔的解读。在保留天皇作为人民代表的同时，特权精英将被取代，军队将被赋予权力，以加强日本，使其能够将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

“废除贵族制度：通过废除贵族制度，我们将能够消除构成天皇和人民之间障碍的封建贵族。这样，明治维新精神将得到宣扬。”

— 北一辉，《日本改组纲要》

一些学者不诚实地误译了他的作品，过分关注他思想中的达尔文主义，试图将其与希特勒等人物联系起来。然而，北的达尔文主义受到马克思的影响，而马克思本人也受到达尔文的影响，这使得北更类似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中的达尔文主义，而不是纳粹德国的达尔文主义。这使得他的立场与葛兰西、杜波依斯、毛泽东或苏加诺的立场相似，他们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仍将马克思视为灵感来源。此外，即使是将达尔文主义归因于北的学者，如尼古拉斯·霍华德，也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的，因为他们找不到政治现实主义这个词，这种理论关注政治的竞争和冲突性质，以及权力和安全如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问题。

关于北的地缘政治观点，北还设想日本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者后来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借用了这一概念，以证明其在亚洲的扩张是合理的。**北对这一“圈”的最初设想是亚洲国家在日本领导下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西方的影响。虽然他认为日本是亚洲的解放者，但他并不像共产主义消息人士试图描绘的那样，主张剥削或压迫其他亚洲国家。**

1943 年大东亚会议

“……如果有人把《日本改组总纲》称为社会革命论，那也未尝不可。……过去，欧美的思想浪潮席卷日本，但否认日本文明浪潮将席卷美国，实在是不科学。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之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罗马文明之后，是个别民族国家的文明。……印度文明的狭隘理论成为西方宗教哲学的基础，但印度本身的这种理论已荡然无存，传入中国也只剩下骨架。只有在东海的一个小岛上，它才被奉为大道。在这里，它日本化，后来又现代化，现在又普遍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后，它的复兴将照亮整个世界。古代的文艺复兴与之相比，将微不足道。东西方文化将具有亚洲思想的日本化和普遍化，这将启迪那些粗俗的、所谓的文明人。

宇宙运行有其规律，国家兴衰有其规律。正如欧洲各国几百年来不让蒙古族成吉思汗那样的人统治一样，现在盎格鲁撒克逊部落还要蹂躏世界多少年呢？历史在进步，

前进有步骤。东西方的历史进步经历了“战国”时期，之后是封建国家的集体统一，以此类推，直到现在的国际“战国”时期，现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世界和平成为可能，因为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它将统治世界上的小国和大国，建立封建和平。各种世界和平理论都试图消除国家边界，这些理论建立在理想的基础之上，却忽视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即伟大的科学发明和精神的涌现。世界各地理想的现实是，永远只有一个丰臣秀吉，一个德川秀吉，一个神圣的天皇。

日本人民应该考虑到，主权的古老意义、超越控制权的最高权利将在国际上复兴，统治各个国家的最高国家将得以实现。众神之地在神话中被叙述……美国的星旗在凡尔赛宫主持会议，这暗示着世界处于黑暗之中。日本的旭日旗在击败英国、使印度独立、中国自力更生后，将把天堂的光芒洒向全世界人民。全世界预言的基督再临，实际上是日本人民的经文和以穆罕默德为形式的剑。日本人民应该通过改革以日本改组基本原则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困难。日本作为亚洲文明的希腊，摧毁了强大的俄罗斯，就像波斯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一样。只有那时，中印两国七亿人民才真正开始觉醒。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

— 北一辉，《日本改组纲要》

北主张日本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有权控制远东的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并建议这些地区的居民应享有与日本公民相同的权利。他认为，如果不解决全球分配挑战，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就无法解决。这一概念被称为昭和维新。北认为世界分为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他认为日本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缺乏广阔的领土（大型殖民帝国）和金融资源（海外投资）。相比之下，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拥有超过其应有份额的全球领土的主要土地所有者，而英国则被视为食利者和金融家。这种观点与意大利原法西斯主义者恩里科·科拉迪尼非常相似。

“由于自身的发展，国家也有权对那些非法占领大片殖民地、无视全人类共存天道的国家发动战争。（作为当今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国家有权对那些占领澳大利亚和远东西伯利亚并企图夺取这些地区的国家发动战争。）”

“国家有权发动战争，不只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被无原则的强权压迫的其他国家和种族。”

— 北一辉，《日本改组纲要》

北的现实主义观点认为，世界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因此北认为，为日本的积极发展而战不是自私的，而是一种生物性的需要，是一种为国际正义而革命的行为。这种国际正义感和需要感使北同情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国际地主和财阀”的挑战。尽管德国失败了，但北预测日本很快就会挑战这些不公正，并在胜利后成为“东方德国”，获得澳大利亚、东西伯利亚、太平洋岛屿、满洲和蒙古。这些领土收益将确保日本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并确保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印度的独立。然而，北认为亚洲的解放是迈向更伟大使命的第一步。

“欧洲革命论的权威，就是建立在如此浅薄、肤浅的哲学之上，所以当需要领悟这种‘刀剑的福音’哲学的时候，亚洲文明的贵族希腊自己就必须主动重组国家，摇起亚洲联盟、世界联盟的旗帜，将天道教诲传遍四海，宣扬‘万物皆佛子’。”

— 北一辉,《日本改组纲要》

日本渴望通过在全世界传播佛教的神圣原则来领导一个全球联盟。北认为，反对地主和富豪统治的国际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要驱动力。在历史背景下，北的政治愿景试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一种被称为“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方式来统一和加强日本社会。日本的国际使命集中在确保印度独立和维护中华民国，防止它像非洲一样分裂，以体现亚洲统一的精神。他的计划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包括朝鲜、台湾、萨哈林岛、满洲、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澳大利亚。这一愿景还意味着最终拒绝西方民主，认为它与亚洲意识格格不入。

“认为通过选举产生人民代表的国家体制，即‘民主’，比由一个人代表国家的体制更好，这种想法是毫无科学依据的。国家因民族精神和国家形成的历史而不同。不能说实行了八年共和制的中国比由一个人代表国家的比利时更理性。美国的‘民主’观念，是基于个人自由意志缔结自由契约而形成的社会，是基于个人脱离欧洲原有国家，建立村落共同体，进而成为国家的极其粗暴的观念。选民君权神授论是一种软弱的哲学，只是君权神授的对立面。日本建国后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没有出现过这种软弱的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国家元首必须通过出卖自己的名字来操纵舆论，像低级演员一样磨练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参加选举，而对于从小就被灌输“沉默是金”和“谦虚是一种美德”的日本人来说，这种奇怪的习俗足以让他们保持沉默……”

— 北一辉,《日本改组纲要》

北提议日本帝国在 1919 年采用世界语来统一世界。他设想，采用世界语 100 年后，世界语将成为日本及其广大征服领土的唯一语言，日语在帝国内将变得类似于梵语或拉丁语。他认为，日语书写系统过于复杂，无法强加于他人，罗马拼音无效，当时在日本学校教授的英语日本人尚未掌握。北认为英语对日本人的思想有害，类似于鸦片对中国人的影响，它尚未摧毁日本人，因为德语的影响力更大。尽管如此，他还是呼吁将英语排除在日本之外，以防止日本被英国化。北受到他结交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启发，这些人在 20 世纪初主张用世界语代替中文。

北思想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其佛教的广泛影响。与他那个时代普遍反对社会主义的昭和神道教不同，北信奉日莲佛教，这是大乘佛教的一种形式，或称“大乘”佛教，它大力鼓励政治行动和组织，以应对尼禄预言的即将到来的大战。这使得北比神道教更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和多元化的观点。北的佛教与上座部佛教或“长老佛教”不同，它注重菩萨和社区协助实现涅槃。这种形式的佛教由于其社区性，与社会主义非常契合。然而，也有例外，比如奈温领导下的缅甸社会主义者和达赖喇嘛领导下的金刚乘社会主义者。

他的尼采佛教也在他的末世论或历史循环观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和马克思一样，他相信历史在进步。他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循环历史的佛教解释。北认为，他将要实施的社会民主将是人们实现涅槃的最佳舞台，维持这种状态将产生最多的菩萨，使人们接近涅槃。这种将佛教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思想反映了净土佛教，与日本前农业社会主义战士僧侣团体一向一揆的信仰相呼应;从日莲到北一辉，把我们从西方解放出来

在《论国体与纯粹社会主义》中，北还挑战了民族主义者如穗积八束等神道教观点，后者认为日本是一个种族同质的“家族国家”，是天照大神天皇的皇室血统的后裔。北强调了非日本人在日本的历史存在，并认为，除了明治时期中国人、韩国人和俄罗斯人被纳入日本国籍之外，任何人都应该能够归化为帝国公民，无论种族如何，都享有与日本族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他认为，日本帝国不能扩展到非日本地区，除非给予他们平等的权利或将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同时，他认为日本应该保留独特的日本身份，作为世界的菩萨。他的观点与伊塔洛・巴尔博和詹蒂莱关于移民和同化政策的观点相似。

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和年轻军官运动

虽然北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欢迎，但却引起了年轻、失意的日本军官的共鸣，他们自认为是天皇和日本未来的守护者。这个群体被称为“青年军官”，是一个致力于净化日本的左右翼联盟。他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特别活跃，主张采取激进行动，罢免腐败的领导人，实现北复兴日本的愿景。他们相信，只有由军队领导的革命运动才能拯救日本，摆脱社会和经济问题，保持其在西方列强面前的独立性。

这个年轻军官联盟中的一个派系是樱会，即日本帝国陆军年轻军官于 1930 年 9 月成立的民族主义秘密组织。他们的目标是按照极权军国主义路线重组国家，可能通过军事政变来实现。该组织追求昭和维新，意图在新的军事独裁统治下恢复昭和天皇的合法地位，摆脱党派政治和腐败官僚。他们还支持一辉设想的民族社会主义。

樱会由日本帝国陆军总参谋部俄罗斯部门负责人桥本金五郎中校和张勇上尉领导，并得到荒木贞夫的支持，最初由大约十名陆军总参谋部的现役校级军官组成。樱会最终扩大到包括团级和连级军官，到 1931 年 2 月成员超过 50 人，到 1931 年 10 月可能达到数百人。樱会的一位杰出领导人是未来的日本首相小矶邦明。樱会的会议在绫部大本教总部由合气道创始人植芝盛平领导的道场举行。

1931 年，在三月事变和天皇军旗事变期间，樱会与民间民族主义分子一起试图推翻政府。天皇军旗事变后，樱会领导层被捕，樱会解散，许多前成员加入了陆军内的东政派。年轻军官对北的想法的钦佩导致了 1930 年代的几次政变企图，其中最著名的是 1936 年失败的二二六事变。在这次事件中，一群年轻军官试图夺取日本政府并暗杀他们认为是国家改革障碍的关键政治人物。尽管政变被镇压，但它凸显了北在军事圈的影响力以及日本一些社会派系的激进化。

皇道派由荒木贞夫将军和他的门徒正木甚三郎创立。这个激进派别旨在建立一个军事政府，推行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和侵略性扩张主义思想，主要获得年轻军官的支持。皇道派强烈支持北进论（“北方扩张主义”），主张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认为西伯利亚属于日本的利益范围。虽然东政派也有北扩张的支持者，但他们更倾向于更为谨慎的国防扩张。满洲事变后，两个派别都在争夺军事影响力，但皇道派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荒木贞夫因病辞职。他的继任者是同情东政派的林千十郎将军。因此，二二六事变后，皇道派实际上已解散，而政制派也失去了其大部分宗旨。

义军是一群支持激进皇道派的年轻日本帝国军官。这些年轻军官认为，日本的问题源于其背离了“国体”，“国体”大致指的是天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特权阶层”剥削人民，导致农村地区普遍贫困，欺骗天皇，从而削弱天皇的权力，削弱日

本。在他们看来，解决办法是仿照 70 年前的明治维新进行“昭和维新”。他们的信仰深受当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北一辉的政治哲学。1936 年 2 月 26 日，他们试图发动军事政变，旨在清除政府和军队领导层中的派系对手和意识形态对手。

二二六事变（1936 年 2 月 26–28 日）是日本帝国的一次政变，由支持皇道派的义军年轻军官策划。他们的目标是实现“昭和维新”，清除政治对手（尤其是东政派），恢复昭和天皇（裕仁）的直接统治。设想中的“昭和维新”旨在模仿明治维新，由一小群合格人士支持强大的天皇。虽然他们成功暗杀了几名主要官员并占领了东京的政府中心，但他们未能暗杀首相冈田启介，未能控制皇宫，也未能获得天皇的支持。虽然他们在军队中的支持者试图利用他们的行动，但内部分裂和对政变的普遍愤怒阻止了任何政府变革。在军队的强力打击下，叛军最终于 2 月 29 日投降。这导致起义被镇压，科多哈派系的影响力下降，而军方对政府的影响力增强。

北一辉的遗产与处决

北对日本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他的思想工作启发了激进的改革派，他们支持建立严格的军事独裁和威权统治。这些思想促使日本在动荡的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初转向军国主义，当时人们对无效的大正民主和地缘政治挑战普遍不满，例如英日条约的结束使日本陷入孤立。北对大东亚共荣圈的愿景最初是作为一种理想主义和合作的努力，后来被修改以符合帝国政府的议程。近卫等人试图通过工人改革、在国际联盟提出种族平等建议以及努力为参与 2 月 26 日事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争取赦免来实施北的理想，这些人曾试图暗杀他的导师西园寺。然而，近卫军面临日本政府内部各派系的反对，以及美国报复心强、中国心怀鬼胎等外部压力，最终导致主张外交的近卫军将权力移交给更为激进的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对美宣战

1937 年“二二六大清洗”期间，日本政府将北一辉也逮捕并处决，认为他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尽管北一辉也的部分思想被执政当局部分采纳，但他仍被视为危险的思想家，有能力煽动骚乱，挑战精英阶层的根深蒂固的权力。北一辉也的处决并没有终结他的影响力；他的著作继续引起共鸣，成为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家的奠基性著作，他们设想日本的救世主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独裁的社会主义国家。

近卫文麻吕王子和东条英机

近卫和东条的愿景与北的重点一致，即加强日本的工业能力，特别是在日兴工厂的领导下，以促进国防供应、基本产业和出口贸易。政府计划出台立法来支持这一扩张，并确保经济措施与军事和金融需求同步。近卫发起的新秩序运动旨在让日本摆脱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这种自由资本主义受到大萧条时期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经济成功的启发。这一转变旨在挑战西方在亚洲的帝国主义，需要长期的承诺和民族团结来克服未来的挑战。

所期望的政策基于以下原则：

消灭私有财产，在军事支持下实行经济国有化，认可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苏联的一党制社会主义政策。

对抗主宰亚洲的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列强。

北条的意识形态影响出乎意料地深远，尤其是在朝鲜的主体思想中。主体思想反映了北条的信仰，包括最高领袖/天皇概念、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国际合作、反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和先军主义。尽管北条的言论带有反日色彩，但这些原则让北条的思想在朝鲜得以延续。在韩国，一些自由左翼媒体将朴正熙政权描绘成反美、泛亚法西斯和“镇日派”，他在日本接受教育并参与了二六事件，与北条有联系。民族社会主义政治家、日本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深受北条的影响，提倡与毛泽东和苏加诺结盟，与北条的共荣理想产生共鸣。

浅沼和真央

关于浅沼、北和近卫之间的联系。近卫在大学期间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尤其是将奥斯卡·王尔德的《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翻译成日语。他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孙中山受到了北一辉思想的影响。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近卫的几位前内阁成员，如风见彰，加入了日本社会党。在浅沼的领导下，日本社会党经常被误认为是日本共产党，该党由德田圭一创立，走的路线类似于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浅沼深受北的影响，支持日本的战时行动，并被认为是支持阶级合作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他并不是共产主义同情者；相反，他批评共产党人。因此，他经常被贬低为“法西斯主义者”，并被共产党视为右翼分子。

“重组后的政党的干事长是右翼分子浅沼稻次郎。”

— Cecil H. Uyehara，社会民主运动

他的同僚奉行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社会主义，旨在对抗美国自由主义。他在中苏分裂期间与毛泽东的战略结盟旨在建立反苏反美联盟。共同创立并最初领导日本建国会的赤尾彬在 20 世纪 20 年代成为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民族主义明显是亲美、亲资本主义，反对太平洋战争。后来，他在 1951 年成立了大日本爱国党，并继续担任第一任主席，经常为美国利益行事。鉴于此，可以想象，刺杀浅沼的山口音也受到了赤尾反社会主义、亲美情绪的影响或指挥，暗示山口可能是被外部势力操纵的资产。山口是一位亲英美的日本民族主义者，也是赤尾的门生，他刺杀了浅沼，此举无疑镇压了真正的日本主权运动，并鼓舞了日本民族主义各派系中的新保守主义分子。

宣布暗杀日本民族社会主义者浅沼

在现代日本，民族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被压制并与北的思想脱节，深受英美观点的影响——北强烈反对这种情况。正如林田和博在《日本人需要理解第四种政治理论》一书中所讨论的那样，亚历山大·杜金的“第四种政治理论”与北的一些思想在当前地缘政治联盟的框架内相一致。林田和博强调了记住历史思想和人物以理解杜金等当代理论的重要性。林田和博强调了石原贯二，他是一位受北影响的前日本帝国陆军士兵和日莲佛教徒，他因其在战间期的战略理论以及为清朝皇帝收复满洲的计划和执行而闻名，通过集体农业实践和工业化，满洲成为日本雄心勃勃的经济多元文化强国，使生活水平在钢铁产量上超过日本。煤炭开采、石油钻探和农业是重要的产业，港口和城市实现了现代化，贸易和商业蓬勃发展，与中华民国相比，工业化程度大大提高。这使得满洲成为全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导致苏联将其用作作战基地，最终让

毛泽东赢得了战争。尽管石原的理论在二战后失去了影响力，但作者认为它们仍然提供了宝贵的见解。石原的想法与北的想法一样，与杜金的第四政治理论非常吻合。

当代中国政府与北保持着联系，因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深受朴正熙和日本经济模式的影响，而日本经济模式曾启发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中国官员王沪宁也将北大的许多想法融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倡议引导国家建立“中国治下的和平”，这让人想起了黑龙会的努力。王沪宁对多党政治表示蔑视，并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转而提倡社团主义制度。

三岛由纪夫也深受北的影响，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应该以二月二十六日事件为终点，旨在恢复日本主权，摆脱西方影响，否则将面临具有艺术意义的死亡。为此，他成立了盾之会。三岛珍视日本传统文化，反对西方唯物主义、全球主义和共产主义，担心它们会侵蚀日本独特的文化特征，让日本人民“无根”。1970 年 11 月 25 日，三岛和四名民兵进入东京市中心的一个军事基地，劫持了指挥官，并试图召集日本自卫队推翻日本 1947 年宪法，但没有成功。演讲结束后，他高呼“天皇万岁!”，然后切腹自杀。

北仍然是日本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他的激进思想旨在通过融合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来解决经济差距和西方帝国主义等问题，从而创造一个更强大、更公平的日本。他的思想鼓舞了许多人，并对苏联的既有势力构成了威胁。**西方殖民势力和日本本身发起了一场虚假宣传运动，以压制他的思想并歪曲他的形象。**事实上，北试图摧毁资本主义，并将自己视为一个极权主义佛教徒，利用日本作为全球启蒙的载体，呼应了费希特对德国的愿景。他对全球佛教救赎的追求使他成为日本法西斯/第三阵营的重要人物，与风见彰和中野清吾等人并列。

民族社会主义

魏玛体制是旨在解除德国武装的失败的代理制度在国内政治的延伸

民族社会主义是觉醒的德国人民的名字，他们现在正逐渐认清自己的现实处境和自我意识：一场由民族和种族基本力量推动的强大自由运动。这个名字包含了德国革命的原则和整个民族共同体的目标：德国人民将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一个自我意识的权力主体和一个基于社会正义原则的统一的有机社会结构。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受到德国所有部落、教派、阶级和社会阶层的滋养，其内部方法、可能性和有机张力极其丰富。它首先是一个自然运动，而不是一个理性的纲领，它与统一的无产阶级运动不同，不仅因为它吸收了所有阶级，而且从根本上说，它代表了一种来自人民本能深处的运动，它不会像塔木德马克思主义那样过早地被束缚在知识分子的教义和教条中，而塔木德马克思主义很早就陷入了僵化和毫无结果的僵化。

它必须保持一种没有教条主义倾向的运动，直到推动它的革命原则引领它走向胜利、走向自由、走向新的德国国家和民族秩序。在此之前，它将不得不经历其发展的多个阶段，适应新的条件和要求——这种灵活性和敏捷性将是它的命运。民族社会主义同时包括政党、一般人民运动、国家青年运动、国防联盟、青年组织、追随者、政治自由运动、成年人和种族意识、社会社会和经济秩序、国家文化维护以及它们各自的协

会和组织。因此，它承载着未来民族全能国家的所有要素和种子，尽管往往只是初步的轮廓，但它本身就有可能实现德国的总体任务。

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因素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原则。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党是唯一一个具有使命感和能力来克服政党制度的政党——如果可能的话，通过议会的方式。因此，作为一个政党，它必须具有超越党派之争并在自身内部体现民族团结的可能性。它不能也不应该吸收所有个人成员，但它必须发展到证明其体现整体的主张有效的地步，代表整体，以便从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观和方法中发展新的国家和民族秩序，并将自己融入整体。只有这样，意志的统一才能从最深刻的对抗中成为政治权力和有机整体，从国家和纪律形式的解体中成为政治权力和有机整体。

然而，一个政党一旦超越了自身，就不再是一个政党了。人民和国家将要求政党进行彻底的内部净化和解决。

一个政党，即一个部分，成为整体的可能性在于民族社会主义，因为它是革命原则的先锋，渗透到全体人民，影响其所有成员和结构，引导他们走向有机整体的目标。因此，该党已成为一场普遍的人民运动，特别是青年运动。代表革命原则的青年是德国的未来，是新的国家和民族秩序。民族主义青年及其价值观和联盟已经具有新的国家和民族秩序的雏形，是适当的民族全面教育的种子。

青年联盟是政治和军事联盟的教育先驱，政治态度、军事精神和种族价值体系在青年联盟中得到巩固，并用于形成新的国家权力和秩序。通过青年联盟，未来国家将培养一个领导阶层，该阶层通过加强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威。国防联盟及其相关或关联的青年联盟以国家政治教育为主要目的。民族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发现，国防联盟和青年联盟不仅是未来国家结构的支柱和核心，也是第五个国家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形成原则——权力结构的核心和政治精英阶层的先行者。最重要的是，在这里，种族和纪律必须成为现实，形式和方向坚定。

现行制度建立在无形的群众和政党之上。只有政党才能战胜政党，只有群众才能战胜群众。这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任务和道路。作为群众运动，它以群众提升的艺术为前提：如果要塑造群众，群众必须变得流动起来。希特勒熟练运用的群众提升艺术不仅完善了党内鼓动和党领导的技术，而且为群众领导找到了全新的要素和道路。

希特勒成功地挖掘了国民生活中意想不到的脉络，并建立了一个源泉。魏玛体制及其代表们不太可能对此提出任何根本性的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则正在得到比他们自己想象的更有效、更有力的应用，直到它战胜了其他政党，超越了多党制和政党制度的原则。宪法不仅允许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合法途径进行形式变革，而且还为内部可能性留有余地，即一个政党将消灭其他政党，从而建立一个不是多党制的国家，而是最后一个政党的国家。其外在后果代表着一党制的原则，它源于转型原则：政党产生群众，群众产生人民，协会产生国家。

民族社会主义群众运动越全面，它必须纳入的要素就越多，它必须满足的要求就越多，它内部产生的两极分化和紧张局势就越多。这就造成了分裂的危险，以及新政党从内部出现的危险。与之相反的是，它有与其他政党根本不同的原则：同志原则、对领导者的约束、权威的结构和领导形式。必须以统一的形式克服内部的紧张局势。这样，政党和群众运动将在内部得到重塑和巩固：在元首的权威及其价值体系的指导下，

出现了一种纽带、形式、牢固的秩序、纪律、共同的方向和立场——新教育的基础和原则。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民族社会主义大众教育和领导学说中的另一个要素，它不是那么容易形成和概念化的。从外部来看，这一学说和整个运动主要因其“非精神性”而受到批评，而实际上，人们从内部对理性文化和知识主义的政治约束性质的拒绝和厌恶是合理的，知识主义空洞的法律主义在媒体、自由主义讨论等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自由民主及其议会制的生命要素。犹太圈子巧妙地处理了这一点，但越来越多地表明它完全是徒劳的，没有任何内在的力量：一种消极的、外在强加的生命力。

当然，革命人民运动必须被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公民以及相关的文坛大师和某种“教育”人士称为邪恶，因为它与他们的思维方式背道而驰。例如，有人认为，民族社会主义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因为它代表着对立面，从而阻碍了他们的创作和运动方法的联系。

灵魂的地下世界并不比宇宙更邪恶；相反，它是所有创造力和生殖力的避难所和子宫，是所有无形但有形的力量的避难所和子宫，是所有赋予生命和带来死亡的命运运动的避难所和子宫，正如巴霍芬通过他对神话的解释所揭示的，或者至少是让理性主义时代可以理解的。民族社会主义利用群众运动和群众唤醒的方法，从这个所有形成性、创造历史的力量的源泉中汲取力量，让它们流入新形成世界的塑造冲动。

一切革命的力量都源于此，只要民族内心还蕴藏着这种复兴的地下泉源，历史就会找到其永恒的源泉。出于革命的本能，民族社会主义的鼓动主要不是通过理智的证明或论据，而是通过节奏的原始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一切理性和非理性的边界上，存在于一切类似于节奏并散发出其震撼人心的力量的事物中。颂歌是其中的一部分，掌握、煽动和领导群众集会的整个艺术也是如此。出于同样的本能，民族社会主义更多地利用符号及其生动的表现力而不是理性概念：民族社会主义标志、问候方式、第三帝国，都通过象征主义拥有直接的、潜移默化的运动力量。你可以称其为浪漫的、原始的、混乱的——也许有人是对的。但这些都不能证明或反驳任何事情；力量在于运动本身，在于非理性和基本性，正是这种力量造就了历史的塑造力和决定命运的运动，没有这种力量，一个民族就会灭亡，历史就会停止，然而，正是这种力量，人民和历史才会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个过程被称为革命。

由于这种起源，民族社会主义是一种基本的方向性运动，通过种族重生寻求进入新现实的道路。它不像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那样源于智力。因此，民族社会主义也不是政党和纲领，而是一种流动的、流动的运动，它有一天会以新的形式、秩序和国家而告终，但它会一直保持流动，直到它渗透到我们所有的国家生活空间。人民和人性的新形式的形成将是实现，但它也将标志着运动的结束。如果这一切在整体形成之前发生，革命将不会在达到目的之前完成，而只会以单纯的反应而告终。到那时，真正的德国自由和形式将不会获得，旧西方秩序的实现将再次胜利：德国历史将终结。

在民族社会主义的群众唤醒和群众运动艺术中，可以找到未来国家和政治教育最强大的方法、灵感和基本力量。教育可以引导人们实现目标，就像它可以首先使人变得可塑和可塑造一样。可塑性并不是固定的、天生的、不可改变的特质，正如教育学通常所假设的那样，它本身是可以改变的，能够随着人的开阔、提升、通过唤醒在内部

启动而增加，从而提高接受能力、敏感性和可塑性。在这种状态下，基本的观点、见解、方向和态度会更加牢固和持久地扎根，变得更简单、更有力，并在流经灵魂松弛渠道的影响、意见、言语和行动之流中更生动地表达自己。同时，在这种狂喜高度兴奋的状态下，感官变得更加敏锐，想象力更加丰富，灵魂变得更加流畅，聚集人群的意志融合为精神统一、情感一致和集体精神。在这种精神唤醒中，群众变得可塑性和可塑造性。

新的创造力在这里涌现，新的内容从深处涌现。许多出于好奇心而去参加希特勒集会的人回到家乡后就皈依了人民，他们被自然力量所吸引，这种力量对他们的影响比学校所能教给他们的更为持久。“唤醒”的力量并不像知识分子所认为的那样是非理性的，而是混乱的、未成形的，但高度可塑性和可引导的自然力量。

如果教育家们真正理解了裴斯泰洛齐——在关于他的大量文献中——他的存在和工作的核心，而不是总是把他重新解释为民族和知识分子，他们就会认识到他的教育艺术的力量，他的成功秘诀，这一点往往从他的来访者的描述中比从他自己笨拙的理论和书籍中更清楚地显现出来，他与这些基本的群众唤醒和群众运动力量的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裴斯泰洛齐内心是一个狂喜、原始和非智力的人——一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一模一样的人，生活在启蒙运动的世纪。裴斯泰洛齐发明了一种方法，用原始的方式将他和他的一群孩子提升到高度激动、高度接受的情绪状态，主要是通过类似于吟唱的方法，尽管他完全不懂音乐，也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使用乐器。相反，他使用了理性的、基本的语言、节奏和空间形式。通过这些方式，他不仅深深地巩固和强化了基本的印象，而且通过不断的节奏重复，在期望的方向上创造了一种接受性和敏感性，敏锐的感官，从而机械地增加了学生的积极性、自力更生和独立性，尤其是将孩子们融入到一个情感统一的社区中。

因此，这里存在着同样强大的唤醒手段，并结合了与群众领导艺术相同的导向和塑造。

这种方法在裴斯泰洛齐时代的意义和连贯性与在民族社会主义群众运动中完全不同：但方法的要素和力量是相同的。民族社会主义试图通过其群众动员方法来唤醒种族意识，将其引向伟大的国家目标和政治任务，在人民的心灵中灌输相应的态度。民族社会主义学校改革者必须在学校的框架和条件下应用与更广泛的运动中的群众领导和人性塑造相同的方法，并为学校建立新的内容和方法，他们将发现裴斯泰洛齐不仅比主观主义、封闭的学校改革时期提供了更好的理解，而且还会在他身上找到开展工作的手段。他们将不再以卢梭的眼光看待裴斯泰洛齐。从最深层次来说，这些方法与灵魂塑造和灵魂训练的技术相关，正如印度在其瑜伽体系中所修炼的，佛教寺院也已经发展起来，尽管基础、意义和精神有所不同。

看到现代日本如何采用并进一步发展佛教的方法，以增强其国家政治权力和军事纪律，这很有启发意义。这些相同的元素也应用于体育训练和实践的方法中，并在Wehrverbände（国防联盟）和青年联盟的纪律形式、身体护理和锻炼、武器训练、共同意志协调和坚定性格形成的训练中被证明是有效的。因此，群众同时得到了指导和准备，混乱和分散的群众从内到外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团体、一个紧密联系的社区、一

个国防联盟、一个青年联盟、一个专业协会：群众成为一个有序的人民，一个有机的整体。

所有旨在全面掌握、调整和塑造一个人的教育都代表着三重任务，由态度、能力和知识三个概念定义。一个人的工作中心是他们的态度、他们形成的性格、性情、坚定可靠的意志。它对应于其自身的纪律和实践体系，这是整个教育的基础。然而，在西方文化的近代时期，这已被推到幕后或几乎被遗忘，因为西方文化主要强调理性和技术。

当然，通过技术能力的培养和智力刺激（主要是理性的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态度和性格，因为这两者可以相互影响和支持。然而，中心仍然很薄弱。在历史和文化新时代的开始，革命原则导致需要立即、直接地训练和塑造人类，使其符合其种族秩序、目标和任务。这将为能力的训练和知识和世界观的获取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支撑。精神态度、性格、性格和方向的训练系统与修道院对纪律的必要性一样，与军营、教会和国家、士兵和工匠一样。在西方，耶稣会士根据修道院生活和理想形成了他们的训练体系，发展了严格的纪律体系。

通过这样的锻炼体系，不仅唤醒和激发了人们为国家完成任务的能力和可能性，而且还导致了坚定的团结、有目的的态度和形成性的塑造。一群人中典型而统一的态度和方向为他们统一成相应的秩序和组织奠定了基础：内部社区和团结产生了，分散的目标产生了统一，个人产生了有机的团结和力量。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将其领导者的本能付诸实践，利用群众唤醒和运动的基本力量和方法来建立一个普遍的纪律体系，一个锻炼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塑造了国家。

人民和民族个体必须唤醒种族价值观，充分发展种族特质和种族意识，这不仅塑造了人民个体，也提升了民族意识，从而巩固了族群纽带：从群众中产生人民，从人民中产生具有种族意识、统一力量、统一政治态度和意志方向的民族。

这种方法只有在满足人们天生倾向的必要条件时才会奏效。旨在将固有的种族特征发展为政治态度和民族性格的纪律体系只有在存在纯洁和力量的固有种族价值观的情况下才会达到最高成就。在其他种族的个体中，它会不那么有效或完全无果而终。其影响的各个阶段创造了人类的等级制度。这表明了选择领导阶层、国家阶层的方式，从而可以根据成就、态度和种族优点对人民进行分层：从运动的群众中形成了人民、民族和国家。

在军队和国防协会、政治战斗联盟及其附属青年联盟、学生组织、专业协会、各级各类学校中，既适用一般的纪律和选拔方法，又适应各自的特殊目标。因此，在成员、职能、机构和组织的多样性中建立了统一，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民族社会主义：这个名称涵盖了运动的内容、方向和意义。通过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获得了新的内容，而社会主义通过民族主义获得了实现的方向和可能性。民族社会主义表达了革命原则，从而将注意力引向命运、历史和必然性为我们设定的总体任务——根据种族、民族政治、国家建设、社会、文化和教育方面：所有这些都包含在运动的象征性名称中。

社会主义意味着将个人连同他们的态度、能力和行动，尤其是他们的良知融入社会：个人成为更大生命整体的自觉成员，这在我们德国人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人民是

自然的历史生活空间，每个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一切。一个人的成员身份、归属地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任务、在整体中的地位，从而也决定了他实现个人成熟和成就的方式：态度、能力和知识通常是这种成员身份所固有的。

所有这些都可以由个人根据其个人法则来实现、深化或体现，但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方向最终是由整体决定的。人民也代表整个生活空间，其成员的所有必要功能和任务都是在其中创造和实现的。语言、宗教、法律、经济、政治、艺术、文化、教育和学校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的滋养地、内容和意义。如果这种整体意识渗透到个人成员中，塑造他们的态度、性格和世界观，同时指导生活秩序，那么有机社会主义就实现了。

民族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让德国人民重新获得其成长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生活空间，以便所有成员都能获得必要的空间、土地和生存与发展手段。目前，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适应现有空间，以产生新的国家力量。无论如何，在成员中都要求建立基于社会正义和有机互惠原则的社会、经济和法律秩序。人民的每个个体和法人成员对于人民的健康、成长、力量和权力都同样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必须得到保障他们的空间和生存权。在这个空间里，每个人并没有政治平等，而是根据每个人的必要成就而享有社会权利。

当然，国家不是人民的福利机构，而是人民集体意志的表达和机构，是政治权力的塑造者和领导者。一个政治上强大的民族只能是一个社会上健康的民族：如果要确保整体的福祉、力量和权力，那么成员必须有自身发展的机会，以便在整体中完成任务，从而实现自己的生存。

自凡尔赛条约以来，德国缺乏自由，主要表现为德国人民的生活空间被封闭和限制：一个没有空间的民族。这种痛苦，加上内部的解体，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崩溃及其困境。这使得严格重塑现有生活空间、在紧急社会主义意义上对生活可能性进行社会分配变得更加必要。

这并不是要为德国社会主义制定一个纲领。但是，如果要至少从广义上概述相应的教育任务，就必须从根本上审视社会生活方式。

如果要求个人服务于整体并从中获得个人成就，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必须为整体牺牲自己，那么整体也必须为其所有成员提供服务，并赋予每个人权利和生命份额。只有在健康的成员中，整体的力量才有其基础。国家作为人民意志的机构，作为人民统一权力的表达，是社会的主人，也是有机正义意义上的经济组织者。经济本身必须重塑以服务于整体，以便所有成员都能找到自己的生计，也有发展其生命潜力的空间。仅仅为那些在混乱的经济中无法再获得工作和生计的人提供服务，只会让人民的身体不断受到伤害。只有当一个社会公正、有序的国民经济为所有愿意劳动的人提供空间时，才能坚持这一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在紧急情况下，国家别无选择，只能确保受约束的经济体系中的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和生计。

国家是经济的调节者和监督者，但不是经济的执行机构：应拒绝将财产和经济国有化。国家只应直接控制那些自然具有调节功能而非生产功能的经济部门：例如货币和信贷系统、保险系统等。国家掌握的其他调节因素包括税收和关税、进出口的控制和计划调节以及国内外的货币和信贷交易。由于全球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崩溃，国民经济

必须自给自足：它主要必须满足内部需求，国家调节这些需求并根据计划组织和分配经济成果。生产任务分配给生产者，但这是通过自治协会完成的。

经济的执行机构主要是行业和经济部门的法人团体，这些自我管理机构在国家监督下合作管理各自领域的任务。这意味着整个经济社会受到监管，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受监管：没有一个工人或专业人士成为国家官员，没有一个经济生产成为国家管理的职能，而是每个人都是其专业和经济组织的成员，因此是国家法人团体的成员。此外，他们扎根于自己的财产和土地。

然而，经济活动成为一种公共服务，具有公共义务，并由相应的权利来平衡：不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致富自己的权利，也不是通过经济掠夺规则来确保国家财富份额的权利，而是根据个人贡献获得公平份额的财产、土地、收入和生活费的权利。公共专业协会监督其每个成员的职责和义务，保护他们的权利；协会负责完成分配给它的经济任务，也负责确保在经济生活空间的社会设计中，在工作分配和获利机会方面实现社会公正。协会代表与成员有关的整体，也代表其成员在整体中的权利。

“国民经济”只有在经济与国家生存空间紧密结合并适应其目的时才存在；只有在经济成为国家实力和国民健康的源泉时才存在。每一个公共职业和经济协会——国家社会中将不再有任何私人经济协会——都是一种职业人，是国家人类类型的衍生物：它以自己的态度、性格、荣誉、生活方式、相应的典型能力和特定的教育与协会及其内容相对应，其世界观也适合其成员——并不是说他们在协会中代表着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而是作为他们成员的一部分，为整个国家服务。

因此，每个协会也是其所代表的人类的纪律体系：它有自己的态度，有自己的行为纪律、技能训练和相应世界观教育的方法。自治包括自己的司法系统、仲裁和荣誉法庭，以及自己的纪律和教育系统。在所有这些方面，协会只是国家整体的一个特殊目的代表。人们可以争论中世纪行会的功能，它们的最终目的和本质意义是否真的是狭义的经济，或者它们是否更像是坚固的国家人类健全的职业和经济纪律的有机结合。

民族国家的团体秩序不再将单个协会组织成城邦，而是将它们与广泛的民族共同体联系起来：正如其经济功能与这一伟大的生命整体相一致一样，其纪律形式、专业培训和教育也与整体相一致，其特殊价值体系、方法、精神内容和方向也是整体的职业延伸，具有其价值观和目标。协会在整体中找到其意义和成就。

每个协会都具有整体的形式和方法，并根据自己的规律努力满足整体的需求和要求。因此，它发展自己的纪律体系、专业和市场需求，将其要求带入公立职业学校系统，监督其成员的态度、性格和荣誉，并通过教育将其青年融入其队伍。如今，隶属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专业协会已经根据其职业专业将其内容和方向与整个运动保持一致，并在整体和协会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

就作为革命原则的载体的民族社会主义主义所必须完成的总体任务的政治和社会方面而言，创造新文化排在第三。这项任务当然是广泛的，它的完成可能还很遥远，也许只有在运动接近胜利时才能达到真正的阶段。到那时，不仅可以表达新的政治和社会形式，而且可以表达驱动价值、精神财富的实质，并将其提升为共同的世界观。通过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领域的新创造来建立世界观，这符合民族社会主义主义运动

的内容和目标，这将在实现我们时代赋予的总体任务——革命原则的胜利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种趋势已经开始，但必须谨慎，不要高估它们：仅有正确的态度和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政治领导在完成这项重大任务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狭义的文化功能目前还没有占据行动的中心，因此在最初可能在成就上落后。

新文化的诞生并非始于政治上的革命性突破和动荡。这是整理和收集的准备阶段：从文化遗产中，必须选择符合主流种族价值观、符合国家和政治任务的东西。这样，就为新的世界观和新教育体系的正确基础奠定了基础。此外，必须与外来和种族外来产品的洪流作斗争，自崩溃以来，这些产品威胁着要淹没和扼杀我们。所有这些商品，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

一个正在解体的世界中弥漫着压抑和令人窒息的精神氛围。从城市文化的大型百货商店散发出来的气息散发着腐朽和腐败的恶臭。外来种族的影响已经控制了报纸、剧院、出版社、电影，而且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大学也受到了控制，其目的是压制德国人、散布混乱、转移人们对真相的注意力，从而用相应的“文化”补充了依赖的政治体系。一种聪明的文学作品，主要是犹太文学，在思想方面完成了过渡帝国的政治任务。在民族社会主义中种族和民族本能的觉醒之前，即使是所谓的“民族”媒体要么完全屈服于这些解体力量，要么尽管意图良好，却在面对这种情况时完全无能为力。结果，种族的少数创造力和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中正在出现的民族意识几乎没有得到共鸣或力量。

然而，德国人民的新时代即将到来：汉斯·格林的《无空间的民族》展现了德国人性、德国种族、德国政治、德国价值观和世界观。这本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标志着德国民间文化即将取得突破。然而，格林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只带领我们走向了德国革命的门槛。然而，在这里，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因为它们都有助于创造形象、自我认知、民族和种族意识，以及为德国民族任务的合作。

需要所有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以现实的态度认识这个时代的实质、价值、动力、紧迫性和紧迫的青春，并以洞察力提升这些现实，从而创造出一种世界观和教育资产，作为未来德国教育和学校的基础和生活内容。在这种新的世界观中，德国革命将得以完成。

法西斯主义在英国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

法西斯主义已经来到了英国。当它到达现代不可避免的危机时，它就会依次来到每个伟大的国家。这种危机不可避免，因为一个文明的纪元已经结束。我们的任务是催生新的文明，并组织其体系。在英国，法西斯主义是那些自战争以来意识到旧制度已经死亡、必须建立新制度的人的信仰。我们尝试了所有已成立的政党，希望他们制定行动政策，以应对新时代的新情况。但旧政党或旧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事实，也没有制定应对政策。他们一直在误导和欺骗公众。然而，让既有的制度和旧政党有机会适应新的形势是正确的。在开始组建新运动的激烈进程之前，我们法西斯主义者不遗余力地争取让每个旧政党都制定行动政策，对此我们毫不后悔。这是我们向现有制度

发起挑战的最后手段。如果我们未能发出这一挑战，那么我们就没有尽到对国家的责任。

自战争以来，所有党派都背叛了我们，也背叛了国家。我们现在要体现和制定自战争以来我们为之奋斗的原则：有组织法西斯主义的现代信条。这是战后十年间诞生的新信仰。它既不是意大利的产物，也不是任何外国的产物。它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所有其他政治信仰一样，是所有国家共有的。然而，它比过去的那些信仰发展得更快，在诞生后的几年内就在英国形成了有组织的形态。在旧文明崩溃瓦解之前，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组织，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建立新的文明。

法西斯主义是下一阶段文明的体系。已经结束的文明时代是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时代。这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时代。在工业化的早期，它对大众造成了许多虐待和痛苦。在二十世纪，由于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它已经不再起作用，原因将在下一节中讨论。十九世纪诞生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既得利益集团，这些组织协助既得利益集团以国家利益为代价随心所欲。为了对抗这些党派，十九世纪还产生了社会主义，这是对非人道状况的盲目反抗，表达了另一个阶级以国家利益为代价随心所欲的决心。

十九世纪的利益和党派之争使国家濒临崩溃。作为二十世纪信条的法西斯主义，将党派和阶级的利益置于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下。法西斯主义的使命是在英国建立二十世纪的国家。

崩溃的原因

这场危机是由现代的新事实引起的。

（1）科学和工业技术生产商品的能力最近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工业的合理化每天都在提高商品的生产能力。但我们没有使这些商品得以消费的国家合理化。因此，我们能够以比以前更少的劳动力生产相同数量的商品，而失业率却增加了，因为对商品的需求并没有以与商品生产能力相同的速度增长。合理化所淘汰的劳动力并没有被工业重新吸收。生产远远超过需求，导致全球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失业人数越多，人们的购买力就越低，工业生产的产品市场也就越小。恶性循环已经形成：合理化、失业、购买力下降、失业增加。事实证明，在过去十年里，我们赖以生存的旧制度已经无力阻止这个国家和世界被科学带来的过剩所摧毁。

（2）除了生产超过有效需求的世界性问题，我们英国还有自己特有的问题。我们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依赖出口贸易。我们仍然有大约 30%的制成品销往世界市场。这些市场正在迅速关闭。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每个国家都在努力生产尽可能多的本国消费产品。为此，他们正在建立新的产业，并针对我们的商品设置人为壁垒。我们不仅要克服旧的关税壁垒，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其他国家还发明了新的手段，例如配额、禁运、外汇交易否决权等，这使得我们的商品无法进入他们的市场。我们的商品不再只是被阻止和征税，而是被明确和故意地排除在外。相信这些壁垒会被消除是徒劳的。在这些国家，我们投入了人力和资金，建立了新的产业，而相关政府却保证将继续设置这些壁垒来对付我们。仅仅因为少数老政治家在国际会议上对他们发表了一些有说服力的演讲，就以为外国会为了帮我们而牺牲本国人民，这是愚蠢的。如果我们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必须面对英国贸易的旧基础已经不复存

在的事实，必须找到新的基础。

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案：

职团国家

我们认为，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工业和国家组织。我们的政策是建立职团国家。**顾名思义，这意味着国家像人体一样组织起来。**在法西斯政府的领导和驱动下，这个机构中的每个成员都按照整体目标和谐行动。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将由政府进行或干预，就像社会主义组织那样。但这确实意味着，政府将规定利益运作的界限，而这些界限将符合整个国家的福祉。为了国家整体利益，所有次要利益都应服从，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无论是雇主联合会、工会、银行业还是专业利益。所有这些利益都融入职团治理的永久运作机制中。在职团结构中，工会和雇主联合会等利益集团不再是敌对军的一般人员，而是国家职团的联合董事。**阶级斗争将让位于国家合作。所有奉行分裂和反国家政策的人都将受到有组织国家的强力反对。只要活动能够同时造福国家和个人，就能获得利润。但利润的获取不能以国家和工人阶级为代价。职团制度将确保国家和工人（国家的一部分）能够充分分享工业的利益和回报。**

建设国内市场

职团组织的首要职能是建设国内市场。如果我们的出口市场确实注定会减少而不是增加，那么国内市场就是唯一的出路；然而，为了夺回国外市场，国内市场的工资和薪水不断减少，以降低成本。事实上，我们为了占领虚幻的国外市场而破坏了国内市场，而无论我们的生产成本如何，这些市场现在都对我们关闭了。扭转这种趋势并建立国内市场，这应该是职团组织的责任。

为此，我们必须建立职团或自治工业区。**职团将代表雇主、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在职团政府的指导下运营。**

随着科学提高生产商品的能力，他们将负责提高整个工业领域的工资、薪水和生活水平。

目前，在不受监管的竞争体系中，如果有一些支付较低工资的竞争对手，任何雇主都无法提高工资，从而使其破产。因此，工资被迫持续下降，这种无序竞争导致市场萎缩，行业生产的市场也随之萎缩。我们必须用覆盖整个工业领域的职团制度的有序秩序取代目前普遍存在的无序工业混乱体系。我们必须通过提高人们的购买力来弥补市场所缺乏的。这只能通过职团制度的组织来保证。

出口贸易

在我们建立国内市场的同时，职团制度将大力协助我们的出口贸易。我们不应在冗长的国际会议上虔诚地劝说现任政治家，而应凭借真正的实力确保我们的产品进入国外市场。职团制度将自然而然地巩固我们在国外的采购和销售组织。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和原材料买家。在职团制度下，我们将组织起来，利用我们作为买家的实力来销售产品。我们将把我们的贸易口号定为**“英国从那些从英国购买的国家购买商品”。**我们向其他地方批量采购的能力将迫使食品和原材料的卖家降低对我们制成品的壁垒。

帝国

职团组织将为帝国的发展提供最大的服务，而帝国已经是我们最好的市场。自治领和殖民地是天然的食物和原材料产地，而母国则高度组织化，生产制成品。这里存在着

一种天然的贸易平衡，应该加以利用。自治领的农民合作社体系等已经高度组织化，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还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职团体系将建立这样的组织。随着我们巩固外部采购和销售安排，我们将有可能与自治领的农民组织直接建立关系。通过消除不必要的中间商，我们将大大降低本国人民的食品价格。同时，我们将为自治领的农产品提供更大的市场，从而有能力以比目前更优惠的条件为英国制造的商品争取市场。

英国的职团组织将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一个职团帝国，这将是世界迄今所见过的最强大的物质和道德力量。

法西斯主义与世界和平

人们有时会说，法西斯主义强大的经济组织将导致战争。事实恰恰相反。如今，私人利益集团为争夺原材料和市场而进行的混乱斗争往往导致政府卷入战争。事实上，这种斗争是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职团制度将取代这种斗争，建立一套受国家监督和监管的海外采购和出售体系。**当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时，欧洲最文明的国家被法西斯主义统治，我们将朝着和平迈出重要的一步。我们将取代掠夺性利益的私人斗争，在有组织和有能力的政府之间就目前战争的主要原因进行理性讨论和解决。混乱而非组织会导致战争。混乱比思考和方法更危险。法西斯组织是二十世纪普遍法西斯主义下各国之间实现世界和平的方法。

老牌政党-国民政府和保守党

对于当今的混乱局面，老牌政党给出了什么答案？保守党主张保护，他们也尝试过。结果，失业率上升，国家形势恶化。原因在于，组织与保护同样必不可少。保护混乱毫无用处。保守主义的保护壁垒背后也存在着同样的混乱，而此前它并没有保护壁垒。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免受低工资外国雇主的竞争；**但完全无法免受低工资英国雇主的竞争。**减薪的斗争仍在继续；工资、薪水和标准不断下降，国内市场持续萎缩，国外市场对我们关闭。保守主义在最后瘫痪时，无力地坚持着三十年前的各项政策。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提出了保护主义的构想，在他去世后，他们从未进行过任何思考。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说，他们的补救措施是社会主义。他们承认，通过进化实现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工党的“当代社会主义”据其领导人估计需要 25 年才能实现。与此同时，国家崩溃，所有人都面临着制度崩溃带来的毁灭性威胁。因此，社会主义者要么注定徒劳无功，要么采用革命手段来取代他们长期追求的进化理想。他们害怕革命，**因此在反对派时做出大胆承诺，上台后又逃避责任。**他们知道，在现有体制内实施社会主义措施将加速崩溃，而目前的崩溃进程正在缓慢进行。他们害怕崩溃，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所逃避的革命局势，而他们并没有组织起来应对这一局势。因此，在实践中，他们像被催眠的兔子面对蛇一样，无能为力地面对当今的问题。他们知道，任何运动都会创造他们的共产主义对手所期待的革命局势。

对于工党和工联的社会主义来说，当今形势变化太快了。形势正在向共产党人倾斜，他们组织起来准备革命，渴望推动革命。在目前的议会制“老帮派”将我们进一步拖向灾难之前，他们无法取得这一地位。只有当政治上的“老帮派”结束了他们浑水摸

鱼的任务时，共产党人才有机会完成他们的破坏工作。他们努力维护一个已经过时且无法维持的制度，最终必将导致普遍混乱，进而引发无政府状态。

议会与革命-独裁统治

如果法西斯主义在崩溃前没有上台，那么革命局势可能会出现。在崩溃状态下，法西斯主义的有组织力量将独自站在国家和无政府状态之间，而共产主义斗争必然会在这个高度发达和文明的国家中产生无政府状态。面对这种紧急情况，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尽管我们不寻求暴力局面。**独裁统治就是从欧洲大陆上的这种局势和其他类似的暴力斗争和革命现象中产生的。在社会崩溃的情况下，这种事情不可避免，也是拯救国家的唯一手段。但它们是崩溃事件，而非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很有可能通过议会制度向行政目的转变而和平到来，我们希望法西斯主义以这种方式掌权，通过和平、合法和宪法手段。我们的目标是利用现有选举机制夺取议会；然后，将议会制度转变为更有效的方法。简而言之，我们将赋予现任政府绝对的行动权，但议会有权通过谴责投票将其罢免。

这样，当选议会的最终控制权将得以保留，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另一方面，我们将取消少数派日常阻挠的权力，因为这是对人民在政府中采取行动和取得成就的意愿的挫败。此外，我们将通过职业选举权使议会适应技术时代，使选民能够根据其所在行业的信息进行投票。这样选出的议会将成为政府的助力而非阻力，并将得到国家工业委员会或工业议会的进一步协助，以取代目前的上议院。

虽然我们热切希望现有制度能够和平转型，以实现法西斯主义的更有效目标，但我们警告国家，只有在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采取行动，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我们任由国家走向崩溃，暴力斗争就会降临这个国家，就像已经降临其他国家一样。从这场斗争中必然会产生独裁统治，以及我们英国人希望避免的一切革命和暴力手段。因为我们希望避免这些事件的发生，**我们恳请我们的同胞在和平与正常的情况下，趁早采取行动，协助法西斯上台。**然而，如果未能及时采取行动，任由国家成为企图摧毁它的势力的无助猎物，我们将组织起来，阻止国家走向毁灭。我们将以武力对抗企图以武力摧毁英国的敌人。

法西斯主义组织

因此，法西斯主义必须组织起来，以应对两种可能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即通过议会制度的转型，和平接受法西斯主义。第二种情况是我们希望避免但必须做好准备应对的，即法西斯主义将在制度崩溃后经过激烈的斗争上台。事实上，我们必须从两方面组织起来。

（1）我们必须以正常的政治基础组织起来，最终夺取议会权力。在这方面，我们的组织必须与普通政党有所不同，即我们的所有成员，无论男女，都必须积极参与。**他们正在为这个国家和世界引入新的信仰，并有望成为该信仰的捍卫者。他们参与我们的运动是为了奉献，而不是索取；为了将生命和精力奉献给一项事业，而不是从拉选票的政治机器那里获取好处。**

(2) 我们必须以某种程度的军事组织为基础，以防在政府正常措施失效时，我们被要求在无政府状态下拯救国家。我们的法西斯国防军肯定不会用来对抗我们效忠的王室军队。它只会用来对抗无政府状态下的军队，如果他们开始在混乱中行动，并走向崩

溃。事实上，我们的法西斯国防军的宗旨完全是防御性的。在发生任何此类紧急情况之前，我们将组织起来保护我们的集会和宣传，免受赤军的暴力袭击。赤军试图在英国阻止言论自由，并已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

法西斯的纪律形式：黑衫、敬礼等

我们经常被问到为什么普通成员穿灰色衬衫，而接受特殊训练和服务的成员穿黑色衬衫。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使用这些外国标志和形式——黑衫、敬礼等？”

这些对国外标志的嘲笑并不适合社会主义者，他们的信条来自 19 世纪的德国；也不适合自由主义者，他们的信仰来自 18 世纪的法国；更不适合保守主义者，他们的原则来自石器时代的国际主义！然而，我们可以对这些标志的使用给出非常简单的解释。衬衫是法西斯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它打破了所有阶级壁垒，这也是法西斯主义的首要目标之一。我们用国家的共同目标取代阶级；穿着灰色或黑色衬衫，无论你是百万富翁还是领取救济金的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在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目标中，阶级壁垒被打破和消除，以实现更崇高的忠诚。

这件衬衫还有另一个作用：穿上它需要一点勇气；在英国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初期，它能从逃避者中挑选出战士。我们要的是那些拥有伟大信仰的勇气的人。然后是敬礼；这是欧洲文明中最古老的敬礼，我们相信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保护欧洲文明免受破坏的威胁。

我们为欧洲文明感到自豪，并决心保护它，尽管我们的座右铭是“英国第一”，我们把我们的国家放在所有其他国家之前。法西斯是帝国罗马的象征，罗马是过去 2000 年欧洲文明、文化和进步的摇篮。这一事实在许多英国古迹上得到认可，这些古迹经常在伦敦市中心展示法西斯标志，作为伟大的象征。

今天还有什么标志比这更合适呢？

这捆木柴象征着团结的力量；斧头砍掉了过去那些腐朽的木头，为未来的伟大命运开辟了一条坦途。

英国需要对这些象征退缩吗？它们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是我们民族伟大的象征。最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那些放弃过去十年软弱投降的人的决心，召唤英国人拿出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我们已经讨论得够多了：我们要行动起来！

新信仰-法西斯革命

在英国，任何行动信条都遭到那些将我们引入灾难的党派和利益集团的猛烈抨击。法西斯主义以自由的名义遭到那些将自由视为行动的否定者的攻击。我们的回答是，国家生存的自由比少数老人空谈的自由更重要。有时，人们必须在生存权和空谈权之间做出选择。国家的重建尚未到来，也不会从空谈的议会中诞生。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科学带来了这场革命。在过去的几年里，科学改变了工业和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场革命必须从工业领域扩展到政府领域。国家必须适应现代生活的现实。

因此，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革命性的信仰。

我们希望确保：通过和平和宪法手段实现法西斯革命。但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如果为了拯救我们的国家有必要，我们将通过其他方式完成法西斯革命。我们决心通过一条或另一条道路，让法西斯主义来到英国。它将带来科学和现代技术，重建我们破碎的经济体系。它还将带来新的价值观和新的道德观，重建一个国家破碎的信仰。公

共服务和私人自由将是法西斯国家的两大支柱。在公共生活中，所有人都应为国家的利益服务。作为回报，国家将在私人生活中给予所有人真正的自由。我们将用成年人的义务取代童年的限制。在各种利益和部门之上，应建立国家整体利益。所有人都应致力于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特权将被废除，但机会将提供给所有人，让他们有机会晋升到国家的最高职位。奖励和高位只给予那些凭借才能和服务赢得它们的人。英国将由那些证明自己值得承担这一崇高责任的人来治理。

事实上，我们寻求在我们热爱的土地上引入一种新的文明。

我们不仅为国家的物质复兴而战。我们也在为精神的重生而战。

法西斯主义是英国人信奉的信条和道德。这是那些决心让英国继续生存并再次变得强大的人的信条。

J.O.N.S. 西班牙长枪党的宣言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

这里不是为任何人喝彩或欢呼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人是重要的，每个人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士兵，肩负着属于我们和西班牙的任务。

我想告诉那些准备再次欢呼的人，我不会感谢他们的喝彩。我们不是来此接受喝彩的。而且，我几乎可以说，我们不是来教你们什么的。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学习。

我们这些在许多情况下远离卡斯蒂利亚的土地和天空的人，可以从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卡斯蒂利亚的土地，没有矫揉造作，没有矫饰，是土地的本质，既不是地方色彩，也不是河流、边界或山坡。这片土地当然不是众多庄园的总和，也不是某些土地权益在集会中讨价还价的依据，而是土地本身，是永恒价值的宝库，是行为的节制，是生活中的宗教精神，是言语与沉默，是祖先与后代的团结。

在这片典型的土地上，还有典型的天空。

天空是如此湛蓝，没有飘过的云朵，没有绿叶成荫的树林的绿色倒影，纯粹的蓝色，以至于人们可能会说它几乎是透明的。卡斯蒂利亚拥有典型的土地和典型的天空，它们相互凝视，从未甘于仅仅成为一个省，而是时刻渴望成为一个帝国。卡斯蒂利亚从未理解过什么是地方性的，它只理解什么是普遍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卡斯蒂利亚拒绝接受限制的确定性，也许是因为它无限制，无论是范围还是地位。因此，卡斯蒂利亚这片土地上有着许多美妙的名字——托尔德西拉斯、梅迪纳·德尔·坎波、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斯·托雷斯——这里是中世纪法院、集市和城堡的所在地，是正义、贸易和民兵的象征，让我们对曾经拥有的西班牙有了大致的了解，同时也让我们心中充满深深的失落感。

因为如果我们为了将好消息传播到国外，不顾艰难险阻（虽然这并不重要），踏上了穿越西班牙城镇和乡村的道路，那么正如在我之前发言的所有同志所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被剥夺了西班牙。我们的西班牙被三种裂痕所分割：**地方分裂主义、党派冲突和阶级分歧**。

地方分裂主义是衰败的标志，每当人们倾向于忘记祖国并非等同于那些我们即使在最原始的自发状态下也能感知到的直接和物质的东西时，这种分裂主义就会抬头。祖国不是任何特定水源的水味，也不是任何特定树林土壤的颜色：祖国是一种历史使命，

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使命。任何民族的生活都是自发性和历史性之间的悲剧性斗争。原始民族几乎对土地的特性有着植物般的认知。当他们摆脱这种原始状态时，他们知道自己的特殊性不是由所居住土地的物理特征决定的，而是他们肩负的普世使命使他们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一旦普遍使命感开始衰退，分裂主义就会再次抬头，人们会再次转向自己的土地、自己的音乐和自己的语言，从而再次危及西班牙在英雄时代所拥有的辉煌的整体性。

除此之外，我们还被划分为不同的政党。政党充斥着污秽，但在这污秽之上和之下，存在着对政党的深刻解释，这足以使它们变得可憎。

政党诞生于人们失去对真理的感知的那一天，在真理的指引下，人民和个人才能完成他们的人生使命。**在政党诞生之前，人们和个体都知道，在他们自己的理性之上，存在着永恒的真理，而与永恒的真理相对的，则是绝对的谎言。但后来，人们被告知，真理和谎言都不是绝对的范畴，一切都可以讨论，一切都可以通过投票来解决，投票可以决定祖国是继续团结还是自杀，甚至决定上帝是否存在。**人们分成不同的团体，相互宣传、相互侮辱，变得焦躁不安，直到终于有一天星期天，他们将一个玻璃盒子放在桌子上，开始往里面装小纸条，上面写着上帝是否存在，祖国是否应该自杀。

这最终导致了科尔特斯的爆发。

我来这里的原因之一就是呼吸新鲜空气，因为我的肺里充满了科尔特斯的水雾。如果你看到，在如此麻烦和焦虑的时刻，如果你住在乡下，耕种田地，你会看到那里发生了什么！如果你能看到那些聚集在走廊上的小团体，他们蜂拥而至，只为听那些陈词滥调的笑话！如果你能观察到，前几天在一场关于是否应该再分割西班牙的辩论中，人们听到的只是喋喋不休的演讲，他们用琐碎的修辞来谈论宪法的某一条款，谈论是否需要达到一定比例的民众投票来授权分割！如果你当时在场，你会看到一个巴斯克人（他骨子里是西班牙人，骨子里也是巴斯克人）列举了他家乡杰出的西班牙人，而坐在支持莱鲁斯先生政府的那些长椅上的同胞却把这件事当作笑话，并嘲笑地把乌斯库敦的名字加到洛约拉和埃尔卡诺的名字上！

似乎这还不够，在这个为我们带来自由主义以及议会政党的世纪，我们还要感谢阶级斗争的遗产。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人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工作——奴隶制已成为过去；的确如此，工人不再遭受殴打；但由于工人除了雇主给予的食物外别无他物，由于工人无力反抗资本主义的强大，资本主义便制定了各种条件，工人要么接受这些条件，要么听天由命，忍受饥饿。因此，当自由主义者在纸上写下几乎无人阅读的华丽《权利法案》（如果仅仅是因为人们甚至没有接受过阅读教育的话），甚至在撰写此类宣言时，就在我们眼前上演了有史以来最不人道的景象：在欧洲最好的城市，在拥有最精致的自由制度，却有人类，我们的兄弟，生活在拥挤、畸形、可怕的红色和黑色的房子里，被贫困、肺结核和饥饿的孩子的贫血所困扰，**只是不时地被尖刻的讽刺告知他们有多么自由，多么主权。**

显然，工人终有一天会反抗这种嘲笑，阶级斗争也终将爆发。阶级斗争是有道理的，社会主义在最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它。**问题是，社会主义没有遵循其最初追求人类社会正义的路线，而变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无情理论，丝毫不关心工人的解放。那些工人自鸣得意，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西班牙许多城镇的街道都以卡尔·马**

克思的名字命名，但卡尔·马克思是德国犹太人，他坐在书房里，以冷漠的态度观察着那个时代最戏剧性的事件。当这位德国犹太人凝视着英国曼彻斯特的工厂，制定着关于资本积累以及工人和雇主利益的不可抗拒的法则时，他在写给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工人是一群粗俗的乌合之众，除了用来检验他的理论外，不值得理会。

正如我之前所说，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拯救人类的运动，而成为一种顽固不化的教条；它不是为了恢复正义，而是为了报复，将资产阶级的不公正发挥到极致。不仅如此，社会主义还规定阶级斗争永无止境，并指出必须对历史进行唯物主义解释；也就是说，为了解释历史，只有经济现象才重要。当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这样的制度中达到顶峰时，孩子们在学校里被告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祖国只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压迫工具；甚至谦虚和父母对子女的爱都是资产阶级偏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根除。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质。你真的认为如果工人知道这一切，他们会对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的可怕、恐怖和不人道的想法感兴趣吗？

我们这些三十岁左右的人进入西班牙社会时，世界就是那样的，西班牙也是那样的。我们可能会倾向于接受这个制度，并努力跻身于科尔特斯的小团体，或者参与一些会进一步激化无产阶级群众及其阶级斗争的极端行为。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乍一看似乎还有某些好处。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人加入了保守共和党、激进党、民主自由党或人民行动党，他很容易就能成为部长，因为每两周我们就会经历一次政府危机，每次都会有新部长出现，

我们不禁要问，在西班牙是否还有从未担任过部长的人？

但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样的人很少。正如我们的同志莱德斯马所说，走上革命之路，走上不同革命之路，走上真正的革命之路；因为迄今为止所有的革命都是不完整的，**因为没有一次革命同时服务于祖国的民族理想和社会正义的理想。我们将祖国和社会正义这两者结合起来，并基于这两项永恒的原则，大胆而坚定地开展我们的革命。**

有人说我们是模仿者。奥内西莫·雷东多已经对此做出了回应。他们说我们是模仿者，是因为我们的运动，即回归西班牙真实本质的运动，已经在其他地方出现过。意大利和德国以一种极度愤慨的态度转向自己，以抵制那些为了压制他们而散布的神话；但仅仅因为意大利和德国转向自己并找到了自我，我们就应该说正在寻找自我的西班牙是在模仿他们吗？这些国家已经回归了本真，当我们人穷则反本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本真就是我们的，而不是德国或意大利的。**因此，如果我们像意大利人或德国人那样做，我们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西班牙人。**

我想对奥内西莫·雷东多同志说，不要太担心他们说的我们模仿。如果我们处理了这个问题，他们很快就会发明其他问题。诡计的来源是取之不尽的。让他们说我们模仿法西斯主义者吧。毕竟，在法西斯主义以及每个时代的各种运动中，人们都能发现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反复出现的元素，这些元素是每个人类思想的遗产，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如果你愿意，文艺复兴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十一音节诗：十一音节诗来自意大利，但传入意大利后不久，加西拉索和弗雷·路易斯就用十一音节诗、

卡斯蒂利亚十一音节诗来歌唱西班牙的田野，费尔南多·德·埃雷拉则用这种诗来赞美海上平原的主，正是这位主在勒班陀战役中赐予西班牙胜利。

他们还说我们是反动派。有些人恶意中伤，劝工人远离我们，不要听我们的话。尽管如此，工人还是会听我们的，当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时，就不会再相信那些恶意中伤我们的人了，因为恰恰是那些像我们一样想要恢复不可分割的融合命运的人不可能是反动派。相反，反动派在冲突的政权中茁壮成长，就像一个阶级刚刚战胜另一个阶级，而战败的阶级渴望复仇；但我们不参与阶级之间或党派之间的报复游戏。我们把指导我们所有行动的指南置于党派政治和阶级利益之上。我们的指南——也是我们运动的真正本质——**是被称为祖国和民族的完全融合的命运。这个国家概念由一个强大的民族来服务，既不屈从于阶级也不屈从于政党，由此产生的利益是整体利益，而非胜利者一时的利益。工人将意识到这一点，然后他们将看到我们的方案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然而，其他人却认为我们是反动派，他们模糊地希望，当他们一边在俱乐部和赌场里抱怨，一边渴望部分失去的特权时，我们会成为反动的突击队员，为他们从火中取栗，并忙着为那些现在正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上看着我们的家伙们安装扶手椅。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受到死者的诅咒，我们为了更崇高的事业而击倒了他们。

最后，他们说我们没有纲领。你能想到还有什么比纲领更严肃、更深刻的东西吗？你什么时候见过真正决定性的东西，永恒的东西，如爱、生命和死亡，是由纲领来支配的？

我们必须拥有的是对自身需求的全面认知，对祖国、生命和历史的绝对理解；正是这种在我们灵魂中闪耀的全面认知，会在任何情况下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和该选择什么。在更好的时代，没有这些研究小组、统计数据、选民名单和纲领。此外，如果我们有一个具体的纲领，我们就会成为另一个政党，我们就会像他们为我们制作的卡通人物一样。当他们说我们复制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时，他们都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西班牙人；但提出这种指控的人却用左手组织了一场模仿我们的运动。如果我们能在巴利亚多利德举行游行，他们也会在埃斯科里亚尔举行游行。如果我们谈论永恒的西班牙、帝国的西班牙，他们也会说他们渴望西班牙的伟大和职团国家。这些运动可能与我们的运动相似，就像一盘冷肉与前一晚的热餐。

因为正是它的温度、它的精神，就是这种对比，才让我们产生了这种渴望，让我们有了这种理解。我们关心什么职团制，废除议会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同的机构继续培养出这些谨慎、苍白、圆滑、微笑的年轻人，他们无法被爱国热情所激发，甚至——让他们说去吧——被宗教热情所激发？

在涉及职团化国家时，一定要非常谨慎；在处理很多人告诉你的那些冷冰冰的事情时，一定要非常谨慎，他们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我们变成另一个政党。奥内西莫·雷东多已经警告过我们这种危险。我们不会通过某种方式重组国家来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想要的是给西班牙带来乐观、自信、清晰而有力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团体不是党派，而是一支民兵队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为了成为代表、副部长或部长而来，而是为了在各自的岗位上完成我们被委以的使命；虽然我们五个人现在坐在桌子后面，但有一天，最卑微的

战士可能会命令我们，而我们可能被要求服从。我们没有任何个人野心，也许唯一的野心就是站在危险的最前沿。我们只希望看到西班牙再次成为原来的自己，并像 1516 年巴利亚多利德市在给皇帝查理五世的信中所说的一样，**以荣誉、社会正义、青春和爱国热情为荣：**

殿下应该来，一手接过天主教国王、您的祖父留给您的枷锁，无数勇敢而骄傲的人曾用它驯服敌人；另一手接过您祖母伊莎贝拉王后无与伦比的箭，她用箭将摩尔人赶得远远的。

好吧，就在这座巴利亚多利德城，我们恳求你们，你们拥有枷锁和箭矢；枷锁是劳苦，箭矢是权威。因此，我们来到巴利亚多利德，在枷锁和箭矢的标志下，在此高呼：

“卡斯蒂利亚，再次为西班牙而战！”

为什么德意志工人党必须出现？ 安东 德雷克斯勒

德国人民因世界大战、革命和兄弟相残的冲突而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在 11 月的风暴过后，那些以最美好的承诺自居的人，自诩为唯一能够拯救德国的人，如今却统治着我们走向死亡。秩序、正义和习俗的所有纽带都被打破。许诺给我们的自由，却表现为前所未有的普通犯罪激增，例如特权高利贷者和剥削我们的人民[Volksausbeuter]。旧秩序崩溃了——现在毁灭在微笑，而废墟中却没有新的生命绽放！必须明确指出：“1918 年深秋发生的变化不是制度变革，而是旧制度的加冕。德国革命前，资本主义宪法在幕后统治；革命后，它用亲信取代了所有反对者，继续欺压我们，直到我们历经艰难、饥饿和痛苦，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自愿奴隶——而其代表也身处德国。”

1. 35%的外国种族=79%的政府席位。

98. 67%的德裔=21%的政府席位。

这些数字说明了一切！

德国的工业和营运资本总额为 120 亿[马克]。而贷款和股票市场资本总额为 2500 亿。

但只打击了流动资本，而流动资本——以工具、机器、船舶和各种生产设备的形式——是劳动人民的饭碗。

另一方面，贷款资本压在我们自己的土地和土壤上，压在我们的建筑、房屋和公寓上，不仅**没有被**打击，实际上还得到了促进。资本主义的代表和代理人将自己置于他们自己组织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队伍的首位，他们领导着反对阻碍他们前进的工业资本的斗争。劳动人民与工业资本息息相关，无论好坏，这种资本必须得到保护——同时防止对劳动力的任何剥削。

相比之下，股市资本和贷款资本却毫不费力地通过他人的劳动而增长；通过永续利息和复利而无限膨胀，其所在社会如今正承受着由此带来的沉重负担；它们竭力通过消除任何形式的中产阶级生存来获得对整个人类劳动界的信任——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与之抗争。

世界被有意带到了这样一个状态，以至于四五百个伟大的银行家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紧闭钱袋，那么世界的齿轮就会停止运转。”

世界大战、革命、民主化、犹太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导致这种状况的手段。德皇、各党派和人民代表都过于疏忽，忽视了过去五年世界事件

背后的原因。尽管有许多人发出了警告，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都没有听到，只有这样才能让肆无忌惮的领导人成功地煽动盲目群众走向毁灭。

毫无疑问，各党派怀着最美好的愿望致力于重建。但他们无力对抗那些以“消灭”和“破坏”为口号的人。那些致力于保护人民和国家的人，本身也充斥着与消灭者进行模拟战斗的元素，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清除自己的外来因素。与所有党派一样，整个议会也充斥着当选代表，他们个人的野心和通过政治达成的有利交易优先于选民的共同利益。（埃尔茨贝格!）难怪这样的人被用作强大大资本家的狗腿子，当唯物主义精神像瘟疫一样在人民（Völkern）中肆虐时，不断将新的受害者拖到金权神的祭坛上。

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唯物主义和拜金主义是根源。只有当我们从各方面摆脱它们时，才能得到救赎。

现有政党中，有哪一个是真心实意地努力打击拜金主义最有害的形式——借贷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社会民主党还是斯巴达克斯？ **都不是！**

这两个政党都——也许是不知不觉地——发展成了银行资本和大型贷款资本的最佳支柱，成为它们的保护力量。

中间派还是民主党？

他们的队伍中有一些身居要职的人，他们对银行资本和贷款资本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也无法指望他们进行认真的斗争。

打破金钱势力的唯一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一个由所有依靠双手和智慧谋生的人组成的政党；一个由生产者组成的政党，其领导层和成员中没有任何大资本家和非德国人，不受任何金钱势力的压力。

德国的救赎，人类从拜金主义者的枷锁中解放，都源于一场源于**底层**、**内部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必须真正无私，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将人民的共同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只有这样的领导者才能治愈人民受物质主义之害的创伤，带领他们回归正途，重拾道德，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衰败、我们今日苦难的最终原因，纯粹在于这些特殊品质退化和缺失。

我们要求制定严格的法律，打击有意在文字和言论中散布政治谎言的行为。政治谎言挑动国家间相互敌对，煽动它们走向疯狂。这场**谎言的瘟疫**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并导致数百万人伤残，**而这一切的源头又是国际股票市场和借贷资本。**

英国人“只有德国人才能打败德国人”的理论，只有通过外国媒体的大量宣传谎言才能付诸实践——而国内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宣传开始后，德国人不再相互理解，我们共同的身份认同感消失了。**我们目睹了我们的国际化同胞对敌国成员表现出更多的同情，而不是对自己的同胞，只要这些敌国成员是社会主义者。不仅人民，而且他们的领导人，都忘记了充满仇恨的敌人所建议的永远不会为德国的利益服务。我们看到，国际主义或金融导向的报纸通过无情地打击德国人，将我们的关切踩在脚下，从而帮助我们的敌人进行毁灭性打击。不幸的是，这种情况至今仍然存在。海涅部长在普鲁士国会上宣称：“我们知道，独立报是在被占领土上用法国人的钱建立的。**

是什么促使法国人用法国人的钱创办独立报？是对德国人的爱，还是对“德国佬”的

狂热仇恨？是什么促使那些德国人接受这些资金？是对法国人的爱和信任，还是对德国一切事物的狂热仇恨？

事情就是这样发展到了今天？

既然如此，那么，就让我们抛弃一切国际主义情怀吧，尽管它们是出于真诚。但那些有意识地为国际资本家服务的家伙们，就让他们上绞刑架吧。

如果我们不自救，那么谁也不会来帮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成为、并希望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者。

我们受够了让社会主义成为追求金融统治的烟幕。我们不想让工人阶级继续被当作股市资本和借贷资本、犹太人和耶稣会的秘密保护队。

我们想要一个诚实而真实的社会主义！

我们已经认识到，对工人不断提出要求，不断维持他们的不满情绪，实际上无非是：让无产阶级的大锅里的火永远燃烧，让大锅永远沸腾，让工人时刻准备着反抗。因为：对于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来说，没有什么比阻止证券交易所通过过度扩张的人民（Volk）造成前所未有的价格上涨更自然的事情了。革命前后的社会民主党甚至有更多机会确保工人阶级的满足感。相反，战火却烧到了社会主义工人中间，在战争爆发后把他们分为两派，革命后又分为三派；中央办公室认为其掌权之日即将到来，也知道披着煽动者外衣的统治者会给人留下非常糟糕的印象，因此允许这些分支从事煽动活动。

那些为革命而甘愿被剥削的无知工人和士兵，本应得到更好的职位和地位，却只能得到微薄的工资。

收入比以前增加了三到四倍，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上涨了五到十五倍——这就是光荣的犹太革命最显着的成就；此外，腐败和裙带关系正在蔓延。

我们不是自由国家的反对者，但更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君主立宪制的朋友。然而，我们是这场革命的最大敌人，这场革命的“无意识、真实和实用的概念”（根据拉特瑙的说法）是：“在（犹太）**财阀立宪**政府的国家形式下，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霸权。”（金融规则。）

这就是自由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受“指导”的无产阶级对我们发号施令。这些独裁者已经被**识别出来**并**曝光！**

除了成立一个体现德国社会主义的新政党，还有没有其他出路？或者无产阶级专政能拯救我们吗？例如，斯巴达克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经费从何而来？我们告诉你。来自国内外的大型犹太银行和大型公司！您想要证据吗？布雷希罗德、沃伯格、洛威和其他许多公司。资本家是促进自己的利益，还是促进诚实劳动养活自己的人的利益？

这就是答案！

我们遵循着良心指引的道路前进。我们知道这条路崎岖不平，但终将通向期待已久的目标。我们向您保证，您不会从金山中满载而归——当您真正走近金山时，您会精疲力竭、失望至极，因为远处向您展示的闪闪发光的金山只是腐朽、发光的木头堆。我们想对你们说：工人只有在国家繁荣昌盛的状态下才能有所作为，而国家繁荣昌盛的状态需要工人、人民共同维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者。任何人在达到一定年龄后，如果不再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就没有权利分享国家的重要资源！任何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失业生活（寄生虫的生活）都必须杜绝。

目标已经设定。我们将坚定不移地逐个实现这些目标，寸步不让。指导方针是由工人制定的，这些真正的工人以无私的方式牺牲自己，因为别无他法，他们将自己全部的理想主义，甚至生命，都奉献给了这项计划的坚定实施。

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劳动者党成立于 1919 年 1 月 5 日。由于资金不足，每个资本家都远离我们，我们只能自力更生。我们拒绝了各种不恰当的支持者。通过召开会议和收集小额捐款，我们今天才得以向公众展示印刷材料。到目前为止，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现在，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生产者，应该不让这场纯粹的运动——它源于对工人被无情背叛的认知，源于苦难和艰辛——像德国精神一样消亡。

帮助我们再次崛起！

我们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计划的实施中。而您只需在思想和道德上支持我们帮助传播我们的理念。

“先公后私”应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祖国和人民的福祉高于党派！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动者党。

论法西斯蒂 周毓英

法西斯蒂的出现于世界虽只有十余年，却早已成为政治上最惹人注意的专门名词了。

法西斯蒂统一了意大利，法西斯蒂又统一了德意志，法西斯蒂是撼动了世界了，但世人看待法西斯蒂还是和谜一样，大都不能明白了解。墨索里尼诠释法西斯主义，他认为：

『道德的有历史性的反对个人观念的生活，在此项生活中，个人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及其传统。』墨索里尼又认为：

『法西斯蒂与仅为空疏的怀疑主义或唯物主义是处于水火地位；盖法西斯主义显然为确定积极的主张，为政府与祖国较高的利益计，企图发挥纪律与个人活动。此二者均系代表道德性的实际，而以能继续进步为条件。故政府或民族如有一停滞不进，便为覆亡的征兆。且凡一政府不仅以能施行权威为满足，更须证明在其生存中，具有精神的力量。』

墨索里尼的诠释也许是太简短了，许多人『看了这段文字，不但不能明白认识法西斯蒂是什么，反而增加了模糊的印象。』但这所谓增加了模糊的印象的原因不在于墨索里尼氏诠释的本身，而是一般人对这诠释的理解力的不充分。

墨索里尼在极简短的诠释中，确定了社会进化的规律，并阐明了法西斯蒂在哲学或科学上的基础。人类在道德的历史性的反对『个人观念的生活』中，人类所以能够进化，并产生了种种的组织与文化。在此种进化的人类的生活中，『个人』当然是『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及其传统的。』

人类惟其是『道德的历史性的』动物，人类所以能够进化，道德是社会能力的渊源，历史是社会组织的渊源。道德的能力是最伟大的能力，历史性的组织是最坚韧的组织，法西斯蒂便是这种道德的能力与历史性的组织的产物。法西斯蒂有那道德的伟大的能力，有那历史的坚韧的组织，所以法西斯蒂的战斗常是无往不胜，随处都是成功的。法西斯蒂不像共产主义那样，共产主义的战斗能力不是道德的而是唯利（唯物史观）的，共产主义的组织是情感的而不是历史的，所以共产主义经过了长期的糜烂

和转换，一直到了天才的列宁手里才有成功。法西斯蒂却是那样的有犀利的现实性，她的出生虽只有十余年，她的成功却已是空前的了。已经被法西斯蒂统治的有意大利和德意志，未来奥芎波兰和中国等国也都已有了必须实行法西斯蒂的趋势。道德的能力，历史性的组织，不论在任何国家，都具着坚强的基础，但共产主义不能利用这种能力和组织，资本主义也没有方法继续保守下去；人类要求发展，人类自然只有走上法西斯蒂的道路了。

个人的生活『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及其传统』，但法西斯蒂并不因此就抹煞人类的个性发展。在『政府与祖国较高的利益』目标下，人类可以更有基础的『发挥纪律与个人活动』，人类可以更顺利的求得『继续的进步』。所以法西斯蒂虽然以权威的运用为活动的基本，但绝不以『能使用权威为满足』，在其存在与活动中，法西斯蒂具有进步的精神的力量，这力量的渊源便是历史与道德。法西斯蒂的毅力，法西斯蒂的牺牲，她们不像共产主义那样的建筑在自私的利害观念上，而是植基在社会的道德和纪律上面。个人的利害观念在社会上既难一致，并且也时时在变迁着，以这样的力量来改造政治，建立政权，当然没有绝对成功的把握，所以共产主义的革命，近百年来虽然屡有前仆后继的无产阶级像飞蛾扑火般从事暴动，终究没有遇着那预期着的好运而获得『最后的胜利』。道德的与纪律的观念，这在社会上却比较是一致的，同时她们的变迁是随着整个社会而变迁，不能为任何个人所左右，革命的力量因此就容易集中而且持久了。

为求简单和易于明了期间，我们可以总的说一句：

『法西斯蒂是道德的纪律的组织，是实现人类继续进步的革命。』

本来墨氏的诠释并不模糊，只是一般人在自由主义的偏见的麻醉下，自身的认识先已模糊着，于是就感觉墨氏的诠释模糊了。试想在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唯物主义的潮流下，人们的意识上先种下了自私的偏见的劣根性，爱把成见或偏见去粉饰现实，墨氏却揭出了宇宙的真想，负起了历史的重任，以道德与纪律的精神来主张革命，这当然会使『唯个人私利是图』的先生们觉得头痛，觉得模糊。

法西斯蒂在整个社会的认识上既以社会的道德与纪律的发挥为社会革命与社会进步的原则，那末她在政治经济以及其它种种社会组织方面当然也不能违背这个原则。现在将法西斯蒂在政治方面及经济方面的形态略略写出一个轮廓吧。

法西斯蒂最大的特点，便是她在政治上很坦白地主张独裁，主张实行强力政治。我们可以说，法西斯蒂所以引起激烈的反对与妒忌是在于这一特点，但法西斯蒂的所以能够成功也在于这一特点。

在政治上坦白地公然主张独裁主张专政的，一个是共产主义，另一个便是法西斯蒂。一般人讨论独裁问题的时候说共产主义的独裁是极左的一派，法西斯蒂的独裁是极右的一派。其实这种左派右派的分别，只是一种机械的不必要的观察。政治上只有正确与不正确的分别，现实与空想的分别，如果法西斯蒂的主张是正确的，是现实的，右倾也没有关系；共产主义的主张是空想的，是不正确的，左倾又有什么用呢？民众所希望于革命的是切切实实的利益，是现实的生活的利益，民众不需要永不兑现的欺骗性的革命支票，民众不需要取快一时的麻醉性的漂亮煽动！历史把事实证明给我们看，正确的现实主义并不妨害革命，而空想的左倾却正正断送了革命啊。

人类是政治的动物，政治的中心便是权威。权威的正当运用抑或滥用，那是另一问题，但人类需要政治，政治需要独裁，那却是一定的！

墨索里尼说『政治平等不过是一种荒谬的套话』，孙中山先生也说人类的平等只是机会与境遇的平等，并不要连人类的能力和工作也限制着要平等起来。

在人类组织的过程中，人类的绝对平等是没有的，「社会的分工」使社会形成了等等不一的组织与等级，这些等级与组织的出现，并不是为了人类的自相压迫，而是为了人类的协力求进。利用等级与组织来实行人类的自相压迫，那不过是人类的堕落的行为，但利用组织与等级来实行人类的协力求进，那却是切切实实的道德的行为啊！

民众依靠政治的唯一目的，是要藉着政治去保障他们的生活。政治能够保障民众的生活，政治能够维持社会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政治就已经尽了它的责任，同时民众对于政治的欲望也已经满足了。如果民众的要求超过了政治的范围，要求道德与纪律以外的自由，要求万人平等的政权，结果独裁的现象是没有了；但随之而发生的现象，那便是政府的组织纷乱了，社会的组织也纷乱了。可惜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对于人类并不是什么幸福的生活，在混乱自私与无秩序的社会中，人类非但不能求得「继续的进步」，人类的幸福反而减少了，甚至消灭了。

政治发展的历史，从原始时代的酋长制度起，以至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止，它的一贯的共通的原则，都不外是政治权力的强硬发挥，都不外是实行理智的独裁。因为惟有强力政治，政府才有普遍地保障民众生活的权利；惟有理智的独裁，政府才有敏捷地施行改革或发展社会的政策的机会。历史上许多挂起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招牌的政治家，当他们在野的时候，从他们煽动的口中发放出不少的政治平等和反对独裁的说词，但等他们一上台，自己握到了政权，便也不得不组织地纪律地强硬地发挥政治权力，不得不采用独裁的方式以维护统治的权威。许多民主政体的国家如美国法国等，他们表面上是民主，是实行德谟克拉西，但实际上真正的政权还是在少数的政客和资本家手里，或者在三五金融资本家或金融集团手里，多数民众何尝得到什么自由，得到什么政权？所谓政权，所谓自由，还不老实是句骗人的鬼话。当民众在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下，多数民众失却了生活上的保障，逼得要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在无可奈何的境遇中，不过利用自由民主的美言来欺骗民众，用一种巧妙的方式继续维持他的统治地位罢了。

然而这种假民主与假自由的政治并不能千秋万世的存在下去，当民众失了生活的保障，饥寒交迫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民众将毫不顾虑的要起来打碎那不值一钱的虚伪的民主政治。为着生活，民众不能再忍耐了，意大利与德意志的民众都不惜牺牲过去所留恋的自由民主而进展到了独裁的政体。法西斯蒂能下决心保障民众的生活，解除民族的痛苦，民众为着自身的利益，他们当然要起来拥护法西斯蒂了。所以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成功，他们虽然是有着伟大的特出的天才，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有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不得到民众的拥戴。就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三头六臂的天神，他们也绝对不能统一意大利统一德意志的啊。

政治上实现了道德的与纪律的基础，经济上也当然会打消各种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倾向，而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

法西斯蒂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努力，主要的还是依赖着政治权力的运用，藉着政治

权力来改造社会经济，法西斯蒂不希望直接把道德的纪律的力量在经济上运用，不希望以空口的说词来威吓或劝诱资本家让步；法西斯蒂也不希望直接以暴力作改造社会经济的工具，在二十四小时内没收了资本家的一切财产而一步跨进了社会主义。

法西斯蒂的历史实在太短了，所以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理论还很不完全。尤其是经济方面，虽如先进国的意大利，也并没有达到完全成功的地步。不过在一般的发展的途经上，法西斯蒂对待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不是仇恨，也不是屈服，她将承继着现存资本主义的既成基础建立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运用政治的和经济的统制权力，改变「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为「社会资本主义」的经济。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劳绩，以及资本主义在现实社会上的势力，这是任何人都不能用意气或偏见来抹煞的。鼓吹了将近百年的共产主义在苏俄的现实仍没有能够完全放弃资本主义，目前在美国轰动着的技术统治 Technocracy 将更正确的要建筑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主义的社会已矛盾到了极点，但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却还有其不可忽略的任务，不论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美国的技术统治解释得怎样漂亮，说得怎样的打倒了资本主义，可是它们的全部表演，还不过是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交替过程中实现了资本主义所应有的新形态。法西斯蒂不怀任何成见，它对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努力，当然会发挥得更强硬吧。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邮报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这个问题在那些寻求清晰理解该术语的人中引发了相当多的兴趣和争论。**不幸的是，试图提供真诚的答案的努力因乔治·季米特洛夫和乔纳·戈德堡等人的误导性解释而变得复杂，**而翁贝托·埃科的解释对我来说尤其令人失望。熟悉我作品的读者会认识到我更喜欢罗杰·格里芬的概念和使用“一般法西斯主义”一词。我发现格里芬的模型是分析法西斯主义最实用、最直接的框架。

格里芬提出了“法西斯主义最低标准”的概念，该标准概述了运动或个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才能被认定为法西斯主义者。他提出了一般法西斯主义的概念，作为一个涵盖一系列法西斯主义实体的总称，包括人物、运动、实践和政策。这种一般法西斯主义的概念也可以被描述为一般民族社会主义，或置于政治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立场的框架内。根据格里芬的说法，理想的法西斯主义类型围绕着一个关键的驱动力和一个它试图创造的世界的基本蓝图。这些结论是使用一种称为同理心的方法论得出的，该方法涉及从其追随者的角度理解政治意识形态。最终，格里芬将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综合成一个简洁的单句定义。

“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其各种变体的神话核心是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再生形式。”

——罗杰·格里芬，《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让我们分解一下这些概念，看看它们的综合作用如何催生了法西斯主义。这三个概念是：

重生

极端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

重生：

重生的主题在许多传统中都很普遍，从洗礼等宗教仪式所象征的精神复兴，到对灵魂在不同生命中轮回的信仰。

然而，这些历史悠久的概念可能会与法西斯主义的重生观念相混淆，从而造成误解。格里芬澄清说，法西斯主义中的重生常常被错误地与对历史复兴或维持现状的单纯愿望联系在一起。当将这一想法与重生相提并论时，就会产生这种混淆——重生这一概念在共产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中都有一席之地。长期以来，政治领导人一直利用怀旧情绪来唤起对美好过去的感觉，例如里根总统和特朗普使用并得到比尔·克林顿认可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等口号，或拜登总统倡导的“回归正常”等口号。

然而，在法西斯主义的背景下，重生并不是为了重拾昔日的辉煌，而是为了通过建立新的社会结构来激发深刻的民族认同。

法西斯主义不同于保守和反动思想，因为它并不寻求简单地维持现状或复活前政权。它的野心是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现实，灵感来自它所认为的民族遗产的不变本质。

历史学家 A. James Gregor 观察到，这些持久的元素通常体现在涉及民族身份的文明神话中，例如德国人的雅利安中心日耳曼尼亚、意大利人的罗马尼塔、西班牙人的西班牙尼达、俄罗斯人的欧亚大陆、日本人的八纮一宇、中国人的文明和印度人的阿坎德巴拉特。他指出，法西斯意识形态也吸收了尼采的“好欧洲人”概念。

法西斯主义以雅利安人的传说为基础，塑造了一种精神和文化上丰富的新存在的愿景，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这些社会尊重这些方面，而不仅仅是历史复兴。

它通常被称为“革命有机民族主义”，致力于通过一系列策略来破坏既定秩序，从合法的政治手段到武力和可能的革命。当法西斯主义掌权时，它试图创造一个与极端民族主义、以雅利安人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独特新时代。这种驱动力被称为根深蒂固的现代主义（反动现代主义），这是一种与基本的理想化价值观深深交织在一起的现代性变体。法西斯主义并不反对现代主义，而是寻求一种通过复兴或再生来改革当今国家的版本，想象一种现代性，它抛弃当前感知到的衰败，转而支持由特定的雅利安理想主义塑造的未来，使用每个法西斯团体特有的特定物质和美学实践。

意大利法西斯和纳粹德国采用的被称为“简约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体现了这一理念，将古典图案与现代主义风格融合在一起，象征着根植于受人尊敬的历史的进步。简约古典主义并非只与法西斯国家有关；不同的政府也利用它表达不同的意识形态叙事。

法西斯运动尤其被它所吸引，因为它具有现代进步和历史辉煌的双重象征意义，培养了以“健康和有机”原则为基础的未来愿景。大众汽车的设计受到希特勒的影响，旨在成为“人民汽车”，它体现了这一理念，以理想“家庭”交通工具的形式代表了现代性。它的设计理念意义重大，以至于它被列入 2006 年的“现代主义：设计新世界”展览，展示了其持久的影响力。

法西斯主义开创新时代的努力，让人想起历史美德，可以比作凤凰涅槃重生——转型和复兴的隐喻。这与黑格尔的“扬弃”概念相呼应，旧结构既被否定又被保留，为新的、更高的秩序铺平道路。**法西斯主义寻求解构现有制度，但保留精选的珍贵元素，**

以打造它认为更优越的社会模式。冈仓天心将这种根深蒂固的现代主义的本质概括为“活生生的不二论，**它欢迎新形式，但又不失旧本质。”**

极端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尤其是与法西斯极端国家联系在一起时，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形式，将一个国家或人民的利益置于所有其他利益之上。**它与常规民族主义不同，它相信某个国家固有的优越性，通常伴随着仇外心理和对民族团结的神话般的关注，好像国家是一个单一的生命体。它鼓励对国家进行拟人化的看法，通常支持独裁统治。这种意识形态为法西斯职团国家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并支持跨社会阶层的合作。经济通过行会、职团、庄园和辛迪加等实体进行组织，从而形成一个被设想为集体有机体的严格控制的社会**。

有时，保守主义会表现出一种与法西斯主义不同的极端民族主义形式。这种类型关注仇外心理和有机社会的概念，**以此作为保护现有或过去的社会框架免遭明显恶化的手段。**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等人物就是这种立场的象征，他们利用极端民族主义来保护和维护君主制和教会等历史悠久的机构。这些组成部分被认为是维持他们所认可的权力等级制度的关键。通过强调这些机构的重要性，保守主义试图防止它们被削弱并确保其意识形态遗产的持久性。

什么是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其含义如下：

“一种公然反自由、反议会的民族主义形式（它排除了戴高乐、撒切尔甚至叶利钦的爱国主义，使其不成为法西斯主义），但又拥抱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中心主义，这些民族中心主义源于种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变化形式表达为合理化的仇外心理。正是这种多义性和灵活性，解释了我的“法西斯主义最低限度”如何涵盖法西斯主义和欧洲法西斯主义（“百旗欧洲”）所容纳的意大利种族的各种概念，而欧洲法西斯主义自战后就变得如此重要。”

——罗杰·格里芬，《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再生核心》

民族中心主义通常源于雅利安文明神话，这种神话塑造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特征并创造了统一的历史传奇。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的核心是一种旨在捍卫意识形态免受外部动乱并塑造一个牢牢扎根于其基本信仰的未来战略。这一起源神话的可信度通过以下方式确立：

“对过去文化或政治历史上的伟大时期，或与所谓的敌人算旧账的深度神话叙述。”

——罗杰·格里芬，《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再生核心》

“通过庸俗化的体质人类学、遗传学和优生学，合理化民族优越性和命运、堕落和非人类性的观念”。

——罗杰·格里芬，《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再生核心》

法西斯主义认为，被美化的建国时期与现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它认为现在受到了有害影响的玷污。它将这种衰落归咎于外部力量削弱了国家的真正本质。**因此，法西斯主义的目标是清除、拆除和消除它所认为的现代性的衰落，为极端民族主义和复兴的融合奠定基础。**至关重要的是要明白，并非所有法西斯意识形态都一律依赖种族或优生学辩护，就像纳粹德国及其北欧神话一样。例如，巴西整合主义行动表明，

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及其相关神话可以基于对多元文化身份的集体意识。在这种情况下，重点在于保护和振兴国家独特的文化遗产，而不是严格遵守种族纯洁性或优生学原则。

罗杰·格里芬评论道：

“巴西整合主义行动（AIB）创造了最原始的基础神话之一，将原始时代与黄金时代的幻想融为一体。鉴于这个国家种族混合情况复杂，土著人民和葡萄牙殖民者的后代及其非洲奴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通婚，普利尼奥·萨尔加多无法沉迷于任何科学的生物纯洁性、优生学或神话般的祖先超级种族观念。

相反，对他来说，巴西精神（Brasilidade）的本质正是其独特的种族和文化融合，正是这种融合为巴西的重生提供了凝聚力和精神力量，也正是这种融合让巴西成为强大的现代经济和政治国家。

直到 1938 年他的运动被独裁者热图利奥·瓦加斯禁止之前，萨尔加多一直致力于将巴西视为一个理想的实验室，以展示种族混合社会的力量，从而在精神和文化上振兴一个国家，进而在政治和经济上振兴一个国家，从而奠定‘人类第四时代’的基础。萨尔加多被安全流放到葡萄牙后，瓦加斯得以在自己的政权下宣传 AIB 的种族融合和解神话。”

——罗杰·格里芬，《法西斯主义——政治理论中的关键概念》

必须纠正极端民族主义完全与民族国家框架挂钩的误解。极端民族主义可以采取超越传统国家边界的形式。例如，它可以涵盖整个种族，形成超越单个国家边界的超国家身份。在多元文化社会让位于以种族同质性为特征的地区（即所谓的民族多元主义）的情况下，可以观察到这种情况。这种信仰体系并不主张建立一个单一的、包罗万象的法西斯国家，而是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由不同的自治地区组成的马赛克。

此外，极端民族主义可以在没有任何正式国家结构的情况下表现出来，正如国家无政府主义所表明的那样，它提出理想的极端国家是由没有中央政府运作的种族同质社区组成的。无论采取何种特定的逻辑或形式，法西斯主义中的极端民族主义目标始终依赖于团结一群“有机成员”来实现其愿景。

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方法，旨在吸引那些认为自己被统治精英忽视或压迫的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和“权力精英”的身份是灵活的，会根据所讨论的观点而变化。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为例，民粹主义将斗争描绘成无产阶级（普通民众）和资产阶级（权力精英）之间的斗争。民粹主义通常试图聚集群众或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觉得自己被一个更小、更有影响力的少数群体所支配。在保守民粹主义的背景下，群众团结起来保护他们认为被这些精英破坏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保守的民粹主义倡导者经常给这些精英贴上“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正义战士”或“全球主义者”等标签。

在白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中，“普通民众”在种族上被归类为“白人”，而“权力精英”通常被视为“非白人”或犹太人等特定少数群体，他们被指责为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白人民族主义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白人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培养和维护白人民族认同，这从根本上讲是种族主义的，因为它预设了一种需要白人优越或分离的种族等级制度。这种信仰体系早于法西斯主义，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结构中。

纵观历史，白人民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例如美国开国元勋的行为，他们主要是受启蒙运动影响的自由人文主义者。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主义强烈反对这些自由主义基础。在美国，历史和当前的政策都对有色人种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从奴隶制和监狱工业综合体到种族隔离和有偏见的贷款做法。必须承认，一个人不必是法西斯主义者才能持有种族主义信仰，将两者混为一谈会导致对不同形式种族主义的简化解释。白人民族主义要演变为法西斯主义，就需要极端民族主义的复兴，完全放弃任何反法西斯自由主义学说和价值观。

那么，我们如何定义法西斯民粹主义呢？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被理解为：

“当足够多的‘群众’被自发的或人为的神话能量有效动员起来时，就会产生‘人民力量’的通用术语。”

——罗杰·格里芬，《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政治核心》

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将极端民族主义身份所定义的民众概念化为需要激励的团结的“有机群体”。其目标是培育一个强大的实体，准备发起深刻的变革，努力构建新的社会框架。这种描述表明，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可以被描述为一场复兴运动，寻求彻底复兴和复兴现有的社会秩序。

“革命觉醒的载体可能是‘全体人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所有被认为是健康成员的人），而不是某个特定的阶级或社会群体。然而，在国家目前颓废的状态下，大多数人处于‘沉睡’状态，受到‘外来’价值观（即弑父或种族灭绝价值观）的污染，因此，与列宁主义一样，先锋队必须承担传播愿景和夺取权力的英雄任务。**在新政权中，‘运动’的一些先锋队将成为新的统治精英，这种‘自然精英’不是基于阶级、权力或财富，而是基于他们对新国家秩序的最终愿景的承诺程度及其对实现这一愿景的价值。因此，对‘群众’的深刻矛盾心理是法西斯主义的固有特征，既是轻信的绵羊，又是潜在的英雄”**

——罗杰·格里芬，《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政治核心》

结论

通过罗杰·格里芬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法西斯主义超越传统政治的复杂性。**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一种再生的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一种民族重生的愿景，就像凤凰从社会衰败的灰烬中重生，渴望恢复其昔日的宏伟和道德正直。这种意识形态以其非凡的适应性而著称，产生了诸如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和民族无政府主义等变体，反映了超越传统左右政治分歧的第三立场。根据格里芬的说法，法西斯主义培育了一种全面的理想主义世界观，深深影响着社会结构，将集体意志与怀旧而又前瞻性的民族复兴动力结合在一起。**

法西斯主义根植于理想主义哲学，倾向于社会人文主义，强调人类意识在塑造社会中的重要性。它是一种在哲学理想主义的基础上错综复杂地交织着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神话叙事和工团主义元素的意识形态。通过格里芬的分析，法西斯主义被揭示为一种流动而务实的意识形态。它代表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民族认同复兴的力量，旨在实现复兴，重振国家的精神和目标。

法西斯主义不仅寻求建立集体认同，还寻求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共同体。最终，法西斯主义可以提炼为一种再生的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

这种意识形态的推动力是一种强烈的愿望，既要振兴国家精神，又要确立其无可争辩的主权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显然，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和考察，不仅将其视为特定国家的特定政权，而且将其视为一种运作的世界概念，是一项合法且可行的事业。事实上，我们可以列出一系列特征、概况、目的和梦想，这些特征、概况、目的和梦想让我们清楚地了解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全球现象的确切形象。从这个概念的意义上讲，也只有在这个概念的意义上，才有可能在意大利以外谈论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这个词获得了普遍性的能力。”

——拉米罗·莱德斯马·拉莫斯，《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

根据我的文章《什么是法西斯主义？》的反馈，我将在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背景下阐明雅利安人的概念。

必须承认，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运动早于并渗透到民族社会主义中，并非完全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创造。这些思想和文化信条很可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出现，因为它们在整个历史中都存在并将继续存在。准确定义“雅利安人”也很重要。在我的讨论中，“雅利安人”与其最初的语言和文化意义有关。从历史上看，吠陀传统中的“雅利安”代表着高贵和荣誉。在梵语中，“Arya Lok”表示雅利安人的社区，**其特点是致力于美德和社会仪式。雅利安人以最大的忠诚履行他们的职责。从本质上讲，雅利安人体现了他们的法，即神圣的职责。**“雅利安”这一概念从印度向西传播，影响了多种文化，包括伊朗的名称，其名称就源于“雅利安”一词。

雅利安人的概念源自印度，影响了欧洲的语言和社会，例如“贵族”和“贵族制”等词就体现了这一点，它们源自希腊语“Aristo”（最佳）和“Kratos”（统治），意为“由最佳者统治”。德语中表示荣誉的词语“Ehre”也与梵语“Arya”有关。从历史上看，雅利安人后来表示“最优秀的人”，这种区别的标准深深植根于神学教义中，后来被基督教的传播所掩盖。随着基督教在领导人和思想家中的兴起，雅利安人的理想与基督般的美德之间发生了融合。在基督教神学中，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类，成为雅利安人就是要效仿神。这种效仿体现在高雅文化的创造、追求和谐的社会、无私的社区价值观和对更崇高目标的奉献中。

从科学角度来看，“雅利安”一词并不是指一个单一的同质群体，而是指雅利安民族的集合，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人类学特征，但又由共同的精神本质团结在一起。这种多样性体现了统一中的多样性平衡。

根据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研究所的 Walther Wüst 教授的说法：

“我们所说的雅利安人到底是科学意义上的什么？雅利安人包括居住在欧洲并使用印欧语系的北欧民族、居住在印度的印度雅利安人和居住在印度西部的伊朗人。

这些雅利安人（印度和伊朗）对我们具有决定性的巨大优势。他们拥有最古老的印欧文学，这是不容否认的基本事实。在人们甚至不知道德国文学、如尼文字和类似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拥有了这些文学。在公元前一千年末、第二千年和第三千年，这些印度雅利安人和伊朗人将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称为自己的文学。这些作品都与现实有关。我们立即就会看到，我们仍然拥有这些文学是多么重要。其中有吠陀经和其他智慧，还有伊朗世俗圣人查拉图斯特拉的承诺。

最后，公元 6 世纪及以后的印欧统治者最古老的文献也得以保存。虽然伊朗古迹清楚地显示出闪族人的影响，但这并不适用于最古老的文献。

——1936 年 6 月，德国古代研究与教学研究所的 Walther Wüst 教授在慕尼黑大学最高礼堂发言

在探索第三立场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希特勒上台前的一些文件和哲学思想的形成性影响。

1904 年的特劳特瑙纲领、1913 年的伊格劳纲领、1918 年的维也纳纲领以及鲁道夫·荣格 1919 年的著作《民族社会主义：其基础和目标的介绍》为后来的民族社会主义及其早期思想奠基者奠定了基本的意识形态支柱。这些思想经久不衰并仍然引起共鸣，因为它们代表着一些人从法西斯哲学中获得的一种赋权感。

这包括希特勒对民族社会主义的解读，这种解读受到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哲学和美学原则的影响——墨索里尼曾广义地使用“民族社会主义”一词来预示他的法西斯意大利的出现。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包含着超越性的一面，它关注国家的团结和进步、功能的有效性以及个人和社区在身体、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全面福祉。它主张集体利益、发展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众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一次演讲中明确阐述了这些概念：

“那些不明白的人，他们的人民没有经历过同样的灾难。这些事情看起来神秘莫测，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会在灾难和激情中聚集起来。其他人无法理解，这不是国家的命令！他们在自欺欺人。国家不命令我们。我们命令国家！”

——阿道夫·希特勒，《意志的胜利》

法西斯主义利用了一种深刻的形而上学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与人类对超越世俗的事物的内在渴望相一致——寻求与超越平凡的生命力相联系。法西斯主义的目标是围绕这种超越的追求来构建国家。尤利乌斯·埃沃拉（Julius Evola）阐明了在个人经历和最高秩序之间建立明显联系的重要性。

“还有一种要求，即通过‘与更高法则的内在关系，赋予超越个人的客观意志，使人成为精神社会的自觉成员’来整合人。即使从未充分定义过这一要求的内容，但提出这一要求也意义重大。人们可以对法西斯主义试图满足这一要求的具体形式做出各种判断，以便将自己视为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国家学说的完美代表。认识到法西斯意大利各种举措和习俗的肤浅和做作性质，不应成为忽视一个现在和当时同样重要的问题的借口。

这基本上是一个如何面对‘自我超越’冲动的问题，这种冲动可以被压制和压制，但永远无法完全消除，除非在极端情况下有计划地将人贬低为牛的状态。昨天的“民族主义革命”试图提供一个政治中心来具体化这种冲动（再次强调，这是我们提到的“形式”对“物质”的作用），以阻止它的失控以及它爆发或演变为破坏性的形式。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忽视资产阶级文化试图“合理化”生存所带来的深刻危机，因为在各个层面上，这种文化的裂缝中都出现了许多非理性或“基本”的东西（指自然力量的基本特征）。今天，随着这种对“合理化”的痴迷的回归，人们倾向于服务于一种不是政治而是“社会”的理想，这种理想属于物质享受，而边缘化和抹黑一切由生存张力、英雄主义和神话的激励力量构成的东西。但有人正确地指出，当繁荣和舒适

最终变得乏味时，深刻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场危机的早期迹象已经很明显了。它们包括所有那些盲目、无政府和破坏性的反抗形式，这些反抗由年轻人发起，而年轻人恰恰在最繁荣的国家中注意到了社会化、理性化、物质化和被所谓的“消费文化”所主导的存在的荒谬性和无意义性。在这些反抗中，这种基本的冲动找不到目标，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变得野蛮。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着某种权力和主权的仪式或神秘感，这是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为我们一直在解决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Julius Evola，《从右翼看法西斯主义》

因此，这些意识形态对那些深刻思考民族认同的人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这可以追溯到希特勒成名之前民族社会主义者开创的历史先例。**必须承认，希特勒并不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唯一缔造者；相反，他是推动其发展的众多思想家之一。人们普遍误以为法西斯主义缺乏思想实质或哲学严谨性，有些人认为它是一套不连贯的信仰。然而，正如我一直指出的那样，法西斯主义和纳粹意识形态是以思想和哲学基础为基础的。否认这一点的人往往是无知或信仰僵化。即使是一些共产主义者，尽管他们的意识形态根本不同，但偶尔也会承认这一事实。**

“谁是法西斯知识分子？法西斯主义源于一个人的社会和知识态度，探究其起源至关重要。当理想主义者谈论法西斯主义时，他们通常指的是由于社会、政治或宗教教条而进行的残酷的十字军东征：他们描绘了肢解的尸体，并回忆起各种肉体杀戮和迫害。理想主义历史学家认为，突然间某个人、某个阶层或某个社会变得疯狂并开始杀人。这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简单定义，一种忽视人类处境现实的舒适合理化。人们会突然变成杀人犯吗？不。当人们相信某件事而不去进行调查时，他们就表现出了法西斯主义倾向；不质疑声明、分析或概念中涉及的前提就为法西斯主义奠定了基础。冷战口号正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缺乏经验有效性且由社会积累的偏见构成的信仰会导致明显的法西斯主义。”

——爱尔兰共产党马列主义者，《客观唯心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对诺思洛普·弗莱文学批评的谴责》

对新黑格尔主义的批评并不出人意料，不幸的是，一些共产主义者开始使用“法西斯主义”作为贬义词，其方式类似于“耶稣会”的历史负面含义。这种用法并不反映事实。

例如，希特勒倡导的“领袖原则”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准则说明了对个人施加的精神限制，尽管乔瓦尼·詹蒂莱的纯粹内在性概念并未得到充分实现。

反思法西斯主义内部的法令，这些法令宣称完全自愿服从是最高美德，并宣称领袖是绝对正确的。在现代话语中，两个极端政治派别经常不经意地互相指责对方是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然而，在希特勒时代之前，早期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包括前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保守党人、共和党人和工团主义者。

贝尼托·墨索里尼从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共和主义中汲取灵感，旨在与天主教传统主义建立和解的关系。阿道夫·希特勒真诚地相信他对德国工人的愿景，民族社会主义者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都将自己定位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就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他同时期的运动一样。

探索自由主义的历史揭示了朱塞佩·马志尼对年轻的乔瓦尼·真蒂莱的影响，后者最初是一位自由人道主义者。墨索里尼直到去世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根据各种消息来源，希特勒及其同志反对资本主义，并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真蒂莱认为他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进化”，受到马志尼哲学的影响。鉴于他在意大利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发现的缺点，他主张向他的有机国家和实际理想主义转变。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中“第三立场”或“第三条道路”的意识形态本质。

这些见解直接来自一手资料——主角们自己的话。通过追溯浪漫主义、德国和意大利民间文化、理想主义、工团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右翼的“左派是法西斯!”和左翼的“右派是纳粹!”这些说法在脱离历史背景后变得混乱不堪。

许多评论家都回避直接接触这些一手资料，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会同情某些法西斯主义信条。然而，法西斯主义的形而上学和知识层面要广泛得多，代表了意大利知识遗产更广泛的顶峰。法西斯思想的演变可以通过历史线索追溯。**值得注意的是，雅利安种族学说最初并不是法西斯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不是源自吉多·冯·李斯特或约尔格·兰茨·冯·利本费尔斯的阿里奥索哲学，也不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早期的法西斯思想家，如乔瓦尼·真蒂莱，坚决反对将雅利安种族主义纳入法西斯主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社会主义驳斥了这些理论。民族社会主义制造了自己的叙事，以血统纯正和保护他们认为是日耳曼民族神圣本质的东西为中心，他们称之为“雅利安人”。墨索里尼试图将意大利人提升到雅利安人的地位，他通过培养一种植根于罗马帝国荣耀和天主教传统的民族团结来实现这一目标。

约瑟夫·戈培尔也在向基督教德国宣传时触及了这个主题，宣称上帝创造了德国人民。这种信仰导致了共济会、神智论者、犹太人、人智论者等各种群体的迫害和边缘化。

在其晚年，民族主义哲学家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成为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思想影响者。张伯伦的学术研究以民族主义的视角深入研究古代历史，留下了持久的印记。“民俗”的概念源于浪漫主义思想，神话和民间传说的交织成为法西斯运动身份和追求的核心，与传统主义思想流派的原则相一致。

历史学家埃里克·库兰德承认传统德国神话在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社会主义党的民粹主义理想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宗教学说。戈培尔坚决否认与异教的任何联系；即使日耳曼部落皈依基督教，他们仍保留了本土传统和故事的元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戈培尔声称他们很幸运，因为他们拥有一种与祖先传统不冲突的基督教形式。此外，这种背景有助于理解真蒂莱的断言：

“天主教确实是最完美的宗教，正如现代欧洲哲学是最完美的哲学一样：它们共同构成了雅利安精神的最高创造。”

——乔瓦尼·真蒂莱,《现代主义的错误与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1921 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发表演讲时声称，法西斯主义源自雅利安人种的内在、长期冲动。这一说法强化了我分析的核心观点，即雅利安人叙事在塑造法西斯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正如爱德华·卡利克在《与希特勒的秘密对话》中所详述的那样，民族社会主义信仰体系的核心围绕着血统学说，该学说在理论上经过调整以适应理想主义框架。

1931 年，在与莱比锡一家报纸的编辑的对话中，阿道夫·希特勒热情地表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根据人们所能表现出的精神活力来评估他们。他将此称为“历史使命”和“精神事业”，需要出现非凡的精神战士来打造和维持一个旨在延续千年的帝国。同样，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也将但丁·阿利吉耶里视为先知，其思想预示了法西斯主义学说并后来成为其宗旨。**

19 世纪，俄罗斯斯拉夫派人士对欧洲各民族拥有独特“雅利安”血统的观点表示认同。斯拉夫派领袖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与他的追随者亚历山大·希法亭、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伊洛瓦伊斯基和伊万·叶戈罗维奇·扎别林认为欧洲人起源于“雅利安”祖先。这些斯拉夫派支持者将东正教与雅利安血统联系起来，认为拜占庭皈依基督教受到了雅利安群体的影响。这一观点与许多纳粹分子和一些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共鸣。此外，早期中国王朝与雅利安吐火罗人有过互动，影响了他们的治理结构。这种影响延伸到了日本人，他们与中国人有共同的血统，并继承了这些雅利安人的概念，正如“八纮一宇”原则所见。

诺瓦利斯、谢林、施莱格尔、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和赫尔德等著名哲学家也接受了雅利安起源论。该学派认为，所有雅利安文明都起源于印度，并传播到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大陆，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罗曼·冯·恩琴-施滕伯格等人也持这种观点。雅利安人的吠陀文化起源于印度，向东迁移，通过这一运动将既定的古代宗教联系起来。他们的“人神”传统最终发展成为基督教，正如吠陀经所预言的那样。这表明雅利安传统主义在各种文化和信仰中都很盛行。它表明，印度河地区是“大洪水”之后文明的发源地，这种大洪水在全球洪水叙事中都有出现，例如基督教圣经、琐罗亚斯德教阿维斯塔斯和吠陀经。这一雅利安原则体现在不同领域的贵族所实行的历史习俗中，在我看来，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农民就是这种习俗的缩影。

亚历山大·杜金的“民族社会学”扩展了这一概念，研究了雅利安人的概念。在民族社会学层面，雅利安人的概念与德语“volk”或希腊语“λαός”（laos）相似。它代表的不是最小的社会单位，即民族，而是一种集体认同，当一个民族的孤立性被打破时，承认他人并建立起敌友关系。例子包括古希腊文明，其城邦尽管存在内部冲突，但仍认同更广泛的文化和种族认同，以及罗斯，由几个由东正教信仰和斯拉夫血统统一起来的民族组成。Narod 是多种民族的综合体，超越了个人的民族身份，同时保留了与祖先根源的联系。

雅利安民族是神话，但物质上真实存在，是人类意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其中种族的精神本质，即雅利安主体，被视为终极表达。这不是源于政治学说，而是一种非个人的、本体论上更早的原则，它促进了英雄般的雅利安民族的存在，这种民族多元但受超越统一的约束。在政治上，这与柏拉图的和谐统一与多样性观相一致，其中统一先于多样性，呼应了亚里士多德的观念。自然的重要性超越了它的功利性和物质性，

通过“规范”一词获得重要意义，它体现了所有“正常”和和谐的存在状态。这种见解不是经验性的，而必须被理解为绝对的、永恒的价值。在雅利安民族中，雅利安主体承担着国家的角色，引导着历史的进程。当黑格尔的“理想和谐”得以实现时，历史便被照亮了，而海德格尔的“此在”促成了这一条件。

雅利安主体的此在以农民为代表，反映了卡尔·施密特的土地权力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法人团体中的世界主义工人（与恩斯特·荣格的法人团体中的工人相对）和自由主义商人/海上力量形成鲜明对比。与雅利安农民不同，后者是法人团体，脱离了国家的土地，从闪族人的视角出现。

因此，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努力重建雅利安人主体，将其深深地融入国家土地的结构中，体现出照亮人类生存本身的理想状态。这种与土地的内在联系，通过农民的形象来体现，体现在纳粹的“血与土”格言中。

1948 年纽伦堡审判期间提供了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个深刻例证，据记载，主审法官要求纳粹理查德·沃尔特·达雷的辩护律师哈里斯·默克尔博士澄清“血与土”的含义。默克尔坚定地展示了健壮的农民男子在田里耕作的照片，以及精力充沛的农民妇女和他们的孩子的照片，**并宣称：“大人，这就是血与土。”**

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广阔土地上，一种新的贵族诞生了，这就是雅利安人的贵族，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正如杜金所言，“像我们的土地一样无边无际，像我们的血液一样鲜红”。

这是真蒂莱、罗森堡等思想家和北一辉等梦想家试图阐明历史的叙事。例如德国人的雅利安中心日耳曼尼亚、意大利人的罗马尼塔、西班牙人的西班牙尼达、俄罗斯人的欧亚大陆、日本人的八纮一宇、中国人的文明和印度人的阿坎德巴拉特。

这些神话中的每一个都反映了雅利安原则的独特体现，试图通过高贵而持久的原型来定义其人民与土地的联系和集体命运。这是具有帝国特征的文明国家的核心。

“雅利安人挣脱了将他与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捆绑在一起的锁链。（巴黎 1897 年）”

——阿奇尔·勒莫特

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一个人不会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者。他迟早会发现自己一直都是民族社会主义者。”——萨维特丽·德维

民族主义基于这样的观点：一个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是人类之间互动产生的契约实体。一个国家消耗食物、消耗能源并产生废物。一个国家拥有自己的过去记忆，想象自己的未来，并可以收集和分析信息以产生知识。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交流并结成友谊或敌对关系。一个国家经历着生与死的循环。一个国家可以产生后代国家。根据通常用来定义生命或意识的任何特征，一个国家确实是活生生的、有意识的。这种观点并不否认每个国家的居民都有自己的意识，但同时将民族意识视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单位**。因此，民族主义者试图将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就像与一个人一样。

“当今的学说是：社会是个人的总和——国家充其量是个人或协会的方便集合。我们可以将这种社会建设学说比作一堆石头。它唯一真实的东西是一块块石头。它的形状

是一个偶然的问题；石头在上面还是下面都无关紧要。结果就是一堆。……但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学说和国家哲学是房子。机械地说，房子也是由许多单独的砖块组成的。……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房子是一个更高的实体，是一种新奇的东西……不仅仅是一堆堆砖头的总和。”——戈特弗里德·费德

(** 按照这个逻辑，反过来也适用，因此较小规模的单位也可以被认为具有自己的意识。正如米格尔·塞拉诺所言：“对于雅利安人来说，原子从来都不是数字抽象的空洞公式。它们是侏儒。”)

广义上讲，任何致力于国家整体发展的意识形态都可以被描述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从不局限于国内任何小群体的利益，而是始终考虑行动对国内每个小群体的影响，将每个小群体视为身体内的一个内脏器官，并认为为了增强另一个器官而剥夺一个器官对身体健康毫无益处。相反，民族主义期望每个小群体在危机时刻都准备好帮助彼此，就像在年轻的身体里，强壮的器官会自动比平时更努力地帮助虚弱的器官恢复力量(而在年老的身体里，虚弱的器官得不到强壮器官的帮助，因此最终会衰竭)，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如果有人反对持续的给予会造成太重的负担，那么我们必须回答说，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团结的理念。真正的民族团结不能只存在于索取中。”民族主义将国内所有只为自身利益而非服务于整个国家的亚群体视为国家敌人，认为这些亚群体是癌症器官，会消耗其余营养物质，同时将癌症传播给这些亚群体。最著名的例子是犹太人（见下文），但它更普遍地适用于任何围绕种族身份、阶级意识、教育水平、性别、性取向、宗教排他性或任何其他心理观念建立起来的群体，这些观念最终会产生部落主义行为。这些群体的成员不能被接受为民族主义国家的公民。

民族主义的另一项原则是，一个国家不能指望也不应该等待外界的帮助（无论是其他国家还是银行或联合国等实体），而必须找到帮助自己的方法。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有义务在外部援助时总是拒绝，而是说它的任何计划都不应该依赖于外部帮助才能成功，这样它就永远不会陷入不得不接受附带条件的帮助的境地。这也不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应该牺牲自己来帮助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孤立主义、不干涉主义或对其他国家困境的漠不关心，最重要的是，它并不意味着只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相反，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国家，会鼓励其他国家也不要永远依赖外界的帮助，而向它们提供一切可能的短期援助，以使其最终获得长期的独立，正如希特勒所说：“一切社会活动的目的绝不能仅仅是慈善救济，这是荒谬而无用的，而必须成为一种消除我们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根本缺陷的手段。”

（在这种态度上，民族主义与身份主义（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完全不一致，后者宣称：“它为自己的人民做出决定，而不考虑对他人的影响。”身份主义是部落主义的，而民族主义是反部落主义的。当今许多极右翼分子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他们的文盲，也证明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地混淆了政治话语的词汇。）

民族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原则，而是一个可以服务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执行原则。资本家可以成为民族主义者，只要他相信吸引资金流入国家，而不是像国际资本家那样追随资金流向世界各地。同样，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者的目标是在国内实现财富分配的均等化，而不是担心在不同国家之间实现财富分配的均等化。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者的目标是让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既能向内又能向外投射权力的国家，而不仅

仅是后者。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者的目标是让整个国家实行最小政府，而不是容忍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有更多的政府。等等。

“希特勒……不仅认识到民族团结高于一切的必要性，而且愿意竭尽全力追求社会正义。”——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

社会主义认为，国家干预对于切实打击社会不公至关重要，国家有道义上的责任进行干预。社会主义基于这样的观点：无国家制度（例如自由市场）不利于真正的才能，有利于非基于才能的竞争优势，因此，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向制度中增加规则来解决，而这些规则的制定是为了促进才能，其作用是消除非基于才能的竞争优势。 犹太人外邦人因此，任何选择不遵守这些规则的人都是功绩的敌人，因此必须被关进集中营被宣布为不法之徒的人也不再像公民一样受到规则的保护。

“民族社会主义政府的目标是鼓励人类的崇高变革和进一步发展，使他们不断进步，走向更高尚的生活方式，建立高尚而公正的秩序。这包括为个人与生俱来的高尚品质的出现和绽放创造有利条件。” – 大卫·迈亚特

所谓社会不公有许多不同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又源于许多不同的功绩概念。例如，民主社会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认为是对多数人实施的不公，其国家主义补救措施就是给予多数人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即使这涉及到压迫少数人。它认为多数人不可能对少数人实施社会不公，因为多数人的意见定义了功绩，少数人应该闭嘴并顺从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只认为是对无产阶级实施的不公，其国家主义补救措施就是从非无产阶级那里拿走东西给无产阶级。它认为无产阶级不可能对非无产阶级实施社会不公，因为功绩完全等同于成为无产阶级。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无产阶级也是多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就会相吻合。

（身份主义（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绝不能归类为社会主义，即使它采用国家主义手段来推进其议程，因为它首先不是基于社会正义，而完全基于群体利益。例如，犹太人倾向于指责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反犹太主义者”，而不是“不公平”（误导但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指责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本身就表明犹太人根本不关心公平，一切都是为了促进犹太群体的利益，无论公平与否。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那些复制了这一伎俩并指责批评者“反[插入非犹太人群体]”的非犹太人。）

民族社会主义认为所有人都遭受不公正对待。从最根本的层面上讲，只要出生，我们每个人就自动地、终其一生都是不公正的永久受害者，因为我们没有人选择出生。承认这一显而易见、无可辩驳的事实的勇气（“整个生命都是一个永恒的危险，而出生是其中最大的危险。”——阿道夫·希特勒）将民族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尽管所有其他社会主义迟早都会趋向乌托邦主义，但民族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通过这种承认来否定乌托邦主义（一种错误的左派思想），从而将自己提升为一种真正的末世论意识形态，与古代（真正的左派）泛诺斯替宗教相提并论。

“我们甚至不会简单地相信会有一个没有缺点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用为消除我们已经认识到的缺陷、克服不足和努力实现理想而奋斗。”——阿道夫·希特勒

因此，在上下文中，所有其他形式的不公正都被理解为发生在这种主要不公正的受害者之间的次级不公正，这与将其视为发生在没有共同压迫者的人之间的不公正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作为同一监狱中的囚犯，我们一开始都站在同一边；我们之间唯一

有效的敌人是那些选择“出卖”并站在我们囚犯一边的人，他们失去了对其他囚犯的同情，因此他们从囚犯降格为奴隶（囚犯很可能会因此奖励他们控制其他奴隶）。这种观点——经常被批评者抹黑为“悲观的”——实际上是前所未有的积极，因为它不仅使以前习惯于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的人们之间建立新的融洽关系，而且在逻辑上要求通过一种同时解决主要不公正的方法来处理次要不公正的政治问题，换句话说，通过国家控制生育的方法——用经典的社会主义术语来说，就是增加以促进优点为目的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是关于遗传学的。

从这个最激进的意义上讲，民族社会主义不仅仅意味着“民族主义加社会主义”，而且在语法上更准确地意味着“与民族有关的社会主义”，这最终意味着“与诞生有关的社会主义”（见后面的部分）。民族社会主义通过承认所有泛诺斯替宗教都独立认识到的完全相同的主要不公正而与它们平起平坐；它超越所有泛诺斯替宗教的地方在于，它是唯一提出现实的普世救赎战略的意识形态。诺斯替教徒提供愿景，而民族社会主义者则采取行动。诺斯替教徒逃跑，而民族社会主义者反击。诺斯替教徒终结自己的血统，而民族社会主义者则准备终结所有拒绝自我终结的血统。

“雅利安军队从这个宇宙的边界之外渗透进来，他们是战士和女战士。为了在造物主的四个领域“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推翻了整个恶魔计划。”——米格尔·塞拉诺

指导原则

“它拒绝一切原则，也拒绝在其自身结构中拒绝一切原则，即根据多数人的投票做出决定，并且根据这些原则，领导者只是他人意愿和意见的执行者。该运动规定了这样的原则，即在最小和最大的问题上，一个人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并承担所有责任。在我们的运动中，这一原则的实际后果如下：一个大团体的主席由其上级团体的负责人任命。然后，他就是该团体的负责任的领导者。所有委员会都受他的权威管辖，而不是他受他们的权威管辖。没有投票的委员会，只有工作的委员会。这项工作由负责任的领导者，即团体的主席分配。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上级组织 – Bezirk（区）、Kreis（城市巡回区）和 Gau（地区）。在每种情况下，主席都是从上级任命的，并被赋予全权权威和执行权。 …该运动的最高职责之一就是使这一原则不仅在自己的队伍中成为必需，而且在整个国家中也成为必需。”——阿道夫·希特勒

民族社会主义最看重的是个人性格。乍一看，这可能与民族社会主义“人口就是命运”的立场相矛盾，但仔细观察后，你会发现这其实是同一立场的一部分。个人带来了积极变化的潜力（消极变化不需要个人的启发），而人口统计学又决定了这种潜力能够实现的程度。正如希特勒反问道：“有人真的相信人类进步源于大多数人的综合大脑，而不是个人性格的大脑吗？”民族社会主义者将整个历史视为少数英雄理想主义者与传统流行规范之间的道德斗争。雅利安人种理论只是增加了这样一个命题，即这些理想主义者之所以成为他们自己，是因为血统。

“在一个被体面人视为必要之恶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些谴责奴隶制的人……对于那些认为古老的动物剥削是正常现象的人来说，仅仅因为它几乎普遍存在，与人类一样古老，我们应该说，今天有人强烈反对它——不管他们是否只是数百万仍处于进化更野蛮阶段的人类中的少数人。今天，有一些远远走在我们时代的前列的男男女女，他们

敏锐地感受到所有剥削的令人厌恶的不公正……所有无端施加痛苦的恐怖。……这些人现在是“梦想家”、“古怪的人”、“怪人”——就像所有先驱者一样。但谁能说他们的观点永远不会成为普通人的观点，他们的原则永远不会成为世界的法律呢？”——萨维特丽·德维

因此，将民族社会主义称为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准确的，但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义几乎与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无政府主义概念中所谓的“个人主义”完全相反。任何真正的个人主义概念都不会也永远不会意味着每个人都表达个人，原因很简单，当同一个社会中的每个人同时尝试表达个人时，结果就是相互束缚，因此任何人都无法表达个人。真正的个人表达只有当每个社会只有一个人（根据定义，即领导者）表达他的个性时才能实现，而同一个社会中所有真诚的个人主义者的责任就是支持这位领导者，使领导者的个性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因此，激进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事实上也与）自我中心主义相反；激进的个人主义者纯粹希望看到个性得到最大程度的表达——不一定是自己的个性。这正是流行文化偶像（音乐家、演员、运动员、虚构人物等）的狂热粉丝的态度，他们觉得自己生命中最大的甚至唯一的意义就是支持自己所献身的偶像的个人表达，无论是通过经济资助，还是通过制作粉丝作品、参加粉丝活动和提供粉丝反馈，他们为了做到这一点，放弃了自己的大部分个性。政治上的激进个人主义者始终是绝对君主主义者，他们（除非他碰巧是领导者本人）会认为寻找和找到一位值得服务的领导者是自己人生的使命，使自己成为领导者人格的延伸，就像流行文化粉丝通过上述过程使自己成为偶像人格的延伸一样。正如鲁道夫·赫斯简洁地说的那样：“希特勒就是德国。”

从词源上讲，“folk”一词源于“follow”，因此与如今流行文化中常用于描述某个偶像的粉丝群的“following”（名词）含义相同。在这种世界观中，状态只是让领袖的追随者（即“folk”）帮助领袖表达个性的最有效机制的总和。而且，就像真正的铁杆粉丝不负众望，随时准备为他的偶像献出生命，毫无疑问，真正的政治个人主义者也同样准备为他的领袖献出生命。民族社会主义与年轻人结盟并非巧合（“希特勒青年团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是纳粹德国唯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组织。” - 约瑟夫·戈培尔），因为粉丝热情与年轻人的热情最为密切相关，并且随着大多数人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在政党中表现得最为粗俗的对平等的疯狂信仰已不复存在。个性原则取代了大众愚蠢的观念。”——约瑟夫·戈培尔

真正的领导者不应该代表民意。

真正的领导者要求青年对自己忠诚，而不是对他们的家人忠诚。

真正的领导者应该代表原始的高贵品质。

进一步阐述激进个人主义的精神，一个真诚希望看到个性得到最大限度表达的人，不会愿意追随那些不具备杰出个性的人。因此，个人主义世界观中的领导者永远不会是传统主义者，个人主义世界观中的追随者也永远不会是传统主义者，因为传统主义只对那些不尊重个性的人有吸引力。激进个人主义者希望看到个性的表达永远且永远与传统相反，后者总是由规范而不是例外决定。此外，激进个人主义者将个性定义为与身份相反（“个性（意志加理性）是一种代表人的精神力量，与物质相反。……人格（本能加理解）是人的主体及其利益。” - 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后者总是由我们

在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被置于预先存在的角色决定，而不是由我们自己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真诚的精神决定。因此，衡量个人性格的一个很好的标准就是看他蔑视传统束缚的程度（身份是传统的一个方面），因此，浅薄的性格只是表面上反传统，而深厚的性格则是从思想的根本上反传统的。（“真正的性格起初充满敌意地面对要改变的对象，然后后者被迫服从正式的意志。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性格风格就形成了。”——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因此，在我们眼里，所谓的“传统主义领导者”根本不是领导者，而只是家长式的平庸之辈，或者——更直白地说——奴隶长官。

因此，激进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只为领袖”——既反对现代伪左派的虚假“人人皆有个人主义”，也反对所有右翼意识形态的“个人主义不为任何人”的传统主义和家长式的独裁主义，因此是真左派独有的态度。古典柏拉图主义关于“哲学王”的思想在形式上与我们对领导力的概念很接近，但浪漫主义影响下的民族社会主义更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它把领袖想象成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从而进一步强调了个人个性的重要性。希特勒就是这样的一位领袖，而民族社会主义是一场由具有艺术同情心的人发起的运动——考虑到这一点，民族社会主义领袖和流行文化偶像之间的比较就变得更加类似了。这样的领导者不应该关心自己在追随者中的受欢迎程度，否则他就不再领导追随者，而是堕落到做他们想让他做的事情，从而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领导者（甚至不是一个个人）。相反，作为一名艺术家，领导者的唯一职责就是坚持他的艺术愿景。

“国家组织必须建立在人格原则之上，从最小的细胞开始，一直到国家的最高政府。没有多数票做出的决定，只有负责任的人才能做出决定。‘理事会’一词再次恢复了其原有的含义。每个担任职务的人身边都会有议员，但决定权只能由该人自己做出。”——阿道夫·希特勒

“如果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未能理解这一基本原则的根本重要性，如果它只是粉饰当前国家的外表并采用多数原则，那么它实际上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与马克思主义竞争。因此，它没有权利称自己为世界主义。如果该运动的社会纲领包括消除个性并让大众取而代之，那么民族社会主义就会被马克思主义的毒药所腐蚀，就像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阿道夫·希特勒

将这样的领导者描述为暴君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不会强迫任何人为自己服务——这种想法本身就和流行文化偶像强迫任何人成为他们的粉丝一样荒谬。在现实中，许多国家和许多领导者，所有追随者都应该被允许选择为他们喜欢的任何领导者提供服务，并在必要时迁移到相应的国家，以便与其他追随者一起为他们选择的领导者服务。促进有抱负的追随者自由迁移的过程对领导者来说是互惠互利的，因为它会将每个领导者与最忠于自己的追随者匹配起来。一个相信自己可以成为比任何现有领导者都更好的领导者的人，也会尝试通过自己的方式成为领导者。只有在追随者自愿宣誓效忠后，他才会有义务为领导者服务，直到他去世或直到领导者解除他的誓言。民主是暴虐的，它迫使大量公民容忍他们不忠诚的民选政府，其借口是：1）他们输掉了选举；2）他们可以在几年后再次投票。

民族共同体

“我们的经济原则是：国民经济的职责是提供生活必需品，而不是为资本获取最高的利润。”——戈特弗里德·费德

“我们对于社会主体的原则如下：公共福利是所有人的最高法律。我们的这一原则与当今的做法截然相反，根据当今的做法，每个阶级都试图为自己的特定群体谋取利益。”——戈特弗里德·费德

对民族社会主义来说，领导者如何对待民众，民众如何对待彼此，同样重要。在这方面，流行文化偶像和粉丝群的类比仍然有用。

流行文化偶像显然希望他的粉丝们能够保持最佳的个人状态，以便欣赏他的作品。如果一个粉丝饥饿或无家可归，或者难以支付账单，或者尽管工作时间很长却仍然负债累累，或者必须应对慢性疾病，或者时不时地受到诉讼的压力，或者被日常琐事所困扰，这些琐事占据了他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注意力，那么他不太可能有时间和精力，甚至没有心情将自己奉献给他的偶像，无论他理论上多么希望这样做。在民族社会主义制度下，追随者与领导者的关系也是如此，只不过领导者——作为政治家——能够通过国家举措积极改善追随者的生活条件。因此，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人的最初目标是确保他的追随者拥有足够的身心健康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和公民保障，同时让他们免受不必要的官僚主义的困扰，以便追随者可以重新做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提供粉丝支持。

“填写表格是现代文明人类的国际职业之一。”——萨维特丽·德维

“想到有一天我可能会被束缚在办公室的凳子上，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而不得不将一生的时间都花在填写表格上，我就感到恶心。”——阿道夫·希特勒

“表格和问卷应尽可能减少。人们没有时间在某种荒谬的表格上写下他们的整个简历来获得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东西。人们应该通情达理，只要求他们提供必要的信息。” –约瑟夫·戈培尔

“民族社会主义法律……不承认‘专业律师’或‘律师’的绝对必要性，认为这种必要性是不光彩的……所有程序都应该让普通人能够理解。”——大卫·迈亚特

只有人才能帮助人。官僚主义从来都没有帮助过任何人。

当然，一个人必须愿意提供帮助。

但是，民族社会主义旨在减轻民众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担忧，因此它不鼓励民众追求超出舒适范围的富裕生活。正如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会削弱粉丝的热情一样，无限利润的诱惑也会分散粉丝的热情。这就是为什么高能投机者、企业家等很少会成为流行文化偶像的铁杆粉丝：他们对金融趋势的密切观察和以有利可图的机会主义为目的的社交消耗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他们因关注而立即获得奖励，因疏忽而受到惩罚，因此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都远离了对个性的思考。民族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严格禁止除通过生产劳动获得的收入以外的收入，同时保护诚实工人的储蓄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也是建立民间栖息地的一部分，这与资本主义诱惑的存在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但简朴的生活反而最有效。

“将我们的人民重新组织成一个包括所有劳动生产者的国家单位，这完全推翻了旧的雇主和雇员组织。”——阿道夫·希特勒

我们在黄金时代所拥有的一切。

简单的生活最好！

按照这种思路，当流行文化偶像的粉丝们感到他们之间即使在粉丝圈内也存在竞争时，他们也无法为粉丝提供支持，因为这会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偶像本身转移到粉丝群内部的竞争上。当每个粉丝都尽其所能帮助其他粉丝支持偶像时，粉丝群就会蓬勃发展，但当一些扭曲的粉丝试图限制其他粉丝的支持，以防止他们提供比自己更多的支持时，粉丝群就会萎缩。同样，在民族社会主义下，民众也是如此。因此，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人有责任向每一位真诚的追随者灌输一种对民众有价值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不需要降低其他同样真诚的追随者的价值。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依靠平等主义的（错误）前提来支持这一点，但拒绝平等主义的民族社会主义依靠公民权原则。两个人不平等并不重要；两人都是公民，这一简单事实意味着，两人都是领导者乐意接纳的民众，两人都是领导者宁愿在场也不愿缺席的人，任何公民只要知道这一点，就能对其他人抱有友善的态度。

平等主义主张以平等为基础的团契，实际上却暗示不平等是拒绝团契的充分理由。因此，它给自己设置了反弹（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设计它的目的）。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团契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生活必然会把我们分成许多群体和职业。克服这种分歧是国家政治和精神教育的任务。这项任务首先分配给了劳工服务部门。其职责是将所有德国人团结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社区。为此，让我们把同一个工具放在所有人手中，一个国家最尊重的工具，铁锹。”——阿道夫·希特勒

公民身份与国籍不同。“国家”一词的词源来自词根“natus”，意为“出生”；人们出生在同一个国家，因此拥有在该国成长的共同经历，因此是同胞。（那些声称共同国籍需要共同种族的种族主义者再次表明了他们的文盲。）另一方面，“公民”一词的词源来自词根“civitas”，意为“联邦”；人们为同一个国家增添价值，因此在该国拥有共同利益，因此是同胞。对于流行文化的比较，偶像的粉丝应该不仅仅是偶像的观看者/订阅者——粉丝应该积极参与粉丝作品，从而补充偶像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享受偶像的影响。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希望国籍能够成为公民的充分动机，使每个国民都成为公民，但非国民当然也可以成为公民，而那些没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国民（以及那些自己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但却试图阻止其他希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这样做的扭曲的国民）肯定不会成为公民。

“公民身份不应该是与生俱来的礼物，而应该通过劳动获得。只有履行职责和为民族荣誉服务才能授予这一权利。因此，我们必须将授予公民身份作为仪式来代替确认。只有为某事做出牺牲后，人们才会愿意为之奋斗。这最后一项措施也将自动将那些最能有机地服务于我们民族最高价值的种族因素推到前台。” – 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

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严格定义贡献，设定每个人获得公民身份所需的最低贡献量，并建立衡量贡献的制度。同样，这并不复杂，概念上与经营粉丝俱乐部无异。贡献的定义越有目的性，公民身份所需的最低贡献量设定得越明智，衡量贡献的制度越公平，国家就越能成为称职的民族社会主义管理的典范。

栖息地

“对自己空间、对自己面包的渴求，是实现精神价值的先决条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

但是，为了让领导者充分表达自己的个性，即使只有民众的绝对忠诚的支持通常也是不够的。正如流行文化偶像不是其背后艺术家的真正表达，除非该艺术家本人拥有与特许经营相关的所有相关生产资料（理想情况下完全由粉丝组成），因此不依赖中介机构来接触粉丝群，所以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要求领导者绝对拥有民众的生活空间，以便建立可靠的经济自给自足和政治自治。一旦围绕特定领导者形成，民众的最初使命就是建立这样的生活空间。在这方面，民族社会主义展现了其从根本上雅利安人的根源，因为史前游牧狩猎和放牧的人群拥有对人类的统治权——在放牧的情况下，拥有羊群形式的可交易资产的所有权——但没有固定地理领土的统治权（因此不是雅利安人理解的真正的政治家），后者是与自给农业相关的定居生活方式所独有的。因此，游牧民族的族长/女族长总是迟钝的传统主义者，因为无论他们表面上多么富有和强大，他们永远在游牧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缺乏深刻的经济信心，无法想象彻底摆脱世世代代以来一直为他们带来成功的传统社会态度。对游牧民族来说，社会成功和经济成功并不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而是同一个概念。反传统所需的深刻信心只有在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分离时才会产生，而这种信心是纯种雅利安人独有的，他们生活在保证之下，他们只需要警惕地保管和勤奋地照料他们的农田和水道，就能获得像阳光一样有保障的食物。对雅利安人来说，所有其他问题都是伦理和/或美学问题，需要用高尚的人格来回答。

“在民族社会主义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作为社会基础的政治基础设施和机构时，只有光荣而高尚的人才能承担起治理和管理新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责任。”——大卫·迈亚特

政府对土地的管辖权本身不足以使其成为居住空间。土地及其相关的所有物质财富必须被定义为从根本上属于领导者，因此领导者理论上可以随时征用其中的任何部分。在民族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公民都享有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制度不同），但应该理解的是，居住空间内的所有私有财产只是由领导者以不同的方式委托给不同的公民，由领导者代表领导者进行管理，这是基于领导者无法通过国家行政同时处理所有财产的实际考虑。希特勒最喜欢用的例子来解释这一概念，即国家将允许公民在国内拥有农田，但前提是该公民继续从这片农田中生产足够的食物来养活依赖它的当地社区；否则，领导者最好在人们开始挨饿之前迅速将其没收并交给其他更有生产力的人！因此，财产（源于“proprietas”，意为“特殊”）与归属（源于“be-” + “lang”，意为“伴随”）有所区别；前者是公民的义务，后者是领导的义务。这可以防止堕落为封建主义，在封建主义中，土地所有者可以作为寡头集团密谋利用经济杠杆干涉政治。

因此，唯一有效的货币概念是，货币的价值由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保证，并仅限于在同一国家管辖的领土内流通。不仅国家必须是货币的唯一发行者，而且用于实物货币的材料本身也应该尽可能没有价值。例如，金币或银币是极其糟糕的货币选择，因为即使在最初铸造硬币的国家垮台后，它们也可能被熔化成无铸币的金条，并以材料的价值出售，这意味着货币与国家分离。纸币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一旦国家垮台，纸币就会立即变得一文不值（除了用作卫生纸），从而将国家货币的命运与国家本身的命运

联系在一起，从而消除了当情况开始恶化时，人们拿着钱逃离国家的可能性。更好的选择是使用秒表之类的设备来测量劳动成果，并将其直接转换成货币（甚至不能用作卫生纸）。希特勒本人以用劳动时间形象化金钱而闻名："自从我们掌权以来，我们已经在国家生产过程中取代了大约五百万人。这意味着，我们为德国人民提供的每个工作日比他们以前平均多三千万到四千万小时的工作时间。这是他们的救赎。在个别情况下，这些劳动力用于何种生产并不重要。总的来说，一年内，我们为国家提供了大约九十亿小时劳动的成果。"显然，货币伪造的危险仍然存在，警察部门必须将其作为刑事问题来应对，但至少外国势力向市场投放贵重材料的危险被消除了。

"从我放弃金本位制的那一刻起，尽管我仍有大量失业者可供支配，但我没有遇到任何财政问题。我必须支持七百万全职失业者和四百万兼职失业者。这需要五十亿的预算。如果德国国防军从一开始就乐于接受我们自己的合成和补充原材料，而不是坚持从国外进口，我们应该可以节省数十亿的海外支出。"——阿道夫·希特勒

自给自足是生存空间的基础。

自给自足是否已经实现的唯一检验标准是 100%依赖国内生产。

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不得承认适用于其政权的国际法。没有执法就没有法律，因此在国家领土上承认国际法就等于承认一个管辖范围延伸到国家领土的外部执法者。承认这一点的国家已经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外国势力的隐性殖民地。这就是希特勒所说的话背后的意义："我绝不愿意让外国政客在德国心脏地带建立第二个巴勒斯坦。"话虽如此，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努力维护基于荣誉和同理心的外交关系。它绝不能认为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在道德优先级上低于本国公民，但必须毫不留情地惩罚本国公民，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如果本国公民以任何方式虐待其他国家的公民——不是因为它担心未能这样做会受到国际谴责，而是因为它真心希望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消除本国内部的部落主义。这一原则的例外是，如果外国公民是以色列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自己的人民中提倡部落主义，那么针对他们的一切暴力行为都可以看作是报复性的，因此自然是合乎道德的。

除了对部落主义国家采取报复性暴力的想法之外，对于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占领部落主义国家的领土是完全合乎道德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英雄的责任。以色列部落主义国家被纳入其领土，不是作为殖民地，而是作为直接的领土吞并，所有居民都适用与原领土完全相同的法律，并采取国家举措（例如生命源泉之家）促进多民族融合，根据基于雅利安标准的血统质量。特别是被吞并领土的儿童，除非被怀疑携带潜在的部落主义血统（见下一节），否则应有机会重新开始，而不受父母传统上强加给他们的身份包袱（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将这一政策称为"纳粹偷孩子"，好像孩子曾经属于那些未经他们同意而生下他们的人）。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占领其他非部落主义国家的领土才是不道德的。

"一个民族拥有的领土越大，其国防就越强。与拥有广阔领土的国家相比，对一个领土有限的民族，军事决策可以更快、更轻松、更彻底、更有效地获得。此外，一个国家领土的规模本身就是一种保证，外部势力不会仓促冒险入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取得胜利之前，斗争必须是漫长而艰苦的。风险如此之大，必须有特殊原因才能进行这种侵略性冒险。因此，一个国家的领土规模为国家自由和独立提供了相对容易维

护的基础；相反，领土较小的国家对侵略者来说是一种自然的诱惑。”——阿道夫·希特勒

这样，我们设想的和平时代，所有部落主义（即“在时间中”）国家都将被消灭，普遍主义但非英雄主义（即“超越时间”）的国家将保留对原有小块领土的统治，但普遍主义和英雄主义（即“对抗时间”）的国家将统治更大的领土，并因此拥有最强大的防御能力，抵御入侵，这是他们为了理想而战的意愿所当之无愧的。

“抵御犹太人的威胁只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当它成为讨论民族社会主义的唯一问题时，那是犹太人的错，不是我们的错。”——约瑟夫·戈培尔

纵观世界历史，许多非犹太国家，包括许多与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其他共同点的国家，都曾试图解决犹太人问题。因此，尽管从定义上讲，只要世界上还活着一个犹太人，就不可能不积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国家针对犹太权力采取的反制措施本身并不意味着该国是“民族社会主义者”（因为过分热心的测量员倾向于称呼任何公开反对有组织的犹太人的国家）。反对犹太人可以基于多种推理，其中只有少数与民族社会主义相容。一般来说，任何旨在促进自己（非犹太人）群体利益的反对犹太人的行为都与民族社会主义不相容。只有将反对犹太人视为纯粹的责任——在必要时愿意集体自我牺牲以确保消灭敌人——才与民族社会主义相容。

“很难想象有比斯宾诺莎更大胆、更直言不讳的世界观；但他的伦理观连猪都会感到恐惧。‘凡事求是’是他的道德哲学的精髓——真正的犹太观点。”——迪特里希·埃卡特

“再也没有人敢说我们在这里发言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德国人民在过去五年中做出了牺牲，因为他们认识到世界面临的危险，因此有权就此事发言。”——约瑟夫·戈培尔

因此，所有严肃的民族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对犹太教、犹太文化和犹太历史至少有一定的了解。对犹太法律细节的详细了解并非必不可少，但需要对其背后的广泛原则有概念性的理解，这样才能清楚地看到其在犹太人行为中的持续实际应用。

“犹太人对所有危险都免疫：人们可以称他为恶棍、寄生虫、骗子、奸商；这些都像雨衣上的水一样对他不屑一顾。但如果你叫他犹太人，你会惊讶地发现他是多么退缩，他是多么受伤，他是多么突然地退缩：‘我被发现了！’”——约瑟夫·戈培尔

“犹太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他开始将商业领域和所有货币交易视为专属于他自己的特权，并对其进行了无情的剥削。在这个阶段，金融和贸易已成为他的完全垄断。……当他将地产纳入商业商品并将土地贬低为市场商品时，他的罪恶之杯已满溢。由于他自己从未耕种过土地，而是将其视为可供剥削的对象，农民仍可以留在土地上，但前提是他必须服从新主人最无情的勒索，公众对犹太人的反感逐渐增加，并最终演变成公开的仇恨。……尽管公众对这个永恒的奸商怒不可遏，并将他赶走，但几年后，他又出现在那些地方，继续像以前一样生活。任何迫害都无法迫使他放弃剥削他人的行业，无论多少骚扰都无法永久地将他赶走。他总是过一会儿就回来，而且他总是重复老一套。”——阿道夫·希特勒

与许多其他反对犹太人但不一定反对犹太教教义的犹太敌人不同，民族社会主义者首先对犹太教感到极为震惊，并且反对犹太人只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犹太教的化身。

我们强烈反对和谴责在了解犹太人的犹太基督教徒和各种右翼分子中流行的错误观念，即犹太教仅指所谓的“拉比犹太教”，而《塔纳赫》不知何故不属于犹太教（!）。相反，我们认为，除非一个人反对《塔纳赫》（“锡安”一词本身就源于此），否则不能可信地称自己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

“所有犹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庆祝路德，而忽略他的反犹太主义。他无意中为他们铺平了道路，而且他这样做了！他们越是赞美他的权威，世界就越不会注意到他的错误。”——阿道夫·希特勒

“犹太人戈德曼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理由。‘路德再次让旧约受到尊崇。’……甚至路德也被‘选民’所欺骗。他把旧约视为神的启示。他痴迷地读着这本书，确信它除了纯粹的珍贵之外什么都不能包含。”——迪特里希·埃卡特

“他看待犹太人的方式，就像我们今天才开始看待他们一样。但不幸的是，为时已晚，而且即使那时，他也没有在基督教中看到他们，而基督教正是他造成最大破坏的地方。哦，要是他只在那里看到他们就好了；要是他只在年轻时看到他们就好了！那么……他就不会赞美《旧约》，而是会把它打上反基督者的烙印。”——阿道夫·希特勒

这并不是说民族社会主义者认为犹太教只是宗教问题，因为我们相信犹太人在种族和宗教上都表现出犹太教，这是数千年来持续不断的选择压力的结果，这些压力倾向于与犹太教相容的遗传特征，因为犹太人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一直抵制融入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因此，一个宣称放弃犹太教的犹太人并不一定不再是犹太人。（很可能这样的犹太人正在向秘密犹太人转变。）希特勒对他同时代人中那些认为犹太教只是宗教信仰的人表示愤怒：“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几滴洗礼水就可以解决问题，从此犹太人仍然可以安全地继续他的生意。……整个运动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次新的试图改变犹太人的尝试。”如果任何已知具有犹太血统的人希望我们相信他不是犹太人，他不仅必须放弃犹太教，还必须自愿停止繁衍，从而表现出对逐步消除种族和宗教犹太性的认真承诺。

但迄今为止，在极右翼组织的非犹太人运动中，最流行的毒害思想——主要是那些想要建立自己的非犹太人民族国家的人——是，只有散居犹太人才是问题，而以色列根本不是问题（甚至是一个积极的东西!）。相反，民族社会主义者公开反对以色列，正如希特勒所解释的那样：“他们丝毫没有打算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便在那里生活。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中央组织，进行国际诈骗和欺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其他国家无法控制它。因此，它可以成为被发现的骗子的避难所，同时也是训练其他骗子的学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或容忍散居犹太人，但从战略上看，在先摧毁他们的基地以切断他们的退路后，处理散居犹太人将变得容易得多。极右翼的替代计划包括保留以色列并迫使所有目前流亡的犹太人移居到那里，这不仅对巴勒斯坦人和该地区的其他居民来说是不可原谅的残忍，而且非常不切实际。除了不切实际地假设每个流亡犹太人都能被非犹太人成功识别（忽略世界上秘密犹太人的绝对数量，尤其是那些渗透到极右翼领导层的人）之外，它还低估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持续进展。魔像制作技术（忽略犹太人的平均智商至少比非犹太人高出一个标准差的事实，更不用说以色列（通过犹太秘密间谍）可以接触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新技术发展，而世界其他国家无法接触到以色列的新技术发展），最终可能使以色列在军事技

术上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以至于犹太人有朝一日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可以征服地球。我们拖延消灭以色列的每一天，都会减少我们最终尝试时成功的机会。
如果……（而且，在我看来，老款甲壳虫看起来更好。）

综上所述，民族社会主义者对待犹太人的最后一个显着特征是我们坚定不移的雅利安原则，即公平对待个人，仅基于他们自己的行为，这包括犹太血统的个人，也包括其他任何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将犹太人关押在集中营中，其中许多集中营（与犹太复国主义盟军的宣传相反）以提供给居民的舒适程度而著称，包括游泳池、运动场、图书馆、剧院和其他与度假营中常见的设施相当的便利设施。所谓的“毒气室”的实际功能是维持被关押人群的洗衣卫生。作为犹太血统的携带者，他们必须像任何其他携带遗传疾病的群体一样被隔离，以防止疾病的延续和蔓延；作为人，民族社会主义的政策从来不是为了虐待而虐待他们，在我们未来的政府中也不会这样做。所有拒绝放弃犹太身份的犹太人将被剥夺公民身份，并因加入秘密社团（严格来说，犹太社团就是秘密社团）而被以叛国罪关入监狱。另一方面，所有放弃犹太教、自愿放弃生育、且没有其他不光彩行为记录的犹太血统人士，都将得到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保障，有权作为被隔离的公民（即住院病人，而不是刑事犯）安全有尊严地度过余生，此外，他们死后还将被追认为雅利安人。特别是，犹太父母的年幼孩子将得到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所能提供的一切可能的善待，因为他们是犹太身份的第一批也是最无辜的受害者。而犹太父母们肯定会因他们无可估量的罪恶（通过生育而给世界带来恶果，通过生下他们并把他们当作犹太人养育而给自己的孩子带来恶果）而受到比他们应得的更少的惩罚，因为即使是地狱里无休止的折磨对他们来说也不够。然而，他们将被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以低预算判处最高刑罚。
（所有这些为与犹太人打交道而制定的原则，理论上也适用于处理未来可能不幸出现的世袭部落制外邦群体（及其宗教）。）

“这是德国人可以倾尽全力追求的最崇高思想。它使德国民族成为团结的礼物，赋予德意志帝国新的内涵。它是一种社会哲学，是一种血腥的文化洁净理想。民族社会主义被其创始人最信任的人滥用，最终士气低落。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在历史上与此有关。但这一思想本身就是行动和生命，这一点不能也不会被忘记。正如其他伟大思想有高度和深度一样，民族社会主义也将在某一天在新一代中重生，他们被悲伤所磨练。”——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

尽管纳粹德国在二战中被摧毁，但在其短暂的历史中激发其精神能量的二战后世界仍然熠熠生辉。对魅力十足的流行文化偶像的关注成为集体心理的一部分，而二战前从未如此。大众娱乐媒体的每个领域——文学、音乐、戏剧等——都异常而耀眼地蓬勃发展，一个又一个杰作似乎毫不费力地问世，以至于它们的美感确实经常被当代消费者视为理所当然。犹太人试图将艺术方向引向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的积极尝试并没有成功；到了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英雄人物和浪漫主题重新成为流行文化世界的焦点。 （“瓦格纳想要的是：一种作为宗教的艺术……他并不是在崩溃的状态下说：我不再理解这个世界了。相反，他希望创造另一个世界……即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感到自己与拜罗伊特理念的形式相疏远或对其毫无同情，但这种理念一直是野蛮时代真正的生活源泉。” – 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犹太人在现实生活中向非犹太人兜售平

等主义，但流行文化偶像越来越成为闪亮个人个性的典型例子（顺便说一句，通常是为了藐视身份）。犹太人在现实生活中向非犹太人兜售性滥交，但流行文化越来越多地颂扬纯洁、贞洁、忠诚且常常无法实现的爱情（顺便说一句，经常是为了藐视传统）。犹太人在现实生活中向非犹太人兜售道德相对主义，但流行文化却日益推崇正当复仇和逾期惩罚（顺便说一句，尤其是针对部落主义者）的绝对道德美。犹太人无法阻止这些趋势，就像他们 2000 年前无法阻止基督教一样，于是他们就狡猾地转而为这些趋势邀功（!）——新纳粹分子也相信这一点（!!）——他们荒谬至极地声称这些趋势是出于对所谓“大屠杀”中所谓的犹太受害者的同情。不，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趋势是出于对文艺复兴后西方文明 500 年恐怖历史中全球受害者的同情，以及——尽管大多数有这种感觉的人并不知道——对世界上最伟大的反对者：希特勒本人的同情。拥有雅利安血统记忆的人们从几十年前他的阿罗汉人格所带来的惊天动地的影响中感受到他的阿罗汉人格的接近性，渴望将其作为他们理想主义的化身，但他们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者关于“纳粹”的谎言，因此从来不知道他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人格，于是将流行文化偶像作为想象中的替代品。

这是唯一一种能够解释民族社会主义兴起和二战后流行文化趋势发展并非截然不同的现象，而是同一现象的两种形式的叙述：通过高贵实现统一。19 世纪艺术中的浪漫主义运动为 20 世纪初政治中的民族社会主义聚集了能量（希特勒明确承认了这一点，认为瓦格纳对他的运动产生了影响）。由于战争失败，其政治出路被削弱，这种能量在 20 世纪末又被回收到艺术中，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但叙述不必就此结束。现在是 21 世纪。当今世界各国迫切需要这种能量来再次激发政治，以统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的社会。如果能获得这种能量，那将是我们。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拥有正确的历史叙述，还因为我们确信我们拥有正确的历史叙述，我们愿意从希特勒未竟的事业中继续前进，并向世界证明这一点——你和我们在一起吗？

法西斯之教条 贝尼托-墨索里尼

与任何坚实的政治概念一样，法西斯主义是实践，也是思想，是一种行动，其中蕴含着一种理论，一种从特定的历史力量体系中产生、嵌入其中并在其中运作的理论。因此，它的形式与地点和时间的偶然性相关，但同时又具有理想的内容，将其提升为思想史上的真理公式。如果我们不了解作为我们行动基础的短暂而特殊的现实，也不了解作为前者存在和生命的永久而普遍的现实，我们就不可能作为人类意志的主导者在世界上采取精神行动。要认识人，就必须认识人本身；要认识人，就必须认识现实及其规律。没有任何一种国家概念从根本上说不是一种生活概念：哲学或直觉，一个在逻辑结构中展开或在愿景或信仰中汇聚的思想体系，但始终是，至少实际上是对世界的有机构想。

因此，如果不从法西斯主义的一般人生观角度来看待它，就无法理解法西斯主义的许多实践态度，如作为党组织、教育制度和纪律。精神主义方式。法西斯主义的世界并不是表面上的物质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是独立于他人和自己的个体，受自然法则的支配，自然法则本能地吸引人过着自私和一时享乐的生活。法西斯主义的人是民族和祖国的个体，是一种道德法则，它将个人和世世代代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传

统和使命，它抑制了封闭在短暂享乐中的生命本能，在义务中建立了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优越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个人通过自我牺牲、牺牲自己的特殊利益、死亡本身，实现了完全精神性的存在，而他作为人的价值就在于此。

因此，精神主义的概念也产生于这个世纪对 19 世纪迟缓的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的普遍反动。它是反实证主义的，但又是积极的：既不是怀疑论，也不是不可知论，既不是悲观主义，也不是消极乐观主义，因为一般的学说（都是消极的）都把生活的中心置于人之外，而人的自由意志可以而且必须创造自己的世界。法西斯主义希望人积极主动，以全部精力投入到行动中去：它希望人强烈地意识到存在的困难，并随时准备面对这些困难。法西斯主义将人生视为一场斗争，**认为人要征服真正配得上自己的东西，首先要在自己身上创造出建设它的工具（物质的、道德的、智力的）。**个人如此，国家如此，人类亦如此。因此，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宗教、科学——都具有极高的价值，教育也非常重要。工作是人类战胜自然、创造人类世界（经济、政治、道德、智力）的手段，因此也具有重要价值。

这种积极的人生观显然是一种伦理观。它涉及整个现实，也涉及支配现实的人类活动。任何行为都不能免于道德评判；为了达到道德目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被剥夺其应有的价值。因此，法西斯主义者眼中的生活是严肃的、肃穆的、宗教的：一切都徘徊在一个由精神的道德和责任力量支撑的世界中。法西斯不屑于 “舒适 ”的生活。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宗教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人被视为与更高法则的内在关系，与超越特定个人的客观意志的内在关系，并将人提升为精神社会中有意识的一员。那些对法西斯政权的宗教政策仅仅停留在权宜之计上的人并不了解，法西斯主义除了是一种政体之外，首先也是一种思想体系。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历史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在家庭和社会群体、国家和历史（所有民族都参与其中）中所贡献的精神进程的一种功能。因此，传统在记忆、语言、习俗和社会生活准则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离开历史，人什么都不是。正因如此，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 18 世纪式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抽象概念，反对一切雅各宾乌托邦和创新。法西斯主义不相信人间的 “幸福 ”是可能的，正如 18 世纪经济主义文学一厢情愿的想法一样，因此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目的论的构想，即在历史的某个时期，人类将得到最终的解决。这意味着将自己置于历史和生活之外，而历史和生活是不断流动和变化的。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希望成为一种现实主义学说；在实践中，它只希望解决那些由自己提出的历史性问题，并从自身找到或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要在人与人之间行动，就像在自然界行动一样，必须进入现实的进程，掌握起作用的力量。

反个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概念是为国家服务的；它也是为个人服务的，因为它与国家、人类在其历史存在中的普遍良知和意志相一致。法西斯主义反对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对专制主义作出反应的需要，自国家成为人民的良知和意志以来，古典自由主义已经耗尽了它的历史功能。自由主义为了特定个人的利益而否定国家；法西斯主义则重申国家是个人的真正现实。如果自由是真正的人的属性，而不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所认为的抽象傀儡的属性，那么法西斯主义就是为了自由。法西斯主义

追求的是唯一严肃的自由，即国家的自由和国家中个人的自由。对于法西斯主义者来说，一切都在国家之中，在国家之外没有任何人类或精神存在，更不用说价值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是极权主义的，法西斯国家是所有价值的综合和统一，它解释、发展并赋予人民的整个生活以权力。

既不是国家之外的个人，也不是团体（政党、协会、工会、阶级）。正因如此，法西斯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僵化了阶级斗争中的历史运动，忽视了将各阶级融合为单一经济和道德现实的国家统一；同样，法西斯主义也反对阶级联盟主义。但是，在秩序化国家的轨道上，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所源于的真正要求，法西斯主义希望它们得到承认，并在国家统一体中调和的职团利益体系中得到执行。

根据利益的类别，个人是阶级；根据所涉及的不同经济活动，个人是工会；但个人首先是国家。国家不是数字，不是构成人民多数的个人的总和。因此，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因为民主将人民归类为最多的人，将他们降低到最多的人的水平；但是，如果从质上而非量上将人民视为最强大的思想，那么法西斯主义就是最直接的民主形式，因为它更道德、更连贯、更真实，它在人民中作为少数人的良知和意志，或者说作为一个人的良知和意志来实现，而作为一种理想，它倾向于在所有人的良知和意志中实现。所有那些从自然和历史中、从种族上获得形成一个民族的理由的人，作为一种意识和一种意志，在发展和精神形成的同一路线上出发。这不是种族，也不是地理上确定的地区，而是历史上延续的血统，是由一种理念统一起来的人群，这种理念就是存在和力量的意志：自我意识、人格。

只要是国家，这种高级人格就是民族。按照 19 世纪作为民族国家宣传基础的旧自然主义概念，并不是民族产生了国家。相反，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国家赋予了意识到其道德统一性的人民以意志，从而赋予了有效的存在。一个民族的独立权不是来自于对自身存在的文学和理想意识，更不是来自于或多或少无意识和惰性的事实状况，而是来自于一种积极的意识，来自于一种行动中的政治意愿，并愿意证明自己的权利：也就是说，来自于一种已经存在的国家。事实上，国家作为一种普遍的伦理意志，是法律的创造者。

作为国家的民族是一种伦理现实，它在发展中存在和生存。它的消亡就是它的死亡。因此，国家不仅是管理个人意志并赋予其法律形式和精神生活价值的权威，而且也是一种对外执行其意志的力量，使其得到承认和尊重，即在其发展的所有必要决定中展示其普遍性。因此，组织和扩张就能适应人类意志的本性，而人类意志在其发展过程中是没有障碍的，它通过证明自身的无限性来实现自己。

法西斯国家是人格的最高和最强大的形式，它是一种力量，但却是一种精神力量。它概括了人类道德和智力生活的所有形式。因此，它不能像自由主义所希望的那样，局限于简单的秩序和保护功能。它不是一种限制所谓个人自由领域的简单机制。它是内在的形式和规范，是对整个人的约束；它渗透到意志和智慧之中。它的原则是生活在公民社会中的人格的核心灵感，它深入到行动者和思想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内心深处，是灵魂的灵魂。

总之，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法律的制定者和机构的创立者，也是精神生活的教育者和促进者。它要改造的不是人类生活的形式，而是内容、人、性格和信仰。为此，他需

要纪律，需要深入灵魂深处的权威，需要不受质疑地支配他们。因此，它的徽章就是象征着团结、力量和正义的 “利托里亚大旗”（fasces lictoriae）。

政治和社会理论

1919 年 3 月，当我在《意大利人民报》（Popolo d'Italia）的专栏上召集自 1915 年 1 月成立 “革命阵线”（Fasci d'azione rivoluzionaria）以来一直追随我的干预主义者（interventionists）来到米兰时，我的脑海中并没有具体的理论计划。我心中只有一个理论：从 1903-04 年到 1914 年冬（大约十年）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追随者和领导者的经验，但不是教义经验。即使在那个时期，我的教义也是行动的教义。自 1905 年伯恩施坦领导的修正主义运动在德国开始以来，一个明确的、普遍接受的社会主义学说就不曾存在过，另一方面，在各种倾向的跷跷板中形成了革命左翼运动，在意大利，它从未离开过短语[口号]的领域，而在俄国社会主义中，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前奏。改革主义、革命主义、中心主义，甚至这些术语的回声都已消逝，而在法西斯主义的大河中，你会发现从索雷尔、社会主义运动的拉加代尔、贝吉和意大利辛迪加派一伙中流出的支流、 1904 至 1914 年间，奥利维蒂（Olivetti）的《自由之页》、奥兰（Oran）的《La Lupa》和恩里科-莱昂内（Enrico Leone）的《社会的未来》（Divenire sociale）给已经被吉奥里特（Giolittian）通奸行为搞得乌烟瘴气的意大利社会主义环境带来了新的气息。

到 1919 年战争结束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已经死亡：它只是作为一种怨恨而存在，它仍然只有一种可能性，尤其是在意大利，即对那些想要发动战争并必须 “赎罪 ”的人进行报复。Il Popolo d'Italia》的副标题是 “quotidiano dei combattenti e dei produttori”。生产者 "一词已经表达了一种心态。法西斯主义并没有被事先在办公桌前制定的理论所压制：它诞生于行动的需要，它就是行动；它不是一个政党，但在最初的两年里，它是一个反党组织，是一场运动。我给这个组织起的名字决定了它的性质。然而，任何重读当时的废纸上关于意大利战斗法西斯（Fasci Italiani di Combattimento）成立会议的记述的人，都不会发现一个学说，而是一系列暗示、预想和提示，这些暗示、预想和提示摆脱了不可避免的偶然因素的影响，在几年后发展成为一系列学说立场，使法西斯主义与过去和当代的所有其他学说相比，自成一体，成为一种政治学说。 “我当时说，如果资产阶级认为它在我们身上找到了避雷针，那它就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必须走出去迎接劳动....。我们要让工人阶级习惯于管理技能，也要让他们相信，经营一个行业或产业并非易事..... 我们将与技术和精神上的后卫主义作斗争... 一旦政权更替结束，我们决不能成为低能儿。如果政权被取代，我们将取而代之。继承权属于我们，因为我们将国家推向了战争，并领导国家取得了胜利。目前的政治代表权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希望直接代表个人利益... 可以说，我们回到了职团，这与我们的计划背道而驰。这并不重要！因此，我希望大会从经济角度接受全国职团主义的要求.....”。从圣塞波尔克罗广场的第一天起，'职团'这个词就在耳边响起，而在革命过程中，这个词被认为是作为政权基础的立法和社会产物之一，这难道不奇怪吗？

在向罗马进军之前的几年里，由于行动的需要，无法进行调查或完整的理论阐述。城镇和乡村发生了战斗。有辩论，但最神圣、最重要的是有死亡。人们知道如何去死。

教义——很好地形成了，分为章节和段落，并有一个清晰的大纲——可能是缺乏的；但有一种更具决定性的东西可以取代它：信仰。然而，谁能从书籍、文章、大会誓词、重要讲话和次要讲话中回忆起来，谁知道如何调查和选择，谁就会发现教义的基础是在战斗激烈进行时奠定的。正是在那些年，法西斯思想也在不断武装、完善，并走向自己的组织。个人与国家的问题；权威与自由的问题；政治和社会问题，以及更具体的民族问题；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济会和平民主义学说的斗争，都是在 “惩罚性远征 ”的同时进行的。但是，由于缺乏 “制度”，法西斯主义的对手们恶意地否认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能力，而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却在不断涌现，尽管一开始是在暴力和教条式的否定中出现的，就像所有开始出现的思想一样，后来又在积极的建构中出现，并在 1926、1927 和 1928 年的法律和政权机构中得以实现。今天，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权，也是一种理论。对这个词的解释是，今天的法西斯主义对自己和他人进行批判，在面对困扰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问题时，有自己明确无误的观点、参照——因此也是方向。

首先，法西斯主义着眼于人类的未来和发展，不考虑当前的政治，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可能性和有用性。**因此，法西斯主义反对和平主义，因为和平主义掩盖了放弃斗争和面对牺牲的懦弱。只有战争才能使人类的所有能量达到最大限度的张力，并为那些拥有面对战争的美德的人们打上崇高的印记。所有其他的考验都是替代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从未将人置于自身之前。因此，从和平的偏见假设出发的学说与法西斯主义格格不入，就像与法西斯主义精神格格不入一样，即使它们在某些政治局势中被接受并可能有一定的用处，但它们都是国际主义和社会的建构，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当感情、理想和现实的因素冲进人们的内心时，这些建构就会随风飘散。这种反和平主义的精神，法西斯主义也把它带到了个人的生活中。写在伤口绷带上的 “me ne frego”（我才不在乎）是法西斯主义者引以为豪的座右铭，它不是一种委曲求全的哲学行为，也不是一种政治性的理论总结：它是战斗教育，是对战斗风险的接受；它是一种新的意大利生活方式。因此，法西斯主义者接受生命、热爱生命、无视生命，并认为自杀是卑鄙的；他将生命理解为责任、提升、征服：生命必须高尚而充实：为自己而活，但首先是为他人而活，无论远近、现在还是将来。**

政权的 “人口 ”政策就是这些前提的结果。事实上，法西斯主义者也爱他的邻居，但这个 “邻居”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模糊而难以捉摸的概念：对邻居的爱并不妨碍必要的教育严厉性，更不妨碍区分和距离。法西斯主义拒绝普遍的拥抱，虽然它生活在文明社会中，但它警惕地、漫不经心地注视着他们，关注他们的情绪和利益变化，不允许自己被变幻莫测的谬误表象所欺骗。

这样的人生观导致法西斯主义突然否定了构成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社会主义基础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根据这一学说，人类文明的历史只能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斗争以及生产手段和工具的变化来解释。经济事件——原材料的发现、新的工作方法、科学发明——有其自身的重要性，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但认为它们足以解释人类历史而排除所有其他因素，则是荒谬的：法西斯主义仍然并始终相信神圣和英雄主义，即相信没有任何经济动机——无论远近——在其中起作用的行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只是历史的临时演员，在波浪的表面出现和消失，而在深处，真正

的指导力量在涌动和起作用，阶级斗争也被否定了，它是永恒不变和不可挽回的，是这种经济主义历史观的自然产物，最重要的是，它否定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在社会主义学说的这两块基石上打了一记重拳之后，社会主义就只剩下了一种感伤的愿望——这种愿望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那就是实现社会共存，减轻最底层人民的苦难和痛苦。但在这里，法西斯主义否定了经济“幸福”的概念，而经济“幸福”将在经济发展的特定时刻，通过确保所有人的最大繁荣，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几乎自动地实现。法西斯主义否认物质主义的“幸福”概念是可能的，并将其抛弃给 17 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否认福利=幸福的等式，这种等式会将人变成只有一种思想的动物：那就是吃饱穿暖，因此沦为纯粹而简单的植物人。

在社会主义之后，法西斯主义将整个民主意识形态综合体打入了缺口，并在理论前提和实际应用或手段上对其加以否定。法西斯主义否认人数可以指导人类社会；否认人数可以通过定期协商进行管理；肯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可弥补的、有益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无法通过普选权这种机械的外在事实来消除的。民主政权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政权：在这种政权中，人民不时被赋予主权的假象，而真正的主权则掌握在其他有时不负责任的秘密力量手中。民主是一个没有国王的政权，但却有许多国王，这些国王有时比一个暴君国王更具排他性、专制性和破坏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虽然在 1922 年之前出于偶然的原因采取了共和制的倾向，但在进军罗马之前却放弃了这一倾向，因为它深信国家政治形式的问题在今天并不重要，而研究共和制的问题在今天才是最重要的。他深信，一个国家的政治形式问题在今天并不突出，研究一下过去和现在的君主制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共和制，就会发现君主制和共和制并不是永恒的评判标准，而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演变、历史、传统和心理的表现形式。现在，法西斯主义克服了民主主义赖以生存的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对立，使前者背上了所有不足的包袱，并将后者模仿为完美的制度。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共和制是反动的或专制的，而君主制则欢迎最大胆的政治和社会经验。

“理性、科学”，法西斯前的启蒙者勒南在他的《哲学沉思录》中说，是人类的产物，但想要理性直接为人民服务并通过人民来实现，那是痴人说梦。理性的存在并不需要全世界都知道它。无论如何，如果要进行这样的启蒙，就不能通过低级民主，因为低级民主似乎会导致每一种高深的文化和每一门高级学科的消亡。社会只为组成社会的个人的福祉和自由而存在的原则似乎并不符合大自然的计划，在大自然的计划中，只有物种被考虑在内，个人似乎被牺牲了。我们强烈地担心，这样理解的民主的最后一个词（我急忙说，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堕落的大众除了享受庸俗人的无耻享乐之外，别无所求"。

至此，法西斯主义在民主中摒弃了政治平等主义的荒谬传统谎言、集体不负责任的习惯以及幸福和无限进步的神话。但是，如果民主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说，如果民主意味着不把人民推向国家的边缘，那么法西斯主义就可以被作者定义为'有组织的、集权的、专制的民主'。

面对自由主义理论，法西斯主义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处于绝对对立的地位。不能夸大自由主义在上个世纪的重要性——仅仅是为了当前的论战——而将其作为在那个世纪绽放的众多学说之一，变成现在和未来所有时代的人类宗教。自由主义只兴盛了十

五年。它诞生于 1830 年，是对想把欧洲赶回 89 年前的神圣同盟的一种反击，在 1848 年达到鼎盛时期，当时庇护九世也成为了一名自由主义者。紧接着，颓废开始了。如果说 48 年是光明与诗意的一年，那么 49 年就是黑暗与悲剧的一年。罗马共和国被另一个共和国，即法国所扼杀。同年，马克思发表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开启了社会主义宗教的福音。1851 年，拿破仑三世发动了不自由的政变，统治法国直到 1870 年。胜利者是俾斯麦，他从不知道自由的宗教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使用的是哪位先知。像德国人民这样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在整个 19 世纪完全忽视了自由宗教，这是一个症状。只有一个小插曲。以被称为 “荒唐的法兰克福议会 ”为代表，它持续了一个季度。德国在自由主义之外实现了民族团结，反对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似乎与德国人的灵魂格格不入，德国人的灵魂本质上是君主制的，而自由主义则是无政府状态在历史和逻辑上的前奏。德国统一的阶段是由毛奇和俾斯麦等 “自由主义者 ”领导的 64、66 和 70 年三次战争。至于意大利的统一，自由主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如马志尼和加里波第，因为他们不是自由主义者。如果没有不自由的拿破仑的干预，我们就不会有伦巴第；如果没有不自由的俾斯麦在萨多瓦和色当的帮助，我们很可能不会在 1866 年拥有威尼斯；1870 年我们也不会进入罗马。从 1870 年到 1915 年，是新信条的牧师们自己指责其宗教暮气沉沉的时期：他们被文学中的颓废主义和实践中的激进主义打入了缺口。

激进主义：即民族主义、未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由 "世纪积累了无数的死结，试图用世界大战的大屠杀来解开它们。从来没有任何宗教强加过如此巨大的牺牲。难道自由主义之神渴求鲜血？现在，自由主义即将关闭其荒废的庙宇的大门，因为人们感到，它在经济学上的不可知论、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冷漠主义将导致国家的毁灭，就像它已经导致的那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代世界的所有政治经验都是反自由主义的，而想把它们归类到历史之外是极其荒谬的；就好像历史是专为自由主义及其教授们准备的狩猎场，就好像自由主义是文明的定论，再也无法逾越。

然而，法西斯主义对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否定，绝不能使人相信法西斯主义想把世界变回 1789 年之前的样子，而 1789 年是民主-自由主义世纪的开端。一切都回不去了。法西斯主义学说并没有推举德梅斯特尔为先知。君主专制主义是，教会专制主义也是。封建特权和不可逾越、不可交流的种姓划分也是如此。法西斯的权威概念与警察国家毫无关系。以极权主义方式治理国家的政党是历史上的新事实。参考和比较是不可能的。法西斯主义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理论的废墟中汲取了那些仍然具有生命价值的元素。它保留了所谓的后天历史事实，摒弃了其他一切，即对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都有益的理论概念。尽管 19 世纪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世纪，但并不能肯定 20 世纪也一定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世纪。政治学说在流逝，人民在留存。如果说 19 世纪是个人的世纪（自由主义意味着个人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 “集体 ”的世纪，因此也是一个国家的世纪。一种新的理论可以利用其他理论中仍然重要的元素，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没有一种学说是全新的、闪亮的、从未见过的。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可以宣称绝对的 “独创性”。即使只是历史性的，它也与过去的其他学说和未来的其他学说紧密相连。因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傅立叶、欧文和圣西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相联系；因此，19 世纪的自

由主义与 17 世纪的整个启蒙运动相联系。因此，民主学说与《百科全书》相联系。每一种学说都倾向于将人们的活动引向某个目标；但人们的活动会对学说做出反应、改变它、使它适应新的需要或超越它。因此，学说本身必须不是一种语言练习，而是一种生活行为。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实用主义脉络，它的权力意志、生存意志、面对“暴力 ”事实的立场及其价值。

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基石是国家的概念、本质、任务和目标。对法西斯主义而言，国家是绝对的，在国家面前，个人和团体是相对的。个人和群体只要处于国家之中，就是 “可思考的”。自由主义国家并不指导集体的游戏和物质与精神的发展，而只是记录结果；法西斯国家有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意志，这就是它被称为 “伦理 ”国家的原因。1929 年，在法西斯政权的第一个五年大会上，我说：'对法西斯主义而言，国家不是只照顾公民人身安全的守夜人；国家也不是一个纯粹以物质为目的的组织，比如保障一定的福利和相对和平的社会共处，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就足以实现这一目标；国家也不是纯粹政治的产物，不考虑个人和民族生活的物质和复杂现实。法西斯主义所构想和实施的国家是一种精神和道德的事实，因为它是国家政治、法律和经济组织的具体化，而这种组织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是精神的体现。国家是内部和外部安全的保障者，同时也是千百年来在语言、习俗和信仰中形成的民族精神的守护者和传播者。国家不仅是现在，也是过去，更是未来。国家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短暂局限，代表着民族的内在意识。国家表达自身的形式在变化，但必要性依然存在。国家对公民进行公民美德教育，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敦促他们团结一致；在正义中协调他们的利益；传承科学、艺术、法律和人类团结方面的思想成果； 它引导人们从部落的初级生活走向人类权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帝国；它将那些为国家的完整或服从国家法律而献身的人的名字留给千秋万代；它向世世代代的人们树立榜样，并向他们推荐那些为国家扩大领土的船长和为国家增添光彩的精灵。当国家意识衰退，个人或群体的分离和离心倾向占上风时，民族社会就会走向夕阳。

从 1929 年到今天，世界政治经济的演变仍在强化这些理论立场。巨人是国家。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巨大矛盾的是国家。除了国家，在国家内部，所谓的危机是无法解决的。朱尔斯-西蒙（Jules Simon）在自由主义萌芽时期曾宣称 “国家必须努力使自己无用并准备辞职”，如今他的影子去哪儿了？上世纪下半叶宣称 “国家必须避免过度治理 ”的马克-库洛克斯（Mac Cullochs）的影子在哪里？英国人边沁（Bentham）认为，工业只应要求国家别管它；德国人洪堡（Humboldt）认为，“无所事事 ”的国家才是最好的国家，面对国家对经济事务持续不断、有求必应、不可避免的干预，他又会说些什么呢？诚然，第二波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没有第一波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么极端，斯密本人也已经——尽管是谨慎地——打开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大门。如果说自由主义者说的是个人，那么法西斯主义者说的就是国家。但法西斯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原创。它不是反动的，而是革命的，因为它预见到了某些普遍问题的解决方法，例如在政治领域，政党的四分五裂、议会的盛气凌人、议会的不负责任；在经济领域，工人和工业部门的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它们之间的冲突和理解；在道德领域，需要秩序、纪律、服从祖国的道德要求。法西斯主义希望国家强大、有机，同时建立在广泛的民众基础之上。

法西斯主义国家还将经济领域据为己有，并通过其创建的职团、社会和教育机构，将国家意识延伸到最远的地方，在国家内部，国家的所有政治、经济和精神力量在各自的组织框架内循环往复。国家的基础是千百万认识它、感受它、愿意为它服务的个人，而不是中世纪领主的专制国家。它与 89 年前后的专制主义国家毫无共同之处。法西斯国家中的个人并没有被取消，而是成倍增加，正如在一个军团中，士兵的人数并没有减少，而是成倍增加。法西斯国家将国家组织起来，但又给个人留有足够的余地；它限制了不必要的或有害的自由，保留了基本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评判者不可能是个人，而只能是国家。

法西斯国家不会对一般的宗教事实和意大利天主教这一特殊的积极宗教无动于衷。国家没有神学，但有道德。在法西斯国家，宗教被视为精神最深刻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宗教不仅受到尊重，而且受到捍卫和保护。法西斯国家不会像罗伯斯庇尔那样，在会议的某个时刻，在极度谵妄的情况下，创造出自己的 “上帝”；也不会像布尔什维主义那样，妄图将上帝从灵魂中抹去。法西斯主义尊重苦行僧、圣徒、英雄的上帝，也尊重人民天真原始的心灵所看到和祈求的上帝。

法西斯国家是权力和帝国的意志。在这里，罗马传统是一种权力观念。在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中，帝国不仅仅是领土、军事或商业上的表现，更是精神或道德上的表现。我们可以认为一个帝国，即一个直接或间接领导其他国家的国家，无需征服一平方公里的领土。对法西斯主义而言，帝国的趋势，即民族的扩张，是生命力的表现；其反面或立足点，则是颓废的标志：崛起或复活的民族是帝国主义者，消亡的民族是放弃者。法西斯主义是最合适的理论，它代表了像意大利人民这样在被忽视或被外国奴役了许多世纪后重新崛起的民族的倾向和精神状态。

但是，帝国要求纪律、协调努力、责任和牺牲；这解释了该政权在许多方面的实际行动和国家许多力量的方向，以及对那些反对 20 世纪意大利这场自发的、致命的运动的人的必要的严厉态度，这些人挥舞着 19 世纪过时的意识形态来反对这场运动，而在任何敢于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伟大实验的地方，这些意识形态都被摒弃了：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权威、指令和秩序。如果说每个世纪都有自己的学说，那么从千丝万缕的线索来看，本世纪的学说就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唤起了人们的信仰，法西斯主义征服了人们的灵魂，法西斯主义有倒台的，也有殉道者，这一切都说明了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生命的教义。

法西斯主义现在在世界上具有所有学说的普遍性，这些学说一旦实现，就代表了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时刻。

NSDAP 的纲领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然而，当一个国家陷入困境时，如果它仍然拥有真正强大的精神力量，那么它重生的首要条件就是找到衰退的深层原因。

像德国这样的大帝国能够屹立世界之巅，然后轰然倒塌，揭示了当时英雄主义最严重的弊端，这迫使每个有思想的人不得不严肃思考。他会认识到，商业主义精神、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思维、毫无灵魂的国际主义精神，再加上普遍的傲慢，可能在 1918 年 11 月 9 日公开掌权，但多年来、甚至数十年间一直在人民内部肆虐。无

数警告的声音无人理会；在纯粹的技术和经济征服的恶魔般冲动驱使下，在物质限制（人口过剩等）的推动下，没有抓住空间问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德国人民失去了精神平衡，成为诱惑者的牺牲品，后者利用人们日益恶化的精神状态灌输有毒的教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和平主义、议会制等）。

1914 年 8 月，一场针对这种病态的全国性革命爆发，德国人民在战场和国内都做出了英勇的举动。但疾病的根源已经深深植根于血液之中，而饱受苦难和饥饿折磨的德国人，在短短几天内就推翻了数百年的梦想，让位于一个对古老而伟大的过去、对德国人本身都构成嘲弄的制度。

现在，伟大的转折点已经到来，我们必须决定，中欧地区是继续生活着一群只会说德语却不再拥有共同心志的杂牌军，还是出于深深的羞耻，让古老的理想主义重新崛起，将 7000 万人民凝聚成一个拥有共同血脉、民族和命运的共同体。第一种情况，衰落——应有的衰落——已成定局；第二种情况，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德国的复兴。民族社会主义者反对一切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坚信理想主义的力量，呼吁有意识地与当权者进行无情斗争，其中一些人有意推动德国衰落，一些人则无力抵抗，但仍声称有权统治德国人民。没有金钱和财产，但有了这种信念，斗争开始了。反对所有党派。因为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他们都患有这种根本性的疾病，他们对德国人民的苦难负有同样的责任。

一个致命的错误是允许扭曲民族和社会的概念。那些声称捍卫最宝贵民族利益的团体和党派，往往只是从外交政策的角度出发。在国内政治中，他们经常把等级、地位和金钱视为足够的资本，从而轻视穿着工作服的老百姓，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这些同胞的价值不被重视，而只被当作一个经济单位。这种傲慢在异族诱惑者手中成为受欢迎的煽动手段。

王朝和国家利益相提并论，助长了这种邪恶。毫无疑问，国王或皇帝的人格有时是整个帝国的保障。但拜占庭主义[专制主义]试图掩盖帝国政府的所有弱点，无意中强化了德意志国家的反对者，使这种状况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信条。人们已经忘记了，民族、民族利益、民族福祉和民族荣誉必须凌驾于君主的人格之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外部政治民族主义也经常具有反民族和反社会的性质。除了这些敌人之外，还有日益普遍的学究气。对最古老的古代、东方科学、抽象、无血缘原则的单方面兴趣，扩大了知识分子——即民族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他们实际上被要求领导一个民族的生活 斗争，而这也为不择手段的分子和外来煽动者提供了机会，他们利用饥饿人群的需求来达到与他们所宣称的目的截然不同的目的。因此，阶级斗争的鼓吹者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几十年来，他们的代表从未停止过试图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揭开德国民族身体的伤口。

德国工人认为自己与有血缘关系的知识分子阶级脱离了关系，并相信永恒的阶级斗争是自然法则；他听到许多外国使节与国内领导人说同样的话，并相信各国人民平等和无产阶级团结；他每天都能看到机器时代的不公正，相信未来的国家是公正的；他感受到有形资本统治着世界，每天都能看到那些不友好的企业家，因此相信有必要推翻一切资本，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拯救世界。但除了追求看似理想的目标外，马克思

主义还玷污了自己的本质，篡改了社会主义思想，而社会主义思想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在变化，并且以前是有机发展的。

在宣扬德国人、法国人、犹太人和中国人之间平等的同时，它却鼓吹同一国家不同阶级之间进行殊死斗争，因此从一开始就自相矛盾。它不仅偶尔如此，就像过去那样，而是将盗窃视为原则问题（由此完全掩盖了逻辑上的荒谬——没有财产，就不存在盗窃的概念），他教导的只是以他人为代价的个人致富。马克思主义声称要对抗高利贷世界资本主义，然而自其诞生以来，它却一直与各大国际银行和证券交易所沆瀣一气。直到今天。

1918 年 11 月 9 日，反资本主义、掠夺和煽动工人发动了股市革命，其长期追求的目标是将尚未被世界银行完全掌控的德国民族工业和农业转移到超国家贷款资本手中。这就是在德国与这些务实经济力量斗争的目的，正如“反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财阀民主联合发动的斗争。但这也是社会民主党自 1880 年以来在帝国议会投票反对所有高利贷法、股票交易税、奢侈品税等的目的。他们并不关心人民的福利，而是蓄意制造不公正，以便在不满情绪的自我支持下组织革命队伍。

这是 19 世纪最大的骗局，最终于 1917 年 11 月在莫斯科和 1918 年 11 月在柏林取得了胜利：由世界资本主义仆从领导的反资本主义世界革命。马克思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是集体主义精神，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有意识的、惟一的伪装嘲弄。马克思主义不是对时代唯物主义的宣战，而是对这种拜金主义思想的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一场经济斗争，而是对欧洲各国人民发动的公开争夺权力和文化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将国际主义、阶级斗争和和平主义等理念篡改为社会主义原则，而社会主义原则与这些理念毫无关系。

在 19 世纪，剥削各国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同一国家——犹太国的代表手中，这才使得这场巨大的世界骗局成为可能。因此，马克思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场种族斗争。**法国大革命及其在其他国家的影响几乎消除了所有束缚，犹太人的本性与过去几个世纪的影响完全相同。坚韧不拔、不择手段、国际团结、公民平等、天生的寄生虫……所有这些构成了犹太人金融统治的基础，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标志。**

为了消除新兴劳工运动带来的危险，犹太人高资本家银行界“支持”马克思主义，创办“工人”报纸，建立工会，煽动反对企业家和农民，煽动教派之间的对立，以便通过分裂进行统治！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犹太人或无足轻重的人在所有国家的所有工人政党中担任领导职务，这些人无论好坏都与政党的存在息息相关，而这类卑鄙、野心勃勃的人存在于每个国家。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些领导者中也有不谙世事的梦想家；他们与有意识的骗子一样有害。农民和工业家的罪恶助长了欺骗，几十年来，经济和政治斗争一直在错误的阵线上进行：雇主和工人没有认识到他们在国家、政治和经济上的共性，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转而反对[缺字]和毁灭性的股票交易投机，他们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争，而笑到最后的第三方——**犹太人及其未受割礼的精神兄弟**——则从中渔利。

因此，民族社会主义者向这些银行财团及其所有者宣战，他们现在几乎控制了一切，同时也向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忘记国家责任的个体企业家或农民宣战。特别是对他们

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因为这些寄生虫扭曲了以国家为基础的经济的必要性。保护国民经济，向蔑视者宣战。在粗俗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纯粹的唯物主义数量概念取代了质量概念；它否认创造性的个性价值，鼓吹大众；它把国家和政治谎言作为指导原则，民族社会主义认为其死敌（党员身份在此扮演次要角色）是 克服和摧毁这种世界观，并使它的主要代表在各方面丧失能力，是党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当这一目标实现后，德意志和真正的德国祖国之路将畅通无阻。

现在，新的群众运动为何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动者党”为名，已经显而易见。它具有民族性和民族主义色彩，对古老而埋没的民族的重新认识充满热情；它具有社会主义色彩，认为国家的共同缔造者和建设者绝不能接受社会救济（就像自由国家那样），而国家有责任监督其所有成员所需的一切。进一步认识到，在细菌被消灭之前，这一切都无法实现，因为细菌毒害着我们的血液和灵魂：犹太人及其精神，以及来自德国阵营的追随者，与这些德国人民的诱惑者进行了无情斗争。同时，这也意味着：所有有精神和体力劳动的人与寄生虫和无业游民的斗争。

对于民族社会主义而言，既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这两个敌对阶级，只有作为血缘和命运同志的德国人。富有创造力的德国人。在财富发生巨大逆转的当下，一个新的世界、历史和国家观已经形成，虽然尚未明确表述，但方向已经清晰。我们不再认为历史是“人类永恒的发展”，无论是朝着人类、朝着国家的基督教化、朝着某种想象中的“人类文化”发展，还是作为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精神和种族力量与其环境和其他种族之间的对抗。

种族的兴衰是由我们所能感知到的最后一条伟大的自然法则所决定的；对它的忽视造成了种族混乱，印度、波斯、希腊和罗马的伟大雅利安文化曾经因此而消亡。欧洲种族意识的自我意识以德国为体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觉醒，这种灵魂的力量只想要表达自己，坚信这样做就是在创造自己所能创造的最宝贵的东西。在否认永恒本质数个世纪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有意识地重新融入永恒生命进程的自然法则。

拯救德国的关键在于摧毁民主、马克思主义和财阀崇拜的偶像。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也是其努力消除导致犹太拜金主义统治的原因，并给整个国家指明新方向的原因。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新的思想，不如说是新的思维方式。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民族对国家和世界的观念能够取得胜利，那么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劳动者党就完成了它的首要使命。今天，我们反对时代一切强权的呐喊，将成为永恒生命的新结构的基础。

该运动自称为党派，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公开的权力斗争不可能由寻求各方和解的非党派协会来对抗整个世界。相反，只有将明确界定的战斗个性和能量结合起来，才能发动这场斗争。起初，这样的人会很少，永远不会成为多数派，正如在世界历史上，国家的命运从来不是由多数派决定的，而是由有目的的少数派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组织，无论它自称联盟、圈子、俱乐部还是其他什么，都始终是一个政党。

无论它如何假装“非党派”且不追求“全民”，但政党始终存在。在这里，就像在任何地方一样，这是一个信仰问题。民族社会主义公开承认它是一个战斗党，可能永远不会形成多数派，但它坚信它代表一场人民运动，终有一天将决定德国的命运，并给

其他国家展示未来的新道路。然而，目前它是一场斗争，而斗争总是意味着人与人、党与党的对抗。鉴于上述考虑，我们将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劳动者党命名为［民族自由运动］，

即：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动者党。

对当时所有政党产生有害影响的一个因素是，它们不再作为实现人民愿望的手段，而成为目的本身。许多对维护议会政党感兴趣的人并不真正渴望实现合理的想法，因为他们靠不满情绪为生。不能指望他们为实现重要而振奋人心的理念而努力，因为那样做会终结他们的生存。

因此，群众的不满总是被重新激起，新的要求总是被提出，尽管他们很清楚这些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政党不再是国家机器的附属机构，而是国家内部的独立实体。

拯德国工人党的纲领是一个有限期的纲领。一旦纲领中设定的目标实现，领导人就拒绝制定新的目标，其[制定新目标]唯一目的是通过人为地增加群众的不满来使政党继续存在。

1. 我们要求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将所有德国人团结成一个更大的德国。
2. 我们要求德国人民享有与其他国家人民同等的权利；废除凡尔赛和圣日尔曼和平条约。
3. 我们要求获得土地和领土（殖民地），以养活我们的人民，安置过剩的人口。
4. 只有拥有德国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德国人，无论其宗教信仰如何。因此，犹太人不能成为德国人。
5. 非公民只能作为客人居住在德国，并必须遵守外国人法律。
6. 只有公民才有权决定国家的领导层和法律。因此，我们要求无论是帝国、州还是市，任何公职只能由公民担任。我们反对腐败的议会经济，这种经济只考虑党派因素，而不考虑品格和能力。
7. 我们要求国家首先确保其公民的生计和生活。 如果无法养活国家的全体人口，那么外国成员（非公民）将被驱逐出帝国。
8. 禁止非德国人的进一步移民。我们要求自 1914 年 8 月 2 日起移民到德国的所有非德国人立即离开德意志帝国。
9. 所有公民必须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
10. 每个公民的第一要务是工作，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个人的活动不得违背公众利益，而必须符合整体利益，造福所有人。因此，我们要求：
11. 废除不劳而获，打破利益束缚。
12. 鉴于每次战争都要求人民做出巨大的财产和生命牺牲，通过战争来谋取个人财富必须被视为一种反人民的罪行。因此，我们要求彻底没收所有战争利润。
13. 我们要求将所有（到目前为止）已经社会化的（信托）公司国有化。
14. 我们要求大公司实行利润分享。
15. 我们要求大幅增加养老金。
16. 我们要求建立并维护健康的中产阶级，立即将大型百货公司国有化，并以低价出租给小商贩，在向国家、省或市提供商品时，应给予所有小商贩最优惠的考虑。

17. 我们要求进行符合我们国家需求的土地改革，制定无偿征用土地用于公共目的的法律。取消土地租金，防止一切土地投机行为。
18. 我们要求严厉打击那些通过其活动损害公众利益的人。普通百姓中的罪犯、高利贷者、投机者等，无论其宗教和种族，都应处以死刑。
19. 我们要求用德国普通法取代罗马法，罗马法服务于物质主义的世界秩序。
20. 为了使每个有能力和勤奋的德国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并因此走上领导岗位，国家必须确保我们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得到彻底扩展。所有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必须适应实际生活的需求。学校必须从开学之初就让学生了解国家的目标（公民教育）。我们要求政府出资为贫困家庭的有天赋儿童提供教育，无论其身份或职业如何。
21. 国家必须通过保护母亲和儿童、禁止童工、通过法律强制推行体操和体育教育以及为所有从事青少年体育教育的协会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来确保公共卫生的改善。
22. 我们要求废除雇佣军，组建人民军队。
23. 我们要求采取法律措施，打击蓄意散布政治谎言的行为，以及通过新闻媒体传播此类谎言的行为。为了能够创建德国媒体，我们要求：
a）所有德语报纸的编辑和合作者必须为德国国民，
b）非德语报纸需要获得国家明确许可才能出版。它们不得以德语印刷。
c）法律禁止非德国人对德国报纸进行任何财务投资或施加影响，并要求对这种违法行为的处罚是关闭报社，并立即将涉案的非德国人驱逐出德意志帝国。违反公共利益的报纸将被取缔。我们要求依法打击对国民生活产生颠覆性影响的艺术和文学方向，并取缔违反上述要求的活动。
24. 我们要求国家内所有宗教派别享有自由，只要它们不危及国家生存或违反日耳曼民族的道德和伦理。本党代表积极基督教的立场，不拘泥于任何特定的教义。本党反对我们内心和外部的犹太物质主义精神，坚信只有从内心出发，以共同利益为先，才能实现民族的持久复兴。
25. 为了实现这一切，我们要求：建立强大的帝国中央政府。中央政治议会对整个德意志帝国及其组织拥有绝对权威。成立商会和专业协会，以执行德意志帝国在各个联邦州颁布的框架法律。党的领导人承诺将不遗余力地倡导上述观点的实施，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1920 年 2 月 24 日，慕尼黑

结论：当前是一个充满伟大命运的时代。在清晰洞察力和强烈意愿的驱使下，未来的力量在崩溃的世界中应运而生。它们是自然发展的必然产物，与那些无力阻止崩溃的力量以及直接导致崩溃的力量展开了斗争。每一个新的、内在强大的思想都会以立法的形式出现。它从新的内在方向出发，与生活相联系，改变生活，并将其作为世界运转的目标。如果这个目标符合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摸黑探索的本质，那么，任何力量都无法长期压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运动。

许多德国人坚信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代表着德国对自由的觉醒，他们愿意为伟大的事业而战，正如许多人已经证明的那样，他们愿意为之流血牺牲。**但民族社会主义仍然相信，其原则和世界观——尽管会根据各国国情采取不同的方法——将成为一股超越德国国界的指导力量，在欧洲和美洲其他国家不可避免的权力斗争中发挥作用，开展**

反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旧式国际主义的民族斗争。民族社会主义认为，一旦伟大的斗争结束，在当今时代结束后，将会迎来一个德国斗争再次成为世界斗争的时代，即使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但他们拥有无限的对德国人民的无限热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腐败分子的无限仇恨……但如果人格的理念要取代当今大多数人在伟大斗争中的偶像，那么它也必须在小范围内实现。

当选的领导人必须是一个完全的领袖。也就是说，在分配给他的任务范围内，当选的领袖拥有充分的权力和权利，可以自己做出决定，自己承担责任，不受中间投票的影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果，保持方向，赢得最后的胜利。所有民族社会主义者都应该以信仰和责任感为指导，从而使领导者能够实现德国的目标。但纲领的最后一项内容已经确定，创始人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已经承诺并兑现了这一点："领导者承诺将不遗余力地倡导落实上述各点，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落实这些内容最终的目标是：大德意志！

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

与将法西斯主义描绘为意识形态不连贯相反，它得到了乔瓦尼·金蒂莱、阿尔弗雷多·罗科、卡尔·施密特和海德格尔等知识分子的贡献的支持。从意识形态上讲，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植根于工团主义和民族主义。我试图推翻左派的说法，我的分析旨在超越基思·伍兹和 Cultured Thug 的视频，以最终证明法西斯分子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为了进一步了解，推荐阅读 A. James Gregor 的《墨索里尼的知识分子》一书，因为它挑战了普遍存在的误解，甚至表明法西斯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从民族工团主义发展而来的。我的目的是仔细研究历史上的法西斯运动的起源、意识形态和行动，考虑它们的影响、言论和对无产阶级的吸引力。我还将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献来质疑共产主义观点，并证实法西斯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特征。这项彻底的调查旨在对抗左派的解释，揭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定义社会主义。它通常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主张社区控制或监管商品的生产、分配和交换。这可以表现为工人或国家所有制，而"社区"一词则有多种解释。虽然马克思偶尔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互换使用，但列宁和社会民主党人将两者区分开来，认为社会主义是走向完全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阐明的那样。马克思有时贬义地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将某些派别描述为"反动派"或"封建社会主义者"。它也代表了一种政治议程。相反，列宁和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僚将社会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概述的那样，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缺乏商品生产的价值形式，这是历史上几次社会主义努力中都观察到的一个特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解释了公有制如何通过结束商品生产和产品对生产者的控制来改变社会，从而形成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竞争性的生存斗争被合作的努力所取代，在合作中，人类有意识地控制自然力量并克服以前主宰他们的条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扩展了基于公有制的合作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产品交换停止，劳动超越了其价值衡量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重要的"劳动收益"概念在这种合作框架下变得无关紧要。共产主义（包括其社会主义的初步阶段）的另一个关键方

面是国家和阶级分化的解体，这表明通常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实际上仍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了资本主义的革命潜力，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无产阶级多数，而且为革命改革奠定了基础。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首先将生产资料变为国有财产。这一举措是最终消除阶级差别（包括无产阶级本身和国家机器）的第一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重申了恩格斯的观点，即在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阶级需要压制，国家就会过时。在 1921 年的一次演讲中，列宁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指出了工人和农民无限期统治的概念中的矛盾；不同阶级的持续存在阻碍了真正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要工人和农民仍然是不同的阶级，社会主义的全面实现就遥不可及。

“刚才我走进您的大厅时，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工农政权将永远存在。’当我读到这块奇怪的牌子时，我心里想：这块牌子上写着：‘工农政权将永远存在。’这块牌子确实没有挂在通常的位置，而是放在角落里，也许是有人觉得它不太合适，所以就把它移开了。当我读到这块奇怪的牌子时，我心里想：这里面有一些我们仍然感到困惑的基本的东西。事实上，如果工农政权永远存在，我们就永远不会有社会主义，因为它意味着阶级的消灭；只要有工人和农民，就会有不同的阶级，因此就不会有充分的社会主义。”

— 弗拉基米尔·列宁，1921 年 5 月 27 日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

列宁在其著作《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除阶级差别。他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消除阶级差异的一种手段，但这个过程不是立竿见影的。因此，阶级的存在和专政是交织在一起的，直到阶级完全消亡。专政对于阶级的最终消失至关重要。有些人可能会说，列宁认为国家只有当阶级不复存在时才会开始消亡，而不是它已经处于这个过程之中。在《国家与革命》中，他提到国家在一个无阶级社会中的解体，即一个阶级不会压迫另一个阶级。然而，由于翻译上的细微差别，这种观点可能与早期的国家理论相冲突。 “国家机器”一词或马克思的原始术语“staatwesen”指的是国家作用的减弱，沦为协调行政任务和监督生产，尤其是在仍然使用劳动券的情况下。

围绕苏联及相关国家的经济制度的争论经常引发这样的问题：这些制度是否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他们所宣称的纯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形式。这一观点挑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即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联合经济”概念标志着社会主义思想迈出了关键一步。伯恩斯坦倡导进化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种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务实、渐进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合作社和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与传统社会主义对国家或工人拥有生产资料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将伯恩斯坦的思想扩展到民主参与之外，揭示了更广泛的应用，涵盖了经济的各种组织结构。这不仅包括合作社和集体，还包括法西斯政权特有的国家控制经济和法西斯主义制度，在这些制度中，经济部门被组织成没有民主治理的协会。即使是为互惠互利而合作的资本家，也可能属于这一扩大的定义。

“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的定义是朝着基于联合原则的社会秩序迈进或处于这种秩序的状态。这个意义也与该词的词源（socius——伙伴）相对应，该词在下文中被使用。”

— 爱德华·伯恩斯坦,《进化社会主义》

这种对“联合经济”的扩展理解挑战了传统的经济分类，表明如果没有民主标准，那么各种各样的制度，其中一些通常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都可能被包括在内。用马克思主义标准来给国家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会暴露出内在的矛盾。严格遵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设定的定义，将法西斯国家归类为“资本主义”就变得有问题，因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标准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身可能不符合这些标准。提出将社会主义广义地定义为“联合经济”可以避开这些不一致之处，而是关注集体所有权和组织结构，而不是国家机构和价值体系。然而，这种方法使得民族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变得无关紧要。几乎没有一个国家，除了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试图废除价值形式。即使在尝试易货系统的经济体中，市场元素仍然存在。

认为法西斯国家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说法缺乏说服力，因为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未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国家资本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特别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存在市场活动。这种更广泛的视角促使人们更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表现形式，促进关于经济组织、民主参与和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价值观的对话。通过这种视角，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更广泛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变得更加清晰，突出了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交叉和发展的复杂格局。没有商品生产，社会计划就是要消除价值形式。然而，所有计划经济都继续进行财务核算，表明市场特征仍然存在，利润动机仍然存在，正如斯大林所承认的那样。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描述了废除私有财产的预期结果，包括集体管理生产力、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以及彻底消除阶级分化。随后，国家资本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显而易见，前者通过国有化将资产阶级纳入国家机器，而后者则将无产阶级纳入国家机器。在研究法西斯政权的政策和基础时，我们将探讨这些细微差别。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中存在雇佣劳动，国家成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实体。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并没有废除雇佣劳动，而是采用了马克思认为高度资本主义的计件工资制度，这进一步说明了这些经济体系的复杂性。

“在计件工资制下，工人的个人利益自然是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这使资本家能够提高正常的劳动强度。此外，现在工人的个人利益是延长工作日，因为这样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就会提高。这逐渐引起计时工资中已经描述过的反应，更不用说，即使计件工资保持不变，工作日的延长也会导致劳动价格的下降。

因此，计件工资在使个人工资高于平均工资的同时，也倾向于降低平均工资。但是，如果长期以来传统上固定了一定的计件工资率，因此降低该工资率特别困难，那么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雇主有时就不得不强制将其改为计时工资。例如，1860 年考文垂的织带工人就发生了大罢工。计件工资最终成为上一章所述的计时制的主要支柱之一。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计件工资是最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对社会主义核心原则及其表现形式的研究，鼓励对经济结构的组织、民主参与的意义以及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原则进行讨论。这样的对话揭示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更广泛解释，甚至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联合经济的背景下。一旦充分理解了细微差别，这种比较分析就会揭示出看似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共同元素，

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揭示了对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批判性审视，并强调了资本主义对个人利润的关注所带来的局限性。资本家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无意中通过效率创新推动了社会进步。

然而，这种进步在垄断阶段停滞不前，创新逐渐减弱，为保住权力而做出的努力导致压制竞争以降低成本。这产生了一个重大矛盾：大多数人的劳动使少数富人受益，使资本主义成为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对此，社会主义者认识到管理资本以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性，并致力于重新调整社会关系与生产力。他们提倡持续和加速进步，重点从个人利润转向满足社会需求，这一转变是由这样的认识驱动的：社会福祉需要超越资本主义框架。促进生产资料社会化，特别是通过联合经济，旨在将资本控制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集体手中，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随着这些矛盾变得越来越明显，无产阶级对更公平分配劳动利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社会主义者引导的改革制度奠定了基础，他们利用对资本主义的理解重建社会结构，造福共同利益。

要理解法西斯主义，就必须理解工团主义的概念。工团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它将工会视为主要经济单位和生产资料的合法所有者。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则概述了共产主义的两阶段过程，包括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低级阶段的共产主义要求国家拥有生产资料，并代表无产阶级进行中央计划，这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还相去甚远。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发展到高级阶段，其特点是没有国家，所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代表没有社会阶级的真正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完全拥有社会主义理论，工团主义也不完全符合这两个阶段。工团主义主张各个工会拥有各自的产业，类似于蒲鲁东的工业协会。工团主义哲学于 1895 年在法国出现，吸引了乔治·索雷尔等早期支持者，他是一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最初与社会民主主义保持一致，但开始质疑其改革主义目标，后来加入革命工团主义阵营。

犹太历史学家泽夫·斯特恩赫尔（Zeev Sternhell）在《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诞生》一书中指出，法西斯主义试图瓦解现有的政治秩序，破坏其理论和道德基础。斯特恩赫尔解释了法西斯主义反对普世主义、人道主义、进步主义、自然权利和平等等资产阶级价值观，强烈反对自由主义的哲学和经济理论。斯特恩赫尔认为，索雷尔在 1909 年 4 月阅读了《君主制之争》第二版后，于 1909 年夏天信奉了整体民族主义，表达了对法国行动创始人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钦佩。

三个月后，7 月 10 日，他在恩里科·莱昂内的《社会神学》上发表了一篇对莫拉主义的热烈赞扬，该书是意大利革命工团主义的主要期刊。这篇题为《反议会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宣布了整体民族主义和索雷尔革命工团主义之间的融合——这种融合将由法国和意大利索雷尔的年轻一代实现。这揭示了意大利和法国法西斯主义在极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圈子中的起源，在那里，原法西斯运动为一种新的革命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这种新革命社会主义民族主义通过索雷尔神话、工团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综合实现。这种融合引发了一场革命，旨在根除自然权利理论和拆除民主文化的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基础，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愿景。

“它一方面将自己置于蒲鲁东的权威之下，另一方面又从索雷尔那里获得灵感——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为整个 19 世纪相互对立的两种法国传统的会面做好了准备：民族主义和未被工团主义所代表的民主所腐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 泽夫·斯特恩赫尔，《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诞生》

早期工团主义者爱德华·贝尔特对早期法西斯理论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意大利法西斯哲学家乔瓦尼·詹蒂莱和恩里科·科拉迪尼等人的著作中都体现了革命工团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反映了这些运动的共同理想和目标。尤其是墨索里尼，他呼应了革命工团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语言。在这一发展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蒲鲁东的影响，因为他对民主和议会制的拒绝引起了莫拉西亚人的共鸣，塑造了他们对民族主义和传统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民族主义并不完全与反动意识形态有关。最初，它与法国雅各宾主义和反抗帝国主义有关，如爱尔兰、波兰和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得到了索雷尔的支持。

即使是像巴枯宁这样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没有完全拒绝民族主义，他们承认人们对祖国有着天然的感情。随着社会主义开始脱离其自由主义根源，民族主义开始与之融合，形成了反对民族主义和国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将国家视为道德实体的国家工团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这种观点揭示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格雷戈尔将其描述为一种以实际理想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工团主义民族主义。墨索里尼使用的“fasci”在英文中意为“法团”，在意大利代表工会，说明了工会被纳入国家机构，这一概念被称为国家工团主义或法团主义。工会采用“fascio”符号来表示其凝聚力，后来墨索里尼将其重新用于象征工团主义和法团主义国家。意大利革命工团主义者鼓吹战争，将民族神话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则反对战争，坚持阶级还原论，这促使墨索里尼转向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分歧促使墨索里尼放弃马克思主义，他对社会主义言论感到失望，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言论缺乏革命所需的活力和决心。

斯特恩赫尔强调了革命领袖背离马克思革命模式的一个有趣方面，马克思的革命模式强调无产阶级获得阶级意识。这些领导人中的许多人来自南部地区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圈子，他们带来了反叛传统，并渴望将意大利南方的农业工人纳入革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拉布里奥拉和莱昂等知识分子开始修改马克思主义，他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展开。在意大利，改良社会主义与自由资产阶级的合作不仅加强了现有的社会秩序，而且加深了工业化北部和农业南部之间的分歧，导致大规模移民，尤其是来自欠发达南部的移民。到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末，这成为革命工团主义者和激进民族主义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反对导致基本民族要素丧失、延续欠发达和促进移民的制度的斗争成为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综合体的共同目标。1910 年左右，民族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运动都对意大利现有的政治制度怀有强烈的厌恶。他们认为乔利蒂所代表的自由议会民主是困扰国家的致命疾病，并将战争视为一种潜在的新解决方案。激进民族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者，尤其是到 1914 年，得出结论，如果实施得当，战争可以成为消除意大利弊病的有力良药。正如法雷尔在《墨索里尼：新生活》中所指出的，这种与主流左翼的背离正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被贴上反动标签的原因。

“意大利左派立即将法西斯主义打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势力的标签。他们一直这样说。历史大体上接受了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定义，但法西斯主义绝不是右翼运动。”
——尼古拉斯·法雷尔，《墨索里尼：新生活》

在《雅努斯的面孔》中，格雷戈尔认为，与马克思主义不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实现其目标方面更为成功。这导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历史的进步发展。尽管在罗马进军期间，法西斯主义队伍中有相当多的产业工人，但它仍然被认为是反动的，其工人被认为具有虚假意识。与马克思主义未能带来社会变革相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促进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构成了真正的威胁。马克思主义者将法西斯主义描绘成资本主义衰落的象征或金融资本的力量，以此合理化他们的失败。根据格雷戈尔的说法，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被贴上非理性的标签，因为它违背了历史进程，它用来实现目标的手段被视为野蛮和不人道的。然而，格雷戈尔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观点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在被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击败后试图诋毁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而传播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神话的重要性，以及人们优先考虑国家、传统和宗教而不是阶级的事实。墨索里尼受到工团主义和索雷尔等思想家的影响，将尼采和贵族神话融入其意识形态，提倡基于质量而非数量的社会主义。

“法西斯主义本身是索雷尔工团主义的一种变体，它自诩为唯意志主义、新理想主义和精英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金蒂莱从未拒绝过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潮流。金蒂莱坚持认为，“法西斯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索雷尔遗产的产物……加上当代意大利理想主义的影响，法西斯思想正是通过这种理想主义而成熟的，它将哲学视为实践。 ”
— A.詹姆斯·格雷戈尔，《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

格雷戈尔指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背后的主要思想家主要是信奉民族主义的工团主义者或采取工团主义经济立场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和工团主义的融合根植于对自由主义的共同反对，目标是用新的、注重道德革新的无产阶级精英取代资产阶级精英。法西斯主义者将国家视为民族的法律体现。1919 年，国家法西斯党以法西斯宣言为竞选纲领，该宣言由意大利未来主义艺术运动的杰出人物 F.T. 马里内蒂和革命工团主义者阿尔塞斯特·德·安布里斯撰写。未来主义者拒绝传统，试图拆除博物馆、图书馆和学院等机构，同时支持经济工团主义。

“我们要拆除博物馆和图书馆，打击道德、女权主义以及一切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懦弱行为。”
— FT Marinetti，未来主义宣言

马里内蒂强调暴力、英雄崇拜和使用武力实现国家目标的必要性和美感。他还强调神话的重要性，这一点与索雷尔类似。1921 年国家法西斯党的纲领和章程中概述的原则反映了这些思想，与法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综合体相媲美。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早期到垮台，整体民族主义和综合主义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各种欧洲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发展起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修正，甚至可以看作是超越马克思主义但保留某些元素的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意识形态。

“墨索里尼是一位见多识广、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终极政治信念代表了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改革，即恢复其黑格尔主义的元素。”

— A.詹姆斯·格雷戈尔,《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

要了解纳粹主义的起源，请阅读以下内容：

分析法西斯思想的根源，可以发现其哲学基础与一种极端的工团主义有着深刻的联系。然而，要全面理解法西斯主义，还需要深入研究其政治理论。批评者，包括网络声音和翁贝托·埃科等左翼作家，认为法西斯理论不值得研究。我的观点不同。法西斯主义在两个层面上运作：其理论基础和实际实施。在我看来，忽视其理论方面而只关注其实际效果是一个重大错误。通过研究法西斯理论家的著作和解释，我们发现任何意识形态中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动态。这些动态涉及妥协、对政治环境的适应以及现有体系内的战略机动。

有些人以法西斯主义从未得到充分实施为由，拒绝研究法西斯主义原则。然而，尽管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偏离了这些理论，后来也只是部分采纳了这些理论，但这种论点并没有减损对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我们研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为了获得深刻的见解。这种批评来自左派尤其矛盾，因为左派本身也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并面临“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指控。从共产主义团体内部的不同观点，或斯大林、霍查、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等人物对不同理论家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同样，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都有不同的政纲，他们承认这些政纲在反映候选人和政党的信仰和价值观方面发挥着作用，从而影响了公众舆论。认为法西斯理论没有完全实现就不重要或无效，忽视了德国这样的案例，法西斯意识形态在那里被广泛实施，甚至导致失败。无论法西斯理论是否完全实现，研究法西斯理论对于理解其核心及其应用背景都至关重要。

“左右两派是密不可分的。他们都是横跨所有阶级的，都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左派和右派都必须同样地拥护民主议会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意味着他们在捍卫民主的同时，也在捍卫资本主义。”

— 皮埃尔·罗谢尔,《法西斯社会主义》

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延伸到左右两派政治领域，因为他们被视为资本主义利益的推动者，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墨索里尼强调了这一观点。他发动对社会主义的攻势，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还因为它与他的民族主义议程相悖。他的目标是让无产阶级远离主流社会主义政党，并渴望形成一支决定性的少数派力量。此外，墨索里尼直言不讳，法西斯主义者无意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联手对抗共产主义。他认为他们是不可靠的伙伴，只会利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谋取私利。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位支持者埃德蒙多·罗索尼也认同这一观点。他指出，工人不仅遭到资本家的剥削和蔑视，还遭到所谓的国外革命盟友的剥削和蔑视。因此，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认为国际主义是一个空洞而虚伪的概念。尽管如此，民族主义并非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议程的唯一推动力。他们尖锐地批评了传统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将其与他们认为的真正的革命民族主义区分开来。**法西斯主义认为这种肤浅而模糊的民族主义形式类似于左翼与右翼的误导性二元论**，罗谢尔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

“模糊的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防御形式。资本主义利用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炒作，尽管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超出了资本主义的范围，并且从本质上讲，它与任何和所有物质主义的政治和社会表现形式都是分离或独立的。”

— 皮埃尔·罗谢尔,《法西斯社会主义》

声明强调，并非所有民族主义运动都等同于法西斯主义。事实上，法西斯主义会排斥某些缺乏必要激进热情的民族主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基思·伍兹和理查德·斯宾塞批评唐纳德·特朗普的民族主义版本。他们认为特朗普的做法与古典自由主义价值观交织得太深，变革性不足以与真正的民族主义哲学保持一致。**法西斯主义者认识到，信奉资本主义理想的民族主义团体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这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断言法西斯主义迎合金融资本家的议程是一个有缺陷的论点。**墨索里尼的政治历程也表明了他与社会主义的复杂关系。1917 年，他表示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甚至称自己为“意大利的列宁”。在 1919 年的选举中，墨索里尼对社会主义革命家乔治·索雷尔的钦佩显而易见，这进一步凸显了他的社会主义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他临终前写下的《最后遗嘱》中，墨索里尼也坚持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这些例子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贯穿墨索里尼一生的政治身份。

“随着社会的自然发展越来越多地证明马克思的预言是错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从可能退到了可能。唯一可以真正实施的可行社会主义是社团主义——一个融合点，一个平衡和正义的地方，尊重集体利益。”

— 贝尼托·墨索里尼,《最后的遗嘱》

墨索里尼在 1928 年的自传中尖锐地批判了自由主义原则，强调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公民作为独立存在并有权反对国家集体决定的观念被完全否定。大萧条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加剧了墨索里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尤其是对个人经济自由和自由放任政策的强调。在《法西斯主义学说》中，他明确指出，只有当个人目标与国家目标一致时，个人的重要性才会得到承认。这与古典自由主义以个人为中心的哲学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主张国家的最高权力，将治理作为其主要关注点。必须纠正许多共产主义者和右翼人士普遍存在的误解，他们常常将法西斯社团主义误认为是私人企业垄断和国家之间密切合作的体系。这是一个深刻的误解。法西斯经济政策实际上是通过国有工会进行经济管理，是一种工团主义。

“公司国家以工业和职业组织为基础，而不是当今社会实行的区域或地理政府方法。这一特征将在整个政府和代表系统中普遍存在，并且必须将其作为公司主义的绝对基本原则来把握。这个想法提出，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应该组织成主要的利益集团，称为公司，其功能类似于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工人将按照职业和行业路线组织起来，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将通过谈判和联合协议在国家监督下解决任何问题。在公司主义下，一个行业的劳动力和管理层属于一个行业组织，如行会、辛迪加或公司。这些团体的代表被选举进入劳资大会，通过集体谈判解决问题。这些公司的职责可以分为三个核心类别：监管、规划和社会方面。每个公司都必须通过谈判来规范其控制的行业中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它还必须与国家和各类企业家合作，规划工业的发展或关闭多余的工厂；最后，它必须关注从事该行业的人们的社会福利、工业保险、退休金等。”

— 亚历山大·汤姆森,《未来的企业国家》

本书全面阐述了法西斯经济体系的典型特征。行会、公司或辛迪加（有时合并为一个全国性工会）将各种经济活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这些组织就工资、定价和生产限

制等问题进行集体谈判。包括银行和基础设施在内的基本服务被国有化，以确保国家权力凌驾于私人利益之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就有这方面的证据，特别是在“个性和民族国家概念”和“工会问题”两章中。历史学家伊恩·克肖观察到，纳粹对罢工的支持导致农村选民大量弃权，而农村选民自 1928 年以来一直是该党的可靠支持来源。

戈特弗里德·费德对社会国家的探索反映了类似的想法。《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和学说》更进一步，在法团国家部分详细阐述了工会如何与国家机构合并。它阐明了法西斯主义借用了工团主义对辛迪加在教育和道德中的作用的看法，旨在使辛迪加与国家监督的公司协调一致。这一过程旨在展示国家固有的统一性，并将个人视为集体国民经济中实际的熟练工人，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构造。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重要人物塞尔吉奥·帕努齐奥阐明了 1926 年意大利工团主义法律背后的理由，声称促进经济发展对于工团主义体系实现其生产顶峰至关重要，这是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一步。罗索尼是一位著名的工团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他在定义意大利工团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他的努力极大地塑造了意大利的企业模式。贝尼托·墨索里尼在他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上宣称：“革命的完成取决于法西斯工团的行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罗索尼工会的力量对工业家构成了如此大的威胁，以至于一些人考虑招募共产党员来对抗意大利法西斯势力。本文讨论了工业家和法西斯工团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萨尔维米尼继续说道：‘现在工业家们不再对墨索里尼感到满意。他们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好管教。’在文章的最后，萨尔维米尼提到了传给天主教报纸《人民报》编辑多纳蒂的信息，指出：‘都灵的一位工业家告诉多纳蒂，在他的圈子里，人们开始问自己，现在付钱给共产党人来对抗法西斯分子是否明智！’ 5 月初，未来的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写信给莫斯科的葛兰西说：‘工业阶级对新政权相当警惕，担心与法西斯集团的阶级斗争会出现不可预测的发展。’”

—意大利工业家富兰克林·休·阿德勒（Franklin Hugh Adler）从自由主义到法西斯主义

这凸显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罗索尼观点中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元素。共产党人指出工业家害怕法西斯，而通常指责法西斯主义是亲资本主义的，这种讽刺是值得注意的。罗索尼对资本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反对；1926 年，他谴责工业家是吸血鬼，认为他们是工人接管经济之前的临时人物。这种观点是企业国家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企业国家旨在将经济权力转移给工人，从而有效地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罗索尼对法西斯思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他最终在 1943 年与共产党结盟，表达了他对墨索里尼的不满，这可以被解读为凸显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暗流，或挑战了人们对意大利法西斯“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尼古拉·邦巴奇对墨索里尼的政策和社团主义深信不疑，他认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引发了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邦巴奇认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列宁的苏联有相似之处，认为两者的动机都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提升无产阶级的地位。

“法西斯主义带来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墨索里尼和列宁。苏联和企业法西斯国家，罗马和莫斯科。我们必须纠正很多，没有什么可以原谅我们，因为今天和昨天一样，我们被同样的理想所驱使：劳动的胜利。”

— 尼古拉·邦巴奇，埃里克·诺林在《革命法西斯主义》中引用

正是这个人在 1943 年维罗纳大会上提出了法西斯社会化的经济理论，资产阶级嘲讽地称他为“红色教皇”。在 1945 年热那亚的一次集会上，邦巴奇大胆地宣称“斯大林永远不会实现社会主义；墨索里尼会。”他从 1943 年到 1945 年参与法西斯运动并不是该运动鼎盛时期叛徒的机会主义；相反，他在法西斯事业衰落期间致力于该事业，最终与墨索里尼一起面临处决。据报道，邦巴奇的遗言是“社会主义万岁!”在《法西斯主义学说》中，墨索里尼和金蒂莱挑战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强调了对其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批判。他们钦佩俾斯麦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拒绝，主张国家发挥更多的干预作用，特别是考虑到 1929 年经济衰退暴露出的资本主义的缺陷。

他们的分析延伸到谴责自由国家的被动性质，在他们看来，这些国家忽视了积极促进社会福祉。文本表达了一种愿景，即国家利益优先于个人权利，主张集体认同高于个人野心。这种观点是对全球化及其资本主义基础的更广泛怀疑的一部分，这些资本主义基础被视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来使少数人致富。最终，墨索里尼和詹蒂莱的讨论达到了高潮，他们提出了一种模式，即国家在塑造国家命运方面发挥着核心指导作用。这与戈特弗里德·费德作品中的反资本主义极为相似：

“只有当消灭利息奴役的根本要求得到满足时，社会国家的道路才第一次被扫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必须不顾一切拜金主义势力的反对，做到这一点。在利息奴役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社会化的呼声无非是企图建立一切工业的托拉斯和到处建立大企业集团，而大借贷资本，尽管征收各种财富税，将来当然也会对这些企业集团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建立在拜金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荒谬的，它必然导致已经深受拜金主义污染的社会民主党和大资本之间的妥协。

相反，我们要求彻底拒绝拜金主义国家，并根据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重建国家，其中统治的基本思想是滋养的义务——共产主义的古老基本要求可以在其中找到合理和有用的满足——形式是每个公民都应通过国家对最重要的粮食的分配，获得其在祖国土地上应有的权利。

我们进一步要求，作为新国家的骨架，人民代表院应由最广泛的选民选出，此外还要有一个常设的劳工院，即全国工人根据其职业和经济阶层的分布情况拥有发言权的中央委员会。最后，我们要求国家领导人承担最高责任。这种以社会主义贵族为基础的新国家建设将在同一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增刊中讨论。然而，所有这些建设的先决条件仍然是废除利息奴役。”

— 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废除利息奴役宣言》

马克斯·弗劳恩多弗、费德尔和奥托·瓦格纳等人都是法团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热切地推崇纳粹法团国家的概念。纳粹党内许多人都信奉某种形式的法团主义，包括希特勒，《我的奋斗》就是明证。奥托·瓦格纳在回忆录中讨论了在不采取暴力手段的情况下从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挑战。他批评马克思和列宁确定了正确的目标，却选择了一种在他看来导致俄罗斯社会不必要的痛苦和同质化的道路。瓦格纳将此与

他的信念进行了对比，他认为纳粹政权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超越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有趣的是，瓦格纳回忆了与希特勒的对话，希特勒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与耶稣在新约中的教义相呼应。希特勒认为，尽管基督教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这些社会原则尚未完全实现。他突发奇想地提出，纳粹主义实际上是耶稣社会主义思想的真实实现，并将犹太人描绘成这一愿景的对手，而将耶稣描绘成社会主义烈士。

希特勒对共产主义的厌恶源于他认为共产主义效仿苏联，创造了统一的社会，缺乏个体差异。他主张“民族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和列宁所倡导的国际社会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当时的主要挑战是解放劳动力，寻求扭转资本主宰劳动力的现行等级制度，转而以劳动力统治资本为目标。通过瓦格纳的回忆录，希特勒成为一个虽然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在运用上却大相径庭的人物，类似于墨索里尼对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态度。希特勒将自己定位为革命社会主义者，希望纠正他所看到的基督教和以前的共产主义努力的失败，宣称他的政权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未能实现的目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左派普遍使用的“晚期资本主义”和“超级资本主义”等术语源自纳粹思想家。 “晚期资本主义”是一个带有反犹太主义色彩的术语，由维尔纳·桑巴特推广，而“超级资本主义”则由阿尔弗雷德·布伦纳在早期德国工人党宣言中提出。

“超级资本主义的出现源于此前土地销售和生产能力的自由化。自由土地不存在超级资本主义。”

— 阿尔弗雷德·布伦纳，《在无犹太人和无资本的基础上建立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纲要》

1933 年 11 月，墨索里尼在《企业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衰落》的演讲中，仔细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观察到了协议、辛迪加、公司和托拉斯在欧洲和美国的兴起。他指出，自由竞争因此而崩溃，因为资本主义企业更喜欢结盟而不是竞争，分割市场和分享利润，而不是争夺统治地位。这些工业集团操纵市场的能力破坏了供需理论。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巩固和托拉斯化，越来越多地寻求国家的庇护，寻求关税保护和其他形式的国家干预。自由主义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延伸——面临消亡。墨索里尼强调了美国等国家，它们建立了巨大的贸易壁垒，而英国则放弃了传统的经济政策，转而实行保护主义。战后的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企业规模空前膨胀，导致物质主义对精神和生理的支配，这已成了一种病态。墨索里尼警告人们警惕他所谓的“超级资本主义”的兴起，这种制度旨在使人类同质化，从摇篮到棺材，一切都标准化。这种超级资本主义的愿景寻求欲望、消费和生活方式的统一，将个性简化为一系列功利主义需求。

“在这个阶段，超级资本主义从乌托邦中找到了灵感和理由：无限消费的乌托邦。超级资本主义的理想是人类从摇篮到坟墓的标准化。超级资本主义希望所有婴儿出生时都身长完全相同，这样摇篮就可以标准化，所有孩子都会喜欢相同的玩具。它希望所有人都穿同样的制服，读同一本书，对电影有同样的品味，渴望同样的所谓省力设备。这不是任性的结果。它存在于事件的逻辑中，因为只有这样超级资本主义才能制定计划。”

—西蒙内塔·法拉斯卡-赞波尼所著《法西斯奇观：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权力美学》中引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话

恩斯特·荣格是德国革命保守运动的关键人物，与民族布尔什维克和斯特拉瑟兄弟有联系，他指出，大型托拉斯基本上已成为国家内部的自治实体。他提议，在普鲁士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经济巨头应该融入国家框架。这个想法呼应了墨索里尼的信念，即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国家，不容许任何反对或独立于其权威。在这个设想中的企业国家中，团结与合作至关重要，没有可能扰乱其运作的内部不和的余地。这个概念是让国家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有机体运作，每个组成部分都齐心协力。亨利·阿什比·特纳的著作《希特勒三十天掌权》以有趣的方式突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强调了其对经济和政治控制的独特方法。

保守派人物库尔特·冯·施莱歇尔试图通过提议希特勒担任副总理来控制希特勒，同时威胁要组建一个反纳粹联盟，即所谓的“交叉阵线”。希特勒拒绝任何从属职位，坚持担任总理，因此施莱歇尔的战略失败了。戈培尔嘲笑希特勒在资产阶级政府下任职的想法，他说：“元首担任资产阶级内阁副总理的想法太荒谬了，不值得认真对待。”1931 年接受理查德·布莱廷采访时，希特勒否认了纳粹主义支持资本主义的想法，澄清说他的政党的经济计划包括国有化公共公司，类似于社会主义。他强调国家的权威和社区福利优先于个人利益。国家将监督财产所有者，他们应该充当公共利益的管家。希特勒毫不关心资产阶级对私有财产权的关注，批评他们道德败坏、自私自利，并指责资产阶级媒体对他和他的运动怀有敌意。希特勒的言论展示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可以参考费德尔制定的党纲，该纲领主张信托国有化、利润分享、无补偿土地改革和大型百货商店的公有化经营。仔细阅读汉斯·泽勒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也会发现社会主义的线索交织在意识形态中。戈培尔本人在其出版物《民族社会主义者的 ABC》中强调了这种情绪，强调了该党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基础。

“股票交易资本不是生产性的，而是寄生性囤积的资本。它不再与土地联系在一起，而是无根的、国际化的；它不生产，而是渗透到正常的生产过程中，以从中榨取利润。它由动产即原始现金组成；它的主要载体是犹太高级金融，其目标是让生产民众工作，然后将他们的劳动收益收入囊中。”

— 约瑟夫·戈培尔，《民族社会主义者的 ABC》

1941 年，希特勒在国会会议上发表了关于纳粹意识形态的演讲，内容如下：

“我们选择了一条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道路。一个极端束缚着我们的人民。它是自由个人主义的极端，它不仅把个人作为利益的中心，而且把个人作为一切行动的中心。另一方面，我们的人民受到普遍人性理论的诱惑，而这种理论是个人的唯一指南。另一方面，我们把人民看作是上帝意志下形成的身心共同体。我们被置于这个共同体中，只有它，我们才能形成我们的存在。我们有意识地把所有的考虑都服从于这个目标，我根据它塑造了所有的利益和所有的行动。因此，克服了个人主义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世界出现了。共同利益在必要时会调节和命令，限制和指挥。”

—莱纳·齐特曼在《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中引用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话

综合考虑所有因素，我的结论是，法西斯主义从根本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一种变体。克罗地亚乌斯塔沙强化了这一观点，其意识形态融合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倡导爱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相呼应。

“真正的社会主义脱离了民族框架是无法想象的。没有社区意识，没有人民代表社区理想，社会主义的成果就不可能实现。”

— 亚历山大·塞茨，《克罗地亚社会主义之路》

纳粹党缺乏社会主义成分的说法经常与驱逐施特拉瑟主义有关。然而，研究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的作品会发现，他的作品与纳粹意识形态及其总体原则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彼得·斯塔丘拉在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的传记中，重点介绍了施特拉瑟和希特勒在 1933 年末至 1934 年初期间就施特拉瑟在政府中的潜在作用进行的讨论，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回忆录和大卫·欧文的著作也支持这一说法。这些证据表明，对纳粹党内所谓的社会主义者的清洗并不像人们通常描述的那样明确，更像是一场类似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政治权力斗争，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系统性清除。约瑟夫·戈培尔在纳粹领导层中的持续影响力进一步挑战了该党与社会主义思想保持距离的观点。奥托·斯特拉瑟的角色反映了托洛茨基在更广泛背景下作为政治局外人的角色。大清洗期间处决恩斯特·罗姆并不一定表明希特勒支持资本主义，就像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信誉并没有因他们反对孟什维克或暗杀托洛茨基而受到削弱一样。《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中的分析反对将大清洗解释为纳粹党对社会主义的拒绝，这表明其中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动态。

“希特勒与罗姆之间的冲突，不是反动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革命模式代表之间的冲突。历史学家毛泽东对此的描述最为清楚，他说，这是一场旧派革命与现代革命代表之间的冲突。”

— 莱纳·齐特曼，《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

戈培尔是德国宣传部长，也是希特勒的亲密心腹，他通过宣传工作深入了解了纳粹意识形态。在《纳粹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者问答》一书中，戈培尔反对马克思主义，声称马克思主义辜负了德国工人，且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他断言马克思主义有害于国家和工人阶级，德国工人由于缺乏其他选择而被误导接受马克思主义。戈培尔鼓励工人拒绝马克思主义，转而支持另一种社会主义——纳粹主义。这突出了纳粹意识形态中独特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强调纳粹主义本质上并不拒绝社会主义。相反，戈培尔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指出德国工人不应该怀疑社会主义，而应该明确拒绝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纲领”一章中，戈培尔声称，与其他做出空洞承诺的政党不同，纳粹党的目标很明确：解放德国工人，让他们重新融入国家。他表示，如果为了国家自由和打破任何阻碍德国工人基本生活保障的枷锁，纳粹党准备进行一场社会革命。纳粹党承诺为工人的生存权而战，将这场斗争描述为一场争取自由和繁荣的斗争。

这些论点代表了戈培尔明显支持劳工、看似社会主义的叙述，这种叙述是明确而深思熟虑的。对于那些仍然持怀疑态度的人，戈培尔在“生产与社会问题”一章中进一步阐述，他指出：

“为此，我们要求：

1. 大自然赐予人民的一切：土地、河流、山脉、森林、地下宝藏和空中空气，原则上都属于全体人民。如果人民同志拥有这些财产，他必须对国家作为人民财产的管理者负有义务。如果他管理不善，或对社会造成危害，国家有权将这些财产从他手中夺走，并重新归还给社会。
2. 生产，只要需要人的力量、能力、创造力、创业精神和天赋，就属于个人所有。国家保证那些为生产做出贡献的人，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者，都能分享所有权和利润。
3. 那些已经基本完成、不再需要力量、能力、创造力、创业精神和才智的生产（例如，运输系统、托拉斯、企业集团）将收归国有。

这关闭了生产的大循环，并再次将所有生产工人纳入其中。在实现这一要求时，我们将劳动力从工资奴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结果将是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土地上的自由经济：人民社区。”

— 约瑟夫·戈培尔，《纳粹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者问答》

戈培尔言论中的社会主义意味在这里更加明显。具体来说，他主张利润分享和员工持股，还支持工业信托、企业集团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国有化。他关于将劳动力从“工资奴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产生了共鸣。甚至他所说的“原则上一切属于全体人民”也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重要的是，要将戈培尔看似共产主义的立场置于纳粹党内的背景之下。他与希特勒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在纳粹德国的影响力使他的言论具有分量，证实了这些言论在更广泛的纳粹党意识形态背景下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戈培尔有亲布尔什维克倾向，这偶尔使他与希特勒发生冲突。拉尔夫·格奥尔格·鲁斯（Ralf Georg Reuth）的戈培尔传记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复杂性。

“在戈培尔非常看重的社会正义问题上，希特勒并不认同戈培尔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继承者的观点。戈培尔认为，没有一位沙皇像列宁那样了解俄罗斯人民的民族主义本能，而列宁与德国共产党不同，并不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 格奥尔格·罗伊特的戈培尔

在《魏玛共和国资料手册》中引用的戈培尔的《民族社会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戈培尔批评了将苏维埃俄国视为国际团结灯塔的观点。他认为，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实际上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或泛斯拉夫主义的一种形式。戈培尔断言，苏联体制之所以能生存下来，不是因为它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它体现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戈培尔认为，列宁在沙皇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他与俄罗斯民众，尤其是农民建立了联系，给予他们他们认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自由和土地所有权。

戈培尔随后将德国共产党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想主义观点与俄罗斯正在发生的现实民族主义演变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切实际且脱离现实的。他认为列宁优先考虑俄罗斯的自治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暗示德国共产党人正在做出相反的选择，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牺牲德国的自由。此外，戈培尔还评论了犹太人融入苏联体制的情况，认为他们已经适应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转变，无论是出于战略原因还是其他原因。他指责西方国家对苏维埃俄罗斯怀有敌意，因为苏维埃俄罗斯

的民族主义立场与资本主义利益不相容。最后，戈培尔向读者提出了共同反犹太主义的指控，声称大家普遍认为犹太人的存在在布尔什维克国家中是矛盾的。他挑战了读者不愿公开承认这种情绪的态度。在希特勒随后的著作中，希特勒重申了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内部出现民族主义倾向的类似观察。

“然而，可以想象，在俄罗斯本身，布尔什维克世界内部也可能发生变革。犹太元素也许会被或多或少俄罗斯民族元素所取代。那么，也不排除目前真正的犹太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可能会被民族主义反资本主义倾向所驱使。”

— 阿道夫·希特勒，第二本书

我们可以看到戈培尔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热爱渗透到了纳粹党的官方宣传中，他至少从 1926 年起就一直坚持这一立场。在 1926 年 1 月为《民族社会主义简报》撰写的一篇题为《取向：西方还是东方》的文章中，戈培尔明确表达了他对与俄罗斯结盟的支持。彼得·隆格里希在他的传记中引用了他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俄罗斯并肩作为平等的伙伴，共同争取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一切的自由。”

— 约瑟夫·戈培尔 在格奥尔格·鲁斯的《戈培尔》中引用

戈培尔早年在纳粹党内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公开表达了亲苏立场，因此他宣布自己倾向于布尔什维克，这一点值得注意。尽管后来纳粹的宣传似乎与这些最初的立场相冲突，但可以合理地推测，这种言论的变化是对德国地缘政治战略转变和最终与苏联对抗的反应。尽管如此，戈培尔的言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在党内的观点。戈培尔并不是唯一一个亲苏的人。德国外交部长、《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起草人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是德苏结盟对抗盟军的坚定倡导者。另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德国大使弗里德里希·冯·舒伦堡，他认为德苏冲突对西方文明来说是灾难性的。舒伦堡虽然不是亲俄派，但他赞同奥托·冯·俾斯麦的观点，认为德俄和平对于维持德国的强大和繁荣必不可少。然而，这种联盟的前提是苏联吞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是希特勒不愿做出的让步，最终导致联盟无法实现。

历史记载表明，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等待希特勒，1929-1941》一书中承认，斯大林认可希特勒在迅速组织德国和消灭庞大的德国共产党方面的成效。同样，希特勒在 1941 年录制的《桌边谈话》中，将斯大林描述为一位非凡的历史人物，指出他从一个谦逊的办事员成长为一个通过反应灵敏的官僚机构发号施令的统治者，而无需花言巧语。这些引述表明两位领导人都欣赏对方在巩固权力和改造各自国家方面的能力。斯特恩赫尔对此观点做出了更多贡献：

“由于他是一个革命者，所以战斗者只能是法西斯主义者或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在意大利境外第一个法西斯运动的创始人看来，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对资产阶级和富豪精神的同一种反应”。对于金融家、石油大亨、养猪人，他们自认为是地球的主人，希望按照金钱法则、汽车要求和猪的哲学来组织世界，并让人民屈服于红利哲学，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都举起剑来回答。他们都宣扬战斗者的法律。

乔治·瓦卢瓦是法国最早坚持左翼和右翼革命者拥有共同基础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两个互相敌对的兄弟，他们之所以是兄弟，是因为他们共同鄙视资产阶级政权；他们之所以是敌人，是因为他们占据着欧洲两个对立的首都——法西斯主义占据着圣湖（地中海），布尔什维克主义占据着野蛮之地。

此后二十年，所有真正的法西斯分子都表现出了类似的行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在战争年代，他们对资产阶级欧洲的仇恨往往比对共产主义的反对更为强烈。”

— Zeev Sternhell，《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法国的法西斯意识形态》

著名纳粹分子莱昂·德格雷勒表示，他们在俄国的战斗不是为了保卫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革命。他表示，他们宁愿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一切，也不愿看到欧洲重回颓废的资本主义。根据德格雷勒的说法，真正的目的是战后必然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此外，俄国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在其 1927 年的作品《革命的钟声》中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有相似之处，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他将他们之间的相互仇恨描述为兄弟般的，并将两者都视为“凯撒主义”的先兆，暗示着共同的命运。在 1941 年 6 月 16 日纳粹进攻苏联前不久，戈培尔在日记中写下了对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信心。他对后征服俄罗斯的愿景排除了沙皇制度的复兴；此外，在苏德外交和睦时期，德国共产党的官方立场——即 1939 年 12 月 30 日共产国际德国委员会起草的政治纲领——虽然批判了纳粹主义，但仍然将纳粹党打上反对法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标签，认为纳粹党是企图破坏德苏关系、分裂德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法西斯主义中，私有财产的概念通常与小规模所有权有关，包括小农、手工艺人、工匠和小资产阶级。这与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等人的解释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区分了满足个人需求的财产——“人的财产”——和与货币积累和借贷相关的财产，或资产阶级生产系统特有的“资本财产”。这种对财产概念的区分表明，这与社会主义原则并不存在根本上的不相容性。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当我们谈论资本主义时，我们谈论的并不是财产。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财产是个人对物质的直接投射；它是人类的基本属性。资本主义逐渐用资本的财产取代了个人的这种财产，资本是经济统治的技术工具。随着大资本和小私有财产之间可怕的不公平竞争，资本主义逐渐消灭了手工业、小工业和小规模农业；它逐渐把一切都交给了大托拉斯和大银行集团，而且这种做法还在不断加强。最终，资本主义使老板和工人、雇员和雇主陷入同样的焦虑状态，陷入被剥夺了一切属性、生活失去一切意义的人的同样非人状态。”

—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精选》

在共产主义观点中，私有财产（不同于个人物品）被视为一种将人们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制度，导致一种缺乏人性的异化状态。它与个人所有权无关；相反，它是一种与高利贷、冲突和社会崩溃相关的疏远财产。这种解释与法西斯意识形态相吻合，在法西斯意识形态中，与资本相关的财产被认为超越了个人所有权，可以自主运作、集中权力并主宰社会。如果人们抛开描述这种现象的不同术语，这两种意识形态都强调了这种财产的反社会和非人性化方面及其对社区的有害影响。共产主义者提议逐步废除私有财产，采取措施逐渐使其变得无关紧要。同样，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采取了

一种进步的方式，通过缓慢扩大国家影响力和限制私人财产权，尽管保留了个人财产。此外，斯大林批准的 1936 年苏联宪法承认小农和手工艺人拥有土地和从事当地私人贸易的权利，表明承认集体框架内的个人所有权。

“第十条 公民对自己的劳动收入和储蓄、住宅和家庭附属经济、家用家具、用具和个人使用、便利用品的私有财产的权利和继承权受法律保护。”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1936 年 12 月 5 日

在苏联后期，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推广私有农业的政策得到了扩大，这些自留地对苏联农业产量贡献巨大，约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一。这些土地在某些领域特别高产，例如土豆、蔬菜、肉类、牛奶和鸡蛋。迈克尔·戈德菲尔德和梅尔文·罗森伯格合着的《资本主义重生的神话》详述了自留地对苏联农业的巨大贡献，甚至指出战前对自留地的依赖程度更高。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将后斯大林时期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并将其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然而，如果人们接受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那就意味着农民和工匠的小规模私有制可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共存，而不会破坏它或恢复资产阶级关系。同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其三级公社制度中纳入了自留地，允许家庭拥有和耕种小农场供个人使用或出售剩余农产品。罗伯特·L·沃德（Robert L. Ward）的著作《中国：一个国家研究》描述了农业部门如何围绕集体制度构建，其中家庭也保留自留地并有出售或消费其产出的自由。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匈牙利，在亚诺什·卡达尔的领导下，经济模式遵循了与何塞所描述的类似的结构。虽然政府将所有大型企业和工业机械收归国有，但小规模农田和零售店仍掌握在私人手中。

套用匈牙利文章的一句话：

计划管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阵营”作用更大

国有制的作用十分重要

私营企业作用较小

福林对市场过程的依赖程度较低

农业和工业的作用十分重要

银行体系的作用不那么重要

社会主义消费习惯

共产主义波兰与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不同，它从未完全实现农业集体化。正如 Jarka Chloupkova 在《波兰农业：组织结构和转型的影响》一书中所指出的，波兰大部分农田为私人所有和经营，抵制共产主义集体化努力。因此，即使在共产主义时代，波兰的农业部门仍然以私营为主。这种私有制产生了真正的商业激励，尽管农场规模小导致效率低下。在共产主义时期，私营农场占农业劳动力的 80% 左右，生产了超过四分之三的农业总产量，这使得农业部门的私有性质在共产主义政权的背景下成为一种政治讽刺。Glenn E. Curtis 的《波兰：一个国家研究》强调，从 1956 年开始，波兰的农业部门就以其私有制为主在经互会国家中脱颖而出。尽管如此，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仍通过强制配额和对供应的控制保持影响力，并影响耕作方法和土地销售。歧视性的资源分配政策确保私人农场规模一直很小，并且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都依

赖体力劳动。人们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对波兰农业方法的批评很少，这通常被称为“修正主义”。这也意味着，人们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财产权方面的相似之处可能源于翻译上的误解。当我们考虑到所描述的适当背景时，两者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更加明显。

《餐桌谈话》讨论了希特勒对财产的看法。希特勒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家族财产的价值，由家庭成员而不是国家官员管理，因为这样可能会更有效率。然而，他批评以匿名股东参与形式存在的财产所有权，认为此类企业的利润属于国家，而不仅仅是个人投资者。希特勒的立场是，私有财产应该促进将经济管理委托给熟悉生产条件的地方当局，而不是建立静态的财产所有权关系。他的观点与纳粹实施的国有化政策和戈培尔的言论一致，认为资产阶级只是充当管理者，直到无产阶级准备好接管。这种方法与罗索尼的建议一致，即工业家保留其角色，直到工人准备好管理意大利经济。

“法西斯纳粹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显然对资本家和企业高管来说更人道，对社会也更有利，而共产主义则突然取消一个系统及其管理人员，并在没有足够的专家的情况下建立继任系统。让资本主义工业家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委员比让他们成为尸体要好，这既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社会，活着比死去更能被社会利用。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就有时间在专家的指导下培训其人员，而后者则能够在服务和舒适中结束他们的生命。”

— 劳伦斯·丹尼斯，《战争与革命的动力》

乔瓦尼·金蒂莱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主张强调实践的变革方法。他重新设想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融入了精神层面，以实现更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法西斯主义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时期以及随后与左翼团体的讨论中，金蒂莱将法西斯主义描绘为拥护劳动价值和公平，暗示意大利共产党人可能无意中支持了一种新生的法团主义形式。这种解释似乎得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运作的观察的一致支持。纳粹经济学家汉斯·布赫纳博士对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关系的细致理解，特别是在法团主义的背景下，得到了有效的概括：

“因此，将民族社会主义财产概念与旧德国封建制度、中世纪的分封制进行比较是显而易见的。两者的本质都代表着所有者和占有者与民间社区建立的一种信托关系。这种形式的财产权、利润参与权和管理权，通过不断监视公众的利益而限制其主权，防止行政、受益和看管所有者对委托给他们的占有者进行无情的个人剥削，并迫使他们顺从地照顾和维护他们的 Allodiums，公共部门可以以普通法的形式要求他们对此负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民族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概念，这些理论概念将个人财产解释为民间社区的一种借贷（分封），民间社区有权在财产被滥用或受到公共利益侵害时将其收回，或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责任而自行保留。”

——博士。汉斯·布赫纳（Hans Buchner），《民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纲要》

格雷戈尔也证实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这一点：

“因此，尽管法西斯的财产观念拒绝承认集体占有，但个人所有权被理解为严格服从集体纪律。法西斯关心的不是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而是对集体控制的服从。财产被

理解为履行社会职能，而不是体现个人权利。很明显，财产作为一种社会职能的概念足够广泛，包括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如果国家利益需要的话。”

— A.詹姆斯·格雷戈尔，《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阶级斗争的辩证法中，将集体福利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概念体现了一种财产关系形式，这种关系寻求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内协调个人利益。在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中，人们明显强调在无产阶级、军队、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之间建立联盟，系统地排除金融工业资产阶级，金融工业资产阶级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颓废和资本主义的化身，因此被指定为被消灭的对象。这一战略旨在瓦解现有的阶级等级制度，努力从根本上改变阶级身份，正如莱纳·齐特曼所批评的那样。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通过扬弃超越阶级对立。这一观念同样反映在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思想家的理论中，类似于拉萨尔的民族社会主义，其中国家职能被降为对生产过程的监督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背景下，对国有企业（SOE）的“对口支援”计划体现了一种社团主义模式，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旨在加强民族团结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为潜在的军事冲突做准备，从而呈现出一种受法西斯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解读。

法西斯主义致力于将民族资本的流动转向“生产资本”，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国家目标结合起来，以抵消帝国主义的压力，从而建立统一的民族阵线。在 1940 年代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大公司被合并为国家集团，小型企业仍然是唯一的私营实体，有效地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生产由工人控制，尽管由国家调解，预示着建立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同时，务实地采用了这一框架，由于其发展重点是增长，该框架继续获得法西斯分子的支持，他们似乎并不反对放弃这一模式。因此，阶级合作战略和社会化财产从根本上体现了一种发展主义的观点和在帝国主义侵略的背景下实现民族统一的策略。这也是墨索里尼和纳粹德国劳工阵线负责人罗伯特·莱伊把德国和意大利描述为无产阶级国家，反对富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原因。

“资产阶级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它比较软弱，经常动摇，和工人有矛盾，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反帝国主义的决心！而且是我们的抗日同盟者之一。”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这场伟大的斗争只不过是我们革命逻辑发展的一个阶段，是贫穷但拥有大量工人的人民反对那些凶猛地垄断着地球上一切财富和黄金的剥削者的斗争…… ”

— 贝尼托·墨索里尼，《对法英宣战》

纳粹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都包含主张消灭被认为不合时宜的种族的元素。恩格斯在《匈牙利斗争》中提出了这一思想。在希特勒出现之前，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家都重申了这一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认为，某些种族是封建历史的残余，无法跟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些群体被视为这一框架内的进化死胡同，注定要灭绝。恩格斯将这些群体标记为过时的、应该被遗忘的群体。

“其余一切大小民族和人民，在世界革命风暴中，不久也必将灭亡。所以，他们都是我们的反革命分子。”

“下一次世界大战将导致地球上不仅反动阶级和王朝的消失，而且整个反动民族也将消失。这也是向前迈出的一步。”
——弗雷德里克·恩格斯，《新莱茵报》

马克思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书信，被收集成《东方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反斯拉夫情绪，让人想起纳粹统治下斯拉夫人所遭受的歧视。

“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都因此获得了这样的经验：他们不能将各自的民族权利建立在封建的王室继承法上。他们获得了更好的经验：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同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之间争吵，而不是结成联盟，只会为他们的世仇斯拉夫人准备战争。”
— 卡尔·马克思，《东方问题》

“我们无意这样做。对于欧洲最反革命的民族在这里向我们提出的关于兄弟情谊的动人言辞，我们的回答是，对俄国人的仇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德国人的主要革命激情；自革命以来，对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仇恨也随之增加，只有通过对这些斯拉夫民族采取最坚决的恐怖手段，我们才能与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一道保卫革命。我们知道革命的敌人集中在哪里，即在俄国和奥地利的斯拉夫地区，任何华丽的言辞，任何暗示这些国家民主前景不明确的言辞，都不能阻止我们把我们的敌人当作敌人来对待。”
——卡尔·马克思，《新莱茵报》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提出，大量食用肉类和奶类可能有助于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的高级发育，因为这些食物有益于儿童成长。他将此与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进行了比较，后者主要坚持素食。在恩格斯看来，他们的脑部比其他食用更多肉类和鱼类的土著群体要小。这种种族歧视也延伸到社会的下层，即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是非人类。在后来的岁月中，这个群体遭受了列宁和斯大林等领导人的严厉迫害，列宁支持处决性工作者，斯大林则针对同性恋者。此外，1920 年 8 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对其政党的演讲中宣誓效忠一种将社会主义思想与种族理论融合在一起的学说。

“如果我们是社会主义者，那么我们肯定是反犹主义者——而反犹主义者的反面就是唯物主义和拜金主义，我们要反对它们。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你怎么能不反犹呢？”
— 阿道夫·希特勒在乔治·沃森的《希特勒与社会主义梦想》中引用道

巴枯宁和蒲鲁东等社会主义者表现出反犹主义态度，可视为种族主义。巴枯宁和希特勒深爱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之间的联系凸显了激进左翼思想与激进民族主义复兴狂热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社会主义者皮埃尔·蒲鲁东说过：

“犹太人。写一篇文章来反对这个种族，他们干涉一切，从不与其他人混杂，从而毒害一切。要求将他们驱逐出法国，但与法国妇女结婚的人除外。废除犹太教堂，不让他们从事任何工作。最后，废除这种宗教。基督徒称他们为弑神者并非毫无道理。犹太人是人类的敌人。他们必须被送回亚洲或被消灭。用钢铁、火或驱逐，犹太人必须消失。”
— 皮埃尔·蒲鲁东，《论犹太人》

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家米哈伊尔·巴枯宁指出：

“马克思是犹太人，他周围是一群或多或少聪明、诡计多端、机敏、投机取巧的犹太人，就像到处都是犹太人一样——商业和银行代理人、作家、政客、各种报纸的记者；简而言之，他们是文学经纪人，就像他们是金融经纪人一样，一只脚在银行，另一只脚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屁股坐在德国报刊上。他们控制了所有的报纸，你可以想象，他们会产生多么令人作呕的文学作品。现在，整个犹太世界构成了一个剥削派别、一个吸血鬼的民族、一个贪婪的寄生虫，与另一个犹太世界紧密相连，不仅不分国界，也不分政治分歧——这个犹太世界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或罗斯柴尔德的支配。我相信，一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欣赏马克思的优点，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一种本能的倾向和极大的尊重。这似乎很奇怪。共产主义和高级金融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呵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追求强大的国家集权，而哪里有这种集权，哪里就有寄生的犹太民族——他们靠投机取巧于人们的劳动——总能找到生存的手段。实际上，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将是一个军营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人男女工人变成了一个统一的群体，他们随着鼓声起床、入睡、工作和生活。统治特权将掌握在有技能和有学问的人手中，而犹太人则有广阔的空间进行有利可图的不正当交易，而犹太人将被国家银行的国际投机活动的巨大扩张所吸引。”

— 米哈伊尔·巴枯宁在《巴枯宁论马克思和罗斯柴尔德》 中引用

研究魏玛德国反资本主义言论的历史学家们注意到，纳粹主义内部的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交织在一起。布伦丹·西姆斯在其著作《希特勒：一部全球传记》中提供了大量证据来说明这种联系。希特勒对英美资本主义秩序的厌恶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决定性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帝国的强权和美国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此外，凡尔赛条约施加的财政限制强化了他对犹太人和英美资本主义之间共生关系的信念，他认为英美资本主义是国际金融的缔造者，也是导致德国战败的力量。西姆斯认为，如果不承认希特勒的反资本主义情绪，那么对希特勒反犹太主义的讨论就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两者在他的人生观中有着根本的联系。

“希特勒强烈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即使它不是犹太资本主义，但他却将犹太人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为极其恶毒；这仍然是他反犹主义的主要根源。在《我的奋斗》中，就像在他早期的言论中一样，犹太人与金钱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密不可分，他们是‘交易者’、‘中间人’，从他们的‘金融交易’中收取‘高额利息’。他声称，犹太人的目标就是‘金融统治整个经济’。”

— 布伦丹·西姆斯，《希特勒：全球传记》

为了提供进一步的见解，请考虑《论犹太人问题》中希特勒和马克思的比较：

众所周知，20 世纪 30 年代或之前，德国社会主义者从未质疑过希特勒基于种族主义主张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路德维希·沃尔特曼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种族理论》中重新诠释了历史唯物主义，使其完全有利于北欧人种。这种改编从根本上催生了种族历史理论，该理论对张伯伦产生了重大影响，随后又影响了希特勒，他深受张伯伦思想的启发。这一背景丰富了对这些引文的理解，表明纳粹主义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体，特别是因为它采用了沃尔特曼的种族理论。如果将纳粹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不同形式，并与沃尔特曼的种族史学相结合，那么显然，如果没

有种族主义理论，纳粹主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非常相似，正如希特勒本人所承认的那样。这表明纳粹主义内部存在着更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联系，不同于其种族意识形态。希特勒认为，如果没有种族叙事，纳粹主义就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

“种族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承认种族的重要性，因此也承认个人的价值，并以此作为其结构的支柱。这些是其世界观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不理解这一基本原则的根本重要性，如果它只是粉饰现有国家的外表并采用多数原则，那么它实际上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与马克思主义竞争。”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

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深深植根于观念的辩证法，在这个领域中，精神的展开引领着历史的进程。马克思改变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将其牢牢地锚定在存在的物质基础中，认为物质条件从根本上塑造了人类意识和社会结构。沃尔特曼扩展了这种唯物辩证法，引入了一个新维度，认为这些物质条件反过来又受到生物决定因素的调节。这一进程暗示着贯穿黑格尔、马克思、沃尔特曼和纳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作品的哲学连续体。通过重新概念化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物质本质，并进一步将这一本质转化为罗森伯格对种族灵魂的概念，人们有效地维持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动力，尽管重新定位了其应用轨迹。这种哲学转变不仅保留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完整性，而且重新校准了其应用，从而继续通过一种经过修改但在哲学上连贯的形式来证明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认为，国有化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当工人委员会或工会与国家职能相结合时。民族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很模糊，因为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同的——墨索里尼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只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倒置，关键区别在于对价值形式和利润动机的坚持。尽管社会主义政府从未完全消除利润动机或价值形式，但它们经常过渡到适合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版本，因为实际适应是必要的。例如，斯大林承认社会主义内部利润的必要性，用于储备、积累以及满足国防和社会需求，正如他在 1941 年至 1952 年的对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斯大林声称苏联没有按照价值规律运作，但苏联货币和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的存在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与西方的竞争需要遵守这些经济规律。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承认社会主义政府是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下运作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的民族主义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此外，尤金·韦伯在《法西斯主义的种类》一书中讨论了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同义词的误解，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会将自己的属性投射到法西斯主义上。

“法西斯社会主义，我们已经看到了法西斯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是否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程度，这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法西斯主义的批评者通常将其描述为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这种观点的典型陈述出现在约翰·斯特雷奇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中，这位英国劳工领袖和未来的部长在放弃莫斯利的新党后于 1933 年出版了这本书。对斯特雷奇来说，民族社会主义只是一场通过暴力和以牺牲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代价来维护的运动。法西斯主义杀戮、折磨和恐吓，以捍卫资本家将他们的田地、工厂和矿山作为私有财产保留的权利。”

— 尤金·韦伯，《法西斯主义的种类》

这段话强调了一个关键的误解：人们经常将法西斯主义与反动运动混为一谈。反动运动的特点是希望维持现状或恢复到以前的状态，理想状态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状态，因为它抵制进步或激进的变革，黑衫军和冲锋队等团体就表现出这种变革。与此同时，在斯特雷奇的作品中，罗马尼亚军团士兵被错误地描绘成仅为不为人知的私人利益而雇佣的士兵，而真正的革命者如查尔斯·莫拉斯和法西斯运动并没有犯下这样的错误。从类似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者 R. 帕尔梅·杜特在其 1934 年版的《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一书中列出了他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定义特征，可以归纳为七个要点：

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加强资本主义统治的专制方面

抑制和压制自主劳工运动，同时促进结构化的阶级合作

拒绝议会民主模式

扩大国家对工业和金融的垄断控制

加强各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团结

不断升级的帝国主义冲突为战争铺平了道路

详细分析表明，杜特所指出的法西斯主义的许多特征也适用于共产主义。例如，两种意识形态都对议会民主制不信任，共产主义的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等政党结构中，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未能获得多数票后强行解散了 1917 年俄罗斯制宪会议选举，这些都表明了这一点。此外，两种制度都扩大了国家垄断和组织，共产主义实施国家计划和合作社来控制经济。同样，对独立劳工运动的镇压也是两者的共同点，共产主义在内战期间对反对派的反应就证明了这一点，包括镇压喀琅施塔得水手起义和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此外，两种意识形态都试图将集团统一为单一的社会经济单位，并加剧了帝国主义紧张局势，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了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以维持对东欧的控制。

詹姆斯·格雷戈尔在《雅努斯的面孔》中讨论了这些相似之处，他指出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与第三国际结盟的知识分子开始对反动的、右翼的、一般的法西斯主义进行全面的分析。随着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主义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使法西斯主义概念在欧洲这个主要国家成为焦点，这项任务的紧迫性也随之增加。正是杜特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解读，这将成为左翼文献的标准，将法西斯主义定义为天生的反动主义。鉴于两种意识形态在实践上有相当大的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于它们之间存在根本差异的神话在现实中几乎没有依据。因此，当自己的实践反映了反对派的这些行为时，对反对派进行毫无根据的批评是虚伪的。

继续格里高尔的叙述：

“整个标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描述充其量只是对实际政治和历史顺序的讽刺。认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由资本家、大地主、大工业家或金融机构资助、控制和指挥的，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几乎不值得分析。无论人们如何解释标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描述，候选的解释仍然难以令人信服。我们知道，意大利工业家和大资本家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有着强势的互动。我们还知道，他们的利益和法西斯分子的利益在关键和广泛的关头是一致的。但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表明，工业家从来没能控制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经常（如果不是定期的话）为意大利有组织的工业家和金融家提供补偿，以使他们屈服于控制，但证据表明，商业和银行利益几乎始终服从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优先事项。墨索里尼不仅有时会在为法西斯主义服务时牺牲商业和金融利益；他毫不犹豫地解雇和流放他不信任的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墨索里尼与商业、农业和金融利益的联盟始终基于政治考虑。在外交政策方面尤其如此，他几乎完全独立地运作。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兴起于工业落后的意大利；是的，它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是一场在本质上是农业环境中的工业化运动，既现代化又反动。它违反了传统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规范，并最终在其建立集体主义大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威胁到私有财产的社会化。然而，不知何故，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捍卫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西方大多数教育机构都认为，法西斯主义不过是右翼反动派，永远与政治左翼区分开来。”

— 詹姆斯·格雷戈尔，《雅努斯的面孔》

格雷戈尔在《墨索里尼的知识分子》中扩展了这个主题，他解释说，随着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掌权，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盟友疯狂地试图理解那些似乎篡夺了他们预期的历史角色的令人困惑的事件。他们认为是历史错误或反革命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和它所引领的进步政治变革。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克拉拉·蔡特金认识到墨索里尼的胜利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征服；这是劳工运动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失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优于马克思主义。相反，它表明马克思主义者未能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理论框架。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崛起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掌握其真实本质。随着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更好理解，第三国际内部齐心协力，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明确的批判，以更有效地对抗其影响。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缺乏统一性，唯一的共识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革命力量，违背了历史的既定方向，因此本质上是不合理和自相矛盾的。

除了这一共识之外，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的描述也大相径庭，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最初，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被描绘成服务于大地主的反动农村运动。后来，它与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随后，它被视为工业家的代理人，或金融资本家的工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试图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描绘成所有这些利益的集体工具，尽管这种描绘本身就很复杂且矛盾重重。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主流描述已经固化。在这个框架内，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被描绘成金融资本主义的产物和工具，据称金融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中挣扎。当资本主义面临所谓的终极衰落时，法西斯主义试图加强对国家生产的控制，以维持垄断定价。

如前所述：投射、扭曲和谎言的指控。法西斯主义从来都不是资本主义的机器，它确实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出现的真正分歧根源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哲学争论。法西斯主义现实唯心主义拒绝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其民族主义品牌无视阶级差异。这就是为什么法西斯主义经常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他们重视民族、团结、文化和信仰等概念——所有这些都被唯物主义所拒绝，从而疏远了它声称代表的工人。这种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在历史上使法西斯主义能够成功夺取政权。

“法西斯主义从来没有服务于意大利企业的利益……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法西斯主义控制了国家经济以造福‘有产阶级’。”

— A.詹姆斯·格雷戈尔，《寻找新法西斯主义：社会科学的使用与滥用》

针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指控也延伸到了纳粹主义，但这些指控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在《德国大企业与希特勒的崛起》一书中，亨利·特纳这样回应这些指控：

“德国大企业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魏玛共和国？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资助了纳粹党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帮助希特勒上台？从这一点来看，答案显然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得多。只有通过严重的扭曲，大企业才能在共和国的垮台中扮演关键甚至主要的角色。

纳粹党早期的发展并没有得到大型企业界的大力支持。纳粹党以工业欠发达的巴伐利亚为中心，因 1923 年啤酒馆政变失败而沾染上非法的色彩，背负着令人不安的反资本主义纲领，在政治上只是一个喧闹的分裂团体，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纳粹党在大多数大企业人士眼中名声不佳。德国的主要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抵制了包括希特勒本人在内的纳粹党人的花言巧语，他们试图让企业界相信他们党的意图。只有在 1930 年没有大企业帮助的情况下取得的选举突破才引起了该领域的关注。摘自《纳粹政治机器的发展和特征，1928-1930 年，以及纳粹党的选举突破》；在权衡了所有证据之后。我们必须认识到，工业界的财政补贴绝大多数是针对纳粹的。党金库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会员费。”

— 亨利·特纳，《德国大企业与希特勒的崛起》

回顾美国作家和学者彼得·德鲁克的观点，大企业助长法西斯主义的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在意大利和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中，工业和金融部门所占份额最小。此外，认为大企业从法西斯统治中受益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在所有社会群体中，在极权经济和战时经济的制约下，企业阶层可能遭受的损害最大。詹姆斯·普尔和苏珊·普尔在《谁资助了希特勒》一书中深入探讨了这一话题，并提供了全面的分析，探讨了希特勒掌权的金融基础。

“然而，该党的财政实力不仅来自最慷慨的捐助者的捐款，还来自普通党员的日常收入。该党的每个党员每月都要缴纳一马克的会费，并尽其所能地捐款，但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失业，所以几乎没有剩余收入。你不知道希特勒后来告诉格雷戈尔·斯特拉瑟，当我想在纽伦堡发表演讲时，当时要找到钱买票是多么困难。

回顾希特勒 1918 年至 1923 年政治活动的资金来源，有一件事特别有趣。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党得到了大企业的资助和支持？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早期，只有两位德国主要工业家弗里茨·蒂森和恩斯特·冯·博尔西格给纳粹党捐了钱。捐款来自一些保守的慕尼黑商人，他们正处于共产主义危险的顶峰，以及巴伐利亚小工厂主，如格兰德尔、柏林钢琴制造商贝希斯坦和出版商莱曼。但这些人尽管富有，却都不能完全归入大企业的范畴。

没有证据表明，德国真正的大工业家，如卡尔·博世、赫尔曼·比歇尔、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和雨果·斯廷内德，或大家族，如克虏伯家族和主要银行家和金融家在 1918 年至 1923 年期间给予纳粹任何支持。事实上，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来自巴伐利亚的小党派的存在。希特勒的大部分捐款来自富有的个人，他们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或反犹太主义者，出于意识形态动机捐款。在一定程度上，富有的白

俄罗斯人属于这一类；他们也可以被视为唯一真正的利益集团，希望从对纳粹的援助中获得明确的政治经济目标。”

—资助希特勒的詹姆斯·普尔和苏珊·普尔

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在《第三帝国的到来》一书中也指出，纳粹的力量和势头源自其基层的资金支持。这种独立于大型企业和官僚实体（如大企业或工会）的资金支持，有效地打消了纳粹受到资本主义利益集团资助的观念。

为了进一步阐明第三立场不是资本主义的工具，我将探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格局，重点关注其定义特征、运作机制、劳工宪章以及法西斯时期实施的各种政策。这段旅程始于 1922 年 12 月 3 日，当时意大利在自由派财政部长阿尔贝托·德·斯特凡尼的指导下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改革税收立法、取消贸易壁垒、废除租金管制法、削减政府开支和启动私有化，从而开启了短暂的自由放任经济时代，一直持续到 1925 年。在德·斯特凡尼离任之前，墨索里尼政权已经开始引导资本主义部门服务于国家利益，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促进工业家、工人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合作。德·斯特凡尼的辞职标志着他任期的结束。

1925 年墨索里尼巩固独裁统治后，意大利走上了不同的经济轨迹。墨索里尼的想法与后来纳粹德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罗斯福新政的美国如出一辙，他开始大规模赤字支出，发起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并最终推行军国主义事业。大约在这个时候，墨索里尼甚至承认自己与著名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观点有相似之处。他称赞凯恩斯的著作《自由放任的终结》，称其可作为法西斯经济原则的初步介绍，认为书中几乎没有可争议之处，值得称赞的地方很多。这种立场反映出他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明显怀疑。法西斯政权有两个主要经济目标：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和解决意大利战略资源的匮乏。短期内，政府努力改革税收制度，战略性地私有化一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削减公共支出，并实施保护性关税以保护新兴产业。

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尤其是法团国家的出现，这一联盟也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实用的制度，经济决策是通过由各行各业的工人和雇主代表组成的集团内部的集体谈判做出的。这种安排旨在解决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明显的经济冲突，从而防止阶级斗争危及国家事业。在这个法团国家中，罢工等劳工行动是被禁止的，劳资纠纷将由国家控制的机构解决。在《意大利法团国家》一书中，福斯托·皮蒂利亚尼对意大利法西斯经济进行了可以说是最全面的考察。

“法西斯工团主义已经接受了某些真正意义上的工团主义原则。因此，它通过贸易辛迪加采用了辛迪加组织原则，但将其应用于所有生产类别，而不仅仅是工人。在这样做时，它并没有从资本和劳动斗争的社会主义原则出发，好像整个政治世界只分为两大类别，而是承认人口中的其他经济阶层现在已经成为独特而独立的群体。”

“法西斯工团主义主张通过国家级组织来规范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以职业协会为媒介，将其影响范围严格限制在国家领域内。”

“国家判断其公民的集体需要，研究和规范与外国理解的可能性，但不允许国家利益服从于某个阶级的利益或以任何方式受其间接控制。”

“它旨在让所有个体生产者自由选择自己的经济政策，并以每个人的财产应享有充分保障的原则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在法西斯政权下，当财产权与国家承认和代表的民

族共同体的利益相冲突时，财产权受到限制。每当企业的经济自由干涉公共利益时，它就会受到各种限制。”

“劳动宪章主张将私人主动性视为私人生产组织的基本属性，强调国家职能的重要性，并宣布企业组织者对国家负责指导生产。从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断言中，似乎已经很清楚，社区利益在国家政策中具有根本重要性。国家不会取代企业组织者的位置，也不会剥夺他们的控制权，也不会剥夺他们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指导自己事业的可能性，而是建议个人在最佳条件下组织自己所依赖的部分生产。正是作为对国家给予保证的交换，国家要求对这一权利进行生产性使用。如果私人主动性的语言或行使方式不足以造福社会甚至损害社会，那么国家就会干预并取代个人。这种态度表明，国家有一种集体主义或更确切地说是社团主义的倾向，因为国家的经济生活的积极监督被委托给国家控制。”

“国家的干预有时是有害的，因为它有助于延续私人主动性能够更快、更果断解决的情况，这是对国家干预这一部分的可能性提出的最强烈反对意见之一”

— Fausto Pitigliani，《意大利企业国家》

如果考虑到法西斯主义政策包括可能损害企业或以可能挑战私营企业的方式雇用工会的行动，那么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目标是维护资本主义的观点似乎是矛盾的。这与法西斯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工具来对抗社会主义的观点相矛盾。福斯托·皮蒂利亚尼在其书中讨论工团主义在法团体系中的演变时指出，新形式工团主义的本质不在于它对生产中各阶级之间动态的处理方式，而在于它注重建立为这些阶级服务的机构。皮蒂利亚尼认为，法西斯工团结构有两个关键方面引人注目。首先，组织不同的生产类别，考虑到它们作为雇主、雇员等的角色。其次，将这些生产者合并为国家批准的实体，按其行业部门分组（工业生产、商业、贸易、银行等），从而形成联合各个低级协会的高级联盟。

这些联盟始终仅限于从事特定行业的个人，充当着国家与分类阶级互动并利用这些阶级来提高国家生产力的机制。皮蒂利亚尼认为法西斯主义的作用和这些工团协会的目的是通过组织不同的生产阶级并监督他们的相互关系来实现平衡和平的社会秩序。这些公司的目标是通过协调各种生产要素和因素来保护国家资源并促进国家生产能力的增长。

“根据目前立法者为工会和一般工会制定的原则。它必须在预先确定和明确界定的领域内运作，其中包括安排集体合同、组织就业办公室、解决劳动争议、开展社会援助和职业培训福利等职责。另一方面，公司在整合工会在生产类别之间关系领域的社会活动或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或履行其对发展和控制国家生产的特殊责任时，现在可以自由地按照不受明确立法条款实质性限制的路线开展工作”

— Fausto Pitigliani，《意大利企业国家》

为了解决现代化所必需的工业资源匮乏问题，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采取了双重战略：大力开发国内资源，并采取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包括寻求专门的原材料贸易协定或参与战略殖民活动。墨索里尼敦促意大利议会在 1923 年初之前批准“意苏政治和经济协议”，这促使意大利于 1924 年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苏联的西方国家。1933 年的《友好、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关系，使法西斯意大利成为斯大

林统治下的俄罗斯的重要贸易伙伴——用意大利在航空、汽车和海军领域的技术专长换取苏联的自然资源。20 世纪 20 年代初，合作社遭到法西斯黑衫军的恐怖、抢劫和破坏。然而，到 1922 年，以全国合作社互助会为代表的合作社运动同意开除共产党员，从而获得了墨索里尼的官方认可。经过这些调整后，合作社在法西斯统治下蓬勃发展，表明了该政权对工人合作社的支持，特别是通过支持全国合作社互助会。在 Sharryn Kasmir 的《蒙德拉贡的神话》中，有人指出：

“从意识形态上讲，意大利合作社受益于法西斯宣传。墨索里尼指出，意大利合作社是法团主义理想的典范。它们体现了工人的参与、劳资双方的非冲突关系以及阶级认同的消亡。”

— Sharryn Kasmir,《蒙德拉贡的神话》

法西斯经济模式由一个错综复杂的组织层级来引导，这些组织包括雇主、工人和代表地方、省级和国家各级各行业的联合实体，最终形成全国公司理事会。虽然工团主义和社团主义是法西斯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争取政权的支持至关重要，但实际决策权掌握在国家机构手中，例如工业重建研究所（Istituto per la Ricosstruzione Industriale，简称 IRI），该机构在企业集团之间进行调解。

大公司的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大多数小企业主发现自己基本上变成了政府工作人员，在官僚体系中穿梭。这些小企业家们顺从了，他们往往认为这种强加只是暂时的措施。鉴于国家将土地视为重要的国家资产，法西斯政府严格控制农业实践，指定作物，重组农田，甚至诉诸没收的威胁，以确保遵守其指令。该政权还发起了公共工程项目，并掌握了有关建设和扩建制造设施的决定权。1931 年，政府成立了 Istituto Mobiliare 来监督信贷，IRI 随后接管了银行在工业、农业和房地产等行业持有的所有股份。墨索里尼的框架旨在优先考虑国家的需求，而不是个人消费者或金融资本家的需求。

至于劳工宪章，它恰好有三十条，但我没必要逐条详尽地阐述，而是将主要内容概括出来。

保险

带薪休假

养老金

工会协会

劳工法庭

劳动力的作用

集体合同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认为罢工和停工都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建立了一个劳工法庭系统，旨在调解纠纷并促进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协议。在提交法院的案件中，11,062 件得到解决，3,432 件被放弃或推迟，6,050 件经过非正式仲裁，670 件因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而被驳回。尽管该系统存在缺陷，但它成功地大大降低了劳资冲突的程度。此外，发起停工的企业主将受到法律处罚，包括 3 至 12 个月的监禁和 10,000 至 100,000 里拉的罚款。正如墨索里尼所描述的那样，这些改革的总体主题是通过建立

劳工法庭、合同协议、固定工资和工人组织以及其他各种有利于工人的政策来提高工人的地位。

最初，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采取了基于自由放任原则的经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走向了更大的集中化，这一转变让人想起了苏联的新经济政策。1926 年 4 月 3 日，随着劳动宪章、法团制度和辛迪加的编纂成为法律，这一转变正式化。工业的全面公司化于 1933 年实现，最终由阿尔弗雷多·罗科颁布立法。罗索尼是这些法律背后的关键人物之一，当时担任农业部长，他在一次演讲中主张，不应教导工人鄙视工厂主和工业家。相反，他表示业主应该放弃传统的“老板”心态。他主张建立一种意大利人不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而是追求集体利益和国家目标的合作者。罗索尼警告说，任何旧“老板”心态的残余都将面临坚决的反对。

“劳动法院是国家干预解决劳动纠纷的机关，不论这些纠纷是由于遵守合同或其他现有规则，还是由于制定新的劳动条件而引起的。”

“法律认可的专业协会确保雇主和工人在法律上平等，严格控制生产和劳动，促进两者的改善。行会（corporazioni）构成了生产力的统一组织，并全面代表了生产力的利益。凭借这种全面代表，并考虑到生产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法律承认行会为国家组织。”

— 1927 年劳工宪章

法西斯政权实施的社会改革使全国范围内结核病和霍乱等疾病的死亡率下降，流产率也下降。这些政策还为工人提供了更好的激励。值得一提的举措之一是成立了 Dopolavoro，该组织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娱乐设施，并为其成员提供各种休闲活动，包括滑雪、拳击、戏剧、歌剧等。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包括那些不属于法西斯党的人。1939 年，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卡尔·西奥多·施密特（Carl Theodore Schmidt）观察到：“从形式上看，社会服务的组织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所有工人都有权享受工伤和工伤事故保险、养老金和伤残抚恤金以及肺结核保险。相当多的人投保了失业保险。还为大家庭的劳动者提供了小额工资补贴。女工有权享受产妇福利。企业和工会组织设立了自愿病假基金。此外，政府还扶持了许多社会福利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多波拉沃罗（Dopolavoro），即休闲学院，它为其成员提供了令人钦佩的教育、体育和娱乐机会。到 1938 年，它拥有超过 3,000,000 名成员。据说法西斯青年、产妇和婴儿组织也为工人的福利做出了物质上的贡献。”

— 卡尔·施密特，《企业在行动》

1926 年，意大利政府成立了森林民兵组织，负责重新造林、森林管理以及监督水道和地区的水力组织。根据森林民兵组织奥古斯托·阿戈斯蒂尼将军的报告，从 1928 年到 1930 年，意大利种植了令人印象深刻的 7950 万棵树苗和超过 557,000 公斤的森林种子。以前被忽视的护林员和伐木工等职业现在被组织成各自的联盟。在大萧条期间，意大利政府促进了兼并和收购，拯救了濒临破产的企业，并没收了持有各种企业大量股份的银行股票。国家控制了破产的公司，组建了商业卡特尔，增加了公共支出，并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它通过国有化而不是让企业倒闭来支持重工业。

意大利法西斯领导人将法团主义描述为“革命性的”，声称法团国家将确保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这一口号被各种人物和运动所采用，包括美国法西斯同情者考夫林神

父、阿道夫·希特勒，甚至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分子支持工会主义，要求所有意大利工人加入工会。虽然墨索里尼禁止罢工，但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苏联也同样禁止罢工。在法团国家的框架内，计划委员会决定产品类型、生产量、价格、工资、工作条件和公司规模。许可证是强制性的，禁止任何未经政府批准的经济活动。这些规定阻碍了新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此外，国家规定了消费水平，剩余收入通过税收或强制贷款征收。

到 1925 年，法西斯政府已推出一项综合计划，其中包括食品援助、婴儿和产妇护理、一般医疗保健、补充工资、带薪假期、失业救济金、疾病保险、职业病保险、家庭支持、公共住房以及养老和残疾保险。关于公共工程，墨索里尼政权从 1922 年至 1942 年的二十年间从公共资金中拨款 4 亿里拉用于建造学校。从 1925 年到 1927 年，墨索里尼政权专注于压制工人。最初，非法西斯工会和随后的法西斯工会被国有化并处于国家控制之下，这与列宁废除苏联独立工会的做法如出一辙。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实施立法，要求所有工人都必须加入工会，这反映了工会及其工团主义起源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工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关键发展。 1925 年的《维多尼宫协议》将法西斯工会与主要工业参与者联系起来，同意工业界只承认法西斯党批准的工会，从而将非法西斯和意大利社会党结盟的工会排除在外。此后，1926 年的《工团法》（也称为阿尔弗雷多·罗科的《罗科法》）进一步推进了这一政策，每个工业部门只允许一个工会和一个雇主组织。领导法西斯工团公司总联合会的埃德蒙多·罗索尼最初统一了劳工，但他的影响力和工业家对他的不满导致他在 1928 年被解职，墨索里尼取而代之。尽管《工团法》维持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分裂，但党的官员向民众保证，这些只是临时措施，未来将完全融入法人国家。

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法团主义和监管整合使意大利信贷系统处于国家和准政府的控制之下，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国家管理或影响了大约 80% 的信贷。为了应对与埃塞俄比亚的冲突，意大利政府实施了价格控制、生产配额和提高关税，导致贸易逆差大幅增加，随后进口限制、外汇管制和原材料分配监管也随之加强。墨索里尼追求“自给自足”或经济自给自足，导致保护主义措施增多、政府支出激增，预算赤字从 1934 年到 1937 年增长了七倍。1936 年的《银行改革法案》将意大利银行和其他主要银行转变为政府实体，前一年标志着资本没收的开始，银行、企业和个人被命令将外国发行的股票和债券交给意大利银行。

“ 1936 年底，期待已久的里拉贬值刺激了经济复苏并改善了国际收支平衡。与此同时，通过一项简单的部长令，取消了对国家从中央银行借款的所有限制。银行的自主权跌到了最低点。”

— Bianca d'Italia,《意大利银行从成立之初到 1936 年银行法》

1927 年，意大利过渡到法团化阶段，1927 年的《劳工宪章》强调了私人倡议在经济中的作用，同时保留了国家干预的权利，特别是在法西斯控制的工人招聘过程中。到 1930 年，全国公司理事会成立，代表经济的关键部门并旨在应对工业挑战。1932 年，国家提倡卡特尔化，这导致了冲突，因为几家公司抵制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CGII）组建卡特尔的指令，促使政府干预。鉴于公司涵盖所有生产部门，卡特尔化和相互协议

成为自然结果。1934 年 5 月，随着工业重建研究所（IRI）开始控制银行资产，墨索里尼发表声明，表明意大利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意大利经济的四分之三，包括工业和农业，都掌握在国家手中。”

— 贝尼托·墨索里尼，1934 年 5 月 26 日

20 世纪 30 年代，意大利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土地复垦计划，即“土地争夺战”或 Bonifica Integrale。到 1933 年，该计划已雇用了 78,000 多人。政府还推出了旨在现代化意大利欠发达南部地区（即意大利南方地区）的政策，以对抗黑手党并解决严重的经济差距，南部的人均收入比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北部落后 40%。这一时期还见证了铁路电气化、广泛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水力发电的发展以及化学、汽车和钢铁等关键行业的增长。随着 Agip（Azienda Generale Italiana Petroli — 意大利通用石油公司）的成立，战略经济领域，尤其是石油工业，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国有化。到 1933 年 1 月，意大利政府控制了银行拥有的公司，这使得意大利拥有欧洲最大的政府关联公司（GLC）部门。到 1933 年底，政府拯救了股价暴跌的皮埃蒙特水力发电协会，1934 年 9 月，安萨尔多托拉斯在 IRI（工业重建研究所）的授权下进行了重组，并注入了大量资本，实际上将其纳入国有。到 1939 年，意大利的国有企业比例位居全球最高，仅次于苏联。那一年，意大利政府控制了该国大部分的海上运输和造船业、相当一部分生铁生产和近一半的钢铁行业。

人们经常争论，尤其是格罗弗·弗尔等左翼历史学家，法西斯主义让工人处于奴隶般的条件，这种观点与历史政策实施不符。在墨索里尼的领导下，特别是在社团主义时期，意大利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职业健康和安全措施以及社会福利法，这些法律在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法西斯政权为妇女和儿童提供了工作场所保护，并为工人提供了医疗援助，同时还引入了国家支持的失业保险、残疾和老年保险、强制性结核病保险和强制性职业健康保险。此外，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到 40 小时，并成立了信用合作社——一项为农业工人和工匠提供财政支持的举措。虽然还有许多其他立法值得注意，但强调最重要的立法表明，法西斯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冷漠或恶意并不完全准确。提出这样的观点会扭曲历史现实并延续神话。

作为背景，当我们考虑诸如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之类的劳动改革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策在其他国家采用得要晚得多——例如，奥地利在 1975 年，加拿大在 1960 年代——这使得法西斯意大利在某些劳动立法方面领先于时代。尽管如此，对法西斯统治下的奴隶经济的误解仍然存在。虽然纳粹德国对集中营强迫劳动的剥削是有据可查的，但将其与法西斯主义发源地意大利的情况进行比较是误导性的。苏联存在“真正的奴隶制”，以古拉格制度为代表，也使叙述复杂化。此外，在墨索里尼吞并的领土，如埃塞俄比亚，奴隶制被正式废除，这与法西斯意大利延续奴隶制的指控形成鲜明对比。将焦点转移到社会政策领域以及法西斯主义中工团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原则的融合，我们可以研究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SI）时期。在马丁·戈德堡的作品《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真相》中，他敏锐地观察到 RSI 在恢复政府控制和促进社会主义倡议方面非常有效。戈德堡还强调了墨索里尼的宣言，即重新振作起来的法西斯分子正在追求一个致力于社会化的意大利共和国，这一立场与某些德国官员的观点不一致，其中一些官员对墨索里尼的努力持怀疑态度。1944 年 2 月，墨索里尼政府通过了一项

立法措施，旨在促进更大的社会正义，确保更公平的财富分配，并加强劳动力在国家治理中的参与。这一发展凸显了该政权推进其社会和经济议程的意图。

“社会共和国通过收归国有 80 家公司（这些公司共有 150,000 名员工）的方式，不辜负其革命初衷。在向国家控制的公司中，值得注意的是传奇的意大利公司法令，该法令于 1945 年 1 月进行了社会化。此外，墨索里尼扩大了工业国有化，工人将参与管理工厂和企业，同时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利润分享（在早期的社团主义模式下受到限制），同时还颁布了大规模的公共住房计划。墨索里尼政府制定了“社会化法”。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痴迷地强调”对社会化的承诺和“各种法西斯平等主义和扩大的法西斯福利国家” 。

— 马丁・戈德堡，《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的真相》

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尼古拉・邦巴奇在当时的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墨索里尼的亲密盟友，邦巴奇在法西斯政权的社会和社团主义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 年，他宣称“每一项假设都是社会主义计划”，以此来描述法西斯改革。邦巴奇没有领薪水，后来领导了意大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下的统一工作和技术联盟，热心倡导法西斯社会主义议程。墨索里尼借鉴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方法，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由国家集中控制的经济体系。从诞生到灭亡，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都效仿了列宁的“第三条道路”——市场原则和社会主义政策的综合体，类似于“市场社会主义”。这种混合制度通常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谢尔登・里奇曼在《经济学简明百科全书》中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一概念，他说：“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法西斯主义是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

“墨索里尼本人在知道谁会聚集在新法西斯共和党的旗帜周围之前，就致力于实现法西斯主义最初的工团主义和新理想主义纲领。他最初的意图是将他的新共和国称为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尽管如此，它还是宣称自己是意大利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的载体。”

— A.詹姆斯・格雷戈尔，《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

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彻底摧毁资本主义，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则保留了市场经济的外表，但实际上依赖于通过国家控制的工会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中央计划。历史学家罗兰・萨蒂和罗萨里奥・罗密欧指出，在法西斯统治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比当时除苏联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大。社会共和国国内议程的悲剧性之一是它很短暂，其努力并未得到充分认可。许多学者试图反驳或淡化这一时期的意义。虽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一致，但它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工人权利。还有证据表明，墨索里尼准备将权力移交给左翼游击队，这一点在《第三帝国的兴衰》中有所讨论，但他的遇刺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从根本上讲，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本质上是深刻的工团主义，而且可以说比共产主义中国更具社会主义性质。

分析了意大利的经济政策后，有必要从比较的角度探讨德国的经济政策框架。尽管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有相似之处，例如依赖国家主导的卡特尔化、价格控制和资源配置，但德国的做法表现出更集中、自上而下的特征，类似于苏联，与意大利模式不同。与通过基于职业的选民管理经济的意大利公司委员会不同，德国实施了一个复杂的雇主-雇员组织网络，包括德国国家工会和德国劳工阵线。这些实体参与了工资和价格谈

判。此外，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私营企业家之间的一系列合同促进了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持续互动，强调了国家监管和计划在德国经济机制中的重要作用。

一项值得注意的立法行动是 1933 年 6 月 1 日颁布的《劳工采购法》，该法为全国建设项目拨款 10 亿美元。这包括公共建筑、商业场所、住宅物业、农业设施和基础设施项目的翻修和建设，例如水道监管和建立天然气和电力服务。长期失业或大家庭户主的个人优先就业，每周工作时间上限为 40 小时，并要求使用德国建筑材料。此外，同年夏天通过的建筑维修法为小规模项目额外提供了 5 亿美元，为房主提供 20% 项目成本的补助，包括翻修和增建，并将升级和安装的资格扩大到商业地产所有者。该立法还引入了业主通过当地金融机构为建设融资的机制，政府发行息票以支付贷款利息。 1933 年 9 月 21 日生效的减税法规定，维修费用可享受所得税和企业税抵免，政府补贴了近 40% 的整修费用。此外，公司再融资法将短期贷款转变为更易于管理的长期贷款，利率也降低了，从而防止了贷款违约，使企业能够保留资本用于再就业和扩张。

该政策的一个创新之处是为新婚夫妇提供低息贷款，旨在鼓励女性参与家庭生活，从而为失业男性腾出工作岗位。该计划根据子女出生情况调整贷款余额和延期还款，第四个孩子出生时贷款将全部免除。这项计划的资金来自对单身人士征收的附加税。到 1936 年 6 月，政府已批准了 75 万笔婚姻贷款，这表明政府通过经济政策对社会工程进行了重大投资。1933 年 11 月婚姻法出台后，每月约有 2 万名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随着新婚夫妇数量的增加，住房需求激增。这种需求增加了建筑和相关行业的就业机会。例如，家具行业的制造业产量在 1933 年增长了 50%，而炉灶和其他厨房用具制造商则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为了支持年轻夫妇，州政府为购买小型独户住宅的夫妇提供房产税减免。这些旨在减少失业和振兴经济的举措所产生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减少失业救济金和增加企业税、所得税和销售税的收入来抵消。

政府还启动了广泛的公共工程项目来创造就业机会，例如国家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高速公路项目主要雇用体力劳动者，将其预算的 79% 分配给工人工资，从而确保了相当多男性的就业。此外，还采取措施支持农业部门，该部门受到大萧条的严重影响，导致许多农民负债累累，并促使农村青年移居城市寻找工作。1933 年 9 月，为支持农业经济而成立的组织“帝国食品生产者”实施了防止农场衰落和农村人口外流到城市的政策。尽管公众不满，但该组织成功地在 1938 年将食品杂货的购买价格提高了 10% 以上，为农民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

为缓解农民的困境，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包括大幅削减财产税和减免债务，为背负沉重抵押贷款的农场主提供新的开始。农村援助计划让 12 万名年轻人从事农业工作，提供政府资助的工资、培训和住房。该计划还为学生和学校毕业生在暑假期间提供临时农场就业，甚至允许波兰人等外国参与者加入该计划。税收改革在这些复苏努力的成功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1933 年 4 月的车辆税法是更广泛的莱因哈特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以统一的国家累进税制取代了市政税、省税和州税。这次经济复苏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 1938 年 1 月，曾在伦敦和巴黎任职并熟悉华尔街金融家的苏联外交官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ristyan Rakovsky）对其前所未有的性质进行了评论。

“希特勒，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凭直觉，甚至不顾技术专家沙赫特的反对，创造了一个特别危险的经济体系。他不懂任何经济学理论，只受需要的驱使，切断了国际和私人的高级金融。希特勒几乎没有黄金，他无法努力使它成为货币基础。由于他的货币唯一可用的抵押品是德国人民的技术才能和勤劳，技术和劳动力成为他的黄金储备。这是绝对反革命的，正如你所知，它像魔术一样照亮了 600 多万熟练雇员和劳动者的所有失业。”

— 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在理查德·特多尔的《希特勒革命》中引用

德国从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转向以国内生产力为基础的货币，反映了希特勒对国家主权的倡导。这一举措对巴黎、伦敦和纽约的金融中心造成了破坏，在这些金融中心，国际投资和银行界通过向外国提供贷款获利。与意大利一样，德国能够在全球市场上开展贸易而无需借贷，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其境内的就业机会，因为国外对德国产品的需求增加。为了集中控制，希特勒解散了现有的工会，成立了帝国劳工调解和失业保险研究所，即 RAA。RAA 实施了一项工作权计划，不仅重新分配了劳动力，还限制了工人更换工作的能力。它要求寻求新领域就业的工人，尤其是在城市地区的工人，必须获得 RAA 的批准——这一许可很少被授予，以帮助保护德国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社区。 RAA 还有权将表现不佳的产业工人和管理人员重新分配到可以提高生产力的部门，例如农业。按照当代民主标准，这些政策将被视为侵犯个人自由。然而，这种劳动力分配方法受到俾斯麦将工人视为“劳动战士”的观点的启发，将为公共利益服务置于阶级或财富之上，而非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

希特勒统治时期，禁止对食品和能源等基本商品进行投机，这严重阻碍了证券交易所的运作，该政权将其贬为“黑帮社会”。获得经纪人执照的程序变得更加严格，禁止大型公司以低价击败较新、较小的竞争对手。成立了价格监督委员会，以防止企业操纵生产或交付以造成人为短缺，从而保护消费者免受价格上涨的影响。公务员、军人和纳粹党成员被禁止持有股票投资组合或在私人公司担任顾问，甚至禁止私人公民投资股票。到 1937 年，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必须解决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断言，即亚尔马·沙赫特是德国经济复苏的设计师和希特勒背后的真正力量。这是误导性的；沙赫特最终因反对希特勒而遭到解雇和监禁，他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不同意国家采取的促进经济复苏的措施。正如约翰·托兰德在其希特勒传记中所言，沙赫特在纳粹政权内部因其资本主义倾向和抵制政府的革命性经济战略而受到批评。

“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解除你德国国家银行行长的职务，”沙赫特接过递给他的那张纸。**“你不符合上面写的那张民族社会主义的形象。”**

— 阿道夫·希特勒引用自约翰·托兰德所著的《阿道夫·希特勒》

这主要表明希特勒对他怀有鄙视，这种情绪在希特勒的《餐桌谈话》中得到了强化，希特勒称他为共济会会员、一个工具和一个障碍。例如，1933 年 10 月，希特勒用“德国农民的毁灭就是德国人民的毁灭”这句话阐述了德国农民对国家福祉的重要性。随后，新的农业计划启动，同时推广了血与土的意识形态。理查德·瓦尔特·达雷于 1929 年撰写了《农民是北欧人的生命源泉》一书，他被任命为食品和农业部部长。达雷的目标是彻底改革食品生产和营销，特别注重提高农民的收入。他制定政策的主要目标

是保护农民免受市场力量的影响。这导致了 1933 年《世袭农场法》的颁布，旨在防止农田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或出售——这一举措是以牺牲农民的自由为代价的。这项法律规定，只有拥有可追溯到 1800 年的血统证据的雅利安人才有资格拥有农田。面积不超过 308 英亩的农场被归类为世袭庄园，这意味着它们不能出售、分割、抵押或因债务而被扣押。在所有者去世后，庄园将由最亲近的男性亲属继承，该亲属将负责支持和教育其家庭成员。如果农民违反“农民荣誉准则”放弃耕种，他可能会失去他作为农民的尊贵地位。

与此同时，由农民领袖达雷领导的“帝国食品庄园”成立，负责监督和管理农业条件、生产和农产品营销。“帝国食品庄园”追求两个目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实现德国粮食自给自足。达雷设定农产品价格，导致批发价格在纳粹统治的头两年内上涨了 20%，牛肉、蔬菜和乳制品的价格涨幅甚至更高。然而，这些价格上涨也意味着消费者的成本增加。在执政的第一年，该政权专注于通过政府贷款、道路建设和造林等公共工程项目以及针对扩大资本支出和就业的企业的税收激励来刺激经济。虽然德国农田的所有权表面上掌握在私人手中，但受到营销委员会的严格监管，这些委员会通过配额制度确定生产水平和定价。农场被分成卡特尔，接受政府机构“帝国农业局”的监督。该机构规定了从种子和肥料种类到土地传给继承人的方式等所有事项。1933 年颁布的《世袭农场法》有效地阻止了农民出售土地或退出农业部门，将他们束缚在这些半国有的农业企业中。在德国入侵苏联期间，这一制度甚至延伸到了乌克兰。德国人保留了苏联的集体农业模式，但对分配给德国人的农场实行了一种“伪私有化”形式。然而，这些农场被党卫军强加的繁重配额所束缚，农产品被任意没收，这表明它们根本不是私人经营的。

“如果他们证明自己勤奋，他们最多可以得到 25 公顷土地。德国族人的农场受到党卫军的高额配额限制，牛奶和其他农产品被随意没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囚犯和强迫劳工耕种未分配给德国和党卫军农民的保留农田。”

— 温迪·洛尔，《希特勒的伊甸园》

针对纳粹统治下的私有化概念，在私有化发生的同时，纳粹党同时加强了国家对贸易政策的监督，最终形成了针对所有生产部门的全面国家主导的计划体系。《纳粹德国的企业行动自由》一书的引言探讨了这一点，该书批评了过于简单化的私有化叙事。“ Buchheim-Scherner 解释的核心主张如下：

1. 纳粹政府为实现自给自足和重新武装，对德国商业进行了监管，但其监管方式十分无系统，而且从未建立任何类似于中央计划经济的制度。
2. 由于纳粹政权普遍尊重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因此该政权很少强迫企业实现其目标，而是提供一系列诱惑，企业可以接受或拒绝这些诱惑而不会产生不良后果，以使企业达到政权的生产目标。
3. 在这种背景下，纳粹德国的私营企业在投资决策和生产战略方面保留了很大程度的自主权，这些决策和战略仍然反映了管理者对长期商业前景的估计。所有这些主张的问题在于，它们都是半真半假。第一点利用纳粹经济众所周知的即兴发挥和缺乏中央计划的特点，转移了人们对这一事实的注意力：纳粹贸易政策在 1933-34 年引发的干预主义螺旋式上升，到 1938 年发展成为一套全面的、全面的、国家强制规定的针对

每种生产要素的配给和分配制度。该系统在战争期间变得更加严格，从 1942 年开始几乎密不透风。第二点是正确的，纳粹政权出于意识形态和实际原因更喜欢胡萝卜而不是大棒，但否认这种偏好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所产生的恐吓作用则是完全错误的：1933 年强制出售容克斯飞机，1934 年征召私营企业资助成立 Braunkohle Benzin AG (Brabag)，以及 1937 年在建立 Hermann-GöringWerke 的过程中从德国重工业手中实质上没收了 Salzgitter 铁矿场，更不用说战争期间多次罢免首席执行官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包括 Gutehoff nungshütte 的 Paul Reusch、飞机制造业的 Willy Messerschmitt 和 Ernst Heinkel 以及宝马公司的 Franz Josef Bopp。第三点是正确的，许多公司领导人反复想象——事实上，渴望——一个类似于前纳粹自由市场时代的经济未来，因此试图维持其传统的核心业务。但布赫海姆和舍尔纳都夸大了大多数大公司在坚持一切照旧方面所取得的有限成功，并低估了许多高管在 1937-42 年的关键时期根据党派路线修改其商业前景评估的重大程度。”

— 彼得·海斯，《纳粹德国的企业行动自由》

这一讨论凸显了私有化叙事的复杂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批评的复杂性。现实情况是，私有化发生在有限的范围内，私有化的行业很快通过监管措施和政治策略的结合重新融入国有部门。这种叙事往往忽视了经济调整和干预的大背景。一本值得注意的参考书是冈特·雷曼 (Gunter Reimann) 的《吸血鬼经济》，它深入探讨了这一政权下的广泛监管、国家计划、价格管制和征用。承认雷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很重要；尽管他自认为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这可能使他倾向于将经济解释为资本主义——但他承认德国经济框架内存在社会主义政策。他的分析与《毁灭的代价》中的发现一致，进一步挑战了对纳粹经济的简单分类。为了加深我们对这一时期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交织的理解，让我们来思考一下马修·瑞安·兰格所著的《1850 年至 1933 年德国文化中的反犹太反资本主义》中的见解，该书揭示了这些经济政策更广泛的文化和历史基础。

“此外，纳粹 1937 年的法令迫使进一步实行卡特尔化，以简化指挥链并为战争做准备，而这正是 1936 年四年计划的目标。这项大规模干预政策的结果是“整个经济完全巩固，个人主动性和选择自由完全被消除”。81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商业私有制仍然存在，但由于两线作战，纳粹采取了最后一步，于 1942 年成立了中央计划办公室 (Amt für Zentrale Planung)，消除了任何私人主动性的残余。”

— 马修·瑞安·兰格，《1850 年至 1933 年德国文化中的反犹主义反资本主义》

在《毁灭的代价》一书中，历史学家亚当·图兹提出了以下见解：

“与任何现代经济体一样，德国经济离不开食品和原材料的进口。为了支付这些费用，德国需要出口。如果这种商品流通受到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贬值的阻碍，德国就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更严格的国家进出口控制，而这又需要一系列其他干预措施。”

— 亚当·图兹，《毁灭的代价》

企业家和企业主面临着大量官僚障碍，这些障碍由国家决定，涉及生产细节、定价和数量等问题。他们还背负着沉重的税收负担，并有义务向纳粹党提供资金。资本总额低于 40,000 美元的企业被解散，资本总额低于 2,000,000 美元的新企业也将被禁止成立，导致五分之一的德国公司倒闭。在纳粹政权之前就已存在的卡特尔化做法被

强制执行，经济部获得了创建新的强制性卡特尔或强迫企业加入现有卡特尔的权力。游说魏玛共和国的复杂商业和贸易协会网络被国有化，并成为所有企业的强制性要求。此外，还成立了帝国经济商会，包括七个国家经济团体、二十三个经济商会、七十个手工艺商会和一百个工商会。到 1935 年 2 月，就业完全由政府办公室管理，政府办公室决定就业安排和工资。

1938 年 6 月 22 日，四年计划办公室通过征兵实施了强制就业，为每一位德国工人分配了一份工作，雇主既不能解雇他们，也不能未经政府许可更换工作。缺勤可能会导致罚款或监禁，所有这些都是以工作保障为幌子，并以“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口号为标志。这一概述强调了德国经济中广泛的国家干预和对私营企业的压制，与依赖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代表和国家分配的意大利模式相似。对于那些寻求进一步证据的人，请考虑《纳粹经济复苏》中的见解：

“即使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曾支持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和国家援助的重工业，也发现 1936 年之后国家控制的程度以及国有工业部门的崛起也威胁到了它们的利益。这种关系产生的紧张已经在汽车工业、航空工业和钢铁工业中得到证实；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对纳粹主义和德国商业之间的关系做出令人满意的历史判断。已经清楚的是，第三帝国不仅仅是一个支撑独裁资本主义的商人政权，相反，它着手减少经济精英的自主权，并使其服从于纳粹国家的利益。”

— Richard J. Overy，《纳粹经济复苏，1932-1938》

在德国经济中，被贴上“私人”标签的举措受到了国家大力控制和指导，这明显偏离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私营部门的动态。这种战略更类似于现代中国和铁托的南斯拉夫所观察到的经济方法，而不是培育真正的私营企业环境。根据《纳粹经济复苏》的见解，私营企业的作用基本上被降级为在国家指定的 Gleichschaltung（同步）中充当临时管理者，而不是由创新和财富创造驱动的独立实体。经济被描述为 die gelenkte Wirtschaft（管理经济），商人更多地充当国家经济目标的代理人，缺乏真正创业的自由。这种管理经济扼杀了企业家精神，与政权的意识形态目标保持一致，但以牺牲经济活力为代价。到 1939 年，纳粹政府对几乎所有商业运作方面实施了广泛的控制，从生产到定价，从投资到工资，有效地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条件。希特勒及其官员的声明进一步强调了这种控制程度，表明如果私营企业未能满足国家的要求，他们准备完全接管商业运作。例如，希特勒 1937 年的声明表明，如果私营企业未能成功执行四年计划，国家将全面接管企业，强调了纳粹政权下企业的有限自主权。这种对经济的全面控制表明，它严重偏离了自由企业的理想，将企业定位为国家意志的延伸，而不是推动经济进步的独立实体。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 1936 年德文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写道：

“总生产理论，即下一本书的重点，比起自由竞争和高度自由放任条件下提出的生产和分配理论，更容易适应极权主义国家的条件。”

—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凯恩斯在书中将自己的方法与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方法对立起来，并分析了他的理论与纳粹经济学理论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纳粹经济学受到德国历史学派和弗雷德里克·李斯特经济理论的重大影响。虽然凯恩斯对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没有任何

同情，但他认识到他的经济理论更有可能在极权主义政权下成功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强调了这一观点，她评论说："希特勒在凯恩斯完全阐明之前就找到了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希特勒统治下的经济学家摒弃了自由放任的原则，高度推崇凯恩斯主义思想，甚至预见了凯恩斯的许多概念。这种钦佩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的，正如乔治·加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著作《凯恩斯和前希特勒德国的经济活动家》所表明的那样。值得注意的是，肯尼迪总统直到 1962 年才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希特勒运用了凯恩斯主义原则。

纳粹政权的集权不仅局限于经济，还延伸到社会生活。"欢乐带来力量"组织负责管理公民的休闲活动，从体育和娱乐俱乐部到戏剧和音乐等文化活动，确保国家对各个方面的监督。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虽然旨在促进一个统一的社区，但却以个人自由为代价，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监督和管理民众的私人活动。希特勒培育自由放任的环境或鼓励真正的私人主动性的说法与他统治下的德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本身相矛盾。私有化的说法是误导性的，因为即使是被视为"私营"的企业也经常由高级党员领导，而党实际上是国家的代名词。这些实体受到德国劳工阵线的控制，表明法规、经济规划和国家控制或所有权的增加。

"此外，纳粹 1937 年的法令迫使进一步实行卡特尔化，以简化指挥链并为战争做准备，而这正是 1936 年四年计划的目标。这项大规模干预政策的结果是"整个经济完全巩固，个人主动性和选择自由完全被消除。"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商业私有制仍然存在，但由于两线作战，纳粹采取了最后一步，于 1942 年成立了 Amt für Zentrale Planung（中央计划办公室），消除了任何私人主动性的残余。"

— 马修·瑞安·兰格，《德国文化中的反犹太反资本主义》

"即使是重工业，它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也支持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和国家援助，但 1936 年之后国家控制的程度以及国有工业部门的崛起也威胁到了它们的利益。这种关系产生的紧张已经在汽车工业、航空工业和钢铁工业中得到证实；但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才能对纳粹主义和德国商业之间的关系做出令人满意的历史判断。已经清楚的是，第三帝国不仅仅是一个支撑独裁资本主义的商人政权，相反，它着手减少经济精英的自主权，并使其服从于纳粹国家的利益……

随着国家扩大其在监督或监管所有主要经济变量方面的作用，他们发展出了一个更加连贯的经济体系。德国经济学家将这种体系命名为"die gelenkte Wirtschaft"，即管理经济。在这种制度下，商人被视为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经济职能人员，而不是独立和进取的财富创造者。"管理经济"的概念符合政权的意识形态野心，但却扼杀了企业。"

— 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纳粹经济复苏》

"公共工程和重新武装都需要大量的赤字融资，实际上是印钞来支付工人工资和刺激需求。尽管希特勒在经济方面从根本上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政治，但他并没有将工业国有化。事实上，在他执政的头五年左右，他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为了通过出售陷入困境的企业来快速筹集资金。希特勒非常有效地将德国工业家国有化，使他们成为他政治意愿的工具。控制，而不是所有权，才是关键。德国的主要经济机构，尤其是工业、商业和银行，完全被排除在决策之外。

与国防军不同，他们至少在开始时没有被告知有关生存空间的任何秘密。他们只是被告知要做什么，如果他们不做，就会受到监禁、没收或被排除在外的威胁。”

— 布伦丹·西姆斯，《希特勒：全球传记》

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一现象在现代中国也存在。这种界限模糊的现象在 1930 年代苏联和纳粹经济计划的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讨论。在 1920 年代，苏联为应对行政人员短缺的问题，推动将个体企业合并为托拉斯，并进一步将这些托拉斯合并为辛迪加。有趣的是，辛迪加的概念与社团主义的概念非常相似，而社团主义也是苏联采用的一种策略。

“苏联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也采取过类似举措。面对行政人员短缺的问题，国家鼓励企业合并成立托拉斯，托拉斯又合并成立辛迪加。”

— 彼得·特明，《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和纳粹经济计划》

尽管一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这种比较提出质疑，但认为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受到工业家的大力支持或进行广泛私有化的论点缺乏确凿的证据。这一观察为本次讨论做出了恰当的结论。

奥托·吕勒参与马克思主义团体使他注意到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对全球共产主义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他认识到左翼政治中的威权主义倾向与整个欧洲新兴的法西斯运动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吕勒强调了列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特征，例如严格的忠诚、侵略性和集权。他认为苏联的政治框架是德国和意大利出现的法西斯政府的先驱，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强调了这种联系。通过在《反法西斯斗争始于反布尔什维克斗争》中创造“红色法西斯主义”一词，吕勒引发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融合的辩论，重点关注它们相似的方法而不是意识形态。这一比较受到不同角度的审视，包括批评者如吕勒和自由主义者，以及支持者如国家布尔什维克卡尔·奥托·帕特尔，他们指出了相似之处。民主社会主义者哈罗德·尼科尔森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压制个人主义的军事化社会主义，这与莫斯科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莫斯科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这一观点当时并未得到广泛接受。

在纳粹德国，许多学生认为他们正在为新社会主义奠定基础。乔治·奥威尔观察到纳粹德国吸收了战时有用的社会主义元素。萧伯纳和约翰·T·弗林等人物强调了费边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微妙界限。阿根廷独裁者胡安·庇隆和他的妻子崇拜墨索里尼并与纳粹德国有联系，也反映了这种交织。切·格瓦拉认为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其特点是独裁执行社会民主、民族主义，并将国家需求置于个人阶级之上。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支持工人控制生产，这是他对欧洲社会主义的愿景的一部分，同样，弗朗西斯·帕克·约基主张建立红棕色联盟来对抗美国的影响。这类似于弗朗哥·弗雷达的纳粹毛主义愿望，以及各种法西斯团体对世界各地左翼领导人和政权的亲和力，例如乌戈·查韦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等。莫斯利对英国经济提出的激进建议，包括大规模公共工程和政府资助的就业岗位，使他成为凯恩斯后来在《通论》中提倡赤字支出的先驱。莫斯利的计划具有变革性，遭到工党的拒绝，导致他辞职——这个故事在《对比的一生》中有详细描述。他还挑战了既定的自由贸易体系，以保护英国工资免受他所认为的外国劳工威胁。

丹麦现代民族社会主义者 Povl Riis-Knudsen 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作为一项运动，我们迄今为止取得了显着的失败。现在是时候醒来并认识到我们思想的真正意义了。第一步是成为革命专业人士。我们必须抛弃所有不成熟的右翼态度，并意识到我们是左翼人士。”

— Povl Riis-Knudsen,《民族社会主义：左翼运动》

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极端新纳粹恐怖分子，如民族社会主义解放阵线（NSLF），会在其宣言中表达与此一致的观点：

“我们不希望有‘法律和秩序’，因为法律和秩序意味着这种腐烂的、欺诈的资本主义犹太制度的继续存在。”

—民族社会主义解放阵线宣言

美国的民族社会主义阵线受到了地下气象员等左翼组织策略的影响。他们的宣言反映了对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的深入研究和对城市政治恐怖主义的承诺，与《秩序》中的罗伯特·马修斯、《围城》中的詹姆斯·梅森和《特纳日记》中的威廉·路德·皮尔斯等人的言论如出一辙。同样，战后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的重要人物弗朗哥·弗雷达在意大利领导年代领导了恐怖组织新秩序。他和他的追随者，包括来自罗马第一大学的一个学生团体，旨在用毛主义游击战术建立无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然而，在与恐怖活动的联系被曝光后，他们的努力遭到了挫败。

“蒲鲁东圈子”的创始人乔治·瓦卢瓦也承认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敌意。1925 年，随着勒费索的成立，他断言“法西斯主义的目标与社会主义完全相同”。在法国，新社会主义的出现以前无政府主义者、SFIO 成员马塞尔·德阿特和法国社会党联合创始人皮埃尔·雷诺德尔的参与为标志。他们的努力促成了强大的法国法西斯运动的形成。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和阿道夫·希特勒等人公开批评金融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恩斯特·尼基施、卡尔·奥托·帕特尔、尼古拉·邦巴奇和亨利·德曼，以及后来的思想家弗朗哥·弗雷达、亚历山大·杜金和爱德华·利蒙诺夫都主张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即国家布尔什维主义。这一传统影响了现代公众人物，例如理查德·斯宾塞，他就主张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

奥古斯托·德尔·诺斯认为，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列宁主义的世俗理想主义变体，代表着超越阶级分歧、辩证发展的革命浪潮。他认为，将法西斯主义仅仅标记为“右翼”是不准确的，因为法西斯主义者自己认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对政治光谱的彻底突破和反对。根据德尔·诺斯的说法，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石都是社会主义的变体，但它们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唯物主义方面。虽然马克思主义保留了某些自由主义元素，但法西斯主义试图通过抛弃其自由主义方面来超越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新颖、现代和反自由主义的姿态，与费迪南德·拉萨尔的远见卓识产生共鸣。尽管他们走的道路截然不同，但这两种意识形态从根本上都拥抱社会主义核心和集体拒绝资本主义，体现了一种“联合经济”。

总而言之，我们之所以会遇到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荒谬论点，主要原因可以追溯到战争的历史背景，这基本上是苏联宣传的残余。根据我的经验，不少共产主义者在私下发言时会承认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等人物采取了社会主义政策。此外，墨索里尼将苏联描述为富豪和资本主义的转变直到巴巴罗萨行动才真正开始，标志着纳粹宣传的一个明显转变，即把苏联描绘成一个资本主义暴政，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

实体。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战时宣传，任何精明的法西斯主义者都会承认这是一种战术策略。这正是我认为参与讨论的共产主义者，有时甚至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对话完全没有启发性，缺乏深度的原因。最后，看起来，任何依赖这种论点的人要么没有进行批判性思考，要么没有受过教育。

“法西斯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

— A. 詹姆斯·格雷戈尔，《雅努斯的面孔：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民族主义的目的 霍里亚-西马

注：这里介绍的片段是各章节的节选，每个片段中的段落在原文中不一定有关联。

这不是一本抽象的教义汇编。它涉及的是人们在行动中看到的政治问题。作者从深深震撼一代罗马尼亚人灵魂的事实和事件中编织了本书的内容。是军团运动穿越了历史的长河，成为历史的沉淀。

正如我们将在本文中努力阐明的那样，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拉脱维亚、挪威、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民族主义运动属于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是整个欧洲的一种现象。 这些运动都没有模仿另一个运动——只是其中一个运动允许自己受到外国公式的诱惑，削弱了自己的创造潜力——但每一个运动都响应了历史向所有民族发出的呼唤。墨索里尼说得没错，法西斯主义、意大利民族主义 “不是出口商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吹嘘自己塑造了民族主义，然后将其传播到全世界。**

军团运动也不像人们经常轻率或恶意断言的那样，是由于来自国外的冲动而产生的，而是罗马尼亚人民生活需要的体现。它与其他运动在表现形式上的某些相同之处，甚至在意识形态上的某些相似之处，都可以用所有民族主义团体的共同背景来解释。

这是一本态度之书、斗争之书。它旨在支持民族主义事业，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找到一条走出战争废墟的道路。但是，如果不首先认清它的真面目，不确切了解它真正代表的是什么，又怎么能发现这条新路呢？朋友和敌人都误解了他。世界从主要民族主义势力的表现中了解和欣赏的民族主义，与他的真实形象并不相符。人们的愿望被扭曲了。人们谈论民族主义，并以民族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行动，但实际上，是其他观念激荡着各国人民的灵魂，毒化了国际气氛：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时代的残余。民族主义者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对这一现象的错误评估。

1945 年民族主义灾难的幸存者们现在会走上怎样的道路？战争的悲惨经历对他们有好处吗？它能帮助他们辨别过去政治中的是非对错吗？或者，对战败理想的怀念会比生活的教训更强烈，从而阻碍人民生活的新方向，更符合民族主义的深层含义？

为了使民族主义思想重新成为一种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政治价值观，它必须以其本来面目示人，摆脱本质上不属于它的行为和态度。

自 1945 年以来，无论是否出于某些人或其他人的意愿，民族主义的命运都与民主国家的命运混为一谈。如果仍有被激情蒙蔽了双眼的民主主义者，甚至在最后时刻仍看不到他们的厄运可能来自何方，那么民族主义者就绝不能陷入这一致命的错误。他们有责任保持警惕，以免自己急躁的行为或不合理的要求危及他们与民主国家之间的谅解。如果民族主义者固守极端和僵化的立场，甚至无法获得真理的无条件支持，那么

他们就可能阻碍欧洲力量的统一进程，增加布尔什维主义获胜的机会。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内心世界太贫乏，受到的思想潮流伤害太大，没有民族主义的经验是不行的。如果个人意识中没有这一原则的活生生的存在，人民大众就会破坏由民族类别构成的历史的自然框架，就会把自己变成种族、民族和文化的堕落的混合物。民族主义不仅是当前国际形势下必要的意识形态，也是历史的创造性因素和民族的永久铺垫，在未来的时代，各民族将更加需要民族主义的保护。

在西方，军团运动的朋友寥寥无几。除了其对手广泛散布的诽谤和谎言，人们对其过去、苦难和目标几乎一无所知。本书无意澄清事实。它涉及的是一个一般性问题。我们向读者指出一个在我们看来十分雄辩的事实，即使不加评论：从 1938 年起，集中营的世界就成了军团成员生活中的常态。他们离开一个集中营，又被带到另一个集中营的铁丝网之间。罗马尼亚集中营、德国集中营、盟军集中营、苏联集中营！这种折磨一直持续到铁幕之外。在我们所做的思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直在关注：那就是威胁着所有民族的灾难。太多的仇恨和绝望在世界上蔓延，使我们无法忍受轻松地说出真相。我们不能再让历史在混乱目标的驱使下胡乱发展。我们必须修正过去时代的所有思想、所有体系和所有观念，使之适应人的内在和目的。我们必须停止将精神人与政治人割裂开来。历史是伟大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国与国之间为了土地、荣誉和利益而无休止地争吵，不过是历史的次要内容，必须加以克服，服从于历史的强制性目的。历史的目的是将人民从恐惧、压迫和不公正中解放出来，从而将他们最好、最纯粹的精力用于文化创造领域，这是唯一具有不朽光环的领域。

1. 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

一代人在社会组织方面取得的无可置疑的进步，在后代人中消失了；另一方面，被人们的经验所鄙视的错误，在被遗忘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出现，并得到群众甚至统治精英的信任。如果人类能够以更大的毅力分析自己的过去，发现哪些是与人类的存在相关的、不应该被遗忘的，哪些是在人类走过的道路上被证明是错误的、荒谬的、具有破坏性的，那么人类本可以避免许多痛苦、许多社会痉挛和弯曲的道路。

毫无疑问，要在历史中辨别真假，需要付出比理性更多的努力。人类智慧很容易与物理科学所体现的现实拉开距离，因为它要面对的是惰性的、无名的、服从于我们命运的物质。但是，当涉及人类事件时，人类智慧就不再具有同样的客观性了。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最终会屈服于与其使命格格不入的倾向。利己主义、虚荣心和扭曲的利益给一个国家的过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无知的帷幕，使其无法将历史的真实教训传授给子孙后代。

各国人民和个人在激烈的斗争中相互厮杀，为的是让理论和理想取得胜利，而这些理论和理想的根基同样被压制。

当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各大洲的统一时，人类却缺乏支撑这种努力和建设的原则：开明的历史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人民对战败国人民怒不可遏，指责声铺天盖地。他们寻找责任人，找到他们，惩罚他们。这个程序本身并不坏，唯一的保留是，这个人道法庭应将其管辖权扩大到各国人民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所有罪行，不考虑犯罪者的国籍或政治肤色，也不放过胜利者。否则，这个国际法庭与其说是一个赎罪法庭，不如说是一个复仇工具，是为历史的内在正义服务的。民族主义运动无疑犯过错误，

但怎么能把它们从历史的框架中剥离出来，单独归档呢？

在民族主义罪魁祸首之前就有罪魁祸首，只要这些运动在欧洲有发言权，他们就一直伴随着这些罪魁祸首，甚至在轴心国垮台后也没有停止过。我们在谈论民族主义的错误之前，不能先讨论和说明那些在民族主义出现之前并强加给它的错误。民族主义不过是民族集体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旧有错误的反动。当各民族在不断堆积他们所提供的负面资本时，布尔什维主义的基座，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憎恶，就这样建立起来了，难道我们应该放纵他们吗？

布尔什维主义长期与真理作斗争，它的整个体系就是为了迫害和消灭真理而建立的。它不是与人民的社会政治实体作斗争，而是与注入人民灵魂的真理作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国家不满足于其臣民无懈可击的顺从主义，而是要控制和夺取他们的内在自我。苏维埃国家的模范公民是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相分离的个体，他们无法独立思考，也无法表达自己的个人愿望，他们的灵魂具有标准化的功能，完全可以从外部加以控制。我们不要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想象成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或军事胜利。只有当苏维埃的单一文化成功地消灭了人的最后一丝精神力量时，我们才会庆祝它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理想是对人的剥夺。

这个畸形的组织是如何诞生的？如何解释它的极端恶毒和普遍表现？

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以一种有组织的力量的存在为前提的，这种力量抓住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利用了历史转折点上出现的混乱。共产主义要成为世界性的灾难，首先必须在它所憎恨和想要摧毁的社会中找到有利于其发展的环境。如果没有本国人民的同谋，一小撮为邪恶思想服务的狂热分子绝不会对世界人民的安全构成威胁。全世界都在为共产主义的扩张推波助澜，如今却不知何去何从，不知如何抵御共产主义的入侵。共产主义传播的主要载体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解体。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恶习、不公正、懦弱和残忍，铸就了今天危害人类根基的力量。它自己助长了世界革命的火焰，却无视大众的命运，将他们抛弃在苦难、腐败和愚昧之中。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首先是资产阶级自私道德和商人心态的产物（我们似乎认识到了当今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宁愿破坏民族团结，用新的不满者来壮大对手的队伍，也不愿牺牲自己的物质福利、舒适生活和享乐生活，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从而避免民族全面解体的危险。古往今来，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过渡，都是在原有社会出现疲态并向死亡投降时完成的。

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我们撇开了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出现的一切仅仅是其立场的策略性变化的演习，我们只以其最终目标为指导，而这些目标本身始终是不变的。俄罗斯帝国主义、俄罗斯的宗教自由、泛斯拉夫主义、东正教攻势、肤色民族主义，这些都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行动手段，只是通往胜利道路上的一个个阶段。它们并不表明共产主义转变为民族主义，也不表明向俄罗斯人民特有的其他目标演变。所有已经作出的让步，无论方向如何，只要其战术优势已经耗尽，就会遭到严厉谴责，并将被置于清洗的烈火之下。布尔什维主义不会整顿任何事物，不会带来慷慨的思想，而是充分激活社会分解的发酵剂。它从社会中抽取邪恶，并以纯粹的形式，在专门用于发展邪恶的环境中培养邪恶，就像实现微生物培养一样。

各族人民千百年来辛勤劳动所创造的传统制度，无一幸免于毁灭的浪潮。民族、祖国、

宗教、家庭、财产、法律、道德、个性、自由，都将被无产阶级的浪潮所席卷！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一切都被巧妙地呈现出来，但胜利后如何使用政权的一切却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为未来制定的方案似乎并非出自同样敏锐的头脑、同样精确而现实的社会分析家之手，因为我们突然进入了另一个虚幻的世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公式并不是为了表现某种有形的东西，暗示未来的具体和可实现的形象，而是为了掩盖某种东西，掩盖一种空虚，一种思想家的无能为力，一种其创造性能量的放弃。

共产主义社会对于那些不想揭开它的人来说仍然是一个谜！

2. 民族主义现象

我们倾向于将这一现象称为 “民族主义 ”或 “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是通常所说的 “法西斯主义 ”或 “法西斯运动”，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更符合事物的确切含义。法西斯主义 "这一概念是在其与生俱来的基础上强加给大众的。法西斯主义先于所有其他欧洲复兴运动成功夺取政权并建立国家（.....），但将法西斯主义及其成就与后来出现的同类运动相比较，我们意识到法西斯主义过于充满特殊性，过于针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因而无法涵盖这一现象的巨大多样性。我们选择的术语更容易被接受。它没有特别的提法，不会唤起对任何政权的记忆，因此，所有右翼政党都可以在同一个术语中找到，而不会有任何形式上的概念上的困难。

把握民族主义特殊性的最佳途径是 “民族”，即民族主义的直接来源。民族主义的全部起源和意义都在这里。民族 “和 ”民族主义 "代表着民族实现的两个阶段，代表着民族生活的两个不同时期，代表着民族感知宇宙的两个不同时期，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更倾向于外部世界，更倾向于 epos，另一个更倾向于内在世界，更倾向于 ethos。

民族 "反映了欧洲各民族的政治统一运动，即把他们组成独立国家的运动。这些运动在过去是零星的，在法国大革命后变得普遍化，并在 20 世纪初结束了大多数欧洲民族的运动。“民族主义 "意味着这一阶段已经结束。只有在各民族划定了自己的民族边界，每个民族都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之后，民族主义才会出现。随着 “民族主义 ”的出现，民族的内部化和深层结构化时期开始了。

“民族主义"表达的是民族的地理界限阶段，是将民族主权固定在一块土地上的阶段。它的表现意义是广泛的。其发展的可能性是横向的。“民族主义 “改变了 ”民族"，发现了其创造性的虚拟性，并将其生活轴线垂直转向。民族 “代表着一个民族的领土动员;”民族主义 "则从这一获得出发，进行精神动员。两者的视角和价值等级是不同的。当民族开始探索其精神空间时，当民族从其物质生活的框架转向其精神面貌时，民族就 “民族化 ”了。

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格格不入，后者是 “民族 ”超越其自然界限的表现形式。在欧洲民族的历史上，“民族 ”阶段受到了同时出现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扩张主义的污染和损害。

民族的两种并置之间的差异，就像一块非正式的大理石和经过艺术家巧手的同一块大理石之间的差异。民族来到世界上时，其个性也没有被禁锢。只有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通过不断的自决努力，民族才能形成。

一个走在自知之明道路上的民族只会对其他民族的存在感到无限的尊重。正如她自己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每个民族都是一个独特的事实，一个属于自己的宇宙，一个不可转让的创造性装置。对一个民族的破坏或压迫等同于对整个人类完整性的攻击。只有从这种开明的立场出发，一个集体才能在其他民族中间成为和平与博爱的土壤。

无论各国人民多么热衷于捍卫自己的命运，除非他们寻求更强大的力量的支持，否则他们将永远无法摆脱掠夺本能的漩涡。民族主义的主导地位与盲目崇拜民族毫无共同之处。

民族主义倾向于在超验现实的庇护下约束民族。民族主义精神与基督向世人揭示的我们存在的终极奥秘密不可分。

3. 民族主义的错误

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没有充分认清自己的根基就开始行动。民族主义运动不仅要与作为其敌人的世界作斗争，还要与自己缺乏方向作斗争。他们的领导者之所以屡遭惨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界定自己的目标。他们希望在狭隘和僵化的框架内涵盖更广泛、更复杂的现实。他们的政治纲领不是自主思想的体现，而是原创思想和借鉴思想的难以消化的混合物。由于缺乏对新欧洲精神的深刻认识所产生的重大指示，民族主义领导人在不同的倾向之间摇摆不定，直到主动权最终落入对手一方。

这种基本概念上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民族主义者的失败。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邪恶联盟主要是由于民族主义者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缺乏忠诚。当然，从责任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民族主义运动都负有同样的责任。首先，这些责任落在了那些有更多机会坚持自己主张的人身上，他们凭借人数和政治军事实力，更有条件向欧洲发声。我称它们为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即使在这个狭窄的圈子里，也需要一条新的分界线。从 1936 年起，民族社会主义在战斗力和政治地位上超越了法西斯主义，因此责任中心也必须进行同样的转移，从罗马-柏林轴心的南部转移到北部。

西方列强后来对民族主义国家越来越不信任，是其外交政策方向改变的结果。他们被侵略性民族主义的海市蜃楼所诱惑，这是一种虚假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其真实形象毫无共同之处。这些大国的军队不再像它们的主要目的那样为可能的反苏战线服务，而是威胁着欧洲各国人民的和平共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 “民族主义 ”与 “国家主义 ”之间的巨大距离。在外交政策上，他们采取了一种过时的意识形态立场，一种被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腐蚀了的 “民族 ”立场，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扩张的阵痛中，将所有民族都视为随时可能成为猎物的对象。

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种从不同方向发动战争的做法造成了一种难以为继的局面，使可用的力量无用而惊人地分散。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希特勒试图以这种形式向全世界展示在俄国的战役——的前提是事先消除欧洲内部的敌意，并让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人民受到鼓舞地参与进来。但是，当莫斯科的阴谋巢穴的发起者和最高领袖正在践踏其他民族的生命和自由时，从什么内在源泉中能够产生对这一巨大努力的必要热情，从什么内在源泉中能够结成强大的联盟来捣毁这一阴谋巢穴呢？除了俄罗斯的邻国之外，欧洲各国人民已经放弃了建立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统一战线的

想法，因为希特勒本人是第一个发出崩溃信号的人。

为了真实起见，我们必须将意大利的态度与德国的态度区分开来。墨索里尼怀有同样的帝国梦想，但他太现实了，没有意识到这些梦想不可能在人的一生中实现。(.....)墨索里尼只是奠定了帝国主义愿景的基础，而其实现阶段则需要几个世纪和几代人的努力。

希特勒的想法则完全不同。他认为自己注定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人民对空间的渴求。德国将扩张到我们大陆的最边缘，并从欧洲的中心指挥世界。墨索里尼只是作为意大利历史的一个推动因素才推出帝国主义方案，而元首所想象的帝国则不同，它将在元首有生之年最终成型。在希特勒的判断中，其他民族的生活需求是次要的，只有当它们能够服务于或阻碍他统治世界的计划时，才会引起他的兴趣。他并不满足于德国在即将形成的欧洲共同体中的主导影响，也不满足于德国的领导权（Führung），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反常，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不是大国的主动权占上风的，但他全力争取的是 Herrschaft，争取其他民族完全臣服于德国统治的权杖之下，争取他们在政治上消失。

民族社会主义缺乏一种宽宏大量的气度，而这种气度能够为政治理念进入各民族的心灵开辟一条广阔的道路。希特勒的学说意味着“民族”对“民族主义”的胜利，意味着德国人的私利被提升到了极致，并披上了神话的外衣。即使是种族主义思想也不是为了其内在价值而培养的，而是为了服务于帝国统治世界的计划。

希特勒出现在一个 “民族主义 ”时代，但却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他借用了环境的框架，却篡改了环境的本质。(.....)在所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民族社会主义最不容易被其他民族所接受。但是，尽管它独自摒弃了欧洲合作的思想，却同样声称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其他运动的命运。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结果呢？从它所坚持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出发，民族社会主义不可能像伟大的人生观那样自发地、神气活现地走向世界。一个拒绝接受其他民族的生活，宣称自己不关心他们的利益的理念，很难被接受为新欧洲的精神象征。

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后一年，党内最重要的人物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赋予民族社会主义一种更人性化的解释，一种不那么严苛、意识形态上不那么过分的解释，一种回归其根源、回归其最初状态的解释。这种新理念的倡导者、德国外交部文化处处长于 1945 年 1 月初在魏玛组织了一次德国所有民族主义难民大会，目的是在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共同的理解基础。(.....）从德国官方代表开始，所有发言人都反对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宣称它们与真正的民族主义不相容。

尽管灾难即将来临，但在歌德的普遍主义思想指导下召开的魏玛大会代表了民族主义运动存在的一个关键时刻，也是其未来的一个新起点。在第三帝国的暮年，真正的民族主义之路在长期徘徊之后被重新发现。

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错误是受一党制的诱惑。一党制并不代表民族主义的本质，这与一党制的种种表象和可怕之处恰恰相反。只是因为这种错误来自从小运动到大运动的普遍性，才造成了这种政府技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实质同一性的印象。

极权主义最早是由布尔什维克引入历史的。他们是单一政党的创造者。他们的理论

是如此缺乏人文内涵，以至于只能通过为一党利益夺取政权，然后持续实施恐怖，才能在国家中实现。

民族主义精通这种程序吗？它的理论是否远离了人民的灵魂，以至于不得不求助于警察国家的保护？民族主义不会与人民的存在发生冲突，不会损害他们的生活基础。那么，如果它所倡导的思想没有背离一个民族的最高利益，它又何必逃避选举的考验，何必害怕违背民族意志的决定呢？民族主义者无法摆脱这种两难境地：要么他们表达了一个民族的优秀思想，然后就没有理由回避民众的裁决；要么他们拒绝融入政治自由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默认自己与民族的真正愿望格格不入。

迄今为止，我们在民族主义的历史表现形式中发现了两个致命的错误。这两个错误在本质上都不属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起源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极权主义国家则是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借来的。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错误——这也是最重要的错误——是让自己受到唯物主义的污染，而唯物主义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的青睐和传播。

民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将无边无际的壮观、史诗般的威严归结为在国家支持下进行的物质建设。一栋建筑、一座桥梁、一条铁路、一次展览都成为集体狂欢的时刻，成为对民族自豪感的肯定。一种将国家永恒化的倾向，一种国家生产了多少吨钢铁、建造了多少栋房屋、在船坞上建造了多少艘轮船、获得了多少项专利发明就有多少价值的信念。

我们不要误解：拥有技术的人是幸福的。从他们大脑中产生的一切都值得无尽的赞美。只有当我们将技术从生活和精神的从属地位中剥离出来，并将其视为人类的最终努力时，荒谬才会开始。这种将兴趣从内部转移到外部，从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转移到疯狂的物质创造的做法，剥夺了其文化的原始元素。技术领域可能实现的所有奇迹都无法弥补精神领域造成的空虚。

4. 民族主义的建设性经验

在分析了民族主义的偏差之后，我们现在还必须审视民族主义的优点。如果对民族主义的行为不加区分，如果不承认民族主义所创造的、今后属于人类的真正价值，那将是对民族主义的极大不公。

民族主义以民族的内在力量对抗现代社会的一切瓦解趋势。民族在历史上的这种精神呈现是一剂具有普遍效力的良药，是一种能够满足最多样化需求的公式。一旦 “民族 ”开始以 “民族主义 ”的形式出现，社会分解的进程就会停止，一个民族的历史就会显示出振兴的迹象。最重要的是不要忽视一个民族固有的发展路线，不要偏离其主要指标。每当民族主义运动忠实于自己的内在结构时，它们就能有效而优雅地解决问题，而每当它们向外国寻求灵感时，它们就会误入歧途，以不合时宜的方式提出解决方案并遭受失败。

例如，谁能不承认民族主义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决定性贡献？在这个矛盾重重、资产阶级越来越无能为力的领域，民族主义找到了一个发光体，一个社会各阶层和解的方案，为共产主义运动挡住了道路。

民族主义的最大优点是找到了一种调和方式，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两个词是不可调和的：祖国和社会主义。工人不需要为了改善生活而攻击国家的完整性。劳动

者的诉求之路并不一定要经过祖国的废墟。

社会主义只是一个国家要解决的问题，并不要求国际解决或建立一个世界无产阶级国家。阶级仇恨会在一个被民族意识的启示所淹没的民族中消融。当共产党人鼓动的对象消失了，当社会各阶级宣布与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当资产阶级已经发展到认识到人剥削人的亵渎和不光彩时，共产党人还能呼吁什么其他的不满情绪来煽动工人反对自己的同胞呢？

民族主义的另一个伟大胜利是，它能够实现最大胆的社会改革，却没有放弃私人首创精神的优势。民族主义只是在引入指令性经济原则时对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修正。这种制度并不压制私人首创精神，而只是将其视野扩大到社会现实，将其与国家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指令性经济将自由经济的脉动与整个国家的生产循环相协调。它不排斥私人的主动性，但也不能无视其他经济现实，它们同样享有生命权、劳动要求权和国家的全部物质资源。后者并不属于某一代人，而是必须作为世世代代的生存基础。只有通过这三个因素的长期合作，经济才能健康发展。一个国家经济中出现的困难，是由于其中一个因素的突出而损害了其他因素造成的。这三个因素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三分之一，只有在这种完美的和谐中，才能确保一个国家的物质繁荣。

民族主义运动引以为豪的这些经济和社会理念，今天已为世界上所有自由民族所赞赏。然而，比经济和社会成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欧洲反对共产主义渗透的斗争。民族主义运动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将经受住一切诽谤和贬低其历史作用的倾向。总有一天，后人会重新审视同时代人对民族主义世界的评价，到那时，为捍卫欧洲文明而流下的鲜血将成为最有分量的见证。

民族主义者所建立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阵线与历史上任何常见的对抗都毫无相似之处。因为不再是两个民族、两种倾向、甚至两种存在感的对峙，而且无论哪种倾向占上风，都不会妨碍善的力量在世界上的存在；但在这场斗争中，精神上的虚无正在努力取得对人类创造性本质的最终胜利。因此，任何反共战士，在积极和光荣的意义上，都会成为全人类的战士，只要他在这束火焰下服务，就会得到至高无上者的支持和保护。民族主义者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所发挥的先锋作用，使他们有权利希望，明天当全地球都拿起武器保卫基督，使其免受崛起的暴徒的狂暴攻击时，他们将受到不同的看待。

民族主义运动使布尔什维主义在欧洲的传播至少推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让我们回顾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陆的混乱景象：一切观念、一切代表着稳定并在先辈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东西都被可怕地抹杀了，一个被苦难蹂躏的世界，在战争废墟散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中疯狂地寻找出路。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早在 1930 年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大陆上。对欧洲的征服本来可以在没有全面战争风险的情况下，通过在各国人民中间建立共产主义飞地的简单方式逐个国家地进行。

每当来自东方的敌人试图渗透欧洲时，民族主义运动的这一短暂政策只有一次失败：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一行为在当时的德国宣传中备受赞誉，与俾斯麦巧妙的外交组合并驾齐驱，却引发了欧洲良知的溃败，在各国人民之间播下了混乱和不信

任的种子。德国从中获得的利益与其遭受的损失相比微不足道。它的结束暴露了民族主义世界结构的危机，因为只有被不确定因素破坏的内部战线才能想象出这种同志关系的可能性。

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仅仅是政治战略上的失误，更是历史使命的失败。即使这次英勇的征程以类似 1945 年的灾难而告终，那也是全人类所祝福的失败。

1941 年 6 月 22 日平反了德国历史。但功劳不再属于民族社会主义统治集团，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条约的好处都在莫斯科一边。功劳属于数百万德国士兵的强大进军，属于拿起武器的民族社会主义群众，他们顶着酷暑和风暴，穿过暴风雪和冰霜，向一望无际的俄国大草原挺进，要把这个在 1917 年脱离的国家带回欧洲民族共同体，成为它最凶恶的敌人。

当希特勒把战争机器转向克里姆林宫塔楼时，他自己似乎更加纯洁了，更加远离了对自己民族的病态热情。通过进攻苏维埃俄国，他走出了自己的民族轨迹，觉得自己披上了人类的齐格弗里德的战袍。他认为这样的姿态足以平息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仇恨，并改变国际气氛，使之对他有利。他希望在西线缓和局面，给他的军队以喘息的机会，以便在日出时结束这场大决战。

只是当他看到对手的灵魂中除了必胜的喜悦之外再无其他回响，在大西洋彼岸除了追杀自己的首级之外再无其他目标时，他才开始为自己辩护，带着一个知道只有绝望才能拯救自己的人的沮丧。从那时起，一场毁灭的狂欢开始在交战各方的良知中合法化。火葬场冒着浓烟，城市在燃烧。双方在野蛮的野蛮人中竞争。这并不能为希特勒或那些模仿他的人开脱，但却能解释战争进入的 “全面手段 ”阶段。除了战败或全胜，德国别无他法，这种确定性使战争的恐怖普遍化。那些否认德国有可能从其所陷入的僵局中光荣撤退的人，同样为欧洲的悲剧时刻做了准备。 在这方面，1943 年 1 月盟军在卡萨布兰卡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与希特勒最恶劣的行动一样，对欧洲的未来造成了破坏性后果。这一声明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不必要地延长了战争，并为苏联入侵欧洲铺平了道路。这是一种受复仇驱使的行为，而不是出于政治原因，更不是出于人道考虑。

当今文明世界是两个相关民族群体之间思想冲突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命运扭曲的结果。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战争双方都缺乏有远见、有勇气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能够将欧洲的精力引向有利于各国人民的合作。

5. 民族主义悲剧

除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外，民族主义运动的特点是零碎而不精确的表象，给人留下了行动过早结束的印象。但这种表达上的不足，即他们的过去模糊不清，却被他们仍然拥有的自由价值的优势所弥补。未完成的社会现象不能被强行排除在历史之外。在找到新的表达方式之前，它一直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这并不是说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已经用尽了自己的再生手段，而只是说其他运动受其过去的束缚较少，因此在未来的方向上更加自由，更容易接近新世界。

阻碍民族主义运动前进的各种障碍和敌意，正以一种幻觉般的速度不断增加，仿佛全人类都凝聚了神秘的力量，目的是阻止他们前进，无论他们敢于出现在哪里。逆境

的图景并不局限于民族主义运动的表现方向所激起的通常的敌人，它还包括最多样、最难以想象的敌意。从共产主义者到民主国家，再到主要的民族主义势力，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势力都对欧洲人民复兴自己的努力表现出同样的敌意。

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民族主义者自然是最大的敌人。两股力量之间的对立是不可化解的，因为这种对立源于它们的理论本质。

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清晰明确。关于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我们知道双方的敌意都是明确的，但如果说民族主义者向旧世界宣战，那未免言过其实。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取代民主赤字，介入一场旧党派不准备以任何真正的成功机会来应对的冲突。民族主义党人并不指望资产阶级能提供有效的帮助，但他们希望至少能赢得资产阶级善意的中立，因为他们很自然地假定资产阶级不会对与共产党人的斗争结果漠不关心。

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并没有同样清醒而有远见的判断。从他们的角度看，情况有所不同。几十年来，这些政党习惯于在封闭的圈子内掌握国家大权，以交换服务为幌子互相传递权力，并确信他们不会长久地放弃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权阶级的心态，可以说，他们已经掌握了公共事务的领域，甚至可以想象，如果征得他们的同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国家元首。

当民族主义团体出现时，他们认为新的政治组织不过是一个骨干过于强大的对手，而没有区分导致其存在的客观因素。在民主派看来，右翼和左翼的危险同样严重，因此必须以同样的力度打击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原则差异，对一方来说民族是一种信仰，而对另一方来说民族不过是一种阶级偏见，注定要从个人意识中消失，这些都没有打动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他们不再考虑他们的两个对手和敌人中哪个真正威胁到了社会的基础，哪个只是顺应了新的社会条件，而是对所有已经充分渗透到人民意识中、害怕与他们竞争的政治团体进行诅咒。只要注意到他们在选民中的人数减少，他们就会把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混为一谈，认为他们在国家中同样不受欢迎。当他们有机会检验自己的理论、强调两个 “极端 ”之间的相似性时，他们的满足感是无以复加的，他们坚持不那么重要的一面，即政治技巧，却有意无意地忘记了，无论他们有什么相同的证据，都无法消除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深刻分歧。

这种观念将各党派领导人推入了一个更加危险的游戏。因为谁登上政治舞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不尊重他们的教导，谁就必须被打倒，而民族主义者的进步越来越快，这意味着他们而不是共产党才是欧洲的头号危险。共产主义者无疑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但他们的活动并不会让他们太过烦恼，因为他们知道，由于他们的混合理论，他们被困在社会的边缘，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选票。但民族主义者在群众心中却有着不同的共鸣。他们以民族的声望为依托，诉诸于民族的无穷力量，诉诸于集体原始能量的底层，这种能量一旦释放，就会溢出到民族有机体的边缘。

为了击退民族主义政党的进攻，自由民主国家放弃了其经典的斗争体系。他们意识到，如果继续在自己的战场上厮杀，就有被民族主义者战胜的危险。资产阶级政党只有在大众潮流对其有利时，才会高唱民主政府的赞歌，并稳定地保持其执政地位。只要还

没有出现真正的挑战者，只要他们还能确保议会的尊严，人民的声音当然就与上帝的声音无异。但是，一旦他们意识到投票箱的匿名性可能隐藏着意外，人民即将改变他们对政党的偏好，寻找其他方案和其他人来表达他们的需求，他们的老板们就不会再热衷于选举算术的结果了。他们焦急地喊道："如果晦暗的社会势力利用民主自由，把人民从传统的墨守成规中吸引出来，那么国家的根基岂不是受到了威胁，使我们这个时代闻名遐迩的原则岂不是面临灭顶之灾，现在难道不是制止这种蛊惑人心的煽动的时候了吗？

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为了证明其战争计划的合理性，不惜在理论和宪法上弄虚作假。他们宣布 “民主就是我们”，并通过这种不可接受的词语替换（民主的永恒原则和政党的短暂存在），认为自己摆脱了所有意识形态上的顾虑。就这样，选举阵线混乱的政党偶尔提出的请求，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所有欧洲国家的国内政策手册。新精神 "得出的结论是，民主政体有权使用一切武器来保护自己，即使是那些与其内部结构相抵触并使其失去资格的武器。民主国家甚至不需要发展这些武器，因为现代独裁政权和极权主义政权的武器库中就有这些武器。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对所有这些武器逐一进行了尝试，起初有些勉为其难，但后来却大胆尝试，甚至坚信没有什么可以归咎于他们自己，直到他们找到了那些更能满足他们愿望的武器。他们不无兴趣地发现，当专政有利于他们时，专政并不那么可憎。以前，当个人权利似乎受到国家威胁时，政党总是大声疾呼，而现在，这些政党却使用专制语言，敦促政府严厉打击 “颠覆”和“无政府”思潮。党的领导人意识到宪法保障不足以保护民主政权，于是用一整套特别法律来扩大宪法保障。当他们发现民族主义的浪潮甚至已经冲垮了这些偷偷摸摸的限制时，他们就进一步加大了力度。他们镇压反对派，解散不合他们心意的政治团体，逮捕、迫害和恐吓拒绝接受他们干涉的民众。事情的发展就像在一场剑术决斗中，其中一个对手看到另一个对手更善于使用这种武器，便扔掉剑将自己的手放在手枪上一样。

有必要补充的是，这些话主要是针对欧洲黎明期的民主国家说的。 在西方国家，民族主义运动曾遭受过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但对它们的迫害从未激烈到暴行的地步。在这些国家，经过长期的社会辩论，经过激烈的良知澄清过程，民主制度取得了胜利。尊重公民的自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被民众所接受的概念。无论对民族主义运动怀有多大的仇恨，这些国家的政治框架都不能忽视公共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法制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镇压措施也必须尊重（至少表面上尊重）法律秩序，不能与法律公开冲突。

在这些国家，民主并不是有机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深刻而持久的需要中产生的，而是叠加在与西方产生民主的条件和习俗截然不同的条件和习俗之上的。民主以一种时尚的效果和突然性强加给了这些国家的人民，迫使他们从过去的安居乐业中跳出来，进入一种迄今为止他们所不知道的生活节奏。这种形式与实质的错位导致了一种面目全非的民主，它与我们在暮色中看到的民主并不一致，只是在名称上有所区别。从外观上看，它们没有任何区别。条款模仿得无可挑剔：从下到上都是同样的国家宪法，同样的经典分权制度。然而，与现实政治生活的接触很快证明，政治生活是在国家根本法规定之外进行的。

在东欧各国人民中，民主制度的基石——普选权、选举自由、议会制政府——只是寡

头独裁的伪装。它们代表了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向时代的胜利精神做出的形式上的让步，而没有服从其内在的纪律。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对民族主义者的迫害达到了暴力的极致，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是这些伪民主国家，看到在现行宪法庇护下的镇压手段不够有效，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种合法的伪装，用独裁的盔甲和徽章来装饰自己。当东方国家的寡头阶级走向建立专制政权的道路时，它并没有与自己的信念进行斗争，而是在其自然的生存环境中发现自己并重建自己。它用自己的真名来称呼以前打着民主幌子实行的独裁统治。

战争的爆发给民族主义运动造成了更加不利的局面。一方面，这些运动在国家中并不担任要职，不能决定国家的命运；另一方面，国际事件要求他们对外宣布效忠，加入交战阵营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民族主义运动首当其冲地承担了战争的后果，但却与战争的爆发或战争的特殊面貌毫无关系。

战争结束后，盟国政府与其说是想弄清欧洲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受复仇精神的驱使，自然而然地将所有依附于轴心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称为 “通敌 ”运动。在他们看来，这种说法的目的是对历史做出一种难以接受的评判，成为一种永远取消民族主义运动资格的提醒。在协约国看来，任何与德国站在一边的人都会成为 “通敌分子”，而无需进一步解释。“通敌分子 ”在这个词的新意义上，是指为了个人利益而放弃人类尊严和祖国神圣纽带的人。

即使在这些运动中存在一些游击队员，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态度玷污了民族主义的本质，但也不能将这些孤立的案例一概而论，认为所有民族主义运动都只是德意志帝国主义的附属品。每个民族主义运动都有自己的内心戏，与轴心国的合作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这些运动——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与德国共赴苦难，这一事实本身就有力地说明了激发它们的理想的独特性和崇高性，也是对它们所受到的严重侮辱的最好回答。

民族主义运动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在经受了民主国家不间断的攻击，并在战争爆发时 “在绝望的高地 ”徘徊之后，他们也未能幸免于自己同路人的打击。当他们带着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斗争、他们的伤痛和他们未来的责任出现在主要民族主义列强面前时，他们受到的待遇更像是豪华宫殿门前的穷亲戚。民族主义运动发源的世界以道德沦丧而闻名，而这个正迈着蹒跚的脚步走向历史的世界却被期待着用一颗充满希望的心来迎接他们，想象着这个世界会更好、更正直、更向精神之美敞开大门。民族主义运动遇到的不是宁静、热情的人类，而是同样的霉烂形象，同样的被民族利己主义玷污的氛围。

法西斯意大利在其存在的最后十年对民族主义运动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与此相反，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却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活动范围内大展拳脚。它伪造了新欧洲的实现感，赋予其泛德内容，试图利用民族主义世界的牺牲力量来达到其帝国主义目的。民族主义运动强加给他们的准则、奴役和态度不符合他们的内在和谐，对共同事业毫无益处。在法国、荷兰、比利时、丹麦和乌克兰，党卫军对整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所有这种 “党卫军化 ”都是一种不幸的启发，是自然冲动的倒退，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使他们与人民疏远。民族主义运动的魅力和活力恰恰在于其倾向的特殊性，在于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每个民族的才能和价值都得到了体现。一个由千篇一律的个人组成的宇宙，即使他们的才能逐一超过人类的平均水平，也不再具有任何创

造性。这样的宇宙因其自身的陈腐、焦虑原因的枯竭、资源的极度匮乏而被凝固。

在这幅民族主义苦难的三联画中，我们看到了三种尝试，三种净化行为。如果民族主义运动一帆风顺，其内在宝藏很可能很快就会在成功的喜悦中烟消云散。但就这样，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无数次打击中，他们总是被迫修正、面对、审视自己的疑虑和梳理自己的经验。他们无法向外表达的东西被反映到了内心，从一开始就完善了他们的人生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这些运动还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最后的痕迹。总有一天，全人类都会记住他们的悲惨经历。**

6. 有效历史的前提

民族主义运动的前景如何？特别是读者和朋友们会很快说：回到过去，回到民族主义现象未曾改变的形式，以便从其第一阶段恢复被误导的历史进程。这种解决办法本身就有一定的道理——它是以往辩论的结果——但我们不应毫无保留地相信它。历史的进程不可逆转。我们提出同样的建议，即拾起在当代分裂的荒野中迷失的线索，但目的截然不同：控制民族主义所遭受的偏差的严重性，在视网膜上重新捕捉其正确的表现线。

但是，一旦我们刷新了对民族主义的忠实印象，追溯到它的源头，再停留在过去，试图追溯它的脚步，就好像在此期间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是有害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民族主义现象催生了一种心态，塑造了几代人的思想，因此，那些希望民族主义被埋葬的人的希望只是一种幻想。但是，那些拒绝接受失败经验、希望看到民族主义自己创造新世界的人的立场同样是错误的。民族主义的信心在二十年的历史曲折中受到了严重动摇，只有与其他政治力量、其他思潮达成一致才能重拾信心。

这一观点可能不会受到民族主义者的欢迎。我们会被告知，妥协方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难道这不会改变现象的特征吗？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担忧是合理的，但一旦未来妥协的框架和条件得到明确，这些担忧就会烟消云散。

我们心目中的联盟并不是由历史的一时臆想构成的；我们并不打算通过使民族主义脱离其自身的短暂情结来 “拯救 ”民族主义，因为这会破坏其基本结构。我们心目中的方案是欧洲精神的综合体，是对欧洲大陆各民族所经历的生活经验的精选。两千年的欧洲历史让我们能够回顾过去，发现它的主要支撑点是什么，它的支柱是什么，它的有效前提是什么。这种对欧洲精神的广泛分解揭示了对我们文明的命运至关重要的三个因素：基督教、民主和民族主义。

基督教、民族主义和民主穷尽了人类的全部自由，并将个人从一切可以想象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只有它们汇聚在一起，只有它们同时发挥作用，人类才能成为真正的人。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代表着一场精神革命，是将个人从阻碍其创造力自由发展的短暂等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行动：通过基督教，人从内在的罪恶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民主，人从外在的社会阶级统治中解放出来；而民族主义的使命则是将人从民族自豪感的暴政中解放出来。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三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完美地交织在一起。将这些概念放在一起思考，不仅不是奢望，而且是清晰理解它们的唯一途径。基督教、民族主义和民主，在它们未被证实的接受范围内，相互呼唤，相互支持。在这种对抗中，最重要的是不要通过肤浅定义的棱镜来看待它们，不要从未经充分研究的材料中

得出结论。

民主政体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发明，是人类天才的产物，适用于集体组织领域。民族主义不是一种技术，不是我们智力的创造，而是一种既定的现实，是一个民族逐渐展现在其意识中的一种精神状态。民主是表达这种看不见的现实的一种手段。人民灵魂深处发生的一切，人民意识中的变化、变化的幅度和变化的音调，民主都会记录下来并加以赞美。普选、议会和法律都是表达民族良知的工具，显然，在没有任何因素阻碍它们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民族主义对民主的支持，那么选票还有什么意义？选举活动的目的何在？是为了表达公民某种模糊不清的意愿吗？只有在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民族中，这种意愿才会变得清晰。法国有法国的公众舆论，英国有英国的公众舆论，意大利有意大利的公众舆论，这些公众舆论对应着同样多的对事件的态度，同样多的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就像有同样多的人民一样。舆论意味着民族主义投射到特定的事实上，投射到民族集体的切身利益上。它永远处于躁动之中，所处理的问题也总是各不相同。但是，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舆论的反应并非偶然，它们遵循着自己的曲线，表现出一个民族的永恒性。

党派往往不倾听民族的心声并与之同步，而是把自己当作自给自足的现实。政党的作用是收集众多个人意见，并将其归纳为某些基本类型，它们从中间机构趋向于自身的存在，冲淡了民族意识的反映，并在其表现形式中篡改了民族意识的历史意义。

政治历史综合体的第三个要素改变了这些价值观，将其扩展到永恒真理的世界。正如我们在专门讨论民族主义现象的章节中所指出的，为了超越 “民族主义 ”这一外部煽动时期，进入 “民族主义 ”这一自我认识阶段，各国人民必须摆脱骄傲，接受基督的教导。为了将目光从行动转向内在，转向神圣滋生的永恒财富，他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上帝的主权。

没有基督教，就不会有民族主义；没有民族主义，就不会有孟德斯鸠所期望的以美德为动力的民主。

在阐述这些论点时，我们丝毫没有断言它们会自行实现。我们只是说：各国人民的普遍需求正在推动历史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不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运动，也不相信这是不可抗拒的事件，我们只相信这是欧洲文明的创造性手段，是两千年历史事件的产物。在这三个因素的保护下，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向前迈进，战斗已步入正轨，所有战略要素都已就位，以确保结果不会令人失望。民族主义、民主和基督教是有效历史的前提。但是，能够实现它们并使其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力量来自人的内心，来自人的灵魂。集体进程是千百万个体进程的结果。各民族的历史可能在某一特定时刻被某些倾向所掩盖，但这些倾向不会自行克服，而只能通过个人的推动力来克服。仅仅意识到一种现象已经诞生，它正在演变，还不足以确保其成功。你必须一刻不停地为它服务。一个时代的趋势只是一个分散的物质点，它可以采取适当的历史形式，但也可能被引导到其他地方，用于不那么正当的目的。例如，劳动群众的解放愿望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表现。但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工会主义和基督教民主都是建立在同样的原材料之上的，这就意味着每种政治理想所耗费的精力不同，结果也就不同。

现在是时候了，历史应该走出试探性和不连贯的努力阶段，面向未来的目标。历史

不仅是过去，也是未来。它记录了各族人民的探索，但也在不断创造的意义上，在为印上有效指令而进行的日常斗争中，预见了这些探索。

7. 民族还是社会大众？

地球表面不存在同质的**民族**，无论我们从中国还是美洲、非洲还是欧洲采集样本材料，这些**人群**都具有相同的特性。因此，我们必须对 “群众”这一概念进行修正和重新思考，明确我们所讨论的是 “民族”群众，即特定民族的群众。这并不妨碍我们将民族特殊性之外的群众视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但我们也不应将抽象概念推得太远，以至于抵消了现实。

群众的民族多重性可以从其起源得到解释。群众在成为群众之前，处于一个民族的生物和历史空间之中。他们从一个民族的内在领域中脱离出来，带着民族的印记来到这个世界。他们不是自主的实体，而是代表着民族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民族实质的一种改变。群众不能与民族割裂开来，因为在各种力量的更广泛发展中，群众只不过是民族的一部分。群众继续作为 “民族的 ”群众留在历史中并发挥作用。

群众引领我们走向民族。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没有任何民族特征的单一群众。非罗马人、非希腊人、非法国人、非英国人的 “非民族 ”人类尚未出现。

大众的出现只说明了这一点：人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认识阶段，在技术和工业的推动下，相当多的个体正在摆脱千禧年的惰性。但是，在民族的平台上，革命始终在进行。

既然国家创造了历史，这就意味着所有当代问题，包括国家、文化、技术、大陆联盟、经济计划，都必须纳入国家的框架，其解决方案也必须被视为国家视角的延伸。忽视民族的存在和需求，也就无法脱离群众问题。

只有在缺乏精英的情况下，群众才是危险的。构成这些背井离乡的大众的个体正处于其生存的关键时刻，处于过渡阶段，为了通过这一考验，他们需要支持。精英的任务是接受大众的事业，并通过智慧和耐心使他们重新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大众已经脱离了迄今为止统治社会的旧秩序，但他们并没有脱离民族精神，在新的生活条件下，他们将继续为民族精神服务。他们的自然冲动促使他们在民族中重新奉献自己。执行这一计划的精英们并没有强加现实，也没有违背群众的普遍倾向；相反，他们是一种行动的推动者，这种行动虽然没有明确的目标，但却预先存在于他们的灵魂之中。

只有一种学说可以持久地、互利地解决群众的问题，那就是民族主义。它代表着一个民族内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分配给组成民族的所有人。

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得以出现，因为只有到了现在，民族的能量才得以释放。旧的阶级特权不仅是压迫人民大众的手段，也是民族发展的敌对势力。一个民族的真正历史只能从实现其所有创造潜力开始。

民族主义通过在群众中激起反平均主义的逆向运动，避免了全面削平的危险。在民族主义学说的影响下，群众中的非正式群体分裂为具有自己的生活观念和问题的个人，随着他们的增多，他们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民族主义将群众划分为个性和人格。普通人作为群众的特征，只有付出巨大的灵魂压力才能成为民族主义者。为了在自身和环境中发现民族的存在，他必须借助直觉和沉思的力量。这种精神上的专注，这种从外部到内部的生命转换，使平等主义落空。个人强烈关注自己民族的命运，从陈旧的

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他的判断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一个完全以灵魂力量为基础的新贵族诞生了。

当然，这些伪装、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只是发生在精神层面；在政治层面，民主原则将继续支配个人之间的关系。

寻求在没有民族参与的情况下解决大众问题的方案，是当今最常见、最受推崇的方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被打败。它还在理论思想层面遭到了挫败。人们产生了一种偏见，认为民族主义已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回避民族主义就是回避民族，就是忽视历史的主要现实，忽视支撑人类创造全过程的基石。

社会主义和欧洲超国家这两个当今备受公众青睐的伟大构想都是人类的规划项目，它们也往往会抹杀大众的种族多样性，而种族多样性恰恰是大众复兴可能性的源泉。我们不明白，当全国人民被一个由四五亿人组成的非正式集团吞噬时，他们的精神境界还能得到什么提升？我们不明白，当一个普通人被从自己的民族中剥离出来，融入无名的暴民之中时，他作为大众的一员，将如何恢复自己的内心世界。相反，他被扔进一个不确定的社会空间，会使他失去所有的意识支点。

即使是被托克维尔视为防止社会彻底夷为平地的唯一保障的个人自由思想，除非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否则也无法明显改变群众的野蛮面貌。自由的支撑点是创造。如果人没有创造的冲动，或者这种冲动因恐怖而萎缩，那么他就不会努力争取外在的自由。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同时创造一种创造的氛围，那么仅仅创造和维持政治自由的氛围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内在自由的环绕，如果不引导个人以其个人的丰硕成果来充实自由的社会框架，那么外在自由本身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充其量只是一个有利条件。

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会从欧洲的联邦化运动中看到一种危险。我们并不反对建立这样一个联盟。当各国不再互相残杀，而是以建设性的方式投入精力时，人类将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联邦主义运动自己承认，其基本指导原则是尊重每个国家的完整性和特殊需要。建立欧洲各国联邦的目的不能是动摇各民族的生活基础，而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当今战争所使用的极端破坏性手段所带来的致命危险。

如果说联邦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在每个民族自由加入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组建未来的欧洲，那么令人费解的是，它怎么可能在自己内部产生出无视这一原则的方向，这些方向往往会牺牲民族现实，将其纳入毫无生气的计划之中。在欧洲，我们必须以经验为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借用或过于笼统的公式。

如果不考虑民族精神的持续活力，只凭一时的热情就将欧洲联邦化，那么欧洲很快就会分崩离析。

民族主义也恢复了对联邦制领域事物的清晰认识。民族主义具有两种巨大的行动可能性：一方面，它维护并加强了民族特性，即民族的内在存在；另一方面，它在民族之间创造了一种共融的氛围。这种博爱精神使民族国家的联合成为可能，并保证了新定居点的可行性。民族主义在各民族心中为联邦制的目标铺平了道路。从国家层面到国际层面的过渡是顺利的，因为民族的精神投射也澄清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

在历史上达到开明阶段的民族会看到每个民族的存在都是一个奇迹，并将各民族的创造视为全人类都应享有的神圣礼物。

军团教义 法西斯邮报

（也称军团主义）是指米迦勒大天使军团（也被称为铁卫团）所提出的哲学和信仰，该军团是罗马尼亚基督教民族主义组织，由 Corneliu Zelea Codreanu[科德里亚努]创立，他是该教义创立的关键人物。由于缺乏研究或媒体欺骗，以及人们**错误地**认为军团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或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模仿，因此有必要澄清军团运动成员所教导和信仰的内容。

前体

1878 年和 1879 年，罗马尼亚从奥斯曼帝国获得独立后，这个新国家希望得到其他欧洲列强的承认。罗马尼亚人如果不签署《柏林条约》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该条约迫使他们向罗马尼亚土地上充满敌意和异族的犹太人授予公民身份。尽管签署了条约，但罗马尼亚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文化和政治人物公开反对犹太人，以警告他们的国家，犹太人在文化和经济上是有害的。这些人 1879 年的作品是军团运动获得有关犹太问题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思想和知识的重要思想来源。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以下几位：

瓦西里・孔塔 (Vasile Conta) (1845-1882) - 哲学家和政治家
瓦西里・亚历山德里 (Vasile Alecsandri) (1821-1890) - 外交官和政治家
米哈伊尔-科盖尼塞努 (1817-1891)——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米哈伊尔・埃米内斯库 (1850-1889)——著名诗人和记者
波洛丹・彼得尼赛卡・哈斯(1838-1907)——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科斯塔凯・内格里(1812-1876)——政治家
AD 森诺博 (1820-1847)——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还有更多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亲历了 20 世纪初，见证了军团运动的诞生和发展，他们向科德里亚努和其他军团成员传授了更多关于犹太人问题的知识，并向他们传授了涉及民族神秘主义、正统神秘主义和经济实践的概念。这些人是：

AC 库扎(1857-1947)——政治家、法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
尼古拉・约尔加 (1871-1940)——历史学家、历史学教授和政治家
尼古拉-波莱斯库(1869-1931)——生理学家、医学教授和哲学家
因-嘉万内斯库(1859-1949)——教育学教授
尼基福・克雷尼克 (1889-1972)——神学教授、神学家和哲学家

为了避免误解，必须在此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军团运动的先驱者在每一点上都同意军团的教义。例如，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军团拒绝共和主义，而埃米内斯库等先驱者则支持民主制度。

反犹太主义和犹太人问题

如今，一些遵循军团教义或敬仰军团士兵的人坚称军团并不反犹太，他们之所以反犹太只是因为罗马尼亚存在犹太人问题。他们反对“反犹太”一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犹太人和亲犹太主义者对这个词的定义方式。这些团体将其定义为对所有犹太人的非理性仇恨，在这种情况下，军团士兵并不是真正的反犹太主义者，因为他们对犹太人

的敌意并非非理性的，他们也不是每个犹太人的敌人（有人指出，军团有一些犹太支持者，但应该记住，大多数犹太人都是军团的敌人）。

然而，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反犹太主义者”一词被简单地定义为对犹太人怀有敌意并反对犹太人在自己国家存在的人。这就是 Cuza [库扎]和其他先驱 Corneliu Codreanu [科德里亚努]及其继任者霍里亚-西马的定义，他们都毫不犹豫地称自己为反犹太主义者。Codreanu 在他的主要著作《致我的军团》中坦率地谈到他访问德国时说：“1922 年，我与柏林的学生进行过多次讨论，他们今天肯定都是希特勒的支持者，我很自豪能成为他们的反犹太主义老师，向他们灌输我在雅西学到的真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科德里亚努对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建立联系没有任何问题（尽管他也正确地坚持认为他的军团完全独立于民族社会主义），但霍里亚·西马反对二战后两者之间的任何联系。西马在 1967 年出版的《Istoria Mişcării Legionare》（军团运动史）一书中写道：

“自第一次出现以来，罗马尼亚军团运动就成为各种诽谤的对象。无数内部和外部敌人最常指控军团是‘纳粹主义的一个分支’。这种说法可能是无知或恶意的结果。罗马尼亚军团运动的反犹太主义与德国反犹太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通过反对在罗马尼亚极为活跃和危险的犹太危险，Corneliu Codreanu 只是在延续近百年的罗马尼亚传统。”

还应该强调的是，罗马尼亚军团对犹太人这个民族的敌意其实是合理的，这不仅基于库扎、保列斯库、约尔加、泽诺波尔等知识分子对犹太人问题的科学研究，也基于许多普通罗马尼亚人的真实经历和观察。犹太人问题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无论是知识分子的观察还是普通人的观察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大多数犹太人不仅通过拥有许多公司或从事金融活动，寄生于罗马尼亚工人的劳动，而且还对罗马尼亚的文化和传统构成威胁，他们通过对大众媒体和某些政府政策的影响破坏了这些文化和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科德里亚努首先关心的是罗马尼亚的状况，但他也认为，需要各国结成联盟，才能在国际上解决犹太人问题。《致我的军团》一书中的一句话明确表达了这一点：

“在那里，我和我的同志们分享了我的一个旧想法，那就是去德国继续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同时努力实现将我们的思想和信仰传播到国外的愿望。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犹太人问题具有国际性，因此应对措施也应具有国际范围；只有通过所有意识到犹太人威胁的基督教国家的行动，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不是杀死犹太人，正如许多不诚实的人指责科德里亚努想要的那样，而是将犹太人驱逐出罗马尼亚。这一驱逐计划在《根据地领袖手册》中明确说明，他写道：“罗马尼亚属于罗马尼亚人，巴勒斯坦地方属于犹太人。”

经济与劳工：反共产主义与反资本主义

1919 年，科德里亚努第一次来到雅西大学，那时距离他创建军团还有好几年，他发现这座城市和大学的大部分地区都深受共产主义政治运动的影响。罗马尼亚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工资也很低，因此他们被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吸引到共产主义阵营。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也大多皈依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学生集会攻击罗马尼亚军队、东正教、君主制和罗马尼亚传统生活的其他方面。正是这种情况促使科德里亚努与共产

主义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最终带领保守派彻底粉碎了共产主义运动。科德里亚努是一名传统主义者，他坚持捍卫对上帝的信仰、民族主义、王室和私有财产。

另一方面，科德里亚努也相信要与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他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制度，允许企业剥削数百万工人。1919 年，在制定“民族基督教社会主义”纲领时，他表示：

“只打败共产主义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为工人的权利而战。他们有权获得面包，也有权为荣誉而战。我们必须与寡头政党作斗争，建立全国性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在国家框架内而不是在国家框架内获得他们的权利。”

1935 年下半年，他宣布建立一套新制度，希望一旦军团运动掌权，整个国家都能采用这一制度：

“军团贸易标志着商业史上一个被犹太精神所浸染的新阶段。它被称为：基督教商业——以对人的爱而不是掠夺为基础；以荣誉为基础的商业。”

从本质上讲，科德里亚努是第三立场社会主义者，**他支持私有财产，但同时反对唯物主义和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科德里亚努对罗马尼亚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劳动是每个人都必须参与的事情。懒惰是一种在罗马尼亚各地都应被视为极其负面的恶习的性格。所有罗马尼亚军团士兵都以某种方式从事某种体力劳动，通常是为了帮助下层罗马尼亚人完成自己的劳动和解决问题。科德里亚努写道：

“工作法则：工作！每天工作。全心投入。你的回报不是收益，而是你为军团建设和罗马尼亚繁荣又铺平了另一块砖的满足感。”

人们经常针对科德里亚努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与犹太人联系起来，因为在罗马尼亚，这两种制度都是由犹太人统治的。他写道，将犹太资本家和犹太共产主义者联系起来，

“但产业工人却在不断向共产主义靠拢，犹太媒体和城市里的全体犹太人系统地灌输这些思想。每个犹太人，无论是商人、知识分子还是银行资本家，在他活动范围内，都是这些反罗马尼亚革命思想的代言人。”

他的一些反对者反对这种联系，认为犹太公司老板和银行家会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会在革命中摧毁他们，这种说法很荒谬，因为他们想要消灭资本家。**但应该记住，并非所有资产阶级都在全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中被消灭。有时，革命前支持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成员（通常是犹太人）会在革命成功后在共产主义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

国家与土地

军团士兵相信，国家不仅仅是历史和地理的产物，而是由上帝亲自创造的，具有精神成分。科德里亚努在《致我的军团》一书中写道，他采纳了尼基福·克雷尼克的教义：

“如果基督教神秘主义及其目标——狂喜，是人通过‘从人性到神性的飞跃’与上帝接触，那么民族神秘主义就是人与人群通过这些力量从个人和物质利益的世界飞跃到民族的外部世界，与人民的灵魂接触。不是通过头脑，因为这是任何历史学家都可以做到的，而是通过与他们的灵魂共存。”

一个国家也与其赖以发展的土地密不可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与土地之间形成了精神上的联系。科德里亚努这样描述罗马尼亚人民：

“我们与橡树和冷杉一起诞生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不仅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这片土地为我们提供了面包和生存，还因为在这片土地上长眠着我们祖先的遗骸。我们的父母都在这里。我们所有的记忆、我们所有的战争荣耀、我们所有的历史都埋葬在这片土地上……这里……长眠着在战争中阵亡的罗马尼亚人，贵族和农民，他们多得像树叶和草叶……罗马尼亚人的鲜血流遍地，像河流一样。在午夜，在我们人民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听到罗马尼亚土地的召唤，催促我们战斗……我们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因为有数百万座坟墓和数百万条看不见的线，只有我们的灵魂能感受到……”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科德里亚努还认为，每个国家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因此，只有那些背叛上帝赋予的使命的国家才会从地球上消失。科德里亚努写道：

“上帝赋予我们罗马尼亚人、我们的人民和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一个使命、一个历史命运，一个人必须遵循的第一条法则就是走上这条命运之路，完成它所赋予的使命。我们的人民从未放下武器或放弃自己的使命，无论这条通往各各他的道路多么艰难或漫长。”

一个民族的目标，或者说它在精神世界中的命运，不是简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要通过基督的教义实现复活。

“终有一天，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将复活，所有死者、所有国王和皇帝都将复活，每个民族都将在上帝的宝座前占有一席之地。这最后的时刻……是一个民族能够崛起的最崇高、最崇高的时刻。”

正是为了这一理想，军团不懈地与一切障碍、腐败的政客以及坚持依靠罗马尼亚人民和土地生存的外来民族（例如犹太人）作斗争。

宗教与文化

罗马尼亚军团运动的目标之一是保护和复兴罗马尼亚的文化和习俗。他们知道文化是民族天才的表现，其产品是特定民族成员的独特创造。文化可以具有国际影响力，但它始终起源于民族。**因此，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场是允许不同族群自由迁入另一个族群的国家，通过他们的存在和影响干涉该国的文化和发展，这是极其错误的。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灵魂，并产生和结晶自己的文化形式和风格。例如，罗马尼亚的文化形象不能从德国的本质中创造出来，就像德国的文化形象不能从罗马尼亚的本质中创造出来一样。**

此外，宗教是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往往是许多习俗和传统的起源。军团士兵相信基督教不仅是他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代表神圣真理的宗教。这就是为什么要加入米迦勒大天使军团，一个人必须是基督徒，不能是其他宗教信徒或无神论者。因此，军团明确了这些原则，旨在建立一个只由罗马尼亚族人和基督徒组成的罗马尼亚国家。

考虑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科德里亚努和其他许多罗马尼亚人认为犹太人在他们国家的存在是如此具有威胁性。犹太人在经济、金融、报纸、电影甚至政治领域都具有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甚至在文化领域也变得强大，慢慢地改变了罗马尼亚人的习俗和思维方式，使其与犹太人的思想更加相关。科德里亚努和库扎和加瓦内斯库尔等人一样关心这个问题，他评论道：

“我们罗马尼亚人民再也无法结出硕果，这难道不可怕吗？我们没有自己的、属于我们民族的、属于我们血统的罗马尼亚文化，无法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并肩在世界上闪耀光芒？我们今天注定要向世界展示犹太文化的精华？犹太人不仅无法创造罗马尼亚文化，而且他们会篡改我们的文化，以便毒害我们。”

种族

大多数军团士兵都接受了种族现实，科德里亚努也写到了保持民族种族凝聚力的重要性。在《致我的军团》一书中，科德里亚努引用了孔塔的种族分离主义论点，这些论点构成了他自己种族态度的基础，甚至将其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观点进行了比较。他写道：

“想想我们伟大的瓦西里·孔塔 1879 年在议会的态度。五十年前，这位罗马尼亚哲学家以不可动摇的科学论据，在无可挑剔的逻辑体系中，证明了种族真理的合理性，而种族真理是民族国家的基础；五十年后，柏林也采纳了这一理论，并于 1879 年**强迫**我们授予犹太人公民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有少数军团成员并不认为种族很重要。1935 年，当伊翁·莫塔在德国会见纳粹党时，他批评了纳粹党，并告诉他们：

“种族主义是物质主义最粗俗的形式。人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肉体、血统或肤色。他们的区别在于精神，即他们的创造、文化和宗教。”

当然，莫塔的态度不太可能在军团中占主导地位，因为科德里亚努是军团大多数成员所持思想的创始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霍里亚·西马（Horia Sima）在其关于军团信仰的著作中同意科德里亚努的观点，即种族是真实且重要的。然而，西马不同意将罗马尼亚的种族观点与德国种族主义联系起来，他谴责希特勒的追随者，声称他们的世界观滥用了种族主义，使其过于绝对和物质化。

新人

罗马尼亚退伍军人运动旨在创造新人（Omul Nou），通过罗马尼亚退伍军人教育将每个人培养成高素质的人，从而改变整个国家。新人将更加诚实和有道德，更加聪明、勤劳、勇敢、愿意牺牲，并且完全摆脱物质主义。他的世界观将以精神性、为国家服务和热爱同胞为中心。这种新的、改进的人格将改变历史，为罗马尼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奠定基础。

科德里亚努写道：“我们将创造一种氛围，一种道德媒介，英雄在其中诞生并成长。这种媒介必须通过最高级别的精神防御工事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离开来。它必须抵御一切危险的懦弱、腐败、放荡之风，以及所有葬送国家、谋杀个人的激情。一旦军团士兵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他将被派往世界……他将成为一个榜样；将把其他人变成军团士兵。而人们，为了寻求更好的日子，将追随他……将形成一支战斗并取得胜利的力量。”

因此，精神革命将为政治革命奠定基础，因为没有新人，任何政治纲领都不可能取得任何持久的成就。

政治

罗马尼亚的政府是君主立宪制，因此该国政府被认为是民主政府。Corneliu Codreanu 曾两次担任罗马尼亚议会议员，他对民主政治的体验使他坚定地得出结论：民主制度

虽然声称代表人民的意愿，但很少实现其代表的目标。事实上，他认为它恰恰相反。在《致我的军团》一书中，他列出了他对该系统及其运作方式的一些主要反对意见（以下是他的观点的释义）：

民主会造成派系斗争，从而破坏人民的团结。

民主把数百万犹太人（以及其他外来群体）变成了罗马尼亚公民，从而肆意摧毁了一个国家古老的民族构成。

民主无法持久努力和承担责任，因为其设计本身就会导致领导层在短时间内不断更替。一个领导人或政党致力于制定具体计划来改善国家，但只执政几年，就会被一个制定新计划的新领导人取代，而新领导人或政党基本上甚至完全无视旧计划。因此，他们收效甚微，国家受到损害。

民主缺乏权威，因为它没有赋予领导人履行国家职责所需的权力，而是使他成为自私的政治支持者的奴隶。

民主被金融家和银行家操纵，因为大多数政党依赖他们的资金并因此受到他们的影响。

民主并不能保证选出有德行的领导人，因为大多数政客要么是煽动者，要么是腐败分子，而普通民众通常没有足够的能力或知识来选出好人。科德里亚努曾反驳过由民众选择精英的想法："那么为什么士兵不选择最好的将军呢？"

因此，科德里亚努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新的政府形式，既拒绝共和制，也拒绝独裁。在这种新制度下，领导人不会通过世袭继承权力，也不会像共和国那样通过选举产生，而是通过选择产生。因此，选择新精英的方法就是选择而不是选举。天生的领导者，表现出勇气和技能，会通过军团等级晋升，**而旧精英将负责选择新精英。新人的概念对科德里亚努的领导体系很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建立新人，合适的领导者才会崛起并成为国家的领导者。精英将建立在科德里亚努自己制定的原则之上：**

a）心灵的纯洁。

b）工作能力和创造力。

c）勇敢。

d）艰苦奋斗，与国家面临的困难持续斗争。

e）贫困，即自愿放弃积累财富。

f）对上帝的信仰。

g）爱。

科德里亚努想要建立的这种新政府体制将是独裁的，但不是极权的。他这样描述它：**"他（领导者）不做他想做的事，他做他必须做的事。他不是受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的引导，而是受永恒民族利益的引导，人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些利益的框架内，也只有在这些利益的框架内，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才能得到最高程度的正常满足。"**

军团政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点是军团承认三个实体：

1）个人。

2）现存的国家集体，即某一特定时刻生活在一个国家内的同一国家的所有个人的总和。

3）民族，是一个生命延续数百年、根基深植于时间长河、前途无限的历史实体。

这些实体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权利，而且是分等级的。共和主义只承认个人的权利，而军团运动则承认这三种权利。国家是最重要的实体，因此国家集体的权利从属于国家，最后个人的权利从属于国家集体的权利。“民主”的破坏性个人主义侵犯了国家集体的权利和国家的权利，因为它忽视了这两个实体的权利，而将个人的权利置于一切之上。

从这些事实来看，指责军团运动想要建立暴政只不过是针对该运动的盲目或欺骗性的宣传。

殉道

科德雷亚努写道：

“罗马尼亚军团士兵拥抱死亡，因为他的鲜血将铸就罗马尼亚军团的坚实基石。”

在经历斗争和激烈迫害的过程中，罗马尼亚军团运动产生了许多烈士，其中最常被提及的两位是伊翁·莫塔（Ion Moţa）和瓦西里·马林（Vasile Marin），他们于 1937 年在西班牙内战中帮助佛朗哥对抗马克思主义共和党人时牺牲。罗马尼亚军团的其他烈士包括斯特里·丘梅蒂（Sterie Ciumetti）、尼科莱塔·尼科莱斯库（Nicoleta Nicolescu）、卢西亚·格雷库（Lucia Grecu）和维克托·德拉戈米雷斯库（Victor Dragomirescu）等数百人。最后，在 1938 年，科尔内利乌·科德里亚努（Corneliu Codreanu）本人也成为了烈士，因为阿尔芒·克利内斯库（Armand Călinescu）非法杀害了他。所有罗马尼亚军团成员经常在歌唱中向烈士致敬，在军团仪式中，当在点名中宣布他们的名字时，所有参加仪式的罗马尼亚军团成员都会说“到!”

他们相信，罗马尼亚阵亡者的灵魂仍将与他们一起战斗。

暴力

除了殉道（即死亡）之外，军团士兵偶尔也会对敌人施暴。科德里亚努最初打算让军团运动非暴力化，但敌人对待他们的方式异常冷酷无情，暴力不可避免。当他们的政治对手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时，军团士兵经常会反击。在某些情况下，军团的某些头号敌人会被暗杀。有三个最突出的例子：

1933 年，杜卡政府禁止军团参加选举，逮捕了 18,000 名军团成员，并折磨和杀害了其他几人。同年 12 月 29 日至 30 日，军团成员 Nicolae Constantinescu、Doro Belimace 和 Ion Caranica（通常被称为 Nicadori）为了报复暗杀了杜卡。

1934 年，罗马尼亚军团成员米哈伊尔·斯特莱斯库（Mihail Stelescu）受到罗马尼亚军团高层的调查，发现他曾计划背叛罗马尼亚军团并创建自己的组织，因此被开除。斯特莱斯库随后于 1935 年创建了该组织，将其命名为 Cruciada Românismului （“罗马尼亚主义十字军”），并在该组织的报纸上诽谤科德里亚努。还有证据表明，斯特莱斯库曾密谋暗杀科德里亚努，并且在联系了高层政治人物后，他得到了政府对该计划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十名后来被称为 Decemviri （“十人”）的罗马尼亚军团成员开枪打死了他。

1938 年 11 月，阿尔芒·卡利内斯库（Armand Călinescu）让军警非法谋杀了科德雷亚努（Codreanu）（当年早些时候，科德雷亚努因未经证实的指控而受到不公正和有偏见的审判,被判处 10 年徒刑)、尼卡多里（Nicadori）和德西姆维里（Decemviri）。1939 年 9 月 21 日，九名被称为 Răzbunătorii （“复仇者”）的军团士兵暗杀了卡

林斯库。他们自首后，遭到酷刑，未经审判就被处决。这九个人是：米蒂·杜米特雷斯库、塞扎尔·波佩斯库、特拉扬·波佩斯库、内卢·莫尔多韦亚努、扬·约内斯库、扬·瓦西留、马林·斯坦丘列斯库、伊萨亚·奥维迪乌和格奥尔基·帕拉什韦斯库。

有人可能会反对军团士兵的这种行为，声称他们这样做是非基督教的行为。然而，要正确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记住，在整个基督教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了宗教而犯下暴力行为或杀人。一些杀死大量人的十字军骑士甚至被封为圣人。显然，基督教狂热分子与敌人作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有人会说，因为基督教导人们“爱他们的敌人”，所以科德里亚努公然违反了基督教教义。但事实并不那么清楚。

应该记住，在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中，“爱你的敌人”（马太福音 5:44；路加福音 6:27）这句话特指私人敌人，而不是公敌或国家敌人（因此可以憎恨他们）。这就是为什么科德里亚努对军团士兵说：

“原谅那些因为个人原因而袭击你的人。那些因为你对罗马尼亚人民的信仰而折磨你的人，你不会原谅。不要混淆基督徒原谅那些冤枉你的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我们人民惩罚那些背叛它并承担起反对其命运的责任的人的权利和义务。不要忘记，你戴上的剑属于这个国家。你以她的名义携带它们。以她的名义，你将用它们进行惩罚——无情和无情。只有这样，你才能为这个国家准备一个健康的未来。”

这些都是需要记住的事实，以便正确理解科德里亚努和军团士兵为何这么做。否则，就无法进行正确的历史研究。

俄罗斯法西斯主义之基础

上帝 国王 国家

不要美化坏的东西，不要把颜色涂得太浓，不要诅咒好人，不要撒谎！只写事实，哪怕刺痛别人的眼睛。苦涩的事实永远比甜蜜的谎言更有价值。自我美化、自欺欺人已经够多了，我们的民众总是病入膏肓。你们看到了不敢直面真相、不敢承认错误和过失的恐惧将我们引向何方了吗？我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敌人。那些本应首先热爱和保卫祖国的人，却对祖国爱得不够。

P.N. 将军 克拉斯诺夫，1945 年

I. 作为一种思维形式的法西斯主义。

1）人与民族

在人的一生中，每个人都会与某一民族的代表人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而这一民族的文化对他来说是土生土长的。此外，这些关系主要表现为对其人格形成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影响（教养），以及其个人意识在环境影响下的自发转变过程。然而，在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一个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任意地形成了他对自己因出生、教养而成为其一员的民族的个人态度，或者相反，作为他在有意识的年龄段自由选择的结果。 当然，这种态度不仅包括民族生活的日常形式，还包括民族国家和民族理想。

无论一个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对国家的态度对他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的整个个人和社会生活。 一个人如果对国家形成了自己的明确态度，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国家生活。然而，他的参与在质量上可能是建设

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 一个人参与国家生活的质量（创造性或破坏性）取决于他的思维形式（方式）。 反映一个人对国家的态度的创造性的思维形式包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 每一种反映人对国家的创造性态度的思维形式（形象），都与具有人对国家的破坏性态度的相反思维形式相对立。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相对立，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相对立，法西斯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相对立。

具体表现如下：

对国家的态度的创造性 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 法西斯主义

对国家的态度的破坏性 个人主义 世界主义 无政府主义

让我们给所有这些思维形式下个定义。

爱国主义是一种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思维形式。

个人主义是一种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思维形式。在传统社会中，爱国主义总是被大多数人积极看待，从小灌输这种思想是国民教育最重要的方向。

相反，个人主义通常被舆论谴责为人格本身负面特征的表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和民族生活形式的依恋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并非都是爱国主义的结果。除了有意识的动机，人还有无意识的动机——那些基于本能的动机，动物也有。这些本能驱使人类保护自己的、本土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人类习以为常的，失去它们就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

然而，动物的行为完全由本能决定，直接取决于环境，而人的行为则相反，是自由和合理的。 因此，人能够运用抽象概念，从 "亲戚 "和 "熟人 "的整体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群或一个民族，而且是一个国家，从而实现民族国家所宣布的民族利益。 爱国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实现这些国家利益，并愿意为了这些利益而牺牲自己、个人甚至生命。这里有必要澄清国家、民族和部落之间的区别。

人民是一个无形的群体，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特定的日常生活。人民之所以能保持其相对的完整性，完全是因为在他们的民族意识中，有一种源自特定宗教的真理观念，作为人际关系中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以及每个人民共同的个人生活终极目标。 与民族不同，人民本身不是世界历史的主体，因为它无法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民族是以民族自觉为特征、具有民族观念的人。也就是说，民族也是人民的一种特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民有可能达成最彻底的一致。民族自觉是每个人对特定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明确认识。民族观念是对某一民族独特的世界使命的普遍认同。 民族自觉和民族思想使民族政治理想成为可能——以特定民族的权利为基础的适当社会秩序的形象，即民族关于什么是真理的思想。

一个民族的基础总是建立在普遍认可的宗教观念之上。每个民族都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种宗教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人类自然精神需求的结果。 通常情况下，人类吸收某种思维形式（方式）的决定性因素是每个人自己决定的尘世生存的终极目标问题。为了有意识地生活，人需要确切地了解创造他的力量和创造他的目的。只有这样，而不是其他任何方式，人类自己才会提出他一生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会导致从宗教或无神论这两种基本世界观中选择一种。

宗教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与之相关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其定义是相信存在超自然的存在领域，并由此产生对一种秘密的超自然力量的联系感、依赖感和义务感，这种力

量设定了生活的目的，值得人们崇拜。 而无神论则认为超自然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此坚信人类的存在是无价值的、偶然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爱国主义受宗教世界观的制约。此外，某个国家的爱国者并不一定是其国教的代表。 这是因为，出于某种原因，爱国者只是一个献身于特定民族国家的人。他不理解建立这个民族国家的民族基本原则（其中之一总是特定的宗教），也不认为这些原则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

一般来说，爱国主义的特点是对与民族理想有关的问题的思考程度较低。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民族国家的情况下，爱国主义通常不会得到应用。 因此，我们说过，爱国主义往往受宗教观的制约。 爱国主义的对立面是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利益至上，认为个人利益是唯一真实和根本的利益——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主义是无神论世界观的结果。 然而，个人主义者也可能包括那些宗教信仰与国家宗教信仰不同的国家成员。由于民族国家的宗教或其忏悔与这些民族成员的宗教不同，民族理想在他们的灵魂中得不到充分的共鸣，民族国家也不是他们理想愿望的表达者和体现者。因此，这些代表并不认为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安全是有意义的。 但与此同时，个人主义往往也是一个人对众所周知的国家理想感到失望的结果。

相对思维形式的第二个层次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将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相提并论的思维方式。 世界主义是一种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 显然，民族主义者总是少于爱国者，就像世界主义者总是少于个人主义者一样。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比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需要付出更多的精神和体力。民族主义是指一个人对国家的态度，这种态度使他以国家为家，把国家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把国家的失败视为自己的失败。民族主义是自愿终生为民族国家服务，不是为了恐惧，而是为了良知；不是只在普遍危险的时候，而是每天在任何地方都只想着国家的利益。**爱国主义没有这样的精神张力；它将民族国家视为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东西，尽管需要做出一定的牺牲。**

相反，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要维持这种组织形式就需要公民积极自愿地参与国家生活。 此外，民族利益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是深层次的个人利益，与其说是通过民族国家的宣言来实现，不如说是通过对民族生活和民族历史的亲身体验来实现。 然而，当民族国家崩溃时，民族主义者只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宗教生活自由的斗争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与爱国主义一样，民族主义的特点也是无法提出明确的民族理想，因此，这种思维形式及其带来的活动无法激活大众心理的建国机制。 也就是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不是建立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充分条件。

然而，在民族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大量民族主义者自愿为国家最高权力服务，可以确保国家的发展，保护国家不受破坏势力的影响。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与特定的民族宗教相一致，而民族宗教往往确定了民族理想，这一事实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 关于民族所承认的最高权力问题，应该指出的是，在民族国家中，最高权力只能以三种合法形式体现：民主、贵族和君主制。 最高权力本身是一个民族认为构成其所有成员团结力量的东西，它不仅以抽象原则的形式存在，而且还以其具体表现的形式存在。 最高权力既可以是人民数量上的多数的权力（蛮力的权力）；也可以是民族中 "最优秀的人民"的统治（合理的、质量上更高的权力）；还可以是神赋予特定专制统治者的神权（宗教和道德理想的权力）。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主义受制于整个民族共同的宗教世界观，而反对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则往往是那些信奉非国教宗教的国民不满情绪的表达。 然而，更常见的是，世界主义是无神论意识的结果。 世界主义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对立起来，既可以表现为完全无视民族国家，因为在世界主义者看来，民族国家只会限制他的行动，使他的生活复杂化；也可以表现为对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公开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甚至达到与民族国家对抗的地步。

然而，世界主义并不否认某种社会秩序的必要性。但它往往不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而是以广泛的国家间联盟的形式来允许这种秩序的存在，这种联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国家间的边界，并使国家本身非人格化。然而，世界主义认为社会秩序的最佳形式是平等民族组成的联邦形式的世界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个爱国者都是民族主义者，但每个民族主义者都不可避免地是爱国者。他们的对立面也是如此。并非每个个人主义者都是世界主义者，但每个世界主义者都是个人主义者。这是由这些思维形式的本质所决定的。 现在有必要谈谈相对思维形式的第三个层次，即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思维形式，它将国家的最高利益与理想国的形象相联系，即一个完全符合已知国家理想的国家。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思维形式，它将个人的最高利益与一种社会状态的形象相联系，在这种社会状态中，任何形式的社会自我组织都是不可能的。

显然，并不是每个民族主义者都是法西斯主义者，因为并不是每个民族主义者都把建立一个理想国作为其活动的最终目标。 然而，每一个法西斯主义者都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要创建一个理想的国家，就必须以民族、民族历史和民族切身利益为本。 他们的对立面也是同样的关系。并非每个世界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每个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世界主义者。

显然，世界主义者不可能是爱国者，民族主义者也不可能是个人主义者。法西斯主义也是如此，它既不接受个人主义，也不接受世界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还不严重，因为它通常不会导致冲突，但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矛盾就变得非常严重，在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对抗中，这种矛盾具有最不可调和的性质。 因此，我们已经澄清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探讨法西斯主义现象。

2）法西斯主义的内容

根据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法西斯主义并不止步于为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服务；这种服务的目标并不包括对适当社会秩序的理想构想。 法西斯主义理解民族历史，从中发现民族生活的终极目标，制定民族使命。 显然，为此目的，法西斯主义完全依赖于人民的宗教观念，只有宗教观念才使任何民族理想成为可能，而民族理想又是民族本身存在的条件。 此外，法西斯主义只有在特定的民族宗教中，即在构成民族基本原则之一并直接影响民族思想形成的宗教中，才能找到其合理性。

因此，法西斯主义的特点是希望建立一个以宗教和道德理想为最高权力的国家，即君主制国家。 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建立了君主制国家，但由于某种原因，这个国家衰落了，那么这个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者就会毫不含糊地成为君主主义者。对于基督教民族

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来说，君主制国家在精神上优于贵族制和民主制国家形式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主义承认世袭君主的唯一权力是实现民族理想的最佳工具，尤其是那些与人民的宗教直接相关的理想。法西斯主义通常是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无能为力的时候，即在民族灾难发生的时刻或灾难发生后的时期凸显出来的。 法西斯主义找出了民族衰落的原因，并宣称需要一种能够将人民团结成一个民族的新的民族思想。 然而，这种新的民族思想几乎总是要么是对其他历史民族的民族思想的改良重复，要么是直接恢复已经被人民打败过一次的民族思想。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宗教统一，那么这个民族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成为一个国家。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民族基于统一的宗教世界观——所谓的积极宗教，即没有分裂民族的特定教派特征（取向）的宗教。

例如，如果一个民族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组成，那么其统一的基础将是积极的基督教，这将是民族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民族思想的形成。 如果民族的基础不包括统一的宗教世界观，那么这样的民族就不可能转变为国家。 一般而言，就其本质而言，法西斯主义并不等同于任何特定的历史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所有民族的代表在任何时候都固有的一种普遍思维形式。 如果我们用 "法西斯主义 "一词来表示某种思维形式，那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自 20 世纪上半叶以来，所谓的 "世界公民" 一致将基于这种思维形式的所有政治意识形态称为 "法西斯主义"。 因此，法西斯主义是这些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它们可以被正式称为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的程度是这些政治意识形态起源于法西斯主义这种思维形式。

如果说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彼此不同，那是因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形式，即某种内容的外在表现。因此，法西斯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正是源于这种特殊的内容。

至于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有条件地分为两个部分：普遍性和民族性。 普遍性部分包括特定历史时期大多数民族法西斯主义所特有和共有的意识形态立场，即那些不具有严格民族性的立场。 民族性部分包括那些使所有法西斯主义成为可能的意识形态立场——民族理想、特定民族的基本原则以及与民族理想相对应的社会结构的基础。正是这些意识形态立场使人们有理由根据法西斯主义的民族内容，将其称为俄罗斯法西斯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等。

现在有必要列举一下任何现代具体民族法西斯主义内容的普遍部分的意识形态规定。其中之一就是反犹太主义，即不容忍国际犹太人和犹太族个别代表的破坏活动，而这些人在各种革命组织的领导层中一直占多数。 早在 20 世纪初，不仅是对民族精英，而且对所有欧洲国家的人民大众来说，在国际政治和每个民族的国家生活中，反国家的破坏势力显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每个国家中，这些势力的先锋是犹太部落，他们是一个孤立的群体，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民族，尤其是基督教民族具有侵略性。

犹太部落有自己的暗处的政府，对每个犹太人几乎都有无限的影响力，它是世界犹太共济会势力的工具，共济会势力试图彻底摧毁民族国家，甚至是特定的国家，特别是在统治世界和建立一个与上帝斗争的世界政府的道路上，犹太部落尤其危险。 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部族令人惊叹地保持了相对的团结，但并不是一个民族，也就是说没有能力建立真正的国家，这主要归功于其古老的宗教思想，这些思想与犹太人的民

族生活密不可分。 尽管如此，国际犹太人完全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依靠民族国家内部默许的犹太政府，同时将资本高度集中在犹太国际投机商手中。从本质上讲，犹太人是世界上的寄生虫，只对自己部落的利益感兴趣，在经济上奴役着基督教家庭、村庄和城镇。

当国际犹太人成为能够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时，它就成为革命传染源，成为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为名摧毁民族国家和民族社会秩序基础的革命思想的源泉。这种新秩序向所有民族许诺一种虚幻的人间幸福，为了这种 "幸福"，他们将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民族国家地位。 民族基督教国家是革命运动的主要障碍，革命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未来的反基督人间王国，而国际犹太人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之一。 国际犹太教如何成功地利用世界革命运动自不必说。很明显，反犹太主义作为所有现代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思想立场之一，已经成为国际犹太人蚕食世界统治权的充分反制手段。 在 21 世纪初的今天，世界犹太人显然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攫取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权力，因此，反犹太主义具有了更加明显和具体的政治特征。因此，所有现代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个意识形态立场就是反抗犹太共济会极权政权。这种抵抗的目标是推翻非民族国家的政权。 然而，只有存在一个民族，即对民族理想有清晰认识的人民，才有可能最终战胜这些政权。

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的转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是一个民族心理学问题。然而，只有当人民中有足够多的法西斯分子，能够在同胞的灵魂深处灌输永恒的民族理想信仰，这种转变才有可能实现。 然而，如果人民在道德上变得如此粗鄙，以至于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的最后残余在大多数人的灵魂中不再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如果人民不再是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和形象，变成了伪人类，那么就不可能对政权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抵抗。 在今天的前俄罗斯领土上就可以看到这种可悲的现象。俄语居民不是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人民意志，因此他们仍然被政治盗贼和赤裸裸的强盗所统治，并将继续被他们所统治，这些人把政府官僚机构和惩罚机构组织得像一个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主义者就是那些健康的民族因素，他们能够激励曾经是单一民族的无形群众的代表重新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民族衰落、民族非人格化、人民沦为历史尘埃和垃圾的灾难性后果越明显，这种必要性就越强烈。 了解并热爱祖国历史民族理想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出现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因素，而民族复兴主要与对亡国原因的历史认识有关。在这些原因中，根植于本国人民的缺点、诱惑、错误和罪恶的内部性质的原因始终占据首位。 因此，为建立民族国家而奋斗的法西斯主义，不得不从对本国人民精神尊严的正确而清醒的认识出发。民族自我批判作为消除民族衰落根源的必要条件，成为任何法西斯主义不可或缺的特征。

法西斯主义清醒地评估了导致民族丧失独立或彻底衰败的所有民族弱点，从而创造了新的民族性格。法西斯主义并不是要复兴一个带着所有民族弱点、恶习和导致民族灾难的不真实而被遗忘的民族，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民族——一个英雄的民族，或者用基督教的话说，一个圣人的民族。 法西斯主义只肯定民族生活的那些形式和内容，这些形式和内容使民族生活有意义、有目的、有永恒的理由。 因此，我们可以区分现

代特定民族法西斯主义的以下普遍意识形态立场： – 反犹太主义，承认国际犹太人在民族国家的毁灭过程和反犹太主义斗争中的主导作用；

– 民族自强，承认有必要建立一个英雄（圣人）的民族；

– 民族抵抗，即承认有必要与大多数非民族国家的现代政治制度作斗争；

– 国际主义，即承认有必要团结各国，与犹太共济会领导的世界破坏势力作斗争。法西斯主义的所有这些规定都将其描述为一种反对世界政府的普遍的民族斗争形式，即一种普遍的民族反革命形式。

3）革命与反革命。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以理想国（即理想的法律和秩序）为最高民族利益的思想形式，与憎恨一切秩序、蔑视一切法律的无政府主义相对立。 无政府主义表现在革命运动中，表现在反对传统价值观和宗教、反对民族国家和传统社会秩序的斗争中。 无政府主义建立在纯粹无神论的世界观基础上，这使它在与传统法律秩序的斗争中拥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心。无政府主义甚至有能力抵抗强大的民族国家，其基础是全民族都清楚的国家理想。 然而，无政府主义几乎总是在国家动荡和民族衰落的时刻脱颖而出。无政府主义者是那些以人民的悲痛为食的秃鹫，他们寄生在死去的民族躯体上。

然而，无政府主义不能只与那些承认宗教和道德理想的最高权威（即上帝赋予国家特定代表的神权——完全独立于人民意愿的专制君主）的国家作斗争。 无政府主义滋生于大众的误解、因缺乏信仰而产生的迷信以及大多数人的政治冷漠，他们的观点很容易受到深信不疑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 然而，无政府主义无法与专制君主平等对抗，因为专制君主的统治权和治理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认可，大多数人民都相信专制君主的神圣目的。 为此，作为无政府主义基础的无神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过于软弱和肤浅。 在此，我们不妨说明一下我们所谈论的思维形式与基本世界观（宗教或无神论）之间的关系，后者在许多方面决定了这些思维形式。

因此，无政府主义是一切破坏的神化，是一切政治革命的根源。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革命组织过去和现在都隐藏在各种政治和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等）的背后，但是，尽管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它们却给人民带来了谎言、暴力和对所有民族社会生活形式的破坏。 世界上所有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在出现之初，在每一个国家都是非法组织，因为它们的意识形态与大多数人对真理的自然理解相矛盾。 反观革命者，如果他们在卑鄙的煽动中诉诸原始的口号，而这些口号符合大多数普通人对正义的理解，那么他们这样做却丝毫没有将口号付诸实践的愿望。 革命组织的理论建立在最初对社会的错误认识之上，他们不依靠群众，更不依靠本国最优秀的人民（这是传统政治力量的一贯追求），而是依靠人渣、罪犯和迷信者，也就是每个国家都存在的与革命者关系密切的社会分子。

例如，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于 1917 年 11 月 22 日颁布法令，废除了以前所有的民法和刑法，以及所有执行这些法律的司法和行政机构。由于这一真正的革命行动，抢劫、谋杀和强奸浪潮席卷全国。 革命者在道德败坏的人民的帮助下推翻了传统的国家制度，他们的所作所为证明，革命政府不是也不可能是国家。 犹太部落（无论其政治力量多么强大）、海盗、吉普赛人、布尔什维克（以及他们在所有国家的革命同类）都没有国家的概念。他们需要组织的是自己的、私人的利益，而不是共同的利益。 一

般来说，没有一个特殊群体本身具有国家性质，只有他们在复杂的多样性中共同创造了国家观念。在国家中，实现的生存条件不是阶级、企业、阶层或任何其他类型的生存条件，不是封闭在其私人或群体目标中的生存条件，而是整个民族的生存条件。

因此，当布尔什维克遵循犹太人卡尔-马克思（莫尔达丘斯-列维）的教导，将民族提升到阶级斗争，即民族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战争时，他们追求的完全是破坏性目标，他们在统治世界的道路上的主要受害者是民族国家。 曾经强大的基督教帝国的存在不是靠武力和强制，而是建立在臣民（公民）自愿服从的基础上，与建国民族的某种心理和道德状态相一致，而革命者只能在这些帝国的位置上建立一些国家的雏形。在这些伪国家中，1922 年在布尔什维克于 1918 年建立的类似非法实体 "俄罗斯联邦"的基础上成立的苏联就是一个犯罪组织，它至今仍然存在。 但是，任何一个由民族组成的国家都不会摧毁整个阶级、庄园和社会群体，例如布尔什维克对神职人员、"资产阶级"、贵族、富农和哥萨克采取的大规模恐怖政策。毕竟，这与国家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只有当我们把革命者理解为日常生活中典型的强盗和土匪，把政治世界中的革命者理解为以宗教狂热的仇恨对待被迫人民的外来入侵者，才能解释这种行为。 许多有意识的上帝斗士（如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的活动确实具有明显的宗教特征，这可以用他们有意识地与上帝、与神在人间建立的秩序作斗争来解释。 只有当他们相信存在一个善良的上帝和另一个与上帝斗争的邪恶力量（具体表现为撒旦的形象）时，他们才有可能这样做。 对于现代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和正在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破坏活动来说，仅有无神论的热情是不够的。 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大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要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就必须与特定的国家、特定的人民发生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这个民族的文化视为自己的文化。 然而，对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来说，他们周围的基督教文明不仅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也没有任何本土的东西。**从最真实的意义上讲，这些亚人（subhumans）自觉地放弃了一切民族的东西、一切国家的东西。**

他们是宗教撒旦狂热分子。 严格地说，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无神论是一种严重的妄想，在周围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依据。然而，如果这种妄想继续在世界上蔓延，在每个国家都找到新的支持者，那要么是上帝斗士有意识欺骗的结果，要么是魔鬼直接行动的结果。任何有洞察力、智力发达的人都会发现无神论的前后矛盾之处，因为有计划地广泛破坏传统的生活形式需要有具体的终极目标和明确的理想，这些目标和理想的灵感来源要超越尘世生活。

因此，无神论的态度只能满足个人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而不能满足犹太共济会，因为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摧毁他们所憎恨的健康的社会生活形式。 宗教和无神论都以信仰为基础。但无神论显然是无足轻重和站不住脚的，只能作为有意识的上帝斗士的宗教目标的掩护。 总的来说，撒旦主义远不是对人们最有吸引力的宗教世界观，部分原因是大多数人至少在理论上坚持善良；部分原因是这大多数人并不准备为了任何理想而摧毁包括家庭在内的所有社会机构。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共济会的主要工具是谎言和暴力。那些难以用未来世俗物品的承诺来欺骗的人，将不可避免地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已经被欺骗的无政府主义者强迫为最终奴役人类而工作。 这就

是真正革命的可怕意义，只有法西斯主义者才能抵制它。 每一种法西斯政治学说都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反革命学说。因为不仅民族理想国的存在，而且一般民族的存在，顾名思义都是反革命的事实。

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反对教条，我想严肃地探讨这个话题。法西斯主义同时包含相对主义和客观主义。虽然法西斯主义中存在着普遍真理，但随着每个国家的发展，实现这一真理的途径可能会有所不同。在追求法西斯主义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利用所有方面。无论是顺应传统还是反对传统，支持帝国主义还是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中央集权还是权力下放，还是持有宗教或不可知论信仰（同时排除无神论），所有这些立场在法西斯主义领域内都有价值。当有人指出巴西整合主义者反对轴心国时，他们的回答很直接：他们的忠诚在于巴西整合主义，他们没有义务捍卫欧洲法西斯主义，即使这可能是可取的。答案仍然是：那又怎样？

作为法西斯主义者，我们必须将一切都视为理想。即使我们所感知的物质现实也是理想的现实，无论有人试图扭曲它。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是观念，是感质，无论它们是如何概念化的。物质条件本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对物质世界的全面理解。只要有正确的思想，压迫制度已经通过纯粹的权力发生了改变，私有化是否发生就变得无关紧要。对于法西斯主义来说，资本主义超越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还原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资本主义是一种投射到生产资料上的理想，涵盖了工人的生活。它不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抽象物质概念，而是一个细致入微、多方面的理想。

正如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敏锐地指出的那样，法西斯主义涉及个人将他们的想法投射到他们的财产上。私有财产本身并不是天生的恶意，但个人使用和操纵它的方式可能会导致腐败。法西斯主义被有意设计为同时包含绝对和相对元素，而不管有些人可能试图传播的误解。我们不是教条主义的狂热分子，不像共产主义者那样坚持理论，好像它们是神圣的经文一样。如果我们是，我们就会不断地从一种意识形态转向另一种意识形态，就像左翼人士一样。“哦，列宁这么说过，所以你错了。”“等一下，托洛茨基是这样认为的。”“哈！马克思在 1856 年的一封信中写了这句话，所以我是对的！”你看到这里的问题了吗？

展现共产主义教条主义

詹蒂莱的著作在法西斯主义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们不应被视为该意识形态的权威和排他性。法西斯国家拥有根据自己的哲学家解释和改编法西斯主义元素的自由，并发展独特的理论。虽然詹蒂莱的作品对于理解法西斯主义至关重要，但它们并不代表该主题的绝对和最终决定。詹蒂莱的思想是基础，但法西斯主义的后续演变掌握在我们手中。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从黑格尔极权帝国主义中汲取灵感，纳粹主义从费希特种族主义国家概念中汲取灵感，长枪党主义从普遍宗教帝国主义中汲取灵感，复兴党主义从阿拉伯反帝国主义愿景中汲取灵感。这些例子表明，法西斯主义具有共同的务实思想基础，用于在各个国家具体构建意识形态。

这引出了右翼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问题。事实证明，每当法西斯主义试图确立自己的地位时，右翼都是一个有缺陷的盟友。他们往往只在符合自己利益时才与法西斯主

义结盟，但在面临逆境或对革命言论感到失望时，他们就会背叛这种意识形态。事实证明，右翼对法西斯主义的危害不亚于左翼，甚至更大。

右翼人士经常在法西斯主义符合其利益时拥护法西斯主义。例如，尤利乌斯·埃沃拉赞扬法西斯主义的潜力，但并未积极加入该事业。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自由派和保守派最初加入法西斯党以对抗红色恐怖，但当墨索里尼实施反右翼政策时，他们开始退出。这表明，右翼人士要想真正与法西斯主义结盟，就必须经历真正的转变，否则他们的存在可能会破坏我们的思想。

许多自称支持法西斯主义的传统天主教徒经常以此为借口，宣扬不必要的反动倾向。事实是，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如此运作，是因为它试图建立法西斯主义本身，而不是采取特定的方法作为最终目标。庸俗的反法西斯白人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者也是如此。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相信法西斯主义；相反，他们试图利用“法西斯主义”作为推进自己特殊政策的手段。并不是每个自称是法西斯主义者或与法西斯主义结盟的人都真正体现了它的原则。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可能会认定自己是法西斯主义者，但持有的观点更符合古典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与这些人保持距离。

在反思时，我们必须问自己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谁对科德里亚努的死负有责任？

谁允许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灭亡？

谁主导了墨索里尼的下台？

为什么传统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加入了游击队？

谁多次企图暗杀希特勒？

谁策划了推翻庇隆的政变？

豪尔赫·盖坦被暗杀的幕后黑手是谁？

谁策划了针对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的政变？

我们的重点在于实现我们期望的价值观，而传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我们不会优先考虑你们的传统或过去的价值观；我们只致力于建立我们追求的价值观。如果你们的传统阻碍了我们的目标，我们会相应地调整或抛弃它们。这就是我们方法的本质。如果有人加入法西斯主义只是为了宣扬种族主义、反动观点、恐同症，或者仅仅是为了反对自由主义者，那么他们就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现在，必须承认并非所有法西斯主义者都属于这一类。然而，让我们诚实地承认，有些人加入法西斯运动时并没有完全理解或遵守其原则。法西斯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僵化和教条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个允许相对解释的概念。因此，如果一个法西斯国家实施的政策可能不符合传统的法西斯主义原则，只要它们有助于实现最终目标，它们仍然是合理的。然而，谨慎对待这个话题至关重要。仅仅因为我们承认解释的灵活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意或避免批评这些政策。保持批判性的观点和进行健康的辩论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当法西斯主义者过于执着于严格遵守特定的文本或教义，比如坚持遵循外邦人写的每一个字时，我们必须挑战他们的清教徒心态。如果他们陷入狭隘和教条的心态，我们就不能认真对待他们的法西斯思想。包容多元观点、避免过度知识主义是正确理解法西斯哲学的核心。

让我们牢记这一点，继续前行。

“阿德里亚诺·蒂尔格尔（Adriano Tilgher）在其关于‘当代相对主义者’的详尽小册子第 62 页中，过快地提到了法西斯运动：

“我们亲眼目睹了意大利在无产阶级的攻击下国家权力突然崩溃，法西斯运动兴起，宣称国家并不‘存在’，而是由那些相信国家、想要国家的人时不时创造出来的。法西斯主义不过是移植到政治领域的绝对激进主义。”

这个定义非常准确。阿德里亚诺·蒂尔格尔用这句话将法西斯主义与当代最伟大的哲学——相对论哲学——相提并论。

如果蒂尔格尔每天都密切关注法西斯主义的活动，如果他注意到该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指导原则，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他会把我列为相对主义者，即使不是理论家，至少也是实践家。

在德国，相对主义是一种非常大胆和破坏性的理论建构（也许是德国的哲学报复，这可能预示着它的军事报复？）；在意大利，这只是一个事实。法西斯主义是一场超相对主义运动，因为它从未试图对其复杂而强大的精神状态给出明确的“纲领”外观，而是通过直觉和片段进行，相关文件可在本报中找到。我最近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是“直觉”的相对主义。如果事实上，相对主义必须被理解为科学主义的终结，“科学”神话的衰落，被理解为绝对真理的发现者，那么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在考察社会主义现象时运用了这一标准。我在 1921 年 4 月 3 日在博洛尼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称社会主义为科学更荒唐的了；”后来，在否认了社会主义黑暗、不连贯的教义的任何真实性之后，我又否认了社会主义本身的出现具有任何宿命性。

社会主义者出于各种理由相信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和必然性，这是他们关心的问题，但必须防止对这种真理性和必然性的信仰超出该教派的追随者范围。简而言之，必须创造一种反真理和反必然性，以对抗社会主义。

在这两种力量之间，成功是裁判者，也已经做出了裁判。相信社会主义本身的真理、相信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宿命的社会主义者很少，即使他们羞于承认这一点。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资本主义及其所形成的文明类型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这种继承自称是自然而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纯粹是武断的：相对主义批评彻底扫除了这种历史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心态，即历史总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总是知道他们和社会最终会走向何方。

例如，人们认为战争应该导致革命。但事实很可能恰恰相反。我们经历的政治动荡实际上可能构成了伟大复辟的开始。随着“公民”的审判，19 世纪的审判也随之而来。不确定一个更加自由、更加民主、与妇女参政有关的时期是否即将到来。未来几十年，所有所谓的民主成就都有可能以不光彩的结局收场。从多数人和所有人的政府，即民主的极端理想，我们很可能会回到少数人或一人政府。在经济方面，多数人或所有人的政府实验已经失败。在俄罗斯，我们又回到了工厂独裁者。政治不能慢吞吞地跟随经济。我不清楚普选权和相关的比例主义政府的命运。很快它就会成为“老游戏”。人们也许会像独裁者一样含糊其辞。

如果相对主义被理解为对固定范畴的蔑视，对那些相信自己是永恒客观现实的承载者的人的蔑视，对那些安于现状而不是不断更新来折磨自己的静态人的蔑视。对于那些以永远做自己而自豪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法西斯主义的心态和活动更相对主义的

了。如果相对主义和普遍流动主义是等同的，那么我们法西斯主义者，面对其他党派的偏执者像蝙蝠一样把自己钉在椽子上的名义主义，我们总是表现出我们肆无忌惮的傲慢；我们有勇气打破所有传统的政治范畴，交替称自己为贵族和民主派、革命者和反动派、无产阶级和反无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反和平主义者，我们确实是典型的相对主义者，我们的行动直接指向欧洲精神的最新运动。

我们不愿意强迫自己接受一个计划，即使我们明白，计划不仅仅是一个参考观点和方向的问题，我们在政权面前采取不可知论的立场，从其他政党那里拿走我们喜欢的和对我们有利的东西，拒绝我们不喜欢的和对我们有害的东西，我们对神秘的未来的所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抵押品的嘲弄，构成了我们相对主义心态的许多证据。要前进，我们只需要一个参考点：国家。其他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蒂尔格尔说，在相对主义中，‘生命和行动’被认为比智力具有绝对的优势。

古代怀疑论者从所有观点的等同性中得出，因此，唯一要做的就是放弃判断和行动。现代相对主义从所有意识形态的等同性中得出，因此，每个人都有权创造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尽其所能将其强加于人。因此，今天从历史主义中发展出相对主义和普遍怀疑主义的强大运动，无非是被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所压制的深刻的生命力量（这种意识形态神化过去，并以它的名义否定未来）所压制的、新的、因而是革命的，它们为摆脱铁轭、开辟通向光明的道路而做出的努力。

在蒂尔格尔看来，意大利法西斯现象一定是相对主义哲学最高级、最有趣的表现；如果如瓦辛格所说，相对主义可以追溯到尼采和他的《权力意志》，那么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过去是、现在也是个人和国家“权力意志”最强大的创造物。”

——贝尼托·墨索里尼，《相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意大利人民》，1921 年 11 月 22 日

值得注意的是，广义上的法西斯主义不应仅限于意大利的解读。法西斯主义，通常理解为主要指该意识形态在意大利的表现形式。因此，如果你遇到一个自称“美国法西斯联盟”或类似名称的政党，那么它很可能是一群在扮演角色或对这种哲学缺乏深刻理解的人。墨西哥法西斯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群墨西哥人试图建立自己的法西斯党，但他们的努力遭到了法西斯意大利的批评和嘲笑。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认为墨西哥党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表明他们从根本上误解了该意识形态的核心原则。

为简化问题，可以将自己称为法西斯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然而，对这类人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第三立场主义者。这个标签涵盖了在各个国家出现的更广泛的国家有机运动，每个运动都将法西斯主义思想融入其特定情况。这种多样性在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整体主义、共治主义、正义主义、长枪党主义、复兴党主义、梅塔克西斯主义、铁卫团、莱希等运动中显而易见。这些运动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了对第三立场的独特诠释，并根据其起源国家的特定条件和要求量身定制。

社会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月刊发刊宣言**　周毓英

一 历史

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出现于一八三〇年间，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欧洲成为盛极一时的运动。当时，圣西门，傅利叶，欧文各派的社会主义思想，正如雨后春笋，澎湃了全

欧洲的现实社会。各派都以社会主义相号召，于是圣西门派，傅利叶派，欧文派等各式各样的新村运动也就在这时候出现了。

社会主义的名词虽然在一八三〇年间才出现，但这一思想的内容却远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端倪。柏拉图的共和国，孔子在礼记中所记载的『大同』思想，这些都可说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模型。其后如：陶渊明的桃花源，穆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国，培根的新西世界，哈林顿的大洋国，莫勒里的巴细利亚德，这些理想社会的描写，可以说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品。不过这种理想社会的追求，只是一些空想的艺术家的抽象的创造，他们都没有想到要从丑恶的现实中去创造出美满的理想的社会来，这种思想我们如一定要用社会主义的命名，那末可以称它为『文学的社会主义』。孔子的『大同』思想和老子的『无为无争』思想，也是合于社会主义的内容的，我们可以称它为『哲学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利叶，欧文各派的新村运动，便是上述『哲学的社会主义』和『文学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化，使社会主义从纯然空想的阶段，发展为接近现实的阶段。

可是在各种『哲学的社会主义』和『文学的社会主义』之前，还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便是各派宗教家的社会主义了。耶稣教和回回教，于现实的痛苦社会以外，另有一个快乐的美满的天堂，佛教则于恶浊的人间世界以外，另有一个清净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些所谓天堂，所谓极乐世界，也可说是社会主义的典型社会。

耶教，回教，佛教，都以信仰一种神为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只要人们信心坚定，人们准能进入那美满快乐的天堂，进入那清净的极乐世界。文学家与哲学家是比较宗教家进步了，他们从『神』的本位改向『神化的人』的本位，把迷信的心理改为鉴赏的心理，用艺术手段创造出共和国和乌托邦等等的理想社会，把寄托在神身上的社会主义现实化了。

社会主义在名词上没有重要的争论，但它在人类观念中和思想上变迁的历史我们可以列成如下的系统：——

第一个阶段：神学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阶段：哲学的社会主义；
第三个阶段：文学的社会主义；
第四个阶段：形式的社会主义；
第五个阶段：科学的社会主义；

宗教的出现，耶稣教，佛教，回回教的成立，虽然在柏拉图与孔子之后，（中国道教的发源始祖老子，则与孔子同时，甚或较早。）但人类的迷信神（拜神）与迷信物（拜物）实早于任何哲学与文学之前。人类迷信的开始，正是人类文化的开始；拜物教的图腾社会，我们虽然不能知道它确实的发生的年代，但我们知道它至少要比封建的哲学与文学社会早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呢。

科学是最后出现的东西。哲学从神学中产生出来，科学则又从哲学中产生出来，所以我们依着人类思想与学术变迁的形迹来排列社会主义的发生和变迁的历史，神学的社会主义应该冠在最前，而科学的社会主义则要殿在最后了。

二 理论

在宗教时代，人们相信美满的社会主义社会要于另一个世界，要于神的世界中求

的。至于人的世界，人们都相信它是个恶浊世界，那种美满的社会主义社会决不能实现，人们也不希望它实现，这是神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在哲学时代，人们相信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的世界也可以有，不过那种人与普通的人不同。可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完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却成了一个谜。有的说人类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只剩下一些『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人类；有的则说这种『完人』是有的，不过不和我们居住在一起，他们早已离开我们这恶浊世界，逃到什么『山』，什么『洞』去了。

在文学时代，人们把哲学的思想弄得更具体更美妙起来，把现实净化着，艺术地描摹着，将哲学上的『黄金时代』或『别有洞天』说得栩栩如生，一若确有其事。

在形式时代，人们就真想来试一试了。圣西门傅利叶欧文各派的人都努力新村运动，想创立一个文学上的『别有洞天』的美满社会，来与那些恶浊世界分开。在这时代以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只是口头说说，社会主义这个东西只隐隐约约的藏在人们的脑子里，到了圣西门各派的人出来，才努力要把那些隐隐约约的东西，使它进为有形式有实体的东西。

形式的社会主义到了马克斯恩格斯手里，真是开遍了美丽的花朵。圣西门派等的孤立的形式，单独的创造新村，马克斯恩格斯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除非社会到了整个的变革时期，社会主义的形式才会普遍地互相关联地出现于世界，那时社会主义才能成功。这就是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于『恶浊世界』以外去创造出来，而要在『恶浊世界』以内『辨证地』形成。

马克斯恩格斯所合力成立的社会主义思想，世人普遍地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可是我们如彻底的查究其内容，则我们可以相信马克斯主义只是把『形式的社会主义』扩大化，发展到了最高度而已。圣西门傅利叶欧文各派用新村的手段去追求社会主义的形式，而马克斯则以唯物史观辨证论哲学来综合了政治与经济的原理，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去追求社会主义的形式。圣西门派与马克斯派所根本不同是的地方，只是新村运动的社会主义形式孤立于现实社会以外，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形式则植基于现实社会以内。

以哲学（唯物史观辨证法）的方法综合政治与经济等科学来决定社会主义的理论，以阶级斗争的手段来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看来马克斯的社会主义一定是科学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思想了；可是我们一考察实际，就发现马克斯在理论方面已走上了宿命论的前途，在手段方面成了偏狭观念的自杀政策。

三 宿命论的马克斯社会主义

善良的制度，美满的社会，这些都需要人类用自己的力量来创造的。离了人类自己的力量，非但善良的制度和美满的社会无从实现，就是恶劣的制度，腐败的社会也不能存在。马克斯忽略了人类主观的创造力的作用，依着他的宿命论的社会进化的法则，说社会主义这一组织是历史上必然实现的东西，好像原始部落社会成长到熟烂了，必然有封建社会出现，封建社会成长到熟烂了，必然有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成长到熟烂了，又必然有社会主义社会出现。这种由成长，熟烂和必然出现的唯物辨证论的逻辑，在善的方面讲，『必然论』固是教主坚固其信徒的信仰心的法宝，但在恶的方面讲，『必然论』就成了悲观的宿命论。试问在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尚未成

熟的地方，如目前世界各个资本主义尚未成熟而熟烂的国家，那末社会主义只好暂时与他们绝缘了。

不论在善的方面在恶的方面解释，马克斯这种机械的『必然论』都是走不通的。在善的方面讲，马克斯主义成了宗教的教义，劳动者对马克斯主义只要像信仰神一样的坚定，像信仰神一样的至诚，劳动者就会像基督徒进天国般自然而然的走进那『神秘的必然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在恶的方面讲，马克斯主义就老实成了躲避革命的洞窟，一部份积极的勇敢的劳动者猛进着上前去流血牺牲，另一部份消极的取巧的人们（劳动者也有）则躲在一边，静候着『历史的必然性』时期的到来。结果把马克斯主义当做宗教教义的人固未求得社会主义，而那些等候着『历史的必然性』的人更连社会主义的影子都没有看见。

现在马克斯主义已成了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好像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一样。马克斯主义不单在苏俄成立了政权，而且在全世界的劳动群中植下了深刻的影响，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凡太阳光照到的地方，差不多都有马克斯的信徒。它不单在苏俄成了绝对的思想界的统治权威，就是在别的反马克斯主义政权的国家，凡所有温和派或左倾的政治家也没有一个敢明目张胆的反对马克斯，甚至在无可奈何中，都要标着马克斯的幌子作拉拢群众的工具。如果我们现在把一本中世纪思想权威的圣经和二十世纪思想权威的资本论同样地陈列在一个公共场所，任人信仰，那末，毫无问题，膜拜圣经的只有一些少数衰弱无力的老夫老妇，膜拜资本论的将拥挤不堪，而且都是大多数的强壮勇敢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可是我们不要惊骇，我们如能翻读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就知道圣经在中世纪的受人膜拜，实比现在的资本论还要热盛几十倍几百倍啊。我们如知道了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繁荣的历史，那末对于资本论的受人膜拜就丝毫不值得惊异。

人类意识的向上性的发展，总是自然地倾向于比较真实和高深的理论。这不是哲学问题，也不是神学问题，而是人类意识发展的问题。虽然拜物，拜神和拜人都同是利用人类的意识活动，可是神学把人类的意识引向世外去发展，而哲学又把人类的意识引向空虚中发展，终究都成了历史上的陈迹，都随着宿命论没落了。在最初的时候，拜神的宗教比拜物的宗教在人类意识的作用上是比较的高深，同时在社会活动的作用上也比较的真实，并且拜神教比拜物教有统一性和普遍性，这便是基督教在中世纪时代能够成为欧洲思想界绝对权威的科学基础。我们试再用同一的方法去观察马克斯主义，去观察赫格尔哲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马克斯主义与赫格尔哲学较基督教教义更具有高深的理论内容，同时在社会活动的作用上也比基督教更具有统一性，普遍性和真实性。

圣经与资本论这两个思想，在历史上所以能成为绝对的权威，各有其科学的现实的基础。我们对于历史上的事迹，只要明了其基础与构成原因，一切神秘的迷恋的心理应该扫除开去。对历史发生神秘或迷恋，那是危险的埋没真理脱离科学的现象。

现在我们所要注意的，便是纯宿命论的拜物与拜神的宗教及其教义已被人完全放弃了，以宿命论为基础的唯心哲学也被人放弃了，却拥戴那回复了拜物教精神的『唯物史观辨证法』的马克斯主义，马克斯用右手打倒了唯心论，又用左手把宿命论扶植了起来，所以那可怕的宿命论，现在在思想界仍占着绝大的权威，做着社会主义现实

的障碍。社会主义不离开宿命论的镣铐，社会主义是永远没有现实的希望，纵使各时代各地域的马克斯教徒——劳动者——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成千成万甚至几千万几百万的生命牲牺下去，结果也都是白牺牲。施行阶级斗争而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实和舍身基督而求进入天国是同样的蠢事！迷信唯物史观辨证法而静候历史的必然时期的到来，也和那在教堂中诵读圣经求得上帝的脱苦赦罪是同样的没有前途，是同样的葬身于宿命论的圈套之中！

四 阶级斗争

馬克斯主義因被困於宿命論的圈套，便常常有喪失其革命性的危險。列寧常常說，誰要放棄階級鬥爭，誰要躲避暴動，誰便不是正確的馬克斯主義者，這不是無因的說話。放棄了行動，馬克斯主義便乾脆地只剩下一個消極的宿命論的前途，毫無意義可言了。那些無恥的取巧的智識份子，自考茨基以至於現在那些反布爾什維克的馬克斯主義者，一方面用盡種種方法緩和階級矛盾，避免暴動，一方面抄盡了馬克斯恩格斯列寧的話語，以標榜自己是真正老牌的正統馬克斯主義者，這本是無恥，同時也是無聊。棄去了馬克斯主義的革命的一面，保存了馬克斯主義的消極的宿命論的一面，這種『真正老牌』的正統的馬克斯主義，其價值的低微和人格的喪亡，我們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我们不要以为马克斯主义有了『暴动』这一针兴奋剂马克斯的社会主义便能胜利。事实上，暴动给与社会主义的赏赐只是一个残酷的牺牲和惨暗的破灭！历史上暴动是从来没有胜利过一次的，从欧洲的巴黎公社到中国的广东公社为止，我们如不是闭着眼睛，我们总可以看到这些暴动那一次不是自己去惹起统治者的残忍性，酿成巨大惨暗的流血牺牲，致使社会中暗滋潜长的一点社会主义的根芽，经不起一阵狂风暴雨便完全破灭了。

傅利叶欧文辈于另一个世界去创立新村，求社会主义的现实，这固然是行不通；可是马克斯放弃了整个的社会，而要在无产阶级中创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这也同样是一条死路。社会主义是要人类共同建设的，资本主义社会到了熟烂的时期，无产阶级固将不能生存，资产阶级却也要同样受着社会生活的威胁，在这整个社会秩序崩滑没落的时期，对于社会认识得最清楚的人提出完善的解决方法，主张社会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组织的合理化，将困厄被围的人类拔登于完善快乐的境域，这不单无产阶级欢迎，就是资产阶级也要默然首肯而热心拥护的。马克斯迷信着历史的必然性，迷信着无产阶级的伟力，毅然将社会划成两部分，以为只要无产阶级去消灭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稳稳到手了。殊不知阶级这个组织是最抽象的东西，它只有利害相同的形式，而没有密切相关的组织内容，横梗于阶级之前的有基于感情作用的民族组织，国家组织，友谊组织，家族组织；当无产阶级尚未组织成力量以前，为马克斯宿命论所决定的『必然死亡的』资产阶级早已在防备着，遇着机会，便来一个大屠杀。这里，我们能怪所谓资产阶级的残忍吗？资产阶级不愿意迎受『死亡』，——其实就是无产阶级也决不愿意迎受——『死亡』——不甘心坐待『死亡』，在无可奈何中拼命挣扎，以宿命论的手段还施之于宿命论的主动者。每次暴动后无产阶级的被惨杀，如果我们相信资产阶级的暴行是出于不得已，是出于宿命论的报复，那末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暴行的责任不应归之于资产阶级也不应归之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暴动也是困于宿命论的圈套不

得已而发动的——我们只好把这责任归之于宿命论的完成者马克斯（宗教的宿命论定在前世与来生，或在渺茫的天国，唯心哲学的宿命论建筑在形式上的玄想中，至马克斯才将历史上世外的与空想的宿命论推之于现实，所以我们称马克斯为宿命论的完成者）。

资产阶级对于社会的劳绩，它的前期是推倒封建社会，它的后期则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柱石。马克斯主张以暴动逐出资产阶级，扑灭资产阶级，这显然是自损力量。当然，马克斯主义暴动的出发点除哲学与经济的出发点外，其主要的原因则由政治上的见解。马克斯对于国家的认识，『货真价实』的是半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二者不同的地方只是时间上的差别，无政府主义者要于『二十四小时』内否定国家，取消政治组织，马克斯主义者则把『二十四小时』延长为数年或数十百年。他们的否认国家，否认社会的政治组织，实异途同归，毫无二致。

国家的成立，是应着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出现的，统治阶级虽有时利用之为压迫民众的工具，但其主要的藉以维持生存的任务则在谋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整个集团社会的发展。社会的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之间，自有其相互发展的基本作用，经济组织不能独立存在，政治组织也不能独立存在。目前政治组织的腐败，非但对经济组织不能有发展的助力，差不多连政治组织的本身也难于维持了，可是我们不能因这暂时的变态便加以根本的否认。人类如能把国家组织恢复到合理的健全的状态，那末政治组织对于社会的进化，对于经济的发展，仍具有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价值。马克斯因其宿命论的哲学基础，对于政治有了错误的认识，于是把国家的存在作为无产阶级暴动的理由了。

五 苏俄的十月革命

一般短视的人，或者会提出苏俄的十月革命来，说十月革命是马克斯社会主义胜利的证明。以为暴动毕竟取得了政权，宿命论毕竟现实了。事实上，这样观察是完全错误了，因为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非但不能证明马克斯主义有现实的基础，反而把马克斯主义的矛盾性完全暴露出来了。由苏俄十月革命这一历史的事实，证实了如下的几个马克斯主义的矛盾：

一、推翻了唯物的宿命论——依照马克斯唯物史观辨证法的决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成长，首先应当出现于英德法等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像俄国那样生产幼稚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万万没有发动和成功的可能。马克斯在许多地方的言论，也说无产阶级革命将在资本主义成熟了的国家『必然地』发动起来，至于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斯自己也不敢有把握地出来主张。可是经济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十月革命竟出于马克斯的意外发动了，而且成功了，把宿命论的辨证法的预言根本推翻了。

十月革命的成功，显然不是马克斯社会主义的成功，而只是由于列宁及其党人的努力。列宁及其党人在理论上虽然仍穿戴着马克斯主义的衣帽，但在实行上则完全是以列宁主义为中心。在十月革命的前阶段，列宁首先利用议会政策和平政策建立布尔什维克在政治上的基础，这一时期的努力，实是列宁的创造；虽然议会政策和平政策不难在马克斯恩格斯文献中找得若干理论的根据，却都是极不完全的。列宁先造成布尔什维克的普遍的政治势力，取得了在民众意识上的政治领导权，然后以暴动的形式

来独占全盘的政权，这种暴动与马克斯宿命论的暴动是绝不相同的。马克斯迷信着『历史的必然性』，不知道社会变革的循环性与前进性，单纯的机械的以暴动和斗争来号召，结果到处碰壁不能实现。

在十月革命的前期，列宁尚不得不从马克斯恩格斯文献中引用若干字句以作实行上改正马克斯主义的论据和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出发点，但到了十片革命的后期，试行马克斯主义经过了种种困难和失败以后，列宁不能再引证马克斯的著作来在行动上作改正马克斯主义的根据，在主张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断然喊出了『不惜牺牲一切的主义』的口号。所谓『牺牲一切的主义』，当然不能是牺牲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或其它主义，的确不移的是牺牲宿命论的马克斯主义。所以十月革命的成功，除其中暴动的一点与马克斯主义有若干形似的地方，其前期和后期的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以及这一事实的本身，都把宿命论的马克斯主义推翻了。当列宁喊出『我们不惜牺牲一切的主义』的时候，又显明的把马克斯的一切理论也推翻了。

有许多人恣口替马克斯辩护，说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斯主义的发展，这实在是和历史开玩笑，用辨证法的矛来攻辨证法的盾。假如我们承认改正了宿命论的列宁主义是马克斯主义的发展，那末我们何妨承认改正了唯心论的马克斯主义是赫格尔主义的发展，更何妨承认由唯神论改正为观念论的赫格尔主义是宗教教义的发展呢？在前期理论的列宁主义，我们承认列宁只和恩格斯考茨基同样的只做了发展马克斯主义的工作，在后期列宁主张了新经济政策的列宁主义，这就不是简单的发展的工作，而是改正的工作了。谁要不了解列宁主义与马克斯主义的划时代的差别，谁便不能了解列宁主义的伟大，谁便不能了解苏俄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二、打破了无产阶级伟力的迷信观念——十月革命的前期，即是苏俄克伦斯基政权成立到十月革命发动这一阶段，布尔什维克根本是依赖着资本主义的权力而存在的，若不是列宁适当的运用议会政策与和平政策，使克伦斯基无法先事防止或摧残，否则现在漂流世界的三百余万的苦难白俄，何尝不是现在夸耀世界的赤俄的榜样！十月革命后，共产政策着着失败，全国生产平均跌到战前百分之二十以下。

苏俄生产指数比较

	一九一三	一九一八	一九一九	一九二〇
工业生产总结数	一〇〇	三　五	二　六	一　八
铁生产指数	一〇〇	一二·三	二·七	二·四
钢生产指数	一〇〇	四　二	二　九	二　七

附注：农业生产无从统计，但其跌落的程度当不亚于工业生产。且农民曾激烈怠工，其跌落的程度或十倍于工业，那就不及战前生产百分之二或三了。

看了上表，我们可以明了马克斯迷信无产阶级伟力的失败了。十月革命后苏俄是依着迷信无产阶级伟力的观念去决定经济政策的，不幸这经济政策一开始，苏俄的生产便只有步步降跌，跌到全国人民都在煎熬饥寒的待死状态中，若不是列宁的积极主张牺牲马克斯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万能』的观念，则苏俄经济的全盘失败，更变成政治的全盘失败，当年煊赫一时的十月革命现在怕只成为一个悲壮的革命故事了。

三、证明了资产阶级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责任——对于列宁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学者说这是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屈服，共产主义者则说这是暂时的过渡阶段—

一痛快些说，是共产主义者暂时利用资产阶级以作经济建设的过渡阶段——其实这两个说法都不是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内容。新经济政策的正确的解释，在经济上的意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协力建设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意义是以集团意旨与政治权力去发展社会经济；所谓集体生产，所谓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所谓国家——社会——资本主义，都是在上述这两个意义下面产生的。

苏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性的农民协力，早于十月革命前后就开始执行了。后来土地国有政策及其它经济法令公布施行，无产阶级的排他性充分表演了出来，于是苏俄工人与农民在经济上便不能继续协作，发生背道而驰的现象了。感觉敏锐和认识深入的列宁，首先发现这种无产阶级（主要的是工人）与资产阶级（主要的是农民）不能继续协力的现象，便以先知者的勇敢精神，不怕被人詈为马克斯的叛徒，毅然喊『不惜牺牲一切的主义』，号召全国同志及人民起来执行新经济政策。我们万万没有理由说新经济政策是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屈服，更不能说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利用，明明白白的只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协力，协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新经济政策非但是苏俄国内工农两阶级的协力，并且还曾和欧美大资本家实行协力政策，各种大实业的出租，各种工具及原料的交易和赊欠，吸收国外过剩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这都足以证明苏俄的协力主义，从国内扩大到了国外。现在苏俄几到处敲着小锣，鼓吹『互不侵犯条约』及切实裁军，目的便是建立国际间协力主义的初步。偏狭的人们大家会争着喊：

『这是屈服』!

『这是利用』!

可是我们目光放远一点，就应该喊：

『这是协力啊』!

惟其是协力，苏俄国内的经济努力和国外的互不侵犯条约才有社会主义的前途。否则苏俄一切的努力都是虚伪而可耻的!

马克斯与列宁根本不同的地方，便是马克斯始终固定在宿命论的围套中，认为资产阶级始终是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立志要打倒它，宁把地球浸入血海里，资产阶级则非杀不可！列宁在晚年则有了彻底的觉悟与勇敢的改过，认为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自有其不可放弃的责任，而且非有资产阶级的热忱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便不能成功!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恐慌开始以来，生产的不安撖动了全人类的意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众如农民与大小工业资本家——中国可以黄任之史量才一派作代表，申报及生活周刊是其理论中心——都跃跃欲试的企图负起社会主义的责任。这一现象证明协力主义的列宁主义是正确的，宿命论的马克斯主义被打入历史的漩涡中去了。

四、证明国家将永远存在——关于这一证明，因为注意国家问题的人现在还很少，讨论的材料因此也很少。列宁对此最具体的著作有国家与革命，但这著作在早年所完成，道地的是『发展马克斯主义』的著作，在后期则简商没有具体讨论过。目前证明国家将永远存在的论点只有三个：

第一是协力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国家的善的作用充分地表演了出来。原来社会的有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并不是空虚的无用的东西，也不是自然的或上帝的东

西，而是人类为着社会生活的需要从认识的领域中和历次的试验中创造出来的。自从苏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苏俄的政治组织对于发展经济组织实收了以外的功用。观于这一事实，我们敢确信政治组织是经济组织的中心，离了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将立即崩溃而无法存在。国家则是社会的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的集成机关；国家消灭，政治组织便首先解体。而社会的经济组织也就不能保持了。关于这一点，暂时还没有事实可作证明，不过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极力主张社会生产发展到最高度，社会就只要保留经济组织，不再需要政治组织和国家，我想苏俄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以后，那时苏俄的生产力至少比现在的美国高出五倍，他们的生产总算发展到最高度，总可以废弃国家，消灭政治组织了，我们试静俟着素称勇敢的布尔什维克届时将如何开始这一行动，或再来喊一喊列宁的口号：

『不惜牺牲一切的主义，继续维持苏俄的繁荣』!

第二是列宁派与斯太林派对托罗茨基派的争论，列宁派与斯太林派主张在一个国家内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托罗茨基派则主张在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能实现。这两个不同的主张，无疑是托罗次基派的主张失败了。既然在一个国家内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那末就使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以后，为国际环境所逼迫，国家的组织必将仍旧保存着，以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命。这样说起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没有国家的说法已经否定一半了。

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成立以后，世界各国必将络续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形成全世界全人类统一的国家。不问这种国家的形式如何，为全人类全世界的发展前途起见，这种世界国家的组织，创造，并且永久保存下去，那是必要的。

第三是社会安定以后，人口的激烈增加将不能免。十月革命后苏俄虽牺牲了不少人口，参加欧洲战役也牺牲了很多的人口，可是现在迅速繁殖，已追及战前的纪录甚至超过了。生活资料与人口增加的比率，在自然中决难逃过马尔萨斯的定律，那末实现社会主义以后，人口将迅速增加，弄得大家过生活资料不足的生活，不又是人类的灾难吗？照全地球的水陆面积，就使充分利用以后，至多可供比现在多五倍的一百万万人口的生活，但过此以后，人类又如何生活呢？现在已有人忧愁地下的矿藏开采完了以后，怕没有石油石炭等燃料了——关于这些，人们的答复将是『科学上有不断的新的发明』。

人们如知道科学上的发明的重要，那末问题就在这里解决了。科学有不断的新发明，这便要归功到社会的形成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归功到国家。宿命论的马克斯常把科学的发明归功于资本主义，实是错误的观察。资本主义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只是人类在历史生活中所体验出来的东西，我们与其把科学的发明归功于资本主义，倒不如把资本主义的出现归功于科学的发明好。因为没有亚丹斯密自由主义的经济科学的成立，没有瓦特蒸汽机的发明，没有美国新大陆的发现，没有远东近东等市场的出现，现在这个被人爱戴又被人咒骂的资本主义真还不知躲藏在什么地方呢。

国家机关，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既同是科学的维持者和保护者，既同是科学的母胎，而一切社会的进化与生活的改善又都依赖着科学，科学的本质和它的重要就可想而知了。社会进化不能停滞，生活改善也不能停止，人类要谋自身永久的繁殖，将

永久不能离开科学，那末便永久不能离开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将永久保存国家这个社会组织的集成机关。

六 结论

——怎样实现社会主义

社会所有一切的历史现象，都是从人类在宇宙间自然界的认识和经验中不断的发明，不断的创造出来的。不论是拜物教也好，拜神教也好，唯神哲学也好，唯心哲学也好，唯物哲学也好，科学也好，总之，一切都是从人类的认识与经验中发明和创造出来的。大到组织国家，组织国际团体，创造大炮海舰飞船，成立垄断全世界市场的大托拉斯，小到组织家庭，组织商店，制造镰刀和斧头，成者一群小孩子在旷场上做捉迷藏的游戏，也都可以说是人类从认识与经验中发明而创造出来的产物。推而广之，那末封建思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又何尝不是人类的发明呢？

发明有空想的，有现实的，必须现实的才能成为事实，空想的发明则无论你具有何等勇敢的创造精神，结果却永久是个空想。对于自然界的东西，就使这个发明是空想，也不妨用种种方法去试验，试验越多，认识与经验也越充分，最后空想的发明便成为现实的发明，造成事实了。可是人类自己，那就有了困难，自然物可以放进实验室或化验室，任你高兴，一天试验几次都可以，同时分成几组去试验也可以，但整个的人类，整个的社会，却不能拿进实验室或化验室去这样试验。人类要想求得对于社会的认识和经验，求得对于社会的智识，唯一的方法只有去看书本，从书本中了解社会的历史，把握社会变迁的途径；可是单有这些空洞的智识还不够，这些空洞智识只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初步基础，要自己的智识成为实用，还必须参加实际社会的活动，求得整个社会的实际情形；一知半解的单只知道社会的光明的一面没有用，单只知道黑暗的一面也没有用。单只知道社会光明面的，便一味歌颂功德，单只知道社会黑暗面的，便一味咀咒罪恶，结果前者做了统治阶级的走狗，后者专门想暴动推倒政府，两者都弄不出什么成绩，至多不过留下几部文学作品。

社会所以发生黑暗现象，自有其原因，这原因应该是全机构或局部的机构有了不合理的缺点，我们要创造新社会，便要把不合理的缺点去掉，而在合理的领域中求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向有历史以来，大概可以分做四类：第一类是宗教的，天国和极乐世界谁也不希望它在人间实现；第二类是文学的或哲学的，『大同』世界和共和国桃花源乌托邦等只供精神上的鉴赏取乐，也没有人求它实现；第三类是圣西门傅利叶欧文等的新村，他们求实现，但他们只想创造光明的一面，把社会黑暗的一面忘去了；第四类是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他们也求现实，但他们又只知道剔除社会的黑暗面，甚至用报复残杀的手段去剔除黑暗面，而把发展光明这一面的任务又放弃了。所以上述这四类的社会主义，都没有顾到实际社会的全机构，结果都不能成为事实。

马克斯主义者自称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其实这是夸大，马克斯主义虽较天国极乐世界共和国大同世界及各种新村和无政府主义接近现实，可是决不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应该有步骤有计划，马克斯主义从来不谈这些，马克斯主义者只要顾今朝，明天的事情就不去想它，因此暴动的时候只讲暴动，暴动以后如何是不问的，罢工的时候只讲罢工，罢工以后如何也是不问的。马克斯主义者常以『只想将来不顾现在』这句话嘲笑一般空想的社会主义，甚至以此在大众之前自豪；可是我们反过来问一句：

『只顾现在不想将来的方法，这就算科学吗』？

马克斯主义者自以为『只顾现在不想将来』的勇敢的试验是最忠实的科学的态度，可是我们不能同意啊。科学的最后任务是在于『创造』，所谓『试验』并不能包括科学的全过程。宗教家，文学家，哲学家对于社会主义从没想到试验这一回事，圣西门傅利叶欧文等的新村运动屡次试验而屡次失败，马克斯的暴动也都是失败；不过马克斯的暴动虽然失败，但因为有『科学的』三个字装在头上，徒众终是坚信不移，希冀在宿命论的圈子内碰碰运气，获得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不幸马克斯的方法完全不讲步骤和计划，只是盲目的去『试验』，去『暴动』，取了科学的皮毛，抛却了科学的精粹。

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这问题我们现在不能再学马克斯那样放弃不问了。创造电灯的人不明了电灯的概念，决不能创造出电灯来，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不明了社会主义的内容，也决不能创造出社会主义的社会来。第一我们要从事社会主义运动，我们先要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概念。

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人类实行协力主义的共同生活，共同推进社会发展生产，使社会全体都得到自由幸福，过美满快乐的生活。这里，唯一的中心便是协力主义的问题，协力主义就是未来社会的骨干。现在的社会完全不是人类互相协力，而是人类互相攻击摧残，资产阶级拼命摧残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也拼命摧残资产阶级。我们要创造社会主义，那末我们将用什么方法消灭相杀的社会，恢复协力的社会？

国家的组织本是维持社会协力的机关，但因为人类自私性的发作与个人主义的活跃，往往使这个协力的机关变成压迫的机关。马克斯以为国家纯然只是压迫的机关！他实在只说了国家的后半截。当一个政府沦入个人主义的专制魔王之手，这种政府将完全失去社会的协力性，失去了社会协力性的国家是不能生存的，于是就有新的协力主义的政府要抬头，这种新旧交替便就是革命的现象。所谓革命，也不能完全机械地去了解。革命有时候有形式，有时候形式上却看不出，但实质上已经改变了。譬如资本主义革命，法国把封建的皇帝推翻，英国日本的皇帝却仍旧存留着；譬如社会主义革命，苏俄是经过了暴动的形式，但其它欧美有进步性的政府如能作合于时代的改革，那末就是不经过暴动的形式也一样可以走入社会主义的前途。形式上的改变是次要的，主要的问题只在于失了社会协力性的旧政府，是否有决心回复到协力主义的基础上去？如果能够断然回复协力主义的精神，那自然没有形成另一个新政府的可能。但如要继续压迫下去，那就没有问题，另一个富有社会协力性的新政府将代之而起了。所谓协力，并不是新政府与旧政府的协力，也不是几个政党领袖的协力，乃是整个国家机构和全体社会民众的协力，在目前，就是所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协力。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怎样会协力呢』？马克斯主义者一定要这样的带问带嘲笑。

马克斯主义真是铁铸的宿命论，总以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生死冤家，永久只有互相压迫互相残杀，万万没有协力的可能。其实事情是很简单的，要知无产阶级怎能与资产阶级协力，只要去问英国和日本的封建的贵族皇室怎能与资产阶级协力就得了。

现在因为市场限制的关系，社会经常存在着两个矛盾；一是生产品过剩，二是劳动力过剩。马克斯说这是循环出现的『经济恐慌』，其实这不是循环出现而是经常存在

着，不过有时激烈有时缓和罢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开始，解放了成群的封建奴隶，本有协力的基础，所以奴隶们都逃出封建领主的约束而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不久市场充塞，生产窒息，现实上生出了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就失了社会的协力性了。这时人类如要继续前进，便须放弃矛盾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另外创立一种合理的协力的社会资本主义制度。

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列宁主义的暴动——不是宿命论的马克斯主义的暴动——固然也是一种手段，但根本的方法则是解放市场——生产合理化与关税壁垒只能加深市场限制——的限制。解放市场的方法便是改革有限制的铸金货币制度为活动的信用货币制度，同时改革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的生产方式为有组织的集团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样，人类就可以仍旧回复协力主义的精神了。经济上回复了协力主义的精神，政治上要回复协力主义便毫无困难。人们如迷信着马克斯的宿命论，迷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两立的斗争的死敌，不相信两者有协力的前途，那末人类就只好永远混乱，永远黑暗，等待『末日』降临！

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 周毓英

法西斯主义（Fascism）现在已掀动了世界，不论反对者的诅咒和詈骂是怎样的尖刻恶毒，法西斯主义并未因此落入地狱。却是那些毒喜欢诅咒，喜欢詈骂，逃避现实的人一天一天与地狱接近了。事实总是事实，不论反对者怎样的富有文学的想象力，富有艺术的理想力，坚硬的事实绝不为玄妙的空想所击毁！人类的脑际今后大半潜伏着一个信念，这信念不是『上帝』，不是『佛』，也不是『美人』，『黄金』或者『自由』，而是任何人都看得见听得到的一句话：『法西斯蒂！法西斯蒂！』

法西斯蒂与布尔什维克同样的具有科学基础，然而在理想与现实接合的基点上，则法西斯蒂的行动，比布尔什维克就更敏捷更坚决了。把法西斯蒂与布尔什维克同列在一起，或许有人觉得贬损了法西斯蒂的价值。可是我们不那样想。我们不能承认『法西斯蒂是布尔什维克的右倾』。当把法西斯蒂与布尔什维克并列比照的时候，我们只见法西斯蒂比布尔什维克更具有坚决性与现实性，比布尔什维克更具有科学的基础！把玄妙的空想送入地狱，把粗糙的事实放在眼前，我们准会知道法西斯蒂的精神。

法西斯蒂是行动的组织，不是吃了饭没事做的谈论的组织。布尔什维克虽也同样以七百万（共产党徒）少数有纪律有毅力的组织统治一万万六千万（苏俄人民）多数无纪律无毅力的民众，布尔什维克也同样以普罗列塔利亚迪克推多的强迫统治打破虚伪的德谟克拉西，但法西斯蒂与之绝不相同。法西斯主义者是最坦白的政治行动员，时时刻刻追逐着粗糙的事实，以事实为革命的内容，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脚下蹈的是粗糙的事实，头上顶的却是世纪前马克思的空想。他坦白的主张以少数统治多数，毅力的图谋公共的利益，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用一套巧妙的手法将浮滑的智识份子冒充工人，将一个政党的独裁讳言为普罗列塔利亚狄克推多。当然，我们公开承认，法西斯蒂与布尔什维克没有丝毫矛盾，法西斯蒂的志趣，法西斯蒂的精神，都和布尔什维克没有两样，但行动的表演，法西斯蒂是更坦白！更坚实！还可以说是更粗糙！更强力！

法西斯主义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内容，它是以社会的内容为内容，社会需要国家主义，法西斯蒂便是最活泼的国家主义，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法西斯蒂便是最前进的社会主义，总之法西斯蒂是毅力的牺牲的结合，抱着大无畏的精神来拯救社会，拯救人类。

法西斯蒂的活动，在意大利是墨索里尼主义，在德意志是希特拉主义，此外在英国日本法国和东欧各小国也已有蓬勃发张的现象希特拉主义与墨索里尼主义在行动上精神上同样是毅力的牺牲的铁血组织，但德意志与意大利的国情各有不同，内容上不免有若干差别。可是这些差别，并不能以之定为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说法西斯主义没有国际性，实际上，这正证明了法西斯蒂的活动性。因为法西斯蒂的产生，纯然由于社会的需要，是社会自然产生的。它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组织了第三国际去做主义的运贩工作，这种运贩工作显然是失败的。假如一个国家没有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那末就使把墨索里尼的全部行动都抄袭了去也没有用，墨索里尼早已说过了：『法西斯主义不是出口的啊！』

『法西斯主义不是出口的』。却偏能撖动全球，共产主义被第三国际装箱发卖，却到处都打回票。这证明社会条件已经成熟了的时候，墨索里尼虽然丝毫没有注意，德意志的希特拉也自然会站立起来，日本的法西斯蒂势力也自然会暴长起来。苏俄的领袖们硬要把自己的老文章叫人家去照本誊抄，结果各国的无产阶级暴动都相继失败了，只留下一个寂寞的苏俄巍然独存！九一八东三省事变突发，老弱的中国被日本实行开刀宰割，亡国的惨痛刺醒了麻痹的慢性病的中华民族，有毅力的志士奋然愿以热血来救国。在这潮流下，那法西斯蒂在中国社会便蠢然思动，『毅力的牺牲的铁血组织』如血魂团铁血团等组织一时有了七八十个，关外与暴敌血战的义勇军在五十万以上。许多从各政党各组织脱退出来或未脱退而怀者不满意的青年志士，都跃跃然的要起来组织法西斯蒂，完成一个革囊样的组织，把四万万七千万的一盘散沙的同胞盛放在法西斯蒂的革囊里。

中国能够团结，不要说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一致来围攻，也有力量打退他们。只是中国究竟怎样才能团结，却是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忍受日本军国主义的『革囊』来盛我们『四万万粒的散沙』。二十余年的革命没有把中国实行团结，内政经济没有统一，军事上是形合实分，外交上就各有秘密，——张学良不愿与日本秘密勾结便有去年九一八事变。有毅力而彻底明了事实的志士，都感觉中国必须放弃惰性的民主，实行正义的独裁。这样，法西斯主义就成了中国的对症要药了。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本不起于九一八。清末同盟会的歃血革命，就有这种精神；不过公开彷效法西斯蒂并且受到社会的同情是九一八以后才有的事。我们应知以中庸求前进，那本是孙中山先生成功的至道，但一般人却假借『中庸』作苟安偷惰力事保守的工具，中国社会已受尽了『中庸』末流的遗毒。这『腐烂了的中庸』，中国一辈子不得兴盛，不使用强力绝不会有挽救的希望。本来中国能够永久关着大门中庸下去也是好的，大家中庸着过生活，让少教酋长式的军阀各霸一方，让少数有智慧的政客挑拨图利，无奈世界不让我们再迷恋着『腐烂了的中庸』，日本已经动手来侵略，英国法国也想来侵略，旧存的不平等条约更窒塞着我们不能继续生存。

历史告诉我们，救中国『五分钟的热度』是没有用的。外患的刺激才过去，甚至还没有过去，内部自私的纷争又起来了。民众爱国的心理是一致的，士兵爱国的心理也是一致的，但那些自私自利的政客却爱挑拨着军人来作乱，使中国不能坚固团结，实行统一。这里，我们就不得不主张采取毅力的牺牲的铁血的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只有铁血的法西斯蒂才能击碎虚伪的德谟克拉西，才能医治中国民众的慢性病，才能打倒侵略的军国主义，也只有铁血的法西斯蒂才能救中国。

法西斯蒂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以社会的内容为内容。那末在中国的法西斯蒂除了组织上的有毅力有纪律以外，无条件的是该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内容。中国社会需要三民主义，但『徒法不能以自行』，必须有坚强的组织来执行，这个组织便是法西斯蒂。孙中山先生为着执行三民主义，最初的组织有兴中会，兴中会以后有同盟会，同盟会以后有国民党，国民党以后有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以后有中国国民党。这些组织上的转变，我们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社会的惰性作用常常使一般参加革命的份子趋于消极腐化，组织上如没有新的刺激或转变，整个的组织便会走向没落，使党的组织离开党的立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可崇拜尊仰，就是他时刻注意着组织，必要的时候便使自己所领导的组织有一个转变，有一个改革，这样才能保持党的革命性，不致随着社会的惰性走向没落。

中国国民党于十三年改组成立，十六年北伐的时候曾收了巨大的作用。北伐能够成功，完全是由于十三年改组的效果。可是党由十三年改组到现在，快满九年了，在这九年中央党所受到的社会惰性作用使党内增添了不少的消极份子和腐化份子，使组织渐渐离开主义而走向没落。中国国民党的倾向没落，非但党外的人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在党内有志气的青年也都是这样的感觉着。国内两个主力的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共产党因为主义不合实际着着失败，国民党因为组织惰性的作用也无多大建树，于是一般青年都泣血椎心的呼号着：『共产党是永久没办法，国民党长此下去也将没办法啊！』

共产党的没办法，是根本因为主义上走不通，可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凭着伟大的天才和四十余年的经验完成的，国民党的没办法实在由于组织的惰性作祟，绝不是因为主义不正确，九一八事变后，一般舍本逐末的人，居然主张提早结束训政，主张立刻开始宪政，模仿欧美虚伪的德谟克拉西，非但不要国民党的组织，连国民党的主义也不要了。请问宪政是什么东西，日本德国英国的宪政不是在溃烂得出蛆吗？美国法国也快要摘下宪政的脸具！离了有基础的民治，离了三民主义，宪政是没有地方好求得的啊！要求得真正的宪政，必先完成三民主义的基础，完成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样，我们非但不主张提早结束训政，至少还要将训政延长五年十年，性急而浮滑的智识份子或许觉得五年十年是太长了，可是在我们以纪律与毅力为生命的政治行动员说起来，五年十年也不过是一个短促的阶段罢了。

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更不能放弃党的组织，而是要以更敏捷更毅力的党的组织来执行三民主义。那末今后的中国革命便是要：

三民主义＋法西斯蒂

解释起来是：正确的主义＋坚毅的组织

好的社会思想，好的社会主张，没有组织是一步都不能行动。但是如果永远被一个病牛样的组织拖累着就还不如没有组织的好，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如九一八时中国民众对于三民主义的责难，便是受『病牛样的组织』的赏赐！三民主义如要求有效的像法西斯蒂那样的强力的执行，民众与军队的密切联合是必要的，军人们排除挑拨，放弃嫌恨，而赤心的团结起来也是必要的。

三民主义下没有私见！法西斯蒂下没有个性！

执行三民主义的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

雅利安革命实用指南　戴维-迈亚特

戴维-迈亚特出生于 1950 年，是英国哲学家、作家和翻译家。他很早就对政治产生了兴趣，是英国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首任领导人，并被认为是民族社会主义组织“战斗”背后的主要知识分子。

他曾在大学学习物理，并被怀疑是九盎司骑士团的创始人，但他否认了这些指控。

马萨诸塞州韦斯特菲尔德州立大学刑事司法系教授乔治-约瑟夫-迈克尔（George Joseph Michael）声称，迈亚特 "可以说是英国当代新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倡导者和革命理论家"。据报道，迈亚特的智商高达 187，从他的智力产出来看，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1999 年伦敦爆炸案首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据说《雅利安革命实用指南》给了幕后黑手以启发：大卫-科普兰是一名工程师的儿子，同时也是一名激进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科普兰以伦敦的黑人、南亚人和同性恋社区为目标，造成 3 人死亡，129 人受伤，许多人失去了四肢。科普兰于 2000 年被定罪，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雅利安革命实用指南》据说影响了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地下组织，被誉为 "恐怖主义暴动的详细步骤指南"。它是所有参与雅利安人反对全球主义精英及其新世界秩序斗争的人的必备著作。

我们的雅利安文化、我们的雅利安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雅利安种族正处于危险之中。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有雅利安人的国家，没有一个地方有雅利安人的家园：在这片土地上，雅利安人自由自在地生活，按照他们独特的雅利安生活方式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维护雅利安文化。

相反，世界上的雅利安人现在生活在 "多种族社会 "中，他们的习俗、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以个人荣誉为基础的雅利安法律观念都被宣布为非法。

此外，这些 "多种族社会 "致力于一种真正的雅利安人——真正的勇士——认为令人憎恶的生活方式（消费资本主义），就像这些社会积极骚扰、迫害、监禁甚至杀害那些为他们的雅利安文化、他们的雅利安生活方式、他们的雅利安种族而自豪和蔑视的雅利安人一样。这些社会将任何雅利安人的骄傲、雅利安人的文化、雅利安人的生活方式视为 "种族主义"，这些社会的政府公开向 "种族主义 "和 "种族主义者 "宣战。

因此，我们这些有雅利安人思想、情感并希望作为雅利安人行动和生活的人，发现自己生活在**占领国政府的统治之下**，这些政府决心从精神上奴役我们的人民，从精神上限制我们的人民，并决心通过种族混合最终使我们的种族灭绝。现在统治我们民族的政府试图驯服和驯化我们曾经凶猛、骄傲、好战的民族。

六十多年来，成千上万勇敢的雅利安男男女女一直在试图做些什么，以应对对我们民族的罪恶操纵，应对我们的权利、自由、文化、生活方式的逐渐侵蚀，应对多种族主义对我们的家园、我们的祖国的破坏。这些人中有许多人被监禁——有些人被长期监禁——许多人遭到殴打、骚扰、恐吓和迫害。有些人甚至被杀害。

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镇压性反雅利安人的法律出台，这些法律进一步限制了我们可以说什么、做什么、写什么，甚至我们可以去哪里。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雅利安人活动家遭到斯大林式的 "黎明突袭"，他们的住所被搜查，以寻找被反雅利安政府宣布为非法的文学作品。**在曾经是雅利安人国家的英国，情况是如此糟糕，镇压是如此严厉，以至于现在连拥有持不同政见的 "种族主义 "文献都是刑事犯罪，可处以监禁。甚至携带任何防卫性武器——这是雅利安人的古老权利，也是我们致力于捍卫自身荣誉的标志**

- 就像直率、自然地表达对同性恋这种颓废生物的厌恶现在被打上了 "仇恨言论 "的烙印一样。

这种压制我们人民、压制我们天生战士的生活方式的行为是邪恶的，是专制的。

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如何反击？我们怎样才能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我们按照自己的习俗和法律在同类中生活的自由而战？我们怎样才能为自己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的家园？

我们要玩敌人希望我们玩的游戏吗？组建合法、和平的政治运动并参加选举的游戏？难道我们要按照敌人制定的规则来玩游戏，而且每当他们认为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时，他们就会改变这些规则？难道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敌人会平静地将权力移交给雅利安人政治运动，通过选举取得成功？

还是采用武装叛乱的策略，组织一个或多个秘密团体，招募并训练雅利安人成为城市士兵？还是采取无领导抵抗的策略，由独行侠进行破坏、扰乱和政治暗杀？

在我们开展任何合法或秘密活动之前，甚至在我们考虑如何建立雅利安人家园，从而恢复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雅利安人生活方式之前，我们必须接受三个基本事实。

这三个基本真理是

1. 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根本目的就是帮助、协助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种族：也就是说，为我们的种族尽我们雅利安人的责任。这种责任高于一切：高于我们自己的幸福，高于我们自己的舒适，甚至高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真理并付诸行动，我们就会成为战士：我们就会像雅利安人那样思考、行动、感受和表现。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一真理，也不按照这一真理行事，我们就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他们的纯粹消费者、纯粹傀儡。消费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以邪恶、专制的社会工程为名，致力于破坏大自然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社会。
2.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卷入了一场真正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为了自由，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我们生活在一个镇压性的占领政府的统治之下，这个政府过去和现在都在对我们的人民进行精神操纵和洗脑，它一直在寻求，而

且确实在寻求维持一种假象、谎言和骗局，那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 "民主 " 的国家里。

我们必须看穿我们的占领政府所制造的安全和满足的假象。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很可能过着平静的生活，而也许它们吃得很好，但它们仍然被关在笼子里，仍然无法像它们应该的那样，在自然栖息地自由自在地生活。

我们必须看穿我们的占领政府为了让我们的人民保持娱乐、转移注意力而使用的幻觉，以及让我们的人民对他们的雅利安文化、他们的雅利安身份、他们的雅利安责任、他们的雅利安命运一无所知的宣传和洗脑，并使他们成为为资本家和腐朽政客服务的自我放纵的消费者和工人——这些资本家和政客经营并维持着这种压制性的社会工程——消费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必须明白，目前雅利安人生活的所有社会的生活方式都不是雅利安人的生活方式，有损于我们的健康、福祉、自由和未来。这些社会目前的生活方式是颓废的、不光彩的、无耻的，代表了战士、真正的雅利安人所厌恶和憎恨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奋起革命：摧毁这种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健康的、高尚的、能够体现战士的生活方式和品格的生活方式。

3. 我们的雅利安方式是个人荣誉的方式，是对同志和真正的朋友绝对忠诚的方式，是对我们的人民尽职尽责的方式。这些东西表达了我们雅利安人自己的品格；表达了作为雅利安人的意义；是我们独特的雅利安生活方式的基础。我们正在为建立一个维护这些雅利安价值观的社会而奋斗，因此我们自己必须努力生活，必要时为这些价值观、这些理想而献身。只有接受这三个基本真理，我们才能开始执行争取胜利的艰巨任务。

既然我们是在为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种族的未来而战，既然我们是在与一个强大的敌人作战，而这个敌人拥有资源、权力和影响力，可以出台新的法律、新的社会和政治立法，进一步驯服和驯化我们的种族，既然我们的自由、我们种族的未来岌岌可危，我们就不能在战术选择上自我设限。

没有一个将军会在战场上指挥军队，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企图置自己和全军于死地的敌人，听从顾问的建议，不能使用某些战术，因为这些战术可能会被远离战场的 " 国内 "的一些平民认为是不合适的。这位将军当然不会在意未来的学术历史学家会对他的战术做出什么评价。对这位将军和他的军队来说，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胜利问题；这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空洞或自命不凡的学术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雅利安将军唯一的标准就是他的战术是否有效，是否光荣：即是否适合战士。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可以采取三方面的战术：

1. 合法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或政党；
2. 通过有组织的起义积极反抗暴政；
3. 通过无领导（或独狼）行动主义进行积极抵抗。

重要的是我们要战斗。我们使用什么战术并不重要，只要这些战术**既实用又光荣**。也就是说，对我们选择战术的唯一真正限制应该是，这些战术对敌人有效或可能有效，而且是光荣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限制，因为战争规则、交战规则是战争时期战斗人员必须遵守的。遵守这些规则，我们就是光荣的。

这些规则规定，必须公开宣战；还规定，参加战争的人必须是军事组织的现役士兵：即军队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在道义上有理由采取三种必要的策略：寻求政治权力的合法运动策略；通过有组织的叛乱进行积极抵抗的策略；以及 "无领导"或 "独狼"抵抗的策略。

对于积极抵抗的策略——即有组织的叛乱和无领导（独狼）行动主义——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是，这种策略会导致或可能导致当时的政府出台更多的镇压性法律，并可能导致他们直接取缔雅利安人的政治组织。

虽然这可能是事实，但现实情况是：

1.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专制的政府，它限制雅利安人政治组织的活动，限制其领导人和成员在公开场合的言行，限制这些组织制作、拥有和分发什么文献，而我们却没有进行什么积极的抵抗。这种专制每年都在加剧。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已经有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直到现在我们被迫生活在一个压制性的隐蔽马克思主义社会中：也就是说，生活在一个压制性的社会中，这个社会除了外表的名称之外，其他方面都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场无声的、几乎不流血的马克思主义革命。
2. 这些致力于 "和平 "手段的政治组织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收效甚微，甚至一无所获，尽管它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3. 尽管有数以千计的热心支持者的承诺，但我们的选举活动还是花费了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捐款。在我们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的同时，在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被压制和取缔的同时，在我们的人民继续被操纵和洗脑的同时，在我们曾经是雅利安人的国家继续欢迎和接受其他种族的同时，却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了

这样，大约再过五十年，我们雅利安人在自己的国家里将成为少数民族。曾经的罗得西亚的白人农民的命运就预示着我们的未来。英国有一个政治组织，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的选票往往少于 "绿党"。

事实上，这些组织缺乏两样基本的东西：第一，一个真正的、鼓舞人心的、有魅力的领导人；第二，社会上合适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要想取得成功，要想接近政治权力，就必须有一个强大、可敬、毫不妥协的领导人：一个出于对人民的真正热爱而行动的可敬的人，他既散发着这种真正的爱、真正的关怀，又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即使这样的领导人要取得成功，也必须具备适当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我们的人民必须渴望彻底变革，渴望建立新秩序。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群众的不满情绪；必须要有革命前的局面。

问题是，我们没有这样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我们的敌人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努力，让我们的人民安于现状：安分守己、心无旁骛、衣食无忧。目前，我们的大多数人民在精神上被我们的占领政府所操纵，他们不了解自己的雅利安文化，不了解自己的雅利安生活方式，也根本不关心自己种族的未来。他们失

去了自己的身份，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他们不知道自己生活的真正目的，因为他们现在和过去一直被操纵着，相信并接受消费资本主义 "多种族 "社会的卑鄙价值观和思想，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目的被视为自我满足和个人幸福。

积极抵抗是帮助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为雅利安政治组织创造可以利用的条件。也就是说，积极抵抗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抵抗，我们的社会将继续保持现状，我们的人民将失去雅利安人的身份，盲目地走向灭亡。如果没有这种积极的抵抗，我们将注定永远生活在这个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牢笼中，被我们可耻的敌人为奴役和驯服我们而铸造的枷锁所限制。

积极抵抗是打破束缚我们人民的精神、社会和政治枷锁的一种手段，是使他们摆脱昏昏欲睡状态的一种手段。积极抵抗——只有积极抵抗——才是帮助或带来革命形势的手段，而革命形势是我们赢得或夺取政治和社会权力所必需的，这样我们就能够为自己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的家园，在那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雅利安法律和习俗自由地生活。

简而言之，积极的抵抗和合法的政治组织都是必要的，都是取得胜利所必需的。如果政府因为积极抵抗而出台更多的镇压性法律，直接取缔一个政治组织，那么这只会加强我们的努力。一个政治组织的优秀领导者，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会有技巧、有能力迎接这样的挑战，必要时会简单地重新命名这样一个组织，或者创建另一个组织，继续按照敌人制定的规则巧妙地玩弄政治游戏。

在我们有这样一位领袖之前，现有的或将要建立的政治组织都将收效甚微，当然也不会实现我们所需要的革命、社会和政治力量。因此，这些政治组织现在用来反对积极抵抗的论点是无关紧要的。

必须重申的是，鉴于我们的处境，鉴于我们被迫生活在镇压性暴政之下的险恶性质，积极抵抗不仅在道义上是正当的，而且是一种责任。

现实情况是，我们的人民需要一场革命、一场战争或一个制度的崩溃，来把他们从昏睡、昏迷和颓废中唤醒：再次唤起他们祖先战士血液中的热血。他们需要再次面对艰难的现实生活；需要做出艰难的、改变生活的、威胁生命的决定：需要克服巨大的挑战，因为这能培养人的品格，使男人和女人都发挥出最好的一面。

人们必须在做正确的、必要的、光荣的事与做错误的、不光彩的事之间做出选择。必须打破这个腐朽的物质消费资本主义社会为我们的人民所包围的整个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摧毁我们被迫生活在其中的邪恶的、压迫性的多种族暴政。因为这个暴政通过其 "社会工程 "多种族社会的险恶政策，通过其赤裸裸的资本主义贪婪，正在摧毁我们的种族和土地。我们必须了解、牢记并遵循这样一个真理：这个多种族社会是对我们曾经引以为傲、充满勇士精神的雅利安种族的种族灭绝。

没有战争，没有革命，没有崩溃，除非我们这些有知识、有感情、有理解力的人去创造它。我们的人民不会觉醒，除非我们通过这些事情唤醒他们。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人民的未来确实取决于我们。这个腐朽的物质主义社会的整个结构必须被打破和摧毁，无论采取什么必要和实际的手段，无论我们必须多么无情，因为现在必须采取这

种无情的手段来拯救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土地，使我们能够自由地生活，像我们必须生活的那样：按照我们崇高的战士文化的法则和传统，在我们的同类中生活。

要抵制和推翻暴政，就必须采取行动：受压迫的人民齐心协力。也就是说，必须进行积极的抵抗，并将这种抵抗组织起来。但是，考虑到我们的处境，我们必须以一种有效、务实的方式组织起来。我们必须吸取过去三四十年的教训。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现代抵抗组织。雅利安解放军（ALA）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它适合于我们这个压抑的时代，并建立在实用的、从过去吸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

它由认同其目标和战术的人组成，他们宣誓积极参加它所宣布的战争。通过这种方式认同该组织并宣誓，这些人就成为了这支军队的士兵。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将各自决定执行什么任务、使用什么战术与敌人交战。解放军将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直到战争结束，取得胜利，因为它是一支真正的人民-民族解放军：它是人民在反抗所建立的暴政，他们现在和将来都会受到其宗旨、目标和反抗方法的鼓舞。

因此，没有一个总司令会被敌人除掉；没有一个等级森严的个人会被俘虏和监禁；没有一个中央总部会被袭击和摧毁。其性质决定了它没有一个 "个性"，没有一个 "首领"，因此也没有敌人可以诋毁或散布谣言的人。因此，ALA 不受争吵和 "个性"冲突的影响，这种争吵和 "个性 "冲突曾使许多老式组织蒙受损失，最终使它们失去效力，并很容易被敌人瓦解。

因此，ALA 是一种理念、一种理想，也是一种现实。其性质决定了它永远不会被敌人摧毁，就像它永远不会被间谍和特工渗透一样。只要有一个人坚持它的目标和理想，只要有一个人以它的名义行动，只要有一个人宣誓效忠并成为雅利安解放军的战士，它就会生存下去，不会被我们的敌人征服。

以 ALA 的名义进行的最初可能是个别的小规模抵抗行动将最终取得胜利，因为重要的是行动，重要的是对暴政的积极抵抗。重要的是，无论需要多长时间，这些抵抗行动都要持续下去。

重要的是，其他人受到这些抵抗行为的启发，也会有所行动。

ALA 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那些积极抵抗的人提供了一种身份、一种结构、一种目的，以及一种与其他与我们的占领国政府作战的同志团结一致的感觉。**

这个词（孤狼抵抗运动）比无领导抵抗运动更可取，因为这些人要想有效和体面地行动，就必须服从雅利安解放军（ALA）这个组织的领导、战略和战术。

要光荣地执行独狼抵抗战术，个人必须以自己的名誉宣誓效忠 ALA，并在进行任何活动或行动时佩戴 ALA 徽章（即死神头像）和《规章制度》中规定的臂章。这样，此人就是代表 ALA 行事的士兵，如果因任何原因被俘或入狱，可以要求按照战争规则（此处指《日内瓦公约》）作为战俘对待，因为 ALA 已对我们的占领政府公开宣战。

这些人没有必要与军队中的任何人进行直接的个人接触：事实上，这样做不仅会适得其反，而且有违《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独狼式抵抗

这包括由一群人组成一个积极的 ALA 单元：即积极服务单元（ASU），然后决定开展哪些活动或行动。这样一个积极服务单位应由三到七人左右组成。

重要的是，这些人要成为长期的朋友或战友：ASU 中的每个人都要了解其他每个人的背景和详细的生活史，从而对他们充满信心和信任。理想的情况是，所有的人都住得很近，因为他们会对试图加入他们的外来人员产生怀疑。如果个人愿意，他们可以在 ASU 的其他人面前宣誓或重申誓言。

我以我的荣誉起誓，我将履行雅利安解放军士兵的职责，即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为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雅利安家园而战斗，在那里，我的人民可以按照雅利安的习俗和法律生活。

我以自己的荣誉起誓，忠于我在雅利安解放军中的战友，因为我发誓遵守雅利安解放军的规章制度。

1. 该组织的名称应为雅利安解放军。
2. 该组织的宗旨是维护雅利安人的生活方式，倡导雅利安人的价值观——荣誉、忠诚和对人民的责任，并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积极打击所有反对这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人，以及所有试图压迫雅利安人的人，从而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雅利安家园，让雅利安人能够按照自己的习俗和法律生活。
3. 雅利安解放军的徽章为死神头像，该徽章与佩戴在右臂上的黑色臂章共同构成雅利安解放军的制服。士兵在服现役期间必须穿着这套制服。
4. 宣誓效忠即成为雅利安解放军士兵。从那时起，士兵将被视为适合服现役。
5. 所有士兵都必须努力履行职责，为实现雅利安解放军的目标而奋斗。这包括作为雅利安解放军士兵积极服役，积极服役是指根据环境和现役士兵的情况，在任何合适的时间，以任何合适的战术方法和手段积极与敌人交战。
6. 现役士兵只有通过 "退出现役声明 "才能退出现役，并从雅利安解放军退伍。
7. 所有士兵在公共场合都应表现出雅利安战士应有的荣誉感。

[我在此声明，从 [说明日期] 起，我将停止服现役，不再是雅利安解放军士兵。]

我们雅利安解放军在此宣布，我们与统治我们这片土地的反雅利安占领政府之间存在战争状态，该政府通过其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已经并正在推动压制和摧毁我们的雅利安文化、我们的雅利安生活方式，并与其他反雅利安政府和其他反雅利安势力合作，积极推动和鼓励对我们高贵的雅利安种族进行种族灭绝。

因此，为了我们的荣誉、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我们决心战斗。

士兵的定义是军队成员，宣誓效忠后即成为士兵。宣誓后，他们便受所加入军队的规章制度约束。

军队的定义是由士兵组成的有组织的团体；组织是指提供结构；构架和安排秩序；作出安排。

ALA 被组织成活跃的细胞（ASU's）和单个的 "独狼 "活动家，并提供结构（目标、方法、战术、效忠等），将这些 ASU's 和活动家引向共同的敌人。

以下内容是为民族社会主义革命者准备的，也就是说，是为那些准备像真正的战士一样生活和行动，并在必要时献出生命的人准备的。真正的战士是有行动的人，是真正从事战争行为的人，而精英战士则是准备采取任何必要行动以取得或帮助取得战争

胜利的人。我们雅利安人现在必须与真正的敌人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以夺回被敌人夺走的自由。

这些敌人暴虐地统治着我们雅利安人自己的土地，我们被迫生活在一个暴虐的占领政府之下。民族社会主义革命者是反抗占领政府的自由战士。如今，我们必须打一场圣战——我们必须对我们自由事业的正义性抱有狂热的信仰，因为我们
我们必须明白，空谈、以和平手段寻求自由的时代已经过去。

目前，我们的圣战所能采取的最有效形式就是对我们的敌人采取秘密的直接行动，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在哪里。必须给我们的敌人上一课，从现在起每年都要提醒他们。我们的这些敌人必须学会在生命的恐惧中前行。

这种直接行动是我们夺回自由、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建立一个真正的雅利安家园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这一政策并非出于绝望，也不是因为我们放弃了希望。我们只是认识到，五十多年来一直奉行的 "和平竞选策略 "已经失败。本手册第二部分概述的这一新战略是我们赢得胜利的手段。

现在是我们种族的关键时刻——要么我们奋起抗争，赢回自由，要么我们忍受压迫，最终让我们的种族灭绝。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遵循错误的战略，使用错误的战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试图遵守系统的规则和法律；这些规则和法律是我们的敌人制定的，目的是控制我们，奴役我们的人民。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试图玩弄我们敌人的选举游戏，希望取得成功，让自己被选举上台。每当我们似乎取得成功时，我们的敌人就会改变这个游戏的规则——出台越来越多的专制法律来限制我们的言论和写作，阻止我们为自己辩护，阻止我们举行公共会议、集会和游行。

与我们不光彩的作弊对手玩这种单方面游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的敌人已经向我们宣战，现在我们也公开向他们宣战。
我们准备把战斗带到他们的家中、工作场所——任何地方。

如果我们有勇气采取行动——如果必要的话，无情地采取行动——那么我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取得胜利。如果我们以任何理由拒绝做现在必须做的事，那么我们就活该被奴役、被欺凌，活该我们的种族被淘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我们的自由和未来取决于这个选择。

为了雅利安人的自由，本文件可以不经允许全部或部分翻印、再版、复制、翻译和传播。

有四种主要的秘密直接行动方法适用于我们所考虑的情况——即适用于试图削弱/推翻/破坏/稳定当前反雅利安体系，从而制造或挑起革命局势的 NS 团体。这四种方法是

(1) 暗杀个人；(2) 恐怖轰炸
(包括可能造成平民伤亡的目标)；

(3) 破坏本系统的基础设施，如道路、通信、电视发射台、机场、铁路、发电站、食品供应、企业、商店、金融机构等；

(4) 针对我们敌人的恐怖活动——不分青红皂白或其他。我们将逐一讨论这些方法。不过，在此之前，有必要先谈谈任何直接行动之后的逃跑和规避问题。

一旦采取任何直接行动，有关人员必须尽快离开现场。在对特定目标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应执行一次或多次侦察任务，以了解 "地形 "并确定可能的逃生路线。参与行动的每个人都必须在行动前决定，如果行动出了差错，特别是受到警察或 "公众 "的质疑，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必须决定必要时是否使用致命武力，如果决定使用致命武力逃跑或逃避追捕，则必须做好准备。

这意味着要携带某种武器，最好是枪支。在行动之前，还必须决定是否公开穿戴适当的组织制服和徽章，以及是否公开携带武器。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穿着这样的制服并公开携带武器，那么一旦被抓获或俘虏，相关人员就可以根据《日内瓦公约》要求被视为 "战俘"——因为他们属于一个组织，穿着这样的制服并公开携带武器，从技术上讲，他们就是士兵，可以要求获得这样的待遇。不过，该组织或军队必须有适当的组织结构——有规章制度——因为它必须公开宣战并指明敌人。

如果有关人员不属于任何组织，或他们或他们的组织出于某种原因决定不采取 上述行动，那么他们应做好准备——在采取任何严重行动（如暗杀或安放爆炸装置）之 后——处理（最好是焚烧）所穿衣物，包括鞋袜和手套。在武器方面，有关人员必须决定是处置这些武器，还是将其藏起来，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最好是处置武器，但如果这些武器供不应求或将再次需要，这可能并不实际。

暗杀是一种有效的隐蔽方法，但在某些情况下有一个明显的缺点。这就是，如果目标是 "硬目标"，暗杀者很可能在行动后被抓或被杀。合适的目标分为两类：(1) 硬目标，(2) 软目标。

软目标是指那些没有任何保镖或安全程序保护的个人。这类目标大多过着 "普通 "的生活。如果事先制定了适当的计划（逃跑和规避），暗杀这类目标和逃跑一样容易。软目标包括我们 NS 事业的敌人——例如：

(1) 共产主义/反民族社会主义分子；(2) 犹太复国主义者；

(3) 反 NS 组织的成员和官员；(4) 毒品贩子等腐朽败类；

(5) 积极反对或公开反对我们事业的地方和国家政客；

(6) 判同志入狱的法官（如果他们没有警察保护）和地方法官；(7) 参与反 NS 活动的警察，如调查 NS 运动、逮捕同志等； (8) 参与危害我们的种族和自由的计划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官员； (9) 公开反对我们的事业或做出危害我们的种族和自由的事情的 "媒体"和娱乐"人物"。

硬目标是指那些具有 "高公众形象 "并担任某种官方或政府职务的个人，他们有权获得警察或保镖的保护。这些人通常会尽量保持其日常行动的秘密性和安全性。

尽管如此，暗杀这类目标仍然相对容易——尽管暗杀后很难或不可能逃脱。由于工作性质或官方职责，硬目标必须公开露面，这些露面和旅行为意志坚定的枪手提供了机会。例如，英国首相就是一个硬目标。首相受到武装警察的保护。在公开场合露面时，这些警察和其他人会尽量与 "公众 "保持距离，并在目标周围拉起保护警戒线。但在很多情况下（例如在竞选期间），目标会非常接近公众。只要枪手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这往往是运气或等待合适机会的问题——那么使用手枪近距离攻

击是可行的。合适的硬目标包括(1) 公开反对我们的事业或做出有害于我们的种族和自由的事情的民选官员——如国会议员、首相、政府部长；
(2) 以反 NS 的方式行事的外国官员——如以色列、美国等国的大使和使馆人员； (3) 高级警官（如警察局长）
(4) 判同志入狱的法官（如果他们或他们的家有人看守）

最实用的暗杀方式是由一名枪手靠近目标，在近距离用手枪发射几发子弹。行动前应检查和清洁枪支，如果可能，应使用手工装填的子弹——使用适量火药减慢子弹的速度，这样子弹一旦进入人体，就会停留在那里，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如果可能，应使用软鼻子弹，因为这种子弹在体内会破裂，造成更大的伤害。一般来说，对于没有经验的枪手来说，最好瞄准上半身（目标区域较大）并发射几发子弹。如果枪手和目标都在移动，瞄准头部可能会比较困难——如果选择头部，那么两枪几乎肯定会致命。对于软目标和硬目标，手枪的一个很好的替代品是去掉大部分枪托的 "锯断式"霰弹枪——双管霰弹枪通常比手枪更容易获得。

目前最好不要考虑用步枪对硬目标进行狙击，尽管对软目标进行狙击非常有用。由于两个主要原因，狙击手很难成功攻击硬目标。首先，通常只能一枪毙命，因此必须具备高超的枪法。其次，警方和安全部门会设法占领或掩护狙击手可能使用的任何有利位置。第三个原因是，这种精确的攻击需要一支相当专业的步枪——一支精确度高、可以拆卸从而在携带时不会引起过分怀疑的步枪。必须重申的是，近距离攻击硬目标意味着刺客几乎没有逃脱的机会。刺客必须承认，他们要么被俘（可能受伤），要么被杀。正因为如此，对硬目标进行近距离暗杀需要一种特殊的人——专心致志、勇敢无畏的狂热分子。对于软目标的袭击，刺客必须在袭击前计划好逃跑。

在任何类型的暗杀成功后，组织中的其他同志都必须发表声明，赞扬组织，并在必要时说明原因。这可以是给某些报纸或电台的新闻编辑室打一个电话，也可以是向这些地方发送一份印刷声明。

目前，在暗杀方面可以采取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是，在未来一两年内瞄准并杀死几个软目标。成功的暗杀行动将使该组织为人所知，受到尊重和敬畏。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在目标类型中制造恐惧气氛。在这方面，最好的软目标类型是

（1）NS 的敌人——特别是那些活跃在反 NS 组织中的人；

（2）毒品贩子和（3）那些参与对我们的人民进行街头袭击的人；那些公开反对 NS 或做出有害于我们的种族和自由的事情（如支持一些新的反雅利安人法律或鼓励种族混合）的政客。

(2)和(3)提供了极好的宣传材料——该组织可以发表声明称，**这些腐朽的反雅利安人渣终于被绳之以法。**

在实际操作层面，组织必须收集有关合适目标的情报，获取合适的武器，并准备行动后的声明。然后，可以向各个秘密小组提供一份目标清单，并配备合适的武器。

恐怖爆炸——不同于使用爆炸装置破坏建筑物和设施（见下文）——基本上涉及在 "公共场所 "放置爆炸装置，目的是造成平民/军人伤亡，或对公共设施和建筑物造成破坏。这种持续轰炸行动的主要目的是：
(1) 在公众中制造不确定和恐惧的气氛；

(2) 通过为应对威胁而采取的安全措施给公众带来不便；
(3) 促使政府动用重要资源——警察、军事、情报和财政资源——来应对威胁；
(4) 打击政府的士气；
(5) 将战争带入敌人占领的城镇；
(6) 制造并维持一种战争正在进行的意识，反对政府的人准备为他们的事业而行动和牺牲。

要使这种行动被视为成功，只需实现其中的部分目标即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当一场全面战争或圣战正在进行，当一场战争已经公开宣布时，这种恐怖轰炸战术才是合理的。

至于是否使用——以及宣传上的弊端是否大于战术上的好处——则是该组织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问题。但是，使用这种战术的秘密组织与授权军队

(a) 从飞机上向城市投掷炸弹的政府在道义上并无根本区别；
(b) 在平民居住的城镇作战；
(c) 授权其警察和安全部门以恐怖手段无情地追捕其对手。

当一个秘密组织安放炸弹炸死或可能炸死平民时，政府沉溺于 "道德义愤"，这完全是虚伪的——**这样一个政府的成员，以及协助这样一个政府的军队和文职部队的成员，随时准备并愿意对他们的敌人使用 "致命武力"，无论他们是否是平民。**

开展轰炸行动有两种主要方式——可以结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第一种是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在公共场所安放爆炸装置，装置爆炸后造成平民伤亡。第二种是在公共场所安放爆炸装置，并发出警告，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清理该区域，但没有足够的时间找到爆炸装置并确保其安全。在第二种情况下，可以在装置上安装 "防破坏 "装置，警告通常是在炸弹安放完毕、投弹者离开现场之后发出的（通常延迟半小时左右）。在实际操作方面，需要获取爆炸物，掌握制造炸弹的技能。除了遥控、精确的定时延时和安全（对炸弹制造者而言）的防破坏装置外，这些技能相对简单（手册仍然很容易获得）。后者是相当复杂的技能，必须向经验丰富的炸弹制造者学习，或者通过反复试验才能掌握（这是有风险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从 "化肥/糖 "炸弹或简单的 "钉子炸弹"开始。

其目的有两个(1)从内部破坏制度——制造混乱，使普通雅利安人的日常生活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剥夺他们一些现代生活的舒适，因为正是这些舒适部分地鼓励和促成了他们奴役、驯服的家庭式生活；(2)从财政和军事/安全方面消耗政府的资源——迫使政府修复/替换被破坏或摧毁的东西，并投入资金和人力保护其基础设施。

实际操作主要涉及使用爆炸装置破坏/摧毁易受攻击的结构和设施。合适的目标有

(1) 电力塔——尤其是通往大城市的电力塔；(2) 电视发射台和中继桅杆；(3) 水泵站；(4) 电力变电站；(5) 高速公路和主干道（尤其是桥梁和 "立交桥"）；(6) 铁路(尤其是信号灯和桥梁)；(7) 食品配送中心/批发商；(8) 地下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目前，这些管道大多在穿过公路或河流的地方作标记]；(9) 大型国家和国际工厂及工业综合体；(10) 室内购物中心；(11) 炼油厂；(12) 化工厂；
(13) 商业仓库和配送中心；(14) 污水处理厂；(15) 机场；(16) 集装箱配送中心；(17) 燃料配送中心。

这种破坏活动必须定期进行，至少每六个月左右一次，因为它需要维持数年之久。此外，所选目标的类型也必须定期更换，例如，某月用爆炸装置攻击电塔，下个月攻击电视转播桅杆，接着是高速公路桥梁，然后是配送中心。

大多数目标在被装置破坏或摧毁时不会对生命构成威胁，因此无需发出警告。对于爆炸可能造成生命损失的目标，组织必须决定是否在装置爆炸前发出警告（如选择高速公路桥梁）。如果决定发出警告，则需要在装置中安装某种延迟引爆或遥控装置。因此，如果选择一座桥，该装置可以放在被遗弃的车辆中。

需要理解的是，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对设施和结构造成破坏和毁坏。其目的并不是要特别伤害或杀害平民（甚至是军队的"拆弹"人员）。因此，在选择目标时应尽可能避免造成此类伤害。因此，应选择没有工人的建筑物等。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选择诸如中继桅杆、铁塔等孤立目标时。- 无需隐藏爆炸装置，也无需安装防破坏装置。只需将爆炸装置放置在能造成最大破坏的地方，然后 "现场"引爆或安装一个简单的延时装置即可。

在实际操作中，需要获取爆炸物，并收集有关合适目标的情报。最初选择的目标可以是那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装置、如果没有无线遥控器或电子定时引爆器，也能造成破坏。合适的初始目标包括电塔、电视中继桅杆、输油管（一般埋在地下六英尺以上，因此需要挖掘）等。

在实际操作层面，近期的最佳战略如下。

(1) 暗杀几个软目标；(2) 针对易受攻击的低风险目标使用爆炸装置，开始破坏活动。一旦完成了这些初步工作，并获得了更多的武器和培训，就可以开始长期的破坏、暗杀和叛乱活动，目的是创造必要的革命形势。要知道，这场运动至少要坚持五到十年才能取得成功。

该组织需要有切实可行的目标，每次行动取得成功时，它都可以要求政府实现这些目标——这些目标被理解为该组织为之奋斗的一些目标。这些目标必须是具体的，因为从理论上讲，这些目标可以得到政府的承认。

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求政府公开谴责大屠杀谎言。

另一个目标是要求雅利安人有权在雅利安人专用学校教育子女。

另一个目标是要求允许雅利安人在公共场合携带武器进行自卫。该组织为之奋斗的首要目标，也是所有类似组织和 NS 个人为之奋斗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雅利安家园，在那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然法则和雅利安习俗，和平地生活在自己的同类中间。

在这个家园里，我们自己的雅利安文化可以发扬光大，我们的孩子可以以雅利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方式接受教育。每当成功开展一项行动时，都必须让人们了解这一首要目标。

民族社会主义：一场左翼运动

海因里希-里斯-克努德森

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是极右翼分子，他们也很少犹豫这样称呼自己是否妥当。然而，世界民族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官方政策是避免使用“右翼”一词，

声称民族社会主义不符合“右”和“左”的模式，而应该被视为超越这种区别。这种做法无疑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在当前斗争的背景下，重新考虑整个政治派别问题并明确“右”和“左”的含义，也许是一个好主意。

从历史上看，用于指称政治观点的“右”和“左”这两个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前，当时那些希望或多或少保持旧政府制度原样的人坐在国民议会的右边，而那些希望进行更激进变革的人坐在左边。因此，“右”这个词指的是保守派，“左”指的是革命派——这些术语后来变得众所周知和使用。

然而，“保守派”和“革命派”这两个词是相对的，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会有特定的意义。以前的革命者，例如 19 世纪的欧洲民族自由主义者，今天看起来并不十分具有革命性——恰恰相反！——就像今天的保守派在 200 年前会被认为非常具有革命性一样。1917 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权时，他们是以革命者的身份推翻反动和腐朽的政权的，而 70 年过去，今天的苏共也成为了面临新革命挑战的保守派。

在我们这个时代，传统的左翼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到了“左翼”一词本身都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究其本源，任何革命者都是左翼分子——只是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遇到什么竞争，所以他们能够完美挪用这个词。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是右翼，由想要保留现存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西方所谓的基督教文明捍卫者、及其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反动派组成。右翼分子支持传统的爱国价值观：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和好公民，他们捍卫宪法，忠于自己的国家和君主（如果他们有的话）。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伟大，只要他们认为其他国家威胁到自己的国内秩序——即使是已经腐败和堕落的秩序，他们愿意与任何其他国家开战——即使这意味着对另一个白人国家发动核战争。他们有的支持以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而不考虑后果，但他们也对政治中的自由主义趋势以及移民和种族融合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担心这种变化可能扰乱他们习以为常的秩序。

现在，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在这个定义中的位置似乎非常清楚：我们是左翼分子——毫无疑问！我们站在建制的对立面，我们不信任那个导致我们的人民陷入当今苦难的制度！我们不想支持任何导致白人国家之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次小规模战争、核竞赛、环境污染、失业、年轻人颓废、对未来失去信心、吸毒、色情以及当今表现出的所有其他形式的彻底堕落。

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想要最彻底的改变：我们要彻底推翻整个旧秩序！而马克思主义与旧秩序有着相同的平等主义哲学，并将自己定义为一种唯物主义运动，其目标仅仅只是重新分配物质财富。

民族社会主义寻求建立一个全新的秩序，该秩序以理想主义和对自然法则的深刻尊重为基础。这无疑是本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因此非常左翼！——而且它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相比，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伪革命思想，由基督教发明并得到自由民主的支持：如果人人生而平等，那为什么不把所有的财富平等地分配给所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只是我们想要摧毁的旧秩序的一部分。**

如果民族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左翼运动，那么民族社会主义者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迎合传统的右翼态度，却避开了所有向左翼开放的机会，这么做显然是违背

根本的。难怪所有以此为基础创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尝试都完全失败了。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任何东西的首要前提是，一个人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实现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它。想要创作一件艺术品的雕塑家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然后按照他的构思来雕刻它。而不能只是用凿子在大理石上随意地画一画，谁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因此，认识到民族社会主义不仅是极右的一种形式至关重要。

我们队伍中任何仍有这种想法的人都应该重新研究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找到它真正的含义——如果他没有精力或能力这样做，他应该自觉地走向出口。我们的运动没有空间容纳沮丧的仇恨者和宗教梦想家，只有忠诚的民族社会主义革命者！

让我们面对现实：右翼分子大多是一群可怜的、思想非常不明确的人。他们意识到有些事情不对劲。但他们拒绝脱离旧秩序。相反，他们拼命地坚持旧秩序，希望恢复到 75 或 100 年前的状况，认为这样就能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今天所处的困境正是我们 100 年前的制度的必然结果——那个制度的基础不够好，不够稳定，无法保护我们免受当前发展的影响。现在我们大多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基督教思想，它的平等主义哲学和异己、不自然的教义夺走了我们人民的灵魂，但右翼却认为它是抵御他们周围所见的衰落的盾牌。当右翼所有阻止发展的徒劳都失败时，他们就会感到沮丧，变成纯粹的仇恨者，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愿景，也没有意识形态。

历史事实是，因循守旧者从未产生过任何好东西。如果没有哥白尼、开普勒、布鲁诺和伽利略这样的革命者，我们仍然会相信地球是平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当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时，当权者并没有试图解决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问题，而是继续无情地剥削新兴的工人阶级——从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所表达的革命思想。而我们在过去 100 年里看到的所有必要和公正的社会进步都是在左翼的强力压力下实现的，而右翼保守派则不断撤退，可怜地试图为自己保留尽可能多的东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推翻既定制度的努力本身都是好的。如果人类成功创造了一种新的自然秩序，这种秩序不会变成化石而僵化，而是保持着生命体的活力，并在自然法则的范围内发展，采用新的科学和哲学见解来理解生命的本质，而不拘泥于过时的观念，那么试图废除这种秩序并 恢复到利己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督教或任何其他非自然哲学，这时候他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反动派。

善与恶只能根据自然法则来判断——越接近自然法则越好。

毫无疑问，民族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鸿沟。但同样，民族社会主义者也肯定不是右翼分子。民族社会主义与右翼分子唯一的共同点似乎是种族问题。但在这里，双方的观点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右翼分子认为，白种人本身就具有绝对的价值，这使得雅利安人种高于所有其他生物，并赋予其对世界为所欲为的权利。然而，**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种族的生命和直接福祉。我们提倡种族隔离，我们认为白种人是整个宇宙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我们保护它的愿望与我们保护整个自然环境（包括其他人类种族）的愿望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出于对大自然不可思议的智慧的深深敬意。**

毫无疑问，我们种族的智力潜力巨大，但如果不按照自然法则正确使用，我们的能力就毫无价值。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加入宣称“白人至上”的合唱，却忽视了我们种

族已经在至少 2000 年内拥有绝对权力这一可悲的事实。正是这种权力导致了我们今天的社会。

因此，我们不赞同右翼持续的技术和经济扩张的理念，这种扩张已经导致了空气和水的污染，使世界大片地区不再适合所有物种生存——这一发展意味着大气中的臭氧层被系统地破坏，后代将受到威胁生命的辐射，曾经为我们提供氧气的热带森林被砍伐，为工业增长腾出空间，沙漠被灌溉，导致肥沃地区的地下水位下降，进而变成沙漠。所有这些都是雅利安天才的成果，没有这些天才就不会存在——这些天才并没有被用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只是为了满足人类当下的贪婪，只顾现在过上幸福的物质生活，而不顾未来。这种致命的趋势，按照自然法则的标准，无疑已经使西方工业化的白人国家变成了比任何第三世界所谓的原始社会都更加堕落的国家，而右翼势力则大力支持这种趋势，他们似乎认为只要驱逐黑人、犹太人和船民，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知道，这本身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我们的目标是彻底的精神重生，而我们当前的目标是确定和建立这种重生的基础——这是我们种族斗争的意义。这场斗争不应被理解为与其他种族的战争，而应被理解为对我们自己种族堕落的无情反抗。除非我们能够克服这种堕落并找到回归自然价值的道路，否则孤立地呼吁种族作为新社会的基础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的种族只能在现有制度下生存，那么我们不希望它生存下去，因为那样的话，它就只代表了最粗暴的反自然堕落形式。“白人权力”的主张只有在我们希望重新激活自然的力量时才会有意义，因为这种力量潜伏在白人的天才中，而白人的职责就是利用这种力量来维护生命的原则。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任何形式的多种族主义。种族是自然秩序的基石之一，因此必须像所有其他自然原则一样得到捍卫。白种人让世界滑向灾难的边缘，除非他们能够认识到，通过用自然和精神价值观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物质消费社会观，否则他们注定要灭亡，只会在绝对衰落的过程中摧毁整个地球。

当然，民族社会主义者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回到石器时代；但我们确实认为，我们从大自然中索取的东西永远不应该多于我们给予它的回报。生活质量对我们来说应该比物质产品的质量更重要。

在当今这个幻灭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们抗议统治秩序。然而，他们没有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者，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意识到民族社会主义——而且只有民族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当今的关键问题。相反，他们允许他们的运动被马克思主义者接管，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比我们更擅长推销他们的产品，尽管事实上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曾经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这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本身就是唯物主义的，与自然价值毫不相关。**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利用群众对当权者的不满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满的个人本身根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民族社会主义者四处奔走，试图赢得传统右翼分子的小小边缘群体的支持，他们有着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各种主张，有着臭名昭著的狂妄自大，缺乏对事业的坚定——这是因为他们总是处于被动防御状态，试图挽救那些必然要放弃的东西。另一面，马克思主义者在公民中站稳了脚跟，同时，一部分人出于对地球未来的关怀，向马克思主义妥协，放弃了无限的唯物质至上而采取科学发展。

然而这些人大多没有意识到，维护自然秩序需要采取比控制污染、废除核能和原子弹更深远的措施。他们没有看到，这还需要种族隔离和普遍的精神复兴，才能让人类回归生命之源。

然而，如果他们获得必要的信息和洞察力，而不是被愚蠢的马克思主义教义所左右，他们也可以学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们不得不看到这一点。这些人是理想主义者，崇尚自然，因此他们与我们在一起。作为行动者，他们也比许多幻想破灭的年轻人更有价值。**他们自称民族社会主义者，以此试图提升他们的自尊心，用自封的制服和荒谬的军衔和头衔来隐藏他们的个人问题和不安全感。但时代决定了现在我们的主要宣传对象已经不受当年冲锋队和仇恨宣传的吸引，因为所有这些都证实了他们对民族社会主义的负面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们谈论种族的重要性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看透种族问题的程度。所以必须从他们所在的立场和他们当前关心的问题入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民族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挖掘出关于环境问题的优质解决方案，并主动深入到这些人中，团结起来抗议核武器、污染和核战争。我们不能指望环保主义者来找我们，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民族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抢先取得他们，他们就会被马克思主义的大手卷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他们永远无法意识到自己态度的全部后果。

现在这些新的抗议者对我们怀有敌意——仅仅是因为几十年来敌对的宣传，这种负面宣传不仅使健全而聪明的人远离任何公开打出民族社会主义旗号的运动，而且还成功地吸引了大量低俗引流狗加入我们的运动，这些人太符合他们对民族社会主义的负面宣传形象了，他们加入我们恰恰是是因为他们想活出这个“负面”形象。他们觉得民族社会主义很潮很酷，他们想成为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野兽，就像他们从无数好莱坞电影和垃圾新闻中了解到的可怕的“纳粹”一样。可悲的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欢迎这样的精神病患者加入我们的队伍，长期以来，我们未能与其他做同样事情的组织划清界限。

有人自称是民族社会主义者，挥舞着纳粹符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我们的同志！许多组织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要他们继续这样做，他们就注定要失败——不幸的是，如果我们不抓住一切机会公开谴责他们，我们也注定要失败。人们常说，我们不应该在“敌人面前洗我们的脏衣服”，所有的“内部纷争”都应该留在我们自己的墙内。然而，现在这些人不是我们的衣服，也不是“内部纷争”，这样的人不属于我们——这是一项必要的清理行动，必须公开进行。

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不是犹太人或共产党员，而是那些自称民族社会主义者，却通过自己的愚蠢的行为玷污民族社会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的人，他们证实了我们的敌人向公众传达的对我们思想的扭曲印象。

事实上，我们对这些人既没有忠诚，也没有友谊。相反，我们必须摆脱与他们的任何联系，并竭尽全力向人们表明他们不属于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去纠正那些我们的刻板印象——“我们应该拥抱任何挥舞纳粹标志的右翼分子，我们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有左翼的任何地方”，因为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被告知我们是右翼分子。因此，我们应该向他们表明他们被误导了。至少能多让一些人听我们说的话，接纳我

们的观点。此外，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被误导时，他们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也会更加深入。

1989 年 4 月 20 日希特勒诞辰 100 周年讲话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的是，我们不是一个历史协会。许多民族社会主义者似乎认为，我们将复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并将其移植到世界其他地区。这正是我们的敌人希望我们表现出来的样子！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的德国代表着民族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实践——而且是一种并不完全成功的实践！——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组织一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它可以激励我们，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但我们不能复刻它。它是一场实验，旨在解决当时德国人民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但今天的人们不一定认为这些问题同样重要。

大约 60 年前，当希特勒开始着手重组德国的历史使命时，整个德国民族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都处于瘫痪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德国不仅失去了所有殖民地，还失去了其欧洲领土的很大一部分，那里居住着数百万德国人，他们发现自己与祖国隔绝，在外国过着少数民族的悲惨生活，而这些国家只想消灭他们。德国剩下的部分完全非军事化，征服者提出的巨额赔款造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通货膨胀，粉碎了经济复苏的任何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少数犹太移民逐渐控制了支离破碎的经济，以及整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与此相比，所有关于当前经济危机的谈论都是荒谬的。

从物质上讲，现在的西方的任何国家和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都比 20 世纪 20 年代的德国富裕得多。如今，贫穷问题也许只是卖掉家用车，也许搬到更便宜的公寓。而在德国，问题只是如何生存下去。

然而，从道德上讲，我们面临的威胁比希特勒严重得多。他接手的德国仍然是一个相当同质的国家，大多数人都拥有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和规范，对国家的文化传统有着共同的信仰。他们想重新获得昔日的权力——他们想变得强大并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希特勒不必告诉他们要爱自己的人民和种族，他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不一定都符合民族社会主义哲学，但它们是建立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没有太多困难，因此希特勒可以将他的政治宣传集中在更平凡的事情上。

希特勒生活在一个彻底革命的时代，工作和食物的需求至关重要，他知道一个能够保障这些需求的计划将会为他带来选民的支持，从而使他获得权力，这样他就可以尝试实现他的政治愿景，当然，他的政治愿景远远超出了对物质的直接需求。

然而，众所周知，民族社会主义并不是当时德国唯一的革命力量。共产党的优势与希特勒很大程度相同：饥饿的民众为了生存愿意做任何事情。他们还比希特勒有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借鉴俄国革命的成功。希特勒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他的斗争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将他的运动与过去任何强大的右翼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如君主制或教会。他的方法完全是左翼的，同样反对当权派和共产党。**当他最终赢得共产党的支持时，他并不是通过打击他们让他们保持沉默，而是通过提出与共产党相同的问题并指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来耗尽他们的支持——所有这些都让德国工人相信，希特勒**

可以成为比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台尔曼更有魅力、更有能力的领导人。他用当时的语言与人们谈论他们关心的问题，并采取了军事作风，这在一个当时充满了退伍军人的国家很受欢迎，因为退伍军人有理由感到被魏玛政府背叛，而且在吸纳众多共产党团体支持也相当有效，因为他们使用的极权主义风格和语言与希特勒非常相似。

如今，试图模仿希特勒的风格无异于政治自杀。事实上，迄今为止，所有尝试过这种做法的团体都以失败告终。照搬希特勒的宣传材料，将其翻译、重印或模仿成其他内容，这简直是荒谬至极。希特勒迎合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群众。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当前情况下，套用当年德国的道路没有办法赢得群众的支持。今天，我们正在寻找少数理想主义者。要找到他们，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那些与我们要找的人有关的问题：污染、核威胁、跨国资本主义的诅咒等。希特勒同时代的人对这些问题大多一无所知——但这并不是不解决它们的理由！我们的世界比 50 年前复杂得多，任何未能考虑到这一点的政治运动都会沦为过时的化石。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通常倾向于过多地谈论和撰写有关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文章。尽管我们也许能够展示希特勒为德国所做的一切好事，但我们今天要寻找的人对 50 年前发生的事情并不十分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时代——以及未来。

我们如此执着于过去，原因之一当然是，德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应用民族社会主义的典范，而那短短的 12 年代表着我们运动所拥有的唯一荣耀。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充满屈辱和迫害的艰难时代，我们需要它。我们需要它来向我们自己表明，尽管面临种种逆境，民族社会主义主义曾经胜利过，他们曾经来过。**

然而，如果这种对过去的尊重和钦佩不是产生富有成效的灵感，而是沉湎于对过去辉煌的怀念，而是对 NSDAP 的服饰、制服、标志、军衔、发型，甚至 30 年代的语言风格的盲目热爱，那就极其危险了。重要的不是外表，而是内在的理念，我们必须从那里继续前进。像希特勒一样，我们必须避免被历史所困。**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展示民族社会主义如何解决今天的失业问题——而不仅仅是讨论希特勒在1933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民族社会主义背后的思想超越了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本身。

希特勒曾将其应用于更早的时代和地点；我们必须将其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时代和地点。它是永恒的，因为它代表了大自然生存和创造的根本原则。它自古以来就存在，只要宇宙存在，它就会永远存在，无论雅利安人种或人类本身是否存在。人类已经放弃了这一原则，我们的任务是向他表明，人类这样做是不能不受惩罚的，人类目前的所有问题都是由人类自己高于自然的疯狂信念造成的。在这样做时，我们不应该与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有任何联系，就像其他左翼分子与苏联没有任何联系一样。

我们也应该从其他左翼团体的组织方式中学到很多东西。你们普遍高傲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组织是由人类废物组成的。当然，这也许适用于某些团体的追随者，**但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核心是按照一定的质量和奉献精神组织的。成员经常缴纳党费，他们每周必须花一几个晚上进行思想培训和实践活动。**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其成员要求远远超出了我们对我们的成员的期望。这说明了质量问题，也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比我们做得成功得多——尽管他们所宣扬的完全是胡说八道。

然而，在有些民族社会主义者眼中，对于采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方法似乎会产生极大的恐惧，他们担心自己会以某种方式被马克思主义“污染”。他们声称，这会让我们在朋友和敌人中名声扫地。现在，我们的名声肯定已经很坏了——老实说，情况几乎不可能更糟了。但是，只要我们不太关心赢得传统保守派的支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不能区分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表现出缺乏智慧，无论如何，这对我们毫无影响。

我们不能让敌人决定什么是民族社会主义的观点，什么不是，我们当然不能为了取悦那些对我们毫无用处的人，而把所有的好机会都留给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太久——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如此成功并能够接管我们文化和知识生活的大部分领域，而民族社会主义者却总觉得自己有义务对北约、欧洲共同市场、原子弹、资本主义、无限的“自由企业”等说“是”。是时候改变这种情况了 ！让我们不要继续做人们期望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做民族社会主义教我们做的事情——而不是做别人以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这方面，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是，许多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其传统思想中已经成为最糟糕的右翼反共宣传的牺牲品。

对人类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莫斯科、北京或哈瓦那。你绝对不能把当今世界的糟糕状况全部归咎于共产党——毒品滥用、犯罪、色情、核竞赛、种族融合、污染等等。罪魁祸首是我们自己的现行政府制度——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犹太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罪恶是由我们自己国家那腐败和道德败坏的政客和股票经纪人造成的，而我们，世界上的雅利安民族，自己让它们变得如此糟糕。对地球生存构成威胁的不是外国政府，而是现行制度，没有这个制度，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或任何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如果西方没有向苏联提供必要的武器和技术，共产主义就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消灭。即使在今天，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如果没有西方政府和银行家的持续支持，也会立即解体，这些银行家通过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和借钱给他们赚取巨额财富。共产党当然知道这一点，他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包括管控东欧和确保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权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

有趣的是，跨国公司在与共产主义集团的贸易中赚取了巨额利润，而我们的政客们却试图说服我们，生产武器是抵御共产主义的必需品——就好像在核战争中毁灭所有生命就能保卫一切一样。这当然是极其荒谬的——但这仍然是右翼如此大力支持的政治和金融体系。

毫无疑问，共产主义肯定会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快的事情，但它不会是世界末日。相反，基督教自由民主倒是很可能会！共产主义东欧的种族纯度远高于西方任何地方——仅仅是因为他们低效的经济体系无法吸引大规模的第三世界移民；而苏联的主导民族俄罗斯人的种族意识肯定比自由派和保守派美国政客的愿景更能保证雅利安人种的生存前景。当然，共产主义在理论上不支持种族原则——但理论和实践是两码事。毫无疑问，西方提供的物质享受在此时此刻更具吸引力，但这种愉快的生活更有可能伴随着一场可能消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滔天洪水。然而，如果西方有健全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存在。他们根本无法独自生存，饥饿的人民将反抗。如果共产党占领西方，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他们的政权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此时，有人可能会大胆地问，我们是否应该废除有关民族社会主义和万字符的所有讨论，并伪装成“真正的”左翼分子，提出一个可以轻易以不同名称向人们兜售的新思想。**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尝试这种方法就是低估了我们的敌人。他们真的不介意这个名字或符号。他们介意的是这个想法，你无法将其伪装得面目全非。我们的敌人总是反对任何对我们的人民有益的事情，那时候他们又会理所当然地给我们扣上“纳粹分子”的帽子。那么我们又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来“证明”我们不是。这将是荒谬的。**

许多组织都曾尝试过，但都没有成功。

只有一条艰难的道路：证明民族社会主义并非人们所想的那样，它是确保地球上生命生存的唯一途径。我们知道我们处于弱势地位，但坦率地说，我们应该庆幸我们不必担心现在就夺取政权。我们根本无法处理它。这是许多民族社会主义者——以及自称民族社会主义者的人——似乎完全忽视的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当我们没有足够的民族社会主义理论家来使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运转时，明天赢得群众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我们需要经济学家、法学家、行政人员、生物学家等，他们也是民族社会主义者。

权力本身绝不能成为目的。我们想要建立新秩序，因为我们想要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更美好的世界不可能凭空而来。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许多受过良好教育、专心致志的人：现在，赢得这些人的支持比在街头打一场必输的架来打动一些偏执者和失败者更为重要。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例子。从一开始就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秩序的实验之所以无法完成，因为一个新国家无法承受来自外界的压力，**阿道夫•希特勒不得不向大量对民族社会主义一窍不通甚至嗤之以鼻的专家妥协。他根本没有时间培训和教育足够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必须集中精力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前赢得人民的支持。我们应该庆幸我们没有这样的担忧。无论如何，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永远不可能赢得革命的胜利，所以让我们集中精力为未来的群众运动奠定坚实的基础。**

然而，让我们现实一点吧。这也可能是一场必败之战。我们无法保证我们一定会赢。说实话，我们除了一个非常模糊的希望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们无法相信我们能赢。

然而，大自然本身可能会将人类从地球表面抹去，因为它忽视了宇宙法则。这可能就是我们即将面临的命运。然而，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决定不战而胜——即使面临所有困难！但我们不想为失败的事业重蹈覆辙而成为烈士——如果我们坚持旧方式，我们就会成为烈士。

作为一项运动，我们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是时候醒悟过来，认识到我们思想的真正意义了。第一步是成为革命专业人士。我们必须抛弃所有不成熟的右翼态度，认识到我们是左翼人士。此外，我们应该停止将我们的痛苦归咎于他人。我们在各方面都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我们不需要替罪羊！我们想要的任何改变都必须从改变我们自己人民的基本态度开始。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一想到如果我们失败会发生什么，就值得一试！

世界观的斗争

与赤色势力的冲突 阿道夫-希特勒

1919 年至 1920 年以及 1921 年，我参加了一些资产阶级会议。我对这些会议的感觉就像童年时代被迫服用的蓖麻油一样。因为对人有好处，所以必须服用，但味道肯定不好。如果有可能用绳子捆住德国人，强行把他们拉到这些资产阶级会议上，把他们关在铁门后面，直到会议结束，不让任何人离开，那么这个方法也许能在几百年内取得成功。就我而言，我必须坦率地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生活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不再希望成为德国人。但感谢上帝，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因此，理智而未受污染的群众像躲避圣水一样躲避这些“资产阶级群众集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结识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先驱，我对所了解的情况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他们不太重视口头表达。那时，我参加了民主党、德国民族党、德国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巴伐利亚中央党）的会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听众的千篇一律。他们几乎总是由党员组成。整个场面更像是一场打哈欠的纸牌聚会，而不是刚刚经历过伟大革命的人们的集会。演讲者竭尽所能维持这种宁静的氛围。他们以知识分子报纸文章或学术论文的风格宣读或更确切地说，是朗读他们的演讲，避免使用任何引人注目的表达方式。演讲者偶尔会讲一个微不足道的笑话，坐在演讲者桌子旁的人觉得有义务笑一笑——声音不大，但鼓励且含蓄。

演讲台上总是有那些人。我曾参加过在慕尼黑瓦格纳音乐厅举行的一次会议。那是一次庆祝莱比锡战役周年的纪念活动。

演讲是由来自某所大学的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发表或宣读的。委员会成员坐在主席台上：右边一个戴着单片眼镜，左边一个戴着单片眼镜，中间一个没有戴单片眼镜。他们三人穿着考究的晨礼服，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法官面前，死刑判决即将宣布，或者是在参加洗礼或某种更隆重的宗教仪式。所谓的演讲，如果以印刷的形式呈现，可能读起来还不错，但实际效果却非常糟糕。演讲进行了四分之三个小时，听众们陷入了某种催眠般的恍惚状态，直到有人离开大厅，或者女服务员的脚步声响起，或者打瞌睡的人越来越多地打哈欠，才打破了这种状态。我站在三个工人的身后，他们或出于好奇，或受党派派遣，出席了这场集会。他们不时地彼此瞥一眼，露出难掩的微笑，用肘部轻轻碰一下，然后默默地离开大厅。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没有打断仪式的意思，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打断仪式。终于，庆祝活动出现了结束的迹象。教授的声音越来越小，终于结束了演讲。这时，那位没有戴单片眼镜的先生向在场的“德国兄弟姐妹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结束语。他代表听众和他本人感谢 X 教授的精彩演讲，并强调教授的演讲让他们深受感动。如果对讲座进行一般性讨论，无异于亵渎，他认为自己表达了在场所有人的意见，建议不要进行这样的讨论。因此，他请与会者起立，一起唱爱国歌曲《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兄弟民族》。会议最后以《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国歌结束。

然后他们齐声高歌。在我看来，当唱到第二段时，歌声逐渐减弱，只有副歌响起时，歌声才变得洪亮。当我们唱到第三段时，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在场的许多人并不熟悉歌词。

但当德国国民全心全意、热情洋溢地唱起这首歌时，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

散会后，大家纷纷赶往户外，有人去喝啤酒，有人去咖啡馆，还有人只是想呼吸新鲜空气。

呼吸新鲜空气！这也是我的感受。这是纪念数十万普鲁士人和德国人英勇斗争的方式吗？**去他的吧！**

这种行为可能会得到政府的青睐，因为那只是一次“和平”集会。负责法律和秩序的部长不必担心公众礼仪会突然被热情冲昏头脑，导致这些人冲出房间，而不是分散到啤酒馆和咖啡馆，而是排成四列穿过城镇，唱着《德意志万岁》，给需要休息的警察带来一些不愉快。

不，那种公民对谁都没有用。

另一方面，民族社会主义会议绝不是“和平”的事情。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相互激烈对立，这些会议结束时，人们不是机械地演唱乏味的爱国歌曲，而是热情洋溢地表达民族情感。

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在会议中引入严格的纪律，并建立主席的绝对权威。我们的目的不是发表一些软绵绵的资产阶级言论，而是要在会议上激起反对者的情绪！他们经常成群结队地出现，其中有几个煽动者，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随时准备当场干掉我们。

是的，他们经常大批出现，那些红旗的支持者，事先都得到指示，要彻底摧毁一切，结束这些会议。很多时候，一切都悬于一线，只有主席的坚定决心和我们的粗暴对待才能挫败对手的意图。的确，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恼火。

我们选择红色作为海报的颜色，足以吸引他们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普通资产阶级看到我们选择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象征性红色，感到非常震惊，他们认为这具有模棱两可的意义。德国民族主义圈子中有人小声怀疑，我们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甚至可能是经过适当伪装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更好的是社会主义者。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实际区别对这些人们来说仍然是个谜。当人们发现我们在会议上故意用“同胞们”代替“女士们、先生们”，并互相称呼“同志”时，马克思主义的指控得到了确凿的证明。**我们常常为这些愚蠢胆小的资产阶级以及他们试图弄清我们的起源、意图和目标而大笑。**

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了红色作为海报的颜色，目的是激怒左派，引起他们的注意，吸引他们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哪怕只是为了驱散他们——这样我们就有机会与人们对话了。

在那些年里，跟踪我们困惑无助的对手不断变化的策略确实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经历。首先，他们呼吁他们的追随者无视我们，远离我们的会议。一般来说，这种呼吁得到了响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追随者逐渐找到了我们，并接受了我们的教导。然后，领导者们变得紧张不安。他们坚信，这种发展不应被永远忽视，必须采取恐怖手段来制止它。

于是，他们呼吁“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参加**我们的会议，并举起无产阶级的拳头，打击“君主制和反动煽动”的代表。

我们的会议在预定开始前三刻钟就挤满了工人。这些集会就像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导火线就在手边。但事情总是有不同的发展。**人们来时是敌人，走时却可能已经准备加入我们**，他们带着反思的心情，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的理论是否正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三小时讲座逐渐让支持者和反对者团结在了一起，成为一个热情洋溢的

团体。每一次试图解散会议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结果，反对派领导人感到害怕，再次向那些以前不赞成派遣工人这门策略的人寻求帮助，他们曾以某种正确的方式表明，原则上应该禁止工人参加我们的会议。

然后他们不再来了，或者只是少数人来了。但没过多久，整个游戏又重新开始了。远离我们的指示被忽略了；同志们的数量稳步增加——我们本应被解散。

然而，当两、三甚至八次会议后，人们意识到要解散这些集会比想象的要难，而且每次会议都会导致红色战斗力量被削弱，于是突然引入了另一个口令："无产阶级、同志们，避免参加民族社会主义煽动者的会议"。

在红色媒体上，也出现了同样的永恒交替战术。 他们很快试图压制我们，但发现这种尝试毫无用处。之后，他们转而采取相反的策略。他们每天都在"参考"我们，目的只是为了在工人阶级眼中彻底嘲笑我们。一段时间后，这些先生们肯定觉得对我们没有坏处，相反，我们从中获得了好处，因为人们会问自己，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篇幅用于讨论一个如此荒谬的话题。人们开始好奇。突然之间，策略发生了变化，一时间，我们被当作名副其实的反人类罪犯对待。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接踵而至，解释了我们的犯罪意图，并提出了新的证据来支持这些说法。为了毒害公众的思想，人们发布了一篇又一篇从头到尾都是捏造的丑闻故事。但没过多久，这些攻击也被证明是徒劳的；事实上，它们起到了实质性的帮助，因为它们吸引了公众对我们的关注。

在那些日子里，我采取的立场是，他们嘲笑我们也好，辱骂我们也好，把我们描绘成傻瓜也好，罪犯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注意到我们了，而且在工人阶级的眼中，我们被视为唯一能够抗争的力量。我对自己说，犹太新闻界的追随者终将了解我们的一切以及我们的真正目标。

他们从未成功破坏过我们的集会，**其中一个原因无疑是反对派领导人表现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懦弱。**在每个关键时刻，他们都将脏活累活交给小喽啰，自己则在大厅外等待破坏的结果。

我们非常了解对手的意图，不仅是因为我们出于权宜之计允许一些党内同事继续留在红色组织中，还因为幸运的是，红色组织中的幕后操纵者有着一种在德国人中仍然非常普遍的健谈症。他们无法保守秘密，往往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就开始喋喋不休。因此，我们一再采取预防措施，让那些红色分子丝毫不知道自己距离被赶出会场已经不远了。

这种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亲自保护会议。官方保护是不可靠的。相反，经验表明，这种保护总是只保护那些捣乱者。警方干预的唯一真正结果是会议被解散，也就是说，被关闭。而这正是我们的对手所希望的。

一般而言，这导致警方采取了一种程序，至少可以说是官方渎职的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当他们收到关于某个会议将被驱散的威胁信息时，他们没有逮捕潜在的扰乱者，而是迅速通知无辜的与会者会议被禁止。警方宣称这一步骤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预防措施"。

因此，正直的人的政治工作和活动总是会受到穷凶极恶的流氓的阻挠，而后者却拥有各种手段。国家当局以和平与秩序的名义向这些流氓低头，并要求其他人不要挑衅他们。当民族社会主义党希望在某些地方举行会议，而工会宣布其成员将予以抵制时，

被逮捕和监禁的并不是这些勒索者。不，我们的会议是被警察禁止的。是的，这个执法机构不知羞耻地多次以书面形式提出这样的建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有必要确保任何干扰会议的行为都扼杀在萌芽状态。在这方面需要考虑的另一个特点是，所有依靠警察保护的会议必然会在公众眼中给发起者带来负面影响。只有在强大的警力保护下才能举行的会议无法改变任何人的想法；因为要想赢得底层民众的支持，必须展示自己一方强大的实力。就像勇敢的人比懦夫更容易赢得女人的芳心一样，**英勇的运动也比依靠警力支持的软弱运动更容易赢得民心。**

正是由于后一个原因，我们年轻的运动肩负着确保自身生存、自我防卫以及粉碎红色反对派的使命。

我们采取以下措施来组织会议的保护措施：

（1）以充满活力且心理上明智的方式主持会议。

（2）组织一支队伍来维持秩序。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才是会议的主宰，这一点我们从不讳言。我们的对手深知，无论形势多么不利，只要他们有任何挑衅行为，我们就会立即将他们赶出会场。在会议期间，特别是在慕尼黑以外的地方，**我们当时面对五百到八百名对手，而我们的队伍只有十五到十六名民族社会主义者**；但我们毫不畏惧，因为我们宁愿战死也不投降。不止一次，党的同志对暴怒的红色暴徒进行了英勇抵抗。如果对手知道他们的人数是我们的三到四倍，那么这十五到二十个人最终肯定会被打败。他们也不愿意冒这个险。我们尽了最大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召开会议的方法，并且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奉行最严格的纪律，因此，他们的会议决不可能被资产阶级分子破坏。这赤军更有理由实施这一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仅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而且在帝国的某些大区，他们甚至宣称非马克思主义会议是“挑衅无产阶级”的根源。当幕后操纵者怀疑某次会议可能会引起人们对其违法行为的关注，从而暴露其背叛和欺骗行为时，情况尤其如此。因此，当宣布召开此类会议时，红色媒体就会发出愤怒的咆哮。这些法律的诋毁者几乎总是首先求助于当局，以命令式的威胁语言要求立即停止这种“对无产阶级挑衅”，以“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们根据所面对的官方蠢货的重要性来见鬼说鬼话，从而确保成功。

这些资产阶级会议召开时可怜又惊恐的样子必须亲眼目睹才能相信。这些威胁往往足以立即取消会议。恐惧感非常明显，以至于会议很少在八点开始，而是推迟到八点四十五分或九点。主席竭尽所能，对“反对派绅士”大加赞赏，以证明他和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高兴（这显然是个谎言）欢迎那些尚未与他们达成共识的人前来拜访，因为只有通过相互讨论（立即达成一致），他们才能更紧密地相互理解。除此之外，主席还向他们保证，这次会议完全没有干涉任何人公开表达的信念的意图。确实没有。每个人都有权形成并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但其他人也应该被允许这样做。因此，他要求允许演讲者不受干扰地发表演讲——无论如何，演讲都不会很长。他继续说道，这样一来，国外的人们就不会把这次会议视为德国兄弟间激烈争斗的又一个可耻例子。诸如此类

左翼兄弟对这种言论几乎毫无好感；演讲者尚未开始，就被喝止了。人们有时会感到，这些演讲者因被粗暴地打断其殉道者般的演讲而感到荣幸。这些资产阶级斗牛士在巨大的骚动中离开了舞台，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被扔下楼梯摔得头破血流，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因此，我们在民族社会主义会议上的组织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非常奇怪。他们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认为他们经常玩的小把戏当然也可以在我们身上重演。“今天我们要把他们干掉。”他们进入会议厅时经常这样互相叫嚣，结果还没来得及重复就被闪电般地赶了出去。

首先，我们开会的方法完全不同。我们不会乞求和祈祷别人允许我们发言，也不会直接赋予每个人进行无休止讨论的权利。我们直截了当地让每个人明白，我们是会议的主人，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任何胆敢打断我们的人都会被毫不客气地赶出去。我们明确表示，对于以这种方式对待的任何人，我们拒绝承担责任。如果时间允许，并且适合我们，我们将允许进行讨论。我们的同志现在将发表演讲……这种谈话本身足以让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惊讶。

其次，我们有训练有素、组织有序的男性队伍来维持会议秩序。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政党则用一群年龄较大、自认为有权有势、受人尊敬的男性来保护他们的会议。但马克思主义对这些东西几乎毫不尊重，因此可以说，在这些资产阶级会议上，适当的自我保护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当我们的政治会议刚开始时，我特别强调要组织一支合适的防卫队——主要由年轻人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曾与我并肩作战；其他人则是年轻的党员，从一开始就接受训练，**并认识到只有恐怖才能粉碎恐怖，只有勇敢和坚定的人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最后，我们为崇高的理想而战，值得为此付出最后一滴血。这些年轻人从小就明白，在用武力代替常识解决问题的地方，最好的防御手段就是进攻，而我们的冲锋队的名声应该证明我们是一支政治战斗力量，而不是一个辩论协会。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战争年代的男孩对这一命令的反应非常热烈。他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对资产阶级采用的可怜懦弱的方法感到失望和愤怒。

因此，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得益于资产阶级政府卑劣的手段。当时，镇压革命的人手肯定是不缺的，但遗憾的是，缺乏的是指挥者的智慧。当我向年轻人解释他们任务的重要职能，并一再向他们保证，除非有力量的支持，否则一切世俗智慧都是无用的，温柔的和平女神只能与战争之神同行，而且每项伟大的和平行动都必须得到武力的保护和协助时，他们的眼睛里常常闪烁着热情的光芒。这样，服兵役的想法就以一种更现实的形式出现在他们面前——不是那种僵化的、为已逝国家的死权势效力的腐朽官员的灵魂，而是每个人都有责任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以使国家得以延续的鲜活意识。

那些年轻人是如何完成工作的！

他们像一群黄蜂，不顾人数上的优势，不顾受伤和流血，一心为我们的运动的神圣使命开辟道路，勇敢地对付会议上的捣乱分子。

早在 1920 年夏天，组织人员担任会议秩序维护者的队伍就逐渐成形。到 1921 年春天，这些人员被分成一百人的小队，再分成更小的团体。

这种紧迫性显而易见，因为我们的会议数量一直在稳步增加。我们仍然经常在慕尼黑皇家啤酒屋（Hofbräuhaus）开会，但更经常地在全市各地的大型会议厅开会。在 1920 年至 1921 年的秋冬季节，我们在布格布劳和慕尼黑金德布劳的会议规模变得非常庞大，而且总是出现同样的场景：民族社会主义党（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劳动者党）的会议总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警方不得不在会议开始前就早早地关闭并封锁了大门。组织保卫人员维持会议秩序解决了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此之前，该运动没有党徽和党旗。缺乏这些标志在当时不仅是一个劣势，而且在未来将变得无法忍受。主要劣势在于，党员之间没有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明显标志，而且，未来他们仍然没有某种标志来象征该运动并与国际运动区分开来，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这种象征的心理重要性已经很明显，从情感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可取的。战后，我在柏林参加了在皇宫和 Lustgarten 举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众示威活动。红旗、红袖章和红花的海洋本身足以让这场约有 12 万人参加的集会看起来充满力量。我能够感受到并理解，普通人很容易屈服于这种宏伟的戏剧表演的催眠魔力。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政党既不拥有也不代表任何世界观，因此没有一面旗帜。他们的政党由身穿德意志帝国色彩的“爱国者”组成。如果这些颜色是某种特定世界观的象征，那么人们可以理解国家统治者为何将这面旗帜视为他们自己世界观的表达，因为他们通过努力使官方的帝国旗帜成为他们自己世界观的表达。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德意志帝国是在没有德国资产阶级帮助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国旗本身也是战争时期诞生的，因此它只是一面国家旗帜，没有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使命。

只有在德语区的一个地方——德奥地区——有类似资产阶级政党旗帜的东西。在这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选择了 1848 年的颜色（黑、红、金）作为他们的政党旗帜，并以此创造了一个象征，虽然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它并不重要，但从民族的角度来看却具有革命性。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神职人员是反对这面旗帜的最激烈反对者，这一点今天不应忘记。他们贬低和玷污了这些颜色，就像 1918 年他们将黑、白、红拖入沟渠一样。当然，在旧奥地利，德国政党的黑、红、金三色是 1848 年的颜色：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可能被视为有点异想天开，但这个时期有正直的德国人作为代表，尽管犹太人作为幕后操纵者隐藏在暗处。正是由于叛国和德国领土的可耻奴役，这些颜色首先吸引了中央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至于今天他们将其视为最珍贵的财产，并作为自己的旗帜来保护他们曾经玷污过的国旗。

因此，直到 1920 年，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帜一直没有出现，以表示对他们的联合抵抗。因为即使德国资产阶级中政治觉悟较高的成员在 1918 年之后不愿接受突然出现的黑、红、金三色作为他们的象征，他们也无法用符合新趋势的未来计划来对抗。他们最多只能想到重建旧帝国。

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才使得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得以复活，成为我们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旗帜。

显然，一个被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光彩的情况下推翻的政权的象征，现在不值得作为旗帜，让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反过来被摧毁。然而，任何正派的德国人可能多么热爱和

崇敬那些旧的颜色，当它们年轻新鲜地并排放置时，当他在这些颜色下战斗并看到如此多生命的牺牲时，那面旗帜对于未来的斗争几乎没有价值。

在我们的运动中，我始终认为，德国民族失去旧国旗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的这一观点与资产阶级政客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共和国在其国旗下做了什么，对我们来说可能无关紧要。但我们要深深地感谢命运，它如此仁慈地让最辉煌的战旗永远免于成为一块耻辱的破布。当今的国家出卖自己及其人民，绝不允许其采用光荣而英勇的黑白红三色。

只要十一月的暴行持续存在，这种暴行就将继续保留其自身的标志，而不会窃取光荣的过去。我们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应该唤醒自己的良知，意识到无论谁希望这个国家拥有黑、白、红三色，都是在窃取过去。旧国旗只适合旧帝国，幸好共和国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颜色。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悬挂旧国旗并不能象征我们的特殊目标；因为我们无意让因自身错误而衰败的旧帝国死灰复燃，而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如今，沿着这些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运动必须在其旗帜上展示新国家的象征。

新国旗的问题，即它必须采取的形式和外观，让我们在那些日子里非常忙碌。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议虽然用心良苦，但几乎都不太可能实现。新旗帜不仅要成为表达我们自身斗争的象征，另一方面，它还必须像一张大型海报一样有效。所有关心公众品味的人都会认识到并理解这些看似小事的重要性。在成千上万的情况下，一个真正醒目的标志可能是唤起人们对运动兴趣的第一原因。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拒绝了各方提出的所有建议，即用一面白旗来代表我们的运动，而白旗上的图案是旧国徽，或者说是那些唯一政治目标是恢复过去状况的腐朽政党的徽章。此外，白色不是能够吸引和聚焦公众注意力的颜色。它只适合年轻妇女协会，不适合在革命时期代表改革的运动。

也有人建议使用黑色——当然，它很适合那个时代，但无法彰显我们运动背后的意志。而且，黑色无法吸引注意力。

白色和蓝色尽管具有令人钦佩的美感——它们是德国联邦州的颜色——但最终被放弃了。遗憾的是，这个州因其政治上的狭隘和偏执而声名狼藉。而且，一般来说，用这些颜色很难吸引人们关注我们的运动。黑白也是如此。

黑、红、金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出于上述原因，黑、白、红也不在考虑之列。至少，不能用目前使用的形式。但这三色的效果远远优于其他颜色，它们无疑是最和谐的组合。

我个人一直主张保留旧的颜色，不仅是因为我作为一名军人，视它们为最神圣的财产，还因为它们的美学效果比其他任何颜色都更符合我的个人品味。因此，我不得不放弃为新旗帜提出的无数建议和设计，其中许多建议和设计将民族社会主义标志与旧颜色结合在一起。作为领导者，我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设计，因为其他人可能会提出一个甚至比我的设计更好、甚至更好的设计。

事实上，一位来自施塔恩贝格的牙医提交了一个与我非常相似的设计，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他的带有弧形角的民族社会主义标志被放置在白色背景上。

经过无数次尝试，我最终确定了设计——一面红色旗帜，中间有一个白色圆盘，上面有一个黑色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徽。经过多次尝试，我确定了旗帜和白色圆盘以及民族社会主义党徽的正确比例。此后，它一直沿用至今。

与此同时，我们立即为负责维持会议秩序的男队员订购了相应的臂章，臂章采用红色材料制成，中央有一个白色圆盘，上面印有黑色民族社会主义党徽。慕尼黑金匠弗斯先生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实用且永久的设计。

1920 年仲夏，新旗帜首次公开亮相。它与我们的运动非常契合，两者都充满活力，朝气蓬勃。之前没有人见过这个旗帜；它当时的效果就像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当负责制作旗帜的女党员之一终于把它交给我们时，我们自己也体验到了几乎像孩子般的喜悦。几个月后，我们在慕尼黑的人拥有了六面这样的旗帜。我们大厅守卫力量的不断增强是推广这个标志的主要因素。

事实证明，它确实是一个象征。

这不仅是因为它融合了那些令人尊敬的色彩，表达了对辉煌过去的敬意，以及曾经为德国民族带来的巨大荣誉，而且这个象征还雄辩地表达了运动背后的意志。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的旗帜是我们党纲的化身。红色表达了运动背后的社会思想。白色代表了民族思想。而民族社会主义党徽则象征着赋予我们的使命——为雅利安人赢得胜利而奋斗，同时实现创造性工作的理想，这种工作本身是反犹太主义的，而且永远都是如此。

两年后，我们的大厅守卫队早已成长为冲锋队，似乎有必要为这个年轻的世界观防御组织设计一个特殊的胜利象征，即一个标准。我也设计了这个标准，并委托一位老党员加尔先生（Herr Gahr）来执行。从那时起，这个标准就成为民族社会主义斗争的独特象征。

人们对我们的会议越来越感兴趣，特别是在 1920 年，有时我们不得不每周举行两次会议。人们聚集在我们的海报周围；城镇里的大型会议厅总是座无虚席，成千上万被马克思主义教义误导的人找到了我们，并协助我们为解放帝国而战。慕尼黑的公众已经认识了我们。人们谈论我们。 “民族社会主义者”一词已成为许多人的共同财产，对他们来说，这个词意味着一个明确的政党纲领。我们的支持者圈子甚至党员数量都在不断增加，以至于在 1920-21 年冬季，我们得以在慕尼黑成为一个强大的政党。

当时，除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慕尼黑还没有任何政党能够像我们一样举行如此大规模的游行。可容纳 5000 人的慕尼黑金德尔大厅不止一次人满为患，而在此之前，我们只去过这个大厅，而克朗马戏团大厅，从未冒险去过那里。

1921 年 1 月底，德国再次面临重大危机。根据《巴黎协定》，德国承诺支付 1000 亿金马克的巨额赔款，而《伦敦最后通牒》将确认这一赔偿。

因此，一个由所谓的民族主义团体代表组成的慕尼黑老派委员会认为，应该召开一次公开抗议会议。我看到很多时间被浪费，却什么都没有做，变得紧张不安。起初，有人建议在国王广场（König Platz）召开会议，但后来被否决了，因为有人担心会议可能会被红色分子破坏。另一个建议是在费尔德赫恩大厅前举行示威，但这也无疾而终。最后，有人建议在慕尼黑金德尔大厅举行联合会议。与此同时，日子一天天过去，大型集会完全因为这场可怕事件耽搁，而工作委员会也无法确定举行示威的日期。

2 月 1 日星期二，我提出了一个紧急要求，希望尽快做出最终决定。但对方一直推到星期三。那天，我要求对方明确告知是否以及何时举行会议。但对方再次含糊其辞，表示“打算”在星期三安排示威活动。

我失去了所有的耐心，决定自己组织一场抗议示威。星期三中午，我花了十分钟口述了海报上的文字，同时租下了第二天（2 月 3 日）的克朗马戏团大厅。

在当时，这是一项巨大的冒险。不仅是因为不确定能否填满那个巨大的大厅，还因为会议可能会被破坏。

从人数上看，我们大厅的保安队伍不足以应对如此庞大的大厅。我也不确定如果会议被破坏该怎么办——巨大的马戏团建筑与普通的会议厅完全不同。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情况恰恰相反。在那座巨大的建筑里，破坏者比在狭窄的大厅里更容易被制服。

有一点是肯定的：一旦失败，我们将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如果一次会议失败，我们的声誉将受到严重损害，对手也会因此受到鼓舞，不断复制成功。这会导致我们的工作遭到破坏，影响后续会议，而要克服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进行数月的艰苦斗争。

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来张贴我们的账单，星期四。不幸的是，那天早上下雨了，人们有理由担心许多人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冒着雨雪赶去开会，特别是当可能发生暴力和流血事件时。

事实上，在那个星期四的早上，我突然感到害怕，担心大厅可能永远无法容纳所有的人，这会使我在工作委员会的眼中显得很可笑。因此，我立即口述了各种传单，并在当天下午印刷并分发。当然，这些传单都包含着参加会议的邀请。

我租了两辆卡车，尽可能地用红色装饰，每辆车上都悬挂着我们的新旗帜，然后载着我们党的十五或二十名成员。我命令成员们彻底地巡视街道，分发传单，并为当晚举行的大众集会进行宣传。这是第一次有卡车载着旗帜穿过街道，而车上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公众张着嘴看着这些红色布幔的汽车，在郊区，人们愤怒地举起拳头，抗议这种“对无产阶级挑衅”的新证据。难道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有权举行会议和驾驶卡车吗？

晚上七点，只有少数人聚集在马戏团大厅。我每隔十分钟就接到电话，心里越来越不安。通常七点或七点一刻，我们的会议厅就已经坐了一半人，有时甚至爆满。但我很快就找到了不安的原因。我完全忘了考虑这个新会议场所的庞大规模。霍夫布劳豪斯（Hofbräuhaus）里有一千人，场面相当壮观，但马戏团大楼里同样的人数却淹没在它的规模中，几乎不引人注意。不久之后，我收到了更乐观的报告，八点差一刻，我被告知大厅已经坐了四分之三，还有大批人在售票处排队。然后，我前往会场。

我八点零二分到达马戏团大楼。外面仍然聚集着一群人，其中一部分是好奇的人，还有很多人是反对者，他们宁愿在外面等待事态的发展。

当我进入大厅时，我感受到了与一年前在慕尼黑皇家啤酒屋宴会厅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同样的喜悦；但直到我挤过厚厚的人墙到达讲台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功。大厅就在我面前，就像一个巨大的贝壳，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连舞台都挤满了人。门票卖了 5600 多张，再加上失业者、贫困学生和我们自己的秩序维持人员，现场大概有 6500 人。

我的主题是“未来或衰落”，我坚信，我演讲的人群代表了未来，这让我感到无比喜悦。

我开始演讲，讲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在演讲的前半小时，我就感觉会议一定会取得巨大成功。我与数千名听众之间立刻建立了联系。演讲进行到一小时后，听众自发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但到了两小时后，掌声逐渐平息，会场陷入庄严的寂静，我后来在这个大厅里多次经历了这种场面，在场的所有人都将永远铭记。没有人打破这令人印象深刻的寂静，直到演讲结束，大家才唱起国歌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我看着场面，看着大厅里的人逐渐散去，然后才离开讲台，心满意足地回家。

在慕尼黑的克朗马戏团大厅举行的首次会议被拍成照片。这些照片比语言更能说明这次示威的成功。资产阶级报纸转载了照片，并报道说这次会议只是“民族主义”性质的；他们以一贯的低调方式，只字不提发起人。

因此，我们首次超越了普通聚会的规模。我们再也不能被忽视了。为了消除人们关于这次集会只是孤立的成功的疑虑，我立即安排在接下来的一周在马戏团大厅举行另一次集会，结果我们再次取得了同样的成功。大厅里再次挤满了人，以至于我决定在接下来的一周举行第三次集会，结果也取得了类似的成果。

在 1921 年初取得初步成功后，我进一步增加了我们在慕尼黑的活动。我不仅每周举行一次会议，而且在某些星期甚至定期举行两次会议，在仲夏和秋季，会议次数经常增加到三次。我们定期在马戏团大厅开会，每次会议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结果，我们的聚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成员。

当然，这样的成功并没有让我们的对手高枕无忧。起初，他们对我们采取的策略是恐吓和沉默交替使用。后来他们发现，恐吓和沉默都无法阻止我们运动的进展。于是他们采取了极端的恐怖行动，意图彻底终止我们的聚会活动。

作为采取这一行动的借口，他们利用了对州议会议员埃尔哈德·奥尔的一次非常神秘的袭击。据称，某天晚上有人朝此人开了几枪。这意味着他并未中弹，但有人试图向他开枪。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冷静和英勇的勇气，不仅阻止了这起亵渎神明的企图，还让那些疯狂的刺客仓皇逃窜，暴露了他们懦弱的本性。他们逃得非常快，而且逃得非常远，以至于警方后来都找不到他们的丝毫踪迹。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利用这一神秘事件激起公众对运动的反感，同时发表其关于下次将采取的策略的陈词滥调。他们的目的是确保我们的运动不会壮大，而是立即被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连根拔起。

几天后，真正的攻击来了。他们最终决定打断我们原定在慕尼黑皇家啤酒屋举行的会议，而我也将在会上发言。

1921 年 11 月 4 日晚上六点到七点之间，我收到了确切的消息，会议肯定会被中断，为了实施这一行动，我们的对手决定派遣大量在“红色”工厂工作的工人参加会议。

由于一次不幸的事故，我们没能更早地收到这个消息。那天，我们放弃了位于慕尼黑斯特内克街的老办公室，搬到了其他地方；确切地说，我们放弃了老办公室，而新办公室还没有投入使用。前租户切断了电话线路，而电话还没有重新安装。因此，当天几次试图通过电话通知我们晚上计划进行的破坏行动都没有成功。

因此，我们的秩序部队没有在会议上派出大量兵力。只有一个班在场，该班的人数也不足一百人，只有大约四十六人。而且我们的电话线路还没有充分组织好，无法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发出警报，以便召集足够多的秩序部队来应对局势。还必须补充一点，之前几次我们曾得到过预警，但都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可能出于这个原因，那天我们也没有采取足够有力的预防措施来应对对手破坏我们聚会的野蛮决心。

最后，我们认为慕尼黑的皇家啤酒屋并不适合我们的对手采取干扰战术。我们更担心在更大的大厅里，尤其是克朗马戏团的大厅里发生这种事。但那天晚上，我们学到了非常有用的经验。后来，我们根据科学系统研究了这个问题，得出了有趣且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这些结果随后成为我们组织方向和冲锋队战术的重要因素。

当我在七点四十五分来到会场大厅前面的时候几乎无法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景象。会场爆满并且还有警察在进行警戒。提前到场的捣乱分子在会场里面，而支持我们的人却大部分在场外。一小部分冲锋队员在会场前厅等着我。我让他们关上通往大厅的门，并命令这四十五名或是四十六名冲锋队员列队站好。我告诉这些小伙子们今天也许就是他们必第一次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捍卫自己对这场政治运动忠诚的时刻，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许离开会场，除非他们是当作死人给抬出去的，我自己也要留在场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你们会弃我而去，但我自己要看出谁是胆小鬼，我就要亲自撕下他的袖标，拿走他的徽章。然后我就要求他们那怕是最细微的捣乱行为都要立即采取行动并且还要时刻牢记要尽量防备自己也会遭到攻击。

我听到三声“万岁”，比平时更嘶哑、更猛烈。

然后我穿过大厅，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形。我们的对手紧紧挤在一起，试图用目光刺穿我。无数张充满仇恨和愤怒的脸庞盯着我，其他人则一起对我发出嘲弄的冷笑。现在他们要“解决我们了。我们必须小心自己的内脏。今天他们要彻底粉碎我们的脸庞。”还有其他同样优雅的表达方式。他们知道自己人数占优，所以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然而，我们得以主持会议，我开始发言。在 Hofbräuhaus 大厅，我总是站在远离入口的一侧，站在啤酒桌的顶部。因此，我总是处于听众的正中间。也许正是这种环境造就了某种感觉和共识，而这种感觉和共识是我从未在其他地方感受到的。

在我面前，尤其是我的左边，只有坐着或站着的反对者。他们大多是来自马菲工厂、库斯特曼工厂和伊萨尔河畔工厂的壮年男子和青年。大厅右侧的墙壁上，他们密密麻麻地挤在我的桌子附近。他们开始点一升装的啤酒，一杯接一杯，然后把空杯子扔到桌子下面。这样，他们收集了一整排空啤酒杯。如果这次会议和平结束，我应该感到惊讶。

尽管有这些干扰，我仍然能够讲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感觉自己像是掌控了局面。甚至那些带头闹事的人似乎也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们越来越不安，经常离开大厅，回来后明显紧张地与手下交谈。

我在回答一个打断时犯了一个小小的心理错误，这个错误在我说出那句话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了，它引发了骚乱。

有几个人愤怒地爆发了，突然间，一个人跳到座位上大喊“自由”。听到这个信号，自由斗士们开始行动了。

片刻之间，大厅里就挤满了大喊大叫的暴民。无数的啤酒杯像榴弹炮一样在他们头顶上飞来飞去。在这片喧闹声中，人们听到椅子腿的碰撞声、碎裂声、呻吟声、呼喊声和尖叫声。

这是一场疯狂的表演。我站在原地，观察我的孩子们履行职责，他们每个人都尽职尽责。

在那里，我有机会看到一场资产阶级会议会是什么样子。

武斗刚开始，我的冲锋队（从那天起他们就被这样称呼）就发动了进攻。他们像狼一样，以八到十人为一组，一次又一次地扑向敌人，将他们逐出大厅。五分钟后，我几乎看不到一个没有血迹的人。然后我意识到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什么样的人，尤其是我勇敢的莫里斯，他如今是我的私人秘书，还有许多其他人，即使受了重伤，只要还能站起来，就一次又一次地发起进攻。混乱持续了二十分钟。然后，七八百名反对者被赶出了大厅，或者被我的手下们直接撞倒，而我的手下只有不到五十人。只有左边的角落里，一大群人仍然站在我们的人面前，进行顽强的抵抗。然后，大厅入口处响起两声手枪射击声，方向是讲台，现在，四面八方都爆发了疯狂的枪声。看到这一幕，人们不禁回想起战争的记忆，几乎感到欢欣鼓舞。

当时无法确定是谁开的枪。但无论如何，我看到我的部下们更加愤怒地重新发起进攻，直到最后将最后几个捣乱者制服并赶出大厅。

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二十五分钟。大厅里就像发生了一场爆炸。我的许多战友不得不包扎伤口，其他人被带走。但我们仍然掌控着局势。会议主席赫尔曼·埃森宣布："会议将继续进行。发言人继续发言。"于是我继续演讲。

当我们自己宣布会议结束时，一名激动的警官冲了进来，挥舞着双手宣布："会议解散了。"

虽然我不想这么做，但我还是忍不住为这个法律拖延的例子而笑。这是典型的警察办事效率。他们越小，就越要显得自己越大。

那天晚上，我们上了一堂真正的课。而我们的对手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所受到的教训。

直到 1923 年秋天，慕尼黑邮报才再次提到无产阶级的紧握的拳头。

步入人生 科德里亚努 选自《致我的军团》

在多布里纳森林 1919 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们聚集在那，它矗立在胡西周围的高地上。

谁？ 约 20 名高中生，包括高二、高三的学生。 我召集这些年轻的同志来讨论一个严重的问题，尽管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如果布尔什维克入侵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我的意见是，其他人也同意我的看法：如果布尔什维克军队越过德涅斯特河，然后到达普鲁特河，到达我们的地区，我们不会屈服，而是会武装起来，在树林里避难；我们将在那里组织罗马尼亚行动和抵抗的中心，通过巧妙行动动摇敌人；我们将保持不屈不挠的精神，在罗马尼亚城镇和乡村的群众中保持希望的火花。我们都在古老的森林中宣誓。这片森林是著名的蒂格丘森林的一角，在摩尔多瓦的历史上，许多敌人都在森林的小径上丧命。我们决定获取武器和弹药，严守秘密，在森林中进行侦察和战

斗演习，并建立一条战线来掩盖我们的意图。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这个阵地，并很快将其建立起来：一个名为“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的胡西高中学生文化民族协会。该协会得到了高中校长的批准。然后，我们开始在镇上举办聚会和讲座。我们在公开场合讨论了常规话题，同时在树林里模拟战斗演习。在那个时代，人们随处都能找到武器，因此我们大约在两周内就收集到了所需的一切。

当时国内局势混乱，我们虽然还不到 18 岁，但对此深有体会。每个人都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心怀憧憬，而革命的浪潮已经越过边境，近在咫尺。农民出于本能反对这股毁灭性的浪潮，但完全处于无组织状态，无法进行有效抵抗。但工业工人正迅速向共产主义靠拢，犹太媒体以及城市中的犹太人都在有计划地灌输共产主义思想。每个犹太人、商人、知识分子或银行家-资本家都在其活动范围内传播这些反罗马尼亚的革命思想。罗马尼亚知识分子举棋不定，国家机器混乱不堪。人们随时可能看到，要么是内部爆发一些有决心、有组织的事件，要么是德涅斯特河对岸的入侵。

这种外部行动与犹太共产主义团伙的内部行动相互配合——他们可以摧毁桥梁，炸毁弹药库，从而压制我们——这将决定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命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思绪纷乱，担心刚刚在艰难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国家会失去生命和自由，我们年轻的心中萌生了在多布里纳森林宣誓的想法。我在马纳斯蒂雷亚·德阿鲁（山上的修道院）军事学院学习了五年，那里是勇敢的迈克尔长眠之地，尼古拉·菲利佩斯库（Nicolae Filipescu）将军曾在此驻扎。在那里，在少校、后来的上校马塞尔·奥尔特亚努（Marcel Olteanu）的命令下，在维尔吉尔·巴杜列斯库（Virgil Badulescu）上尉和埃米尔·帕兰杰亚努（Emil Palangeanu）中尉的指挥下，在教授的指导下，我接受了严格的军事教育，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事实上，我的军事教育将伴随我一生。秩序、纪律、等级制度，以及军人尊严的情感，从小就融入了我的血液，它们将成为我未来活动的指导原则。在这里，我也学会了少说话，这让我后来讨厌“终日喋喋不休”。**在这里，我学会了热爱战壕，鄙视客厅。我接受的军事科学概念使我日后能够通过这门科学的棱镜来评判一切。**

军官们培养了我对人类和军事尊严的情感，但在一个缺乏荣誉和尊严的世界里，这种情感为我带来了困难和痛苦。1916 年夏天，我在胡西的家中度过。过去两年，我的父亲被召回军队，随团前往喀尔巴阡山脉。一天晚上，母亲把我叫醒，一边哭一边画十字说：“快醒醒，所有教堂的钟都在响。”

那是 1916 年 8 月 15 日，圣母玛利亚节。

我明白，动员令已经颁布，罗马尼亚军队此时已经越过山脉。我激动得全身发抖。三天后，我离开家，追随父亲，渴望自己也能成为前线战士中的一员。最终，经历许多冒险后，我到达了父亲指挥一个连的团，即第 25 步兵团，该团由 V. Piperescu 上校指挥，当时正在向特兰西瓦尼亚的奥伊图兹山谷挺进。我非常不幸，因为当时我才 17 岁，团长的志愿兵申请被拒绝了。

然而，我参加了特兰西瓦尼亚的推进和撤退，9 月 20 日，当我的父亲在 Ceres-Domu 山上的索瓦塔受伤时，我在敌人攻入之前救了他。虽然受伤，但他拒绝撤离，必须带领他的连队撤退，他后来又参加了在奥伊图兹（Oituz）的激烈战斗。一天晚上两点，团里接到命令要前进。军官们检查了集结在公路上像坟墓一样寂静的部队。父亲被要

求向上校报告。过了一会儿回来，他告诉我：“你回家不是更好吗？我们很快就要投入战斗了，我们两个都死在这里可不好，因为母亲将只剩下六个年幼的孩子，无人赡养。上校打电话给我，说他不想承担让你留在前线的责任。” 我能看出他的内心充满疑虑：他犹豫着是否应该把我一个人留在深夜的野外，在距离最近的铁路 25 英里的陌生道路上。然而，注意到他的坚持，我交出了卡宾枪和两个弹夹，而团里的队伍继续前进，消失在宁静而黑暗的夜晚中。我独自留在沟渠边，然后朝着老边境和家的方向走去。一年后的 9 月 1 日，当我进入博托沙尼步兵军事学校时，我仍然想着能够到达前线。

从 1917 年 9 月 1 日至 1918 年 7 月 17 日，我在军事学校的现役连队完成了学业并掌握了军事知识。斯拉夫斯库上校、丘雷亚上尉、弗洛林·拉杜列斯库中尉和斯特弗莱亚少校这四位杰出的军官引导我走上了为国战斗和牺牲的道路。又一年过去了——1919 年带来了和平，我们这些准备牺牲的孩子也各自回到了家乡。我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他一生都是一名民族主义战士。我的祖父是一名林业工人，我的曾祖父也是。我的民族从最开始就生活在树林和山脉中，经历了历史上任何艰难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我军人出身的成长经历和血液中的军人基因让我对多布里纳行动印象深刻——这是一种天真的表现，一种严肃的态度，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所不具备的。在那些时刻，我们内心深处感受到了祖先的存在，他们曾为摩尔达维亚而战，在敌人从未涉足的道路上战斗。

1919 年 9 月，在雅西大学

夏天过去了。秋天我拿到了学士学位，我们这群人就此分道扬镳，各自前往一所大学。从多布里纳出发，我们只留下了保卫祖国的记忆，抵御来自国内外的敌对浪潮。

我正站在这个十字路口，即将告别胡西，走向每个年轻人都会经历的十字路口——大学入学，期待已久的大学入学！作为准备，我拥有高中时期积累的知识资本，包括轰动一时的文学作品，以及如今在高中生的成长阶段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精神变态作品——不幸的是,我从未接触过这些作品。除了罗马尼亚经典文学外,我还读过 N. Iorga 和 A.C. Cuza 的《播种者》（Semanatorul）和《罗马尼亚人民》（Neamul Romanesc）中的所有文章。我父亲把它们放在阁楼上的几个箱子里。我会在空闲时间爬上阁楼，阅读这些文章。这些文章以一种高雅的形式表达了罗马尼亚人民的三种生活理想：

1. 罗马尼亚人民的团结。
2. 通过土地改革和政治权利提高农民地位。
3. 解决犹太人问题。

当时所有民族主义出版物的封面上都印有两句**格言**：

“罗马尼亚人的罗马尼亚，只属于罗马尼亚人和所有罗马尼亚人。”

——N. Iorga

“民族性是人文文化的创造力，文化是民族性的创造力。”

——A.C. Cuza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近雅西——这座被每个罗马尼亚人喜爱和理解的雅西，这座每个人都至少想去游览的城市。摩尔达维亚的许多城镇都拥有辉煌的历史。当我们念出霍廷、巴尔拉德、瓦斯鲁伊、蒂吉纳、阿尔巴城、索罗卡这些名字时，我们的灵魂都会为之振奋。但最重要的是，苏恰瓦和雅西。苏恰瓦是斯特凡大帝的堡垒；雅西是库

扎·沃达之城，也是1859年联盟之城，通过建立大学，成为一座青春之城，承载着人们最崇高的理想。

在雅西生活过：米隆·科斯汀、博格丹·彼得雷斯库·哈斯德乌、米哈伊尔·埃米内斯库、扬·克雷安加、瓦西里·亚历山德里、科斯塔切·内格里、雅各布·内格鲁兹、米哈伊尔·科加尔尼恰努、西特尼翁·巴努蒂乌、瓦西里·孔塔、N·约尔加、扬·加瓦内斯库。库扎教授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杰出人物，他在这里像灯塔一样闪耀着光芒。大学成为民族主义学校；雅西是罗马尼亚伟大前进的城市，是我们民族伟大、理想和抱负的象征。

1917 年，费迪南德国王饱受折磨的灵魂在此找到了避风港，从此摆脱了悲伤；1918年，雅西成为所有罗马尼亚人的团结之城；雅西 其辉煌的过去，也因其当前的悲剧——这座拥有四十座教堂的城市，在无情的犹太人入侵下日渐衰败，被人们遗忘。雅西与罗马一样，建在七座山上，是罗马尼亚永恒的城市。这里曾有过多少辉煌的记忆！在这里，人们第一次听到了亚历山德里那和谐动听的诗句：“罗马尼亚人，无论你是什么人，让我们携起手来。”在这里，学生感受到祖先的灵魂在寂静的雅西上空徘徊，带着神秘的召唤和神圣的敦促。在寂静的夜晚，雅西的学生仿佛被痛苦折磨得疯狂，听到米哈伊尔·埃米内斯库的幽灵在城市的曲折街道上奔跑，像幽灵一样呻吟：**“把陌生人放在心上的人，愿狗吃掉他的心，愿废物吃掉他的家，愿恶名吞噬他的亲人。”**

1919 年秋天，我怀着深深的敬意走近这座城市，被它巨大的光环所吸引，同时也因为二十年前我出生在这里而感动。就像任何孩子一样，我再次被感动，想要亲吻我的故乡的土地。

雅西大学在战争期间关闭，一年前重新开放。老先生们作为退伍军人重返校园，保留了战前学生生活的传统民族主义路线。他们分为两个阵营。一个由来自文学系的拉布斯卡领导，另一个由来自法律系的内鲁·约内斯库领导。这些人数不多的团体被从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涌向学校的犹太学生所淹没，这些学生都是共产主义分子和宣传员。除了以 A.C. Cuza、Ion Gavanescul 和 Corneliu Sumuleanu 为首的一小部分人外，大学的教授们都是左派思想的支持者。

保罗·布约尔（Paul Bujor）教授是多数派代表之一，他在全国参议院直言不讳地表示：“光明来自东方”，即德涅斯特河**以外**。这些教授认为任何民族主义思想或观点都是“野蛮的”，这种态度导致学生彻底迷失方向，一些人公开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另一些人（占大多数）则说：“随你怎么说，民族主义已经过时了，人类正在向左发展。” 拉布斯卡小组完全滑向了这个方向。我所加入的尼鲁·约内斯库小组在大学的一些选举中失利后，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解散。这些反罗马尼亚思想在教授和学生群体的拥护下，在罗马尼亚的所有敌人的怂恿下，在学生群体中找不到任何罗马尼亚人的抵抗。我们中少数仍在试图坚守阵地的人被轻蔑和敌意包围。在街道上或大学的大厅里，持有不同意见的同事，那些拥有“良心自由”并宣扬其他各种自由的人，在我们经过时朝我们背后吐口水，并且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成千上万的学生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上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攻击军队、司法、教会和皇室。**只有一个协会仍然保持着罗马尼亚特色：布科维纳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人组成的“阿夫拉姆·扬库”，由学

生瓦西里·拉辛斯基领导。自 1860 年以来，这所大学一直是传统的民族主义大学，现在反而成为反罗马尼亚主义的巢穴。

革命正在酝酿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完全存在于大学中。雅西的工人群众几乎完全沉浸在共产主义中，随时准备爆发革命。工厂里几乎没有什么工作。他们连续几个小时开会和讨论，主要讨论政治而不是工作。我们发现，有人有计划、有指挥地蓄意破坏我们的工作："破坏、摧毁机器，制造普遍物质匮乏的局面，引发革命。" 事实的确如此，这条命令越得到遵守，苦难就越蔓延，饥饿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民众心中的反抗情绪也越来越强烈。在雅西的街道上，每隔三到四天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游行示威。在莫斯科犹太罪犯的操纵下，一万名饥饿的工人高唱国际歌，在街上游行，高喊："打倒国王!""打倒军队!"他们举着写有"共产主义革命万岁!""苏维埃俄罗斯万岁!"的标语牌。

如果这些革命取得了胜利，我们至少会有一个由罗马尼亚工人政权领导的罗马尼亚吗？罗马尼亚工人会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吗？不会！第二天，我们就会成为最肮脏的暴政——犹太法典暴政的奴隶。新罗马尼亚在成立不到一秒后就会崩溃。

我们罗马尼亚人民，包括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会遭到无情屠杀、杀害或驱逐到西伯利亚各地。从马拉穆列什到黑海的土地，将从罗马尼亚人手中夺走，成为犹太人的殖民地。他们将在这里建立真正的巴勒斯坦。我非常清楚，当时罗马尼亚人民的生死存亡岌岌可危。而那些推动罗马尼亚工人革命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毫不同情我们当时心中的痛苦，也不理解我们眼中的焦虑。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只有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是无意识的。这些知识分子受过教育，本应在困难时期启蒙民众——这也是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的原因——但他们却失职了。

在那些决定性的时刻，这些不称职的人竟然抱着"光明来自东方"的犯罪意识。谁去对抗那些在我们城镇街道上威风凛凛地行进的革命队伍？学生？不！知识分子？不！警察？安全部队？这些人在听到队伍逼近时惊慌失措，逃之夭夭。就连军队也无法阻挡他们的去路。因为人们谈论的并非 1000 人，而是 15000 人、20000 人，他们组织有序，饥肠辘辘。

国民良知卫队

1919 年秋的一个雨天，我在工艺美术学校食堂担任顾问，一位朋友向我展示了一份报纸通知。"国民良知卫队将于今晚（星期四）9 点在亚历山德里街 3 号召开会议。" 我立即离开，迫不及待地跑向这个组织，想了解并加入其中。几个月前，我曾读过该组织的反共传单。

亚历山德里街 3 号的房间里摆着新做的长凳，只有一个人在那里。他大约 40 岁，身材魁梧，神情沮丧，坐在桌子旁等待人们到来。他个头高，两条胳膊壮实，拳头有力，中等身材。他就是康斯坦丁·潘库，国民良知卫队主席。我自我介绍，说我是一名学生，希望加入卫队成为一名战士。他同意了。我参加了那次会议。大约有二十人参加了会议：排版员沃尼斯库、一名学生、大约四名来自 R.M.S. 的机械师、两名来自铁路部门的机械师、几名商人和工人、律师维克多·克莱姆斯库以及一名牧师。讨论了几个问题，涉及共产主义运动在各个工厂和部分城市中获得的势头，以及组织卫队的问题。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兵分两路。一半在大学里参加斗争，另一半与康斯坦丁·潘

库（Constantin Pancu）一起在工人中斗争。我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的领导下，我始终与他站在一起，直到组织解散。

康斯坦丁·潘库

康斯坦丁·潘库的名字在雅西两派阵营中广为流传，罗马尼亚人满怀希望地提起他，其他人则对他充满恐惧。他并非知识分子，而是一名商人、管道工和电工。他只读完了小学四年级。他拥有清晰、平衡的思维，并通过学习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储备。二十年来，他一直忙于解决工人问题。他曾担任冶金工会主席多年。他演讲一流。站在讲台上，面对众人，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灵魂和良知都带有鲜明的罗马尼亚特色。他热爱祖国、军队和国王。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拥有马戏团演员的肌肉和真正的巨大力量。雅西人认识他很久了。

战前，一个马戏团来到雅西，表演格斗节目。表演者中有来自各个国家的人。匈牙利人、土耳其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等。一天晚上，当其中一人战胜了所有其他格斗者时，观众中的一位市民站起来要求与获胜者决斗。他获准这样做。他脱掉衣服，战斗开始了。两分钟后，匈牙利马戏团的大力士被摔到地上，落败了。在众人的热烈欢呼中获胜的罗马尼亚人，正是康斯坦丁·潘库。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的战斗号召第一次出现在雅西的街道上时，崇尚力量的公众会信任地接受它。他的努力持续了一年，随着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加剧而增加，随着威胁的减弱而减少。起初只是举行小型会议，后来集会的人数达到 5000、6000 甚至 10000 人。在关键时期，这些集会每周在 Prince Mircea Hall 举行，有时也在联合广场举行。

我本人也是经常发言的人之一。正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如何在众人面前发言。不可否认的是，国民良知卫队在雅西这样重要的地方，在关键时刻唤醒了罗马尼亚人的良知，并将其作为一道屏障抵挡住了共产主义浪潮。

然而，这项活动并不局限于雅西。我们还去了其他城镇。此外，定期出版的《良知》报纸几乎传遍了摩尔达维亚和比萨拉比亚的所有城镇。几乎每天在两个阵营之间的战场上都会发生不可避免的血腥冲突，我方伤亡最为惨重。这种紧张局势一直持续到春天，但在我方取得两场重大胜利后，对手的进攻能力大大减弱。

国家垄断机构被国民良知卫队占领

1920 年 2 月 10 日或 11 日。两周来，人们一直在谈论全国总罢工。决战即将到来。城里传言说，大约中午时分，在拥有约 1000 名员工的 A.S.M. 公司，罢工会被宣布，红旗被升起，国王的画像被取下并踩在脚下，然后被卡尔·马克思、托洛茨基和拉科夫斯基的画像所取代。我们的人民遭到殴打，机械师和卫队成员受伤。

一点钟，我们大约一百人聚集在总部。该怎么办？潘库主持了讨论。有两种意见。一些人主张向政府发送电报，请求军事干预。我的意见是，在场的人应该前往 ASM，不惜一切代价拆除红旗。我的观点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我们拿起国旗，在 1 点钟方向，由潘库（Pancu）带领，开始向拉普斯内亚努（Lapusneanu）和帕库拉里（Pacurari）进发，高唱《罗马尼亚人，醒来吧》（Desteapta-te Romane）。在工厂附近的街道上，我们击溃了几组共产党人。

我们进入工厂的院子，走进大楼，一路举着旗帜走到屋顶，在那里插上了旗帜。我从那里发表了演讲。军队出现并占领了工厂。我们边唱边撤退，然后回到总部，认为

我们的快速攻击取得了成功。我们的态度的消息像闪电一样传遍了小镇，但罢工仍在继续。

军队只能保卫旗帜，不能使工厂运转。该怎么办呢？我们想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到城里寻找工人，以便重新开工。三天后，从雅西各地聚集而来的 400 名新工人进入了工厂。工厂开始运转了，罢工失败了。

两周后，一半的罢工者要求复工。我们的胜利是巨大的。总罢工的第一步被拒绝了。犹太-共产主义联盟的计划开始受挫。我们的行动在罗马尼亚队伍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提高了他们的士气。

尼古利纳工厂的三色旗

罗马尼亚尼古利纳的铁路工厂是最强大的共产主义中心。那里有 4000 多名工人，几乎都是布尔什维克。这些工厂周围的住宅区，如 Podul Ros、Socola 和 Nicolina，有大量犹太人居住。

这就是为什么雅西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格勒特博士和他的助手格勒尔将抵抗点定在这里。他们刚刚在 ASM 失败，为了发出开始总罢工和决定性战斗的信号，红旗在工厂上空飘扬。罢工宣布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涌了出来。当局对此无能为力。

我们通过传单召集所有罗马尼亚人到米尔恰王子大厅开会。演讲结束后，我们举着旗帜离开大楼，全体人员前往尼科利纳。在联合广场，我们被当局拦住，他们建议我们不要继续前进，因为那里有 5000 多名武装的共产主义者在等着我们，将会发生很多流血事件。

于是我们从联合广场转向火车站，在火车头的车库和车站上悬挂旗帜。然后我们征用了一辆轨道上的火车前往尼科利纳。所有人都进入了尼科利纳工厂。我们下车了，商店里没有人。在一栋建筑上，悬挂着红旗。我咬着三色旗爬上消防梯。我费了好大劲才爬到屋顶，因为实在很高。

我爬到屋顶，一把摘下红旗，在持续了几分钟的欢呼声中，我升起并固定了三色旗。然后，我从那里发表了演讲。在墙外，共产党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群体，并进行了威胁性的示威。一片混乱。里面欢呼，外面嘘声和咒骂。然后我慢慢走下台阶。潘库命令我们离开。但在门口，共产党人阻止我们离开，大喊：“让潘库和科德里亚努站出来！”我们走到人群前 30 码处，走向大门。中间是潘库，右边是商人玛格瑞特，左边是我自己。我们三人一言不发，双手插在口袋里，紧握左轮手枪。大门处的人安静地注视着我们，一动不动。现在，我们距离大门只有几步之遥。我预感到子弹会从我耳边呼啸而过。但我们继续坚定地向前走。

然而，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令人心潮澎湃的时刻。我们距离大门只有几步之遥。**共产党人让开了道路，为我们让开了路！**我们大约走了十码，在他们的中间，像在坟墓中一样安静地走着。我们既不向左看，也不向右看。什么声音都没有，甚至没有人的呼吸声。我们的队伍跟着我们。但是当他们穿过时，寂静被打破了。双方开始诅咒和威胁，但没有发生战斗。

我们沿着铁路向车站走去。在我们身后，工厂上方，胜利的三色旗在风中飘扬。这一行动所产生的道德影响是无可比拟的。整个雅西都为之沸腾。街上每个人都只谈论“国民良知卫士”。

空气中弥漫着罗马尼亚觉醒的气息，火车将这一复兴的消息带到了全国各个角落。我们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将被击败，因为面对它以及它的侧翼，人们已经建立起一道良知屏障，阻止其扩张。现在，所有通往其进一步扩张的道路都被封锁了。从现在开始，它必须狼狈而逃。

不久之后，格蒂采取了行动。阿韦雷斯库政府也加入了我们的努力，足以使这一运动的前景完全破灭。

进步与混乱 奥托·邦格

生命从无意识的深处升向光明。在意识之上，意志存在，那神秘而强大的最后力量，它已经沉睡在沉重的石头中，神秘地推动和驱动植物，在动物中更强大、更猛烈地颤抖，最终在人类中达到最高能量。这股力量就像最高电压的电流，在有机世界的所有生物中脉冲，将整个混乱的创造凝聚在深处；它是生命流动的最终根源。正是她通过夺取物质、分裂自己和向生物创造发起战争，使所有生命不断增长和壮大。

因此，意志是世界的真正本质和驱动力，而其载体则是流动的血液。只有人类才能将这种黑暗而强大的意志冲动转化为独特的意识，而世界也首次以概念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意识面前。

这种意识将光芒投射到物质世界，以清晰的观念把握各种现象，用敏锐的概念对其进行排序，从而使意志能够从肉体上征服精神上已被征服的宇宙。通过服务于奋斗生活的意识，人类超越了所有生物，甚至是最强大的生物，因为它们是在黑暗中摸索，而他的精神，他的意志的对象和牺牲品，却得到了清晰而持久的照耀。

意志也向我们揭示了北欧种族的基本态度，这种浮士德式的冲动影响着世界和个体，使其成为完美的人格。由此产生了北欧精神的本质，它只为意志和生命服务，而永恒的必需品永远高于意志和生命。

这种精神存在于血液中，存在于无意识的创造力中，存在于所有存在的原始力量中，并深刻理解其自身的从属地位。因此，敬畏是北欧精神的基本特征，对无意识生命的宗教敬畏，这种敬畏比所有意识都更强大。这种伟大的敬畏感知道，人只能通过思想和概念来把握事物，却永远无法洞悉其本质的秘密；它觉得世界根本无法把握，因为只有事物、死物可以把握，而本质、意志却无法把握，无法理解。面对存在的巨大奥秘，人必须谦卑地接受自己的局限性；他不必试图解释，但可以沉浸在对世界的敬畏探究中，满怀不安地试图解读世界的深邃和黑暗。因此，北欧精神本质上是沉思的；它不求理解和解释，只求洞察。它完全不关注外表，只关注内心深处，并深入探索。就像孤独的矿工在寂静的地下通道中徘徊，北欧精神“浮士德”也深入黑暗的深渊，来到坐在生命之源的“母亲”身边。这种精神也以科学和探究的态度对待事物；但正如歌德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北欧的研究从不拘泥于扼杀生命的僵化概念，而是试图从现象中把握思想、内在的正式思维。它认为现象不是死物，而是可塑的、有生命的形式，是人格。因此，它不寻求有目的的“解释”，而只是从其内在的完美性出发进行思考。

北欧精神是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它怀着敬畏之心接近自然，以便进行研究或思考。只有这种宗教观和研究才能打开通向世界深处的视野。因此，北欧宗教意识无处不在，

为生活服务。自然科学为其提供理论知识，这些理论很快被重新评估为实用工具。宗教从高处伸出援助之手，而哲学则勾勒出存在的某个方面，试图揭示无意识中的内在意义。甚至艺术，它像一面纯粹的镜子捕捉世界的形象，也不是一种消遣，而是试图提升生命意识，从而提升意志。

因此，血液和精神是紧密相连的。精神牢牢扎根于潜意识，而塑造和塑造文化的创造力正是源自潜意识。只有当血液本身通过所有意识在创造中发挥强大作用时，真正的文化才有可能出现，而国家、教会、法律、艺术、科学、宗教等伟大的文化形式并非随意构想和制造，而是从潜意识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文化，尽管可以自由地由个人设计，但它像所有生命一样，具有植物般的生长方式，意志通过教堂、国家和哲学体系表达出来，其内在方向与驱动植物叶子和花朵的方向相同，并决定着动物本能的存在。我们称之为有机内在需求，在动物中我们称之为本能，在人类中我们称之为性格，称之为风格。风格是血液的内在需求，是赋予文化统一、一致态度的形式。

因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只有当纯粹的种族血液承载着文化时，文化才有可能。一旦种族败坏，血液就会失去其创造性的强大动力。精神只是血液的仆人，它不再对血液感到有义务，变得独立，从生命中解放出来：人类的意识变成了纯粹的理性。这种非宗教的理性以一种自命不凡、不敬虔的方式面对存在，它不再追随血液的冲动，而只遵循其冷酷的逻辑。理性是纯粹的数学；它与自然科学或形而上学都没有共同之处。它只有一个功能，即形成抽象概念的无尽逻辑链。理性将这种特殊的因果结构转移到整个世界，看到无处不在的因果联系和关系，生命本身似乎是一种机械功能，一切都可以从逻辑上解释。它屈服于“发现”自然法则的错觉，而事实上它只是认识到了自己的智力结构，这种结构在宇宙中就像一个欺骗性的海市蜃楼。我们知道伟大的北欧思想家康德是如何果断而永久地纠正这种理性的错觉的。

因此，内心完美的崇高理念也与理性完全格格不入。它从因果关系中看到存在的意义，并由此理解了所有神圣纽带和内在需求的逐步解决，直到对生命本身的彻底否定。进步是理性的抽象趋势，它试图摧毁“不合理”的历史和文化形式，因为它们与血液有关，并用“合理的”结构取而代之。

当这一目标实现时，血液的有机创造就被摧毁了，赞美人类的时代开始了，其特点是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只有血液连接，理性才能分离。因为，所有现象的本质没有内在的统一性；因为，只有孤立的事物存在，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因此，理性对人类的血缘关系也没有意义。它既不把家庭也不把民族视为有机单位；它唯一的单位是不可分割的。个体是分析和计数智能的分析概念，它不再将人类视为具有个性的个体，即被血缘束缚的人物，而只是纯粹的数字，是终极的、独立的和不可分割的单位。**这样，无数原子就产生了，它们彼此之间或与任何超个体力量都没有内在的有机关系。由于这些被称为个体的原子既没有通过血缘相互联系，也没有被共同的生活（种族、国籍）束缚，它们形成了绝对自由的意识。个体被抛入没有命运的空旷空间，想象自己是自己存在的无拘无束的主人。**

只有理性，凭借其逻辑思考和抽象原则，决定着人的行为，因为个体不再有任何内在需求。内在需求是纯血统的呼声，当与血统的每一种联系都被打破，血统本身也被玷污时，它就不再对意识有任何影响力。只有当自我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而不

是一个死板的数字时，人们才会感受到内在需求。但是，通过打破所有种族和宗教联系并宣扬个人自由，理性将人孤立起来，让他在空旷的空间中依靠自己的资源生存。

那些曾经紧紧依附在生命之树的支撑和滋养主干上的人，现在就像枯萎的树叶一样暴露在生存的风暴中，他们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稳定性和意志。在这种存在中，每个人物、每个个人印记都迷失在漂浮的谷壳中，没有方向，没有意志。生活变得漫无目的、混乱不堪；内心失去了指引，指引人们沿着自己的道路直行，而只有纯粹的血液才能赋予这种指引。但这些没有个性的个体汇聚在一起，也变成了没有方向的大众；理性现在可以宣称普遍平等。

理性无法理解善良和品格，也无法理解生活中丰富多样的形式。它的任务是将这个形式的世界简化为几个抽象的类型，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模式化，人类的思想才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到某种秩序，从而在概念上把握它们。只要理性在服务生命的过程中完成这一任务，它的类型化和模式化就不会危及生命。只有当理性脱离了意志，强行将本应服务于生命的模式化概念强加于人，并试图将自然、世界和历史纳入其划一的规范时，理性才会变得危险。

生命以其不可抑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如今被框定在抽象的概念中，所有的特殊性都被抹平了，因为理性不容许在其统一扁平的形象中出现任何令人不安的差异和崇高。因此，基于血统的人、阶级、民族和种族的差异必须消除！只有一个没有血缘和肤色的大群体，即社会或“人类”，在这个群体中，一切特征和卓越之处都必须消失。因此，理性反对一切种族和民族界限，反对一切形成和自我发展的个性。理性是普遍的、民主的；它希望群众一致，个人平等。自然只关注内在需求，询问其目的甚至其固有的终极目标都是毫无意义的。然而，由于理性无法了解内在的必要性，它在探索生命的意义时，看到了世界中的因果目的，然后，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从这些目的中“解释”它们。**到处都在为保护物种而奋斗的原始自然驱动力被自我意识到的理性目的所取代，后者只考虑个人的福祉。“享受并死去!”理性向那些漫无目的、对生存的神圣意义一无所知的人呐喊。**

欲望被提升为生命的真正和最高“目的”，“为尽可能多的人带来最大可能的幸福”被宣布为人类进步的目标和理想状态。但这种普遍的欲望只有永恒才能保证。因此，在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三个假设：博爱。因为正如生命是一场永恒的斗争，幸福只能存在于英雄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中，自私的进步主义者也会逃避与之相关的斗争和牺牲。“合理的世界观只能是和平主义的，因为‘自由’的个人希望保持自我，而不是牺牲自我。只有不断进取的人生才能做出牺牲和战斗。理性的兄弟情谊与真正的血缘兄弟情谊不同，后者建立在共同牺牲的基础上，而前者没有任何道德基础。这种兄弟情谊只不过是懦弱、追求享乐的和平主义，是保证普遍享乐的契约。

然而，这种肤浅的幸福哲学却用理想的道德短语来掩饰自己：理性、幸福和“Lugend”被天真地等同起来，并由此产生了美丽而尊严的著名生活，至少在理论上，羔羊和狮子可以友好地在一起吃草。人们已经忘记了所有生命的简单而永恒的意义，忘记了那种渴望通过奋斗完善自我的意志。“永恒和平”的时代已经不知道战争是所有存在的本质，我们为了保护和发展生命而战，这种战斗根植于家庭和民族，深深植根于血液之中。这个自私的时代已经不知道幸福就是命运，即服从超个人的内在要求。因为幸福

从来都不在于追求个人成功和享受，就像理性欺骗了“开明”的人，幸福只在于帮助建设生命并为之做出牺牲的神圣感觉。摆脱生存的巨大束缚，只会导致自私的孤立，从而陷入孤独和彻底的绝望。

但幸福与宇宙之源和所有生命息息相关，是永恒的创造之工中幸福的一部分。但文化到此为止，文明时代开始，其特点是冷酷的唯理论，概念对生活的绝对统治。从血液中孕育出的伟大文化创造，如今被理性的抽象结构所取代。成长起来的传统屈服于教条主义理论；历史形式因其中创造力的消亡而停滞或崩溃。它们被到处充斥着死气沉沉、纯粹机械运作的人造系统所取代。这种概念的统治像永恒地牢的栅栏一样封闭着生命，并且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

一个“理性的”世界秩序已经取代了自然秩序。但正如道德世界秩序体现在自然界鲜活的形式和表象中一样，理性的世界秩序也努力以一种可塑的方式呈现自己。它也抓住了物质，但它没有赋予其生命，它无法为物质注入创造性的气息。它只需要将概念具体化，这些概念现在以死物形式存在于纸张和金属中。在科学和哲学中，死纸的统治开始了，印刷的规则和概念体系开始统治一切。在法律、国家和教会中，死文字战胜了生命，生命被埋葬在“合理的”容器、段落和教条中。然而，概念在经济领域中凝固得最可怕、最灾难性的地方，它们在机器和金钱的无生命结构中具体化。金钱和机器只不过是金属中的纯粹理性、因果关系、数学和逻辑。在技术的巨大发展中，理性成为存在的女主人，紧随其后的是雄心勃勃的现代货币体系，其具体化的概念——金条和支票——统治着整个经济生活。工厂、高炉、风车塔、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就像可怕的堡垒一样，现在坐落在地球上，迫使鲜活的血液进入它们的恶魔圈。

一个由钢铁、纸张和黄金组成的第二个世界无情地压在了自然界之上，这个物质化的世界理性傲慢地统治着整个地球。可以说，机器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它没有内在的力量，只有机械的功能。这个时代不再相信命运、内在的必然性，甚至不相信世界深不可测的终极意义。所有生命都不过是因果关系机械产生的外在喧嚣。这就是为什么文明没有真正的悲剧感，而悲剧与一切必然的事物一样，无法避免。英雄主义也是文明所陌生的概念，因为英雄主义与所有生命一样，是命运的必然。生命只有一个愿望：变得内心完整，不断成长，即使这意味着牺牲和痛苦，甚至意味着毁灭。

但在文明机器般的喧嚣中，人现在真的只是这个巨大世界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随着纯血的消失，人的创造力也随之消失。他可能摆脱了内心的束缚，但这恰恰是他的失败之处。由于血液的力量不再以令人信服和决定性的力量在他体内产生，没有内在的必要性支撑他战胜世界，因此他毫无支撑地跌倒在事物的强迫之下，现在在他看来，这些事物就像分散的原子一样巨大而不可逾越。只有那些感到自己由血液、意志、生命本身所支撑和驱动的人，才拥有征服世界和死亡的力量，即使在十字架上，也能战胜一切。理性个体不再拥有这种力量。在追求外在自由的过程中，它放弃了内在，从而失去了塑造世界的创造性优势。个体不再凌驾于事物之上，而是深深处于事物之下；它“客观地”思考，因为它不再拥有亲自行动的力量；它成为事物的自愿奴隶。它屈从于自己的理性，没有意志，崇拜其客观化的概念，即段落、教条、法律、黄金和机器。它对鲜活的创造物充满仇恨，对历史形式充满仇恨，沉溺于死板的、理性的

结构中。因此，从文明的知识主义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哲学唯物主义、缺乏创造力的客观性、对无生命的事物和材料的奴性崇拜。

在科学、艺术、国家、教会、经济领域，处处都是物而非人的统治。但今天，这种悲惨而真正令人痛苦的奴役，在毫无血性的智慧看来，仍然是智慧的最高结论！北欧世界秩序的衰落首先发生在西方国家。自民族迁徙以来，建立国家、经济和精神文化的条顿血统，在前帝国的罗曼种族混乱中逐渐但不可避免地走向枯竭。与血统相关、意志坚强且富有创造力的北欧人格，正日益被没有种族归属的个人所取代，**他们不再遵循纯粹血统的冲动，而是遵循理性的专横。**

北欧人种逐渐消亡，在各个世纪中逐渐瓦解，演变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他们迟早会沦为无种族理性的牺牲品。

血液不再是精神体验和形而上学关系的载体，而只是无节制的感官欲望的源泉。 种族变成了大众，国家变成了无形的堆砌。对于这个毫无原则的暴民来说，法国大革命前存在的北欧国家及其与个人和贵族阶层的联系，肯定显得毫无意义，因为暴民以及国家的封建和神职支持者都不再认可这种北欧秩序。普鲁士王室本身作为社会主义的最高体现，通过路易十四宣布：国家即我，从而打破了社会主义的联系和纽带。当时，北欧国家不仅在 1789 年，在法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历史只是后来才揭示其必然的后果。自我即国家的口号成为整个世纪的口号，直到个人在法国大革命中庆祝其可怕地战胜了社会主义，北欧贵族陷入了混乱。

当罗伯斯庇尔站在血泪之海和丑陋的狂欢中，将理性奉为女神时，这一事件就充分表达了这些暴行、这场可怕灾难以及理性战胜历史的全部可怕含义。当北欧人的鲜血在断头台下流淌，当暴民战胜了流血至死的种族时，所有“理性”努力最终必须达到的目标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彻底摧毁有机生命！理性与血腥创造物的斗争，即历史现象，只是序幕；这场毁灭之战是针对血腥本身，针对纯粹的种族，而暴民则成为血腥的刽子手。因为纯种人抵制混乱，并永远捍卫道德世界秩序、社会主义和贵族。因此，混乱必须以对北欧人种狂热的仇恨来对抗，并以不可磨灭的敌意来追求纯种人。

但这样一来，理性对纯种人发动的灭绝战争就变成了对生命本身的灭绝战争。只有纯种才能将个人的利己主义团结起来，并愿意为维护和促进生命而做出牺牲。混乱不希望再有斗争、牺牲和生命的进步，它只希望自由、平等和永恒的和平。理性的个体希望享受，但不愿为未来的生命做出牺牲。因此，它杀害了母亲腹中萌芽的生命，因为孩子对它来说是一种负担和诅咒。“享受并死亡”是存在的合理格言，或者正如蓬巴杜侯爵夫人所断言的“洪水过后，我们再来！” 这场理智与生命的战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初具雏形，时至今日仍让我们心有余悸；这是“完美人性”时代第一次出现在被理性口号迷惑的世界，人们深感恐惧；这是人们渴望已久的、充满悲怆的、美丽而尊严的生活，是完美理性的理想时代！

人类，或更确切地说是动物的各种激情的爆发，所有人之间的野蛮斗争，欲望和残忍的单一地狱般的嗜血——这就是“永恒的和平”，这就是“自由”、“平等”和“普遍幸福”，这就是“理性”和“美德”，这就是“人权宣言”！北欧世界发出一声厌恶的呐喊……被奉为神圣的理性在世界历史面前俨然成了血腥的罪犯。

法国大革命有时被比作德国宗教改革，甚至被视为后者的政治继承者。这种判断只是非常肤浅的考虑。任何真正想要批判性地评估这两个历史现象的人，无论如何都必须看到决定性的事情不是发生在各个地方的历史强权的推翻，而是必须寻求推翻的驱动力。然后，这两个事件性质的根本区别很快就会变得很明显。

在宗教改革中，北欧人为内心的自由而战，为听从内心和血液的召唤而战；他为内心的必然、命运和意志而战，他捍卫内心的必然和意志，将其视为“信仰”，以对抗教条的胁迫和学术理性的束缚。另一方面，在法国大革命中，个人在没有方向感的情况下，摆脱了所有内在联系和必需品，跌跌撞撞地陷入了所谓的理性自由，陷入了混乱的无限荒谬之中，在短暂的流血恐怖之后，人们感到这比最糟糕的束缚更令人压抑。

正如宗教改革是理性战胜血腥的胜利，革命也是理性战胜血腥的胜利。宗教改革是北欧人种的一次上升，而革命则是其一次下降。古老的条顿法兰西不复存在。在北欧国家的废墟上，疯狂暴民肆虐的个性主义横行；腐朽的血液已丧失了创造力。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毁灭性痉挛。混乱中并没有涌现出创造性的意志，因为波拿巴不是创造者，而只是这场巨大毁灭的恶魔执行者。他是这场革命的执行者，是理性与北欧历史对抗的执行者，在它的残酷打击下，旧欧洲整个国家的封建制度崩溃了。**在自由的热血中汹涌澎湃的群众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专制的暴君。**

正如一个种族纯粹的民族中最重要的个人以一种血缘关系为人民服务一样，在个人利己主义泛滥的种族混乱中，最强壮、最残忍的 将坚持自己的立场，对抗所有其他人，并成为混乱旋转的人群中的凯撒式人物，因为选择法则总是有效的，在这里，它体现在所有人之间的斗争中。但这种选择不再是为了生活而进行，生活需要坚强的个性来发展更高的个性；这种选择是为了支持一种妄自尊大的理性，这种理性想要支配生存法则。受约束和服从的个性，其中超个人的血缘力量在起作用，与自由和霸道的个性相对立。

拿破仑-波拿巴不是一个贯彻血液、命运和历史的意志的创造者。他实际上只是一个残酷、无视历史的人，他毫不尊重千年的历史，为了王冠、国家和人民而冒险。这种原因不顾历史传统和血缘关系，随意建立国家，转瞬又将其消灭，就像革命一样，**为了实现其奢侈的抽象理论，不惜血流成河。**

如果 这位科西嘉冒险家在革命法国的焦土上成功地维持了自己的地位，因为他将尚未被鲜血扼杀的群众释放的力量引向了无休止的海外军事行动，从而耗尽了这股力量。但他非常善于向法国人展示自己，把自己塑造成革命意志的化身，成为群众力量的至高体现。事实上，他非常小心地不去触动人民形式上的平等，因为他非常精明，知道不团结、混乱的群众是专制统治最好、最稳固的基础。但即使科西嘉人倒台后，法国也不再可能建立一个“国家”。一个基于公民奉献和忠诚的国家无法在无政府的大众中实现。它既不可能被创造出来，因为创造性人物无法在大众时代出现，也不可能自我主张，因为没有整合或从属关系，没有社会主义。

因此，真正的国家被契约社会取代，即由理性构建的社会秩序。在经历了人人自危的可怕经历后，人们机械地同意将某些个人权利让渡给“社会”，以保障彼此的生活和享受。所谓的“所有人的意志”就是统治，即所有个人意志的总和。但由于个人意志的愿望本质上经常相互冲突，因此，拥有最多选票的“多数派”的意愿方向具有决定

性。因此，理论上所有人的意愿实际上由纯粹数量上的多数派意愿来代表。为了确定多数派的意愿，公众被公开咨询。人们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不同倾向，并派出这些倾向的代表（称为政党）进入议会。只有精神迟钝的人才会认为人民的意志在这种议会中得到了真正的体现。人民真实意愿的生动表达，与命运和血液中模糊的冲动融为一体，始终是富有创造力的个性。**人民的真实意愿永远无法通过投票来决定，因为人民不是一个数字的总和，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

从这个有机意义上讲，参加投票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原子团，是由根据各自实际观点理性决策的个人组成的。因此，所谓的“人民代表”绝非人民意志的体现，而只是以数字形式记录和呈现的群众意志。这种集体意志并非是命运，也不是超越个人的国家需要。**它只是个人利己主义的集合，完全不是出于为国家服务的理念。因此，所谓的人民代表丝毫不觉得对国家利益负有责任。**最高权力始终属于党。所谓的人民代表只需维护党的利益。

但由于议员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党员当选的，因此根本没有个人行动自由，也就没有个人责任。在议会制国家，部长与议员个人一样，只代表本党的意愿，而不是整体利益，无论议员们如何郑重其事地申明。因此，责任转移到了政党身上，因为议员只是政党的执行机构。但政党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没有人愿意或必须承担个人责任。相反，每个人都躲在多数人背后。真正愿意承担责任的人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在议会、委员会和各个政党内部，一切都要通过投票来决定，**而多数人往往空洞无物，毫无个性可言，他们的意见往往左右了局势。**

然而，只有在个人行动自由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个人责任才有可能。你不能要求任何人为他人决定和做的事情负责。一个人只能对自己负责。**但正如在真正的国家中，只有凭借真正的能力和美德才能成为领导者一样，在议会制度中，那些卑鄙肮脏的阴谋家们也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晋升机会，他们除了贪得无厌的野心和对利益的贪婪外，对担任高级职位毫无建树。**当有内在价值的人通过真正的成就慢慢晋升时，这些卑鄙的家伙却往往以惊人的敏捷（甚至可以说是猿猴般的敏捷）爬到最高职位，获得最高荣誉。他们需要的只是足够的狡猾和厚颜无耻，再加上能迎合大众本能的巧舌如簧，就能为“有能力的人”扫清道路。因此，厚颜无耻的煽动者一边嘲笑真正重要的人被残酷的群众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一边一步步往上爬。不用说，这种政治骗子没有丝毫责任感。

这些可敬的人只是把他们的职位看作是养肥他们无耻的贪婪和虚荣的丰厚福利。其中一些特别善于维护个人利益的人，后来成为政党领袖和部长，同时狡猾地将自己的野心计划伪装成党的目标。如果你想要让这些懦夫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就会立即以正义的姿态大声疾呼，将一切责任推给党。民主这个词被用来指代整个无政府主义体系，而我们却给它冠上了人民国家的美丽名称，这是非常荒谬的。真正的人民国家是由负责任的领导人组成的，他们视自己为人民社会的公仆，无私地为人民的福祉和伟大而奋斗。这些领导人是从人民中自然产生的，他们不是通过机械的投票选举产生的，而是凭借其品格和能力成为领导者的。这种有机领导并不依赖于多数人的支持，而是由人民的信任和热爱所支撑，人民心甘情愿地追随它。另一方面，民主是一种抽象概念和公式的系统，它不是像真正的民主体制那样的有机体，而是一种违背生命中

所有自然法则的僵死结构。这种机制只具有纯粹的形式意义，因为所谓的“人民统治”及其所有死气沉沉的功能只是空转的齿轮，而实际上还是少数人统治。

然而，这些人不再像真正的民主体制中那样，由天生的领导者组成，而是主要由那些在民主时代才崭露头角的可疑分子组成。因此，这些所谓的政治家们所追求的并非国家的福祉和伟大，而是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党派利益，因为党派利益背后隐藏着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力量。

因此，在真正的民主体制下，人民可能对事务的处理没有发言权，但会得到公正和良好的治理，而民主则假装人民自己治理自己，而少数精明的骗子巧妙地牵着他们的鼻子走。用形象的说法，民主体制是一个民族的堡垒，忠诚的人站在它的城垛和塔楼上。然而，民主只是一个傀儡戏，在幕后操纵着的是最狡猾的欺骗者。

大自然则像一个无情的法官，对法国的可怕背叛进行报复，对法国与千年日耳曼历史的疯狂决裂进行报复。**法国民族已经深陷民主的种族泥潭，甚至以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名义向黑人出卖自己堕落的血脉，这样的法国民族在这个地球上没有未来。攻占巴士底狱、理性取得胜利，最终将导致民族陷入混乱……**

如果说法国开启了个人政治“解放”的大门，那么英国则开启了经济“解放”的大门。推动力是蒸汽机的发明和随之而来的工业的强势崛起，这迫切需要更自由的经济活动。在工业的故乡英国，自由贸易理论应运而生，为经济个人主义打开了所有大门。

因此，生产的重要意义、整体利益开始让位于个人利益，即“商业”，后者在经济生活中开始变得日益强大且无情。追逐利润、追求轻松而丰厚的收益成为普遍口号，紧接着人们又呼吁实现最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其结果就是形成了我们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经济理性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商品在这里出售，生意在这里成交。在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中，国家只扮演令人不快的警察角色，人们勉强容忍警察的存在，因为毕竟即使在市场里也必须维持某种秩序。否则，它就会受到最少的尊重，因为决定命运的是经济，而不是政治。不再是刀剑、有组织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决定着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是煤炭、钢铁和股市。讨价还价的商人取代了英雄，生活不再是斗争，而是一场商业交易。

自由主义与民主一样，也梦想着永恒的和平，认为商业将因此更加繁荣。英雄主义被克服并得以幸存，成为昨日不切实际之人的童话。人是为了做“交易”而存在的。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分享利润，因为人们想要出售的价值只能通过无私的创造性工作来实现。**因此，总有人不幸或头脑简单，愿意从事这项工作。这些可怜的傻瓜，靠他们的劳动为生并从中获利，被称为“工人”，就像蜂群一样。人们以某种方式支付报酬，以保证他们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否则，他们的劳动成果就会落入他们自己的腰包。但是，由于这些可怜虫可能有一天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可能通过暴力手段来索取被窃取的劳动果实，他们只能忍受无处不在的干涉，因为总得有人来确保“法律和秩序”。**在自由主义看来，国家只是保护财产的守夜人或保安公司。

与保护个人财产免受侵犯的真正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国家片面地维护所谓有产阶级的利益，即使民俗因此消亡也在所不惜。整整一千年，北欧自然与西方理性一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在哥特时期首次得到反抗——那时，北欧自然仍然是一个被束缚的巨人。

在神秘主义中，这种对理性结构进行永恒抗议的浮士德精神完全转向内心，并埋没在原始存在的深处，在马丁·路德身上得到了有力的体现，信仰，即向上奋斗的意志，突破了学术理性的教条体系。人格内在完善的圣权与行为正义的哲学相抗衡，和平主义的隐居避世被征服世界的北欧理念所取代。北欧人的意志以征服世界和追求内心完美的两大目标为英雄主义行为提供了解放。正如这种意志在德国公爵中抵制罗马国家观念中人口过剩的普遍主义，在宗教改革中抵制罗马教会的理性教义和普遍权力诉求，在普通百姓中愤怒地反抗建设性的罗马法律。风暴和压力、浪漫主义引领着伟大的斗争，捍卫着鲜活的人格、鲜血、宗教和历史，对抗启蒙运动和西方人文主义的世界资产阶级思想。

当时，北欧崇尚纯粹理性的精神与西方哲学体系中的生命观相抵触，反对其强大而胜利的批判，从而为“事物本身”、意志、生命而战，直到永远。然而，尽管有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尽管有贝多芬的音乐和歌德的宗教世界观，理性思想还是渗透到了德国，毒害了北欧人的心灵。尤其是所谓的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建设性思想体系，在德国也传播了虚无主义的理性崇拜，从而为西方精神的入侵打开了大门。

这种完全抽象的哲学至今仍被德国教授奉为德国知识成就的巅峰之作，它宣扬“绝对精神”和“至高无上的道德自我”是最高价值，为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入侵提供了哲学依据和思想背景。这为北欧世界的理性个人主义铺平了道路。从这一点来看，叔本华对理性哲学的强烈憎恶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哲学启蒙引发了北欧有机世界的大解体，随之而来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如今正在冲击北欧的社会主义和北欧贵族。

因此，在德国，血液与意识之间出现了危险的暗流，并在 20 世纪爆发，成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对整个北欧世界的存在提出了质疑。当然，今天世界的本质仍然抵制和否认血液、命运和英雄主义，不仅剥夺了生命的所有尊严和伟大，也剥夺了所有的美丽。孤独而饱受误解的德国，这个神秘的国度，坐落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其北欧灵魂中蕴藏着神秘的力量，尚未被无情的人类所摧毁。在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中，西方理性试图彻底摧毁这座北欧自然之堡。在灰色的德国国民军中，沉默的北欧灵魂展开了尼伯龙根式的战斗，历史、意志、生命、纯正的血统与纯粹的理性展开了对抗。“哥特式野蛮”与全球性人文精神、浮士德式人格与文明社会、真实世界观与纯文学展开了角力。如果北欧英雄德国在这场命运之战中屈服，那不是因为理性的军队，而是因为理性本身，它早已吞噬了民族的生命力。德国不再是曾经不可战胜的北欧堡垒。它甚至还没开始就已经输了。于是，混乱降临到了德国。

政治异见

总体而言，近十年来，我国政治异见领域（即反自由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然而，它仍然受到某些缺陷和幼稚弯路的困扰，阻碍了其发展。

异见圈子里充斥着**自我破坏和反革命思想。**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思想被巧妙地传播。在某些情况下，意识形态破坏是故意的，目的是分裂或瘫痪异见圈子。

即使这些思想可以融入埃沃拉或尼采的名言、或 50 年代美国家庭的照片或阿诺布雷克的雕像之中，它们全部都是反革命思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我们的领域中根除。

对异见领域的异见批评变得极其必要。

10. 幼稚的田园风情

总体而言，异见领域早已超越了与未来主义相关的某些历史乐观主义，转而对城市化、人际关系机械化、技术信仰以及背离自然和自然循环而导致的某些人工化进行激进批判。

在此之前，人们普遍将“乡村生活”理想化，比如“麦田里的金发女郎”和“森林里的小屋”（当然有 Wi-Fi）。决定住在小城市或决定耕种土地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当这被视为政治行动和战斗精神的替代品时。

事实上，在农业、耕作土地和更紧密的人际关系中，有一些值得庆祝的事情，但所有与此相关的事物都必须动员起来，作为一种象征，以激发一场具体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也应在城市中进行。在政治斗争之外，田园风情只不过是披着传统主义外衣的保守懦弱。

9.资产阶级家庭生活

异见人士圈子里广泛使用的另一种使自己的胆怯和懦弱合法化的手段是“今天真正的革命是结婚生子”这句座右铭，它与前一点联系在一起并不罕见。也许在非自愿独身者中，建立家庭的想法最终成为一项伟大的征服，但在那个环境之外，这句座右铭被高举起来，**令人震惊。**

显然，我们这个后现代晚期资本主义和身份认同模糊的时代，一定程度上重复了“天空是蓝色的”和“2+2=4”，因为在人们可以拥有“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作为性别的时代，与异性结婚并按照旧的方式生儿育女确实可以看作是来自不同世界的事情，**但结婚生子并不是什么特别具有革命性的事情，也不能代替政治行动。**

在所有传统社会中，延续自己的家族血统始终被视为重要，但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且，除了那些有着僧侣或类似职业的人之外，这也是最起码的事情。

在任何形式的真正传统主义眼中，这种话语不过是对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呼吁，家庭成为男人生活的中心，他关心的事情围绕着“付账单”和“成长”。

当你放弃政治行动，而去扮演“爸爸妈妈”的角色时，你只不过是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永久政治问题外包给了你的孩子。

8. 对政党政治的恐惧

异见言论中普遍存在某种反政治道德主义，将参与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一切行为都分析为“腐败”、“背叛”等。这种言论是典型的以异见政治激进主义为幌子的顺从幼稚主义。

从心理上来说，拒绝参与资产阶级政党政治表达了对成人世界的普遍恐惧。这是一种“彼得潘综合症”，但适用于政治。你无法加入政党，但你可以成为一个 30-40 岁、与青春期相比尚未成熟的“舞台”男人。

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世界以**妥协、交易、谈判、务实联盟等而闻名。**所有这些都让每一个异见人士感到愤怒和鄙视，这是完全有道理的。然而，在西半球几乎每个国家的具体条件下，参与政党政治是实现异见人士必须拥有的唯一真正目标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权力。**

因此，如果想要摧毁政党制度，扭转局面，尽快结束游戏，那么任何在这一领域没有参与或主动性的异见人士，尽管只是次要的，都必须被视为业余人士或等同于愚蠢的青少年无政府主义者。

7. 懒惰的自发性

如果你问列宁，或者他的意大利继承人墨索里尼（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列宁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他们强调看不见的蚂蚁工作：花费数小时打字，浪费时间决定和组织平淡的后勤问题，为当地小报纸撰写文章或与十几个人演讲。**

革命政治行动一点也不浪漫。浪漫主义后来才随着革命诗人而来。

针对这种往往乏味的现实，许多异见人士主张“人民觉醒”。他们的观点是，最终（救世主式的、千禧年的“最终”，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几千年后……）人民会厌倦“现有的一切”，然后自发地起义，推翻政府。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4chan 上那些满脸青春痘的肥胖青少年会以天生的首领和天生的刹帝利的身份带领起义群众。读过奥特加·加塞特的《群众的叛乱》或勒庞的《群众心理学》后，这种幻想就会烟消云散。这种对群众自发觉醒的懒惰信念通常与前一点有关，即对政党政治的恐惧。

一般来说，任何对加入政党、质疑选举等行为的人表示厌恶的人都会认为，如果我们传播足够多对大屠杀主义的批评，以及蒸汽波美学中的裸体雕像图像，最终“那里的一切”都会改变。

6. 理想主义的失败主义

说实话，我从未认真对待过那个老观点：在体育运动中，重要的是竞争或“尽最大努力”，而不是获胜。显然，最重要的是胜利！赢得奖牌！声名鹊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

同样，在政治上，每当我听到持不同政见者圈子里有人开始含糊其辞地说“最重要的不是获胜，而是……”时，我总是本能地转过头去。

现在，如果你对获胜不感兴趣，你在政治上做什么？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许多异见人士都认为，“正确”的意识形态会预先授予“道德胜利”，这使得任何具体、客观和历史性的胜利都变得可有可无。**你可能是一个被孤立在网络里的无名小卒，**但 Facebook 页面有 200 人关注，但因为你读过几本尤利乌斯·埃沃拉的书，你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刹帝利，你注定要进入瓦尔哈拉殿堂。或者你可以有一个几十人的“运动”，除了出去喝酒和自拍几次外，**什么也不做。**

如果有人问这些异见人士，他们假装在做什么来夺取权力，或者为什么事情似乎没有出问题，他们肯定会告诉你“一切都是[在这里模糊地插入犹太人、共济会成员、穆斯林、共产党员或他们所有人]的错”。当然，他们没有战略，甚至没有一个合理的简单计划，这不是他们的错。

瞧：他们至少可以尝试一下。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做不到。“道德上的胜利”已经让他们心满意足。这些人陷入前面描述的所有意识形态恶习的情况并不罕见。

5. 天真的加速主义

通过与另类右翼异见人士圈子接触，我们受到了“布加卢”神话的严重感染，在我们的圈子里，不乏持不同政见的人，他们坚信“体制”正濒临崩溃，甚至明天整个世界都可能变成一个疯狂的麦克斯式的场景。

无论是因为石油峰值、机器革命、全球内战、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可持续性，还是任何其他原因，具有某些生存主义倾向的持不同政见者（通常只在虚拟世界中）都在为“末日”做准备。

因此，他们断言，他们将走出街头，以恢复“传统社会”。除了他们将在街头面对红色指挥部、军政府和“正义联盟”（这可能是一场悲剧）这一事实之外，主要问题是，**这种情景是一种幻想，它消除了有条不紊的战斗、革命进程的细致建设和政治实用主义的需要。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需储存金枪鱼罐头和一把 .38 口径的手枪来“保护家庭”。**

这类异见人士不愿意识到的最大恐惧是，我们已经“走到尽头”。如果任其发展，这一“走到尽头”将永无止境。将“末日临近”改为“这永远不会结束”。

4. 持不同政见的托洛茨基主义

持不同政见者圈子里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这不仅仅在巴西存在）是某种宗派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建立在意识形态清教主义的基础上，将次要问题上的任何微小分歧转化为主要矛盾。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看到的不是庞大的异见组织（当然还有它的变体），而是无数的民族社会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组织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成员人数在 1 到 20 之间，而且这些组织一出现就会消失。

有时，这并不是意识形态清教主义的问题，而只是异见人士的自负问题，**他们无法适应等级制度，无法遵守革命纪律，因此会因任何个人分歧而分裂。**

3. 政治通灵术

黑白照片，不断提及已故的政治偶像，书目列表几乎完全被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布满灰尘的旧书占据，主题涉及电动汽车等当前话题。

我们所有人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我们继续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许多团体的异见宣传渠道中，甚至在他们的个人资料中。

许多异见人士都是过去的囚徒。缺乏感情？这很难说，但当我们不得不处理当代话题和原创当代作家（而不是仅仅评论者或死者复述者）时，**这些异见人士似乎感到不安全，甚至感到受到威胁。**

对于这些异见人士来说，**传统不是一盏通向精神解放的明灯，而是一大堆链接**，让你不断重复口号。比如后自由主义世界有“政治正确的独特思想”，异见人士世界也有“政治不正确的独特思想”，其基础是将任何与第三政治理论有关的已故者所写的作品都视为圣经。

试着做一个乐观主义者，至少它不像自由左派那样，把《哈利·波特》系列书籍变成了他们的圣经……

2. 伪传统反国家主义

无论是由于自由主义的渗透，还是仅仅出于吸引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机会主义，在异见人士中都存在着少数人，他们故意没有充分区分对现代国家的批评和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批评。

显然，这些“神权主义者”会幻想他们的博学自由主义带有所有可能的传统调子，从尼采的引文中，到呼吁“自上而下的批评”，再到幼稚的精英主义。但结论是一样的，必须摧毁国家，以便日后“重建”，只是这一次是传统的、真实的、有机的。

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联盟对这些批评的支持并无鼓噪，这引起了人们的真诚怀疑。

事实上，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任何国家，即使是现代国家，都比陷入后现代无差别的混乱和异常要好。国家，就纯粹的形式而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也不符合无政府主义。这是埃沃拉政治思想的基础。

这是一种特殊的“传统主义”，它结合了福柯自由主义、托尼·内格里和迈克尔·哈特的自治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结合了穆瑞·罗斯巴德和汉斯-赫尔曼·波普的思想。在马科斯·吉奥的案例中，这些观念最终与支持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意思是“保卫阿萨德就是保卫现代和反传统的国家”。这些论点也会出现新纳粹分子身上，他们假装为支持乌克兰针对顿巴斯人民的恐怖主义以及反普京主义辩护。“普京是资产阶级!”

所有这些都是普遍弱化国家权力以实现“更公正秩序”的倡导者。

显然，我们知道这背后的原因以及这些想法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

1. 边缘拜物教

询问过去 50 年来任何一位持不同政见的思想家关于“该怎么办？”这一基本问题，他们都会一致认为，需要汲取葛兰西的源泉，以便能够促进我们思想的制度渗透。

必须创作学术内容，必须加入工会并积极参与其中，必须开展基层活动并组织社区，必须创作异见艺术作品，必须与政党建立联系和影响力网络，必须利用社交媒体来努力传播流行的异见思想。为了普及，我们会坚持下去。不要增加“边缘人”的数量。

然而，仍有许多异见人士会坚持最天真的边缘行为，同时假装激进分子。**使用动漫头像的虚假账户、完全疯狂的阴谋论、以及许多引起普通人厌恶的举止和癖好，即使是那些有异见倾向的人也会厌恶。**

现实情况是，很多人更喜欢成为小众政治群体的一部分，而这个群体通常被大众媒体和公共机构所忽视，因此他们会尽一切可能，甚至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压制异议。

女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邮报

介绍

女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要细致的研究，挑战根深蒂固的信念，揭示当代话语中常常被掩盖的历史融合。早期妇女参政论者参与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法西斯运动，揭示了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面，强调了这些领域中难以简单归类的女权主义努力。鉴于普遍存在的误解是由无知或仇恨引起的，尤其是在现代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中，消除围绕法西斯主义对妇女权利立场的误解变得势在必行。

尽管法西斯主义具有准保守主义倾向，但它并没有普遍反对女权主义理想或严格执行传统的性别角色，而是蕴含了进步元素，主张女性参与劳动力、母亲支持系统和女

性融入治理结构。这种细致入微的理解重塑了我们对女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相互作用的看法，阐明了挑战简单化叙事的多种参与方式。通过仔细研究法西斯运动中某些派系所倡导的进步改革，特别是在性别问题方面，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敦促重新评估塑造当代性别、政治和社会转型观念的历史交汇点。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历史记录显示，意大利早期的众多女权主义者是法西斯主义兴起的重要推动者。这些女性与以革命热情而闻名的激进团体“Squadristi”密切相关。

其中一位杰出人物是伊内斯·多纳蒂（Inés Donati），她是意大利战斗法西斯团的一名年轻活跃成员，该团因与共产主义团体的激烈对抗而著名。1921 年，多纳蒂献身于法西斯事业的志愿服务，并在法西斯政客的宣传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经常遭到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的敌视，但她仍然毫不气馁，在威胁中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勇敢和坚定。

多纳蒂是一支准军事部队的成员，该部队主要由来自意大利中部的“小队”成员组成，在反法西斯分子策划的一次重大总罢工中，该部队有效地控制了罗马。她参与的领域扩展到紧急援助工作，她是参加法西斯分子策划的关键罗马游行的杰出女性之一。1923 年，为了表明她对国家安全的持续承诺，她申请加入新成立的准军事组织“黑衫军国家安全志愿民兵”。

墨索里尼这样评价她：

“我很早就知道她的名气，知道她是一个凶猛的意大利人，一个不屈不挠的法西斯分子。”

——马丁·布林克霍恩在《墨索里尼与法西斯意大利》中引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话

1924 年，伊内斯·多纳蒂的健康状况恶化，于 11 月 3 日在马泰利卡因肺结核不幸去世，年仅 24 岁。她死后，法西斯党将她尊为烈士。为了表示纪念，多纳蒂的遗骸于 1933 年 3 月 23 日被重新安葬在罗马维拉诺公墓的英雄教堂，标志着她成为年轻奉献精神的象征。此外，1926 年，马泰利卡的一家诊所以她的名字命名。1937 年 10 月 17 日，为纪念她的功绩，人们竖立了一座铜像，但不幸的是，这座铜像在 1944 年的游击抵抗活动中被拆除。

1922 年，国际女权大会在罗马召开，得到了国家法西斯党的支持。贝尼托·墨索里尼亲自出席大会，发表讲话，支持女性积极参与政治，体现了对女性参政的鼓励态度。

墨索里尼出席女权主义代表大会

1923 年 6 月 2 日，贝尼托·墨索里尼在帕多瓦妇女法西斯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演讲。

“法西斯主义者不属于那些贬低妇女的社会和政治重要性的失败者和怀疑论者。投票有什么关系？你会投票的！但即使在妇女没有投票或不想投票的时候，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妇女在塑造人类命运方面始终具有主导影响力。因此，勇敢地穿上光荣的“黑衬衫”并聚集在我们的旗帜周围的法西斯主义妇女注定要写下辉煌的历史一页，以自我牺牲和行动帮助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贝尼托·墨索里尼，《政治演讲中所展现的墨索里尼》（1914 年 11 月 - 1923 年 8 月）

法西斯主义在妇女联盟等女性团体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妇女联盟于 1919 年在米兰成立，此后不久也出现了类似的团体。这些女权主义组织转变为法西斯主义支持者一直是意大利历史学家谨慎对待的话题。在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前，妇女问题并不是政府政策的核心重点。然而，早在 1919 年，《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的第一份圣塞波尔克罗法西斯宣言就已经承诺赋予妇女投票权。这一承诺吸引了许多女权主义者，她们随后与法西斯运动结盟。

“按地区进行普选，比例代表制，女性享有投票和选举资格。”

— 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和 Alceste De Ambris，《意大利战斗法西斯宣言》

法西斯政权上台后，迅速兑现了解放女性的承诺，于 1925 年赋予女性选举权。同年晚些时候，该政权发起了第一次女性问题改革，成立了“全国母亲和儿童工作组织”。该组织旨在为母亲和儿童提供支持。1927 年，发起了一场鼓励提高生育率的运动。然而，大规模妇女组织的全面发展不得不推迟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

有趣的是，国家推动的组织之一是“意大利犹太妇女协会”。

为了满足女性积极参与和为国家社会奉献的愿望，政权开始在现代化和解放之间采取微妙的平衡行动。1925 年后，女权主义者将她们的努力转向社会志愿服务和文化活动，催生了一种新的全国性女性亚文化。**这种新形式的女权主义被称为“健康女权主义”，与人们认为的“虚荣女权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作为一个集体，女权主义者普遍对法西斯主义充满热情，很少有人反对它，主要是在保守派群体中。然而，这些官方妇女团体经常被史学界忽视，而更倾向于强调反法西斯主义的叙述，这种叙述将法西斯主义描绘成天生反妇女的，因为它据称坚持传统主义。

法西斯主义推行了广泛的母性政策，包括将堕胎定为犯罪、对产妇进行保护和支持、为已婚夫妇和新生儿提供贷款、为大家庭父母提供职业偏好、为家庭和儿童建立健康和社会援助机构等。

意大利女权主义者劳拉·卡萨特利（Laura Casartelli）对这种法西斯女权主义进行了最好的总结：

“她们真诚地热爱祖国，具有悠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情感，这使她同情法西斯主义者赞扬胜利、颂扬民族战争的纲领。”

——劳拉·卡萨特利在马丁·布林克霍恩的《女性与法西斯主义》中引用

瓦伦丁·德·圣波因特虽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直接参与者，但由于她参与欧洲艺术圈，因此与意大利未来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 1912 年，她发表的《未来主义女性宣言》引起轰动，引发了整个大陆的激烈辩论。 她的宣言主张通过将传统的男性和女性特征融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来解放女性的性表达。 她的作品影响广泛，翻译传播了她的思想，并将女性的角色置于未来主义话语的核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圣波因特的思想有助于塑造法西斯主义中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最终导致了“女法西斯主义者”概念的出现。

“一个用眼泪和伤感来留住男人的女人，远不如一个用虚张声势鼓励她的男人拿着左轮手枪控制城市底层的妓女：至少她培养了一种可以用来做更好事情的能量。

女人，长期以来被道德和偏见所误导，回归了你们崇高的本能——暴力和残忍。**为了不可避免的鲜血牺牲，当男人要为战争和战斗负责时，你们要繁衍后代，并在你们的孩子中，作为对英雄主义的致敬，接受命运的角色。不要为了你自己而养育他们，这会贬低他们，而应该在广阔的自由中，让他们充分发展。不要把男人变成感性需求的奴隶，而是激励你的儿子和男人超越自己。你们是塑造他们的人。你们拥有对他们的所有权力。你们亏欠着人类中的英雄，创造他们!"**

——Valentine de Saint-Point,《未来主义女性宣言》

唐娜·法西斯主义是传统和现代价值观的独特融合。她是一位母亲和家庭主妇，同时也是社会和国家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体现了法西斯主义对女性的理想。这种女权主义与自由女权主义不同，后者试图将女性与母亲身份分离，并鼓励她们参与传统上由男性担任的角色。相反，法西斯女权主义赞美母性，反对堕胎，维护家庭单位。因此，它与自由主义观点中的解放概念背道而驰。尽管法西斯女权主义没有达到自由女权主义那样的影响力，后者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一起塑造了战后女权主义格局，但法西斯女权主义在其历史背景下仍然是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代观点经常批评母性政策，但法西斯主义却将母性和母性视为美德。

1926 年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教育改革具有开创性意义，摆脱了长期以来的保守传统。当年的国家法规第 11 条规定，学术竞赛和考试对男女开放，但有一定的性别限制。这个时代还强调了女子体育运动，并建立了与男子组织相似的女子青年组织。1925 年 OMNI 的成立凸显了该政权对支持母亲和儿童（尤其是单身母亲）的承诺，该组织在 1975 年解散之前一直具有影响力。

在田径领域，被亲切地称为“小浪”的翁迪娜·瓦拉在 1936 年柏林奥运会上一举夺得意大利首枚女子 80 米跨栏金牌，甚至在半决赛中创下世界纪录。她非凡的成功使她成为意大利青年的优秀象征。此外，战争年代，大量女性加入了女性辅助服务队，承担了一系列重要角色，并在动荡时期展示了她们的积极参与。

英国法西斯主义

英国法西斯联盟主席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自认为是一名女权主义者，这与他的前瞻性观点相符。与墨索里尼对严格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厌恶相呼应，莫斯利可以被视为一位进步人士。此外，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成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权主义者。

“问题 31. 女性是否有资格担任（i）所有职团的代表，（ii）任何职团的代表？

她们将有资格加入代表其行业或职业的所有职团。此外，法西斯主义将首次为绝大多数身为妻子和母亲的女性提供有效代表。将为她们成立一个特别职团，在国家中享有特殊地位。该职团将处理诸如母亲和儿童福利等突出的妇女问题。此外，它将协助政府处理诸如食品价格、住房、教育和其他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务实的家庭主妇的意见往往比社会主义教授或老处女政治家的意见更重要。

问题 32. 在法西斯统治下，妇女的地位是否会有所下降？

当然不是。**英国的法西斯主义将坚持英国尊重和提升妇女地位的原则。我们当然要与现行制度的颓废作斗争，这种制度将妻子和母亲的地位视为次等。相反，我们认为这是人类和种族最伟大的职能之一，值得尊重和鼓励。**但女性将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假期。法西斯主义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说服和示范来对抗颓废的虚假价值观。”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关于法西斯主义的 100 个问题与解答》

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类似，英国法西斯主义也为女性实施了各种进步改革。**它并不是一场试图让女性服从于男性或恢复过时社会规范的反动运动。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总是着眼于未来。**

诺拉·埃拉姆（Norah Elam）在 1935 年发表于《法西斯季刊》的论文《法西斯主义、女性和民主》中表达了她对法西斯主义的看法，并认为莫斯利派法西斯主义是一场现代且具有前瞻性的运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友好的环境。女性占英国法西斯联盟（BUF）成员的 25%，在党内担任权威和领导职务，包括埃拉姆在内的几位女性被提名为 1936 年选举的候选人。这些女性成员的干劲和奉献精神在运动中得到了赞赏和认可。

莫斯利在 1940 年指出：

“我的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由女性的狂热所建立起来的；她们对理想怀有极大的热情。”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我的一生》

诺拉·埃拉姆在 1935 年《法西斯季刊》第 1 卷第 3 期上发表的论文中，热情洋溢地阐述了法西斯主义是女性利益和自由的真正保护者的观点。她还有趣地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原始妇女参政运动的自然发展，并将女权主义和莫斯利法西斯主义的利益点进行了比较。埃拉姆的论文强调了她对促进女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原则相容性的热情和奉献精神。

“在这种实际公民权的概念中，妇女的斗争与法西斯主义的新哲学非常相似。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是对上一代激进妇女提出的重大问题的合乎逻辑的、甚至更宏大的概念。相似之处还不止于此。妇女运动与法西斯运动一样，是在严格的纪律下进行的，不受任何党派的约束；其支持者来自各个阶级和党派。它呼吁妇女忘记私利；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放弃微不足道的个人利益和少数人的特权；并团结起来反对这种对种族福祉如此灾难性的制度所固有的错误和不公正。

与法西斯运动一样，它也选择了它的领袖，一旦选择，就赋予该领袖指导其政策和命运的绝对权力，表现出这个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忠诚和奉献精神。

此外，与法西斯运动一样，它面临着街头的残酷、反对者的嘲笑、善意者的误解和政客的怨恨。它忍受着现任政府的仇恨，最后还忍受着牢房的孤独和强制喂食的恐怖。站在空旷地方和街角的演讲者被剥夺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它的拥护者在出售其作品时遭到唾弃和辱骂；它的代表受到粗暴对待。妇女参政论者成了任何想私刑的流氓的玩物。更确切地说，任何诽谤都不能太卑鄙，任何中伤都不能太下流，以损害其领导人的道德品质，或那些效忠他们的妇女的目标和宗旨。”

——诺拉·埃兰,《女性对法西斯主义的贡献》

安妮·布洛克-格里格斯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也是 BUF 的早期成员，她加入该运动的部分原因是她对保守主义体制感到失望。她通过强有力的演讲获得认可，并于 1935 年被任命为 BUF 工作人员中的女性宣传官。后来，她被提升为首席女性官员，成为党内女性部门的全国领导人。布洛克-格里格斯通过党报《行动》中的女性版块代表女性成员的观点。1937 年，她作为 BUF 候选人竞选东伦敦莱姆豪斯，尽管她的竞选最终失败了。她积极参与和平运动，反对英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 BUF 任职期间，布罗克-格里格斯于 1936 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妇女与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妇女的十点政策》。这本小册子反映了 BUF 在妇女问题上的官方立场，得到了莫斯利本人的认可。书中大力强调福利和社会改革，目的是造福妇女。

这些好处简单概括如下：

妇女在议会中有代表权

妇女享有法律上的平等

同工同酬

工作和投票的权利

改善妇女的工作条件

消除一切性别歧视

卫生及母婴福利支援

适合家庭的经济适用房

免费幼儿园和免费高等教育

为家庭提供可负担得起的食品供应

尽管因健康状况不佳而面临挑战，布罗克-格里格斯仍继续参与政治，在战争期间根据国防条例 18B 获释后加入了莫斯利的战后运动。不幸的是，她于 20 世纪 60 年代因癌症去世。

BUF 的女性成员积极参与组织内的各种角色，包括安全职位。她们还参加了自卫课程以提高技能。值得注意的是，来自 BUF 附属不同组织的女性都接受了柔术训练，表明她们致力于个人防卫和准备。

《法西斯周刊》报道：

“ BUF 的任何男性成员都不得对任何女性使用暴力，而“女红军”在法西斯会议上经常会吵闹不休，并携带管制刀具。**因此，我们以女性来反击女性。”**

——AK 切斯特顿，《法西斯对妇女的态度》

在她的书《女性法西斯主义：英国法西斯运动中的女性》中，朱莉 V. 戈特利布深入研究了英国法西斯运动中一些著名人物的迷人生活。玛丽·罗利·理查森是妇女参政运动的杰出人物，最著名的是她在 1914 年妇女投票示威期间对罗克比的维纳斯画作的攻击。理查森对选举权事业的热情使她做出了更为激进的行动，如纵火、破坏内政部和炸毁火车站。

20 世纪 30 年代，理查森和受希特勒影响的熟人玛丽·索菲亚·艾伦一起加入了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的黑衫军。艾伦对法西斯政府的运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游历欧洲，研究和获取这些政治体系的见解。她的热情与玛格丽特·达默·道森的热情如出一辙；两人的关系复杂而深厚，自 1914 年至 1920 年一起生活在伦敦，保持着私人和职业上的伙伴关系。

在加入法西斯运动之前，艾伦和道森都曾参与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值得注意的是，艾伦和她的搭档玛格丽特在建立英国第一支女警察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为促进妇女权利和参与社会活动所做的努力反映了她们对这一事业的坚定奉献精神。

艾伦这样评价 BUF：

“我最初被黑衫军吸引，是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勇气、行动、忠诚、服务的天赋和服务的能力，这些都是我在妇女参政运动中所了解的。”

——玛丽·艾伦 1934 年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

在欧洲旅行期间，玛丽·索菲亚·艾伦与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人物建立了关系，例如爱尔兰的埃恩·奥杜菲和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1934 年，她与阿道夫·希特勒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了女性在警察工作中的作用。与希特勒的这次互动对艾伦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励她公开表达对元首的钦佩。尽管艾伦与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 BUF 的联系直到 1939 年才正式确定，但她积极参与了该运动的激进行动。

1933 年，她在组建妇女预备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旨在支持国家抵御叛乱分子的威胁。成为 BUF 正式成员后，艾伦转向新闻业，为该党的出版物撰写大量文章，毫无保留地接受自己作为坚定法西斯主义者的身份。

Julie V. Gottlieb 认为：

“艾伦是莫斯利英国联盟的著名支持者，她声称自己加入该联盟是因为她同情该联盟的反战政策。”

——朱莉·V·戈特利布（Julie V. Gottlieb），《女性法西斯主义》

英国法西斯主义中一位鲜为人知的女性人物是罗莎·贝丽尔·林托恩-奥曼。1914 年至 1918 年间，林托恩-奥曼作为妇女紧急部队和苏格兰妇女外事医院的老兵，有着丰富的经验。1918 年，她担任英国红十字会汽车学校的校长，这是一所重要的机构，负责培训驾驶员以支持战场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林托恩-奥曼于 1923 年成立了英国法西斯组织。该组织是英国第一个公开的法西斯组织，其独特之处在于其女性领导人。朱莉·V·戈特利布认为，英国法西斯组织的成立可以看作是女权主义者对樱草花联盟的回应。林顿-奥曼的政治倾向更倾向于保守党，但她强烈的反共情绪和对贝尼托·墨索里尼行动导向的政治风格的钦佩使她走向法西斯主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她与法西斯主义的结盟并非出于对该运动的深刻意识形态承诺。尽管如此，林顿-奥曼对女权主义的支持使她在英国法西斯主义的背景下脱颖而出。

引用自《女性法西斯主义》：

“林托恩-奥曼不仅是一名单身女性，而且她对穿制服的女性以及对女性的准军事管制的偏爱导致她被贬低为‘男人味十足的女人’。”

——朱莉·V·戈特利布（Julie V. Gottlieb），《女性法西斯主义》

林顿-奥曼对女性穿制服的倾向可以通过男性倾向、女同性恋情色和对爱国主义的广泛热情来解释。然而，随着她的运动逐渐瓦解，她变得相对默默无闻。林顿-奥曼沉迷于毒品、女同性恋和酒精，再加上她的政治立场，这导致她被边缘化，被真正的法西斯组织（如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 BUF）边缘化。

德国民族社会主义

在德国，特别是在纳粹兴起期间，女权运动中存在着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方面。与一些纳粹党人认为女权主义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不相容、与犹太教不相容或不受欢迎的看法相反，纳粹运动实际上吸引了大量女性的支持。在 1932 年 3 月的总统选举中，约

26.5% 的德国女性投票支持希特勒。此外，在 1931 年 9 月的选举中，女性占纳粹党获得的 650 万张选票的近一半，其中约 300 万张由女性投票。

妇女组织是国家认可的妇女活动组织，拥有超过 400 万名女性参与者。德国劳工阵线的妇女部门也有 500 万名女性会员。纳粹政府鼓励此类组织的发展，以团结帝国各个部门的女性，并鼓励传统女性气质的重生。在纳粹女权主义的框架内，教育家兼作家索菲·罗格-伯纳（Sophie Rogge-Börner）脱颖而出，成为主要倡导者。罗格-伯纳和她在 NSDAP 女权主义派系的同僚们通过美化、半传奇的北欧黄金时代的视角来设想她们的女权主义，当时性别平等是常态。他们认为，只要国家继续存在基于性别的歧视，以社会和谐和阶级团结为前提的真正的国家团结将难以实现。

索菲·罗格-伯尔纳虽然从未成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劳动者党的正式成员，但她积极参与各种德国民族主义团体，如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她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承诺显而易见，因为她参加了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和当时的许多德国民族主义者一样，她非常乐观地欢迎希特勒 1933 年的政府。希特勒上台后，索菲编写了一份备忘录，后来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出版物《德国女战士》创刊号的头条文章。后来，她的作品连同多篇关于纳粹女权主义的类似文章被汇编成 1933 年出版的《德国妇女致阿道夫·希特勒》一书。普鲁士帝国专员戈林对这份出版物给予了简短的书面认可。

尽管政府最终于 1937 年禁止了这本书，但它确实推动了一些温和的改革。这些变化主要集中在妇女团体、对母亲的支持、经济实惠的住房以及有利于家庭和母亲的额外政策上，这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 BUF 采取的措施如出一辙。

备忘录中引用如下：

“在公民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同样需要让女性发挥最重要的影响力。这种对更大责任领域的要求不能被看作是女权主义。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由最优秀的德国男女领导。人民包括全体人民；因此，如果人民要繁荣，就只能由全体人民领导。最优秀的男人和最优秀的女人必须分享国家的领导权。男人和女人必须参与每一个领导职位。”

——苏菲·罗格-伯纳，《德国妇女致阿道夫·希特勒的讲话》

罗格-伯纳坚信，对性别平等的追求与反犹太主义情绪和北欧审美完美理念紧密相连。她断言，日耳曼民族有着性别平等的历史传统，女性享有充分的平等，并有充分发挥潜力的空间。与其他纳粹女权主义者一样，罗格-伯纳主张女性有能力担任女祭司、领导者和战士，并引用《埃达》、冰岛传奇、赫瓦拉传奇、丹麦人的事迹和塔西佗的记述等文本来支持他们对北欧女权主义的愿景。

这些女权主义者利用将日耳曼身份推崇为文化成就巅峰的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张在当代德国复兴北欧黄金时代，为所谓的民族女权主义奠定了基础。尽管罗格-伯纳的完全性别平等理想在希特勒统治下未能实现，但她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忠诚在二战期间始终坚定不移，直到她去世。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社会主义者还在壁画中承认了包括海德维希·海尔、奥古斯特·施密特和海伦·兰格在内的多位女权主义者，以颂扬她们的历史贡献，展现了与女权主义思想的复杂且常常相互矛盾的关系。

“我们尊重过去所取得的一切真正的成就，因为它们符合民族社会主义的精神。”

——阿道夫·希特勒，《女性之路》壁画

1926 年，女权主义者埃玛·哈德利希在纳粹党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在文章中，哈德利希批评了纳粹党下属妇女组织负责人埃尔斯贝特·赞德。这导致该报在 1926 年 1 月至 4 月发表了一系列指控和反指控。这场争论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在 1933 年《德国妇女致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发表后再次浮出水面。

尽管纳粹党上台，纳粹女权主义者并未停止表达自己的信念。她们认为，女性与男性不同，但同样有能力和智慧，除了母亲的角色之外，还能为德国民众做出很多贡献。在她们设想的德国社会中，女性将与男性并肩站在一起，为公共福利做出贡献。这些女权主义者借鉴了人类学理论，认为母系社会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结构，并声称在古代日耳曼文化中，男女地位平等。纳粹女权主义者和批评者之间的争论核心集中在日耳曼社会的历史现实上，而不是对未来的期望上。

虽然这些女权主义观点中的许多都与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相一致，但伊姆加德·赖兴瑙却超越了传统的界限，呼应了激进的现代自由女权主义中的情感。在 1932 年 3 月写给希特勒的题为《天才女性》的文章中，赖兴瑙认为女性应该扮演有影响力的角色，这不仅是为了社会进步，也是为了自我实现。她为职业女性辩护，反驳那些认为她们加剧失业或选择不生孩子的批评，并质疑她们缺乏母性本能的观点。赖兴瑙批评男性更喜欢舒适的婚姻，而不是与坚强、聪明的女性合作，她认为以事业为导向的女性比那些只注重母性的女性更能成为优秀的母亲，她引用了玛丽亚·特蕾莎和克拉拉·舒曼等历史人物作为例子。她警告说，**未得到利用的女性才能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歇斯底里、神经衰弱或家庭专制。**

这场辩论的显著特点是其在教义方面的流动性。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通过哈德利希的原文和赞德的反驳认识到了纳粹女权主义内部观点的多样性，并建议公开讨论这些分歧。其他评论员指出，这种内部冲突展示了该运动的活力。罗森伯格最终听从了党的领导，强调任何分歧都应服从于反对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总体斗争。

1933 年，当这些女权主义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时，伊姆加德在书的序言中引用了希特勒的话，呼吁任何认为对人民有危险的人公开打击邪恶，另一句话是“爱德国的人可以批评我们”。罗森伯格在《人民观察家》上澄清说，他对哈德利希作品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女性低人一等，而是强调了心理和生物学上的差异。尽管罗森伯格试图在印刷品中解决这一争论，但纳粹女权主义者仍然坚持反对他的立场。伊姆加德甚至指责他因性别歧视观点而怀有犹太倾向。结果，许多纳粹党内的女权主义者受到德国政府的审查。

有关纳粹女权主义者的更多信息，可以参考 Leila J. Rupp 的《动员妇女参战》一书。该书说明，在第三帝国内，妇女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她们是妇女行政机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女性教育发展中发挥着作用，并担任学者和研究人员。妇女还在公共安全部门（如警察和消防部门）以及交通、集中营、文职工作、军队中的支持角色和医疗领域（如护士、医生和军事医疗保健经理）任职。她们的参与延伸到政治舞台和航空领域。许多女性获得了杰出的荣誉，包括铁十字勋章和金党徽章。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空军是雇用女性担任飞行员的先驱之一。

1944 年，大批女性担任战斗机飞行员，以腾出男性飞行员去前线服役，还有数百人担任滑翔教练。汉娜·雷奇（Hanna Reitsch）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位获得多项荣誉的著名试飞员。1945 年，她直接参与了战斗行动，执行了最后一次飞行任务，飞入被围困的柏林，随后又飞出柏林。

战争结束后，在最后一次采访中她说道：

“而我们现在的德国又怎么样呢？一个银行家和汽车制造商的国家。甚至我们伟大的军队也变得软弱了。士兵们蓄着胡子，质疑命令。我毫不羞愧地说我相信民族社会主义。我仍然戴着希特勒给我的镶有钻石的铁十字勋章。但今天在整个德国，你找不到一个投票支持阿道夫·希特勒上台的人。许多德国人对战争感到内疚。但他们没有解释我们共同的真正内疚——我们输了。”

——汉娜·雷奇（Hanna Reitsch），罗恩·莱特纳（Ron Laytner）采访

维奥莱特·莫里斯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军人家庭，莫里斯在比利时修道院开始了自己的体育生涯，修女们向她介绍了各种体育运动，包括板球、篮球、自行车和曲棍球。离开修道院后，她将重点转向英国拳击，并在 1913 年的法国深海游泳锦标赛中获得了令人称赞的第五名。1917 年父母去世后，莫里斯全身心投入体育界，加入了法国女子体育联合会和奥林匹克足球协会。

莫里斯在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包括铅球、标枪、足球、游泳、自行车、田径、掷铁饼、举重、摩托车和驾驶汽车。她获得过许多荣誉，其中包括 1925 年最佳 5 公里自行车运动员、1934 年多洛米蒂山拉力赛冠军以及 1920 年、1925 年和 1926 年夺得法国足球锦标赛冠军。尽管莫里斯运动能力超群，但她的职业生涯却饱受争议，包括服用兴奋剂的指控和个人风格的丑闻。这些争议以及体育界潜在的性别歧视可能导致她与法国体育界疏远，并随后转向激进意识形态。莫里斯与法国法西斯主义的联系以及她的个人选择使她彻底背离了当时保守的文化规范。

因丑闻被禁止参加竞技体育后，阿道夫·希特勒亲自邀请莫里斯作为贵宾参加 1936 年柏林夏季奥运会，无视她的性别不合、双性恋以及 1926 年选择接受乳房切除术以更好地适应赛车的事实。柏林的热情接待带来了合作邀请，使莫里斯成为维希法国的重要人物，被称为“盖世太保的鬣狗”。她担任间谍，对抗英国情报网络，为法国盖世太保审问女性，并管理巴黎德国空军机库的运营。莫里斯积极参与纳粹占领和维希法国政府，凸显了她与这些政权的共谋和合作。

莫里斯在意识形态上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真正一致程度仍有待历史辩论。虽然有人认为她的合作是出于机会主义或必要性，但其他人则认为这表明她与法西斯主义原则有着更深层次的共鸣。莫里斯的生命在 1944 年以暴力结束，当时她遭到法国抵抗运动的伏击并被杀害。袭击的激烈程度使她和车上的其他人，包括一对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以及一个共同的朋友，都无法辨认。她被匆匆埋葬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里。死后，将她妖魔化的努力愈演愈烈，敌人将她描绘成一个虐待狂形象——这种描绘加剧了她在历史记忆中的丑化地位。

埃莉诺·鲍尔在纳粹党早期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党的成立之初就为阿道夫·希特勒提供了大量支持。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护士的经历以及她参与自由军团奥伯兰（一支准军事部队，参与了 1919 年与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和波罗的

海地区的冲突）的经历为她进入民族主义政治奠定了基础。1920 年 3 月 11 日，鲍尔因在慕尼黑妇女大会上发表煽动性的反犹太主义演讲而被捕，这充分表明了她对纳粹事业的坚定承诺。她随后被无罪释放，不仅免除了指控，还巩固了她在纳粹运动中的烈士地位。鲍尔在啤酒馆政变中受伤，使她成为唯一积极参与这次失败政变的女性，并为她赢得了享有盛誉的血勋章，这是纳粹党内仅有 16 名女性获得的荣誉。

作为希特勒的亲信，鲍尔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中占有重要地位。海因里希·希姆莱任命她担任武装党卫队福利护士，这一职位相当于党卫队上级，相当于武装党卫队等级制度中的将军。1934 年，鲍尔成立了民族社会主义姐妹会，重点关注护理工作，并于 1937 年担任名誉主席。她对党的忠诚服务通过获得金色党徽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在纳粹时代，鲍尔被誉为纳粹女性的典范，德国《明镜周刊》称她为“纳粹国家的护士”，证明了她杰出的地位。她获得的众多勋章包括西里西亚鹰勋章、勇敢银质勋章和波罗的海十字勋章。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纳粹政权垮台后，鲍尔仍然坚定地效忠民族社会主义，凸显了她对自己热心坚持的原则的持久忠诚和坚定信念。

结论

在探索女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时，很明显这些政治运动不仅仅是压迫性的或根植于反动思想。法西斯主义政策往往拥抱现代主义，不同于约瑟夫·德·梅斯特的传统主义。纠正那些声称支持法西斯主义却体现过时的厌女刻板印象的人所传播的错误观念很重要。

这些运动旨在建立一个包容性社会，促进跨阶级和跨性别的合作，并寻求提高国民福祉。任何偏离这一包容性和进步性愿景的行为都歪曲了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不将女性局限于家庭角色或反对当代社会动态。法西斯女权主义致力于维护传统的家庭角色，同时确保女性在社团主义体系中的代表性，成功地团结了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性。

虽然法西斯女权主义的合法性存在争议，但一些现代女权主义者、反法西斯活动家，甚至法西斯主义内部的派系都承认其亲女性元素。主流学者经常淡化这些方面以适应特定的叙述。倡导赋予妇女权力的法西斯运动挑战了左翼假设并促进了民族团结。虽然这里并非所有论点都需要认可，但很明显，亲女性立场可以与法西斯思想共存。

法西斯主义对以劳动为导向的人文主义理想的微妙理解，**旨在减少工人经常感受到的与劳动成果的分离感**，这代表了其社团主义经济哲学的一个复杂方面，但很少受到关注。这一方面与卡尔·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有着思想上的联系，其中人文主义的基础被占主导地位的唯物主义叙事所掩盖，**他的同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随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威宣扬了这种叙事，但它们对于全面理解他的最初主张至关重要。**

马克思认为，劳动虽然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但矛盾的是，劳动使个人与真实自我疏远。劳动从自我实现的潜在途径转变为繁重的生存必需品。这种观点与传统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传统观点认为劳动是提高人类尊严和身份的手段。**马克思断言，真正的人类表达不在于劳动的范围内，而在于工作领域之外的原始、不受约束的活动。共

产主义愿景旨在解决这一悖论，设想一个工作不再是疏远之源，而是通往真正自我实现和人类发展的渠道的世界。

“第一，劳动是工人的外在劳动，也就是说，劳动不属于工人的本性；因此，在劳动中，工人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满足而是感到不快乐，不是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折磨自己的身体和毁掉自己的精神。因此，工人只在劳动之外感到自己，在劳动中感到自己在自身之外。不劳动时，他感到自己很自在，劳动时，他感到自己不自在。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被强迫的；是强迫劳动。因此，劳动不是需要的满足；它只是满足外在需要的手段。它的异化性质清楚地表现在，一旦没有身体或其他强迫，劳动就会像瘟疫一样被人躲避。外在劳动，即人使自己异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劳动，一种折磨自己的劳动。

因此，人（工人）只有在动物职能中，吃、喝、生育，至多在住处和穿衣等等，才感到自己是自由活动的；而在人的职能中，他不再感到自己只是动物。动物的东西变成了人的东西，人的东西又变成了动物。”

— 卡尔·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革命工团主义者通过提出以劳动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丰富了关于工人异化的对话，这标志着背离了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将话语转向一系列反理性主义意识形态。其中包括活力论，强调生物过程在生命本质中的重要性；实用主义，认为实际结果是理解意义、真理或价值的关键；以及理想主义，认为现实的本质是精神的或非物质的。

这些工团主义者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待异化，他们认为解决方案并不在于改变社会结构，而在于解决工人个人的主观体验和心理框架。这一传统中一位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是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他认为工人参与治理和工作场所的决策可以减轻他们对劳动的疏离感。拉布里奥拉认为，通过积极参与，工人会产生一种投入感和控制感，对抗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非人性化影响，并让他们重新与劳动成果联系起来。

“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使资本主义看起来像老板，而资本则像一种智力统治力量，也就是说，像某种超越工人群体的东西。这是工人与资本家对立的本质事实。资本家看起来像老板，工人看起来像一群奴隶。由于智慧和组织与指挥的力量与工人群体无关，后者似乎更像是资本手中的自动化工具。”

— Arturo Labriola 在 Zeev Sternhell 的《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诞生》中引用

社团主义意识形态以心理学方法为基础，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与强调生产力和拒绝阶级冲突相吻合。这种概念路径引起了亨利·德曼等以伦理社会主义闻名的知识分子的共鸣。德曼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的做法保持距离，提倡一种深深植根于道德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变体。

他采取了精英主义的观点，非常重视社会结构的心理层面以及道德指令在培育基于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性。德曼的理论提出，将社会改革建立在道德考虑的基础上可以为更具凝聚力的社会结构铺平道路，这种结构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促进对集体福祉和效率的共同承诺。他的思想促进了更广泛的讨论，即不仅通过经济重组，而且通过灌输道德责任感和团结感来重构社会体系。

“工人阶级的社会劣势’既不是由于缺乏政治平等，也不是由于现有的经济结构，‘而是一种心理状态。’”

— 亨利·德曼在泽夫·斯特恩赫尔的《“反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法西斯意识形态兴起的一个方面》中引用

劳动是自我完善的关键要素，也是文化生活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这种哲学或许由乔瓦尼·金蒂莱最雄辩地表达出来。他认为，文化发展领域（传统上是智力追求的领域）应该扩大到涵盖所有形式的劳动。金蒂莱的观点是，劳动不仅仅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也是个人和文化发展的基础组成部分。每个人的工作都为社会文化的更大图景做出了贡献，增强了人类的集体体验。

通过主张所有劳动都是文化活动，Gentile 将工作的地位提升到了经济领域之外，将其视为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载体。这种观点符合更广泛的人文主义原则，即包括劳动在内的每一项人类活动都有可能为丰富人类精神和社会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劳动超越了其经济功能，成为一种个人艺术和社区贡献的形式，主张每个工人都有潜力成为工匠，通过劳动不仅可以创造商品或服务，还可以塑造他们的性格和社会文化。

“文化人文主义确实是人类解放的光辉一步，而劳动人文主义今天或明天将取代它。因为大工业的创造和工人登上历史大舞台，深刻地改变了现代文化观念。这个词过去是指知识文化，特别是艺术和文学；它忽略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他们没有把目光投向更高文化的自由视野，而是在人类文化的基础上工作，在那里人与自然接触，并进行劳动。”

— 乔瓦尼·金蒂莱 (Giovanni Gentile) 引用自 HS Harris 所著的《乔瓦尼·金蒂莱的社会哲学》

劳动将从单纯的经济必需品提升为一种艺术形式。在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观中，劳动将成为工人实现精神成长和满足的一种媒介。在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观中，劳动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个人发展和致富的途径。这种重新构想旨在将工人的身份和贡献融入国家结构，创造一种工作与文化和精神提升同义的环境。

“国家不再像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被认为是公民的国家（或人和公民的国家）；它是工人的国家，也应该是工人的国家。真正的人，有价值的人，是劳动者，他的价值由他的工作来衡量。因为价值就是劳动，这是事实；一个人的价值应该根据他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

— Giovanni Gentile,《起源与社会结构》

设想中的法西斯国家是工人阶级的堡垒。正如塞尔吉奥·帕努齐奥所言，意大利渴望转变为一个劳工帝国，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等以财富为中心的富豪国家建立的货币帝国形成鲜明对比。这个新帝国将以工作和工人的价值为基础，而不是资本的积累。法西斯政权旨在重新定义国家伟大，将**重点从金融财富转移到劳动尊严以及劳动力的道德和社会力量。**

“帕努齐奥认为法西斯主义的使命是建立一个社团主义的、有机的、集中的、专制的“劳工帝国”，以取代发达资本主义、财阀英美列强创造的“黄金帝国”。”

— A.詹姆斯·格雷戈尔,《墨索里尼的知识分子》

在这个设想中的劳动帝国中，人类劳动的价值至关重要，而国家的作用是确保劳动不被剥削，而是被誉为国家繁荣的驱动力。法西斯政权认为，通过这种对劳动的提升，意大利不仅会与其他资本主义社会区分开来，而且还会创造一个更具凝聚力和活力的社会秩序。其目的是培育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工人不仅仅是工业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而是一个为更宏伟的国家目标做出贡献的重要贡献者。

最终，从劳动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社团主义的核心可以得到充分理解。这种哲学支撑了工人国家的概念，该概念寻求超越劳动力的传统经济角色，解决普遍存在的工人异化问题。社团主义主张建立一个以工作作为个人成长和社会凝聚力渠道的社会。它寻求培养一种统一的目标感，而不仅仅是经济产出，国家既是劳动力与更广泛社区之间共生关系的促进者，也是监护人。通过这种模式，国家在协调劳动力动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确保工人的内在价值和贡献融入经济和社会结构。

“任何人如果只把社团主义看作经济概念或政治经济学，就无法理解它。这场经济革命完成了个人和社会的精神发展。”

—泽夫·斯特恩赫尔在《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诞生》中引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话

关于民族社会主义的未来

——这种理想主义、高尚但被误解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要明白，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只是民族社会主义实际实施的开始。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正在努力实现，但由于当时的情况——特别是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战争（通常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德国需要打一场全面战争才能生存下来——从未完全实现。在许多方面，阿道夫·希特勒（他自己承认，例如向莱昂·德格勒尔承认）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以便不仅获得权力，而且在面临外部和内部问题的情况下保持权力。……因此，虽然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它本来的样子，而不是犹太复国主义仇恨宣传所表现的样子）应该被视为我们和后代的鼓舞人心的榜样，但它不应被视为完美、理想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 … 我们的任务——也是子孙后代的任务——是为这个完整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阐述纯粹、理想主义的民族社会主义，不受任何与我们时代社会妥协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确说明民族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它涉及什么，无论它看起来多么“不切实际”或理想主义，无论它多么不受欢迎。……我们不需要政治宣传——例如激动人心的演讲、集会、游行、激烈的呼吁——这些只会吸引人们变化无常的情绪。相反，我们需要理性的文学作品；民族社会主义英雄主义的真实故事；以及个人和集体民族社会主义行动的活生生的例子。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个人的事迹和项目——以身作则，展示民族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和真理。”——大卫·迈亚特

要了解民族社会主义，首先需要了解它在 20 世纪初兴起的历史环境。

从实际情况来看，德国从未从一战中恢复过来，士气空前低落，经济状况糟糕，社会四分五裂。戈特弗里德·费德对此描述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我们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痛苦、束缚、压制和不安全感，呈现出一幅人人反对人人的清晰画面。政府反对人民，政党反对政党……雇主反对雇员，商人反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地主反对佃户，劳动者反对农民，官员反对公众，工人反对‘资产阶级’，教会反对国家，每个人都盲目地攻击自己的特定对手，只考虑自己的私利……没有人考虑邻居的福利，

也没有人考虑自己对社区的更高责任。”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对此描述道：“它没有展现出明确的意志，也没有立场和反对的画面，而是——如果我可以预见到后来的发展——一场人人反对人的斗争。最后，议会制变成了四十九个不同的政党，每个政党都把自己的问题说成是最重要的。”希特勒本人对此进行了描述，并提出了解决办法的初步设想：“有一天，成群的被解放的奴隶从这些苦难的巢穴中走出来，向毫无戒备的同胞发起攻击，会发生什么呢？因为另一个世界根本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他们任由这些事情继续下去，毫不在意，甚至毫不怀疑——由于他们完全缺乏本能的理解——除非命运及时平息，否则它迟早会报复的。……甚至在那些日子里，我就已经看到，只有通过两种方法才有可能改善这些状况。这种方法是：第一，通过在公众中树立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为社会发展创造更好的基本条件；第二，把这种社会责任感与毫不留情的决心结合起来，剪除一切无法改善的赘生物。　”

在知识层面，经验主义世界观（从文艺复兴开始，随着所谓的启蒙时代实验科学的加速发展，这种威胁愈演愈烈）日益以唯物主义的还原论威胁着精神性，并承诺最终将情感、梦想、自由意志和精神本身等事物视为完全生理机制的副作用。随着压力变得太大，哲学反应开始反对经验主义，重新确认直觉和情感是有效的——甚至是更优越的——知识途径，正如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所描述的那样：“抽象以各种形式开始颠覆生活。因此，德国浪漫主义形式的反应就像长期干旱后的雨水一样受欢迎。……希腊人概括……浪漫主义者拟人化。”然而，这种反应本身立即分裂成两个运动，因为对感觉的依赖导致不同类型的人有不同的感觉。

浪漫主义运动始于一场运动，该运动认为，经验主义虽然能够有效地产生关于现状的知识，但它却以切断我们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知识的毁灭性代价而告终。（“我们能够区分分子的组成部分。但当要解释某件事的为什么时，我们却无言以对。”——阿道夫·希特勒）人们认为，只有通过个人努力来完善精神，才能实现后者，而这又只能通过沉浸在消除社会对情感活动限制的环境中来实现（在实践中通常由艺术作品产生），从而让我们远离低级情感，如果可能的话，完全交给高级情感。人们特别强调纯洁的爱情、诗意的正义和对美的欣赏，所有这些都被认为会汇聚到浪漫主义理想并充当实现浪漫主义理想的渠道。

另一方面，反启蒙运动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经验主义切断了我们与人类原始冲动的联系，从而导致人类变得枯燥无味，生活体验不如那些仍然与原始冲动相关的人丰富。他们建议的应对措施是寻求沉浸在释放原始性的环境中。他们承认，原始情感可能不会汇聚，而且即使在同一个头脑中，它们也常常为了争夺主导地位而相互冲突，但他们认为这并不是值得担心的事情，因为对汇聚的期望本身就是一种非原始情感，因此应该被拒绝。原始主义被认为是唯一有效的指导；理性主义应该与经验主义一起被拒绝。

简而言之，反启蒙运动担心经验主义会贬低低级情感（他们认为这些情感是原始的），而浪漫主义者担心经验主义贬低低级情感的琐碎方法必然会同时贬低高级情感（我们认为这些情感具有救赎作用），从而干扰浪漫主义的末世论观点，即高级情感在意志的胜利中直接战胜低级情感。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从浪漫主义的角度总结了反启蒙运

动的问题："人们立即想起了十八世纪末出现的感伤回归自然和对原始人的赞美。……但据我们合理推测，原始人的本性并不特别英雄。"

但许多反启蒙运动人士很快就开始称自己为"浪漫主义者"，只看到两个运动都对工业化的西方抱有共同的蔑视，共同偏爱中世纪甚至更早的过去和非西方*文明，共同偏爱乡村生活而非城市生活，以及其他表面上的共同品味，而这些品味实际上是由完全不同的感觉所驱动的。浪漫主义者天真地接受了这些，以为反启蒙运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真正的浪漫主义。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反启蒙运动篡夺了浪漫主义的标签，并将该运动与反启蒙思想混为一谈，正如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所描述的那样："伟大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感觉到天体之光的诸神面前有越来越黑暗的面纱，它越来越深地沉浸在冲动、无形、恶魔、性、狂喜和冥府之中，并陷入对母爱的崇拜之中。"

(* 无论是浪漫主义者还是反启蒙主义者，在政治上都尽可能地站在非西方文明一边，因为经验主义被视为一种独特的西方态度。希特勒本人也指出了这一点："我们确实是浪漫主义者，与美国人截然不同……唯一能激起北美人心弦的浪漫是红皮肤的浪漫；但值得注意的是，创作出最生动的红皮肤浪漫故事的作家是一位德国人。")

不久之后，真正的浪漫主义者就被推到了反启蒙运动主导的所谓"浪漫主义"的边缘。他们感到沮丧，需要一个新的、甚至更激进的运动来团结起来。当时，反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流行将西方文明的产生归咎于基督教，因此呼吁放弃基督教，转而支持前基督教的异教。相比之下，真正的浪漫主义者则对基督教极为忠诚，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一个令人信服的新运动必须提供一种反西方的叙述，一方面可以重申真正的浪漫主义者对耶稣的直觉，另一方面可以解释反启蒙运动对（犹太）基督教的指控。迪特里希·埃卡特已经准备好了："叔本华……说，如果想理解《旧约》，就必须阅读希腊文版。那里的语气完全不同，色彩完全不同，没有基督教的预感！"由于这种新的解读，即西方文明的创造者不是基督教而是犹太教，民族社会主义就此诞生。

帝范 李世民

君体第一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建亲第二

夫六合旷道，大宝重任。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亲戚，以为藩卫，安危同力，盛衰一心。远近相持，亲疏两用。并兼路塞，逆节不生。昔周之兴也，割裂山河，分王宗族。内有晋郑之辅，外有鲁卫之虞。故卜祚灵长，历年数百。秦之季也，弃淳于之策，纳李斯之谋。不亲其亲，独智其智，颠覆莫恃，二世而亡。斯岂非枝叶不疏，则根柢难拔；股肱既殒，则心腹无依者哉！汉初定关中，诚亡秦之失策，广封懿亲，过于古制。大则专都偶国，小则跨郡连州。末大则危，尾大难掉。六王怀叛逆之志，七国受鈇钺之诛。此皆地广兵强积势

之所致也。魏武创业，暗于远图。子弟无封户之人，宗室无立锥之地。外无维城以自固，内无盘石以为基。遂乃大器保于他人，社稷亡于异姓。语曰：“流尽其源竭，条落则根枯。”此之谓也。

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则上无猜忌之心，下无侵冤之虑。此封建之鉴也。斯二者，安国之基。

君德之宏，唯资博达。设分县教，以术化人。应务适时，以道制物。

术以神隐为妙，道以光大为功。括苍旻以体心，则人仰之而不测；包厚地以为量，则人循之而无端。荡荡难名，宜其宏远。且敦穆九族，放勋流美于前；克谐烝乂，重华垂誉于后。无以奸破义，无以疏间亲。察之以德，则邦家俱泰，骨肉无虞，良为美矣。

求贤第三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尧命四岳，舜举八元，以成恭己之隆，用赞钦明之道。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待风云之会；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明君旁求俊乂，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昔伊尹，有莘之媵臣；吕望，渭滨之贱老。夷吾困于缧绁；韩信弊于逃亡。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为耻，终能献规景亳，光启殷朝；执旌牧野，会昌周室。

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汉以六合为家，是赖淮阴之策。

故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鹄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辅之资。故求之斯劳，任之斯逸。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乃求贤之贵也。

审官第四

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然则函牛之鼎，不可处以烹鸡；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兽；一钧之器，不能容以江汉之流；百石之车，不可满以斗筲之粟。何则大非小之量，轻非重之宜。

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少，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斯二者治乱之源。

立国制人，资股肱以合德；宣风道俗，俟明贤而寄心。列宿腾天，助阴光之夕照；百川决地，添溟渤之深源。海月之深朗，犹假物而为大。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故云则哲惟难，良可慎也！

纳谏第五

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鞀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

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义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故云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

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雍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

去谗第六

夫谗佞之徒，国之蟊贼也。争荣华于旦夕，竞势利于市朝。以其谄谀之姿，恶忠贤之在己上；奸邪之志，恐富贵之不我先。朋党相持，无深而不入；比同相习，无高而不升。令色巧言，以亲于上；先意承旨，以悦于君。朝有千臣，昭公去国而不悟；弓无九石，宁一终身而不知。

以疏间亲，宋有伊戾之祸；以邪败正，楚有郤宛之诛。斯乃暗主庸君之所迷惑，忠臣孝子之可泣冤。

故蘼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奸佞之危也。斯二者，危国之本。

砥躬砺行，莫尚于忠言；败德败正，莫逾于谗佞。今人颜貌同于目际，犹不自瞻，况是非在于无形，奚能自睹？何则饰其容者，皆解窥于明镜，修其德者，不知访于哲人。讵自庸愚，何迷之甚！良由逆耳之辞难受，顺心之说易从。彼难受者，药石之苦喉也；此易从者，鸩毒之甘口也！明王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可不诫哉！可不诫哉！

诫盈第七

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人主好奇技淫声、鹜鸟猛兽，游幸无度，田猎不时。如此则徭役烦，徭役烦则人力竭，人力竭则农桑废焉。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珠玉珍玩，黼黻絺绤。如此则赋敛重，赋敛重则人才遗，人才遗则饥寒之患生焉。乱世之君，极其骄奢，恣其嗜欲。土木衣绩绣，而人裋褐不全；犬马厌刍豢，而人糟糠不足。故人神怨愤，上下乖离，佚乐未终，倾危已至。此骄奢之忌也。

崇俭第八

夫圣世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非憎荣而恶味，乃处薄而行俭。

故风淳俗朴，比屋可封。斯二者，荣辱之端。奢俭由人，安危在己。五关近闭，则嘉命远盈；千欲内攻，则凶源外发。是以丹桂抱蠹，终摧荣耀之芳；朱火含烟，遂郁凌云之焰。以是知骄出于志，不节则志倾；欲生于心，不遏则身丧。故桀纣肆情而祸结，尧舜约己而福延，可不务乎？

赏罚第九

夫天之育物，犹君之御众。天以寒暑为德，君以仁爱为心。寒暑既调，则时无疾疫；风雨不节，则岁有饥寒。仁爱下施，则人不凋弊；教令失度，则政有乖违。防其害源，开其利本。显罚以威之，明赏以化之。威立则恶者惧，化行则善者劝。适己而

妨于道，不加禄焉；逆己而便于国，不施刑焉。故赏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罚者不怨上，罪之所当也。故《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此赏罚之权也。

务农第十

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故躬耕东郊，敬授人时。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然而莫不带犊佩牛，弃坚就伪。求什一之利，废农桑之基。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为害也，甚于秋螟。**莫若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人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斯二者，制俗之机。**

子育黎黔，惟资威惠。惠而怀也，则殊俗归风，若披霜而照春日；威可惧也，则中华慑軏，如履刃而戴雷霆。必须威惠并驰，刚柔两用，画刑不犯，移木无欺。赏罚既明，则善恶斯别；仁信普著，则遐迩宅心。劝穑务农，则饥寒之患塞；遏奢禁丽，则丰厚之利兴。且君之化下，如风偃草。上不节心，则下多逸志；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犹恶火之燃，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浊，挠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则人不言而化矣。

阅武第十一

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彫；族群虽安，亟战则人殆。彫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是以勾践轼蛙，卒成霸业；徐偃弃武，遂以丧邦。何则？越习其威，徐忘其备。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弃之。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机也。

崇文第十二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筈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不朽者，其唯学乎？此文术也。斯二者，递为国用。

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笔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咸在兹焉。

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故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惟慎祸于将来。当择圣主为师。毋以吾为前鉴。**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以来，所制多矣。奇丽服，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劳人，此非屈己也。斯事者，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但我济育苍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损少，人不怨；功大过微，德未亏。然犹之尽美之踪，于焉多愧；尽善之

道，顾此怀惭。况汝无纤毫之功，直缘基而履庆？若崇善以广德，则业泰身安；若肆情以从非，则业倾身丧。且成迟败速者，国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位也。可不惜哉？

道德的世界秩序 奥托·邦格

大自然对普遍平等和博爱一无所知。她以创造为乐，让无数生物在物质中繁衍生息，为争夺物质而搏斗，最终让最强者统治一切。如果她真的想要永恒的和平，如果生物的普遍混合是她的目标，那么将生命分割成数百万个物种又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大自然并不希望混合，而是希望多样性和个性。她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总是设计出新的形式，并以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将其付诸实践。正如没有艺术家会将他创造的世界揉成一团，大自然也不觉得有必要消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形式。她如今也想保护她所创造的一切，并将这种意愿赋予她所有的生物，作为种族的本能，或者作为基本的生物学原理在植物界发挥作用。自然界中，混合是得不到提倡甚至不被容忍的。在任何地方，物种的保护都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即使一个物种出现在不同的科中，例如狗、狐狸和狼，它们都基于共同的类型“狗”，自然也不会考虑通过杂交将这三个科都归结为该类型，而是每个科都坚定地保持其独特的身体和道德特征。

相反，大自然允许这些家族中的每一个分支衍生出无数变种，而这些变种又努力保持其独特性。但在人为环境压力下，这种混合确实发生了，自然立即以复仇者的姿态出现，对杂种进行毁灭性的审判，削弱其健康和活力，或剥夺其繁殖能力。因为自然界希望保护物种的多样性，所以它理所当然地确保劣等物种的灭亡。但所有物种都拥有相同的原始生存本质，即生存、进化、强大的意志。这种意志存在于数百万个物种中，它们相互斗争、拼搏，因此斗争成为所有生物的基本主题。在所有意识之前，这场永恒的战争是唯一的生命得以增长和完善的途径，因为只有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选择健康和强壮。

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几千年里，这种斗争已经主宰了生存，在第一个石棒砸在人类头骨上的很久以前，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战场。人类与动植物一样，也感受到了生命的脉动，只有通过斗争，人类才能从属于地球的原始森林巨兽和野生动物手中夺回这片血染的土地。人类凭借强大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第一次将意识之光投射到这片土地上。因此，通过斗争，他成为唯一的统治者，成为创造和自然的王者，征服了自然，让它臣服于他的脚下。

但即使最强者从这场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王者，永恒的战争也并未结束！它以不减的凶猛在不堪重负的动植物群中肆虐，同时无情地爆发在人类之间，以便在民族和种族之间重复自然选择最强者和最优秀者的过程。即使这场战争已经结束，北欧人统治了世界，但古老的战争仍在持续了几个世纪和几千年。因为被征服的种族立即开始了反扑，奴隶们反抗生命之王，迫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出无情的决定。生命中不存在永恒的和平。它可能会将统治权交给强者，但与此同时，也会催生各种力量，如果强者没有时刻准备捍卫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优越地位，并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一点，这些力量就会与之抗争，并夺取统治权。

这也是“继承”一词的含义：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东西，要努力去拥有。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子嗣有权躺在父辈的荣誉上睡大觉。然而，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

么他们醒来时一定会感到无比震惊。历史告诉我们，**那些看似永恒的国家与辉煌的文化是如何因为其承载者不再拥有战斗的力量和意志而灰飞烟灭。**

因此，在波斯战争胜利的剑下绽放的希腊伯里克利时代就此结束，而剑也锈了；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因公民不再愿意和有能力参战而崩溃。一个国家不能仅凭艺术、科学和一切和平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一个健康、野蛮的国家的利剑永远不会畏惧精神。当阿拉里克（Alaric）的金发部落攻陷永恒之城罗马，大理石庙宇和宫殿化为灰烬时，**这种“暴行”只是表达了生命坚定不移的正义，它不容忍任何外表，无论外表多么美丽。**因此，燃烧的罗马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永恒的榜样，那就是：保护一个国家的不是艺术和哲学，而是战争。但世界不属于最古老的名望，而属于最年轻的剑。

但自然的贵族原则，即允许紧密封闭的物种相互斗争，以便在斗争中赋予最好的血统以优势，在各个物种和家族中也有其有效性。大自然对物种已经存在的巨大多样性并不满足，她又在其中为个体留出了相当大的余地，因此至少在高等物种中，你很难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在这里，自然界也通过在物种之间展开同样（尽管大多是无血缘关系）的斗争，强调其不可改变的意志，即严格保持物种的独立性、独特性和唯一性，从而选出这里和那里最强壮、最健康、最优秀的个体。在发情的鹿为争夺鹿群而进行的争斗中，这种永恒的意志清晰可见：只有最好的血统和最强壮的生命才能孕育新的生命，因为只有这样，生命才能普遍进化。

然而，物种中的个性在人类领域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同血统的人在身体和道德上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质。在动植物物种中，没有哪个物种的体格、面部表情和性格差异像人类这样明显，这是数千年来进化而来的。正如没有两个种族是相同的，也没有两个民族是相同的，因此不能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等同起来。在这里，大自然取之不尽的创造力也在重复着永恒的游戏。正如不存在单一的人类，只有具有各自独特特征的特定种族和民族，**因此，在一个民族中寻找仅作为该民族典型代表的人是徒劳的。一个民族的所有个体都可以追溯到某种基本类型，但这只是智力的构建，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在生活之中，没有类型之分；这里有着丰富的个性，它们或强烈或微弱地彰显着自我。我们将封闭的个性描述为性格或人格。**

在生活与历史中的任何地方，我们都会遇到这种存在之谜——人格，这是创造性本质的最高、最完美的形式。人格当然远不止是个性；相反，如果个体仅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立、孤立的个体，那么人格的神秘性就会立即消失。真正人格的秘密恰恰在于它是对个体的征服，是超越个人的力量在人格中的体现。正是这一点将真正卓越的个性与普通个体区分开来：它不像后者那样只代表“我”，而是一个强大的“它”作为驱动的基本元素在其中活跃。

但这个神秘的“它”只不过是所有个体存在、种族生命力的超个人基础，它以更高的效力出现在已形成的个性中。拥有个性意味着拥有种族。只有感受到体内纯正血统的不可抗拒的冲动和诱惑的人，才能拥有这种内在的方向感和整体性，才能拥有我们称之为个性的那种坚定而无私的坦率，个性之秘也由此得以展现。在一切个人行为背后，都存在着一种近乎动物性的必然性。人们总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有一个更高级、更美好、更深刻的世界，它就像一股可怕而强大的力量，在血液中涌动，无法摆脱，这就是命运，必须服从，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因此，耶稣和路德感到自己与血液息息相关；因此，伟大的霍亨索伦家族出于血液的内在需求而成就了他们的事业。世界上的一切伟大事物都源于内在需求，往往源于最高、最深的内在需求！在这里，意志与命运完全合二为一。

对于真正的个性而言，自由总是只存在于外在，存在于与世界的关系中，而不存在于内在，存在于与无意识、与血液的关系中。只有通过这种内在联系，才能保证外在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力量，将创造性的意志强加于外部事物和环境。与内在的必然性相连，人格就像耶稣一样，以崇高的自由对抗事物，其意志不会被任何外力所摧毁。这种由内在需求引发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在自由；它不是向内，而是从内向外。但当这种内在自由与个人创造力相结合时，天才就诞生了。**天才是一种最高效的种族。在天才身上，最纯净的血液浓缩在一起，整个民族的种族精髓得以展现。**

罗马帝国末期的种族混乱不再能产生天才；堕落血统中不再出现任何个性、任何强大的创造人格。一旦种族让位于混乱，那么孕育个性、人格和天才人物的土壤便不复存在；从此不再有可塑的人物，只有可数而不可称的人。种族变成了一个群体。但自然的意义不是无形的堆砌，而是类型和特征、个性、性格和形状。它不想要混合和平等，而是不可侵犯的生命等级制度，有距离、阶段和统治，直到最佳种族、最强壮和最聪明个性的统治。然而，尽管自然界对个性、有机、自足的形式充满热情，在其贵族式的世界秩序中，它对任何地方的个体都漠不关心。地球上的所有生物确实都是利己主义者，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它们确实都在痛苦中努力维护自我、维护个体存在。

但大自然对个体生物的生存或幸福毫无兴趣。它只关心物种的存续。个体植物、个体动物、个体人类会死亡、被杀、从地球上消失。但物种在世代更替中永垂不朽，不会消亡，也不会被毁灭。当一个物种没有足够的防御能力来抵御其他物种时，它就会以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繁殖力，赋予无数新的个体生命，即使这种生命会千倍万倍地成为血腥的牺牲。如果自然没有赋予一个物种武器，那么子宫就会代替角、牙和爪来保护它。在个体的潜意识中，这种神圣的自然意志也得以延续和传承。它通过每一种自我牺牲、自我克制的举动清晰而崇高地表达出来，正如我们在动物界中无数次遇到的那样，为了保护物种，它们不断做出最大的牺牲。

在人类的世界里，同样的不屈不挠的意志迫使母亲在必要时为她的孩子牺牲自己的生命，并驱使人们为了自己的同胞而冲向敌人的长矛。这种原始的生存意志在健康个体身上非常强大，在事关物种、民族和种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它能够轻易战胜个体对生存和享乐的渴望。在这样的时刻，个体愿意放弃这种被紧紧抓住、深深热爱的存在，甚至将其抛弃，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然后，牺牲成为生命中令人陶醉的节日，人们为自己加冕，仿佛要去参加一场舞会，而不是去忍受苦楚。爱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不过是生存意志的自我保存。**大自然又何尝在意个体的欲望和渴求！**它引领个体进入最幸福的幻想，似乎许诺他人间天堂。但是，她用诱人的梦幻图像使个人的意识服从她的意志，实际上她想要的不是他的空气，而是她的崇高目标——繁衍，生命的延续。当个人从欺骗性的陶醉中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被欺骗了；自然对此并不感到困扰，她满足于自己的意志得到贯彻。整个塞雷尔问题都源于此，即想象中的个体与爱神（Eros）的普遍意义之间的矛盾。个体

追求其想象中的自私目的，从动物的性欲到精神体验，追求各种形式的快乐；但他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超个体“生育意志”的支配，包括捕猎和保存母亲和孩子。

对于人类和某些高等动物来说，婚姻的道德结合由此产生。婚姻不是相互享受生活的契约，就像堕落的世界今天所理解的那样。婚姻是生育和养育新生命的原始结合。根据养育时间的长短，婚姻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或更短。例如，许多鸟类在雏鸟长出羽毛后就会结束婚姻，以便在下一个繁殖季节再次交配。在人类中，孩子要独立生活需要二十年的时间，因此婚姻自然延续到整个人生。自然界中的女性更想要的是孩子，而不是感官上的愉悦。在自然界中，无论在任何地方，无论处于什么层次，女性为了完成繁衍生命的任务，天生就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一旦怀孕，就会立即放弃个人目的，以大局为重。众所周知，在受孕后，高等雌性哺乳动物通常会拒绝或勉强忍受进一步的性交；个体欲望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为了总体命运，此时所有的力量和精力都服从于这一命运。由于爱神只在某些相对较短的交配季节出现在大多数雄性动物体内，其余时间它们的重要能量都用于照顾和喂养幼崽。

例如，我们多么无私地看到鹳和燕子从黎明到黄昏都在进行着这种崇高的服务！这种美丽而本质上是道德的观念，即个人无条件地拒绝和牺牲，在母性中尤为纯粹地闪耀，贯穿了整个有机世界，以至于人们几乎可以说自然及其编织物已经完全基督教化了。

在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我们必须坚定地强调这一点，因为道德沦丧与生命为敌，而几乎没有人怀疑只有自然才是道德的。克服自私是所有自然道德的首要任务。只有在人类世界中，这种在自然界中只表现为黑暗冲动的主张才以精神的形式出现，并作为道德和宗教观念进入我们的自我意识。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崇高历史时刻，道德从无意识的世界过渡到有意识的世界，这种光荣的过渡发生了，没有人比这更伟大的爱，他为朋友献出生命，这个永恒的真理现在从宗教世界获得了神圣而超凡脱俗的光辉。道德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早已萌芽，但只有通过耶稣，它才成为有意识的力量。只有通过耶稣，道德才与更高、更深的意志建立了明确的关系，而如今，人们将这种意志视为一切生命的源泉，并对其顶礼膜拜。

因此，道德世界秩序既是贵族式的，也是社会主义式的。它把个人的利己主义束缚在生命这个伟大的血缘共同体中，但与此同时，通过永恒的斗争，它为最强者开辟了从底层走向上层的道路。

今天进行的心理政治战争可以看作是二战的直接延续。

约瑟夫·戈培尔预言道：“我们确信，战争结束后，犹太人将面对一个完全理解犹太人问题的人性。”虽然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成功推翻了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政权，但他们却未能摧毁民族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应用中固有的一个思想：任何一个社会，只要真诚地团结起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就可以轻易推翻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统治。因此，从战略上讲，犹太复国主义者有必要通过媒体和学术界继续战争，不仅要玷污希特勒的名字，掩盖民族社会主义的真正理想，也要使非犹太人对真正的革命不感兴趣（尽管不一定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支持的针对指定替罪羊的起义不感兴趣）。

大规模报复始于互联网通信，通过共享信息和分析，将以前分散的知识分子聚集到国际上，这些信息和分析既证实了犹太人已经控制的程度，也揭露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为进一步控制犹太人而进行的行动，尤其是以色列侵略者对巴勒斯坦的残酷占领以及以色列附近所有不服从的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的系统性削弱。我们认为信息战已经获胜，因为犹太人意识现在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犹太人不可能再恢复他们的秘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第一道防线已被轻易击败。

但是在了解犹太知识的非犹太人中，有多少人愿意团结起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

我们现在正处于宣传战阶段。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二道防线是阻止我们达成解决方案，从而无法将对问题的认识转化为消除问题的必要行动。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是让犹太复国主义特工在不同的非犹太人群体之间挑起不和，而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犹太人统治所有非犹太人的事实并没有在受影响的群体之间形成牢固的融洽关系，反而与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的非犹太人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几乎完全一致。更可疑的是，自称反对犹太统治的人之间的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比普通民众之间的紧张局势更严重，这与我们所期望的相反，如果这种紧张局势不是故意制造的。早年，非种族主义的声音在讨论中远远盖过了种族主义的声音，而今天情况已不再如此。尤其可耻的是，那些本该更了解情况的人，在看到穆斯林——目前最坚定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宗教团体，也是他们活动所导致的最大的苦难——被犹太媒体指责为从 9/11 到街头轻微犯罪等一切事件的集体责任后，仍然对穆斯林抱有负面偏见。帮助我们赢得信息战的互联网传播，在宣传战中给我们带来了难以置信的问题，因为它让坏思想在坏人中占据了优势。我们可能赢得了第一轮，但犹太人已经通过将犹太意识本身转化为犹太复国主义武器而恢复过来，目前正在赢得第二轮。

“一个没有根基的国际集团使各国人民相互对立。他们是那种到处都感到自在又无处安居的人。”——阿道夫・希特勒

但是今天有多少人明白，纳粹标志是一个统一的象征，而不是分裂的象征？

非犹太人在全世界（除以色列外的所有国家）的数量都比犹太人多好几个数量级。他们无法与我们正面交锋，而且实际上不可能获胜。但他们能做的，也是他们最擅长做的，就是让我们互相争斗而不是与他们争斗。我们当中的精明人士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尽一切努力在时间耗尽之前警告所有愿意倾听的人：我们正在分裂，而随着我们分裂，我们也将被征服。

三方冲突

“犹太人是务实的人……他们不反对反犹主义，他们只是反对反犹主义的人是危险的。”——萨维特丽・德维

初入犹太意识领域的人们很容易被诱导相信，反对犹太统治的人作为一个整体，比其他人都好。事实并非如此：今天许多好人不反对犹太统治仅仅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今天许多坏人反对犹太统治是因为他们恰好更早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多年来目睹了这些情况的缓慢发生），犹太意识带来的心理创伤产生了一种副作用，即扼杀了基本的纯真和善意，从而使人们变得比犹太意识之前更坏。

“犹太人从两边对我们发动攻击。下层阶级还没有看到他，因此，出于愚蠢而憎恨我们；上层阶级看到了他，但认为他可以满足自己的私利，因此，从背后向我们开枪。”——迪特里希·埃卡特

所有战争的第一步都是了解参与的各方。我们看到这场冲突并非像通常想象的那样只有两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而是三方。具体来说，我们看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对犹太人统治的对手，他们性格上根本不可调和。我们认为，所有希望加入这场冲突的人都必须先学会区分他们。

雅利安人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被视为非犹太人。我们反对犹太人统治主要是出于道德（和愤怒）动机，因此只有我们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其他任何群体在背后支持压迫，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任何群体被压迫，我们都同样在道德上厌恶压迫。事实上，我们的目标是以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统治为例，激发人们对整个部落主义行为现象的反感。（我们大多数人通过研究诸如 9/11（以及随后的战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暴力、中央银行的权力、反对所谓“否认大屠杀”的法律以及历代对犹太复国主义构成危险的魅力人物的各种暗杀等话题，对犹太人有了认识。）

相反，外邦人不希望自己部落的成员成为外邦人，但也不担心其他人是否保持外邦人的身份或成为外邦人。他们反对犹太人统治主要是出于自私（或嫉妒）的动机。他们不是在道德上对压迫现象感到厌恶，他们只是不喜欢被压迫者的角色。他们的目标是将犹太人从统治地位上赶下来，以便他们自己的部落能够占据这一地位。他们名义上可能是反犹太人，但他们并不是战略上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他们在非犹太群体之间造成分裂，从而加强了犹太人的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通过不喜欢其他非犹太群体而对犹太人产生认识，然后他们才将这种认识归咎于犹太人。）即使他们成功了，世界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好，因为他们并不比犹太人好。

“如果即使在犹太人被驱逐之后，当今犹太人统治的原则仍然存在——个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我们或许会看到许多‘反犹太主义者’坐在犹太人曾经坐过的地方。”——戈特弗里德·费德

从雅利安人的角度来看，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道德差异是粗略的：两者本质上都是无辜的压迫者；一个只是喜欢通过巧妙的欺骗（按照他的牧民原型的传统）来压迫，另一个则喜欢通过毫不掩饰的武力（按照他的猎人原型的传统）来压迫。雅利安人与非犹太人合作，先推翻犹太部落主义，然后再担心非犹太人部落主义，这在战术上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作为部落主义者，非犹太人爱自己胜过恨敌人，因此永远不会为了消灭敌人而牺牲自己。但如果所谓的反犹太联盟中每个派系的主要动机都是自我保护，那么没有一个派系愿意为其他派系做出牺牲，这意味着它实际上根本不是联盟。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非犹太人本质上无法跨越种族、宗教和其他教派界限团结起来。

“我相信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所有人，但我不相信与那些不想与我结为兄弟的人可以结为兄弟。”——马尔科姆·X

知道这一点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策略一直是在反对犹太统治的阵营中提拔非犹太人的领导地位，从而用有用的白痴淹没他们，淹没真正了解情况的少数真正的反犹太

复国主义者。因为，不幸的是，我们花在解释真正发生的事情上的时间比他们滔滔不绝地说“除了我们之外的所有人都恨我们!”非犹太人的叙述所花的时间还要长。作为反制措施，我们必须不断指出非犹太人部落主义和犹太部落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其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扩展为更广泛的反部落主义运动（无论如何，这应该是所有雅利安人心中最关心的事情）。

如果你反对其中之一而不反对另一个，那么你就不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

普遍的反部落主义运动实际上具有免于普遍指责我们单挑犹太人进行批评的优势，因此对我们的进步大有裨益。但是，它要求彻底放弃对反对犹太统治的非犹太人（那些虚伪地拒绝放弃自己的部落主义态度，同时谴责犹太人的这种态度的人）的支持，转而专门支持雅利安反犹太复国主义者（那些不信奉任何部落主义态度，因此真正有权谴责这种态度的人）。只有当我们排除那些天生无法团结的人（即非犹太人），只留下那些能够团结的人（即雅利安人）时，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才会真正团结起来。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真正团结必须建立在共同的高尚品德之上。因此，我们不是粗鲁的“包容主义者”/“包容主义者”，他们相信非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站在同一边；我们是雅利安主义者。我们坚决不同意这样的想法：“任何反对犹太统治的行为都比没有反对好!”只有基于高尚动机的反对犹太统治才是可以接受的；基于卑鄙动机的反对犹太统治比没有反对更糟糕。

“我们是当今世界的革命者，并被打上了革命者的烙印。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绝不能由时代的认可或反对来决定，而应由我们已认识到的真理所承担的义务来决定。”——阿道夫·希特勒

打个比方，如果犹太人是肿瘤，如果犹太人的意识是发现肿瘤，如果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外科医生来做手术切除肿瘤，那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策略就是向屠夫颁发外科文凭，让他们相信他们有能力切除肿瘤。屠夫现在已经进入医院，数量远远超过真正的外科医生。虽然真正的外科医生切除肿瘤仍然很重要，但我们现在最紧迫的目标是阻止屠夫进入手术室！我们遇到的每个屠夫都必须立即隔离，必要时可以强制隔离。

停止资助新纳粹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

因此，对于寻求统一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建议采取几条简单的行动：

1）批评外邦人，也批评犹太人

我们不把焦点从犹太人的罪行上移开，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群体内/群体外双重标准的行为无论是谁实施的，都同样令人厌恶。那些对非犹太人部落主义视而不见的人是阴谋家。

2）排斥和谴责任何以反对犹太统治作为实现后续身份认同目标的手段的人（例如“如果我们想把穆斯林/第三世界人/等等赶出去，我们必须首先对付犹太人!”）

那些为了部落利益而愿意与敌人作战的人，同样也愿意为了部落利益而向同一个敌人出卖自己。他们是叛徒。

3）提高人们对犹太人针对非本族裔或宗教派别受害者所犯下的罪行的认识

我们都是同舟共济的。任何只为自己的群体寻求救赎的人，都和士兵为了自救而逃离战场，将战友置于危险之中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逃兵。

严重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不能容忍阴谋家、叛徒或逃兵。除掉这些人，我们保证真正的团结——高尚团结——将随之而来。

我们可以共同做出最有力的判决。

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性 马特-科尔

民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思想和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历史现象的真正意义常常被其追随者忽视或遗忘。有时，它的观点和目标与反动右派的观点和目标相混淆，有时又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左派的观点和目标。要消除这种误解，不仅要在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民族社会主义的作用，而且要重新评估其独特的人生价值。只有当这种作用和这些价值观的意义得到更清晰的理解和认识时，我们每一个支持者才能实现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完成其历史使命所需的责任感。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谈到 “欧洲的衰落 ”时，指的是现在已进入最后阶段的宏大历史进程。但即使在这个晚期阶段，也很少有人有足够的思想和精神力量来认识到衰落的全部程度。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腐败堕落的政治结构。我们所熟知的文明的方方面面——整个文化体系——都已腐朽不堪。

衰败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机构：社会、经济、宗教、道德、文化以及政治。自罗马衰落以来，世界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以利润为上帝的商人；在议会妓院里兜售自己的政客；号召他的教众向犹太人俯首称臣并公开诋毁种族的传教士；将女权主义和同性恋仅仅奉为“另类”生活方式的教师；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安稳的退休生活看得比士兵的荣誉更重要的军官——而在这些人当中，普通公民在啤酒和电视的熏陶下，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一切。所有这些都是不健康的症状，是癌症的症状，是一种不治之症，它注定了当今文明的死亡。这是一种死亡前的状态。根据支配文化发展的伟大周期律，西方文明作为一个有机体已经走到了尽头。没有恢复的可能。没有拯救的希望，也不应该有希望。腐朽的东西是无法人为保存的，它必须被摧毁。现代西方文明是对真正文化的可笑模仿。它代表着旧秩序，旧秩序的价值观是虚假的、异己的、与生命和种族敌对的。今天，我们正目睹其堕落的最后阶段，一段时间后，它将以死亡和混乱告终。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一进程。如何面对这一严峻的前景？如何面对一个文明、一个我们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整个文化即将消亡的局面？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痛苦的经历？我们应该放纵自己的激情，陷入肆无忌惮的享乐主义还是自杀式的虚无主义？放弃常识，相信萨满或宗教邪教对另一个世界生活的承诺？还是完全蔑视现实，怀着怀旧的情绪要求恢复已经不可挽回地失去的东西？但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文化的消亡是否意味着一切的终结？这是否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活下去了？对于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基于对现实的清晰认识采取行动——大胆、果断的行动，目的是再次从混乱中汲取秩序。这里有第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在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中，文化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相反，它主张种族至上，并承认种族原则中蕴含着所有高雅文化的潜能。

当然，从这种观点出发，可以直接得出结论：文化的消亡是一种不同于种族消亡的现象。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曾在他的书中所说的："每一次失败都可能成为未来胜利

之父。每一次战争的失败都可能成为新的高潮的动力。每一次灾难都能为人民注入新的活力。每一次压迫都可能成为新复兴的新力量源泉。**只要民族保持血统的纯正，这一切都有可能。**"这里最关键的是什么适用于较小的悲剧。

在这里，保存种族核心的问题变得至关重要。谁能在即将到来的崩溃中幸存下来？什么将取代西方文化？这些都是基本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将我们的种族与西方文明的整体衰落割裂开来是非常危险的。一千多年来，阿里乌斯的命运一直与西方的历史密不可分。他能否经受住文化断裂的冲击，现在还无法确定。然而，我们必须迈出这伟大的一步，因为别无他法。如果我们的种族——或者至少是其中有生命力的一部分——不能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将自己从正在瓦解的文化大潮中分离出来，那么它将毫无希望地被吞没；因为只有建立一个具有独特价值观和思想的新秩序，在旧秩序的废墟上勇敢地崛起，才能确保雅利安人有一个有价值的未来。最重要的不是一个腐朽的文明能否生存下去，而是一个能够创造文化的种族能否生存下去。因为关键不在于文化或文明本身的生命，而在于一个能够创造最高文化的种族的永恒生命。这是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

只要阿里乌斯还活着，他的体内就蕴藏着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悲剧性的大灾难只能将其燃烧成新的创造性表达的明亮火焰。正如西方文化毫不费力地将古典时代的元素融入其历史一样，新秩序的后西方文化也将如此——它将继承西方那些仍保留其价值和纯洁性的特征，将其作为不朽的遗产。要正确评估作为革命现象的民族社会主义，就必须准确定义其术语，并理解其在广阔历史背景中的作用。认为革命等同于虚无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是不严肃的。真正的革命并不等同于虚无主义，后者只会导致为毁灭而毁灭，没有一套相应的价值观。它也不是布尔什维主义——**在一个堕落的时代，遵守礼仪成为一种革命行动。**

它不仅仅是夸夸其谈——任何骗子或机会主义者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它不仅仅是暴力，尽管后者可以伴随革命的进程。它不仅仅是违宪地改变政权。所有这些都是外在的。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彻底变革的愿望和引入一套根本不同的价值观。西方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著名的革命事件。

1649 年，英国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政权更迭，克伦威尔和他的“圆头党”成功推翻了查理一世，建立了清教徒共和国，其主要遗产是盎格鲁-撒克逊政治中虚伪的道德主义传统。下一次欧洲大动荡发生在 1789 年的法国，雅各宾派打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号，这一事件标志着乌合之众和平庸者的胜利。

在许多方面与所谓的法国大革命相似的是 1917 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变，它是前两次动乱中已经显现的平等化进程的畸形结果。除了“札勒基林”和普遍的残暴之外，所有这些欧洲“革命”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产生于相同的精神渊源，承载着相同的物质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当时西方正在发生的堕落的特征：对数量、质量和物质财富、世俗商品、幸福、漫无目的的自由、特权和权利的迷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人类的利己主义服务！

甚至可以说，这些革命中的每一次革命都是逐步堕落的日益鲜明的表现。虽然 1776 年的美国革命具有真正的民族起义的某些特征，但不幸的是，它受到了 18 世纪唯物主义理性主义的感染。内战摧毁了美国发展成为真正的民族国家的任何机会，为其留下

了最毒辣的平等主义和精神布尔什维主义的种子，我们今天正目睹其全面开花结果。无论“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美国梦最初的含义是什么，它都已成为最不择手段的贪婪和私利的廉价幌子，正如臭名昭著的“美国精神”已成为全世界骇人听闻的淫乱和无文化的象征。与以往的“革命”相比，1933 年的德国革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现象。它不仅几乎不流血，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一场强大的精神变革。

在阿道夫-希特勒卓越领导的激励下，革命从德意志-普鲁士独特的责任、服务和纪律传统中发展而来，反映了德意志人民作为第一个自觉抵制西方衰落的雅利安民族在政治上的成熟。它实现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体系，从根本上不同于旧秩序的价值观体系。也许并非巧合的是，正是那些曾经有意识地纵容人类衰落的国家在二战期间成为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死敌。虽然从狭义上讲，这一独特的创造悲剧性地昙花一现，**但从广义上讲，它不仅应被视为具有种族意识的雅利安人的第一次真正起义，而且应被视为两千年来的第一次真正革命。**

以往的所有动乱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现存体制内颓废的表现，而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则代表了对体制本身的彻底反抗，并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价值观。民族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不同于旧秩序的反自然主义，而是有意识地寻求将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应用于人类生活。通过公开承认普遍不平等的原则，民族社会主义将“血缘”和“种族”价值观作为其意识形态及其所有应用的基石。她认为平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人类天才完美的手段。它为了健康而与我们时代的严重疾病作斗争。为复兴而颓废。为了力量而战胜软弱。用谎言换取真理。以死亡换取生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革命必须被理解为过去两千年中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阿里乌斯具有永恒重要性的特殊事件。今天，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正是从这一强大的灵感源泉中得到启发；作为我们时代真正的革命者，我们共享的正是它的价值观。

自从马克思主义宣传说民族社会主义（作为某种未定义的“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后的垂死挣扎”以来，人们对我们的信条及其在世界各种意识形态中的适当地位就产生了一些困惑。不仅所有左翼政治家都相信这种明显的荒谬，一些极右翼人士也是如此。**事实上，民族社会主义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它既不是右翼意识形态，也不是左翼意识形态。它不参与现存秩序中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

民族社会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现实的理解摒弃了任何此类毫无意义的二分法，认为这只是过去两百年工业革命所产生的阶级矛盾的非自然后果。它与当代种族需求毫无关系。尽管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右派和左派——存在着外表上的差异，但它们只不过是旧秩序的两个永恒的方面。它们是同类，因为它们的世界观都建立在经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都从资本和大众的角度看待世界。就像两个敌对的帮派，他们争吵的不是核心价值观的实质，而是核心价值观的应用方式，即财富的分配方式和相关的政治考量。世俗生活可能有更高目的的观念与他们都格格不入。与旧秩序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相反，民族社会主义肯定了种族理想主义哲学，其特点是为了整个种族有机体的利益而做出个人牺牲和服务，这不仅被视为所有真正文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自身有意义存在的基础。

阿道夫-希特勒这样描述这种理想主义方法：**"实际的理想主义不过是个人的利益和整个生活从属于社会的利益和整个生活。只有这种从属关系才能创造出任何组织的可**

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唯心主义符合大自然最深层的要求。正是这种理想主义使人们自愿承认强者的优势。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成为构成我们宇宙的世界秩序的一个微粒"。他接着解释了这种理想主义的意义："我们多么有必要更经常地记住，理想主义并不是一种过分的情感流露，而是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切人类文化的主要前提！不仅如此：只有理想主义才创造了人的概念。雅利安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完全归功于这种情感，人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也完全归功于这种情感。

从这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中可以看出，与所谓的革命左派对立的并不是真正与反动右派结盟的民族社会主义，而是旧秩序的两翼——右派和左派——共同反对新兴的、在政治上由所谓的革命左派所代表的新秩序。价值体系的基本对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变得昭然若揭，当时，国际金融资本和国际共产主义这两股看似对立的力量无条件地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他们都视为致命威胁的一股力量。在民族社会主义军团围攻马克思主义堡垒的同时，**世界目睹了共产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在一场狂热的"圣战"中的亲密合作，以击败共同的敌人，维护旧秩序。**忠诚在历史背景下审视了西方的现状，并讨论了通过基于民族社会主义激进价值观的革命来解决衰落危机的方法之后，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民族社会主义者个人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态度——伴随其实际参与的道德义务，以及一些客观事实，其后果应决定其个人观点和倾向。

首先，革命者有义务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坚实、哲学和道德一致的基础之上。阿道夫-希特勒曾说过："行动的必要条件是面对真理的意志和勇气"。对于政治活动家来说，顺从公众的喜好和偏见总是比采纳不受欢迎的观点要容易得多。领袖明白这一点，因此给民族社会主义者下达了这样的指示："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非常清楚，在捍卫上述关于国家作用的观点时，我们是以革命者的身份行事，因为我们动不动就被贴上革命者的标签。

然而，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与同时代人对我们的看法无关，无论他们是赞扬我们还是指责我们。我们只有一种义务：真理强加给我们的义务"。真正的革命者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终极目标。否则，他就不再是革命者，而只是另一个政治机会主义者。阿道夫-希特勒对这种机会主义的无情态度清楚地表现在这些话中，他的著作中的以下段落也是如此："……一个希望更新整个世界的伟大运动，无权考虑当下的情绪，而必须考虑未来。

一旦道德基础牢固确立，**革命者的下一步就必须从内部脱离腐朽的现代秩序，重新考虑个人对各种社会机构以及国家制度本身的态度。因为民族社会主义者不可能忠于一个企图破坏或摧毁人民种族完整性的国家。**这样一个丑恶的实体必须被推翻。"当一个政府权力机构利用其掌握的一切手段将整个民族引向毁灭时，那么反抗不仅是每一个人民子弟的权利，也是每一个人民子弟的义务"。这是阿道夫-希特勒关于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论述，他指出："国家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的目的是维护和进一步发展在身体和道德上相似的人类集体……"西方文明的普遍解体在北美最为明显，那里的特殊问题是民族尚未成型。在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结构——至少直到最近——都与其独特的民族类型相对应，而在美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民族。

我们所谓的"民族"只不过是对所有生活在同一片机会均等土地上的人的一种方便称呼，很难说是真正民族的合适基础。也许正因如此，美国人的特点是倾向于将国家

与国家相提并论，这是真正爱国主义的可悲模仿。无论美国曾经是什么样子，如今它只不过是一个同质的、多种族的大杂烩，没有真正的特色或共同的目标。从长远来看，唯一能阻止它解体的因素要么是普遍福利，要么是武力。在缺乏这两个因素的情况下，一旦各种离心力——社会的、地区的、民族的，尤其是种族的离心力——开始运转，整个结构就会变得非常脆弱，而在当前条件的压力下，这种情况必然会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社会主义者坚持传统的爱国主义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毁灭。“为了祖国，无论对错"。我们有祖国吗？说白了，北美洲的雅利安人是否拥有一片他们完全拥有独立权力的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美国白人生活在一个殖民地，其行政中心在华盛顿特区，而真正的首都在耶路撒冷？当数以百万计的非白人被允许合法或非法地涌入美国，并在那里立即成为庞大的消费社会的平等成员时，就不可能再认为美国的边界是神圣的，“美国人”这个称谓也失去了任何特殊的意义。那么，所有关于拥有宪法、国家和自由社会的说法都是可笑和侮辱性的，因为这些概念只不过是表示我们被奴役和灭亡的流行语而已。那么，就必须考虑到，现有政权不再值得我们忠诚和效忠，而是作为暴政和压迫的工具——作为敌人——必须被彻底和无情地摧毁。

那么，就必须把“法律和秩序”视为我们民族最严重的灾难，而把内部矛盾的离心力视为最大的幸福，因为它们打破了不自然、不神圣的结合的束缚。阿道夫-希特勒拒绝宣誓效忠即将灭亡的哈布斯堡家族的旧国家时，采取的就是这种僵硬的革命立场，他清楚地预见到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灭亡——因为缺乏民族团结。每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思考一下，哈布斯堡王朝即将崩溃的过时制度与目前北美多种族国家的状况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回顾一下《我的奋斗》中的警示将特别有帮助：**“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把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呼爱国情绪同化到自己身上"。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特点是打击距离国家边境安全距离较远的目标，而不是承担更困难、更危险的任务，消灭离家更近的敌人。**例如，美国的保守派总是站在那些呼吁海外军事冒险——从珍珠港和苏伊士到越南和伊朗——的前列，**而他们显然丝毫不担心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本土的统治**，这绝非巧合。让我们想象一下，列宁也会以类似的资产阶级反动方式行事。例如，让我们想象一下，随着 1914 年敌对行动的爆发，他会宣称，尽管他与沙皇的意见分歧众所周知，但作为爱国者，他的职责要求他在这个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保卫俄罗斯母亲，并将与“他的”政府的斗争推迟到战争结束。任何一个理智的人，不仅是共产党人，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极其愚蠢和天真的，甚至是彻头彻尾的疯狂。

无论如何，列宁都不会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他的事业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对世界构成威胁。然而，有些同志却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成功的真正原因，他们还没有像威廉-乔伊斯在 1939 年那样明确地解决效忠国家的问题。作为一名民族社会主义者，他有意识地决定离开被犹太人统治的英国，去捍卫德国的雅利安革命，因为他意识到血缘公民身份比单纯的效忠更为重要。**当今世界，有两种同样危险的意识形态势力正在肆虐。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平等主义，即共产主义。另一种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即犹太人优越于所有非犹太人的阴险学说。在东方，共产主义占主导地位，而在西方——**

与垄断资本结盟，在政治上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为代表——犹太复国主义则占主导地位并至高无上。

因此，西方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削弱和瓦解犹太复国主义的权力结构。只有摧毁了这一憎恶，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才能开始有效地完成其他任务。

因此，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挑战现有现状。如果我们不能或不愿认识到首先必须攻击和打败内部敌人，那么我们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永远无法打败其他敌人。

民族社会主义者决不能为了捍卫现行制度或帮助它克服困难而忘乎所以，无论是在国内政策领域还是外交政策领域。任何此类行动都是与革命进程背道而驰的，只能起到维持现状的作用。相反，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欢迎一切有助于瓦解和摧毁现有秩序的事态、事件和行动。在这个晚期阶段，没有什么是可以恢复的。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恢复逝去的时代。我们的任务不是让衰落、濒临消亡的文明起死回生，不是维护腐朽的制度，也不是试图调整和重塑它。这些现在都没有意义。简单地说，我们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历史任务就是，以新的视野、新的观念和新的意志，从零开始，在地球上创造新的秩序和新的文化，这将是不朽的雅利安天才的新的奇妙见证。我们的使命正是如此，别无其他。

德意志内外之自由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每当谈到自由，世界历史上一些最激烈的争端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不仅所有的革命都与自由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历史的进程中，严重的暴政也经常与自由的理念联系在一起。古代暴虐的杀人犯所呼唤的是自由；古罗马的奴隶在对一个光荣的制度给予致命一击时所渴望的也是自由；正是为了良心的自由，才使得宗教改革者与传统的教条作斗争；正是科学的自由，才在成千上万的科学实验室中与中世纪的教会作斗争。

最后，许多伟大的哲学家都对人类自由和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当宗教、科学或政治生活中出现重大运动时，它几乎总是与自由的理念相联系。数以百万计的人追随这一思想，并在各个领域为之奋斗，这一事实将永远为我们带来自由的尊严，无论这一思想上有什么糟粕。没有人敢于对人是否自由做出教条式的决定。双方的代表都以同样令人信服的方式为自己的观点激烈地争论。

特别是自从精确科学兴起以来，将人完全融入自然的尝试越来越多地伴随着这样的论点：自由意志的想法是一种幻觉，因此，由这种想法产生的所有后果必须被宣布为无效。只有那些诚实地承认问题的两面以及两面的后果的思想家，才能够提供一个推测解决方案的想法。

特别是康德，他预见到了精确自然科学的发现，并将人纳入自然规律，就像其他自然或生命现象一样。以自然科学家得出物理结论的方式，他对人的内在本质进行了同样彻底的调查。他最终得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结论：人是完全不自由的，但还是自由的。与歌德相似，康德认为人是两个世界的成员，它们相互影响。这两个世界的起源是不同的，无法追根溯源。看来，在不发表任何教条主义意见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站在康德的基础上。以同样的真理，我们可以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生命依赖

于其世界和环境的许多影响。在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生命游戏中，人不过是权力的一个桥梁期，就像其他任何生物一样。**我们必须承认有某种内在的力量，使人能够有意识地为一种想法而生，为一种想法而死，这证明了某种力量的存在。**

这违反了其他的存在原则，从而使我们不得不假设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并不超越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观念。当然，不存在完美的自由，即使我们想承认自由意志是这样。自由取决于外部的可能性和内部的"格式塔"，但在我眼里，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自由的唯一可能呈现。因此，在一个国家的生活中，自由并不意味着有机会实现一切，而且，个人自由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创造、发明或形成一切。

相反，自由必须被认为是一个"格式塔"。这意味着，在创造能力的意义上，自由反对被执行的模式的暴政，它也反对混乱的任意性和"格式塔"的缺失。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一下知识和政治的争论，我们会发现没有任何地方的自由等同于自由和对自由的要求。这意味着对创造机会的要求不是给每个人的，也不一定是给每个人的。真正的自由，作为一种要求和机会，必须始终伴随着生物的力量、性格和创造性的灵魂。有个人的性格，也有国家的性格。对后者来说，不能允许过度扩大自由的机会，为了每个人的利益，有必要进行限制。从许多狂热的哲学家和蛊惑人心的群众法庭之命运中可以看出，它可能会导致因某些外部力量的缺失而产生的驱动性野心和奢侈的意志，从而导致权力的致命不稳定。

里安齐的格拉查、米拉波和当今政治生活中的许多人物的例子都清楚地表明，自由和法律必须形成一个整体。这一事实在歌德的信念中得到了体现，即"只有法律才能给我们带来自由"。适当的外部联系塑造了内部创造。

这就是今天以民族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德国人对自由的古老理解重新出现的地方。这个概念完全不同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破坏的狂热疯狂。其他国家从未完全理解德国的这种自由概念，因为他们一般从未掌握人格概念的内在一面。法国历史学家基佐曾创造了一句歌德特别喜欢的话："是德国人首先把人格的概念介绍给欧洲各国的"。

这是一个格式塔的概念，与所有平等主义的短语和混乱的政治构造截然不同。然而，这是一个个性的概念，它有意识地捍卫自己的个性，围绕着一个深刻而坚定的内在核心进行创造性的表演，从而在扩张的同时也被束缚在一个中心。马丁-路德提出的正是这种德国式的自由理念，他为精神和宗教自由而争论，并准备为此冒生命危险。但与此同时，他要求建立一个严格的政治制度，以保护这种内在的自由不受邻居的选择影响，并对个人的选择提供防御。歌德在谈到尊重，特别是自尊的存在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并不主张肤浅、傲慢地高估自己的能力，而是承认形而上的中心是不可摧毁的，没有它就不可能理解艺术、科学和政治发展领域的宏伟创造。这基本上是同一个自由概念（尽管它在哲学上可能并不存在），它在我们所说的个性和社区之间的关系中显示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争取建立一个由数百万德国人组成的社区，坚定地塑造和引导他们，同时我们要求为杰出的、有创造力的个性提供空间。我们不觉得这两种要求是相互对立的，尽管其他国家是这样，因为他们只知道在暴政和混乱之间做出选择。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遵循其内心的本能，在政治基础上得出了德国人民的重要宗教领袖以及我们的思想家和光荣的诗人早先得出的相同结论。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是

因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是由德国人领导的，并在为自由而战的过程中产生了活力。如果我们把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就会受到影响世界历史的其他规定的阻碍和困扰。无论是对德国还是对任何其他国家，国家主权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根据我们的信念，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边界，对一个国家的创造能力来说只会是有害和危险的。划界、竞争和对各种可能性的不断检查，不仅是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任何国家存在的一部分。仅仅是这一教育和哲学思想就清楚地表明，德国并不争取世界统治权。**

这种转变将结束混乱的自由主义时代，这种自由主义一方面努力追求世界信任和世界共和国，这种信任和共和国应该建立在民主的国际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由所谓的无产者进行世界革命。

地球上居住的不是抽象的人类，而是某些种族和民族。这些国家和民族有自己的过去，他们的历史可以越来越多地通过研究他们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来理解。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揭示了自己的成就，并提出了进一步表现的可能性。在政治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自然法则。抗议这一法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拒绝一个自然事实并不能改变其存在。事实是，在进化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国和小国。很明显，巨大的植物会比小灌木或小花更远地伸向天际，并将其根系深深地扎入地下。这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生命形式的美感，也没有说什么贬低所谓小国的创造可能性。希腊人曾经是一个小国，但他们成为古代印度-日耳曼文化的宏伟奠基人。

几千年来，他们的教育力量对相关的日耳曼部落产生了影响，并且一如既往地年轻，它仍然延伸到我们这个以北欧人的觉醒为标志的时代。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威胁要打破所有边界的巨型国家。在他们的破坏力中，他们可能为事物的改变做了准备，但与古希腊的例子相比，他们留下的只是黑暗时代的记忆。因此，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教育既受限制法则的制约，又有要求欧洲统一的权利。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其他国家并没有利用他们的机会来完成这一使命。对德意志民族来说，承认自己在这个星球上其他伟大国家中的利益和权利范围并不丢人。

德国甚至准备支持他们的创造能力。另一方面，对德意志民族来说，仔细对待那些受到大德意志帝国保护的小国的人民或那些寻求受到我们保护的小国的人民，是一项光荣的责任。如果他们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总体命运，我们就让他们慷慨地参与到我们古老而受人尊敬的大陆内部形成的一切。这是一种曾经在古罗马短暂盛行的态度；当时强大的罗马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与所有东方的影响作斗争。在严格的罗马法律和罗马公民的自豪感的综合作用下，他们为古代印度-日耳曼人的态度提供了一个令人钦佩的范例。在小范围内，中世纪德国的许多城镇以一种将外在的力量与内在的创造性快乐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他们的生活。

普鲁士虽然受到许多敌人的骚扰，但在许多领域都是北欧-德国人试图将法律和自由结合起来的范例。严格的弗里德里希秩序与康德和其他伟大的德国人所宣扬的思想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在德意志民族中，自由的概念总是与义务而不是与权利相联系。

一位德国哲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很好的观点：**自由从来都不是一个"免于"的问题，而总是一个"自由地"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揭示了整个态度。德国人的斗争，并不是为摆脱责任意义上的自由而斗争。它是为一种使命而战，在这种使命中，我们努力践行我们被赋予的伟大职责。这就是为什么德意志民族是欧洲最革命的民族，同

时它也是内心自由的全然启蒙思想的发源地。我们相信，德国人自觉的内在价值——荣誉、信念、忠诚和自豪——代表了所有欧洲民族的最佳元素。因此，我们的政治力量是合理的，因为它保护了这些价值。**自从中世纪的世界观消失后，我们看到了各种忏悔、艺术理论和哲学学说，但没有伟大的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一种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创造内在统一的观点）终于在民族社会主义中诞生了。**

民族社会主义还是布尔什维主义？ 约瑟夫 戈培尔

我的左翼朋友！不是出于博取好感的目的，而是直截了当、毫无保留地承认，我喜欢你，你是个好人！昨天晚上，我本可以在成千上万目瞪口呆的听众面前与你辩论数小时，因为我觉得，我们共同点和分歧的根本问题正在德国的工人论坛上提出，这个问题最终与他们有关。我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写下这些文字。你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已经就原因达成共识。

今天，任何诚实、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工人运动的合法性。问题只在于实现最终目标的方法和形式。他们因需要和痛苦而生，如今站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分裂和无力、缺乏牺牲精神和对未来意愿的活生生见证。我们不再需要讨论德国员工对社会补偿的要求是否合理，就像我们不需要讨论被剥夺权利的第四等级是否应该或必须生存。

无论路径和目标是国内还是国际，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都在为自由而真诚、坚决地斗争，只为自由；作为我们最终的成就，我们都渴望和平与共同体——你渴望世界的和平，我渴望德国的和平。我们俩都非常清楚，在这个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今天谈论和平，就是将墓地当作自己的家；在这种状态下保持和平，就是和平主义和懦弱。你我都知道，一个内在彻底虚伪的国家、一个内在彻底虚伪的制度注定要被推翻；因此，为了建立新的国家，我们必须为之奋斗并做出牺牲。在这方面，昨天我们俩本可以对黑红金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懦夫们说出完全相同的话。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意见一致。

我不需要向你强调，对我来说，人民和国家意味着与那个大腹便便、戴着金表链的健谈绅士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他油腔滑调地复述施特雷泽曼和赫格特稀释过的语句，就像留声机一样。

人民：就是我们、你和我，昨天虔诚地坐在我们面前的成千上万的人，以及与我们同在、拥有相同精神和血脉的数百万人。

国家：就是这些数百万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需要、面包和命运的共同体。人民心中对国家充满渴望。将国家组成一个需要、面包和命运的共同体是我们的首要目标。第二个目标必然从第一个目标中衍生出来，就像它自己一样：民族自由。为了获得自由，人民必须斗争，当他们成为一个民族时，他们必然会斗争。这就是我们的方式。

对于那些了解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没有什么令人震惊的；这是一个古老的历史因果链。民族（Völker）的历史无非是塑造民族的创新意志和民族追求自由的积极行动的单一结果。**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因为另一个民族的善意、爱或慈善而得到救赎。这总是源于其追求自由的意志，只有在追求权力和生存的意志具有相同的大方向时，才能从邻近民族那里获得帮助。**

你称赞俄罗斯是国际主义团结的国家，并承认今天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俄罗斯化。你所说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是泛斯拉夫主义最明显、最突出的形式。我绝不会加入资产阶级骗子和无知者的合唱。俄罗斯和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没有濒临崩溃。**但俄罗斯议会制度的失败并非因为它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国际性的，而是因为它是民族性的，因为它是俄罗斯的。没有任何沙皇像列宁一样，能够如此深入地抓住俄罗斯人民的内心、激情和民族本能。他给了俄罗斯农民农民一直憧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自由和财产。他让最朴实的阶级——农民——成为新制度的真正代表。**俄罗斯农民对犹太人，尤其是苏联犹太人充满仇恨，就像他们支持土地改革、热爱祖国、土地和土壤一样。 “打倒犹太人苏维埃，列宁主义土地改革万岁!”这句口号最能说明俄罗斯农民对俄罗斯新制度的态度。

德国共产主义者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像西方犹太资本家所希望的那样：意识形态化、理论化，对意识形态的敌人充满无边的仇恨；不切实际，对现实毫无认识，甚至是一种不顾及实际完成可能性的意识形态。他并非生来就是诗人或思想家的后代。他认为俄罗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国家的核心，而实际上它只是欧洲国家新民族组织的核心。总结一下：列宁牺牲了马克思，换来了俄罗斯的自由。而你却想牺牲德国的自由来换取马克思。

即使是布尔什维克犹太人也清楚地认识到俄罗斯民族国家的迫切需求，并迅速而谨慎地适应了它。出于策略还是别有用心，谁说得清？两种可能都有！无论如何，今天他必须入乡随俗。这破坏了与西方资本家犹太人的和谐。因此西方对苏俄怀有刻骨的仇恨。证券交易所不能也不会容忍一个民族国家，而布尔什维克国际犹太人并不能保证反对民族布尔什维克俄罗斯。

昨天，你在犹太人问题上拐弯抹角。我知道原因。请不要转移话题。你和我一样，都是反犹太主义者。你还没有准备好承认这一点。在共产主义国家，犹太人仍然可以存在，如果需要的话。在民族布尔什维克国家，犹太人是一种荒谬的存在。他自己最清楚这一点。但他因此变得非常狡猾。他通过狡猾的计算来适应那些比他强大的力量。他适应一个民族的国家本能，他比我们更早认识到并考虑到这一点，因为他并不用真心去束缚自己，而只是作为一个感兴趣的旁观者来观察。

犹太人的问题，甚至布尔什维克内部的犹太人问题，比人们想象的更复杂。资本主义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可能并非同一种人。从长远来看可能如此，但从当前实践来看却并非如此。他们最终可能都想要同样的东西：“你们将征服所有民族!”但他们太聪明了，不会在错误的地方对抗比自己商业本能更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之一就是民族意志，这在今天的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

因为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始于对个人牺牲的要求。对他而言，任何事情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的钱包。对他而言，唯一在政治上正确且真实（即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事情，就是保证他的财产和他自鸣得意的庸俗和平。我看到你在微笑：是的，我们可以一起抱怨这一点。这是粗俗、卑劣、令人厌恶的，从最真实的意义上来说，也是不负国家责任的行为。你和我都不屑于那些毫无牺牲意愿的国家口号。布尔什维克主义始于为国际主义渣滓服务。它与财产所有者需要做出的牺牲大小无关，完全无关。如果国家自由需要，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要求

一切，一切。

朋友，你昨天说的国际兄弟情谊都是胡说八道，我相信你和我一样清楚这一点。你真的相信俄罗斯人民希望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吗？你有没有想过，俄罗斯站在德国无产阶级一边，是因为它认为德国无产阶级是稳定其国家生存的第一要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德国共产主义中，没有一个卢布不以“俄罗斯”为纲领。

被压迫阶级从未通过国际抗议解放自己，而总是通过其民族意志来展望未来。18 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没有等待德国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声援。它独自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无法忍受枷锁的时刻，挣脱了枷锁。旧体制的力量试图摧毁它的精神，但它奋起反抗，并胜利地将自由主义这一理想带到了全世界。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德国工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自由，才能获得自由，而当他无法忍受奴隶制的枷锁时，他就会这么做。

你们对国际主义大加赞赏，却没有理解其最深刻的含义。一个体系越腐败，其联系就越国际化。你们和我们最可怕的敌人——民主、金钱——都是国际化的。国际主义试图欺骗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因为它知道这样它就永远无法被阻止。

通向自由的道路需要经过民族。民族越团结，对自由的渴望就越强烈。民族社会主义有责任激发民族内部对自由的渴望。我们和你们一样渴望自由，只是我们采用其他方式，即通过实现目标的方式。国际团结是你们的纲领，而民族团结，即民族共同体，是我们的纲领。昨天我高兴地看到一件事： 你们现在相信我，我们的民族共同体不是马克思和施特雷泽曼所说的和平主义。今天的民族共同体只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而争取民族的权利。我们渴望这场斗争，因为只有它才能带来自由。

未来必须为之奋斗。你我之间，虽然彼此争斗，但并非真正的敌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分散了力量，却始终无法达成目标。也许绝对的必要性将我们团结在一起。也许吧！

不要摇头！这个问题关乎德国的未来，更关乎欧洲的未来。新国家的诞生或西方的衰落，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这些年轻人，你我都是几代人的命运的承载者。

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一点！我向你们致敬！

会场战斗 库尔特·马斯曼

有一次，我们在工人郊区举行会议。会议由我们这些民族社会主义学生召集。会议厅很小。一支冲锋队就足以守卫会场。大约九点半，预计另一支冲锋队将在会议结束时出现，以保护与会者免受可能的攻击。

八点钟，当晚要发言的巨人席默尔卷起衬衫袖子，露出两只和普通行李箱一样大的手，面带微笑地啐了一口。他在俄罗斯待了三年，对那里的骗局了如指掌。回到德国后，他全心全意地成为了一名民族社会主义者，成为那些让胆小的资产阶级心惊胆战的人之一，他们对民族社会主义者中危险的 “社会主义 ”感到焦虑不安！一个出色

的家伙！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你可以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保管，他宁愿饿死也不会拿走一分钱。

据说有一天他被介绍给元首。这个高大、粗鲁的小伙子平时总是口若悬河，但那天却只是站在那里，吞吞吐吐，用手揉眼睛，最后结结巴巴地说：“好吧，阿道夫·希特勒……”并热情地和他握手。然后他恢复了理智，脸涨得通红——哦，真是奇迹！他挺直了腰板，敬了个礼，转身潇洒地走了。

冲锋队队员穿过喧闹的人群，人群已经吵闹了十五分钟，他来到主席台前一个非常狭窄的位置。

场面非常壮观！持续了半小时的喧闹声震耳欲聋。没有发生暴力行为。熊一样的席默尔站在讲台上，双臂交叉，面带轻松、漠不关心的微笑，看着大厅里发生的一切。

渐渐地，他的微笑产生了效果。喧闹声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紧张而期待的气氛。

八点半左右，席默拿起水壶，凑到嘴边，喝了一大口，然后把水倒入旁边的一个玻璃杯里。他拿起杯子，水巧妙地越过冲锋队员的头，正好洒在一排里那个一直在大厅里大声吆喝、煽动人群的人的脖子上。然后，席默突然用洪亮的声音吼道：“安静！现在我来发言！”大厅里立刻安静了下来。

然后，他开始演讲。他用这些工人日常使用的简单明了的语言发言。他们听得很认真。

大厅中间，整个晚上喧闹声的来源：一个小犹太人戴着厚鼻子上的角框眼镜爬上椅子，开始用不愉快的高音说话，就像太监一样。

席默尔用手做了一个轻蔑的动作，继续用洪亮的声音演讲，回声从墙壁上回荡，完全盖过了椅子上小个子男人的呜咽声。但小个子坚持自己的目标，不断咆哮，并做出前所未有的态势。

当席尔默刚刚谈到“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时，停顿了一会儿，小犹太人可以听到他在尖叫：“工人！无产阶级！你们的阵营就是国际无产阶级！……你们的……”没有听到更多的话。席尔默穿过冲锋队粗铁链般的阵线，独自一人穿过喧闹的人群，径直走到小犹太人面前，他是共产党人的发言人和领袖。

犹太人打断了他的演讲，尽管他周围有 350 名同志，但他还是像猴子一样敏捷地从椅子上爬下来，退了几步。席默尔耸耸肩，脸上露出阴郁的表情。然后他对着大厅里的人吼道：**“工人，看看带你们来的蛤蟆，再看看我！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工人！我和你们一样都是用拳头来生产！你们是属于他，还是跟随我？”**

犹太人则喊道：“同志们，他想挑衅我们！”席默尔在骚乱中无法继续发言。他面无表情地回到讲台上，继续在那里讲话。

但那个东西又一次爬上了他的椅子。他当然有理由担心他的同胞会受到这位演讲者的影响，于是他示意散会。

“我们走！”小犹太人喊道，“莫斯科！我们走！”

片刻之后，大厅里响起了喊声、震耳欲聋的敲打声、拳打脚踢和狂乱的尖叫声。

席默尔站在讲台上，用尽全力向大厅吼了几声“德国！”，声音盖过了喧闹声。“德国！”听起来就像号角声。我不知道这个词是否是他演讲的一部分，还是对会议大厅斗殴的最后一次劝诫。说完这句话后，他猛地跳入混战。

就在那时，大厅的大门被打开了，第二支冲锋队冲了进来。一分钟前还像倒霉的拿破仑一样的小犹太人，现在像瘫痪了一样靠在椅子上。席默尔正在左右击倒对手，他已经和几名冲锋队队员一起逼近了犹太人头目。犹太人像只黄鼠狼一样从椅子上跳起来，穿过大厅，从工人中间跑过，跳过紧闭的窗户，跳进院子，碎玻璃片也随着他一起摔在地上。

一时间，大厅里笑声四起。

大多数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主要的挑衅者，已经从前门逃跑了。只有一小撮红军在角落里顽强地抵抗。我看到，那些抵抗的人正是共产党中最英俊的人，大多是年长的工人。

很快，连这些人的抵抗也被打破了。在他们投降后，他们被允许不受干扰地离开。

大厅一片狼藉。到处都是血迹，没有一把椅子是完整的，残骸散落一地。一些共产党人，不是最后一批，用啤酒瓶和玻璃杯进行了反抗！

大约有八名冲锋队成员被这些粗鲁卑劣的武器击中了头部。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脸上满是血迹，甚至遮住了眼睛，他们像盲人一样在大厅里摸索。

几名共产党员仍然躺在地上。当冲锋队医生开始治疗他们的伤时，一名面容清秀、年长的工人，他一直战斗到最后，用真正的勇气进行自卫，与对方针锋相对，他从口袋里拿出党员证，从衣襟上撕下党员章，交给巨人席默尔，他要求见席默尔。他握着席默尔的手说：“现在，我的伤已经好了！” 包扎好伤口后，他在一张空白表格上签了名，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动者党。

一位永恒的小资产阶级抱怨“政治的原始人化”。他们说，德国的情况不会因为人们互相打斗而得到改善。

他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为德国人的灵魂和新德国而战，甚至发生在这样的集会和会议厅的斗殴中！

我们民族社会主义的学生不会为了白挨打而进入工人阶级聚居区！我们也不会为了赢得选举的十几张选票而这么做，因为那根本不值得。我们本可以举办学术讨论晚会，至少那样危险性会小一些。

我们为德国工人而战。我们希望帮助工人获得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

为了接近工人，赶走那些真正种族歧视的“领导者”及其保镖，我们常常不得不使用拳头和椅子腿！

施图姆的觉醒 奥托-鲍格特

他领到了上周的工资，正在思考即将到来的周末应该做些什么。他漫步街头寻找娱乐。当施图姆穿越柏林时，他看到路灯发出的光在沥青上反射，听到有轨电车、卡车和汽车驶过的声音。显然，在这片喧嚣中，他迷失了自己，也无人理解他。

突然，施图姆发现了一张火红的海报，上面写着“德国民族同志（Volksgenossen）！有勇有谋之士！”这是在号召人们参加政治集会。海报底部有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党徽。这位年轻工程师以前见过这个标志。虽然他从未参加过民族社会主义党的集会，但他从同事那里得知，民族社会主义是“强盗”和“工人的杀手”。此外，他们还是想要让德皇复辟的反动分子。尽管有这些“偏见”，他还是决定去参加。

集会开始前十五分钟，施图姆到达了集合地点。令他惊讶的是，集会将在一个“至少可容纳三千人”的大厅里举行。尽管大厅很大，却没有地方可坐。人们站在过道上，还有几百人在外面，希望能被允许进入。由于人太多，警方在八点差十分时关闭了大门。“事情变得有趣了。”环顾房间，他注意到一面旗帜。那是“胜利而稳定”的民族社会主义党万字记号。“他觉得：这个符号不代表平庸、软弱或空谈；它要求狂热的支持或狂热的仇恨！”

随后，施图姆开始观察集会上的与会者。所有阶层的人都有：店主、工匠、退休人员、官僚、学生、白领、许多妇女和女孩，但最重要的是，还有无数工人。“褐衫军”也聚集在大厅里，为集会提供安保。这些冲锋队士兵脸上表情坚定，他们大多是工人，就像施图姆一样。“天知道，这些人看起来并不像强盗！”

与冲锋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坐在人群中间的“共产主义者和红色阵线”团体。他们的领袖是一个“看起来像犹太人”的人，正在向他的同志们发表反民族社会主义的演讲，并给他们喝烈酒。喝了几杯后，其中一名共产主义者吹嘘道：“今天我们要终结希特勒这个垃圾！”其他人则大喊“法西斯狗！”和“把他们一网打尽！”

集会领导人试图宣布会议开始。人群开始高呼要求秩序，会议似乎将演变为一场混乱。集会领导人像磐石一样站着，并告知在场人员他们正在参加“民族社会主义集会”，秩序将得到维护。他的坚定话语使大厅变得鸦雀无声。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们感到集会正在受到有力控制。集会可以按计划进行。

演讲者走向讲台。他个子不高，人们可能会误以为他是个“年轻人”。但“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字”都表明约瑟夫·戈培尔是个“男人”。演讲的题目是“列宁还是希特勒”。在场的共产党人不喜欢演讲的主题，开始打断演讲者。戈培尔强硬地处理了他们，他们很快就屈服了。“五分钟后，全场鸦雀无声。”

施图姆参加过许多政治集会。毕竟，柏林曾是德国的政治中心。但他从未见过如此盛况。其他集会毫无意义，而“这里充满了决心和真理，这里就是出路！”戈培尔的演讲与他听过的其他演讲截然不同，清晰有力。他是个行动派，为了拯救德国，他会不惜一切。演讲者回忆起革命以来国家所遭受的耻辱时不禁落泪。施图姆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人民”一词的含义：每个德国人都是他的“兄弟姐妹”。这次演讲向这位机械师展示了一个“新世界”。

戈培尔演讲结束后，讨论阶段开始。一名共产党人开始使用标准的术语，发表了一贯的党派言论：“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和“在哪里发现法西斯分子就在哪里打击他们”。场面一片混乱。共产党人开始唱《国际歌》。对此，冲锋队领袖吹响了哨子。局势恶化，很快就会发生一场斗殴。为了阻止事态恶化，集会领导人喊道：**“如果你们想用椅子腿和铁棒来解决意识形态之争，我们将用更残酷的手段来反击你们的恐怖。任何试图驱散集会的企图都将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让你们血溅当场。”**

施图姆印象深刻。这些人面对敌人毫不退缩。他们愿意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理念……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战线，一种比谎言和金钱更强大的抵抗力量。”战斗开始了。共产党人一边唱着《马赛曲》，一边扔啤酒杯和椅子腿。“把旗帜都拆了！”有人拿着刀喊道。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对女性毫不尊重，在场的人不得不躲在桌子底下，以躲避共产党人的肆意攻击。

冲锋队突然发动反击，勇敢的冲锋队员从后方和侧翼攻击共产党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乌合之众打得满地找牙。战斗只持续了两分钟左右。敌人被迫带着血淋淋的双手撤退……德国工人的拳头真的发挥了作用！冲锋队领袖额头鲜血直流，站在桌子上高呼："德国万岁！" 人群欢呼雀跃，挥舞旗帜。"三千只手臂齐举"——向希特勒敬礼。"现在，汉斯·施图姆终于明白独特的法西斯礼代表了什么：伟大理想的崇高意识。"

这个德国工人为之流血牺牲的理想将拯救德国。施图姆意识到，他为英雄理想献身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动者党，用原本打算庆祝周末结束的工资缴纳了党费。"'我感谢你！' 他握着演讲者的手说，'现在我终于知道我为何来到这个世上。'

就这样，汉斯·施图姆找到了自己的祖国，并成为第三帝国的战士。"

关于未来任务的思考 格雷戈尔 斯特拉瑟

躺在病床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确实有好处。琐碎的日常事务现在有机会从无意识慢慢上升到意识层面，在那里接受检验，并受到想象力的启发，从而获得形式和生命。通常，人们经常犯的错误是，认为实际行动——对日常必需品的不间断关注——并非基于思想。因此，他们喜欢在思想家和实干家之间进行令人反感的比较！的确，当一个人坚定地处理日常事务，并试图通过重新开始工作以务实的方式解决所有问题时，思想和灵魂的潮流不会变得有意识！

因此，偶尔抽空看看今天和不久将来的任务之外的事情，并深入探究那些我们决心用一生去解决的问题，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还有什么比在病床上的孤独时光更适合做这件事呢？那时，时钟仿佛停滞不动，黑夜永无止境——直到最终，终于迎来了黎明！新生的曙光，一次又一次的黎明，是深深的慰藉，是赐福的确定性，让我们能够忍受当下的黑夜——即使时间、岁月似乎永无止境——黎明终会到来，朋友们，太阳终会升起，光明终会到来！

关于孤独夜晚的思考，关于未来民族社会主义任务的思考——我将在这里简要地谈谈——这些思考肯定出现在我们大多数朋友身上，在相似的时刻，以相似的方式——这些思考目前还不是我们工作的主题，但它们暗流涌动，在我们的工作中流淌着。

一、经济精神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敌人，是它的死敌。资本主义体系剥削经济弱势群体，工资分配不公，以财富和金钱而非责任和成就来衡量个人，我们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废除这种体系！我倾向于采取实际行动，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更好、更公正、更道德的制度来取代它，这个制度要有手有脚，而且比现在的制度有更好的手和脚！

然而，仅仅改变一个系统，用另一个经济系统取代另一个系统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改变精神！需要克服的精神是物质主义精神！我们必须实现一种全新的经济思维，一种摆脱当前根植于金钱、财产、利润和虚假成功的观念的思维！马克思主义和虚假的社会主义表明，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资本主义完全相同。基于这个原因，我多年来一直说，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精神上是一体的，只是信号相反！民族社会主义源于有机生命本身，它抛弃了远离世界的理论的虚假言辞，以及衰落文明的陈腐观念。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个民族的经济中，重要的不是利润或收益，而是满足这个民族成员的需求！这才是“国民经济”的任务！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贸易”、“贸易平衡”、“出口盈余”等观念是衰落时代的产物，最终会自食其果，因为它们违背了有机生命的永恒法则，是投机而非必要或土壤催生的产物！我们必须明白，投机性生产及其各种吹捧和广告手段制造了虚假需求，是对人类劳动和生命的背叛！人为的贪婪欲望会催生不断膨胀的野心，而膨胀的野心会加剧人类奴役，即精神奴役，这种奴役取代了灵魂，主宰着生活！如今人们对于生活又了解多少？他们奔波劳累，折磨自己，像苦役犯一样努力工作，只是为了过一种可怕的空虚生活！我们想要的新经济体系并不是为了生产更多。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高生产率并不是关键，真正重要的是人的灵魂！生产、经济只有一个任务：满足个人的经济需求，拒绝那些仅靠人为刺激而产生需求的商品，拒绝“利润和收益”的驱使！

我们必须明白，工作比财产更重要！成就比分红更重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最不幸的遗产是，所有事物都按照金钱、财富和财产来评估！一个民族的衰落是应用这种标准的必然结果，因为根据财产进行选择是种族、血统和生命的死敌！我们从未怀疑过我们的民族社会主义会打破这种所有者的特权，德国工人的解放也将延伸到分享利润、分享财产和分享成就！但如果仅停留于此，不强调精神革命，不反对现行体制的精神，那就意味着用旧标准来衡量一切！我们自觉地反对按财产进行估值，主张按成就进行估值。这是我们唯一认可的估值方式！我们自觉地将工作置于财产之上！我们关注的是成就，而非分红；我们认可的是责任，而非财富或辉煌，这才是人类奋斗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一种全新的经济学信仰。它坚定地认为，金钱的可怕统治即将终结，个人之间的差异和权利之间的差异——即成就的差异、责任程度的差异——是神圣的，是上帝赋予的差异！

二、社会和国家精神

正如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精神的斗争，必须从其外在表现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将其根除；我们反对社会和现状的斗争也是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精神进行的生死斗争：反对自由主义和虚假民主！

如果想要建立第三帝国，我们的民族社会主义理念就必须战胜自由主义和虚假民主！自由主义根植于有机生命，我们意识到，对人类平等的虚假信仰是自由主义摧毁人民和国家、文化和道德的致命威胁，它侵犯了我们最深层次的存在！自由主义思想侵蚀着生命的基础，摧毁着血液，摧毁着神圣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基础是不平等所造成的距离，与当前的社会结构毫无共同之处！我在此所谈论的等级制度完全取决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必须以狂热的热情拒绝那种“人们基本上是平等的”的谎言，拒绝那种认为人们在国家中的影响力和权力分配上是平等的谎言！**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就不平等，在生活中变得更加不平等，因此，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也应得到不平等的重视！但这种不平等反过来只有一个标准，只能有一个标准：个人为社会、为国家、为国家的成就！**

因此，我提出了一项乍一看似乎乌托邦式的诉求，但它是我所说内容必然的结果，也是许多朋友以类似方式提出的诉求。根据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分配权利，这需要制定一个衡量贡献的甄选程序。在民族运动中，人们经常谈论新领导人的出现，而这一诉

求与我所说内容不谋而合。但建议的解决方案：验血、北欧化等等，在我看来，这些方法在可行性、价值甚至效果方面都存在一些疑问！然而，我的朋友普费弗曾提醒我注意另一种方法，即彻头彻尾的德国、普鲁士方法，这种方法比其他方法都更合适：由军队进行选拔！

这要求兵役是自愿的，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实际可行的办法是，根据法律，每个德国公民都必须为国家服务一年；在这一年中，他不会像义务劳动服务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修路或做其他集体工作，而是学习一门手艺，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德国人没有接受过至少一年的手艺培训！然而，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才能入选武器贸易，这项工作将持续两年，因此只会吸引那些最愿意牺牲的人，而这项工作伴随着致命的战争危险，因此需要具备所有英雄美德！入伍是自愿的，不受任何强制。谁怀疑那些自愿应征入伍的德国人，他们离开私人生活的时间是公务员的两倍，而且不像后者那样包括实际生活中的实际好处，相反，在经历了更严酷的服役后，意味着在战争中面临生命危险——谁怀疑这些德国人将是他们国家中最优秀的，种族上最优秀的，他们现在和将来为国家做出的成就将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还有什么比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更自然地重视这些高于其他成就的成就呢？以至于除了每个公民普遍平等的投票权之外，它还会给予自愿捍卫这个国家的公民十倍的额外投票权！这难道不是对成就原则作为政治权利基础的认可吗？作为回报，军事职业将在国家中明显地占据主导地位，而国家首先是其将维护和保护免受外部一切攻击的国家。

在这方面，如果不区分女性，那将是一种罪过！因为衰败的所有特征在两性身上都同样明显，因此种族基础也是相同的；我几乎想说，经验表明，在“母亲”中，这种基础甚至更强。因此，如果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不在这里寻找自然选择的方法，将更有价值的部分分开，并优先选择它，这是不可原谅的疏忽！

对于男人来说，服兵役是参与国家事务最真诚、最有价值的形式——对于女人来说，则是母性！在非洲有许多好战的部落，在分娩时去世的母亲会得到与阵亡男子相同的军事荣誉！这包含着双重含义：除了认可个人英雄主义外，还表明这些人对部落的价值是相同的。因此，在我看来，这是对自然选择中最好的人们的努力的一种合乎逻辑且内在的延伸，将已婚母亲与男子的兵役进行比较，并给予相应的奖励，以获得更多的选票。不言而喻，在这两种情况下，获得更多选票的权利不能成为唯一的奖励形式，此外，在选举地方长官和高级官员、任命公务员以及所有荣誉职位时，还必须优先考虑所有其他政治权利。

这可以称之为乌托邦，但对我来说这是必然的：经过 20 到 30 年的这种选拔，德国将拥有一批改变整个社会和国家面貌的领袖和次领袖，他们将成为国家及其经济不可动摇的支持！

三、文化精神

是否还需要一个特别的词来表明，我们当前生活的虚假精神也必须从根源上克服，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新事物，以及持续的新事物？ 已经不可能再写“我们当前生活的精神”了；那将是一个太大的谎言！直到我有了时间，在漫长的几周里阅读，我才清楚地意识到当下生活的悲剧。如果我不知道人的灵魂是如何饥渴的，那么我就会从阅读

过的书中得出这样的印象：灵魂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理性，即“比率”，它只从机械和技术中寻找意义、目的和内容。

人类灵魂中存在一种可怕的绝望，所有坚定的价值观都荡然无存，这种不稳定徒劳地寻求稳定，而稳定在宗教中已经不复存在，在道德中也已经丧失！“相对主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基调——万物相对，一切知识相对，一切情感相对——良心的麻木焦虑徒劳地试图用“精神分析”来掩饰和解释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核心本身已被侵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

这是最大的、也许也是无法治愈的伤口！因为一个深刻的真理是，道德的复苏是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态度的先决条件。我不想在道德这个词上被误解——道德总是建立在有生命的自然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所谓不可改变的命令之上，即使这些命令是从有生命的自然中提取出来的！我们谈论的不是一种等级或一种宗教的教条式道德观，而是和谐——人与永恒自然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的形式与人类一样受时间限制，但内容却是永恒的！

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是困难的，尤其是在这里。然而，我试图提出一些总体要求。国家的影响力只能是间接的，而且相当外部化：通过学校，特别是通过具有相应态度的教师。然而，为了改变目前这种分裂、解体、无目标、相对和不诚实的精神，或者至少防止这种精神进一步蔓延到那些保持健康的人或群体，除了支持所有真正的宗教努力外，最重要的是： 荣誉感必须成为整个精神生活的中心！对于许多人来说，宗教已经无法像中世纪那样成为精神生活的中心，而忽略这一事实是错误的，尤其是对于那些种族上并不最糟糕的人。但荣誉感本身已经是优秀个人的典型特征，它仍然能够完全取代灵魂中的主导力量，组织人的思想，这些思想参差不齐，意识到了太多的细微差别，[通过对比]使人们能够再次找到“生活的意义”。这只是同一系列的第二阶段，我要求将义务作为荣誉的政治和社会激励予以高度重视。因此，我认为“生命的意义”是通过荣誉和义务来完善人类生存；对于今天的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也许对他来说，这代表了“普鲁士风格”的成就！

有一点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形式和制度是可变的，它们永远没有“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之分：然而，只有一种“正确的”精神，只有一种具有建设性观点的精神：那就是永恒自然的精神，由人赋予活力，是上帝的形象！我们坚信并深知，这种精神存在于我们之中，存在于民族社会主义的理念之中，因此，只有这种精神，而不是其他精神，才能建立：

千年的第三帝国！

民族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 马丁 科尔

民族社会主义是"右翼"吗？

需要从这个话题开始，因为这是对民族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最常见的歪曲之一。许多民族社会主义者认为它是右翼，但却不了解"右翼"和"左翼"的正确含义是什么。这个词起源于革命前的法国，那些希望保留政府制度的人坐在议会的右边，而那些争取激进变革的人则坐在左边。**因此，"右派"一词被用来定义反动派和保守派，而"左派"则用来定义革命派。**

对"左"的评价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团体使用，因为他们通常从事革命斗争。然而，这些术语并不是根据学说的性质来适用的，而是与当时的时间和政治形势有关。例如，在沙皇俄国时代，布尔什维克因为代表了一场革命运动，所以适合于左派。然而，当马克思主义在 1917 年夺取政权时。它不再代表任何革命成为的情况；因此，所有反对他的政权的方式将是左，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是保守派。由于这些自由主义的马列主义团体经常使用"左"的分类，任何与他们对立的其他学说都被贴上"右"的标签，这成了常见的做法，许多民族社会主义者接受了这个标签，尽管是错误的。

一支革命的队伍

"（.....）民族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及其附属机构的现行世界相对立，并更加严厉。"

——戈特弗里德-费德

——德国工人党的民族社会主义纲领

1945 年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社会上发生的变化，继续生活在过去。当其他运动在成长、发展并适应当时的需求和问题时，其他运动却停滞不前，仍然活在本世纪上半叶。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的许多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的社会与 78 年前不一样了。有必要关注现实问题和当前的现行政策，进行调整，并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我们认为现代世界和当前的西方"文明"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它由一个绝对的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组成，具有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哲学。一个由自我利益和自私自利建立的帝国。**一个不是为人民建立的帝国，不是一个文化或精神帝国，而是一个由系统寡头、垄断、大公司和大众媒体不健康地资助的帝国，由一个不道德和反民族的，保护强者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利益而形成的帝国。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寻求对现代世界的彻底毁灭。我们要结束这个颓废的时代，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文化，恢复我们的根本，但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是政治上的保守派。我们不想拯救目前堕落的价值观，不想保留一个资本主义制度或腐败的政府，它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对保持我们的文化遗产和保护我们的种族无所作为。我们不想要一个做任何事情都保持沉默的国家，不想要一个促进破坏千年文化的国家。

我们不赞成当前的（混乱）秩序，而是做反对它的斗争。我们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它们。抛弃与我们的集体主义性质不相容的变态和自私的心态。我们相信对制度进行暴力斗争，以摧毁它，实施新的和公平的东西。我们将建起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秩序。我们是为建设人的精神伟业而斗争，把物质的和自私的精神的利益赶出去。我们不仅为解放而斗争，而且为创造和自由而斗争。人们应该认识到，造成我们目前状况和迫害的原因是西方政府。他们憎恨我们，只保护伟大的利润，并不惜一切代价禁止我们，打击我们。对他们来说，文化和种族毫无意义，只有经济问题。支持这样的政府就是为了提防和拖延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每一个行为之前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说出真相的意愿和勇气被遗忘了——现在我们无论是在右派还是在左派都看不到它。"

——阿道夫-希特勒

民族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它是"正确的"，这个词是敌人的媒体应用在我们身上的，只有那些理解能力差的个人和一些摇滚乐队还在带着它。与那些"正确"的政党合作完全是浪费时间，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讨厌我们，并将成为

第一个顽抗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人。议会也没有民族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因为它在所谓的"民主"中不允许有空间。我们完全反对金钱的专制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势力。左翼"和"右翼"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我们克服了这种标签。我们正在与旨在破坏旧的制度和政府的团体合作。即使这些组织有不同的想法，甚至与我们相矛盾，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旧体制。我们从四海而来，但我们汇为一击。但当我们之间发生内讧时，体制就会占上风。民族社会主义是一个颓废时代的结束，是一个繁荣时代的开始。我们的目标是再创零年，一个时代的伊始。我们是革命的队伍！

民族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吗？

"因此，我们呼吁：

11. 没收不劳而获的财产。

12. 鉴于战争的巨大牺牲要求人民的所有资产，个人在战争中的致富必须被视为对人民的犯罪。因此要求没收所有的战争利润。

13. 我们要求将所有垄断企业国有化。

14. 我们要求分享大企业的利润。

15. 我们要求将社会援助慷慨地扩大到老年人

17. 要求进行适合我们国家要求的土地改革，为共同利益的目的建立自由征用土地的法律。废除地租，禁止一切土地投机行为。

18. 我们要求对那些从事有害于共同利益的活动的人进行无情的斗争。人民的罪犯，贪婪的投机者，等等。将被处以死刑，不论其宗教或种族。

19. 我们要求用共同体法取代为唯物主义世界秩序服务的资本主义法。(.....)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阿道夫 希特勒和戈特弗里德-费德——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 25 点纲领

血与金的斗争

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解是，社会的福利高于任何其他群体的个人利益。对民族社会主义来说，货币只是物质产品交换的一个因素，是对人的工作进行数学评估以实现未来交换的一种方式——我们称之为贸易。所有的人都有权利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收益，只要它是生产性的和诚实的。

在民族社会主义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没有区别，只要是诚实的劳动，就没有劳动等级的划分。我们完全反对那些旨在通过残酷和不道德的方式，在人民的利益面前猖獗获利的大公司。我们反对那些破坏环境的公司，因为他们更关心金钱而不是未来和世界福利。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是历史上第一批环保主义者!全球化是一种标志着高利贷和自私的力量的现象。它是国界的终结，是全球经济体系的部署，只有利于大型精英，不以文化保护或人民为目标，而只以利润为目标。国际主义通过冲破边界，摧毁了民族文化，并促进了一种完全类似于麦当劳的消费主义的美国人的反文化。大众媒体，一个异化的工具披露了这种唯物主义的生活方式，用徒劳无益的愚蠢的乐趣来麻痹社会，转移他们对现实的腐化的注意力。作为资本主义的代理人，这个系统促进了大规模的移民，以便为那些打算减少开支和增加利润而不关心工人的雇主提供人力。对本国工人的偏见贬低了工作质量，使工人阶级陷入贫困，增加了犯罪率，并将外国文化植入到应该被保护的国家。

"反对国际金融资本和贷款的斗争已经成为国家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最重要的一点"——戈特弗里德-费德

金融投机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只是无节制的盈利，对社会没有任何形式的贡献。在民族社会主义中，只要工作就可以成为财富的来源。货币不能创造货币，货币不是产品，它是交换因素。资本只是履行了中介的作用，它没有单独的价值。

民族社会主义支持自由企业，只要它是按照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原则来应用的。相反，大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会使用来自社会以外的人的廉价劳动力——这对社会是一种伤害。同时，我们也不会犹豫不决地给予工人应有的权利，或以恶毒的方式对待他们，使我们受益。民族社会主义认为，诚实的雇主和雇员可以在一个健康和平衡的环境中相互尊重地合作。

马克思主义者否认文化和种族是不可改变的身份，用社会阶级取代它们，但并不存在社会阶级这一说法。工人从本质上讲不是也从来不是国际主义者，他是爱国的——他生活在一个社区，与他们工作的土地有联系。国际主义者是全球化的代理人、银行家、商人探险家，他们看不到国家或民族，而只看到金钱。民族社会主义的精神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激烈和彻底的反对。它是创造精神和真诚的人性对权力和金钱剥削的反叛。我们正在进行反对资本和金融投机者的斗争。民族社会主义是对贪婪和自私的力量的反对和精神上的统一和文化认同感。

“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人民的孩子。我不是由资本家开始这场斗争的，而是由工人来采取我的态度。”——阿道夫-希特勒

民族社会主义政府将增加了工人的假期，将每天的工作时间减少到 8 小时，并实行政策，让他们每天有 2 小时的休息时间和娱乐时间。在一年时间内，工厂和商店将按照最高的清洁和卫生标准进行了改造。在三年内，各类商店，运动场，卫生设施和公共食堂都建起来了。创造了工作岗位，彻底解决失业问题。每个人都应该付出一年的社区工作来重建国家。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投机性机构被关闭，银行家的不正当利润被没收。**历史上的民族社会主义已经证明是站在工人一边的。**我们代表了一种相信人民的世界观，相信诚实和生产性的工作，相信文明的意义——当个人明白他们是一个民族的一部分并为子孙后代共同工作时。

一切的决定因素是性格、勤奋、劳动、个人的意志力，而不是银行账户。现在，容忍大老板和股东的时代已经不复返了，把我们生活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民族社会主义是人类对金钱权力的反叛。民族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真正的声音!民族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

民族社会主义是"种族主义"吗?

民族社会主义的敌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制造并将我们与无知和偏见的形象联系起来。他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制定了"种族仇恨"的政策，并以我们是"可憎的"这一谎言为借口让我们闭嘴。通过使用这个借口，我们被系统迫害、监禁，而且从未被给予答复的权利。

民族社会主义的敌人所希望的是，广大民众不知道我们思想的真相，不理解我们的世界观。事实上，我们的反对者很害怕人们了解民族社会主义的真相，害怕我们代表

着高尚的价值观。他最害怕的是人民反抗金钱的力量，反抗政府，反抗腐朽的制度。种族与自然法则"认为其存在的根本依据必须建立在他们的祖先之上。

对民族社会主义来说，种族是几千年来自然进化和创造人类多样性工作的体现。种族是大自然在我们身上的表现方式。破坏和合并种族——任何种族——都会破坏大自然的所有工作。它应该保存和培养我们自己的血统，我们祖先的遗产，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通过保存血统，我们与自然一起成长、合作和进化。

我们不希望也不认为我们有权利摧毁、消灭或损害任何其他种族。民族社会主义遵循的是个人荣誉和尊重他人的概念。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以其他所有人都能创造一种相互尊重，并为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感到自豪。

血与土

不可否认，构成人类的各种种族是存在的。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我们观察到，不同的文化是不同种族的反映。种族并不存在的说法是目前从创建多元文化社会中获利的政府和系统所宣扬的一个神话。民族社会主义相信"血与土"的原则。血是我们对祖先的文化遗产，也是民族共同体的方式。当人们有相同的起源、创造和传统，当他们有一些共同点，有祖先为未来奋斗和耕耘的土地，有价值观和类似的世界概念，他们就会以类似的方式思考和反应。如果被解放的个人主义情绪是为了社区认同感；人们往往会相互关心，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同一民族的成员。这就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和凝聚力。这种感觉是不可否认的人性和自然。

当它存在时，人们就会一起工作，为相互协作创造文明。现代世界是以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为基础的。它与社区或文化保护的理念毫无关系；它受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文化支配。没有人试图维持或发展自然群体。现代社会的道德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这只会满足于资本和物质产品的积累。没有像民族社会主义那样具有最高价值或精神信仰。由于我们出生在一定的环境中，并在特定的文化中被创造出来，我们很少思考社区、社会和国家存在的起源和原因，它们来自哪里（这超越了历史），是什么真正把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社区是任何民族形成的自然和历史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婚姻，会自然形成一种文化，一套原则，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对某些事物的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历史，这就形成了一种身份和纽带。这种身份和纽带是自然的，自人类存在以来，它一直存在于所有文化的所有部落和社区中。这种关系创造了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责任和关注，有为你所关心的共同利益劳动的目标。这个问题的主要内容是试图理解多元文化社会的本质。显然，没有一个社区（看到有谈论社会的）自始至终都是多元文化的，那么，来自不同文化、种族和原则的人聚集在同一空间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是文化还是独特的身份？这几百万人之间的亲和力会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钱。将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东西是生产-劳动-消费系统。这些社会的本质是唯物主义和个人利益。没有纽带或相互关心。由于移民是离开自己的祖国到另一个国家去做好事、挣钱和消费（"更好的生活"，社会学家会这样说）的人。你能想象一个印第安人离开他依存的部落，抛弃他的人民去另一个地方吗？只有现代社会才试图取代这种社区价值感，如永恒地追求个人利益，金钱比人更重要。多元文化社会存在的唯一原因是贸易和金钱，只有这个。

因此，任何人，即使在反资本主义的地方，攻击"种族主义"将是一个自然的反应，以捍卫他们的空间和文化。他们会捍卫任何多种族社会，以及多种族主义本身，而主张一个没有本质、历史、文化或人类纽带的社会，而只是一个为他的人民利用产品的系统，作为纯粹的资本主义利益。多元文化的存在没有任何理由，只有资本家从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中获利。剥削只发生在多元文化社会，而不是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注的有机社区。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国家和领土，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法律、文化和价值观生活，这是非常自然的。所以，目前的社会是多元文化的，而所有的多元文化社会从根本上说都是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和颓废的。堕落的社会学家、社会工程师和大多数西方政府所提倡的多种族观念是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个人必须为其个人的自我实现而生活，寻找金钱。现在是我们面对民族社会主义概念的时候了，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想法，而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感觉和现实。正视现实事实是，在存在民族共同体的情况下，不会发生种族冲突，战争和文化冲突只发生在多民族社会。是自我保护的本能造成了仇恨和不和谐，但由于多元文化主义把不同的人放在同一个国家，这在攻击的同时也捍卫了彼此的利益。

残酷的现实是，多元文化社会并不奏效。虽然在一个地方有一些具有价值观、宗教和文化的群体，即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但他们对某些事情的反应是不同的。会有仇恨、歧视、偏见和战争。人类的本性就是认同他的友邻。由起源、创造和传统形成的纽带是血的反映，并形成我们的世界观。不同的人和文化有不同的观点。理想情况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领土和国家，按照他们的法律、习俗和文化耕作生活。“种族主义"这个词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内涵。有些人把它当作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仇恨，有些人则认为它是自我保护和对民族和文化的崇拜。

关键是，民族社会主义是一种爱、自豪和荣誉的学说。如果有合法的多元文化主义者，我们就是。我们认为，所有种族都应该培养自己的文化，而这些文化的混合会造成冲突，并破坏它们。我们不希望任何种族被消灭或低人一等，而是希望保护和进化人类的多样性和他们的差异。

自由主义的谬误学说　奥托-瓦格纳

自由主义的优点无疑是将人类从中世纪专制权力的邪恶控制中解放出来，但从这种“解放”中也是我们的人民因一场失败的战争和一场罪恶的革命而遭受的全部苦难的根源。**个人脱离了将其生活权利限制到最低人道程度之上的权力，导致其脱离了民族共同体。1789 年“大革命”的结果是，各民族解体为其民族人口总数的个人，共同体意识则丧失了，或者不得不让位于一种虚无缥缈的所谓“人类”观念，即一切个人的总和。在自由时代，维系各民族的是外在的经济环境，而不是天然的团结意识和血缘关系。民族被塑造成经济机器，然而大自然通过人类生存的各种要素，通过血缘关系，不时会以规模巨大的民族起义来反抗这种经济机器。民族分解为个人，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个人从对血缘共同体的义务中抽身出来，逐渐地为自己而不是为人民而生活。自然赋予人类的保护血缘的义务为所谓的自由人权所不齿。**在这些人权的诉求下，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意识：个人主义，而资本主义等所有的时代弊病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资本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产物。回过头来看，可以说自由主义所成就的一切都是各

民族的悲哀。它不是维护，而是摧毁。它不是建设，而是破坏。自由主义使我们失去了民族共同体。人权吞噬了整个人民的权利。**然而，如果自由主义不成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观的垫脚石，垂死的人民也将不得不带着他们的所有权利走向死亡。**

如果自由主义宣扬的是整个人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所谓人权，宣扬的是国家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那么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它才能为人民完成建设性的任务。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源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力量。它不是经济上的必然，而只是自由主义时代追求私利的结果。它是自由主义及其政治表现形式民主或利益集团统治的完整世界观。

因此，在社会方面，自由主义只会使贫富差距更加明显，同时也导致了如今政局的动荡和人民的无能为力。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物质主义思想」流毒

从自由主义的贫富对比、资本与劳动的对比出发，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在 19 世纪中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种观点的基础是资本主义时期贫困和无产阶级化的人民的经济困境。与自由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纯粹从物质角度看待生活；事实上，它甚至更进一步，宣称生活是一个经济过程。历史是经济阶级斗争的结果。经济生产形成社会。上帝、宗教、礼仪、伦理、道德、法律，简而言之，一切的文化价值观都是起源于资产阶级经济基础的概念。马克思也由此得出他的结论。**因此，犹太马克思主义只看到现象和表面的世界，他不知道现象的精神内因，他对塑造人类环境的思想过程一无所知，他只看到结果，而不是创造性的思想；换句话说，他的世界观是物质主义的。因此，从思想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的延续，或者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延续，只不过打了个减号。**

曾经强大的德意志劳工运动的整个破灭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内部政治斗争，却因为错误的思想方向而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失去了成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三代数百万劳动者.在这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中，三代数百万劳动者被迫从事前所未有的无以言语悲哀的劳动。牺牲和殉难是一切历史运动的创造性要素，但在马克思主义中似乎失去了意义。**因为一个民族的生活不是根据经济原则来实现的，而是根据血缘和种族来实现的，不是来自物质的力量，而是来自理想的力量。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物质主义犹太教的精神，其教义总是给人民带来杀戮和毁灭。**

民族社会主义将扭转法国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方向-法国大革命使人民的生活沦为没有理想的、悲惨和懦弱的苟活，民族社会主义将给我们的人民创造一个神话，在这个神话中，信仰和生存的意志可以焕发出新的力量。它将代表一种生活方式，使我们的人民摆脱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阴影下生存的精神折磨。有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理想，有了将我们人民的命运作为我们生活中斗争的最庄严和最崇高理想的信念，一个值得世人钦佩和后人敬仰的历史时期将会到来。

屠杀人民的阶级斗争　奥托-瓦格纳

从经济生活的观念到阶级斗争只有一步之遥。马克思主义把经济上的弱者统合成一个阶级，称他们为无产阶级，并宣布要与经济上的强者-马克思称他们为资产阶级-作斗争。这场斗争的目标是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犹太人卡尔・马克

思不知道别的民族如何，当然除了他自己的民族之外–生活在各个国家之上，不会被阶级斗争所毁灭。

这样的阶级斗争是我们的劳工运动永远无法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必须加以解决，它是罪恶的犹太思想下最可怕的罪行，是人类对世界秩序和大自然最妄自尊大的暴力行为。

每一个人类社会，尽管在今天看来并非如此，但都是在共同血缘的基础上有机地成长起来的。历史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种族斗争的结果。形成社会的不是经济生产，而是血缘。无论经济、社会或文化上的轻浮如何玷污了它，大自然都会进行干预，以其铁律来纠正它。几个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试图掩盖这一真理，但民族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大自然的平衡之作；它将恢复这种秩序，这种秩序虽然不是所谓的人类理性的结果，但却是超越一切人类傲慢精神的杰作。

我们人民中裂痕的加剧有其原因，那就是对劳动者一词的胡乱限定。根据马克思主义，只有体力劳动者才有权自称为劳动者。在某些情况下，把人民划分为经济上弱小的阶级和经济上强大的阶级可能不会取得预期的成功，也就是说，如果经济上弱小的阶级有机会上升成为经济上强大的阶级的话。这就是为什么要人为地在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制造社会矛盾的原因。在这里，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的险恶用心跃然纸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不是解决社会的问题，不是与资本主义作斗争，不是在经济上提升经济弱者的地位，而是屠杀人民的阶级斗争，是毁灭民族的理论。**

谁会反对一无所有的人、雇员和体力劳动者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呢？每个人都有代表自己经济利益的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从长远来看，谁又能阻止体力劳动者、无产者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呢？劳动者有权利这样做，不，他有义务这样做！但是，阶级斗争一开始，民族的自杀就开始了，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自杀也随之而来。

民族社会主义希望弥合我们人民之间的撕裂，恢复人民的有机团结。对它来说，每一个为了共同利益进行生产和服务的人都是工人，劳动者。

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了维护经济或职业利益，雇员和雇主应在财产上团结起来，反过来团结起来的财产同时又会使雇员和雇主团结起来；与雇主一样，雇员也有权在经济上联合起来。出于同样的原因，民族社会主义也承认雇员有在当前的状态下加入工会的权利，但并不认同今天的工会，因为这些工会几乎完全被滥用于达成党派政治的目的，而且往往除了为工贼提供职业食宿之外别无其他用处。

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阶级斗争的纲领，并在三卷的《资本论》中对其进行了科学论证。马克思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清楚地表达了大家对所谓科学论证的看法，即任何体力劳动者都无法理解，任何脑力劳动者都不愿去阅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自称自己的理论“科学得令人发指”，以至于俾斯麦无法对其采取行动。换句话说，狡猾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将其罪恶的政治宣传带入了科学领域，因为他十分害怕遭到俾斯麦的迫害。

今天，阶级斗争的后果已人尽皆知。不受旧时代束缚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的德国人，其生活注定为其父辈的罪孽而遭受残酷的、非人的奴役，还有，不能忘记的是，世界大战中沉默的千百万战败者，他们作为无情的审判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杀人学说面前站了起来，要求清算。

民族社会主义接过了这一要求的执行权。

他将经济利益的自我主张视为一种责任，但拒绝任何可能危及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斗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劳动共同体，其目的是为了共同利益而提高生产。每个公民都是劳动者。劳动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不想劳动的人，即不想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必须放弃这个社会通过国家给予其的权利。民族社会主义将资本主义理解为资本对劳动、经济、国家和人民的统治。国际金融帝国主义是此类统治最残酷的表现，必须被彻底打倒。资本必须服务于民族经济，同时也服务于国家，而国家服务于人民。资本本身并不是有害的，只要它服务于共同利益。马克思主义也承认这一点，因为它并不想消灭资本，而只是想把资本从私人手中夺过来，转到国家手中。因此，我们的斗争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对劳动、人民、国家和经济的统治，反对出于个人私利对资本的滥用。资本和劳动力一样，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是唯二的两个生产要素。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并肩前行，必须承认国家拥有对此二者的仲裁权。劳动受到国家的特殊保护。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希望将资本从个人手中收回，转交给它所向往的社会。这样一来，一切都将造福于每个人。**这种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性的消灭和经济的死亡。**众所周知，列宁在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废除了私有财产。结果，俄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数百万人因此丧生。因此，列宁在 1921 年 4 月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自己说，马克思主义试验给整个经济战线带来了可怕的失败。列宁从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崩溃中得出的教训是，必须重新引入私有财产，特别是把土地分给农民。毫无疑问，如果说有哪个国家能够对付马克思主义经济试验，那一定是俄国。在德国，约有 136 人被迫拥挤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艰难谋生，而在俄罗斯，每平方公里只有约 37 人。

俄罗斯是一个拥有巨大经济财富的国家。俄罗斯所能做到的是德国完全做不到的。认为一个国家的条件可以移植到另一个国家身上，这只能证明其政治上的无能。在俄罗斯，只要肯付出努力，就能使人民在经济上富裕起来。资本以最多样化的形式大量存在，只需加以利用即可。尽管如此，如果仍有数百万人死于饥饿，那只能是由于列宁所明确承认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巨大失败。如果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应用于德国经济，这并不只意味着数百万人死于饥饿，而是意味着三分之一的德意志人，即大约两千万人的死亡，因为他们目前已无法再依靠德国的土地维持生计。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城市人口的饥饿，首先是无产阶级的饥饿，因为即使农村人口被征用并被迫生产粮食，农民最终仍能以一种临时的措施养活自己。马克思主义就是自杀，尤其是劳动者的自杀。如果说，尽管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仍然使广大人民沉醉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化妄想中，**那么，这不仅是由于犹太人的恶意，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罪恶，它们不能承认自己理论的破产，以免被它们所误导了近一个世纪的人民彻底击垮。**

民族社会主义将劳动和资本视为两个生产要素。因此，它的任务不可能是征用人民；相反，它为自己设定了相反的任务，即使人民重新获得财产。劳动和成就是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只有重新获得财产的人民才能维持一个为全体劳动者提供面包的经济。

但不能取消私营部门还有另一个原因。并非每个国家的行政机构都需要堕落为官僚机构。然而，像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全面行政机构，同时还必须兼顾经济，不仅不可

避免地会官僚化，而且由于缺乏竞争，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合适的行政人员，从而削弱生产。然而，德国要想在过于狭小的空间内维持甚至增加人口，就极其需要经济生产。因此，如果德国的经济要确保我们人民的生存，它就需要唤醒一切力量的竞争因素，它不仅需要个人积极性的全部巨大力量，更需要 6500 万德意志人的胆识和进取精神。这并不意味着民族社会主义要打开新的自由主义时代的大门，然后孕育新的资本主义。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中，个人的积极性已经到达了最终限度，这使它不能够危害共同利益并展开它的剥削。通过立法，确立资本和劳动的平等权利以及国家的监管将确保这一点。

因此，民族社会主义意味着与自由主义剥削作斗争，与征用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疯子作斗争。

最后，所有制之所以必要，还有一个原因。

只要人类存在，他们就充满着前进和向上发展的不可抑制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有其物质经济方面的理由，但马克思主义通过其平均主义，通过征用，对这种追求设置了致命的阻碍。在这一阻碍面前，一切前进都会停止，生命的意义也会随之陨落。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暴力。民族社会主义是上升的，是所有勤劳者-即创造者或劳动者的上升。

最后，马克思主义把它所谓的社会问题，即无产阶级的经济满足问题，说成是公正的分配问题，给人的印象是，只要公正地分配生产资料，就可以消除人民的苦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无耻谎言。

社会主义的重点不是分配问题，而是生产问题。穷人的苦难并不仅仅片面地源于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而是人口数量与土地面积之间的比例失调和紧张造成了无产阶级及其苦难。但同时社会主义也是民族政策上的问题，甚至还不止于此：显而易见，真正的民族主义无外乎就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也无外乎就是民族主义。尽管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实施了经济的国际化，但在我们人民受到凡尔赛和谈及其条约的奴役之时，这一古老的真理再次昭然若揭。随着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时代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也即将结束。民族经济正在重新获得其权利。

但是，对于民族社会主义来说，我们的人民不仅在经济上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在社会上也是不可分割的。与经济斗争相比较，社会阶级斗争更是对我们劳动者利益的背叛，剥夺了我们人民的生存权利。来自“上层人”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自负，与来自“底层人”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同样的有害。

当资本家和无产者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德国的敌人却正在着手准备进行世界大战；当雇员和雇主的斗争在德意志肆虐的时候，国际金融帝国主义却能够开始对市民和无产阶级进行它的凶残统治！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德意志互相对立的时候，当人民的力量被阶级斗争所扼住咽喉的时候，针对我们的世界大战爆发了，这绝非偶然。1914 年 8 月，德国的外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身上，这是历史的事实。有朝一日，历史研究必须充分确定阶级斗争与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于民族社会主义来说，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者，只有德意志本身。对于我们来说，衡量我们民族同志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其对人民的贡献。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的障碍将会不复存在。未来，那些为德意志血缘共同体履行劳动者与斗士

职责的人，服务于国家的人，将为这个社会所接受。国家最优秀的服务者将成为国家的领导者。只有承担义务的人才能享有权利。**但是，法律的严酷和人民的鄙夷应该警醒那些逃避公民义务或认为可以以牺牲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而生活的人。新的民族共同体将从民族社会主义中崛起，它不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好坏，只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好坏。**

作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组织　海因里希 希姆莱

如今人们经常谈论布尔什维主义，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布尔什维主义是现代才出现的一种现象。有些人甚至认为，这种布尔什维克主义，这种由犹太人组织和领导的非人类斗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全新的方式成为了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与此相反，只要地球上还有人类，人与非人类之间的斗争就是历史规律，犹太人发动的这场针对各国的战争，是我们这个星球上自然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只要我们回顾历史，就能发现这一点。**不难得出结论，这场生死之争与人类对抗瘟疫、细菌对抗健康身体的斗争一样，都是自然法则。**

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显而易见的例子研究从过去到现在这场斗争的方法，以便弄清楚犹太-布尔什维克对手的战术。

圣经为我们提供了其中一个历史例子，说明布尔什维克-犹太人用他们的方法彻底摧毁了一个雅利安民族。用眼睛阅读犹太人历史上的这一部分，其中讲述了犹太人是如何在波斯人、所有城市、所有村庄中分布的，波斯人、雅利安人是如何意识到这些犹太人的危险的，以及波斯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意愿——由大臣哈曼代表——，以及这位在《圣经》中被称为亚哈随鲁、在历史上被称为薛西斯的君主如何通过宫廷犹太人精心策划的阴谋与波斯妻子瓦实提分居，以及犹太人如何以各种伪装，包括通过犹太女孩，特别是通过犹太妓女以斯帖，诱骗国王。然后，我们听到，不顾人民和种族意识强烈的哈曼的意愿，犹太人施展了各种阴谋诡计，最终，忠于人民和国王的哈曼被毫无原则且盲目无知的君主送上绞刑架，交给了犹太人末底改——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最后一次在各国历史上——以及这个犹太人末底改是如何成为总督的，现在，凭借布尔什维克主义特有的冷酷、清醒和无情的计算，他发布命令，根据这些命令，在所有城市和村庄，最尊贵的波斯人，犹太人的所有敌人，在事先预定好的日期被犹太人杀害，而犹太人则受到王室法令的保护。《圣经》记载，当时有 75000 名波斯人被屠杀。更过分的是，这位雅利安国王颁布法令，将阿达尔月的 14 日和 15 日定为法定假日，并作为犹太人的伟大胜利节，年年庆祝，直到今天。

毋庸置疑，古代波斯人从未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这个国家遭受了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沉重打击，其核心被摧毁，其悲剧程度可见一斑。这个雅利安民族不仅被剥夺了崇高的、纯粹的宗教教义——琐罗亚斯德教，还被剥夺了母语。两千多年后，德国学者才成功地将琐罗亚斯德教经典从古波斯语翻译成德语，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总是走这条路：一个民族的领袖、思想家被血腥地斩尽杀绝，然后这个民族就会陷入国家机器、经济、科学、文化、精神、心理和身体上的奴役。

其余的人，在无数次血腥混战中丧失了自我价值，堕落了，在短短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人们最多只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群人。至于其他例子，我们无法确定地球上到底发生

过多少起此类悲剧——无论结局是圆满还是未竟。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能猜测，我们的永恒敌人犹太人，以某种伪装或通过某些组织，参与了其中。我们看到了坎斯塔特和维登那把不知疲倦的刽子手之剑在历史长河中闪烁。

我们看到熊熊燃烧的火葬堆，无数人遭受了巫术审判，被折磨得支离破碎，母亲和女孩的尸体被烧成灰烬。我们脑海中浮现出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座椅，正是这些座椅让西班牙人背井离乡，正如三十年战争，让繁荣的德意志民族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 2400 万人口锐减到仅存 400 万饥寒交迫的幸存者。

法国共济会革命

现在，我将谈谈近代历史，为了欧洲历史的完整性，我在此谈谈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的方法，在雅各宾主义时期和“消除嫌疑犯”的法律时期，大革命代表了完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屠杀金发碧眼法国人的制度，而他们是法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了真实起见，这里应该提到：法国大革命及其恐怖统治是共济会（一个优秀的犹太人组织）的革命。共济会不仅承认其“光荣”的革命，还在世界各地的分会中称赞这场革命，甚至包括最无害的德国分会，将其视为胜利和人类解放的壮举。

俄罗斯革命

现在我要谈谈俄罗斯革命。我的任务不是重复那些经常被引用的数据，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指出方法。首先，社会贫困的俄罗斯人民的不满情绪被利用来作为革命宣传。一些想要废除农奴制的俄罗斯领导人，特别是斯托雷平部长，在实施改革造福俄罗斯之前就被犹太无政府主义者杀害了。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俄罗斯仓促地与德国开战。关于犹太共济会引发世界大战的活动，这里只字未提。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下一章随即上演。共济会称之为从“黄旗制度”到“红旗制度”的转变。用议会的话来说，这意味着权力正从民主资产阶级政党转移到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我们的例子中是社会民主党，而在那边则是孟什维克党。其领袖是犹太人克伦斯基，他的待遇是雅利安人善良品性的典型例证。他的犹太母亲——我在这里插入这个有教育意义的插曲——因参与无政府主义袭击而被判处死刑，并因即将成为这个克伦斯基的母亲而得到末代沙皇父亲的赦免。

正是这个克伦斯基，因雅利安人的善良本性而幸免于难，废黜了末代沙皇，为布尔什维克主义铺平了道路。但在俄罗斯，仍有太多的反抗力量。这些人再次被冷酷无情地逼上进攻之路；雅利安人统治的俄罗斯必须再次走向屠杀。

最终瓦解成为可能

再次使用共济会的术语，现在“红旗系统”与最终系统“黑旗系统”交替出现；用议会术语来说：权力从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转移到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的手中。一切障碍都不复存在。犹太人凭借国家的一切力量，对所有反对他们的优秀血统进行了极端屠杀，而其他人则因恐惧和恐怖而屈服。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可以引用《以斯帖记》中的一句话：许多波斯人因害怕犹太人而成为犹太人。在这种黑旗制度下，所有性格懦弱的非犹太人都会叛变投靠犹太人，成为刽子手、仆人、告密者和告发自己同胞的告密者。

从布尔什维克的战术中可以看出这种灭绝方法是如何全面发展的，他们系统地、反复地组织告密者起来反对自己的政权，以便反复找到那些，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抓住他们，

这样每一个抵抗组织的头目，每一个仍然能够思考或成为反对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领袖的受苦受难的雅利安人，都会倒下。

如果你看一下俄国革命，你会发现它与 1918 年的德国革命有无数相似之处。唯一的区别是，在这里，仁慈的上帝和命运为抵抗犹太人设置了屏障，并唤醒了反抗的力量，在 1919 年这个恰当的时机，让阿道夫·希特勒行动起来。

如果你纵观全局，就可以从这些例子中自己补充细节，这些例子只是简单提及。毫无疑问，你可以在国家历史中收集到无数布尔什维克主义犯下的大大小小暴力行为的例子。我认为你很难反驳我，我请求你不要以夸张的雅利安和德国人的客观性来看待细节，而是要看到整体情况，并从中推断出，在犹太人、非人类及其附属组织中，有一些聪明的人有能力进行破坏，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性，在客厅里，在部长和君主的密室中，在暗杀中，在混合毒药中，在蓄意发射的死亡射线中，在大饥荒中，在阴谋中，在诋毁个人思想中，在利用领导人物——他们本应是我们生死与共的朋友——在街头巷尾，以及官僚机构的阴谋诡计，农民的流离失所，对宗教的滥用和对神的渴望——都是老练的对手，他们比我们更清楚，在这些斗争中没有和平条约，只有胜利者或失败者，**而在这场斗争中失败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灭亡。**他们可能还会指出，这个对手已经在其血腥的毁灭旗帜上写下了许多无可争议的胜利，写下了被摧毁和消灭的国家的名字。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先说到这里吧，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人民 我们的民族是多么伟大，他们的思想水平是多么高，他们的法律是多么完美，从以下事实中我总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日耳曼法律。古老的日耳曼法律禁止任何个人、任何未经授权的人破坏上帝创造的、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神圣的自然界中的任何东西。

直到近代，日耳曼人定居区还禁止砍伐村庄范围内的橡树，除非得到其他村民的同意。如果允许砍伐，则必须种植三棵树苗作为补偿。这是神圣的命令。我们的祖先坚信，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受上帝的启发，属于这个法律概念。愚蠢、恶毒和愚蠢的人把这个变成了一个寓言，一个恐怖的故事，好像我们的祖先崇拜神和树。不，根据古代知识和古代教义，他们坚信整个地球、整个植物世界和整个动物世界都遵循着神圣的秩序。

动物的权利

只有雅利安人、日耳曼人才能将野兽纳入其法律体系，而在地球上其他无数国家，野兽是没有权利的。直到中世纪后期，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这种残余。即使动物造成的损害显而易见，例如鼠患，我们从传统中得知，市政委员会不能自行下令消灭这些老鼠，因为即使这些小动物在这种情况下对人类有害，它们也受到神圣秩序的保护，它们也是上帝创造的。于是它们被带上法庭，这位正派的德国人在法庭上为这些小啮齿动物提供了辩护律师，只有在法律程序结束后，当事实证明老鼠确实扰乱了这片土地的秩序与和谐时，才能决定对它们展开灭鼠行动。今天，我们可能会嘲笑这些古老、在我们看来幼稚的观点。如果新潮的我们能够对这种世界观、这种根深蒂固的上帝信仰以及这种基于上帝的秩序的深度和伟大表示敬意，那将是一件好事。

文化发现

我可以给你看其他图片。当我们挖掘德国的土壤时，在如今耕种的田地的表层土中，我们时不时会发现几手宽的珍贵铜、银和金器，它们精湛的工艺和古典的美感，是我们

这些精通技术的现代人难以企及的。对祖先的崇拜。或者当我们站在巨大的石墓前，想到在很久以前，一个与我们相隔甚远的人建造了墓地，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可怜巴巴地建造墓地，几代人之后，墓地被清理，骨头被放入盒子，然后墓穴被夷为平地，而是像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做的那样， 祖先们建造了千年不朽的纪念碑，我们今天仍然敬畏地伫立在其面前，有些人可能再次想到，**对祖先的崇敬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的源泉，因为每个尊敬祖先的人都会用正确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伟大和重要性。**

勇气和力量

或者，我还可以再次向大家展示一幅图画，这是罗马作家对历史上最早出现在罗马世界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描述，他们有多么伟大，他们的进攻多么不可阻挡， 凭借坚不可摧的力量，他们击溃并击败了一支又一支罗马军队，直到……是的，直到这些部落也因我们祖先的错误而成为牺牲品，被罗马纪律和军事秩序击败并消灭。

天文知识

我想给你看一幅宁静的画面。如果我们今天看地图，在地图上标记出发现的旧遗址，就会发现它们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是天文精确的， ，建立在对宇宙的不可思议且至今无人超越的知识之上，建立者一定是对创造了许多恒星以及我们的恒星的神圣存在怀有最深切的敬畏。

最古老的犁

我想再举一个和平的例子，犁是我们人民最古老的武器，五千年前就已经在耕作我们的土地了，如今历史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它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合理耕作顺序，为农作物带来有益的变化。我们在此提醒并希望表达一个事实，即不是我们从其他民族那里得到了犁，而是罗马人从我们的日耳曼祖先那里继承了改良的轮式犁。文字。最后，我想向您展示北欧古文字，它是所有文字的母体，可能是大多数民族的文字，是雅利安日耳曼人的最早祖先有意构思、创造和发明的。

我们仍然有一些来自远古的例子，即人们认为已被大自然覆盖的岩石铭文，而关于其他无数书面纪念碑，我们只能说法兰克人查理曼收集了它们，而他的儿子虔诚的路易斯受犹太人影响，几乎无一例外地与不理解的教会一起摧毁了它们。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悲惨历史。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只是寥寥数笔。但回顾我们民族的历史，过去两千年间，我们这个拥有一切天赋的民族所经历的，是最痛苦的历史。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这里，我也只想举几个例子，也许只是众多例子中的几个，然后尝试给出答案。赫尔曼·切鲁斯坎。众所周知，赫尔曼·切鲁斯坎是日耳曼民族摆脱罗马帝国统治的解放者。他的父亲将女儿（解放者的妻子）交给了罗马人，之后他被自己的族人杀害，他的死因是自己的血缘关系。

日耳曼秘书

我想提醒大家，罗马帝国统治和伟大的基础，从凯撒开始，他的亲密助手和秘书是日耳曼人，高卢人为罗马组织，直到民族迁徙、日耳曼人用自己的的创造力、日耳曼人的领导才能、日耳曼人的领袖能力和日耳曼人的作战能力，为腐败和种族注定的罗马国家服务，对抗他们自己的同胞。

维杜金绝望的斗争

我回想起维杜金绝望的斗争，他注定会失败，因为他的部落和人民中的贵族，有着相同血统的人，已经无法达成和解，从背后刺伤了他们的公爵。

阿勒曼尼之战

我想起人们经常提到的阿勒曼尼战役，那次战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那些自由自在的日耳曼部落成员无法容忍与他们同族出身的公爵坐在马背上俯瞰战场，他凭什么高人一等。

农民战争

最后，我想起了农民战争，在农民战争中，一场不顾死活的斗争遭遇了同样程度的混乱、分裂和纪律涣散，农民中那些最优秀的人们的纯粹意图和深思熟虑的愿景 在一场失败的战斗后，农民们怀着对德国国家的真诚渴望和明智的理想，与不可救药的愚蠢的条顿人的血腥尸体一起，最终只能悲叹现实，只能认识到轮到子孙后代去更好地战斗了。

我们的美德和我们的缺点

毫无疑问，我们最优秀的品质之一是我们对自由的热爱。

毫无疑问，传承给我们的最好的遗产是我们的血统，我们种族中的优秀者。但是，这两种品质在我们热爱自由的人民中发展起来，不仅激励和推动了文化发展和英勇斗争，同时也阻碍了全德国人的伟大国家形成，也是我们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不得不接受的所有失败的原因。当然，正是对高贵的血统和同样优秀的血统的过分重视，才导致贵族之间互不服从，公爵之间互不信任，彼此之间互不服从。有着相同血统的日耳曼人从未给予自己的领袖和政客（他们无疑经常存在）创建德意志国家的机会。最终，这些错误导致了一个又一个帝国的覆灭，无论是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阿勒曼尼人还是其他许多人的帝国。现在，由于德国地区的德国人没有建立一个充满德国精神的国度，统治和统一成一个由其他德国人主导的帝国，而是带有外国精神，因此必须以鲜血、眼泪和苦难来接受。每次我们都会看到同样的画面：逆反、不服从、低估对手，对根本不存在的条件、政治局势和事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这样一种对手：他们头脑清醒，对现实的政治斗争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步一步地前进，尽管他们素质不高、流血较少、文化水平较低，却一再战胜了我们。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错。因此，我们的人民——我们想以德国人的身份确定这一点——在过去 2000 年里，因为自己的过错，走了艰难的道路。不要责备任何胜利并索取我们鲜血的对手；因为上帝的普世法则、地球法则和民族法则不会计算那些满心善意的人，而是给胜利者加分。

现在有些人会提出一个问题，并带有责备的语气：为什么尽管我们拥有这么多优点，却要说出这些关于罪恶和错误的可怕言论？我们还能对未来抱有信心吗？我们想在这里自由而坦率地说，**没有什么比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种族在犯下种种错误和遭受种种苦难后仍然活到了今天，并在今天重新崛起，更坚定我们对未来和我们的血统的信心。**

我们相信我们血液中的命运和使命，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失败和不幸，也看到了我们为了生存而必须学习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向对教会的服从服务和骑士的命令。在本千年初，根据教会的命令，几乎所有德国名门望族的子弟都进入教会，成为教会的牧师和王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扛起十字架，沿着德意志血统的十字架之路，前往远东、沙漠和沙地。其中一些十字军骑士加入了各种骑士团，成为骑士牧师，他们带

来了德国人的勇敢、领导力和廉洁，在罗马教廷的秩序中，他们进入了服从和国家权威的学校，这个学校比教廷本身还要古老。

西西里岛的腓特烈二世国

因此，这个骑士团参与了第一个现代国家的建立，这个国家建立在国家管理和专制服从的原则之上，即腓特烈二世在西西里岛的国家。在十三世纪上半叶，骑士团被牧师兼骑士团成员赫尔曼·冯·萨尔扎移植到了德国东部。他凭借政治家的智慧，将骑士团取得的成就带到了那里。他们在东部地区建立了德国骑士团国家，这个国家大家都很熟悉。在德国地区首次推行服从制度并不难，因为除了基督教教的绝对统治外，通过斗争从德国最优秀血统中挑选出的最贵族家庭组成的骑士团，将自己推举为领导阶层，凌驾于那些在种族上与我们的人民价值不相等的民族和混血儿之上。

因此，除了教会的服从外，还出现了表现与个性之间的价值差距。普鲁士军队。东普鲁士的普鲁士军队也采用了同样的组织、管理、纪律和无条件服从的原则，而东普鲁士则由勃兰登堡选帝侯作为普鲁士国王接管。普鲁士军队及其雇佣兵成为德国内陆地区第一个绝对纪律的伟大学校。

这种纪律并非建立在人类灵魂最崇高的动机之上，而是在许多情况下真正建立在强者、国家、工资和生计以及对军士鞭子的恐惧之上。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一位英雄人物——普鲁士最伟大的国王老弗里茨亲自率领这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参加了三次重大战争。

确实，即使在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的最后一次战斗中，这位在军校中接受过严格服从训练的普鲁士军官也手持长矛站在火枪手身后。然而，这种服从已经因对领导者的爱、对新兴的普鲁士祖国的爱、因能够成为英雄的普鲁士军队的一员而变得高尚。在这种无条件的服从中，第一次响起了“让我们成为勇敢的国家之子”的旋律。

解放战争

接下来，人民军队在 1812 年至 1815 年的解放战争中遭遇了惨败，但一位市民和学生的儿子已经视能成为普鲁士人民军队的一名志愿者为一种荣誉。历史以更快的步伐向前发展。自由和荣誉的概念，以及服从，开始变得越来越为人所熟知。1864 年，1866 年。凭借这种精神的军队，普鲁士不仅征服并击败了热爱自由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和其他自远古以来就生活在祖传土地上的南部德意志人，而且和德国南部其他地区的人民，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有联系，但并不总是循规蹈矩。他们不仅征服并击败了普鲁士，还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并出于内心的信念将他们纳入德意志帝国的秩序和服从之中。世界大战。历史再一次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我们这个时代，回到了世界大战。荣誉、自由和服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0 万最优秀的德国人不仅报名参战，为自由而战，而且同样愿意加入最优秀的组织——德国军队。

在四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各种考验，命运再次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学完。命运向那些必须指挥的人展示了这一点，而有些人却忘记了，在最后一次最严峻的考验中，当国家权威的象征、信号和外在标志在泥泞和苦难中变得模糊不清时，人民只会把最后的服从给予拥有相同血统的领导者，而且只有当荣誉、自由和服从形成统一体；它向必须服从的人表明，任何不服从的行为，即使看起来是出于对荣誉或自由的伤害，也总是

对统治者本人的打击，是对忠诚的违背，是先辈们的原罪，将国家和每个不服从的人拖入深渊。

元首和民族社会主义

现在，对于被赶出家园的德国人民来说，我们通往服从之路的最后一所学校开始了。命运将元首送给了我们。他本人就是伟大德军中的一名服从命令的士兵，他内心深谙我们人民的自由、荣誉和鲜血的价值。

在 15 年的斗争和胜利中，他首先教育了少数人，然后是越来越多的最热爱自由的人，最富有战斗力的德国人，将他们培养成民族社会主义者。

今天，让我对这一概念进行如下定义：培养出自觉承担我们种族和血统价值的人，他们深知血液是文化和伟大成就的最必要前提。他还激发了人们追求自由和荣誉的意志，甚至让最狂热的人变得更有活力、更坚韧不拔。他利用了这些具有相同血统价值的力量，即对自由最不可抑制的渴望和对荣誉最敏锐的感知，通过血统、荣誉和自由意志产生的自愿且更具约束力的服从来激发这些力量。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够用这些眼光看待德国历史和我们民族自食其果的苦难，我相信，这将揭示出符合这个世界永恒、仁慈法则的意义，从而成为我们的民族在地球上各国框架内所肩负使命和任务的指针和义务，而并非终点。

民族社会主义党卫军(SS)

现在，让我来谈谈民族社会主义党卫军本身。民族社会主义党卫军是阿道夫·希特勒创建和发展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动者党的一部分，在运动框架内，它从元首那里获得了确保帝国内部安全的特殊任务。民族社会主义党卫军的组建。当元首于 1925 年下达成立党卫队的命令，并于 1929 年 1 月下令扩大该组织的规模时，我们便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按照元首的见解和指导方针以及所灌输的价值观，以最高标准组建党卫队，才能完成其使命。认可血统和选择的价值。对我们而言，第一项指导原则是认可血统和选择的价值。

1929 年如此，只要还有党卫队，就将继续如此。我们就像培育种子的人一样，为了培育出古老优良但已经混杂退化的品种，首先要在田地里进行所谓的多年生选择，我们首先筛选出那些我们认为无法用于建立民族社会主义党卫军的人。筛选过程重点关注那些最接近北欧人理想形象的人。

外部特征，如身高和种族外貌，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我无需向您保证，随着经验的积累，这一原则多年来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同样，我请求您相信，我们完全意识到，这种选择永远不会停滞不前。年复一年，我们的要求变得越来越严格，这与德国种族法的影响以及人们日益认识到血统对于德国种族进步的重要性有关。 我们的后代在一百年或更长时间内设定的条件，对个人的要求肯定比今天要高得多。我们也知道，基于外部标准的第一次选拔——如今辅以家谱表和多项检查——只能作为选拔的第一原则，而且只是非常首要的原则；在党卫军服役的整个过程中，必须继续进行选拔，筛选出那些在性格、意志、内心和血统方面不适合我们的人。

根据我们自己制定的法规，我们希望确保，并非每个在党卫军家庭登记簿上登记的党卫军家庭的孩子都有权甚至有权再次成为党卫军成员，而是希望 确保只有部分这些家庭的孩子被我们接受并认可为党卫军成员，我们将继续确保通过选拔和传承，让整个国

家最优秀的德国血统不断进入党卫军。这就是我们的选拔原则。自由意志和战斗精神。我们努力向党卫军灌输的第二个原则和美德是自由意志和战斗精神，并将其作为永恒的品质传承下去。

绩效评估

我们一直立志在每一场战斗和每个岗位上做到最好。为此，我们为每一位在表现和斗志方面超越我们的个人和协会感到高兴，因为每一个超越我们的人都是德国的财富，他们证明了我们自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坚定我们的斗志，磨练我们的意志。我们每个人一生都要经历最艰难的考验，通过年复一年的业绩考核，我们确保每个人，尤其是领导团队，都能一次又一次地经受勇气和战斗精神的考验。与此同时，通过每年对我们的业绩要求，我们将杜绝安逸自满，这种心态往往成为德国人加入我们行列的致命障碍。

此外，一个要求人们到老年仍保持身体和心理活力的社会将得以延续，从长远来看，它会拒绝那些可能带来舒适生活的东西，因为它们会削弱我们为德国而奋斗的力量，并使我们丧失斗志。

忠诚与荣誉

对于这支党卫军而言，其结构和性质所必需的第三条准则和美德是忠诚与荣誉的概念。这两者密不可分。它们体现在两句话中，一句是我们元首对我们的教诲："我的荣誉就是忠诚"，另一句是德国古老法律中的话："所有荣誉都来自忠诚"。我们教导党卫军成员，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事情可以原谅，但有一件事永远不能原谅，那就是不忠诚。任何背弃忠诚的人都将遭到社会的排斥。因为忠诚是发自内心的，而非理智的。理智可能会动摇。这有时会带来伤害，但总归可以弥补。

然而，内心必须始终遵循相同的节奏，一旦停止跳动，这个人就会死去，正如一个国家背弃忠诚时也会灭亡。

我们指的是各种忠诚：对领袖的忠诚，从而对日耳曼民族的忠诚，对日耳曼民族的意志和生活方式的忠诚；对血液、祖先和后代的忠诚；对家族的忠诚；对同志的忠诚；对正直、纯洁和骑士精神等永恒法则的忠诚。

一个人不仅会因袖手旁观而让民族社会主义党卫军的荣誉受到侵犯，而且会因不尊重他人的荣誉、嘲笑他人视为神圣的事物，或因未能勇敢、体面地维护缺席者、弱者和无自卫能力者的利益而犯下违背忠诚和荣誉的罪行。

服从

适用于我们的第四个原则和美德是服从；这种服从来自最高程度的自愿，来自对我们世界观的奉献，它准备做出一切牺牲，包括骄傲、外部荣誉以及我们个人珍视的一切；这种服从从不犹豫，无条件服从来自领导者的 或上级合法下达的命令；即使在政治斗争时期，当自由意志认为必须反抗时，这种服从也保持沉默；对对手保持最敏锐的感知和最警觉的注意，在禁止时不动一根手指，无条件服从并继续进攻，即使他内心深处认为无法克服。我们很诚实，不会声称每个人都完全理解了这些法则。但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声称，在过去六年中，党卫军已经按照这些原则组建和壮大，并按照这些原则行事。

我们每年都吸收越来越多的这些美德，它们对党卫军每个成员来说都变得越来越理所当然。我们坚信，多年后，当我们不再是这支党卫军的第一代成员时，迟早有一天，命运会让我们将这些美德作为最好的传统完整地传承给我们的后代。

婚姻法

根据这些准则和美德，我们为自己制定了法律，建立了社区生活，为遥远的未来铺平了道路。1931 年颁布的第一部法律规定了每个 SS 成员的结婚和订婚许可。

我们从对血统价值的认可中得出了结论。我们意识到，如果不考虑宗族，试图召集经过种族筛选的人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想重蹈覆辙，犯下过去士兵和男子协会所犯的错误，这些协会可能存在了数百年，但由于缺乏纪律的血统和宗族的传统，最终归于虚无。

我们从内心深处知道，一个群体只有怀着对最遥远、最灰暗的过去祖先的敬畏，坚信其人民永恒的起源，才能找到通往未来的道路。我们知道，只有当真正的血统被理解为一种义务，一种在纯粹的氏族、种族和民族中传承的神圣遗产时，一个种族和民族才能获得永生。我们坚信，只有夹在祖辈和子孙中间的一代人，才能正确衡量他们所肩负的任务和义务的艰巨性，以及自身短暂意义的渺小。

子孙的胜利

我们了解到，只有拥有这种信念的人，即使在成功时也能保持谦虚，避免傲慢和自大的错误，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以同样的钢铁般的冷静度过最艰难的时刻，就像他们以谦虚和斯巴达的方式度过好运时刻一样。因此，我们教导党卫军成员的内容超出了婚姻法的要求，也超出了为他们的种子选择合适女性的教育要求，即如果德国精神的胜利之后没有德国孩子的胜利，那么我们的所有奋斗、两次世界大战中 200 万人的死亡、过去 15 年的政治斗争、为保护我们的边界而建立武装部队的努力都将徒劳无功。我们为自己设定了任务，即在这个问题上以身作则，而不是空谈，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和榜样来影响我们自己的队伍。

我们将向今天和未来的男人们强调，我们国家最神圣、最宝贵的人是我们每一个血脉相连的母亲，她们深知自己职责的神圣性，而最宝贵的财富则是德国孩子。

党卫军荣誉法则

1935 年 11 月 9 日颁布的另一项法则规定，每个党卫军成员都有权利和义务用武器捍卫自己的荣誉。同时，该命令还规定，按照党卫军的规定，每位党卫军成员在成为候选人 18 个月后，向元首宣誓，并在 21 岁时光荣地完成劳动和兵役后，将获得党卫军匕首这一武器，从而被正式接纳为党卫军成员。我们每个人都是党卫军成员，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帝国领袖。我们为自己制定了这条荣誉法则，因为我们坚信，只有知道自己的言行终将受到惩罚的人，才能理解我们这个团体的终极意义，并重新学习如何作为无可指责的清白战士为人民服务。因为荣誉法则要求他维护自己的荣誉，就像要求他尊重他人一样，就像要求我们严格履行原则，善待我们的同志、同胞和人类一样。现在我想谈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在一本名为《党卫军士兵 50 问》的小册子中，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的誓言是什么?”答案是："我们宣誓效忠和忠诚于您——阿道夫・希特勒，德意志帝国的元首和总理。我们承诺对您和您指定的上级服从命令，直至死亡。愿上帝保佑我们!” 第二个问题是：

“那么你相信上帝吗?”答案是:“是的,我相信主上帝。”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答案是:“我认为他傲慢、自大、愚蠢,不适合我们。”我向大家分享这三个问题和答案,是为了明确表明我们对宗教的立场。请相信,如果没有对至高无上的上帝的信念和信仰,我们就不可能成为这支誓死效忠的队伍。

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和这片土地,并赐予我们领袖。我们坚信,根据这个世界的永恒法则,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念头负责,我们心中所想、口中所言和手中所行的一切都不会在行为发生后消失,而是会引发影响,在永恒不变的、无法逃避的祝福或诅咒的循环中,我们和我们的民族终将自食其果。你认为有这种信念的人除了无神论者还能是什么?然而,我们反对这种说法,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团体,不承诺任何信仰,不遵守任何教条,甚至不要求我们的任何人被谴责为无神论者,滥用异教徒一词。

然而,我们保留权利和自由,在教会和忏悔活动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军国主义之间划清界限,我们将竭尽全力捍卫这条界限,尽管我们的人民过去在这方面有过正当的热情和不幸的经历,但我们将教育我们的男人,出于他们的教育和信念,尊重任何国家成员神圣的一切,言语和行为上没有任何冒犯。血与土。

作为帝国党卫军领袖,我本人也是农民出身,有着血缘和天性,在此,我想向你们德国农民发表第二项声明“血统“的概念从一开始就体现在党卫军中,如果没有与对土地价值和神圣性的坚定信念密不可分,它注定会遭到谴责。从一开始,种族和定居总署就定义了”血统和土地"一词,虽然换了一种说法,但意思却是一致的。

我可以向你保证,德国农民的帝国领袖多年来一直是党卫军成员,并且作为高级小组组长担任这个种族和定居点主要办公室的负责人,这绝非偶然。正如我是一名农民和帝国农民委员会的成员并非偶然一样。农民和党卫军成员不会说太多客气友好的话。但正如迄今为止的情况一样,我们在此明确声明,未来也将如此。无论阿道夫・希特勒的农民在哪里,他们身边永远有党卫军作为最忠诚的朋友,正如我们知道,无论阿道夫・希特勒的党卫军在哪里,德国农民就在他身边,作为他最好的同志和朋友。今天如此,未来亦如此。

安全局和国家秘密警察

我知道在德国有些人看到这身黑色制服会感到恶心;我们理解这一点,也不指望得到太多人的喜爱。

关心德国的人会尊重我们,而那些对元首和国家心怀愧疚的人则应该害怕我们。我们为这些人建立了一个名为安全局的组织,我们,党卫军,也为秘密国家警察提供人员。我们将不断履行我们的任务,保障德国境内的安全,就像德国武装部队保障德意志帝国的荣誉和伟大及其海外和平一样。我们要确保,在欧洲心脏的德国,再也不会有次等人种的犹太-布尔什维克革命从内部或外部使者那里点燃。我们将无情地审判所有此类势力,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在和活动,无论今天、几十年还是几百年后,只要他们有丝毫企图,我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

布尔什维主义不是过眼云烟

现在,我回到开头,想再次强调,我们不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过眼云烟,可以轻易地被我们辩论出世界,或者按照我们的意愿被我们遗忘。

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由全球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废物组成的，他们把犹太人的烙印强加在所有民族和国家身上，他们的愿望是统治世界，他们的欲望是毁灭，他们的意志是灭绝，他们的宗教是无神论，他们的理念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既不会低估他，因为我们认识他已有数千年之久，也不会高估他，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和力量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而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力和工作则让这一使命得以复兴。

党卫军

在这个新生的国家，我们党卫军是奉元首之命建立和发展的。如果今天我试图向你们描述党卫军的组织、结构和任务，那么仍然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除非他用自己的血和心脏来理解我们。

我们人数如此之少，而德国全国却有两百万军队，我们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无法解释。我们每个人都穿着黑色制服，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他是否坐在赛马场上，在运动场上竞技，他是一名公务员，或者是一名建筑工人，或者是一名政府高官，或者是一名士兵，或者是一名前线的士兵，也许默默无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而是有二十万人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与他同在，这力量给了他不可估量的力量，正如他知道，作为这支黑色军团的代表，他必须尽其所能，以最好的状态履行自己的职责，以此回报这个集体。

因此，我们挺身而出，按照永恒不变的法则前进，我们是一个由北欧人组成的民族社会主义组织，宣誓成为他们氏族的共同体，迈向遥远的未来。我们希望并相信，我们不仅会成为战斗得更好的子孙，也会成为后代子孙的先辈，这是日耳曼民族永葆生命所必需的。

我的政治覺醒 安东 德雷斯克勒

亲爱的同事们：是一位工友在和你说话——他仍然站在车床前。他要对你们说的话可能显得相当奇怪和令人惊讶，因为它听起来与你们习以为常所听的不同。我和你们一样是社会主义者，呼吁体力劳动者获得与其他创造性群体的平等，消灭惰工和寄生虫，并消灭不劳而获的利益。我仍然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公正的社会主义形式，希望劳动群众得到拯救，希望创造性的人从剥削性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但我相信，我们没有走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道路上。我们的许多领导人确实是诚实可爱的人，他们希望为工人争取充分的利益。但也有一些人是为外国势力服务的。他们利用工人运动为特殊利益大开绿灯。他们利用工人组织去给非生产性的证券交易和贷款资本主义当保镖。经过调查，我确信：有一个阴谋，虽然大谈特谈人性和宽容，但实际上只是想把人民绑在一个新的枷锁上；一些工人领袖，实际上是大资本家，属于这个集团；300 名大银行家、金融家和报业大亨，他们在世界各地相互联系，是真正的独裁者；他们几乎完全属于"被选中的人"；他们都是这个组织世界政治的秘密阴谋的成员，即共济会的国际分会；他们的目的是金钱对劳动的统治这些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独裁者没有公开做任何事情，因为他们在工人运动中有自己的代理人，而且他们付给他们高额报酬。他们把人民的怨恨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小业主、工厂主和农民身上，他们的所有钱都难以支付大银行家的利息。仅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资本就比德国所有重工业的总和还要多。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我们运动的假朋友看个透彻？犹太大资本家总是装我们的朋友和狗腿子；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把我们变成他的奴隶。听信于他们的工人要帮助他建立犹太人的世界独裁政权。因为那是他们的目标，正如《圣经》中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人都要为你服务，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属于你。在《塔木德》中，讲述一个时代即将到来：**每个犹太人将有 2800 个奴隶。同志们，你们想做犹太人的奴隶吗？结束虚假的自豪感!我们的工人常常这么说：我们的双手创造了所有的人类文化。但这是真的吗？教师、发明家、艺术家、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呢？难道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农民没有生产力？难道他们不也像我们一样在大资本的独裁统治下受苦吗？向他们挺出我们的手，同敌仇恺，这不是更有意义吗？这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特殊伎俩，他们能够把工人和资产阶级玩弄于股掌之间，从而使他们无法凝聚力量。甩掉你们的犹太领袖，以及那些受雇于犹太的人！还有最后一点：不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抱有任何期望。它并没有给工人带来自由。在俄国，八小时工作制已经被废除了。再也没有工人委员会了。所有的人都畏缩在一百个政府委员的独裁统治之下，而这些委员有十分之九是犹太人。布尔什维主义是犹太人的骗局！**

首先，我必须说明，我在此提出的观点纯属政治和工会性质，我并非以战友的身份向公众展示这份文件；相反，我忙于在国内的战场作战。许多同事对我说：“可惜我生错了地方，如果我在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圈子中，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有时我突然觉得这些人说得对，好像我真的必须将社会主义思想完全融入社会民主主义。我只有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才坚持忠于我的民族社会主义，对此我现在感谢命运。在工人海洋中，描绘我孤身一人在孤岛上的狂风暴雨，向工人阶级和每个生产工人传达我在政治事务中积累的经验——这就是本文的目的。我没有任何借口向我的同事们解释，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但我希望他们理解，我的政治观点在工人中是如此孤立，只是出于对德国工人生存状况的担忧。

无论是狭隘、野心还是对金钱的理想主义，都没有使我走上政治立场。作为一个“中立”的人，我置身于政党阵营之外——也就是说，我本人没有接受过政党教义——我研究了国内的政治生活和活动，同时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外交政策问题上。

他们让自己被敌国工人领袖和和平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所包围——德国工人领袖和其他政党人士在评估敌国战争目标时这种短视导致了德国和德国工人阶级今天所处的境地。

作为唯一一位没有被英美意图欺骗的慕尼黑工人，我公开倡导实现“公正和平”，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向公众讲述我 自从我“政治觉醒”以来，我更加有权利和义务向公众讲述我的经历和感受，因为我逐渐了解到，正是“秘密力量”让我们的政府和许多政党领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地——直接为破坏者的利益服务。

对政治的兴趣

为了向读者阐明我的政治思想和感受的发展，我必须稍微回顾一下。希望我不会让他感到厌烦。

在战争之前（直到 1910 年），除了思想工作者通常的关心程度之外，我对政治并不关心。因为我在 18 岁时在柏林因工会分子的恐吓而失业，几乎跌入大城市不体面的地摊献艺，我对所有组织都有一定的反感；因为那种“如果你不想成为我的兄弟，那么……”

的态度让我对同事关系这个概念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在这种情况下，我直到 25 岁生日前才读过几份工会报纸，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是的，在阅读日报时，我只对楼梯和电车事故、死亡和婚礼公告感兴趣。简而言之：我和大多数德国工人一样。我对政治世界事务不感兴趣，因此理所当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从 25 岁起，我进入了不同的社交环境，也结识了外国人。在这些圈子里，人们经常讨论不同国家的军事实力。有一位友善而威严的法国人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早在 1911 年，他就开始报导自己同胞的火炮装备，并总是说：法国正在为与德国的战争做准备。由于我和我的朋友一样都是德国人，我对国家边界以外的事情越来越感兴趣。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一般只对报纸的头版和每日新闻的最新报导感兴趣，现在我逐渐意识到什么是沙文主义，并认识到法国人并非只是在“放烟雾弹”[“aufgeschnitten”]。

最终，对英国的不断恭维和“奴颜婢膝”引起了我的怀疑，我日益看到德国的政治前景越来越暗淡。1911 年，贝特曼-霍尔韦格提议与英国签订中立条约，这让我确信德国并不感到安全。 与此同时，我对世界总体政治局势有了自己的看法，以至于英国拒绝这一提议时我甚至没有感到惊讶。1912 年，德国为回应英国的拒绝而实行兵役制，我意识到我们的处境。群众也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某种气息。在“人民”经常光顾的场所，人们已经可以听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战争一定会爆发，否则双方都会被对方吞噬。” 尤其是工人说了这些话。今天，我对这些言论的看法将在后面讨论。

世界共济会、工人和犹太人

[在一场公共会议上，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 晚上，一位名叫 Jaffee 的教授（瑞士著名的和平谈判领导人）也上台发言。他后来成为财政部长和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他建议选举奥尔而不是艾斯纳，并说了许多深思熟虑或无心的废话：“德国人民必须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我们要保留霍亨索伦王朝，就要选择战争；如果我们要要求威廉二世和皇太子退位，就要选择和平。”他对威尔逊充满了信心，威尔逊将为德国人民带来公正的和平。Jaffee 先生是以德国人的身份还是以国际主义者的身份发言？他是否追求德国的利益，还是追求“犹太理想”（追求资本主义世界共和国）？如今看来，这些主张都是骗局。今天，我坚信他也属于那些有意无意地成为德国掘墓人的人。

1918 年 11 月 3 日，艾斯纳在拥挤的 Löwenbräukeller 发表了演讲，正如他本人所说：“这不是一场选举演讲，因为我认为选举还没有到来”，而是一场政治“启蒙（？）演讲”。他（艾斯纳）说，他当然知道，当德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时，就会获得权利与正义。威尔逊和协约国只是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和德国的专制，而不是反对德国人民。如果协约国想要对我们强加一种强制性的和平（Gewaltfrieden），他（艾斯纳）将是最后一个容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他也会拿起步枪，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在贫困和痛苦中消亡。如果真是这样，是的，那么他（艾斯纳）也会支持国防。

意识到这种言论的危险性，一个人从他那深受感动的德国人胸膛里发出了对祖国和人民的关切的呐喊。他的呐喊很简单：“等着瞧吧。” 拥挤的大厅里许多人从椅子上跳起来，开始寻找这个放肆的家伙，也许想对他施以私刑。 艾斯纳很清楚这种“等待”对他的事业意味着什么，他向那个捣乱者大声喊道，那种活泼是他那天晚上从未表现过的：“现在没有什么可等待的，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在“时机成熟时，我将号召

人民”的宣言下，艾斯纳“行动”了，并在四天后创造了历史。他解放了无产阶级，使他们摆脱了“君主制的枷锁”，击溃了前线部队和后方基地的支柱，将整个德国人民推向了国际资本主义的灭绝和奴役。

艾斯纳自称是人民的挚友（Volksfreund），是无产阶级睿智而富有远见的领袖，他怎么会如此失算？他追求乌托邦式的理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希望），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中资本主义世界共和国的下怀，为了短暂的自治而毁掉一个拥有 7000 万人口的国家。难道他和他的犹太同志不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吗？难道他们也是为了将拜物教王子和金钱大亨变成世界唯一的统治者而拥护泛犹太[alljüdisch]共济会的“废除一切世俗和精神王位”的理想吗？艾斯纳是否也欠国际共济会在世界舞台上的恩情？但问题已经够多了，答案是肯定的。无论艾斯纳和所有那些所谓的工人领袖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滥用“社会主义思想”，出于纯粹的“理想主义”还是出于贪婪和个人野心，推动建立纯粹物质主义的世界秩序，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那就是“工人和所有生产者”很快就会受到国际资本主义最无情的剥削。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神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巴达克斯式的奴隶解放运动正在受到国际资本的组织和资助。

无论工人是陷入多数党、社会民主党还是德国共产党（KPD）的网中，他总是被一个全球政治中央办公室所领导，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或者换句话说，是国际性的、金钱的资本主义。”

基于这些联系，研究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很有意思。它意味着社会最底层“消灭中产阶级”——用“资产阶级”一词来表示。但“无产阶级专政”逐渐演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主义无情地屠杀俄罗斯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而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大资本家却逃之夭夭。1919 年 4 月底，俄罗斯工人和士兵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决议，列宁在决议中要求：“工厂中的资产阶级官员应获得高薪。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纪律约束，引入计件工资和泰勒制。工资应根据工厂业绩进行调整。”

早在 1919 年 3 月，列宁就呼吁“知识分子”和大型企业回归并协助建设“社会主义”俄罗斯，而托洛茨基及其同伙既不是、也从来不是无产阶级。有真正的工人站在委员会独裁统治的首位吗？犹太人（他们很少是体力劳动者）不是一直在各苏维埃共和国担任领导职务吗？那些鼓动非犹太无产阶级（德国没有犹太无产阶级）参与可怕的流血冲突的人（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者、基督徒对基督徒、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难道不是犹太人吗？他们为什么不呼吁自己的宗教和种族同胞捍卫受到威胁的自由？那些声称“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事业的大嘴巴们去哪儿了？他们躲进了橱柜和其他藏身之处，却没有躲进无产阶级的茅屋；他们没有躲进所有地方，而是躲进了那些肮脏的富人的豪宅里，而诚实工人却因这些人为他灌输的幻想而流血致死。

可怜的受骗工人，你还不明白吗？你所谓的最伟大的朋友其实是你的死敌。国际资本家及其追随者对血海是否会变成汪洋大海、尸山是否会变成尸山群毫不关心。正是他们让阶级斗争、文化斗争和社会主义斗争永无休止，以阻碍所有生产者（创造者）的联合，而只有生产者才能从国际资本主义手中夺取全球统治权。工人应该最终意识到，革命不是从下到上，而是从上到下；革命不是为了解放他，而是为了奴役他；革

命带来的所有世界事件都只是为在劳动之上建立“黄金独裁”而已。300 个大银行家人希望统治所有从事生产的人类。

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通过工人消灭中产阶级。这是“黄金国际”的目标，它与犹太人关系密切。

如果你还不明白这一点，工人，如果你仍然被你的政党言论所迷惑，那么你就再无救赎。你现在必须振作起来，完成解放行动；如果你同意，你就是强大的。你们必须找到通向资产阶级的桥梁，因为工人和士兵、市民和农民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犹太人及其追随者。有一种号召力将你们团结在一起，那就是：“以世界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基督的精神，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才能赋予你们力量，在与物质主义-塔木德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认识到：“只要有人为了个人野心和追求巨额财富而追求政治（即物质主义政治），那么意识形态者和理想主义者、无赖，流氓和罪犯就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超级物质主义者所滥用。” 关于这一点，可以引用我们勇敢的慕尼黑诗人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写的一首关于现代议员的诗：

这一切多么可悲，谎话的迷雾使人发愁！
它向一个人点头，向另一个人挥手
每个人都想：“你这个无赖!”
每个人都想：“你这个游手的滑头!”
“别人也这么想。”
一个接一个地与他们打交道，所罗门握住他们的手
让他们激动泪流
——亲爱的祖国，愿你安好。

没有什么比这首讽刺诗更有道理，没有什么比这首诗所表达的反犹太主义更切合时宜，每一天、每一刻，这些情感都在我们的实际经历中得到强化。只要非犹太人知道“犹太信仰的德国公民”中央协会在 1911 年 2 月底的大会上通过的一项决定，他们就有道德义务成为犹太人的反对者（Judengegner）：“我们的代表应在政党内部组织起来，争取对政党施加影响，只提名那些完全保证在议会活动中反对反犹太主义的人选。”我们理解“反犹太人”是指所有那些认识到犹太人对我们民族生活（Volksleben）的腐蚀性影响的人，所有那些与之抗争的人，以及所有那些抵制犹太人经济扼杀的人！根据犹太人对“反犹太人”一词的定义，还有什么比“反犹太人”更明智、更崇高的吗？还有社会主义工人对其犹太领导人的忠诚！他相信这些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按照道德法则和宗教信条（尽管他们通常假装自己是自由思想家）生活，其中写道：

“所有外邦人都将被毁灭!”

“上帝赋予犹太人统治所有民族的财产和鲜血的权利。”

——塞弗·Jp. 92 1. 25. 贾尔克·施姆等

他们可能还是社会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他们认识到《塔木德》及其信徒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死敌。

德国工人，您如何看待犹太人蒙特菲奥雷（他与克雷米厄共同创立了以色列犹太人联盟）1849 年在克拉科夫国际犹太人高级理事会“犹太公会”上的发言？ “您胡说八

道些什么！只要我们没有掌握媒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我们必须对全世界的报纸施加影响，才能欺骗和安抚群众（die Völker）。”

工人现在是否明白为什么犹太人通过创办社会主义报纸把自己包装成劳动的恩人？当然，对于普通工人来说，犹太人滥用和玷污社会主义，通过媒体愚弄工人，而如今90%的媒体都是由犹太人资助的，这种想法仍然难以理解。如果允许一位杰出的现代学者通过他的文章《金钱势力的统一战线》来阐述，也许工人会更容易理解。E. Jung 教授写道：“这种超国家金钱力量与工人阶级诱惑者的反常联盟，或许在柏林日报、法兰克福日报，前进报目前为阻止德国取得全面胜利而进行的合作中得到了最惊人的体现；根据社会民主党的证词，德国**工人代表**与西方**财阀势力**的联盟代表了世界上最残酷的资本主义。”

因此，无论你在哪里，贫穷、被追捕的工人——背叛、背叛自己、背叛祖国和整个德国民族。革命是因你们而起的，不是为了给你们自由，而是为了给金钱提供唯一的力量。

你们发动的革命成为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工资运动，这场运动没有给你们带来任何好处，却为那些一直在剥削你们的人装满了腰包，摧毁了德国的竞争力，使数百万德国工人沦为移民。这样，你们就成为了西方大财团（westliche Großkapital）的肥料。

国际

读者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即使是最诚实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也毫无力量。事实上，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没有领导权。实际上是，没有改革，没有重建，也没有[社会民主党]党代表大会所承诺的“根除和重建”。在这一点上，一切必须彻底拆除，必须为新的基础奠定新的基础。犹太教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泥泞之上的；我们必须把它重新建立在坚如磐石的高处，让那些虚伪的牧师和法利赛人望尘莫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永远不会走上这条只有通过汗水才能穿越的陡峭而崎岖的道路，因为他们厌恶任何自我牺牲，也没有“登高望远”的头脑。只有下定决心摆脱目前的领导层，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将把“所有生产者”带到国际，为充满仇恨和折磨的人类带来救赎。为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不能成为现实？只是因为它毕竟从未被真诚地打算过，因为无产阶级只是用犹太人的金钱和犹太人的媒体控制整个世界的手段。如果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是真诚培育起来的，**那么那些在民族和国家艰难时期不畏强暴的工人领袖们，那些多年来一直宣扬国际主义理念的人，那些自 11 月 9 日起除了“世界革命正在前进”之外别无他言的人，他们现在应该鼓励那些被培养成国际主义者的工人（不设防）在莱茵河上架设阵地，并向另一侧的同志喊话：“好吧，兄弟们，完成你们的背叛，冲破这道工人做的墙，然后我们就会知道国际主义已经永远失去了。”**

他们没有为此做出丝毫努力，这是因为法国工人阶级内部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对德国同志的“同情”，这一点我们从外国非资本主义的报纸上可以得知。不仅法国人，还有爱尔兰人、埃及人和印度人都要求获得“自决权”；他们只等待德国人民的坚定立场。国际上的所有领导人要永远消除“德国危险”，**只需用“国际主义”麻醉德国工人阶级。他们向工人阶级灌输的有意识的虚假理论和希望，实际上从未想过要实现，却将 6500 万人推向了深渊。**其他所有民族已经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饱受世界资本主义之苦；只有德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达成了共识，资本主义世界共和国才面临德国革命带

来的最大毁灭风险。由于他们出色的组织能力，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塑造德国；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资本主义国际主义尚未完全巩固世界历史上最无耻的强加和平。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背叛。一旦他们完全了解了一切，他们就会与所有日耳曼人联合起来，用一种刺耳的语言来谴责“以色列人民”（以及他们的傀儡）。“离开德国，离开所有党派，离开所有国家！回到你们的祖国巴勒斯坦去。”或者，“世界主义暴君，你会被粉碎的。”

我的想法并非来自报纸或小册子，而是来自我自己的经历和对学术著作的深入研究。但为了避免任何误解（因为我非常了解工人的灵魂），我不打算寻求或担任任何职位，因为我无法将商业和政治混为一谈。如果这份文件中的警告得到重视和信任，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我就心满意足了。**人类，请睁开你们的眼睛，对你们所目睹的一切采取行动，否则，这种情况将永远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将永远只是超级资本家及其同伙和寄生虫的“廉价商品”。**

在第二届大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者国家间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阿道夫 希特勒

注意：这份原始稿件有很多问题，比如模糊不清。

亲爱的同胞们！[Liebe Volksgenossen und Volksgenossinnen!]

直到今天，在这么多年之后，始于 1904 年的德奥运动才在德意志站稳脚跟，这让我感到羞愧。只可惜，只有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巨大不幸才能向我们的民族表明 他们必须首先放弃个人利益，必须结束只区分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冲突，最终有一天必须区分诚实劳动的民族同志与寄生虫和恶棍。（掌声）。崩溃必须首先发生，它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七、八、九个犹太人为我们发动了一场革命，而是因为我们内心真正地道德惰性，因为我们忘记并抛弃了无数原则，而一个民族若想实现自决，就必须承认这些原则。**我们一方面沉浸在阶级傲慢中，另一方面又沉浸在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自负中，我们忘记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没有区别，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共同[难以辨认]国家，否则国家就会走向毁灭。**

我们还忘记了，这样的国家必须具备道德基础，在这种状态下，当成千上万的同胞被强行榨干鲜血而死亡时，其他人只是向国家提供有利息的金钱，除了与[难以辨认]交易外无所作为，这是疯狂的。我们忘记了，这原本是一项社会和道德义务——在成千上万的人为最高利益做出牺牲的时候；在家庭忍受着艰难、悲伤和贫困的时候；在不择手段、卑鄙无耻之徒在这个 [听不清]民族中，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非民族性的民族最终会宣判自己的死刑——我们要牢记，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要么成为民族，要么在国际主义的漩涡中灭亡。（掌声）。我们忘记了另一个真理，那就是一个民族只能由其同胞领导。我们抛弃了[字迹模糊]的基本法则和基本真理，即只有[字迹模糊]的人才能成为国家的公民，将外国种族纳入[字迹模糊]公民权并最终将整个[字迹模糊]委托给他们，并将领导权交给他们，这是疯狂的。结果，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崩溃了。崩溃之后，人们开始失望。协约国的压力日益沉重，德国人民越来越坚信，通过小措施和小改革来缓解困境已经不再有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制度已经过时，我们的政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我们不应该互相指责，因为同样的

想法和同样的困难导致帝国各地都出现了同样的运动。我们自然彼此独立。因此，杜塞尔多夫的人甚至不知道我们那里也是一样，慕尼黑的人不知道基尔也是一样；我们找到的这条解决问题的道路证明，我们的纲领虽然彼此独立产生，但最终却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然而，在我们成立之初，我们强调的是[难以辨认]的词语。最初，我们强调的是一个词。我们认识到，如果迄今为止，我们的人民还能从最自然的事情中抽离出来，那就是民族感情，如果迄今为止，个别团体还能让数百万人说我们是国际性的，从而表达出不自然的东西，那么也一定有可能告诉他们，他们是有民族性的，而且必须如此。

遗憾的是，对于[难以辨认]，“德国”这个词如今背负着许多罪恶。我想到的是那些也带有“德国”一词的党派，包括前党派、德意志自由党、德国人民党等， 我们知道滥用“德国”一词会带来什么后果。如果有人有勇气宣称自己是国际性的，那么我们也有勇气宣称自己是民族性的。这是它的对立面。然后，我们希望与第二个词联系起来，即“劳动者”一词。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 200 年前腓特烈大帝已经能够说：“我只想成为国家的第一官员和仆人，第一个劳动者”，那么今天，我们更有理由和需要要求，任何民族同志都不应该为这个词感到羞耻，相反，他应该为自己被允许称自己为劳动者而感到自豪。这应该是我们与那些无业游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无论是在化学实验室，无论是在技术设计局，无论是在办公室担任官员，还是在机器旁当劳动者，对我们来说，“劳动者”这个词实际上就是试金石，因为它能告诉我们谁已经准备好加入我们的运动，谁还没有。对这一称呼感到羞耻的人还没有准备好加入我们的运动，因为他仍然生活在过去的时代。对我们来说，只有那些配得上这个称呼的人才是有效的，才有资格将其作为荣誉头衔。

我们的目标尤其在于让那些至今仍被称为劳动者的人接受我们的理念。任何没有百万群众支持的群众运动都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这是前提条件，民族思想不再局限于少数人，而是逐渐深入人心，渗透到工厂和车间里日复一日工作的千千万万劳动者心中。他们现在知道他们拥有一个祖国，知道有必要为祖国而奋斗，知道有必要成为民族主义者。民族思想只有成为整个民族的共同财产，才能发挥效力。现在，我们不得不加入另一个我们原本不想采用的词，那就是“政党”。这个词听起来很脏。

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把它包括进来。仅仅从理论上理解威胁是不够的，不足以消除威胁。从理论上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足以防止我们被布尔什维克化；从理论上理解犹太人的危险性不足以使犹太人变得无害。理论只能作为基础。只有当它所认为正确的事情、它必须做的事情通过武力得以实施时，理论才具有价值。(掌声)。这种实施不必以集体迫害的形式进行，因为我们的党纲已经为这种理论上的实施和实践的实现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指导方针，其中也包括犹太人问题。我们想要确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最终认为整个民族生存的最终目标，就是为自由和团结而斗争，为整个民族的融合而斗争。今天早上有人提到，我们被召集到萨尔茨堡是为了欣赏这颗节日的明珠，对此我并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感到悲伤，因为上帝的广阔世界中竟然有一个民族无法拥有这样一颗明珠。作为一个单一民族（einziges Volk）并非理所当然；意大利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对法国人来说再自然不过，对英国人来说更是原则，因为英国人拥有整个地球三分之一的土地，但对我们来说，这些都不存在—

一[字迹模糊]我们国家[字迹模糊]四分五裂，必须忍受最深的无力感，部分国土还处在外国统治之下。对我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德国政党的首要目标，正如荣格指出的那样，它不顾一切地准备为这一立场进行无情的辩护。我们要求建立一个大德意志，统一所有德意志族群。我们不是出于慈善而提出这一要求，而是因为这是不可剥夺的权利。（掌声）只有满足这一要求，我们才能提出第二个要求。

我们今天讨论的社会改革、改善我们的[难以辨认]，是不现实的。让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是协约国的奴隶。德意志帝国的宪法不是魏玛宪法，而是《凡尔赛和平条约》；德奥帝国的宪法不是维也纳宪法，而是《圣日耳曼条约》。只要我们的民族只是外国的[难以辨认的]奴隶，就不可能为我们的民族做任何事情。这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我们要求并必须继续要求我们的民族获得自由，打破枷锁，德国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包括所有希望加入德国的人。（掌声）。

这些要求中的第一条及其实现将为所有进一步的改革铺平道路；尽管也许有一些纯粹程序性的东西使我们与众不同，但这可能不符合这个问题的精神。我们在犹太问题上的立场。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是可以蒙着眼睛绕过去的问题，也不是通过一点让步就能解决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首先决定着我们的民族是否能够恢复健康，犹太精神是否真的会消失。不要以为不杀死病原体、不消灭细菌就能战胜疾病，也不要以为不确保人民摆脱种族肺结核的病原体就能战胜种族肺结核。只要犹太人这个病原体不从我们中间消失，犹太人的活动就不会消亡，人民遭受的毒害就不会结束。（掌声）

不要以为这个要求很过分，因为此时此刻，在德国，我们目睹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移民，人们可以看到并清醒地承认，犹太媒体日复一日地鼓吹这种做法，并向工人宣称没有祖国，只要能赚到钱，哪里都是家，哪里就是祖国。与此同时，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那些德国不是其祖国的人。当我们说，你们怎么能如此残忍地驱逐那些在德意志与我们共同生活了这么久的人？我们被拒绝了。事实是，我们的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道德水平在下降，还有一部分人被迫移民。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们就有神圣的道德权利要求这个帝国只为我们的人民而存在，而不是为其他人而存在。只要整个世界有能力剥夺 1000 万到 1100 万德国人的自决权，有能力压制和遏制 6000 万德国人，那么我们就要鼓起勇气，要求从那些我们深信最终导致我们不幸的人手中解放出来。（掌声）。

因此，我们的基本要求包括：只有拥有日耳曼-雅利安血统的同胞才能成为国家公民。其他人不能担任国家公职。只要公民的生活机会不足，非公民就没有资格在国家内生活。一旦他违反规定，就会被驱逐出境；只要这种情况不消失，我们的民族就无法复兴，因为坏榜样会破坏最好的道德标准。我们的民族被纯粹地卷入战争；各师出发时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数十万人贡献出自己最后的财富，没有人期望得到回报；每个人都准备牺牲一切；数百万人自愿服役并献出生命。而在国内，种族污染开始侵蚀我们整个民族，我们因此遭受痛苦，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我们将无法恢复。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解决取消不劳而获收入的问题。其前提条件是：为每个人提供老年福利，将所有银行国有化，将整个金融体系国有化。国家疯狂地成为金融集团的乞讨债务人——这种疯狂必须停止。国家还必须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权。另一个后果是，

我们将把工人个人与其他工人完全等同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利润分成、特许权使用费和奖金，那么这一原则就必须坚决地适用于所有勤奋工作的人；每个工人必须分享这种努力的成果。

我们可以在此确认整个计划。土地改革和德国法律的建立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像埃尔茨贝格审判这样的情况，即原告被驳回，却不得不支付诉讼费，绝不能再发生。这种对人民健康情感的打击必须停止。我们不需要《萨克森镜法》或《施瓦本镜法》[地方习惯法法典]，而是需要一部基于日耳曼而非犹太情感、适应经济和现代要求的法律。

作为附加要求，我们并不希望立即对全民教育体系进行重大调整，而是希望让每个有能力的人至少能够参与现有教育体系，让每个聪明的孩子至少能够参与现有的教育体系，无论其父母的身份如何——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太穷，则由政府出资教育。只有这样，我们才要求根据实际历史（主要是德国历史）逐步修订教学大纲。（掌声）然后，我们可以肯定地期待，此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将与下层阶级成员相互融合，在国家领导层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求废除雇佣军。我在此不对我们的德国国防军说一句侮辱的话。但德意志帝国无法承担这种防御，数十万、数百万民众认为这不公平，我们所有人多年来只为几芬尼服役，冒着生命危险，任由自己被射杀、致残、挨饿，而我们的年轻人不应该为了祖国的利益做出一点牺牲，哪怕只是服役几个月。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并不是为了折磨他们，而是因为我们也希望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掌声）

最后，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具体的基本要求，那就是反对新闻界的斗争。对我们来说，这场斗争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确保不再用非德国人的钱来推广和维护德语报纸。我们指的是非德国人的钱，包括所有犹太人的钱。这样，日复一日充斥我们民族的谎言和欺骗浪潮就会消失；这样，我们民族最终将从媒体中解放出来，媒体自称是人民的教育者，但实际上却在误导和愚弄人民。媒体必须摆脱其在艺术、绘画、戏剧和电影中允许的滥用行为。这里必须建立一种原则性的正派风气。最后一点要求是，我们要摒弃一切物质主义精神，将“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基本原则置于我们所有思想和行动的首位。我想强调一点。我们反对一切教派斗争。我们认识到，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在德国的人来说，可以放心的是，每个教派都有成千上万的德国教徒，他们发自内心地同情和理解人民目前的不幸，愿意做出任何牺牲，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教派。我们必须明白，我们需要寻求团结，抛弃一切分歧，我们不能像海姆博士和博丁格那样思考问题，他们总是宣称南北必须分裂，哪怕只是暂时的。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努力，因为正如荣格同志今天解释的那样，成为民族意味着成为德国人，而不考虑好处。如果有人今天向我们保证，如果不向法国屈服，那么他们将成为布尔什维克——好吧，我宁愿在布尔什维克的德国被绞死，也不愿满足于法国统治下的德意志南部。（掌声）

你们可以放心，我们会到处找到同志；这应该是一个更大的目标。我们认识到，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斗争。我们相信，德国的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也许就在几个月内。在那里，我们有责任通过无情的宣传，高举的不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旗帜，而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旗帜。正是这种紧迫的需求、这种灾难性的危机，如此迅速地降临到我们头上，让我们没有时间三思，没有时间简洁地总结我们的纲领，没有时间将最关键的内容提炼成口号。在整个德国——因为我们不是巴伐利亚党，而是德国党。（掌声）

于是我们开始了：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当慕尼黑的议会时期到来时，我们再次被压制。 有几天，我们的会议、我们的运动只有两个人，德雷克斯勒先生和我。（掌声）。我们一直期待着它能够与那些为信念而流血牺牲的人并肩而立。然而，运动再次扩大，成员增加到七人，然后是十一人，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增加到二十人、五十人、一百人、一百一十人、两百人、两百五十人，并且不再每月召开一次会议，而是每两周、每八天召开一次有四百人参加的会议。1920 年 2 月 24 日，我们首次向公众展示自己，1700 人聚集在 Hofbräuhaus 节庆大厅。从那以后，我们每周都会公开露面。每周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如今，我们的大厅里挤满了 2500 到 3500 人，他们坚信这场运动再也不会被摧毁。

它无视冷漠和忽视，无视懒惰，终有一天将带领德国走出沼泽。最重要的是，我们将会实现一个目标，那就是团结所有数百万个知道只有一个目标的人，那就是大德意志祖国。（掌声）因此，我向所有人，包括布伦纳先生，宣布，我们时刻准备着，愿意随时团结起来，最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共同努力。（“万岁”的呼声） 我们时刻准备奉献出全部精力。如果今天有人说复兴必须来自巴伐利亚，那么我们将自豪地捶胸顿足，说这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只是创造了一个自由的庇护所，让个人可以发表意见，而不会被暴民最终摧毁。因为我们希望这股能量不会在相互斗争中分散，而是共同追求同一个目标。如果这个名字真的不能更改，那么即使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运动相互对立。 那么，就目前而言，尽管无法就名称达成一致，我们必须努力确保这两个运动不会相互干扰，而是将精力集中在那些真正能够取得成功的地方。我们只希望一件事——无论我们的运动以什么为起点，无论是民族社会主义还是德国社会主义，它都能取得成功并突破那里，不要局限于个别道路，而是完成我们在慕尼黑所完成的事情，即吸引广大民众，将整个运动转变为真正的群众运动，从而成为日后德国复兴的核心。

我们现在必须开始有意识地、有系统地建立一座绝对稳定、安全的堤坝，抵御将德国布尔什维克化或高卢化的企图，因为这两种运动都是危险的。我再次向您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我们很高兴听到您说，尽管您身处困境，但从未忘记您属于我们的信念。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一点。当希尔林先生星期一在慕尼黑发表演讲时，我会向人们讲述您在这里如何坚守大德意志的理想。然后希尔林博士先生会告诉您，有 3000 人[就是听众]因德国没有被遗忘而欢欣鼓舞。（掌声）。

我还要说一点，因为今天在我们中间也有肆无忌惮的商人政客，他们在当前艰难的困境中，为自己的民族的不幸讨价还价，他们不会停止确保在慕尼黑、斯图加特、明登，甚至是在德奥边境，只有与巴伐利亚的合并才是人们所希望的。请大声清楚地记录下来，请举手！“我们只想要一个统一的德国！”（掌声。举起的手宣誓。）

让那些认为德国可以分裂的先生们听听这句话。这是商业政客的做法，而不是德国人民的。在慕尼黑，我感到自豪和高兴的是，如果会议没有取得其他成果，那么它至少取得了一个成果——继续努力的决心。我相信这项工作一定会取得成功，这让我意识到你们怀有同样的想法，你们只有一个目标：首先，德国高于世界上的一切；其次，只要德国人还在，我们的德国就在。（暴风雨般的掌声）。

当一天结束时——法西斯开始工作 威廉-路西法-艾伦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办公室里又开始热火朝天地讨论度过夜晚的最佳方式。出纳匆匆忙忙去打高尔夫球，记账员要去打网球，发货员要带他的女朋友去看电影，而办公室的小男孩则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舔邮票，以便赶在"狗"之前。只有上衣翻领上别着法西斯徽章的年轻布朗，似乎对如何更好地自娱自乐这个大问题不感兴趣。他正在有条不紊地收拾东西，准备报到。

几分钟后，他向总部的哨兵敬礼，迅速换上黑衬衫，在晚上的任务开始前到食堂吃了点东西。没过多久，一名士官从楼梯上哗哗地跑下来，呼吁大家自愿参加一个会议的管理工作，布朗连忙放下剩下的三明治，匆匆跑上楼去，与其他人一起坐上了其中一辆面包车。今晚这辆车是老式敞篷莫里斯面包车，它经历的麻烦和战斗比运动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要多。

没有人知道车窗被打碎了多少次——车身两侧被石块砸出的凹痕、棍棒和其他武器划出的伤痕，车身上的油漆也所剩无几；但我们都喜欢这辆老莫里斯，总有一天，法西斯主义的永久展览中会有它的一席之地。

喜忧参半

今晚，面包车正以一种破烂的姿态穿过西区，在拥挤的人行道上，黑衫们受到了褒贬不一的欢迎。到处都是阴沉的面孔、充满敌意的眼神和嘀咕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的同志遭到了野蛮的袭击并受了伤。

但今晚我们对西区不感兴趣，莫里斯号继续向东北行驶。很快，我们就经过了"天使"，接近了目的地。西区宽敞明亮的街道已被我们远远抛在后面。我们来到了肮脏、嘈杂但却热闹非凡的伦敦东区。

当我们经过时，聚集在公共房屋外的人群发出阵阵喝彩声，小男孩们吹着粗鲁的"覆盆子"；但我们对这一切都习以为常，所以也就宽容地笑了笑。

我们终于到了，在主干道外的一条小街上停了下来，当地的一些法西斯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布朗和其他来自 H.Q. 的黑衫党人一起跳下面包车，很快就和当地支部的一些老朋友聊了起来。他得知上周的会议闹哄哄的，而且外面有传言说共产党今天晚上会大举出动。但这都是今天要干的。让他们都来吧！

请注意！今晚的演讲者正登上面包车，人们已经在小街和大路的交界处集合，会议准备开始。黑衫军在面包车尾部围成一个半圆，作为演讲者的护卫。他们奉命背对人群，面向演讲者。我们必须冒着被人从背后袭击的风险。演讲者已经开始概述我们的政策。

起初他讲得很小声，但随着人群的聚集，他的热情高涨起来， 他清脆年轻的声音很快就在街上回荡，将我们政策的要点娓娓道来。"英国优先.....重组工业.....职团制国家.....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国家控制金融。但很快，迅速壮大的人群中开始有人插话。"工会怎么办？""犹太人怎么办？"的喊声此起彼伏。

有组织的反对派

发言人耐心地解释说，提问时间稍后安排，但他们现在必须保持安静，以便他有机会介绍我们的政策。相对安静了几分钟后，喧闹声再次响起。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

党员，布朗很快就意识到，有组织的反对派已经到来。嘈杂声来自人群的一个部分，他瞥了一眼，发现有几名当地共产党员聚集在背景中，看来还是没被打一顿。正是从这个方向传来了大量的起哄声，人们开始努力高唱"红旗"。

不过，我们的演讲者以前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他巧妙地化解了群众对共产党人的不满，并呼吁公平竞争。愤怒的喊声"闭嘴"响起，"红旗"逐渐消失，演讲者得以完成演讲。接着是提问时间，场面变得更加热烈。现在，共产党人可以就经济方面提出他们刁钻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当他们不喜欢答案时，就可以进行谩骂。现在人群至少增加到了三四百人，而黑衫总共不到二十人。

突然一个共产党人不再提问 而是故意煽动群众攻击我们

"如果你们这些失业者有胆量的话，你们就会把这些法西斯分子赶出街道"，一声令下，黑衫军转身面向人群。共产党领袖在我们够不着的外围；在我们前面的大多是没有攻击性的年轻人和妇女，但后面的男人们开始推搡，我们逐渐被逼回到面包车上。

突然，一个空牛奶瓶从共产党队伍的人群头顶飞过，砸在面包车的侧面。紧接着又是几块石头。我们的一群人在布朗的带领下冲出了拥挤的人群，向共产党人冲去。他们中的几个人看到我们冲过来，连忙逃跑，但还有几个人忙于寻找地上的石子什么的，而我们能够接近这些人。

共产党人逃跑

布朗挑出了一个他记得曾在伦敦西部看到过的试图破坏集会的壮汉。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打斗，但由于现在是近身，而不是从远处扔东西，共产党人并不那么热衷，很快壮汉就跟着他们的同志跑到大街上去了。

与此同时，演讲者一直在安抚人群中的其他人，干扰因素被消除后，我们继续开会，回答了几个有智慧的问题，这表明在更爱国的人群中，有很多人对我们表示同情。最后，天快黑了，发言人宣布会议结束。当我们向法西斯致敬并高唱"法西斯醒来"时，人群中响起了欢呼声。又一次会议圆满结束了；我们向共产党人表明，我们不会受到肆无忌惮的攻击。

我们告别了当地的法西斯，老莫里斯号又呼哧呼哧地回家了。年轻的布朗明天要在办公室解释他的黑眼圈。还有一个人的脸颊被划伤了，另外还有几个人受了轻伤；但在为法西斯主义而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预料到这样的小事。

与威胁作斗争

所以，当你看到黑衫党人从我们的面包车上经过时，不要以为他们只是在 "炫耀他们的制服"、"扮演士兵"；他们有比这更严肃的事情要做。**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乐趣，放弃了自己的夜晚，来保护我们的演讲者，来打击那些地区的共产主义威胁。**

因此，我们向黑衫军致敬！

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 周毓英

小引

法西斯蒂在中国还没有具体地出现的时候，感觉敏锐的国人就已经在鼓起反对的风潮了。这好像栽树一样，下种的时候反对的人真多！但反对也没有用，越反对，种子越成长得快，在那激烈的反对空气里，法西斯蒂的树是高大起来，高大起来，最后

连反对的人们也被浓荫大树遮蔽着，享受到这株大树的恩惠了。

在中国，反对法西斯蒂的人有两种，第一种是什么东西都要加以怀疑的空头学者，他们有时侯也同情于孙中山先生，有时候也同情于马克斯，有时候也同情于墨索里尼，希特勒，但对于一件事实的临头，一个运动的出现，他们为要使自己高于一切，就什么东西都要先来怀疑一阵，反对一阵，好像不如此，学者的生命就要失去了。第二种是有着先入之见的固执的政客和政治家，他们死守着一个成见，凡与他们的成见不相符合的，便要誓死反对，不惜抹煞一切的事实来反对。

那些可怜的空头学者的怀疑，简直像粪壤中的蚯蚓在翻爬，自以为尽了反对的能事，但实际上却正帮助了法西斯蒂种子的成长。我们让那些蚯蚓，专门做松动土壤工作的蚯蚓，由他们永永不息的翻爬下去吧。

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政客和政治家的反对法西斯蒂，我们从逆流着的大浪潮中捻取了一粒细沫——胡汉民先生在三民主义月刊中第一卷第五期中发表的那篇『论所谓法西斯蒂』。这粒细沫，的确是最坚硬的一粒了。空头学者们的反对法西斯蒂，既只是一种蚯蚓的翻爬工作；那些民主派政客的反对法西斯蒂，也只是在一种事实的打击之下所发出的失望的悲啼，胡先生的这粒细沫，却就不是简单的翻爬和悲啼，似乎有一些实际的基础和理论的根据。虽然胡先生的实际并不可靠，而理论也只是一种掩饰，但我们却很可以把胡先生的言论当作他山之石，切磋琢磨，使敌人也发生友人的作用。

像蛇一般固执的胡先生，他的固执是使他成为中国一个政治家的因素。但胡先生似乎没有想到一个政治家除了固执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这更重的因素就是虚心。不虚心的固执，什么时候都要推车撞壁，牵牛下井，一步一步的走上死路。胡先生的固执，固然加强了胡先生的政治家的地位，于胡先生个人毫无损失，然而整个的中国却因胡先生的固执撞了壁，下了井，走上了死路啊。

胡先生这篇论所谓法西斯蒂的文章里，发了龙的姿态，存了蛇的心理，从世界骂到中国，从天上骂到地下，简直把法西斯蒂说得像一个凶恶的纸老虎，虽凶，然而一戮就穿。殊不知法西斯蒂的出现于世界，法西斯蒂的出现于中国，都自有其现实的基础和历史的原因，谁也不能无中生有，谁也不能强行抑止。事实就是真理，真理不能离开事实，顽固的和空想的先生们假如也能有一天顾到事实，顾到实际的中国和世界，那末那些口头笔头所煊染着的美妙的真理也许一时一刻都不能再挨下知去，而要马上火化吧。

一，法西斯蒂的本质

『什么是法西斯蒂？』这句话在中国想问的人实在太多了。

世界上的事情，从来就没有用两句三句话就可以解释得清楚的。除非说：人是上帝造的，地球也是上帝造的，这当然很简单，而且越是愚夫愚妇越能听得懂。愚夫愚妇们只要知这人是上帝创造的，地球也是上帝创造的，他们就已经心满意足，用不着更追求什么了。至于科学的解释，现在恐怕还只能由少数人知道，由少数人理解，就是那些不信上帝会创造人类，创造地球的人，他们本身不是专家，也不过有着一个模糊的科学的信念，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越是科学的东西越不容易解释，也越不容易为大众所了解。孙中山先生解释知难行易，说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这是证明

宇宙间有许多事实，不待人类的解释与了解，而事实总是存在着的。人与地球，在没有科学家以前固然已经存在着，就是在没有宗教家以前也早已存在着了。

什么是法西斯蒂？假如是实行参加过法西斯蒂的生活的人，或者是一般不好歪曲的民众，他们当然都能够满足地了解的。意大利的民众生活在法西斯蒂之下，墨索里尼就是不解释什么是法西斯蒂，意大利的民众也绝不会起来怀疑法西斯蒂。意大利民众的相信法西斯蒂，纵不说是像愚夫愚妇们的相信上帝，但至少是像苏俄民众的相信布尔什维克，他们有着实在的生活，他们就用不着来追求空虚的学理。列宁解释从少数变成多数，孙中山先生解释知难行易，这都是从革命的实际生活中体验出来的说话。不幸那些空想的理论家。只想在理论上钻牛角尖。竟把社会的实际丢在脑后了。如中国的顶顶大名的胡汉民先生之流也居然以钻牛角尖的精神，不惜以歪曲与胡缠来涂污法西斯蒂。

墨索里尼说：

『法西斯蒂并不是一种主义，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就法西斯蒂的立场来看，生活是一种奋斗，每一个人首先克制自己，锻炼自己，为一有价值的工具，足以服务自身，服务人群。法西斯蒂的生命观，是严肃刻苦的宗教，最反对安乐与妥协。法西斯蒂反对抽象的个人主义，唯物主义与理想主义。在政治方面看，法西斯蒂是一种现实主义，他是要根据实际来解决一切当前的问题的。因为法西斯蒂主义，都存在于现实中，离开现实，无论人世或灵魂的一切，都不能存在。不过我们之构成此现实，是似个人的资格，并不是以大多数的资格。所以法西斯蒂反对德谟克拉西主义，因为德谟克拉西主义是以大多数较低下的层级为标准，而使我人统一于其下的。法西斯蒂不然，她在训练个人及国家，使臻于一较高的层级，所以她注意纪律，威力和精神的发展，还比注意政治为甚。』

这里是说得很明白了，『生活是一种奋斗』，而且要在有组织的奋斗中社会才能得到进步。法西斯蒂要每一个人克制自己，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组织的奋斗中有价值的工具。以严肃的刻苦的宗教的精神排斥一切安乐与妥协，以实际主义现实主义排斥一切抽象的自私的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及理想主义。以刻苦的牺牲训练个人训练国家，在纪律与威力的统制下求得进境。实现组织的最高理念，德谟克拉西式的苟且图利的要求当然是被排斥的。

德意志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革命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正就是一种严肃的刻苦的组织的奋斗，而且绝不离开现实的奋斗之下达到了目的。法西斯蒂如果像一般诬蔑之口所说的是无原则的独裁，是回复了古代专制的暴行，那末德意的民众早已把她打了下去，决不能生长到现在而成为一切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眼中啊！并且德意法西斯蒂的迅速成功，完全是由于民众的助力，或者是由于民众的承认。意大利不先出现共产党的残暴，墨索里尼虽有心要救祖国，意大利的民众也未必能信任墨索里尼的独裁，使意大利得以很快的强盛起来。德意志如不是有了社民党民主主义的没落和失业潮流的袭击，希特勒党也未必能得到全国选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投票赞同而实行独裁。事实证明墨索里尼希特勒的独裁是完全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民众的利益，绝不如一般下劣哓舌者的诬蔑把法西斯蒂说得比沙皇专制还可怕的毒蛇猛兽啊！

法西斯蒂既不同于封建专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惰性民主，可是胡汉民先生民

却是那样的不肯理解，他开头就先对法西斯蒂下了一阵丧心的诬蔑，说法西斯蒂是『摧毁无产者的革命运动，并提倡狭义的国家种族观念，以稳定垂绝的统治』。接着又假装虚心的引证了一些墨索里尼的说话，但这假装的虚心并没有使胡先生增加一点理解，也没有能够免强拿出一点像煞正当的驳辩。就只是机械地说墨索里尼的话『是名辞的修饰的润辞』，好像意大利革命十数年的经验和事实就可以在胡先生的『修饰』『润辞』之下抹煞了。墨索里尼的话是『修饰』是『润辞』，但也还有事实在做根据，丝毫无损于法西斯蒂，可是胡先生不能用正当的驳辩只能运用『修饰』『润辞』等等抹煞对方，却反而证明胡先生的假装虚心的引证墨索里尼的说话是无聊，而武断顽固的精神倒足以送胡先生入坟墓呢。

二，法西斯蒂产生的历史

假如我们相信胡先生这篇文章不是唯物主义文氓的枪替而是胡先生于长期抱病中的手笔。那末我们真敢大胆说胡先生的渊博和虚心是太惊人了。胡先生的广征博引，胡先生似乎很想从许多客观的事实中求得若干了解，不幸胡先生的顽固绝不愿有何了解，只是夸张了渊博与虚心之后，硬生生地加上一些武断与诬蔑而已。

胡先生于其大作的第一节中以不少的篇幅引用了墨索里尼的说话，但胡先生并没有能力加以反驳，只能无聊地加一些武断和诬蔑，根本在本质上就误解了法西斯蒂。本质上误解了法西斯蒂还不知足，不肯藏拙，还要更高谈一谈什么法西斯蒂的历史因缘与时代背景。

法西斯蒂的产生，当然是有她的历史和背景的；法西斯蒂不会从天上突然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下突然变出来。不过我们相信历史是错综复杂的东西，历史至少有主管与客观的两方面的成份，主观是组织力量（人类的力量），客观是自然条件。我们如单纯的只看见客观的历史，而忽略了主观的历史，那末人类与禽兽同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为什么禽兽不能也和人类一样有同样的社会的进化呢？胡先生尽着九牛二虎之力，凭其机械的历史观念——也许这观念不是民生史观的胡先生所固有，而是唯物主义的文氓送把他的——大谈其法西斯蒂产生的因缘，大谈其意大利德意志以至于日本等国产生法西斯蒂的历史。胡先生说法西斯蒂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是『参加欧战之失败』；

第二是『社会党措施之失当』；

第三是『经济状况的凋蔽』。

可惜胡先生这叙述实在太不够啊！机械唯物主义者的宿命论的公式是：

『什么，什么，什么；就「必然」产生什么』。

胡先生自命是反对唯物主义的孙中山先生的高足信徒，是国民党革命任务的独立担当者，胡先生当然不能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观点而去采纳宿命论的公式。但事实上，胡先生竟已踏着宿命论的公式和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大发谰言了。

当然，我们在讨论意大利法西斯蒂产生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否认胡先生所提出的三个主要的条件，但我们相信还有更主要的条件，这便是（一）墨索里尼的智慧，（二）墨索里尼的毅力，（三）墨索里尼的组织。意大利如没有墨索里尼的智慧，没有墨索里尼的毅力，没有墨索里尼的组织，那末我们相信意大利的纵使经过十次的『参加欧战之失败』，经过十次的『社会党措施之失当』，更加上十倍的『经济状况的凋蔽』，

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革命也不一定能够出现。

意大利当时有了墨索里尼的智慧，毅力和组织这三个法西斯蒂的主观条件，于是再加上胡先生所说的（一）参加欧战之失败（二）社会党措施之失当（三）经济状况之凋蔽等等的客观条件，所以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革命便出现了，而且成功了。否则参加欧战之失败者不止意大利一国，社会党措施之失当者亦不止意大利一国，经济状祝的凋蔽者更不止意大利一国，为什么其它各国都没有能够出现法西斯蒂的革命呢？

意大利革命，正好是和苏俄革命中国革命有同样的形迹。苏俄革命如没有列宁的智慧，没有列宁的毅力，没有列宁的组织，中国革命如没有孙中山先生的智慧，没有孙中山先生的毅力，没有孙中山先生的组织，那末纵使苏俄与中国的革命的客观条件怎样成熟，苏俄的共产党革命和中国的国民党革命也是不能成功的。可怜那些唯物主义的宿命论的论客，老是喊着『什么，什么，就必然产生什么』。但事实如铁掌，自马克斯以来，那些夸大勇敢的预言，宿命论的革命公式，老是左一个巴掌右一个巴掌的被打入地狱里去了。胡先生不回头看一看唯物宿命论的地狱里堆积了多少丑恶的死骸，堆积了多少无聊的预言，却还要勇敢的蹈着这个地狱的死路去估量意大利，甚至还要来估量中国！这是何等可笑，也是何等可怜啊！

胡先生像英雄唐诘诃德似的妄谈了意大利革命的生产的历史，又还更勇敢的谈到德意志，谈到东邻日本，但也不过一贯的更暴露了胡先生对历史的认识的错误而已。德意志的法西斯蒂革命，最主要的历史的主观条件便是：

（一）希特勒的智慧；（二）希特勒的毅力；（三）希特勒的组织。

但胡先生不相信，他还是要主张『（一）国势危急』，『（二）经济恐慌』，是德国法西斯蒂革命产生的原因。胡先生就不想一想为什么苏俄『国势危急』『经济恐慌』产生了共产党革命？为什么中国的『国势危急』『经济恐慌』产生了国民党革命？为什么当时的苏俄和中国不也产生法西斯蒂的革命呢？假如我们讨论苏俄革命而漠视了列宁的智慧，漠视了列宁的毅力，漠视了列宁的组织，讨论中国革命而漠视了孙中山先生的智慧，漠视了孙中山先生的毅力，漠视了孙中山先生的组织，那种讨论是不会有丝毫价值的。胡先生拾了唯物主义的牙慧，在毒骂意大利德意志法西斯蒂的罪恶的时候，恨不得把一切罪恶都放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位恶魔的身上，在讨论意德革命产生的历史的时候却又不知怎样忘掉了墨索里尼，忘掉了希特勒了。在胡先生的意思好像就是没有墨索里尼希特勒列宁和孙中山先生诸革命的导师，意德俄和中国也只要有当时那样的环境，——『国势危急』，『经济恐慌』——意德俄和中国的革命也是能够成功的。这种毫无理解的抄袭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无顾忌的雇用唯物主义的枪手，胡先生的无知，抑是胡先生的无耻呢！

又日本的法西斯蒂，现在还只是在酝酿时期，这种酝酿的成功与失败，以及畸形的天皇至上主义是否能走上健全的法西斯蒂的大道，这些都还在不可知之数中。但胡先生却也机械地叙述一番日本的『国势危急』和『经济恐慌』，好像日本的法西斯蒂也像意德一样掌握了政权，已经成功了。这显然又是胡先生的曲解，但为节省无关重要的争辩起见，不多费宝贵的笔墨了。

三，社会的前进与后退——法西斯蒂的革命性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社会到了熟烂的程度，民主政治的时代过去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一切都陷入了无组织的混乱状态，社会就好像一切都解体了。政治上资本家在议会中互争议席，政治不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只是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益。经济上资本家在市场上互争销路，生产不是为了消费，为了民众，而只是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润。于是一切都在私人自由竞争的占有欲之下，政治动摇不定，国家变乱丛生，经济塞滞凋蔽，民众失业充斥，国家与民众都同陷于无法生存的危机中，在这资本主义到了熟烂崩溃的时候，当时的社会可以走三条路：

一是尽力保守资本主义社会的原状；

二是调整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推动社会的进步；

三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完全打碎，另行建造一个理想的社会。

上述的三条路，第一条是保守主义的态度。用种种方法如『生产合理化』等以维持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这仍旧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第三条是激进主义的态度。用种种方法如阶级斗争罢工暴动等以根本毁弃资本主义制度而另行创立新制度，这便是马克斯所提倡的共产主义制度。除了保守的资本主义与激进的共产主义外，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二条办法便是法西斯蒂。

在目前的时代而仍以保守的态度去维持资本主义，这当然只有使社会后退。同时那激进的共产主义者，遥望着一个不可实现的空想，不顾一切的要把现实的旧社会打得粉碎，但旧社会虽然被打碎了，新社会却创立不起来，结果也和保守主义的方法一样，更猛烈的使社会后退了。

在社会临到了大转变的时代，一切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及其成功，便是决定这个社会的前进抑后退的主力。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目前这个世界的阶段，都可以说是使社会后退〔的主〕力，它们绝对没有力量使社会前进的。欧战后新兴的法西斯蒂运动，没有资本主义的保守成份，也没有共产主义那样的无原则的破坏，然而她却兼有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长处。法西斯蒂成功，社会自然是前进了。

社会是人类协力的结晶，是人类组织的产物，社会的一切文物制度，便是为了经常维系人类的组织关系和协力关系的。人类那一天割断一切的组织关系，停止一切的协力关系，人类的社会便可在那一天破灭，而人类的幸福也就在那一天完结了。当然，人类不是傻子，人类必不肯有意识地来自行割断各种组织关系，停止各种协力关系，可是所谓组织所谓协力，经常都要藉着社会的各种制度和法规而存在的，没有善良的制度，没有完备的法规，什么组织什么协力都无从谈起。

人类的组织关系协力关系经常既都存在于各种制度和法规的活动中，我们就可以判断社会革命运动发生的原因和成功的路径，原来某种社会存在了若干时期以后，文化基础与经济基础等等都有了全部的或局部的变革，这是社会的制度和法规便应当随着社会的环境而有所改变，否则便不能再继续维持社会的协力关系和组织关系了。

社会的制度和法规有时已失了协力和组织的效能，但社会还能保存着秩序，这便是出于国家机关利用警察军队等等的镇压的力量。警察军队等国家的镇压力量，非但能够保存社会的秩序，有时还能保存失了时代性的制度和法规。当社会的制度和法规已失了组织的协力的作用，使少数人有利而使多数人受害，政府却还拼命维护旧的制度和旧的法规，这便要引起被压迫民众的反抗，引起社会的革命运动了。

法西斯蒂的革命，是以社会新兴集团的强力来恢复社会的协力关系和组织关系，同时法西斯蒂的本身也就是建筑在这种协力主义组织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法西斯蒂主张全体民族全体国家——甚至全体世界——的协力，所以法西斯蒂从来不像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那样预存着阶级的偏见。法西斯蒂主张社会的健全组织以促成协力主义的稳妥的执行，所以法西斯蒂需要坚硬的组织，排斥一切分散力量的多头竞争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而以一个正义的贤明的独裁来指挥一切，支配一切。

法西斯蒂的革命性，法西斯蒂的进步性，现在除了好怀疑或好固执的人以化，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了。可是像蛇一样固执的胡汉民先生，他的反对法西斯蒂是只要于一些假装虚心假装渊博的引征和叙述之外，再加上一些武断的判词就完了。胡先生在其大作的第三节里，我们总以为他要怎样的发挥出多少漂亮的理论，指斥着法西斯蒂的反动性，可是胡先生太笨拙了，他就只是第一句先下了一个武断：

『法西斯蒂运动，实在是现代政治上最反动的运动』

于这个武断之后，胡先生倒也承认法西斯蒂是『时代转变的产儿』。但接着又说：

『……同时也必会以时代的转变而转趋没落。她的没落，不是理论的问题，而只是时间的问题。』

胡先生真妙，他的时代的解释竟含着有那样多的魔力。一回儿法西斯蒂承胡先生开恩是『时代转变的产儿』，一回儿法西斯蒂在胡先生的大红朱笔之下又要『以时代的转变而转趋没落』了。胡先生的『时代』的运用，竟只是贩运字句，在读者面前演遮眼法啊。胡先生做了唯物主义的干儿子，所以常常倒拜在『时代』的脚下，有时还要以『时代』做掩护遁词的法宝。可是我们是不怕时代的，历史是我们的战场，时代正要在我们的脚下践蹈出来！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去等候『时代』，更不会那样怯懦卑劣地对着『时代』暗暗叹气。

闹过了『时代』的把戏，胡先生又捧出孙中山先生的话：『阶级斗争，是当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而后机械地来一个武断：『法西斯蒂，也正是当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她是政治的变态现象，不是政治的常态的演进。』法西斯蒂与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是两个绝不相同的东西，即在阶级的观点上说，也是正处于绝对相反的地位。胡先生像一个没出息的宗教师。捧出孙中山先生的经典眩耀着读者的眼睛，一套遮眼法，法西斯蒂就变成『也正是当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了。至于法西斯蒂为什么是『一种病症』，胡先生并不说出理由，好在胡先生学着宗教师的秘诀，只要把废话和武断加在一起，任务就已告毕，理由是不用说了。

于生硬的诬蔑武断之后，胡先生又信口雌黄的谈着法西斯蒂的（一）『在政治上』，（二）『在经济上』，（三）『在社会上』（四）『在文化上』等许多问题。这自然又是胡先生假装虚心假装渊博的手法，但我们却只看见这些叙述里。又完全都是些武断，诬蔑，和废话啊。现在，我们不怕空费时间来依次看看胡先生对于这些问题的叙说和判断吧。

（一）『在政治上』——我们认为政治是一种组织与威力的产物，历史上所有的什么部落统治制度，君主统治制度，民主统治制度，不论这些制度有怎样的差别和不同，但这些制度的组织形态和威力作用，却是完全一致的。政治上的革命现象，目的可说就是在于求得组织的进步和威力的合理运用。社会在经过若干时期的成长和变迁以后，

组织不免发生矛盾，威力不免趋于滥用；组织的矛盾和威力的滥用，当然是政治的退步现象，是社会进化的障碍物。譬如法国在大革命以前，皇室，贵族，僧侣把所谓第三阶级的平民排斥出组织以外，同时皇室，贵族，僧侣的威力的滥用亦无所不至，由这组织的矛盾和威力的滥用，于是法国的大革命便产生了。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在当时自然是一个极大的社会进步现象，第三阶级的平民参加了政治，政府的威力也不再是压迫民众，而是在图谋民众的利益了。现在世界都已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潮流，打倒了封建政治，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法国大革命成功，社会由封建的组织转入于资本主义的组织，威力也由封建的运用转入功利主义的运用，这当然是人类社会史的一个互大的进步，由于这一个政治的进步，于是一切社会的经济文化科学都有了巨大的进化的痕迹，而人类的幸福也大大地增加了。

可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所成立的资本主义政治，经过半世纪以上的成长和变迁，现在又已矛盾丛生，弊端百出，不能适用了。组织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一方面有投诸大海付诸烈火的过剩商品，一方面又有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的失业群众；威力上议会制度的政权常常移动于少数几个资本巨头之手，国家的政权成为保护少数资本家利益的工具，成为少数民主政客满足私欲的角逐之所了。

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现在已充分暴露了她的弱点，社会的施政，若取决于民主，则朝三暮四，暮四朝三，主张时常有变更，实际一无表现，这种落于时代之后的民主政治，实在倒还不如没有政治的好。

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其由民主的虚名而陷于腐败，没落，当然不如由一个材干和道德高超的领袖去执行独裁。政治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义务，这种义务不是有特别高超的人格学问和能力的人是不能负担的，所以我们与其把政治的任务仰望于一般盲目无能的民众，实不如专责于一个英勇贤明的领袖。胡汉民先生昧于事实，以『王权天授』,『教权神授』等语句来讽责法西斯蒂，实则民众信仰孙中山先生，民众信仰墨索里尼，民众信仰希特勒，胡先生是用不着哓哓地问主权谁授的。社会的进化与秩序的维持须赖有国家的制裁作用，社会的制裁既由国家为中心，那末『主权在国家』的说法当然谁都不应怀疑。胡先生提出三个难题『（一）甚么是国家的本体？（二）优秀的少数者是否即足以代表国家？（三）独裁者任意的主张，是否便是国家的意见？』——以为这三个难题就可以难倒法西斯蒂。胡先生的意思也许以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吧？请问无组织的人民如犹太民族那样是否可以称之为国家呢？我们承认人民可以成立国家，但必须有固定的活泼的组织才能成立国家。一群无制度无法规的乌合之众，我们相信怎样胆大的人也不敢称之为国家吧？所以国家的成立第一就在于人民的组织，人民没有组织是不能成为国家的。同时在组织的过程上观察，没有领袖就没有组织，所以国家的主权虽渊源于人民，但主权的执行却属之于贤明的特出的领袖。这所谓『权』与『能』的分别，孙中山先生在演讲民权主义的时候已解释得很详尽，就是三岁小儿也没有什么不明了的地方，胡先生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装傻呢？须知『独裁』不是权利，只是一种义务，无『能』者不必痴心妄想，有『能』者逃避亦逃避不了，并且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起见，这种独裁的义务也根本不应逃避啊！胡先生处处都从权利上着想，于是『朕即国家』,『民族专制王国』等字句都被胡先生搬了过来；其实胡先生应该赶快肃清这些封建思想，再去熟读一下民权主义，把政治上的『权』与『能』分辨明白

了，再来高谈法西斯蒂亦不迟也。

（二）在经济上——胡先生以『主张私有的经营主义和营利的自由竞争主义』为攻击法西斯蒂经济制度的论点。胡先生没有能力从理论上对法西斯的统制经济和组合制度加以攻击，只是抄袭而曲解了几条意大利的条文，便闭着眼睛大嚷其『反社会主义』，『反民生主义』。胡先生大概还不了解什么是统制经济，什么是组合制度，这里我们就犯不着为了教训胡先生的『法西斯蒂经济学』而多费口舌，我们只要看胡先生的高唱反对私有经营主义和营利的自由竞争主义，我们就可以知道胡先生的怎样爱唱高调，而实际上是怎样的糊涂了。

法西斯蒂的政策纲领，本是随时随地而异，德国不能相同于意国，中国日本也未必相同于意德，胡先生咬文嚼字的抄袭了一些意大利的条文，就机械地断定法西斯蒂是『主张私有的经营主义和营利的自由竞争主义』，希图以此为法西斯蒂的罪状，这实在是心劳日拙的举动。经济上的『私有』与『营利』这两个问题，在经济组织的活动过程中和前进的过程中是两个不能避免的现象。『私有』与『营利』如绝对禁止，社会经济的组织活动便会立即停滞起来，社会经济没有了组织的活动，经济便也就难于进化了。试想以破除私有制度营利制度标榜了近百年的共产党，在其自身统治之下的苏俄，尚不得不中途放弃马克斯主义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仍恢复到利用『私有』『营利』等经济上进化的因素以发展苏俄的建设，容许农工各阶级有充分『私有』和『营利』的权利，为什么意大利没有反对『私有』和『营利』就成了罪恶呢？又胡先生身为国民党的一个偶像，也曾做过很多日子的立法院长，胡先生所亲手造成的那些民生主义的立法，究竟做到怎样的反对私有的经营主义和营利的自由竞争主义呢？究竟与意大利的立法有多少经济上的不同之点呢？假如意大利容纳了『私有』和『营利』就是反社会主义反民生主义，那末胡先生的糊涂的立法院长难道不也是反社会主义反民生主义吗？

并且，法西斯蒂的容纳『私有』和『营利』，只是暂时的过渡的阶段，在法西斯蒂经济的统治与组合方式下，法西斯蒂是要从实际上调整社会的经济结构，而造成幸福的完满的社会。

（三）『在社会上』——任何社会，都须带有组织的性质，没有组织，社会是没有的。虽然组织的性质有浓厚和淡薄的分别，组织强固的社会几乎一个社会就如一个人，行动是活泼的，而且是有力的；组织软弱的社会，一个社会就几乎像一群乌合的群众，一动都不能动。譬如国家，这总要算是组织性最强固的一种社会了，可是我们老大的中华，还是那样四分五裂，组织统一不起来，发生了内乱外患，中央政府有时也只好手足无措。暴日占了东三省，攻了上海，胡先生是负党国重责的人，也会脱离了组织的行动而远避香港遥领西南政权，作乘机进攻中央的准备，把抗日的任务责诸别人，无怪乎中国要衰弱了。像胡先生这样依老卖老不守组织的人，也许正就是中国社会的典型人物，他非但做到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还尽了乘机图利，自推倒墙的能事呢。

社会是有机的组织，社会就应该有形成一个中心的领袖，胡先生的所谓『社会群体的意志』，显然就是这个中心领袖的意志。但胡先生似乎没有懂得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原理，而就胡乱狂喊一阵在法西斯蒂运动下，『抹煞社会群众』，『社会群体没有意

志』了。

（四）『在文化上』——文化是社会进化的精神的产物，社会的进化离不了组织和现实。空想出来的天堂不能算作进化，散漫而无组织的社会不能实行进化，那末与进化问题发生密切关系的文化，当然随时随地都要顾着社会的实际情况和组织问题，不能充分的追着空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乱奔狂跑。可是为着这组织的问题与实际的问题，胡先生的责言又来了：『所谓法西斯蒂运动乃是一种反进化主义的，复古的，和排他的运动。所以在政治上，她必定摒绝近代民主主义的精神，以回复于古代帝王极端之专制；在经济上，她必定摒绝近代民生主义的精神，以巩固剥削的资本主义的壁垒；在社会上，她又必定摒绝近代自由主义的精神，以奉所谓特出的贤者，而以众人为刍狗。综合这三种反民主主义的反民生主义的和反自由主义的精神所产生的文化，无疑的是一种反进化主义的，复古的，排他的文化』。

胡先生要对法西斯蒂尽可能的加以曲解和诬蔑，于是不惜完全抹煞事实，口口声声高喊着『近代的民主主义』,『近代的民生主义』,『近代的自由主义』。其实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这些臭东西，已不是「近代的」，快都成为过去了。社会要进化，这些妨碍进化的东西——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便不得不被时代掉入坟墓里去。至于民主主义的实现，这是实际的问题，不是空口的吹牛，在欧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下，议会中的民主已只剩下一个躯壳，一个形式；所谓自由也只是压迫工人有自由，把过剩生产品投入海中，或置诸火烧有自由；但数百万数千万的失业工人要饿死了，何尝有自由，被困在巨大数字之下的利息奴隶——全世界几千万几万万的破产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等又何尝有自由？至于民生主义，也应该有切实的把握，不是空谈所可了事，国民党革命六七年来，民不聊生，盗匪遍地，这当然不能算实现了民生主义；像欧美失业充斥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当然不能算是实现了民生主义。

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我们只承认是些没落的臭东西，不意胡先生竟要以这些臭东西来攻击法西斯蒂啊！社会不能离开现实，社会不能没有组织，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特出的贤者』决心为集团而牺牲，那末『众人』做了『刍狗』正是革命道上不可免的现象，胡先生借着文化问题而发的狂妄的谰言大可节省了。

四，法西斯蒂胜利的特征

自命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斯主义，挣扎活动了几乎近一百年，结果还是一无成效，只产生了一个畸形的苏俄——产生了一个与马克斯共产主义相差甚远的苏俄。法西斯蒂在人类的历史中只出现了十余年，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十余年中，她的成功，她的势力，却已远远的超过了共产主义了。

因为法西斯蒂的无往不利，并且无处不成功，墨索里尼统一意大利在前，希特勒统一德意志在后，日本中国也有迅速成功的趋势，害得胡先生没有方法来——胡先生的说辞是『不想』——『铺叙实行法西斯蒂的国家之施政的实际，来证实法西斯蒂的没落的必然性』，于是就只好『举出法西斯蒂的反动形态，证明法西斯蒂的没落』，而似乎很有把握地高喊法西斯蒂的没落，『不仅是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事实的问题，亦且仅仅是迟早的问题』了。

胡先生『扼要地说』:『所谓法西斯蒂，只是挽救资本主义的没落，利用小资产者绝望的情绪，和夸大的历史的传统，来镇压革命的一种反动的资本主义的最后组织。』

胡生先这滑头的论调，当他在拥护民主主义，拥护自由主义的时候，他是厚颜无耻地做着资本主义的辩护人，现在他又学会了小丑的跳跃，绕过一个圈子，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来反对法西斯蒂了。『挽救资本主义的没落』，『一种反动的资本主义的最后组织』，胡先生跟共产主义学舌，学得太逼真了啊。胡先生这样的学舌，把所有的资本主义的罪恶，完完全全的推在法西斯蒂的身上了。我们早已说过，法西斯蒂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的没落期中社会转入另一新时代的革命行动，她绝不同于共产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她不拘拘于保守，也不像共产主义那样的空想激进，用一种强硬的态度和坚酷的手段执行革命，建设社会，把人类从万劫不复的魔难中救出来。不幸胡先生的顽固不能认识法西斯蒂的真面目，于是胡先生对『法西斯蒂的发展』，所举出的『四个显著的特征』——『必须是绝对拥护资本主义的利益的』，『必须是绝对消灭社会主义的力量的』，『必须是绝对厉行独裁专制的政制的』，『必须是绝对实现其狭隘的国家观念的』——一切的话也都说到反面或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法西斯蒂的特征，第一是坦白，不像一般滑头论客和投机政客爱绕理论的圈子，爱立永不兑现的空头支票，绝不肯欺骗民众，叫民众冒险，更不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无代价的去牺牲民众，葬送民众。第二是切切实实的以民众的实际利益为中心，为谋多数民众或全体民众的利益。不惜遭受一切虚名的和血肉的牺牲，甚至不惜暂时拂逆所谓国民公意以达到谋民众利益的目的；第三是法西斯蒂把握着社会进化和社会活动的枢纽，以组织主义行动主义唯力主义为推动社会进化的主力。

胡先生举出四个显著的特征，以为这就是法西斯蒂没落的特征，我们却正可藉此说明法西斯蒂胜利的特征。

（甲）『必须是绝对拥护资本主义的利益的』——共产主义者对于社会组织的认识，他们是先天的带有一种机械的观念，以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有一条不可消灭的鸿沟，是两个不能并存的死敌。资本主义者则又以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上帝创造了两种人类。无产阶级是天然应当受饥受寒，受资产阶级的压迫。法西斯蒂则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不相同，她反对共产主义的挑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作无原则的斗争，也反对资本主义的主张资产阶级的天然可以压迫无产阶级。法西斯蒂主张着彻底的协力主义，以全体社会的利益作阶级矛盾的调和，铲除横暴的斗争，也要消灭无理的压迫。所以法西斯蒂的能够适合于任何社会，通行于全世界，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阶级的认识的正确上面。资本主义因为对阶级的认识不正确，资本主义已经走上了死路，一天一天的走近坟墓了，共产主义也因为对阶级的认识不正确，共产主义便到东到西都打回票，现在也已走上不可实现的绝路了。

法西斯蒂在阶级的认识上，不论是已经成功了的意大利德意志，或是将近成功的日本和中国，都已显示了明确的立场，她可以拯救困苦饥寒的农工阶级及失业群众，也可以给予产业的资本家以革命的前途。不知胡先生是太糊涂了抑是爱故意曲解事实，鼓其如簧之舌，大喊其法西斯蒂『必须绝对拥护资本主义的利益』，法西斯蒂『与资产者勾连着』，法西斯蒂『万不能与资本制度绝缘』。……我们真不知道胡先生是在制造理论上的谣言呢，抑是凭着村妇的狭隘见地，拼命谩骂以快其私意啊！胡先生非但能够在理论上制造谣言，他还能进一步把希特勒和『巴伐利亚的工业资本家阿斯托，……明兴的工业界大王马法依斯及谷伦巴哈的工业资本家霍伦林……等』联系在一起，把

日本的法西斯蒂与三井三菱等总裁联系在一起，制造了许多事实上的谣言。当然，胡先生只要在其所能想象得到的范围之内，尽可不顾一切地振笔捷书，狂造谣言，以骗取读者的同情，至于理论的真假，事实的有无，胡先生自然是『概不负责』了。

（乙）『必须是绝对消灭社会主义的力量的』——对于『社会主义』这一个名词，不知道胡先生究竟是怎样解释？如果社会主义是一种恶意的解释，那就不成问题，谁都要起来消灭社会主义的，如果社会主义是一种善意的解释，那就谁都要向着社会主义这条路走，谁都没有力量能够消灭社会主义。法西斯蒂的革命，以严肃刻苦的牺牲精神求得社会的进化和改善，建立美满无缺的社会，这美满无缺的社会，显然就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当然，法西斯主义者不能像一切的自由主义的空想家那样，什么『飞跃』『突变』一步就可以蹈进美满无缺的社会，一拳一掌就可以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法西斯蒂认为社会的飞跃与突变是不可能，而眼前的现实离社会主义还很远，所以除了实际方面的踊跃迈进，绝不涉及所谓社会主义的空谈。说法西斯蒂不事空谈，自是事实，但说法西斯蒂违反了社会主义，那就只是一种无知的妄言，荒唐的预测了。

法西斯蒂是向着社会主义的前途阔步迈进的，不过她的走向社会主义不是用『飞跃』『突变』一类的方法，而是现实的从解除社会矛盾方面入手的。法西斯蒂为了要从事现实，就不得不排斥一切空想，因此首先就和共产主义发生冲突了，共产主义本也只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一种，离开现实是很远的，但因为马克斯的粉饰的说辞，以及恩格斯考茨基等继续加以发挥和洗练，好像马克斯主义很有力量支配现实，大家被这『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几个字蒙蔽着，希望社会主义的迅速实现，都很踊跃的乐于去作种种实验了，什么罢工咧，暴动咧，都就是为了实验马克斯主义而发动的。

马克斯主义是空想的，当然不会因为有了暴动，罢工等的表演而就增大了现实性。暴动罢工等等一次一次的失败，早已证明了马克斯主义的没有现实性，等到法西斯蒂出现了，而且很快的成功了，这就好像萤火遇着炬烛，活跃的法西斯蒂的光辉把空想的马克斯主义打入地底下去了。

有了法西斯蒂，马克斯主义就连一点欺骗的作用都不能发生，法西斯蒂与马克斯主义自然就变成死敌了。并且罢工，暴动，这是绝对的斲丧国家民族的元气的举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断的发生暴动罢工的事情，自己先就贫弱不堪，不要等到外敌来侵袭，早已走上灭亡的死路了，法西斯蒂既绝对以拥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中心，这些妨害和破坏国家民族利益的暴动和罢工，当然要被法西斯蒂加以极端的排斥和打击。

在理论上，在事实上，法西斯蒂随时随地都要与一切空想的社会主义作对敌，尤其与马克斯主义共产主义不能并存。胡汉民先生不肯了解法西斯蒂的真实的内容，看见法西斯蒂反对共产主义，就居然闭目狂呼：法西斯蒂『必须是绝对消灭社会主义的力量的』。胡先生是以三民主义装幌子的，当然应该把他自己的三民主义看作最道地最科学的社会主义，现在因为法西斯蒂反对了共产主义，就居然说法西斯蒂根本反对了社会主义。把三民主义的社会主义前途也几乎抹煞了，胡先生这样的认识和了结，真是何等浅薄无聊啊！

（丙）『必须是绝对厉行独裁专制的政制的』——政治上公然主张独裁专政的，一个是共产主义，还有一个便是法西斯蒂。普通称共产主义的独裁是极左的一派，法西斯蒂的独裁是极右的一派，其实独裁专政，无所谓极左，也无所谓极右，革命要表现

力量，运用组织，独裁专政就成了必然的现象。

一个组织要在社会上占得地位，发生力量，整个组织就必须在一个人的意志指挥之下活动，奋斗。若依着民主的方法，那末主张既不能确定，一切的活动也都以各自的个人为中心，那就要弄成一个人多手杂的状态，结果是一无所成，有利益，大家都是一个团体中的人，势必斤斤较量；但遇着牺牲的时候，大家又要互相推诿，取巧躲避，好像大家都只是团体中的一份子，谁都不能来督责谁的。孙中山先生努力革命，奔走了数十年，辛亥革命成功，满清是被推翻了。可是一些急功近利之流的党徒，不能再跟随孙中山现实继续革命牺牲，不肯再听领袖的话，一个一个的都自由行动，去投奔袁世凯投奔黎元洪，甚至去投奔曹锟吴佩孚等大大小小的军阀。孙中山先生受着这个万恶的民主的牵累，不少投机的党徒是由此走上了升官发财的道路，而整个的团体，整个的革命，却因此受累不浅，一次一次都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和打击。直到后来国民党实行了总理独裁制，并屡次清除了党内的自由主义份子及投机份子，革命基础才渐渐巩固起来，而得有十六年北伐的成绩。

党内民主，固然是一种浪费革命力量，使民众徒受牺牲的鬼话。但在国家政治方面，民主制度显然也是一种骗人的诳语。历来许多的所谓民主领袖，当初为要获得民众的拥护和同情，弄出许多漂亮的说辞和美妙的姿势四出鼓吹，把民主制度说得天花乱坠，可是等到自己一上台，就马上显出野心，抹煞民主，而以领袖自己为『主』了。在中国，则所谓民主更是可笑，选举的时候，连欺骗民众的演说也用不着，竟是直捷痛快的用金钱去收买了。民主可以用金钱收买，这种民主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民众都只能顾着自己的生活，对于政治，因被学识及生活条件所限，是很少兴趣的。不想一般政治骗子，他们为要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却又不好说自己要政权，于是硬抬出民主的幌子来，以民主做他的夺取政权前锋队。

胡先生对法西斯蒂的排斥议会政治，甚至排斥宪法，深致愤愤不平之气，好似法西斯蒂对议会，对宪法太不客气了。但胡先生如能想到每次选举均被投机者所利用，金钱能产生议会也能制造宪法，胡先生就可以平一平气了。法西斯蒂主张党内独裁，更主张党外也要独裁，自有其社会的及组织的原因，因为不独裁，革命的本身便不能发生力量，不能摧毁一切的反动敌人，不能稳固地实行建设，根本上就谈不到什么革命不革命了。独裁为了革命，独裁是不会有罪的啊！

（丁）『必须是绝对实现其狭隘的国家观念的』——法西斯蒂主张国家至上主义，主张民族至上主义，这只是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我们并不觉得其中存有丝毫的狭隘观念。绝对的排他的国家主义的提倡，主要的原因有二：

第一，对内因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的狂放，民众都只有个人观念，只知道图谋个人的利益；国家观念都极淡薄，甚至已完全消失，好似国家的兴衰存亡，与国民是完全没有关系。国民忽略了国家的价值，不肯为国家效力，国家便一定要颓废萎败下去，于是内乱外患相继丛生了。法西斯蒂革命的出现，大都是在国家最混乱最衰弱的时代，法西斯蒂要想打起拯救祖国的精神，平内乱而抗外患，首先便要恢复国家的机能，使全体民众受着中央政府的操纵指挥，于是国家才会强大有力，民族也就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了。但这里我们如不提出强力的国家至上主义的主张，颓废因循的民众是刺激不起爱国的观念来的。民众不爱国，民众不紧紧的拥护在中央的周围，

国家的机能显然就振发不起的啊。

第二，对外因为世界各国都虎视眈眈的致力于向外侵略，凡不能侵略的国家，就势必要受外国的侵略。为防止外来的侵略起见，一种排他性的国家主义行动是事实上所不能免的。譬如德意志和意大利，他们在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捣乱下，民气已颓废不堪，墨索里尼希特勒如不提出国家至上主义的口号，民众不一致起来为祖国效力，意德两国的法西斯蒂怎样也不能够起来抵抗各强国的压迫和侵略。又如中国那样，整个的国家是压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蚕食鲸吞，瓜分共管，领土主权是一天一天是在缩小，灭亡之祸是随时可以出现的。可是国家危急到如此地步，国民有没有丝毫爱国的念头呢？最大多数的无智识的农民只希望赶快有『真命天子』出来，从来就想不到国家那回事。奸商买办则惟利是图，甘为洋奴，不惜亡国。一部分工人和无业流氓，听着一般骗客的煽动，他们不认中国是祖国，而认苏俄是祖国，为了要拥护苏俄，恨不得马上破坏中国。居着领袖地位的那些党国名流，军人，政客，说起来更痛心，为了争个人的权利，可以任何牺牲都不吝惜，内战起来动不动要耗费几百万几千万的饷糈，死伤几十万几百万的生命，内力不足，还不惜引狼入室，利用外力来摧残本国。中国处在这种帝国主义的加紧环攻和民族国家观念薄弱的环境中，请问离了国家至上主义的主张，再用什么方法来加强国家的机能，又怎样可以有力量去反抗帝国主义呢？在口头上，共产党社民党以及一般洋奴汉奸都不妨打起反帝的漂亮口号，然而讲到实力的反帝，我们相信离了国家至上主义是没有办法的啊。

胡先生不相信要集中全体国民的力量才能够反抗帝国主义，不相信实行国家至上主义后才能集中全体国民的力量，就只是装着那种假清高的态度，尽量诽笑谩骂所谓『狭隘的国家观念』，把法西斯蒂说得比军国主义帝国主义还不如。但不知道胡先生的『宽大』的国家观念，究将宽大到如何程度？我们相信胡先生总不至于主张把破碎的中国直捷爽快地送给帝国主义吧？国家的组织，在相当范围内便免不了有排他性，免不了有狭隘观念的表演，胡先生不想接近事实，不想切实反帝，胡先生自不妨清高，不妨不负责任的尽量发挥空谈啊！

五，中国的前途——法西斯蒂

资本主义的崩溃，民主政治的没落，共产主义的碰壁，法西斯蒂的抬头，已成了世界的潮流，在这狂暴的潮流下面，各国都将先先后后的趋向于法西斯蒂，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的。不过中国的出现法西斯蒂的统治，当然不会是出于被动的世界潮流的模仿，也不会是出于少数人的好奇心，而自有其内在的原因。中国本身所存在的法西斯蒂原因，形成法西斯蒂统治的客观条件，分析起来，可以得到下列的主要各点：

第一，经济上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的束缚，资本主义不能成功，共产主义也不能实现，民众左奔右突而得不到出路，便不得不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以外另求生活的大道，于是经济的国家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都将很自然地被中国民众所欢迎了。

第二，政治上因为文化水平的低下，民众既对政治不生兴趣，并且也没有干涉政治的智识和能力，与其施行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政治，任令少数官僚政客投机取巧，朝秦暮楚，还不如由一个革命的政党和负责的领袖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

第三，国民党的统治已实现了六七年，但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很少显著的进步，

当然六七年的统治不能算过长，政策上的遭受打击也许是不能免的，但国民党的遭受打击并不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阻力，主要的还是由于党的本身组织的落后。客观的阻力是可以希望党的长期努力来应付，但如党的本身落后了，若不从组织上加以严密的整理，事实上就很少有挽救的希望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理论，经济上不承认资本主义，也不承认共产主义，政治上主张由军政到训政，训政以后才开始宪政，这种主义，这种理论，当然是完全正确，完全适合于中国的。但在组织上，十五年一月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改总理制为委员制，当时本为迁就环境，实在这种组织方式是很不适合于国民党的主义的，党外要专政，党内却要民主，这是一个何等可笑的矛盾。难道革命是打劫，向外抢到了财物，向内却要平均分赃吗？——这一个组织上的矛盾，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主义牵累得实在很不小，国民党如不采用这种党内民主制，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早就有相当的实现了，何至弄到现在的半死不活呢。

我们看了上述的三个原因，我们就知到中国一定要走法西斯蒂的路，中国才有办法，国民党一定要实行法西斯蒂化，国民党才能够完成他自己的使命！

不过，我们是那样的认识了，但胡先生怎样说呢？我们先看他在『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中说了的话，而在『论所谓法西斯蒂』论文中又重行得意地提出的一段吧：

『最严重的，是专断独裁的军阀，——个人主义的寡头政治之抬头者。篡夺中国国民党党权之不足，还想运用其「偷天换日」之故技，去三民主义而代之以所谓法西斯蒂主义，无论是所谓「蓝衣社」或所谓「救亡社」，其扩展，虽然充类至尽，只能做到流氓式的侦探或暗杀为止，然而这一个反革命势力之孕育，无疑的是微示着三民主义前途的又一劫运。』

想不到胡先生以这垂暮的老人，却还像没有嫁得汉子的泼妇，火气竟那样的重。胡先生的谩骂和随意发泄无稽的谰言，这里真可谓尽了狂妄的泼妇的能事。胡先生的意思，好像中国国民党是天经地义的是属于胡先生个人的，胡先生在南京中央长立法院，胡先生是笑颜逐开的，但胡先生一离开南京，胡先生便要愤愤然狂跳着喊『篡夺中国国民党党权之不足』了。其实党权的问题很容易解答，孙中山先生没有写遗嘱把党权交给谁，也没有一定的『承认』党权的俗例，谁能负担孙中山先生所遗留下来的使命，谁有肩起中国革命的道德和能力，谁就可以掌执国民党的党权，谁就可以掌执中国的政权，什么『篡夺』不『篡夺』，这都是封建的依老卖老的鬼话。中国的混乱，国民党的涣散，法西斯蒂精神的运用正成了唯一的救星，然而胡先生却是那样的顽固，至死不悟的喊着法西斯蒂『势力的孕育，无疑的是微示着三民主义前途的又一劫运』啊！

接着胡先生说：

『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绝对不能与法西斯蒂的反动运动并存。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要摧毁法西斯蒂的国家至上主义，它的要求，是国家为民族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民族为国家某一时一人的畸形权力发展而牺牲；它要求全民族的共存，而不是残酷的帝国主义之发展。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要摧毁法西斯蒂的独裁专断主义，它要求全民的共治，——社会人人为社会去服务，去管理众人之事，而不是讴歌着所谓特出的贤明的独裁者。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要摧毁法西斯蒂的资本主义的统制主义，它要求社会的生存，与全民的共享，而不是要去巩固剥削者的壁垒，使被剥削者转辗

呻吟，莫由反侧，因此三民主义的革命者，便是法西斯蒂的毁灭者，一切三民主义的信徒，必须抱着坚决的信念，不与法西斯蒂共存亡。』

三民主义不能与法西斯蒂『共存亡』，胡先生的见地未免太固执，太短浅了。我们试依着胡先生所提出的三点，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对于法西斯蒂的矛盾，先分别加以简略的答覆：

『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要摧毁法西斯蒂的国家至上主义，它的要求，是国家为民族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民族为国家某一时一人的畸形权力发展而牺牲；它要求全民族共存，而不是残酷的帝国主义之发展。』——民族与国家，本是两个不可分离的名词，两者是时时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的。在组织上在机能上讲，国家比民族尤为重要，国家是一切社会进化社会秩序的总枢纽。国家亡了，无论怎样的优秀民族，就使进步到犹太人那样，终是要做随处受人欺侮受人压迫的亡国奴。所以一个民族到了没有国家的时候，这个民族将成为怎样的民族，就是三岁的小孩子也可以知道的。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提出，目的正是在于反抗帝国主义，加强国家的力量，恢复民族的光荣。如果民族的意义不是加强国家力量的，那末反帝请问用什么去反呢？难道在野政客的高调和无组织的民众的乱动就可以打退帝国主义吗？所以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正是和法西斯蒂的国家至上主义是相互为用的，两者绝不会发生互相摧毁的矛盾，顽固的胡先生以为民族主义要摧毁国家至上主义，这是第一个白日见鬼！

『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要摧毁法西斯蒂的专断独裁主义，它要求全民的共治，——社会人人为社会去服务，去管理众人之事，而不是讴歌着所谓特出的贤明的独裁者。』——专政独裁，这在社会的组织的活动运用上本自有其一定的基础和需要，现代实行专政独裁的国家，前有苏俄，后有意德，而中国则也居然虚有其表的揭起了国民党专政的旗帜。俄意德实行专政独裁，都已得到了成功了，中国的专政因为有名无实，结果毫无成绩。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国民党实行专政的失败，就根本否认了专政的价值。一党专政与领袖独裁，在理论上在事实上都有充分的根据，坚强的基础，但这里为了节省篇幅，就只略提一点民权主义中的独裁专政的原则吧。孙中山先生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曾不厌烦琐的解释着『权』与『能』的分别，并且举出乘车坐船诸葛亮与阿斗等等的例子。照孙中山先生的话，那末除非民众不信任那个『特出的贤明的』有『能』的人则已，如果信任了而且选举了，那这个『特出的贤明的』有『能』的人老实就应该像舵手车手一样负起责任来独断独行不顾一切牺牲，实行独裁。否则像舵手车手那样动不动就受着乘客们三心两意的牵制，不单要『老大多，打翻船，』整个的国家也会因此灭亡呢？并且孙中山先生这种所谓『权』『能』分明的民权主义，还是要到宪政时期才开始实行的，在军政时期和训政时期，则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民众连『信任』不『信任』的权限都没有，那当然是十足道地的专政独裁制度了。胡汉民先生和一些民主的先生闹昏了头，只想杜撰些名词理论来诬陷私敌，却连三民主义中的极普通而且极重要的基本常识都忘记了。有官做独裁也好，专政也好，一旦无官，便惶惶如丧家之犬，狂吠不休！在理论上，国民党不成问题的是应该实行专政独裁，在事实上，国民党从来也是实行专政独裁。（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党内行民主制，独裁基础不幸已动摇了。）国民党的专政独裁，正适合于法西斯蒂的精神，已毫无疑义，胡先生却戴着墨镜骂青天，说民权主义要摧毁专政独裁主义，这是第二个白日见鬼！

『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要毁摧法西斯蒂的资本主义的统制主义，它要求社会的生存，与全民的共享，而不是要去巩固剥削者的壁垒，使被剥削者转辗呻吟，莫由反侧！』——自由独占的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利息的剥削和恐慌的出现，常常使中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遭受莫大的经济的打击。巨大债务的拖累，中小资产阶级的人们固不能有翻身出头之日；而经济恐慌的出现，银行，商店，工厂的倒闭停歇，更使整千整万的失业的无产阶级断炊绝食。在这经济的大混乱时代，法西斯蒂主张以国家资本主义来代替自由资本主义，以统制经济来代替无组织的经济，当然是一种最合理的方法。国家资本主义实现，不合理的私人独占的事情没有了；统制经济实现，生产与市场的平衡可以有调整的机会，每次恐慌的出现可以有所预防，而不致坐视着束手无策。法西斯蒂的经济实现了，剥削者既已受着限制，被剥削者也自然不致『辗转呻吟，莫由反侧』了，孙中山先生在讲演民生主义的时候，不承认资本主义，也不承认共产主义，而以『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为实现民生主义的两大纲领，这显然是和法西斯蒂的经济方针暗相符合。经过六七年来国民党统治中国的经验，实使我们感觉到民生主义的实施，尤须有法西斯蒂的精神。因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阻碍太多了，封建势力，资本主义的势力，以及帝国主义的势力，随处都可以打击民生主义的经济，国民党如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坚毅的独裁手段，仅凭那种懦弱平庸的态度，『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实行简直是不可能的。胡先生不检查理论，也不观察事实，就只是那样顽固地机械地喊着民生主义要摧毁经济的统制主义，这又是第三个白日见鬼！

比蛇还固执的胡先生，什么理论什么事实都无暇顾及，尽只是空口胡说，白日见鬼，就难怪胡先生要得出一个荒谬绝伦的结论，如醉如狂的大喊：『因此三民主义的革命者，便是法西斯蒂的毁灭者，一切三民主义的信徒，必须抱着坚决的信念，不与法西斯蒂共存亡。』

唐诘诃德的胡先生，他是很勇敢的，同时也是很坚信他自己的。所以当大多数的真实的三民主义的信徒都或明或暗的接受了法西斯蒂的精神的今日，胡先生还能在『妙高台』得意着，抱膝长吟：

『一切三民主义的信徒……不与法西斯蒂共存亡。』

胡先生于痛骂法西斯蒂，曲解三民主义，曲解中国的现实社会以后，心犹未足，又还于最后更加以一番反面的攻击。根据着所谓『一个远道的朋友，——其实也许不是什么『朋友』，而只是胡先生足下的一类捏造消息轻事重报以邀赏的暗探谍报——抄给我所谓中国法西斯蒂的章则。』于是胡先生的牢骚又来了，什么『邯郸学步』，什么『书虎不成反类犬』，一一都发泄了出来。好似实行法西斯蒂的人都应该是了不得的西洋人，或者是后起之秀的东洋人，老大腐化懦弱的中国人，万万没有实行法西斯蒂的能力。依胡先生的观点，中国那些『做着法西斯蒂的迷梦者』，决乎『建立不起法西斯蒂的组织来』，大不了是『邯郸学步』，大不了是『书虎不成反类犬』而已。

胡先生这些琐琐碎碎的对人不对事的说话，显然只是在发泄个人的牢骚，报复个人的仇恨，已失了论证的价值。中国能不能出现法西斯蒂的组织，完成法西斯蒂的革命，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事的问题，一个既成领袖的反对法西斯蒂或拥护法西斯蒂，都于法西斯蒂的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历史的条件——主观的与客观的——具备了，

中国的法西斯蒂迟早有成功的一天。工农在困苦的生活中，青年在烦闷的环境中，新的『时世』将造成新的『英雄』，新的『英雄』也将造成更新的『世界』，我们固不敢奢求既成领袖的助力，但像胡先生那样的狂发谰言，恣意曲解，却也不能强事缄默啊。

民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马丁·克尔

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们可以说，与民族意见一致的人。他或她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世界观是正式意义上的民族社会主义。也有欣赏欧洲历史上 NS 时期的，虽然可能对民族没有全面的思想认识社会主义。他们可能被描述为同情民族社会主义，即使他们对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理论知识是不完整的。但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从深刻的意义上来说，意味着过一种非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抽象地认同非传统的思想，或者赞美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从远处看社会主义。赫尔曼·戈林曾经指出，一个人不会仅仅因为智力上的认可而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人生来就是民族社会主义者。NS 哲学家 Savitri Devi 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一个人不会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者。一个人迟早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从本质上来说，他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人。**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标签；不是一个人可以根据情况接受或拒绝的“观点”，而是一种信仰，涉及一个人的整个生命，身体和心理，精神和精神：“不是一种新的选举口号，而是一种对世界的新概念”——一种生活方式——正如我们的元首自己所说。”

因此，如果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者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信仰，它应该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有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科林·乔丹写道，如果一个人真的完全是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那么他就是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我们应该指出的第一件事是，**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有一个积极的，“能做”的心态。他关注的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本身或阻碍解决问题的障碍。**

正如阿道夫·希特勒所写：**“障碍的存在是为了被打破，而不是被屈服。”**

林肯·罗克韦尔说过：**“生活是奋斗，而拥有幸福和成功生活的秘诀是，享受奋斗。”**

这是 NS 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我们欢迎奋斗，不是作为一种必要的邪恶，而是作为一个伟大的礼物和机会，让我们在精神上，身体上和精神上加强自己。再次引用希特勒的话：**“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变得伟大，只有在永恒的和平中才会灭亡。”**上世纪 30 年代德美邦联的领袖弗里茨·库恩(Fritz Kuhn)说过，“我们必须欢迎每一场战斗!”

完全接受斗争伦理有两个必然结果。第一个是民族社会主义者热情地过着积极的生活。无聊的抱怨不是民族社会主义者的作风，也不是无所事事地看电视或日复一日地摆弄电子设备的人。相反，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走出去，投身于现实世界。这可能采取参加公共活动来建立运动的形式，也可能只是去森林远足。

元首引用了一句古老的雅利安格言，指出“一直休息的人会生锈。”

你乘自动扶梯还是楼梯？墨索里尼说，“法西斯蔑视简单的物质生活。“领袖[Duce]不是民族社会主义者，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话符合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生活方式。

拥抱积极生活的第二个必然结果是，一个人接受一种英勇无畏的生存和死亡态度。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知道世界上有危险和艰难，有痛苦，有一天我们都会死。民族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因为这样的认识而变得沮丧，或者以懦弱的方式从世界上退缩，而是

以快乐的坚韧迎接生活。他在精神上、身体上和精神上与可能遇到的困难作斗争，以坚定的决心勇敢地战胜它们。

这位民族社会主义者决心带着胜利的呼声死去，而不是像一只被打败的狗一样畏缩和呜咽着死去。

每个民族社会主义者都接受党卫军的格言：“了解生活的规律，并据此生活”作为他或她的个人座右铭。因此，锻炼、健康饮食和滋养精神是 NS 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正如懒惰是不符合民族社会主义的，由加工食品、无营养(甚至有害)的零食组成的饮食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是用某种形式的酒精或含糖软饮料吞下的。相反，民族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包括大量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或许尽可能少吃肉，以及大量的水和阳光。雅利安音乐和艺术滋养他的灵魂。同样，民族社会主义者避免被非雅利安流行文化的堕落副产品所污染。其中包括侮辱白人历史、宣扬种族融合、贬低妇女或美化犯罪的电影，以及冒犯雅利安精神的所谓“音乐”。同样，民族社会主义者不会用毒品和麻醉剂污染他的身体和削弱他的精神。不久前还有人声称他最喜欢的音乐是“民族社会主义说唱”

让我们一劳永逸地搞清楚这一点:没有“民族的”“社会主义说唱”,也没有“NS 嘻哈”或“雅利安爵士乐”。“我们并不坚持要求 14 岁的雅利安女孩放弃愚蠢的爱情歌曲，只听德国空军的突击进行曲或德国歌剧——只是要求所有年龄段的雅利安人用他们种族灵魂所产生的、符合他们种族灵魂的音乐形式来滋养他们的精神。民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尽可能面向家庭。正如他认为他的种族是他家庭的巨大延伸，他也认为他的家庭是他种族的缩影。民族社会主义者以尊重、尊严和关爱对待他种族的妇女和儿童。他对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护和支持，而不是敌视和攻击。

可悲的是，许多生活在非 NS 家庭的青少年民族社会主义者因为试图让他们的父母皈依希特勒而疏远了他们的家庭周日晚餐的世界观。**民族社会主义者和非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家庭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但民族社会主义者有责任不让这些紧张关系分裂家庭。省点力气把好消息传播给你家庭以外的人吧。如果被问到，解释你的信仰，但不要把它们强加给家庭成员。**民族社会主义者尽可能多地呆在户外。他们花园，去漫步在树林中，享受大自然的壮丽。他们觉得自己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他们偶尔造访的异国环境。民族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包括热爱动物，善待动物。对于雅利安人的精神来说，没有什么比闪米特人残忍地屠杀动物作为食物更奇怪的了。

一个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以礼貌的方式与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非雅利安人交往，以至于他们同样对待他。我们对其他民族的任何敌意都不是个人的，也不应该发泄在我们可能遇到的随机的非白人身上。将民族社会主义者描述为粗鲁、刻薄或侮辱普通的非白人，他们没有做任何冒犯的事情，这完全不符合犹太人的剧本。**不管我们的敌人怎么说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不是一个无脑的暴徒。**

在今天的世界里，过一种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并不总是容易的。当然，我们的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种族粪坑。在 20 世纪的前几十年 19 世纪，阿道夫·希特勒发现自己的处境与我们今天住在维也纳时遇到的情况相似。还是一个少年或年轻人时，他就面临着各方面的堕落。他的朋友奥古斯特·库比席克报道了年轻的希特勒如何应对有了它：“在那个腐败的城市中，我的朋友用不可动摇的原则包围了自己，这使他能

够建立起内心的自由，尽管他周围充满了危险。正如他常说的，他害怕感染。现在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不仅仅是性病感染，而是一种更普遍的感染，也就是说，有被卷入当时的环境并最终被拖入腐败漩涡的危险。不足为奇的是，没有人理解他，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怪人，那些与他接触过的少数人说他放肆和傲慢。但是他走了自己的路，没有被周围发生的事情所触动……”

听起来熟悉吗？归根结底，民族社会主义者必须过民族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不这样做意味着对他或她或是谁是虚假的。因此，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事实上，甚至是危险的时候——他也按照他的内在来过他的外在生活。然而，无论代价如何，他都有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巨大回报。即使在种族衰退和社会衰落的情况下，他也生活在新秩序中。

民族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希特勒是一个精神载体，一个半神；甚至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神话。……墨索里尼只是一个人。”——卡尔·荣格

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之间的轴心国联系（意大利宣传可笑地声称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人们普遍误以为纳粹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分支，或是一种特殊的法西斯主义，而事实上纳粹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唯一关系是，两者都是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二分法的反制，这解释了他们之间的政治联盟。值得注意的是，反犹太复国主义最初并不是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只是在纳粹德国崛起后才加入的，主要是为了巩固联盟。还应该注意的是，二战结束时，纳粹党的许多成员对巴勒斯坦民族阵线怀有强烈的怨恨，认为巴勒斯坦民族阵线是导致纳粹败于犹太复国主义盟军之手的原因之一。

“根源在于对法西斯主义的过高评价。希特勒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有令人失望的经历视而不见，至少在 1943 年之前，他似乎确信墨索里尼的意志已经改变了意大利人民，将他们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

尽管如此，二战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进一步推动了这种混同**（将民族社会主义者抹黑为“法西斯主义者”，而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以便将民族社会主义规范为一个更容易被自由主义者和其他小政府倡导者驳斥的普通法西斯主义稻草人。如今，法西斯主义倾向阵营和自由主义倾向阵营之间形成了新的敌对二分法，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民族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与这场辩论截然不同，在意识形态上远远高于这场辩论。

权力意志 VS 自由意志

“法西斯主义本身并不是民族社会主义，这与许多反对这两种主义的人的想法相反。它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制度；而不是一种超越政治的信条；它激发了一场具有实际意义和直接意义的运动，而不是一场宇宙范围的运动。”——萨维特丽·德维

法西斯主义指的是公然利用国家主义控制经济、媒体和其他国家机构，以团结和激励社会的独裁统治。古罗马的束棒是法西斯主义的象征，它颂扬了团结就是力量的原则，也就是说，一捆棒子比一根棒子更难折断。事实上，可以有力地论证，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例子不应该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而是古罗马本身，正如鲁道夫·赫斯所暗示的那样：“在困难时期，罗马人把全部权力交给了一位年轻能干的领导人——罗马人

知道如何治理国家！他们知道“人类创造历史”。”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是现代世界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复兴了这一罗马象征，迅速将墨索里尼时代之前严重分裂的社会团结起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墨索里尼并不从根本上反对民主，正如他自己所说：“法西斯主义是通向民主道路的独裁统治。”朝鲜的主体思想（意为“整体主义”）制度是当今法西斯制度实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它并没有自称是法西斯主义者。然而，法西斯主义者（尤其是那些自称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从定义上来说应该本质上是罗马人的观点。

因此，与反法西斯主义/主流媒体的标签相反，种族主义极右翼团体不是在社会上创造统一，而是在种族或宗教方面造成分裂，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而是完全相反。他们将棍子分成许多小捆，然后用一个子捆敲打另一个子捆，直到几乎所有的棍子都被打断。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法西斯（与他们自己用来描述自己的形容词“fashy”保持一致），他们与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对立就像新纳粹分子与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对立一样。没有一个极右翼分子会说墨索里尼说过的话：“没有什么能让我相信今天可以证明存在生物学上纯洁的种族……民族自豪感不需要种族的狂热。”墨索里尼的观点与罗马人的观点相呼应，而极右翼的观点并非源自罗马文明，而是源自西方文明，因此，极右翼分子根据种族主义者/仇视伊斯兰教者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和卡斯蒂利亚国王伊莎贝拉一世的徽章称自己为长枪党分子更为准确。（长枪党主义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犹太人）统治下西班牙的意识形态。在与公开支持犹太人的佛朗哥第一次会面后，希特勒告诉墨索里尼，他宁愿花同样的时间让牙医拔牙，也不愿再见到佛朗哥。）墨索里尼根本不仇视伊斯兰教：穆斯林不仅被允许加入 PNF，而且他特别创建了 AML（穆斯林 Lictor 协会）以鼓励他们这样做。因此，我们支持真正的（即非种族主义、非仇视伊斯兰教的）法西斯主义者为从法西斯手中夺回法西斯旗（统一的象征）所做的一切努力，**就像我们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从新纳粹分子手中夺回纳粹十字记号（贵族的象征）一样。**至于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应该记住的一件事是，真正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是丘吉尔，一个亲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者。

罗马人不是种族主义者，因此法西斯主义者也不应该是种族主义者。

巴勒斯坦民族阵线当然不是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以服兵役换取公民权是古罗马的一项政策，最早由奥古斯都实施，墨索里尼只是照搬了这项政策。

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不喜欢这个观点的人应该称自己为长枪党分子，而不是“法西斯分子”。

我们同意！

另一方面，说民族社会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就等于说素食主义是一种烹饪风格；这种说法在技术上并没有错，但在思想上具有煽动性，因为它把重点放在了结果而不是原因上。理解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的关键区别的最简单方法是检查它们言论的本质：

法西斯主义：**如果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将有能力实现我们想要的任何目标。（“当别人书写历史时，我们却袖手旁观，这真是令人羞辱。谁赢了并不重要。要使一个民族伟大，就必须派他们去战斗，即使你必须踢他们的裤子。这就是我要做的。”** – 贝尼托·墨索里尼）

民族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共同努力。（“他们被一种使命感所鼓舞，我们不妨给他们一点鼓励。”**——阿道夫·希特勒）

法西斯主义并不首先明确目标。相反，它承诺个人参与的回报——以国家权力的形式实现任意目标。墨索里尼最著名的口号是：“一切在国家之内，无外乎国家，无反对国家的行为”，它通过对国家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来衡量其他一切事物的价值，但没有提供固定的目标来衡量国家本身的价值。换句话说，权力本身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动机，因此，法西斯国家的成就永远只是向自己或他人展示权力的浮夸之举。另一方面，民族社会主义坚持认为，权力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结束剥削——这一目标从一开始就明确，此后成为其他一切事物的焦点。比如，法西斯分子认为政治，尤其是战争，是塑造性格的最好方法之一，因此很高兴参与其中，仅仅为了获得经验价值；而民族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这些都是令人厌恶的负担，因此纯粹是出于责任感，纯粹是为了打败敌人而参与其中，用希特勒的话来说：“我是一个违背自己意愿的战争领袖。如果我把我的思想运用到军事问题上，那是因为目前我知道没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民族社会主义不是通过荣耀而是通过责任来激励个人参与。民族社会主义看重的不是精通，而是高尚。我们的效果可能是通过团结而产生力量，但我们的事业是通过高尚而实现团结。

卍字符是心脏；武器仅仅是工具。

即便没有人（包括其领导人）真正知道或关心一个国家存在的目的，只要其领导人能够保持国家的强大，法西斯主义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民族社会主义则不同，因为忠诚于目的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实践中，法西斯分子只不过是国家主义的荣耀追逐者，而民族社会主义者则是真正的意识形态战士。虽然有些法西斯分子错误地称自己为民族社会主义者，通常是因为从法西斯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秩序和效率印象深刻（正如希特勒所描述的：“新帝国只有一支军队、一个党卫队、一个政府，这一事实将产生非凡的权力效果。”），但事实并非如此。把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称为法西斯分子是一种侮辱，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以力量为目标，而不仅仅是工具。

“‘在时间中’的人要么根本没有意识形态，也不假装有意识形态，要么假装信奉一种‘超越时间’或‘反对时间’的信仰，并利用后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所有以上帝的名义为自己而战的假基督徒，以及所有假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在纳粹党旗下的斗争只是一种夺取权力的手段）。”——萨维特丽·德维

部分混淆的产生是因为旁观者看到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社会主义者都批评“唯物主义”，却没有意识到每个阵营对这个词的使用方式不同。法西斯主义者（很像正统犹太人）所说的“唯物主义”仅仅是指消费品，过度消费会分散个人对权力动机的注意力。民族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唯物主义”不仅指消费品，还指法西斯主义者（很像犹太人）崇拜的权力动机本身！在我们眼中，为了国家权力而放弃消费品的法西斯主义者与消费主义者相比，一点也不缺乏物质主义，只是更注重集体主义。

尽管法西斯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劣势，但由于其专制政府形式的优势，法西斯国家有可能迅速发展成为更有意义的国家，例如当宗教能够提供外部目的，并且国家足够重视宗教以追求它（例如莱昂·德格勒尔的基督王权概念导致了王权主义实验，旨

在成为比利时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当其领导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变为民族社会主义时。考虑到这一点，即使我们不同意当前法西斯领导层的政治观点，我们通常也应该在任何国家都更喜欢法西斯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因为它至少将问题简化为赢得领导人而不是群众对我们意识形态的支持。

“只有在罗马帝国，人们才能说文化是政府的一个因素。”——阿道夫·希特勒

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我们应该对与真正的法西斯结盟持开放态度，以实现共同的实际目标（例如反犹太复国主义（“想想看，罗马人竟敢没收犹太人拥有的最神圣的东西，他们寺庙里堆积如山的黄金！” - 阿道夫·希特勒）），前提是法西斯领导层具有理性和受人尊敬的个性。另一方面，民族社会主义者必须警惕自己堕落为法西斯主义者，因为权力和宏伟的腐蚀诱惑不容小觑。这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未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作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预计犹太复国主义特工将竭尽全力渗透到亲独裁运动中，尽可能地提倡法西斯主义战胜民族社会主义、长枪党主义战胜法西斯主义，并在他们所谓“法西斯主义”但实际上是长枪党主义的旗帜下混淆两者的区别，从而控制这些运动并通过它们实现犹太复国主义议程。

超人 vs 敌人毁灭者

“对享乐和所谓‘荣耀’的渴望……是野蛮人的标志。”——大卫·迈亚特

亚瑟·叔本华 vs 弗里德里希·尼采

尼采和希特勒之间所谓的意识形态联系仅仅基于 1933 年希特勒在尼采档案馆的一张误导性照片。他并非主动前往档案馆，而是在伊丽莎白·福斯特（纳粹党的一位捐助者）的坚持下前往的。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受到尼采的任何启发；相反，在与汉斯·舍姆等人的私人谈话中，他谴责了图勒学会成员（通常是对神秘学研究感兴趣的人），他们试图暗示民族社会主义的起源是尼采。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说：“我已经明确并一再禁止这种事！所有关于“事物”场所、夏至节、尘世之蛇的废话，以及他们从德国史前史中挖出的所有其他垃圾！然后，他们和十五岁的男孩们一起读尼采的作品，用难以理解的引语描绘超人，并告诫男孩们：“那就是你——或者那就是你将要成为的人。”事实上，希特勒的主要哲学影响无疑是叔本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名士兵独自学习过叔本华的书，后来又在自称叔本华弟子的迪特里希·埃卡特的指导下学习。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回忆起他们私人学习小组的那些日子：“偶尔，当我早上去看他时，他会在楼梯上遇见我，并当场给我读他最新的作品。……或者，埃卡特可能正好在他喜爱的叔本华的作品中看到了另一个美丽的段落，他会坚持当场读给我听。”希特勒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瓦格纳（他本人是叔本华的弟子，这绝非偶然），他甚至说过：“谁想了解民族社会主义，就必须首先了解瓦格纳。”相反，尼采对瓦格纳和叔本华都持负面看法（“有人试图将瓦格纳和叔本华视为精神疾病的类型，这是不值得的：如果人们能更科学地精确地描述他们所代表的颓废类型，那么我们将获得无可比拟的更重要的洞察力。” - 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也对旧约持积极看法。因此，民族社会主义不可能是尼采式的。如果说有什么政治意识形态，那就是法西斯主义，才是尼采式的。

从内部来看，法西斯主义与超人的概念高度兼容，法西斯分子除了政治观点之外，对这一理念的吸引力也很常见。相比之下（尽管犹太复国主义学术界声称如此），始终

将自己与雅利安神话联系在一起的民族社会主义与古老的敌人毁灭者（阿罗汉）概念更加兼容。两者的区别在于，超人是进步到未来状态（字面意思是通过“超越” “人”的状态），使其成为一种超人类主义的精神形式，而敌人毁灭者是回归原始状态（字面意思是通过“摧毁”破坏这种状态的“敌人”）。因此，前者基于一种非雅利安人不断增长的精神，而后者基于雅利安人原始高贵的精神。

“名誉是必须赢得的东西；荣誉，只是不能失去的东西。”——亚瑟·叔本华

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人类的主要二分法是主人和奴隶，他们希望成为主人。相反，民族社会主义者认为主人和奴隶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野蛮人。民族社会主义者看到了另一种人类二分法：野蛮人和骑士，我们希望成为骑士——所有被压迫者的捍卫者，所有压迫者的祸害。野蛮人是精神上的奴隶，无论他变得多么强大，因为他缺乏高贵品质。只有骑士才是真正自由的。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我立即尝试吸收整部作品，但其中有些东西让我感到陌生。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过于悲哀，甚至戏剧化的元素，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任性的，而不是完美的。” – 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

帕里斯的评判

“组织只是必要之恶。充其量，它只是达到某些目的的一种手段。最糟糕的情况是，它本身就成为了目的。”——阿道夫·希特勒

原型中的右、真左和假左

在神话中，女神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争夺帕里斯对至高无上美貌的裁决，最终阿佛洛狄忒获得了他的裁决。这里的关键不是帕里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作为政治革命者，我们已经知道阿佛洛狄忒——她代表着纯粹私人性的满足——是错误的选择。三方竞争的目的是警告我们有两个错误的选择。

“它就在这里，一目了然，甚至在一个人的名字里。荣格说，德语中的“弗洛伊德”是快乐的意思。弗洛伊德的理论正是以性快乐为中心。 “阿德勒”在德语中是猛禽的意思，他的心理学学说以权力本能为基础。“荣格”代表青春，这位伟大的医生将重生置于他的教学中心，站在永葆青春的船头。他家里的一块牌匾上写着：“我们年轻，我们象征着永葆青春。”他知道这一点。——米格尔·塞拉诺

我们怀疑，那些将法西斯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的人恰恰就是那些不理解赫拉（她会让巴黎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王国的统治者）和雅典娜（她会让巴黎在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礼物之间的区别的人。通常的解释会让我们推断，军事统治地位的保证被政治统治地位的保证所取代，但这假设一个国家的士兵是为了国家的生存而存在的。只有理解一个国家除非为超越性的目的而战，否则它就没有生存的理由，雅典娜的礼物才有意义。

显然，赫拉的天赋和雅典娜的天赋会吸引不同类型的人。我们预计这种分裂与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裂非常相似。顺便说一句，阿瑞斯和赫菲斯托斯（赫拉的儿子）在技能上与雅典娜重叠，但完全缺乏她的高尚品格，这与上面讨论的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的表面相似性直接相关，并希望进一步凸显混淆两者的巨大危险。

第二次选择的机会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如果我们再次犯错，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还要等多久才能得到第三次机会

民族社会主义和自然法则　马丁·克尔

“……一切事物都必须服务于生命本身。”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第一卷，第二章。**介绍阿道夫·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一个独特和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在现代所有各种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中，只有它是完全基于自然秩序的。只有民族社会主义是基于现实，而不是人类思想的幻想。民族社会主义者认为宇宙受自然法则支配，人类要想幸福和成功，必须首先承认这些法则的存在；其次，他必须发现它们是什么；第三，他必须按照它们生活。这是另一种说法，即宇宙是根据因果关系运行的它不是基于超自然的力量，也不是基于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精神建构和一厢情愿的想法，也不是基于神学家的宗教幻想。**

希特勒从他的公共生活生涯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924 年，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当人类试图反抗自然的铁一般的逻辑时，他就开始与他自己作为人的存在所依赖的原则进行斗争。所以他对抗自然的行为必然导致他自己的毁灭……这里我们遇到了反对意见[认为]“人类的角色是征服自然!”……但人类从未在任何方面征服过自然，至多抓住并试图揭开她那由永恒的谜语和秘密组成的巨大面纱的一角或另一角，事实上，他什么也没有发明，只是发现了一切，他并不主宰自然，而只是根据他对各种规律和秘密的了解，成为了那些缺乏这种知识的其他生物的主宰……(第一卷，第二章)。和其他地方:人类绝不能陷入相信自己已经成为大自然的主宰和主人的疯狂状态——这很容易被半吊子教育的自负所诱导——但必须理解自然法则的基本必要性，并认识到他的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些战斗和向上斗争的法则。然后他会感觉到，在一个宇宙中，行星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行星转，只有力量永远控制着弱点，迫使它成为顺从的仆人，否则就摧毁它，对人类来说不可能有特殊的法则。对他来说，这种终极智慧的永恒原则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可以试着抓住它们，但永远无法逃脱。

因此，民族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按照自然秩序有意识地组织人类社会。战后的丹麦民族社会主义者 PovlH.Riis-Knudsen 用一句话就这样定义了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是自然法则在人类事务中的应用。**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致地建立在人类平等的概念之上:多种族主义强调种族平等；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平等；政治平等上的民主；基督教关于精神平等。

但是，当阿道夫·希特勒观察生物世界时，他发现，始终存在的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更确切地说，他认为自然是按照结构和等级的原则运行的。人类的种族之间和种族内部都有结构和等级。他把种族之间的等级制度称为种族原则，把每个种族内部的等级制度称为人格原则。他在《我的奋斗》第二卷第四章中深入讨论了这一点。在 1928 年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用一句话给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下了自己的定义:所有的生命都包含在三个命题中:斗争是万物之父，美德存在于血统中，领袖是首要的和决定性的。**在这里，“血统”象征着种族的原则，“领导”象征着人格的原则。“斗争”是决定等级地位的机制。生活应该与自然秩序和谐相处的信念渗透了整个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从上到下。它不仅体现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中，而且体现在社会的**

各个方面，包括儿童养育、营养、林业、动物权利、医药和保健。保护环境是当务之急。的确，民族社会主义是最初的“绿色”运动！党卫队有一个流行的座右铭：“了解生活的规律，并据此生活。”另一句党卫军谚语指出了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精神层面：“神在自然秩序中显现，而不是在超自然的奇迹中。”科学界热情支持与自然秩序和谐相处的社会重建。植物学家恩斯特·莱曼就是一个例子，他将民族社会主义描述为“政治应用生物学”。1934 年，在进入 NS 时代仅一年后，他写道：我们认识到，将人类与自然、与整个生命分离，会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和民族的灭亡。只有通过将人类重新融入整个自然，我们的人民才能变得更加强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生物学任务的基本点。人类不再是思想的焦点，而是整个生命……这种与联系、与生命的整体、与自然本身、与我们出生的自然的斗争，是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深刻的意义和真正的本质。

毫无戒心或被误导的人很容易成为如今无处不在的恶意、谎言、抨击希特勒、反 NSDAP 的受害者。**试图讨论阿道夫·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深刻和赋予生命的特征，往往会偏离主题，陷入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事行动的荒谬和不明智的辩论中——好像这个主题比我们作为一个种族的生存更重要！**但是有一个人看透了反希特勒主义的瘴气，即使是在它最鼎盛的时候。民族社会主义哲学家**萨维特里·德维**认识到了阿道夫·希特勒成就的重要性，以及他的学说的独特价值——不仅对雅利安人，而且对全人类。在她的巨著《闪电和太阳》(1958 年)中，她写道：**在本质上，民族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超越了德国和我们的时代，而且超越了雅利安种族和人类本身以及任何时代；它最终表达了大自然赖以生存和创造的神秘而永恒的智慧：非个人的智慧原始森林的智慧，海洋深处的智慧，太空黑暗领域的智慧；阿道夫·希特勒的荣耀不仅在于回到了那种神圣的智慧……而且在于使它成为了世界范围的实际复兴政策的基础……**(《闪电与太阳》，标准版，219-220 页；第 128 页，皮尔斯版)我们生活在一个尽可能远离自然秩序的文明和社会中。这就是我们的种族生病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种族正在死亡。只有再次与自然法则和谐相处，我们才能恢复种族健康。只有一个运动能提供这种拯救，因此只有一条种族生存的道路，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

社会生物学视角根据动物是否生活在社会中，以及如果生活在社会中，它们的社会化程度，将动物世界分为三大类。生活在社会中的动物群居，其特点是

(1)等级制度，

(2)合作。

这三个类别是：

1. 非群的动物，要么作为个体过着孤独的生活，要么没有等级制度或合作而群居。大多数猫科动物(除了狮子)和猩猩都是作为个体生活的动物。成群的鱼、成群的鸟和汤普森瞪羚是群居动物，它们没有组织结构，成员之间也不合作——基本上它们是个体的集合。

2. 群居动物(本质上是蜜蜂、蚂蚁和它们的亲戚)生活在群体中，在这个群体中，个体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有集体存在。

3. 群居动物生活在被称为社会的群体中，其中有等级制度和合作。个人拥有权利，但这些权利通常从属于社会整体利益。大多数高等灵长类动物，包括除猩猩之外的所有类人猿，以及大多数犬科动物，都是群居动物。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不是蜜蜂(只

为集体而存在），也不是老虎(只为个体而存在)。在人类社会中，个人拥有权利，但这些权利必须与群体的整体福利相平衡。

群体和个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紧张，但在成功的社会中，这种紧张是可以控制的，因此双方都不会受到过度的伤害。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是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现代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国家，它处于共产主义的蜂巢般的、群居的集体主义(在这种集体主义中，个人的存在只是为了为国家服务，他没有任何权利)和反社会的自由意志主义的无根的、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在这种自由意志主义中，整体的利益服从于个人的欲望和突发奇想)之间的平衡中点。希特勒的格言“保护种族的义务先于个人自由的权利”体现了个人欲望和种族群体利益之间的平衡。(《我的奋斗》第 255 页)。**这一声明明确承认个人自由的权利，但这一权利从属于共同的种族利益。**“自然”这个词只有在有人执意如此看待时才会有问题。相反的是“人造的”。狼是犬科动物，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吉娃娃是人工选择的产物。**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是一个脱离自然的人造社会。**作为一个健康的种族，我们需要一个按照自然界构建的社会。理论与实践杰出的澳大利亚民族社会主义者 E.R.Cawthron 博士(荣誉学士)在 1980 年写道“仅仅笼统地谈论自然法则没有什么意义。”非常正确！让我们看看一个具体的自然法及其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具体应用。**在上述导言中，注意到阿道夫·希特勒承认不平等，而不是平等，是生命本质中的规范，而且就人类而言，这种不平等既表现在种族之间，也表现在每个种族内部。作为种族不平等定律的一个推论，希特勒也发现了一条关于“追求种族纯洁的冲动”的定律。**

他写道:人类无一例外地在自然的花园里漫步；他们认为他们几乎什么都知道，但除了少数例外，他们盲目地忽略了自然法则中最明显的原则之一: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物种内部隔离……每种动物只与同一物种的动物交配……只有不寻常的情况才能改变这一点……(第 284 页)**他进一步指出:因此，简而言之，所有种族杂交的结果总是……降低更高种族的等级。**(第 286 页)他举了一个例子: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它清楚地表明，雅利安人的血液与低等民族的血液的每一次混合，其结果都是有文化的民族的灭亡。到目前为止，北美的人口中最大的部分是日耳曼人，他们与较低肤色的人混合很少，显示了与中南美洲不同的人文和文化，在中南美洲，占主导地位的拉丁移民经常与土著人大规模混合。通过这个例子，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种族混合的影响。美洲大陆上的日耳曼居民，一直保持着种族的纯正和不混杂，成为了这块大陆的主人；只要他不成为血液污染的受害者，他就仍然是主人。(第 286 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希特勒关于自然法的逻辑的发展:•他首先假定一个适用于所有生物的法则或原则。

•他进一步表明了人是如何被明确地纳入这一法律的管辖范围。

•他把讨论从理论领域中抽离出来，给出了一个在现实世界中表达这一法则的具体例子。

但是它并没有就此停止。1935 年 9 月 15 日，德意志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签署了一项法律，禁止“德国公民或有血缘关系的人”和犹太人进行种族混合。这一法案被正式命名为“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保护法”主流历史学家称之为“纽伦堡种族法”，并声称这是走向灭绝欧洲犹太人的险恶的第一步。但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这是一个初步的和有远见的尝试，尝试将自然法编纂为国家法。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开始重组德国社会，使其符合自然规律——正如他十年前在《我的奋斗》中所倡导的那样。林肯·罗克韦尔的《部落法则》乔治·林肯·罗克韦尔是战后美国民族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也是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阿道夫·希特勒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信徒。他在人们的记忆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考虑到他充满戏剧性和活力的一生，这并不奇怪。然而，他也是一个智力超群的人。除了大量的散文和文章，他还写了两本书，《This time the world》(1962)，他的政治自传和《白色力量》，这是在他死后于 1968 年出版。像阿道夫·希特勒一样，林肯·罗克韦尔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他并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与自然秩序分离或区别。在《白色力量》第 15 章题为“民族社会主义”中，他列出了支配所有社会动物的社会组织的五条“部落法则”(见第二部分)。这对狼、大象、海豚和黑猩猩都适用，对人类也适用。在人类的语境中，罗克韦尔所说的“部落”指的是种族、民族或族群。

以下是罗克韦尔的五条“部落法则”：

1. 生物完整性法则；
2. 领土法则；
3. 领导法则；
4. 地位法则；

和 5. 母性或家庭法则

在《白色力量》中，他深入讨论了五大原则或定律中的四个。就生物完整性而言，罗克韦尔既意味着保护部落专属基因库的本能冲动，也意味着由此产生的爱恨二分法。他写道:这两种本能同等重要。爱不是“善”，而恨是“恶”——这是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嬉皮士、同性恋者和弱智者如此钟爱的谣言…爱，这种自然健康的爱，的确是推动世界运转的力量，它是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最美丽、最神圣的奇迹。但是如果没有对威胁我们所爱的东西的致命憎恨，**爱对于嬉皮士、同性恋和懦夫来说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生物完整性:基于强烈的爱，对自己种族群体绝对的、完全的、毫不妥协的忠诚，以及对任何外来者的绝对的、毫不妥协的仇恨，这些外来者入侵并威胁要将自己的基因与群体中女性的基因相混合。**(第 445-446 页)他所说的“领土”首先是指部落赖以生存的土地或不动产。

在民族社会主义的德国，生物完整性和领土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概括为“血和土”(BlutundBoden)。但他也将此扩展到私有财产原则。在这里，罗克韦尔在民族社会主义和犹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画了一条基本的分界线。罗克韦尔详细说明了“最佳领导”最好的，不是最受欢迎的，也不是最富有的，当然不是那些最渴望亲吻犹太人屁股的人。他把“地位”定义为每个人在部落中的自然地位或等级。部落中的每个人都不是“平等”的——但每个人都有价值，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角色。罗克韦尔除了将母性和家庭列入他的五大法则之外，并没有提及它。他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写作的，当时白人社会的每个人都组建的是传统家庭。他显然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描述它。像同性恋“婚姻”这样的反常行为远远超出了社会的视野，甚至在 1967 年还看不到。人们只能想象他会对这种种族堕落和社会衰落的表现说些什么。

传统家庭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每一个健康的白人社会的基础。罗克韦尔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在列举五大法则时，他深深地感谢了罗伯特·阿特里，他是这方面书籍的作者，如《非洲的起源》和《领土秩序》。虽然这超出了他正规知识的范围，但罗克韦尔足够聪明，当他看到真相时，他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从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角度来描绘它。当他第一次阅读《非洲的起源》时，罗克韦尔被阿德瑞的观点深深吸引，他给作者写了一封长达数页的信，解释说民族社会主义不亚于阿德瑞中心论点的政治体现。几个月过去了，提交人没有回复他的信函，罗克韦尔给他发了一封挂号信，问他是否收到了他的第一封信。阿德瑞还是没有回答。然而，阿德瑞继续写了另一本书，领土秩序，其中他详细讨论了他的领土法。在这本书里，阿德瑞煞费苦心地与民族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他没有提到罗克韦尔的名字，阿德瑞也没有提到罗克韦尔关于民族社会主义是他的思想的政治体现的论点——他只是想让他的读者知道他不是那些可怕的“民族社会主义”中的一员。尽管如此，《非洲的起源》和《领土秩序》都是很棒的书，它们的内容在阐述中完全不存在。我们推荐这两者，尽管第二卷表面上反 NS 的倾向。《白色力量》中阐述的这五条法律，有朝一日将成为我们这些希特勒和罗克韦尔的继承人在北美建立的民族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基础。

白人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人类的存在是否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构成我们生存基础的生物学先决条件就必须得到尊重，否则忽视它们就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种族罪恶的代价是种族死亡。**今天，世界上的雅利安人毫无例外地生活在完全脱离自然秩序的社会中，这种情况必须从伟大的历史角度来看，是一种暂时的错位。这是一种疾病，而不是永久的状况，患者要么康复，要么死亡。**民族社会主义是对人类社会的重新定位，使其再次符合自然及其铁律。这是治疗疾病的方法。**

第两千年 约瑟夫-戈培尔

据美国消息来源报道，三位敌国战争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罗斯福提出的占领计划，即在 2000 年之前摧毁和消灭德国人民。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提议有些冠冕堂皇。它让人想起纽约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上层建筑随风摇曳。2000 年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已经决定了，至少就德国人民而言是这样。然而，人们可能会怀疑他们和我们是否会按照预测的方式行事。

没有人能预测遥远的未来，但未来五十年的一些事实和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制定这一英明计划的三位敌国政治家都将不在人世，英国将最多拥有 2000 万居民，我们的后代将延续下去，这场战争中发生的事件将成为神话。我们还可以非常肯定地预测，欧洲将在 2000 年成为一个统一的大陆。人们将在 15 分钟内从柏林飞到巴黎吃早餐，我们最现代化的武器将被视为古董等等。然而，按照雅尔塔会议的计划，德国仍将处于军事占领之下，英国人和美国人将对德国人民进行民主培训。这三个骗子的大脑该是多么空虚啊——至少其中两个是这样！

第三个人，斯大林，所追求的目标要比他的两位同志深远得多。他当然不打算公开宣布这些目标，但他和他的两亿奴隶将为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对世界的看法与那些财阀们不同。他看到的未来是，整个世界都要服从莫斯科国际组织（即克里姆林宫）的独裁统治。他的梦想看似梦幻荒诞，但如果我们德国人不阻止他，这个梦想无疑将

成为现实。具体情况如下 如果德国人民放下武器，根据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协议，苏联将占领整个东欧和东南欧以及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铁幕将笼罩在苏联控制的这片广袤的领土上，各国将在铁幕后遭到屠杀。伦敦和纽约的犹太媒体可能还会拍手称快。剩下的只是人类的原材料，是数百万绝望的无产阶级化劳动动物的愚昧和发酵，他们只知道克里姆林宫想让他们知道的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没有元首，他们将无助地落入苏维埃血腥专政的手中。欧洲的其余部分将陷入混乱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为随后的布尔什维克化铺平道路。这些国家的生活和生存将变成地狱，而这毕竟是演习的意义所在。

除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外，英国还将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这将使其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比现在更弱。1948 年，罗斯福竞选连任失败，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竞选连任一样，共和党孤立主义者将成为美国总统。他的第一项正式行动很可能是将美国军队从欧洲女巫的水壶中撤出。毫无疑问，美国全体人民都会赞成。由于欧洲大陆上没有其他军事强国，在最好的情况下，60 个英国师将面对 600 个苏联师。在此期间，布尔什维主义肯定不会闲着。工党政府，甚至可能是激进的半布尔什维克政府，将在英国执政。在犹太报刊和厌倦战争的人民所煽动的舆论压力下，它很快就会宣布对欧洲不感兴趣。这种事情发生的速度有多快，今天波兰的例子就很清楚。

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是短暂的，我们的大陆将被来自草原的机械化机器人所征服，这是一个不幸的局面。

毫无疑问，布尔什维主义会蹿到英国，在这片典型的民主土地上燃起熊熊大火。铁幕将再次落下，笼罩着这个巨大的民族悲剧。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数以亿计的奴隶将制造坦克、战斗机和轰炸机；然后，对美国的全面进攻将开始。届时，我们从未威胁过的西半球将面临最严重的危险。有朝一日，美国国内的人会诅咒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美国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发表公报的那一天。

民主国家无法对付布尔什维克制度，因为它们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制度束手无策，就像我们夺取政权之前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对共产党束手无策一样。与美国相比，苏维埃制度无需考虑公众舆论或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它无需害怕美国的经济竞争，更不用说军事竞争了。即使战争如罗斯福和丘吉尔所设想的那样结束，财阀国家在世界市场上面对苏联的竞争也将毫无招架之力，除非它们决定大幅降低工资和生活水平。但如果它们这样做，就无法抵御布尔什维克的煽动。无论结果如何，斯大林永远是赢家，罗斯福和丘吉尔永远是输家。英美的战争政策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他们唤起了亡灵，却再也无法摆脱他们。我们的预言，从波兰开始，开始被当前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所证实。当英国人和美国人为 2000 年制定计划时，人们只能会心一笑。如果他们能活到 1950 年，他们就会很高兴了。

今天，任何有思想的英国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英国首相在雅尔塔会议上穿了一件俄罗斯皮草大衣。这引起了英国公众的不满。当伦敦通讯社后来报道说这是一件加拿大皮草大衣时，没有人相信他们。人们从这件事中看到了英国屈从于克里姆林宫意志的象征。英国在世界事务中拥有重要甚至决定性发言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参议员最近说 “英国只是欧洲的一个小附属国!”

他的同志们已经这样对待英国了。难道它还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吗？在欧洲历史上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它向帝国宣战，引发了一场世界大火，不仅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有可能使英国本身成为一片废墟。德国向东方纯德意志领土的微小扩展，足以让人看到欧洲均势受到的威胁。在由此引发的战争中，英国发现有必要抛弃其长达 200 年的均势政策。现在，一个世界强国已经进入欧洲，它从东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始，在将英国本身纳入其独裁统治之前，不会停止在西方的行动。

英国首相对 2000 年帝国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进行规划，未免过于天真。在未来的几年和几十年里，英国可能会有其他的担忧。它将不得不拼命战斗，以维持其昔日在世界上的一小部分力量。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第一次打击，现在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临着最后的致命一击。

我们可以想象事情会有不同的结果，但现在为时已晚。元首曾多次向伦敦提出建议，最后一次是在开战前四周。他建议德国和英国在外交政策上合作，帝国尊重英国的海上力量，英国也尊重帝国的陆地力量，并在空中保持均势。两个大国将共同保障世界和平，而大英帝国将是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甚至准备在必要时用军事手段保卫大英帝国。在这样的条件下，布尔什维主义将被限制在其最初的滋生地。它将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现在，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到了奥得河边。一切都取决于德国士兵的坚定性。布尔什维主义是会被赶回东方，还是会在西欧泛滥成灾？这就是战争形势。雅尔塔公报丝毫没有改变局势。事情只取决于这场人类文化危机。要么由我们来解决，要么根本无法解决。这就是我们的选择。

不只是我们德国人这么说。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知道，和过去一样，今天德国人民肩负着欧洲的使命。我们不能丧失勇气，尽管这一使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磨难。愚蠢的万事通不止一次地将世界带到深渊的边缘。在最后关头，可怕的苦难景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使其在关键时刻果断地后退了一步。这一次也将如此。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我们剩下的大约只有我们的军事力量和我们的理想。我们可能不会放弃这些。它们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也是我们履行历史义务的基础。这是艰难而可怕的，但也是光荣的。我们被赋予责任，因为只有我们才具备必要的品格和坚定性。任何其他民族都会崩溃。然而，我们就像阿特拉斯（Atlas）一样，将世界的重担扛在肩上，毫不怀疑。

德国不会在 2000 年被敌人占领。德意志民族将成为文明人类的智慧领袖。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这一权利。与我们的敌人进行的这场世界斗争将作为一场噩梦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们的后代和他们的后代将为他们的父亲和母亲树碑立传，因为他们承受了痛苦，因为他们坚忍不拔，因为他们表现出的勇敢，因为他们战斗的英雄主义，因为他们在困难时期对元首及其理想的忠诚。我们的希望将在他们的世界里实现，我们的理想将成为现实。**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后代眼中折射出这个狂野时代的风暴时，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一点。让我们行动起来，为他们赢得永恒的祝福，而不是诅咒。**

禁令并未扼杀民族社会主义！ 约瑟夫-戈培尔

1927 年 5 月 5 日，柏林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因警方发布禁令而陷入组织危机，如今，民族社会主义在精神上克服了这一危机。

令民族社会主义陷入严重困境的冲击已经消除，通过一份激进且具有攻击性的周报，领导层与追随者之间被中断的联系得以恢复，夏季完全缺乏的宣传机会也得以重现。我们确实还有很多担忧，尤其是财务方面。**但乌云密布的天空偶尔也会透出一丝光亮。毕竟，我们要求的只是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丝希望。命运对我们很残酷，我们常常有足够的理由感到绝望，并默默地放弃斗争和目标。运动的新路线在帝国首都最充满希望的时刻因官方措施而中断，似乎完全不可能继续下去，即使以伪装或隐藏的形式。** 然后，“攻击报”介入救援。

有了它，党再次巩固。在专栏中，我们有机会继续在帝国首都宣传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可以说，这个年轻的企业是由我们一手创建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次清楚地证明，只要有勇气、自信和胆量，即使是最绝望的企业也能成功。关键在于承担者要相信自己的事业，不要因为被认定为正确的道路上的严重挫折而转移注意力。一位伟大的当代人曾这样评价自己：**“有三样东西让我登上了人生的巅峰：智慧、勇气和对金钱的极度蔑视。”**我们正是按照这些话行事。人们不能否认，柏林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层具备一定的智慧。

冲锋队为无产阶级区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激战，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对我们而言，对金钱的极度蔑视似乎也是恰当的，因为当时各地都极度缺乏金钱，只有怀着这种极度蔑视才能无视这种短缺。《攻击报》在创刊后的头几个月就经历了严重的人员危机。一位一开始还满怀热情支持我们办报计划的同事，在事情变得危险和绝望时，却卑鄙地抛弃了我们，使我们的年轻企业陷入了严重且几乎无法克服的困境。有一段时间，我们完全失去了能干的同事，不得不靠每位政治领导人亲自撰写一部分报纸来维持生计。因此，我们几周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新闻工作上。我们以各种化名发表战斗性的文章。然而，即使与永远不变的同事一起工作，报纸的版面仍然多种多样，读者几乎不会注意到每一期都倾注了多少心血和关怀。

但作为回报，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攻击报》在帝国首都的新闻界中享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尊重。它的发展历程与大型资本主义报业企业不同。我们没有捐赠者提供创办新闻机构所需的金额。因此，很容易聘请编辑人员和出版人员，企业很难失败。但在这个过程中，由大捐赠者资助的每份报纸都不得不被动地代表其支持者的政治观点。因此，在这种方式下，公众舆论中不会出现新的声音。一个严肃的金融家会直接购买自己的报纸，以便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影响公众舆论。**而我们则恰恰相反。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的观点，由于我们不依赖任何捐赠者，因此可以非常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早在那时，我们可能就是整个柏林唯一一份出于信念而写作的报纸，其政治倾向不受任何秘密资金来源的影响。读者自己对此感受最为清晰和明确。尽管犹太人的报纸发行量高达数百万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但它们与自己的订户之间却缺乏内在联系。这样的报纸不会受到喜爱。读者认为它们只是必要的恶。他每天都会阅读它们，以了解时事。但他的内心深处仍然坚信，即使他无法确定细节，但最终它们还是会欺骗他。

对印刷文字的盲目信仰在德国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如此频繁且如此具有命运性，但这种信仰正在逐渐消失。如今的读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求报纸的导向性和观点的诚实性。自 1918 年以来，大众的听觉和视觉变得越来越敏锐。在结束战争的股市起义中，

国际媒体发动了最后一次重大政变，预示着股市资本主义的到来。从那时起，它就开始走下坡路，起初并不引人注意，但后来迅速衰落。自由民主的世界观如今在精神上早已被超越。它仍然只停留在程序性的议会伎俩上。对于大众来说，这最初意味着巨大的失望。我们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失望，并早已筑起了一道堤坝来抵御它。凭借现代手段和绝对新颖迷人的姿态，我们早就开始尝试影响公众舆论。

当然，一开始我们很原始，也很业余。但人们应该向我们展示一位从天而降的大师。我们也必须付出我们的努力；如**果今天人们仍然只能通过官方禁令来压制民族社会主义媒体，那么这恰恰证明了人们无法用理智的论点来对抗媒体所代表的观点，而只能诉诸赤裸裸的武力。**但当时，我们在帝国议会和州议会的代表人数确实很少，而且人数上也不占优势。尽管如此，被取缔的运动背后还是有一个避难所。

Gau[大区]办公室变成了代表办公室。以前是党官员工作的房间，现在成了不受限制的人民代表们的住所。将整个业务流程重新构建到这个系统中并不容易。但几个月后，我们也学会了这一点。渐渐地，整个党组织适应了这种可以说是非法的状态。我们为办公室制定了一套新的、几乎无法察觉的工作流程，最重要的文件分散保存在整个城市最可靠的党内同志那里，党员名单只保留给老党员。但它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紧急情况。它不会让人怀疑它摇摆不定。人们可以信赖它。

我们很快就发现，在可预见的未来，禁令不会解除。因此，我们开始根据非法状态重新组织党。以前的部门变成了狂野或无害的俱乐部。他们经常成为官方禁令的受害者。但一个解散的保龄球俱乐部几天后变成了一个新的滑板俱乐部，被禁止的游泳俱乐部变成了一个投资组织或足球俱乐部。背后始终是民族社会主义。尽管遭到取缔，但党的据点却完好无损。警察总署知道对我们不公，因此没有对我们进行严厉处罚，毕竟这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逐渐地，新的生命从被摧毁的组织废墟中萌芽。

冲锋队没有一刻动摇。它的规模确实很小，但纪律严明，骨干可靠。在斗争的头几个月里，少数尚未成熟的人加入了我们，但逐渐被排挤出去。整个组织的核心保持完整无损。那**时，人们几乎还能认出每个党员和冲锋队员。在党的宣传集会上，人们经常看到那些充满战斗意志的面孔，周复一周，日复一日，这些面孔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记忆中。整个党就像一个大家庭，人们也拥有同样的归属感，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柏林的民族社会主义才没有消亡。**党还注意不让外部人士人为地一再给党带来的紧张气氛威胁到组织的内部生活。通常情况下，每一次挑衅企图都会被及早发现，然后被无情地扼杀在萌芽状态。必须毫发无损地保护聚会的核心。在将来解除禁令后，重建整个组织就变得简单了。我们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为被禁止的党分配任务和目标上，这样就能防止个别团体因缺乏日常工作而出现机会，通过争吵和人为制造的危机来破坏我们活动的平稳进行。我们在柏林周围建立的坚固堡垒明显地形成了一条牢不可破的锁链。我们将帝国首都的周边地区打造成了一个强大的攻击前线；因此，如果柏林的形势对我们不利，我们就可以撤到周边省份。

每一个伟大的世界观，如果它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出现，试图为民族生存提供精神和文化基础，并最终提供物质基础，那么它的发展必须经历四个阶段。这取决于它在这四个阶段中设法克服那些反对它的力量的方式，它是否真的被称之为。在人类历史上确实出现了许多想法。许多人为了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声称自己能为民众带来意

义，并能够告诉民众一些事情。许多人来了，又走了。但后人不会记住他们。只**有少数人被称为能够给民众带来新的政治理想，而命运总是很仁慈，总是早早地迫使这少数人向公众证明，他们不仅被选中，而且被召唤。每一个伟大的运动都始于默默无闻。**

最初，它只是个人头脑中萌生的想法。个人是否是这一想法的杰出发明者并不重要。个人只是幸运地表达了人们模糊的感觉和渴望的猜测。他表达了一种不为大众所理解的驱动力。在将我们的年轻想法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人们总会感觉到自己。这时，人们通常会说："这就是我一直相信、思考和想要表达的。这就是我追求的，我的感受和猜测。"个人被召唤，他如今将表达赋予广大群众的渴望和猜测。对于赋予思想以救赎之词的个人而言，他总是会努力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想法，并为此做好准备，以避免孤立无援，从而吸引一群人、一个党派或一个组织。团体、党派或组织因此成为思想的仆人。**当然，他的同时代人以及周围的世界最初会完全不理解他，因为他的想法毕竟领先时代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今天所宣扬的悖论，在二十年甚至更久之后才会变得微不足道。他向他的同胞们指明道路，他想要带领同时代人从令人窒息的低地走向新的高度。**

可以理解的是，现在的人不想理解他，而且归根结底也无法理解他。最初的一批理念拥护者起初默默无闻。这也是件好事；因为那棵小小的橡树苗第一次害羞而尴尬地伸出小冠，从松散的土壤中探出头来，可能被一个不小心踩踏而折断。它还没有力量去抵抗。力量仍然存在于根部；它最初只存在于小植物所拥有的可能性中，而不是小植物目前所代表的意义。自然，它比大杂草丛更小、更谦逊、更不起眼。但这并不能证明十年后它还会如此。

十年后，当杂草丛早已成为腐殖质时，一棵坚实的橡树树干将用它宽阔的枝条遮蔽周围的一切。命运的安排是明智的，周围的世界一开始根本不会注意到这棵小橡树。因为这样它才有机会成为自己的命运。大自然总是确保生物、人和组织只接受他们能够承受的考验。对于一个年轻想法的最初拥护者来说，当代人根本不关注他们，这无疑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状况。无论谁内心怀有战斗精神，喜欢与敌人交锋，他都可以与敌人混战。但对方根本看不到他，根本不理会他，这种侮辱性的无视，是英雄人物最无法忍受的事情。最初为年轻想法而奋斗的斗士，在运动的初期阶段与日后征服权力时，自然完全一样。因为他们没有改变，而是改变了周围的世界。

改变的不是希特勒，而是他生活的德国。在发展的第一阶段，命运正在考验着那些怀有改变历史的野心出现在那里的人是否也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在一段时间内默默忍受无名。如果他克服了困难，灵魂没有受到伤害，那么命运就会认为他已经准备好接受第二次考验。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后，运动将获得内在的力量，融化精神抵制所形成的坚冰。然后，它找到方法，让周围的人了解它；即使不是以善意，至少也是以仇恨。如果他们不爱我，那么他们应该害怕我，但至少应该了解我。然后，很快就会到来，公众不得不注意到这个想法和组织。那么人们就不能保持沉默了。如果这已经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如果这已经传遍大街小巷，那么那些胆小的报纸也不能再保持矜持了。他们必须表明立场，无论以何种方式。他们最初会以适合他们的方式表明立场，因为他们坚信，他们政治领域中习以为常的做法，也可以毫无保留、不做任何改变地应用于新的运动。然而，他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那就是，这个年轻运动坚持的是完

全不同的理念，它源于完全不同的精神动机，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类型。在它统一的反对者中，通过有效且时髦的手段来对付它，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敌人必须惊恐地发现，他以为对运动有害和毁灭的一切，只会加强和巩固运动。是的，这往往如此，以至于人们用来反对运动的力量又被运动本身吸收了。起初，人们以为可以嘲笑它。人们把它与宗教或文化领域中任何幼稚和天真的尝试相提并论。我们这些老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仍然清楚地记得，我们曾与救世军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当时对我们的普遍评价是：**他们品行端正，无法证明他们违法。他们是无害的疯子，最好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是发展的第二阶段：人们不再诅咒，而是嘲笑。笑是件好事。如果敌人现在发起进攻，也许就有可能扼杀这场运动。但当他笑的时候，运动却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影响力，越来越有激情。是的，运动的支持者会因为对手的笑声而感到更有力量。野心也会随之增加。每个人仍然只是受到热切愿望的鼓舞："我们会让你笑不出来！" 对手轻蔑的傲慢只会激发年轻运动支持者的热情。他不会因为有人嘲笑他而放弃自己的想法，相反，他会确保对手不再笑。**

这是第二阶段。当笑声停止时，人们最终开始反对这一运动，最初是通过谎言和诽谤。毕竟，对手已经无计可施，因为他无法用更好的论据来反对新的世界观。例如，资产阶级政党有什么样的理念可以对抗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如果我们进行智力交锋，比如社会民主党如何与我们抗衡？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一旦我们在客观的政治辩论中登上领奖台，那么我们就是青年，而他们是老年。因此，他们尽可能避免进行智力上的交锋，而是通过诽谤和恐吓来达到目的。

于是，现在，污垢和肮脏的东西如潮水般涌向运动及其领导人。人们对此无话不谈，无所不用其极。敌人每天都在编造新的恐怖故事。可以说，他用自己的肮脏爪子捏造谎言。自然，这首先会在愚蠢且不加批判的群众中产生影响。但前提是，对方必须有能力阻止群众与运动及其领导人直接接触。如果这一点不再可行，那么敌人就失败了；当经常被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有机会亲眼认识运动及其领导人时，他们就会认识到之前被欺骗的内容与运动实际意义之间的区别。这时群众会感到被侮辱了。对于民众来说，没有什么比欺骗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起初，人们带着保留和内心的抑制进入我们的集会，但随后必须说服自己，告诉他们的谎言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谎言会反过来摧毁说谎者。

因此，在发展的第三阶段，诽谤很快就会变成迫害。人们使运动受到政府机构和街道的恐怖。有人试图用武力来达到诽谤无法达到的目的。但这个系统的悲剧在于它总是采取行动太晚。如果它早点行动，也许就能成功。但那些在运动旗帜下团结在一起、匿名诽谤的人并不是懦弱的胆小鬼；否则他们无法忍受之前所遭受的一切。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有内在的力量去对抗充满敌意的世界，并直视它说：**尽管嘲笑吧——只有男子汉才能忍受；尽管诽谤吧——懦夫会在那里变得反复无常。**他会留在群众中，他会吐口水、嘲笑、咧嘴笑，让自己变得愚蠢。但与此同时，一群纪律严明的战士已经按照这个理念的标准集结起来。他们不仅懂得运用理性，而且懂得——如果有人威胁到他们或他们的运动——用拳头说话。如果有人让他们陷入血腥的恐怖，在政府办公室和法院里追捕他们，如果有人用红色杀手威胁他们——人们应该相信，那些蔑视诽谤、抵制谎言和荒谬的人，现在面对武力变得软弱了。恰恰相反： 当有人对他使用这

些手段时，新思想的持有者首先意识到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没有人对他使用这些手段，那么他可能会时不时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路。但恐惧恰恰证明敌人已经认识到了他，并且憎恨他，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敌人认识到了他并惧怕他。

在鲜血中，运动只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领袖和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突然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一个革命思想的方阵。

过去所有的革命叛乱都是如此，我们所参与的革命运动也是如此。它就在那里，无法简单地用谎言掩盖。它有自己的能量和思想，有自己封闭而纪律严明的追随者。最重要的是，如果它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目标，并且无论绕道多少弯，也从未忘记目标，那么它就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最终，对手会意识到自己的手段仍然有效。与此同时，民众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在多年艰苦斗争中，运动对民众思想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仍在持续，它动员和激活了群众，使民众行动起来。今天的德国民众已经无法与 1918 年的民众相提并论。当权者的权威已经衰落。而构成反对派的权威也在同样程度上崛起。如果今天有人把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告上法庭，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人们仍然像无忧宫的穆勒对柏林最高法院那样，以幼稚的信任仰望这些法庭，那将是一个成功。如果小人物仍然相信法院是正义的庇护所，如果人们希望法院对反对派人士处以严厉的惩罚，那么这些惩罚对民族情感来说仍然意味着耻辱和诽谤。但如果一个无罪释放巴马特的法院判处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长期监禁，那么民族对此将无法理解。然后小人物说：“哦，原来是这样。不是把骗子关进监狱，就是把正直的人关进监狱。就像骗子威胁正直的人一样，正直的人也会威胁骗子。”制度的权威已经崩溃。事实上，制度并不愿意相信这一点，但它必须日复一日地接受这一事实。当反对派的势力逐渐增强时，政府就会感到孤立无援。

这时，斗争的精神层面已经决定了结果，而政治层面也很快会做出决定。

现在，诽谤已经无济于事，因为诽谤运动，就是诽谤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如果有人诋毁领袖，数百万人就会站起来说：“这些人是我们的领袖。侮辱他们就是侮辱我们。这些人的荣誉就是我们的荣誉。”

于是，民众们觉得：无论把哪个民族社会主义者关进监狱，无论哪个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家里被逮捕，他都会体验到任何无法再缴税的民众所经历的一切。

最后的战斗已经打响。人们再也无法对这场运动保持沉默，再也无法用谎言来掩盖，也无法再将其扼杀。无论人们在哪里打击它，民众都会大喊“我被击中了”；无论人们在哪里诽谤运动人士，都会有数百万人在喊“那就是我们”。如果追随者在黑暗的街道上被枪杀，群众就会站起来发出威胁：“十万人都有他的脸，都是审判者”。

那么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敌人无条件向反对派的精神优势地位投降，除了采纳反对派的思想，他别无他法——当然不是为了执行这个想法，而是为了扭曲它，使之与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任何人的头脑中，永远只存在与其相匹配的思想。如果有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奉行和平主义，那么他不可能突然充满战士精神。**如果一个人为民主奋斗了二十年，那么他不会在一夜之间成为贵族。**无论谁破坏和颠覆国家几十年，都不可能突然成为负责任的国家支柱。他可以假装自己就是那样的人。他可以给自己戴上虚假的面具。突然之间，这位十二年来一直确保民众麻木不仁的社会民主党

人站在广大民众面前，疯狂地挥舞着双手，高呼：德国醒醒！突然之间，这些旧的阶级和利益集团又想起了民众。然后他们称自己为“人民党”（Volkspartei）。这就是我们的德国悲剧：我们有三个“人民党”，但不再有民众。他们都把“人民”这个词放在名字前面。当他们的旧名称受到伤害和损害时，他们就会抛弃它，取一个新名称。几十年来，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战斗——当民主不再具有吸引力时，他们又突然改名为国家党。他们还是那些人，他们只是想在新的口号下继续他们旧的政治。他们还是那些懒惰的人，头脑里还残留着那些过时的想法。但这对民众已经不起作用了。

旧的名字已经过时，当他们采用新的名字时，民众就会把他们和那些在事情变得棘手时也喜欢改名的人联系起来。骗子和犹太人就是这样做的。**如果一个人在犯罪记录中登记的名字是迈尔，那么他的新名字就是穆勒。如果一个人来自加利西亚，名字是万德尔鲍姆，那么在德国，他的名字就是埃尔鲍。**

十二年来，他们欺凌国家，践踏民族荣誉，侮辱、嘲笑和玷污祖国；现在他们突然又想起饱受折磨的德国，突然又成了严格的爱国者，指责背叛祖国和和平主义。他们支持装甲巡洋舰，支持武装人民，并明确声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继续下去了。人们必须为国家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打着虚假的旗号航行，与那些运送违禁品的海盗无异。

他们根本没有拯救人民的意图，只想利用人民的反抗来为自己的政党服务。但很快，他们就会意识到这样做也是徒劳的。现在，他们失去了冷静。他们放弃了自信。如果人，尤其是犹太人，一旦失去了冷静和自信，就会开始做愚蠢的事情。他看到自己处境多么糟糕，即使表现得彬彬有礼，也会流下苦涩的眼泪。他想要在公众面前扮演巨人歌利亚的角色。他表现得好像一切顺利。人们告诉对方：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不要患希特勒妄想症，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他们喊道：“我们不害怕”，但对他们来说，这就像那个男孩必须在夜晚穿过黑暗的森林，大声喊道：“我不害怕!”，他只想借此压制自己的恐惧。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也必须经历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事实上，整个运动就像其各个附属组织一样。人们试图对它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甚至将其扼杀。如今，在德国，要想终结民族社会主义，除了接受其主张和要求，进而与之对抗，别无他法。1927 年秋，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的转折点。

事实上，人们仍然试图通过媒体来置其于死地；但显而易见，这种做法对于目标而言是不合适的。现在，人们开始全力打击它；但在三个月的防御斗争中，运动已经打破了这种企图的威胁，现在，这个政党的胜利进军不再有任何阻碍。民族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可以继续扩大自己的阵地，并在突破政党政治的限制后赢得新的领域。《攻击报》现在已成为我们政治观点的流行机构。我们可以在那里畅所欲言，毫无顾忌。这里使用的语言激烈而明确。但民众对此并不排斥。这就是小人物在街上、工作场所、公交车和地铁里说话的方式；这里提出的要求，伴随着民众愤怒的呐喊，而民众也响应了这种呐喊。

我们的报纸，也就是党的同志和支持者所说的《攻击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这个机构的共同所有者。每个人都坚信，没有他的参与，这个机构根本不可能存在。如果报纸能够盈利，那么决定将其全部用于运动的政治工作。《攻击报》是柏林唯一不屈从于资本主义的机构。我们谁都没有从中获利，只有运动本身。直到今天，情况依然如

此。我们一直竭尽全力反对将这份报纸变成私人资本企业的行为。根据我们的财力，每位工作人员都能获得尽可能多的报酬，而且考虑到他的表现，报酬也是适当的。但这份报纸本身属于党，因此也属于每一位党员同志。谁为这份报纸发声，谁就是在为党服务，不仅是在宣传方面，而且在财政方面。每一点进步、每增加一个订户或街头销售，都会立即转化为更好的业绩。因此，报纸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虽然当时还谈不上盈利，但三个月后，报纸就实现了自负盈亏，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如何长期承担创办报纸时所欠下的巨额债务，这些债务一部分是作为政党所欠，一部分是作为个人所欠。我们经常需要开展大胆的金融操作。我们这些对金融事务了解不多的家伙，在这一过程中成了最精明的信贷和借贷政治家。我们在这里开个洞，以便在那里塞东西，拆了东墙补西墙。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财务平衡；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始终努力不让报纸上经常出现的糟糕的财务状况影响到公众。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承认，我们常常走到穷途末路；但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总能一次又一次地找到解决方案，哪怕是最绝望的方案。我们保持乐观，继续努力工作，希望最终命运之神也会眷顾我们。

人们不应该认为，在担心日常生活中的小麻烦不断重复时，我们变成了脾气暴躁的厌世者和悲观的末日预言家。恰恰相反！我们都还太年轻，不能失去哪怕是一刻的勇气。是的，我们逐渐习惯了绝望的处境，以至于觉得这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理想的。我们以良好的心态克服了所有危急情况。那时我们笑得多，垂头丧气的时候少。如果今天有人回顾整个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从不起眼的小教派到声势浩大的群众政党，人们会一次又一次得出这样的结论：实现目标的过程是美好而令人满意的。但更美好、更令人满足的是，从为伟大目标而奋斗开始，从对无法忍受的状况感到绝望，到仍然汲取力量和信念开始工作，即使这看起来毫无意义、愚蠢且不可能。我们不是黑暗野蛮的暴徒。

媒体确实倾向于这样描述我们。民族社会主义的领导层主要由德国青年组成，他们因时代的苦难而投身政治。正是德国青年意识到老年人已经无力掌控时代的艰难困苦，才投身政治，并赋予政治以崇高而迷人的特质，使其在今天区别于其他所有国家。我们以一种全新的不关心态度来处理公共事务。我们以年轻人的心态开始工作，正是这种年轻人的心态让我们没有一败涂地。年轻人奋起反抗政治环境的衰老，这种政治环境已经变得无法忍受。它解决了政治生活的迟钝问题，打破了限制德国战后政治积极流动性的障碍。青年唤醒了人们的灵魂，点燃了人们的心，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如果今天德国仍然有希望迎来更美好的未来，那么除了我们和我们的运动，人们还能指望谁呢！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这样一些日子，人们会相信，所有的幸运或不幸都在一个小时内安排好了相遇。人们由此推断，如果财富过剩，那么之前的厄运就会得到回报；如果厄运过剩，那么之前的幸运就会受到惩罚。命运在此时将所有令人愉悦或痛苦的意外都集中起来，然后倾泻到那些受其折磨或幸运的人身上。

1927 年 10 月 29 日对于柏林运动和我个人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日子。我正是在这一天庆祝自己三十岁的生日。一大早，我就收到了许多惊喜。第二封邮件是警察总署寄来的，通知我长达四个多月的禁止发言令已经解除，条件是如果警察总署提前通知并批准举行集会，我就可以再次在公共集会上发言。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现在，

人们开始踊跃参加集会，势不可挡。党有了新的财政机会，因此我们可以逐渐摆脱紧迫的资金问题。

从 1927 年 10 月 29 日的首次祝贺开始，一连串的喜事再也没有间断过。忠诚的党的同志纷纷送来鲜花、贺信和电报，团结互助的关系在此间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而这一关系是在柏林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及其领导层之间近一年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我在他值得纪念的那天晚上与一位老同志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时光。然后，我被邀请去散步，不知不觉间，我们来到了柏林郊区的一家场所。我毫无戒备地与我的冠军一起走进大厅，当我发现几乎整个柏林的追随者都聚集在紧闭的房门后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为我临时举办了一场生日派对，派对上的同志们想出了各种惊喜，不让我拒绝。柏林人的幽默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有人郑重其事地递给我一个口罩，这是 Isidor 公司正式注册并拥有版权的口罩：“完全忠于宪法，可抵御橡胶弹的打击!”冲锋队和政治部门纷纷送来贺词，这些贺词用纯正的方言和智慧写成，只有柏林才有的地道风格。一位政治官员递给我一个巨大的包裹，里面有一张完全出乎意料的惊喜照片，让我惊讶不已。

里面有两千五百名《攻击报》的新订户，这是整个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了庆祝我的生日而进行不懈宣传的结果。但还有更多。这些穷困潦倒的人私下凑了钱，结果在我生日那天，我的生日桌上摆了将近两千马克的现金。我因此得以偿还最紧急的债务。我腾出手来，开始新的政治和宣传工作。

一名冲锋队成员亲自将一个密封的信封交给我。信封里装着我创办《攻击报》时亲自撕下的两千多马克的欠条。上面用简洁的文字写着：债务已还清。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财务问题。《攻击报》从此摆脱了债务，政治运动也有了应急资金，可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复杂情况和危机。

《攻击报》的订阅量增加了，它的继续存在得到了绝对保证。警察总署解除了对我的禁言令，因此，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可以恢宏地恢复工作，并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带领党取得新的成功和胜利。因此，我们为运动承担的所有担忧和艰辛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了回报。我们的幸运星再次升起。我们内心早已克服的危机也将从外部得到解决。党内联系得以重建，组织得以巩固；我们可以在不受财务困扰的情况下开展新的政治行动。

政治领导层再次掌握了主动权，时间和精力不再被琐碎的财务问题所拖累。我本人也重获自由，可以再次公开投身于政治鼓动工作。今晚，一个冲锋队表演了一出戏，其感人至深的质朴和艺术表现力几乎让观众热泪盈眶。舞台上用生动的形象展现了德国工人从共产主义到民族社会主义的精神历程。该剧由一位不知名的冲锋队员创作，由不知名的业余演员表演。

“国家剧院必须从民族中诞生，从民族诞生，通过民族和业余戏剧诞生。国家剧院必须成为此类戏剧作品的家园，成为新英雄主义态度、伟大思想、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戏剧作品的承载者。

国家剧院必须从民族发展而来，**属于民族，而不是大众**。”这是业余演员之一在演出开始前宣读的序言。整个活动洋溢着自信的氛围，人们一致表达了信心。演出结束时，整个大厅一片漆黑。

一名身穿制服的冲锋队队员举着党旗走上舞台，用动人心弦的诗句为我们所有人宣誓，我们不会在斗争中感到疲倦，我们决心以新的手段和方法继续斗争，直到取得胜利。

“我们柏林人需要有人来呐喊，你知道，要有勇气和讽刺意味，我们也非常高兴，那些跟不上的人已经走了特殊路线……因为我们知道你了解你的东西，如果某个兄弟来向你吐口水，说些疯狂和卑鄙的话，那就随他去吧，我们会让他远离你…… 因此，尊敬的博士，可敬的同志，我们向您表示祝贺，并祝您在战斗中一切顺利，战斗对我们来说再疯狂也不为过；有您参与，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

这是一封来自一位不知名的冲锋队成员的祝贺信，内容极其有趣，讽刺意味十足。信中表达了人们对冲锋队一年来工作、担忧和奋斗的感激之情。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现在，我们可以感到欣慰，因为奋斗和担忧没有白费。“经警察局批准！1928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晚上 8 点，戈培尔博士在哈森海德 32-38 号新克尔恩的奥芬剧院发表题为“德国民族死亡之舞”的演讲。群众们，快来参加！”这张海报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贴满了帝国首都的所有广告柱。公众惊讶地发现，被压制和束缚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又复活了。尽管禁令并未失效！这个口号在那个星期二晚上得到了辉煌的证实，对我们来说，这个晚上是如此具有决定性，因为那天下午七点左右，在无产阶级区中心的哈森海德奥芬剧院前，1918 年股市起义的前一天，而就在 1923 年，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了全国革命。当天，群众聚集在一起，在售票处开放后不久，奥芬大剧院的大厅因人满为患而被警方关闭。他们全都冲了进来，他们是柏林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拥护者。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政治官员、来自远近各地的追随者、老一辈的党卫队成员齐聚一堂，郑重庆祝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事实上，警察总署的禁令尚未解除，我们仍然需要等待近半年的时间，才能让错误得到纠正。

但禁令已经不起作用了。骚扰和强制措施显然已经证明是无效的。运动以顽强的毅力挣脱了束缚它的枷锁。他们匆匆从车床和机器、办公椅和工厂桌子、西方明亮的房屋和失业办公室黑暗的庭院中赶来，他们现在坐在那里，是旧党的卫兵。他们热切地宣誓，他们希望再次投身于他们曾无私地、全力以赴地为之奋斗的事业，任何力量都无法迫使我们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正义和真理战胜了恐怖和迫害、苦难和监狱，我们信仰的旗帜再次高高飘扬，熠熠生辉。我们可能会屈服，但绝不会被打垮。他们可以迫使我们屈服，但我们绝不会投降！我们这些年轻的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深知利害关系。

我们坚信，如果我们绝望，德国将陷入混乱。因此，即使看起来毫无希望，我们也要挺直腰杆，坚定地捍卫我们的事业。我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对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曾与德国生存联系在一起的要求的回应：这意味着，**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有所作为。**

国家理念

人民与国家 阿尔弗雷德·克兰门特

当我谈论民族和国家时，我必须首先解释我所讨论话题的整体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一系列复杂的观点，其总称是：政治学，或者——如果我们强调基本观点——民族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这个标题确实非常宽泛，以至于我今天只能涵盖摆在你们面前的大量材料中的一小部分。如果试图用几句话来描述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国家观，那么人们会立即发现三个要点，每个要点都涵盖相对独立的一组问题：

首先，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国家是一个民族或种族国家；

其次，是一个以各种专业和职业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国家；

第三，是一个由领袖统治的专制国家。

一个基于种族和血统的国家，一个基于各种专业和职业的国家，一个由单一最高领袖统治的国家——这是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概念的三个方面。

这里必须指出，仅凭这三个名称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完整地定义民族社会主义对国家的构想，只有将这三个观点结合起来，才能揭示我们对国家的全部构想。因此，如果只谈论民族国家、只谈论法人团体、只谈论领袖的国家，那么从一开始就会以扭曲的方式看待这个整体，或者至少不能完整地理解它。当然，这三者都是同一原则的应用，我们倾向于将其描述为“有机”，并以这种三重的形式展开，从而形成我们整个国家结构的基本结构。

但是，如果强调这一点，说成是“职团制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对我们来说，“职团制”一词既不能描述国家的实际机构，也不能表明其结构的具体政治原则；事实上，如果将民族社会主义的政治概念纳入职团制机构之间的关系中，就会从根本上误解这一概念。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基于财产统治的政府体制；我们理解合作社理念，但不是从反动或恢复的角度，而是从历史上首次实现合作社理念的角度，即所有财产在平等的基础上并肩而立，构成富有创造力的德国人民有机整体发展的总体工作状态，其中不包含任何直接的政治统治制度。政治秩序和权力的行使被添加到职团结构中，成为全新的事物，并且完全由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劳动者党负责和执行。但各阶层完全平等的原则是德国新社会主义的真正革命性方面，它恰恰证明了其作为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尽管与共同的整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深深植根于古老的日耳曼自由意识。自由也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口号，作为德国人，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它。然而，我们理解自由是古日耳曼概念意义上的自由，根据这一概念，自由并不排斥对我们民族的存在和本质的纽带和无条件的奉献，而是本来就包含着这种纽带和奉献。由此，我们彻底反对神权统治的中世纪社团国家及其历史继承者——君主专制。

我们同意，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彻底终结了欧洲古老的职团思想。关于这一点，根据党的基本纲领倒数第二部分，我可以明确无误地声明，民族社会主义不想回到英国、美国或法国革命之前，而是要迈向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从根本上说是以现代精神和思想为基础的。因此，我们也信奉民主原则，阿道夫·希特勒在演讲中多次表示，德国也有民主宪法，而且最近几天在魏玛举行的帝国党大会十周年庆典上，他一再明确表达政治领导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因此，将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带来的政治秩序称为独裁或暴政是完全错误的。相反，我们宣布反对任何形式的过时的专制主义，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教会

制，抑或是同时具有君主制和教会制性质的专制主义。我们不想让陈旧、过时、不自然的生活方式从其应有的沉睡中苏醒，而是希望帮助自然状态和社会思维发展出新的、具体而实质的形式，这些形式直接受到生活的启发，并尽可能地符合其内在的多种法则。再次重申：职业行会的理念只是我们新国家结构的基本理念之一，当然不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另一方面，只谈论领袖国家是不够的，因为这里不仅独裁秩序仍然不被认可，而且国家的实际承担者也是如此，因为传统的德国国家思想早在 150 多年前就已经从有机意义上将人民指定为国家的实际承担者——这与西方启蒙运动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国家原则、职团原则和领袖原则是同一思路的结果，旨在解决自然不平等和建立一种有生命力的具体结构，但人们必须清楚地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它们作为整体结构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才能全面认识民族社会主义的完整理念，以及其丰富的内涵和全面的创造力。当然，我无法在各位面前详细阐述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思想的这种整体结构。鉴于本次演讲时间有限，我只能粗略地介绍。

因此，我更倾向于从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的三点主要特征中，挑选出对德国国家和社会思想具有根本重要性且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只要它以一种发达的形式存在，一直是德国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特点：即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社会主义如今已将其发展到全新的深度，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进，从中引申出各种实际后果。然而，种族方面的完全采用实际上不过是国家和民族有机概念所能采取的最一致的形式，因此也是德国传统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巅峰之作。

现在我的任务是说明民族-种族概念对于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进步发展的根本重要性。我已经指出，我们对于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或君主专制国家和社会概念，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毫不认同。现在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与自由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两种形式是启蒙思想可以采取的两种基本形式，历史上都是由启蒙运动实现的。为了用纯粹的外部术语描述我们目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人性结构中的立场，我注意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站在两个极端的中间。

尽管这两种立场有根本的相似之处，但在对国家和政治的构想和评价上却截然相反。**自由主义本质上与政府是敌对的；它倾向于将政府和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事实上，它宣扬用社会取代政府，将人类生存尽可能地非国家化、非政治化和私有化。这就是尼采在谈到自由主义时所说的“尽可能小的政府”。**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主义在思考问题时，其主张却恰恰相反：**它主张国家和社会的同一性，宣扬极权统治下的恐怖状态，这种状态具有最极端的强制性，它摧毁了个人以及经济、法律、科学、艺术和宗教等个人生活和文化领域的自由。**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尽可能多的国家”，是尼采以先知般的洞察力也视为对自由主义的必然反应的极端国家，他以其北欧-日耳曼式的对自由的热爱，全身心地投入反对这一极端国家的斗争。以上只是粗略勾勒出两种启蒙世界观可能的形式，它们基于截然不同的心理假设：自由主义对人性抱有无可匹敌的乐观态度，认为人性本善，而国际社会主义则是一种极端悲观主义，认为人性本恶，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就像贪婪的狼一样相互对抗，不断发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顺便说一句，国际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型早在政治和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形成，也就是说，甚至在约翰·洛克（John Locke）及其 1689 年的《宽容第一

封信》和 1690 年的两篇关于政府管理的论文发表之前，他的同胞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已经形成了这种原型，特别是他的 1651 年的《利维坦》。与洛克不同，霍布斯不承认任何不受国家约束的原始自由权，也不承认在国家之前和之外的所有权，因为每个人对一切的权利等同于完全缺乏权利的状态。与洛克不同，他的教导虽然也是基于自然法理论中的契约和民主原则——国家的绝对统一、全能和整体性，包括国家与教会的统一、政治与宗教的统一，以及权力的不可分割性，简而言之：国际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始终导向的吞并一切的庞然大物。

如果我们现在考虑这两种观点，根据这两种观点，要么要求个人和社会生活尽可能摆脱国家的束缚，要么要求以恐怖主义的方式暴力摧毁所有这些自由——如果我说，我们牢记这两种观点，那么民族社会主义就恰好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其口号是：国家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我们反对无限制的自由和强制。在这方面，我们赞同国家的存在，也认为社会主义不会凭空产生，例如根据自由放任、自由发展等自由主义原则，而是必须在唯一的机构框架内组织起来，即国家。但我们反对国家专制，反对由此导致的对个人自由以及个人生活和文化领域的破坏；对我们来说，国家与其说是经济的直接主体，不如说是间接主体，更不用说它是经济、法律、科学、艺术和宗教的唯一主体。

因此，我们与自由主义一样承认自由本身，但我们反对无节制的自由，因为我们认为，根据自然法则，无节制的自由必将导致混乱，而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魏玛时期的德国，也发生在欧洲和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地方。因此，关于上述观点，事实证明民族社会主义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正是这种中庸之道，这种避免两个同样片面且站不住脚立场的做法，才是常识所提倡的，它建议从两个极端中汲取优点，并避免两个极端中的缺点。然而，将民族社会主义视为现代欧洲两个客观且历史悠久的极端之间的黄金分割点，这种观点并非完全错误，但仍然非常肤浅且流于表面。

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思考来补充和深化这一概念，即不仅看到在自由或国家方面存在的渐变或量变差异，还要看到在人类共存这一基本社会学原理方面存在的本质性质变差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民族社会主义对国家的概念。因为这里涉及的是本质和结构上的深刻差异。根据西方、启蒙运动和民族社会主义的概念，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学原理：社会原理，这是自由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的基础；社区原理，这一直是真正的德国国家和社会哲学的原则。考虑到这种巨大的对立，即使自由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在细节上可能很有趣且意义重大，但对我们来说最终并不重要。这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是社会，另一方面是社区?我们必须非常准确地理解这两个术语，因为它们是本质不同的两个社会学结构原则。我借此机会指出，英语和法语对其中一种情况有精确的定义，即：社会和 société，但对另一种情况却没有：社区——一个真正的德语单词，我不知道合适的英语或法语翻译，因为社区和社区对我来说似乎与社会和 société没有本质区别。顺便说一句，德语单词“Volk”或“völkisch”也是如此——这证明了概念意义和感性词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最终源于一个民族的存在和本质的最深层原因。首先，我想通过一些基本观点来阐明“社会”和“共同体”这两个词的区别。

对我们来说，“社会”指的是人类作为一个自由漂泊、无根的实体，它已经失去了与自然的真正联系，因此也失去了与作为任何自然表现的基本条件——空间和时间——的联系。社会没有根基，与空间没有联系，只关注转瞬即逝的短暂时刻。**因此，从更深层**

次的意义上讲，社会也没有历史。与之相反，社区扎根于空间，与时间息息相关。它从上帝赐予的宇宙中汲取营养，生生不息，从黑暗的过去直接编织到未来的无尽世代中；它是过去和未来在时间和历史的当下脉动中的统一体。简而言之，社会是由血和土孕育而成的，是永恒的；事实上，它是我们地球上最物质和最鲜活的永恒象征。或者换一种说法：在理想的情况下，社会就是整个人类，毫无秩序或结构地分散在全球各地，转瞬即逝。

人类是所有个体原子的机械外部声音，这些原子被认为具有相同的本质；而社区，即建立在社区原则基础上的国家，正如德国浪漫主义者所说的 国家理论家们如此美妙地描述道，理想中的大家庭就像一个由同一个身体、同一个灵魂和同一个精神支撑的大家庭，由共同的血液和语言、习俗、情感、思维、感觉和信仰所渗透和交织，更重要的是，他们基于共同的历史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顺便说一句，德国浪漫主义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试图用一个美丽的寓言来阐述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从贵族、农民和资产阶级三者的关系来看，它讲述了一场婚姻，其中女性原则体现在顽强、更被动、直接热爱自然和相信土地的农民身上，而男性原则则体现在机动、不断创新、进取和冒险的资产阶级身上。也许这种比较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因为在原始时代，园艺和农业工作作为家庭经济的延伸，可能主要是女性的领域，而男性则主要从事狩猎、战争和贸易。

然而，元首曾将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称为新帝国的两大支柱，他认为，在时代变迁的条件下，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分别是农村和城市中的阶级。他也可以用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婚姻和结合来描述这种情况，以说明民族社会主义社区与最重要的阶级关系有关的有机思维，这与马克思主义对城乡关系的破坏形成鲜明对比。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对国家的基本定义。对我们来说，国家是一个民族的综合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民族是一个有活力的社区的决定性形式。民族又从婚姻和家庭、氏族和部落等原始社区圈中发展而来，因此同时获得了其特定的种族特征，而这种特征也主要体现在国家本身的构想和塑造中。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一旦社区思维开始运转，就应该让它充分发展并得出一致的结论，而不应过早地打断它，更糟糕的是，用一种对社区充满敌意的社会思维取而代之。

现代德国社会学泰斗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去世几个月前，他的社区哲学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弱点，即他总是将社区想象成非常狭隘、私密、熟悉和秘密的东西，几乎完全是私人的。他对社区的思考仍然停留在家庭层面，因此家庭成为他社区哲学的中心，而另一方面，他只知道将国家与无家可归者和背井离乡的启蒙机械社会联系起来。在他 1887 年的早期著作《社区与社会》中，，他仍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而在他后来的作品《社会学概论》(1931)中，他显然追随了托马斯·霍布斯的脚步，当然，他从未达到霍布斯那种严厉和宏大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从民族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必须坚定地指出，只有软弱和不一致才能使家庭中的集体思维陷入瘫痪，而且会导致其被社会思维所取代和摧毁。事实上，这里有一种逻辑，其力量和范围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无法随意揭露和取代。一旦确认了其基础，就必须保持其真实性。家庭是一切社区哲学的根基，两性关系也是如此。但所有真正的社区哲学的中心焦点，只是各自种族决定和特征中的人。这不是狭隘、半生不熟、私密或不公开的东西，而是地球上所有真正活跃和发展的社会学形式中最公开和最有力的东西。

因此，作为社区的核心形式，人民才能成为国家的决定性支柱。然而，对于费迪南德·滕尼斯的总体评价，无论如何都不应忘记，因为他始终坚持社区的社会学原理是人类共存的原始原则，尽管他经常认为，他不得不痛苦地接受“社会”中“社区”日益瓦解这一不可避免的命运。

但每当他认为人类共存的社区基础是不可妥协的，甚至是不可摧毁的——就像他在晚年作品中，特别是对霍布斯的批判中仍然坚持的那样——那么德国的精神遗产就会在他身上涌现，他血液中的声音就会通过他发出。

家庭、民族和种族——总的来说，根据民族社会主义，这些是国家的基本有机力量，由此自然产生了积极的家庭、民族和种族政策，以及新的公民概念，正如我们的纲领第四点所规定的七个字："只有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只有拥有德国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德国人，而不考虑宗教派别。因此，犹太人不能成为德国人。"自民族社会主义党掌权以来，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都是为了贯彻我们对婚姻、家庭、人民和国家的构想，特别是为了维护我们民族的种族本质。我只提其中最严厉的几条：1933 年 7 月 14 日的《防止遗传病后代法》；两项《纽伦堡法》：1935 年 9 月 15 日的《帝国公民法》和《保护德意志血统和荣誉法》；以及 1935 年 10 月 18 日的《婚姻保护法》及其所有实施细则。如果为了这次演讲而详细解释这些基本法律的内容和范围，那就太偏离主题了。我只想强调，正如宪法现在所定义的那样，国民和帝国公民之间的区别从根本上来说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特定区别，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国家的认知，尤其是与任何开明的思想相比。这种差异意味着，在德国，获得公民身份——超越拥有和获得国籍——今后将取决于以下条件：首先，当事人具有德国血统或亲属关系；其次，当事人通过其行为证明其愿意并能够忠诚地为德国人民和帝国服务。

因此，仅仅有血缘关系是不够的，今后只有履行了劳动和兵役的国家荣誉义务，才能获得帝国公民身份。只有到那时，才能获得全部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例如投票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在德国，任何犹太人都无法获得这些权利，因为他无法成为帝国的公民：德国的命运已经重新掌握在德国人手中，而此前它曾被彻底剥夺。帝国法律已经落实了民族社会主义党纲领中最具深远意义的一点。此外，这项德国种族立法还明确表明：我们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立场是原则性的，完全由我们的世界观决定。面对人类从自然界一切深层根源中解放出来，这种世界观的特点是回归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然而，超自然思维却同样鄙视这些法则，尽管是从相反的角度，并且出于对权力的渴望，而不是对价值的迷失，武断地将其废除。但我们知道，从长远来看，人无法摆脱永恒的宇宙秩序而逍遥法外。从最深层次的意义上讲，民族和种族是上帝的思想，尽可能保持血统纯正并发展我们真实的自我的道德责任源于我们的德国宗教信仰。因此，德国民族主义和德国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具有鲜明的特征。我们恢复了“nation”一词的本义，即荣誉，根据这一定义，nasci 的意思是出生，因此本质上包含了血缘关系。但是，当以这种终极生命深度产生的社区圈来衡量时，个人和社会在我们看来都是同样人为的抽象概念。**我们不同意人作为孤立个体原子存在，甚至不同意人作为原子存在，也不认为存在或可能存在普遍的人类。然而，我们绝不是一般概念的名义主义者。我们不能成为名义主义者，因为民族和种族也是一般概念，尽管范围更有限。因此，我们并不否认个体和人类社会确实存在于现实世界中。**

但我们认为,它们的存在仅限于个体同时被束缚在有机生命语境和具体实体社区中,我们认为,正是这些语境和社区赋予了人类社会真实的内在形式和结构、丰富多彩的价值。在此背景下,我必须强调,这种有机逻辑已经推动了德国人在狂飙突进、浪漫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时代的思维,以对抗抽象、启蒙运动的世界,特别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一种新的有机概念来诠释自然、精神、历史,以及国家、法律、经济和社会的本质。这是赫尔德和歌德、雅恩和阿恩特、谢林、穆勒和黑格尔的时代,他们首次提出了普遍的民族思想学说,即对世界的全面有机认识,这一学说至今仍是德国生活和民族文化的真正基础。

为了全面理解战争和战后时期直至今日,我们绝不能忘记西方人民的生活方式:法国、英国和美国在启蒙时代得到了决定性的塑造,而德国的世界观和生活观,尽管受到了各种启蒙运动的思想,正是在风暴和压力、浪漫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时期——解放战争也发生在此期间——德国的世界观和生活哲学最终形成了决定性的独特形态。这种见解对于国家和社会概念的根本差异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亚当·穆勒(Adam Müller)在1809年的《治国要义》中就国家进行了如下阐述:"国家不仅仅是一个工厂、乳品厂、保险公司或商业机构,所以 ;它是一个国家内在和外在生活的全部物质和精神需求、全部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亲密联系,是一个充满活力、无限运动和充满生机的整体。" 1924年3月27日,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人民法庭的闭幕词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国家不是一个经济组织,而是一个国家有机体。" 或者,在如今筹备奥运会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在1810年撰写的《德意志民族》(Deutsches Volkstum)中的话:"没有人民的国家什么都不是,它就像一件没有灵魂的艺术品;没有国家的民族什么都不是,它就像一个没有实体的快乐影子,就像逃避世界的吉普赛人和犹太人。

只有当国家和人民合二为一,才会形成帝国,而维护帝国的力量则存在于人民之中。"最后,应该提到黑格尔,他在1821年的《权利哲学》中将自由国家描述为纯粹的外在和抽象的必要性和理性状态,并明确指出:"当国家与公民社会混淆时 其目的是为了确保财产和人身自由的安全与保护,那么个人的利益就是他们团结一致的最终目的,同样,作为国家的一员也是任意性的。但他与个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关系;因为他是客观精神,个人只有作为精神的一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和道德。"在黑格尔看来,客观精神只是民族精神的另一种说法。

因此,正是民族国家的概念使黑格尔认为国家除了民族精神的存在形式之外一无是处。今天,我们可能比黑格尔更彻底地理解民族精神这一概念,并可能将其从这位思想家的体系中仍然存在的所有绝对主义过度中解放出来。但原则上,它仍然是德国古老伟大的传统国家哲学,我们今天正在进一步发展它,深入探索它,并第一次毫无保留地从中得出结论。然而,我们当今对国家的理解,可以从元首在其著作《我的奋斗》中的话中找到,他在书中关于国家的章节中写道:"国家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维护和促进由身体和智力相似的个体组成的共同体……国家的最高目的是确保维护那些作为文化创造者、创造更高人类之美和尊严的种族元素。

作为雅利安人,我们只能将国家想象为一个民族的有机体,它不仅确保这个民族的存续,而且通过进一步发展其精神和智力能力,带领这个民族走向最高的自由。这有力地

描述了我们对于国家的概念中的民族和种族特征。**尽管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这也从根本上区别了我们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这一点必须强调。法西斯主义思想最终源于国家,将其视为人民的意志意识、精神文化形式。因此,法西斯思想也认为国家是独立形式元素的缩影,罗马法、罗马经济和宗教观念以及罗马古典艺术(其与法律的契合度与北欧日耳曼艺术截然不同)都体现了这一点。**赋予其独特的个性,因此,对象在这里呈现出形式与内容之间牢不可破的自然统一性,而古典的、南罗马式艺术的对象则从外部获得决定性的形式,就像从人为的、普遍的、自成一体的典型法则中获得决定性的形式一样。我们从艺术、哲学、宗教、国家、法律和社会的内容入手,看到其固有的形式;而罗马思想则从形式入手,根据其自身的规律塑造内容:在这里,内容最终成为绝对形成原则的纯粹材料,这些原则超越内容,并应在其自身内承载其意义和目的。人民只是国家统治下秩序的体现——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杰出理论家圭多-博尔托洛托(Guido Bortolotto)对人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精辟表述。在这方面,他与墨索里尼的观点完全一致,后者在 1932 年的法西斯宣言中明确宣称,不是人民创造了国家,而是国家创造了人民。墨索里尼多次表示,在意大利人的思想中,人民首先不是指与血缘和领土有关的事物,而是指意志、精神、意识和艺术,通过民族形成国家。

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国家;二十世纪是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因此也是国家的时代。这是法西斯主义领袖的演讲和著作中传达给我们的明确信息,尽管他们偶尔会偶尔陷入黑格尔关于民族精神的思考以及他将国族视为一个国家有机体的观点,但他们最终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在国家和教会、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尤为明显。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正在实现黑格尔哲学乃至浪漫主义最深刻的意图,至少在健康和创造性的方面。

我们生活在 20 世纪,一个由国家和种族以及由它们决定的国家和政治力量所主导的世纪。总结一下:对我们来说,国家不是一种应被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临时恶行,不是一种外部机制或没有灵魂的权力机构,而是包罗万象的生命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我们的人民的身体、灵魂和精神能够根据其自身的需求得到最好、最丰富的展现 ,但另一方面,国家不是一个自治实体,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只是德国生命和文化实质得以焕发新的活力和伟大之处的形式和载体。我们认为,民族和种族是孕育真正文化的沃土,而国家则因创造性的文化价值而存在。

因此,民族和种族自然成为国家唯一的载体。与此同时,由此产生了政治与世界观之间令人振奋的和谐,这种和谐像强有力的和弦一样,贯穿于民族社会主义的所有教义著作和第三帝国的全部建设性工作中——今天,这种和弦激励着整个德国民族,将其凝聚为一个生死与共的共同体,我们希望并相信,这种凝聚比德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议会还是理事会？ 鲁道夫-荣格

1918 年的情况如何？独裁——当时宣布——必须消失，民主应该取而代之。

没有人能够找到一个单词来描述所期望的东西，这一事实表明，这目标是相当模糊的。从本质上说，个人的专制已经受到宪法机构的严格限制，只是被主要政党的更无情的统治所取代。即使如此，有时也只是表面上的。

权杖滚入尘埃，钱袋取而代之；取代王朝的权力斗争——在许多地方仍然必须与公共福利相协调的——是政党的赤裸裸的自私。贪得无厌的冲动带来了政党之间最站不住脚的联盟，在这种联盟中，每一方都对另一方没有信心，每一方都在寻求挖另一方的好处。对他们来说，只要党运兴旺，他们被委以重任的国家是否因此而分崩离析并不重要.....为了缓解这种弊病，人们采取了各种方法，从这里的团结党派到那里的不稳定的政党联盟。

但这是不治之症。相反，这个制度必须被彻底改变。今天的议会制度，及其一院制结构，迫切需要由古老的德国庄园代表制来补充，这种制度更适合于我们人民的性质。当然，这种制度不会像以前那样出现，因为旧的庄园要么已经部分改变，要么已经完全消失了。例如，今天没有人能够充分体现出 Bürgertum[资产阶级]的概念。

但是有一些职业团体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合适的庄园主代表制的基础，这种代表制的现代表现形式是议会制度——不过，我们并不是指俄国的画面，因为议会独裁的概念和任何独裁，即暴政，一样站不住脚。但理事会的概念[Rätegedanke]本身是好的，它将在政治、知识和经济生活中以最多样的形式实现！但在这里，人们也需要对理事会的概念进行分析！我们也需要警惕片面性和高估性。世上没有万应锭；每一种疾病都需要不同的补救措施。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它的表现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

因此，我们不认为仅靠议会制度就能医治对人民和国家这个痛苦的躯体造成的伤害。但是，它无可争议地能够更新一些生活的表现形式，即经济领域内的表现形式。每种职业都会得到巩固。这些成员作为一个集体，通过他们的代表对他们所在的企业以及所有企业整体施加影响，即对国家和人民的整个经济生活——也就是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这决不会使政党成为不必要的。

然而，他们将从大量琐碎的事情中解脱出来，从而能够转向更伟大的任务，更多文化上和政治家的任务；他们将能够更好地致力于实际的哲学；因此他们也将更少地令人失望。对这个或那个职业被排斥的抱怨——今天这些抱怨太有道理了——将会消失。只有这样，我们的人民才能学会政治思考。自由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伟大的旧观点就会作为胜利者站出来:竞争一方是世界主义(国际主义,世界公民),另一方是 völkisch。

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一直在相互竞争。自从罗马教会首次将其手臂伸向德国土地以来，我们的国家和经济生活的 völkisch 发展就开始被剥夺了。罗马法和资本主义只是一个预先存在的根源的自然和必要的后果，这个根源就是我们民族生活的非德国化[Volkslebens]。援引理事会的概念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接续在几个世纪前的发展中断裂的地方。它绝对应该被载入德国国家的宪法中。这一要求包含在我们的指导原则中。他们说：在职业代表的基础上设立议会第二院。因此，议会将由一个议院和一个职业协会组成，前者由各政党派代表参加，后者由职业协会派代表参加。

Paul Schrekker 博士在他的作品《财产院》中，为这样一个议院勾画了一个计划，我们现在将简要地考虑一下。在他的构想中，选举应根据职业分层制度，以简单多数（即没有比例代表制）为基础决定。**整个国家领土应该只包括一个选区，而那些不劳动的人，如股东，应该被排除在选举过程之外。关于议会两院中哪一个在国家生活中发挥更大的决定作用，还是留给未来的发展吧。德国人本能地倾向于职业代表，甚至在组建政党时也是如此。这在苏台德地区最为明显。**

例如，那里有一个农村居民的政党（农民联盟），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党，以及最近的一个小商人党。这些都是明显比"人民"党更自然的实体，因为它们最终并不代表全体人民，而只是代表某些群体，一个人不应该打肿脸装胖子。从经验上看，职业党比所谓的人民党拥有更少的相互摩擦的原因，这一简单的事实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引起我们的思考。

这可以解释为，人民党是集权主义的，也就是说，在其最内在的存在中，它们本质上是非德国的实体。（民族社会主义党派不是一个纯粹的职业党，但也不是一个今天经常被误用的人民党）。

自然，所有代表机构的整体结构必须从头开始实施。除了各议院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与它们协调的政府来进行咨询和管理。德国的土地应该被领导和管理，而不是被统治!在我们的德国国王制度中，在（被虚假的荣耀所蒙蔽）堕落为罗马的统治之前，曾经在我们的德国国王制度中得到体现的领导理念[Führergedanke]，将再次崛起！这就是我们的领导理念！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现在要讨论今天争论得沸沸扬扬而又缺乏理解的那个问题："自由国家（共和制）还是君主制？"日耳曼诸国和古老的德意志王国就其性质而言，与其说是君主制，不如说是共和制。即使是中世纪的德意志帝国，在其早期也可以说是一个贵族共和国：选帝侯从贵族中选择（选举）国家元首。

只是后来，随着罗马中心主义的统治理念[Herrschaftsgedanke]越来越深入人心，最终在公国制中达到顶峰，才第一次出现了今天被称为"君主制"的国家形式。如果有人选择将一个有王室领导的真正的人民国家描述为君主制，那我们也无所谓；它也可以被称为共和国。重要的不是名称，而是内容。我们认为王冠是一种象征；但我们反对统治权和神权的概念。

元首完全可以被称为国王，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地位是由人民的恩典决定的！德国人民的国家 1918 年 10 月 21 日，该党在维也纳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宪法宣言，其结论是："自由、社会的泛德国万岁！这个自由的、社会化的泛德国是未来的德国人民的国家，这个未来将越发接近我们的人民能够从国际和平主义的言论中解放出来，从他们目前所受到的每一个外国——主要是犹太人——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并找到回归德国精神的道路。

我们希望，我们已经足够清楚地标出了通往这一未来的道路。它的路线是通过知识、精神和经济-社会的更新，以及通过物质条件的改善。这也是普鲁士-德国在耶拿战败后成功走过的道路。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去走这条路，今天这条道路是更困难还是更危险都不重要！唤醒并不断塑造这种意志，只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任务之一。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到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它的功能。我们试图在那里概述的德国法律的最基本特征，和它必须构成的基础。那么，它的结构应该如何设计呢？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立即明白了一件事：一个德国人民的国家不可能建立在西方民主的原则之上；这些原则不过是为犹太人的拜金主义服务的谎言和欺骗，他们利用这些原则来支配和剥削各国。德国的民主——如果我们希望继续使用这一表述——不能意味着议会统治。但是由人民[Volksherrschaft]统治，也就是民主一词的含义，反过来也不能作为一个概念来认真对待，因为希望统治自己是一种荒谬的行为。

因此，我们将更准确地把这个词重新定义为"为整体服务"，即"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正如腓特烈大帝——他确实是伟大的，因为他也懂得放弃的艰难艺术——公开渴望成为国家的第一仆人，我们也都希望成为人民的仆人，人民的福利是我们心中最重要的。必须有领导人[Führer]，也必须有被领导的人。当然，那些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元首的人，实际上远远没有真正成为元首，因为领导人不能任命自己，也不能被任命；相反，他们的当选只是证实了他们存在的事实。正确的元首诞生了。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某种无法确定的东西，为他赢得了人心，为他提供了群众的信任；他们感受到了在他身上闪烁的神圣的火花。这种内在的火焰，驱使他无情地前进——不关心他自己的个人福祉——也转移到他们身上。他们追随，因为他们必须追随!领导权[Führergedanke]的概念——与统治权的概念相对，后者一般只基于最粗暴的武力使用（见苏维埃俄国）现在应该在德国人民国家内再次确立自己的地位!至于这位元首是被称为"人民的国王"还是"总统"（他能不能用德语的"herzog"这个头衔？）基本上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为人民谋福利上的人，他的唯一愿望是成为他的人民的仆人。然而，元首不可能独自完成所有的事情，即使他是具百倍的最杰出的影响力的人。**

他需要顾问，即一个政府和一个代表大会。根据我们在前几章中的解释，并考虑到"议会制度"在德国土地上的惨败，这不可能是今天已变得如此普遍的议会制形式，它不可能来自政党之间的关系，这不应该需要任何额外的理由。今天的绝对议会制是一个必要的过渡；曾经被严重高估的、与德国民主完全无关的议会制，只需自我补救。诚然，这将涉及到牺牲，但为了实现前进，什么时候不需要这种牺牲了？那么，应该用什么来取代议会制的地位呢？在"议会或理事会"一章中，我们已经强调了两院存在的必要性，一个是政治院，一个是经济院，并在那里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根据我们人民的意愿，职业代表可能很快会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议院将以政党为基础，另一个则以职业协会（工会、合作社）为基础。无论如何，这种安排已经是一个重大的改进，因为它将减轻许多摩擦的根源，并将唤醒我们的意识，即我们是一个集体整体的成员，无论好坏，我们都与之密不可分。鉴于上述情况，很明显，只有德国人可以参加德国议会，**而那些外国血统的人则被排除在外。仅仅这一事实就有助于消除今天相互煽动行为的很大一部分。**

我们来自慕尼黑的思想家同行，塔菲尔博士，提出了意义更为深远的建议。(PaulTafel 博士:新德国:一个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议会国家。Deutscher Volksverlag，慕尼黑)。由于对我们来说，党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由于民族社会主义政党根本不是为议会席位赢得选票意义上的党，我们可以放心地把他的观点变成我们自己的观点——尽管今天的政党迟早会灭亡。对于德国人民（他指的是只有德国血统的人），塔菲尔想建立两种不同的结构：**一个是职业性的，一个是政治性的。**

两者都从最底层开始。如果说最高层次的职业结构代表了帝国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统一性，那么政治结构则考虑到了其不同的地区特征。因此，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德意志帝国将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而在政治上，它将是一个联邦国家——而且不是建立在今天的联邦国家（这是我们历史上一些相当不愉快的事故的最终结果）上，而是建立在我们人民的自然基础上，即自然邦。这一个令人愉快的想法是肯定的!

职业代表团从市镇开始。**一个行业团体（农业、交通、公共教育等）的每个德国劳动者，无论他们是雇主还是雇员，都联合起来组成"地方协会"，并通过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其执行委员会——"地方理事会"。**每个地方理事会从其成员中任命一名或多名"地区理事会"的代表，而这些代表又在"高级理事会"中拥有一个席位。"省理事会"从"高级理事会"中产生，最后从省理事会中产生"最高理事会"。在职业金字塔的顶端是"帝国经济院"[Reichswirtschaftskammer]。**在这里，每个职业团都有一票代表权。为了使经济院不至于堕落并将所有权力据为己有，而且因为我们最终不仅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也是公民、家庭主妇和知识分子，他们的需求既是精神上的，也是经济上的——总之，因为国家不仅仅是一个百货商店，而且必须有一个"政治院"或"人民院"作为一个类似的机构与它并存。**

然而，根据塔菲尔的说法，各政党不应按照目前的做法向这个议院派出代表；相反，它还需要从头开始。初级选举"[Urwählergemeinde]是这个政治结构的核心。它包括城市地区或农村地区的每一个居民，不分年龄和性别，只要他们有德国血统，并且向国家或当局缴纳某种形式的税款，无论数额有多小。在初级选举区之上是"区议会"，区议会向其派遣代表；在这些区议会之上是"地区议会"（省、地区）；

最后，在其顶点是"帝国人民院"[Reichsvolkskammer]。除了这两个并非旨在成为议会，而是议院之外，还有一个政府。它不应该仅仅是两院集体意志的执行机关，还应该是两院的同僚和指导。这在法律的起草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今天，政府通常被议会要求就某一问题提交法律草案。

在塔菲尔的制度下，情况恰恰相反：相反，政府要求一个或两个议院提交报告，产生一个最终草案，然后提交给国家元首批准。因此，人民实际上是在制定自己的法律，这在议会民主制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从一开始就防止代表机构内部出现对权力的渴求，国家元首将有权拒绝议院作出的所有决定。为了避免任何潜在的滥用领导权的行为，即大官僚主义权力的渴望，通过使用"公民投票"（公投）来限制这一权利将是至关重要的，即通过民意调查或对拟议的立法进行民众投票。**

鉴于上述情况，国家元首被称为什么可能相当不重要，因为我们刚刚概述的国家是一个共和国，即旧日耳曼意义上的人民国家，即使有一个"国王"作为其首脑。当然，这不可能是一个由"神权"选择的国王，而只能是由"人民的恩典"，通过民众投票选出的。不是戴着它的个人，而是王冠本身，它是未来德意志帝国的象征，一个在其所有多样性中统一的帝国。现在，就经济和政治结构的目的和活动范围说几句。整个国家领土的贸易集团就其性质而言将是一个自治机构，其目的是将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提高到可能的最高水平。

它将同样是一个慈善协会、合作社、行会（兄弟会）和卡特尔。它的下属机构也将被分配某些具体任务——对专业培训、工作设施等进行管理。最底层的团体，即地方分会，是特别重要的。它将主要服务于教育目的。在它的定期会议上，它将负责让其成员了解本国和外国的经济状况，了解所有的改进等等，它还将负责唤醒和保持其成员对他们共同的、共有的联系的认识。当然，一开始确实会有冲突；但是，很快就会有一种凝聚力产生。初级选举处也将主要负责教育工作。

当然，它的工作将是政治性的，首先是文化性的。在我们看来，塔菲尔的德国议会国家是一个得人心的想法。如果今天的德意志帝国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它很快就会开始对所有的前哨基地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当然，这需要改变目前对一切外国事物献媚的制度，最重要的是，消除犹太人的影响——这是新德意志帝国的绝对必要条件。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司法行政 帝国司法部长

有人说，即使是通常努力客观判断的批评家也会说，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废除了法律，取而代之的是任意性。持这种观点的人一定是完全不了解民族社会主义所坚持的原则和德国实际存在的条件。新的德国国家建立在这样一个公理之上：法律是支持民族团结和代表民族的政治结构的主要支柱之一。

不仅如此，深深扎根于国家生活并被每个公民认可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概念是国家整个文明的基础。鉴于法律和正义是新德国开展的每项活动的根源，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最佳意义上的宪法国家。然而，对这个词的解释决不能按照这样的理论：个人的利益必须被视为所有立法的主要主题，必须建立一个全面的控制体系，以保护个人免受国家的过度干预。

这一学说在德国已不再被坚持。

民族社会主义将民族共同体视为一个组织，它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其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当我们谈论民族时，我们并不局限于我们碰巧属于的那一代人，而是把这个词扩展到包括我们之前的几代人和将会继承我们的几代人的总和。这种观点在民族社会主义学说中得到了体现，该学说声称"集体先于个人"。它主导了民族社会主义政策，其自然推论是，个人的权利必须服从于社会的权利。**个人享有的保护不是基于他们的特定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假设，而是基于他们所有人都被视为国家社会的宝贵成员，因此应该得到保护。**

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合理地声称是一个宪政国家，是因为它的法律旨在促进社会的利益，而且——根据构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的信任——每个公民都可以放心，他对正义的要求将得到满足，而且每个忠诚地履行他对社会的义务的人都可以期待从国家机关得到同等程度的忠诚。过去四年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令人信服地表明，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为每个人提供安全的生存基础。到处都是荒地变成了生产用地。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在数月甚至数年来一直被失业的阴影所困扰，现在已经有了工作。民族社会主义政府正在不断努力加强国家的国防力量，从而保障每个公民的生活和工作。

民族社会主义的正义思想与前政权时期的正义思想有根本的不同。将其转化为实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涉及到两方面的必要性。首先，必须通过大量新的立法；其次，必须对那些按照新的精神来管理司法的人进行教育培训，使他们能够胜任工作。在这两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仍有更多工作要做。然而，过去三年的成就足以说明所遵循的路线。如果我们忽视了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就不可能正确评价已经发生的变化。我指的是德国法律和德国法学的统一。

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一直没有统一的法律。每个联邦州都有自己的法律体系、自己的法院和自己的法律权威；尽管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某些国家立法行为逐渐建立了统一的外表，但法律仍然是以各个州的名义而不是以帝国的名义实施的。多年来，这种状况一直是许多德国人感到遗憾的话题，但事实证明，彻底的改变是不可行的，因为每个国家都嫉妒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殊权利。民族社会主义，除其他许多事项外，代表着一个统一的帝国和一个统一的法律制度。它不允许过时的特权阻碍进步的道路，因此大胆地废除了它们。所有的州都被置于帝国的最高权威之下。这样一来，独立的司法系统就被废除了，所有德国法院现在都以帝国的名义进行司法审判。这一伟大变革的实际重要性——它的开始时间是 1935 年 4 月 2 日——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现在，司法管理和新法律的制定都由一个人负责，即由帝国司法部长负责。法院在日常工作中获得的经验现在可以直接提供给上级机关，从而可以用于立法目的。

此外，全国所有司法机关的统一组织，使之有可能使所有这些机关了解立法者的意图，而不必求助于迂回的方法。对于一般公众来说，旧制度由于其巨大的多样性而成为无尽的烦恼和困难的来源；但所有这些困难现在都消失了。当我们说，通过统一全国的司法行政，德国人民一个世纪以来的渴望得到了满足，这的确不是夸张。不言而喻，法官的法律地位没有受到这一巨大变化的任何影响。1933 年 3 月 23 日，元首在对帝国议会的讲话中，庄严地申明了他们的独立和不可撤消的地位；此后，类似的声明也一再出现。这种独立性始终是德国思想和感情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我们对宪政国家的看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法官职位不属于国家行使权力的范围，因此与政府下的所有其他职位不同。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司法职能的行使目前正在发生变化的事实。与英国的普通法不同，德国的法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书面"法律。法官需要参照法典中涉及他所审理的案件的特定段落来做出决定。在过去，这种必要性常常导致所作出的判决——尽管它们符合法律条文的规定——未能充分考虑到现实生活的事实。

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打算免除法官的上述必要性，而是期望他们按照基本原则解释法律的措辞，并以公正地满足德国人民的重要需求的方式适用这些原则。为了使法官能够满足这一要求，他必须与弥漫在新德国的精神紧密而持久地联系在一起，他将成为这种精神的活的体现。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表达整个民族对法律至上的信仰。这至少是我们对法官应有的理想。这也是我们为法官职位培训年轻人的目标。我们相应地重新组织了培训，并相信它不仅将为法律专业的学生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而且还将使他们熟悉国家种族生活的基础，从而使他们能够在上述意义上行使他们的崇高职责。

与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司法行政有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律师。我们对他的期望是，他不仅把代表客户的个人利益，而且把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作为自己的职责，以便真正的正义能够得到维护。德国律师已经实现了这一期望，并获得了国家和法院的信任，其程度在以前并不总是存在。民族社会主义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不合格的顾问在法律问题上的地下影响。除非持有政府许可证，否则任何人都不得以专业身份提供法

律咨询；而这种许可证只能由那些具有法律规定的必要资格的人获得。与 1933 年以前的情况相比，刑法和刑事诉讼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战后，人们越来越习惯于过度关注罪犯的个性，发现他的行为可以减刑的情况，而忽略了社会的利益和受害者的利益。因此，在该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了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实施法律规定的标准处罚几乎是一种例外，而适用减刑情节或甚至免费赦免几乎成为一种规则。在监狱和感化院里，过度的温和也占了上风，囚犯的生活被弄得过于舒适。1933 年之前，定罪人数的不断增加证明，这种制度并没有提高打击犯罪活动的效率。如果我们想充分了解民族社会主义所应该做的任务，就必须了解这些情况。政府希望有效地保护社会和个人免受犯罪分子活动的影响，并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以确保在确定刑罚时主要关注社会的利益。人们认为，就成年罪犯而言，任何教育制度都不可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宣判的刑罚要足够重，以阻止罪犯继续犯罪。此外，对每一个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精神伤害都要进行适当的补偿。

在目前的判决执行制度下，惩罚的威慑力再次得到了应有的认可。由于我们的目标是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大的保护，我们为法官创造了特殊的便利条件，使他能够对那些有理由被视为对社会构成永久危险的罪犯施加额外的惩罚。法官现在可以下令在惯犯服完刑后对其进行关押。经常滥用其行业或职业进行犯罪的人可以被剥夺从事该行业或职业的权利。最后，对于那些被证明是违反道德的惯犯的人，可以根据法官的命令对其进行绝育。刑事诉讼程序的方法已经尽可能地加快了。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使被告难以或不可能为增加查明真相的难度而延长诉讼过程。然而，对被告由律师代理的权利没有任何限制。由于这些措施，我们发现在许多案件中，例如违反交通规则的罪行、暴力行为等，都有可能使惩罚与罪行同步进行，而没有丝毫可避免的延误。

我不需要指出，这一制度大大增强了人们对法律和执法者的尊重，也增强了人们的普遍安全感。德国人民在目前的时刻正在经历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过程。任何阻挠这一进程的企图都值得特别注意，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们设立了特别法庭来处理这些问题。然而，这些法庭并没有被赋予特殊的权力，而是像我国法律规定的所有其他法庭一样，属于普通法庭。叛国罪和类似的罪行由人民法庭审理，它是国家的高级法院之一。它由专业法官和经验丰富的非专业法官组成，后者拥有与专业法官相同的司法权。与德国所有其他法院一样，人民法庭和组成它的法官都具有独立地位。适用的程序与适用于所有其他刑事案件的程序相同，而且被告有权利用所有通常可用于其辩护的可能性。就其物质方面而言，刑法在过去三年中也经历了一些重要的修改，但由于篇幅有限，无法详细描述。

然而，我想提请注意 1935 年 6 月 28 日通过的法律在刑法中增加的一个条款，因为它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废除了这样一条格言，即除非在现行法典中特别提到，否则不能对任何罪行进行惩罚，并使法官能够对那些虽然没有特别提到，但其性质却需要根据法律的主旨和健康的民族情感进行惩罚的行为进行惩罚。**因此，"成文法"已经不再是我们了解是非的唯一来源，尽管它将继续是主要来源。**立法者意识到不可能使"成文法"的规定全面到涵盖所有实际遇到的情况，因此采用了英国人民自古以来就熟悉的原则，因为英国法律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成文法"。到目前为止，它的大部分是来自于古代的习惯，被称为"普通法"。在我国，对或错的问题曾经完全按照法律的措辞来决

定；但这种形式上的观点现在已经被实质上的观点所取代，根据这种观点，任何有损于社会利益或与之相冲突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我们相信，我们越是把法官从以法律条文为指导的必要性中解放出来，越是使他能够把他的决定建立在法律的活生生的精神之上，对法律的尊重就会变得越大。我只能简单地提到我民法中的创新和民事案件中应遵循的程序。

虽然迄今为止在这些领域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其中的某些缺陷已经被消除了。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已注意确保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拖延，并确保尽可能迅速地解决当事人的索赔。与诉讼当事人宣誓有关的某些过时的手续已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有弹性的制度——与英国使用的方法不一样。对强制销售也给予了特别关注。经济的发展使得有必要对严格执行有关这种销售的规则进行限制，只要它将破坏债务人的经济存在并损害社会的利益。然而，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努力对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公平调整。在过去三年里，在民事和经济立法领域颁布的众多法律中，有几项值得特别一提。因此，房地产的个人所有者对相邻财产可能拥有的权利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减，以利于对社会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机构。

至于专利立法，给予发明者的保护已经扩大，他的职业荣誉也得到了特别认可。另一方面，只要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就可以限制他的权利（支付赔偿）。**当双方显然没有真正打算以通常的方式缔结婚姻，而只是希望通过结婚获得一些外部利益时，可以拒绝发放结婚证。**只要收养只是为了达到某种微不足道的目的，如获得一个好听的名声的权利等，就会被禁止。最后，我想提到两个例子，它们恰当地说明了法律认为它对新德国负有的责任。因此，在司法部的配合下，代表房东和租户的组织分别起草了一份标准的租赁协议。它的条款体现了对双方利益的公平调整，而不仅仅是为经济上较强的一方服务。另一个例子涉及一种安排，我们称之为"人民的法律指导"。管理法律的人不仅急于弥补因违反法律而造成的损失，而且还希望尽可能地防止法律被违反。为此，法院每天获得的经验被收集起来并提供给全体人民。上述说明表明，在法律管理方面，如同在其他事务方面一样，民族社会主义政府决心保护德意志民族的和平，并尽其所能地促进其发展。

国防与经济　彼得-隆

在许多人看来，将国防政策和经济政策合二为一似乎毫无道理。然而，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这样做。没有士兵，农民就不可能从事他的和平劳动，工业就不可能销售它的产品，商人就不可能在公路上和海上安全地运输他的货物。强权政治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强权政治只有在强大军队的炮火下才能实现。

人民不是为了经济而推动经济，士兵也不是为了战争而发动战争。人民，尤其是像德国人民这样挤在狭小空间里的人民，为了养活自己而推动经济，甚至是合理到最小细节的经济。**军队的任务就是为饥肠辘辘的人民争取可以获得食物的空间。**

这就是为什么士兵和农民首先是相互依存的。如果农民不迁徙到这片土地并用犁耕永久地征服它，征服者的军队就永远无法守住被征服的土地；如果士兵不保护边界，农民就永远无法守住他们的土地。

看一看今天的德国东部边界，就能比历史上其他一百个例子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但是，最靠近一切经济来源（即土地）的农民才是人民真正的衣食父母。**民族社会主义愿意承认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既得权利，并千方百计地防止永远扎根于土地的农民被赶出土地，像腐烂的糠秕一样被扫进城市，相反，它还不惜一切，努力使城市松动，让年轻人离开街头，在农村安家落户。**

而不是通过接受实际上是永恒的贡赋[利息奴役]来永远奴役人民，最终使所有劳动人民沦为奴隶主任意摆布的宠物，而不是使人类堕落，与成为布尔什维克国家制度下毫无意志的苦力和被外国人奴役，民族社会主义希望让德国年轻人通过慷慨的定居计划，以和平的方式征服土地，有朝一日，他们将作为自由人在自由的土地上过上与德国人民相称的生活。可以过上健康的生活。即使是在帝国目前狭小的范围内，如果允许成千上万的家庭开垦丰富的荒地，他们也可以获得住所和面包。

据计算，仅在六年内，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创建一百万个农场，成本约为 80 亿美元。大家都应该清楚，只有实施这样的安置计划，才能恢复真正的国民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国家、只有这样，麻烦的贸易条约的规定才能被外国废除，作为外国商品消费者的德国人民才能作为一个力量因素站起来反对外国商人、依附于他们的政府及其军事机器。

当然，只有通过实行义务劳动和教育人民放弃大城市的所谓享乐，过上简朴的农民生活，才能在内部实现这一解决计划；而另一个先决条件是，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应有助于保护国家的边界，并通过军事教育来支持这项伟大的工作。因此，民族社会主义者极力要求实行义务兵役制，这并不意味着廉价劳动力将有助于压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而是意味着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德国青年将有机会通过这项法律为自己征服新的领土，并在规范的劳动生活中接受教育。**民族社会主义者还要求实行义务兵役制，作为教育青年保护整个国家的进一步手段。**

他们认为，其他国家要求德国人民彻底解除武装，却利用从他们身上榨取的贡品来大规模重新武装，目的是一有机会就再次攻击手无寸铁的德国人民，并以人道的名义掠夺他们更多的生存空间，这是一种可耻的愚蠢行为。

上文简述的人民定居的实施还将为许多其他职业提供工作机会；因为一百万农民家庭需要教师、商人、手工业者、医生等。出于民族观，**民族社会主义还主张实行枪炮关税政策。它认为，为了保护国内生产者的生存，这样做是必要的。如果农业的目的是尽可能利用自身资源养活国家，那么通过关税保护国内农业就是合理的。我们不能指责民族社会主义者试图在这里以及通过其他手段将自己的国家与外国隔离开来。他们只是采取了一种非常合理的观点，即只进口那些德国需要但国内无法生产的商品，从而确保资金流主要流向国内市场，而不是帮助加强外国资本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的奴役。**例如，苏维埃俄国在谷物、木材、火柴方面的倾销削弱了所有的竞争，而这种倾销只是通过奴隶劳动才得以实现的，不久之后，苏维埃俄国还可能在棉花、羊毛、亚麻方面进行倾销，从而严重威胁到整个世界经济。难道我们就应该让德国农民和产业工人在外国的祸害下沦落到与俄国平民库里一样的悲惨的无助境地吗？**德国劳动自由既要对抗西方，也要对抗东方**，这必须成为民族国家艺术的目标。

民族社会主义从不同角度看待资本、资本的形成和资本的交换。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借贷资本，因为借贷资本一方面把原本只是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变成了昂贵的商品，另一方面迫使工人以劳动力的形式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卖自己的资本。与此相反，民族社会主义希望货币在国家的监督下，像血液一样涓涓细流地流过人民的经济活动体，滋养所有细胞，刺激劳动，使国家商品的生产、增殖和公正分配成为可能。民族社会主义希望通过国家对经济心脏（即银行）的监督，打破迄今为止贷款资本对利息的束缚，防止经济躯体被抽干血液。这并不是说应该或能够废除利息本身。民族社会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立即废除利息会导致流动资本的流通陷入危险的停滞状态；但他们始终会努力把利率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希望，希望后人有一天能够彻底废除本质上不道德的利息，即从货币所有权中不劳而获的收入。**此外，**民族社会主义还反对黄金货币。**

当我们了解到各国人民的黄金债务高达 15000 亿，而全世界的实际黄金存量估计只有 400 亿金马克时，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这些数字是正确的，并且继续利用少数人手中的黄金存量实行高利贷，那么人类的全部劳动都将沦为纯粹的奴隶劳动。**然而，在不同货币的基础上创造价值稳定的货币是可能的，这种货币建立在实际存在的产品或生产可能性的基础上，正如租印花税的短暂历史所不幸证明的那样。

今天的条件证明了老一辈国民经济学家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担心人们会大量繁殖，以至于现有产品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由于技术的发展，今天的仓库、储藏室和储备库中的商品已经堆积如山，只要这些人有钱购买，这些商品就能大量供应众多的人。**

今天，人们争先恐后地寻求出口机会，今天，他们在寻找世界市场的土地，以便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国内的生产。而世界市场海面也被堵塞，不再具有吸水性。只有加强国内市场才能维持生产，而只有本地货币而不是国际货币使商品交换成为可能，国内贸易才会富有成效。基于这些考虑，关于进出口的思考就结束了，并**显示出民族社会主义海关政策是国家劳动的促进者。**

根据让尽可能多的人独立工作的原则，民族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现代企业和类似商业企业的形成，因为它们的出现总是意味着对一些小商人独立性的破坏。

民族社会主义者不认为，大企业的形成是必然的，人们必须袖手旁观。今天，**同样一些人支持依赖于借贷资本的大公司或托拉斯，并想把以前独立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已成为在经济上依附于公司的工人）仅仅看作是时代的牺牲品，而另一方面却要求摧毁大地产，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在这里，我们不能说大规模企业更经济，生产过程更廉价，产量更高更好，所以泰勒主义**[工厂管理方法]**是必须接受的时代要求。**

从心理上讲，泰勒主义会导致工人个人的迟钝和僵化，他们只会进行机械操作，而这些机械操作在无意识的千篇一律中也可以由任何机器完成。如果你真的想传承文化并为一个民族创造新的东西，你就不能像驾驭马车一样驾驭人。

文化总是与精神和智力发明有关，如果把人变成机器，就会扼杀他们的发明欲望，并随之扼杀文化。文明不能替代文化。我们德国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手工艺人，但对工厂本身来说却一无是处。当然，必须要有大型工厂，特别是在有大量人口

需要快速、大量供应的地方，或者在必须为特定用途提供特别大量的统一制造产品的地方。小农场无法充分供应大城市，当然，大型农业企业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几个锁匠无法制造火车头，事实上，只有在配备了所有现代化辅助设备的铸铁厂才能制造出单个的火车头铆钉。但是，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试图将整个创造性的民族打造成为一个像车轮一样的巨大工业机器。虽然这似乎与人民的有机结构的思想相矛盾，但这个矛盾只是表面的。

在提倡泰勒主义时，人们忘记了在其极端实施过程中，活的器官会被分解，从而石化。但化石化的细胞再也无法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因此，我们的行为违背了自然规律，即发展规律，从而加速了最终的固化，即生命的终结。

今天，机器不再被视为夺走人们面包的创造物，因为它使人们的劳动变得可有可无。相反，机器给人类带来了好处，它解放了工业中的劳动力，使他们从枯燥的机械工作中解脱出来，从事更高的工作或对自身更有益的工作。但这些任务总是在农村。

如果一个民族的大部分人在户外生活和创造，为自己和孩子们提供足够的空间，而最小的一部分人却在无数机器的帮助下制造工业产品，这些产品是今天人类生活和共同完成工作所必需的，那么这个民族该是多么健康啊！只有那些看到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那些数着被机器瘫痪了劳动的失业者的人，才会永远诅咒机器。

当然，有些人认为，大多数人并不追求更高的发展，他们在枯燥乏味的职业中过得很快乐，尽管这样也能养家糊口，只有当他们被迫对自己的体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甚至是精神上的要求时，他们才会不快乐。

对此，我们必须回答，**如果大自然的领导者不偶尔迫使他们的同胞也发挥自己的脑力，那么即使到了今天，人类仍然会停留在动物的发展阶段。卢梭说，不自由的人必须经常被迫获得自由，这并非毫无道理。人的任务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幸福，而是用精神的翅膀将自己托起，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幸福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目标；因为如果一个人曾经达到过这种幸福的境界，它很快就会使人厌倦，或者从长远来看并不总是可以被感知到，然后人们将不得不再次寻找新的幸福，并确信这也不会是真正的幸福。因此，民族社会主义不是要让人民幸福，而是要教育他们成为有思想的劳动者。公正的工作要求公正的工资。**

根据里卡多的铁工资定律，依赖体力劳动的工人得到的报酬是不公平的，因为他的劳动所得永远不会超过最低生活费。

但是，即使在提出最低生活费的概念时，铁工资制的思想支柱也开始摇摇欲坠。不存在普遍有效的最低生活费。德国工人的生活必需品要比中国苦力或北非皮毛猎人的生活必需品高出许多；事实上，在德国工人自己中间，所谓的最低生活费无疑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设定不同的水平。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阻止外国工人的移民，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德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更缺乏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德国人无法与捷克人竞争，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也不能降低到波兰农场工人的水平。如果我们想通过允许外国劳动力移民来对德国工人施加经济压力，那么我们就会部分地使德国人口减少，部分地使德国人民的文化水平被亵渎地降低到一个意味着落后发展或萎缩的水平。

此外，可以说，德国工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即使是波动很大的最低生活水平，也必须被看作是合理工资的极端下限，这样，工人就必须能够从他的工作中获得利润，以偿还他作为劳动资本投入到工作中的力量、此外，他还必须有足够的余钱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体面的住所、简单但丰富的饮食、必要的衣物和持家设备，以及保障未来的必要储备。

国家的任务是保障工人及其家庭的精神发展。民族社会主义为了确保德国工人从工作中获得最低限度的收入，希望产业工人分享其工作的工厂的总利润，而不希望工人获得的利润流入不劳而获的股东等的腰包。

如果工人在利润中的份额不是以现金支付（经验表明，每年支付的数额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如果担心工人从无利润或收支不平衡的企业流向高利润的企业，从而扰乱整个经济，但如果把这笔钱提供给工人用于结算，或投资于保险和日后支付，这也符合民族社会主义的观点。如果人们用工人的劳动所得为他在外面盖房子，也许还可以借助国家监督的工人利润分享基金，并且如果建立一个利润分配方案来弥补各行各业不同的利润分配水平，**工人就会感到自己是一家之主，而不是受人恩赐**，这样他也可以重新扎根农村。

当然，如果大型工业企业将更多的部门单独迁往农村，利润分配的问题就可以按照建议的方式更容易地得到解决。这样，工人就可以省去往返工厂的长途跋涉。

同样，民族社会主义也反对百货商店、连锁店和消费者合作社等大型商业企业。举例来说，在一个中等城市里，百货商店形式的东方旧货市场不可能夺走或减少许多小商人的面包。

作为一个自由人，自负盈亏的商人对国家的价值远远高于百货商店的雇员、消费者协会的会员证持有者或分店的经理。

在这方面，**民族社会主义也是为交易者的自由而战。**当然，这种商人自由观也以商人的内心自由为前提。**民族社会主义并不为拜金主义的悲惨仆人而战，也不为那些只把赚钱当作人生目标，然后在知道如何巧妙地蒙骗顾客时就认为自己特别有进取心的杂货商而战。**

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是汉萨时代的皇家商人，他们认为自己是整体的仆人，拥有不可动摇的荣誉感，不仅在外表上维护自己家族的声誉。早在十七世纪，德国商人就为其主人的儿子们写下了未来的准则，今天，人们仍然期望体面的商人能够效仿这些准则。商人阶层的愿望，例如：.....："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良好信誉。努力在适当的时候满足你的债权人，并与每个人保持正确的账目：因为正确和简短的账目可以保持最好的友谊"。"要像对待自己的仆人和佣人一样，保持和照顾好他们，还要好好照顾他们，**永远记住主人自己才是最好、最忠实的仆人。**给车夫、水手和工人合理的工资：这样，将来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才会更愿意、更忠实地为你服务。"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在那些一般紧急情况下离不开的物品上咒骂自己，比如粮食之类，因为任何囤积居奇的人都会招致全国人民的唾弃。"

今天，我们贸易的祸害是赊购和赊销，是中介贸易的高利贷，它经常毫无道理地渗透到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是劣质商品的贸易。在贸易中，**古人有唯一正确的原则：这里是货物，那里是现金。在高利贷时代，这种简单、诚实、易于核实的程序正日益**

消失。如今，人们也可以通过虚空交易赚钱，不再认为远期交易有任何不道德之处。在一定限度内，中间贸易是必要的；**因为事实上，所有的贸易，如果不是由生产者直接进行的，都是中间贸易。**

然而，从民族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那些中间商被认为是特别有害的，因为他们的全部商业工具就是一个笔记本、一支铅笔和一部电话，他们用自己从未见过的商品进行交换。这些讨价还价的人活跃了证券交易所，但却破坏了诚实的交易，无论如何都会损害整体利益。物以稀为贵，这是一个古老的道理。尽管如此，今天的人们却常常以牺牲商品质量为代价来压低价格。廉价的垃圾、无味的乡村食品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就好像是在利用黑人做生意一样。但在这里，一切抱怨都无济于事，恶性循环始于缺钱，止于缺钱。鲜血是创造良币的先决条件，只有当脚踏实地的良币在德国市场上流动时，国内的经济才会复苏，德国人民才会再次成为经济强国，外国市场也会心甘情愿地向其开放。

因此，这不是一个为了做生意而做生意的问题，就好像一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消磨自己的生命时间一样。毫无疑问，正如李斯特所正确认识到的，**经济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产力。**

因此，如果我们从有机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过程，我们就必须把经济描述为人民身体中的一个生理过程，这就好比消化物质在有生命的个体身体中的消化和加工过程。正如人体中的营养物质通过专门的器官逐渐加工成葡萄糖，同时排出不能再被消化的废物，而这些血糖又通过血液供给细胞进行积累一样，大自然赐予的食品、劳动资料等也要经过人民劳动者的加工和转化，并必须提供给单个同志作为资本道路上的营养和进一步的转化，而这是根据绩效原则进行的。

拥有一大笔流动资本，就不能过奢侈、贪婪和享乐主义的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它的正确性已被生活所证明。伟大的商业领袖在精神上、体力上和物质上都被他们的财富所占据，以至于他们可以留给自己的闲暇时间和生活享受比工人要少得多。

因此，是否应该征用他的财富？是否应该切断他的劳动，让官僚取代他的位置？除了民族社会主义，哪个有经验的人还会想用其他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以及逻辑上随之产生的其他许多问题呢？民族社会主义努力促进的正是这些力量、精神资本、体力资本、技能资本或金钱资本，只要它们能增强全体人民的力量，民族社会主义承诺要摧毁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只要它表现为一种内在腐朽和自我毁灭的拥堵产物。

无意义的形式、令人反感的贪食和对享乐的沉迷破坏了大众道德的基础，它通常只是被驱使，而并非来自于自己的劳动，作为借贷资本，它从未提高过人民的生产力，从未让人民受益于整体，而只是为自己剥削人民，直到自己的生产力枯竭为止，只有当自己的生产力枯竭时，它才会像寄生虫一样寄生在死去的受害者身上而死去。

民族社会主义拒绝这种资本主义，因为这种高利贷资本主义永远不会显示出自己是真正的民族的、建设性的力量，也永远不会显示出自己是具有社会主义约束力的力量。今天，货币和生产力就像血液和维生素一样相互依存；如果不杀死整个躯体，就不可能废除一个而留下另一个。但是，确保维持生命的元素从为此目的而设置的腺体中洁

净地流出，确保血液在身体中不含杂质、不受阻碍地流动，使二者相互协调，这将是未来政治和经济领导人的主要任务之一。

国家和法律　彼得-隆

国家是一种法律形式，**顾名思义，是一个民族在一定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根据这些法律规范组织民族的劳动力，对工作进行基本分工，并确定或将要确定个人之间以及个人对整体的法律要求。因此，只能从法律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法律的概念从未得到过明确的科学解释，也很难得到科学解释，因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对全世界]普遍有效的法律。**

欧洲的法律远非世界其他地方的法律，反之亦然。法律的根系生长在人的灵魂深处，而善恶的知识则是滋养这些根系的土壤。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个民族的法律，就必须探寻其道德观的最深处。但归根结底，**每个民族最深层的道德观都将是一个民族在斗争中获得的经验总结**，对这些经验的思考将在未来对该民族的地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具有有机思维的人只能以民族本身来衡量道德价值。

善是指有利于整体并在各方面促进整体的行为，恶则相反。但是，善与恶的概念不能仅仅局限于有用这一面。善也是使个人面临自我征服和牺牲的任务，从而增强其意志力的东西；善也是促进文化和提供精神凝聚力的东西，而恶是其阴影的一面。

人人权利平等！**一个流行的蛊惑人心的口号。**这是什么意思？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同样的权利，也应该被剥夺同样的权利？在同样的情况下？但什么时候两种情况是相同的？审判方式相同？但哪有两个同样的法官？在解释法律时不要考虑数学？

这样的法律从来就不是法律，而且，如果要在实践中加以执行，就会造成最大的不公正；**因为人是不平等的，因此，在不平等的人所要求的义务和权利方面，对整体的要求和承认也必然是不平等的。公务员的失职与商人的失职应受到不同的判决；士兵的叛国罪应比平民的叛国罪受到更严厉的判决。**

但是，平等的权利与平等的义务！这正是民族社会主义公正而合理的要求。很自然，在旧德国法律中，人们曾经试图通过设立专业法庭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处理司法问题（在此必须在一个狭隘的框架内不予讨论），有一件事必须是最高原则：必须始终大力捍卫整体，反对个人违法或其法律主张有损于整体，**在极端一致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杀死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有机融入国家的人。**

因此，如果民族社会主义试图用适应当今时代但纯粹德国式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形式来取代我们的现行法律，那么这也表明，这种新的民族理论是建立在自然有机思维之上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新的法律基础上，才能产生他们所追求的新的宪政国家。如果要把国家理解为一个组织，带领一个民族的力量实现整体意义上的最高成就，那么对这一目的的认识就要求个人在融入整体并与之合作的过程中牺牲许多个人自由，此外还要求个人履行许多义务，即使这并不适合他，他也要为了工作而工作，简而言之，就是对国家政治原则的认识：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不言而喻，整个国家也有义务不懈地关注履行义务的个人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或者践踏自己的权利，那么个人履行义务的义务也就不复存在，**因为作为这种国家形式最初基础的法律规范遭到破坏，也就摧毁了这种国家形式。

因此，只有当人民个人的权利不被触动或削弱时，国家形式本身才能被视为神圣。正如一切都在时间的长河中流动，正如人类个体被比喻为瀑布一样，人民的躯体当然也在不断变化，因此也不断需要新的法律形式，以便将个人的诉求公平地纳入生机勃勃的整体框架，因此也将不得不不时相应地改变其国家形式。但是，在不断变化的现象中，有一样东西作为一种指导性的传统依然存在，那就是从过去到未来的自身不断发展的意识；在一个民族的法律情感和法律生活中，**种族的灵魂在诉说法律，只有当其种族灵魂消亡时才会停止诉说法律。民族社会主义并不否认国家的概念。相反，它认为国家是一个机构，只有通过适当的结构才能有计划地聚集和引导人民的力量，从而真正保障人民的国家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要求国家竭尽全力为人民赢得人民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地球空间。**

民族社会主义在思想上确实是好战的，它在斗争中看到了万物的创造者和维持者；但它并不宣扬侵略战争。不以征服战争为借口也可以赢得世界空间。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民族社会主义者都会无条件地捍卫德意志的狭窄边界，**这个边界对今天的德国人民来说仍然是太小了，小到无法使德国人民的生活成为可能，更不用说更高的发展了。**

另一方面，民族社会主义认为国家是在社会主义意义上联系单个同志的一种手段：调节劳动，建立相应的国家行政机构，为同志们提供体面的住所，医治病人并使他们重新适应工作，为那些离开工作岗位时遍体鳞伤、疲惫不堪的老战士们准备一个无忧无虑的晚年，以及对青年进行身心培训和教育以适应国家工作。对民族社会主义而言，劳动管理意味着在国家监督下为工人安排工作，防止企业家背后的借贷资本剥削劳动力，以及由国家银行提供流动资本。这些任务还包括通过国家监督的保险制度为工人提供收入，该保险制度不从属于任何一方，主要致力于保护所有情况下的家庭，并将以这样一种方式管理投保人缴纳的保险金，即强制投保人不必将其视为损失的资本（例如，在医疗保险制度中，这可以被视为当今的规则），而是知道它被存放在保险公司，作为在需要时使用的自赚储蓄金。

民族社会主义并不打击企业家本身；因为如果这样做，就会扼杀劳动过程中的领导者，从而损害整体利益。

民族社会主义只与不愿意融入人民大众、在社会上忽视和剥削工人、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非纳税人的钱财的企业家作斗争，而且是最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那些已经通过形成圈子而在国家中取得垄断地位的企业和事业，或者那些被视为人口的重要供应者的企业和事业，如运输工具、煤气和电力工程等，都将被国有化和社会化。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财产是通过诚实劳动获得的，即不是通过高利贷、武力或狡诈获得的，而且管理方式不会因所有者侵占财产而使整体遭受损害，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就会保障财产。作为整个经济的力量源泉，土地属于国家，因此，如果一块土地的管理有损于国家，所有权被滥用，如果土地被投机者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非德国人打算染指德国的土地，国家就保留索赔的权利。**

原始人从原始汤里出来时，一定渴望拥有财产，否则他不可能发展成今天的人类。那么，今天是否应该把他推回汤里呢？

根据民族社会主义理论，只有经过适当培训的德国公务员才能管理国家，这样国家机器才能正常运转。公务员必须是国家秩序的执行者，只有当他掌握了自己的工作内容，不受任何形式的贿赂，知道自己不可能随时被扫地出门时，他才能保持这种地位。他可以要求适当的报酬，这一点更应给予，因为过低的报酬会助长贿赂。

民族社会主义官员必须始终牢记，他的报酬实际上是由人民支付的，他必须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其他人服务。他将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他的职位上，因此不会追求任何副业。他始终觉得自己要对人民负责，因为他发誓要为人民谋福利；因此，当上级变得脆弱时，他必须凭良心拒绝服从上级。

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公务员不是养家糊口的人，而是要以庄重和光荣的方式履行对人民的誓言。

民族社会主义认识到住房问题对人民健康的严重性。它将通过慷慨的建设计划和建立由国家监管的合作建设贷款协会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协会的任务是为建设目的提供无息资金。通过打击土地高利贷，可以防止贷款资本将住房短缺变为自己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不是创造廉价的住房，从而普遍降低房租。

民族社会主义希望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对穷人、病人和体弱者的照顾，即只要这种帮助对整个社会有益，国家就有义务提供帮助。为了自己的救赎，人类应该为自己的生命而战，并竭尽全力在这场斗争中保持胜利。但是，他不应该乞求自己的生命，不应该学会苟且偷生，甚至可能靠国家机构。**如果国家至少能阻止那些没有生活能力、有遗传性负担或在社会学意义上有害的人繁衍后代，这比国家甚至将这些人视为自己的关怀对象，并因此支持这些人对国家造成的有害影响，对整个国家更有利。**

社会主义并不等同于感情用事，至少在民族社会主义看来，社会主义的目标始终是维护整体。只有保护有生物价值的人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关怀的任务。民族社会主义纲领明确要求提供丰厚的养老金，这不应被理解为仅仅是公务员的养老金或对有需要的老人的施舍，而应被理解为承认对国家的合法要求，即为不再有工作能力的所有阶层的人提供养老金。通过保险的方式建立这种养老金是完全可能的，而不会使养老金领取者认为以后享受养老金是一种怜悯。这应该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怜悯。

在民族社会主义看来，青年教育也是国家的任务。既然国家必须对其民族后代的教育负责，那么它就可以要求：首先，所有学校都必须是国立学校，国家对学校的结构和建立拥有无条件的决定权；其次，每个孩子都必须在其中一所学校就读。民族社会主义学校的特点是选拔；在学校里就已经要筛选出领导人，并与他们的随从一起接受元首基本思想的教育。民族社会主义者特别重视身体教育，因为在他们看来，健康的身体是整个民族健康的先决条件。**勇气、力量和毅力不是在学校的书本后面训练出来的，而是在运动场和远足中锻炼出来的。**

另一方面，智力培训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教育年轻人独立思考，并通过教学对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产生特殊的影响。对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教育并不仅仅是获取一定量的知识。真正的教育永远只是真正的心灵教育，这对于作为个人基础的民族凝聚力而言，比单纯的知识积累要重要得多。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总是倾向于将他只能通过其民族的昂贵机构才能获得的知识，以无私的方式提供给其他同胞使用，并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从这几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它之所以是真正的民族的，是因为它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它之所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德意志人民的继续生存，只有这样，它才相信自己能够摆脱自由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斯主义的破坏性影响，只有在理想社会主义的桥梁上，用爱包容全体人民，它才会寻求通向更美好未来的道路。**

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父是唯物主义，而民族社会主义之父则是德国的唯心主义。这就将两者区分开来，不允许将它们混为一谈。为了使身体所有器官的运作成为可能，神经必须承担起从思维中心到这些器官的调解工作。在一个规范的国家，人民代表必须等同于神经。人民必须有机会向政府及其执行机构表达自己的意愿，提出改进建议，并努力纠正错误。一个议会，如果其代表只是狭隘政党政治的教条主义者，甚至将人民代表制度变成个人私事，可耻地滥用选民的信任，就永远无法完成其任务。生病的神经系统会扰乱整个身体。

因此，民族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反对党政合一的议会。但为了让人民能够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愿，它计划成立一个职团议会，其成员由各个专业组织派遣，对自己的团体向组织负责，如果不能证明对他们的信任是正确的，随时可以被罢免。

今天，民族社会主义者已经向党派议会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这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够抵制政府对他们的运动进行的最恶劣的蹂躏。民族社会主义议员从未以任何方式参与现行议会制度的弊端及其对人民的可怕影响。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受蒙蔽的人民的代表，始终对自己在议会中的行为作出说明，并向人民报告议会中正在进行的金钱游戏。**

尽管这种手段有缺陷，但他们始终诚实地试图在议会的帮助下，把属于人民的东西交给人民，避免人民受到压迫。民族社会主义者否认现在的国家仍然有资格获得这个名称；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共和国，而是一个非德国式的专制制度，一个由假冒民主的暴君组成的寡头政治，这些暴君的统治与人民背道而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拿走属于真正国家基础的人民的主权权利，贡献出他们自己的暴行和他们自己的罪行。人民的躯体在他们的帮助下流尽了鲜血，最终将任由它们进一步发展。

不负责任和狂热主义从未让共和国存活下来，也从未让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按照计划共同努力。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者反对现行制度的原因。根据他们的国家概念，民族社会主义者不仅拒绝给予犹太人公民身份，而且拒绝给予所有外国人公民身份。但这绝不妨碍给予客人权利，这是德国人民自古以来的习俗。至于给予客人这种权利的期限和程度，则由客人本人及其居住者决定。在德国人自己的房子里，只有德国人对他们的所有同胞负责，也对把自己托付给他们的外国人负责。根据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只有德国父母的后代才能成为德国公民，无论他出生在世界何处。他们认为，**一个民族只有血脉相连才能存在，其遗传物质只有通过血缘继承才能不被改变。**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对犹太人的敌视尤其基于这种观点。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想灭绝犹太人，但却有意将其作为一种害虫排除在德国人民的文化和经济生活之外。

国家意味着有组织的权力。**试图规定某种国家形式是人民永恒变化的权力的最佳和不可改变的形式是徒劳的。**

权力，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这里都是一种形式的内容，它将不断创造出新的形式。然而，最大的责任在于指挥这种力量的人，即他的民族的公爵。他只有参与到这种力量中，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如果他是一个具有国家意识的政治家和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民族领袖，并且始终怀着对民族的最高道德责任感，那么他的人民就会感受到他的力量。

同样，我们决不能忘记，如果这些理论不能被那些难以被称为正派的人付诸实践，那么所有关于国家福祉的理论都只是徒劳的镜花水月。**培养正直的人，即愿意为国家贡献自己全部力量的人的遗传倾向，始终是一个真正国家的先决条件。有的民族在专制制度下茁壮成长，有的民族在真正的民主政体下茁壮成长。**

千年历史告诉我们，德国人民在一位领导者的领导下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获得了最强大的力量，而这位领导者得到了具有合作思想和相应组织的追随者的信任和支持。只有按照这一原则组织起来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将继续是未来适合德国人民的国家形式。

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 戈特弗里德-费德

德意志帝国是德国人的家园。这里不是犹太人、俄罗斯人（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的家园，他们不知道有一个叫做德国的祖国，这里也不是那些在德国土地上长期或短期停留的其他外国人的家园。在这方面，我们从根本上与《魏玛宪法》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该宪法只承认“德国公民”，但不承认“德国人”这一概念，无论是从民族还是种族角度。这些论点如下：1-7，分为三个部分

a）外交政策，

b）人口政策，

c）公民。

1. 建立一个由所有德意志族群组成的统一民族国家。**每个有自尊心的民族都有权将群落里的所有人团结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这一要求在我们的战时敌人宣布的“自决权”中得到了自发表达。因此，对于居住在德国国境外的定居区内的德国人，我们不会放弃其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国籍。但我们声明，我们无意强行吞并居住在德国境外的、受丹麦、波兰、捷克、意大利或法国统治的德国人。然而，我们确实要求和期望生活在外国主权下的德国兄弟能够获得与这些国家其他国民相同的权利。因此，这一要求并不带有任何帝国主义倾向。这是每个充满活力的民族都会提出并理所当然地承认的简单而自然的要求。

2. 在国外积极维护德国利益是对第 1 点的进一步补充。作为文化大使走出国门、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德国人，往往都是最优秀、最有能力、最具维京精神的德国人，他们当中有工程师、研究人员、学者、商人、医生。他们属于伟大的德国民族大家庭，不应该、也不应该脱离这个大家庭。即使身在国外，他们也有权受到祖国的保护。这些德国人不仅应该成为文化的肥沃土壤，而且应该成为有意识的哨兵，成为德国在地球上的捍卫者，他们不是“人类的使徒”，而是北欧思想的承载者。身在国外的德国人和我们的官方代表的任务不是“同情”外国的方式，而是维护德国的独特性，即德国的更高境界。这里，也必须用铁扫帚扫除外交部积压的灰尘。埃尔茨贝格和施特雷泽曼

对外国的谄媚态度必须停止，然后人们会突然发现，外国对德国利益的强硬代表会有完全不同的尊重，德国的愿望将得到尊重和考虑，而不是拳打脚踢。

b）在种族政策方面。

3. 清除犹太人和所有非德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所有负责职位。这个要求对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无需进一步解释；但对于那些至少没有掌握种族理论基本原理的人来说，要给出简短、令人信服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认为犹太人只是“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而不是一个外来种族、一个独立而孤立的人群，一个具有寄生虫特征的民族，那么他就无法理解这一要求的绝对必要性。把意外长在草莓地里的大头菜误认为草莓丛，或者认为可以从大头菜上摘到草莓，都是错误的，就像认为把一头小狮子扔进羊群里它就会变成一只羊一样。我们不难理解，德国人并不适合在印度或中国担任地方官员或地方法官，就像我们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或霍屯督人担任德国税务员或市长一样。

尽管如此，如果让恩维尔·帕夏或蔡司凯泽克来恢复德国的秩序，总比让**犹太人在德国肆意发挥其破坏性的种族特征**要好。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革命的发生，与国家秩序的所有联系都被切断，老牌犹太银行家和新移民东欧犹太人一样，从德国的苦难中变得异常富有。我们都经历过，每个人都能亲眼看到，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情况总是这样，而且总是在北欧秩序被破坏之前发生。“但聪明人只看到一条畅通的道路，只要秩序存在；只要秩序不存在，就没有希望”（歌德在《普伦德韦尔集市》中说道）。

因此，要点

4. 防止东欧犹太人和其他寄生外国人的移民。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和犹太人可以被驱逐出境。在通货膨胀肆虐的年代，这些加利西亚和波兰的犹太人像害虫一样涌入了德国城市；尽管住房极度短缺，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最漂亮的公寓，而德国人却只能住在破洞里。然后他们开始从事非法交易，购买一切：珍珠、波斯地毯、钻石、黄金、白银、铂金、战争债券、旧纸、千元纸币、铜、铅、文学、戏剧、废金属（Evaporator-A.-G.）。很快，他们变得非常富有，因此，对于普通的德国人来说，他们也被视为德国人。在民族社会主义的压力下，巴伐利亚州总督卡尔（他“因国家利益而破坏名誉”，懦弱而狡猾地于 1923 年 11 月 9 日血腥镇压了德国起义）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敢于宣布驱逐东欧犹太人，并派警察去对付一些最著名的投机商。然后，中央协会的“历史悠久”的体面犹太人为加利西亚的害虫、他们的犹太“同胞”挺身而出——卡尔像个懦夫一样退缩了。只有非常清醒和坚定的国家领导人会按照他们的种族知识行事。在这方面不能做出任何让步。除了这种纯粹的反犹太主义应用之外，还必须培养种族卫生，并培养我们的民族在北欧思想意义上的北欧化这一崇高目标。这个问题可能不属于民族社会主义党的“时间计划”，但我们必须清楚，从长远来看，德国人如此混杂，很难有什么作为。然而，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可怕的种族低潮已经过去，至少在理论上如此，种族问题和种族书籍在广泛人群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而且关于这一主题的基本著作已经问世，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只有不懈的努力才能真正推动我们前进。

c）在公民方面，我们要求

5. 只有承认德国文化和共同体的德国人才能行使公民权利。这里有一个绝对必要的限制。即使出生在德国，但有意反对德国人民、反对国家，听从外国政治命令的人

不属于德国命运共同体，因此他们不能行使公民权利，就像犹太人一样。我们还将剥夺某些人享有德国公民权利的荣誉。肆无忌惮的投机者、叛逃的官员或仍然“逍遥法外”的叛徒，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中肯定不会再享有任何公民权利。

6. 那些不是“德国人”的人只能作为客人生活在德国，并受外国人法的约束。这是一项重要的原则，旨在结束对外国人的永久奉承。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希望看到外国公民作为客人来到我们的国家，只要他们行为得当，我们就会欣然接纳并给予应有的尊重。

7. 德国人的权利和利益优先于外国人的权利和利益。无需进一步详细阐述。例如，“外国人法”的具体内容以及如何将犹太人排除在外的问题，都是以后的问题。我们不想让基本纲领成为“行动纲领”，为夺取政权或完成特殊任务提供战术细节。我一般反对过多地修改纲领，因为在我们的巨大斗争中，首先是要坚定不移地确立我们的目标，而不是资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政党的“选举”和其他“纲领”。

经济政策：基本原则是：

国民经济的目的不是为贷款资本实现最高利润，而是满足需求。对简单的人来说，强调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似乎是多余的，尤其是用这种基本术语。对于工人、农民、劳动者、手工业者、商人、制造商以及从事货物运输和分销的辅助行业人员来说，生产出来的东西应该被使用或消费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还是作为与他人交换的经济商品。对他们来说，不面向生产和消费的“经济”似乎很荒谬——不可能——毫无意义。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宣传工作中的一个重大思想难题：**我们必须告诉同胞们，尽管他们在思考工作和整体经济的意义和目的时，自然情感是正确的，但不幸的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经济并不符合这种自然需求；相反，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令人震惊的特征与整体经济的自然功能完全背道而驰。**高利贷者和投机商都在做什么？这种普遍存在的人考虑过满足需求吗？没有！他们创造价值、生产东西了吗？没有！他们从经济角度进行抢劫、偷窃和欺骗，从而致富。银行在做什么？它们负责货币交易和“信贷”业务。是的，但邮局也提供货币交易服务，而且更便宜、更快捷、更完善。银行向谁提供信贷？——不是向穷人、没有自己住房的工人群体提供信贷，以便建造房屋满足住房方面的迫切经济需求？——不！或者，是那些作为经济消费品的生产者和中介的农民、商人和商人？几乎不可能，除非相关人员提供“担保”，除了自然还款义务外，还同意提供高额特殊服务，即“利息”。

银行是否关心客户是否得到商人或企业家的良好、快速和廉价服务，换句话说，是否关心经济需求是否得到快速、廉价和可靠的满足？不！他们只对利息、佣金和银行其他赚钱手段的单方面利润感兴趣。银行生产什么？什么也不生产！银行赚什么？巨额利润。因**此，高利贷者和投机者、银行和专业贷款资本家并不满足任何需求，而是从当前盛行的利息资本主义制度中获取巨额利润。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当前盛行的反社会经济秩序的真正主人、受益者和剥削者。当今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贷款资本的“盈利能力”**

也就是说，在这种利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必须将大部分劳动收入交给银行、证券交易所以及经济放贷者和投机商的大资本。在工人眼中，所谓的“雇主”就是“剥削者”和“吸血鬼”，那么“雇主”究竟做了什么呢？一方面，他通过支付最低的工资

和使用劣质材料，另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生产或“包装”和高价，试图尽可能多地为自己牟利。他不在乎工人的辛苦，对他来说，他的产品即使一文不值，很快就会被扔掉，那更好，因为这意味着新的订单和新的利润，只要用极具诱惑力的方式做广告和展示，人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上当，购买廉价的垃圾。百货商店的毒瘤（见上文）。他的“利润”，即资本收益率，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满足需求”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至少——他至少生产了一些东西，创造了工作。与此相反，真正的企业家，意识到自己作为经济领袖肩负着崇高使命，必须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这样的人必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至少在经济意义上是这样。他的首要任务是了解人们的实际经济需求。他通常以发明家的身份亲自完成这项开拓性工作。

然后，他必须找到最佳且最廉价的生产方法，将价格降到最低，以便 介绍产品、提供完美无瑕的商品、确保持续供应、支付工人优渥的薪资，让他们也成为具有购买力的经济产品消费者，并时刻关注生产和分销的创新和改进。如果他将此作为行动指导原则，从而以最佳和最高的方式满足需求，利润就会自然而然地到来，而无需将其作为最高目标来追求。

在这方面，我们大工业中真正伟大的创造者同样值得尊敬，例如卡尔·博世、克虏伯、基尔多夫、蒂森、阿贝、曼内斯曼、西门子，仅举几例。但当这些企业不再由有道德人格的人负责管理时，其性质就会立即发生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有道德人格的人会出于对企业的理解，以谨慎和体面的方式对待工人，但当企业“匿名化”和“去人格化”并转变为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时，情况就会发生改变。

只要创始人和创造者作为主要股东能够保持其作品原有的坚实传统，这或许还是可以接受的，但通常在转型后不久，股东（即职业资本家）纯粹的利润利益就开始冲击公司。前业主、经理和董事们依赖“董事会”来提出改善公司和提高工作条件的要求，而“董事会”对工人和工厂的福祉毫无兴趣，只要它能获得高额投资分红就行。随着不记名股票的推出，这些条件变得完全灾难性，任何老奸巨猾的投机者和唯利是图的人都可以成为股东、大股东，从而成为最大的工业企业的所有者，而他们对业务一无所知。对于专业的借贷资本家、大股东、股票交易商来说，这些股票证书、股票除了是股票交易所赌博的“纸”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股东”们当然对生产场地、生产和工厂不感兴趣。事实上，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命名产品、销售条件、工厂的工作、工资和薪水条件，而他们正是这些工厂的“合法”所有者，他们根据自己在股票交易所转让的这家或那家工厂的股份来确定自己的所有权。这些东西对国民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必须清楚地了解它们，才能认识到这种利益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危害性。 “利润”和“盈利能力”是当今经济的目标。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百货商店——蒂茨、韦特海姆、卡施塔特等，都是犹太人——走了一条有些不同的道路。

他们的经营方式基于“激励”、“包装”、“虚张声势”以及创造完全不必要的“需求”，即“奢侈品”。这些巨大的宫殿采用各种艺术装饰，吸引人们购买大多毫无用处的物品，而看似低廉的价格和优惠的付款条件则诱使他们进行各种奢侈消费。“休息室”让人们更容易在百货商店里待上很长时间。因此，百货商店是奢侈品的温床，因为没有人会认为他们能免费得到任何东西。

真正有钱的人肯定不会去百货商店购物，因为他们知道穷人通常不知道的道理：“一分价钱一分货”。百货商店里熙熙攘攘的购物者相信这些宫殿是用他们自己的积蓄建造的吗？百货商店的顾客相信他们不必为“旋转楼梯”、电梯、休息室和童话般的照明付费吗？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百货商店是小型工业的毁灭者，百货商店以最残酷的方式剥削家庭作坊和员工，主要销售廉价垃圾，而更好的商品却比有尊严的专业商店更贵，那么我们就有理由与百货商店进行激烈的斗争。在这些机构中，我们还看到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利益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其目的不是为了真正满足需求，而是主要为百货商店的股东创造巨额利润。从这种与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毫无关系的满足需求经济的总体角度来看，应该明确指出，私有财产的地位问题应该放在首位。

民族社会主义原则上承认私有财产，并将其置于国家保护之下，即诚实获得和赚取的财产。这里无法进行根本性的讨论，但任何正确理解“劳动”的人都不会怀疑劳动成果必须是劳动者的“财产”。创作者无法理解他的劳动成果或等价物应该属于不可理解的“公众”、“所有人”，也无法理解他的劳动成果应该属于某个个体，即资本家。

因此，从正确理解的劳动概念出发，必然会产生对私有财产的认可。毕竟，我们在这里也处理终极事物，就像在家的概念中一样。只有当你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当“自己的家”环绕着你的家人时，你才能充分体验家的感觉。自己花园里的草莓、土豆、蔬菜和水果，比大规模食品公司生产的食物更美味。那些不知道对自有财产的渴望、无法享受自有财产带来的幸福的人，他们不理解承认私有财产的根本意义；他们要么是无根的沥青人，要么是无根的“资本家”，他们将劳动人民的财产视为自己的猎物，并且懂得如何通过利息资本家的方法将外国财产据为己有。**资本家的“掠夺性财产”与对不断更新的财产（最好是易于移动的财产）的贪婪欲望密不可分，而北欧人脚踏实地，非常“谦虚”。**

从一开始，他只想要自己能赚到的。没有哪个工人会为自己建造一座他永远也赚不到的华丽别墅，但他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漂亮整洁的家，而且他希望这是自己的自由财产，而不是“租赁”，因为他在有生之年所付的租金是房子的总价的 3 到 4 倍。另一方面，贪婪的犹太人、资本家根本不想被任何一块土地束缚；一个装有成捆股票和其他证券、典当票、债券的大保险箱就是他最大的理想。财富，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属于他人的抵押财产，是他的目标。他并不“工作”，但他不停地休息，直到他看到自己拥有如此多的“债权”，并以此为筹码，向“债务人”（毕竟他们并不欠他什么）挥舞利息大棒。我们的计划将在第 9 点中对此进行反驳。

9. 然而，人民的福利限制了少数人手中财富的过度积累。财富和财产本身并没有害处。相反，管理良好的财产可以为所有与之打交道的人服务。同样，正是特殊形式的利息资本主义经济将财富的祝福变成了相反的东西，变成了诅咒，变成了剥削。负债的中产阶级中大量没有财产的工人与“富人”、资本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无数前小业主被剥夺了财产，负债累累，而职业资本家的金融实力日益增长，这些人没有祖国，没有家园，在现代强盗城堡——银行中掠夺民众。与此相反，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德国人应组成一个劳动共同体，以促进普遍福利和文化。这个“劳动共同体”是社会建设普遍主义概念在经济政策领域的体现。每一种工作、每一种成就都必须以服

务社会的崇高理想为框架。这完全符合个人努力、个人勤奋和个人效率，但个人的进步不能“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因此，第 11 款明确规定：

11. 在每个德国人的一般工作义务和对私有财产的基本承认的框架内，每个德国人都有权自由选择职业和自由处置其劳动成果。通过这一声明，明确拒绝了“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以及高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努力”。国家应该由尽可能多的自由自营职业者组成，他们以服务这一社会理念为纽带。当然，不可能以“小规模”的方式运营矿山、高炉、轧钢厂或造船厂，但 10 万个独立鞋匠比五个巨型鞋厂对经济和国家的贡献更大。德国北部和东部的巨大偏远庄园，大规模耕种比个体定居更有利可图。个体定居属于城市和郊区周围的广阔绿环。

我们的第 12 点要求：

12. **必须保持包括农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领域中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健康组合。**

13. **巨型企业（公司、财团和信托机构）将被国有化。这一要求也是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理念斗争的必然结果。**财团和信托机构的主要目的是将某些生产领域的同类企业合并，以操纵价格。它们的主要目的不是提供最好和最便宜的商品，而是向消费者控制商品的质量、数量和价格。这种“垄断”特别受个别盈利公司的欢迎。同类的新企业要么被收购，要么倒闭，通常会获得巨额补偿。这样一来，“供应”本身就被“配额”所控制，公司现在可以根据所谓的“供求关系”基本定律来控制价格！——股东们关心的就是这个，而不是竞争使价格尽可能低的事实。最重要的是，创新和发明受到怀疑，如果它们对老公司的盈利能力构成威胁，就会被压制。这些企业作为巨型托拉斯，如今仅由官僚机构运营，因此已经具备了社会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它们不再承担为公众服务的不断奋斗、努力进取的企业家个性；它们基本上已经僵化，如今只应满足贷款资本对利润的贪婪。

14. 高利贷和暴利，以及以牺牲和损害人民利益为代价的残酷致富，将受到死刑惩罚。我们目前的法律确实特别保护个人的财产。小盗窃通常会在累犯的情况下受到不人道的惩罚，而我们的法律却无法抓住那些利用“资本主义手段”从全体人民手中窃取财富的大骗子。我们在这里主要指的是通货膨胀的肇事者和受益者：**历史上从未听说过一个勤劳的民族的所有积蓄被一场规模巨大的通货膨胀犯罪所掠夺，就像德国货币毁灭案一样。稳定后的银行高利贷比街头抢劫更严重。**受战争贩子行为之害的德国人比受有组织抢劫团伙之害的德国人多。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并且必须找到法律上的措辞；但所有人都清楚，“有组织地欺骗人民”与个人盗窃或欺诈一样应受到惩罚，甚至应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15. 规定每个德国人每年工作（或服务）一年。**强制劳动是服务社会的崇高理念的直观体现。**它具有教育意义，它向模范企业的每个德国人展示整个经济体系的工作，它向每个德国人展示严格履行义务、为国家服务的工作带来的幸福。本系列论文中的另一份研究也将更详细地探讨这一问题。

为了理解民族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二分法，我们必须定义每个二分法的参数。由于许多误解以及它在公众心目中与所谓的“大屠杀”的联系，产生了巨

大的心理厌恶，民族社会主义今天肯定不受欢迎，我冒昧地解释了一下它的心态，作为我工作的基础。这些信息大多鲜为人知，除了它的不屈不挠的敌人，他们出于自己的原因希望民族社会主义被摧毁。但从根本上讲，民族社会主义是永恒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领域的应用。请阅读它，考虑它，如果你觉得你必须拒绝它的基础，至少这将是你做出的明智决定。

民族社会主义明确宣称自己是一种世界观。

民族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或一种政府形式，就像民主一样。民族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观，这是一个德语单词，没有对应的英语单词。最接近的翻译也许是“世界观”。

像民族社会主义这样的世界观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它提供了对生活各个方面的见解和观点，包括种族、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军事、金融、社会、资源，甚至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极权主义”，但请注意，这并不等同于“镇压”。在民族社会主义中，人们不可能像在民主国家一样，成为五年一次的选民，并认为自己已经履行了自己的政治义务。

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形式可能是半民主的，具有有限的选举权，但民族社会主义政府最纯粹的形式是所谓的“仁慈独裁者”，或一人统治（与民主的多人统治相反）。这也许是美国人最难理解的事情：自愿放弃某些“权利”给国家组织，就像民族社会主义那样。

因此，民族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观，与民主相反，它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

民族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民族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包括对生活质量的重视。将人民（一个国家中种族同质的居民）视为一个有机单位，任何这样的人存在的唯一值得作为主要目标的目的就是培养尽可能多的真正优秀的男人和女人——身体强健、精力充沛、本能未受破坏、头脑强大，能够进行分析和创造——具有真正高尚的人所特有的综合、高超的个性和崇高的精神。

原因有二：

（a）伟人和他们的作品是骄傲和光荣的源泉，是民族存在和最高成就的正当理由，其中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卑微的人，都会感到自己被提升了，因为他知道他为实现这些成就做出了必要的贡献，并且

(b) 伟人是人民的救赎。只有他们才能把人民的生活组织成一个整体，使它普遍令人满意，并引导它安全地避开困扰每个民族生活的危险。

种族世界观与民主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前者承认种族的重要性，因此也承认个人价值，并以此作为其结构的支柱。

因此，民族主义国家的最高目的是保护和保存那些通过文化领域的工作创造出更高人类特有的美丽和尊严的种族元素。作为雅利安人，我们只能将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视为一个民族的活体，这个有机体不仅维持着一个民族的存在，而且其功能是通过智力和文化能力的逐步发展，引导其人民获得最高自由。

请注意，与政治层面的民主不同，民族社会主义并不将幸福作为人民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目的。当幸福不是直接追求的，而是花费精力做好某项工作或为了实现自己深信不疑的其他事情而产生的副产品时，幸福被认为是最丰富和最令人满意的。

适宜的环境和人的重要性

有利于优等人出现的条件有：

（1）种族同质性[通过（a）隔离（b）近亲繁殖和（c）长期服从相同价值观实现]，从而导致

（2）社会团结。根据他们的理解力和性格力量，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道德观、相同的宗教信仰，热切地相信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伟大，并理解、接受和维护他们的社会组织、目标、政府和生活方式，认为它们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每个人，无论在社会地位如何，都觉得自己属于这个社会。他以一个知道自己对与他密不可分的整体很重要的人的尊严行事。在所有表面的差异和个人冲突之下，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团结，在危机中，这种团结使人与人、家庭与家庭、阶级与阶级、所有人与整体站在一起，献身于至死不渝的忠诚。这样的民族也许会被强大的力量击垮，但他们永远不会瓦解。日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犹太人。

与民族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民族有机团结相反，民主的思维方式过分强调个人及其“权利”和“自由”。民主所要求的个人社会是一个原子社会，是一堆松散的石头。它的凝聚力很弱。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当今的民主正在把我们的社会变成人类的蚁丘，把我们的人民变成没有面孔、几乎毫无名字的虚无，就像沙粒一样。而我们这些生命力尚未被驯服和击败的人，讨厌平凡生活的无意义——它的无聊、空虚和屈辱。

有利于君子的第三个条件是

（3）金字塔形式的政府（职能和责任的区分）。

在这三点之上，是优生宗教的保护伞。如果一个社会想要在环境和敌人面前维持和发展，并达到文化伟大的顶峰，它必须由那些智慧最深厚、品格最高尚、宗教经验深厚的人来掌舵。他们独树一帜，摆脱了其他人所承受的狭隘忧虑和焦虑以及琐碎的责任，怀着无私和崇高的动机，就像站在指挥塔上一样，扫视地平线，研究星星，设定船的航向。船上每个人的命运都取决于他们的智慧、爱和力量。

民族社会主义需要这样的人，需要从这些环境中走出来的人来指导和领导。这种民族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远胜于民主党的思维方式，后者允许一个无名的笨蛋参加一场过度赞助的人气竞赛，从而在美国这样的强国中掌握权力。民族社会主义说：“人品很重要”，而民主说：“钱包鼓鼓很重要”。

即使是纯粹的理论工作，也无法用明确的标准来衡量，而且是所有后续技术发现的先行者，也完全是个人大脑的产物。广大群众不会发明，大多数人也不会组织或思考；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个人，即个人。

民主推行普选，空谈平等权利，却找不到平等的基础，破坏了素质的基础。

领导原则

一种世界观，如果否定了群众统治的民主原则，并致力于把这个世界交给最优秀的人——也就是人类中最优秀的人——那么，也必须把同样的贵族公设应用于人民共同体内的个人。

民族社会主义坚持认为，必须把领导职位和最高影响力交给最优秀的人。

因此，领导原则不是基于多数人的思想，而是基于个性的思想。

领导原则可以以独裁的方式强加给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但这一原则只有经过自身发展所必需的阶段才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这些阶段从国家有机体的最小细胞向上发展。作为领导原则的承载者和代表，必须有一群经过数年选拔过程的人，他们经过了严酷的生活现实的磨练，从而能够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

竞选活动

民族社会主义没有民主那样的竞选活动。问题通过全民公决解决；领导人凭借其过往履历所展现的品格、能力和效率在体制中晋升。

民主制度在选举中摇摆不定，议程灵活多变。一个人换另一个人的间隔逐渐缩短，最后演变成一场疯狂的接力赛。随着每次更换，政治家的素质不断下降，最后只剩下小政治骗子。在这些人身上，政治家素质的衡量和价值取决于他们组建一个又一个联盟的熟练程度；换句话说，他们操纵最琐碎的政治交易的狡猾程度，

看到骆驼穿过针眼的几率比通过选举发现一位真正的伟人的可能性更大。

问责与责任

民族社会主义也许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即在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用“目标管理”概念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些目标的实现被委托给指定的领导人，他们有责任以最仁慈、最有效和最光荣的方式发挥他们的技能和才华。标准是整体的福祉高于个人的福祉。这意味着，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为了追求质量，牺牲较小的利益来换取较大的利益。

民族社会主义任命一位领导人担任某个职位，并凭借他的任命获得决策的权力和自由。这些决策的结果决定了现任者是否会继续担任该职位，因为他，也只有他，对他的决策结果负责。如果这些决策与既定原则和目标不符，他必须承担错误的责任并辞去权力职位。自由与责任相平衡；履行职责会获得更多权力，失败则要承担责任。

民主永远不会被要求对任何事情负责，因为决策权不属于内阁，而是属于议会多数。内阁始终只是作为多数意志的执行者。它的政治能力只能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适应了多数的意志或说服多数同意其建议来判断。但这意味着统治机构必须从真正的统治权力的水平下降到乞丐的水平，乞求暂时聚集起来的多数的批准

因此，实际上所有的责任都被废除了。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责任存在。因为责任只来自个人职责，而不是来自空谈者议会会议的义务。这种绝对权力和绝对责任相结合的原则，将逐渐产生一批精选的领导人，这在我们目前这个不负责任的议会制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权力的重要说明

当谈到“权力”这个概念时，有民主思想的人士很快便会引用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来回应：“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面对三个事实：

（1）**除非权力被委托给某个人，否则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

（2）最迫切的是，必须把责任归咎于某个特定的人。在民主政府中，决策是由委员会和委员会通过多数票做出的，责任是如此分散和细碎，以至于最终几乎不可能把责任

归咎于任何人。由此导致，我们社会中许多身居高位的人可以严重违法，甚至完全叛国，而不必为此负责。
(3) 如果将权力委托给某个人是与政府不可分割的，那么明智的做法似乎是将权力委托给最有可能抵制权力腐蚀的人，也就是说，将权力委托给那些性格使他们不屑于滥用权力的人，他们属于一个以对任何被判定犯有失职罪的人施以最严厉、最无情的惩罚而闻名的精英团体，这足以阻止最大胆的人屈服于诱惑。尽管任何制度的实际运作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意图的失误，但人们仍然相信，事实上，这是一种深刻的本能，即如果一个人要对另一个人拥有权力，那应该只有他显然是更好的人，如果他是更好的人，他就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以及正确使用权力所需的权利和特权。

新闻媒体

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影响舆论的工具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不再被外来者和人民的敌人掌握。这只是保护人民的自卫措施。

政府形式

民族社会主义坚持认为，最好的宪法和最好的政府形式是让最优秀的人才自然而然地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和影响力。

工会

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将其代表机构划分为：
（2）代表各行业和专业的法人商会。
为了确保这两个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我们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它们。这就是特别参议院。
众议院或参议院不进行投票。它们是工作组织，而不是投票机器。个人成员有咨询投票权，但没有决策权。
决定权完全属于总统，他对所讨论的事项负全部责任。
工会罢工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会扰乱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机生产，也违反民族社会主义努力构建的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即伙伴关系。

一般的

关于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的可能性，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议会民主制原则，即通过多数票通过决定的原则，并非一直统治着世界。相反，我们发现它只在历史的短时期内盛行，而这些时期总是民族和国家的衰落时期。
“虽然是在遥远的未来，但终有一天，我们只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世界按照我们现代的民主观念来统治，到时候所有的决定都会偏向于人数上更强大的种族；要么世界按照自然分配的法则来统治，到时候那些意志更残暴的国家将会获得胜利，而不是那些自我克制的国家。” 摘自《我的奋斗》

民主原则

“共和派［法国革命者］颁布了三项极其荒谬的原则。第一项是平等原则，不只是法律眼中的平等(歌德接受这一点)，而是绝对平等；……第二项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歌德不相信这种原则。他说，即使你杀死了国王，你也不知道如何代替他统治……统治者被消灭了，但谁来保护大多数人免受大多数人的伤害呢？……第三项革命原则是

政治自由对人类来说是必要的……在生活中，我们发现歌德坚持认为没有人可以自由……”

摘自 L&W of Goethe

问题是：“我们应该最放心地把社会事务的方向委托给谁，我们应该如何找到这样的人并让他们掌舵？”

“民主”（我认为是“暴民统治”）是一个答案；“品德高尚、能力卓越的人”是另一个答案。这两个答案在意图和意义上截然相反。

批判

（1）民主制度被视为一种政治制度，它为外敌和叛徒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让他们把自己包裹在政治机构中，在那里秘密地进行毁灭人民的活动。事实证明，大多数打倒叛徒、真正大叛徒的努力都指向了国际金钱势力的大门。最后，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金钱势力始终是任何人民的头号敌人，而民主制度完全缺乏束缚金钱势力所需的那种力量。这是对民主制度的最高和最终指控。

（2）即使我们记录了人们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判断，在我们得到这些判断之后，它的价值何在？国家重大问题需要一定程度的考虑和详细的背景知识，而大多数人缺乏、不关心、缺乏理解的品格。愚蠢仍然是愚蠢，无论愚蠢乘以一还是一百万。你不会通过计算笨蛋来获得智慧。

（3）对群众也没有吸引力——一旦“多数人”决定了某个问题，尽管它可能是无可救药的错误，但对上述问题可能正确的少数人也会被洪水淹没。

（4）民主最令人沮丧的结果之一就是责任的消解。没有责任的权力对于任何好的政府来说都是毁灭性的。

（5）民主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及其伴随的“平等”概念。但平等不过是下等人对上等人的嫉妒和怨恨的呐喊，是毁灭天生优越者的起义呐喊，创造一个平庸的世界，充满了现在软弱、丑陋、迟钝和普遍拙劣的人。

平等主义理论构成了双重威胁：（a）否认领导的必要性。（b）否定品质。它否认自然的差异，而品质与差异无关。

P:=讨论的参数
NS:=民族社会主义
D:=民主

P：哲学基础
NS：天生贵族。
D：自由主义。

P：统治思想
NS：培养最多数量的优秀人才。
D：创造最多数量的幸福人。

P：民主
NS：“我们要为我们的种族和人民的生存和繁衍、子孙后代的生存和我们种族血统的纯洁性、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这样，我们的人民才能完成造物主赋予的使命。”

P：呃……？

P: 人的模范
NS：品格很重要。
D：财富很重要。

P：人类平等

NS：承认它不存在。
D：一切都平等。

P: 国家典范
NS：国家只是容器，种族是容器的内容。只有保存和保护内容，容器才有意义。否则它就毫无价值。
D：咦..？
P: 政治纲领
NS:世界观的纲领代表着一个封闭于自身内部的有机体，坚固且内部同质。不可改变的原则。
D:“这是在下次大选中制造有利结果的秘诀”。非常不稳定，基于权宜之计。

P：公民分歧
NS:公民（有权利和义务）、国家臣民（没有权利，有很多义务）和外国人（没有权利，没有义务）。
D:公民（有权利）和外国人（没有权利）。

P：特许经营
NS：根据出生国家、种族、年龄、社区服务获得资格。
D：符合出生国家、年龄要求。

P：决策
NS：没有通过多数票做出的决定，只有负责任的人才能做出决定。“理事会”一词再次恢复了其原有的含义。每个担任职务的人身边都会有顾问,但决定权只由该人一人做出。
D：消散在无名的委员会、理事会和议会中。“多数人统治”。

P：责任
NS：对上级负责；对失败负责。
D：在多数决定中失败。

P：向上级部门上诉
NS：直到领袖（元首）。
D：嗯……
P：兄弟会
NS：通过种族和民族获得资格。
D：对所有公民实行自由开放。

P：入籍
NS：除非是种族和民族的成员，否则不可能。
D：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公民。

P：自由
NS：私人自由；公共义务和责任。
D：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不侵犯别人的自由。

P：掌控国际金融
NS：国有中央银行；国家发行的货币（没有外债）。
D：啥……？再说一遍……？

P：货币体系
NS：民族社会主义
D：资本主义。

P：货币支持
NS：Volk 的生产能力。
D：“信任”（不是黄金）。

概括：
答:民族社会主义明确宣称自己是一种世界观。

B 民族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1）Volk = 一个国家内种族同质的居民
（2）努力提高生活质量
（3）目的——培养最多的优秀人才

（a）伟人和他们的作品是骄傲和荣耀的源泉
（b）伟人是人民的救赎。
C.
（1 种族同质性
（2 长期坚持同一种价值观
（3 社会团结
（4 金字塔型政府（职能和责任分化）。
（5 优生宗教
D. 幸福不是一个人生存的终结。
E. 领导原则
贵族公设——人类共同体中人类的最高品质。
领导职位交给最优秀的人才。
不是基于多数，而是基于个性。
经过数年的甄选过程而诞生。
F. 竞选活动
民主有灵活的议程。
G. 责任与义务
民主永远不能为任何事情负责。
责任在实践中被废除。
责任源于个人义务。
绝对权力和绝对责任相结合的原则。
H. 关于权力的说明。
权力必须委托给某个人。
责任必须落实到个人。
将权力委托给更优秀的角色。
一、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
J. 政府形式——最优秀的人才处于重要和有影响力的职位上。
K. 工会
职团商会代表各行业和职业。
无需投票；由总统做出决定，并承担全部责任。
不允许罢工。
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伙伴关系。
L.民主原则
平等原则
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理论。
政治自由对人类来说是必需的

慎言选 王廷相

御民篇

御民以道不以术，守我之正而感服不计焉，付得失於民尔。术不可久，民不可愚，虽暂得之，终必失之，民以我非诚也，故圣人王道。

法久必弊，弊必变，变所以救弊也。或曰：“法无不弊，变亦弊。”曰：“然。可坐视哉！权其利害多寡，变其太甚可也。”曰：“变有要乎？”曰：“渐。春不见其生而曰长，秋不见其杀而曰枯，渐之义也，至矣哉！”

圣人置天下於安平，莫先於植纲纪。何谓纲纪?居重以驭轻，督内以制外，柔夷以绥夏也。是故有六官率属焉，有省道敷政焉，有郡县分治焉，有王使廉察焉，有边镇防御焉，有羁縻之夷捍蔽焉。六者总之为纲，维之为纪，封建不行，势不容已之道也。王都重则外制，边镇固则内安。羁縻之夷，以不治治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

权、所以运国势，纪纲、所以系国脉，人才、所以主国命。故国之不亡者三：权不下移，国不亡；纪纲不堕，国不亡；不用小人长国，国不亡。

弗通于时而泥古，斯困溺於法制者也，迂；谋近小而昧远图，斯困溺于功利者也，陋。二者皆暗于道者也，谓之识局。

物各得其所之谓大同。大同者，化之极也。百姓曰用而不知，是谓安常。安常者，神之至也。

圣王神道设教，所以辅政也。其弊也，渎於鬼神而淫於感应。礼曰：“刚毅犯人妨於

政，鬼神过节妨於政。”言失鬼神之中也。后世之鬼神亵而不敬，惑而诬，皆妨政教也夫！

安天下不失丘民之心，固矣。而贤智在位，豪杰得所，尤其所急焉。夫是人也，一世之标准也，王者能尽畜而有之，则天下之变在我。不幸而有乱逆者，皆愚谬之夫尔。愚谬安足成乱，故乱天下者，才智之堆也。是以圣王知之养之，学校罗之，科目录之，才艺廪之，史胥拔之，山泽之隐而不得其所者寡矣。

仁、义、礼、乐维世之纲；风教、君师，作人之本。君师植风教者也，风教达礼乐者也，礼乐敷仁义者也，仁义者君师之心也，八者具而和平之治成矣。虽谓之尧舜可也。

事势有轻重，为政有几宜。必俟大有更革而后可救其积弊者，重也；渐次而变亦可以返其未极者，轻也。施之失其宜，未有不养患而激乱者，要之贵察於几。

人非乐天之心，不能制情於道，故莫不有欲。欲则贪侈，贪侈则僭，僭则乱，圣人以礼防天下，使民各安其分而不争，是故或役或承、或亢或卑、或宠奴夺、或泰或约、一受其正。奔命执分而无外慕，心定故也。是谓天下齐一、久安、长治之道乎！失其防者反之。

治安之国，其事简，其赋轻，其政平，其气和，其民乐，灾异足以警寇贼，奸宄无衅以起，夷狄仰其治而顺化，而祥瑞不与焉。危乱之国，其事繁，其赋重，其政僻以淫，其气乖。其民畏以怨，祥瑞适以肆寇贼，奸宄窃发，夷狄乘其敝而扰，而灾异不与焉。

有圣人而后名教立，定之以天命则妄心灭；定之以礼义则遂心亡；定之以法制则纵心阻。故名教者，治世之要也。

人心、道心皆天赋也，人惟循人心而行，则智者、力者、众者无不得其欲矣。愚而寡弱者、必困穷不遂者矣。岂惟是哉！循而遂之，灭天性，亡愧耻，恣杀害，与禽兽等矣，是以圣人忧之。自其道心者，定之以仁义，齐之以礼乐，禁之以刑法，而名教立焉。由是智愚、强弱、众寡，各安其分而不争，其人心之堤防乎？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兴行在民趋於正。上节俭，刚寡取于民而富矣；上简易，则动于民者寡而乐矣；上稽道于圣，则民不惑于异术而趋于正矣。

圣王敬天不泥天，以人事足以胜之也，故奸宄无以乘其惑；庸主不慢天则泥天，而应天之实无闻也，故奸宄得以藉其变。

正大广远，以之立法；公平明恕，以之用法。不正则戾道，不大则用小，不广则偏於一，不远则所施不久。 公平则人服，用明则情得，用恕则法行而物感，要终之仁也。

世之平也，安静中和之士皆足以有为，缓急有用；苟无俊杰焉，诡特不羁之才亦可也。或曰：“诡特无行，不可！”曰：“时急其所长也，顾御之有道焉尔，德也岂悉求於众人哉！震之以敦大之气，入之以诚信之操，则受变於我而才无不效矣。”

三皇草衣木食，人曰时也。王子曰：圣人俭以顺俗也。 尧舜茅茨土阶，人曰时也。王子曰：圣人俭不务饰也。此天下之大乐也。 今之时政繁矣，风侈矣，民劳矣，财困矣，生促矣，天下之大灾也。上之人乃不思而返之，其胥溺之道乎！舍是而欲有为，其为治也亦外矣。

圣人为治，豫调夫国势之机， 机伏而不可见者，议之若未然，举之若无所事。一失

厥会，轻者浮，重着压，强者甚，弱者微，事去而不可为矣。 故执古者，失于时宜；徇俗者，蔽于囚陋；守法者，惮於更革；举不足以论机也。通炤远观，其惟神识之士乎！

君子篇

君子有微言，无谬言；有辩言，无赘言。探道于精曰微；迷道于幽罔以惑世曰谬；析理以明道曰辩；道无所赖以明而漫言之曰赘。

仁、义、礼、乐，圣王固世之道也，虽寡近功而有远效，世非有桀纣之恶，犹存也。秦人弃礼义而尚功利，虽速得之，必速失之。

圣人之言有尽，圣人之道无穷。圣人处其时事也，不可以有加矣；时变势殊，圣人应之则反是。是故圣人执道不执事。然则，圣人有未言、末行者，当以道求之可也。

死合天理之谓仁，死尽人道之谓义。 比干剖心，申蒯断臂，弘演纳肝，豫让吞炭，要诸仁义之途，岂徒然哉!彼苟免者，生也倏忽，延命几何？一息之差，万世之谬。 既失忠贞之节，终抱忸怩之耻。生也无颜，气也不扬，与死何殊哉！

人无天地普大之心，则限而不能通，偏而不能公，不足以宰天下之事，亦不足以议天下之道。

或问君子之乐。 曰:”顺理而行，随寓而安，无得无丧，以道御之，何不乐！”曰:所由乐？曰:“穷理尽性，通之天人，斯得矣。”曰：人何以寡乐？曰:“得於内斯轻乎其外也，重于外斯失乎其内也。夫人也既重於外也，则夫利害祸福、穷通得丧，曰交於前，而劳心以图之，忧且不及矣，而况于乐乎！”

五行生克之说，始而谶纬托经，求信其术：终而儒者援纬以附於经，此天下之惑，固蔽而不可解矣。

古人之学，先以义理养其心，志於道，据於德，依于仁是也。复以礼乐养其体，声音养耳，彩色养目，舞蹈养血脉，威仪养动作是也。内外交养，德性乃成，由是动合天则，而与道为一矣。今人外无所养，而气之粗鄙者多；内无所养，而心之和顺者寡。无怪乎圣贤之不多见矣。

离气无性。气外有本然之性，诸儒拟议之过也。

正道湮塞，邪说横行，多由于在上之势致之。 汉光武好图谶，故当时纬候之流，顺风趣附，遂使道之所妄，强以为真；命之所无，的以为有。郑兴、贾逵以扶同贵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弃。嗟乎！贵贱穷通之际，守义乘道，坚而不回者，几何人哉？中人小生慑于时威，孰能违之，而况寡超明之鉴者乎？卒使天下后世诡圣不经，奸政坏俗，厥谁之咎哉？

性与道合则为善，性与道乖则为恶，是故性出于气而主乎气，道出于性而约乎性。

迂儒强执，不识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顾国家之计；俗储浅陋，不达治忽之机，皆不堪委任。

不直截语道，而穿凿以求通，其蔽于成心乎!不普炤于道，而强执以求辩，其蔽于私心乎！此二心者，学道之大病也。 虽然，祛其偏倚，则私心可亡。学至於成心，则习识坚固，吝其旧学而不舍，虽贤者犹不能辩其惑，而况愚不肖之无识乎？故习识害道。

墨索里尼论职团制国家 关于职团定义和归属的决议

1933 年 11 月 13 日该决议由意大利政府首脑起草，并于 1933 年 11 月 13 日在全国职团理事会大会上宣读，此前他发表了重要讲话：

全国职团理事会：

将职团定义为在国家支持下对生产进行完整、统一管理的工具，旨在扩大意大利人民的财富、政治权力和福祉；

宣布原则上应根据国民经济实际需求组建主要生产部门的职团；

规定各职团的一般员工应包括国家行政、法西斯党、资本、劳工和专家的代表；

指派职团执行特定任务：调解、协商（重大问题必须协商）以及通过全国职团理事会颁布规范国家经济活动的法律；

授权法西斯主义大理事会决定宪法和政治秩序的进一步发展，这应通过职团的有效组建和实际运作来实现。

关于职团国家的演讲，致全国职团委员会 1933 年 11 月 14 日

昨晚宣读我的决议时，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让我不禁思考，是否值得发表演讲来阐述这份文件，它直指你们的智慧，诠释了你们的信念，唤起了你们的革命精神。然而，也许大家有兴趣知道，我通过什么思考和思考过程，才得出昨晚发言的措辞。

但首先，我想祝贺大会在这里举行的辩论。只有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才会对表达的不同观点和意见感到惊讶。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我甚至应该说这是必要的。

和谐就是和谐，不和谐是另一回事。

另一方面，在讨论像目前这样微妙的问题时，每个人都不仅应该带着自己的理论准备、自己的心态，还应该带着自己的个人气质参与辩论，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最抽象的哲学家、最超验的形而上学家，也不能完全忽视或放弃自己的个人气质。

你们应该记得，在 X 年 10 月 16 日，在威尼斯广场聚集了成千上万为十年庆典来到罗马的党官员，我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这场危机已经困扰了我们四年——我们还没有进入第五年的第一个月——这场危机是存在于系统内部，还是源于系统？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没有立即的答案。答案需要思考，长时间的思考，以及大量数据的支持。今天我的答案是：这场危机已经深深扎根于系统之中，成为这个系统的危机。它不再是一种伤害，而是一种体制性的疾病。我们现在可以断言，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已经被取代，与之相伴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现在我想给大家大致介绍一下上个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人们可能会把上个世纪定义为资本主义的世纪。首先，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能与资产阶级混为一谈。资产阶级是另一回事。资产阶级是一种生存模式，它可以是伟大的，也可以是卑劣的；可以是英雄主义的，也可以是庸俗的。

而资本主义则是一种特定的生产模式，是一种工业生产体系。

当资本主义达到最高境界时，它就是一种大规模生产、满足大众消费的模式，通过在国内和国际发行联合股份资本来筹集资金。因此，资本主义是工业化的，在农业领域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我想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划分三个时期：活跃期、停滞期和衰退期。

活跃期从 1830 年到 1870 年。这一时期恰逢机械织机和蒸汽机的问世。工厂应运而生。

工厂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这是利润丰厚的时期，因此自由竞争法则和弱肉强食法则得以充分发挥。有些人倒下了，有些人受伤了，最终由红十字会救助。这个时期也有危机，但危机是周期性的，既不长也不普遍。

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如此强大的活力和恢复力，足以轻松克服危机。正是在这个时期，路易·菲利普发出“致富!”的感叹。城市化发展迅速。柏林在世纪初只有十万居民，现在已达到一百万；巴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只有 56 万居民，现在也接近一百万。伦敦和整个大西洋沿岸的城市也是如此。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优胜劣汰确实发挥了作用。当然，战争也是有的。不过，这些战争与我们经历过的世界大战无法相提并论。它们都是短暂的。1848-49 年的意大利战争持续了四个月，第一年四个月，第二年四天；1859 年的战争持续了几个星期。1866 年的战争也是如此。普鲁士的战争也没有持续更长时间。1864 年对丹麦公国的战争持续了几天，1866 年对奥地利的战争持续了几天，并在萨多瓦结束。即使是 1870 年的战争，包括塞当的悲惨日子，也没有持续两个季度以上。

我想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战争刺激了各国的经济活动，事实上，八年后的 1878 年，法国再次站起来了，并有能力举办世界博览会，这一事件让俾斯麦深思。我们不应将美国发生的事情称为英雄主义。这个词只适用于军事事件；但毫无疑问，对远西地区的征服是艰难而冒险的，它像任何伟大的征服一样，充满了风险和牺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应该从蒸汽机的出现到苏伊士运河的开通。

这是一个为期四十年的时期。在这四十年里，国家是一个旁观者，保持超然；自由主义理论家说：国家只有一个职责，那就是以一种明智的方式行事，以至于人们甚至不会在经济领域察觉到它的存在。你对经济问题的关注越少，你的统治就越好。因此，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仅受《刑法》和《商法》的约束。

但 1870 年后，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为生存而挣扎，不再进行自由竞争，也不再选择适者生存。我们注意到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疲劳和偏离的最初征兆。卡特尔、辛迪加、联合企业和托拉斯的时代开始了。我不必赘述这四种资本主义组织形式之间的区别。

这些区别无关紧要，或者几乎无关紧要。

它们就像利率和税收之间的区别。经济学家尚未定义它们，但纳税人必须缴纳这些费用，他们发现讨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因为无论费率还是税收，他都必须缴纳。正如一位意大利自由派经济学家所坚持的那样，受托、卡特尔化和联合化的经济并非战争的结果。不，第一个煤炭卡特尔成立于 1879 年的德国多特蒙德。

1905 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年，德国已有 62 家金属卡特尔。

1904 年成立了一家钾肥卡特尔，1902 年成立了一家糖业卡特尔，玻璃行业则有十家卡特尔。当时共有 500 至 700 家卡特尔控制着德国的工商业。在法国，1877 年朗维工业办公室成立，负责处理金属行业事务；1888 年又成立了一个处理石油事务的办公室；1881 年，所有保险职团合并。奥地利的钢铁卡特尔成立于 1873 年；国际卡特尔与国内联合企业同时发展壮大。瓶厂联合组织成立于 1907 年，而包括法国、英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制造商在内的玻璃和镜子工厂联合组织则成立于 1909 年。

1904 年，铁路轨道制造商组成了国际卡特尔。锌业联合组织成立于 1899 年。在此我就

不一一列举那个时期组建的所有化学、纺织、航运和其他联合组织了。

英智硝酸盐卡特尔成立于 1901 年。我这里有一份完整的国内和国际信托职团名单，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可以肯定地说，在欧美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没有哪个领域没有形成这些典型的资本主义组织。

但结果是什么呢？自由竞争的终结。

鉴于利润已经减少，资本主义企业发现达成协议比争斗更好，为了分享市场和利润，它们会组成联盟和进行兼并。供求定律不再是一个教条，因为卡特尔和托拉斯能够影响供求关系；最后，这种联合、托拉斯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向了国家。它要求什么？关税保护。自由贸易只是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更广泛方面，它受到了致命一击。第一个设置几乎无法逾越的壁垒的国家是美国。现在，英国自己也放弃了所有似乎已成为其政治和经济生活永久传统的做法，并采取了日益强硬的保护政策。

接着是战争。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企业膨胀。其规模从百万级上升到十亿级。从远处看，所谓的垂直结构给人一种巨大、混乱的印象。企业的规模超越了人的能力：以前是精神控制物质，现在是物质制约并塑造精神。生理学变成了病理学，一切变得不正常。在人类的所有变迁中，有两个人物脱颖而出，他们可以被看作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瑞典火柴制造商克鲁格和美国投机商因索尔。用我们惯常的法西斯坦率，让我们补充一点，在意大利也有过这种情况；但总体而言，它们并没有达到类似的高度。

在现阶段，超资本主义从无限消费的乌托邦中汲取灵感，并以此为借口。超资本主义的理想是将人类从摇篮到坟墓都标准化。超级资本主义希望所有婴儿出生时都一样长，这样婴儿床就可以标准化；所有孩子都想要同样的玩具；所有男人都穿同样的制服，读同样的书，看同样的电影；每个人都渴望拥有所谓的省力机器。

这不是异想天开，而是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因为只有遵循这样的路线，超级资本主义才能实现其计划。资本主义企业何时不再是一种经济现象？当其规模大到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时，资本主义企业就会陷入困境，并像一块沉重的砝码一样跌入国家的怀抱。

国家干预由此开始，并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那些无视国家的人开始焦虑地寻求国家的帮助。

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如果欧洲各国政府都睡 24 小时，这种拖延足以酿成大祸。

目前，没有一个经济领域不需要国家干预。

如果我们——这只是假设——向资本主义的这个最新阶段让步，我们就会滑向国家资本主义，而后者不过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倒退。无论以何种方式，我们都会走向国家经济的官僚化。 这是资本主义体系普遍意义上的危机。但还有一场特殊的危机，作为意大利人和欧洲人，我们对此尤为关注。这是一场典型的欧洲危机。

欧洲不再是引领文明的大陆。这是需要思考的人必须意识到并传达给别人的严峻事实。曾几何时，欧洲在政治、精神、经济上统治着世界。在政治上，通过其政治体制。在精神上，通过欧洲精神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一切。在经济上，因为它是唯一高度工业化的大陆。与此同时，一个伟大的工业和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在大西洋彼岸成长起来，在远东，日本在 1905 年通过战争与欧洲接触后，迅速向西方迈进。

这里的问题是政治问题。

让我们来谈谈政治，因为这次大会显然是一次政治性会议。如果欧洲能够找到最低限度的政治团结，她仍然可以努力恢复她在世界文明中的领导地位。
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一贯奉行的政策。然而，除非纠正某些不公正现象，否则欧洲不可能达成政治谅解。我们已到了一个极其严峻的关头；国际联盟已经失去了所有能够产生政治意义和历史影响的东西。此外，那些发明它的人从未选择加入。俄罗斯、美国、德国和日本都不在。国际联盟从其中一项原则开始，这些原则在宣布时听起来很美，但一旦考虑、分析和分解，就会变得荒谬。还有什么其他外交手段可以恢复国家之间的联系？

洛迦诺？洛迦诺是另一回事。洛迦诺与裁军无关。出路不在于此。

《四国公约》近来陷入一片沉寂。没有人提起它，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这正是我们无意重启倡议或加速解决这一局势的原因，因为从逻辑上讲，这一局势终将不可避免地发展到顶点。

现在让我们换个问题：意大利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吗？

你们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如果资本主义是指现在所有国家都普遍存在的用法、习俗和技术进步的综合体，那么可以说意大利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并从统计的角度来审视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研究构成人口的不同经济类别，那么我们就有数据可以表明，意大利不是当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

1931 年 4 月 21 日，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有 294.3 万人；佃农有 85.8 万人。共有 163.1 万农民和佃农以作物分成的方式耕种；另有 247.5 万农业人员、农场工人、工薪族和季节工。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总数为 790 万。制造商为 52.3 万；商人 84.1 万；独立和依附的手工业者 72.4 万；工业工人 428.3 万；仆人 84.9 万； 国家武装部队，包括警察在内，有 541,000 人；从事文科和职业的人数为 553,000 人；公共和私人服务业雇用了 905,000 人；加上其他群体，总人数达到 1700 万。

意大利的房地产所有者和出租者并不多。只有 201,000 人。有 1,945,000 名学生和 11,244,000 名家庭妇女。另有 1,295,000 人属于其他非专业类别，这个数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计算。

从这份调查中，您一眼就能看出意大利经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为什么不能将其归为任何一种类型；尤其是以 523,000 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为代表的制造商，他们大多是中小型企业的所有者。我所说的“小型企业”是指员工人数在 50 到 500 之间的企业。中型企业雇佣 500 至 5000 或 6000 名员工；超过这个数字的就是大型工业，有时会发展成超级资本主义。

这项调查还证明，卡尔·马克思追随其世界末日学说，声称社会可以被分为注定永远不可调和的两个阶级，是多么的错误。

我认为，意大利应该保持混合经济，即以强大的农业组织为基础（事实如此，熟悉这些事务的人一致认为，最近工业的轻微复苏是由于过去几年的丰收）；健全的中小型工业；不进行投机的银行；履行其向消费者快速、合理地提供商品的适当任务的贸易体系。我昨天晚上提交的决议概述了我们打算和希望创建的职团，并确定了其宗旨和目标。决议指出，创建职团的目的是增加意大利人民的财富、政治权力和福祉。这三

个目标相互制约。

政治权力创造财富，而财富反过来又加强政治行动。

我想请大家注意阐述的第三个目标：意大利人民的福祉。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建立的机构在特定时刻应该被大众自己视为提高生活水平的手段。

在特定时刻，劳动者、耕种者必须能够对自己和家人说：

“如果我今天真的生活得更好，那我要感谢法西斯革命建立的机构。”

贫困在所有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有一部分人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但我们有专门的机构来照顾他们。真正应该困扰我们的是那些强壮、有能力的人的贫困，他们虚荣而狂热地寻找工作。我们应该让意大利工人——作为意大利人、工人和法西斯主义者，我们都很关心他们——认识到，我们建立机构不仅是为了表达我们的理论观点，而且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取得积极、具体、务实和持久的成果。

我不会赘述职团可能发挥的调解职能，我认为行使咨询权没有任何弊端。事实上，每当政府必须采取任何重要措施时，都会咨询各相关方的意见。

如果对某些特定事项进行强制性咨询，我认为这没有坏处，因为任何使公民与国家更紧密联系、任何将公民纳入国家机器的事情，都对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和国家目标有益。我们的国家不是绝对国家，更不是远离人民、仅以法律为武装的专制国家，法律本应具有灵活性。

我们的国家是有机的、人性化的国家，渴望贴近现实生活。

即使在今天，官僚主义也不是，将来更不会是，国家活动和意大利人民实际需求之间的障碍。我确信，意大利的官僚机构确实值得钦佩，它将在未来一如既往地与职团合作，只要事实证明这是有效解决当前问题的必要条件。我们决议中关于赋予全国职团理事会立法权力的内容，符合大会的利益。有人本末倒置，已经谈到了现有众议院的终结。让我们把话说清楚。立法机构即将结束，目前的众议院必须解散。

但是，由于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足以建立新的职团机构，因此必须根据 1929 年通过的制度任命下一届众议院。然而，众议院必须决定自己的命运。有法西斯主义者想为这个建议哭泣吗？

如果有，请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擦干他们的眼泪。

可以想象，全国职团理事会可能会完全取代目前的众议院。我从来就不喜欢众议院。毕竟，众议院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个时代错误：它是一个我们发现的机构，但它与我们的思想和作为法西斯分子的信仰格格不入。众议院假定存在一个我们已经颠覆的世界：它意味着政党的多元化，而且经常阻碍部长级活动。从我们废除这种多元化的那一天起，众议院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原因。

法西斯议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实现了他们的理想，我们必须推断，如果他们的血液没有被充满过去气息的氛围所毒害，那么他们血管中的血液是非常健康的。但这一切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发生，因为我们不着急。重要的是要确立原则，因为从原则出发，必然的结果就会随之而来。1923 年 1 月 13 日大议会成立时，表面观察者可能认为这只是新机构的建立。其实不然：从那天起，政治自由主义就寿终正寝了。通过建立民兵组织（党的武装保卫力量）和革命委员会（革命的最高机构），我们彻底击溃了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所有支持者，从而坚定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今天，我们也要埋葬经济自由主义。

职团负责经济领域，而革命委员会和民兵组织负责政治领域。

职团意味着受监管的经济，因此也是受控制的经济，因为没有控制就没有监管。

职团取代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建立了一种新的综合体系。

一个事实具有象征意义，即资本主义衰落与社会主义衰落同时发生，而这一事实可能尚未得到充分考虑。

欧洲的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崩溃了。

我指的不仅是意大利和德国，还有其他国家。

从严格的逻辑角度来看，这两个现象尚未相互影响，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们是同时发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并存的现象在历史上特定时刻产生了它们所能产生的所有影响，企业经济随之兴起。

我们继承了这两种现象中仍然存在的一切。我们继承了每种自由主义理论中仍然存在的一切，每当劳动力被当作商品时，这些理论就会愤然崛起。经济人并不存在。人是完整的：他具有政治性、经济性、宗教性、圣洁性和战士性。

今天，我们正在革命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塔西纳里同志说得对，一场伟大的革命，要想在人民的生活和历史上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记，就必须是一场社会革命。如果你深入观察，你会发现法国大革命具有显著的社会性，因为它摧毁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所有东西，从通行费到劳役，它还引发了法国土地财产制度的动荡，造就了数百万小土地所有者，他们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该国最强大、最稳固的力量之一。

如果不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认为他发动了一场革命。革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是宫廷阴谋，也不是内阁更迭，也不是一个政党取代另一个政党上台。

1876 年，左翼上台被描述为一场革命，这真是可笑。

最后，让我们扪心自问：职团主义能否适用于其他国家？我们之所以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所有努力研究和理解这个问题的国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鉴于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职团主义解决方案将在各地脱颖而出，但如果要全面、彻底、完整、革命性地推行这一制度，则需要三个条件。一个单一政党，以便政治纪律与经济纪律并存，共同命运的纽带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超越利益冲突。但这还不够。除了单一政党，还必须有一个极权国家，一个通过吸收人民的能量、利益和愿望来改造和提升他们的国家。

但即使这样还不够。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生活在强烈的理想张力氛围中。

我们意大利人如今就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

因此，我们要一步步巩固我们取得的成就，使之具有持久性，将我们的理念转化为行动。

谁能否认法西斯时代是一个充满伟大理想的时代？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在这个时代，胜利为武器披上了荣耀的光环，制度得以更新，土地得以赎回，新的城市得以建立。

德国法律和立法

当民族社会主义政府于 1933 年 1 月 30 日成立时，它面临着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广泛混乱局面。在法律领域和司法行政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状况。

情况非常危急，不允许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浪费任何时间。

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结束议会迄今为止的运作方式。即使在战前的帝国时代，这个机构也证明了自己的效率低下。然而，战后出现的共和制议会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对国家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这个共和制国会是根据 1919 年《魏玛宪法》规定的原则组织的。但这部宪法是由一个与国家的实际需要完全脱节的理论法学家和政治家会议起草的。因此，它与德国的历史传统、德国人的心态和德意志民族的伦理不相协调。此外，在魏玛颁布的宪法性法律是在所谓的和平条约的支持下制定的，因此它们自然无法唤起民众对新宪法的支持。在 1932/33 年的最后危机中，根据这部宪法运作的立法机构，也就是帝国议会，绝对没有发挥作用。议会立法日益被帝国总统发布的紧急法令所取代。

1931 年通过了 35 项法律，发布了 42 项紧急法令。1932 年只通过了 5 部法律，但发布了 60 条法令。这种紧急法令制度不能为国家政府提供一个永久的基础。正如国家的情况一样，地方行政部门也无法应对他们所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市政当局，由于政治混乱直接导致的经济状况，面临着灾难的威胁。除此以外，帝国和各联邦州政府之间不幸的二元论（注：本文中多次使用"联邦州"这一表述，最近的宪法改革也对这些州的地位产生了影响。由于一般的局外人已经习惯于把德国看成一个政治单位，因此不妨解释一下，战前德国是一个联邦联盟，名称为：德意志帝国，由普鲁士国王世袭担任主席，他的头衔为"德意志皇帝"。1918 年，各联族群家的国王和王子退位；但《魏玛宪法》以共和国的形式保留了主要联族群家，它们拥有独立的政府和议会。这些国家是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以及一些小州：巴登、图林根、黑森、梅克伦堡、奥尔登堡、不伦瑞克、安哈尔特、利珀、沙姆堡-利珀。除此以外，还有吕贝克、不来梅和汉堡等自由城市。）导致行政机构的发展越来越不协调。司法行政部门未能制止日益增多的犯罪和不端行为的发生。尽管由于道德观念的普遍松懈而对罪犯越来越宽容，但在柏林被指控盗窃的人数却从 1926 年的 32452 人上升到 1932 年的 52231 人。被控入室盗窃的人数在同一时期内从 18673 人上升到 36729 人。而抢劫加谋杀的案件数量从 2 起增加到 7 起。1926 年，由盗窃造成的损失达 1650 万马克。1932 年则达到了 3200 万。

无罪判决的增加，触犯了大众的正义感，这突出地证明了现有的刑法典不足以有效地处理一般犯罪的新发展。劳动法是建立在雇主和雇员之间长期利益冲突的基础上的，它无法维持工业和平，而工业和平对国家的存在是如此必要。失业率的上升使现有的紧张局势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国家的粮食供应来源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农民负债累累，此外，由于按照世袭制度划分土地，他们的农场很难盈利。此外，一大批外国人，即犹太人，从东方移民到德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他们在政治、法律、学术界、教育和文化组织的控制方面获得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犹太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他们在公共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关键职位上都有了立足之地。1933 年发生的政治变革

带来了法律领域的许多实际改革。崩溃的威胁清楚地证明，现有的法律不足以满足国家的重要需求，司法实践的改变，或通过个别措施或补充法律，都不足以消除这些深刻的缺陷。只有在民族革命引入国家生活的新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秩序，才能有效地纠正这种状况。但是，一个新的、永久性的体系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起来。因此，帝国政府没有急于制定新的法典；而是暂时满足于引入补充法律，为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并为未来的系统法典奠定基础。立法者将最终形成的法律必须来自国家本身的生活。德国法学院是作为一个公共机构成立的，在这个组织的框架内，一些委员会正在进行初步的法学工作，这在新法典最终形成之前是必要的。

目前，学院主要从事的是法典中确立和保证家庭在国家社会中作为一个整体单位的地位的那一部分。整个新的法律体系将受到今天主导德国思想的主要思想的启发：即领袖的思想、人民的思想和民族共同体的思想。为了理解新立法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必须清楚地掌握今天德国人在谈到民族共同体即 Volksgemeinschaft 时的意思。

这种民族的想法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成员有一个同质的民族特性。当众多的人一起行动，意识到他们的历史统一性，并决心作为一个民族单位追求完成一个使命，那么他们也是一个政治单位。现在，管理民族共同体的法律产生于内在的精神、政治和物质需要，这些需要通过共同的历史经验而发展。

因此，在民族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法律不是国家权威的表达，人民必须作为一个被动的和惰性的群体服从于它。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相协调，法律是人民生活的一部分。立法者把人民灵魂中固有的对正义和非正义的感觉，对善和恶的感觉引出来并给予有机的表达。因此，民族社会主义的法律概念的起点是人民，而不是国家。国家的任务是确保法律得到执行。在中世纪末期传入德国的法律体系是以罗马法学的原则为基础的。这些原则在十九世纪得到了恢复和重新制定。它们与德国的传统完全不同，而且证明它们永远阻碍着德国法律统一体系的发展。德国人民没有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的传统法律体系，而盎格鲁-撒克逊人正是通过这种体系来表达其内心的正义感，并构成其所有法律思想的基础。在德国生活的许多领域，引入一种与人民的天性相悖的制度，使法律的运作与人民自然发展的生活分离。第二帝国自 1871 年以来所做的立法努力，未能弥补人民从其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法律本能与博学的法学家的思想之间的差距。在第二帝国时期进行的伟大的法典编纂工作是由受过罗马法思想训练的人完成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部法典很快就被证明需要改革；但所有改进它的尝试都失败了。在法律和人民的自然法律本能之间产生隔阂的一个特殊因素是，犹太人在法律界获得了主导地位。仅在柏林，1932 年就有 54%的执业律师是犹太裔。在解释和应用德国法律时，他们以自己种族的法律思想为指导。犹太人和德国人的法律观念之间的差异表现在，直到 19 世纪，由于犹太人对法律上的是非观念不同，他们在法庭上受到特殊对待。为他们制定了特殊的宣誓方式，他们不会因为接受赃物而受到惩罚。1935 年 9 月 15 日的法律制止了犹太人的进一步主导地位；但在柏林仍有许多犹太律师。1937 年，在律师总数中，32.6%是犹太人。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里，元首是法律的制定者；但他本人是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民族社会主义法律所遵循的原则与独裁者地位在法律上所依据的原则不同。为了维持独裁者的统治，外部强制力是必要的；但领导权则取决于信念的无条件权威。在有强制力的地方，个人会觉得自己对社会和

未来没有责任，但民族社会主义法律正是建立在这种个人责任感之上。最高的荣誉和最高的理想在于为社会服务。荣誉和内部以及外部的自由对社区的存在至关重要。因此，由于民族共同体的理想构成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法律形式来表达这一原则，并使每个德国人都有作为国家团体组成部分的地位。

个人并不是孤立地站在社区之外的。一个共同体必须由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并不仅仅是其统治或社会机构的对象。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代表着社区，并在社区内有自己的活动领域。社区的全部活动取决于单个成员的力量和成就。因此，成员并不像专制主义国家那样，处于没有自己权利的主体地位。社区的权利就是他的权利，社区的荣誉和自由都取决于他。但他是为了社会而不是为了个人而占据这个位置的。这意味着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利。

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仅仅意味着现有国家的外部崩溃。它还意味着国家的基本观念及其法律的改变。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作是对 1933 年存在的罪恶的反抗，那就错了。相反，民族社会主义法律代表了某种本质上的新东西，它能够为所有传统形式注入新的生命。元首和人民，民族团体和德国公民，构成了民族社会主义法律概念的基本要素。而新法律的目的是为这一概念赋予形式。除了关于帝国领导权的法律之外，还通过了以下法律，这些法律由于其根本的重要性，可以被视为宪法性法律：1933 年 3 月 31 日和 4 月 7 日的协调法，1933 年 7 月 14 日的公民投票法，1933 年 12 月 1 日的建立党和国家统一的法律，1934 年 8 月 1 日的继承法，1933 年 1 月 30 日的地区长官和地方政府法，1935 年 3 月 16 日的战斗服务法，帝国国旗法，帝国公民法，以及 1935 年 9 月 15 日的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1938 年 3 月 13 日的奥地利和德国统一法。从这个清单可以看出，国家的重心不在于它的外部结构，也不在于它与国家本身之外的东西的关系。相反，国家是由它所要服务的人民的内部关系决定的。

国家、政党、经济体系和司法体系，只是为人民服务的次要因素。这一点在元首 1934 年 8 月 8 日的法令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他在法令中要求帝国内政部长就政府任命元首为帝国总统的决定准备一次全民公决。我希望德国人民明确批准内阁的决定，即把前帝国总统的职务移交给我，并由此与帝国总理的职能相结合。

我绝对相信，国家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于人民，所以我要求将内阁的决定，以及任何必要的补充，毫不拖延地提交给德国人民，让他们在自由的公民投票中对这些措施发表意见。人民和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表明，把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定性为极权主义国家是多么错误。一个本身为某一目的而工作的国家，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被称为极权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重心已经转移到个人的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无力反抗的个人面对的是一个全能的国家。

但是，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民族，从而服务于每个成员。每个德国人都是整体的成员，因此被要求在国家的生活中进行合作。整体这个词恰当地适用于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它体现在全体人民身上，并激活了国家存在的每一个分支。最重要的宪法法律是那些旨在保持德国血统纯正的法律。对民族社会主义来说，人民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德国臣民的总数，也不只是指所有具有共同历史的人。

民族是一种政治因素，它有自己的存在，为了维护这种存在，它的血液必须保持纯净和健康。民族存在的基础是种族。争论种族的构成是浪费时间的。种族是上帝用来

建造人类的石头，我们的任务只能是保护它们。这就是帝国议会于 1935 年 9 月 15 日通过的《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的目的。该法案确保德国人民与生活在同一国家领土上的犹太人民明确分开。这种分离是一种严格的分离，其结果似乎常常对个人产生严厉的影响。但是，只有在生活和法律上完全分离，才能使两个民族在同一领土上共同生活，这是可以容忍的。要实现这一点，就要防止各种血统关系的混合。只有当双方都认为另一个种族是外来的，才能避免另一个种族对一个种族的仇恨和蔑视。该法案在未来确保了德国人民必要的生物统一性。1935 年 9 月 15 日的《帝国公民法》在政治领域补充了另一项法案。它在国家内部区分了德国公民，他们是国家伟大的代表和基础，和那些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居住在国家的人。"只有那些国民才能成为国家的公民。只有那些有德国血统的人才是国公民，不存在宗教信仰的区别。因此，任何犹太人都不能是公民"。（党纲，第 4 点）。只有帝国公民才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只有他们才能行使选举权，才能担任官职，才能参加帝国议会的选举或公民投票。只有他们才能成为帝国议会或国家委员会、省委员会、镇委员会或区委员会的成员，或成为公务员或担任荣誉公职。授予这些权利的一个条件是，这些人应该有能力并愿意忠诚地服务于德国人民和德意志帝国。当帝国公民（其权利以帝国公民证书的形式授予他们）和帝国臣民（他们只是作为保护单位属于德国国家）之间做出这种区分后，就有必要对那些只有部分犹太血统、目前居住在德国的人的地位做出规定。这些人处于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种族之间，他们的命运是特别困难的，也是许多讨论的主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做出意义深远的让步。这包括制定这样的规则：所有那些祖父母少于三个犹太人且不宣布效忠于犹太民族的人都不应算作犹太人，在某些情况下应允许他们被吸收到德意志民族中。只有那些有三个或四个犹太祖父母的后代的臣民才算作犹太人。有两个犹太祖父母的臣民可以获得与德国血统的人结婚的许可。他们和只有一个犹太祖父母的臣民将来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被吸收到德国政治体中。这一规定有利于那些有一或两个犹太祖父母的人。但是，如果不同时废除有关私人俱乐部和社团等的雅利安人条例，它就不可能成功。但它已经使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再由犹太人在政治上或文化上进行统治了。体现在法律条文或政党条例中的更严格的限制仍然保持原样。如果德国人民今后受到保护，不再有任何混杂的外国血统，那么他们将足够强大，能够经受住这种混杂。在特殊情况下，元首可以批准豁免该法案。

NSDAP 是代表人民政治生活的组织。它是德意志帝国唯一的政治组织；因为 1933 年 7 月 15 日的法案规定，旧的政党制度已经被取代，不应成立新的政党。党的任务是用对国家的责任感来激励每个人。党的地位不归属于瓦解国家，而是以其自身的权利存在。实际上，现在的国家在事实上建立之前就已经理想地存在于党内。新的国家所通过的所有法律都只执行党的原则，党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然而，尽管占据了这一主导地位，那些不是党员的德国人并没有因此而不能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因为通过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全体人民已经成为政治权力的存放者。党与国家的关系在一项规定党与国家统一的特别法案中得到了进一步界定。该法案于 1933 年 12 月 1 日通过。在实践中，通过任命元首为国家元首，通过在党和国家机构中广泛的个人联合，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统一。该法为这种实际联合提供了法律基础。但该法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党和国家各自进行的各种活动领域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和界限。

它的目的是为联合工作和合作开辟一条道路。对外，这种新的立场通过任命元首的副手为不负责任的内阁部长得到了正式体现。因此，他的职责不属于国家的任何一个部门。他专门负责党的事务，并监督党对国家许多内部事务的影响。这种国家与党的结合使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其特有的形式。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部门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后来经 1934 年 1 月 30 日《帝国重建法》修正和补充的《帝国领袖法》，代表了对迄今存在的代议制民主形式的否定。它把新的重点放在了通过选举和公民投票的直接民主上，这种方式的采用范围大大扩展。

以前，人们经常犯一个错误，就是把民主与与之相关的特殊机构联系起来。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由于德国放弃了拥有几个政党的制度和通过议会投票进行立法的制度，她就放弃了民主原则本身。但是，民主意味着人民的主权，意味着政治领导人应该对大多数人负责并代表他们。因此，如果我们从内部考虑德国人民的生活，我们必须承认，与关于民主或独裁的争议无关，德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相当于建立了一种直接的民主形式。没有人可以说，元首没有承认人民的主权是国家的最高统治原则。他多次将自己的工作提交给人民的判断，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利以人民的名义行事和发言。民主原则也正在通过以下事实得到实践：我们正在稳步发展一个政治领导层，作为人民群众中的一个新兴事物。在这种选拔过程中，属于人民群众的真正有能力的人可以被任命为领导职位，而不考虑出身或财产，只考虑卓越的能力。元首在 1937 年 1 月 30 日对帝国议会的讲话中说"通过这种遵循自然法则和人类理性的选择过程，我们的人民中那些表现出最大自然能力的人将被任命到国家的政治领导岗位上。在进行选择时，将不考虑出身或祖先或财富，而只考虑候选人是否具有担任这些高级领导职务的天赋。"1933 年 7 月 14 日的法案规定了进行公民投票的法律程序。它授权帝国政府不仅在立法问题上，而且在其他措施上，都可以获得人民作为主权国家的裁决。如果某项法律是公民投票的主题，那么公民投票的有利裁决就不仅仅是一种批准行为，其本身就是一项正式的法律。

在民族社会主义政权的头四年里，有四次帝国议会选举和三次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的主题分别是：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放弃《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条款，阿道夫-希特勒担任帝国总统，以及奥地利和德国的统一。革命带来的民族团结要求国家按照人民意愿的统一进行相应的统一。因此，德国人民中最优秀的分子的一个长期愿望在宪法中得到了实现。德意志帝国的联邦结构起源于王朝统治，即使在第二帝国时期，王朝统治也是各联邦州的主权。1933 年 1 月 28 日的总统令已经授权帝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任命帝国专员，以维护各联邦州的法律和秩序。实现宪法统一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是 1933 年 3 月 31 日的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各州的议会和地方议会的组成应根据帝国议会选举的结果进行调整。因此，这些机构被赋予了统一的政治方向，而根据《帝国领导权法》规定的原则将立法权委托给联邦州，引出了政治领导权的统一。

1933 年 11 月 14 日帝国议会的解散，自动导致了联邦议会的解散，后者没有被重新选举。1934 年 1 月 20 日的《重建法》在法律上废除了联邦议会。1933 年 4 月 7 日的法案规定，联邦政府的活动服从于帝国政府。每个较大的联邦州，如巴伐利亚州和萨克森州，都被任命为州长，而较小的联邦州则被分为若干组，每组都有一名州长。这些州长接管了以前由联邦政府承担的一些职责。作为元首的代表，总督必须确保联邦

政府的工作以巩固帝国的政治统一为目标。总督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任命和解除联邦政府的总理和其他部长。他起草并颁布各自联邦州的法律。他任命公务员，并可以解雇那些不是由帝国任命的公务员。

1934 年 1 月 30 日的法案将联邦主权的最后残余移交给了帝国。根据这项措施，各联邦州的政府仅仅成为帝国行政部门的渠道。联邦州的立法需要得到帝国主管部长的批准。司法管理则由帝国直接接管。但是，尽管所有权力都集中在帝国政府手中，1935 年 1 月 30 日的法案中仍然保留了总督的职位。他是帝国和联邦当局之间的纽带，并被赋予了帝国政府的一些职能，以便在必要时可以考虑到当地的特殊情况。这样一来，尽管帝国统一了，但德国人民各部门的传统特性将得到保持。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颁布的法律并不代表宪法发展的最后阶段。它们只是为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

新宪法的形成不是从上面开始的，而是从下面开始的，从国家社会中最小的细胞——社区开始的。因此，他们是第一个接受宪法的人，体现在 1935 年的《地方社区法》中。但该法案不仅对社区的政治生活有意义。在许多方面，它试图在小范围内尝试一些最终可能对国家宪法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因此，《地方社区法》是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之一，在它所准备的基础上，帝国的新结构将被建立起来。地方社区法》中的规定来自古老而有价值的德国法律思想。它最重要的部分是由冯-斯坦因男爵倡导的，因为其目的是给予社区很大程度的独立性，以便它们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为整个国家的利益作出贡献。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选择的形式，代表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民族社区思想应用于行政管理的最早例子之一。

因此，《地方社区法》并没有把社区仅仅看作是一个技术和经济的行政单位，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个根据邻里的特殊情况而形成的社区。该法鼓励每个区都有牢固的独立性，以便每个公民都能通过他在社区这个狭窄社区的工作，在国家这个大社区的工作中进行明智的合作，并具有充分的责任感。因此，他不再仅仅是数百万人中的一个数字，而是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自己的特殊功能。由于这个原因，社区不只是被视为执行国家命令的被动机关，而是在其地区的有限框架内承担着完成那些与国家社会有关的任务的责任。德国地方政府的性质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原则上，社区必须根据自己的职责执行自己的任务。国家的监督仅限于确保行政管理符合法律规定并与国家的总体政策保持一致。但这种监督不能导致国家在不同意社区所采取的措施时接管行政机关。监察委员会只能阻止那些与帝国政府的政治目标相违背的法令生效：它不能强迫地方当局执行任何特定的措施。社区只能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就可以保证，国家的监督不会以任何方式妨碍地方当局的主动性和进取心。必须由社区来纠正所犯的任何错误。通过这种方式，社区的每一个成员都得到了政治上的正确思考。

2. 市长拥有自己的特殊机构，以形成决策。他和议员都不是由国家任命的。市长是由社区自己任命的，而议员则由党的代表任命。地方社区法规定，那些在职业上能代表社区及其特殊问题的公民将被任命为议员。这意味着，只有那些与社区的生活有密切联系，并因此认为自己对社区的福利负有天然责任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议员。

3. 社区的公民被要求在决策中发挥作用，并在行政管理中进行合作。

新的法律并不是要确保每个公民每年一次通过无记名投票，象征性地宣称他对地方

行政的责任：而是要实现每个公民的实际合作，并确保社区的每个成员承担他实际的责任。维持某些技术形式并不能保证存在真正的自治。只有当每个公民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在行政管理中进行合作时，才能保证后者。有很多荣誉工作者，《地方社区法》要求任何人不得拒绝荣誉职位。这种荣誉性合作的推行程度可以从以下情况看出：在德国的 51,311 个社区中，96.03%的社区由市长管理，他们的职位是荣誉性的。在总共 138,895 名市议员中，99.42%是荣誉性的。此外，还有 291234 名议员和 305248 名助理议员；因此，有 777973 名公民担任荣誉职务，而只有 2770 人将地方政府工作作为其主要职业。与国家一样，社区也是建立在领袖原则之上的。这个原则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有领导权，它还意味着这个领导者是社区的代表体现。

领导者的地位意味着对社区的责任，以及基于为社区所做的工作在社区的权威。社区的官员不能满足于依法管理社区和提高社区的经济效益。他不能把社区仅仅看作是一个经济单位，而必须始终牢记，社区是由作为他的同胞的男女个人组成的。因此，他必须始终寻求他们的合作，而不是退回到他的办公室，在那里隐居。地方社区法的前提是市长和他的社区之间要有活的联系。在这种关系尚未存在的地方，该法为其引入开辟了道路。这是整个法案的基本要素，而社区的生活则建立在它的基础上。每个社区要做的特殊工作取决于当地条件，例如，超越任何个别社区限制的运河建设由社区协会承担。文化政策为社区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活动领域。鼓励文化活动对社区尤其重要，因为在地方政府中，与国家政策相比，更容易与公民个人建立联系。生活在近处的人们所产生的社区感觉是文化工作的良好基础。在经济领域，社区的活动受到限制，因为它不能与其成员的经济活动竞争。社区只能从事个人主动性未能完成的工作。因此，社区不一定要局限于提供水和电。它也可以致力于其他为社区服务的任务。但是，商业活动不能仅仅为了其本身和可能产生的利润而进行。由于居民超过一万人的城镇数量大大增加，我们发现专业官僚机构与荣誉工人并存。这些城镇的有序管理需要高度的法律知识，而这些知识不能总是被认为是荣誉工人所拥有的。但这些专业官员也受制于市长。他们只是作为地方政府的辅助人员行事。

因此，这种法律管理不是与政治管理对立的，而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社区都会任命一位党代表，这位党代表在行使其影响力时，必须根据党和国家的统一性，确保地方政府的工作与帝国的总政策保持一致。他不得干涉日常行政事务。但是，即使在市长必须与党代表合作的情况下，市长仍然要对党代表向他建议的决定承担个人责任。如果市长采取的措施被党代表否决，而市长仍然认为这种措施是必要的，他必须将此事提交国家行政部门的上级部门进行裁决。就财政而言，地方当局的权力受到限制。在 1933 年之前，异常广泛的债务使得有必要加强国家的监督权力。但 1936 年 12 月 1 日的房地产和商业交易税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区的财政独立性。计划在未来进一步放宽限制。德国的自治概念不认为财政部分是决定性的。重要的是发展社区生活，灌输正确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责任感。地方社区法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条款，以确保社区的经济政策将以有序和理智的方式进行。地方社区法还赋予社区制定自己的法律的权利。社区可以根据该法规定的原则，为自己制定和颁布专门的宪法，只要不影响社区在国家框架内的地位，这种宪法就不需要监督机构的批准。

除了《地方社区法》之外，国家内部生活的另外两个方面也得到了最终的形式：根

据 1935 年 5 月 21 日的法案，服兵役被宣布为德国人民的一项荣誉服务。陆军、海军和空军是唯一有权为国家携带武器的机构，它们构成了一个军人素质的培训学校。此外，根据 1935 年 6 月 26 日的法案，引入了普遍的义务劳动服务。这个机构在民族社会主义思想所塑造的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目的是使每一个德国年轻人对体力劳动有适当的尊重，并对劳动有正确的态度。罪与罚在德国法律的任何领域，改革和修订现有法典的愿望都没有刑法领域那么强烈。

早在 1900 年，德国法学家大会就指出，刑法典的改革是立法者必须完成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从 1909 年到 1927 年，已经发表了不少于五个草案；但这项工作仍然没有完成。这种对改革的持续讨论和对解决方案的寻求导致了令人遗憾的司法地位的削弱，并使打击犯罪的工作更加困难。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首先放在刑法的改革上，因为刑法比法律的任何其他部分都更能体现国家的政治态度。1933 年秋，帝国司法部长代表元首任命了一个起草刑法典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经过三年的工作，完成了一份草案，现在已经提交给帝国政府审议和批准。该草案本身确实尚未公布其所有细节，但所发表的关于它的报告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人们对它发表了详细的意见，因此，现在人们普遍知道它的基本思想。对草案中的计划进行的公开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从而为接受新法律做好了准备。有两项法案已经预示了改革的计划，对这两项法案的审议将使我们能够了解刑法的现状。这两项法案都与迄今为止刑法所依据的原则大相径庭。后者不仅寻求保护社会，而且还寻求保护罪犯免受社会的任意行为的影响。这两部新法律仅仅是为了保护社会免受各种犯罪行为的侵害。

刑法的任务不能是保护违法者，而只是为维护和保障人民做出贡献，并打击那些试图逃避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或侵犯人民利益的非社会因素（希特勒，1937 年 1 月 30 日）。

凌驾于人和物之上的是民族的共同体，任何违背忠诚的行为都是一种法律上的犯罪。因此，根据单纯的法律条文来解释法规的做法必须被废除。1935 年 6 月 28 日的补充法规定，不仅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惩罚，而且在健全的正义感要求对所实施的行为进行惩罚时，以及在刑法典的某段基本思想适用于这种行为时，也可以进行惩罚。迄今为止，刑法迫使法官严格遵守法律条文的规定。他必须这样做，因为除了现有的法规之外，没有任何法律被承认。因此，不以严格解释法律条文为基础的判决必然显得武断。如果像民族社会主义那样，不把法律限制在成文法规中，就必须承认，可能有一些法规中没有规定的情况，实际上与法规中列举的行为一样是犯罪，因此应该受到惩罚。1935 年 6 月 28 日的《补充法》并没有规定判决应以法官的主观感受为依据。它要求后者考虑到人民的正义感，然后根据客观标准——刑法典特定段落的根本原则——决定是否实施了类似于法律规定的应受惩罚的行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可以施加惩罚，而且这种惩罚必须是法律规定的。因此，法官受到法律的约束；因为每项法律都代表着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决定，因此法官只有法律明确允许的自由。法律不认为人民的正义感仅仅是大众所持有的任何特定的法律观点，而认为是普通公民的健全和冷静的判断。因此，法官今后必须以德国人民的法律为基础作出判决。

有了这一补充法律，众所周知的原则，即只有那些在法律中确切描述的罪行才能受到惩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就被放弃了。这一原则被描述为所有欧洲文明国家刑

法的基础之一，因此它也被纳入了《魏玛宪法》。

然而，对比较法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所理解的"法律"只是成文法，而不是司法判决和规定性法律，无论后者如何被普遍认可。在英国，大部分的刑法已经被修订，并由法规来规范。但杀人罪仍受普通法管辖。无论成文法如何严格解释，"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在这里都不能得到维持。除此之外，英国法规通过其语言的多样性和其中包含的解释规则，给予了法官在德国法院中相当少的自由。但是，在英国以外的地方也存在规范性法律，例如在瑞士的三个州。在丹麦，刑法典甚至允许法律适用于类似于其中规定的案件。

在挪威、瑞典和芬兰，这种解释方式确实没有被法律明确允许，但在实践中，类比原则被应用于许多重要案件。然而，必须承认，不受限制地使用类比将为各种解释开辟道路，因此法官们自己最终可能会演化出一部远离人民生活的法律，并与作为所有不成文法来源的大众正义感相对立。为此，德国法律规定，成文法中包含的根本原则与民众的正义感相结合，以便这两个因素可以相互纠正。北美的一些联邦州也在其《刑法典》中规定，法律的适用不能局限于字面解释，而必须考虑到法律的基本思想。纽约州刑法典》第 675 条规定，任何人对他人的人身或财产进行侵害，扰乱和平或公共卫生，或违反礼节，都可能受到惩罚，尽管该行为未被列入应受惩罚行为的书面目录中。所有文明国家的公法管理都要求严格解释法律并禁止类推的说法不能成立。即使在那些可以找到这一规则的国家，法律的起草也可能非常松散，或者对犯罪的定义非常广泛，以至于在实践中，法官可以完全自由地决定法律适用于哪些行为。因此，当瑞士最高法院宣称，一个人只有在触犯了某些法律的情况下才能被起诉时，毫无疑问，其意思是除了法律规定的处罚外，不得施加其他处罚。但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起草法律的人必须详细列出根据该法律可能受到惩罚的所有罪行。相反，他们可以自由地用技术名称来代替各组罪行，或使用一些关于犯罪的一般概念。

因此，在适用成文法时，盗窃罪的概念可以由法官根据自己的法律观点进行解释。1935 年 6 月 28 日的《补充法》中也规定了这种做法。但必须说明的是，偏离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原则，并不意味着放弃法无明文不为罪。只有在法典中已知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这类惩罚。刑法的目的是保护社会免受一切可能的危害，因此，1933 年 11 月 24 日的补充法包含了打击惯性犯罪的规定，以及保护公众的措施。

以前，罪犯在服完刑后必须被释放，即使可以预见他的非社会倾向会导致他滥用自由，犯下更多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多少次，被谋杀的儿童或被侵犯的女孩的母亲问法院，是否真的有必要让罪犯再次获得自由，以攻击不幸的生命并对社会造成严重伤害。但这项法律使法官能够对危险的惯犯判处比正常案件更严厉的惩罚。

危险的惯犯是指多次——一般说来是三次——犯罪的人，而且从案件的一般情况来看，他不仅习惯于犯罪，而且在未来和现在都对社会构成威胁。因此，这些规定仅指严重犯罪，而不是指习惯性乞讨等不端行为。除了加重处罚外，法律还规定了预防性拘留作为保护公众的最后手段。这不被认为是一种刑事措施。罪行本身会受到监禁的惩罚，但如果这不足以在未来保护社会，那么罪犯就会被拘留，以防止他进一步造成伤害。这种拘留一直持续到罪犯不再被认为是对社会的威胁为止，并且定期检查以确保拘留期限不会延长到必要的程度。另一项保护措施是对危险的性犯罪惯犯进行阉割，

这种措施在某些北美国家和丹麦也存在。这的确是对罪犯身体完整性的永久性严重干扰，但它使罪犯有可能避免完全丧失自由或长期被关押。

通过这种操作，性犯罪的冲动至少被削弱了，以至于它不再是一个危险的来源。该法还规定，如果教育方法有可能成功地打击犯罪倾向，就可以将罪犯转移到醉酒者之家或劳动场所。同样，法律规定，在法院因精神错乱而必须宣告被告无罪的情况下，它可以命令将被告关押在庇护所或收容所。这些处理罪犯的措施的成功由以下数字表明：1935 年与 1932 年相比，犯罪率下降如下：杀人罪 33.9%，暴力抢劫罪 64.2%，纵火罪 22.8%。（盗窃罪数字的减少不能作为比较的基础，因为它们受到了一些特赦法的影响）。

那些在打击犯罪方面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可以见证这些措施对惯犯的威慑作用。1935 年 6 月 25 日的补充法律还包含了一项条款，该条款基于民族社会主义的理念，规定每个公民个人都有义务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援助。任何在一般紧急情况或事故中不提供帮助的人，尽管他有能力这样做而不危及自己的人身安全，都要受到惩罚。尽管这两部补充法律也许已经预见到了新《刑法典》中最重要的措施，但后者仍将包含许多创新，因此我们必须在此对其进行简短的说明。

新法典首先是在建立纯粹的犯罪原则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不仅考虑到了罪犯和他的罪行之间的心理联系，而且还考虑到了道德方面的因素。未来的刑法将认为，要确定有罪，不仅需要证明罪犯知道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并故意同意这些结果，或者证明犯罪是由于缺乏合理的注意而导致的。还需要证明罪犯知道或可能知道他在做错事。一个人可能实施了一项刚刚被新颁布的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或者情况可能非常复杂，这可能是他不知道自己做错的原因。人们总是认为，仅仅因为一个人在犯罪时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而对其进行惩罚是不公平的。因此，一个德国国籍的老妇人从瑞士搬到德国定居，对外汇条例一无所知，却因为没有登记一个小的外国账户而受到谴责，尽管她对法律条例的无知是毫无疑问的。由于未来的法学将不仅把犯罪视为违反法律明文规定的罪行，而且视为对社会的攻击，视为针对国家生活的行为，因此有必要考虑到罪犯本人是否认识到或可能认识到其罪行的这一方面。法官确实必须非常仔细地调查罪犯声称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的说法，如果这种说法涉及到不符合国家关于对或错的基本观点的行为，肯定不会被允许。

声称罪犯不知道偷窃和谋杀是被禁止的显然不会被接受，但在上述老太太的案件中，被告将被宣告无罪，这才符合合理的正义观念。要求对罪犯的惩罚不仅要求后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要求他知道自己在做错事，这与所有欧洲国家的刑法中所包含的有罪学说有很大出入。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刑法中，司法和道德不再是根本性的分离。如果我们认识到，个人不再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因此不能再有独特的、也许是不同的道德准则，而是作为社会的成员，成为社会道德观点的代表，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刑事罪责概念的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犯罪未遂也将被区别对待。

根据迄今为止的法律，只有在严重犯罪的情况下才会受到惩罚，而且惩罚的程度要比实际犯罪的程度要轻。未遂与实际犯罪的区别在于，犯罪的目的没有完全达到。由于未来的刑法集中于犯罪的意图，它必须惩罚任何犯罪的企图，并且只有当犯罪的未完成可以被证明是由于罪犯的低强度意志造成的，才允许减轻惩罚。

草案的第二部分描述了单独的刑事犯罪，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扩展。根据犯罪行为的对象的重要性进行了分组。首先是保护人民免受叛国罪的侵害，然后是

保护国家资源、国家的生命（种族和遗传、防御力、劳动能力、国民健康）、

人民的道德和精神理想（婚姻和家庭、伦理和宗教信仰、对死者的尊重、对动物的保护）、

商业和国家财产，以及进一步维护国家机构和秩序（人民的领导、公共秩序、司法）和维护诚信（违反诚信、财产和犯罪的自我利益的罪行）。

在制定这一新的刑法时，有可能借鉴博学的法学家几十年来的工作成果。但为了保证刑法的统一性，以前的补充法律的基本规定也被纳入其中。新刑法典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有关刑罚的规则以及对每项具体法律的刑罚评估。在惩罚方法上没有重要的变化。未来的刑法还将包含死刑、劳役和监禁。此外，它还规定了罚金，但这取决于个人的经济状况，犯罪者的日常收入被作为计算的基础。刑事逮捕被放弃了。在堡垒中的监禁作为"诚实的监护"被保留。在制定单独的刑罚时，对于极端严重的刑罚，如死刑，已注意提供劳役的选择，以便法官本人在罪责程度可能不等于犯罪的客观恶性的情况下，有可能减免死刑。最重要的是，每个案件的处罚必须取决于犯罪者的实际罪行。在实施惩罚时，法官必须考虑到犯罪意图，在过失案件中，考虑到罪犯的粗心程度和对其犯罪结果的漠不关心，还要考虑到保护社会的必要性，以及罪犯造成的危险和伤害，以及他在犯罪后的行为。

因此，法律的目的是根据每项犯罪的整体情况施加惩罚，因为只有这样，刑法才能成为保护社会的有效武器。本法无意引入鞭刑，因为在其他国家，这种惩罚的效果并不值得推荐使用。刑法的重塑也将导致刑事案件审判的新规则。刑法中对社区的高度重视将意味着非专业人员广泛参与司法工作。旨在澄清犯罪事实的初步程序将由检察官负责。在重要问题上，他必须与法官合作。在主要审判中，法官以人民的名义独立执行司法，在进行审判和处理案件方面，完全不受检察官的影响。为特别重要和微妙的个别犯罪类别（如政治犯罪）设立的特别法庭，将作为常设机构予以保留，因为它们的效用已被证明。在处理这些犯罪时，需要有特殊程度和特殊类型的专业知识，因此只能委托在这一特殊领域受过训练的法官来处理。但是，关于审判规则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所以还不可能就这个问题发表任何最终意见。

劳工自 1933 年以来，涉及劳工的法律在各个方面都有了积极的发展。劳动组织也通过《劳动组织法》（1934 年 1 月 20 日）进行了改革。与该措施相关的是经修订的《劳资法庭法》，以及关于引入工作手册的法案（1936 年 2 月 26 日），该法案为当局提供了有计划分配劳动力所需的数据。还制定了有关劳动合同的规则。《保护家务劳动工资法》（1933 年 6 月 8 日）和《家务劳动法》（1934 年 3 月 23 日）的主要部分是保护工人不被降低工资，但也可以禁止可能危及生命、健康和道德的家务劳动，此外还有《工作时间法》（1934 年 7 月 26 日）、《关于面包店和糖果店工作时间的法律》（1936 年 6 月 29 日）。一天八小时被规定为一般规则。在危及健康的情况下，必须减少工作时间。在劳动保护领域，我们有关于使用压缩空气工作的条例（1935 年 5 月 29 日），关于建筑业工人住宿的法案（1934 年 12 月 13 日），该法案为煤矿、滚筒和锤子工厂以及玻璃行业的工人（男性和女性）提供了健康和适当的住宿（1933 年 3 月 12 日）。除了对疾病、

伤残和事故保险进行重组外，还对整个社会保险进行了改革，以确保其有效和经济的工作。所有这些法案都可以很容易地纳入这个法律部门的现有框架中，但仅仅说出它们的名称并不能说明对有关劳动法的一切的全新态度。以前的劳动法以工人协会为中心，承认这些处理阶级冲突的组织是法定的公司，从而使它们在国家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这种协会现在与《劳动组织法》所体现的思想完全不同了。劳动组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试图在民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劳工组织之间做出妥协。劳动组织法》取代了劳动和资本、雇主和雇员的对立，建立了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劳动共同体。"为民族共同体的最高利益服务，他们不是雇主和雇员，而是人民的劳工代表"。**（希特勒在汽车展览会上，1935 年）。

每种形式的工作都是对社会的责任的履行。对每个德国人来说，工作意味着实现人生的目的。因此，手工劳动处于低级阶段的无稽之谈终于被驳倒了。镗床前的熟练工人所完成的任务比工厂办公室里的文员要重要得多，尽管后者可能自称是"脑力劳动者"。在民族团体框架内完成的任何工作的价值，取决于它对国家生活的必要性。社会荣誉的意义在于履行这一职责，在于对劳动者的尊重。

荣誉是我们国家生活的基础，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就其本质而言，它必须是全方位的。它必须渗透到国家生活的每个领域，并成为其基本原则。社区和荣誉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是工程共同体的基础。劳动不被视为仅仅是完成某些任务的身体能力。劳动是一种对社会有价值的活动。劳动作为一个整体是国家劳动，每个工人个人只是工作的民族团体的成员，帮助完成整个人民必须完成的任务。民族生活的规律也需要劳动作为一种选择和刺激精神和道德力量的手段。因此，劳动是一个形成社区的因素。因此，我们不能把劳动和进行劳动的环境和条件，如工人的安全、解雇和休假的条件、工作时间和工资等问题，仅仅看作是社区必须忍受的私人协议的主题，不管它们多么有害。相反，它们必须由管理全体人民生活的法律来管理，因为它们涉及整个社会。

因此，每个工厂或企业的工作都是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其成功或失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命运。雇主作为其企业的领导者，其地位从属于这一任务。他与他所雇用的工人合作的工作，不是基于相互提供的服务，而是基于为国家所做的共同工作。因此，雇主的领导地位并不意味着他是自己家的主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相反，这意味着他要对他的公司为社会所做的事情负责。雇主与他的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他们都在参与国家的劳动。这种合作的本质在于社会荣誉，这意味着履行职责，尊重每一种工作。违反这一荣誉原则就是侵犯了《劳动组织法》所体现的事物秩序。赋予劳动共同体的形式要求它必须是自治的。这种自治的机构是互信委员会，它由公司的领导和工人选举的成员组成。它的任务首先是协助制定工作条例，确保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事故，并加强相互信任。劳动法的执行由每个地区指定的劳动托管人负责。但是，他们的任务不是使用官方的强制手段来促成工作社区的形成。一个社区不能通过强制手段建立。劳工托管人必须利用他的个人影响力，通过一般和特殊性质的教育和建议，确保国家的强迫行为在总体上是不必要的。

迄今为止，劳工托管人的活动表明，尽管他们在必要时使用了该法赋予他们的权力，

但他们避免了任何可能导致其努力失败的严重干预。劳工托管人的工作得到了德国劳工阵线的支持，该阵线是所有工作的德国人的共同体。它是一个社会自治的社团。因此，它接管了工人以前的社会机构，并通过一个强大的组织扩大和完善了它们。它通过改善其成员的生活条件进一步帮助他们，并在他们遇到意外的不幸时给予帮助。由于该组织包括雇主和工人，它可以对各个公司的工作条件以及按照劳工信托基金规定的原则组建工作团体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如果有人故意和恶意反对劳工托管人的命令，后者可以向社会荣誉法院提出上诉。

劳动组织法第 36 段详尽列举了可作为危害社会荣誉罪而受到惩罚的行为。通过建立这些法院，国家已经开始了全新的工作。他们被赋予了通过自己的决定来制定国家劳动法的任务。该法列举的不端行为有：恶意剥削劳工、侵犯个人荣誉、恶意危害工业和平、违反劳工托管人发布的一般法令、以及劳工委员会成员背叛商业机密。但它被认为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来自于非社会性的心态。这些惩罚条例的范围和效果最好通过几个实际例子来说明。尊敬的法院对以下恶意剥削劳工的行为作出了判决：违反工资协议，不支付足够的工钱，扣留工资，不支付加班费，过度工作，恶劣的食宿条件，拒绝休假，以及违反避免事故的重要规定。

还有一个案例是，雇主不允许工人安安静静地工作，而是不断地打扰他们，用辱骂的语言催促他们工作。一位雇主因侵犯名誉权而受到谴责，因为他拒绝按照医生的指示将一名工人的患病子女送往邻镇的医院；他说他希望放过自己的马。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侮辱名誉，而是对劳动界每个成员应有的名誉的冒犯。**

在扰乱工业和平方面，处理了以下罪行：**挑起劳资纠纷；通过歪曲事实对雇主进行示威；破坏工人之间合作的信心，从而扰乱公司的正常工作。**1934 年有 64 起诉讼，1935 年有 204 起，其中 164 起在年底前结束。

社会荣誉法庭可能施加的惩罚是罚款、训斥和警告。但他们也可以命令将工人从他的工作场所赶走，或剥夺雇主的公司领导人的头衔。在评估惩罚的严重性时，不仅要考虑孤立的行为，还要考虑犯罪者的非社会态度。在处理的 164 起案件中，8 起案件以无罪释放告终，25 起案件被处以 100 马克以下的罚款，45 起案件被处以 100 至 499 马克的罚款，4 起案件被处以 500 至 999 马克的罚款，4 起案件被处以 1000 马克以上罚款。此外，还发出了 21 次申斥和 19 次警告。有一项判决是将其调离工作场所，在 9 个案件中，雇主被剥夺了作为公司领导人的职能。如果违法行为不仅有损社会荣誉，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劳工托管人可以向普通法院提出上诉，法院可以判处罚款或监禁。在与劳动法所形成的国家工作组织的密切结合中，我们发现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农民和土地在任何法律领域，都没有像农业方面的法律那样进行过如此根本的变革。以前，民法典的一部分专门用于国家生活的这个特殊部门。这里发生的变化甚至比劳动法带来的变化更加全面和深远。它们的目的是重组和保护作为国家力量主要来源之一的农业阶层，为此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帝国农业庄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农业债务已经普遍减少，农场受到保护，不被扣押；此外，还建立了一个营销系统，**确保农业产品以合理的价格进入市场**，同时保证德国人民能够靠自己的土地上的产品生活。组织和经济条例非常广泛。

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接管了以前由私人机构行使的确定价格的职能。但这一物质方面也从属于维护和发展繁荣的农民的国家目标。这个目标对国家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农民与他所耕种的土地联系在一起，是国家力量永不衰竭的源泉。农场继承法是整个关于农业阶层的法律的基石。它是德国法规中这一部分所有法律措施的基础。它的出发点是，农民的家庭通过他们的工作与土壤联系在一起。该法将农场作为民族有机体中的一个活细胞。农场继承法不是只为土壤立法，而是为所有以土壤为生和在土壤上生长的东西立法。它把田地、农庄和牲畜作为一个自然单元，在这个单元的中心站着农民本人。这种结合被认为是一种永久性的。

因此，农场应作为遗产留在德国自由农民的后代或亲属的手中。由于这个原因，该法规定不可能改变遗嘱中的正常继承权。一般来说，长子继承农场。只有在没有具备接管农场的必要条件的男性后裔时，女性后裔才会继承。农场的经济地位通过禁止抵押和出售得到保障。农场只有在能够养活一个家庭的情况下才能被视为世袭农场，而且面积不能超过 300 英亩。通过这种方式，该措施为未来提供了保证，即尽可能多的中小型农场应遍布全国。被称为"农场继承法庭"的独立法庭确保这些措施得到执行。德国的农业通过土地定居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组。有计划的土地定居首先有助于提高德国人口较稀少地区的人口密度。

它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依恋，并通过从不肥沃的地区开垦土地，或通过分割未集中耕种的负债庄园并在其上建立新的农场和村庄，确保这种土壤能产出足够的食物。每个农场必须有足够的土地，以便为一个有几个孩子的家庭提供生计。农场的规模要有多样性，要严格避免统一性。最稳定的单位是可以由农民和他的家人经营的农场，因此这种农场受到特别的青睐。但也为农场工人提供了条件，因为大型农场需要他们。根据当地条件，还必须提供工匠和共同使用的机构（例如，合作奶油厂）。但是，为了使农业地产建立在良好的经济基础上，有必要对债务进行管理。1933 年 6 月 1 日的法案使得有可能将债务减少到符合安全的水平，并确保在不危及农民生计的情况下从收益中偿还债务。

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有一个减少债务的程序，债权人自愿给予减免，使之有可能制定一个偿还欠款的计划。另一方面，如果有必要减少债务，而债权人又不愿意给予减免，则有一个强制调整的程序。债务条例的目的是使农场、树林和市场花园的所有者获得自由，他们需要减免债务，以至于在支付家庭生活费之后，他们可以根据调整计划用土地的收益来偿还他们的债务。废除债务的计划由保护农业不被扣押来补充，以防止财产被没收和拍卖农场经营所需的东西。帝国农业地产的组织是建立在职团自治的理念之上的。

基本法案于 1933 年 9 月 13 日颁布，大量的补充法令保证了它的正确实施。其目的是将所有因从事农民职业活动、农业协会成员、农产品批发或零售商、可用于农业的土地所有者或从事农产品开发的德国公民聚集在一起，被视为属于一个单位。帝国农业局的任务是培养其成员对人民的充分责任感，并成为国家能够发展和维持自身的坚实基础。它负责监督职业荣誉，这也是社区的基本要素。它还必须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关心其成员。自 1933 年 12 月 8 日的法令以来，帝国农业地产由帝国农场领导人领导，他有一个行政人员可以支配。在所有重要问题上，他都由帝国农场委员会提供建

议。帝国农业区被划分为区域协会、地区协会，因此，尽管有中央组织，但也注意到了地方条件。自我管理是通过这些机构进行的，这些机构的每个成员都以荣誉身份服务。作为这个专业组织的一部分，帝国农业地产被委托执行营销计划，其目的是保证重要商品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保护农民，使他们不至于对是否能够出售其产品感到不确定。营销计划提供了一个永久的市场，同时确保农场得到适当和经济的经营。它根据农产品的性质和程度对农产品的利用进行管理。这些措施并不像计划经济中的命令和禁令那样精确地告诉个人他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这种方法是让每个人知道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并教育后起之秀了解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因此，**决不排除私人的主动性。**

政府

“一个人如果在这样的时刻认为自己有责任承担起人民的领导责任，那么他不需要对议会惯例或特定的民主观念负责，而只需要对他肩负的使命负责。任何干扰这一使命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阿道夫·希特勒

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必须公开宣称自己是民主的敌人（“1918 年 11 月的德国民主标志着世界有史以来最肮脏的敲诈勒索思想的胜利。”——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并且应该试图树立民族社会主义最直接的反民主（因此必然是反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名声。虽然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 1923 年啤酒馆政变失败后确实转而参与选举政治，直至 1933 年成为民选政府，但希特勒在这次胜利之后立即根据元首原则禁止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所有其他政党。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次性参与选举政治不能被视为民族社会主义对民主的任何形式的认可。约瑟夫·戈培尔总结了他们的态度：“我们进入议会是为了在民主的军火库中获得自己的武器。如果民主愚蠢到给我们免费门票和薪水来做这头恶熊的工作，那是民主的私事。我们不是作为朋友而来，甚至不是作为中立者而来。我们是作为敌人而来。”

历史上，各阵营的政治激进分子都认为民主是最糟糕的长期政府形式之一。在这一点上，我们并不区分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用希特勒的话来说：“任何正确评估群众政治智慧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种智慧还不够发达，不足以使他们自己形成一般的政治判断，也不足以选出有能力在实践中实现他们想法的人。”这种对民主的激进批评，无论是民族社会主义还是其他，都不应与对民主制度的肤浅怀疑相混淆，这种怀疑基于（实际上是民主的）担忧，例如选举舞弊、民选政府往往获得较低的民众支持率、民选政府往往无法兑现竞选承诺，甚至民选政府极易被颠覆（例如被犹太复国主义特工颠覆）。作为激进分子，我们不相信选举能够代表选民的意愿，而是不相信选民本身的意愿。

这就是民主人士的想法。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点，民主实际上是对国家分裂的公开邀请，因为它促使社会各阶层投票反对彼此，试图各自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从而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同胞，所有人都陷入了困境，必须共同努力才能摆脱困境。民主是身份政治和相互指责所有问题的温床，因此在各方面都与国家团结和民粹精神背道而驰。

其次，更重要的是，民主的定义就是多数人的意见，而多数人的意见从来都不是消息灵通或最聪明的意见，更不用说最善良或最高尚的意见了。民主是数量优先于质量、生产力优先于理想主义，而且——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几乎总是非雅利安价值观优先于雅利安价值观。（无论人口的平均质量如何，情况都是如此：无论人口整体质量如何，最好的意见总是来自其中最优秀的部分，而这部分永远是少数。平均质量的唯一区别是，更高质量的人口更有可能接受这一事实，从而更有可能拒绝民主。）

“国家必须做出决定。他们要么想要多数，要么想要智慧。这两者永远无法兼容。”——阿道夫·希特勒

我们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我们会说，群众不只是无知，而且野蛮。）**

此外，民主国家的罪行很少受到惩罚，因为很难惩罚整个选民集团，因此民主国家对邪恶的实际抑制作用远小于任何可以确定独裁者责任的独裁政权。希特勒描述道：“民主的这一新发明与最近蔓延到有害程度的一种特殊现象密切相关，即我们大部分所谓的政治领导人的懦弱。每当需要做出重要决定时，他们总是很幸运，能够躲在他们所谓的多数人背后。观察这些政治操纵者之一，就会注意到他如何哄骗多数人，以便获得他们对他所采取的任何行动的认可。他必须有同谋，以便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将责任推卸给其他人。”当多数意见（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社会说服力的力量）被进一步赋予政治权威时，它就获得了一种道德正直的假象，这意味着民主国家很少会承认他们犯下的罪行的集体罪责。（选民最多会责怪他们自己选出的代表，同时对他们明智地选出他的继任者的集体能力保持不可动摇的信心。）

因此，我们必须避免以下形式的反民主论点：“如果民主发挥作用，那将是件好事，但不幸的是，它无法发挥作用。”不，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会产生比一个功能失调的民主更糟糕的政府！民主就是多数人的暴政，简单明了——不仅是运作上的厌恶，而且是道德上的厌恶。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那些因为这个原因而拒绝民主的人往往很快就开始宣扬贵族制的好处，即由少数优越者统治多数劣势者。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我们首先承认贵族制优于民主制。这种形式的政府与我们的信念相呼应，即更好的治理是通过寻找更优秀的人来担任公职，而不是通过加强制度来抵制低素质人员的滥用，无论是通过宪政、任期制还是其他所谓的“制衡”。

“道德人格的良知比议会监督或三权分立更能防止滥用职权。”——鲁道夫·赫斯

值得强调的是，民族社会主义者偏爱贵族制而非民主制，并非源自右翼家长制，即新反动派的“群众不知道什么对自己好”。我们的批评，也是左翼的批评，是群众只考虑对自己好，从而削弱了民主政治中对道德的一切尊重。只有少数人——少数雅利安人——才会在个人生活中做出道德决定，因此，只有将这些人置于贵族制中，道德才有可能在政治中得到考虑。在即将到来的资源短缺时代，外交关系尤其如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能够抵制这种日益强烈的诱惑的领导人，即每个国家都为了自己利益而无情地对待他人。然而，这样的领导人是最难赢得选举的人，因为群众更有可能选出那些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为自己谋利的领导人。

“面对这样的现象，一个真正具有领导才能的人会倾向于不参与政治生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情况并不需要具有建设性政治才能的人，而需要一个能够讨价还价争取大多数人支持的人。因此，这种情况会吸引心胸狭隘的人，并因此而吸引他们。”——阿道夫·希特勒

但归根结底，我们拒绝永久贵族制的理由与贵族拒绝民主的理由是一样的。如果民主国家迟早会招致恶意颠覆，贵族国家迟早不会也招致大规模叛乱吗？如果多数人连相对无关紧要的短期政策现象都无法决定，那么多数人是否可能有资格通过他们的繁衍来决定长期遗传的命运现象？如果一个国家只由上级统治是合理的，那么一个国家只由上级居住不是更合理吗？我们怀疑贵族和种姓制度的支持者是喜欢与下级共存的人，因此他们自己的优越性在比较中显得更加明显，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卑鄙的态度。我们接受贵族制只是作为一种中期计划，然后只是作为一种消除其自身存在必要性的手段。真正的贵族必然意味着寻求逐步消除卑鄙。

“贵族不再是构成水平社会阶层的种姓的特征，而是垂直贯穿民间所有阶层。”——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

关于领导的作用，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前提（源于隐性民主思想），即领导者的主要技能应该是能够解决群众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我们不仅认为大多数人没有资格选择优秀的领导者，而且我们更强烈地认为大多数人没有资格确定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大多数人倾向于放大影响自己群体（无论是性别、种族、阶级、宗教还是其他类别）的问题，而忽视影响其他群体的问题。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公平。自私的多数人试图把自己的要求强加给一个尽力公平对待所有人的领导者，这应该被称为叛变。（民族社会主义中的叛国与叛变同义；领导人可以以某种方式“叛国”民众的观念（主要由当今的身份主义极右翼传播）是一种完全民主的观念，在民族社会主义中毫无意义。）

专家是需要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也是领导者应该能够委派问题的人。领导者的主要技能应该是能够发现问题，尤其是大多数人要么太不敏感而无法识别，要么太盲目而无法容忍的问题，从而能够让专家们有目的地工作。领导者不是管家。他的任务不是管理人民，而是真正地领导他们。为了领导人民，必须有一个目标来引导他们。因此，一个国家只有管家，没有领导者。只有人民才能有领导者。

“作为雅利安人，我们只能将国家视为人民的活体，它不仅维持人民的生存，而且其功能是引导人民走向最高自由。” – 阿道夫·希特勒

换句话说，真正的领导必须以目标为先。因此，民族社会主义政府是有目标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只会得到那些真诚地与我们分享目标的被统治者的支持。因此，民族社会主义政府是民间政府。最重要的是，对我们来说唯一有价值的目标是自由。因此，民族社会主义政府是高尚的政府。有些人可能会把它比作神权政治，但它并不依赖于任何形而上学的信仰（也不专属于任何特定的宗教体系）。相反，它只是通过高尚来实现团结。

“我们的目标是——最优秀的人宁愿成为我们国家中最差的人，也不愿成为其他国家中最优秀的人。这样的愿望只能是绝对统一的民族意志的结果。”——约瑟夫·戈培尔

这种政府的实际结构将是一种绝对独裁的形式，最好被描述为对一个没有平民的国家进行军事统治——所有公民都被视为军队，因此有责任在集中裁决的战略讨论中表达他们的想法。一位领导人将评估所有提出的想法——受欢迎的或不受欢迎的——并做出决定，其结果——与任务相关的成功或失败——将反映出他的领导能力，其透明度是无法掩饰的。事实上，这只是无数非政治职业中已经使用的系统。在医疗手术台上，一名外科医生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做出所有决定。在电影片场，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明白，他们在那里是为了体现导演的愿景。在运输船上，每个人都听从船长的命令。用希特勒的话来说："一个有能力的人总是拥有他需要的权威。一个没有才能的人总是缺乏权威，无论他的工作是什么。"而如果这些职业每次行动前都需要投票，那么病人就会流血而死，电影制作也会因艺术分歧而无法启动，船也早就撞沉了。

"今天，我们的国家很幸运，主要由前线士兵领导，这些前线士兵将前线的美德带到了国家的领导层。"——鲁道夫·赫斯

这与贵族制不同，贵族制不鼓励非贵族参与政治讨论，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则鼓励所有公民积极参与讨论，并给予他们表达意见的机会。希特勒明确强调："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我们的精英成为一个排他性的社会。"但它与民主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讨论，但任何人的想法是否受欢迎都毫无意义。民族社会主义深深植根于提升个人个性（并提供机会），无论其背景如何，绝不能误解为反对言论自由；民族社会主义反对的是多数人的命令，这不利于个人个性。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有某种道德义务遵循民意（否则就会被打上不配担任权力职位的标签）这一观念是一种隐含的民主观念。在民族社会主义中，领导者有责任不利用他的权力地位来损害他人的利益来使自己或他的亲属/氏族受益，但除此之外，领导者应该做他认为最好的事情，无论这在人民中有多么不受欢迎。

依靠多数人支持的民主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愿意压迫少数人以谋取多数人的利益；而民族社会主义政府则不会迎合社会的任何特定阶层，而是会从原则上致力于公平对待所有人。正如希特勒所言："我们的胜利是数学上的必然结果，因为与社会民主党不同，我们不会拒绝任何来自国家社会的人。"任何政府——无论其形式如何——如果为了另一阶层的利益而压迫社会的任何阶层，就不配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政府，我们将拒绝承认任何这样的政府是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府。

归根结底，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中，士兵不忠于军官，军官不忠于指挥官；所有人都只忠于使命，并被提醒，只有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国家乃至民族本身才有存在的理由。

职团国家 亚历山大-拉文-托马斯

当前经济体系的崩溃给现代世界带来了巨大问题。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样一个体系，它让我们大多数人陷入贫困，而人类却前所未有地富裕；它剥夺了数百万人的谋生权利，并使国际间争夺萎缩的世界市场的战争危险日益逼近。这种普遍崩溃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在充分理解问题根源之前，我们必须考虑有组织社会的三重性质，具体如下：

- 中央政府，负责规划和管理国民生活。

- 多个社会团体，拥有不同的目标和利益。
- 大量个人，拥有主动性和进取心。

十九世纪的经典经济理论几乎完全关注社会中组织最不完善的第三方面，反对国家或团体干预经济事务。在早期资源稀缺的时代，这种观点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当时个人的主动性和进取心对于开发潜在的生产力、推动技术发明至关重要。显然，如果给予个人最大的经济自由，他就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主动性和进取心，这正是曼彻斯特学派经济学家倡导“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时所要求的。

然而，无论经济自由在解决稀缺问题方面有何优势，在即将来临的丰裕时代，它已成为对社会福利的积极威胁。我们无需谴责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身，但必须认识到，经济学不可能有独立于社会组织的绝对“定律”。毫无疑问，在物资匮乏的时代，个人主义制度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也要感谢曼彻斯特学派解决了生产问题，但现在到了建立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新经济体系的时候了。完全自由开发所鼓励的个人创业终结了稀缺，但却完全无法将创造的财富分配给全体人民。生产本质上是个体或最多是团体行为；而分配则基于整个社区的需求，显然，如果没有大量有意识的社会规划，分配是不可能成功的。

社会主义与阶级战争

由于个人主义已经过了它的有用期，并且成为经济进步的实际威胁，现在应该将经济利益的焦点转向社会群体，甚至转向整个国家。迄今为止，那些最强烈地攻击现行制度并采用“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等集体术语的人，从未真正超越群体考虑。尽管他们夸夸其谈地宣称要“国有化”生产资料，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吸引人的根本原因在于夸大阶级差异和坚持“阶级战争”。显然，这种阶级意识学说属于社会群体范畴，无法上升到对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的欣赏。事实上，社会主义者强调国际主义，否认爱国主义，这表明他无法理解社会组织的全部含义，而社会组织应该远远超越阶级考虑，实现国家目标。当苏联政权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就达到了最终的“归谬法”，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群体永久且自觉地凌驾于国家生活之上。

实际上，在物质丰富的时代，阶级斗争变得荒谬至极，因为当人人都衣食无忧时，阶级斗争还有什么意义？**阶级斗争只不过是物质匮乏时代的可怕遗毒，由于我们当前经济体系效率低下，这种遗毒才得以延续到今天。**只要解决了分配问题，阶级斗争就结束了。无论如何，社会分为敌对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卡尔·马克思的人为发明，因为随着现代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拥有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分化变得越来越困难。卡尔·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大型股份公司会将所有权分散给大量通常以工业为生的人；他也没有预料到现代工业的发展将催生大量组织者和工程师、专家和技术人员，他们将成为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中介。

即使我们接受社会分为雇主和工人，也不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必然对立。雇主和工人确实认为自己是对立的，双方利益冲突，但这是由于双方无法从集体组织中获益。就每个企业而言，雇主和工人的利益显然是相互对立的，如果工人要求过高的工资，雇主就没有利润可言，而如果雇主能够压低工资，他就能获得更高的利润。然而，这并

不意味着雇主和工人整体上可以牺牲他人利益来满足自己阶层的利益。实际上，在当今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工人和雇主的利益是相辅相成的。显然，现代工业需要的是不断扩张的大市场。近年来，试图在虚幻的国际贸易中找到这些市场已经以惨败告终，因此，现在实业家们越来越转向国内市场。然而，国内市场的购买力显然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水平，因此，实际上，雇主们希望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以便他们能够购买现代工业的产品。当然，社会主义工人不会将他们对阶级战争的信念扩展到拒绝更高工资的地步，因为这样对雇主有利！

职团概念

我们看到，当前的经济体系已经失败，因为它过于强调个人利益，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同样存在缺陷，因为它以牺牲整个社会为代价来提升社会群体的地位。法西斯主义转向了第三种选择，坚持将社会视为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职团国家，由中央政府控制和规划，该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力来控制个人和团体，以保护整体的整体福利，并推进国家目标。这是将国家视为一个更高层次的有机体的职团概念，但本质上与人体相似，其器官和功能服务于集体目标。这是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组织的基本原则，它根据著名的《劳动宪章》的规定，按照共同利益的原则来调节意大利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基于全新经济目的概念的制度，需要一种同样全新的经济科学来适应社会需求。我相信，这种新的经济科学将在这个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商业中心的国度里得到发展。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意大利和德国是第一批采用法西斯政治宪法的国家，它们在发展经济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尽管它们应对世界萧条危机的能力远远强于民主国家。我们必须记住，尽管民主和自由主义原则首先出现在法国和欧洲大陆，但正是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个人主义者发展出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内涵。由于是英国将这种危险且近乎灾难性的经济理论带到了全世界，因此英国显然有责任将法西斯主义的新原则应用于经济领域，并建立未来的商业结构，以取代自由自由贸易的残存部分。

职团原则

虽然奠定这种科学的基础不是当前讨论的内容，但企业经济学的某些原则与当前的个人主义截然不同，显而易见。我们应当摒弃旧派经济学中以个人利益为根本的“经济人”，转而推崇“经济共同体”，让个人为祖国服务。我们将不再有为了保护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阶层，而是有为了向整个社会提供职能服务而联合起来的职业团体。我们将不再有个人为了谋生而相互竞争、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而是有为了共同利益而相互合作。

如何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首先，毫无疑问，要通过行使权力。必须将纪律和控制引入当前经济事务的混乱局面。当前制度的恐怖之处在于，它助长了阶级斗争的火焰，为社会主义鼓动者攻击“资本主义”提供了理由。这种恐怖很大程度上源于有权有势的个人过度行使经济权力，他们积累了足够的财产或资本，对商业事务施加了可观的影响，从而通过不公平的手段谋取私利。在法西斯主义下，任何个人都不允许利用其财产来谋取私利。“权力”是政府的垄断。

对于要求废除私有资本和将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在这里给出了完整的答案。诚然，私人资本家过去曾滥用其对资本的控制来谋取私利，但这并不能成为

废除私有财产的理由，而只能证明有必要控制其使用，以防止反社会行为。事实上，社会主义者不过是一个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他嫉妒资本家的财富和权力。他默认了资产阶级的原则，即所有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自己的财产，因此，除了大规模没收之外，他找不到任何其他办法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剥削，而大规模没收只会让好的资本家不堪重负。法西斯主义承认资本和金钱赋予了个人权力，而他们过去滥用这种权力，因此要求选民拥有足够的权力和行动手段来对抗国内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如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所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利用国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在法西斯主义制度下，国家利用资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政府无论多么强大、高效，试图对全国的经济事务进行详细规划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将否定所有团体组织，而团体组织是健全的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会延续和加剧官僚主义对国家的威胁，而官僚主义正在迅速使国家社会化。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在竞相增加白厅的权力和影响力，而白厅正在迅速成为首席大法官休厄特爵士所预言的"新专制主义"。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大量官僚控制权将再次沿着新的职能组织路线下放给控制着该国主要行业和行业集团的职团。农业、渔业、运输、采矿和医药职团将在白厅取代各部委，其员工都是经过行业和专业磨练的，比任何政府常任官员都更适合控制这些行业。这些新的工业自治机构将取代地方自治机构，后者在现代通信和公共事业更广泛规划面前迅速过时。通过这种方式，团体组织将从过去更僵化的结构基础转变为未来更灵活的功能基础。

职团将获得很大程度的自治权，以解决与其所控制行业相关的所有内部事务，雇主、工人和消费者都将派代表参加职团理事会。雇主将通过雇主联合会派代表参加，工人则通过工会派代表参加，而政府将委派消费者代表监督公众利益以及对产品特别感兴趣的其他职团的利益。职团必须为雇主和工人制定行业工资标准和工作条件，以及雇主和消费者之间的价格和竞争条款。所有协议对整个行业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雇主或工人违反职团现行细则的行为均构成犯罪，可被起诉至法庭。实际上，雇主联合会和工会都应要求其成员遵守纪律，而成员将占相关行业的 100%。有了这种适当的仲裁手段，罢工和停工当然会被禁止，但雇主、工人或消费者可以向职团部长提出上诉，部长将与所有工业职团的代表一起开会，根据一般工业惯例和国家福利做出公正的决定。可以看出，通过将权力和自治权下放给职团，中央立法机构将摆脱目前阻碍议会工作的繁琐立法。

使用职团组织

到目前为止，新经济学可能看起来是一个有趣的新概念，但能否弥补其相当大的复杂性，其实际价值值得怀疑。然而，这种制度的设计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活动，而是在现行制度特别薄弱的地方具有巨大的优势。例如，让我们来谈谈最严重的问题，即富裕中的贫困，保守党人过去称之为"过度生产"，但更好的描述可能是"消费不足"。显然，只有当人们能够消费现代科学和技术带来的巨大成果时，才能提高生活水平，从而纠正当前体制中的这一缺陷。遗憾的是，在富裕时期，个人主义体制会通过工资或利润的形式压制购买力，因为要在已经库存过剩的市场上销售商品，竞争非常激烈，迫使制造商降价以抢占市场。然而，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价格和竞争条件将受到控制，任何制造商都不得违反职团规定，让工人加班加点，以超越竞争对手。通过这种

方式，不仅能够抑制购买力的下降，而且整个工资体系也可以通过整个工业领域的协调行动得到永久提升。显然，这种做法是完全合理的，近年来也有许多公众人物提倡过，但遗憾的是，在目前的个人主义制度下无法实现，因为如果某个雇主愚蠢地试图以国家复兴为由提高工人的工资，他很快就会发现有很多不爱国心的竞争对手会削减他们的工资，把他挤出市场。只有在法西斯政权的纪律和控制下，这种政策才能成功实施。

同样，失业这一重大祸患也可以得到解决，因为很明显，这纯粹是我们目前国民经济缺乏组织的结果。这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工作（以工时计算）需要完成，而且必须有愿意并渴望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当然，可以通过调整工作时间来分配工作,就像意大利目前正在做的那样,现在意大利正在推行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法西斯政府更倾向于寻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是缩短工作时间的更有利的解决方案，但无论如何，在计划性职团国家的组织下，失业问题可以得到彻底和永久的解决。**

金融的功能

现行制度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它未能使社会的各种职业和行业具有为整体服务的功能目的感。这导致了金融领域最糟糕的结果，银行家和金融家为了自己的利益无耻地利用金钱力量。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国家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被高利金融的独裁统治所控制，他们对外国债券市场的丰厚回报比对英国人民的福祉更感兴趣。法西斯政府的首要任务和最紧迫的任务是打破当前国际金融的专制统治，取而代之的是由国家授权的权威政权，即使是对国内最强大的利益集团，也能强制其服从职能和社会目标。

货币的功能是促进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这一点在当下经常被遗忘。如今，我们很难交换商品和服务，这清楚地表明金融未能履行其对社会的首要责任。无论我们的技术人员和发明家多么熟练和聪明，除非有足够的货币和其他交换手段流通，否则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无法提高。否则，发明和工业合理化的唯一结果就是使越来越多的人失业。目前，我们正遭受着货币严重短缺之苦，这是银行为推行紧缩政策而采取的措施。采取这一政策的原因有两个。首先，人们天生保守，仍然将货币的金本位制视为物物交换时代的最后遗迹。

其次，金融家们意识到，限制交易物品的数量会使这些物品变得更值钱，从而增强自己的实力。基于这两个原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并未像应该的那样与该国的潜在生产量相适应，而是仅限于中央银行金库中某种贵金属（黄金）供应量的一定比例。显然，这种金属的可用供应量与金融必须解决的分配问题完全无关，事实上，全世界的黄金数量对于现代工业的庞大生产力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然而，我们的金融大师们并没有通过扩大货币和信贷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求，而是试图通过将生产限制在世界黄金供应量所设定的范围内来恢复金本位制。毫无疑问，国际金融家通过这些手段维持并扩大了对世界事务的控制，但代价却是让世界大部分地区在富足中陷入贫困。

法西斯政府将坚持扭转金融对工业的非自然统治。必须明确指出，金融具有为工业服务的功能，而金融并不适合它所篡夺的工业政府。不仅必须通过伦敦金融城的外国上市来结束鼓励外国生产与我们本国生产竞争的做法，而且必须迫使我们的金融家和

银行家正视他们过去一直忽视的分配问题。我们已经指出，我们贸易的未来在于国内市场的复苏，金融现在必须将注意力转向通过提高人们的购买力来实现这种复苏的手段。

这需要彻底打破银行业务中最神圣的传统，因为问题的本质在于消费融资。迄今为止，银行家的业务完全局限于商业领域中的生产融资，分期付款业务实际上并不为消费融资，因为它只是为了立即销售而抵押未来的购买力。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为更高水平的工资和薪水融资，以释放生产潜力。当然，在目前这种个人主义制度下，任何此类举措都不可能实现，任何雇主如果去银行申请透支来支付更高的工资，都会理所当然地被指责为疯子，因为他无法保证竞争对手也会这样做，或者不会为了从自己手中夺走市场而降低工资。经常倡导提高工资率的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始终无法克服这一根本性的困难。

然而，职团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解决方案，因为职团的目的就是控制和调节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因此，如果法西斯政府采取提高工资的政策，就不会出现不爱国或受外国控制的职团利用竞争对手的问题；所有职团都必须遵守相同的标准。如果雇主随后去银行申请透支，以完成他计划中的部分，银行家会毫不犹豫地满足他的要求，因为他知道，整个社会购买力的提高将带来订单的增加，并使与他有业务往来的特定职团更加繁荣。法西斯主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增加流通中的货币和信贷量，这是为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提供资金所必需的。

显然，这种货币扩张政策必须彻底打破金本位制，而更保守的批评家可能会担心货币的稳定性。然而，法西斯主义指出，货币实际上是对商品和服务的索取，任何正常的人都不会真的去银行要求用纸币兑换金条；如果他能够用钱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他就完全满意了。现在，这个国家显然有很多商品和服务可供选择：仓库里堆满了商品，事实上，有超过 200 万同胞在无偿提供服务。只要我们发行的纸币有可用的商品和服务作为支撑，就不会有通货膨胀的危险；因此法西斯主义将把货币建立在国家全部生产资源的广泛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英格兰银行持有的狭隘不安全的根基上。

帝国主义专制

这种企业组织工业的政策确实提高了全民的生活水平，但唯一有效的批评在于，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外贸易，因此无法提供比其竞争对手更高的生活水平。然而，亨利·福特的例子可以反驳这种说法。福特生产了世界上最便宜的轿车，却支付了最高的工资。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美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使他能够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方法，在生活水平低得多的国家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实际上，我们正在失去海外市场，不是因为我们的商品比竞争对手的贵，而是因为这些市场被难以逾越的关税壁垒拒之门外，而本土工业正在关税壁垒背后迅速发展。无论我们的商品变得多么便宜，我们都不能指望其他国家为了购买我们的产品而破坏自己的工业，让本国人民失业。无论如何，考虑到工资水平的问题，像日本人这样的东方人都会以无法抗拒的价格击败我们。

出口贸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对一个国家的福祉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这意味着将货物运出国外供外国人消费，而不是将货物留在国内用于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大亨们能从长期出口过剩中获益，因为他们正是依靠这些盈余

来发行巨额外国贷款，从中获取丰厚的佣金。出口只是为了支付必需品的进口，而通过排除所有我们可以在国内生产的进口商品，英国的进口可以大大减少。大量制成品进口到这个国家，而它们完全可以在这里生产，这是一个可耻的事实。仅仅因为我们的资源不足以养活整个人口，我们就忽视国内农业，这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应该至少生产尽可能多的国内农产品，然后再去国外购买剩余的。

即使我们在这个国家生产了最大量的商品，也不能否认我们无法完全自给自足，但另一方面，我们所需的商品很少在大英帝国找不到。法西斯主义不是狭隘的小英格兰政策，而是为整个帝国提供自给自足发展的宏伟计划。与渥太华相比，自治领在扩张的本土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将更大，因为外国竞争将被完全排除在外。毫无疑问，整个帝国将完全愿意在这种经济体系中合作，这种经济体系将形成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帝国，不受世界危机和世界萧条的影响，并能够建立比以往更高的生活水平。

最后，我们必须想象一下法西斯主义的企业原则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进口商将不再被允许在他认为合适的任何市场购买商品，而是必须通过对外贸易委员会进行采购，该委员会将利用国家的购买力作为获得出口市场的手段。法西斯主义从一开始就采取英国从那些从英国购买的国家购买的政策，如果任何外国希望向我们出售我们缺乏的商品，她将被要求接受我们的商品作为回报。 随着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方法，我们最终将达成一个国家之间有组织的易货贸易的通用体系，这是有计划的国际贸易的唯一实用手段，不受国际金融的阴谋和国际高利贷的束缚。

职团世界秩序

不能认为法西斯主义完全以国家为中心。当然，将本国放在首位是法西斯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但就此认为法西斯主义意味着国家间的竞争并可能导致经济战争，未免过于草率。相反，当前体制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危险是，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日益激烈，可能导致战争。事实上，在远东地区，争夺市场的战争已经打响，欧洲列强好不容易才避免被卷入其中。实际上，企业经济规划体制将把战争危险降到最低，因为它将把战争的经济原因置于人类的有意识控制之下。这不再是一个各国向邻国倾销最多出口的问题，而是各国政府在充分的职团控制下，共同分享和交换其工业发展所需的基本原材料。由于这些原材料并不稀缺，而且事实上为了防止市场供应过剩，其生产已经大幅削减，因此，一旦各国摒弃了通过相互破坏来谋取私利的荒谬想法，那么，要达成一个友好解决方案，解决这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未来的世界当然会有竞争，但竞争是建立在成就而非竞争的基础上的。只有遵循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我们才能在一个有序的世界中实现和平与繁荣。让我们发挥自己的作用，把自己的国家事务安排好，并鼓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罗马尼亚国家 科德里亚努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篇幅中，以任何年轻的军人或工人都能理解的方式，介绍我日常经历中得出的几个结论。

我们生活在民主形式的外衣下。我想知道，它们好吗？我们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我们确实看到了：我们确切地知道，部分更伟大、更文明的欧洲国家抛弃了这些外衣，换上了一些新的服饰。

他们抛弃这些衣服是因为它们好吗？为什么？难道所有国家都疯了吗？难道只有罗马尼亚的政治家才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看来，我不能完全相信这一点。

当然，改变它们或希望改变它们的人有自己的理由。但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别人的理由呢？我们还是关心那些能让我们罗马尼亚人脱掉民主外衣的理由吧。如果我们没有理由抛弃它们，如果它们适合我们，那么我们就应该保留它们，即使全欧洲都应该抛弃它们。

然而，它们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因为

1. 民主打破了罗马尼亚人民的团结，使其分裂成不同的党派，搅乱了罗马尼亚人民的生活，从而使罗马尼亚人民陷入分裂，使其在历史的艰难时刻面临犹太势力的联合阻击。**仅这一论点就对我们的生存意义重大，足以构成我们改变这一民主制度的理由，以换取任何能够保证我们团结的东西：即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不团结意味着死亡。**

2. 民主将数百万犹太人转变为罗马尼亚公民，使他们与罗马尼亚人平等，并赋予他们在国家中的平等权利。

平等？凭什么？我们在这里生活了数千年；用犁和武器；用我们的劳动和鲜血。为什么我们要与那些在这里生活了不过 100 年、10 年或 5 年的人平等？回顾过去，是我们创造了这个国家。展望未来，是我们罗马尼亚人承担了大罗马尼亚存在的全部历史责任；他们没有任何责任。怎么能让犹太人在历史面前对罗马尼亚国家的消失负责呢？总而言之：他们既不能平等地参与创建国家的劳动、牺牲和战斗，也不能平等地对国家的未来负责。平等？根据一句古老的格言，平等意味着不平等地对待不平等的事物。犹太人凭什么要求平等待遇，要求与罗马尼亚人平等的政治权利？

3. 民主不可能持续努力。由于分成了执政一年、两年或三年的政党，它无法构想和完成一项长期计划。一个政党使另一个政党的计划和努力化为乌有。一个政党今天构思和建设的东西，下一秒就会被另一个政党摧毁。在一个需要建设的国家，其历史时刻正是建设之时，民主的这一弊端构成了威胁。这就好比在一个农场里，农场主每年都会更换，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计划而来，前人的东西，只能被明天到来的下一任主人淘汰。

4. 民主使政治家无法履行对国家的责任。在民主制度下，最善良的政治家也会成为支持者的奴隶；他要么满足支持者的个人欲望，要么被支持者摧毁。他被置于要么放弃毕生心血，要么满足支持者的位置。然后，政治家满足他们的胃口；不是从自己的口袋里，而是从国家的口袋里。他创造工作、职位、任务、佣金、闲职，所有这些都使国家预算不堪重负，使人民捉襟见肘。

5. 民主不具备权威性。它缺乏制裁的力量。一个政党由于害怕失去支持者，不会对那些通过数百万美元的丑闻性商业交易、通过偷窃或贪污过活的人实施制裁；也不会对政治对手实施任何制裁，以免他们揭露自己的不正当交易和不正确态度。

6. 民主是为大金融服务的。由于昂贵的制度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竞争，民主需要大量资金。因此，民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国际犹太大金融的奴隶，而国际犹太大金融则通过贿赂来征服民主。就这样，一个民族的命运被交到了银行家的手中。

选举、选择、遗传

一个民族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领导的：民主模式；也不是按照一个人的意愿来领导的：独裁模式。而是根据法律。我这里说的不是人为的法律。这里有规范，即生命的自然法则；这里也有规范，即死亡的自然法则。生法和死法。一个国家的生死取决于它是否尊重其中的一种法则。还有一个问题有待回答：在一个国家中，谁能理解或直观地解这些准则？人民？无产阶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期望太高了。群众不理解简单得多的法律。必须反复向他们解释，他们才能理解-是的，必要时甚至会受到惩罚。

在此，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人民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却让很多人难以理解：

在发生传染病时，必须隔离病人并进行全面消毒；

阳光必须照进家门，因此房屋应该有大窗户；

如果牛得到更好的喂养和照料，它们就能为人类提供更多的营养，等等。如果民众不理解或仅勉强理解对其生活至关重要的几条法律，那么，有人怎么能想象，民众——在民主制度中，必须通过民众自己来领导——能够理解最困难的自然法则；或者，民众能够直观地了解最微妙、最不易察觉的人类领导准则，这些准则超出了民众自身、民众生活、民众生活必需品的范围，或者，这些准则并不直接适用于民众，而是适用于更高级的实体——国家？做面包、做鞋、做犁、种地、开电车都必须专业化，难道在要求最严格的国家领导方面就不需要专业化吗？难道一个人不需要具备某些素质吗？结论是一个民族没有能力管理自己。它应该由精英来治理。

也就是说，通过在其怀抱中诞生的、拥有某种能力和特长的那一类人。就像蜜蜂养育"蜂后"一样，一个民族必须养育自己的精英。同样，芸芸众生在需要时，也会向其精英——国家的智者——求助。谁来选择这些精英——大众？任何"理念"都有支持者，任何竞选公职的人都有选票。但这并不取决于人民对这些"理念"、"法律"或"候选人"的理解，而是取决于完全不同的东西：取决于个人赢得众人好感的技巧。没有比这更任性的了，他们的观点比群众的更不稳定。自战争以来，这群人依次是阿维雷斯坎派、自由派、民族主义派、民族-农民派、伊奥尔甘派等，他们对每一种派别都大加赞赏，但一年后又对每一种派别都大加唾弃，从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迷失和无能。它的选择标准是："让我们试试其他的"。因此，选择不是根据判断和知识进行的，而是杂乱无章、相信运气的。

这里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个包含真理，另一个则是谎言。人们在寻求真理，而真理只有一个。而这个问题被付诸投票。一个观点获得了 10000 张选票，另一个观点获得了 10050 张选票。难道 50 张选票就能或多或少地决定或否定真理吗？

真理既不取决于多数，也不取决于少数；它有自己的规律，而且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它能战胜所有多数，即使是压倒性的多数。寻找真理不能委托给多数人，就像几何学中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不能交由众人投票决定其正确与否一样；或者就像制造氨气的化学家不会对众人说氮气和氢气的含量需要投票决定一样；或者就像研究农业及其规律多年的农学家不必求助于众人，试图通过他们的投票来说服自己这些规律的正确性一样。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精英吗？那为什么士兵们不选择最好的将军呢？为了做出选择，这个集体陪审团必须非常了解情况：

a)战略、战术、组织等方面的规律，以及

b)有关个人的能力和知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规律。

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任何人都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如果民众希望选择自己的精英，就必须了解国家有机体的领导规律，以及领导候选人在资历和知识方面符合上述规律的程度。然而，普罗大众既不可能了解这些规律，也不可能了解候选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领导精英不能由大众选出。试图选择精英，就好比以多数票决定谁是一个国家的诗人、作家、机械师、飞行员或运动员。因此，以选举原则为基础、自己选择精英的民主，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国家的所有错误、混乱和痛苦状态都是由此演变而来的。我们在这里触及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说，所有其他错误都源于民主观念的这一错误。当群众被要求选择他们的精英时，他们不仅无法发现和选择精英，而且，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选择的都是一个国家中最差的精英。民主不仅会清除国家精英，还会用国家中最糟糕的人取而代之。民主选举出来的人完全没有顾忌，没有任何道德；谁的报酬更高，谁的腐败能力就更高；魔术师、江湖骗子、蛊惑人心的人，他们在竞选期间会在各自的领域大显身手，有几个好人会从他们中间溜走，甚至是有诚意的政治家。但他们将成为前者的奴隶。一个国家真正的精英会被打败，会被清除，因为他们拒绝在此基础上竞争；他们会退缩并隐藏起来。因此，这给国家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当一个国家由最糟糕、最腐败、最不健康的所谓"精英"领导时，人们是否可以问一问，为什么这个国家会走向毁灭？

这就是所有其他罪恶的根源：全国各地的不道德、腐败和淫乱；国家财富的偷盗和掠夺；对人民的血腥剥削；家庭的贫穷和苦难；所有职能部门缺乏责任感；国家的混乱和无序；有钱的外国人从四面八方入侵，他们来购买破产的商店，而这些商店的商品只卖很少的钱。

国家被拍卖了："谁出更高价？"归根结底，这就是民主将带给我们的结果。在罗马尼亚，特别是自战争以来，民主通过选举制度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由罗马犹太人组成的"国家精英"，其基础不是勇敢、爱国或牺牲，而是背叛国家、满足个人利益、贿赂、贩卖影响力、通过剥削和贪污、偷窃、懦弱和阴谋来打倒任何对手。这个"民族精英"如果继续领导这个国家，将导致罗马尼亚国家的毁灭。因此，归根结底，罗马尼亚面临的问题是今天，所有其他民族所依赖的，是以美德、热爱和牺牲国家、正义和热爱人民、诚实、工作、秩序、纪律、诚实交易和荣誉为基础的真正的民族精英，来取代这种虚假的精英。谁来进行这种替代？谁来让这些真正的精英占据领导地位？我的回答是：除了群众，谁都可以。我承认除了"民主"之外的任何制度，我看到"民主"正在扼杀罗马尼亚人民。

罗马尼亚的新精英，以及世界上任何其他精英，都必须建立在社会选拔原则的基础上。换句话说，从民族的躯体中，即从与土地和国家紧密相连的大量健康的农民和工人中，自然而然地选拔出一类具备某些素质的人，然后再培养他们。这部分人将成为领导我们国家的民族精英。

什么时候可以咨询群众，什么时候必须咨询群众？在做出影响其未来的重大决定之前，应该征求其意见，以便让其表明自己是否能够、是否在精神上做好了走某条道路的准备。在影响其命运的问题上，它应该被征求意见。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协商，而不

是人民选举精英。但我还是要重复我的问题："谁来确定每个人在精英中的位置？谁来衡量每个人？谁来确定新精英成员的选择和神圣化？

回答："前任精英"后者并不直接选择，而是将候选者奉为上宾，让他通过自己的能力和道德价值提升自己的地位。因此，一个民族的精英必须确保它留下一个继承精英来取而代之。

遗传原则本身是不够的。根据社会选择的原则，不断从民族深处吸收新鲜血液，精英阶层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历史上的主要错误在于，当精英阶层在选择原则的基础上产生时，第二天就放弃了使其诞生的原则，代之以遗传原则，从而使不公正的、受到谴责的通过出生获得特权的制度神圣化。正是为了抗议这一错误，为了清除堕落的精英阶层，为了废除出身特权，民主才应运而生。放弃选择原则导致了虚假和堕落的精英阶层，进而导致了民主的畸变。选择的原则既消除了选举的原则，也消除了遗传的原则，它们相互抵消。它们之间存在着冲突；因为，要么存在着选择原则，而在这种情况下，大众的意见和投票并不重要，要么大众投票支持某些候选人，而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原则不再起作用。同样，如果采用社会选择的原则，遗传就不起任何作用。除非继承人符合选择的规律，否则这两个原则是不能并存的。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真正的精英——第一个精英来指定第二个精英？我只用一句话来回答，这句话蕴含着无可争辩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精英是在与堕落的精英即虚假精英的战争中诞生的。这也是选择的原则。因此，归纳起来，精英的作用就是：

a)按照一个民族的生活规律来领导一个国家。

b)留下的继承精英不是基于遗传原则，而是基于选择原则，因为只有精英才知道生活的规律，并能判断人们的能力和知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规律。这就好比一个园丁，他在花园里辛勤劳作，并确保在他去世前有一个继承人，一个接班人，因为只有他自己才能说清楚，在与他一起工作的人中，谁最适合接替他的位置，继续他的工作。

精英的基础是什么？

c)工作能力和创造力；

d)勇敢。

e)贫穷，即自愿放弃积累财富；

f)信仰上帝；

g)爱。

有人问我，我们迄今为止的活动是否与基督教会的活动一脉相承。

我的回答是：我们所遵循的路线与基督教会的路线截然不同。教会从高处主宰着我们。它达到了完美和崇高。我们不能为了解释我们的行为而降低这个高度。我们通过我们的行动，通过我们所有的行为和思想，向着这条线前进，在我们肉体的罪孽和因原罪而堕落的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提升我们自己。至于我们通过世俗的努力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自己，我们拭目以待。

国家

当我们说罗马尼亚民族时，我们指的不仅是所有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有着同样的过去和未来、穿着同样的衣服的罗马尼亚人，而且是所有从历史开始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将在未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罗马尼亚人，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完整的

国家包括 1. 目前还活着的所有罗马尼亚人 2. 我们所有死者的灵魂和祖先的陵墓。3. 所有出生在罗马尼亚的人。

人意识到这个整体，而不仅仅是自身的目标。

国家拥有：

1. 有形的、生物性的遗产——她的血肉之躯。

2. 物质遗产——祖国的土地及其财富。

3. 包含以下内容的精神遗产

a)她对上帝、世界和生命的概念。这种观念形成了一个领域，一种精神属性。这一领域的疆界取决于她的观念的亮度所达到的地平线。这里有一个民族精神的国度，一个通过启示或自身努力获得的愿景的国度。

b)她的荣誉照耀着这个民族，在她的历史上，这个民族一直遵循着源于她的上帝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准则。

c)她的文化，是她在艺术和思想领域自身努力的结果。这种文化不是国际性的。它是民族天才的体现，是民族血脉的体现。文化的光辉所及之处都是国际性的，但其起源却是民族性的。有人做了一个美丽的比较：面包和小麦作为消费品可以是国际性的，但它们到处都带着生长地的印记。这三大遗产各有其重要性。一个民族必须捍卫所有三项遗产。

然而，最重要的是精神遗产，因为只有精神遗产才带有永恒的印记，只有精神遗产才能历经千百年而不衰。人们记住古希腊人，不是因为他们的体魄——除了灰烬，什么都没有留下——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物质财富（如果他们有的话），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一个民族通过其观念、荣誉观和文化生活在永恒之中。正因如此，国家领导人必须理性行事，不仅要考虑人民的物质利益，还要考虑人民的历史荣誉和永恒利益。换句话说，不是面包，而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荣誉。

国家的最终目标是生命吗？如果是生命，那么人们用来保证生命的手段并不重要；即使是最糟糕的也是好的。因此，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指导各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原则是什么？是否应该他们是否会被动物的本能、他们体内的老虎所引导，就像鱼在海里或野兽在森林里的行为一样？最终目的不是生命，而是复活。以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名义让人们复活。创造、文化只是获得复活的手段，而不是人们所认为的目的。我们必须对上帝在我们人民身上栽种的才能所结出的果实负责。

总有一天，世上所有的民族都将复活，包括他们所有的死者、国王和皇帝，每个民族都将在上帝的宝座前占有一席之地。这最后的时刻，"死而复生"，是一个民族能够崛起的最高尚、最崇高的时刻。因此，民族是一个实体，她的存在甚至超越了地球。民族是现实，即使在阴间也是如此，而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圣约翰在讲述他在地球之外看到的景象时说"这座城不需要太阳，也不需要月亮照耀；因为上帝的荣耀照亮了它，羔羊是它的灯。"万国将在它的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将把他们的荣耀和尊贵带入其中"(启示录，21、23-24)。再来："主啊，谁不敬畏你，称颂你的名呢？因为唯有你是圣洁的；因为你的审判是显明的，万国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启示录 15,4)。对于我们罗马尼亚人，对于我们的人民，就像对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一样，上帝赋予了我们使命，赋予了我们历史性的命运。

一个人必须遵循的第一条法则就是走在命运的道路上，完成命运赋予的使命。无论"各各他"之路有多么艰难和漫长，我们的人民从未放下武器或放弃使命。即使是现在，我们的眼前也出现了高山一样的障碍。我不禁要问，我们是否会成为软弱而懦弱的一代，在威胁的压力下，从手中丢掉罗马尼亚的命运线，**放弃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

经济理念

责任社会主义 Wewelsburg 档案馆出版物

在谈论法西斯主义时，我们得到的最困扰的问题之一是经济问题，通常是由仍然停留在自由主义心态和有限的认知范围内的人提出的，在那里，一切都以社会和经济政策来定义，而不是从主宰世界的单一真理和秩序的概念中得出的原则。我们斗争的各种倡导者所坚持的各种历史性经济计划和做法，同样也扭曲了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全面回答。总而言之，我们只是回答人们，经济是次要的，它们并不重要，以至于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基本和决定性因素。答案并没有改变，然而现在有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描述这种对经济的态度，反正这也是我们在提到法西斯主义时反复使用的一个词：社会主义。

然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经济体系，它不是马克思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而是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直接对立。更准确的说法是，对于法西斯主义来说，社会主义是最终的社会结构，它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结构更相似，但它也与这两种结构相对立。个人主义创造了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高于整体的利益，这是一种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最相关的结构。然后，我们有集体主义，然而，如今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为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因为集体主义在本质上只是一群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在个人主义中，一个人独自寻求他的所有利益，而在集体主义中，许多寻求共同利益的人在一起追求这种利益。简单地说：集体主义是个人主义在给定的共同利益上寻求人数上的优势。因此，共同利益成为集体主义叙事的主要焦点，因此很容易定义。

集体主义对共产主义起了作用，因为它与一个现有的和既定的群体——无产阶级——合作，向他们推销这样的理念：他们可以同甘共苦，而不是分开，实现他们所有的共同利益，而其他个人利益的实现可能随之而来。相对而言，人们可以说集体主义者比个人主义者能完成更多的事情，因为集体的胜利会影响到集体的每个参与者的结果，

而且他们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而在个人主义中，所有的胜利都是.....个人的，很少有人能实现。此外，在个人主义中，绝对的每一个人都是竞争对手，即使你为同一个荣誉而奋斗，而在集体主义中，集体中的每个人都理想地分享胜利。然而，归根结底，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对法西斯主义都没有好处，因为它们的基本前提是个人利益，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的追求。**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利益总是自私自利的，违背了任何一种秩序，而只是为了自己的奇思妙想，而这些奇思妙想总是物质的，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堕落的。**此外，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都没有对保护一个人的人格做任何事情（一个语义学问题：我使用 personhood 和 personality 是为了给通常被称为个性和身份的东西提供一个不同的、不模糊的术语）：作为一个个体仅仅意味着是一个数字，一个原子；在一个集体中意味着是一个齿轮。**在这两种情况下，人格都是没有价值的，原子和齿轮一样可以被替换，一样缺乏真正的个性，唯一的区别是个人主义的结构不那么僵硬，你可以保持作为自己人的假象，而走在大集体的海洋中，他们可以在一瞬间取代你，因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是在平等的前提下工作，需要容易替换。**在这两种情况下，个性都可以被牺牲掉，要么是为了集体心态，要么是为了一个虚假的、可销售的"个人"身份。因此，你可以看到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如何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相吻合，而集体主义的社会结构如何与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相吻合。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一样的：物质繁荣，但一个是通过松散的竞争性的自由竞争来追求（因此，自由市场的金牛犊，国家不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概念等等），后者是通过要求统一方向的集体努力来追求（因此，民族社会主义的形式是由国家控制生产和分配手段，而无国家的共产主义则是这些手段直接由集体自己掌握，没有中间人）。总而言之，共产主义是工业革命期间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直接产物，它塑造了可以识别的不同群体，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然而两者最终都想要同样的东西，只是后者已经实现了它，并依靠前者来维持他们的繁荣，因此不可避免地讲述了剥削：资产阶级在物质财富的竞争中基本上"欺骗"了无产阶级，为了最终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征用征用者"。共产主义只是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目标的追求，而且没有资产阶级路障来阻挡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目标最终是工作和盈利，直到你不需要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在拥有可以享受的物质财富的道路上需要克服的障碍，因此，堕落就开始了。资产阶级实现了这一目标，令无产阶级羡慕不已，他们认为自己的财富被抢走了，因此起来为自己索取财富。随着技术的进步，"完全自动化的共产主义"这样的想法出现是合乎逻辑的，证明斯宾格勒是对的：马克思讨厌工作，使他在这个意义上与资本家没有区别，**因为这种情景也是每个资本家的梦想。**

你可以在奥斯维拉德-斯宾格勒的《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法国帕克-约克的《帝国》中的"马克思主义"一章中阅读更多关于这种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最终与资本主义相同的批评。现在我们定义了所有这些，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法西斯主义经济学的最初问题上了。现在应该很明显的是，法西斯主义并不把物质财富本身作为目标来追求，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此外，法西斯主义努力使人类社会与宇宙秩序和真理相一致，并不赞成遮蔽个人的人格，相反，它希望充分发展其潜力，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基于他们在宇宙秩序中的位置。

简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机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各司其职，努力实现自己，从而为国家、种族和最终真理的实现作出贡献。这个目标只能通过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来实现，这种结构既不允许个人主义的全民自由，也不允许集体主义的家族/阶级/群体冲突。这种结构就是作为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义。这不是经济社会主义，而是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它赋予人民一种责任感，消除了这两种社会结构所固有的利益因素，将它们定义为质量上的相同，而将我们的社会主义定义为质量上的不同（确切地说，当实际上只有两条道路时，谈论任何种类的"第三条道路"是不合适的）。作为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义同样通过引入责任，破坏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它们以不同的手段寻求相同的目的，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则无视这些目的，同样以社会结构中的人所承担的责任来负担经济。这种社会主义有各种名称，以帮助区分它与经济社会主义：专制主义/普鲁士/德国社会主义与英国社会主义相对立（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政治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弗朗西斯-帕克-约克），雅利安社会主义与闪族社会主义相对立（埃沃拉），斯巴达社会主义（爱德华多-维拉斯科）或只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秩序的决定性方面是，它必须遵守义务，这完全消除了琐碎的个人利益，从而否定了作为敌对社会结构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并随后否定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其纯粹的经济形式。

这种责任社会主义必然要弄清并发展一个人的人格，以了解他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从而也实现他在宇宙秩序中的地位。出于同样的需要，责任社会主义通过消除那种会撕裂社会秩序的内讧来防止个人和团体的冲突——有机国家之所以被称为有机国家，是因为它就像一个活的有机体，有细胞和器官，在一个健康的有机体中，细胞（个人）和器官（集体）都不会互相争斗。肾脏不能与心脏进行斗争，因为它们有固有的不同的目的，它们"责任绑定"，因此它们之间没有冲突的空间，没有嫉妒的空间，没有利益的空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秩序，责任社会主义因此也必须形成等级制度，消除平等的假象，它影响到这个等级制度的每一个成员，从上到下，因为每个人都有责任约束自己在有机国家和宇宙秩序中的角色。当一个人成长到了解他的命运（在弗朗西斯-帕克-约克的意义上，即潜力），他在宇宙秩序中的角色，他就有义务去完成它，去努力实现个人的真理，这是终极真理的一部分。因此，他在有机国家的等级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仅实现了他自己的个人真理，而且还实现了作为社会阶层/阶层/种姓的一部分的每个履行这一角色的人的真理。实现这个阶层/种姓的真理有助于实现他们都属于的国家的更大的真理，这反过来又实现了种族的真理，反过来又实现了整个人类的真理，其中的每一个都有助于直接实现最终的真理，以及通过其他真理的积累——这就是有机国家，一切都很和谐，一个有凝聚力的有机存在。有一件事能够长期保持其自然的等级制度，那就是军队，它的运作原则完全相同（正如一切事物一样，真理在其所有层面的原则中占上风，因此有可能从个人真理建立到宇宙真理），因此这种责任社会主义经常被拿来与军队相比较，这是一个好战的兄弟会，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职责，以使军队的有机体保持健康。经济也同样成为有机国家的附属品和义务，为实现所有小的真理和终极真理而努力。因此，在法西斯主义中，经济的主要决定性方面是它服从于影响这个社会秩序中所有成员的同一共同责任。经济学本身不能成为一个目标，因为那会滋生个人主义、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而这些又会导致集

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形成。相反，经济必须是一个工具，以实现责任和实现有机国家的所有真理。法西斯主义经济就是使经济服从于国家，这就是他们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原因，尽管在实际的经济术语中，实际的制度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也许甚至是一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受管制使其与有机国家、国家、真理的实现相联系。

因此，在定义法西斯经济学时，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是：**社会主义是任何经济体系都要服从于有机国家、民族、真理的实现。此后，你可以就确切的经济体系及其技术名称的技术性问题进行争论，但只要该体系服从于这些东西，并像社会其他部分一样受到义务的约束，它就仍然是社会主义。**我想在文章中加入各种名言来加强我的观点，但我想我应该把它们都列在最后，并加上一些评论，以展示这些名言到底是如何指向对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秩序、社会主义责任的理解。弗朗西斯-帕克-约克：社会主义也是一种伦理-社会原则，而不是某种经济计划。它与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是对立的。它不言而喻的、本能的想法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对于作为生命原则的个人主义来说，很明显，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工作。对于作为生命原则的社会主义来说，同样明显的是，一个人只为自己工作，当然是在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工作。在这里，帕克把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和随后的资本主义直接对立起来，但他指出这两者是如何捆绑在一起的，它们是一揽子的交易，他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而是从社会伦理原则的角度来论证这种对立：在一个国家，人人都是自由的，在另一个国家，人们有义务。

工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发展，但它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因为它只是自我利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伦理社会原则，即责任社会主义，与自利是对立的。然而，社会主义的本能绝对排除了有机体各部分之间的任何斗争。在健康的有机体中，器官和细胞不会相互争斗，如果它们有责任履行各自的角色，它们之间的争斗是不可能的，而这只有在责任社会主义下才可能。社会主义是政治帝国主义、权威、历史哲学、超个人政治要求的时代形式。

责任社会主义必然是等级制的，因此与政治帝国主义（相对于马克思定义的经济帝国主义而言）、与权威、与对更高原则的义务、帕克所说的超个人的政治义务和我们所说的真理的实现有着内在的联系。社会主义类型之间的唯一区别是高效和低效、弱小和强大、懦弱和勇敢。然而，一个强大的、大胆的、高效的社会主义，几乎不会使用源自对立的思想类型的术语，因为强大的、上升的、充分的生命在言语和行动上是一致的。如果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济称为"资本主义"，但只要它被赋予了责任，它就不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因此，仅仅凭借使这种制度屈从于社会主义，把它们称为社会主义会更合适，而且这个名字传递了一种公开、强烈和大胆的理解，不试图隐藏。换句话说，把一个有责任感的资本主义制度称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威胁到社会崩溃的弱点。

义务资本主义的核心是阉割了它的个人主义和人人自由的基本方面，因此使它成为社会主义——保持资本主义这个词只是让它回归到个人主义和人人自由。但对社会主义来说，金钱占有量并不是社会等级的决定因素，就像它在军队中一样。在社会主义中，社会等级并不取决于金钱，而是取决于权力。因此，社会主义不知道马克思资本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它在政治中看到了生活的中心，因此它有一种明确的军事精神。

它没有"阶级"，即财富的表现，而是有等级，即权威的伴随物。军队的典型平行关系被提出来了，你会看到它在其他提倡责任社会主义的人的引文中再次出现。这句话再次暗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等级结构，因此提到了社会中的等级，以及对等级之间存在的权威关系的尊重。当文化人滋养自己时——这就是经济学——他们在滋养更高级的有机体，因为文化人是其细胞。它的细胞对超个人的灵魂来说，就像人体的细胞对人类的灵魂一样。经济学在有机国家中的真正性质被揭示出来，经济学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自私的物质财富的工具，而是有机体生活和向其存在的更高的目的迈进所必需的养料，是对其单个细胞、器官和整个整体的养料。

这就要求国家的经济独立于任何外部的依赖，不允许有机体内的经济元素独立到允许它们违背这个责任约束结构的程度。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社会主义包含了比[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更古老、更强大、更根本的因素。这种元素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就存在，并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发展，事实上是与他相反。它们不能在纸上找到；它们存在于血液中。而只有血液才能决定未来。斯宾格勒暗指社会主义与人为的想法或**计划或意识形态无关**，就像帕克称其为**伦理-社会原则**一样，暗指其独立于人类想法的基本现实。责任社会主义与等级制度一样，都是非物质的、自然的起源，因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不是纸上谈兵的产物，而是自然形成的，是血液中的一种本能，比人类关于如何组织社会的第一个想法还要早，而这些想法只是在社会按照这种本能的要求自然形成之后才出现的。**

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党具有将其与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的好战品质：工人营的铿锵脚步声、冷静的决心感、良好的纪律以及为超然的原则献身的勇气。[.....]倍倍尔的党，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行动者的杰作，是一个真正的独裁和好战的组织.....更多的军事上的相似之处，把劳动者变成了一个军事编队，在责任的约束下，为一个超然的原则，最终的真理而战。德国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普鲁士人的本能宣布，权力属于整体。个人为整体服务，而整体是有主权的。正如腓特烈大帝所坚持的那样，国王只是他的人民的第一个仆人。每个公民都被分配到他在整体中的位置。他接受命令并服从它们。这就是我们自 18 世纪以来就知道的专制社会主义。至少与英国的自由主义和法国的民主相比，它在本质上是不自由和反民主的。每个人都属于有机国家，属于一个活的有机体，即使是国王也有义务为它服务，从而为它的所有组成部分服务，这些组成部分都位于它们应有的位置，并有义务在那个位置上实现它们的目的。但是，维京人的精神和日耳曼骑士的共同体精神逐渐产生了两种对立的伦理要求。一方在自己内部积极承受日耳曼人的思想，而另一方则感到自己受制于它：一方面是个人独立，另一方面是超个人的社区精神。今天我们把这些概念称为"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崇高的美德被这些词所概括：一方面是个人责任、自力更生、决心和主动性；另一方面是忠诚、纪律、无私和义务感。

自由和服务——没有什么比这更难的了。一个其精神和存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民族，一个能够真正服务和自由的民族，理应承担起伟大的命运。这里有一个语义学问题，也是与斯宾格勒的分歧点。斯宾格勒在这里所定义的个人主义，我们将再次区分为人格，只是为了将斯宾格勒所描述的个人主义与竞争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区分开。很明显，维京人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我们可

以说，维京人和日耳曼骑士都接受了斯宾格勒定义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不是代表其中之一。然而，这种人格不是对立的，而是对责任社会主义的内在需要，在那里，一个人的个人真理的实现是由他赋予个人主义的品质所驱动的，然后被置于有机国家中，在那里他赋予社会主义的品质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对自由和服务的描述是有机国家的社会秩序的完美写照，由责任社会主义产生。权威社会主义顾名思义是君主制的。在这个巨大的有机体中，最负责任的位置，用腓特烈大帝的话说就是"国家的第一仆人"的角色，决不能抛弃给野心勃勃的私有者。让我们设想一个统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根据他的社会主义等级、他基于内心信念的自愿自律的才能、他的组织能力、他的工作潜力、意识和精力、他为共同事业服务的聪明意愿来分配他的位置。让我们计划普遍征召工作，形成职业行会，这些行会将进行管理，同时由行政委员会而不是议会来指导。在一个每个人都有工作的国家，无论是军官、公务员、农民还是矿工，这个行政机构的一个合适的名字可能是"劳动委员会"。它再一次肯定了社会主义的责任本质上是与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而等级制度必须有一个顶点，即最上层，不一定是君主制的全部性质，它只是必须是一个绝对权力的位置，君主在本质上（君主制的部分与这个秩序直接相关，即绝对权力）与独裁者或元首相同。**

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职位，因此也是拥有最高责任的职位，斯宾格勒接着再次准确描绘了我们所说的有机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他还提到了职业行会，这也是埃沃拉在描述传统社会，特别是古罗马社会时谈到的，那里存在着职业行会，这进一步加强了责任社会主义的军事性质，以及它如何反映在有机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共同的活动提供了一种纽带和秩序，就像血缘和仪式为那些不从事这种活动的高级种姓提供了纽带和秩序一样，行会/公司就像职业的联盟，它是具有某种使命的人聚集在一起，在一个几乎是宗教的机构中，崇拜他们职业的"恶魔"和对死者的崇拜，即代表特定职业成员之间理想纽带的英雄（每个职业的神圣/传奇守护者的崇拜）。有着共同命运、共同目的和责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这些天职的行会，作为一种好战的兄弟会，为他们共同的真理和整个终极真理服务，这与斯宾格勒在前面的一段话中所说的非常吻合：**工人营的辚辚脚步声，拥有决心的平静感，良好的纪律，以及为超越性原则而牺牲的勇气。这些行会是一个有机国家的机关。因此，[马克思]憎恨那些不需要工作的人。费希特的社会主义会指责这些人的懒惰，会把他们打造成不负责任的、可有可无的推卸责任者和寄生虫。但马克思主义的本能却羡慕他们。他们太富裕了，因此他们应该被造反。马克思给他的无产阶级接种了一种对工作的蔑视。**人们在工作中实现他们的个人真理，这是一种召唤，一种对他们的自我实现非常必要的使命，他们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对工作产生蔑视，而那些出于自我利益将工作视为物质财富的障碍和通往颓废的途径的人，只能对工作产生蔑视，认为它是通往目标道路上的负担或不幸的障碍。资本家实现了他们的目标，而共产主义却羡慕地看着这个结果，把它看作是赃物，因此要求暴力推翻，"抢劫强盗"。这再次强化了共产主义是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的产物，并且植根于完全相同的目标和心态，这与社会主义的职责完全不同。它还确切地展示了"自动化豪华共产主义"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为什么这么多现代共产主义者公开鄙视劳动，并尽可能地远离它，对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前提进行纠缠，

同时充分享受其利益，而这些利益在本质上是他们自己的目标，就像他们所纠缠的资本家的目标一样。

从严格的技术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是公共服务的原则。归根结底，每个工人的地位不是商人，而是公仆，每个雇主也是如此。工业、商业、交通和军队都有公仆。这种制度在埃及文化中以最宏大的方式实现，在中国也是如此，尽管方式完全不同。它代表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内在形式，并在哥特式城市的专业行会中得到了体现。哥特式大教堂是这一体系的象征性表达，其中每个元素都是动态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责任的社会主义，每个人都有责任履行他们在有机国家中的作用。对奥托-斯特拉瑟来说，哥特式大教堂也同样是这种社会主义的象征性代表：社会主义是一个军官团，社会主义是科隆大教堂，社会主义是旧帝都的墙壁。在"旧帝都的城墙"这一象征中，**再次暗示了社会主义的军事性质，暗示了它与权威的内在关系。**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骑士思想与普鲁士主义同在。责任社会主义和骑士精神之间的强大平行关系，展示了所有重要的元素和典型的相似之处：军事性质，义务约束，专制，组织成一个秩序或一个职业的行会。

英国或美国的亿万富翁坚持的不是专制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私人社会主义形式，一种规模宏大的福利计划，把自己的个人权力变成了乐趣，并在道德上征服了福利基金的接受者。社会主义象征着[.....]需要完成的任务.....社会主义的责任，对更高目标的责任，需要完成的任务，从一个人最小的任务，到他的行会、种姓/庄园的任务，到国家的任务，任务是坚持他们各自的真理，从而坚持宇宙秩序的终极真理。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人们既是自由的，同时又是服务的，其动机是恩斯特-杨格所描述的"做必要的事"。大信托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为私人国家，对官方国家行使保护权。然而，普鲁士社会主义意味着将这些专业利益的"国家"纳入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正如墨索里尼所说"一切在国家之内，没有在国家之外，没有反对国家的东西"。有机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要求其所有部分完全融合才能发挥作用，它不允许其器官或细胞发生内讧。因此，责任社会主义使一切都服从于共同的义务，从而形成有机体的整体凝聚力。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生活不是由贫富对比主导的，而是由成就和能力决定的等级主导的。这就是我们的自由：摆脱个人经济上的反复无常的自由。[社会主义意味着能力，而不是欲望。斯宾格勒再次巩固了具有内在等级结构的责任社会主义与试图完全抛弃义务的自利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区别。它不是关于自私的利益和欲望，而是关于一个人根据其固有的本性，从而根据其能力所处的适当位置。

最后："再一次：社会主义意味着权力、权力和更多的权力"。爱德华多-维拉斯科：在他的《斯巴达及其法律》一书中，维拉斯科不断谈到斯巴达的社会主义，这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责任社会主义的理解，因此，为什么它经常与军事结构和军事组织相提并论，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社会的好战性质。利库古斯宣扬的清醒、禁欲和尚武的社会主义，要求所有年轻人与家人分开，与战友一起吃饭，这在许多人中并不受欢迎，尤其是富有和富裕的人。这里强调的是职业的行会和那些共同承担义务的人之间存在的重要联系。斯巴达变成了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从其最初的意义上理解，即由一个有天赋的精英组织和约束的文明，由其最好的儿子组成，并以价值-血液-精神-生物标准为基础。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只可能发生在铁器时代的东西，

因为它试图把破碎的东西聚集在一起，而且更像一个贵族而不是一个民主。斯宾格勒在他的《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中描述了这种类型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宗主国制度，指出这种制度如何在历史上一再出现，化身为较大的城镇并导致帝国的出现。（斯宾格勒区分了四种卓越的社会主义：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和普鲁士，后者导致了第二帝国。我们将再增加两个社会主义：斯巴达和第三帝国）。那么在这里，贝拉斯科为我做了连接这些点的工作，同时也增加了或多或少被忽略的元素，即有机国家来自于共同的血液和精神。没有财富的区别，只有英勇本身，在评估一个人的时候会考虑到经验。他们因为通过了教学，经历了类似的艰难困苦，并且是男性斯巴达人而团结在一起。他们为能加入方阵与那些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坚韧、勇敢和正义的人一起而感到自豪。这就是他们成为兄弟的原因。这句话再次有助于理解作为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义内部的职业行会的性质，它有一个更深的结合元素，而不仅仅是作为同一职业的同事，因为在这种行会中，人们被捆绑在一起，为同一个真理服务，一个比国家或种族的真理更亲密的真理，虽然他们都是固有的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终极真理的一部分同时存在。这种更深的联系来自于这种天职对这些确切的人的排他性，因为这是他们内在本质的反映。他们可以尊重国家的所有成员，认为他们是在共同为国家真理服务，但在履行同样的天职时，行会成员有一种基于共同指令和艰难困苦的纽带，有必要证明自己在共同构成有机国家的兄弟会等级体系中属于这个特殊的兄弟会。因此，试图参与一个由于你的天性而不属于你的职业，就成了对所有从事该职业的人的侮辱，因为它标志着这样一个人是他们兄弟会的入侵者，也是一个推卸自己独特职责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种姓社会中，低种姓可以看不起试图参与他们活动的高种姓的人。女性培养的主要内容是身体和"社会主义"教育，把她们的生命献给国家——就像男人一样，只是在她们那里，责任不是在战场上流血，而是保持家庭的活力，为她的种族提供一个强大和健康的后代，并以智慧和关怀抚养他们。生育是女性本能的果实，它能更新种族：这就是灌输给斯巴达女孩的使命。在这里，我们可以回顾墨索里尼和格雷戈尔-斯特拉瑟：战争之于男人，正如母性之于女人"。"对男人来说，服兵役是参与国家的最深刻和最有价值的形式——对女人来说，它是母性！"！在许多非洲部落中，因分娩而死亡的母亲与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士一样，被以同样的荣誉埋葬！"！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责任社会主义呼吁男人和女人的固有性质，因此，男人的责任是在战场上流血，保护国家和种族，而女人的责任是通过生育继续其存在。这些义务在社会主义的责任中也同样得到了强调，而个人主义的奇思妙想则导致男人因为害怕痛苦和中断购买物质财富或享受颓废的快乐而回避危险，并导致妇女放弃了她们作为母亲的角色，作为一种不必要的负担和追求快乐的不必要后果。斯巴达方阵：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另一个典故是关于社会主义责任的好战性。通过他们的行为，他们证明了他们的联合和牺牲的社会主义显然优于其他任何政治制度，他们更好地准备面对铁器时代。如果你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斯巴达的社会秩序与斯宾格勒在之前的一段话中的描述完全吻合："一方面是个人责任、自力更生、决心和主动性；另一方面是忠诚、纪律、无私和义务感。自由和服务——没有什么比这更难的了。一个其精神和存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民族，一个能够真正服务和自由的民族，理应承担起一个伟大的命运。"这种责任的社会主义很可能要求一个人做出牺牲，但一个人在责任感的驱使下，

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他们既是自由的，又是服务的，被"做那件事，那是必要的"的愿望所驱使。朱利叶斯-埃沃拉：我们已经在上面适当的地方提供了一些埃沃拉的引文，然而让我们强调一下埃沃拉在其作品"异教徒帝国主义"中对雅利安社会主义的描述。然而，在现实中，有一种个人主义，它本身包含着——在忠诚、服务和荣誉的价值观中——克服个人的孤立和自我主义的种子，并使宁静和健全的等级组织成为可能。无论是罗马人还是原始的雅利安人-罗马人种，都不需要等待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就可以达到真正的、更高的组织形式。

一方面是雅利安社会主义，即自由的战士之理想，另一方面是闪族的、模棱两可的、图腾式的、基于相互依赖和悲怆的社会主义，这种东西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认为它是欧洲灵魂的耻辱。在这里，人们可以发现埃沃拉和斯宾格勒关于个人主义的观点在描述"维京人"的个人主义方面有相似之处。埃沃拉在他的书中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反对社会主义，但大多是在处理他上面描述的后一种"神族"类型，通过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放在引号中，提供了类似于斯宾格勒和约克的对马克思的批评。可以说，埃沃拉不喜欢社会主义这个词，因为它可能造成混乱（甚至说任何"社会主义"都应该被拒绝，甚至应该监督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不要发展成为焦点），从而招致大众的统治，而不是精英的。我们自己也熟悉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经常造成的混乱，但到目前为止所引用的一切都应表明，与我们共同奋斗的人们对同一社会主义的责任有怎样坚实的理解。事实上，在上述对雅利安社会主义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埃沃拉本人也同样具有相同的愿景和理解：即具有战士理想的好战性（符合斯巴达的比喻），它认为其参与者是能够服务于（按照斯宾格勒的描述）的自由人——自由的主人。我们还可以通过埃沃拉的"第三帝国笔记"来仔细研究希特勒的 NS 政权的运作情况,以展示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在行动:至于经济领域的问题，希特勒已经确认了政治问题和种明确的生活愿景在经济问题上的突出地位。他宣称，"国家与任何特定的经济理念或经济的特定发展无关"，"国家是人民的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一个经济组织"。征服经济，为国家和它的真理服务，不管实际的经济实践可能是什么，只要让它们与为这个有机国家服务的任务结合起来就可以了。此外，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册第十二章中描述了职业的行会：民族主义工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代表不同职业的工具。职业的团体、行会是作为有机国家的机关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竞争者。

此外，埃沃拉还谈到了希特勒掌权后采取的一些行动，他把"中世纪的有机体和社团主义"作为其虚拟模式，再次暗指作为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义。根据 1934 年 1 月 20 日的法律条款，"在企业中，企业家作为企业的首领（Führer），员工和工人作为他的随从（Gefolgschaft），将具体地工作，以实现企业的目标和民族及国家的共同利益。大公司的故障不再被认为是单纯的私人事务，而是被视为一种政治犯罪。原则上，作为自治单位的个别企业没有义务加入"德国劳工阵线"。此外，加入阵线并不意味着自上而下的监管，就像法西斯主义的社团一样。经济机构只受到一个原则的限制：完成任务的责任，按照约克的解释，"为高级有机体提供养料"。此外，根据这些新的法律，第三帝国的私营经济可以非常自由地发展。大型工业综合体依然存在，它们加强并活跃了各种元素的团结意识，而这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会主义，

成为它们的特点。政府并没有以国家、民族或社会的名义着手接管企业。党的纲领在这一领域的一些激进条款（第 13 和 14 条）被搁置。社会化的原则在这里找到了有益的限制，因此有人会说希特勒与"工业大亨"勾结。实际上，这是一个全国家战线的问题，在这个战线上，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拥有富有成效和负责任的主动权。这一制度在第三帝国显示了其最大的功效，并通过了每一次测试，直到最后。失业不仅迅速消失，而且有时还没有足够的工人来完成国家为完成其重建、发展和民族伟大的计划而承诺的任务。这再次说明了在法西斯主义/NS 下可以存在的实际经济体系的巨大灵活性，但只有当它成为整个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成为它的一部分，有自己的作用，有自己的任务，它有义务去完成。

在埃沃拉 1950 年的"方向"手册中还有更多内容：这一点我们必须肯定：一切经济和经济利益仅仅是对生理需求的满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个正常的人类中具有从属的功能；在这个领域之外，必须区分出更高、政治、精神和英雄价值的秩序，这种秩序——我们已经说过——不知道，甚至不承认，无产者或资本家，只取决于哪些事情必须被定义为值得生存和死亡。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等级制度，必须区分新的尊严，在最高层，一个更高的指挥功能，帝国的功能必须占主导地位经济的服从于更高的任务，使其受到义务的约束。. . . . . 需要在企业内部重建统一，重建不同力量的团结，资本主义的谎言（包括投机者和金融资本家的颠覆性寄生类型）在一边，马克思主义的鼓动在另一边，已经粉碎了。

有必要使企业达到几乎是军事化的统一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他们把周围相关的工作力量在共同企业中的团结和忠诚与责任精神、与领袖的精力和能力相比较。然而，唯一真正的任务是对企业进行有机的重建，要实现这一点，就没有必要为了卑鄙的宣传和选举目的而使用旨在崇拜低于群众的阶层的煽动精神，并将其伪装成"社会正义"的公式。总的来说，应该恢复古代专业和工匠社团所特有的积极的非个人化、尊严、团结的生产风格。更多的激进的相似之处，现在企业要以激进的方式组织责任社会主义，更多地呼吁恢复职业的行会，并谴责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至于个人，只有当人面对人，在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尊严的自然多样性中，才会发生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真正超越。至于必须在总体上防止各种形式的分离和特殊的绝对化的统一性，它必须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必须是一种中心的、定向的影响，一种根据领导人的不同而采取非常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冲动。这是"有机"概念的真正本质，与"极权主义"的典型僵化和外在关系相对立。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克服来自于通过坚持自己的真理和承担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来实现自己的人格和个性。恩斯特-荣格：另一位我们现在已经引用过的人物，他制定了一个非常简洁的方式来解释约克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的本能"：因此，我们的价值观将是英雄的价值观，是战士的价值观，但绝不是那些准备用他们的尺子来衡量整个世界的商人的价值观。我们不在利益和实际收益上做文章，我们不需要舒适，我们只需要必要的东西——命运所希望的东西。与经济、物质主义、个人利益或琐碎的个人利益无关，而是希望实现必要的东西，即命运所希望的东西——履行自己的责任，换句话说，是真理。一个更简短的描述方式是"对真理的意愿"。老干部已经证明了他们适应条件和牺牲自己的能力。灾难发生后不久，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表现出愿意拒绝所有以前的特权，穿着普通的士兵

制服加入国家的重建工作。一种真正的新精神在 1919 年志愿军团的军官中占主导地位，而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他们的实验，他们实践着真正的社会主义，与统治者街道的动乱毫无共同之处。展示这种社会主义是如何自然而然地形成于军队和战争经验中的，因为退伍军人表现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反叛者的理论上的经济"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不希望与大众的统治媾和，而是要求身份的主导地位，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内在内容和生活能量构成的。它既不要平等，也不要公正的正义，更不要用空洞的要求来概括的自由。它希望醉心于快乐，而它的快乐是成为它自己，而不是别的东西。现代民族主义并不希望漂浮在没有空气的理论空间里，它确实在努力争取"自由思想"，但它渴望获得强有力的联系、秩序，在社会、血液和土壤中生根发芽。它不希望有机会的社会主义，它渴望责任的社会主义，渴望那种个人必须牺牲自己的强硬的坚忍的世界。这就是血与土的民族主义和义务的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以快乐的心情实现自己的本性，并在一个人人都有义务的社会秩序中实现自己的位置。

总的来说，人们很难否认法西斯分子和民族社会主义者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它不是一种经济制度，而是一种形成有机国家所必需的社会秩序，它使经济服从于国家面前的责任，它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分享对宇宙秩序的责任的共同喜悦。还有许多其他的名言，可以仔细研究，并将进一步揭示我们的斗争和目标的本质：法西斯主义既不承诺荣耀，也不承诺头衔，也不承诺利益——只有责任和斗争。在真理面前的责任，在履行这一责任时的斗争。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任务，这意味着领导者的问题以最简单和最确定的方式解决。个人的自我利益是没有价值的，他的个人真理所设定的任务才真正决定了他的个性以及他在社会和生活中的地位，因此，即使是领导人也会被他们的责任所体现，呼唤他们完成他们的任务，他们的目的。.....我们希望得到必要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它是必要的!这样我们会取得什么？意思是说。在做那些必要的事，那些真理要求的事，那些我们被义务约束的事，我们实现我们自己的个人真理，从而实现自我实现和意义。新意义上的工人意味着国家内部所有工人的共同血液，并为国家的利益而努力。共同的血液就是共同的性质、共同的真理、共同的目的、任务和责任，对国家及其真理的责任。因此，当有人想谈论法西斯主义经济学时，他们需要被简单地告知：法西斯经济学是屈从于有机国家的经济学，并有义务滋养它、它的细胞和器官，以便它们也能履行各自的职责，实现它们在宇宙秩序中的地位。

社会经济 奥托-瓦格纳

1930 年初夏，赫斯代表希特勒问我第二天某个时间是否有时间参加经济政策会议。斯特拉瑟和当时的慕尼黑州长瓦格纳博士将出席会议。

第二天，我们四人围坐在希特勒办公室的圆桌旁。

希特勒提出了我在国有化和社会化问题上的立场。我感觉他是想第一次了解我对经济政策的态度。

我首先作了如下表述：

“当然，我自然非常熟悉 NSDAP 纲领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但既然你们问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现在既不考虑这些问题，也不提及这些问题。

瓦格纳在他的回忆录接下来的几页中，对工业中 “资本与劳动 ”之间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论述，**并拒绝将国有化和通过工人接管企业的 “直接社会化 ”作为解决办法**。“直接社会化 ”从长远来看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在未来的投资方面。**国有化只是用国家取代了私人企业家，而让工人处于与资本的服务关系中。这就使国家卷入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可能会产生危险的政治后果。国有化也没有回答以下问题：谁是国家？谁是国家？其最终结果将是由那些控制国家的集团所支配，其后果是 “食槽精神 ”的蔓延。此外，“健康的竞争斗争 ”所固有的 “自动自我修复机制 ”也会丧失。因此，瓦格纳警告说，不要将那些国家没有绝对必要拥有的企业国有化。为了实现从个人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采取 “完全不同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三人都在认真倾听。由于瓦格纳博士显然想说点什么，希特勒要求他发言。

“他对我说："你的解释，是一个资本家和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解释，是一个企图通过狡猾的辩证法把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引向荒谬的解释。在党的纲领中，我们承诺实现股份制企业的国有化。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我认为您不应该允许自己侵犯这些原则，它们已经成为整个民族运动[Volksbewegung]的信仰和希望的内容。

希特勒随即平静地打断了他的话： “瓦格纳，如果说我们的纲领中包含的思想在 1920 年我们看来是正确的，当时我们的思想受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那么如果我们要准备把这些思想转化为行动，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我们重新审视这些思想现在的正确性。斯特拉瑟，到目前为止，你对州长的讲话有什么意见？”

斯特拉瑟发言。“终于有一个人有了自己的看法，并准备把它说出来。我对他迄今为止的发言没有任何补充。这符合我自己的观点。但现在我很想听听瓦格纳先生接下来会说些什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我看来，首先无可争议的是，“希特勒接着说，”集体主义的解决办法不能引导我们达到目标。在生活中的任何地方，只有选择的过程才能占上风。在动物中，在植物中，只要有观察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强者生存，优者生存。较简单的生命形式没有成文的章程。因此，选择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达尔文正确地证明了这一点：选择不是由某个机构做出的，而是由自然选择的。这就是选择。但是，动物和其他生命形式还有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弱小者、侏儒、生病的个体会被健康的个体驱逐出它们的群体；其中一些甚至会被杀死、处理掉。

“这就是大自然的意志。健康的人憎恶有病的人，有生产能力的人憎恶碌碌无为的人，有目的的奋斗憎恶无动于衷的堕落。

“现在，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人类早已堕落到无法再唤醒自己进行自我选择的地步。看看那些收容流浪者、精神病人和无法治愈的癫痫病人的机构吧，这些机构的建筑布置得像宾馆和宫殿，有中央供暖系统和冷热自来水，周围环绕着最华丽的花园。这些人就在这里得到照顾和珍爱。数十名圣洁的护士照顾着他们，确保他们的病体得以保存，**确保他们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成为他人的负担**。与此同时，在外面，那些精

神矍铄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有能力也想有所作为，但却无所事事，找不到工作，也不知道去哪里为自己和可怜的孩子们寻找最微薄的营养。就连监狱和教养院也是犯罪和非人类的托儿所。有一次，德国国会甚至建议将音乐表演、讲座和电影带到监狱里，以娱乐罪犯。而在监狱外，成千上万——很快就会达到数百万——体面的工人在挨饿，没有工资，没有工作，没有前途，他们是无辜的——但却没有电影和音乐会！

“在古代，斯巴达宪法是唯一一部要求并强制执行健康选拔的宪法。而今天，美国仍有少数几个州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人类的自我选择。

“当我研究集体主义的概念时，我想到它包含着平均主义，而平均主义又不能不带来平均主义。对于全体人民来说，这无异于精神病院和监狱中的做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迄今为止所尝试和提出的社会化形式的整个理念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我得出的结论与瓦格纳先生相同。

“如果想自然、健康和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引入一种选拔过程，即对那些拥有或应该拥有任何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人进行选拔的过程。

希特勒边说边看着我，示意我继续说下去。但首先我必须思考他抛出的想法，现在我不得不处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我毫无准备，要清晰易懂地表达出这一思路并不那么容易——毕竟这是很困难的。我在此重复我当时的想法。当时，我真想点燃一支雪茄。但出于原则问题，希特勒要求在他的房间里不准吸烟，如果可能的话，在他在场的任何地方也不准吸烟。

“这个想法，“我开始说，”意味着不是所有在企业工作的人都能获得企业所有权，而只能是其中最优秀、最有生产力的人。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企业经营者只有通过技能和成就不断重新获得对企业的所有权，才能保住自己的财产。

“因此，不存在社会化，而是任何企业的所有权永久、逐步、持续地转移到最有能力、最优秀的人手中——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需要的话，转移到唯一最优秀的个人手中。

“这个想法无疑是完全新颖的，但在我看来事实上是可行的。我甚至觉得，它与我一段时间以来系统地提出的关于整体财务和资本结构的想法完全一致。请您允许我改天再介绍这些想法。

“但目前，我们应该设法确定哪些企业适合所有权转移，哪些不适合。判断的标准一方面是企业所有权的可分割性，另一方面是分配的经济可行性。例如，股份公司就是所有权已经分割的企业。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所说的所有权的分配和转移可以在所有可以转变为股份公司的企业中进行。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基本原则。

“毫无疑问，企业有一个下限，低于这个下限就完全不可能进行分化。这主要包括手工企业以及屠宰场、面包房等。换句话说，所有这些企业都掌握在一个拥有数量有限的技工和学徒的师傅手中。

“因此，对于这些不可分割的企业，所有权的自动转让是不可行的。作为交换，这种企业的雇员或学徒必须得到某些管理标准，而这些标准由行会和专业协会来制定是最简单不过的。我请求给我机会在另一个场合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可分割所有权的企业，现在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1.）以何种方式进行所有权转让是可行的。

“2.）从期限和效果来看，应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转让。

“3.）如何选择最优秀和最有能力的人。

“关于第 1.)点：从整个推理中得出的基本原则是，企业只能属于在其中工作的人。到目前为止，某人可以拥有一家企业，并让一名经理或董事经营这家企业，而他自己则在柏林或蒙特卡洛消磨时光，靠每月寄给他的企业收入生活。如果我们实施财产转让的想法，我们必须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很好!” 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这意味着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

“我接着说："对每一个企业来说，目前我只考虑工业企业，每年必须留出一定的比例，也就是从现在的所有者那里征用。让我们举个例子——但让我说清楚，只是举个例子——每年减少 5%的所有权。那么，如果一家工厂的账面价值是十万马克，那么到了年底，就必须把五千马克记入一个特别账户，这样，所有者就只剩下九万五千马克了。

“现在，为了遵守我们一直使用的条款，工厂里最能干、最优秀的工人——当然也包括厂主，只要他参与了工厂的工作——必须有机会获得这五千马克的所有权份额。不能让他们白白获得股份。歌德说过：'如果你想拥有它，就必须去赚取它。'"仅这一条规则就已经导致了一种选择——一种自我选择。不感兴趣的人，不想把工厂当作自己生活意义的人，轻浮的人，懒惰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没有积蓄，或者不愿意把积蓄投资到自己工作的企业中去。只有勤劳的人，有进取心的人，有目标的人，精通业务的人，才会有计划地把自己需要的东西留出来购买股份。

“即使是现在的所有者也可以参与收购——在他的情况下，是重新收购。但前提是，他必须在企业中处于领导地位，或者是企业中能力较强的员工之一。如果他不工作，在我们的例子中，所有权每年收缩 5%，那么二十年后，他将完全失去他的财产，而财产将落入那些勤劳、能干、节俭的员工和工人手中。

“每换一个新主人，这种收缩就会继续下去。因此，在我们的例子中，**任何不再获取的人都会在二十年后失去他的份额，而永远是那些一心一意、精通业务的人继续增加他们的股份。**

“很好，"希特勒插话道。“这不是集体主义。这就是选择的过程。”

“那么，如何根据适当的会计方法合法地进行财产转让呢？” 我继续思考。“如果新的所有权申请人要购买股份，那么，让国家或国家设立的一个专门机构——我们姑且称之为管理机构——参与进来似乎是切实可行的，因为资本持有量每年减少的金额——在我们的例子中是五千马克——将记入管理机构的贷方。因此，到任何一年的年底，管理层都会成为这部分企业的所有者。当它把股份卖给申请人时，就会收到现金，这些现金可以上缴国库。在此，我只想简要地谈谈这种安排对国家总体税收结构的影响，但我可以在另一个场合再谈这个话题。

希特勒再次打断了瓦格纳博士的话。“您看，我们终究会实现企业国有化，哪怕只是暂时的。”

瓦格纳点了点头，补充说："我对这些话越来越感兴趣，也越来越惊讶。州长毕竟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和资本家。”

“从法律上讲，“我接着说，”管理者——或者说，在出售之后，新的购买者——是企业的一种有限合伙人。因此，他根据自己的资本投资参与利润的分配，而他只对自己的份额和比例范围内的损失负责。

“由于购买股份的通常是一些人，因此最简单的办法是由他们组成一个合作社，由其中一名成员当选代表。然后，他或合作社就是前唯一所有者的有限合伙人。

“在股份公司的情况下，所有权的减少将反映在股票上。在我们的例子中，每一股每年将减少 5%。可以发行部分股票，比如 200 或 500 马克，以方便工人购买。为了防止进一步细分，这些部分股份的收缩可以通过从利润中扣除来实现。这些细节还需要研究和解决。希特勒先生，今天我们要做的只是从您的想法中进行思考并得出结论，即把自然选择的过程应用到社会化的问题上。

“关于第 2 点）： 第二个问题是，就速度和效果而言，所有权的转移应在多大程度上进行。

“举例来说，我最初建议每年转让 5%，以此来概括这一概念。但是，这个百分比实际上应取决于有关企业的具体性质。首先必须进行非常详细的研究，才能确定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原则。无论如何，税务机关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定的基础工作。折旧率的确定相当详细。例如：宅基地的折旧率为 1.5%；工业厂房的折旧率为 2.5%至 4%；事实上，对于每一个可能的项目，如机器、机动车辆、存货等等，都已经确定了这样的规格或使用率。我认为，所有权转让程度这一核心问题的答案也在这里。不过，在我进一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及其后果之前，我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对整个货币和资本体系的看法。否则，我将无法使自己得到正确理解。但我相信，我可以证明所有权的减少实际上与自然贬值有关。我们会发现，在农业企业中——我说得有点超前了——所有权的减少只占半个百分点；在采矿业中，所有权的减少可能占一到两个百分点；在工业厂房中，所有权的减少占三到五个百分点；而在商业企业中，所有权的减少甚至可能达到 10 个百分点。因此，所有权的减少与获利的机会成正比。

“关于第 3 点）：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挑选最优秀和最有能力的人。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回答，特别是自我选择是一个完全自动的过程。但是，举例来说，与单身汉相比，这一过程会使多子女的父亲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有一个大家庭的男人可能不那么容易拿出他想要的储蓄，而这对单身汉来说要容易得多。因此，总体而言，自我选择实际上是反社会的。

“因此，除了选择之外，选举——有组织的选择——原则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行会和职业组织也应该考虑发挥类似的作用。这种形式的遴选也应是经济界本身的小组的任务。

“在从自由经济向社会经济（我更愿意把这种新的经济制度称为社会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有必要把一些任务委托给经济及其专业和经济协会，而这些任务需要由一个特殊的自治组织机构来管理，这大致类似于政治自治可以而且必须从市镇行政级别开始向上建立——从地区到省、州和帝国。企业家、工人和白领雇员都必须在这个结构中得到代表，而且每个人的代表范围和比例都不能超过其他人，也不能压制其他人，这样这个结构就会成为我们经济和社会和平的倡导者和保障者。

当我结束演讲时，三位听众都保持了沉默。斯特拉瑟和瓦格纳看着希特勒。希特勒在我发言时一直盯着我，现在他低下了头。

最后，他开口了。“瓦格纳，你所讲的内容充满了新意和独创性，我还没有完全吸收，无法明确表态。请你明天上午 11 点钟再来见我，再向我做一次同样的汇报，如果可能的话，用你刚才用过的同样的措辞。

“先生们，你们“——他转向另外两个人——”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两三天后继续进行小组讨论。

“准备好，“他转过身来对我说，”和我们一起一个接一个地详细讨论你们今天才触及到的所有问题，直到讨论结束。如果我的感觉是正确的，那么今天就是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诞生的日子，它将能够解释和解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巨大问题。然而，这一时刻的意义是如此重大，以琐碎的争论来亵渎它是轻率的。

我们告辞了，握手时，希特勒握住我的手的时间比平时长了一些。

我立即记下了这次谈话的必要记录，不仅是为我自己，也是为第二天，这样我就真的能够向希特勒准确地重复我刚才告诉他的话了。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希特勒没有打断我，目不转睛地听着。我说完后，他说："我不是经济学家。我从来没有涉足过详细的经济问题，而且我意识到，我过去对经济学主要方面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与我现在对经济学的理解是不同的，因为我听了您的介绍。

“我可以提出很多问题。但我相信，我会等到听完您的所有发言之后再提问。否则，我们只会浪费时间谈论那些无论如何都可能澄清的问题。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明天下午三点继续。我会给瓦格纳和斯特拉瑟带个口信。明天你们要谈些什么？

“我想我应该从货币和资本的概念开始，"我回答道。

“你研究过这个问题吗？希特勒问道。

“研究过。我听过这方面的讲座，也读过一些书。我还就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作过一些演讲。但我想介绍的是一些东西，如果它是正确的、可以实现的，将会深刻地动摇目前经济政策的基础。”

“瓦格纳，我们无法避免这种冲击。这正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整个革命的最深刻的秘密，我们的使命就是抓住这场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推翻、摧毁、武力破坏！这种毁灭必须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像布尔什维主义时期那样毫无意义的。而只有当我们理解了目标、目的和必要性，破坏才会变得有意义。

“科学、经济学和传统习俗——还有整个法律概念，一直到普遍人权——都建立在千年前的个人主义方法之上——由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建立和设计。它影响了这些人的所有情感、观念，甚至伦理和宗教信仰。

“他们不会理解我们的逻辑；他们会谴责我们的思想；他们会给我们的新伦理定罪；他们会用一种注定要毁灭的意识形态所能表达的所有仇恨来抨击和迫害我们，以抵御、压制和扼杀一种将推翻先前存在的一切的觉醒的意识形态。这场伟大变革的执行者必须是年轻人。如果老一辈成功地限制了我们，阻碍了我们的工作，那么他们将无计可施，布尔什维主义将降临到他们头上——布尔什维主义反成了是我们拯救世界的神圣目标。布尔什维主义将以残酷无情的方式将他们无能的利己主义企图捍卫的一切踩在

脚下，并将其消灭殆尽。索多玛和蛾摩拉将崛起，就像我们已经在俄罗斯看到的那样！只有经过几十年的苦难，新的东西才会出现，才会从那个崩溃的意识形态和世界的废墟中崛起——我们已经预感到了这种新的东西，我们希望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它。”

他沉默了，情绪明显激动。然后，他与我简短地握了握手，说：“那么，明天，我们将继续”。

第二天，按照约定，我们一起坐在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希特勒，斯特拉瑟，州长 瓦格纳博士，还有我. 瓦格纳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完全有道理的，但在我的发言中会找到答案。

瓦格纳博士最初学习的是政治经济学，后来才进入工业领域。他曾在巴伐利亚安贝格附近的国营矿山和炼铁厂担任过几年的总经理。他对经济和社会政治事务有着广泛的了解和丰富的经验。但他不具备必要的适应能力，无法适应特定的环境，因此无法长期担任公职。他听从希特勒的调遣，是希特勒最亲密的顾问之一。此外，如前所述，他还是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上巴伐利亚州州长。

我现在提出以下观点：

瓦格纳攻击了 “货币的内在价值”，理由是它导致了 “利息奴役”。他争辩说，由于货币只是一种用来交换不断贬值的商品的代币，因此它也永远失去了价值。因此，不存在对资本和贷款收取固定利息的理由。投资或借贷的资金只有权参与其投资或借贷企业的盈亏。同样，他还认为，要求偿还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规定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建筑物会贬值。然而，他指出，根据现行法律，尽管建筑物的价值可能会大幅下降，但即使是继承人也有责任全额偿还抵押贷款。

“希特勒此时大声疾呼："我从未如此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打破利息支付农奴制的纲领性承诺是有道理的。

瓦格纳博士表示反对。“但继承人可以拒绝遗产”

“他们可以"。希特勒越说越激动。“是的，他们可以！放弃他们所珍视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最后的纪念品，最后的戒指，小时候在老祖父腿上玩耍的椅子，母亲细心照料和保存家纺床单的箱子，所有这些童年的回忆，对家庭的回忆——对于一个除了这些回忆之外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这些小东西意味着什么！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一切，原因无他，否则，由于官方世界完全错误的资本主义态度，他们将成为支付利息的农奴制的牺牲品，可能要在这种农奴制下煎熬到老。

“哦，我预见到，要说服顽固不化的世人，打破这种已经成为法律的对劳动人民实施的骗局的力量，唤醒人们的信念，让他们相信，做正确的事情也是很容易的，这将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斗争！然而，必须抛弃那些陈旧的、传统的、不再适应时代变化的东西。

然后希特勒看着我，等待着，过了一会儿，我继续说道。

在这里，瓦格纳讲述了他不得不提出实施 “公正利润 ”的计划。为了奠定基础，一个统一的记账系统将为相同或相关类型的生产单位确定 “适当的资本”。然后再为各经济部门确定 “适当的利润百分比”。根据这一标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哪些地方实现了超出正常水平的利润。一旦 “适当利润 ”原则生效，这些超出正常水平的利

润就只能归于劳动，而不能归于资本。因此，这些利润将由工人分享。整个过程将由瓦格纳承诺稍后描述的公司自治制度来管理。

我沉默了。其他人也暂时保持沉默。最后，希特勒开口了。“其他先生们对这些论点有什么看法？”

斯特拉瑟首先回答 “当你听到这些时，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简单和自然。但是，我们不禁要问自己，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人想到过这些观点呢？至少我以前从未听说过。

“此外，我还感觉到，这些想法的实施也包含了许多其他问题——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事实使得这些想法显得更加正确。

“例如，我想到了附属工厂的问题。任何不在企业工作的人都会逐渐被那些有能力并能在企业工作的人所取代。在德国国会，我们经常遇到如何处理附属工厂的问题。这个提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说：借钱不再是无偿的，而是一种参与，有更高的获利机会，但也有损失的风险。我们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消除不基于工作和努力的收入。这就结束了。

“再说一遍： 农业将再次获得贷款，因为它的风险最小。农业财产的抵押贷款实际上是以金为边的。到目前为止，情况恰恰相反。

另外 不再需要遗产税。不动产和资本财产将像现在这样收缩；正如瓦格纳已经提到过的，歌德的名言将得以实现：'你们从父辈那里继承的东西，如果你们想拥有它，就得自己去挣'。

“但我必须静下心来想清楚整件事。我宁愿把它写下来，以便好好研究"。

瓦格纳博士宣布："关于适当资本和适当利润的想法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在确定适当资本的过程中，我也终于看到了为企业收购价格建立基础的机会。实际上，即使实际投入的资本有多有少，适当的资本也必须是正常的购买价格。

“但是，对于资本和财产的收缩，我仍有一些问题和疑虑，这不能不带来整个货币供应量的减少。比如，银行如何运作，如何记账和结算？”

希特勒接着说："瓦格纳的看法使我们正视我们在党的纲领中已经几乎本能地利用了的认识，在我们真正弄清这些问题之前。

“后来，当我听到有人对我事先本能地感觉到的事情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时，这种解释向我揭示了一种自然的发展和合理性，对我个人来说，这种解释的正确性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瓦格纳自己指出的那样，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同意，这些认识需要一流的理论家和实践家经过多年最彻底的研究和讨论，他们的技巧和经验可以保证他们的工作结果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并且可以转化为现实。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已有千年历史的观念，它已深深扎根于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头脑和法律体系中，以至于没有人再有丝毫的想法认为它可能是错误的，那么，如果不经过百次试验，不经过深思熟虑，甚至不在实践中尝试那些想要取而代之的新观念，就试图推翻它，那将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

“这将是经济政策部的任务，我们必须在 NSDAP 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中设立经济政策部。瓦格纳，在适当的时候，我会请你来主持这个部门的工作。

“有一件事我认为非常重要，也是绝对必要的——那就是暂时不要在一个狭隘的团体之外提及任何这些思路和问题。任何歪曲、虚假的表述，甚至部分地公开这一系列全新的、仍在研究中的问题，都只会对我们的计划事业造成损害。

“因此，先生们，我嘱咐你们，目前不要让我们今天和前天听到的任何话传到我们周围以外的任何人的耳朵里。即使经济政策部门已经开始工作，瓦格纳，你也必须确保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的这些关键问题上不会出现任何纰漏。

“我对一些细节也不太清楚。但在我心中，我预见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徒劳无功的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些观念是如此强大，如此具有颠覆性，如此具有革命性，以至于与引入这些观念的后果所带来的动荡相比，法国大革命似乎只是小儿科。

“这些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为了解决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重大问题：用'劳动对资本的统治'取代'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战争爆发了，内战打响了，革命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

“现在，我觉得我们仿佛手握哲人之石。让我们好好利用它，而不是把它扔掉。今天，我比往常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政治的任务必须是防止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跃进到德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这种错误的、以自己的方式犯罪性地解决问题的办法，直到我们能够赞助新社会经济的总体方案，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们德国人民和全人类。”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希特勒严肃地与我们握手告别，并指出，对我的看法的进一步解释将不得不推迟一到两周，因为他即将前往柏林和汉堡旅行。他回来后，我们会再听到他的消息。告别时，他又对我说："瓦格纳。我的脚下又多了一块坚实的土地"。

《民族社会主义经济大纲》选　　汉斯·布赫纳

经济民主！

强加给德国人民的《魏玛宪法》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为经济和社会重组提供了智力框架。德国经济在战前一直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拥有组织良好的生产、消费、服务、报酬、资本、劳动力、风险和成功体系，如今却呈现出令人震惊的破坏景象。整个国家结构在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所谓民主政治下瓦解，也引发了整个经济生活的转型，将原先精心构建的结构变成了废墟。

这一章涉及贫民窟中道德沦丧的最低泥潭，以及政治与商业之间的关系，通俗地称为“经济民主”。这是资本主义十年泥潭的篇章，是浑浊的金融实践的地下水翻腾，也许只有衰败时期的罗马才经历过。社会动荡尚未结束，经济和金融重组规模巨大，几乎无法用语言描述。国家失去了往日的意义，沦为纯粹的警察和监管机器，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资本的封建主义，它形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上的国家，它不再根据经济条件，**而是根据股市来影响生产和消费，股市打破了由满足需求所决定的旧市场规则，取而代之的是股息哲学，即股市的统治。**

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在粗俗的物质主义推动下，正在摧毁今天的德国，但正如桑巴特所认为的那样，它并没有走到尽头；它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演变为一种摒弃逐利的社会计划经济；而是处于一种无政府、混乱、自私、专制的巅峰状态。

“目前，金融界正在掌权，”汉斯·泽勒在《Vössische Zeitung》第 189 期上写道。他在这里谈论的是决定性的力量，这种力量现在才以完全独裁的方式在《扬格计划》下进行，因为在过去几年中，它主导了凡尔赛、日内瓦和洛迦诺的整个国内和外交政策。

并非如《魏玛宪法》所认为的那样，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如今，以前自由但受人民约束的经济正被激进的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后者剥夺了人们的全部财产和生产资本，并使劳动人口越来越依赖资本主义。新兴的集体资本主义也与专制金融资本主义并存。它丝毫不会改变金融资本主义对利息和股息概念的倾向。

相反，它把广大民众吸引到股票市场，把对利润的无节制追求扩展到积累的社区资本。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合作社组织的资本积累过程正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追求利润率、投资收益、经济不活跃和反国家不负责任的目标；简而言之，它们正在加入激进金融资本主义的行列。众所周知，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也努力在资本主义的大厦中安身立命。如今，人们只接受经济决定命运的观点。人们看到这种观点的必然结果，即国家条约、私人债务证券，将一切政治关系分解为形式上正当的法律操纵，这些文件可以根据私法强制执行。

民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民族社会主义有意识地与魏玛宪法所描绘的经济唯物主义扭曲图景形成鲜明对比。“经济决定命运”这一基本原则仅适用于纯粹的机械主义概念。

对于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经济是为更高目标而建立的一套目标体系，一套以目标为导向的手段体系，一套有机的联系体系，它有意识地以价值为导向，并在国家、血缘和生命所决定的总体中找到其系统概念，不仅从科学、经验的角度，而且从认知、审慎的角度。这样，成就优先于价格，需求满足优先于利润，责任优先于投机，既定价值优先于因果过程，道德优先于机械因果关系。

如今，民族社会主义者认为的德国经济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十年来的蓄意破坏、侵蚀和削弱其基础的过程，导致了一系列崩溃、灾难和严重危机，以及长期危机，这表明经济没有自我恢复的能力。**必须为其设定一个政治目标，使其像功能单元一样融入其中，而不是像疾病过程一样吸收整个有机体的力量。**

在其概念理论中，民族社会主义将民族置于首位，因此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是对立面，而是同一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生活的两种表达方式都基于意志、评价和种族的基本原因。**在经济生活方面，这意味着否定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但肯定源于民族特性的创造性人格；否定无机的民族普遍主义，但肯定具有生成性和创造性的民族共同体。解放个人力量，保护个人免受整体剥削，保护整体免受个人利己主义侵犯，以及整体服从领导者的个性，领导者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这些是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整个经济进程的明确公式。**

民族社会主义的经济和金融计划

正如十年前在党的文献中制定的那样，其合理性在细节上日益得到证明。从一开始，一些批评家就认为他们必须将“时代方案”的概念应用于这个年轻运动的经济原则，这是一种仁慈的让步。其他人则主张更客观的“进化论”。

最激进的反对者预言，方案中的大多数要求都会失败，它们会因现有的经济事实和环境而失败。事实上，当时提出的要求仍然像以往一样有力，证明了它们在每天的政治斗争中的宣传效果，证明了它们理论的正确性和实践意义。对它们最常见的批评，即它们是经济“折衷主义”的混合体，恰恰是由那些最不了解它们的人提出的。

为了实现民族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即德国人民的复兴和解放，还需要制定明确、毫不含糊的经济、金融和社会政策。它源于民族社会主义的生活哲学，并辐射到公共和私人活动的这些领域。

责任原则适用于个人人格和国家整体（不仅仅是国家整体）之间的关系，它包含经济过程中一系列复杂的有机副产品，而这些副产品似乎首先是由价值和义务决定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民族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是正确的。民族社会主义与德国旧政治经济学的所谓浪漫主义流派一样，将价值因素教条式地引入国民经济、生产过程、流通和消费过程。但它并没有就此止步。它必须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融入国家生活的有机体，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把所有的燃料和能量都吸引到自己身上，退化成威胁国家生命本身的癌变畸形。当然，当今国家的外在形式和概念内涵，与根植于种族传统的人民所想象的国家并不相同。

这样的国家以其民族力量为支撑，数百年来不断发展其本质特征和价值观。德国的经济理念在完全荒芜的时期内经历了多次毁灭和重生，在民族社会主义中不仅找到了继承者，还找到了第一个真正且合理的实施者。当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家谈到我们打破利益束缚、满足需求、将信贷系统国有化、财产概念、工作责任、养老保险和土地法时，我们不仅应该将其视为当前经济形势的标准，还应将其视为对世界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可以追溯到对生活的有机看法。如果凡尔赛条约、道威斯计划、洛迦诺等指令还没有像乘法表一样在每所学校教授，如果它们还没有像迫切需要的乘法表一样张贴在每辆电车和火车车厢上，那么人们就不能指责民族社会主义者恶意利用经济政治形势。

在我们民族和国民经济瓦解的过程中，民主、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最为明显，其目的是通过迫使德国签订债务合同，使其在未来几代人内都处于负债状态，从而彻底耗尽德国的国力。

反对《道威斯计划》的斗争被反对《扬格计划》的斗争所取代，并且仍在继续，这并非出于反对而反对，而是出于对现有国家结构被摧毁和完全夷为平地之前无法建立新国家结构的认知和意愿。两者无法共存。自诩为“绝对中立”的国家和经济物质主义观念，将一切卷入物质主义权力和利益斗争的漩涡，人们无法再凭借其“无价值”的“事实”走出这个迷宫。然而，正如“普遍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仅凭一种相反的意识形态知识就能取代破产的机械原则，这种想法同样是灰色理论。

抽象的教条主义与唯物的经验主义一样，都无法创造和促进任何东西。创造和塑造特定世界观的不只是知识和想象力，意志也必须参与其中。今天，我们正在有意识地努力增强德国人民的自我保护的本能，唤醒德国，使其摆脱沉睡，唤醒其不惜一切代价的抵抗精神，这与当今的国家与经济理念背道而驰。从民族社会主义的知识观和意志力的角度来看，或多或少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只是次要问题，其解决方案可以从纲领的基本原则中明确推导出来。在这方面，他的论点中的个别观点比其他观点与日常

政治的联系更为紧密。但民族社会主义基本教义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代表了一种关于绩效、价值和能量的学说，其力量来自对人民血缘关系和命运共同体的认可，以及国家政治形式。

国家和人民共同体

我们可以理解民族社会主义这个复杂的概念，目前我们可以通过归纳法，将其简要解释为国家政治组织下的国家共同体整体生活结构。最重要的是，**要避免现在常见的错误，即只把民族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国家福利制度**，一种为失业者和生活拮据者提供的有组织的救济体系，简而言之，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弃儿。

对于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向经济上处于弱势和孤立无助的人施以援手，支持新的第四或第五阶层，支持无产阶级的归化和代表权”的问题，而是对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剖析，而是从民族、种族起源及其对个人和整个民族经济行为的支配地位出发，对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概念的认知重构。个人责任源于其与同同胞在家庭、宗族、邦州和民族方面的关系，不仅使其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承担组织结构规定的责任，还根据其等级和表现，将其提升为民族共同体内生产、分配和消费全过程的合法伙伴。

当然，民族社会主义者也将高度发达且组织完善的社会政策视为国家共同体对贫困个人履行政治义务的终极目标之一。

但可以说，这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所产生的不言而喻的部分结果，这种联系的自然条件既包括个人获得支持和照顾的权利，也包括个人为社区服务的义务。但这绝不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的完整概念。德国中世纪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宝藏，这些例子表明，我们的国民经济曾多次非常接近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共同体秩序的理想，或者说，它已经部分实现了这一理想。

仅以社区的经济形式为例，Allmenden、Rodungen，尤其是生命-财产形式，更确切地说是日耳曼财产概念的特殊形式，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共同财产、共同管理和共同行政的形式，它们展现了前几个世纪高度发达的社区形式。私有财产并未被废除。只是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公众的影响，它获得了封地的内在特征，这种公众的“影响”指向了共同利益。它由职团组织和合作社负责保管，并受到信任。

德国的旧式政府和经济体系以忠诚关系、继承制度、合作社和优越所有权为基础，承认“个人相对短暂，而人民整体永恒”，该体系根据私人财产、封建财产和职团、社区和国家性质的共有财产的结构性秩序，对私法和公法不作根本区分。个人的权利受到家庭法、宗族法和合作法的限制和制约。

同样，公民个人生活中的纪律形式也受到行会和公司结构相互影响的标准化，这些结构以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为目标，防止了“所有职业私有化”。国家具有永久性和关键性，它促进职团和行会式组织的建立，以监管和调解的方式维护公众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它遵循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实现了国家合作结构形式的巅峰，这是一种公共经济组织体系，它“将国民经济视为国家组织的整体，而非个人经济活动的抽象总和”。

重商主义以国家支持国民经济为原则，以国家劳动力为奋斗目标，对国民经济形势有着深刻的把握，已经触及了我们社会学说的一般性根本问题。他是中世纪普遍主义

国家观念的后裔，这种观念固然受到遗传因素的束缚，但通过近代初期个人主义思想的革命，它往往在国家个人主义、个人责任与力量合作组织之间找到平衡。

一方面，在不破坏个人动力或脱离与同类整体的关系的前提下，将个人的智慧自给自足恢复到适当水平；另一方面，将社会从机械的 具有精神和道德基本价值的企业社区秩序的有意义的组合；在许多情况下，备受诟病的重商主义可以声称其试图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具有历史价值。它在金属主义或图表主义、自由贸易或进口关税、自由竞争、行动自由、劳动合同法等方面的立场；它的社会政策、财政道德、国家的有机概念、国家的合作概念，以及保守主义倾向，对现有社会结构、合作体系的维护，这些情感导向、精神状态和意志行动的体现，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了严肃的表达。从康德绝对义务的范畴出发，直接引向费希特关于国家成员之间超越单纯权宜之计的更高团结的学说；以及关于社区整体创造性的学说，个人在其中找到其生存和接受更高教育的地位和形式。德国哲学发生了决定性的革命，即国家有机扩张的认识论系统化，以服务于人民，并建造了第一座大坝阻止自然法理主义与过度个人主义的洪流。浪漫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正是基于这一新方向，成为德国旧政治学和经济学中最早的系统化理论结构之一，并在多个方面有效运作了数个世纪。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概念的牢固根基。这一概念基于生物学、科学和形而上学考虑，是符合逻辑的假设，它提出了具有种族理论性质的新颖而积极的基本观点。

职团国家的社会学

与个人建议的多样性相反，必须强调的是，作为一项原则，公共部门（国家、市政当局、合作社）的范围、成熟程度以及公共、半公共和私人经济形式在封闭的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整合可能性，必须根据其等级、根据有机结构方面来考虑，这与私法和职团法不必对立，而应相互决定、补充和完善的方式类似。作为国民经济实体的分支，国家、市政和公司组织之间存在大量混合和过渡形式（合伙、监督、控制、代表），这使得全面观察结构变得复杂。

与此同时，这也是国家视角下国家与经济的核心问题所在，迄今为止，社会理论（如经济理论）尚未对此给出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 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几个世纪以来，历史的尺度一直在整体或特殊、自我法则或外来统治、内在或外在经验、目的或原因、充分性或道德的负担下摇摆。

如今，约束、合作、合理化、社区化的理念逐渐占据上风，而目的明确、循序渐进、不断瓦解的经济民主资本主义则逐渐式微。经济民主资本主义是一种实用的组织形式，它 可以是一个职团化的国家，作为经济秩序，保护和代表个人在各种角色和职业中的利益，其权力、权利和义务与上一级组织的权力、权利和义务相区别。类似单位联合组成更高级的整体，直至最终形成国民经济这个封闭的有机体。维也纳学派为国家经济结构找到了“下级单位”

合作企业整体的经济联系结构是“下级单位”：工业、贸易协会、公司、家庭。然而，可以看出，在这里，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相互渗透非常强烈，以至于很难说纯粹的个人主义或纯粹的普遍主义形式，两者之间的概念对比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在纯粹的认识论表述之外。在国家概念和国民经济中，整体和个体都不像是派生、次

要、依赖或偶然的事物。相反，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互补和相互满足创造了一个与物种相关且适当的社区活动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缺失，否则就会影响总体福利。职团国家的财产形式 从这个出发点出发，我们将尝试通过财产制度、专业结构和企业的形式等概念来达到社区（国有化、市政化、合作集中化）的相互渗透，从而触及职团国家理论和企业理论的问题。原则上，职团制国家也维护财产，即使它往往具有共同、慈善的特征，旨在实现共同性。财产的所有权仍归个人所有，但由更高级的部分整体监督，进而由国家整体监督。因此，我们有职团、社区、国家和私人财产。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可以通过禁止和打击明显有害的应用（税收、消费和销售监管、交通和运输的海关和关税制度）以及引导其有益使用（强制种植、原材料使用规定、生产禁令和优惠）来管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可能会受到公共财产的影响，从而具有封地的特征，因此兼具两种特征：为他人服务和为自己服务、外来习俗和固有习俗。除了私有财产的形式外，还形成了维持生计的合作财产的法律形式，而更高一级的法律实体可以对其提出繁重的索赔要求
（相互信贷和保险、资源的共同管理、集体劳动合同的不可分割性），从而形成以个人行使和慈善管理为目的的生活形式。”（在这里，私人和公共法律效力的形式也融合在一起，正如真正的德国法律思维所要求的。） 此外，还有第三种所有权形式，即协会和合作社的集体或共同所有权，以及社区和国家的非公司协会。斯潘说：“只有在这种多样性中，经济才能保持活力…… 越关乎基本行业；联系越少，越自由，越关乎非基本和非必要，但却是任意和次要的需求和生活领域。” （铁路、邮政、电话和电报领域的国有企业，烟草、盐、糖和火柴的国家垄断，市政电车、电力和天然气工程，以及 公司、合作社、类似卡特尔和类似辛迪加的经济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发展成大型的企业、横向和纵向的信托、采购、销售、生产和消费组织。）这使我们进入了企业理论，而企业理论与区位理论、市场理论和社会政策的部分内容是相互关联的。

企业管理与市场理论：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预言，资产阶级社会将因资本集中、无数先前独立的个体利益被破坏（剥夺）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过度积累（危机）和日益严重的贫困（工业后备军）而自行瓦解。在工匠时代，每个生产者仍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之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生产本身分离，工人不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小土地所有者、农民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因为小规模农业通常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马克思认为，机器时代摧毁了商业中产阶级，在工厂里，机器取代了人力劳动。企业家应该把工人看作是马力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工人应该把企业家看作是附加值的投机者；在工匠时代并不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应该导致阶级斗争、企业分散化、价值和生产理论、工资和财产理论的变化。

然而，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为惊讶的是，这一发展路线并未按预期那样一致地展开。起初，农业抵制了“集中法则”；中型企业增加，大型企业减少。如今，单个企业形式的优越性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在商业领域，商业的相对类型和规模也是当今决定性的因素，首先是由“类似商品的市场规模”决定的，这对各自商业形式的业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小市场尤其盛行，并将盛行于缺乏运输、人口和购买力的修理、仓储、服装行业、手工业、食品和建筑业。对进口制成品征收关税的政策促使面向巨

大市场的出口国发展“优质产业”。大规模生产商品的庞大工厂即将进行可识别的重组，以支持生产优质商品的中型工厂，同时不会从根本上降低标准化水平。“

除了市场规模之外，大规模生产或所谓系列生产或连续生产的主要条件是技术生产过程中机器和劳动力的比例、国民经济的资本财富以及资本主义股份制度。公司合并为信托、联合企业、卡特尔、合作社等形式的演变清楚地表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计划，将所有经济活动强行整合为大型计划企业，将违反“有机多样性法则”。**

大型企业的优势只有在“市场规模、固定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生产过程的普遍性、后续阶段的相互关联性、资本的充裕性”等条件下才能显现。只有当服务或产品是统一的，市场也是统一的，集中化才有可能实现。“”在自由市场经济、受社会政治和合作法规调节的温和市场经济、公司制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这四种经济形式中，从历史和发展理论的角度来看，第二和第三种形式似乎最有意义。因此，我们现在发现，国民经济实体的空间定义有机体存在于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之间的相对关系中，

存在于农业、贸易和工业的相对交织中，存在于生产、转换和销售系统的区位差异和市场状况中，这些系统由类似的活动组群构成，被称为庄园。大规模金融资本主义企业广泛工业化的危机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到来（即当公平的工资条件与公平的价格以及公平的价格与公平的商品相匹配时），这不仅是与市场和生产相关的危机，也是与社会学相关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学说在这里强调其社会财产的秩序，与民族共同体、价值学说和生产学说紧密相连。它的实现将是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概念政治胜利的自然结果：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之间，机器和手工劳动之间，大型、中型和小型市场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正如费德在其纲领手册《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基础》中所呼吁的那样，他呼吁维护“经济生活各个领域中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健康组合”：这是民族社会主义阶级政策的社会学后果，源于其国家政策。

工作和商品

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只有在特定条件下、特定市场条件下、特定购买力分层和特定国民经济条件下才具有优势。它们不能被描述为一种普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疾病的良药”，而世界正饱受这些疾病的困扰。**标准化取代绩效原则的情况不会发生，也不需要发生。**教育、努力工作和技能将继续导致工作分类，并延伸到工资和集体谈判问题，这对于许多工人和员工的社会发展尤为重要。**工作和高薪是相互依存的，就像就业更关乎质量而非数量一样。最经济地生产优质产品、逐步持久地提高工资以及最经济地分配产品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为国家社会服务”这个词来表达。这取决于调整公司的基本业绩，以满足经济需求，从而满足生活需求。如果企业将利润主要用于降低价格、提高工资和改善产品质量，而不是仅仅用于支付股息，那么生产商品的内在目的就显而易见了。**

生产的目的是创造价值，生产出以价值单位衡量对人民和整个经济有用的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链条中的各个环节也尤为重要。如果工资和薪金增加导致购买力提高，那么消费自然也会增加。如果一家公司的主要目标是分配红利，如果它的利益在股票市场和商业之间分配，如果它试图将股票市场和商业混合，那么公司的经济目的，即服务公众的目标，往往受到威胁。公司的利润不应来自套利，而应来自满足经济需求

的工作。工资、收益和利润对于维持、促进和刺激从生产到消费的价值创造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意义。消费维持生产。两者都创造工作。如果这个连续链条中的收入太弱，工资太低，收益得不到回馈，利润得不到再投资，那么价值创造开始和结束之间的联系就会中断。**商业实践的目的不是股市、信贷和投机，不是刺激消费和创造需求，不是版税和分红，而是创造性的组织对整体经济表现的健康发展，从而维护和延续民族生活。**

资本主义与犹太教 鲁道夫-荣格

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他的著作《犹太人和经济生活》中写道，犹太教和资本主义是相同的。

——通常在讨论犹太问题时，引用犹太人拥护者甚至犹太人自己对犹太教的彻底贬低是非常明智的。在这方面，值得参考鲁道夫·比肖教授、西奥多·蒙森教授以及沃尔特·拉特瑙、奥托·魏宁格、费迪南德·拉萨尔、卡尔·马克思、海因里希·海涅和康拉德·阿尔贝蒂等犹太人的观点。为了证实我们上面引用的桑巴特的话，人们只需查阅《旧约》，其中对犹太民族的本性描述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清楚、更直接。只需考虑一下《申命记》中来自同一来源的以下预言：“你们要消灭所有民族”——“可以向外国人收取利息”——“这样，你们就可以向许多民族（Völkern）贷款，却无需向任何人借款”——最后是：“当主你的上帝把你带到他向你祖先起誓的土地上，赐予你那些你未曾建造的宏伟而美丽的城市；还有那些你未曾装满的满屋财富，未曾挖掘的水井，未曾种植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你将吃得好，过得饱……”

犹太民族作为寄生虫（Schmarotzervolkes）和贪婪金融资本主义的代表，其本质再恰当不过了。《圣经》中的这些承诺与德国谚语“不劳而获者不得食”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生产者，另一边是寄生虫！资本主义和犹太教是一体的。

只要睁眼看，就能清楚地看到，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西方文化圈每个国家都迎来了不受约束的金钱统治时代，而与此同时，这也是犹太人的统治。人们只需看看国家、市政当局和大型企业的预算，就能发现利息和贷款还款是最大的支出项目。我们在金融资本力量下的奴役在这里得到了最清晰的体现。为了获得几百万的贷款，我们所谓的政治家们必须进行多么屈辱的乞讨之旅？而这样做——这是问题的关键——他们通常必须郑重承诺给予他们所珍视的犹太人各种好处。否则，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受到欢迎和保护，而犹太人的反对者却遭到国家力量的镇压？

可以说，德国-奥地利是当代最明显的整个国家被奴役的例子，它在国际联盟的帮助下被“重建”，而德意志帝国更是如此，它把道斯计划的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高级财务官邦博士（可能是该领域最权威的专家）的两本小册子，以及我的同僚、德意志议会议员格奥尔格·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在月刊《Der Weltkampf》（慕尼黑 Deutscher Volksverlag 出版社）第 21 期上发表的一篇精彩文章，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纽约华尔街不仅将目光投向德意志帝国，还投向其他国家，而且《道斯协定》绝非犹太人为了获取更大利益而进行的最后一次“重建”尝试。

如果有人仍然不相信（犹太人）金钱统治的现实，他们大多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家”，众所周知，他们通常是最幼稚、最天真的人。今天的街景有助于普通人了解我们的道路走向：银行像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金融资本的吸入口，它们还有什么？

我们因此生活在货币统治时代的中心。这是一个建立在所有生产者利息奴役基础上的时代。**我们再说一遍，这个时代同时也是贪婪的犹太人统治的时代，他们通过金钱的邪恶力量战胜了生产劳动，从而战胜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东道主社会，他们通过媒体蒙蔽了东道主社会的感官，控制了东道主社会的贸易和商业，掌握了东道主社会的政府和代表机构，使东道主社会的艺术和科学屈从于他们，诱奸了东道主社会的儿女，摧毁了东道主社会的习俗。**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天才在舞台上为我们描绘的《众神的黄昏》悲剧在人生的舞台上上演了千百遍：阿尔贝里希（Alberich）、密姆（Mime）、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哈根（Hagen）、受骗的布伦希尔德（Brunhilde）以及令亚瑟（Æsir）、精灵和人类着迷的闪闪发光的黄金，一切都在上演！

福特在其著作《国际犹太人》第二卷中向我们展示了北美洲美国的情况。一本小册子列出了德意志帝国令人沮丧的数据。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从事需要艰苦体力劳动的职业的犹太人相对较少（即使如此，他们也只是作为业主或经理），而他们在大小企业中（同样作为业主或经理）的比例却大大高于德国人（52 比 32； 只有 34%是工人和熟练工人，而德国人占 138%；此外，在贸易领域，这一比例更有利于他们（每千人中，133 人是业主或经理，而德国人只占 9.7%；每千人中，110 人是中层员工 ，而德国人只有 14%）；他们最终在金融系统中也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在这个系统中，他们（仅占人口的百分之一）拥有的监事会职位是德国人的 44.5 倍，董事职位是德国人的 24 倍，而德国人的人数是他们的 99 倍。正是在这里，在资本主义最真实的领域，Sombart 关于资本主义和犹太教是同一事物的断言得到了最明确的证明。

Sombart 非常正确地谈到了犹太教，而不仅仅是犹太教！对于犹太民族来说，这个人口只有 1500 万，几千年前就已经崇拜金牛犊的民族，一直懂得如何从其他阵营招募辅助力量。巴尔马特事件绝非当代现象。犹太人的黄金在过去也发挥了作用，此外还有他们较轻的良心、话语和女人。根据《圣经》记载，亚伯拉罕为了获得商业利益而利用他的妻子撒拉；雅各利用困境，买下了以扫的出生权；根据《圣经》记载，迦南人和亚摩利人、基特隆和纳哈洛尔的居民以及伯示麦和伯亚纳的居民都成了“附庸”。

为什么犹太人能轻易获得金钱，又为什么他们能如此巧妙地使用金钱？因为他的整个人生都是没有灵魂的，因为他纯粹是为了获取金钱而活着。瓦赫蒙德教授在他出色的著作《游牧法则》中为我们提供了答案：犹太人不是耕种者，从来都不是——这也是为什么巴勒斯坦工程注定要失败的原因——但犹太人一直是游牧民族，而且永远都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因此——正如 Sombart 正确指出的那样——他与东道国社会之间存在种姓般的隔离，因此犹太人区作为“被选者”的特权而诞生。犹太人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在《性与性格》中断然否认犹太民族有灵魂，并宣称“犹太人的一神论与对上帝的真正信仰无关”。卡尔·马克思在回答犹太人世俗基础的问题时说，这是“实际需要，自我利益”；在他看来，犹太人的世俗之神是“金钱”。因此，我在《民族社会主义》一书中将犹太精神描述为“最无耻的自私和最卑劣

的利己主义”时，一点也没说错。我还警告人们警惕“犹太化”的威胁，理查德·瓦格纳也曾提到过这一点，他将犹太人描述为“人类衰落的可塑恶魔”，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则在他那部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著作《西方的衰落》中，尽管是无意识地，也提到了这一点。西方文化的衰落是如何产生的，这种衰落的第一批迹象正在四处浮现，发出警告？通过过去所有文化中出现的相同过程，这种过程以纯粹功利主义原则的过度发展为特征。**金钱统治一直是衰败的先兆！因此，资本主义的问题绝非纯粹的经济问题，因此不能通过纯粹的经济手段来解决。与所有重要问题一样，资本主义问题首先是一个精神和心理问题。**我完全可以作为一个资本主义者思考问题，而不必拥有一枚铜钱，即不必成为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或受“犹太精神”的驱使。

仅凭经济改革计划无法使西方文化圈中勤劳而富有生产力的民族（Völker）摆脱资本主义的罪恶，资本主义意味着精神和肉体的奴役、心理的堕落以及民族（Volk）的堕落和退化，而只有彻底摒弃资本主义——或者说是犹太——精神才能实现。因此，理想主义而非唯物主义才是伟大的目标，做一件事是为了它本身，而不是为了预期的利益。只有一种新的世界观——或者更确切地说，回归我们祖先的世界观——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以民族社会主义为代表，其象征是古老的雅利安人十字记号！[Swastika]通过这个象征，创造性的的人类能够战胜贪婪的游牧民族！

民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戈特弗里德-费德

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内，道德和国民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否则，经济就会遭受最严重的损失，尤其是在每个经济体最光荣的任务——满足需求方面。没有对商业的信心，没有勤劳，没有官员和工人的忠诚，任何工作都不可能繁荣。效率、公正、企业家精神、活力、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一切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承认其特殊意义的。每一个在过去和现在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知道，今天这些美好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是缺乏的。马克思主义的救世学说及其运作方法、罢工、破坏、疏忽和怠工最终会给谁带来损害？归根结底，只有人民自己，因为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人民失去了所有的集体感，并把自己最重要的工作看作是阶级斗争。因此，民族主义阵营发出的抱怨声也必须针对这部分人，这些抱怨声说我们不再是一个民族，如果我们想重新获得失去的权力地位和国际地位，我们首先应该再次成为一个民族。

这些抱怨是有道理的，但抱怨并不意味着前进。马克思主义在有能力实现其经济和政治理想时毫不犹豫地付诸实践，它不回避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残酷镇压：在俄国，它通过屠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保护专政的法律，让它的敌人永远保持沉默，所以我们和共产党人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在做斗争，但我们不是为了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不是为了利用所获得的权力地位来反对某个阶级，而是为了在民族同志中创造经济和平的先决条件。实现需求的满足是国民经济的任务，而不是盈利，因为盈利在今天的商品生产中几乎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民族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态度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观念截然相反。首先生产的不是必需品，而是有利可图的东西。任何不能保证产生足够利息和红利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会被采用。作为当前利益资本主义经济的疯狂盈利性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对住房有可怕

的需求——因此尽管有最迫切的需求——但住房建设却因为无利可图而根本没有进行！从更高的国家政治角度来看，住房建设确实是有利可图的，这一点在此无需多言，从上文特别是关于国家的社会任务的论述中可以一目了然。此外，如果人民挨饿受冻，那么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自己有责任通过生产价廉物美的鞋子、衣服和内衣等来满足这种需要，因为在人民购买力下降的情况下，这是不"有利可图"的。另一方面，各个领域的奢侈品行业却忙得不可开交，因为从未像今天这样，毫不费力就能获得的财富如此热衷于用纯粹的奢华来包围自己。但是，资本主义的 "盈利 "观念，在今天统治一切的经济部门，在银行和证券交易系统中，实际上成了经济学上的无稽之谈。银行的统治地位最突出地证明了资本主义思想在经济上的无意义性。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产品"从未让一个孩子吃饱过，从未让一个受冻的人穿暖过，甚至从未满足过生活所需的最小需求。这句话根本不是什么蛊惑人心的套话，它甚至不能负担得起满足所有民族社会成员的生活必需品。这货币交易机构的可有可无性，它只是清楚地表明，在真正的国民经济需求满足（如民族社会主义的愿望）与完全以私人资本主义为导向的以利润为基础的经济之间，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异。

即使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拥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但它们将不再是国民经济的统治者，而是国民经济的仆人，货币将不再是国家和人民的主宰，而只是商品交换的必要辅助工具。我们清楚地知道，这场与银行和证券交易所资本的斗争将意味着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最艰苦的战斗，因为今天全球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力量都集中在银行和证券交易所资本身上。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权力争夺战，对手比我们的大多数朋友和追随者都更清楚这一点。这场战斗将变得更加艰难，因为整个人口阶层仍然陷于疯狂的盈利行为之中。这里需要再次明确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民族社会主义与财产的基本关系。从第一章的基本观点来看，特别是从第一章所描述的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来看，民族社会主义的结果自然是对财产的根本承认。这种对私有财产的承认在雅利安人的生活中根深蒂固。有创造力的人认识环境，思考环境以创造和形成自己的世界；有创造力的人通过辛勤劳动从土地上收获果实，定居下来，为自己建造家园和城市；有创造力的人定居下来，扎根于他的亲属、他的种族同志的圈子、在这样一个扎根于土地的基础上，继续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迈进，在哲学、诗歌、音乐、艺术和雕塑等领域，为自己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知识世界的人——这个人的想法肯定不会不同，因为他的双手所创造出的作品也是他的财产。从这种对创造者的认识中产生了

这直接引出了对他人财产的尊重，法律也由此产生。

与创造性思维根本对立和不可调和的是其他一些人的贪婪的盗贼思维，他们从不知道创造的气息，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躁动不安，他们从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扎根，他们不是从土壤中广阔地崛起，在漫长的发展中不断向更高的文化迈进，而是带着他们躁动不安的思维和他们的金钱，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当他们 "放牧"了个别的城市或土地之后。我们知道犹太人不是农民，不是商人，不是工程师或建筑大师，也不是工厂工人和雇佣工人，即使在美术和科学领域，真正的创造性天才对他来说也是陌生的。只有在作品被创造之手创造出来、物品被生产出来的地方，活动的头脑才会开始其特有的活动，在那里，贪婪的头脑才知道要为自己购买这些物品，并使它们为自己的金钱利益服务。它不是为了满足国民经济的需求，而是为了从生产到消费的

这一过程中为自己攫取尽可能高的利润，因此它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商人应运而生。如今，贸易商和货币兑换商已成为董事会和银行业巨头。整个世界的经济以最无厘头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聪明、有创造力、大胆、有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头脑不再主宰一切；没有自己的创造能力、剥削和贪婪的邪恶头脑主宰一切。金钱凌驾于劳动和鲜血之上。

犹太人动人的心灵能够让一切国际资本甚至通过抵押贷款将土地、通过匿名化和股份公司将历史悠久的最大工业、通过国家债券经济将政府与人民分离开来。如今，各国政府都依赖于庞大的借贷资本，相对于本国人民而言，它们只是华尔街、伦敦金融城和巴黎匿名领主的收息人。这些简短的观察向我们揭示了创造性民族与贪婪的犹太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的最深刻的秘密。雅利安人创造世界，犹太人为自己攫取世界"。

在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补充一点，财产和占有之间存在着非常细微的差别。占有不一定是财产，占有也不可能是自己创造的。在占有的情况下，占有的来源是不容置疑的。犹太人攫取了雅利安人的财产，现在通过他的财力统治着这些创造者。这种以法定债权、债券、抵押等形式出现的抽象化财产形式，使当今整个世界都通过利息受制于资本。利息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一般不限制占有，它使整个国家的所有劳动都成为少数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巨头的利息。

针对这种并不可怕的利益资本主义强盗经济，民族社会主义规定了对财产权的限制。这种限制的原则在于一句话： "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此外，这一财产限制还可以提高到很高的程度，这是因为，即使是最大的工业工程，只要它们仍然属于创造者的私人所有（我们想到了克虏伯、曼内斯曼、蒂森等），民族社会主义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拒绝它们。特别是当这些大型企业的所有者对社会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并能够在适当的生产自利、适当的销售定价和满足国民经济需求之间找到适当的界限，以及让劳动力以相应的、有价值的形式参与企业收益时，民族社会主义就更不会把它们视为与整体利益相抵触。

在此，我们简要谈谈对外部生产形式的基本看法。战前，德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得益于大、中、小型企业的幸运结合。现在，一般来说，大企业的趋势确实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危险——"在大企业的脚下就是小企业. "。
这不再是为满足需求服务，而是为支配市场和价格独裁的资本主义利益服务。尽管如此，某些工业只有作为大企业才能运作，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适用于我们通常称之为重工业的那些工业部门。理想要求有尽可能多的经济上自由的人存在于中小型企业中。我们知道，只有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工作和工作收入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认真负责的态度，只有在这种土壤上才会产生强大的人格，只有在自由和负责任的土壤上才会产生群体意识，这种意识把那些通过共同工作而结合在一起的人团结在一个生活和命运的共同体中，从而使他们成为一个自由的、有自我意识的民族。只有在这样的土壤上，个人的福祉才能与整体的福祉结合起来。

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原理

戈特弗里德 费德

1. 经济的目的和精神

国民经济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所有民族同志提供食物、住房和衣服方面的三种必需品，除此之外，还要根据当时的技术状况和收入条件，满足文化和文明方面的各种需要。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人民群众有机体中的一个服务体；最理想来说，它是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和民族的福利服务的。一个民族的经济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不是为了让个别商业领袖以牺牲官员、雇员和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致富，更不是被“黄金国际”剥削的奴隶。

2. 经济形式经济有三种可能的方向：

1. 没有任何障碍的自由经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

2. 管制的、约束的、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

3. 社团化结构的、真正的国民经济（普遍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几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它产生的剥削方式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的非人化和堕落；它导致长期的经济斗争，而国家本身却无能为力，只能坐视不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形式管制、约束和计划，即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导致了最强大的经济因素——生产性的消除。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成果会萎缩和下降。只有有机结构的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把生产性人格从资本主义剥削和马克思主义的同质化中解放出来，[生产性人格]才能在国家的不懈帮助下，成为全体人民真正幸福的来源。

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阶级冲突分裂必须由民族社会主义的理念来弥合：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每个人才能为他的人民，因而也为自己做得最好。

3. 国家和经济

在自由主义时代，经济的有机管理被瓦解，国家和经济之间的激烈权力斗争随之而来。这种权力斗争可能导致两种潜在的结果：要么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利益战胜了国家，从而战胜了人民（利息——奴役）；要么是统治者为自己夺取了整个经济机器[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完全变成了经济机器，退化到了强迫劳动的水平，就像在俄罗斯一样。

民族社会主义将国家无条件地置于经济之上，因为国家作为民族的代表，作为国家权力、荣誉和威望的卫士，作为王国的扩张者[指的是给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各种荣誉称号之一]，国家决不能介入生产性经济，因为这样它很快就会被陷入个别部门的游说，不再能自由地关心整个公共利益。因此，关于国家与经济的关系，1. 国家对经济有监督权；如果国家的总体利益需要，国家有权通过治安、行政和财政政策[税收]措施进行干预。

4. 经济原则

生产性、创造性的工作，大脑和拳头的劳动，是所有经济学的基础。

因此，劳动在整个经济中应享有最重要的荣誉地位。财富、房产、各种物质产品的利润、货币、资本、房屋、工厂、生产资料、机器、建筑用地和农田——这些都是生产劳动的成果。未来国家的最高职责将是维护生产性人格，保护劳动力不受剥削。所有的劳动都是有价值的，所有的劳动都必须产生它应有的回报。由此可见，勤奋和熟练的劳动所得，无论是通过耕种土地，还是通过工具和资产，都应予生产者的自由所有权和占有，并应受到正义和法律的保护。在知识产权方面也是如此。

民族社会主义承认私有财产是一个原则问题，并将其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但它把拥有财产的权利与对全体人民的道德责任联系起来。民族社会主义也承认继承权，因为对它来说，家庭是国家最重要的细胞。对劳动所得的权利不能被理解为有可能使产品的销售价值成为工资的基础。产品价格[它们的销售价格]必须包括原材料、机器磨损和更换、建筑物、手工劳动、商业和技术管理、社会和卫生设施，以及教育和培训、老人和病人的福利，以及国家机构能够促进和保障生产、司法行政、商业合同——是的，甚至是军备的生产费率，依次而已。

除了这种最普遍的私有财产形式外，集体主义财产自然也有可能以国家财产和公有财产、合作社财产或民法规定的法律实体财产的形式存在。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制度相比，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将使每个产业工人再次能够获得财产。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被剥夺财产的无产阶级应通过勤奋和能力获得财产。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是完全的公民，也是整个国家生产力的股东。

5. 劳动与资本

资本主义已经成功地完全征服了劳动，剥削了劳动并使其完全符合它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它把劳动和资本[货币]之间的自然和健康的关系几乎完全颠覆了。国家、城市和经济的现状说明了这种不健康的、甚至是致命的发展所带来的灾难。民族社会主义把这种状况称为：利息奴役。

专制贷款资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货币借贷形式；通过匿名化[将经济企业转化为股份制公司]，它早已剥夺了生产者的大部分潜在能力，并使经济从其最初的满足需求的功能过渡到纯粹的利润导向的立场。此外，金融资本还成功地将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完全转化为灾难性的贷款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德国和盟国之间的可怕条约[凡尔赛条约、道斯条约和扬格计划]标志着完成了金融对德国工人的利益支配。打破利息奴役是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决的经济政策中最大和最重要的问题。这是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关于 NSDAP 提出的措施的具体细节，在党的官方出版物中得到了全面的概述。在过渡时期，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将本着我众所周知的建议[建设和商业银行]等的精神，有节制地利用其创造货币的权利，以资助大型公共工程和住房建设。

6. 有机国民经济

民族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经济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连续的结构。今天普遍存在的交叉关系（工人、雇员、官员、企业家、辛迪加）导致经济被分割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之间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冲突。真正的经济要努力化解这些无机的交叉关系，在各个经济部门中促进雇主和雇员的合作，形成一个职业合作社的结构。

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它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是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从阶级阶级偏见的毒气中解放出来，并把所有忠实和负责任地参与生产过程的人导向民族劳动的共同目标。在广泛的自治的特许下，职业合作社必须对工资和休假进行管理；最重要的是，它们还必须努力唤醒职业荣誉，协调雇员和雇主之间的所有个人关系。这些职业合作社将被整合到地区、市级和省级合作社中，并将由帝国一级的中央机构领导。除了这些调节个人关系的职业法庭和财产法庭之外，还将建立经济法庭，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新事物，由独立人士组成，他们在经济中没有个人利益，也不依赖于

经济本身。经济法庭的任务是审查各个职业部门的重要性，并本着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精神对其进行监督。

这些经济机构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将是培育国内市场和仔细监督对外贸易，各经济机构将被整合到帝国经济委员会中，该委员会保障整个国家的总体利益，与个别经济部门的特殊利益斗争。例子：在 1925-1930 年期间，由于色彩鲜艳的女式长袜风靡全球，萨克森州的纺织业出现了异常繁荣的局面。与此同时，德国针织机制造商也在世界各地推销他们的经编机。对德国纺织业来说，每一台销往国外的针织机都意味着对德国纺织工人的竞争，以及失业、饥饿和苦难。第三帝国的经济委员会将承担起使这种相互竞争成为历史的责任；剥夺德国纺织工人的面包的针织机决不能出口。一个规模更大的现代例子是苏维埃俄国向德国工业发出的命令[罢工]，以便能够对德国经济发起可怕的斗争。

7. 贸易政策

民族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政策的格言是：凡是能够在德国种植或制造的产品，都不得从国外购买。这意味着保护德国的国家经济免受外国竞争。当今天德国为大约 40 亿人进口外国食品（小麦、大麦、水果、蔬菜、黄油、鸡蛋、奶酪、肉类等）时，这意味着德国农业内部的艰难，以及失业和德国国家财富的长期流失。(例如：进口冷冻肉)。同样令人气愤的是，超过 20 亿件成品（衣服、亚麻布、机械、汽车、钢铁制成品等）从国外进口到德国。一个购买昂贵的外国汽车的德国人，要为它支付大约 3000 马克的工资给外国工人。有能力做同样事情的德国工人将成为失业者，而德国的纳税人每购买一辆这样的汽车，就不得不再投入 2000 马克的失业补助。禁止进口多余的外国商品绝不意味着与外国和世界市场隔绝的愚蠢和不切实际，但正如外国在未来许多年里仍然需要高端、高质量的德国产品一样，我们仍然迫切需要对我们的加工工业绝对必要的原材料：羊毛、棉花、皮革、毛皮、矿物油、铁矿石等。

8. 过渡性措施

消除失业：民族社会主义在获得政治权力后，会发现德国的经济处于一种非常糟糕的状况。500 万失业大军要求重新融入生产过程；公共财政遭到破坏；彻底负债；人民的购买力和纳税能力被耗尽；国库空虚；农业、工业、商业和各种行业处于崩溃的边缘。此外，不负责任的制度、腐败和党派政治在低谷中觅食，我们的精神已经被阶级斗争的概念所污染。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有大量的清理工作和教育工作需要完成。提供工作和面包强制性劳动服务的实行将使大约 50 万德国民族同志摆脱失业的诅咒。对租房立法的必要改变，最初将采取的形式是，免除那些需要缴纳住房租金的人至少一半的纳税义务，只要他们提供其房产的收据，就可以获得豁免的金额。数十万人将逃脱饥饿，数十万人将重新融入经济生产中。在此之后，建筑业将通过促进建筑和定居部门，通过按照我的建议提供廉价[无息]信贷，以及通过建立社会建设和商业银行来找到就业机会。在国家的压力下，将对进口实行广泛的限制，将需求引向国内市场。农业将以最紧迫的方式，通过降息、债务重组、减税和提供廉价信贷，使其能够在德国本土生产进口的鸡蛋、水果、蔬菜、肉类、黄油等，并将它们推向市场。我们必须通过国内生产，成功地使至少 20 亿种进口食品成为多余的产品。这将使至少 100 万失业者重新回到生产中来。通过切断外国工业产品对德国国内市场的进口，也可以实现

同样的目标。而且，数十万人将再次因此在振兴的经济中找到工作。在财政政策领域，最有力的激励和救济将来自于降低高利率，首先是通过将帝国银行和其余的银行国有化的手段。房地产贷款的国有化和高息抵押贷款债券的转型将刺激住房和房地产市场的复兴。大银行的国有化——或者准确地说，将其置于政府管理之下——将为放松和释放经济中最广泛的部门的有息债务铺平道路。电力供应的国有化将导致电力成本的大幅降低，并将对整个生产产生振奋的影响。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还有一些重大的外交政策任务，这些任务只能在这里暗示一下，这些措施意味着国内市场的有力振兴：废除扬格计划，通过关税协议扩大我们的经济范围等。

积极的政策将保证恢复一个劳动与成就的德国，这个国家远离帝国主义目的，它的唯一任务是为德国人民保卫劳动和面包，坚守自由和荣誉。

牺牲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然而，犹太人根本不理解这一点。他的社会主义就是为自己牺牲他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斗争，直到胜利或最后一刻，从最深层意义上讲，是基督与马克思之间的斗争。”——约瑟夫·戈培尔

马克思（犹太人）：另类右翼的真正创始人？

当今许多左派和右派都不太了解民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严格指反对私有财产/商业、反对个人价值、反对宗教、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支持无产阶级、强制无神论、通过古拉格酷刑“揭露”和“再教育”异见者的理论。我们不参与当今极右翼的神经症，将极右翼以外的一切（例如普世宗教、非种族主义、非性别歧视、非同性恋恐惧症）抹黑为“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暴露了他们对冷战历史的无知。事实上，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上更为保守，因此生活在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们常常幻想资本主义国家是社会自由的天堂。将移民自由称为“共产主义”是不准确的，因为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国家甚至不允许本国公民离开，更不用说大量外国人定居了。将福利国家称为“共产主义”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共产主义会为所有有能力工作的人分配政府选择的全职工作。将 LGBT 主流化称为“共产主义”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共产主义者认为“同性恋”是资产阶级颓废的症状，并将“同性恋者”投入古拉格。而将对伊斯兰教的积极看法称为“共产主义”也是完全不准确的，因为伊斯兰教在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中都在与共产主义作斗争！

事实上，考虑到当今极右翼普遍赞赏铁幕，因为它保护了铁幕内的人们免受 20 世纪末在世界其他地方传播的反主流文化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当今的极右翼分子是最同情共产主义的。事实上，当今天的极右翼分子谈论“白人工人阶级”与“富二代”相比有多么男性化时，他们几乎把无产阶级和男性、资产阶级和非男性联系起来，就像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过去在宣传中所做的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自己在心理上比那些被错误地贴上“共产主义者”标签的人更接近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在“工人阶级”前面加上了“白人”，因为他们对“非白人”工人阶级没有同感。）

外部链接：马克思会把今天的左派分子排成一排，然后枪毙他们

列宁（犹太人）也是如此。

希特勒一直反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纳粹党最初成立时为了对抗的实践共产主义，是一种公开提倡阶级分裂的意识形态，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希特勒和纳粹党虽然也是社会主义者（“只有计划经济才能明智地利用所有人的力量。”– 阿道夫·希特勒），却鼓吹跨越阶级界限的团结，只消灭那些制造分裂的人（即共产党人自己）。纳粹党经常从当时德国的共产党内部招募成员，反之亦然。德国以外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米格尔·塞拉诺就是一名共产主义皈依者，后来皈依了民族社会主义。因此，最好将民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解为与资本主义相竞争的社会主义对立面，正如纳粹党嘲笑共产主义者的传单所指出的那样，传单标题为：“这是你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吗，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资本家会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更像共产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正如希特勒回忆的那样：“撒克逊资产阶级思想极其狭隘。这些人坚持认为我们只是共产党员。任何宣称群众享有社会平等权利的人都是布尔什维克！”希特勒的众多思想成就之一就是揭露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虚假二分法的两极，最终为犹太复国主义服务。

希特勒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公开嘲笑盟军的牵强附会；甚至在二战后期，他还在脑海中想象盟军领导人私下交谈时的滑稽画面：“如果丘吉尔去见斯大林，斯大林会撕开他的皮的！他会对丘吉尔说：‘因为你的克里普斯先生，我损失了一千万人！如果他闭嘴，德国人就不会进攻！’”

“我们的社会主义更加深刻……我们为什么要费力去社会化银行和工厂？我们社会化人类。”——阿道夫·希特勒

在强调我们与共产党人的区别的同时，我们确实接受“红色”一词作为我们自己的标签，因为这也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国旗的主要颜色（恰好是更深的色调）。

民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争论出发点是相同的：奴隶主是邪恶的。共产主义者的致命错误是认为奴隶主是邪恶的，因此奴隶一定是善良的。共产主义者无视所有真正的道德标准，而是根据被压迫的状况来分配优越性。相比之下，民族社会主义者意识到，如果有机会，大多数奴隶会立即高兴地成为新的奴隶主，因此并不比现任奴隶主更好（这并不是说这可以证明他们的奴役是正当的）。

“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真正的社会国家。上层社会无论何时何地都更倾向于‘你的就是我的’，而不是‘我的就是你的’。这些聪明人只能怪自己，因为下层社会充满愤怒，现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犹太人能够利用这两个群体。其中一个人负责自己的事情，另一个人负责完成。因此，我们反对他们。” – 阿道夫·希特勒

因此，民族社会主义者正在解决的问题比共产主义者更为复杂。共产主义者只是试图推翻现任奴隶主。民族社会主义者意识到，不仅必须推翻现任奴隶主，而且他的继任者也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沦为另一个奴隶主，这就要求他的意识形态解决人们性格的不同品质（包括遗传品质），而不是仅仅解决他们不同的人生命运——这是共产主义者的唯一关注点。虽然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都支持反殖民运动，但共产主义在所有情况下都简单地要求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充分的答案，而民族社会主义的逐案考虑包括重新发现前殖民贵族、促进特定土地特有的新文化方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在不撤离领土的情况下从殖民帝国转变为民粹帝国的可能性。

“如果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方式来发展民族的核心，从种族的角度来看，这是最有价值的……整个民族随后将享受最珍贵的礼物，即以真正高尚的方式形成的种族品质。”——阿道夫·希特勒

毒素存在于蘑菇内部，而不是在烹饪过程中添加的。

共产主义国家反对私有财产和枪支所有权，因为它甚至不能相信其人民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对私有财产或枪支所有权没有问题（事实上，它要求强制枪支所有权），因为它相信其人民是虔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希特勒如此嘲笑共产主义者：“即使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集体所有权的概念也有其局限性。裤子……被视为私有财产。”虽然两者都旨在鼓励对国家项目的贡献，但共产主义宣传通过降低个人相对于集体的重要性来实现这一点，而民族社会主义宣传则通过提升个人的重要性来实现这一点。我们再次看到共产主义者对其追随者不言而喻的不信任：它认为个人主义总是会导致自私，因此它的手段是让观众沉溺于集体主义。我们再次看到了民众心中不言而喻的民族社会主义信仰：它相信，通过告诉观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他们每个人都会不负这一鼓舞。

这是因为共产主义国家向其人民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在极端情况下，通过暴力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方法改变行为），无论其内在品质如何，都要接受共产主义，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则选择雅利安人作为其国民。即使是一个真正仁慈的共产主义国家，最终也必须监控和控制人们私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正常运作；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报复生育的人口暴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干涉私人事务。

差异在于思维过程。共产主义从“权利”的概念出发，通过假定每个人都有不被压迫的“权利”来解决压迫问题。民族社会主义从“义务”的概念出发，通过假定每个人都有不压迫他人的义务来解决压迫问题。因此，共产主义注重维护不尽职者的“权利”，而民族社会主义则注重培养尽职者，用希特勒的话来说：“除非在自己的人民中兴起，否则没有社会主义。”

不平等问题

“布尔什维克主义宣扬国际阶级冲突……民族社会主义旨在弥合和平衡社会生活中的不利对比，并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合作。”——阿道夫·希特勒

共产主义者和民族社会主义者对不平等的理解不同，其根源在于历史叙述。共产主义者将历史视为一系列行政改进：农奴制是对动产制的改进；资本主义是对农奴制的改进。因此，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仅仅是从不平等到平等的连续进步的最后阶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社会主义者将历史叙述为精神堕落的故事：农奴制比动产制更糟糕（因为农奴没有被公然视为财产，因此不太清楚自己被奴役）；资本主义比农奴制更糟糕（因为无产阶级在寻找工作时显然有选择权，因此更不清楚自己被奴役）。民族社会主义者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共产主义一定比资本主义更糟糕，因为共产主义的成功——被描绘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会使其臣民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奴役！另一方面，民族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为了与这种潮流作斗争——这种潮流不是朝着日益平等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日益奴役的方向发展（即无法承认奴隶制）。共产主义将带来最大限度和完全可持续的奴役状态，即所谓的“工人乌托邦”，这只是锡安的另一个名字。

“现代人当然不会‘支持’奴隶制；他们强烈谴责奴隶制。但他们仍然在实行奴隶制——而且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现代奴隶……不是公开买卖的。他们只是被一个庞大的非人性化系统所俘虏……既没有身体可以踢，也没有灵魂可以诅咒，也没有头脑可以为其恶作剧负责。”——萨维特丽·德维

民族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它对奴隶制的理解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共产主义将奴隶定义为消费少于生产的任何人（因此，共产主义的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际上是承认共产主义本身就涉及奴隶制!），而民族社会主义直观地将奴隶定义为缺乏自由意志或缺乏高尚品德的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共产主义在其论述中坚持非宗教信仰，而民族社会主义欢迎普世宗教来获得补充灵感，因为这些宗教通常劝诫人们自愿消费少于生产的，以便我们能够帮助受压迫的人，但并不（与共产主义不同）劝诫人们尽可能多地生产，而是建议只生产必需品。

“如果积极的基督教意味着爱邻居，即照顾病人、给穷人穿衣、给饥饿的人喂食、给口渴的人饮水，那么我们才是更积极的基督徒。”——阿道夫·希特勒

共产主义国家必须不断用未来繁荣的承诺诱惑人民，以说服他们忍受当前的困难，正如希特勒所解释的那样：“他们被许诺在世上会幸福（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基督教的一个特点）——但那是在未来。犹太人马尔多奇·马克思，就像一个善良的犹太人一样，在等待弥赛亚的到来。他将弥赛亚的概念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背景中，断言世间的幸福是几乎永无止境的进化过程的一个因素。他说：“幸福就在你们的掌握之中，我向你们保证。但你们必须让进化顺其自然，不要急于求成。”人类总是会落入这种似是而非的诡计中。”相比之下，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服其人民满足于更少的东西，甚至学会以雅利安人的节俭和简朴生活为精神上的骄傲。

共产主义的整个叙事都建立在物质主义的基础上，共产主义纲领不可避免地将“一无所有”与“富有”对立起来。相比之下，民族社会主义可以让人们相信，共同的精神目标比不同的物质资产更能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同时又不忘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通过诉诸内心的同情心（正如希特勒对冬季救助组织的描述：“……不可分割的团结，不仅在一切顺利时，而且在情况恶化时也是如此，不仅与幸运的人团结一致，而且与那些脚步不顺的人团结一致……”），民族社会主义通过自愿慈善重新分配财富，这对给予者和接受者来说都比共产主义通过武力所能实现的要令人满意得多。事实上，随着可供出售的奢侈消费品/服务范围大幅减少，以及在民族社会主义政府统治下投机性投资的彻底终止，将任何多余的钱捐给慈善机构将成为一个越来越自发的决定。纳粹党的一张宣传海报夸耀了该项目的惊人成功：“如果要运送 1933 年至 1935 年间冬季援助运动捐赠的 2.09 亿英担物资，这列火车必须长达 6,000 公里，从柏林一直延伸到亚的斯亚贝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践。”

服务而不卑躬屈膝

“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最真实的社会主义是相同的：为社区提供简单的服务精神。”——鲁道夫·赫斯

那些只想帮助有需要的人并为当地社区做出贡献的基层行善者，在第一次接触共产主义或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时，最有可能被它们强烈吸引，事实上，他们是这两种意识形态最优秀的步兵。　因此，我们反对共产主义，并不是反对那些至少乍一看更喜

欢共产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人的普遍令人钦佩的性格。我们的信息是，这些人没有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否则他们就会意识到，共产主义最终将远远不能满足他们为善的事业服务的愿望。这是因为所有理想主义的起源都是精神的，诠释都是个人的，目的都是超越的。共产主义在其整个意识形态表述中都严格限制于物质、非人格和存在，因此不可能是具有任何真正理想的头脑的产物，而是一个精于算计的牧民的创造物，他故意欺骗善意的人，并将他们拖入世俗的境地，用希特勒的话来说："犹太人巧妙地点燃了对社会正义的渴望，这是典型的雅利安人特征。一旦这种渴望活跃起来，它就会转变为对生活条件更幸运的人的仇恨。"在这方面，我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批评与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愤世嫉俗的批评完全不同。资本家只是不相信共产主义能够实现其物质目标；我们鄙视共产主义，因为它缺乏精神目标。

"无论我们依靠教义问答还是哲学，我们都保留了可能性，而它们凭借其纯粹唯物主义的概念，只能相互吞噬。"——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曾说：**"民族社会主义并不看重工人阶级纯理论的统治，而更看重的是他们生活条件的实际改善。"**这一点也许可以从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对艺术的不同态度中得到最好的体现。共产主义者认为艺术欣赏是资产阶级颓废的一种形式，是那些有太多空闲时间的人沉迷其中的，因此把有才华的艺术家投入古拉格，试图消灭社会对艺术的广泛兴趣。民族社会主义者认为艺术欣赏是提高情感敏感度、让人们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充满共同梦想的民族的最佳方式之一，因此招募有才华的艺术家加入我们的知识分子圈子，并试图让以前可能无法接触艺术的社会贫困阶层也能接触到艺术。

共产党人担心的直接目标，民族社会主义者同样担心。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没有人需要担心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没有人会挨饿或无家可归，每个需要生活工资的人都会得到国家提供的途径。但是，共产党人不担心的更高目标，民族社会主义者也担心。除了给人们经济保障之外，我们的重点仍然是提高人民本身的素质，通过高尚团结起来。一个不那么自私、更有同理心的社会，首先就不会那么倾向于花时间担心阶级差异，也不会追求比过简单生活所需的更多的财富，所以财富差距本来就很小。反过来，这个社会的组成个体会自发地为之感到自豪。

最后，与共产主义不同，民族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乌托邦意识形态，它不寻求创造并永久维持物质天堂。我们不仅没有兴趣投入精力去建立这样一个实体，而且即使它是以已经建好的盘子提供给我们，我们也会拒绝。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像共产党人那样理想主义，而是因为我们比共产党人更理想主义，以至于在我们眼中，所有物质存在——包括乌托邦物质存在——都只能是监禁，因为它仍然是我们从未选择过的存在。正如希特勒所说："我们绝不容忍任何攻击基督教思想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事实上，我们的运动是基督教的。"我们鄙视能够满足于物质天堂的共产主义者，就像我们鄙视能够满足于足够大笔赔偿金的强奸受害者一样。所有乌托邦主义都是享乐主义，所有享乐主义都是奴性的。相反，我们只寻求建立一个临时的堡垒，并从那里一心一意地完成超越物质存在的使命。

"国民"经济 戈特弗里德-费德

今天，在我们德国的大学里，我们不必追求 “无条件的 ”科学，但作为德国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人民进行思考和研究，用德国精神教育我们的思想和意志，以便我们能够作为领导者为我们的人民服务。如果我们贫穷的人民受到外国精神的诱惑，陷入了最可怕的政治和经济束缚，希望重新获得自由——哪个德国人不热切地希望如此——那么，学术界的任务正是熟悉我们今天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然而，德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是由各种极端、专家和幻想家组成的，他们闷头苦思，肆无忌惮地冲向未来，在历史学上唯心，在哲学上专断，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满足于无限的遐想，为一种思想而英勇奋斗，他们不适合正确而重要地看待当前的事物，也不适合将它们融入世界的整体图景之中。因此，德国人孜孜不倦地研究，因此，他在自己的领域成为专家，并取得了卓越成就——当祖国召唤他时，他又欣然为祖国献出生命和鲜血——但奇怪的是，祖国必须始终召唤他，那种与自己的人民永久联系在一起的感觉，在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德国人的日常工作和研究中，都处于休眠状态，在这里，民族与个人之间始终存在的重要相互关系缺失了。然而——“祖国每天都在召唤!”鲁登道夫最近对一个爱国组织代表团说。

祖国的呼唤必须是鲜活的、清醒的，尤其是在我们的青年学生身上，他们不能把科学本身视为目的，不能只从谋生的角度出发，而必须时刻牢记民族和祖国，在学习期间始终把自己的考虑延伸到超个人的层面。我们的大学师生绝不能忘记人民的福祉。只有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我们的大学才会涌现出能够带领我们的人民摆脱耻辱、苦难和奴役，走向美好未来的领导者。只有这样，国家的上层知识分子才能重新找回与人民之间失去的联系。现在，有一个科学分支尤其失去了与人民的这种联系，这种缺失更加明显，因为这个科学分支的研究领域正是人民的日常生活——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的未来弟子和教师将这个外来词翻译为 “经济学”，尽管翻译为 “国民经济 ”更为正确。

当然，厚厚的国民经济学教科书上写的东西与人民和人民的经济、人民的需求和困难关系不大。这些著作中充斥着对经济问题的枯燥抽象和定义，充斥着无穷无尽的历史压舱石——这绝不是要否认它们的 “科学性”——但却无处感受到人民生活和劳动的鲜活气息，无处考虑从经济现象中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最重要的是是否符合整体利益。国民经济方面更没有尝试创造性地利用所获得的知识，找到新的方法来说明我们的经济中普遍存在哪些基本错误，以及如何避免这些错误。因此，那些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学领袖和经济学思想家的人，在实践和创造方面都具有开创性，他们提出经济学到底是否配得上科学这一光荣称号的问题，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无论是对过去的经济状况进行报道的编年史家，还是对现在的经济状况进行描述的记者，都没有理由自称是一门科学的代表。

只有当国民经济学从当前的国民经济条件出发，结合过去的研究条件，确定了广泛的基本路线，批判性地研究和检验了这些条件的驱动因素，从中认识到犯了哪些错误，尤其是哪些弊端，国民经济学才会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必须以一种唯一可能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即经济现象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的，而不仅仅是为个人发财致富服务的。但这还不够，国民经济还必须说明必须如何组织整个经济，使其能够最好地完成任务，满足被历史、命运和血缘联系在一起的民族的多方面需求。只有当国民经济学

能够回答在所有关于当代问题的大规模讨论中都必须提出的三重重大问题时，它才能被公认为是一门被要求成为领导者和培养领导者的完整科学。这三重问题是：形势如何？是如何形成的？现在怎么办？在此，我们不妨就当前经济科学的总体方向提出这三重问题。提出问题： 国民经济学的这种现状是为谁服务的，谁是这门学科的主要教师，这种现状难道不是在为目前的经济统治势力服务吗？尽管我们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纯粹德国式的观点，但我们并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些问题，而只是想从目前的经济结构是否服务于或能够服务于整体利益这一纯粹客观的角度来审视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方向。国民经济的任务是满足需求。

乍一看，将这一不言而喻的事实具体描述为国民经济的任务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天生敏感的人不会想到，今天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方向可能完全不同，那就是盈利。而我们整个经济的这一基本特征正是当今经济管理的特点。决定生产的主要因素不是必要的经济需求，而是盈利能力。这就是今天决定一切的不再是全体人民的福利，而是大贷方资本利益的自然结果。今天，在各个经济领域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从迫切需要的角度出发，而主要是从投资于此类企业的资金能否获得丰厚回报的角度出发。大规模借贷资本的决策只取决于预期的收益率——无论这些租金是来自生产性企业，还是来自电影院公司，还是来自完全非生产性的信贷机构，还是来自违背整体利益的企业，如相当于经济高利贷并从人为造成的食品和消费品稀缺中攫取暴利的辛迪加和托拉斯——这对敛财者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在人民忍饥挨饿、最可怕的经济危机几乎使健康的生产性经济陷于停顿的同时，没有什么比银行系统的巨大发展更能说明这一经济上的杀人事实了。

在德国的中世纪，手工艺、建筑、雕塑和绘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仍然惊叹地站在那个时代的见证者面前——圣斯蒂芬大教堂和科隆明斯特教堂、纽伦堡的艺术珍品告诉我们这一点——帝国城市的市民是自由和自豪的——但货币交易却是犹太人的不诚实交易。今天，手工艺彻底衰落，不得不为机器时代最平庸的媚俗让路，艺术和科学都在追逐面包，不忠于其最神圣的任务，即独立于纯粹经济活动的权宜之计而创造天才的作品，人类的去神化和物质化正在迅速发展，但银行却蓬勃发展，像温雨后的霉菌一样从地下生长出来。如今，货币交易本身已成为一种目的，只关注借贷资本的盈利。信贷的经济目的已经变成了它的反面。诚实的银行和货币经纪业务的重要任务是将储蓄借给忠实的人，通过增加货币资源来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增加生产和需求，但现在这种业务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大银行网络，如今它们以独裁的方式完全支配着经济，哪些行业可以经营，哪些行业可以经营，完全取决于它们。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早已陷入贫困和被淘汰，中型企业完全依赖于银行，即使是大型工业，在公共有限公司这种纯粹的高利息资本主义形式下，首先也只是为了提高银行利息。再也没有一家大公司的监事会不是由大银行的代表担任领导职务，再也没有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的内在价值不是以股票的形式交付给证券交易所。

今天，决定经济走向的不是劳动，不是头脑和双手的创造力；货币——这一生产商品的工具——不再是经济的仆人，而是它的主人；不再是主人和工匠，不再是工程师和工厂主享受他们的组织和技术劳动成果——而是股东和监事会不费吹灰之力、不辞

辛劳地攫取利润。股东通常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钱究竟在哪家公司 “工作”，他们根据价目表或银行家的推荐任意购买股票。借贷资本只遵循一条法则，即利息法则。盈利是唯一的、压倒一切的原则。需求的满足只是次要的，而且只有在这种国民经济最内在的需要和任务成为剩余价值的驱动力和创造者的情况下，剩余价值才会以不可抗拒的吸力从创造民族的经济体内抽出，流入超国家货币势力深不可测的巨口。饥饿越大，需求越大，全球资本的获利能力就越强，利益就越大。土壤结出的果实越丰硕，普遍和公共福利就越好，经济主体本身的劳动收益就越高，对贷款（即举债）的需求就越低，利率就越低。

因此，今天有两种经济形式相互对立，它们是根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一种是利息资本主义经济，另一种是覆盖需求的健康的、自然的无息经济。我们还必须简要地提及第三种经济形式——共产主义经济形式。两个极端——高度资本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经济——从长远来看都会破坏任何满足需求的健康经济，因为它们都会破坏人格自由、创造力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这些问题极其严重和困难；它们远远超出了狭隘的经济领域，涉及到最终的精神和民族问题。我们的学术界青年要在这场衰落的西方国家的斗争中高举旗帜，为苦难的人类摆脱利益束缚和道德沦丧，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而奋斗，在这样的未来中，保卫祖国和人民的民族观念和自豪感将与所有同胞的经济和文化团结的社会观念结合在一起。

NSDAP 的紧急经济计划　格雷戈尔-施特拉瑟

A. 创造就业机会的理由

1. 失业导致贫穷，就业创造繁荣。

正如个人在不再有工作时陷入贫困一样，当整个民族不利用其生产力量，并容忍一种阻碍人们愿意并能够工作养活自己的同志的政治经济制度时，也必须陷入贫困。

2. 资本不创造就业，而是就业创造资本。

聪明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我们不能工作是因为我们缺乏手段。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们工作越少，我们的手段就越少，我们国家资源的非生产性浪费和破坏就越大。我们工作越多，我们的资本就越大，因此我们的劳动成果也越大。**

3. 失业救济金给经济带来负担，但创造就业机会却能刺激经济。忍受失业意味着：

1. 劳动力少了，生产的东西就少了，因此可以消费的东西也少了。其结果是：饥饿、贫穷和减薪。

2. 工作的人越少，交税的人就越少，因此，为了获得同样的税收，个人必须承担更重的负担。其结果是：增税。

3. 购买力的下降和税收的增加迫使更多的公司破产。其结果是：失业率上升。失业者必须得到社会的支持，这意味着公共开支的增加。结果：公共财政崩溃，尽管税收增加。

4. 对失业基金的捐款减少了，而贫困迫使更多的人依赖它。其结果是：失业补偿制度崩溃，尽管缴费增加，福利削减。

5. 私营企业在增加的负担下崩溃了。小公司破产了。独立的人被毁了。大的资本主义公司、信托公司等被国家拯救，因为它们的崩溃会使数十万人陷入贫困。数十亿

用于拯救银行，数亿用于支持大型工业和航运企业。所有这些牺牲都是无用的。只要没有彻底的改变，失业、贫困和赤字就会越来越严重，总体情况就会越来越无望。只有一个创造就业的系统方案才能带来这种变化。如果公共手段不再被浪费，而是被用来创造就业机会，我们的劳动将不再被浪费，而是被有效利用，这将导致各方面的改善：生产的增加，购买力的提高，税收的减少，经济的普遍改善。今天我们正在浪费我们的资源，但这项政策将导致新资本的形成。民族社会主义将确保这种新资本完全属于那些通过劳动和牺牲创造了它的人。

4. 劳动人民不能满足于微薄的失业津贴。

劳动人民要求获得工作的权利。容忍失业意味着粗暴地剥夺了生产者同志的权利。他被剥夺了以自己的努力谋生的自由。他被剥夺了养活自己的能力，而被迫依靠可怜的公共支持，这种支持不断被削减。劳动人民不想为了这几分钱而出卖自己的生命权，而是要求获得工作的权利。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站在为劳动人民争取权利的最前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第一个宣布这一权利的人，并且提出了创造就业的方案。

B. 创造就业的方法

1. 我们有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生产能力。

对创造就业的最愚蠢的反对意见是声称我们缺乏生产能力。我们有足够的土地来生产更多的粮食（见 C 节）。我们有矿井，可以生产更多的煤和矿石。我们有水力发电，可以生产更多的电力。我们有必要的机器和工厂来生产我们能想到的任何东西。然而，今天，土地没有被耕种，矿场关闭，工厂关门，机器生锈。我们的经济不景气，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生产能力，而是因为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被利用。

2. 我们有增加工作的市场。

只要最后一个德国民族同志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德国生产的市场就必须存在。今天，有 600 万民族同志失业了。他们在挨饿，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遭受着最痛苦的贫困。而今天有多少其他的民族同志拥有他们所需要的生活？面对痛苦的贫困，资本主义报刊却敢于写生产过剩。事实恰恰相反。今天德国的生产远远低于我们人民的需要。因此，它可以大大增加。

3. 这些市场只在国内提供如果德国经济要完成其真正的任务——满足德国人民的需求——就会有大量的机会，而这些机会今天还没有得到满足。以前的经济政策首先旨在增加德国的出口，为了我们在世界市场上完成的能力，这扰乱了国内市场。（例如，对工资的压力，对国内生产的保护不足以抵御来自国外的竞争）。这种经济政策已经完全失败了。尽管作出了种种努力，德国的出口从 1927 年的月平均 12 亿马克下降到 1932 年头五个月的 5.069 亿马克。目前的制度在摧毁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地位。

4. 创造就业机会需要将德国经济的重点重新放在国内市场上以往经济政策的结果证明，所有增加出口的努力都没有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加，而只是增加了失业。因此，我们必须在可以找到的地方，即在国内市场上寻求增加销售。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国内生产的保护（见 F1 节），因为否则外国竞争者的倾销价格将使我们的产品无法在国内市场上销售。

5. 注重国内市场需要增加农业生产虽然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满足德国需求的需要，但我们的农业今天还不能生产德国人民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在几年内，德国的土壤可以得到改善，其种植也可以得到加强，这样德国就可以不依赖外国食品了（见 C 节）。

6. 对国内市场的关注必须导致德国工人的社会解放只有当广大人民群众有足够的购买力来吸收增加的生产时，德国经济重新聚焦于国内市场才能成功。反过来，只有当每个德国人都有工作的权利，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与他的成就相称的体面收入时，这才能实现。这些都是解放工人的基础。而将经济重心重新放在国内市场上，将自动减少资本的影响，因为随着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增加，大型资本家的重要性将减少。鉴于德国目前的情况，农业生产不可能通过扩大大型企业来扩大，而只能通过加强独立的中小农户。这将为帮助贫困工人获得自己的家园提供机会和必要条件——这是使劳动人民去无产阶级化的又一步骤。

7. 需要做什么必须采取以下步骤，使德国经济重新聚焦于国内市场：通过土地开垦促进德国土壤的产力（见 C 节）。为工人建造带有单户住宅的楼盘，以促进劳动人民的去无产阶级化，加强工人的购买力，并鼓励减少工业工作时长（见 D 节）。建设公路、运河等，以支持国内的商品交换，使人们在东部定居，并放松对大城市的控制。全面资助生产，促进私营工业。8. 只有国家才能完成这些任务今天，失业对公共财政造成的负担阻碍了任何促进新工作和生产设施的尝试，也就是任何私营工业的增长。只有通过一个慷慨的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才能实现经济繁荣，这也将调整经济结构。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任务。

C. 土地开垦

1. 必要的土地开垦工作的范围

a) 排除土地：850 万公顷。每公顷增产 80 马克，即共 6.8 亿马克

b) 马林草场和田地：200 万公顷。这将使每公顷的产量增加 50 马克，即 1 亿马克

c) 可耕种的荒地：1,900,000 公顷，每公顷增产 300 马克，或 570,000,000 马克

d) 可耕种的荒地：600,000 公顷，每公顷增产 200 马克，即 1.2 亿马克

e) 重新分配需要改良的土地：500 万公顷，增产 25%至 50%，或至少 5 亿马克

f) 通过控制河流、水坝和堤坝获得的土地：尚未确定

2. 工作的效益和成本上述 a-e 项的增产总额约为 20 亿马克。据德国土地开垦协会估计，成本约为 85 亿马克，不包括土地重新分配费用。假设土地再分配、水坝和堤坝的费用再增加 15 亿马克，总费用约为 100 亿马克，从而使每年的生产力至少增加 20 亿马克。

D. 工人住房 1. 作为住所的私人住宅与食物和衣服一样，住房也是生活的必需品之一。

今天，大多数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并不是住在体面的公寓里，而是住在没有光线和新鲜空气的可怕的封闭式住所里。从大城市的总体健康状况和出生率的下降可以看出这种公寓对人们的恶劣影响，这些都远远低于平均水平。死亡的人数超过了出生的人数。如果人们不不断迁入，大城市就会消亡。由于军事原因（空袭、毒气），扩大大城市是不可能的。

反对意见：我们今天已经有太多的公寓了。回应：这种错误的印象是由普遍的经济危机造成的。事实上，我们有太少令人满意的住宅。一旦失业率下降，人们可以再次

支付更好的住房，这一点就会变得非常明显。唯一可能因建造独栋房屋的定居点而受到伤害的人是那些通过出租最糟糕和最不愉快的贫民窟而获利的公寓业主。

反对意见 2：房主的产品会损害农贸市场。回应：房主不会出售他们的产品，而是通常消费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农民很少直接卖给工人。但是，即使销售量略有下降，也会通过增加对房主的幼苗、种子等的销售而得到十倍的弥补。

反对意见 3：布吕宁的政府在城市边缘的住房安置方面完全失败了。回应：这是事实，但我们的计划与布吕宁的完全不同。新的私人住宅不会像布吕宁的系统计划的那样是狗窝，而是坚实的、有用的住宅，业主将在其中获得快乐。此外，布吕宁的住房发展肯定会受到威胁，因为他减少了失业金，而定居者没有能力从他们的小块土地上养活自己。民族社会主义的住房发展将受益于经济的普遍改善，这将保证房主有工作（通常是兼职）。这种农产品将是一种额外的资源，而不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

3. 个人住宅的建筑定居点每个愿意并有能力购买单户住宅的工人将得到政府 40%的补助金。如果他有工作，他可以从国家银行借到剩下的钱，这将保证有利的条件和快速的决定。如果他没有工作，他将因为帮助建造定居点而获得报酬（建筑项目越大，非技术工人的数量就越多）。他的工资的一个百分比将用于购买一户人家的房子。条件将至少与第一组人一样优惠。该计划是每年建造 40 万套私人住宅。这将为一百万人提供就业机会。

E. 财务

1. 为创造公共就业提供资金随着新工作的创造，失业和福利支付将减少，税收和社会保障缴款将增加。

这些节省和增加的费用将至少涵盖总成本的 50%。平均而言，75%的成本将用于工资，25%用于工厂和材料成本（尽可能多的材料成本被列为工资），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将有以下的节约和收入增加：为失业者节省开支；办公室和城镇支付的失业支助费为工资的 33%，或总成本的 25%。社会保障的收入增加：工资的 16%，或总成本的 12%。增加的税收：占总成本的 15%。这些钱可用于创造就业计划。国家不必在实施后要求偿还这些钱，因为即使不实施创造就业计划，这些资金也会被花掉。因此，那些受益者，或购买私人住宅的人，可以很容易地得到 40%的补贴。这将鼓励他们自己筹集其余的资金，因此将有助于为创造就业提供资金。

当然，他们不可能立即筹集到全部资金，但可以合理地假设他们可以提供总成本的 20%至 30%，因为总成本的 50%将来自政府的储蓄和增加的收入，总成本的 70%至 80%将很快偿清。剩余的 20%到 30%可以通过信贷来融资。这种有限的信贷增长对我们的货币稳定没有危险。

2. 资助生产民族社会主义的创造就业计划将促进人民的繁荣和购买力，经济上将再度复苏，订单也会节节攀高。

由于这些增长将是渐进的，因此需要采取临时措施来鼓励生产。这将涉及为制造需求量大且可储存的标准产品提供信贷。这些产品包括粮食、化肥、煤炭、金属等，这些产品将获得补助，条件是这些产品必须以规定的价格出售，并且必须雇用大量的新工人。生产会立即增加，并给工人带来工作和富足。对我国货币的有害影响不会发生，因为：1. 产品可能不会以高于允许的价格出售、

2. 贷款将随着产品的销售而被偿还。

F. 商业和财政措施

1. 对外贸易目前的情况从去年年中开始，外国开始有计划地扼杀德国的出口。

其结果是，在 1932 年的前四个月中，德国的出口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约 35%，超过了三分之一，而同期德国的进口则下降了约 8%。外国对德国经济的这种攻击，使我们的状况大大恶化了。现在是采取防御性措施来拯救我们的经济的时候了。我们贸易政策的指导方针我们的对外贸易政策必须遵循以下准则：

1. 战后政府的赔款政策使德国成为最贫穷的文明国家之一。[注：根据美国华盛顿官方经济研究所的估计，德国迄今已向战胜国支付了 380 亿马克的赔款。根据德国人的估计，如果包括对鲁尔区的占领和对我国工业的拆解，总额为 675 亿马克。这笔巨款还不包括我们失去的土地的价值，也不包括我们殖民地的价值。据估计，仅殖民地的价值就有 800 至 1000 亿马克。它也不包括任意肢解德国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伤害和损失。此外，为了支付赔款，德国承担了 103 亿马克的私人外债，它还必须在赔款之外偿还这些债务。] 如果将来接受与外国的国际收支负数，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浪费。德国人民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接受其他民族的剩余生产。

2. 我们应该努力生产我们有能力生产的东西。而德国人民是被迫[像上面]这样做的。

3. 民族社会主义要求德国工人的需求不再由外国劳工支撑。民族社会主义决心消除德国工人和德国农民的文化水平之间的障碍。因此，当进口限制的结果将是德国工人或德国农民的工作时，就必须实施进口限制。民族社会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相反，它要求保护每个民族同志免受外国竞争。

4. 战前，德国是大国之一。今天，它是一个二等国家。它的原材料主要来自国外，且通往这些国家的运输路线可以立即被切断，因为德国没有能力维持和保护通往这些原材料来源的路线。

因此，民族社会主义政策的指导方针是尽可能用自己的生产来满足德国人民的需要，从友好的欧洲国家获得超过国内生产的数量，特别是如果它们愿意接受德国的工业产品作为付款。执行这些措施将是对外经济关系办公室（对外贸易办公室和外汇办公室）的任务。

反对意见：德国出口的下降只是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果。回应：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他国家的出口在 1932 年前四个月也会下降 35%。然而，英国的出口只下降了 8%。

反对意见 2：减少进口将减少德国的出口，从而导致失业增加。回应：德国的出口不会因为德国进口的减少而减少，因为我们将主要减少从那些进口多于出口的国家的进口，那些与我们有负国际收支的国家。根据帝国官方统计局的数据，1932 年第一季度，德国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内出现了约 2.7 亿马克的国际收支负差。反对意见 3：保护国内生产会导致价格普遍上涨。回应：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在德国生产增加的情况下，福利支付将减少。因此，公共开支将降低，并分配到更大范围的生产活动中。因此，经济上不会有新的负担，而会有更少的负担。

2. 外币供应。

战后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政府使德国人民背上了外债，目前约有 220 亿马克。

这些私人债务被加载到德国人民身上，以支付一部分（103 亿）离谱荒谬的赔款，也有一部分（63 亿）用于支付进口的殖民地商品和美味佳肴，而不是德国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还用于支付本可以生产的食品的费用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政府留给我们的遗产：220 亿的外债。

1.必须用利息来偿还。1931 年，德国人民不得不将 16 亿马克的利息支付到国外。

2.需要不小的海外借贷。这迫使德国的经济被贱卖。明了的是，上述措施不足以满足每年的支付。我们将与我们的外国债权人制定一个减少利息的方案，使之与他们在自己国家向借款人收取的利息相当。就目前约 70 亿的短期外国贷款而言，我们将与我们的外国债权人达成一项长期协议，以使我们摆脱因突发事件而被抢走购买原材料、食品和支付利息所需外汇的风险。我们还需要一项外汇政策。如果我们有过剩的外币，我们就不需要一项政策。然而，今天我们的外汇短缺，迫使布吕宁政府违背自己的意愿制定了一项政策，尽管所有其他系统党派此前都认为外汇政策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无稽之谈。今天，我们的外汇短缺情况已经到了 1932 年 4 月 30 日，我们的黄金和外汇储备还不到 10%，无法支持流通中的马克。（流通中的货币：41.28 亿。储备的黄金和可兑换的外币不到 4 亿。帝国银行显示有 1.4 亿美元，即 6 亿马克，但帝国统计局不认为这些是可利用的，因为它是以短期贷款的形式从国外，或从黄金贴现银行获得的）。我们目前的情况：缺乏任何可用的外汇储备，并背负着 220 亿马克的外汇债务。

民族社会主义将履行它对德国人民的责任，首先是对年轻一代的责任，把我们每年拥有的有限的外汇专门用于进口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并暂时用于购买我们绝对需要的、国内无法生产的额外食品。此外，只要德国人民的经济遭受这种灾难性的流血，就必须限制外国资本从德国经济中的额外撤出。在未来，外国货币只能以有利于整个德国人民的方式使用。任何人都不得再在国外领取工资,令人无法容忍的是，由国家支付报酬的民族同志以有害于德国经济的方式使用这些手段。

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下，货币和资本只有在得到国家的德国外国银行（外币办公室）的批准后才会流向国外。德国海外银行将协调德国银行系统内的所有外国货币和其他贵重物品。民族社会主义将确保德国经济不再失血,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结束现有的饥饿制度.想象一下一个大坝。正如出水口确保水以适当的水平流出一样，外汇管理局的负责人也将确保外汇以经济上适当的方式流动，只用于绝对必要的目的，并且在德国人民度过其巨大的危机之前不会流向国外。由于这些措施，数以亿计人将留在国内，并为德国经济提供额外的资源。民族社会主义将利用这些资源来创造就业机会。

反对意见 1：外币政策是无用的，因为不能保证有些人不会绕过法规。回应：外币政策对于维持经济秩序是绝对必要的。拒绝外汇政策的人还不如拒绝刑法，因为刑法经常被违反。用同样的推理，人们会取消铁路安全服务，拆掉信号灯，因为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消除铁路事故。

反对意见 2：我们已经有了这种外汇政策。回应：目前，只有向帝国外汇银行报告的义务。但是，我们要求未经德国外汇银行（外币局）许可，不得进行任何外汇交易，所有与其他国家的转账都要经过外币局。目前的政策是不够的，因为它豁免了 200 马克以下的付款，允许某人以 200 马克为单位转移大笔资金。它还豁免了 1931 年 7 月 15 日之前购买的证券。另一方面，我们将要求任何外国货币的转移都能得到控制，要求

通过一项没有漏洞的严格法律，使德国外国银行能够控制所有的外国货币。最重要的是，我们将确保外汇流入具有经济意义的渠道，而今天它是按照机械计划分配的。此外，外币政策为国家提供了控制外国商业的能力.

3.反对资本外逃的法律民族社会主义要求尽一切可能使转移到国外的资本再次为德国经济所用。

为了使其紧急法令给德国人民带来的负担更容易接受，布吕宁政府认为应该颁布几项反对资本外逃的法规。这些法规是远远不够的：

1.有必要引入一个没有最低水平的一般报告要求，并且不豁免任何在一定时间之前发送到国外的财产。

2.必须严格监督在德国的外国公司和在国外的德国公司，以防止资本转移。

3.必须宣布资本转移是一种经济犯罪，可被判处死刑。

4.货币改革帝国银行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在不断减少。截至 1932 年 4 月 30 日，我们的储备还不到流通中的纸币的 10%（根据统计局负责人的说法，短期外国信贷也不足以支付这些钱）。这将使德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脱离金本位制的经济影响在英国脱离金本位制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根据半官方的 Vierteljahr shefte für Konjunktur forschung[经济研究季刊]的第 4 号，A 部分："虽然其他国家的收缩过程仍在继续，但这一过程在第四季度停了下来——在已经出现放缓的情况下。生产、原材料进口和出口都有所增加。这是将英镑从金本位制中解放出来的结果，以及由此产生的英镑价值的变化"。因此，放弃金本位制对英国经济产生了可以想象的最佳结果。因此，在其紧急计划的框架内，民族社会主义要求对那些放弃了金本位制，或者在战后期间将其货币汇率与战前相比有所降低的国家实行均衡费（外汇税）。平准费将由进口货物的人支付，并计入出口货物的人。反对意见：按照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报刊的说法，放弃金本位意味着通货膨胀。回应：英国在 1931 年 9 月 21 日放弃了金本位制。英镑的汇率下降了 70%，但英镑的国内购买力却没有变化。根据半官方的 Vierteljahr shefte für Konjunktur forschung（1931/32 年卷）A 部分第 4 号，第 16 页："价格只有轻微的增长。到 11 月为止，批发价格增长了约 8%，然后由于世界市场的发展而下降了。因此，在暂时的增长之后，价格再次下降。批发价格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国外确定的价格对英镑的重新估值所导致的调整。国内价格要么根本不受影响，要么只略有上升，甚至下降"。

G.银行和信贷政策

1.银行监管今天的私人银行系统的问题是很明显的。银行行长因其所谓的巨大的工作而获得几十万的报酬；通常每年只开一次会的董事会的每个成员往往获得几万块钱。

国家不得不为他们愚蠢的投机和糟糕的投资支付 15 亿马克，这表明银行行长和董事会的责任。银行行长做他们想做的事，而国家则支付账单。

因此，我们要求将银行系统以及货币和资本系统国有化，就像五十年前的铁路和邮政系统一样，当时在俾斯麦的领导下，人员、货物和通信的运输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由于自 1931 年 7 月以来的国家支持，通过这种支持，帝国用税收支付了大银行的 15 亿马克的愚蠢投机，德国信贷银行系统的一半以上已经在帝国的手中。作为银行系统国有化的准备，我们要求国家有权利进行监督和干预，并要求银行向国家报告。监督

能力必须使国家有可能充分了解银行系统中发生的一切，而干预的权利必须使其有可能在银行系统中引入符合经济利益的措施。报告要求将确保每月对所有的头寸[银行款项]和重要的变化进行说明。只有这些措施才有可能阻止愚蠢的投资。只有这些措施才有可能将利率降低到必要的程度，打破利息奴役。也只有这些措施才能为创造就业计划的融资打下基础。此外，银行办公室主任将有权进行他认为必要的组织改革，以准备和实施银行系统的国有化。

2. 资金转移系统德国在无现金转账方面是落后的。

在英国，支票已被广泛接受。在美国，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如何填写支票。我们要求大幅扩展货币转移系统，特别是帝国银行和邮政银行，以及其他信贷银行的系统。我们进一步要求对无现金汇款提供法律保护，就像在其他国家已经存在的那样，这样，在邮局银行或帝国银行分行开出支票或汇款而账户中没有必要的资金的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支票或汇款单上加盖日期的行为也将受到惩罚。货币转移系统的扩大将有助于消除流通中的货币短缺，也能将货币集中在经济体内，就像在英国发生的那样，这也促成了伦敦金融市场的主导作用。这也将增加创造就业机会的信贷基础。货币转移系统的扩大也将使整个金融形势更加清晰，并降低货币转移的成本。

3. 降低利率。

当利息吞噬甚至超过生产利润时，收取利息就失去了它的目的。在后一种情况下，生产能力本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工作机会，都会被破坏。目前的利率已经产生了这种效果。它们比战前的繁荣时期要高得多。而且很明显，一个健康的经济可以比一个已经崩溃的经济承受更高的利率。国家对整个银行系统的全面控制必须消除这种情况，并将利率降低到能够维持和增加生产能力和就业的程度。对于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反对意见，我们可以说这是绝对必要的。除此之外，布吕宁政府已经在努力降低利息，尽管程度不够，但没有出现预想的后果。

如果不降低利率，生产将完全停止，这将终止利息，其结果是通货膨胀将再次发生，储蓄将丧失，人民和政府将陷入混乱之中。H. 行政和税收措施

1. 价格控制工资、薪金和私人收入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它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工资、薪金和私人收入的数额，另一方面取决于商品的价格。如果由于卡特尔或某种垄断的存在，一种商品的价格被提高到适当的数额以上（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购买者就必须支付其国民收入份额中不合理的较大部分。这在社会上总是不公正的，在经济上也是危险的。因此，国家的价格控制必须确保防止大幅偏离适当的价格（化肥价格、盐价、无线电管等）。反对意见：这是国家的一种有害干预。回应：如果价格是合理的，国家干预就没有必要。而且，创造性经济活动的自由绝不能与无情剥削他人的自由相混淆。

2. 避免过度支出为了提供创造就业的资金，国家必须行使最大的经济，就像在私营企业一样。那些不为大众利益着想、浪费公共资源的官员必须被淘汰。行政管理必须简化，尊重专业公务员应有的权利。必须从根本上减少面子项目的开支。这包括对使用政府汽车的限制等。只要城市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支付福利，他们就不应该花一分钱用于仪式活动。在私营企业中也必须消除不必要的开支。必须取消董事会的酬金。

3. 增加那些肩负重任的人的负担没有人会相信，没有牺牲就能创造就业。但是，创造就业所需的牺牲不能随意加在所有其他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负担上。所有的牺牲只是证明了经济正在崩溃，而且越来越糟糕的事实。为创造就业而做出的牺牲将带领我们走出崩溃，走向自由。

我们将确信，必须要求的牺牲将使劳动人民受益（见 D3 节：从购买独栋别墅的人那里扣除的工资不能使资本家致富，而是要增加工人本人的财产。同样，国家补助金将使工人更容易获得财产，或使符合整个经济利益的政策或保证我们人民的粮食供应的政策得以实施）。此外，我们将确保不要求最贫穷和最需要的人作出最沉重的牺牲。在危机期间，牺牲应该来自那些最有能力承担的人：那些月收入超过 500 马克的高收入者必须为创造就业机会而征收附加税。每年超过 15,000 马克的高收入者将支付相应的高额税款。对于公务员，最高年薪将被固定在 12000 马克。（这不会是工资表的永久性变化，而只是在当前的危机期间有效）。私营企业的工资将与公务员的工资相似，考虑到这些雇员没有养老金，而且工作保障较少。必须完全禁止有两种收入的人的增长

4. 消除腐败。

公务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与其办公室有业务关系的公司,医生不得与制药厂和其他生产药品或保健品的公司有任何联系,对黑市商人和暴发户判处死刑。

I. 农业

1. 目前的情况由于外国的竞争，农民得到的价格甚至可能低于他们的生产成本，而只是城市中消费者支付的一小部分。导致德国农民贫困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与战前相比，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存在差异（农产品价格指数为 91.9，工业成品的指数为 118.2）。购买力的下降和难以承受的利息和税率导致了灾难性的农业债务，今天的债务总额约为 150 亿，并吞噬了可用的经营资本。

今天的农民既不能支付税款、利息，也不能支付债务，由于缺乏经营资本，他们也无法耕种田地和获得收获。其结果是：农民进一步贫困化，购买力下降，失业增加，德国人民养活自己的能力下降。

2. 错误的经济政策。

今天，我们只有四分之三的粮食需求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的劳动来满足的。由于我们的购买力和出口的减少，我们缺少的四分之一的粮食需求只能部分得到满足。德国人民正在挨饿，由于现行制度的错误经济政策而使饥饿简单化。（对外国产品的保护不足，对农产品的价格压力，利息和税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对通货膨胀时期形成的过时的中间商的容忍和支持）。

3. 正确的经济政策。

我们的经济政策必须确保德国人民能够吃饱。很明显，通过必要的改进，例如土地改良（见 C 节），我们将能够满足我们的全部粮食需求。充分利用德国的土壤将提高农民（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的购买力，为 100 多万失业者创造工作机会，另外还能为大约 100 万产业工人和工匠带来工作机会，从而减少失业金，增加税收。这将导致其他经济部门的普遍改善和德国经济的相应改善。

4. 必须采取什么措施？

1. 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减少农产品的进口。

2. 可以减少从那些不接受我们出口产品的国家进口，纠正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不平等，而不提高销售的价格。

3. 消除中间商的不公正的暴利行为。

4. 降低化肥的价格。

5. 将利息负担降低到以前的一半左右。

6. 对长期贷款进行重新评估。

7. 提供法律保护，暂停扣押农产品的权利，暂停支付利息和本金，直到农业复苏。

8. 为土地改良贷款提供约 2.5 亿，为农机提供约 8000 万。

9. 为农业提供约一百万马克，特别是收获贷款（见 E2 节）

5. 定居东方。

由于人口和国家需要的原因，我们需要尽可能快地在东部地区进行定居计划。目标：在受到威胁的东部建立独立的德国农业。要求：从根本上改善农业，为定居者提供多年的免税待遇，提供廉价贷款，通过改善交通路线来创造市场，并使其成本降低。

K. 工业

1. 对新生产设施的批准要求如 B5 节所述，德国的工业能力不仅是以德国国内市场为结构，而且还以出口机会为结构，这些机会在早期确实存在，但今天由于许多国家的工业化以及新老工业国的保护措施而丧失。

因此，我们受到生产能力膨胀和农业不发达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将新的资本不是投资于工业，而是投资于农业。建设新的工业生产设施必须经过批准。只有在提出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才可以批准（例如，对于减少进口原材料的工厂）。

2. 国有化和国家监督。

没有被解散的垄断企业必须立即接受国家的直接管理，也就是被国有化。垄断企业可以由国家管理，也可以由私营企业管理。然而，国家控制可以确保利润有利于国家，而不是金融资本。股票公司必须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遵循银行控制的模式（见 G1 节）。

反对意见：任何国家干预都是有害的。

回应：相反，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可以保护经济不受金融资本利益的最严重损害。国家干预之所以得到坏名声，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总是在错误的地方进行干预。虽然国家对垄断的管理比私营工业好得多，但马克思主义者却把它们交给了金融资本（道斯计划和杨计划把前德国铁路公司送走了，火柴垄断权被社会民主党财政部长希尔费丁交给了大资本家克鲁格），而无数不必要的政府企业却被保留下来，它们只与工匠和制造商竞争，生产的商品比私营工业的商品要贵得多，质量要差得多。

3. 更容易融资有合同的公司必须保证有必要的信贷来执行这些合同。见 E 节 2。

L. 手工业者、商业和零售业

1. 目前的情况该体系的两大经济罪恶，即通过通货膨胀窃取德国财产，以及在通货膨胀之后的几年里通过没收性税收窃取财产，对独立的中产阶级产生了最严重、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使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无产阶级化。

民族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目标是使德国工人去无产阶级化。更有甚者，针对中产阶级的政策必须阻碍更多部分人的无产阶级化。

金融资本从上面攻击中产阶级，因为巨大的企业有 1 亿马克的贷款来资助可疑的企业，但中产阶级的手工业者、商人和零售商只能以难以承受的利率获得小额贷款。然后是百货公司、连锁店和低价商店。从下面看，中产阶级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攻击，直接受到红色消费合作社的攻击，间接受到立法（促进上市公司）的攻击。

2. 百货商店和消费者协会必须立即提供帮助。不得开设新的百货公司、低价商店和连锁店。

按照 NSDAP 的计划对整个百货公司系统进行重组是必不可少的。对用户群体（消费者协会）的税收优惠将被取消。

3. 合作社所有支持独立中产阶级的合作社都将受到保护和鼓励。危害独立的中产阶级的合作社，将通过税收和其他手段予以打击。

4. 公有企业关注的问题公有企业将被减少到绝对必要的最低限度。这些企业将被立即禁止接受私人订单，除非有令人信服的公共利益或其他要求（见降低利息、银行控制等其他援助措施）。

5. 公共合同公共合同制度将以尽可能少的规定进行重组，根据党纲第 16 点，在授予公共合同时应有利于小公司。

反对与回应：**马克思主义的反对 意见认为，为了加快未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到来，我们必须使独立的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这与德国工人的利益相矛盾。德国工人的目标绝不能是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而是德国工人的去无产阶级化，并为他提供财产。**

M. 社会问题

1. 就业的权利。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是实现就业权，这只能通过我们的创造就业计划来实现。一项关于就业的法律将规定工人的权利。创造性劳动的自由将得到保证，资本主义剥削的自由将被废除。

2. 现有的工作岗位必须保留给德国人民的同志们如果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民族同志的就业权利，我们必须防止非德国人抢走他们的工作。根据我们党纲的第 7 和第 8 点，国家首先有义务为其公民提供服务。公民必须是民族同志（第 4 点）。

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必须确保在所有的生产中，只要有可能，德国材料应比外国材料更受欢迎。这一原则将在公共合同中立即实施。可以鼓励私营企业也这样做，例如，不把公共合同授予那些一再偏好外国材料的公司。

3. 社会保险民族社会主义将尽其所能维持社会保险制度，该制度已被目前的制度推向崩溃。拯救社会保险的唯一方法是创造就业机会。

4. 对老年人的照顾我们将立即做好准备，执行党纲第 15 点："我们要求慷慨地扩大对老年人的支持"。当然，只有在新参保者缴纳了若干年的保险费之后，才能支付新的养老金。要保证维持战争受伤者和矿工的福利。

5. 利润分享减息（G3 节）、价格控制（H1 节）、国家对企业的监督（K2 节）、就业法（M1 节）、税收措施（H3 节）和节约成本措施（H2 节）将保证所有收入首先用于加强德国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一旦德国经济因创造就业而复苏，并开始产生可观的利润，就可以制定一个全面的利润分配制度了。

6. 劳动服务劳动服务不是对失业者的强制劳动，而是让所有一定年龄段的德国年轻人参与对整个德国经济很重要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是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完成的（因此，参加劳动服务的人不会与正常工作的工人竞争）。
对学生和富人不会有任何豁免，而是每个人都将拿起手中的铁锹，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国家服务。对体力劳动者的尊重和荣誉将因此而增加，就像对军队的尊重因实行普遍兵役制而增加一样。

1930 年 3 月 6 日，民族社会主义党对农村人口和农业的立场党官方集会，慕尼黑

1. 农村人口和农业对德国人民的重要性。
德国人民的生活开支很大一部分来自进口外国食品。 在世界大战之前，我们能够用工业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的收入来支付这些进口食品。世界大战的结果关闭了这道大门。如今，我们主要靠借来的外国货币来支付进口食品的费用。这导致德国人民越来越深地陷入国际高利金融的债务束缚中。如果当前形势持续下去，德国人民将被剥夺的财产将越来越多。通过切断信贷和粮食供应，即吊高粮仓，可以迫使德国无产阶级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而工作，或者被运送到外国殖民地当劳工。只有当德国人民能够从自己的土地上基本养活自己时，才有可能摆脱这种奴役。因此，提高农业生产力成为德国人民面临的重要问题。农村人口的经济状况和购买力对于工业销售也至关重要，未来工业将越来越多地面向国内市场。我们不仅认识到农业部门对于人民的至关重要性，而且认识到农村人口是民族基因健康的主要来源、民族青春的源泉和军事实力的支柱。保持强大的农民阶级，使其在数量上与不断增长的总人口相匹配，是民族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石，这恰恰是因为它旨在造福整个民族，包括子孙后代。
2. 当今忽视农民和农业的现状。
在当今德国，维持一个经济上健全的农民群体正受到严重威胁。这是因为农民在生物和经济上的重要性被忽视，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一至关重要的必要性被忽视。农业生产的实质性增长本身是可能的，但由于农民负债累累导致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以及农业工作不再有价值导致缺乏提高绩效的动力，因此农业生产的实质性增长受阻。农业工作报酬（利润率）不足的原因在于：

[1. 现行税收政策对农业造成了过重的负担。这是出于党派政治原因，因为在德国议会民主制下，犹太人实际掌权的金融势力希望摧毁德国农业，因为这样德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将完全受其摆布。

[2. 外国农业在更有利的条件下生产，不受反农业关税政策的充分约束，与之竞争。

[3. 农产品批发贸易在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干预，目前大部分掌握在犹太人手中，为自己谋取了不可接受的高额利润。

[4. 农民不得不向主要为犹太人的公司购买化肥和电力，价格高昂。农民无法再以微薄的收入支付高额的税收。农民被迫举债，并为此支付高昂的利息。他陷入越来越深的债务泥潭，最终失去自己的房子和农场，而贷款资本的所有者多为犹太人。德国农民正在被连根拔起。

3. 在我们为之奋斗的未来德意志帝国中，德国土地法将得到适用，德国土地政策将得到推行。

只要德意志帝国实际上由国际放贷人在议会民主制政府帮助下统治，就无法指望农村人口的困境得到极大改善，农业得到恢复；因为他们想要摧毁德国本土力量。只有在我们为之奋斗的、本质上不同的新的德意志国家，农村人口和农业才会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中流砥柱。在这个未来的帝国中，将适用德国的土地法，并推行德国的土地政策。由此产生以下要求：

[1. 德国人民占领和保卫的德国土地是全体人民的居住地和生计来源。因此，必须由个人土地所有者进行管理。

[2. 只有德国人民才能拥有德国土地。

[3. 德国人民合法获得的土地所有权被视为世袭财产。然而，这种所有权必须服从于为整个国家利益而使用土地的义务。由从事农业的各专业群体代表和一名国家代表组成的专业法庭负责监督这一义务的履行。

[4. 德国的土地不得用于金融投机，也不得作为所有者不劳而获的收入来源。今后，只有那些想自己耕种的人才能购买土地。因此，国家拥有对每次土地出售的优先购买权。禁止将土地抵押给私人投资者。农业部门通过国家认可的专业合作社或国家以优惠条件获得必要的运营贷款。

[5. 土地所有者必须向国家缴纳土地使用税，税额根据土地面积和性质计算。征收土地使用税后，国家无需再对农业用地和农业经营征税。

[6. 农业企业的规模没有固定的规定。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大量有生存能力的中小型农场尤为重要。此外，大规模农业也承担着其特有的必要任务，与中小型农业保持健康的关系是合理的。

[7. 土地的继承应受继承法约束，以避免土地所有权分散和企业的债务负担。

[8. 国家有权征收以下土地，并给予适当补偿：

a）非德国人民所有的土地；

b）根据主管专业法庭的判决，因所有者管理不善而不再用于满足人们需求的土地 ；

c）业主未亲自耕种的大片土地，用于安置自由农民；d）国家特殊用途（如工业设施、国防）所需土地，以造福国家社会。非法（根据德国法律）获得的土地将被无偿征用。

[9. 根据主要的人口政策考虑，对可用土地进行规划安置是国家的任务。土地应作为封地分配给定居者，前提是初始条件允许可行的经济活动。申请人的选择基于对其作为定居者的公民和专业适合性的审查。对没有继承权的农民的儿子给予特别考虑（见第 7 点）。东部边境地区的定居问题尤为重要。然而，仅靠建立小农场无法圆满解决这一问题，只有结合有购买力的农村城镇的发展，以及工业企业的重组，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创造市场机会的唯一途径，使新成立的中型和小型农业企业能够生存。为不断壮大的德意志民族创造大面积的粮食和定居地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任务。

4. 农民的经济和文化地位应得到提升。

国家有责任促进农民的经济和文化地位提升，以维护农民对整个国家的重要性，从而消除农村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

[1. 首先，必须通过减税和其他特殊措施缓解农村人口的紧迫困境。必须通过将贷款资本利率合法降低到战前水平，并采取最严厉的行动打击高利贷，来阻止农业进一步负债。

[2. 国家必须通过经济政策确保农业生产再次盈利。国内农业生产必须通过关税、国家进口监管和有针对性的国民教育来保护。必须消除农产品定价中的股市投机行为，并阻止批发商对农民的剥削。国家应鼓励农业合作社接管农产品批发贸易。专业农业组织有责任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提高产量。(以优惠条件提供农业机械、化肥、种子、种牛、土地改良、病虫害防治、免费农业咨询和化学土壤分析等)。在完成这些任务时，专业组织应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国家的干预必须迫使人工肥料和电力价格大幅下降。

[3. 专业组织还有义务通过签订社会公正的劳动合同，将农业工人职业群体牢固地纳入农业社区。国家有权进行监督并拥有最高仲裁权。有能力的农业工人必须有机会成为定居者。农业工人的住房条件和工资水平必须得到改善，而且随着农业整体状况的改善，改善的速度和程度也会随之提高。通过改善国内农业工人的状况并防止人口外流，未来将不再需要招聘外国农业工人，因此应禁止此类行为。

[4. 农民对国家的重要性要求国家和专业机构支持专业培训和农村文化的复兴。(乡村青年旅社、为贫困但有才华的农村青年提供广泛福利的农民学院。)

[5. 专业经济组织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农民，只有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德国政治自由运动才能做到。农村人口的困境是整个德国人民困境的一部分。**认为一个行业可以脱离德国命运共同体的想法是疯狂的，而让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相互对立则是犯罪，因为无论好坏，两者都密不可分。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采取经济补救措施无法带来根本性的改善，因为德国人民的苦难源于政治上的奴役，只有政治手段才能解放他们。**那些统治至今、将我们的人民带入奴役的旧政党不能成为通往解放之路的领导者。专业组织在未来国家中承担着经济任务，并且已经可以在这方面开展准备工作，但它们不适合参与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因为政治斗争必须首先为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创造条件；这场斗争不能从单一职业的角度出发，而必须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出发。只有通过政治解放运动，才能成功领导我们反抗压迫者及其附庸的自由斗争。这场运动在充分认识到农村人口和农业对整个国家的重要性同时，将德意志人民各阶级和阶层中的德意志思想团结起来。德意志人民的这场政治解放运动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党。

阿道夫·希特勒签名

民族社会主义农业政策的目标和道路

瓦尔特-达雷

1934 年 4 月 17 日在 N.S.D.A.P.外交政策办公室的接待会上对外交使团和外国媒体的讲话：首先，我想表示，我很高兴有机会与你们会面，先生们。从人们对帝国政府在农业政策领域采取的措施所表现出的兴趣来看，很明显，这些农业政策问题在今天不仅是农业政策问题，而且被视为一般经济问题，因此，人们的兴趣不在于农业政策本身，而在于这种农业政策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影响。

因此，我今天不仅允许自己介绍德国农业政策的实质，而且特别是它们对德国经济的影响，以及除此之外对欧洲整体经济的影响。首先，我想预设一个经常听到的反对意见，它在德国商业界你仍然可以听到，即德国经济与所有国家的经济一样，所处的困难局面与我们在农业政策领域采取的措施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人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考虑到以下问题：对于农业以外的所有经济过程，可以说，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之前，德国处理这些经济问题的方法与 1933 年 1 月 30 日之后没有什么不同。从那时起，在这些领域发生变化的是在许多情况下是人们的商业道德，但实际的经济方法就没有那么大变化了。而在农业政策领域，情况则完全不同，可以说，1933 年 1 月 30 日是一个闻所未闻的转折点。

以前，自 1918 年以来，[政府]没有为保护德国农业做任何事情，绝对没有，而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之后，对德国农业和德国农民的绝对保护已经形成，它已经抓住了所有面临农业问题的人民的心。

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得出非常简单的结论：我们今天的经济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前发生的事。既然德国人民的经济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在那一天之前就已经生病了，那么就不可能把这种疾病的事实和这些农业措施归咎于德国人，德国政府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参与到这种疾病中。这种认识是如此重要，它让人从一开始就能为此保持思想和判断的自由，某种程度上说，早先关于农业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因此，我的思考中得先提到世界经济的总形势，以便从这里转向德国农业政策这一特殊领域，特别是表明德国的这种农业政策适合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健康关系。而不是不反对这种发展。关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农业困难的原因，有无穷无尽的理论解释。而当人们翻阅这些理论时，人们会感到绝望，他们希望一些清晰的解释能够帮助我们脱离混乱。

但事实却是基本上是无限简单的，只需要精确地将因果关系分开，就可以认识到疾病的来源，如果我知道疾病的来源，我也将能够克服这种疾病。有人声称，今天的世界经济危机是世界大战的直接影响。我坚持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大战只是助长了这种疾病状况，而在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热战”中，这种疾病就出现了。为了形象地解释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请允许我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三百年前，在所有欧洲国家，想发动战争的王公贵族们仍然普遍使用那些有足够经济实力的军官，以自己的名义训练一支部队，然后带着这支部队去打仗。

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人们有雇佣军领导人为自己工作。由于这些人反过来只把他们的部队交给那些付给他们相应报酬的人支配，所以当时的战争形式肯定是建立在这种资金充足的大官的个人意见之上，他们也因此建立了一个商业企业。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道德或对国家的考虑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是领导军队和战争代表了那些能够负担得起这些东西的人的纯粹经济活动。这一点现在已经毋庸赘疑。这种在战争中主动领域的自由发挥，造就了无数精兵强将。

我可以说，欧洲的所有国家都可以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以其中一个或另一个伟大的兵士为荣。毫无疑问，这种制度为有能力的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能力，不受国家或其他限制的阻碍。然而，总体上看，人民的处境

是这样的：这些条件使个人受益，但却使整体陷入混乱。在雇佣兵领袖私人行动的时代，一方面是优秀指挥官的出现，另一方面在德国的特点则是三十年战争的废墟。因此，在我看来，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总体福利的利益与这些以往的战争方法相协调。由此产生了一个在整个欧洲统一发生的现象，即战争和战争的进行成为人民的事情，在这方面，部队的指挥官，作为他的人民或他的王子的仆人来进行战争。

因此，出于事实需要，人们得出结论，要限制雇佣军领袖个人的经济自由，以提高整体的利益。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变成了个人迄今为止所属于的整体的自由。这个关于三四百年前的雇佣军领袖发展到今天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官员的说法特别具有启发性，因为最终整个世界经济危机可以追溯到与我们刚刚概述的现象。

毫无疑问，我们要感谢自由主义把个人从已经变得不相干的联系中解放出来。人们不应该通过打破壁垒来满足自己，而应该计划接管旧有纽带的好处，以形成新的经济秩序。但这并没有发生；因此，个人在摆脱了一切束缚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倾向过自己的经济生活，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当时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隔绝，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美洲、非洲、亚洲、澳大利亚还没有被发现，那么，这种个人在经济领域的胡乱行动会在短时间内引发与上面概述的雇佣军领袖完全相同的事情，即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斗争而造成的混乱。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并不是因为我刚才解释的规律不成立，而是因为它的存在，个人的私人经济需求在经济尚未发展的海外国家提供了一个闻所未闻的销售市场。这些不发达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准备购买任何商品，因此，销售商品的问题根本没有进入欧洲商品生产者的考虑范围。

但是，如果你让创造精神占上风，并加上领导者的组织能力，如果你继续增加勤奋和授予信用，那么基本上很容易取得商业上的声望，你肯定会在世界某个地方卖掉你的货物。世界上不发达地区对商品的需求是如此令人难以辂信的强烈，以至于欧洲国家在工业生产方面几乎没有相互竞争。任何人，无论他是法国、英国还是德国的企业家，只要他花心思去寻找市场，就有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销售他的商品。

这一事实对我们的经济官员和所有经济理论家的思维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因为它使人们完全摆脱了市场是所有生产的动力的旧原则。由于市场不断地、自然地吸收每一个数量的商品，人们变得不习惯于从其规律上进行思考，而习惯于只从生产规律的角度来看待一切。——但不仅如此，雇主和雇员都没有想到，只要他们的商品被购买，他们的存在在经济上就是合理的，而是都开始完全从生产的角度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

企业的利润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以至于雇主和雇员都只关心雇主或雇员应该得到多少利润份额的问题。而由于雇主对利润的渴望显然是不符合理性的，他们开始组织工人，以便有一天，通过国家，他们可以迫使雇主交出适当比例的利润。尽管事实令人震惊，而且基本是可耻的，但毫无疑问，过去 100 年的经济理论和斗争完全是在如何适当分配生产利润的领域中进行的，但对生产本身不再可能时实际发生的情况却只字未提。人们已经被这种错误的学说所迷惑，以至于雇主和经济企业家们竭力争取不对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经济活动的可能性进行任何干预，而工人则在这些企业家的组织控制中完全看到了他们存在的目的。无论是这种意义上的民主，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这两种情况下，整个概念世界都回到了认为生产

是永恒的大错上，而没有人想到生产取决于销售的事实。然而，在 19 世纪的过程中，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规律是不能被否认而不受惩罚的。

在世界大战之前，这一点只有敏锐的观察者才能认识到。它宣布，我们的欧洲工业集团正在陷入某些困难，他们最初认为可以通过卡特尔协议等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海外国家的新经济生产者作为竞争者进入竞争已经很明显了。这种被归结为世界大战的现象，实际上开始得更早。它是由竞争困难引发的，在这种情况下，某些生产公司决定节省货物的运输成本，以降低绝对成本价格。因此，出现了在世界消费大国建立工业子公司的想法，而没有考虑到这些子公司有一天可能成为母国的竞争对手。

但是，由于在此之前，所有新的机构都是个人信贷的问题，这个问题只从信贷的角度考虑，而没有从对销售市场的影响的角度考虑。由于经济生活中的所有事物都有一定的持久性规律，即新的见解和思想很难建立。相反，许多公司无疑通过成立子公司的新方法获得了红利，而且似乎这一步骤基本上与非凡的进步有关。但是，当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并最终在世界大战中爆发时，德国人民非凡的抵抗力量迫使其反对者动员一切手段来结束这场有利于他们的战争，即赢得战争。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员被部署到欧洲各条战线上，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协约国的工业没有能力保证前线所需物品的生产。

因此，年轻的国家或殖民地的附属工业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出手相助，这当然会立即导致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得到大力推动。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大战导致海外国家的各种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的真正原因。当世界大战结束时，缔结的和平在逻辑上并不是从刚才的思想路线出发，而是考虑到了战胜国的其他观点。我没有必要特别和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但我必须指出，从逻辑上讲，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地新创建的工业生存问题的结束，而是这些工业想活下去，由于它们能够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较短路径上转换，它们缓慢但肯定地将欧洲的竞争者击败出场。

然后，还有第二个因素。在生产成本与工人工资的关系问题上，海外国家面临的问题与欧洲的经济领导人完全不同。因为海外国家的劳动力在特殊情况下习惯于比欧洲工业工人低得多的生活标准。这实际上表现为海外国家的产业工人的工资比白人工人便宜得多。由于这些工资，海外工业变得与欧洲工业有竞争力，因为生产成本更低，因此，在世界大战后的时期，所有海外国家的工业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涌现出来。这些工业现在自然要寻找生存之道，于是在世界经济的销售市场上展开了一场疯狂的竞争，最后堕落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斗争。这些事情发展得比较快，最初引发的现象是，受害国以会议的形式聚集在一起，讨论共同的需要。然而，由于苦恼不是由这些东西引起的，而完全是由每个人都可以在经济生活中为所欲为的可能性引起的，所以在全球经济方面没有达成任何结果。诚然，强国试图通过决定一种国民经济结构来限制个人的经济利己主义，也就是说，试图调动个人的经济利己主义来维护人民的国民经济利益。在这里，我们掌握了理解那些在世界大多数大国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国民经济的东西的关键。但事实上，从原则上讲，这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所取得的成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经济斗争并没有冲破自己的国界线。

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够阻止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斗争在他们的边界内继续进行。这种试图通过让经济自由主义在国家边界内暴动来瘫痪其危害性的做法，虽然阻止了问题的发生，但并没有改变世界经济市场的状况，并不是因为国内一系列的产业以及所有的对外贸易，而是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不太能自给自足，现在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也是一种必然。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现在确信，如果要重建经济，就必须尝试以一种根本性的新道路来进行重建。

如果像我在一开始提到的那样，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忘记了销售市场是生产的动力，那么，试图通过增加生产的手段或通过发放信贷的问题来促进不景气的生产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而只有一种办法：试图通过有计划的重组来取代销售市场的混乱局面。如果采取这种观点，那么有逻辑思维的人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民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在经济上发生。很明显，每个国家都在试图蒙蔽对方的眼睛，但我们必须尝试在两个国家之间建立必要的和可取的经济交流关系，然后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尝试重组销售市场。非常清楚的是，例如，一个国家只能进口与它出口换来的一样多的原材料。这不是一个国家为了建立这个或那个工业而需要哪些原材料的问题，而问题是另一个国家会从我这里拿走多少货物，以便我可以用货物来交换它。这基本上是各国人民之间经济关系的一个永恒的规律。这个规律的事实并没有因为国家给予的信贷暂时使商品进口行业进口的商品多于人民当时出口的商品而改变。

因为国家的这种方法只有在有足够的资本，即由人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的劳动形成的资本，可以作为信贷提供，从而使这个行业能够维持其强大的原材料进口时才有可能。这个规律的事实并没有因为国家给予的信贷暂时使商品进口行业进口的商品多于人民当时出口的商品而改变。因为国家的这种方法只有在有足够的资本，即由人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的劳动形成的资本，可以作为信贷提供，从而使这个行业能够维持其强大的原材料进口时才有可能。然而，如果我们从各民族之间的自然经济关系问题出发，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当人民的经济本身是健康的，才会出现真正的良好平衡。

但是，只有当国民经济建立在健康的农业基础上，拥有经济上必要的工业，并且现在根据情况，即根据各民族之间的需要，冲刺那生产力的高峰时，它才是健康的。只有这样一个建立在自己身上的国民经济，且在一个重心之内，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诚实的商品交换也才有可能。

民族社会主义从这个想法出发，决定用一个新的原则来克服世界经济的混乱局面。这个原则只有在首先能够使农业有序化，并从那里建立国民经济的基础时才能形成。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请你们务必试着理解帝国政府的农业政策。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给德国经济的一个部门，即德国农业提供优待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在健康的农业基础上为新德国国民经济找到基础的问题，而这反过来将能够与其他民族建立起关系。以前的自由主义思想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如果要刺激生产，个人不受限制的私人行动必须在经济中运作。从这一考虑中，人们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出路，即认为如果内部市场通过高关税墙保持不受外国商品的影响，这个内部市场就能通过力量的自由发挥获得最大的收益。然而，人们忽视了这样的关税墙只起到了建立原则的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拒绝的东西，在逻辑上也必须拒绝[来自]其他

国家的。有了这种方法，从内部市场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的经济领导人是安全的，不受外国市场竞争的影响，但这并不排除内部混乱，但最重要的是，它并不妨碍这种方法不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经济利益达成和谐的对抗。但这种制度不得不在一个国家内造成更多的紧张，因为现在对出口感兴趣的行业对海关没有兴趣，而农业需要满足国内需求，反之，农业认为它的天然对手是用心在于出口的工业。

因此，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正在发展为民族自由主义，它发明了民族工业生产和民族农业生产之间的根本对立的理论，而没有意识到它的整个理论大厦在其预设中已经是错误的。这种思考使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思考是否有办法摆脱这些矛盾和混乱局面。我们清楚地看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关税本身是国家之间关系中最有障碍的现象之一，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建立一种国民经济，使关税在其中发挥彻底的次要作用。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帮助，因为我们考虑到，300 年前的问题与雇佣军领袖的自由倡议是一样的，就像今天的问题与经济中的自由经济一样。

这就是说，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摆脱混乱的唯一途径是：如果人们决定从根本上背离经济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决定把个人作为经济的一部分加以整合，并把整个经济的法律作为个人经济自由的尺度。也就是说，我们决定走今天军官团形成的那条路，就他们而言，甚至不认为他们的存在意味着对军官个人的限制，因为他们今天已经知道，对他们自由主动性的限制对他们的人民和国家都是有利的。并且我们只有在内部市场上建立稳固的关系，才能实现农业方面的经济复苏。因此，我们提出如下想法，即通过将农产品的生产商、贸易商和消费者团结在一起，保证国内市场的稳定，并在不以任何方式破坏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情况下确保国内市场。因此，如果事实证明内部市场的需求能够吸收农业生产，那么就有可能对农业超额生产进行配额，以便进入内部市场。另一方面，有可能只从其他国家进口他们自己的农业不再能够生产的产品。我们把自己从计划或强制经济的想法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让农民个人自行决定生产的东西。如果国内市场因这些产品生产过剩而受到影响，我们就不会夺走他的全部收成。这里不是谈论我们如何实现个别生产者的“第一桶金”的地方，如果你想这样做，你必须把内部市场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以至于没有一个生产者能够突破这个结构。因为很明显，如果一个农民有投机取巧的机会，整个系统就会一直无效。

但另一方面，如果农业生产者和农业消费者在国民经济中以这种形式结合起来，那么农业生产者和农业消费者的利益显然可以得到国家或必须决定价格的机构的保障。因此，我们从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价格虚构转向民族社会主义的经济上合理的价格的实现。如果一个内部市场在农业方面是以这种方式组织的，那么原则上关税是多余的。因为在这样一个由内部市场控制的经济中，只有当国家觉得需要这些产品时，外国才能够出售它们的产品。由于市场受到监督，因此不可能将逃避市场当局监督的货物带入市场。人们起初可能会认为，这里发展的思想路线是大胆而复杂的。但事实上，它们对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很明显，人们现在可以在每个国家找到对两国都最有利的相互交换商品的形式。如果人们知道市场可以很容易地吸收这种或那种农产品，那么，与另一个国家进行相互交换并以一种代价来抵消它并不困难，因为我知道市场需要这种商品，因此，如果再与想要出口商品的国家签订贸易协定，而该国再接受其他商品产品作为回报，这就符合国家经济利益。即使这

种思路最初被认为是一种大胆的理论，但与荷兰和丹麦的贸易协定已经证明，这不是一种灰色的理论。因为这两个条约都是由我部以经济领导身份缔结的，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新的经济概念，这根本就不可能。

虽然 Reichsnährstandgesetz[帝国食品法]在德国生效只有 7 个月，但与荷兰和丹麦签订的两个贸易条约已经证明，已经开辟了一条调节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新途径。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现在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自由主义预设的道路是明确的，只有在欧洲这里才有可能在人民之间的关系中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虽然听起来很矛盾，但我必须说，在这条道路的基础上，农民成为有机商品交换的先驱。这是因为在这种方式下，人民之间进行了诚实的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不是国家之间疯狂经济斗争的结果。如果说自由主义在其错误的前提下，在农民身上看到了各国人民之间国际谅解的绊脚石，那么民族社会主义则证明，欧洲的农民被要求在充分保留其民族特点和民族自我主张的前提下，重新组织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关系，从而为有机的世界经济发展奠定全新的基础。而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如此重要，因为人民之间的这种经济关系比迄今为止在自由主义基础上可能建立的关系要诚实得多。这只是一个在这一领域引导自己的事务的问题，让人们认识到自由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了作用，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必须有一个新的领域。有了这一点，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自信地展望未来。我把德国农业政策的这一个方面放在前面，完全是因为它最终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在国外，第一个问题往往总是针对 Reichserbhofgesetz[帝国世袭庄园法]我认为，更正确的做法是指出，Reichserbhofgesetz 只是农业部门内秩序和约束力这一基本理念的逻辑延续。因为只有 Reichserbhofgesetz 才保证了农民对土壤的最终依附，作为所有农业生产的永恒基础。不过，我希望能在另一个场合更详细地谈一谈这个问题。而最终的，德国农民是各民族之间和平谅解的保证，正是从这农民中产生了通过市场的内部组织向外贸自由推进的动力。

劳动货币 法西斯邮报

在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国家中，持续不断且往往肤浅的政治讨论中，私有化话题经常出现。各方可能会就某些经济策略（如公共资产私有化、税收和贷款利率）争论不休，但普遍的共识并不挑战货币的根本性质。货币政策是许多政客议程的基石。那些主张将货币控制权掌握在公众手中的人往往会面临严重后果，约翰·肯尼迪和高夫·惠特拉姆等历史人物就是明证，他们要么被暗杀，要么被强行赶下台。当权者在解决贫困、不平等或削减公共支出等社会问题时，很少面对金钱对社会的深远影响。

自由民主国家现行的金融体系建立在债务型法定货币之上。西方共识认为，货币应该是法定货币，仅由政府承诺支持，并由一群精英私人银行家控制。

正如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对国家经济的控制比制定法律更有影响力。尽管实行选举民主，但真正的控制权仍在银行家手中，因为政客和民众都受这些利益集团定义的金融体系的制约。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或英格兰银行等机构，无论其公共地位如何，都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等私人银行家族的影响，这些家族主导着全球经济政策，维持着一个让他们致富同时剥削全球人口的体系。

“债务型”货币的概念引起了那些了解这一概念的人的担忧。例如，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对美联储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对金融体系缺乏基本的了解——这是金融精英们所希望的现状。任何关心自己福利、子女未来和国家活力的理性人士都会质疑陷入利息、贷款和私人金融家债务循环的明智性。人们自然会质疑将“债务”与“货币”配对背后的理由——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时，暗示着财富创造，但在实践中却表示完全不同的东西。

基于债务的法定货币体系本质上是国家认可的私有化债务循环，其后果非常严重。它与上个世纪美国参与的所有战争都有牵连，是全世界奴役、社会不公、道德沦丧、政治腐败和贫困不断升级的根源。理解这个体系很简单。任何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是公私混合机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虽然名字听起来很正式，但实际上独立于联邦政府运作，正如它最近针对彭博社《信息自由法》请求的法律辩护所揭示的那样。像美联储这样的中央银行在其国家内充当主权金融当局。正如在重大经济衰退期间所观察到的那样，似乎存在着一项不言而喻的协议：中央银行管理经济，国会分配资源，而公众基本上不参与其中。

在美国，曾经由黄金储备支持的货币（例如美国国债）早已停止发行。1971 年，尼克松总统放弃金本位制后，该国转向完全法定货币体系，货币价值由联邦法律决定，没有实质支持。货币创造过程涉及政府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它通过向中央银行发行国债以换取货币来实现这一点。这些债券本质上是偿还的承诺，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时会收取额外的利息。这种制度使政府陷入了永无止境的债务循环，因为它只能通过从中央银行借入更多债务来获得支付利息所需的资金，而中央银行又会收取利息。即使是极端的税收也无法解决这笔债务，因为所欠的利息只能通过中央银行创造更多的货币来支付。债务和货币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是所谓“基于债务的法定货币”的核心，讽刺资本主义为经济复苏所做的努力确定了现行经济框架的核心问题后，我们现在来概述替代方法的基本要素——基于劳动力的货币体系。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戈特弗里德·费德的思想和文学贡献，他对这一主题提出了深刻见解：

“不幸的，世界银行家们胃口真的很大，证券确实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这显然非常适合他们。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会像迈达斯国王[寓言]一样挨饿，众所周知，他嘴里的食物都能变成金子。相反，工人会先挨饿，然后利息领主才会挨饿。”

——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废除利息奴役宣言》

在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货币发行体系中，货币基础的增长与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的投资有着内在联系。这些投资包括公共交通系统和应急管理等社会服务的改善，以及道路和能源设施建设等基础项目。在这样的经济中，所有银行业务，无论是中央银行还是零售银行，都由政府以非营利的身份管理，维护公民的财政利益，提供无息贷款，并管理货币流通。

政府负责评估国家主导的计划的支出，确定所需劳动力和材料的价值，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价格标准化。因此，货币价值与国家在建设和维护重要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部署人力和物力的能力挂钩。在经济衰退期间，国家承担最终雇主的角色，创造就业机会，维护失业公民的自尊。对此类国家资助的工作或从私营部门采购的材料的补偿是通过政府担保的代金券发放的，可在国家银行兑换。这种机制确保私营部门的货币

流通取决于先前的公共部门支出，如果私营部门未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政府就会介入，优先考虑公共福利而不是个人利润。

政府通过促进生产必需品和服务的企业的扩张以及限制非必需品过度饱和的行业过度生产，进一步控制私营部门。这种监管职能旨在避免市场扭曲，并保证必需品的可获得性。随着劳动价值货币框架的采用，包括所得税和公司税在内的传统税收变得多余，因为国家本身为其职能产生所需的资金，并对私人生产的规模和性质进行控制。

在这个框架下，政府掌控经济方向，对公民负责，同时保持对基本服务的主导地位，以防止私营部门削弱政府的影响力。电力、通讯网络、公共交通和医疗服务等重要公共服务仍属于公共管辖范围，确保政府致力于公共利益。对于国际贸易，特别是对于缺乏特定资源或商品的国家，贸易以基本商品和资源的相互交换为结构，由相关国家直接谈判，绕过全球中介。这一战略旨在减少剥削，并保证禁止跨境劳动力交换，从而保护当地劳动力不被廉价外国劳动力所取代。

在政府负责创造货币的体系中，货币的价值与国家雇用公民为国家发展和维护服务的能力有着内在联系。这种货币摆脱了国际金融势力的魔爪，这些势力往往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比另一个国家的货币价值低——无论是由于黄金储备较少，还是有影响力的实体任意宣布支持浮动汇率制度。这种情况凸显了西方经济体中历史上由金属支撑的货币和目前由债务支撑的货币的不可靠性，凸显了全球银行实体及其企业盟友的自私本性。这些金融机构有操纵经济的历史，在一场争夺全球资源的不公平竞争中，有效地将人民置于自己的摆布之下。

迅速解决这一问题并为以劳动力为中心的经济奠定基础可以简洁地概括为：

美联储和贷款机构国有化：这将涉及美国政府接管美联储（美国中央银行）以及其他可能从利息贷款中获利的金融机构。目标是确保货币的创造和借贷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

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共融资：在美国，这意味着通过发行无息政府债券或直接政府支出来资助重大公共项目，例如可再生能源开发或交通基础设施，而不是通过产生利息并增加公共债务的贷款。

由有形资产支持的稳定货币：引入固定货币标准将涉及将美元价值与安全的有形资产或一篮子资产挂钩，从而可能稳定货币并防止通货膨胀。

成立国家开发银行：在美国成立一家政府支持的开发银行，可以为企业发展和创新提供无息贷款，刺激经济增长并降低新兴企业和扩张企业的融资成本。

财富再分配和公平税收：实施变革性的财富和所得税策略，消除累退间接税，修改遗产税法，并设立最低和最高收入限制，以公平地重新分配财富，减少经济差距，并保证所有公民的基本生活水平。

重新定义经济平等与稳定："全国劳工与州议会"（NLSA）将取代传统的两院制国会，充当中央立法机构，专注于协调劳工代表与州政府官员之间的谈判和政策制定，同时有意排除企业的直接参与。NLSA 的任务是倡导改革，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加强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财务安全，它将对税收制度进行评估和可能的改革，以提高其累进性，设定最低和最高收入门槛，并研究重新分配财富以弥合经济差距的策略，确保所有人都

能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平。从本质上讲，它将监督与劳动力相关的所有领域和每项职业或工作。

在美国实施这些理念需要政府进行大范围改革，并转变货币政策、银行监管和财政政策的理念。这将是金融体系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可能会遭遇当前资本主义制度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强烈抵制。

BUF 经济政策：住房、失业、帝国、农业

住房

在接下来的四篇文章中，我们将展示法西斯主义如何在大英帝国建立一种远远高于世界已知水平的文明。这种高标准的生活将为我们的人民提供足够的购买力，让他们能够购买现代工业生产的产品，从而雇佣现在失业的劳动力。

同时，我们将展示这个国家或帝国组织将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更安全和更和平的关系。然而，在这第一篇文章中，我们将以法西斯主义重建我们英国本土的方法为例。

首先出现的问题是住房问题。自战争以来，我们的大多数人一直生活在恶劣的住房条件下，这一点无需赘述。

建设性的补救措施

社会主义者及其同类的习惯是花几个小时讨论这些可耻的状况，从而避免提出建设性的补救措施。对于法西斯主义者来说，没有必要强调这些状况，因为我们和其他人都知道它们存在。英国对革命运动所期待的是建设性的补救措施。我们认为，在现行体制下，住房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也不会得到解决，因为所采用的方法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我们的老政治家们振振有词地谈论“扫贫运动”，但除非他们准备采取行政手段消除贫民窟，否则这些言论毫无意义。

事实上，政府多年来向数千个地方政府提供了或多或少资金，用于解决贫民窟问题。我们在威斯敏斯特和地方政府都拥有民主机制，但这两个机制都已彻底崩溃。这种体制的结果是，人们只会空谈，却完全缺乏有效的行动。

法西斯主义将通过以下方式将贫民窟清理问题作为一项国家任务：我们将制定清理贫民窟和重建计划，期限为三年。在此期间，我们将保证建筑行业的就业机会，并提供优厚的工资待遇，吸纳该行业目前 295,000 名失业人员。我们将把每个大城市的贫民窟划分为若干区域，在指定的时间内拆除并重建。在拆除和重建贫民窟期间，我们将在城外搭建临时平房，安置第 1 区的居民。我们还将提供国家通勤服务，接送他们上下班。

搬进新房子

这样，在房屋重建期间，他们就可以与习惯一起生活的人住在一起，而在此期间，由国家直接采取行动来解决他们上下班的问题。当 1 号区完工后，居民们将搬出平房，回到新房子里。

然后，2 号区的居民将搬出自己的房子，搬到平房去，并使用新的交通系统。当他们的房子建好后，3 号区的居民将接管平房并使用交通系统，直到他们的房子建好；以此类推，直到贫民窟的改造和重建工作完成。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全国建筑行业的动员，而且问题的处理方式与战争中提供炮弹的方式非常相似。从实际经验中我们知道，这些方法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我们将根据已知的需求进行生产，并且可以提前精确计算。因此，可以开发一个成本核算系统，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一旦将问题视为国家问题，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组织，并运用现代组织和大规模生产的各项原则。

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以比现行政治体系所能想象的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完成贫民窟的拆除和重建工作。通过应用法西斯主义原则，即任何没有妥善维护其财产的业主将不得保留该财产，生产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因此，在法西斯主义下清理贫民窟时，不会产生任何补偿问题。由于将此事视为国家问题，并通过上述各种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清理和重建贫民窟的成本可以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在这样的制度下，新房屋可以以经济租金重新出租给租户，租金不会高于他们之前支付的租金。如果新的经济租金与他们之前支付的租金之间存在任何差异，那么国家应该承担这部分费用，作为对国民健康的贡献。在现行体制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投入数百万用于治疗疾病，而不是通过清理贫民窟等措施来预防疾病。

国家必须做好准备，组织并资助国民健康维护工作。重建国民体质的措施中，首要的就是重建贫民窟。

当然，这些措施会受到民主派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威斯敏斯特的所有爱管闲事的人，以及地方当局那些地位较低但同样爱管闲事的人，都会被搁置一边。许多民主小鼓手的自大情绪将受到打击，他们将对法西斯暴政的又一例证发出悲叹！他们会谈论自由——各种自由，从新闻自由到民主自由。所有这些首先意味着他们自己有说话的自由。他们一边说话，一边看着别人在贫民窟挨饿，从而成为威斯敏斯特或地方议会的重要人物。**法西斯主义相信更大的自由，即那些为祖国而战、有资格生活在祖国的人的自由。我们将以民主的自由为代价，为贫民窟居民提供新的自由。**

我们所说的自由与旧党派所说的自由之间的区别，难道还有比这更清晰的说明吗？

失业

法西斯失业提案是解决困扰英国长达十多年的失业问题的唯一建设性方案。在制定建设性政策之前，我们必须简要分析失业的原因。

法西斯认为，英国目前失业问题存在两个主要原因：

（1）我们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如今却不得不面对出口市场对我们关闭的事实。我们不仅要面对熟悉的关税壁垒，还要面对新的、难以逾越的壁垒，例如禁运、配额、外汇交易中的否决权等。如今，外国不仅对我们的商品征税，还故意排斥它们，无论生产成本如何，无论我们准备如何廉价销售。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决心自己生产他们消费的商品。因此，英国不得不面对出口贸易下滑的前景。

生产力量

（2）在这个国家和全世界，失业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在于，自战争以来，科学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以至于生产大大超过了目前的消费能力。

因此，全世界都有人失业，而大量人口却迫切地需要失业者本可以生产的商品。会做靴子和衣服的人失业了，而不仅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孩子，以及许多其他人，都迫切需要这些商品。

这种情况是我们文明的耻辱。科学和工业技术已经解决了生产问题，现在需要建立一个解决消费问题的国家体系。今天，我们必须提高工资和薪水以及整体生活水平，以提供更多的购买力。然而，在目前无序竞争的情况下，工资和薪水却在不断减少。正当工业需要更大的市场时，现行制度却产生了更小的市场。无论个别雇主多么清楚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依赖于高工资和高薪，在现行制度下，他们自己却无法支付高工资和高薪。

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立即会受到一些竞争对手的打击，这些竞争对手会降低工资和薪水，因此他们会被迫停业。在应对廉价劳动力的外国竞争方面，所提供的保护非常有限；而在应对支付低工资的英国雇主方面，本国市场却没有任何保护。

无能的工会领导人

工会本应维护工资标准，统一劳动条件；但实际上，由于领导层懦弱无能，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使工人阶级争取更高标准的斗争变得毫无希望，工会已证明无力维持工资，更不用说提高工资了。失业者等待着就业，而就业者要求更高的标准，在整个工业领域，工会都处于困境。

因此，在工业对更大的市场至关重要的时刻，工资和薪水却在不断下降，购买力也在下降，市场也在不断萎缩。

法西斯主义通过职团国家机器来解决这个问题。向雇主发出含糊不清的呼吁要求维持工资是没有用的。这不是感情问题，而是组织问题。法西斯主义的职团国家为适当的工业领域建立职团，由雇主、工人和消费者的代表管理，在法西斯部长领导的职团部领导下运作。

这些职团不仅负责通过禁止停工或罢工来**防止阶级斗争**。随着科学、合理化等生产力的提高，职团还将负责提高整个工业领域的工资和薪水。

与职团相关的将是金融和信贷工具，它们将提供新的信贷，但不是为了投机，而是为了增加生产和消费融资。因此，需求将首次与供给相匹配。当生产更多的商品时，工资和薪水也会随之提高，从而为消费者提供购买力。这个过程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或价格上涨，因为更高的购买力将被更高的产量所抵消。新的信贷不会流向那些抬高价格的投机者，而是用于工业生产和消费。

我们的反对者认为，工业领域工资上涨会导致成本增加，从而危及我们的出口贸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现代大规模生产行业的生产成本不是由工资率决定的，而是由生产率决定的。为了满足更大的国内市场，生产率将提高，尽管工资上涨，但如果生产率足够高，价格实际上可以降低。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福特汽车在美国，由于面向庞大的国内市场，有能力支付世界上最高的工资，同时生产世界上最便宜的产品。事实上，由于面向庞大的国内市场，工业界将能够降低出口贸易的成本。

除了出口贸易的优势外，职团制还将带来另一个好处。职团制将统一和巩固工业，使英国出口贸易首次能够以一个声音说话。然后，政府的力量可以调动起来，支持我

们的出口工业，确保它们进入外国市场：我们第一次可以利用作为买方的力量来支持作为卖方的地位。我们的贸易口号是“英国从那些从英国购买的国家购买商品”。如果那些现在竞相向我们出售食品和原材料的国家不接受我们的制成品作为交换，我们将把采购转向其他地方。事实上，除非他们接受我们的商品作为交换，否则他们将面临破产。事实上，职团制度的统一和巩固将首次为我们提供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扫除阻碍我们商品进入国外市场的障碍。

因此，法西斯主义将通过以下方式解决失业问题：

（1）通过提高整个工业领域的工资和薪水来扩大国内市场；

（2）通过组织来支持我们不断下降的出口贸易。

在组织职团制度的同时，我们将按照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在 1930 年 5 月 28 日辞职演说中提出的思路，提供一套前所未有的公共工程体系。这项公共工程政策在当时遭到拒绝，如今却被世界上几乎所有政府视为明智之举。只有英国政府顽固不化。

解决失业问题的长久之计是职团制度；在职团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之前，解决失业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公共工程，这将使我们的国家在未来数代人中富裕起来。

法西斯帝国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通过职团制度解决失业问题。提出了两项措施：

（1）提高整个工业领域的工资和薪水，以扩大国内市场；

（2）通过职团制度统一和巩固我们的出口贸易，以便我们与其他国家讨价还价，以换取他们的食品和原材料，以换取我们的制成品。

我们自然应该首先依靠自己的自治领和殖民地来建立我们的经济体系。在大英帝国范围内，我们拥有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不受世界其他地区混乱的影响。

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市场

我们已经提出了在英国建立一个文明社会的建议，这个文明社会将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从而为工业提供目前所缺乏的市场。我们还建议将这一领域扩展到整个大英帝国，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自治领主要生产食品和原材料，而英国主要生产制成品。因此，自然形成了贸易平衡，而组织这种平衡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经济体系。

是什么阻碍了旧政党开发我们的巨大资源并建立这种经济体系？答案并不难找。自由党和工党一直公开反对有组织的帝国；他们拥护国际主义，而不是发展我们自己的帝国。保守党一直大谈帝国，但实际上他们一直受制于高利金融，这阻碍了任何有效的帝国计划得以实施。不难看出，无论是鲍德温还是比弗布鲁克，保守党都不可能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建立这样一个帝国意味着将那些与英国和帝国产品竞争的外国商品排除在帝国之外。如果这些商品被排除在外，我们的国际金融家和外国投资者就有可能失去他们向外国提供的贷款利息。如果外国不能将他们的商品运送到这个国家来支付他们所获得的贷款利息，他们可能会拖欠利息，而那些把钱借给国外的人就会血本无归。

英国农民的利益被牺牲

例如，如果阿根廷牛肉被排除在英国牛肉和帝国牛肉之外，那么阿根廷可能无法偿还国际金融机构诱使一小部分公众向阿根廷提供的大笔贷款的利息。因此，所有品牌

的保守党人，为了支持旧政党的金融利益，他们不建议排除阿根廷牛肉，而只是建议在老式的保守党保护下对阿根廷牛肉征税。因此，英国农民仍然受到外国产品竞争的损害，而帝国农民尽管有小小的偏好，但在英国市场上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

法西斯主义主张明确排除外国产品，并在英国生产商和帝国生产商之间划分帝国市场。我们也坚定地支持英国生产商能够以经济的价格出售其最大产量，甚至不削弱自治领的竞争。如果外国人被排除在外，自治领产品仍然会有很多机会，即使我们在这个国家生产了所有我们能生产的食品，以一个能给我们的农民带来合理回报的价格。

我们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而旧政党却做不到。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直反对帝国主义；保守主义则受到其所服务的巨大金融利益的阻碍，无法制定全面的帝国政策。

法西斯主义一方面忠于王室和帝国，另一方面又是一场革命运动，因为它将控制国家政策，使其服从于国家利益，特别是国际金融利益，而后者严重损害了英国和自治领的生产者利益。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金融将不得不为英国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外国的利益服务。

自给自足的帝国

在上一篇关于法西斯政策的文章中，我们提到了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贸易下滑，因为外国正在排斥我们的商品。如果我们建立一个排斥外国商品的自给自足的帝国，我们就可以在帝国范围内恢复所有的出口贸易。

如今，大英帝国每年进口价值约 14.2 亿英镑的商品，其中 8.99 亿英镑来自外国。如果排除这些外国商品，我们就能弥补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贸易损失，因为这些出口每年仅达 2.4 亿英镑。

此时此刻，我们有机会拯救大英帝国，使其免于陷入世界落后国家的混乱之中，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在其疆域内拥有世界有史以来最高的文明。今天，我们必须摆脱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粗俗国际主义，摆脱保守党所代表的巨大金融利益。基于这些原因，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这是未来的唯一希望。法西斯主义已经开始着手组建一个务实组织。我们已经组建了一个新帝国联盟，这是帝国所有法西斯运动的联盟。澳大利亚法西斯运动的新卫队号称拥有 10 万名成员，在澳大利亚政治中经常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南非和新西兰，也有强大的新卫队运动。法西斯组织也在加拿大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逐渐联合成强大的加拿大法西斯运动。最近，澳大利亚新卫队领导人埃里克·坎贝尔上校来到英国，不仅代表澳大利亚，还代表南非和新西兰运动发表演讲。他与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的谈判促成了新帝国联盟的成立，该联盟负责联合和协调整个帝国的法西斯活动。因此，我们现在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拥有了一个统一的法西斯运动，反对阻碍帝国发展的巨大金融利益，并朝着自给自足的帝国迈进，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这些法西斯运动汇聚在一起，在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将帝国从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共同决心以及伟大而鼓舞人心的法西斯主义理想的推动下，他们携手建设一个世界从未见过的帝国。无论世界其他地方的命运如何，这个帝国都能脱颖而出，成为混乱海洋中的一块坚固磐石，成为人类的榜样和灵感源泉。

农业法西斯三年计划

法西斯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振兴农业。农业在过去一直是国家实力的基础，但长期以来却沦为政党政治的玩物。法西斯主义通过新的民族团结终结了政党政治的游戏。

它还带来了明确的农业复兴政策。我们不是要限制英国的生产，而是要增加生产。国民政府对英国农民说："限制生产"；我们则对英国农民说："增加生产"。每年有220000000 英镑的食品从国外进口，另有 140000000 英镑的食品从自治领进口，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要求英国农民限制生产，实在是一种耻辱。如果必须限制，那就限制外国人吧。法西斯主义坚决主张禁止进口外国食品，并主张英国每年生产价值 2.2 亿英镑的农产品。我们相信，我们目前的粮食产量可以从每年 2.8 亿英镑增加到 5 亿英镑。当然，我们深知英国农业产量不可能在一年内翻一番。但我们相信，通过三年计划，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为此，我们呼吁英国农民给予爱国合作。

我们计划用三年时间提高英国的生产，从而完全排除外国食品，并实现 2.8 亿英镑的商品本土化生产。政府和农民将通过职团组织每年制定生产计划，并由一家新的农业银行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

每年，外国进口产品将按比例减少，三年后，将完全排除外国产品。英国农民和自治领农民将瓜分国内市场，英国农民的产量将增加近一倍，而自治领农民仍可像现在一样每年向英国出口价值 1.4 亿英镑的食品，此外还可出口更多的食品和原材料，以满足法西斯组织带来的更高购买力所创造的巨大需求。

"我们的出口贸易会怎样？"拥有保守党的国际金融的老团伙哀嚎道，"那些向我们提供食品的外国拿走了我们的出口产品作为回报。

我们的答案是，如果英国农民和农业工人的产量翻一番，他们的购买力也会翻一番。国内市场将取代国外市场，成为我们出口贸易的场所，在这个国内市场上，将排除外国竞争。在这个国内市场上，我们的工业将不必像在国外那样与廉价的日本劳动力竞争。

对于社会主义者和国际金融家来说，我们的想法可能很新颖，也很可怕，但我们建议通过农业重组，赋予英国农民而不是外国农民购买力，从而建立一个国内市场来取代国外市场，因为国外市场每天都在对我们的出口关闭。

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老政党没有采取这样明确的政策来增加农业生产，而大多数农民都认为这是可能的。答案很简单。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一直是除自己国家外的所有国家的朋友，任何将英国放在首位的政策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的国家组织会彻底打破他们的国际心理，并干扰他们在社会主义国际组织的庇护下为地球上每个落后国家的土著居民谋取利益的努力。**

保守党未能帮助农民的原因乍一看并不明显，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道理。保守党早已不再是代表农村的政党，而成为代表金融界的政党。伦敦金融城掌控着他们的身与心，而伦敦金融城拥有巨大的海外金融利益。例如，它每年从阿根廷获得的贷款利息就高达 3000 万英镑。这些贷款的利息由英国销售的阿根廷牛肉支付。如果我们排除阿根廷牛肉，就会损害金融家的利益。因此，无论是鲍德温还是比弗布鲁克式的保守主义，都只愿意对外国食品征税，而不是排除它们。

法西斯主义的答案是明确的。如果要在英国生产商和外国投资者之间做出选择，英国农民是第一位的。终于，一场革命运动兴起，挑战金融业的既得利益。但这场运动也忠于国王和国家，奉行“英国第一”的政策。法西斯主义，也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振兴农业，遏制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在它们所服务的外国利益的驱使下犯下的巨大背叛。

保守党的最终背叛在张伯伦先生 10 月 3 日在伦敦市银行家晚宴上的讲话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他再次强调了保守党的新主张，即贸易复兴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实现。他提出了保守党确保经济复苏的四个主要观点：

（1）“打破贸易壁垒”。这仅仅意味着根据与外国签订的协议允许进口外国商品，类似于近期与阿根廷签订的协议。英国农民必须破产，以便金融家们能够继续获得利息。

（2）“尽快恢复金本位制”。这意味着英国再次与国际金融家们捆绑在一起，而英国在 1931 年几乎因此破产。

（3）“国际贷款的复兴”。这意味着伦敦金融城将在国外发放新贷款，贷款利息将通过进口外国商品支付，这削弱了英国商品，迫使农民离开土地。

（4）“国际价格上涨”。这意味着英国国内工资水平不会相应提高，而会因外国竞争而保持较低水平。因此，人们购买的商品将少于以前，英国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市场将继续萎缩。

法西斯主义再次坚持认为，在不提高购买力的前提下提高物价是一项灾难性的政策。我们同意农民必须获得比现在更高的价格，而且价格必须由政府事先确定，以便农民心中有数。我们必须将农产品价格恢复到经济水平；但除非同时提高广大人民的工资和薪水，否则这毫无意义。如果价格上涨，但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人们就会比以前少买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新的限制生产的基础上，也会出现新的过剩，随之而来的将是新的、更严重的崩溃。

法西斯主义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在职团政策中，工资和薪水在整个工业领域同时逐步提高，以提供更大的购买力，从而为工业提供目前缺乏的新市场。呼吁个别雇主提高工资是徒劳的。任何响应者都会立即被竞争对手削弱并淘汰，因为竞争对手会降低工资或将其维持在较低水平。只有职团系统的监管和规划才能提高整个行业的工资和薪水，从而提供新的购买力，吸收目前失业的人员和机器的生产。不仅如此，职团系统购买力的提高将使人们能够购买更多的农产品，即使价格水平更高，这也是使农业经济化和使农业工人获得生活工资所必需的。

农业与整个国家的生活密不可分。农业是国民生活的基础，也是国家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法西斯主义掌权，一旦我们打破了外来红色势力和国际金融家的势力，我们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英国，繁荣的农业复兴将成为国家财富，为法西斯主义的未来提供新的、充满活力的男子气概。**

资本主义力量 来自德国社会党的未注明日期的传单

在我们的出版物中，我们经常讨论资本主义的力量——我们首先理解它意味着借贷资本主义的压倒性优势——与营运资本相对立，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承认，在纯粹德国基础上的经济中，营运资本是以一种受控和受限的形式存在的。

但即使在今天，这种形式的资本也具有一种偏离正确和真理的力量，这一点从现代右翼政党身上就可以看出。这些政党以本质上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纲领为基础，能够把成千上万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而这些人民正是资本主义和当今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这两个政党拥有足够的资金，使媒体和他们的公众演说家能够从社会角度掩饰他们的纲领，并采取反犹太主义的调子，这种调子在临近选举时变得更加活跃。

这些政党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单一的、根本的、全面的要求，可以缓解社会状况，摆脱资本主义的压迫！

无论是犹太人问题，还是法律、土地和金钱问题，政党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本色，也没有表现出放弃当前资本主义道路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呼吁建立一个人民共同体，这自然只是一个口号，正如他们要求工人和白领分享工业利润，这根本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恰恰相反，提议引入小股份实际上会将资本主义毒药引入迄今未受污染的圈子，从而延续资本主义制度。

就像普通人通过享受小额储蓄的利息，基本适应了非社会化的利益经济一样，小股制的引入也会对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类似的影响！中间派、社会民主党和右翼政党都一样，它们都拥有某种口号，并借此一次次成功地将持怀疑态度的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党旗下。

正如中间派总是强调宗教面临的危险，社会民主党总是鼓吹反动的威胁，右翼政党也总是宣称祖国处于危险之中。不幸的是，他们今天的呼吁本身实际上是有道理的。因此，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那些具有民族倾向的人被转移了注意力，而只有社会形式才能真正、永久地拯救祖国，并保证他们自己过上自由、舒适的生活！

因此，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因金钱的诱惑而站错了立场，如果我们的运动能获得那些党派用于营销的部分资金，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早已认识到自己是属于我们的。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那就是在民族主义圈子中，缺乏社会主义（自私的代名词）和资本主义倾向（贪婪的代名词）削弱了整个民族主义运动，并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

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资本在这些政党中的力量通过文字和言论间接作用于群众——但它更直接地作用于那些与民族主义政党结盟的组织（工人、雇员、公务员）的领导人，因为与仍在发展中的运动相比，在财力雄厚的政党中，高薪职位和帝国议会席位的前景要稳定得多。

因此，我们明白，在内部克服拜金主义是多么重要，找到愿意为了人民而承担并追求人民事业的人是多么重要。

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资本主义和无限制的资本都会与真理背道而驰，人们不禁想起基督的话：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入天堂还容易！

尽管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赤裸裸的事实，但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不会因此气馁，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光明才能战胜黑暗，只有德国社会主义才能战胜马克思主义和虚假民族主义的谎言。

犹太资本主义和德国资本最终无法阻挡真理。这是我们的承诺。

德国社会主义党 威斯特伐利亚南区
Wanne i.W.，9号邮政信箱。

1939 年的德国经济政策 威廉-鲍尔

国家与企业

在德国，政府对企业的一切干预都是基于民族社会主义对企业与国家关系的构想。根据德国的理论，企业从属于国家。以前，人们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企业手中，因为据说企业是如此重要和强大，以至于它可以控制国家并决定国家政策。

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恰恰相反。今天，国家或国家政策控制或统治着企业。

我必须强调，在民族社会主义眼中，国家本身并不像绝对君主制那样具有绝对价值。最高价值是民族，我们在德语中称之为 Volksgemeinschaft，即民族共同体。国家只是民族意志的组织形式和体现。

这意味着，只要经济条件不与民族的福祉相冲突，国家就不关心经济条件。私人首创精神的原则得到了坚持。然而，如果有必要使企业符合国家的福利，国家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干预，引导企业进入所需的渠道。在德国，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反，我们没有“计划经济”，而是 “指导型 ”经济（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目标

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现行生产管理的目的。第一，确保工业原料的供应。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包含在《四年计划》中，其目的是通过增加国内生产，使德国尽可能不依赖进口。

第二，增加国内农业生产，尽可能使德国在食品领域实现自给自足。

德国只有少量的原材料，大部分原材料一直需要进口。但是，正如大家所知，进口只能用出口收入或国际收支中的其他信贷项目（如航运、保险或海外资本投资收益）来支付。战争的结果是，德国不再是债权国，而是债务国。换句话说，德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且无法从海外投资中获得巨额收入。因此，德国必须将进口限制在出口的范围内，其结果是，德国的原材料和食品进口取决于其他国家能够并愿意从德国拿走多少商品作为支付。

间接和直接调节生产

德国政府在确定对生产领域进行干预的方法时没有遵循明确的理论。这是

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最大特点之一。在解决失业问题的过程中，政府并没有遵循一种理论，如直接公共工程理论或激励私人积极性理论，而是根据当时看来最好的理论，不偏不倚地遵循这两种理论。对生产的管理也是如此。

各种措施可分为 1. 间接措施和 2. 直接措施。

国家采取间接措施时，不是干预生产和资本投资本身，而是干预制约它们的条件。

有四类特殊的间接措施：

1. 税收调节，特别是减税。

例如，为了振兴处于极低水平的汽车生产，从而刺激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德国汽车化进程，早在 1933 年，政府就取消了所有新乘用车的税收，后来又扩大到所有汽车。

这大大降低了汽车的价格，增加了汽车行业的销量。在过去的五年里，这些措施加上经济上扬，使汽车销售量大大增加，德国的汽车普及率也有了很大提高。1932 年，德国每千人中只有 19 人拥有汽车，而法国和英国分别为 41 人和 37 人；如今，德国每千人中拥有汽车的人数分别为 35 人和 51 人。

通过减税调节生产的另一个例子是对短期资本货物免征所得税。1933 年以后，这些商品的价值可以从个人的应税收入和企业的应税利润中扣除。这刺激了对此类商品的购买，也是增加资本货物行业低迷活动的一种手段。这一措施在资本货物产业充分就业后立即被废除，由此可见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弹性。

2. 间接调控生产的第二种手段是价格政策。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降低成本和提高或保证销售价格。这些方法主要用于农业领域，因为农业生产对价格变化反应迅速。人工化肥、农机和农具的价格就是降低成本的一个例子。另一方面，通过调整农产品价格，冬大麦的种植面积、纤维植物和油果的产量以及绵羊的数量都有可能大幅增加。

3. 与价格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关税政策。这一点对农产品尤为重要，因为这些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要比在德国低得多。为了弥补这些价格差异，德国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有权对进口产品进行管理。

4. 最后一种间接调控生产的方法是禁止在资本市场上发行新的私人股票。由于只允许为特殊目的发行新股，因此所有被禁止进入资本市场的贸易和工业部门的资本投资可能性都受到了限制。它们只能在自有资金允许的范围内扩建自己的工厂等。因此，1933 年在帝国银行的控制下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在发行新股之前必须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请。只有符合 “四年计划 ”目标的公司才允许私人发行股票，而且这些公司也没有其他融资渠道。

资本投资政策

在直接影响生产的众多方法中，我首先要提到的是在某些经济部门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命令。

除此以外，政府对生产的大量直接调控还包括对资本投资活动的调控。

因此，对资本投资活动的管理实际上是指有计划地引导资本投资。在开始制定四年计划时，这一点被证明是特别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投资是根据紧迫性来确定规模的。四年计划、重整军备和出口是最重要的。

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可分为以下几类： —— 禁止资本投资，其目的是防止生产能力足以满足需求的行业扩大其工厂。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地占用有限的资本和材料，避免生产过剩和由此造成的市场混乱。例如，我们在造纸业、玻璃业、部分纺织业和部分化学工业中就有这样的资本投资禁令。

其次是由政府提供利润和销售保障来调节资本投资和生产。我已经强调过，民族社会主义坚持私人主动性原则。但这并不妨碍国家在必要时减轻私营企业在实施某些项目时所承担的部分风险。国家提供的这些利润和销售保证在短纤维、汽车用油和合成橡胶的生产中尤为重要。在德国，从事这些生产的公司都是私营企业，但它们的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的保证，因为它们的产品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在某些领域，国家本身也从事生产，并为此进行资本投资。尽可能将商业留给私人去

做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在某些生产领域和某些特定条件下从事经济活动。例如，在铁矿石生产领域就是如此。

在战争中失去领土后，德国的铁矿石需求量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由国内生产来满足。考虑到当时的固定成本和价格，按照通常的开采方法，德国只有部分铁矿石的开采能够盈利。在铁矿石这样重要的领域，必须消除对进口的依赖。但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问题如此特殊和广泛，以至于国家正确地采取了主动行动。政府成立了赫尔曼-戈林帝国公司（Hermann Goering Reichswerke），其业务是开采德国盛产的低含量铁矿石。

补贴

在国内外，国家干预最古老、最著名的方法之一就是国家发放补贴。在德国以外，特别是在美国，补贴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在航运业。在这里，私营企业本身也无法以国家认为理想的方式经营一个经济部门。德国的某些生产领域也是如此。例如，某些建筑项目，如为农业工人建造住宅或为工业工人建造定居点，都是直接利用国家的捐助，或间接利用国家以极其优惠的条件提供的贷款。此外，有色金属的生产多年来一直得到国家补贴的支持。

调节原材料消费

政府生产调节措施涉及原材料消耗。几乎整个德国工业都受制于原材料配额制度。配额制的精髓在于对进口的控制，它是 1934 年作为德国对外贸易新计划的一部分引入的。这种控制由 27 个控制委员会执行，每个工业部门都有一个控制委员会。使用进口原材料的工厂只能从国外购买一定数量的原材料。通常，确定配额的依据是某个月的消耗量。但公司必须完成的订单的重要性也在考虑之列，出口订单受到特别考虑。

除了这种进口管理制度外，还有一些涉及原材料使用的法令。例如，由于羊毛和棉花的稀缺，德国颁布法令规定，所有为国内市场生产的羊毛和棉布必须含有一定比例的短纤维。某些产品，例如门把手，不能再用黄铜制造。在私人住宅建筑中，只能使用一定量的建筑用铁。这种管理制度是经过精心制定的，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太严格的官僚主义。在许多情况下，必须用无需进口即可生产的新合成原材料来取代常用原材料。使用这些新的合成原材料并不意味着降低成品的质量。恰恰相反，原材料的短缺会带来新的发明和改进，甚至会带来技术上的进步，例如丁纳橡胶（合成橡胶），如果没有这种技术进步，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劳动力供应的调节

在过去的几年中，德国的失业现象逐渐消失，而劳动力却日益短缺，政府不可能消极地看待这一现象，否则一些工业部门就有可能被迫限制生产。因此，政府必须调节劳动力的供应和各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分配。如今，德国的劳动力储备可以通过雇用更多的女性劳动力、延迟退休和雇用多余的独立工人作为工业部门的工资劳动者来保证。但这些储备相对较少，因此出现了如何提高劳动效率的问题。

但问题并不只是雇用更多的人，而是在最需要他们的行业雇用他们。因此，有必要注意某些行业的劳动力供应不会减少。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就业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得到劳动局的批准。这项法律适用于以下部门和行业：农业、林业、采矿业（煤矿

除外)、化学工业、建筑业、建材业、钢铁和金属业。德国政府希望在这些重要行业中，能够满足国家特别紧迫的需求。

提高产量

如果您要问我在生产管理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我只能告诉您几个数字，让您了解德国生产的增长幅度。今天，德国的工业总产值比 1932 年增长了 144%。甚至早在 1936 年就超过了 1929 年的最高峰，而今天的工业品产量比 1929 年多出约 30%。资本货物生产的增长比消费品生产的增长更为强劲，现在是 1932 年的四倍，是 1929 年的 1.5 倍多。

国内原材料生产领域的进步更大。铁矿石产量从 1938 年头三个月的平均 84.3 万公吨增加到了 1939 年头三个月的 122.6 万公吨。这意味着增加了 45%。此外，国内石油生产也取得了巨大进步。1938 年，短纤维产量达到 155,000 公吨，而 1933 年为 5,400 公吨，1937 年为 102,000 公吨。

消费政策

一些生产管理措施，即所有影响消费品生产的措施，也会影响消费。例如，为了保证面包的充足供应，规定所有面包都必须含有一定量的玉米面，这一点每个消费者都能感受到。(顺便提一下，鉴于收成良好，这一特殊措施已于 1938 年 10 月 1 日废除)。纺织品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变化也是如此，在这些领域，新的合成材料正逐渐占据一席之地。

消费调节 "这一概念对你们来说无疑是全新的。在经济学教科书和手册中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一主题的内容。当然，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人类不可能消费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一事实与山丘一样古老。即使在今天的现代经济体系中，个人消费也受到诸多限制。

在中世纪，对不同阶级的服装有严格的规定。重商主义国家，即 17 和 18 世纪的国家，出于经济原因限制消费，主要是为了刺激本国工业和减少进口。如果你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你会发现你的消费中没有或只有少数几个限制是国家行为的结果（你当然会记得禁酒的日子!)，但你可能会发现消费中的巨大限制是风俗、时尚、习惯、社会观点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工业生产的结果。

在几乎每家商店都能找到的六到八种草帽中，您可能很难找到一顶特别轻便、舒适，而且是您自己设计的草帽。这种草帽根本不可能生产出来，您也很难找到人按照您的设计和尺寸为您制作草帽。以机器生产帽子为合理基础的工业化帽子生产肯定做不到这一点。说到帽子，在美国，如果你戴着一顶圆盘状的毡帽，而不是普通的毡帽，走在大街上不被人耻笑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有悖于美国人的风俗习惯。最后，每个家庭必须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购买食物，而购买量与收入成反比，这无疑是对消费自由的一种限制，对个人的影响相当大。

由此可见，完全的消费自由是一个相当值得怀疑的问题。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当我谈到政府对消费的监管时，你就不会再觉得荒谬了。在专制国家，消费指导是国家极权主义主张的一部分，它使个人服从于国家的更高需求。

在德国，消费政策的目的是增加消费，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使消费适应生产，并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方针调节消费。调节消费的

目的部分是政治性的，部分是由经济形势决定的。

调节消费比调节经济中的其他任何事情都要难得多。因为消费政策的每一项措施都会影响到最大的单位，即全体人民。有关铁矿石生产行业的法令只影响到几百家企业。然而，向消费者发出的呼吁却会影响到 1,900 万或 2,000 万户家庭、7,500 万人口。仅这一点，就需要采取特殊的方法来调节消费。

我在讲述面包供应和纺织品生产时，已经暗示过这些方法。类似的还有对贸易的某些限制，根据这些限制，每个顾客只能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例如在油脂短缺的月份。

调节消费的最重要手段是宣传。当然，这种方法不能像法律措施那样保证一定成功。但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能让消费者感觉到，他是在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对他施加的唯一压力就是他的良知。

营养

德国的不幸之处在于，随着收入的增加，油脂、黄油、鸡蛋等食品的消费也会增加，但这些食品的生产和进口都有一个限度。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影响消费者尽可能多地使用德国盛产的食品，而较少地使用不那么盛产或必须进口的食品。同时，还有可能从健康的角度出发，以最佳方式指导营养。例如，我们尽一切可能让人们相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例如那些不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过于富含脂肪的饮食并不特别健康。同样，在增加鱼类消费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如今，德国人均年鱼类消费量为 26.9 磅，而五年前仅为 18.7 磅。

德国商业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Research）制定了一份食品清单，该清单概括了在规范消费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该研究所将食品分为三类，一类是应增加消费的食品，一类是应保持消费水平的食品，另一类是应限制消费的食品。

相关食品如下：

应增加消费的食品：马铃薯、糖、果酱、脱脂牛奶、乳清干酪、大麦、燕麦片、西米、人造蜂蜜、酪乳、哈尔茨干酪、林堡干酪、德国种植的蔬菜、鱼、羊肉、兔子。

维持食用：面包、糕点、面粉、水果、扁豆、猪肉、鸡蛋、牛奶、鹿肉、大米、豌豆、干果、家禽、可可、豆类、蜂蜜。

限制食用：牛肉、小牛肉、黄油、猪油、培根、人造黄油、食用油、脂肪、荞麦、小米、进口蔬菜、高脂奶酪。

在德国，我们不像美国那样全年都有固定的食品供应。因此，研究所制定了一份清单，列出了在某些月份应特别加强供应的食品。我举两个月份为例： 一月：猪肉、鹅、鱼、卷心菜、根茎类蔬菜、水果和蔬菜汁。九月：羊肉、家禽、蘑菇、腌菜、西红柿、豆类、沙拉、菠菜、李子、梨和苹果。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并不是唯一可以消费的商品，而是要教育公众根据某些食品供应的波动来调整自己的饮食。为此目的而开展的宣传活动不是由商业研究所或政府直接进行的，而是由帝国食品区（Reichsnährstand）等组织和私营企业进行的。

另一项具有相同目的的措施是反浪费运动。从其名称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目的。

其他消费领域

其他领域的消费管理问题与食品领域的问题同样严重。众所周知，德国生产纺织品、鞋类等所需的大部分原材料必须进口。在过去的五年中，由于收入的大幅增长，对这

些商品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因此，出现了消费超过生产可能性的危险。由于在这方面不可能强行限制消费者，因此主要通过宣传手段，把消费引向那些消费可能性几乎不受限制的领域。因此，消费被引导到旅游、戏剧、体育等所有服务领域。低价普及型汽车的问世也意味着把消费引向了一种可以大量生产以满足需求的商品。

当然，宣传本身是不够的。因为恰恰是在那些消费者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消费领域，最难让他把钱用在希望他买的东西上。因此，各种形式的降价对宣传起到了有效的支持作用。在这方面，低价流行汽车也是最好的例子。这种汽车的价格约为 1 000 帝国马克，比其他汽车便宜得多。此外，低价流行收音机也促进了这一领域的购买。这种收音机还在不断改进和降价。德国国营铁路公司（Reichsbahn）规定，所有大型展览会，如汽车展览会、无线电展览会、体育运动会等，都可享受优惠票价，使更多的人能够利用这些机会。

有组织的消费

消费管理的一个特殊领域是由大型政治单位，特别是德国劳工阵线组织的消费。在这里，政治和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是一致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影响工人，使他们尽可能多地把收入花在能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的方面，而尽可能少地花在给德国外汇收支造成负担的方面。通过组织可以实现降价，而这些降价将使工人有可能做那些以前只有条件较好的阶层才能做得起的事情。

有组织消费领域的主要因素是 Kraft durch Freude“欢乐带来力量 ”组织。下面的数字和例子说明了所做的工作。截至 1937 年，有 900 万德国公民进行了旅行和徒步旅行。1938 年 5 月至 9 月期间，从柏林安排的 350 次度假旅行中随机抽取了以下旅行： ——

到上巴伐利亚旅行两周的费用为 60-50 帝国马克，在波罗的海逗留 8 天的费用仅为 31 帝国马克，到东普鲁士旅行 16 天的费用仅为 41 帝国马克。这些费用包括所有费用：火车票、食宿、旅行等。在上一个戏剧季，即 1937/1938 年，“欢乐带来力量 ”组织安排了 7000 场戏剧演出。仅为汽车公路上的工人就安排了约 7000 场音乐会和娱乐活动。在过去的四年中，有 3400 万人参加了 “Feierabend”组织安排的文化娱乐晚会。有 700 万人参加了体育展览、体操、游戏等活动。吕根岛正在建设一个大型海滨度假胜地，将为两万人提供娱乐和休息的机会。

德国工人出海游览了葡萄牙、马德拉、挪威和意大利。截至 1937 年底，已有超过 18 万人次参加了此类旅行。最近，德国劳工阵线推出了自己的轮船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 ”和 “罗伯特-莱伊号”，这两艘轮船是专门为海上旅行建造和安装的。计划为此建造约 20 艘蒸汽船。就像在豪华邮轮上一样，在 “威廉-古斯特洛夫 ”号和 “罗伯特-莱 ”号上，你可以每天用淡水洗澡，在船舱里享用自来水和冷热水，喝冰水，在大游泳池里游泳，在运动室里玩耍，享受甲板上的各种游戏，晚上跳舞或参加一些娱乐活动。陆上旅行与北德劳埃德公司或汉堡-美洲航运公司安排的旅行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包括从柏林到热那亚的铁路旅行和从汉堡到柏林的铁路旅行在内，整个三周的费用仅为 158.37 帝国马克。通常的规定是，只有那些月收入不超过 300 帝国马克的工人才能参加这些旅行；实际上，大多数参加者的月收入都不到 200 帝国马克。

所有这些有组织消费的可能性，每年都有更多的人参加，导致德国的生活水平无法用

通常的方法来确定，而且，我想在最后说的是，还导致德国的生活水平无法与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进行统计比较。因此，当你们读到有关德国生活水平的任何统计数字时，你们自己也会有这样的印象，即在听过这些旅行等活动之后，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德国的生活水平受到许多无法用统计数字来说明的因素的影响。

经济改革还是革命 鲁道夫 荣格

经济改革还是革命？

“只有有目的、有创造力的改革工作，而不是革命，才能克服当今难以维持的社会状况。”（民族社会主义党的指导原则。）私人资本主义秩序以纯粹利润为导向，拒绝一切理想主义追求，在它所依赖的无灵魂的物质主义中孕育了自己的敌人。然而，物质主义及其明显的利己主义和自私，同样不适合为社会主义提供精神基础，即社会经济和社会精神。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集体劳动，为集体服务。它体现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原则中。

当然，这一原则需要人们做出很大的自我牺牲。然而，自我牺牲并不是一种物质主义的冲动，而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因此，在我们看来，虽然可以说在物质主义时代长大的人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成员，但社会主义却永远无法以这种方式实现，在这种基础上和这样的人身上尝试社会主义，最终只会以失败告终！我们将提供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通常呈现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带有马克思主义烙印的共产主义。今天，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再次就两种倾向中哪一种能够带来人民幸福展开了争论，就像过去艾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之间的冲突一样。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因此都坚持集体财产的概念。历史上不乏共产主义实验。如果它们成功了，那也仅仅是暂时的，而且总是在政治实体的领导者被赋予绝对权力的情形下。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巴拉圭的耶稣会国家。但一旦这种绝对权力的情形不复存在，它们就会失败！最近，即自马克思主义者渴望并竭尽全力实现的崩溃以来，我们在巴伐利亚和匈牙利看到了这种例子。除了他们的直接受益者，即像昆、托勒、莱文等最悲惨的波兰犹太人之外，没有人会声称这些例子值得效仿。在更远的俄罗斯，悲剧仍在上演。谋杀、火灾、破坏、压制不同意见，都在那里上演。这不过是建立犹太人世界统治的新尝试，其目的与资本主义相同，所采用的方法也与我们在附近看到的方法完全相同。独裁统治在这里和那里都存在，因此奴隶制在这里和那里都存在。犹太人不知道任何其他形式的统治。因此，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并维护他们的独裁权力是完全符合事物本质的。

毕竟，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制度早就崩溃了。如果一个人有意识地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该如此——那么他就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一边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一边又对第三国际的入会条件充满愤慨，这种做法是荒谬的。此外，这种态度也是虚伪的，因为实际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通过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共产主义。关于这一点，请注意我们在“通往未来的大门”一章中给出的解释。我们在那里引用了《共产党宣言》，并得到了德意志帝国社会民主党最优秀思想家之一保罗·伦施博士的帮助。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该党无可争议的最有天赋的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一些补充意见。在他广为流传的著

作《妇女与社会主义》中，他描述了通往马克思主义社会目标的道路，该书已经出版了无数版本，内容如下：

1. 阶级对抗加剧，其原因是：
2. 资本主义工业集中。这直接导致：a）工业取代农业；b）逐步无产阶级化；c）财富集中。
3. 危机日益严峻。
4.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革命。这是建立在剥夺剥夺者，即剥夺剥夺者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废除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1. 所有健全的人都应被要求工作。
2. 利益和谐应占主导地位。
3. 劳动将被组织起来。
4. 生产力将得到提高。
5. 消费能力将得到增强。
6.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比将消失。
7. 所有人将承担平等的工作义务。卡尔·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一旦人们成为完美的天使，国家最终将自行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无国家社会，这是马克思从英国知识界借来的概念，我们之前已经通过英国对国家的概念“私人个体社会”有所了解。顺便说一下，英国（诺曼底）和犹太思想在此点上再次交汇，因为国家概念对于无国家的犹太民族来说自然很陌生。对巴勒斯坦国的渴望仅限于狭隘的圈子，几乎形同虚设。对祖国土地的热爱对于国家概念而言是绝对必要的。但谁能向犹太人这样的无家可归者灌输这种情感呢？国家的消亡不会突然发生，而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阶级国家的迂回实现，即“无产阶级专政”。

恩格斯在批评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评论： “资产阶级国家并没有被废除。相反，资产阶级国家之后是无产阶级国家，既然每个国家都是阶级统治，那么无产阶级国家也是阶级统治；既然每个国家都是压迫机制，那么无产阶级国家也是压迫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机制。”因此，国家作为统治一个阶级的工具，应该转变为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来实现呢？ 只需通过其他人用来维持统治的完全相同的方法：军国主义之类。 因此，整个马克思主义教育体系几乎完全源自这种饱受诟病的军国主义，这并不奇怪。 自军国主义被消除以来，社会民主主义群众中的纪律和训练遭受了不可否认的损失；自那时起，分裂和分裂的癌才变得无法治愈。许多意象和美学都借鉴自这种饱受诟病的军国主义，包括操练。人们只需回忆一下“工人营的步调”，他们排着队走过大多跛足的领导者，在类似阅兵式的群众集会上游行。

归根结底，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也是借鉴自军国主义思维：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它们本质上都是模仿品。为了说明问题，请允许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中世纪的贵族是一个严格隔离的阶层，拥有自己的习俗和传统，以及独特的荣誉地位。在贵族制度解体后，这些习俗和传统被作为遗产传承给了兰斯克内特，然后是常备军，最后在全民征兵时代成为军官团独有的权限。其目的是培养一个具有特定服务职责的阶

层。罗马教会在禁止神父结婚方面也有类似的制度。中世纪的三种社会阶层——贵族、教会和资产阶级——都有各自独特的习俗和制度。

随后，第四个阶级出现了：无产阶级。在当时，将他们从贵族和神职人员中分离出来，并赋予他们阶级身份：阶级意识，是有意义的。他们的直接目标应该是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斗争不仅是为了阶级斗争本身，而且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今天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样的？它针对谁？由谁领导？它的武器是什么？社会民主党纲领（1901 年维也纳纲领）指出："社会民主党工人党致力于解放全体人民，不分民族、种族或性别，摆脱经济依赖的桎梏…… 造成这种悲惨状况的原因并不在于个别政治机构，而在于……劳动工具被个人所有者垄断。因此，作为劳动力的承载者，工人阶级陷入了对劳动工具（包括土地）所有者、大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最令人窒息的依赖之中…… "技术进步、生产与所有权日益集中……导致越来越多的先前独立的小企业家和小农场主失去生产资料，沦为直接或间接依赖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雇员或债奴。无产阶级群众正在壮大，但他们的剥削程度也在增加…… "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就越有义务和能力与之斗争。个人生产的取代也使得个人所有权变得更加多余和有害……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意识到必须促进和加速这一发展…… 推动这一必要发展的只能是无产阶级本身，他们觉醒了阶级意识，并为阶级斗争组织起来。

从这些句子中我们学到了什么？

1.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消除对劳动手段的垄断。
2. 劳动手段不仅包括土地，还包括所有资本财产，包括所有工厂、设施等。
3. 无产阶级是雇佣工人、雇员和资本的债务奴隶。4. 个人所有权——不受限制——是有害的，应该消除。或多或少隐藏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消除大庄园和资本的所有权，而且在于消除所有私人所有权，即集体财产的最终目标，即共产主义。
5. 与富人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它最终会促进和加速上述共产主义进程。
6. 它由觉醒了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领导。我们之前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历史时刻熟睡的。由于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英国、美国、法国——在战场上结成了同盟，1918 年的阶级斗争本应在战壕中进行，而不是怯懦地丢弃武器，鼓励人们逃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却因自己的错误而遭受了它最大的失败——就在它本应胜利的时候。德国工人正在为领导人的错误和失败付出代价，他们为协约国资本主义（即犹太金融资本）服务了 42 年。这一可怕事实的体现就是德意志帝国被迫支付的 21.7 万亿马克（即 217000 亿）。犹太领导集团感受到了这一失败，尽管他们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那些总是高谈阔论社会革命的人，除了"革命"和"没收"（剥夺）之外，其他所有词都是"社会化"（社会所有制），他们把所有不赞同他们的人称为"改良主义分子"和"雇主的走狗"，现在突然 发现他们自己纲领中制定的目标过于宏大，对共产主义能否完全实现心存疑虑，现在只想"将已经成熟的企业社会化"——那么，除了在资本主义面前彻底缴械投降，这还能说明什么？但这就是左右派、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第二、第二和第三国际、社会叛徒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区别。

与此同时，所谓的右翼分子抓住一切机会反复强调他们也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必须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实是同一回事！例如，前奥地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第一位学术领袖卡尔·伦纳博士在 15 个月前就在因斯布鲁克明确宣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追求的目标相同，只是实现目标的方式不同；共产主义者倾向于通过武力实现目标，而社会民主党则通过和平渗透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工人提升到能够承担社会 企业管理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雷纳博士来说，这是一段相当有力的文字，人们已经习惯了他各种概念上的扭曲。在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中，奥托·鲍尔博士——旧奥地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位学术泰斗，在写作时还是德奥“社会化部长”——对布尔什维克做出了毁灭性的评价，而此前他在《工人日报》上曾长时间赞美过他们。例如，鲍尔博士认为，布尔什维克艺术的杰作——农业公社——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毋庸置疑，”鲍尔博士说，“许多公社严重偏离了指令中描述的理想化形象；其中一些迅速崩溃；另一些则资本主义化，从事大规模非法贸易，剥削周边小农作为他们的雇佣劳动力。” 但奥托·鲍尔博士所反对的不仅仅是土地公有制；他更全面地反对整个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在其著作第 87 页上对此进行了总结：“西欧和中欧社会的阶级结构、其脆弱的经济体系以及对国际贸易关系的依赖，要求经济革命应以渐进、有计划的方式进行重组。” 鲍尔博士在这里宣扬的，无非是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一战末期宣布即将实现的社会革命在哪里？

悔过自新的鲍尔博士在这里所说的不再是革命，而是改良；不再是红色，而是——用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言来说——彻头彻尾的黄色！正是我们代表的改良主义社会主义观点，让雷纳博士和鲍尔博士凭借个人经验变得明智，并得以表达。
他们的观点与我们的党纲中的话非常相似：“只有有目的、有创造力的改革工作，而不是革命，才能克服当今难以维持的社会状况。”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社会颠覆性（社会革命性），因此任何背离这些原则的行为都意味着其思想上的崩溃。从一开始，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就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情况迟早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拥护经济改革的立场。用民族主义的话说，我们现在是、将来也是革命者；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我们一直是改革者，没有理由改变这一立场。

农业

德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巨大的动荡之中。经过数百年的悲惨发展，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今天我们正目睹这场革命的最后阶段，这场革命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德国的面貌，还会改变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的面貌。只有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力量才能将一个饱受压迫、悲痛欲绝、自我分裂的民族塑造成一个积极向上、忠于职守、英勇无畏的民族。只有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才能将因 1918 年的崩溃和政治经济灾难而心怀怨恨的德国人民培养成一个自我牺牲、积极主动、具有社区意识的人民同志。任何人想要理解和领悟我们这个时代的原因，就必须不怕困难——抛开眼前的一切忧虑和记忆——去回想那些年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为在国家中夺取权力和废除十一月制度而斗争的岁月。

根本性变革

如果说这是我第一次受元首委任后在汉诺威发表演讲，那是因为我在很多方面都把这个地区视为“我自己的”，我可以称它为家。近二十年前，我在哥廷根当工读生时就成了冲锋队队员。三年来，我作为汉诺威技术大学的助教，一直在汉诺威宣传和争取

民族社会主义思想。最后，当我于 1928 年在汉诺威乡村租下土地时，我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是赢得当地人民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支持。当时，我为争取下萨克森人的心而奋斗，先是作为党的演说家，然后作为汉诺威南部　选区的普鲁士州议会议员。将民族社会主义思想从一个村庄传播到另一个村庄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因为农民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任何用政治口号做广告的人。但是，尽管我深深地被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绝对正确性所感染，我也坚信农民将成为阿道夫·希特勒最忠诚的人。而后来的事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正是那些明显的农村选区首先产生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多数。这种表白所表达的忠诚——我在这里可以表达这一点——不仅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不断增长。我国人民在战争中取得的成就就是这一点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在夺取政权的那一刻，民族社会主义的农业政策承担了一项艰难的遗产。我不需要详细讲述 1918 年至 1933 年那段惨淡时期。它应该仍然生动地留在所有人的记忆中。然而，有一点我必须强调，自 1933 年以来的重建工作不仅意味着消除经济困难，而且最重要的是迈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第一步。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意识形态上，自由主义人生观的糟粕都必须清除，一个半世纪以来，这种人生观主宰了德国人与社区、经济以及国家生活所有其他方面的关系。个人的首要地位必须被社区的信念和意志所克服。只有在实现这一原则时，目的才是建立在“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则基础上的健康的国家和经济生活。正是出于这种观点，1933 年制定了根本的革命性土地政治法。其中第一部是《帝国农业法》，它指向了我们人民最远的未来。随后是《帝国食品法》、农业市场组织法和其他众多农业政策和农业经济措施。

秉承民族社会主义精神

那么，为什么这些法律在夺取政权后会如此迅速地颁布呢？难道应该只赋予一个阶层的人民特权吗？

是否应该独立于人民生活之外，专门挑战一个阶级？不，我的同胞们，正是新帝国的农业政策深深植根于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观。这些法律不仅针对农民，而且针对整个德国人民。农民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和血统力量起着决定性作用。民族社会主义的所有政治和经济要求都有“农民”的概念，这只有在强大、有活力的农民保证人民的生物未来并确保经济独立，即最重要的是食物自由的情况下才有意义，才能实现。

因此，德国的农业政策完全是出于民族社会主义精神。元首当时为我们设定的任务是：拯救农民不能仅靠经济措施和援助来解决；因为一方面，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让我们满意地证明，经济援助最多只能取得部分成功；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保护农民不是为了农民本身，而是为了确保农民为人民的未来完成生物学任务。因此，制定和实施新农业法的不是任何农业专家、农业从业者或部门，而是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中成长并参与斗争的人。今天，当我们将德国的农业政策与苏维埃俄国的农业政策进行比较时，这些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民族社会主义精神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在任何一个领域，民族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对抗都比农业政策更大；在我们这里，它的特点是，世袭农场是农民氏族的基础，而集体农场则压制了个人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和自我责任，从而导致曾经繁荣的俄罗斯农业和食品经济衰落。因此，直到今天，我们才特别迫切地意识到，民族社会主义农业政策不仅在今天，而且在今后所有时代都保留了多少基础。由此不言而喻，德国的农业政策是而且必须继续是民族社会主义工

人党的任务。只有这个党才拥有必要的动态和革命动力以及前瞻性精神，以保持农业政策、原则和指导方针的纯洁性，继续塑造它们，并确保负责实施农业政策的机构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农业政策处于前台

近年来，这些原则有时似乎被置于当前问题的次要地位。德国地域狭小、土地稀缺、自由发展导致德国对国外粮食供应的依赖，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粮食政策成为焦点。但这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之所以能够推行粮食政策，是因为农业政策这一先决条件在 1933 年已经通过几项法律得到了彻底解决。在这一框架下，德国能够果断通过农业政策。只有健康的农业政策才能为健康的粮食经济创造先决条件。这句话的正确性已由德国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的粮食经济表现得到证明。因此，这项民族社会主义农业政策的制定必须回到它唯一能够找到必要行动的地方，即党内、帝国农业政策办公室。

任务分配清晰

你们必须清楚一点：大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使得农业领域中许多决定性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这些问题在大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前是无法解决的。然而，只有当国家中最积极和最坚定的人站出来解决这些问题时，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我们不想忽视和忘记 1933 年实施新农业政策时面临的有时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用新的、有远见的形式取代过时的形式总是极其困难的，总是会有人思想僵化、缺乏对未来的远见，他们会带着无数的疑虑反对任何新秩序。德国和欧洲农业政策领域的重组也将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解决这些重大任务需要党的充分承诺和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当元首委托我管理帝国领袖、帝国农业领袖和帝国食品农业部长的事务时，我决定在帝国农业政策办公室、帝国营养委员会和帝国食品部之间实施明确的任务分工。同时，这也为从根本上简化行政管理并建立一个简单明了的组织提供了机会，在这个组织中，所有可用的力量都可以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根据领导是党的任务这一原则，我解散了前帝国食品局的帝国农业局。它的任务，就政治领导而言，我转移到了纳粹党的帝国农业政策办公室。旧帝国农业局的其他工作领域，例如农村人民所需的职业、社会、经济、法律和社会关怀。实施和执行我们土地法规的任务被分配给了改组的帝国总务局。这必然导致土地和地区农民协会的管理工作相应简化。我已解散或解散了迄今为止在帝国主要部门之外存在的所有特别代表或特别办公室。他们的职责已转移到帝国总部。因此，帝国食品委员会的力量已经集中起来，以适应战争的严重性以及帝国食品委员会现在和将来需要执行的任务的规模。

怀着真正的理想主义

我的战友们，农民不喜欢从他健康的人生观的核心出发被“管理”。他反对任何官僚结构。另一方面，管理是必要的。但它不能成为目的本身。哪里有秩序的观念，哪里就必须有维持秩序的工具。然而，必须清楚的是，创造性不能来自行政，即使是最好的行政也只能管理现有的事物，即从本质上保留它。然而，革命时代设定了新的形式。他们甚至必须有意识地创造一些与传统结构相反的新事物，而传统结构依靠人的自我牺牲个性来创造新的健康、可行的条件。因此，为了考虑到我们时代的动态，在建立帝国主义立场时，有意识地采用了自我管理和荣誉领导的形式 。 然而，这种健康

的想法不应被夸大到现在由荣誉领导来执行同样在帝国管理机构中必不可少的行政任务。因此，新的帝国管理机构 I（实质上构成实际管理机构）将来将由公务员而不是荣誉农民领导。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需要所有相关人员和力量的战斗阵线。未来的任务不能通过工作队形来解决，而只能通过真正的理想主义来解决。重要的不是谁做了什么，而是做了什么。决定性的不是威望或地位，而是任务本身。因此，我们为在我们队伍中战斗的每个人感到自豪。是的，我们不可能有足够的人来合作加强和提高农民作为我们血统的承载者和我们粮食自由的保证者。民族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永远不应该看到我们之间的分歧，而应该只看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今天为我们设定的任务值得把这个共同点放在首位。因此，我特别欢迎纳粹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被元首任命为德国人民团结帝国专员。因此，作为首批措施之一，我并没有通过纸面协议，而是从德国民族巩固委员会指派了两名人员。同样，与党的其他部门合作的基础已经建立。通过这篇短文，我阐明了帝国农业政策办公室、帝国食品委员会之间任务分配的基本形式以及与其他帝国部门开展合作的启动。

通过这一简要概述，我描述了帝国农业政策办公室、帝国食品委员会和帝国食品部之间任务分配的主要形式，并指出了与其他帝国机构的合作。最后，我要指出，帝国农业政策办公室，也就是党，将来将负责制定农业政策的基本方针，而帝国营养部将负责国家管理，帝国营养局将负责农业和营养任务的实际实施。这为我所呼吁的所有机构的合作创造了明确的工作领域和先决条件。

当前的粮食问题

当德国农民现在回顾过去的时光时，我们可以毫不自大地说，这个国家的男女和青年在保卫我们的面包的斗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我们可以毫不自大地说，这个国家的男女和青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德国农村人民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大军，就像德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在这里，我可以自豪地再次强调，元首本人将德国农民的成就描述为独一无二的。德国农民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自生产斗争开始以来，他们用自己的土地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大大提高。尽管战争和战争条件造成了种种困难，但生产再次增加了，特别是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生产再次增加了，从而为维持我们人民的军事力量和劳动和人力创造了先决条件。

但是，德国农民在上一次春耕中超越了自己。这几周取得的成就在德国农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今年，我们在谷物和种子油方面遭受的冬季损失比几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去年秋天耕种的约 250 万公顷土地必须在今年春天重新耕种。这意味着面积相当于下萨克森州、威斯特伐利亚州和奥尔登堡的农业用地面积。尽管缺乏人力和有限的运营资源，这项额外的工作还是完成了。同时，与正常年份相比，天气条件使春季工作的开始时间推迟了整整四个星期。也许只有考虑到根据现有统计数据，1917 年约有 300 万公顷土地未耕种，才能充分理解这一成就。相比之下，在这场战争的第三次春耕中，几乎没有一公顷土地未耕种。此外，我们不仅维持了总种植面积，而且还增加了块根作物的种植面积，这需要特别大量的劳动。同样，在甜菜方面，近年来种植面积大幅增加的情况再次出现。今年春天，马铃薯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可能比我们计划和预期的还要大。在这方面，我们不要忘记，在世界大战年 1917 年，马铃薯

种植面积比 1914 年减少了约 80 万公顷，甜菜种植面积比 1914 年减少了约 17 万公顷，而今天，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我们不仅已经大大扩大了块根作物的种植面积，而且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块根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大大增加，例如，在马铃薯方面，与前一年的高水平相比，增加了约 40 万公顷 = 13%。

营运资源供给

不言而喻，重新种植过冬土地需要大量额外的农业投入、种子、设备和燃料。鉴于众所周知的贸易困难局面——货物供应——每公斤货物无论如何都要精确地重新分配和分配配额，最初似乎不可能满足这些额外的需求。今天我可以说，德国农业管理部门已经尽一切可能满足这些额外的要求。显然，这并非没有摩擦和困难。重新种植过冬地区所需的种子数量已经采购完毕，尽管仅夏季种子谷物的需求就增加了约 250%。几周内，运输了 130,000 多车马铃薯种子，是去年和平时期的两倍多。鉴于德国国铁除了正常用于军事和其他与战争有关的运输外，还为德国食品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粮食供应出现局部困难，这是由于运输条件恶劣。但是，对于给定的运输量，我们认为先运输种子然后再运输干燥剂更为明智。在这方面，战时条件也设定了我们无法超越的极限。

满足重新排序后增加的燃料需求是一项特别困难的任务。尽管如此，德国农业仍然能够在有限的运营资源分配下应对今年春季巨大的工作高峰，这再次证明了每一位农场经理都在努力利用有限的资源做到最好。德国农业可以放心，在如此困难的时期，管理层将尽一切努力。但就像军事领导层必须详细规划向士兵提供的弹药和口粮一样，但在执行计划时会出现困难，偶尔会出现短缺，但部队仍然会继续战斗并取得胜利，德国农业在未来将继续坚守阵地。可以肯定的是，将尽一切可能促进其在战争努力框架内完成任务。

生产本身很重要，但最终重要的是向人民提供食物。食物的供应量证明，这个国家也可以依靠这里的人民。早在 1940/41 年之后，农业部门就被要求在 1941/42 战争年再次提供超过预期近 80 万吨的面包谷物。由于食用土豆的消费量从战前的 1300 万吨增加到去年的约 2300 万吨，土豆收获利用率的变化也表明了农业部门交付的模范意愿。如果没有农场经理及其追随者的这种交付意愿，毫无疑问，在过去几周内，不可能保证大消费区土豆的供应量达到实际水平，也不可能赶上早期的土豆收获。只有向农户提供其所需的最后数量的马铃薯，以及经济本身，才有可能弥补马铃薯库存的霜冻损失，并满足数十万吨种薯的额外需求。

社区努力的成功

然而，农业部门一贯乐于提供牛奶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向奶牛场提供牛奶的发展。1941 年，牛奶供应量比 1938 年增加了不少于 30 亿升。然而，额外提供的 30 亿升牛奶使得额外生产了 90,000 吨黄油成为可能，鉴于世界市场石油供应的减少，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纪念我们农村人民的这些成就时，我必须指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工作都没有受到国家强制，就像世界大战期间一样。元首不是毫无意义地呼吁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牺牲精神。

他们日复一日地工作，经常在田野、马厩和其他任何需要的地方工作到深夜，他们通过这些努力超越了自己。要对这一努力做出公正的评价，只有留到以后才能做出评

价。这一巨大的成功对帝国的军事和军事经济实力具有决定性意义，部分归功于每个人，包括农场领导人、农业追随者、农村妇女以及农村的男孩和女孩。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的志愿农民领袖，特别是 60,000 多名当地农民领袖，他们与支持农场领袖努力的农业追随者一起表现出无条件的忠诚。即使是从自己的收入中，农业工人也为市场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农场经理本人在前线时，农场工人在农场妻子身边接管农场管理并不罕见。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同胞必须承担的沉重负担。大家一定亲眼见过农场，男人们都在田里干活，而女人独自一人管理农场，通常只有外国劳工来帮她。我们并不抱幻想，女人往往不得不做超出其自然职责的事情。整个德国人民都对她感激不尽。作为孩子的母亲和我们国家力量的支撑者，未来更有必要给予她应得的救济。作为德国农村人民的代言人，我也有责任借此机会感谢所有为粮食安全做出杰出贡献的帮助者。党动员了数以万计的帮助者，为艰苦奋斗的农村前线提供同志般的援助。德国农村人民不会忘记城乡社区精神的这种表现。

我们尤其要感谢劳工部署专员、Gauleiter Pg. Sauckel 及其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他们从东部招募了数十万名工人，这一成就在几周内就完成了，尽管困难往往难以克服，但这一成就仍将继续实现。然而，尽管有如此巨大的帮助，所有人的合作，尤其是妇女和年轻人的合作，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功地恢复收成并确保新的播种。因此，我们欢迎德国女议员弗劳·舒尔茨-克林克（Frau Scholtz-Klink）向城市妇女发出的呼吁，帮助这位德国乡村妇女更轻松地完成她伟大而决定性的任务。

尚待完成的任务

各位国民！过去的岁月对你们来说是艰难困苦的。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有这样的感觉，在新的德国国家和经济秩序的框架内，农村经济只是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到目前为止，只对人民提出了要求，而整个人民并没有做出相应的不言而喻的回应。但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评估事实。在目前的斗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里，德国国民经济首先要进行军备工作，使德国的剑更加锋利。政治和军事发展证明，军事和工业建设、西墙的建设、装甲车、飞机和齿轮的生产是最重要的任务。元首本人也曾多次表示，他非常遗憾不得不放弃为德国人民所做的伟大和平工作，首先确保人民的自由。迄今为止，民族社会主义农业政策基本上只致力于争取食物自由，通过放弃对农民劳动的公平报酬，使屠杀和必要的 Aufrustung 成为可能。农民居住地的健康、人民和经济重组的所有基本问题都必须放在一边，直到胜利在这里也铺平道路。重组原则然而，这种重组的革命性开端已经由早在 1933 年颁布的《帝国继承法》发起。前面提到的迫切的营养和经济需求最初阻碍了帝国世袭法院法案中规定的原则的正确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清楚，随着《世袭法》的颁布，农村结构的重组开始了，即建立健康的农场，即使这些原则的最终实现由于德国生活空间狭窄而失败。

在被凡尔赛条约扼杀的德国，世袭法院的理念几乎不可能得到彻底的突破。对德国农民的大规模改革、世袭地产法的不可或缺的扩展都无法实现。在一个仍有数百万失业者需要安置的国家，谈论继承法和德国农民的新组织，起初似乎有些荒谬。

毕竟，当时城市郊区的荒凉定居点和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小规模定居点被视为缓解劳动和经济困难的一种手段。似乎不是农场的合并和扩大提供了出路，而是将农场划分

为小型和微型企业。必须回顾这一发展，才能理解世袭农场的想法有多么具有革命性。德国军队的胜利进军带来了新的局面。

有足够的土地可供数十万新农民家庭过上健康的生活。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着手重组土地所有权，不仅在新地区，而且在帝国本身也创建新的法人实体。我们现在将能够实现一种合理而明智的所有权结构，以保护人民的力量并保障他们的生计。这项伟大的工作将需要数年时间。

在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尤其是那些熟悉这些地区并将被征服的土地变成德国土地的士兵的帮助下，在占领的土地上定居下来的同时，还可以将许多本土无力生存的小型和微型农场改造成可以使用现代机械的健康农场。这种结构性变化必须谨慎进行，以免破坏古老农业定居点的生活源泉。德国历史上愿意定居的德国人将再次向东迁移。只有在德国农民重组和土地重新分配所建立的健康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开始村庄重组。通过德国农民的复兴和村庄的改组，将建立经济平衡，从而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从而为农民能够履行其最重要的任务——成为人民血液的源泉——创造先决条件。因为要定居的地区越大，农民的这一最基本任务就越突出，因为，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的，安全的粮食政策完全是健全的农业政策的结果。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

帝国的领导层知道你们，男男女女，所做的前期工作。元首本人保证，在这次胜利之后，整个德国人民将加紧努力改善农村人民的生活条件。今天困扰你们的所有问题——农村人口外流、农场劳动力价值低估、价格问题、必要投入的供应、结构设计和农场现代化——都将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自行找到解决方案。如果我在这里简要概述未来的任务和解决方案，也是为了帮助你们这些被日常忧虑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展望未来。与这个未来相比，目前的困难，尽管在我们看来很困难，但微不足道。没有牺牲和斗争，就不会有新事物诞生。但这种新事物的基本形式早在 1933 年就已在 NSDAP 的农业政策中奠定，现在才得以充分发展。因此，农业政策现在正进入一个新的决定性阶段。如果其核心——世袭农场——只涵盖了狭隘德国农业的一部分，那么它就会走出这个狭隘的框架。不仅因为新领土上将出现无数的世袭农场，不仅因为旧帝国领土上将通过重新分配产生新的世袭农场，而且因为旧帝国将授予所有宣誓效忠民族社会主义和人民并在战争期间和战时经济中以行动和表现证实了这种效忠的人世袭农场地位；因为世袭农场不是以经济巩固为目的，而是为了保护氏族，保护氏族作为不断增长的人民的核心而进行的经济巩固。

战争中的保存

民族社会主义农业政策规定的任务和目标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只能用以下术语来提及，我的同胞们，你们可以相信，你们会感到荣幸。因此，德国农村人民也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充分享受对其成就的无限制评估。然而，这一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胜利。因此，我们的任务必须是以最无情的努力完成既定的战争任务：

1. 我们必须生产德国土地所能生产的最大粮食
2. 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向市场供应粮食，同时尽量节约自己的消费。

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量不应让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战争的第四年，我们要完成的任务不会更少，而是更多。在战争的第四年，我将要求你们比以前做得更多。去

年冬天给我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我们必须克服这些打击，也一定会克服它们。你们自己最清楚，为什么今年冬季谷物和种子油的产量会降低。我们必须通过增加交货量来弥补这一不足。为了供应前线，我必须期望农业部门在供应方面超越通常的经济极限，以便为战斗前线和国内提供供应。因此，我呼吁你们表现出色、发挥精神和态度。正是通过你们的表现，即将到来的收成才会毫发无损，你们所有的力量都将用于准备下一季的收成。但你们的精神和态度是各领域大丰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这种态度和表现的人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仅要尊敬这少数人，而且为了队伍的整洁，还要对他们进行惩戒性惩罚。但是你们其他许多人，你们这些工人和勇士，不仅要通过自己的模范表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还必须以必要的民族社会主义进攻精神，敦促那些软弱或受苦的人坚定信仰，恪守承诺。正是根据这一古老的斗争法则，民族社会主义才得以开始，并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根据这一法则，在下萨克森州，一小群民族社会主义者也通过他们的承诺和斗争，在元首的帮助下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今天，对于你们这些绝大多数忠实信徒来说，赢得少数人的支持要容易得多。这场战争关乎整个国家的生存。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如果国家崩溃，敌人会在经济和民众上消灭我们。现在，全体人民的力量已经到了极限。本土阵线必须像士兵一样对这场斗争的结果负责。如果没有足够的营养，无论是人力还是国家都无法维持。

在这场斗争中，让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为了帝国而战的战士，他们完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劳动和财产。让我们记住，在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在日常工作的重担下崩溃的时刻，我们在前线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他们以无与伦比的牺牲和无比的勇气，在为帝国而战的斗争中牺牲了生命。英雄主义使布尔什维主义远离了我们的边界。让我们也记住，在那些时刻，东部农业组织的人们，他们在特别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创造了条件，使东部的新地区能够开始向德国和欧洲供应粮食、种子油和其他产品。让我们在此刻振作起来！让我们不要被日常生活的烦恼所压垮。我们已经宣誓无条件效忠元首。这个誓言将会遵守。尽管目前的困难可能很大，但我们不想高估它们。我们总是希望在伟大时代和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的背景下看待它们。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这场战争中保护农民将对其在国家中的未来地位及其在国家社会中的价值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今天的牺牲将在胜利后以多种方式得到回报。因此，我们相信领袖和他的历史使命，想回到我们辛勤的工作中去。在未来，就像过去几年一样，我们希望成为元首最忠实的追随者。我们未来几周和几个月的唯一指导方针和口号只能是：为我们的武器的胜利而努力，从而为我们种族的胜利而努力！

劳动、劳动者、社会政策　沃尔特·岑

工作不是负担，不是苦役，不是束缚，甚至不是耻辱。工作不是一个人为了快乐和满足而必须摆脱的东西。工作是一种道德责任，是上帝的恩赐，是一种祝福。颓废的挥霍者“不必工作”的目标，是堕落、非德国人的懒汉的目标。但数百万坚强德国人的热切愿望是“能够工作”。这是对能够分享工作带来的幸福的渴望。这是通过忠诚和最佳工作表现成为国家宝贵成员的奋斗。工作也绝不是、主要不是填饱肚子的手段。工作绝不是个人维持生计的唯一手段。工作是对人类所赋身心能力的尽责、有目的的

使用。近年来，德国失业人数众多，劳动力市场低迷，数百万德国穷苦男女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工作的恩惠。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渴望将自己的劳动和技能用于有意义的工作。

例如，数以千计年轻、强壮的工业工人自愿脱离家庭、朋友和熟悉的环境，到农村从事志愿服务，连续数月没有任何报酬，这又该如何理解？但在这里，他们可以创造，在这里，他们的行动又有了意义。**失业的祸害让数百万人明白，人不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工作是上帝赐予的礼物，人应该心存感激，工作赋予了他生命的意义。没有人只为他自己工作，只为个人利益；所有工作都是为了社会大众。在德国劳动的伟大机器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每项任务，即使是最微小的，都必须忠实地执行，机器才能运转。因此，工作是为国家服务，是个人对国家社会的道德义务。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工作的道德评价永远不会有任何差异。国家**“在必要的情况下，即使经过几个世纪的教育，也必须打破无视体力活动的荒谬观念。它必须根据个人的工作表现形式和质量来评估个人，而不是根据其工作的性质来评估。”**（摘自希特勒《我的奋斗》第 482 页）。

对于人民而言，擦窗工与政治家的工作同样重要。所有工作都是崇高的，无论穿着工作服还是燕尾服。能够履行自己的工作义务，为人民服务，对每个德国人来说都是一种荣耀。但一个人如果从人民手中抽身而退，甚至利用自己的劳动损害德国人民的利益，就会给自己带来耻辱和不光彩。因为没有人有权随意支配自己的劳动能力，因为每个人的劳动能力都是全体人民的财产。只有这种所有劳动都是崇高的观念才能成为真正的民族共同体的前提，从而克服阶级斗争。

每一种工作的价值都有两个方面：纯粹的物质价值和理想价值。（希特勒：《我的奋斗》，第 483 页。）工作的物质价值以工资金额来表示。工资金额取决于工作直接或间接地为尽可能多的国民带来的利益。而理想价值则不取决于物质价值/

但个人所受的尊重取决于工作的价值。价值评估有三个可能的基础：

a）工资收入，b）工作种类，c）完成任务的方式。

前面已经提到，工资的多少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个人物质财富的多寡，不应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应确保每个人都能从事符合其能力的工作；有才能的人应从事适合他们的工作。由于能力决定了从事的工作类型，但身体和心理能力是天赋，无法后天习得，因此也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所以对工作的评估也不能取决于工作类型。

“对一个人的评价必须基于他完成社会赋予他的任务的方式。”（希特勒，《我的奋斗》，第 484 页）。没有工作，人就会在精神和肉体上退化。没有工作，人就无法履行其荣誉义务。因此，他有权工作，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赋予他这项权利。认为向人们提供维持物质生活的手段而不是工作就足够了，这是愚蠢且错误的。当然，这种支持是必要的。但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会忘记，这只是维持生计的可怜手段。因为人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工作，只有工作。因此，**新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何筹集资金来保障数百万失业德国人的生计，而是如何为每个人创造工作机会。**

一个国家能够有效利用现有劳动力，它就是富裕的。因此，在国家中，任何劳动力都不会感到不满。因此，创造就业机会和培养劳动力是国家首要任务之一。基于这种

对劳动力的看法，我们与过去自由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形成了鲜明对比。《魏玛宪法》第 163 条规定：“在不损害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每个德国人都有道德义务根据整体利益发挥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每个德国人都有机会通过经济工作来谋生。” 过去的岁月表明，这一措辞优美的宪法原则不过是空洞的言辞，因为自宪法通过以来采取的措施根本没有遵守这些规定。根据第 163 RV 条的附注。“如果无法证明德国人拥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则应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旧制度剥夺了数百万德国人履行其道德义务的机会。事实上，人们甚至觉得，前政权满足于建立一个行政机构，其唯一目的是统计数百万失业者的数据。但必须坚决否认的是，国家采取一切可能和可行的措施为德国人民提供工作机会的宪法义务并未得到履行。**过去国家体制的这种态度是由犹太-马克思主义政权对工作本身的基本态度所决定的。**

在这里，工作首先是一种确保个人物质生活的方式。只有物质上得到保障的德国人才有价值。因此，每个人都首先照顾好自己，如果需要，甚至不惜损害他人，甚至损害自己的人民。反复赚钱的人被认为是勤奋的。但那些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因道德和伦理方面的考虑而受到阻碍的人，则被认为是愚蠢的。由于这些禁忌对犹太人来说无关紧要，他们便从中渔利。于是，贪婪之魂愈演愈烈，在巴尔马特、库蒂斯克等地结出恶果。

这是所有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民族团结的破坏！诚实、忠诚的工作在哪里？好吧，它仍然存在，存在于德国普通工人的身上，他们也受到了“拜物教”的感染，即犹太高收入者优越论。

但即使是在诚实劳动的地方，人们也往往只是半心半意地工作，因为这样赚不到钱。每笔不诚实的暴利都比诚实劳动赚得更多。 轻松赚钱，肆意挥霍，成为贬低诚实劳动的代名词。无需赘述这种堕落和毁灭的状态。但有一点应该牢记：**这种对工作的不尊重不仅是由贪婪引起的；德国人民为了绕着金牛跳舞，一点一点地牺牲了生活中所有其他的东西。**对上帝的信仰消失了，教堂变得空荡荡的。艺术变得与人民格格不入，毫无意义。德国科学的独立性在哪里？它也变成了商品。

懦弱变成了美德，有组织的懦弱、和平主义则成了犹太-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政治理想。因此，我们光荣的德国民族被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诱惑、欺骗和背叛，在毫无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狂潮中走向深渊。我们面临着所有民族的必然命运，就像罗马一样，当他们完全陷入贪婪、不道德和懦弱的魔爪时，当他们的工作不再是荣誉和崇高，而是一种负担和劳累时，他们就会灭亡。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将我们的人民从诱惑者的魔爪中解救了出来，在危难时刻将他们从深渊中拯救出来。国家现在摆脱了耻辱的压力。在我们民族生活的新民族社会主义时代，工作将再次成为人们的福祉。

5 月 1 日，新的德国劳动节，德国工人在游行中举着数千面旗帜，旗帜上的字句将成为我们未来的指路明灯：**劳动使人高尚。尊重劳动！尊重工人！**

国家所能支配的德国劳动力总量与人类息息相关。国家中每个身体健全的同志都是劳动力的主人，因此也是合理利用这一宝贵财富、造福全民族的保障。**德国工人（此处工人一词具有最广泛的意义）不应被随意对待和利用。工人不仅有工作的义务，而且在道义上有责任谨慎对待自己的劳动。那些不顾健康、过度劳累的人不仅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国家。**

因此，每个国民都有责任锻炼身体，以便长期为国家做出最大贡献。国家也有责任为国民提供锻炼身体的机会。但劳动者不仅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也是国家这个活生生的有机体的一部分，是国家民族的同志，是城市或农村社区的公民，是职业的成员，是家庭的成员。因此，在新的德国，能够工作的德国国家同志不仅被视为劳动力的所有者。国家必须意识到，劳动者也是民族同志。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将永远铭记这一点。

民族社会主义的信条是，**所有工作都是崇高的，它将劳动和劳动者置于一切思想和行动的中心。人是尘世团结的中心，而不是借贷资本。**

与上个世纪的思维模式相比，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并非只是出于人类错误而追逐物质主义的幻影。不，那是一种制度，一种考虑。这种拜金主义是犹太人摧毁我们德国民族特性的表现。因此，民族社会主义思想要求在民族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再教育；因此，也有必要在我们的思想中重新定义社会政策的概念。社会政策是一般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永远不能脱离国家政策而单独存在，就像在真空中一样。

社会政策必须服务于总体的国家政策。无论一部分人的社会和政治需求多么合理，如果满足这些需求会损害人民的整体福祉，那么这些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社会政策与总体的国家政策密不可分，因此与全体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还需要证明吗？所有德国人都必须清楚，他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任何变化，无论是在宪法、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会对德国国内的社会状况产生追溯性影响。凡尔赛条约的社会后果让每个德国人都清楚这一点。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政策始终与全民意愿保持一致。因此，社会政策始终致力于为德国政治的新基础服务并符合其要求。以下仅列举几个目前决定社会政策的重要基础：

1. **种族纯洁和民族振兴，**
2. **确保后代数量增加且健康，**
3. **加强人民的健康和安全，**
4. **确保自卫能力，**
5. **国民教育等。**

但正如社会政策受其他政治行为和目标的影响并朝着特定方向发展一样，其他所有政治行为也必须符合基本的社会政策目标。社会政策不是一项不考虑其他行动领域的从属政治活动。它本身是一项政策，同样重要。社会政策是整个国家政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环节。正如健康的人体中各个器官协调一致，国家也只有在各个器官之间保持最佳平衡时，才能保持健康。如果国家机体生病了，那么必须更加重视那些能够治愈疾病的器官。因此，新德国的德国社会政策应该是一项有机政策。过去并非如此。我们只需回顾一下劳动部与经济事务部之间的多年冲突。劳动部的任务是维护工人的利益，而经济事务部则必须代表雇主的利益。因此，一个部是工人部，另一个是雇主部。

因此，阶级斗争甚至在政府权力中也有明显的体现。结果呢？结果总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烂摊子。能够巧妙利用随机出现的对他有利的政治局势的部长意见必须占上风。

如果可以用数字来表示一位或另一位部长能够取得多少成果，如果把这些数字组合成一条统计曲线，那么就会得到一条奇特的曲线，生动地描绘出战后社会政策毫无意义的起伏。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劳动部和经济部之间的这场永恒战争终于结束了。

但这也标志着德国社会立法的妥协性质走到了尽头，因为这种立法从未为任何人主持过公道，因为它从未为劳动者和经济服务过。

当然，在未来，工人和企业家也会抱有不同的期望。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解决这些相互冲突的愿望将是对双方都公平的，因为它将以双方都同样关心的整体利益为基础。因为只有真正为德国工人服务，才能不伤害德国人民。

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最初评估是多么愚蠢！**有组织的工人领袖报告称，以民族社会主义为幌子的反动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反过来，相当一部分企业领袖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他们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将获得新的发展。不，利益集团政治已经终结。新帝国的社会政策永远不会成为利益集团政治；但经济政策也不会成为利益集团政治。两者都必须服务于人民普遍福祉这一更高目标。**

在国家社会框架内推行社会政策，无非是为了推崇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推崇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即人人平等，而民族社会主义则将个人对国家整体贡献的原则放在首位。它不给予任何恩惠，而是根据古老的普鲁士格言“各得其所”提出要求，要求城乡工人获得他们应得的国民繁荣成果，这是他们与企业家共同创造的。

只要自由主义主导着企业家阶层，它自然会抵制任何出于社会政治动机的利润削减。因此，民族社会主义设想了企业家的思想和精神转变。他以及他的员工必须感到自己是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并据此行事。那些不想或因种族倾向而无法融入民族整体的人，将被排除在民族共同体之外。

从长远来看，如果民族内部的团结不能得到恢复，企业家也无法实现经济复苏。“但民族社会主义也拒绝向那些被证明对国家有害的员工提供社会福利。因为民族社会主义政策不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博爱”和世界博爱政策，而是完全服务于民族主义。它不想扶助无能者和不合适者，而是支持优秀的民族核心。

它的首要任务不是保护弱者，而是为增强德国人民的力量提供必要的资源。社会政策是所有与国民经济工作及其与环境和国家关系相关的努力和活动的总和。虽然社会政策不仅包括工人和雇员，还包括中产阶级成员，例如德国农民，但从狭义上讲，社会政策实际上只与从事经济工资劳动的国民有关，因此只与工人和雇员有关。我们并不总是能够明确地区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国内政策、外交政策等之间的界限。因此，在像本研究这样的社会政治研究中，我们也会或多或少地涉及相邻领域，这取决于各个子领域的重要性。

全球经济危机的最终原因 戈特弗里德-费德

多年来，学者、政治家和政治家们一直在绞尽脑汁，试图找出所谓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这场危机对战胜国和战败国都造成了同样的影响。毫无疑问，现有的政治和经济解释也不足以解释全球经济危机的突然爆发。如果我在下文指出全球经济危机最深刻、因此也是最被忽视的最终原因，我想明确指出，这并不否定已知的危机原因，这些原因已经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特别是在德国，已经产生了如此毁灭性的影响。

相反，正是因为危机存在某些部分不可避免的原因，有远见的政治家们更应该关注消除导致世界普遍苦难的政治原因。即使是我们战时敌人中最爱报复的政治家们也明白，强加给德国的疯狂赔偿负担必然会导致德国经济的崩溃。德国大部分民众也普遍认为，德国政治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战后时期的疯狂举债。

大型银行的倒闭和资本市场的持续危机证明，在这一领域尤其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糟糕的政党政治对德国经济的破坏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这也是德国陷入困境的众多原因之一。但所有这些原因都不足以解释德国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探究。毫无疑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我们正处于技术时代的末期。技术时代所有伟大而重要的基础显然已经奠定，世界基本上已经具备了技术时代的成就，技术、工业时代的巨大崛起之后，整体技术设施领域却出现了崩溃。工厂的生产能力大幅提高，而市场吸收这些产品的能力却越来越弱。多年前，我已经用曲线图说明了这一点。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发展曲线最初呈急剧上升趋势，但随后呈 S 形向下弯曲。这条曲线适用于整个技术工业发展的总体进程，也适用于技术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个别现象。铁路系统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它可以说是交通和技术时代的典型代表。

当然，铁路发展曲线的起点是发明。与所有基础一样，最大的困难是在早期确立自己的地位，铁路这个如今已成为共同财产的创意，也是在同时代人的抵制下艰难前行。埃尔兰根医学委员会反对铁路的臭名昭著的报告广为人知，根据该报告，乘坐火车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乘客和旁观者的健康构成极大的危险，因此铁路线必须用木板围起来。众所周知，在这些木板围栏中，只有当时学者们头脑中的木板被保留了下来，供后人研究。铁路和铁路旅行缓慢而费力地流行开来。

然而，很快，每个人都相信铁路具有非凡的优势。新的铁路随处可见，铁路成为公共交通工具，整个行业都涌入了这个巨大的活动领域。新的机车工厂、车厢工厂、铁路工厂、铁路技术用品工厂不断涌现，无数铁路建设公司应运而生。钢铁建筑公司获得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桥梁建设订单，德国各大城市都建起了巨大的车站大厅，建筑业蓬勃发展，隧道建设公司也迎来了大量工作 ，并建立了许多附属工厂，生产车厢的联轴器、照明设备和内饰配件。

这种原始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确实在短短几十年内就成功地将铁路网络覆盖了整个德国。德国最小的城镇都建起了火车站，主干线和支线几乎通达每个村庄。越来越多的工厂为铁路提供产品，营业额也稳步增长，这促使德国企业家不断进行新的投资，仿佛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然而，几十年后，德国已经饱和——大约在世纪之交——不再需要新的铁路线。更换的交付量根本无法让工厂和公司保持满负荷运转。247 型机车、货车和铁路网的质量极佳，使用寿命可达 30 年、40 年甚至更长，而大型固定设施、轨道、车站和车站大厅、管理大楼等则可维持数百年之久。

然而，德国的需求却出乎意料地迅速崩溃了——但世界之大，德国铁路建设者凭借大胆的企业家精神，打入世界市场，推动工业化进程，最重要的是，在广阔的世界中建设铁路。然而，在进军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他们第一次与英美和法国的铁路行业发生了冲突，后者的发展道路与他们完全相同，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产品销路。在激烈的竞争中，德国铁路工业也成功获得了巨大的销售区域和交付量，直到 1914 年左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历史性时刻，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国有化，世界铁路工业成功地将所有重要且意义非凡的铁路线包围在全球范围内。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所有主要铁路均已建成，它们在世界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铁路建设达到了顶峰：世界铁路已经饱和。

所有工厂的生产能力和效率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世界大战没有造成大量铁路车辆的损耗，如果战后时期没有需要大量订单来更换战争期间被毁坏的铁路材料，那么即使是在 1925 年左右，铁路行业也会出现大幅下滑。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一发展。铁路的发展适用于技术时代鼎盛时期几乎所有重大的技术投资和设施。

在同一时期——我们暂时还是以德国为例——几乎所有德国城市、中型城镇和小型城镇以及大部分村庄都铺设了自来水管道。这些重大设施也为德国钢铁和建筑行业带来了数十亿订单。

数十万公里各种规格的水管、数百万个接头和配件、阀门和分支、水表和水龙头必须制造和安装。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行业的大量订单与数千个存储设施、水塔和集水系统的建设相关。如今，这一切也即将结束。水管如果无法至少持续使用一百年而不出现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根据管道和轧钢厂、建筑公司和安装公司的表现，原本可以在短短十年内为整个德国提供第二个供水管网。德国所有城市的燃气工程也是如此。这一安装也发生在同一段短时间内，主要是在 1860 年至 1910 年之间。电报、电话和邮政网络的巨大扩张是另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与之相伴的是整个德国经济的机械化。数十万马力被蒸汽、水以及最终被电力所取代。电气工程作为科技领域最年轻、最引以为傲的分支，在德国取得了更快的胜利。幸运的是，大型架空线路和大型发电厂的扩建工作是在战后进行的，因此，在艰难的过渡时期，铁路建设仍需要投入数十亿资金。农业、服装业和食品业的机械化释放了大量劳动力，使其得以转向机器。最后，德国工业的整体效率已经提高到了一个程度，任何需求都不足以让德国工业的生产力感到满足。

然而，与此同时，德国的工业设施已经全部完成，而在外部世界，工业化国家的民族工业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完美的程度，以至于为了争夺遥远的外国的每一个订单，都展开了最激烈的竞争。在国外，主要的技术设施也已完成。机器已经基本取代了人力，失业者没有购买剩余商品的购买力，现在，他们反过来主动关闭机器。技术时代的巨大上升之后，必然是下降，甚至是崩溃，这是不可避免的。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危机是由世界工业产能与世界市场迅速下降的吸收能力之间的差异引起的。

人们不应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新的、强大的技术进步将取代它。真正重大的技术任务已经完成。征服天空无疑是最后一个重大技术任务，但原则上已经解决了。然而，一项最终且艰巨的任务仍然存在，那就是为人们提供技术完善的供暖系统。任何一位睁大眼睛参观过近几十年大型技术展览的人都会注意到，尽管技术进步和细节层出不穷，但最近几次技术博览会却给人一种疲惫、颓废的感觉。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大手笔和新意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为整个全球工业注入新的动力。任何记得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汽车、第一台电动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任何记得第一台蒸汽轮机、柴油发动机、第一盏电探照灯、第一台大型特快列车发动机的革命意义的人，都必须承认，相比之下，即使是近年来无线电和电影带来的轰动，也远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伟大的技术工业时代即将结束，就像世界历史上的其他伟大时代一样，它代表着一种独特的魅力，不会再重现，就像古希腊醉心于美的艺术、罗马帝国对权力的渴望或文艺复兴的巨大复兴一样，仅举几个伟大

的现象。有远见的政治家必须做好准备，因为工业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雇佣数百万工人。当然，为了确保更新换代并为当前磨损提供备件，仍有大量技术工作要做。当然，仍会有许多重大技术创新，特别是在汽车和航空领域，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即新的运输方式的出现也将取代之前的大量工作。目前，汽车或飞机运输的每公吨公里和每乘客公里都会从铁路运输中夺走相应的货运量。整个德国机车和货车行业的崩溃，尤其是最近博西格工厂的倒闭，与其说是政治管理不善的结果，不如说是上述技术原因导致的。

无论通过借贷资金还是“春天资金”，也没有工人接管工厂，任何力量都无法振兴工业，使其恢复昔日的辉煌，因为人们已经不再需要这些产品了。请注意，没有任何需求能够利用工厂的巨大产能，让成千上万人重新获得长期工作。新建的 250 家工厂只能勉强满足这些工厂 10%的产能。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国家监管机构能够采取慷慨措施，这种相对突然的需求崩溃本可以得到缓解，如果像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口政策那样慷慨的计划得以实施，失业的毁灭性后果本可以得到部分抵消。这项人口政策设想将背井离乡的城市人口重新安置到农村，它并不满足于小规模、边缘化的定居点，而是要求对年轻的德国人进行大规模的再农业化。当然，金融资本在技术时代发展中的破坏性作用不应被低估，相反，其残酷的意义应该得到强调。上图中的第二条曲线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点的非常明确的信息：利息和复利曲线，这本身就是纯粹贷款资本时代发展的另一个例子。

从数学上讲，所示曲线是二次曲线，即 x = y2，在经历最初的缓慢上升后，很快就会越来越陡峭，最终趋近于无穷大。我再举一个例子，据说自基督诞生以来，有一分钱一直被用于投资利息和复利，每 15 年，本金就会翻一番。如今，这枚一分钱硬币，如果以复利计算，其价值将大到我们整个地球的黄金总量都不足以代表。只有用纯金制成的所有行星和太阳的 20 倍，才能大致相当于这枚一分钱硬币的价值，如果以复利计算，从基督诞生以来。这显示了利息经济本身的奇妙乌托邦。理论上，这条曲线很容易绘制和计算，但实际上，利息总是与工作挂钩，因此利息收入永远无法超过所做的工作量。在某种程度上，利率曲线表明了一种错误、反经济原则是如何阴险狡诈地占据主导地位的，它最初是如何缓慢而不起眼地远远落后于工业创造的财富的，在技术发展的最初几年，贷款资本对适度的利率感到满意，而工业则以巨额股息百分比来显示其丰厚的收益，这日益刺激了金融资本的胃口。

现在，贷款资本几乎将其资本强加给经济，越来越多的投资获得了融资，经济的匿名化程度越来越高，个人主动性和创业技能日益被削弱，而崛起时代的伟大经济领袖则被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等取代。企业变成了分红工厂，而不是满足需求的地方。国际高利贷者贪婪的目光鼓励着这种疯狂的追逐，他们期待通过这种方式攫取所有劳动的成果。

最终，利率曲线刺破了整个技术-工业经济产生的财富曲线。通过公共生活的腐败，有人试图迫使技术的经济力量完全为金融服务。在疯狂的漩涡中，高利金融的贪婪像水龙卷一样席卷了世界生产；但正如水龙卷没有内部支撑、没有内部结构，所谓的压缩现象很快就会出现在水龙卷上一样，这一系列危机频发现象多年来也一直在高利金融领域出现。

我们面临的事实是，世界金融正陷入一场巨大的危机，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危机，这场危机将不可避免地也将拖垮那些本应支持金融业的行业。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打破利益束缚，重组资本主义体系，向世界展示大型公共工程融资的新方法，在过渡时期实施创造就业机会的慷慨计划，然后，从长远来看 经济和技术计划，准备重新实现土地国有化，这样在一到二十年内，我们整个国家就能在更高的文明和文化水平上，成长为更加和平的时代，扎根于土地和对国家的热爱。

反对资本主义 阿尔伯特 科尔博斯

如果这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那就太可笑了。非常聪明的 Herr Professorvon Freytag-Loringhoven 教授站起来，认真地宣布，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计划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切。然后，Deutsche Tageszeitung,Kreuzzeitung 和其他民族主义报纸给予他——他们在战术问题上真正无法忍受的人——全力支持，用"民族马克思主义者"的童话故事再次伤害了他们浮夸自大的读者。而与此同时，从左方传来的是嚎叫：资本主义的奴仆，企业家的狗。你们只是为了让白种犹太人更好地剥削劳动群众而与黑种犹太人斗争。你们这些可恶的无产阶级叛徒，打爆你的狗头。现在，这些吵闹的指控者中谁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是"神圣财产"的敌人，还是它的仆人；我们不可能同时是两者？但我们既不是这一种，也不是那一种。亲爱的左派朋友，你诅咒资本主义，把它理解为那种神秘的力量，它剥夺了你的正当工资，让你住在黑暗的狗洞里，让你的孩子从年轻时就逐渐成长为枯萎和疲惫的生物。你抨击这种制度，尽管你有努力工作但是一无所获，不过它允许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带着可笑的养老金和痛苦的弥留之语滑入坟墓："所有这些艰苦和辛劳的意义何在？"当你疲惫地摸索着穿过潮湿、黑暗的街道回家时，看到豪华的门厅和奢华的店面，你的拳头愤然握紧："我们的劳动，我们的勤奋——而那些其他人，那些游手好闲的人，那些狡猾的人，却享受着其中的快乐和好处。"这就是你的想法，当人们考虑到你和你的兄弟们毫无意义的生活，他们工作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看不到自己和孩子的未来，那么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你的仇恨和你的渴望，你说的没错："资本主义对我们的苦难负有责任，因此必须予以摧毁"。但是，当你试图在事物的基础上，即在资本或财产及其分配方面理解和解释资本主义的性质时，你就错了。重要的不是资产本身，而是站在它们背后并规范其使用的知识态度和精神。

资本本身既非善也非恶。它完全取决于管理它的人，它是否成为一种祝福或诅咒。资本可以而且应该是实现更高目标的一种手段——满足需求，甚至是实现人民的文化。然而，今天，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目的，或者成为一种工具，用于对纯粹的唯物主义快乐的渴望进行原始、淫荡的放纵。因此，人们为什么要积累毫无意义的财富；生产和制造只能通过毫无意义的广告来销售的东西；在农民应该定居的地方建造工厂；忘记了土地是第一资产，也是最后资产。利息是他们的战斗口号，而[Rente]是他们的偶像。现在你从左翼走来，试图改变这一切，让它变得更好。但你们的出发点是多么奇怪啊。你们希望把资本从个人手中夺走，让它通过所谓的"民主"的方式由社区管理。因此，你们希望能够保证每个人，也就是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的潜在的世俗幸福。对你们来说，快乐也是最大的善，劳动是最大的恶。是的，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你

们神圣的马克思的这一学说是由支配着"证券交易所大亨和烟囱大亨"的实践的同样恶毒的资本主义精神所支配的吗？"你们真的认为，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发起人本身就是铁杆的资本家，你们就可以用另一种制度来摧毁资本主义吗？看看他们，你们的"领导人"，在政界和商界，看看他们是如何"舒服"地把自己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

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积极和消极经济形式。一种形式需要另一种形式；两者都不可能获胜，都会给大众带来贫困和痛苦，同时将各种财富和快乐赐予被选择的少数人。因此，这些被选中的人是生来就是经济的主人，还是由被剥削的大众"民主选举"出来的，这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这也正是与你们相干，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亲爱的当代人。你大谈"私有财产的神圣性"，要求无条件地保护它，因为它是所有文化和道德的基础。真是胡言乱语！请看看今天这个令人满意的世界，让我看看产生文化和道德的财产是什么。财产越多，就越缺乏真正的道德和活的文化。不，亲爱的朋友，你对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的看法和你的对手对财产是万恶之源的看法一样错误。一切都取决于个人和他的态度。当财产是一种责任，当每一个民族同志都有自己的财产时，财产就成为一种祝福。但是，当大约 70%的人民不得不在没有财产的情况下生活时，谈论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是一种无耻的挑衅。把重点放在第一个词——"私有"上，也是完全不符合国人、民族主义绅士的做法。这是符合罗马人的法律概念的。

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认为，所有的财产都是国家的世袭财产，各自的主人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必须管理这些财产。他有权利获得财富，但这种获利决不能通过剥削其他民族同志来实现。满足需求是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口号，而不是分红或利息。我们不相信财产绝对平等的必要性，但我们坚信，必须保证每个身体健康的人都有财产和进步的权利。

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所有那些无法控制的、单一的经济集团，这些集团今天已经把我们大约 80%的民族同志变成了依赖性的雇员，对他们来说，甚至工会也不能再保障对面包和自由的公正要求。实现我们目标的途径包括取得国家政权等。但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创造一种新人，能够通过为国家服务的活生生的精神来克服资本主义的恶性唯物主义精神。

黄金的力量只能被那些蔑视它的人打破。

资本主义奴隶市场 格雷戈尔-施特拉瑟

“自由万岁！德国万岁！革命成就万岁！”德国工人，你熟悉这些口号吗？难道你从报纸上认不出它们吗？特别是在所谓的“宪法庆典”期间，报纸用最大的字体印刷这些口号，以便像号角声一样唤起你的激情，号召你加入革命。

是的，在犹太绅士编辑的舒适房间里，在工会大佬的大房间里，确实有适合散布此类口号的环境，谈论民主和自由是如此容易，革命的成果被居住者生动地展示出来。

然而，我想让你们看看另一幅画面，一幅你们大多数人已经知道的画面，你们通过可耻的经历、恐惧的担忧了解到这幅画面：失业的客观证据！——他们成百上千地站在那里，德国男女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脸色苍白、憔悴、饥饿、迟钝、憎恨、痛苦；他们排着蜿蜒的长队，一个接一个地等待，只为从冰冷柜台后得到一个冷酷的答案“不”，

然后领到微不足道的救济金，这些钱不足以维持生计，却足以让人饿死。他们站在那里，有各个年龄段的，有各个职业的，有处于身体和精神困扰各个阶段的，他们什么都不想要，只想要一份工作，只想要一份微薄的收入，以便能够为自己和家里的孩子买面包，只想要一份工作，以便能够摆脱 数个月甚至数年的被迫失业所带来的身心折磨——他们太累了，累得要死，精疲力竭，甚至不再奢望找到高薪、舒适的工作；他们甚至不再把自己当作 人，一个完整的人，他们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生活，让自己的孩子生活，拥有幸福和阳光，并把自己的幸福和阳光传递给他们的孩子；相反，他们只想要工作，只想要微薄的工资，只想要最终再次找到工作——但他们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奴隶市场，比古代的奴隶市场要糟糕一千倍，因为在那里，每个奴隶都能找到工作，每个奴隶都能为自己和家人提供面包、衣服和住所，他是主人眼中的有价值之物——但在这里，他可以 倒在地上，而没有人会为他感到难过，他的家人可能会挨饿，住在地洞里——这一切都是以自由的名义，以民主的名义，以革命成就的名义！

失业的人，你们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今天仍然有工作的工人；这个月还没有被解雇的员工；暂时还没有被解雇的公务员——你们为什么要忍受超过 200 万德国兄弟姐妹每天在奴隶市场上兜售自己，忍受超过 500 万年迈的父母、操劳的妻子和愁眉苦脸的孩子在屈辱的牢笼中饱受饥饿折磨，因绝望和永恒的苦难而精神崩溃？为什么你们容忍数百万工人只能靠小时工来维持生计，他们的收入仅够勉强糊口，只能推迟身体和情绪上的衰弱？

你们为什么忍受这样的事实:你们1500万德国工人连同你们的家属占德国人口的85%，你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焦虑之中 对未来充满焦虑，内心充满痛苦，担心明天、下个月发工资那天或下个月初，自己还能不能买到面包、买得起衣服、有地方住！

为什么你们要忍受可怕的恐惧，这种恐惧困扰着你们生命的每一年，折磨着你们，让你们不禁自问：“当我无法工作时，我该怎么办？为什么你要忍受生活中所有最大的快乐——组建家庭、养育健康快乐的孩子——却被一个把你当作奴隶的剥削制度所毒害，为什么你要忍受生活中所有最小的快乐——在森林里安静地做白日梦、为你的小孩子们摆弄玩具——却被金钱的力量剥夺了这些快乐？

为什么你们要忍受这种奴隶般的存在，它剥夺了你们作为人的尊严，剥夺了你们享受生活乐趣的权利，把你们本该成为赞美上帝的赞歌的生活——按照自然永恒的法则和所有人的不朽权利——变成了赞美魔鬼的仇恨之歌，变成了痛苦、绝望、悲惨、恐怖和死亡的邪恶赞歌？

兄弟姐妹们，你们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

因为你们被欺骗和蒙蔽了双眼，以至于无法认清真正的敌人，而正是他造成了你们的痛苦！因为你们的头脑和心灵被毒害了，你们在可悲的盲目中互相攻击：失业者攻击仍在工作的人；工人攻击白领雇员；城市居民攻击农民；农民攻击公务员，等等！因为你们被煽动起来互相攻击： 共产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两者都反对“资产阶级”；国旗团反对钢盔团；红色阵线反对民族主义！——为什么？他们不是你们的同胞吗？他们不是也遭受着同样的不幸和奴役吗？不是同样的鞭子抽打着你们所有人吗？不是同样的苦难折磨着你们所有人吗？你们的生活不是同样不幸吗？你们所有人的人权不是都被剥夺了吗？

你们为什么忍受谎言和欺骗？或者，谈论“自由”、鼓吹“民主”和为“革命成就”欢呼，同时在这些口号下，德国人民沦为奴隶，数以百万计地挤在奴隶市场上，其中大多数人将生活视为折磨，将世界视为地狱，这难道不是谎言和欺骗吗？

你们为什么忍受这样的欺骗和谎言？因为你们是盲人，并且希望继续当盲人！因为你们不想看到我们展示给你们的东西，不想听到我们告诉你们的东西——我们用文字和图片展示给你们的东西，用演讲、文章和无数会议告诉你们的东西！

一旦你认识到自己是奴隶；一旦你意识到“自由”、“民主”和“革命成果”不过是犹太人厚颜无耻的谎言，目的是阻止你反抗奴隶制；一旦你明白，正是犹太教的谎言和欺骗让你与他人 ——你的视野将逐渐清晰，认清敌人，你的心将摆脱几十年来虚假、卑劣的欺骗所造成的束缚，最终你会感受到并理解，我们是一个由兄弟组成的民族，被同样的力量束缚，被同样的力量奴役！

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能打破枷锁，共同高呼：

打倒资本主义奴役！打倒吸血的国际金融！打倒他们的领袖、代言人、走狗：毒害民族的犹太教！

民族革命万岁！社会革命万岁！他们的共同目标万岁：

作为所有有生产力的德国民族同志的共同体，在生产性民族劳动的共同阵线中团结起来，迎接即将来临的、带来救赎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 约瑟夫-戈培尔

资本主义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与一个事物的关系。导致我们社会苦难的原因不是矿山、工厂、房屋和土地所有权、铁路基础设施、货币和股票组合，而是对人民的这些产品的滥用。因此，资本主义无非是对民族资本的滥用、尽管这一定义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事务。它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它代表了一个原则。资本主义是对人民产品的不当使用，而滥用产品的人就是资本家。矿井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民群众提供煤炭，使他们能够获得光明和温暖。工厂、房屋、土地、金钱和股份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让人民成为奴隶。拥有这些物品并不意味着权利，而是责任。财产意味着责任，不是对自己的钱包负责，而是对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负责。最初，矿山是为生产服务的，而生产是为人民服务的。

不是钱发明了人，而是人发明了钱，为了让钱服从于他们，而不是让钱征服他们。如果我滥用经济产品，以此来折磨我的人民，那么我就不配拥有这些产品。那么我就把生活的意义扭曲成它的反面；我是一个经济资本家。如果我从事文化资产[Kulturgütern]的滥用，例如，如果我为经济或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那么我就是委托给我的资产的糟糕管理者：一个文化资本家。当资本主义所服务的个人目的与全体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形式。于是，它以物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人为出发点。金钱成为一切围绕的轴心。社会主义的情况则相反。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从人民开始，然后转向事物。事物从属于人民；社会主义者将人民臵于一切之上，而事物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则应用于经济生活，就会出现以下情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为生产服务，而生产又依赖于金钱的力量。虚幻的金钱战胜了活生生的实体——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货币是为生产服务的，而生

产是为人民服务的。幽灵般的金钱从属于人民群众的血肉共同体。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国家只能发挥调节作用。它是两者之间的裁决者，但当人民群众受到威胁时，它就会无情地进行干预。对它来说，无论如何只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如果在经济斗争中，它站在那些敌视人民的人一边——无论他们可能声称是多么的民族主义——那么它就是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如果它为正义和与之同义的国家需要服务，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

尽管这些原则在理论上可能显得简单而透明，但在政治实践中却很困难和复杂。它们取决于一千个具体问题，包括技术和商业考虑，全球经济条件和国际政治限制的问题。但所有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内在没有个性、外在被奴役的人民来说都是无法解决的。今天的德国就是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是不容争论的。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压迫者劳作和奴役，没有时间考虑是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更不用说我们是否有机会，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力量，把它付诸实践。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在 1918 年 11 月 9 日那个不幸的日子里所犯的致命错误：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战争，允许自己在革命中受骗，但仍然可以推翻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位珞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只有通过武装才能实现。在历史上，新的世界观——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从来没有通过屈服而取得胜利，而总是只能通过抵抗和进攻。

1918 年，德国社会主义者只有一个任务：保持武装并捍卫德国社会主义。这一点并没有做到。人们谈论和通过决议，而德国工人甚至没有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他只是为令他最痛苦的敌人——世界金融业提供了一条腿。这种愚蠢行为的结果是：灭国。

口头上是社会民主，实际上是世界资本的奴隶种植园。我们采取了反对这种做法的立场。因为我们是希望金钱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所以我们要反抗这种状况，激发打破不可容忍的制度的意愿，以便在“民主货币”国际王国的废墟上，总有一天会出现社会主义的德国民族国家。

论资本主义的性质 奥托 斯特拉瑟

一个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也是令人倍感遗憾的——事实是，**术语使用得越频繁，使用的人越多，就变得越模糊，就像硬币过手的人越多，就越磨的越破。**

同样的情况是，任何使用一个术语的人都只能在他自己的智力概念中传达这个术语，然后说"按我理解来说"；同样有效的事实是，随着术语的普及，它们的准确性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而且它们被传播的范围越大，这一点就越被证实。很少有术语能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一样，在价值的恶化和认知的变化方面表现得如此明显，这两个术语旨在指定两个相互敌对的体系。现在有什么不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呢？

首先是两种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独裁者　　（'共产主义者'）。

除了这些，还有'前线社会主义'、'青年社会主义'，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社会主义'！

这种把'社会主义'这个名字加在自己身上的癖好表达了一种感觉，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这里有一些新的事物，一些重要的东西，情感和理性都认为有必要分一杯羹，至少在名字上是这样。（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这些不同的潮流，特别是它们的组织，与"社会主义"有多大关系）。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一词也同样模糊不清，尽管在这里更多的是出于掩盖附着在它身上的可怕丑闻的需要——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它是衡量对生活的一般态度的尺度，通过它可以看出精神潮流的现状——同时也是为了证明它的无害性、必要性和有益的效果。

一门完整的科学（已经通过"国民经济"这一名称证明了它的两面性）在这里起作用，它伪造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并将其与个人能力、与生命扩张、与自然"发展"等同起来，将从个人企业到市场经济、到国民经济、到世界经济的过渡说成是每种经济形式的唯一可能和纯粹的完美结局。人们几乎可以感觉到，过多的所谓"定义"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事情真相的注意力，以便不使资本主义的本质得到揭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和界定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质，以便用令人信服的论据说明我们是以及为什么我们是以及为什么我们必须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死敌**，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执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völkisch"任务的话。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了解到民族社会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两个非常好的定义，尽管这些定义很简短，但却表达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这两个定义是罗西卡博士的表述：**"资本主义是财产对劳动的统治"**，以及格雷戈尔-斯特拉瑟的公式：**"资本主义是对稀缺性的组织，以实现尽可能大的利润"。**

虽然很想选择一个类似的简洁的表述，一个同样表达了部分本质（尽管只是一部分）的表述，但我没有选择这条路线，以确保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明确的。

相反，我将挑出它的一些典型的、特征性的特点，并使它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概念的关键；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的本质将比通过一个简短的、因而不充分的定义变得更加清晰可辨。几十年来，从极左派到极右派，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包括民主马克思主义者）到高级金融和高级资本主义重工业，所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宣称增加出口是经济的首要任务，这是他们最深刻的智慧之一。而且，特别是在战争和革命之后的德国，"只有增加出口才能拯救我们"的说法成为每个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指导原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会的指导原则。

围绕出口重新安排国民经济，增加出口的动力，甚至以牺牲国内工业为代价来发展自己的出口工这是资本主义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今天的这一代人，几十年来一直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精神中长大，他们不再意识到，国民经济[Volkswirtschaft]的目的应该在于为他人劳动的想法是多么的不自然，特别是当"国民经济"这个说法本身必须在总体上表明，一个民族的经济可以而且必须只有一个具体的任务，只有一个单一的意义：保证这个民族的生命。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当我们研究这种出口经济的后果时，这种出口驱动的国家破坏性就会立即显现出来：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从而直接使国家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人民的影响之外的因素，依赖于外国的发展，而这些国家要么打算向其出口，要么在竞争中追求同样的出口。这使得对外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依赖性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出口国人民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都可能陷入瘫痪；更不用说还有一个巨大的危险，那就是被卷入严重的纠葛之中，而这些纠葛并不是生活所必需的，而是一个错误制度的产物:从人民福利的角度看是错误的，但从利润的角度看却是正确的。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特征:**它的唯一目标是利润,而且是尽可能大的利润！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耗资数百万建造电影院，承诺可能有 30%的利润机会，而不是将同样的数百万资金用于排干沼泽地，只有 3 或 4%的微薄利息（指利润），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地主雇用波兰移民工人，而不是雇用德国工人，因为他必须给他们更好的食物和更高的工资，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正如我所说的，所有这些都植根于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承认利润是其唯一职责和目标的特征。因为什么是危机？危机就是稀缺性!供应稀缺（因此需求过剩），或需求稀缺（因此供应过剩），以及在这两种情况下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价格差异。

原因是什么？价格差异就是原因!因为这些危机是人为的!它们是有意识的、故意诱发的'经济现象'；**这种稀缺性是有组织的，为了获利的机会而组织的！粮食被大型企业集团收购并囤积，直到超额的需求产生相应的价格上涨，也就是产生巨大的利润，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国际钢铁业卡特尔将铁的生产定为犯罪，从而造成人为的短缺，使"好价格"成为可能，当廉价的阿根廷肉被倾销到德国市场以破坏德国农业时，或者当上述钢铁业卡特尔在不相干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半价出售，以扼杀当地的竞争，或至少是磨灭它时，这是完全自然的。**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因为它都是为"赚钱"服务的，获取利润，产生红利。因此，对金钱的饥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

金钱是伟大的统治者，金钱是万物的尺度，拥有金钱或贵重物品是衡量每个人的标准！这让我想到了"资本主义的灵魂"，想到了它的根本来源！这就把我引向了**"资本主义的灵魂"**，引向了资本主义存在的根本源泉**!每一个将金钱置于其思维中心的人，将财产视为其努力的目标的人，将利润视为其能力的证明的人，每一个根据其同伴对金钱或贵重物品的所有权来评估其价值的人**——他是一个资本家，是我们的敌人，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所列举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基本特征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不可避免地是人民民族生活的敌人！

生活的本质，生活的意志，应当总是在自我利益中关注着整体的福利，总是按照大自然本身的指示，履行保护物种的伟大法则："自由和面包"；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的本质那样："剥削和利润"

打破利息奴役制 戈特弗里德-费德

废除货币利息奴役制宣言"拜金"是我们当代文化领域乃至全人类深受其害的一种沉重的、无所不包的、压倒一切的疾病。它就像一种毁灭性的癌症，一种吞噬世界人民的毒药。

所谓"拜金主义"是指：一方面，压倒性的国际金钱力量、凌驾于任何民族自决权之上的超政府金融势力、国际大资本、最纯粹的黄金国际；另一方面，一种已在大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思维方式；贪得无厌的利欲熏心、纯粹世俗化的人生观，已经导致所有道德观念的可怕退化，而且只会导致其恶性循环。这种心态在国际财阀中得到了体现，并达到了顶峰。

拜金主义的主要力量源泉是通过利息产生的无休止、无止境的收入。从贷款利息这一完全不道德的想法中诞生了黄金国际。从对利息和各种暴利的欲望中滋生出来的精神和道德体质导致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可怕堕落。贷款利息的思想是大贷款资本的邪恶发明；只有它才使少数大亨的懒惰生活成为可能，而牺牲的却是生产者及其工作潜力；**它导致了深刻的、不可调和的分歧，导致了阶级仇恨，并由此引发了公民和兄弟之间的战争。**治愈苦难人类的唯一良方和根本手段就是废除对货币利息的奴役。废除货币利息奴役意味着生产性劳动从隐蔽的强制性货币权力中获得唯一可能的、彻底的解放。废除货币利息奴役意味着恢复自由人格，意味着人类从奴役中获得救赎，从拜金主义束缚其灵魂的诅咒中获得救赎。谁想与资本主义作斗争，谁就必须废除利息奴役。废除利息奴役必须从哪里开始？从借贷资本开始！为什么？因为与所有工业大资本相比，贷款资本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只有通过废除货币利息奴役制，才能有效地打

击大财阀。贷款资本与工业大资本的比例是 20:1。德国人民每年必须以直接税、间接税、地租和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的形式为借贷资本筹集超过 120 亿的利息，而即使在战争的繁荣时期，德国股份公司分配的所有利润的总和也只有 10 亿。通过永恒的、无穷无尽的、不费吹灰之力的利息收入和利息的利息收入，掠夺资本的雪崩式增长超越了人类的一切计算能力。废除对利息奴役会给德国的劳动人民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带来什么好处呢？

废除利息奴役使我们有可能废除一切直接税和间接税。所有国家、所有州、所有大陆的创造价值的人们，你们听着：所有直接和间接来源的国家收入都源源不断地流入大贷款资本的腰包。包括邮政、电报、电话、铁路、矿山、森林等在内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完全足以为学校、大学、法院、行政机构和社会福利等所有必要的国家承诺提供资金。因此，只要公共企业的利润仍然是大贷款资本的支流，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不会给人类带来任何福祉。因此，我们要求将以下内容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首先是德意志民族的基本法律，然后是希望与我们一起加入国际联盟文化共同体的所有同类民族的基本法：

§1 战争债券，连同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其他债务工具，连同德意志联邦各州的所有其他债务工具，特别是铁路债券，以及所有地方政府的债权债券，在取消利息义务的情况下，被宣布为面值的法定货币[或者说被转换为银行信用]。

§2 对于所有其他固定利息票据、担保债券、工业债券、抵押贷款等，偿还本金的义务取代了支付利息的义务；因此，根据利率的不同，在 20 年或 25 年后，借出的资本将得到偿还，债务也将清偿。

§3 所有不动产债务、抵押等，均应按照土地登记簿中记录的费用，分期偿还，偿还金额与迄今所要求的偿还金额相同。以这种方式摆脱债务的房屋和土地财产将部分成为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财产。[这样，国家就能更好地控制和降低租金。]

§4 整个货币体系都应隶属于国家的中央银行。所有私人银行也应如此；邮政银行、储蓄银行和信用社，都应作为分支机构成为附属机构。

§5 所有房地产信贷只能通过国家银行发放。个人信贷和商业信贷由国家特许私人银行提供。这种特许权是根据需要给予的，并禁止在某些地区设立分行。收费标准由国家确定。

§6 股权证券的偿付方式与定息票据相同，年利率为 5%。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支付给股东，作为对"风险"资本的补偿（与定息票据和硬币支持票据不同），剩余的盈余则根据劳动的主权权利进行社会分配或用于降低产品价格。

§7 对于所有因身体原因（高龄、疾病、身体或精神残疾、年龄太小）而无法谋生的人，现有资本资产的利息收入将继续作为养老金支付，数额不变，最终甚至会增加，作为交付证券的回报。

§8 为了降低当前纸币的通货膨胀率，对帝国和各州的战争债券和其他债务凭证征收普遍的、高分级的税。这些纸币将被销毁。

§9 通过对人民进行深入的启蒙教育，要让人民清楚地认识到，货币只不过是完成劳动的凭证，也不应该是其他东西；虽然每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当然都需要货币作为

交换媒介，但货币的职能也到此为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借给货币一种超世俗的力量，让它以牺牲生产性劳动为代价，通过利息来实现自身的增长。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切呢？这一切是不言自明的，必须被视为社会问题的哥伦布之卵。因为在我们对拜金主义的盲从中，我们没有意识到如何看清利息神圣不可侵犯的学说是一种畸形的自欺欺人，只有贷款利息的福音已经把我们的思想缠绕进了国际财阀的金网之中。因为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除了少数富人之外——看似如此可爱、如此受不谙世事的人喜爱的利息是完全由税收抵消的，而且无所不能的金权者故意让我们对这个事实感到困惑。只要我们还没有从利息的奴役中解脱出来，我们的所有税收立法就始终只是对大资本的进贡义务，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为完成社会劳动而自愿做出的牺牲。因此，从货币利息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是全球革命的明确口号，也是将生产劳动从超政府货币权力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口号。实施和理由我们正处于我们贫穷的人民在其痛苦的历史中不得不承受的最严重危机之一。我们的人民病入膏肓，整个世界也病入膏肓。各国无助地踌躇不前；阴郁的人群中流淌着热切的渴望和拯救的呼声。在欢笑和舞蹈中，在电影和庆典中，人们试图忘记自己悲惨的命运——忘记幻灭的希望，忘记内心深处的痛苦，忘记对人们欣然称之为"革命成果"的可怕失望。但我们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想象这一切的呢？所有美好的承诺是如何变质的？在黑夜里，在我们军事崩溃的阴影中，我们希望获得的一切似乎都是闪闪发光的金子，但现在，当灰暗的白天照亮我们的发现时，一切都成了朽木。

现在，我们站在这里不知所措。为了这些在黑夜中的木头，我们丢弃了迄今为止对我们来说珍贵的一切，用这些可悲的宝藏塞满了我们所有的口袋。无怪乎绝望的怒火恰恰攫住了穷人中最穷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兄弟发出毫无意义的愤怒，**在对救赎的深切渴望中，他们试图摧毁一切阻碍他们前进的东西。如果无知和愚昧进一步刺激人们，这种状况必然会导致彻底的疯狂。**

我们在布尔什维克俄国看到了这种疯狂的后果。列宁不慌不忙地宣布，国有化（俄国称之为社会化）已经证明是失败的。经济遭到破坏，货币购买力下降到零，知识分子被杀害，劳动者没有面包。整个民族陷入绝望；只有以东方民族的雇佣军为基础的血腥恐怖，才能保护红色独裁者免遭背叛者的报复。在我们之间，如果国际投机者、痴迷的党派狂热分子、罪责最重的资产阶级代表以及与德国人民天性格格不入的种族成员继续被允许进入政府，那么事态的发展也将如此。他们在我们耳边低声说的那些俏话到底是什么？谈判和平、国际联盟、议会制、人民主权、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摧毁资本主义、从军国主义中解放出来，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漂亮口号。

一个自由民族应该出现，它应该自决命运。如果我们不以最严肃的道德态度调查所有这些幻象、所有这些口号，如果我们不像一个明智、关心病人的医生那样认真地诊病，不遗余力地诊断病人目前的状况，不遗余力地查明这种严重的危急疾病是从哪里产生的，那么所有这一切都不会成真，都不可能成真，也永远不可能成真。

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叫做"拜金主义"。什么是拜金主义？拜金主义是伟大的国际金钱力量阴险、无形、神秘的统治。然而，拜金主义也是一种心态；它是所有感染了拜金主义毒素的人对这些金钱势力的崇拜。拜金主义是人类本身健康的获取欲望的无限膨胀，一种疯狂的金钱欲望，它的最高目标莫过于把金钱堆在金钱之上，它企图以无

与伦比的残暴手段胁迫世界上的一切力量为其服务，它必然导致经济奴役，导致对世界各国人民工作潜能的剥削。

拜金主义是导致所有道德观念衰退的思维模式。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金钱至上"等同于人类残酷无情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是一种贪婪的精神，是一种无止境的统治欲望，是一种完全专注于攫取世界商品和财富的心态；它的核心是纯粹以世俗化为目标的宗教。拜金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直接对立面。社会主义是一种最高的道德理念，它认为人在世界上并不只是为了自己，每个人都对社会、对全人类负有责任，他不仅要对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子民的一时幸福负责，而且还要对自己的子孙后代和自己的子民的未来承担不可动摇的道德义务。更具体地说，我们必须将拜金主义视为各国人民中渴望权力的大资本家有意识的勾结。值得注意的是，"拜金主义"的到来一直是隐性的。大亨们确实潜伏在世界范围内的英美帝国主义背后，成为其最终的推动力。

大财团确实为世界大战中可怕的大规模屠杀提供了资金。作为所有大媒体的所有者，这些大国确实把世界编织成了一张谎言之网。他们满意地煽动起一切低级的激情，努力促进那倾向的增长，并通过巧妙的新闻宣传使法国的舆论沸腾起来。泛斯拉夫思想培育起来、塞尔维亚人自以为大国的自负立了起来，以及这些国家对金钱的需求高涨了起来，以至于世界大火必须熊熊燃烧起来。甚至在我们德国，大家只是在考虑出口数字、国家财富、扩张、大银行项目和国际金融交易的"拜金主义"精神，导致了公共道德的溃败，导致了我们的统治阶层陷入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导致了我们国家的肤浅。我们不禁要问自己，拜金主义从何而来，国际大资本从何而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不容忽视的是，货币大国的国际合作是一种全新的现象。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货币性质的国际义务几乎无人知晓。只有随着全球经济的崛起，随着全球商业的普遍发展，国际利益经济的理念才得以确立。在这里，我们触及了最深层的根源，在这里，我们找到了黄金国际汲取其不可抗拒力量的最内在的力量源泉利息，这种仅仅基于货币所有权而不加任何劳动的毫不费力和无休止的商品流通，导致了货币大国的发展壮大。贷款利息是黄金国际诞生的邪恶原则。贷款资本牢牢地将它的血盆大口覆盖了所有地方。就像海葵的手臂一样，大贷款资本已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牢牢套住。政府贷款、政府债券、铁路债券、战争债券、抵押贷款、担保债券——总之，各种贷款工具以某种方式奴役了我们的整个经济生活，以至于从今以后，世界各国人民都在金网中无助地挣扎。

为了利息原则，为了与一种彻底疯狂的政治妄想保持一致，即每一种财产都有获得收益的权利，我们屈从于货币利息的奴役。没有一个真正的、有效的道德理由能说明为什么仅仅拥有金钱就有权获得永久的利息。**这种对利息和非生产性收入的阻遏，贯穿了所有民族和时代的灵魂而存在。**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对金钱力量的深刻的内在抵抗从未像今天这样为各国所意识到。拜金主义从未以如此包罗万象的方式准备开始毁灭世界。它从未像现在这样巧妙地掩盖一切卑鄙、权力欲、复仇欲、贪婪、嫉妒和虚假，却又残忍地推动一切。

世界大战的核心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做出的最大决定之一，即决定未来是拜金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还是社会主义-贵族主义世界观决定世界的命运。从表面上看，拜金主

义的英美联盟无疑取得了初步胜利。作为对它的反动，东方出现了布尔什维主义，如果人们希望在布尔什维主义中看到一个伟大的思想，毫无疑问，它就是与拜金主义世界观截然相反的立场。然而，布尔什维主义试图采用的方法是艾森巴特医生[Eisenbarth]的拙劣疗法。他们试图用一把刀，通过截去病人的头、胳膊和腿，来医治内脏中毒的病人。面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肆虐，面对这种毫无意义的颠覆，我们必须提出一种可行的新思想，以团结的力量将所有劳动阶级[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创造价值的人]联合起来，从而驱除世界的疾病。我认为这意味着废除货币利息的奴役有三个因素使借贷资本的利息成为造成我们财务困境的真正原因。首先，固定利息的借贷资本，也就是不需要生产性劳动就能自行增长的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严重失调。在德国，这种借贷资本已经达到了我们认为不算太高的 2500 亿的水平。与这一巨额数字相比，我们整个德国工业的周转资金只有 118 亿。此外，还有 16000 家工业有限责任公司[G.m.b.H]的 35 亿资本，因此，我们总共只有约 150 亿工业资本可计。20:1 是第一个基本结论。[显然，17:1 更为准确，但也许费德考虑到了比例增加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在最重要的金融问题上，所有对贷款资本下的措施必须比针对工业大资本的措施有效 20 倍。

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贷款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本质区别。没有什么比这种比较更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贷款资本的破坏性影响相较于在大型工业中投入的资本和冒险的商业资本的利润之间的区别了。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的是，只有认识到借贷资本和工业资本所遵循的数学规律，才能为我们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可以运用杠杆来纠正我们被破坏的金融经济。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祸害人类的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也不是资本本身。大贷款资本对利息的贪得无厌才是全人类劳动的祸害！

资本必须是！劳动必须有！单靠劳动做不了什么。只有资本什么也做不了！

没有劳动的资本是没有生命力的！

因此，最重要的要求，革命最崇高的任务，世界革命最合理的意义，就是废除货币利息奴役制。

今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总估值 400 亿美元。美国高级金融界的亿万富翁卡恩、勒布、希夫、施派尔、摩根、范德比尔特和阿斯特先生的身价加起来至少在 600 亿至 700 亿之间。根据卡尔-海尔弗里希（KarlHelfferich）的研究，按照仅 5%的利率计算，这意味着这八个家族的收入为 50 亿至 60 亿，大约相当于 1912 年普鲁士所有纳税人年收入的 75%。(当时的纳税人约有 21,000,000 人，75%的纳税人约为 15,000,000 人。每个纳税人平均有 1.56 个亲戚，因此有 2,300 万个亲戚)。

因此，大约 3800 万德国人不得不依靠上述亿万富翁的年收入生活。当然，美国的亿万富翁并不像罗斯柴尔德家族等那样是纯粹的贷款资本家。我根本不想争论美国的亿万富翁究竟是"1 亿美元的百万富翁"还是"1 亿马克的亿万富翁"；如果是前者，我们只需再算上一二十个克鲁塞斯。或者让我们简单地接受拉特瑙的"300"，那么我们的盘点肯定会井然有序。在这里，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并不重要，但公认的 300 比 38,000,000 的比例让我们看到了国际贷款资本的残酷统治。

因此，让我们甩掉这些只能扼杀一切精力充沛的劳动的可怕枷锁！正是这三点让我们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哪里才能有效地运用杠杆来缓解我们国内的财政困难。另外，我们认识到，整个社会主义思想界对工业资本的攻击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即使是打算对所有企业利润进行完全管制或社会化——假定经济没有削弱——与我们帝国预算的巨大财政负担相比，所产生的数额也是微不足道的，令人啼笑皆非。通过废除货币利息奴役，可以一举消除整个金融弊病。我们马上就会感到脚下又有了坚实的基础；我们马上就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只是以最怪诞的方式自欺欺人地实行了这种可悲的债券经济。

除了债务，贷款资本还能是什么？贷款资本就是债务！这句话怎么重复都不为过。当整个德国人民为战争借贷了 1500 亿时，这是一种怎样的疯狂？它甚至为此向自己许诺了 75 亿美元的利息，而现在却感到自己陷入了一种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的尴尬境地，即试图以完全虚构的税收形式从自己身上收回这 75 亿美元？与此同时，这种自欺的可悲之处，与其说是整个战争债券经济的愚蠢，不如说是只有相对少数的大资本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包括中型和小型资本家以及商业、贸易和工业在内的全体劳动人民却必须支付利息。在这里，整个想法的政治一面就显现出来了。在这里，他们可以认识到，事实上，大借贷资本，只有大借贷资本（即不是工业资本），才是全人类劳动的诅咒。

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扭曲这个问题，但所有辛勤劳动的人民大众最终都必须承担贷款资本的利息支出。中等规模和较小规模的资本家在支出它们的利息后一无所获；因为这些利息必须全部征税。无论是以直接税的形式，还是以间接税、印花税、关税或其他商业负担的方式，辛勤劳作的人们总是在付出，而大资本则是受益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界，从《共产党宣言》到《爱尔福特纲领》（尤其是考茨基），甚至是当前的社会主义领导人，都像奉命行事一样放过了掠夺资本的利益。利益的神圣性是禁忌；利益是圣物；还没有人敢对它提出质疑。

当财产、贵族身份、人身和财产安全、王室法律、特权和宗教信仰、官员荣誉、祖国和自由都或多或少地被宣布为非法时，利益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收财富和社会化，从而公然违反法律，只要这些行为表面上是以全体个人的名义实施的，就只是稍加美化而已,这就是当今的秩序:所有这些都是允许的,但利益,利益是"我的 tangere"，是"touchmenot"。

帝国债务的利息支付是国家预算的龙头和龙尾。它的压力将国家这艘巨轮拖入深渊，然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大骗局.....一个畸形的祸害自己的骗局，只为利益而滋生。在此，我想简要地谈谈与小额养老金领取者有关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将在以后讨论，这样人们就不会在思考这些问题时陷入困境。在讨论重大问题时，我们不会考虑这些问题，但是，这些补偿将通过最广泛地扩大社会福利服务来提供。我说，诈骗！利益诈骗！一个强烈的词。但如果这个词是有道理的，它在战争期间也许是战场上和国内用得最多的词，那么它在利益——诈骗方面是最有发言权的。但战争债券呢？帝国用第一笔 50 亿美元从人民的口袋里掏出了实际存在的储蓄。钱又流回来了。然后，新的贷款又来了，又把钱吸走了，最后的剩余储蓄也随之被吸走了。再一次，像抽水机似的抽走了几十亿，钱又流了回来，直到这个迷人的游戏重复了九次之后，帝国已

经背上了一千亿的债务。作为交换，人民手中当然握有 1000 亿张精印纸——起初我们还以为自己变得富裕了许多——**但后来国家来了，说"我面临破产"。**

是的，但为什么呢？我自己当然不可能破产，即使我偶尔从右边的口袋里拿出一张一百马克的纸币放进左边的口袋里。

当然，如果我们通过宣布破产来继续我们战争债券经济的愚蠢，那将是最大的愚蠢。**[费德在这里将德意志民族视为一个统一的实体，而不仅仅是个人的集合体：从一些德国人手中转移到其他德国人手中的钱仍然留在德意志民族内部，这意味着德国政府有权力调整分配，这可能会对一些个人造成直接的不利，但对整个民族是有利的。]**

让我们打破对货币利息的奴役！让我们宣布战争债券为法定货币并取消利息，国家破产的噩梦就会像太阳下的三月雪一样从我们身边消融。有人对我说，取消利息支付是一种变相的国家破产。不，事实并非如此！-国家破产的幽灵其实只是拜金主义势力编造的一个童话和妖怪。

弗朗茨-罗尔（Franz Röhr）的著作《尽人应知的国家破产》（Wasjedervom Staatsbankerottwissenmuß）完全停留在拜金主义的思维方式上。虽然作者总体上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通过社会化威胁我们的经济问题，虽然他强调并正确地建议最终只有重建我们的经济才能拯救我们，但他无法摆脱对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迷信，因此他完全按照拜金主义的利益将国家破产描绘成一场完全可怕的灾难。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罗尔拥有更多的历史知识，但他仍然无法摆脱"拜金主义"观点的束缚，并在最后写道："如果不能避免毁灭性的经济灾难，没有人能够幸免于难。"

而在第 81 页，他承认公共财政管理不善的后果很快就得到了部分扭转，在第 68 页，他说，无论如何，毫无疑问，俄罗斯（在上个世纪）克服了这些货币危机，没有出现持久的问题。

在第 76 页，他在研究国家破产的影响时说，虽然当然出现了深刻的经济问题等，但总的来说，既没有导致国家的毁灭，也没有导致国家经济实力的削弱。相反，国民经济的迅速复苏和公共财政的恢复却屡见不鲜。作者接着又说了三行，国家破产绝对意味着经济灾难，会造成无穷的痛苦；我很遗憾无法理解这种逻辑。但回到我们的特殊情况！哪种做法更诚实？一边说战争债券是不可动摇的，一边却以令人震惊的税收负担压迫人民？或者，如果一位财政部长有勇气公开向人民宣布："我无法支付战争债券的利息，或者只有向你们征收完全相同数额的税款，我才能支付。"

....但在战争期间，我绝对需要钱；我没有想到更聪明的办法（见英国），于是我就用高息战争债券来骗钱。你们必须原谅我，亲爱的人们；这最终都是为了你们，但如果我们想不再玩捉迷藏的话.....我，国家，将不再支付利息，而你们，纳税人，也无需纳税来支付这些利息....。

这彻底简化了我们的交易；我们避免了庞大的税务官僚机构，同样也避免了庞大的利息支付官僚机构，从而节省了大量的资金和工作潜力"。我在揭露这一骗局的问题上徘徊了很久，但我认为在此绝对不能顾此失彼。根据巴伐利亚州的纳税申报单，将遭受损失的人——我们可以说，正是那些根据纳税申报单获得了超过 3 万马克利息支出的人——有 822 人，仅占全德国纳税义务人（Bayr.St-Z.1913）的 0.4%，因此，约为

1 万人。(上万人!)。现在，让我们尽可能扼要地阐明这一革命要求的最重要方面，实际上，让我们首先从本国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认清当前的形势。国务卿欧根-希弗在柏林商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宣称，"无法忽视"当前的形势。这只是部分正确。可以忽视的是，我们的国民经济负债累累，我们的货币空前贬值，简而言之，我们已经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贫困的民族。然而，通过和平条约强加给我们的负担不容忽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现有的债务约为 2500 亿。让我们首先假设协约国以某种形式向我们额外征收 500 亿美元的备战费用：这样，债务总额约为 3000 亿美元。尽管本论文的篇幅有限，但还是必须对德国国民财富的规模说几句话。

海尔弗里希（Helferrich）和施泰因曼-布歇（Steinmann-Bucher）的调查估计，德国的国民财富约为 3500 亿。无论这些结论是如何精心得出的，其价值都非常有限。它们只适用于经济活动不受干扰的时期。

但是，由于国家和市政财产也包括在内，因此，例如道路维修、水道改造等也包括在内，因此这些数据也具有相当的误导性。显然，尽管这些工程的建设可能耗资巨大，但严格来说，它们并没有内在价值。衡量国家财富的一个更好的标准是所谓的应税财富,因为它是从国防捐款或战时财富税的退税中产生的。应税财富总额为 1920 亿美元，远远低于海尔弗里希的数字。

不过，根据经验，在这一总额之外，还可以加上约 10%的法定免税小额财富，以及约同等数额的"无声储备"。["无声储备"是指在会计核算中低估了正值，高估了负值，从而造成最低净资产的表象。]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国民财富超过 2500 亿的说法过于乐观。但即便是这个数字，其重要性也非常有限。最正确的做法是完全摒弃从数字上可以把握的国民财富的观念，深入认识到国民财富完全体现在整个民族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潜力中，因此属于与狭义的资本概念无关的数量级。

事实上，我们还必须看到国民财富的另一个来源，即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和肥沃土壤的存在,但这些东西也无法用数字来衡量,因为它们的价值在零和无穷大之间波动，这取决于矿产资源是处于未开发状态，还是根据地质报告可以计算出数十亿吨的煤炭等等。]我们不要忘记，德国确实是一个穷国。它几乎没有垄断。在矿产资源的丰富程度上，它远远落后于大多数邻国，更不用说中国、印度和美利坚国无与伦比的矿产资源了。在土壤肥力方面，与俄罗斯黑土地的福地相比，与热带和亚热带的高产土地相比，它也相差甚远。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有担保的债务，也谈不上债务工具的抵押品.....无论是有息战争债券还是无息帝国钞票，其背后都只代表着全体人民的税收潜力，而税收潜力又何尝不是全体劳动人口劳动能力的函数呢？

让我们再次简要总结一下。废除货币利息奴役是最终和永久医治我国公共财政的根本手段。废除利息共同体意味着有可能放弃压迫性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因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在更多合适的部门（内河航运、电力、航空等）实现社会化之后，将向国库提供足够的盈余，以支持国家的所有社会和文化任务。

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之外，废除利息共同体将使所有领域的生产性劳动获得应有的优先权。货币将再次回归其应有的角色，成为国民经济强大动力的仆人。货币将重新成

为它的本来面目，成为完成劳动的凭证，从而为更高的目标扫清道路，远离我们这个时代汹涌的金钱欲望。

这一想法旨在建立一个由全体劳动人民组成的统一战线：从我们已经看到的、为满足资本借贷而背负沉重间接税负担的无产者，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务员和雇员，农业和小行业的中产阶级，他们都感受到了无情的金钱暴政，如糟糕的住房、农田租金、银行利息等等、对他们来说，生活的首要任务始终是为幕后操纵的金权政治者的养老金、利润和利息而工作。同样，所有知识界——艺术家、作家、演员、学者以及其他独立的专业人士——也都属于这个群体。

尽管作为自然人集团或作为利息原则化身的大借贷资本有意识或本能地试图掩盖其无止境的控制欲，尽管我们的整个法律传统以罗马法为基础，从而以保护财阀的法律为基础，一直如此强烈地强调保护财产，并因此渗透到我们人民的正义感中，但废除对货币利息的奴役必须到来，这是摆脱黄金国际对整个世界经济奴役的威胁的唯一出路，也是驱除腐化和污染我们时代精神的拜金主义毒药的方法之一。

虽然废除货币利息奴役制并不是新国策的最终目标，但它确实是最精辟的行动，**是唯一能够将所有民族团结成一个真正的联盟，反对笼罩所有民族的拜金主义暴政的行动。**

但这并不是终点。恰恰相反，废除利息奴役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从根本上，实际上是从主要根源上控制了全球的恶。只有满足了废除货币利息奴役制这一基础性要求，才能为社会国家第一次扫清道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必须不顾一切拜金主义的力量来实现这一点。

在货币利息奴役制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呼吁社会化，无非是企图建立一个所有行业的托拉斯，并在各地建立巨型联合企业。建立在拜金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荒谬的，其本质是已经深受拜金主义污染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大资本之间的妥协。与此相反，我们要求彻底摒弃"拜金主义"国家，按照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重建国家，其中的基本统治思想是"养育义务"——共产主义的一项古老的基本要求可以在其中得到合理而有益的满足——其形式是，通过国家对最重要食品的分配，每个国民都应得到他在祖国土地上的应得权利。

作为新国家的脊柱，我们还要求通过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人民，人民代表会议应在最广泛的基础上选举产生，其次是永久性的劳动会议，劳动会议是一个中央理事会，全国工人可根据其职业和经济阶层的分布比例在其中发表意见。最后，我们要求对国家领导人实行最高问责制。在社会主义-贵族制基础上的新国家建设将在同一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另一部著作中阐述。然而，所有这些建设的前提仍然是废除货币利息奴役制。我坚定不移的信念，不，更多的是我的知识使我清楚地认识到，不仅废除货币利息奴役制是可以实施的，而且将会而且必须在各地以难以形容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加以推行。

请记住：与所有其他旨在改善人类的思想、运动和努力（无论其用意多么良好）相比，**我的建议并不想试图改善人类的本性；相反，它针对的是一种有毒物质，针对的是一种被巧妙地——不，是邪恶地——发明出来的、完全违背人类最深层情感的现象，其目的是使人类生病，使人类陷入唯物主义，使人类失去其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灵魂。**

紧随其后的是可怕的、无情的金权暴政，人们只是利益的奴隶，只是为了利润和利息而工作。我们深感不安，我们认识到《圣经》中古老谚语的可怕清晰和真实，根据这些谚语，犹太之神耶和华向他的民许诺："我要将世界上所有的宝藏赐予你们；地球上所有的民族都将在你们脚下，你们将统治他们"。

这个全球性问题现在摆在了你们所有人的面前。全球性问题不是挥挥手就能解决的，但解决思路是清晰的。我们必须努力宣传这一理念；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着最可怕的敌人，那就是包罗万象的金钱势力。

对方有的是武力，而我们只有正义，生产劳动的永恒正义。

向我伸出你们的双手，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团结起来！

工作和面包！ 格雷戈尔-施特拉瑟

实施紧急法令是拯救现在的唯一手段！

我上一次于 1930 年 10 月在这里发言时，与现行制度结清了我们的账目，并在我们 1930 年 9 月的选举胜利的基础上，宣布了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劳动者党的基本国内和外交政策原则。从那时起，一切都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从那时起，我们所经历的唯一新事物就是紧急法令的武器，它一方面揭示了紧急状态，另一方面又颁布了紧急法令。但除此之外，从那时起的整个政治发展中没有出现任何新的，最重要的是没有出现任何可救赎的想法。我认为其原因在于，德国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全部政治努力都限制在压制和排除民族社会主义中存在的民族和社会力量的权力上；还在于，政府与德国国会开会的那几天的辩论一样，始终只承认一个主题：与我们作斗争，而不再是为德国人民的利益而斗争。

在上一次选举活动中，政府的全部精力，其宣传的全部方式和影响人民的全部资源，都用于在全体人民和世界面前诽谤我们。没有人提到政府在这期间自己取得了什么成就。帝国总理最近说，民族社会主义对政府的接管将自动带来混乱、通货膨胀和内战，从政治角度看，这就更加危险了，因为在帝国议会这里，肯定没有人怀疑，在我们的反对下或没有我们的帮助，永远不可能尝试或找到解决德国伟大问题的办法。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尽管所有参与布吕宁体系的人和政府中的所有人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但近来的选举带来了该运动的不断和不可抗拒的崛起。

我认为，现在是德国官方摘下它那副被党派罩住的眼镜，仔细看看这种崛起来自何处的时候了。当今天人们顽固地说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崛起只是德国人民普遍不满的结果时，那么我必须问，所有这些不满的人来自哪里，他们为什么会不满？这一定是执政党和它们所支持的政府的错误和失败。但这并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我甚至还不足以说，我们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是新近觉醒的民族感情，这种感情多年来一直被毫无意义地扼杀，现在自然发展得更加强烈。这里涉及的内容更多。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的抗议，这个国家剥夺了民间同志的工作权利和恢复他们的自然生存能力。

它是对一个国家的抗议，这个国家允许并使一种经济制度成为可能，这种制度伪造自然生产力，焚烧小麦，把咖啡扔进大海，毫无意义地囤积粮食，而这一切只是为了推高价格和股票市场的利润。各位共产党员，我一直喜欢论战，没有人可以说我会避

免尖锐的政治争论；然而现在我要谈的是德国的紧急情况问题，特别是创造就业的问题，我有权要求你们尊重我。我们必须坚定地主张并牢记（这样做的能力建立在德国人民最内在的核心和思维中），善良的上帝让全世界有足够的增长来满足全人类的需要。如果今天的世界经济不能公正地分配自然界的财富，那么这个系统就是错误的，如果人民要生活，就必须改变。德国人民抗议这种只考虑金钱、利润和红利，而忘记考虑工作和成就的经济秩序。

笼罩着我国人民的伟大的反资本主义渴望（我称之为反资本主义），它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说服了也许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是有趣和有价值的。它丝毫不是对那些在道德上合理的、通过劳动和节俭获得的财产的拒绝。它首先与共产国际的无意义的、非生产性的和破坏性的倾向完全没有关系。相反，它是劳动人民对退化的经济思想体系的抗议。它要求国家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断绝与黄金、世界经济、唯物主义这些恶魔的关系；断绝完全从出口统计和帝国银行贴现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做法；并要求国家找到一种方法，确保诚实工作的体面回报。这种伟大的反资本主义的渴望证明，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宏伟的转折点：自由主义的被征服，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和对国家的新态度的崛起。

民族社会主义全面就业计划我已经说过，失业和提供就业是最紧迫的问题，我想利用现在这个机会，提请德国人民注意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在过去几个月里制定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计划和想法。我们多年来一直说，在德国存在着以下问题：改善农民——我明确地说是农民——的经济状况；国内安置的必要性；减少向城市的移民；恢复贸易和货币制度；增加国内生产，这与支持封闭式经济同时进行；保证充足的食物供应；组织全国劳工；在工业界的合作下建立一个内部市场；修改我们的土地法；也许最重要的是，宣布我所说的工作的义务和提供食物的义务，也就是说，德国民族同志有义务把他的全部劳动奉献给国家，生产必需品。

我们要求根据个人的劳动成就程度对其进行评级和估价。无论他是作为议员还是作为非熟练工人工作，都没有什么意义。当我们回到提供就业，回到实际的充分就业计划，回到最伟大的德国政党的建议时，我们必须在头脑中非常清楚地了解与目前的思维方式相反的东西：世界上有两个永恒的价值，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以及我们所能创造的一切，都源于这两个价值，这就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

换句话说，所有像"资本创造劳动"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劳动创造资本!在充分接近提供就业，澄清人民的整个情况之前，有两件事是必要的。首先，《魏玛宪法》第 163 条必须修改。我认为，在第 163 条中，他们只采用了每个德国人都应该有工作权利的说法，这表明了制宪会议有意识的懦弱。这种用法已经表达了这些人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按照有机的原则来指导国家和经济，并给每一个诚实地想要工作的人提供工作。

在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全部后果的情况下，第 163 条将不得不被修改为：每个德国人都必须有工作的权利。宪法第 163 条规定了工作权，它必须由我早先制定的第二项要求来完成，即工作的义务，为公众利用劳动力。劳动带来了生活的必需品：食物、住房、衣服、照明和温暖。劳动，而不是资本，是一个民族的财富；一切都源于劳动。因此，在面对提供就业的问题时，国家决不能问："有没有钱买？"要问的只有一个问题："应该如何使用这些钱？"提供就业的钱总是有的，最后的办法只是扩大信贷，这

在经济方面是绝对合理和有成效的。这至少和你的白银通货膨胀一样正确和合理，至少和你冻结的俄罗斯信贷一样可行和安全，也比你用来稳定德国银行的钱更安全。在提供就业方面，问题只能是：我们从哪里开始？必须要找到出发点。关于这一点，应该有以下说法。在满足人类最重要的需求，即对食物的需求方面，德国仍然依赖外国。但归根结底，一个依赖外国的民族永远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解决自己的国际问题，即自由问题。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使德国土地上的生产至少能够满足全体人民的生活需要。在达到目前的失业水平之前，我们就应该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对《凡尔赛条约》做出反应，因为该条约限制了我们的生存空间，从而自动需要对农业生产进行重组。此外，我们在德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住房和人口政策，也就是疏散大城市。城市已经在缩小，这表明人民固有的力量，其无意识的情绪，开始走向自然、正确、有机的道路。我不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和它的影响。归根结底，住房问题是最大的社会问题。从长远来看，一个不得不住在可怕的、寒冷的、黑暗的大城市公寓里的人，不可能对他的人民的政治需要、对大自然的美丽、或对他可以改善自己生活命运的有价值的甚至是廉价的方式有任何认识。我们必须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建造由私人住宅组成的住房开发项目来满足这一愿望。

德国的自由劳动必须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是我们自己的经济、我们人民的需要为我们规定的：增加食品生产和实现健全的住房和建筑政策，从这一点出发，我们通过支付工资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特别的刺激，从而提高购买力，同时也提供材料，归根结底，材料总是占工资的很大比例。在建造私人住宅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对每个住宅的评估是 5000 马克，那么 65%，包括一切，都是工资。但工资提供了重新雇用失业者的可能性。失业保险就会停止支付。社会保障费用和所有这些东西就可以由就业工人自己再次支付。国库的一个巨大负担将被解除。

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原则上拒绝一个在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中经常出现的规则：我指的是误导性资本的口号。仍然有一些人，完全被自由主义思想所感染，他们的立场是：如果我通过扩大信贷或通过扩大德国经济的一个部门的货币供应量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么这些货币就会在另一个部门缺乏。对于今天的现代人来说，这种观点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劳动在外部持续不断地创造新的劳动。任何一个就业者都至少涉及另一个人——这是今天普遍承认的经济原则！因此，不可能有任何误导！因此，不可能有误导的资本！我将告诉你们我们认为如何实现融资。为此，我们需要从失业救济金中节省下来的资金，需要使经济恢复工作而产生的额外税收，需要受益人自己支付一些费用，其余的我们将通过生产性的资本创造来获得。

德国有足够的土地。有待开发的 850 万英亩土地，200 万英亩的荒地，以及 100 万曾经耕种但现在休耕的土地——所有这些都将使我们有可能，以整数计算（我随时愿意提供准确的数据，但在如此简短的讲话中不可能），如果实行强制劳动服务，就可以以正常工资雇用 100 万工人，为期 5 年。当我这个年龄的人冒着生命危险为保卫德国边境工作了 4 年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他们抵制 20 至 21 岁的德国人为他们的人民工作一年的想法。左派的先生们反对强制劳动服务，并不是因为他们作为共产主义者反对武力，而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劳动服务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物质上的成功，而且首**

先在于它可以解决教育问题，使之朝着德国的国家理念发展。面向德国国家的教育将破坏你们的世界观[对共产党人]：这一点很清楚，也是我们建议的前提。在改善土壤的方法中，还有一种新的施肥方法。难以想象的是，由于农民缺乏购买力，化肥停留在工厂里，对土壤没有好处，尽管如果我们有正确的价格政策，施肥会自动获利，因此德国农民在任何时候都很乐意采用。我以前说过，现在再一次说：在自由企业制度下进行的项目应以标准工资进行。最后，我将回到融资问题上。

我们认为，中小型地产的土壤改良应该由国家监督下的土壤改良合作社来进行。有问题的项目和那些必须推迟利润的项目[应该]通过劳动服务义务的方式进行。这些项目所产生的对设备、住所和衣服的需求将进一步雇用手工业、工业、商业和运输业的劳动力。我坚信，这基本上只是一个启动马达的问题。工作创造更多的工作。我们真的不需要在这些事情上有大量的国家干预。但是，提供就业的第一批大项目必须来自国家，因为今天没有任何私人企业家有能力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旦伟大的委托被启动，那么我相信，在两年内，我们将自动地再次有一个正常的过程。这就是劳动的永恒好处，它是生活的基础，一直都是如此。

如果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并利用一切技术可能性，土壤改良项目和现在休耕地的耕种项目将为每年 10 万人创造重新安置的机会。我在这里区分了在城市附近为城市居民开发的住房和在土地上的定居，这个问题已经通过在东部的定居得到了部分解决。如果我们每年重新安置 10 万人（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数字有点高，但它可以实现），五年后我们将在东部有 50 万新的定居者，从而有巨大的地理和军事可能性，这将使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太远。此外，这些定居点的建立又会不断地提供就业机会。我现在谈谈左派的先生们经常指责我的一个问题。他们指责我说，在宣布工作权利和工作义务的时候——如果我们要以任何成功的希望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认为这些权利和义务是必不可少的——对个人自由是一种限制。归根结底，我们在《魏玛宪法》中已经有段落说，在紧急情况下，公民可以有义务做出某些特别的努力。如果你认为你可以不用武力解决问题，如果你想在自由中挨饿，那就去吧；因为如果目前的制度和目前的经济思想继续下去，饥荒本身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猫叫者有一点是对的，尽管他们没有以这种精神说出来：一个国家竟然赋予其人民工作的权利，而且在履行这一权利的同时，还规定了为了个人和国家而工作的义务；这样的国家当然必须采取最广泛的预防措施，使参加新的劳动服务的人所生产的商品在运往消费者的途中不会像以前那样落入私人投机者的手中。

这当然是很清楚的。换句话说，德国政府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必须对食品市场进行全面控制，以防止那些被征入劳动部门的人提出合理的抱怨。如果今天的破坏性趋势继续下去，我不认为在没有粮食垄断的情况下，这种控制可以有效。因为在农业界，我多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在收获年的最后几个月里，粮食的储备已经太少了，因为农业的紧急情况使耕地面积越来越小。我也相信，对食品市场的控制，如果有必要的话，超出粮食的范围（整个问题需要调查），提供了解决德国工资问题的唯一可能性。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一直在巴伐利亚州图书馆里翻阅上世纪中期的旧报纸；我读了像政治家冯-哈森布罗德等人的讲话，他们在巴伐利亚州的警察税（当时作为对食品的控制）

被取消后，自动预测了通货膨胀和经济的破坏，数额达数十亿美元。我可以说，这些研究让我学会了正确地评价经常被嘲笑的"巴伐利亚啤酒战争"。

在巴伐利亚，一计量的啤酒代表了非常具体的劳动量，后来又代表了非常具体的财产量。而价格上涨一便士就意味着所有商品的价格普遍上涨，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价格上涨达到了数百万。我认为，目前工资谈判的巨大困难是由于今天的国家不能从这样一个标准，从这样一个"试金石"来处理工资问题的结果。由于重组，我们必须通过增加自己的生产来消除食品的投机性，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控制食品市场，并超越一般的工资问题。抑制进口或确定配额——我们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并让你们有机会就这些建议发表意见——为了能够成功地吸引农民的积极性，为了使农业有利可图，这些都是必要的。在我们看来，使农业有利可图是通过价格支持来实现的——在此我再次提出完全垄断的问题供大家讨论——最重要的是通过降低利率，特别是对第一次贷款的利率，这将真正有效。

我们还相信，也有必要把整个农业信贷系统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除此之外，我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专家说的，我认为没有必要为德国农民建立一个广泛的组织。当国家成为德国农业生存能力的保证人时——任何未来的国家都必须这样做，任何不想分崩离析的国家都必须这样做——那时，今天的大部分反对派组织——它们的出现是合理的——将完全失去其吸引力和理由。在这里，简化也应该提供深远的可能性。民族社会主义的充分就业计划应如何筹资？我现在谈谈就业计划的筹资问题。

当民族社会主义方面要求实施伟大的工程作为解决失业的良方时，目前政治制度的代表总是提出同样的反对意见：我们缺乏手段。我们太穷了，没有能力多干活。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一个人很穷，就必须多工作，以便重新变得富足。一个民族越穷，就越要工作，因为繁荣的增加只能来自两个外部来源：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大规模提供就业的计划提供资金是完全可能的。我举的例子是土壤改良和私人住宅开发建设，这两个项目都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有必要由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立的银行，如[国家]建筑和贷款协会来进行融资。在过去，你们对"建筑和贷款协会"这个词不是嘲笑就是抗议。

今天，你们不再抗议了，因为你们的"接受和担保"银行，在紧急情况下强加给你们的，已经成为非常相似的东西。通过充分就业计划投入工作的工人应获得全额工资，但在劳动部门工作的工人除外。我现在必须简单说一下，因为时间在流逝：如果在土壤改良项目、私人住宅的安置以及类似的工程中，通过把材料的提供非常广泛地纳入就业计划，把材料的支出尽可能地转化为工资，那么费用将平均以下列方式分配。

帝国失业保险办公室将迄今为止作为失业补偿金支付的款项交给新银行——建筑和贷款协会——的雇员使用。这样，银行就可以得到全部工资所需金额的 30%。你今天也必须支付补偿金，在开始工作时，你有保证你可以停止失业。其次，你有，我在这里不考虑它，那些因新创造的劳动过程的影响而投入工作的人；第二个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退出失业补偿金，可以全部或部分包括在这里。然后是你不再需要的新的失业金!如果有一百万人在工作，构成社会保险的失业金的 6.5%就会消失。这些款项被保存下来。这代表了融资所需的 5%的资金。

那么，当有工作时，马上就有东西可以征税。

人们可以证明这一点：可以精确地证明，随着劳动力总收入的上升和下降，税收收入也会以平行的百分比上升和下降。因此，这里存在着一种无法否认的密切关系。如果我说，税收的回报来自那些通过最广泛的就业扩大而投入工作的人——中产阶级成员、工匠大师等等，如果我说这些回报只占 15%（尽管我们实际上在更高的水平上计算了这些回报和百分比——22%、23%等等），那么我们还有 15%的资金。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定居者或改良土壤的农民所能提供的资金。我们估计只有 25%。

因此，如果是私人住宅的安置，25%；如果是土壤改良，农民的贡献会更大。要么就重新安置一些仍有少量储蓄的人，让他们用于这些目的，要么就给其他定居者提供机会，通过从他们的工资中扣留足够的钱来购买他的定居点中 25%的份额，使他成为新造物的原始四分之一的所有者之一。剩下的 25%将由建筑和贷款协会承担，该协会将发放信贷。一开始没有的那部分税收，也将由发行信贷来支付。在这里，我们正在考虑——我不需要更详细地解释——生产性创造信贷的问题；你们现在也在这样做，但理由远不如我们的建议，这将创造新的价值和新的工作。只要一个强大而诚实的国家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防止不良的发展，这种生产性的信贷创造是不被反对的。

我们将不得不意识到，在所有这些新的就业计划中，必须完全抛弃一个概念：资本主义的利润计算。我们决不能问这些劳动中有多少会产生利息来充实放债人的库房，从而使他不需要工作。相反，我们应该考虑我所称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利润计算，即从整个国家的福利角度来看待这些工程的融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问为整个人民的经济、文化和其他需求将取得什么成果。但最重要的是降低利息。如果你不摆脱利息，不把它从目前的水平降低到可以承受的水平，首先要摆脱银行的奸诈伎俩，那么德国就不会有任何改善，我列举的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将毫无意义。他们说的是 5%的利息，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 2%的额外费用，还有 2%的信贷准备金，然后在提供信贷时，只给一半，然后再加 1%的信贷透支准备金；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低于 10%的利息。

这对于一个为了自身利益必须通过工作和公共工程来重建经济的民族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情况。利息只在有利可图的经济中创造资本。从实际资本中支付的利息会毁掉资本。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我们德国人被我们无能为力的必要性所逼迫，不得不组织内部经济时，我们就不能避免对我们的社会结构进行重组。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重组要比挨饿容易一千倍。这就是面对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后果，我们不能退出。

布吕宁总理肯定是以良好的意愿来处理所有这些问题的，我们从未怀疑过。但在我看来，只要政府的领导人不得不用尽他所有的力量来对付那些被称为政府的异质政党，就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从长远来看，与众多的政党一起执政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不可能解决问题。为此，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选民革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选民革命"，是正确的。小党的要求与它们的规模成反比，由于它们的内部软弱，由于它们在外部不再有支持的情况下留在这里所采取的不道德立场，它们会受到各种腐败的影响。对于这些人，我们无法治理；他们必须消失，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很大程度上，德国人民已经选择了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运动。我们白手起家，为自己赢得了执政的任务，反对你们所有人。[指其他党派]

上天可能会赐予我们成就；我们把判断留给历史。

雅利安人的國家與經濟秩序 亞瑟·特雷比奇

人类一直都知道，只有秩序和良俗兴盛，人类社会才能存在。维护秩序和习俗似乎一直是有序社会和国家最崇高的任务之一。

警察，即公共部门，负责维持生命安全方面的秩序，而习俗的监管则由法律和司法部门负责，司法部门有权对违反者进行惩罚、监禁、剥夺自由和处死。所有这一切都由国家资源提供，用于造福所有人：法官、监狱系统、法院和刽子手办公室都由国家管理，利用社区资源造福大众。在这种已经实行了数百年的秩序中，还有一些旨在规范经济事务的法律。然而，随着犹太商人而非历史悠久的雅利安商人渗透到经济生活中，一种全新的群体出现了，他们凭借精明的 方法不仅没有受到干扰，反而在其放贷领域获得了青睐（参见《DGodJ!》：经济生活）。

但这还不是全部：随着对科学领域的渗透，这类人甚至设法引入并确立了我们在第一部分中阐述的自然法则，这些法则与他们相呼应，且只与他们相呼应！作为商人，他认为在商品采购和分销领域，行动自由和不受阻碍的任意行为是他唯一的救赎。但他狡猾地将个人自由的要求与贸易自由相结合，前者是“自由主义”产生的，是对各地专制统治的反击，后者则引起了自由主义的喧嚣，而自由主义与任意性和掠夺（对贪婪和流动精神的截然不同的需求一无所知）的雅利安人如出一辙！但如今，这种可怕的误解在印度-日耳曼思想中根深蒂固：个人自由与贸易自由和商人的专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事实上，负责防止高速公路抢劫、盗窃和一切危及生命行为的同一支警察部队，也应承担防止人类被机动车辆掠夺的责任，人们之所以能够理解，首先是因为这种掠夺几乎已经达到了毁灭雅利安人种的地步，其次是因为两个种族对权力的不可调和的诉求已经清楚地揭示了它们的基本智力结构…… 但如今，上帝知道，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有机会看清道理，要么接受毁灭，要么制定法律来防止毁灭！

必须建立的经济警察必须确保，决不允许商人的专横和贪婪再次将雅利安人的钱包视为不受控制和不受挑战的狩猎场！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很简单：颁布法令，让商人再也无法不受控制地追逐利润！对所有商品进行监管，通过在产品上标明购买价格，将商人的利润空间固定在一个可以确定且不会超过的百分比上！这项建议会立即遭到反对，反对者会指出商业生活的波动是导致这种要求无法实现的原因；商家通常会在产品昂贵的时候购买，但随后却不得不在价格下跌的时候出售，因此他必须用低价购买的其他产品的高价来弥补这一产品不可避免的损失！对此，没有人可以反驳他；任何提出这种要求的人都是无知的外行，等等，商人当然会用这些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大声抗议任何限制其任意妄为的行为！但在这里必须一劳永逸地说明：经济体系不应根据中间商的利润欲望进行监管，而应完全根据安全的商品分销程序的要求进行监管，而只有通过中间贸易的机械化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只有当每个买家都能清楚地认识到和控制完全非生产性的中间贸易的利润时，雅利安经济秩序才能出现！

幸运的是，在中间贸易领域，我们已经有了这种机械化过程的宏伟模型，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在图书贸易中！这本书有固定的价格，由出版商确定，书商必须遵守！

我们从未听说过书商会因为这一原因而使书业分崩离析，因为书商不会利用“经济形势”来提高突然畅销的书籍的价格！

但整个供求“定律”在国际反经济中就像铁律一样，只不过是他贪婪和专横的定律，是为贸易精神的至高无上而设计的，并强加给毫无戒心的人们！但是，如果所有中间商只能按照非常具体的利润表进行销售，那么这种竞争就完全消失了，而这种竞争源于偶尔能够特别便宜地“甩掉”商品的可能性。随着这种令人厌恶的做法的消失，心理学家的大脑中也将产生与垃圾和欺诈相关的活动，这是令人痛苦的！我们知道，战后由于价值衡量标准的变化，图书交易的价格也出现了波动，而犹太人已经希望进一步确保图书价格也能由经济环境决定！幸运的是，由于书商代表的诚实、传统和坚强，每一次以这种方式破坏德国书业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因此这种犹太化的尝试应该被视为失败！但正如犹太人竭力摧毁货物贸易合理机械化的最后堡垒一样，如今已经意识到自身利益的雅利安人，也必须努力在所有其他领域推行同样的解放性机械化。那些仅仅因为不习惯或受到个人影响而认为某件事不可行的人，永远无法制定新的规则，因为那些在旧体制下谋生的人总是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矛盾重重的雅利安商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投其所好！因为通过这种商品买卖重组，犹太人“优越”的一切，对他来说如此痛苦和难以理解，将突然消失！如果他从有能力的制造商或其他生产商那里购买优质产品，他就能赚大钱，这样一来，这种机械化也会对优质产品的生产产生影响，而不再有任何经销商的做法在客户获取中发挥作用！但是，当所有中间商都同样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时，这种重组对雅利安人的不利之处很快就会变成解放性的优势！

因此，在雅利安国家控制下的商品分销体系，其首要要求之一是：每种商品的售价都是购买价格的固定百分比，且该比例应始终向买方公开，并以相同的方式加以规范。违反这一规定者将受到累进罚款的处罚，最终吊销其营业执照。这种法律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它将消除货币交易商的无谓权力，而商业中介则可以通过其技能、善良的无害心理和商品广告，而不再通过狡猾和幕后操作，能够并将会实现经济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导致了交易商目前的精神统治地位！犹太精神可以消除其危害，就像给狗戴上链子，让它无法咬人一样。这就是新秩序的问题！然而，如果贪婪之灵的统治降临人间，投机者的头脑确实应该像恶狗一样被拴起来。

从科学意义上讲，因为贪婪的精神将能够出现、生存、繁荣和“占上风”，就像它作为长子一样，在数量上也是占主导地位的！这种压制和扼杀灵活精神的过程现在必须以坚定不移的连贯性扩展到整个经济生活！关于放贷本质的新知识，以及迄今为止在这方面习以为常的所有最恶劣做法的可怕徒劳，必须导致消除由此给整个雅利安人类带来的灾难。直到现在，任何拥有土地但面临财务困难的人都会被迫向一些私人银行机构借钱，这些机构通过所谓的抵押和房屋、土地、森林、田地和各类领域的第一“条款”进行“登记”，即永久承诺支付利息！但是，由于我们以坚定的洞察力认识到，这种金钱索赔的永久性，随着所欠全部款项的偿还以及贷款费用的分摊而消除，是一种经济上的错误计算，仅此而已，那么国家只需宣布债务已经偿还，因为计算结果显示总额已经付清，因此债务必须从登记簿和土地登记簿中消失！

但任何认识到新真理，却没有力量和勇气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它的人，就已经放弃了雅利安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只有在能够实现其生活内涵时才能存在！在这个问题上，谁若不能与我们同舟共济，他的心智能力就已经陷入无可救药的扭曲状态，无法再将思考与存在、认知与生活和谐统一起来，因此只能无奈地屈服于那种精神暴政，而众所周知，这种精神至今仍能巧妙地理解如何实现其精神诫命！然而，那些尚未到期的债权，仍应从私人所有权转移到国家所有权。

我们新的见解不言而喻地表明，向私人放贷的权利，因为与暴力、权力和对邻人自由的干涉有关，因此绝不能再允许私人拥有，因为 和故意取消债务，例如在取消债务可能被滥用以在经济上摧毁债务人的时刻，一个人将拥有对另一个人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在地球上绝不应该被行使！国家作为债权人，是个人及其重要需求的朋友、帮助者和支持者。国家不会利用这种权力进行破坏，相反，它会促进和维护其同胞的福利和进步！有了这个新秩序，我们还必须教给人们全新的国家观念和全新的国家情感，与煽动者巧妙灌输给他们的观念和情感截然不同，即对国家的仇恨和摧毁国家的欲望。

但当人们再次认识到国家是他们的最好朋友时，因为国家只是人类社会法律的具体体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那么爱与信任就会将国家和个人凝聚成一个光荣的整体， 仇恨和不和谐将自动从国家结构中消失，而那些奉行此类行为的不同结构的人将永远无法破坏雅利安个人和雅利安国家的有机统一，因为他们的行为和意图将是机械化的。简而言之，贷款业务应该由国家单独进行，作为帮助和鼓励个人并促进其经济发展的手段。那些看不到这一点、没有再次认识到这是我们新知识带来的必然结果并欣然接受的人，已经失去了创造性的精神力量，而如果没有这种力量，任何知识都毫无意义。相反，不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其思想将陷入贫瘠、毫无创造力的次要记忆中，永远无法感知鲜活的思想！

一旦经销商通过必要的机械化流程被消除，那么，可以理解的是，货币交易的疯狂可能就会从世界上消失，因为否则的话，这种机械化永远不会真正发生！但是，当我认识到犹太人从金钱到商品的错误思维方向，以及这种思维方向对生产商品的人类的思维产生的各种影响，并认识到当货币交易、借贷等经济活动不再属于可移动的范畴时，这种错误思维方向就永远被根除了，因为在这种错误思维方向下，已经无法再做出任何经济上的事情。 一旦不可撤销的法律彻底废除，雅利安人的解放时刻就会到来，诚实、快乐、富有创造力的人将在地球上"统治"一切，因为他们将再次存在，而不会像今天这样被谴责为无能为力和灭绝，被金钱的力量奴役！

国家垄断放贷是任何雅利安经济体系的唯一条件和前提！当然，我们立即遭到商人心理学家们的强烈抗议和劝说，他们用轻蔑和戏谑的话语立即 并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完全不懂经济规律、不谙世事的哲学家"的怪癖，他应该用他的愚蠢理论去面对严酷的现实！但是，对于那些因为觉得我们可能敲醒了他们暴政的丧钟而感到绝望的人，我们要说，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创建雅利安经济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当作为经济改革必要基础的法则得以确立并被普遍理解时，这个条件就会实现！雅利安人的货币，第一次被正确理解，是购买商品的交换媒介，但它永远不是商品。只有国家拥有不可剥夺和不可动摇的权利，为经济支持的目的向个人发行货币，但它永远不能再为可移动精神的超国家力量掠夺雅利安人服务！马上，愤怒的人们就会打断我，嘲笑

地问，我全能的新国家到底打算如何阻止有钱人把钱借给需要的人！让愤怒扭曲的脸庞冷静而冷漠地重复一遍，雅利安国家将如何以最简单的方式永远杜绝这种情况：让私人无法因向另一名私人借钱而遭到起诉。

因此，这种非法且一旦举报将受到严惩的经济行为所产生的金钱索赔不仅不被承认，而且被视为犯罪，无论如何，根据雅利安法律，这种行为根本不存在！不对，是的，你在这里张开你的口水，贪婪和贪婪的统治者？ 你从未听说过如此“疯狂”和“疯狂”的事情！在你们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有人反对你们征服世界，但你们从未受到过挑战，直到最后一刻才如此狂妄地反对。耐心点，一切都会变得截然不同！耐心点！你们和你们的神力将在新崛起的雅利安人精神力量的照耀下，消失在黑夜和迷雾中，沉入地狱深渊！你们征服世界的武器——金钱——已经被夺走，成为深渊中残破的刑具，而雅利安人正在为自己创造新的武器，一个能够带来生命和繁荣的武器，一个他正准备在你们惊恐而困惑的目光中创造的武器！耐心点！很快他就会把它握在手里，然后人们就会说：要么变得像他一样，要么灭亡！……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都涉及一场巨大的动荡，只有通过写作和演讲，才能成为唯一可能的方式，才能使雅利安人从犹太世界的强暴中永久解脱，而雅利安人将在全世界崛起，这是肯定的！但这将是理解力思维的最高考验，看看它是否还能认识到它已经认识到了什么！这本书旨在确保读者在领袖的历史背景下充分理解这一点。

它试图为不可动摇的见解奠定基础，没有这些见解，就无法建立所有实际应用的基础。只有当私人生活中的各种借贷都被视为非法，甚至被视为不可能时，雅利安经济才能开始。我们估计，过渡期大约需要十年时间，因为那些不愿理解并相信他们习惯的工作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流动资金，即使法律已经得到认可和实施，仍会继续秘密借钱给有需要的人。

但随后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那些在窘迫中提供签名和宣誓的贫困者会冷冷一笑，援引法律，拒绝付款并威胁提起诉讼。因此，放贷人这个被欺骗的骗子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放弃他不再可行的业务，陷入绝望！这些无疑是未来的景象！但面对一项公认的新法律，任何人都无法想象这样的景象，因为其掌握的力量不足以将其提升到法律的高度，并贯彻到底 如果流动的精神统治世界所需的法律仍然占据统治地位，永远终结雅利安人的统治，那么他只能怪自己。但世界各地的“流动”股票都是借来的钱，仅此而已！富有成效的企业资本也经常以这种形式出现，但这丝毫不会改变事实！在这里，意识到必要回归的雅利安经济理论必须坚定地贯彻实施，以雅利安的方式重塑经济生活！因此，目前，所有未由辛迪加固定的股票都必须通过命令予以消除，命令要求在某个日期之前，将股票提交给为此目的在所有城市设立的国家银行办事处；名义价值——实际价值，而不是通过第五次附加费产生的价值，如第一部分所述 将以政府证券的形式偿还给这些“票据”的持有者，即流通中唯一可能的货币，因为个人，除非是参与犹太经济秩序的罪犯，否则不应以任何方式负担或损害，除非是新秩序所绝对必要的！所有这些流通股都在一天（或一周；结算时间的长短与一次性事件无关）内转归国家（即公众）所有。国家接管后，他们迄今对公众造成的伤害都得以消除！但在一些现有的或秘密的证券交易所“玩弄”票据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犹太人最可怕的罪行也随之从世界上消失了！

人们看到，通过有目的地处理雅利安人的经济重组，实现救赎是多么容易！洞察力就在那里！你们敢于称自己为已经觉醒的雅利安人种的领导者，那么请确保你们有力量去执行必要的措施。通过这样的重组，银行基本上只不过是“以二次幂增长的股份公司”这一事实很快就会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它们的目的就是将钱投资到企业，从而获得（创造）各种股份，而它们本身也是股份，所以它们基本上只存在于理想的形式中！这是因为这些掠夺中心的股份基本上又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所以银行基本上也可以被描述为股份中的股份！因此，这些二流股票，只要它们是浮动的——众所周知，当“银行”要倒闭时，情况总是如此！——就会像上述情况一样从世界上消失。如果它们被保留下来而没有交付，它们将被自动视为已归还国家——且不予补偿！

然而，现在剩下的银行股份都集中在银行创始人的手中，而且属于固定的个人所有权！当然，国家作为雅利安人收购方法的捍卫者，必须采取不同的赎回和消失程序！……因为这些股份往往由同一个人持有。例如，金融巨头的巨额财富，罗斯柴尔德家族、布莱克罗德家族、戈德施密特家族、沙逊家族、佩雷拉家族、埃斯凯莱斯家族、斯普林格家族，以及最近的卡斯蒂廖尼家族、博塞尔家族、斯廷内斯家族等。——读者已经意识到，后者完全可归因于相同的收入者！——在美国，阿斯特、范德比尔特、摩根和洛克菲勒等，都只通过匿名股份的方式近乎犯罪（从雅利安人的角度来看）地动员生产商品，因此重组必然会导致没收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财富！但是，由于所有这些投机分子通过这种迂回的财产获取方式拥有了最美丽的庄园、巨大的领地和整个工厂，从而成为独立的企业家、大地主和庄园主，因为这是与真正的方向相反的，雅利安精神表现出对物质财富的慷慨和蔑视，它一心只想彻底改变价值观念。

这个世界，这些不合法的庄园主，他们的财产需要一种全面的精神，在没收了您所有非法动产后，将同样的东西留给了他们！这种所有权对雅利安精神来说是多么非法，从语言中就可以看出，语言将“方式”和“座位”作为不兼容的事物分开，而在犹太人发明的动产中，我们发现它们是不可接受的结合，诚然，当这种经济改革不顾非法获得的财产，尽管这是目前唯一的获利机会，而所有流动的商业行为现在都被取消时，谁又能指责这种经济改革是恶意的呢！

我们认为，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应得的部分，如果你只考虑奥地利人的话！他们在维特科维采的巨型钢铁厂、他们巨大的地产和城堡，前提是他们必须本着全面的精神管理这一切，而他们的全球流动网络必须被雅利安精神彻底摧毁！但在毫无意义的经济破坏的新秩序下，每个人都必须给予公正和宽恕，因为新秩序下的经济只追求理解的精神，甚至宽宏大量到忘记非法获取的罪行，只要这种宽宏大量有助于实现更高目标，即符合理解精神的秩序！但如果这些金融巨头突然发现自己，由于这种宽宏大量的规定，成为拥有平等权利的房东、工厂主和房地产所有者，但现在，他们怀恨在心，不同意这种不仅仅是重组，而是应该再次尝试他们以前的恶作剧，那么，确实，这种对解放性重组的不服从反抗必须以没收他们所有不义之财来无情地回应！因此，在雅利安经济改革中，金融巨头手中的流动资本将成为国家银行的财产。尽管从雅利安人的角度来看，通过投机手段获得的财产是非法的，但只要他们承认这一新秩序，并在秘密、老式的合作中不采取任何反对行动，这些财产仍将由

其所有者拥有。然而，如果他们违反规定，他们的全部财产将毫不留情地归国家所有，也就是归社会所有！

这些是第一届雅利安人世界大会必须制定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原则。那些看不到只有这样才能让各国严重受损的国家预算恢复元气的人，没有能力将已经掌握的东西转化为既定事实，也没有资格参与任何为雅利安人服务的讨论！我们早就知道，这可能需要一百年才能实现，根据古老而行之有效的惯例，我们的死敌会派出热情的鼓吹者——骗子混入雅利安先驱者的行列，以便将一切计划扼杀在萌芽状态。

但事实上，雅利安人只有看清这些斗争手段并战胜它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这正是所有复兴的前提！但斗争一直不均衡，以至于可以说两个决斗者的剑锋还没有交过。当犹太人还在无畏地刺杀时，雅利安人就像那个备受质疑的“斗士”，他看不到也感觉不到对手的打击和刺杀，只是挥舞着剑在空中挥舞，并大声尖叫，以此表明自己的斗志！

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极不平等的斗争可以用一句残酷的话来概括：“雅利安人光说不做，犹太人只做不说！” 但当他说话时，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而雅利安人厚颜无耻的喋喋不休却向对手暴露了他的所有计划和欲望，而对手早已做好了应对措施，以防雅利安人尝试从言语到行动的陌生且对自己来说非常可疑的转变！……面对这种无望的局面，只有一件事能帮上忙：明确认识雅利安人的目标，并达成普遍共识，然后坚定不移地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直到言行一致，成为新秩序的实际行动。随着上述动荡的发生，当雅利安人意识到他们利益的一致性时，最重要的事情将被解决，而这对于在所有国家建立雅利安结构的国家银行是必要的。

种族理念

民族社会主义种族思想 沃尔特-格罗斯

在新德国采取的所有措施中，与民族社会主义种族政策有关的措施在国际上引起了最大的轰动，因为这是一个国家踏上了迄今为止几乎从未有人踏足的道路，穿过了未

经开发的保护区，其目标在许多方面可能与自由主义党派的既定观点相冲突。相关的立法是为了证实和实现这些目标，因此，至少在一开始，民族社会主义重建的这一特殊阶段遭到普遍的误解和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其他国家已经意识到，德国确实正在走上新的道路，但这些道路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而且，德国在许多方面还为其他国家开辟了道路；只需提及我国关于预防遗传病传播的法律（《绝育法》），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都已制定了类似的法律或提案草案。然而，如果不完全了解民族社会主义在历史的长河中带来的人生哲学观念的根本变化，就不会完全理解或同情我们的立法。以前，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教义的强大影响下，国家和文明的发展和衰落被归咎于经济或纯粹的政治原因，而今天，我们看到了人在维持和塑造经济、国家、文化、政治、艺术和思想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逐渐认识到，保护和维护人民是保持国家和文化成就的主要因素，因为优秀的血统和来自优秀血统的力量只赋予一个民族一次，如果任其退化，就不可能像重建城市或恢复被破坏的土地那样再生。因此，明智的政治家会把保护人民的生物能量，即种族能量，放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之前。过去一系列盛极而衰的帝国和文明有力地提醒我们，忽视这一真理的后果是多么的不可挽回。历史和人口科学研究表明，有三个生物阶段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民族生命力的毁灭，随之而来的是国家和文化基础的毁灭。这三个阶段是:人口不断减少不适合遗传的人增多人种的混杂在这些方面，1933 年德国的状况令人担忧。例如，健康居民的出生率下降，而不适合遗传的人群、智力缺陷者、低能儿和遗传罪犯等的繁殖却毫无节制，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在过去的 70 年里，健康人群的增长只有 50%，而不健康的人群，实际上是那些只适合住在精神病院里的人，却在同一时期增长了 9 倍，即 450%。为照顾这些人，德国的劳动人口每年要花费 10 亿帝国马克，而帝国、省和市镇的全部行政费用高达 7.13 亿帝国马克。

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颁布《防止遗传病传播法》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这是为了自卫而采取的措施，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因为很大一部分不适合遗传的人在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时，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苦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许多人——那些仍有责任感的人——看到"父亲的罪孽"降临到自己的孩子身上，都感到非常恐惧。对于这一类不幸的人，民族伸出了援助之手，使他们摆脱了可能的精神折磨。绝育手术使他们的良心摆脱了给无辜的生命带来更多痛苦的可怕负担。国外敌视德国的圈子经常声称，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被拉去绝育。任何精通德国法律以及整个程序的周密性和预防措施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种指控是荒谬的，没有人会仅仅因为提出要求或政治压力而被绝育。防止遗传病传播的法律只适用于公认的生理和心理缺陷病例，如先天性白痴、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性精神病、遗传性癫痫、遗传性失明、失聪和严重的身体缺陷；此外，它还适用于长期醉酒者。当事人、其亲属、当地医生或与公共卫生事务有关的官方人员向遗传特别法庭提出申请后，即可进行绝育手术。主管法院由一名主审法官、一名医务人员和一名医生组成，负责决定是否需要绝育。如果申请人或被审查人不同意法院的决定，可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高等法院的组成与下级法院类似，但上诉人绝不相同。上诉法院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通过终生居住在私人住宅中——或至少在有生育能力的情况下——的方式来避免执行死刑，条件是这种居住不会给政府带来任何费用。加入这一条款是为了让可能因教

皇通谕而出于良心反对的天主教信徒有机会不惜一切代价遵守其宗教信条。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措施尽管思路开阔，却主要因政治或教条原因而受到攻击。这些批评是基于一些看似毫无根据和奢侈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种观点纯粹是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这种观点反感对个人生活的任何干涉。根据其倡导者的观点，个人有权不生育（如果他愿意的话），或者，尽管有明显的遗传疾病，也有权随意生育，或者，通过超越所有国界和种族障碍，按照自己的喜好缔结婚姻。

从根本上说，我们断然拒绝社会集体利益对个人生活的任何限制。显然，这种态度在每个国家都应受到谴责，因为如果在所有领域都实行这种态度，就会使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社区和国家机构变得不可能。只有当个人成为整体的一部分时，文明才有可能实现。正如集体权威为了所有人的利益，通过税收法或防治流行病的措施等来限制个人的利己主义一样，集体权威也同样有权实施经科学证明有利于人口政策或优生学的措施来造福社会。德国普遍需要采取这种行动。

第二类反对意见主要基于人道主义理由。例如，有人认为绝育行为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社会才应接受。但是，在文明社会中，为了维持和留住遗传性疾病患者（尽管费用高昂，但他们的疾病却永远无法治愈）所需的过高费用，降低了一部分身体健康、有工作能力的人的生活水平，这并不是人道的做法。毕竟，种族中的健康成员也有权得到一份同情和人道考虑。认为绝育不会消除类似病例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也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的论点就好比不要救火，因为在其他时间其他地方可能会发生另一场火灾。顺便提一下，绝育对个人来说是而且仍然是一项人道义务。一个患有某种遗传性疾病的人，如果知道不仅他自己无法治愈，而且他的孩子在不知道他自身疾病的并发症的情况下出生，也注定会有类似或更糟糕的命运，那将是多么大的精神痛苦啊。及时进行绝育手术，可以让那些不适合遗传的人摆脱这种精神折磨。还有一些反对者坚持认为，只有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手术。然而，如果一个人无法控制自己的病态本能，或者一个人因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而无法生育，却希望得到他的默许，那就太愚蠢了。在有组织的社会中，正义和道德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干涉个人自由，甚至是健康个人的自由。

同样，正如医生在这方面采取的预防措施一样，遗传传播领域的医学和法律专家，在生物学知识的支持下，如果需要，也必须承担起病人个人无法承担的责任。第三类，也是最后一类人，则担心社会生物分层或人类种族分类的建议会导致严重的冲突。关于这一点，可以说种族的特殊性是自然的，任何社会或人类的分化体系只有在与自然现象相协调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为什么说，对种族的社会诉求、种族卫生及其实际应用的了解和承认，本身就是为了限制甚至防止战争。因为战争，即使成功了，从生物学上讲，也意味着最佳遗传倾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既然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坦率地从生物学角度思考问题，那么她就只想要和平。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理念是可以想象的最和平的理念，因为在所有其他理念中，它认为自己的职责是维护其人民纯粹的种族连续性。除了纯粹的缺乏理智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指责新德国对战争的渴望。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经过几个世纪的倒退选择、出生率下降，最后在战争中我们的男性遭到可怕的摧残，我们的民族在遗传价值方面遭受了多么无法弥补的损失和多么沉重的代价。如果说我们需要和平与安宁来使我们的人

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重新振作起来，而这种振作几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那么，我们更需要和平与安宁来实现我们人口政策的重建和重要的种族愿望，因为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具有灾难性的了，因为战争无情地摧毁了最优秀的人，从而间接地优先选择了价值较低的人。即使是一场胜利的战争，在生物学上也是一种损失。真正的政治家深知这一点，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会动刀动枪。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种族原则——与恶意赋予它的目的相反——本身就是根本和平政策的最可靠保证。最容易引起误解的是民族社会主义对世界不同种族之间关系的看法。有人质疑，新世界理论的基本种族原则是否会滋生对不同种族的人的屈尊甚至蔑视。恰恰相反，这些原则为所有人的相互宽容与和平合作提供了最好的保障。我们理解另一个种族的人与我们不同这一事实。这一科学真理是每项种族政策的基础、理由，同时也是其义务。我们无法判断其他种族是"更好"还是"更坏"。因为这要求我们在评判过程中超越自己的种族局限性，以超人的、甚至是神圣的态度来看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自然中众多生命形式的价值与否做出"非个人"的评判。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血缘关系和我们自己的种族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即使是抽象的，我们也不会试图采取这种极端种族的立场。历史、科学和生活本身以千百种方式告诉我们，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并不相似；此外，更大的种族不仅在身体上，尤其是在精神和智力上彼此不同。昨天，人们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试图统一地球上所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标准，这是对大自然的犯罪，是为了错误的原则而侵犯不同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自然属性。今天，我们向世界上存在的种族差异低头。我们希望每一种生物都能找到最适合其自身特殊要求的自我表达形式。因此，民族社会主义的种族原则是尊重其他民族完整性的最可靠保证。将其他民族纳入通过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德国的想法与我们的理念格格不入，因为这些民族由于其外来的血统和精神，将永远是德意志国家中的异类。以经济实力或纯粹的疆域扩张为目标的世界可能会沉溺于这种愚蠢的想法，但以有机的、种族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政治家绝不会这样做，他的主要考虑是维护伟大的民族，以及与伟大的民族一起维护由血缘关系纽带维系在一起的民族的基本团结。正因为如此，我们与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们将把我们为自己争取的同样的特权给予地球上的其他种族：根据我们自己的天性要求塑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特殊世界的权利。如果说民族社会主义希望个人避免无限制的血缘混杂，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蔑视。毕竟，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德国人自己就是一个混血儿。民族社会主义的要求只是希望今后能更严格地遵守血缘要求和生物学规律。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与其他具有良好精神面貌的人的观点相差无几。

例如，美国的移民法就是建立在明确的种族歧视基础之上的。欧洲人和印度、太平洋岛屿等地的居民本能地对血缘混杂保持着距离，双方都真正地认为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都是非常恶劣的。然而，这种自然态度丝毫不影响双方密切合作和友好交往的可能性。请允许我代表新德国再次强调：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人民与外族通婚，因为这样的血缘交融会使两个种族的优秀品质和特征丧失殆尽。我们的种族观点只会让我们更

充分地了解他们的基本特征，就像我们希望自己的特征得到尊重一样。根据这一推理，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反对犹太人在德国领土上的帝国主义图谋。

因此，这纯粹是德国人民的内部忧虑，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一个对他们既不同情也不理解的外来种族的统治（这是过去政治错误的结果）。在过去的政治体制下，犹太人在政治、艺术、文化和商业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自 1910 年以来，每天都有多达 13 名犹太人从东方移民到德国。

因此，柏林的职业占比如下：32.2%化学业 47.9%医生 50.2%律师 8.5%报刊编辑 14.2%制片人和舞台经理 37.5%牙医

世界上任何一个对自己和民族荣誉尚存一丝自豪感的民族，都不会愿意容忍一个完全陌生的种族的成员如此主宰重要的职业。同时，犹太人也是那些反对任何民族主义重建的政党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在所谓国家党中，28.6%的议员是犹太人，而在社会民主党中，这一数字为 11.9%。具有一定政治意义的是，德国共产党（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都是犹太人。

在政治、科学和文化领域，这种与德国人天性格格不入的外来影响占主导地位，为制定恢复公务员职业化的法律以及后来被称为《纽伦堡法》的法律提供了目标。在德国的犹太人是一群外国人，他们可以像其他种族的人一样享受德国的热情好客。但是，没有一个法国人会希望自己国家的主要职位被英国人占据，也没有一个英国人会希望自己国家的政治、艺术和文化领域的重要职位被日本人占据。那么，谁又能合理地反对德国人把犹太人从他们国家的重要职位上赶走呢？犯罪率较高是判断德国犹太人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至于犯罪率较高的问题，可以提及的是，其中大多数是来自东欧的移民，他们的文化和道德观念永远不可能与德国人民的文化和道德观念相一致。因此，《纽伦堡法》禁止犹太裔成员获得帝国公民身份。混血儿（共约 30 万人）可以成为帝国公民，但不得担任公职、军队、医疗和法律职业。根据法律规定，可以豁免。禁止犹太人与德国人结婚并规定非法性交将受到惩罚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更多的混血儿，他们的命运在世界各地都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他们非此即彼。

对于已经存在的混血儿，有两个犹太祖父母和只有一个犹太祖父母之分。前者与德国或盟国血统的人结婚需要得到当局的批准。后者不得与犹太人或前一类人结婚。他们只能与有德国血统的人结婚，他们的子女不受限制性规定（《军队法》和《恢复公务员职业道德法》等）的约束。总之，他们的子女成为德国社会的正式成员。**这些措施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保持血统纯正，才能保存其文化和思想个性。有人说，"每一个种族都是神圣的灵感"——这句话顺便针对种族政策。然而，我们要重新加入，"正因为每个种族都是一种神圣的灵感，文明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这种灵感的纯洁性，并拒绝任何有损其纯洁性的行为"。**

民族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 沃尔特 格罗斯

当第三帝国最终在其他国家中确立其应有的地位时，作为政治运动的 National Socialism（民族社会主义）便达到了目标。民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只有当它在德国各阶层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以新的面貌团结全国人民时，才算完成了历史使

命。民族社会主义的政治实现将在强大的帝国和新的生活空间秩序中实现。然而，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体现在我们国家和居民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中。

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生活将与以往截然不同，而我们历史上的许多永恒价值也将继续适用于未来。然而，在某些领域，由于新的世界观取得了胜利，德国人生活的普遍态度将不得不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及其对德国生活方式的实际影响基于两个支柱：

一方面，个性得以充分展现，个人接受近乎完美的教育。另一方面，个人愿意为社会福祉做出贡献。这两极造就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生产潜力。

发展和塑造个人能力，使个人感到幸福和有意识，而国家接受个人对社区做出真正、最有价值的努力的前提条件就是这样做。只有这些对社区的努力，才能赋予个人人格及其发展以意义和最终的高尚。在病态时代，人格和社区成为对立面，但对我们来说，它们是和谐的和弦，其中生活的各个音符共同奏响。

对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生活的基调是幸福和快乐。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那种对生活一无所知或试图逃避生活的深度、沉重和痛苦的那种平淡肤浅的态度。这是一种健康、坚强的人的态度和精神，他们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美好；就像无忧无虑的孩子一样，快乐地热爱自己的生活。对于不断成长、成熟的人而言，生活中的障碍和困难、艰难和麻烦只是证明自己力量的机会，这些经历会让他变得更有力量，内心充满喜悦。因此，民族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肯定一切能增加幸福的事物。我们对待生活的方式只排除一切破坏性和有辱人格的影响：滥用身体和精神资源、通过疯狂消费兴奋剂和刺激物降低个人能力、因疏忽而危及个人健康和生命，这些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国家。任何能够带来力量和幸福的事物都是好的，因此，德国的新生活方式需要这些，就像需要排除所有破坏性和腐蚀性的影响一样，无论这些影响是影响国家还是个人。

上述观点适用于我们生存的方方面面：身体及其发展，以及思想和灵魂。在智力运动中，训练有素、控制得当的强大身体与成熟的思想和卓越的思维能力在精神事物和艺术领域中各种经历中是平等的。这两方面在全面发展的人身上是统一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为我们国家的未来服务。

在身体和精神这两个领域，个人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并且倾向于某些特殊的能力。在我们自己的意识觉醒之前，我们已经由不可抗拒的遗传定律决定了这个问题。我们应归功于这些定律，因为它们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不同，以及我们国家社会中丰富的才能和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民族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不会提供虚幻的平等主义幻影，也不会为每个人制定强制性的标准。民族社会主义的理想不是愚蠢的时尚，也不是标准化的类型。相反，我们的目标是各种各样的人格，根据他们的才能进行教育和培训。只有这种多样性才能带来和谐，提升个人，赋予国家历史的力量和美丽。

勇气与幸福一样，是新一代德国人的主导价值观。民族社会主义造就了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伟大的德国军事传统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成为民族的义务和理想。勇气在战争时期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在和平时期，我们也必须以勇敢和英雄主义的方式生活，这对男人和女人都是一种要求。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很多机会来考验自己：永不逃避困难，即使有更轻松、更捷径的道路，也要坚持走正确的道路；将目标设定得比自己的懒惰更高； 自己，忽略懒惰的愿望，遵守伟大的国家法律而不是培养自己的自私，在重大个人决策中遵循自己的良心，承担责任而不是躲在廉价的借口和懦弱的顺从背后。 所有这些都是勇气，是受民族社会主义教育的新德国人生活方式的必要组成部分。 精神上的勇气，与伟大的新思想作斗争，也属于这里。归根结底，只有那些通过诚实努力而获得的信条和信念才对国家和个人有价值，而不是那些通过懒惰地重复从他人那里听到的东西而获得的信条。

内心和外在的创伤和痛苦，不沮丧，也是一种勇气。不满和悲观、顺从和绝望基本上是软弱的证明，不能与新一代德国人的勇敢态度共存。

超越个人生活，超越个人和国家的斗争与胜利，德国人在这个世界中拥有永恒的未来。我们将通过新一代人的方法来确保我们的未来，他们今天还是孩子，明天就是男人，后天就是新一代人的祖先，将我们与过去和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民族社会主义认为这些纽带，因此家庭和子女是民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成为家庭成员对任何男人来说都是一种特殊的满足。生养许多孩子是女人的最高目标。家庭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必需的，除非他想要不顾人类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此外，家庭和子女是一个国家永恒存在的唯一保障，因此也是我们的民族未来对当代人的要求。正在崛起的德意志帝国拥有强大的实力，并受到利剑的保护，现在和未来几十年都需要拥有无数优秀德意志血统子女的家庭来填补我们开拓的空间，并永久确保当代人的勇气为我们赢得的一切。

私人生活和社区服务的结合在民族社会主义的乐观大家庭中得到了完美体现。在家庭中，两性之间最亲密的爱与强烈的张力能够带来私人生活的圆满，并为整个国家的发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我们同样反对否定和不自然的禁欲主义，也反对那些不愿承担责任的人的自私。通过这种方式，家庭和儿童成长为国家的最宝贵财富，因为他们将个人幸福与集体利益和收获相结合。

在这种态度下，无论男女，对种族感到自豪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德国人会表现出尊重、友爱与合作，以及不可动摇的自信和种族自豪感，他们将违背血缘的罪行视为民族的致命罪过。

正是这种态度使民族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经受住了关键的历史考验。命运总是让我们中的一些人无法完全实现人生价值。然而，那些被剥夺了成功的人，他们同样有价值，他们会加倍努力，以弥补他们在其他领域未能实现的成就。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对家庭和孩子的渴望，以及一个拥有孩子的国家意味着幸福和责任，那么我们就无法谈论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态度。因为只有通过孩子，我们才能参与永恒的德国生活，只有肤浅或胆小的人才会觉得不需要这种参与。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这些原则，在顺境和逆境中度过一生，这样面对死亡时才能泰然处之。他不会渴望或草率地寻求死亡，因为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他的生活也是有意义和值得的。他也不会害怕死亡，可怜地逃避它，因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出生一样自然和不可避免。就像自然界所有普遍规律一样，死亡是无情的，但也是宽容的。没有人知道死亡之后是什么。在这个领域，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知识或直觉来思考和相信。无论如何，幸福而勇敢的生活

包括勇敢而自信的死亡。生活是美好的、有意义的，后代将继续完成死亡从我们手中夺走的人的工作。

民族社会主义种族政策 沃尔特 格罗斯

德意志女子们！

当德国人今天聚在一起讨论我们作为个人和民族共同关心的问题时，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这都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在过去的政治斗争中，我们谈论政党纲领或文明时，灵魂并未参与其中。

现在我们忘记了如何仅凭理解、仅凭嘴巴、仅凭内心来处理问题。我们再次成为完整的人。当我们与他人交谈时，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这就是运动从一开始就强大、伟大和有力的原因。这也是边界两侧的敌人无法理解并强烈憎恶的原因。当这个伟大而美丽的民族运动开始时，敌军和德军之间、一个真正早已消亡的旧世界和一个正在努力通过我们走向光明的新世界之间，也开始了艰苦而痛苦的斗争。这场斗争在人们的心中与灵魂中持续了多年，至今仍未结束。世界很难理解我们努力的核心：鲜血和种族的价值。

当我们谈论它时，我们的敌人先是怜悯地笑，然后是仇恨地笑。

让我们谈谈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对此的看法，这样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德国女性可能比男性、国家及其战斗组织更关心这些问题。

过去曾有一段时间，我们非常不真诚，从最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我们非常不真诚。我们不是对其他人、政党、国家或国王不真诚，而是对更伟大的事物不真诚，对生命法则不真诚。只要世界存在，只要生命生长、繁盛和消亡，生命就会渴望延续到未来，赢得新的领地。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类——就像我们、我或你：只要有生命存在，它就渴望孕育新的生命。

谈论这些事情应该是不必要的。我们谈论它们只是因为几十年来，一个疯狂的年代无视、亵渎和嘲笑了这些伟大、美丽和纯粹的生命梦想。在那个时代，金钱至上，人们说：“这个世界不应该由生活所需来管理，而应该由某个愚蠢的会计决定什么才是最好的。”结果可想而知。人们根据钱袋和支票簿来评估生活的准则。当我们回想起我们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时，家里有很多孩子。虽然家里拥挤，经济拮据，但我们很快乐，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人丁兴旺。但人们开始说：“作为男人或女人，作为父母或领导者的老师，你们有责任告诉人们如何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人们认为，更美好的未来只能是更富裕的未来，个人拥有更多财富的未来。当人们被问及这些钱从何而来时，上个世纪出现了一种错误的说法：“人越少，每个孩子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财产就越多。”因此，一个爱自己的孩子并希望国家繁荣昌盛的人，应该确保德国人口少，在他去世后只有少数孩子继承家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宣扬的可怕节育教义，资产阶级也紧随其后。没有人敢反对它。正是这种理论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模样：一个正在消亡的民族，每年出生的人口越来越少，如今每年死亡的人口比出生的人口还要多。这一切本应带来一个幸福的未来。它只从财产的角度来理解幸福。因此，它本质上就是错误的。但即使从它自己的角度来看，它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忘记了一点：

当一个民族开始消亡，当一个民族不再遵守生命法则，当一个民族更看重金钱而非生存和后代，那么这个民族就走上了一条灾难之路，无论从历史还是政治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几十年后，这个民族将消亡，被其他更强大、更贴近生命、更懂得生命法则的民族所压迫。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本世纪末，德国将只剩下四、五千万人，而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边界上，其他民族正在迅速而强劲地增长。这些其他民族迟早会与日益萎缩和衰亡的德国人发生冲突，所谓的幸福理论的结果将是我们的孩子经历艰难而痛苦的民族死亡。

那些认为减少孩子数量就能给孩子带来幸福和平安未来的人大错特错。他们只是给孩子们承诺，让他们为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理念而奋斗，但这一过程是艰难而痛苦的。

如今，当我们努力向人们证明昨天的想法是错误的，国家和民族离不开家庭，家庭离不开孩子，当我们不仅提供经济支持，让人们更容易组建家庭和生育孩子，还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讲述生命的神圣性和延续民族未来的必要性时，我们边境两边的敌人突然开始侮辱我们，对我们恶语相向。他们想干扰我们的工作。

突然**有人**大声疾呼：“民族社会主义的教义是不人道和野蛮的。民族社会主义关于儿童的观点把人变成了繁殖动物。当它说男女有责任延续生命的长河，这条长河从遥远的过去开始，一直延续到未来，而我们只是这条长河中通向遥远未来的一个环节时，我们的敌人在边界两侧宣称：“你们拒绝人类的尊严和价值。民族社会主义认为，除了繁殖，男女没有其他价值。” 我们不得不回应这些言论，这实在令人遗憾，但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敌人总是试图说服女性反对我们，尽管我们所言所语都根植于与我们对话的男女的灵魂深处。我们的回应是：“你们错怪了我们，以为我们以为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将我们的血液传递给后代来延续物种。我们知道其他价值观。我们支持这些价值观，并尽可能多地发现个人在工作中和无私服务中表现出的价值观。我们深知每个人都有双重生活。第一个是出生到死亡之间的生活。我们要竭尽所能，让生命变得充实，成就美好和美好的事物，为他人贡献我们的优势和天赋。这是个人的责任。但作为一个人，你还有更多的责任：

你是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是你民族伟大血脉中的一滴。

在民族永恒面前，你也有责任和义务。你有责任传承父母和祖先的遗产。我认为，这种既符合理性法则又符合生命法则的行为，既不是野蛮的、可恨的，也不是不人道的。相反，我认为野蛮存在于我们遗忘了的岁月中，那时，任何肮脏的流氓都可以玷污家中最宝贵、最神圣的生命，或者把孩子拖入污秽之中，而没有人会捍卫他们的文化免受这种攻击。

我相信，当我们再次告诉人们血液的伟大价值，并提醒他们不仅对工作和服务的 60 年负有责任，而且对过去的千年和我们未来的千年负有责任时，我们赋予他们的价值比昨天更高。然而，我还要说，如果有人认为只有那些成家生子的人才对我们的国家有价值，那便是错误的。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有些人背井离乡是有原因的。我们知道有些人被剥夺了国家所珍视的东西。我们不会忽视他们，也不会认为自

己比他们优越。我们只想说：“我的朋友，你和我必须尽到对人民的义务，当我们无法以某种方式履行义务时，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精力和奉献精神尽我们所能。

当你尽到义务时，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向你伸出双手，我们尊重你的人性和你对德国的贡献。让我们共同努力，以便将来尽可能多的人能够以两种方式为国家服务。

这是民族社会主义教给我们的关于血统和种族的思想。还有另一个方面。当我们今天看到人们时，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并不完全相同。价值观存在差异；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

过去，人们认为这些差异是肤浅的，是成长环境造成的。人们认为，一个人的成长主要取决于他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或出身阶层。他们认为，一个出生在贫民窟、被阴影、麻烦和贫困包围的人，一个缺乏爱和关怀的孩子，只能成为二等公民，成为社会中身心不健全的成员，成为社会和国家所抛弃的人。人们认为，在这样的贫民窟长大的孩子不可避免地会生病，甚至犯罪。这是因为他在如此贫困的环境中长大。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如果德国的每个孩子都在一个能给他所需的环境中长大，那么他必然会长成一个有用、正直、诚实、自豪的成年人。几年或几十年后，整个德国人民将是由这样体面和有用的人组成的。过去，人们认为即使一个人惨败，也是环境造成的。

我们还记得那些精神错乱的日子，当时，数百万失业者被病态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抛弃在大街上，变得多余。一个人在半夜撬开了铁轨，让火车出轨。不到一分钟，他就杀害了 30 名无辜的人，这些人从未对他做过任何事情，或是偷走了他的钱。昨天世界说了什么？“他无法控制自己。他是环境的受害者。他有贝多芬的手和艺术气质。为了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必把他送上绞刑架或关进监狱。不，可怜的施莱辛格只是因为环境而生病。把他送到现代化的疗养院，满足他的需求：收音机、图书馆、吸烟室、语言教师、牧师、报纸室，给他一切让他接触美好事物的机会。几年后，这个杀害了 30 人的杀人狂将变成一个理想的人，纯洁而天真，可以让他去管理幼儿园。”这就是过去人们的想法。

今天，这在我们看来是个糟糕的玩笑，是个疯狂的幻想，但在几年前，这是德国政府的政策。那些在这种政策下表现良好并加入与我们对抗的人认为，他们可以指责我们的种族和血缘理论是野蛮的。

为什么我们的看法不同？因为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归根结底，你并没有像昨天想象的那样重要和有意义；你的力量和能力并没有像自由时代那样伟大。哦，是的，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碰巧当了老师，我就教我想教的东西，做我喜欢的事情，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这的确是个美梦。好吧，这是你的想法。

面对命运法则，我们更谦逊、更谦卑。

我们认识到，我能够为自己做什么，或者你能够为自己做什么，或者我们能够彼此做什么，都不如更强大的力量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重要、深刻。这种力量甚至在我们的出生之前就赋予了我们一部分天性，为我们规划了在世间的道路。这里结合了两件事：现代科学知识和一个谦卑的人的敏感性和理解力。突然之间，我们明白了：你是什么，我是什么，我一生中能成为什么，部分是由我继承的东西决定的。

如果我的继承物是好的、强大的，如果我忠于它并发展我内在的东西，我的生活将是成功的，也许对他人也有益和快乐。如果我没有这样的天赋，或者命运出于某种难以解释的原因赋予了我其他特质，也许这些特质很弱，甚至很糟糕，那么我可能会为此奋斗一生，但仍然无法摆脱因上天的安排而沉睡在我体内的东西。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继承的遗产。如果我们问这些遗产包括哪些身体或智力特征，或者有哪些群体，我们会发现每个民族都有三个群体。第一个是拥有一般天赋的庞大群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能够应对生活中出现的普通问题。接下来是极少数群体。这个群体比我们大多数人拥有更好的遗产，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仅仅是因为命运。人类的领袖、那些建立国家、领导人民或触动灵魂的人，都来自这个群体。还有第三个具有特殊特征的小群体，这也不是他们的错：那些有病或基因缺陷的人。他们无法应对生活的挑战，需要外界帮助才能生存。

随着人类或一个国家经历几个世纪，决定性的事实是这三个群体中哪个最强。有人可能会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强者将获胜，领导者来自哪个群体。这个优越的群体最终必须是最强的，它必须逐渐拥有自己的方式。" 好吧，如果没有人类，事情就会这样发展，如果人类凭借他们的小脑瓜不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上天赋予世界的生命法则。

人类已经干预了这些事务。他试图改变斗争、生存和选择的法则。这些是古老的生命法则，人类也必须遵守：无法应对挑战的物种就会消亡。

这也许很难，但这也是大自然让生命变得更强大、更美好的方式。人类越来越试图废除这些法则。在生命本应终结的情况下，人类通过人工手段让生命延续。他利用自己的理解力、爱心和同情心来维持一个人的生命，即使这样做毫无乐趣，只会带来负担和痛苦。我们现在通过人工手段让成千上万甚至上万个不幸的生物存活下来，而生命本身却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但让他们活着本身并不是问题。更糟糕的是，他们有机会将不幸的身体和心理特征传递给下一代。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我们不仅让他们活着并照顾他们——这是作为人类的责任，我们当然也不希望在将来忽视这一点——还让他们有能力生育有同样缺陷的孩子，从而加倍或成倍地增加他们的痛苦。德国人民不知道这种痛苦的程度，他们不知道成千上万的残疾人生活在只有食物和照顾的家庭中，这种令人沮丧的精神比任何动物都糟糕。至少动物是应该这样。这些可怜的生物是扭曲的生活，对自己或他人都没有快乐。它们在悲惨的一生中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但多亏了那些照顾它们的人的无私关怀和奉献，它们才能活到 60、70 或 80 岁。德国人没有意识到几十年来花费了巨额资金，这些钱是从那些原本可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做到的人那里拿走的。

有一年冬天，巴伐利亚的孩子们上学时甚至没有木鞋穿，只能在雪地里赤脚行走数小时。与此同时，政府却确保那些不幸的人每周两次能吃到新鲜香蕉，以补充所需的维生素。但这些维生素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力量或健康。但在巴伐利亚森林、鲁尔区或弗里西亚海岸的贫困渔村，这些维生素却无法为那里的工人家庭减轻贫困和需求。与此同时，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英国黑人男子在柏林的一家机构里生活了 16 年，花费了 26000 马克。

26,000 马克被浪费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人生上。26,000 马克本可以用来为十几个健康、强壮、有天赋的孩子提供生活和工作的准备。

但我并不是在谈论一种盗窃。金钱本身并不是目的。相反，我们在这里犯下了精神和灵魂的盗窃，因为我们试图说服国家和人类，我们自己的伟大可以来自为最坏和最无助的人牺牲。最后，我们甚至将病人和垂死者置于年轻、强壮、健康和有前途的人之前。

这是违背自然和生命的。一个国家如果这样发展，必将走向深渊。我们年复一年地向健康家庭宣扬不要生育，最多只生一个孩子，否则就是违背国家和这个启蒙时代的灵魂。但是，如果某个低能儿与妓女或基因有问题的罪犯生下孩子，他们不仅会是一辈子的经济负担，还会占用社会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本可以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比如每天给这些可怜的孩子洗澡三次，喂他们吃饭。这是对一切伟大和健康事物的扭曲，是对生命和创造精神的亵渎。

我们深知作为人类的责任和怜悯之心，因此决定不让这些可怜的生物将痛苦延续到下一代，也许还会延续两代、三代甚至更多代。这是一项重大成就，我们的子孙后代终有一天会为此感谢我们。

我知道有些人会说："你管闲事，这不关你的事。你是在干涉人类无法控制的领域。生死不由人，而是由更强大的力量决定。如果上帝希望有病或有遗传病的人出生，你就不应该通过法律、行动或其他任何措施来干涉上帝的意志。如果你这样做——你通过《预防遗传疾病法》做到了——那么你就是在违背上帝的意志，你就是异教徒。

我们的回答是："朋友，你错了。我们确实受制于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我们人类永远不能干涉造物主的大法则。但你错了。看看造物主为他的世界和你的生命所制定的法则。伟大的法则就是生命必须能够自我保存，如果不能，就会崩溃。这是生存斗争、选择和灭绝的残酷法则。这是我们在天空的云朵和星星下每天每时都能看到的法则，生命似乎在毫无意义中走向死亡，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无论是在遥远的非洲还是在我们身边。

无法应对生命挑战的事物终将消亡，无论它带来多少痛苦，即使你的理解或思维能力有限，无法理解这些，但它们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生命和世界的伟大法则。我的德国朋友，这些法则是我们过去在疯狂的幻想中打破的。

我们以人类自大的骄傲和虚假的怜悯之心，打破了伟大的法则，让那些按照上帝法则本应早已灭绝的生命得以延续。

今天，我们再次遵循这些古老法则，采用人道主义方法，因为按照上帝的旨意，自然界遵循着更残酷、更野蛮的法则。我们不过是重建创造法则，部落天意。我们因此表现出虔诚和真正的谦卑——你们才是异教徒。

这也适用于我们种族思想的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原则。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原则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无论是美洲、非洲还是中国，在身体和灵魂上都是不同的。他们并不像昨天的谎言所说的那样平等。

人们是不同的。

他们不仅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外表：**不，他们有着不同的内心和本性，有着不同的善恶能力。过去人们认为这些差异是偶然的，是气候或文明的结果，人们可**

以克服这些差异，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家，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幸福。但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了解到世界上主要血型之间、主要种族之间的差异并非人类行为的结果，而是造物法则的产物。我们了解到，血缘和血缘、种族和种族之间的界限也是灵魂和灵魂、精神和精神之间的界限。我们了解到，与“上帝所结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句老话相反的说法也是正确的。我们了解到：上帝所分离的，人不应将其结合。

天堂认为，地球上不应该只有一种人，而应该有不同的人，不同种族的人。这是造物的一部分。我们向这个真理低头，尊重边界。这意味着我们种族分离的基础不是政治或经济问题，而是更高层次的问题，我们最终对此负责。

在我们的帝国，我们将属于我们的东西与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分开，因为前者是我们的血脉，而后者是异族。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不仅对当下如此，对永恒也是如此。

相信我，亲爱的德国同胞们，有些人说这种学说是一种傲慢、优越或自大的表现，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比地球上其他种族更好。不，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更好，也不认为其他人比我们更差。我们只坚持一件事——造物主亲自制定的法律：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是不同的。

其他人可能并不比我们更好或更坏，但他们与我们不同，正因为他们与我们不同，我们之间存在一道墙，这是生命法则的一部分。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种族思想的核心。我们的目标不是侮辱他人，说：“我是个多么伟大的人！”相反，我们谦卑地认识到，每个健康生命都有其世界角落和特殊任务。人类与植物和动物一样，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一种生物的价值并不比另一种生物更高。但我们也知道，每种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前提是保持自身纯净和强大。只有结出适当果实的树木才有生存的权利。否则它就会被砍倒和摧毁。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问其原因是很愚蠢的。事情就是如此。我们的任务是谦卑地接受支配我们人类生存的法则，接受我们生在德国是德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或爱斯基摩人的事实。这不是因为我们的美德，也不是我们的错，也不是我们的意愿。这是来自上天的命运。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命运，并根据需要和法律发展命运赋予我们的能力。

其他人可能会在自己的土地上以自己的方式发展。我们必须倾听自己人民的内心，从血液和传承中汲取建设家园所需的力量。更高的力量将照顾到生命之外的一切。

亲爱的德国同胞们，我相信，每一个拥有我们精神的人都会认同我们对血统和种族的思考是正确的，并且会说：“我现在明白了，你们不仅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且诚实且真诚地追求着比人类法律更崇高的要求。”

让我们共同踏上通往新世界观的道路。让我们踏上重视血统和种族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会忽视信仰、知识和对更高力量的感知。让我们踏上这条道路，而不是物质、迷信和异端邪说的道路，而是对上帝法则保持谦卑和虔诚的道路。让我们共同踏上这条道路，倾听血液和灵魂统治的最深处的声音。让我们从中汲取力量，建设国家，更重要的是建设帝国。这将是一个不仅具有政治、组织或经济意义的帝国，更是一个人民的帝国。今天，德国有幸在一位伟大领袖的领导下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今天，德国女性有幸看到一位坚强而忠诚的女性站在她们的前面。让我们携手共进，像建设未来的

同志一样，让我们将根植于血液中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神圣的德意志灵魂帝国。万岁！

作为领导者建设者的种族 尤里乌斯-埃沃拉

在《透视画报》的前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除了种族和民族卫生的一般应用，以及自然地，保护我们的遗传基因免受杂交和混血的影响之外，种族主义理论是否应该仅限于“教导”的问题，或者在我们国家，是否迟早会成为真正的“教育”的基础，对某些种族精英承担精神和政治方面的特殊任务。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考虑，在国内，鉴于类似的必要性，我们是否应该开展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类似的项目，尽管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更晚发展，但已经形成了具体的形式，例如他们成立了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奥登斯堡骑士团学员、党卫军及其领袖学校，以及国家政治教育学院。事实上，所有这些德国机构都表明了进行政治选拔的明确意图，其中种族因素必须发挥根本作用，并具有真正形成力量的价值。未来的领导阶层 总的来说，必须承认，未来统治阶层的问题是恢复性运动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争取权力和巩固对外敌人的斗争的最初阶段，这个问题可以推迟，但在第二阶段，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以延续和稳定“命运之人”所创造的有机体。

种族主义理论不应局限于学术领域，也不应局限于文化和宣传形式，而应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献。当然，前提条件是，这种理论应该以全球化的方式来理解，因此不仅限于生物学和人类学领域（“一级种族主义”），还应将种族视为灵魂、性格和生活方式的现实，最终将种族视为“世界观”和精神的种族（“二级和三级种族主义”）。**各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种族混血，一方面是由于内心情感的堕落以及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情感因素的暴虐，另一方面则是导致民族和文明进一步堕落的根源；这一点必须牢记。**

因此，在创建新的统治阶级时，不应忽视对“一级种族主义”的精确考量，当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尤其是在意大利，特定种族特有的身体特征可能伴随着不同种族的心理特征，这并非不可能。然而，无可争议的是，除了在特殊情况下，当研究和随后的选择仅限于我们认为是更高种族的对应种族身体类型（即北欧雅利安人）所定义的领域时，我们更有可能找到与之对应的精神 品质，而不是通过随意研究，后者忽略了这种身体上的种族类型学以及这种遗传和起源的标志，这种标志可能已经消失，但不太可能完全灭绝，而身体和人类学意义上的相对种族纯度构成了这种标志。威望和榜样效应的优势不容忽视，因为无论何时，在身体上，当领导者的形象特别阳刚时，他们就会在人们的印象中显得“教养良好”，而不是戴着眼镜、长相不佳、杂乱无章的矮个子。

进一步选择

当我们通过第一级种族主义确定了一个特定的领域和第一选择后，我们应该通过第二级和第三级种族主义进行进一步的测试，探索比外表更深层、更本质的品质。当前革新运动的一个明确特征是反理性主义。这种运动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积极的力量，无法用抽象的理性来解释。我们未来的决定性任务之一是将这种运动的神话与一种血缘本能联系起来：某些思想和表达方式之所以成为一种“驱动力”，是因为它们对民族群众具有暗示性，必须找到一种表达方式，至少在精英阶层，与种族和传统有着深层次

的有机联系，从而将我们运动的理念与集体主义表达和神话区分开来，后者有时也能对群众产生同样的影响力，但却完全否认一切代表传统和祖国的东西。

因此，我们考虑在第二阶段进行筛选，通过精确、反复地仔细检查已经满足身体种族筛选要求的群体的政治敏感性。**这需要检查法西斯革命的根本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打动人心，从而转化为比常识或混乱的热情更深刻的现实。**那些通过适当测试证明自己在这方面具有足够能力的人，可以通过适当的学科得到发展和加强，可以被委以重要的政治职位，在德国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监督”**。正如教会在其领域内设立了一个神圣的办公室，负责监督一切与正统教义有关的事务，这些精英们也应基于其法西斯本能和种族意识，在意大利文化中控制一切直接或间接与法西斯复兴原则有关的事务，这些原则是法西斯发展的根基。其任务之一是进行文化净化和改良。必须确保在国内，至关重要的工作不会陷入官僚主义的泥潭，不会沦为只按字面意思理解并执行，而忽略其精神实质的措施。在这样一个敏感而差异化的领域，精神实质才是至关重要的。

迈向新的“秩序”

在德国，上述党卫军（Schutz Staffel）是建立精英阶层最认真、最具体的尝试。有趣的是，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同时兼任秘密国家警察（Gestapo）的首领，而其麾下的其他领袖也担任类似职位。值得注意的是，希姆莱和他的整个军团直接且只对希特勒负责。我们从中学到的是，“警察”的概念必须超越旧民主和实证主义国家中狭隘的范畴，在那个国家，警察只负责处理罪犯，最多处理最狭隘和最直接的颠覆分子。

新的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它不仅必须抵御真正的伤害，而且必须抵御一切微妙的渗透，一切可能削弱它并助长病菌和毒素传播的事物。在这些方面，需要采取的行动不仅是防御性的，而且是预防性和反攻性的。在这方面，显而易见的任务与刑法典或其他法律条款没有太大关系。它们需要的是一种微妙的监视和保护行动，这种行动将道德和精神视为非常重要的因素，具有一种最佳意义上的神职人员的性质，而不是“警察”的性质，因为人们认识到，**革命的真正力量在于对世界的愿景及其伟大的基本理念，而扭曲或削弱这些愿景和理念也将预示着狭义上的政党政治体系的致命衰落。**在这个领域，显然没有什么比官僚主义更致命、更无效，也没有比敏锐的洞察力、种族敏感性和本能更重要的了，即使在与神秘学接壤的领域，这种本能也能得到发展。

既然我们的注意力被恰如其分地吸引到名为《犹太长老会议纪要》的文件上，我们必须问一问，组建一支至少与世界颠覆秘密领袖的能力相当，并且了解他们所有手段的成员，这项任务的困难程度是否会被低估。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之前所考虑的种族精神精英这一概念的重要性。随着这一概念的发展，它可能会超越单纯的民族领域，甚至超越像著名的情报局这样的组织，执行目前仅限于本国地区的任务，即使在民族社会主义党卫军内部，这些任务也仅仅是潜在的。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有可能产生一种古老的中世纪意义上的军事命令，它也是精神性的，旨在捍卫传统，攻击一切形式的敌人，无论其形式可见还是不可见，无论其身在何处，无论其伪装为何，无论是社会、政治、文化还是科学伪装：简而言之，它是全球阴谋和颠

覆国际阵线的积极对应物。当然，在达到这一阶段之前，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训、选拔以及内外部、政治和社会组织的精英。

然而，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了解要求并确定原则：超越种族意识的一般性、政治性、宣传性和大众性阶段，通过建立适当的机构并赋予那些因历史机遇而拥有合适资质的人以明确的责任，从而进入建设性、严肃、有辨别力和教育性的阶段。这些人不仅拥有理论，而且有能力真正领导未来的领袖人员。

传统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

尤里乌斯.埃沃拉

原文选自《反叛现代世界》第 36 章 Nationalism and Collectivism

如果说传统文明的顶点在于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原则，那么现代文明本质上则是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之产物。集体之于普遍，就如同 "物质（matter）" 之于 "形式（form）"。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 "文化“的东西，其第一步，就是对集体之混杂的、滥交的物质（substance）进行差异化（differentiation），并通过对卓越、优良的原则与兴趣的坚持，加以肯定个人之存在。当单个个体成功地为自己的天性赋予了一种法则（law）与形式（form），从而使其归属于自身，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其存在之有形（physical）部分时，那么一种高级秩序之初步条件就已经具备——在这种秩序中，个性（personality）不是被取消，而是被整合；这就是传统 "参与（participations）"之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任何个体、职能抑或种姓，都通过承认高于自己的东西以及与这个东西的有机联系而获得自己的正确位置以及存在之理由。

在最好的情况下，普遍性（universal）是在建筑之至高（crowning）部分的意义上实现的，其坚实的基础既包括各种不同的、已形成的个性，每个个性都忠实于自己的功能，也包括部分有机体或单元，它们被赋予相应的法律和权利，这些法律和权利并不相互矛盾，而是通过共同的精神性以及对超个体的承诺的共同积极倾向而相互协调、补充的。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现代社会中，相反的风向正在占据上风，即，向集体倒退，而不是向普遍前进，单个的个体无法具有其他意义，而只能越来越作为某种事物的一种功能，而在这种功能中，他不再具有个性。随着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之世界的到来，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因此，现代民族主义（modern nationalism）充其量只能被视为过渡阶段。我们有必要，区分民族性（nationality）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中世纪知道民族性，但不知道民族主义。民族性（Nationality）是一种自然因素，它包含了某组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既保留在等级区分中，也保留在等级参与中，二者并不对立。 因此，在中世纪，种姓、社会团体和秩序在不同的民族中相互衔接（articulated），虽然战士、贵族、商人和工匠的类型符合这个或那个民族的特征，但这些衔接同时代表了更广阔的国际单位（international units）。因此，来自不同民族的同一种姓的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比同一民族中不同种姓的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更有可能。

在这方面，现代民族主义（Modern nationalism）代表了一个相反的方向。现代民族主义不是建立于自然的统一（natural unity）之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人为的与集

中的统一之基础上。在自然的和健康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悟丧失的同时，在每一个正宗真传（authentic tradition）的与质性联系（qualitative articulation）的表述都被摧毁之后，个体接近于纯粹的数量（quantity）状态，即，仅仅是大众之状态，人们也就越来越感到这种人为的、集中的统一的必要性。 民族主义通过神话与暗示来影响这些大众，这些神话与暗示可能会激发他们的热情，唤醒他们的基本本能，用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和权力的观点、幻想来奉承他们。无论其神话如何，现代民族主义的实质不是民族，而是人民，其原型始终是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庶民。

这就是为什么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它强调一种对特殊神宠论原则/特殊排他性原则（particularistic principle）的珍视，并将之拔高到绝对价值之状态；因此，民族之间的互谅的、理解的以及合作的可能性被降到了最低点，甚至达到了对现代文明亦作保障的矫平（leveling）形式也不假思索、不作考虑的地步。民族国家之产生与欧洲生态圈之解体是同一种趋势。众所周知，在 19 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乃革命之同义词，其确切含义，就是解散现存的超国家有机体，削弱传统意义上的 "合法主权（legitimate' sovereignty）"政治原则。然而，在考虑整体同（作为个性的）单个个体之间的关系时，民族主义中却又出现了一个相反的方面，即累积性的（cumulative）和集体化的（collectivizing）因素。在现代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出现了前面提到的倒置现象：民族、祖国成为首要因素，成为一个自我存在的实体，要求属于它的个人无条件地奉献，就好像它是一个道德实体，而不单单是一个自然的和 "政治"的实体。即使是文化，也不再是人之形成、人之提升的支撑，而只因其民族性而变得具有本质上的相关性。因此，在最激进的民族主义形式中，自由主义之理想和 "中性文化（neutral culture）"之理想经历了一场危机，并受到怀疑，尽管从相反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以及中性、世俗、非政治化的文化，同以往的有机文明相比是一种退化或崩溃。

即使民族主义谈及 "传统（Tradition）"，它也与古代文明中的 "传统"毫无关系；相反，它是一种神话的（myth）或虚构的（fictitious）连续性，其基础，其实只是作为一个属于某一特定群体的最小公分母。通过 "传统 "这一概念，民族主义旨在巩固集体维度，在个人背后放置神话般的、奉若神明的、集体化的先于其的、在其之前的统一体。在这个意义上，切斯特顿（Chesterton）将这种传统称为 "死者的民主（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是正确的。在这里，完全缺乏超越（transcendence）的维度，或者说，缺乏越过历史的维度。

根据上述方面，可以说，现代民族主义一方面确实，放弃了追求向上的方向，放弃了通过超自然的与潜在的（potentially）普遍性来实现统一；另一方面，它只是在程度上有别于 "第四等级"（及其"国际性[Internationals]"）之观念所应有的匿名性（anonymity）。实际上，只要 the people 成为主权者，国王或领袖不再被视为 "来自上天"，也不再被视为 "受上帝恩典"，而是 "受国家意志"（即使在保留 "受上帝恩典"这一表述的地方，它也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公式）——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将传统型政治组织与共产主义区分开来的深渊实际上已经被攻陷——断裂已经发生，所有的价值观念都已发生转变并被颠倒过来； 此时，我们只能等待最后阶段之到来。因此，苏维埃共产主义早已经体现出的，最后一种形式的世界颠覆，这种颠覆，其领导者们不仅

仅是出于战术目的——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激发、滋养和支持民族主义，即使民族主义由于是反共产主义的，至少在原则上应该反对他们。他们看得很远，就像那些在早期革命中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民族主义的人（即自由主义）一样，他们嘴里说的是 "民族"，但实际上指的是 "反传统 "或否认真正的主权原则。他们认识到了民族主义之集体潜能，它超越了偶然的对立面，最终将能够处置它所控制的有机体。

因此，民族主义同民主、社区特征之倾向间的差异，在反对民族主义内在的特殊排他性（particularism）的以及分裂（division）精神的力量方面，可以看到一种程度上的差异。在这些倾向中，建立在现代民族主义之基础上的倒退现象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其中起作用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广泛的粘聚之冲动。正如朱利安-本达（Julian Benda）所说，最末的视角（perspective）是，人类（humanity）——而不仅仅是人类的碎块、分毫——将把自己作为崇拜的对象。今天，有一种普世兄弟情谊的趋势；这种兄弟情谊远未消除民族主义精神及其特殊排他性、自豪感，最终将成为其最高形式，因为民族将被称为人（Man），上帝（God）将被视为敌人，或被视作"不切实际的虚构"。当人类团结在一个巨大的企业中，习惯于有组织的生产、技术、分工和 "繁荣"，蔑视任何以超越（transcendence）为导向的自由活动时，人类将实现——在类似的潮流中往往被视为真正文明努力的——最终目标。

关于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后一点思考是：一方面，它是一种建构的和人为的实体；另一方面，通过神话的以及扑朔、混淆的思想的力量，它被唤醒，以凝聚和激励特定的人类群体，这一实体仍然受到影响，使之按照颠覆的总体计划行事。现代民族主义那顽固不化的、盲目的利己主义与粗暴的权力意志，它们的对立、社会动荡，以及它们引发的战争，确实是完成一个破坏性进程之工具：从第三等级时代向第四等级时代的转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自掘坟墓。

拿破仑虽然恢复了帝国的象征，并尤为渴望罗马之神圣化，但他仍然是 "大革命之子"，由于他的胜利战役所带来的动荡，他协助着将大革命的病毒传播到了传统欧洲和贵族欧洲的其余国家。通过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他有可能筑起一道堤坝，抵御末世之命运。梅特涅（Metternich）可以说是欧洲最后一位伟大的人物。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高瞻远瞩，从全局出发，看到各种颠覆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立即消除这些力量的唯一办法。

梅特涅看到了所有最基本的要点：革命不是自发的爆发，亦非群众现象，而是由各种力量引发的人为现象，这些力量在人和国家的健康躯体中的作用同细菌在人体中产生疾病的作用相同；民族主义在他所处的时代出现，它只是革命之面具；革命本质上是国际事件，个别革命现象只是全球范围内同一颠覆潮流的局域的、部分的表现。

梅特涅也清楚地看到了革命之不同程度，其彼此之间的连带关系； 自由主义和 constitutionalism 不可避免地会为民主铺平道路，民主又会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社会主义又会为激进主义（radicalism）铺平道路，最终会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第三等级的整个自由主义革命只是为第四等级的革命铺平道路的工具，而第四等级之革命注定会在前者之代表及其世界完成他们作为（负责打开缺口的）先锋队的任务后，立即将他们赶下台，这也就梅特涅认为同颠覆性达成协议是愚蠢的原因： 如果你给它一只手，它很快就会夺走你的手臂和身体的其余部分。了解了革命现象之整体性和本

质之后，梅特涅指出了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由所有传统国家组成一个类似的超国家阵线，并建立一个由所有神权君主组成的防御和进攻联盟。这就是他的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的初衷。

遗憾的是，全面实现这一宏伟构想所需的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并不充足。梅特涅周围没有足够的能人或领袖。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统一防御阵线是一个清晰明确的概念，但能够成为这一联盟之积极参照点与圣洁象征的，使其真正神圣的思想却不那么清晰。首先，在宗教方面没有统一性，因为联盟不仅限于天主教君主，还包括新教和东正教君主；因此，这个联盟甚至没有得到天主教会直接的第一时间认可，天主教会的首领从未加入过联盟。 真正需要的是复兴中世纪的精神，最好是十字军东征的精神；真正需要的并非——一旦革命的火焰在联盟所覆盖的领土上开始闪烁，就诉诸——（单纯的）镇压行动的或军事干预的承诺，而是类似于一种新的圣殿骑士（Templarism）精神，一种秩序，一种因共同的理念而团结在一起并坚持不懈地行动的人之团体，他们可以在每个国家为人类高级类型的回归提供活生生的见证。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人，而不是什么朝臣、警阀官吏、谨小慎微的教会头头或是仅仅热切于寻得 "四平八稳的解决方案 "的外交官。与此同时，应该对世界观的和人生观的理想层面发起攻击。但是，在那个时期，谁是纯粹传统精神之代表，谁有能力铲除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的温床——而这些正是革命之真正发酵剂？从十七世纪开始，王室和贵族们发现作为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是颇为时髦的事，而那些能够摒弃这种文化的人又在哪里呢？那些能够用开怀大笑——而不是用锁链——来埋葬掉所有那些浪漫答答地将自己描绘成 "伟大而崇高的革命思想"的或 "人民自由"的使徒、殉道者的人又在哪里呢？

维也纳缺乏真正的灵魂，在神圣罗马帝国因哈布斯堡家族之自愿放弃而在名义上不复存在的时候，却一跃成为欧洲之焦点，并以 "华尔兹之城 "而闻名于世。神圣同盟在确保了欧洲那相对和平的、秩序的一段时期后，最终解体了，而瓦解了先前的政治或王朝单位的革命民族主义再也找不到任何顽强的抵抗能够阻止他们的进攻。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末世迎来了决定性的事件。1914 年，尽管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军国主义霸权同一些与资本主义勾结的可疑之处（尤其是在威廉的德国），但，中央帝国在西方世界中仍然代表着封建贵族欧洲之残渣、余留。反对中央帝国的联盟显然是第三等级反对第二等级残余势力的联盟；它是民族主义和大民主国家的联盟，或多或少受到法国大革命 "不朽原则"的启发，一些人希望在国际范围内复制法国大革命，但这并不妨碍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意识形态落入贪婪的和至上主义的（supremacist）高级金融家之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出的特征不是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种姓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在以往的战争中鲜有先例。这场战争，其直接的和有意追求的结果是摧毁了 Gentian 君主制和天主教奥地利；间接结果是沙皇帝国的崩溃、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如此混乱和矛盾的社会政治局面，以至于包含了一场新冲突的所有前提。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场新的冲突。在这场战争中，意识形态阵营并不像前一场战争那样精确。像德国和意大利这样吸收了专制和反民主思想并与左翼势力站在对立面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起初维护 "需要生存空间的国家 "——在与世界财阀斗争时—

一的权利，通过赋予他们发动的战争以 "第四权力 "对"第三权力 "之（已得到巩固的）大民主国家的叛乱的意义，几乎可以说，在国际舞台上拥护马克思主义。但总体而言，尤其是在美国参战之后，看似盛行的意识形态是已经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即，民主国家一心要 "解放 "仍被 "落后的政治制度 "所奴役的人民的十字军东征。在新的政治联盟面前，后者注定会迅速沦为摆设。民主国家与苏联结盟的目的是为了打垮轴心国，他们坚持无意识的激进主义，重蹈了——那些自以为可以肆无忌惮地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借助、搭乘颠覆力量的人的——覆辙，他们遵循一种致命的逻辑，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代表两种不同程度的颠覆力量相遇或冲突时，那些程度较高的力量最终会占上风。战争之结束标志着混合联盟的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结果是欧洲作为世界政治的主角被消灭，任何中间形式都被扫除，美国和俄国分别作为第三和第四势力的超国家代表与之对立。

这两个大国之间最终的冲突结果如何并不重要，因为某种内在正义（immanent justice）之决定性因素在起作用；无论如何，这个过程终将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社会影响最终将决定第四阶层的胜利，或者以暴力的方式，或者以"进化"的方式，或者以两种形式。

还有更多。在追求世界霸权的政治大国中，俄罗斯和美国如今似乎处于对立的关系中。然而，如果我们从本质上审视这两种文明的主导主题，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它们的理想，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两种文明的所有价值观和生活趣味皆按照一种中心趋势所经历的有效转变，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发现它们之间的趋同性与共通性。俄罗斯和美国似乎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是导致形成人类类型的两种途径，而这种人类类型正是现代世界发展进程的最终结论。我们不妨简要地探讨一下这些交汇点。不仅作为政治趋同，而且作为 "文明 "趋同，俄罗斯和美国就像同一把钳子的两端，正从东方和西方向古老欧洲的核心逼近。外部冲突、新的危机以及新的破坏只会是为第四世界之多样性开辟道路的手段。

革命必剖清人种 邹容

地球之有黄白二种，乃天予之以聪明才武，两不相下之本质，使之发扬蹈厉，交战于天演界中，为亘古角力较智之大市场，即为终古物竞进化之大舞台。夫人之爱其种也，其内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世界人种之公理，抑亦人种产历史之大原因也。吾黄种，吾黄种之中国之皇汉人种，吾就东洋历史上，能相结相排之人种，为我同胞述之，使有所观感焉。

亚细亚黄色人种，约别为二种：曰中国人种，曰西伯利亚人种。

中国人种蔓延于中国本部、西藏及后印度一带地方，更详别为三族：第一，汉族。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即吾同胞是也。据中国本部，栖息黄河沿岸，而次第蕃殖于四方，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朝鲜、日本亦为我汉族所蕃殖。

第二，西藏族。自西藏蔓延克什米尔、泥八剌及缅甸一带地方，殷周时之氐、羌，秦汉时之月氏，唐之吐蕃，南宋之西夏等，皆属此族。

第三，交趾支那族。自支那西南部（即云南、贵州诸省），而蔓延于安南、暹罗等国，此族在古代，似占据中国本部，而为汉族所渐次驱逐者，周以前之苗民、荆蛮，唐之南诏，盖属此族。

西伯利亚人种，自东方亚细亚北部．蕃殖北方亚细亚一带，今更详别之，凡四族。

第四，蒙古族。原蕃殖于西伯利亚之贝加尔湖东边一带，其后次第南下，今日乃自内外蒙古，蔓延天山北路一带地方。元朝由此族而起，将统一欧亚。印度之莫卧尔帝国，亦由此起。

第五，通古斯族。自朝鲜北部，经满洲而蔓延于黑龙江附近地。秦汉时之东胡，汉以后之鲜卑，隋唐时之靺鞨，唐末之契丹，宋之女真等，皆属此族。今日入主我中国之满洲人，亦由此族而兴焉。

第六，土耳其族。原蕃殖于内外蒙古地；后渐西移，今日则自天山南路，凡中央亚细亚一带地方，多为此族占据。周以前之獯鬻、俨狁，汉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之突厥，唐之回纥等，皆属此族。今东欧之土耳其，亦此族所建。

今就今日人种之能成立者，列表如下：汉族（中国人）、朝鲜人、暹罗人黄种：中国人种：其他：日本人、西藏人、其他亚西亚东部人、蒙古族、满洲人（今日之所谓政府皇帝者）

蒙古族：西伯利亚人（古鞑靼人）、其他亚西来北、中部人西伯利亚人种：土耳其人土耳其族：匈牙利人其他在欧洲之黄种人由是以观，我皇汉民族，起自黄河东北一带之地，经历星霜，四方繁衍，秦汉之世，已满布中国之全面，以中国本部为生息之乡。降及今日，人口充溢四万万，为地球绝大蕃多、无有伦比之民族，其流出万里长城以外，青海、西藏之地者，达一千余万之多。

更进而越日本之境，或侵入北方黑龙江之左岸俄界，或达南方，进入安南、交趾、柬蒲塞。暹罗、缅甸、马来半岛。更入太平洋，侵入布哇、美洲合众国、加拿大、秘鲁、伯拉。逾南洋侵入吕宋、爪哇、孛泥

泥及澳洲、欧洲者，亦不下三四百万。无资力者，孜孜励精，以劳力压倒凌驾他国人民。有资力者，拥数十百万之资本，与欧美之富商大贾，争胜败于商场中，而不相下。我汉族之富于扩张种族之势力者有如此，即以二十世纪世界之主人翁，推尊我汉族，吁！亦非河汉之言也。

呜呼!我汉种。是岂飞扬祖国之汉种。是岂独立亚细亚大陆上之汉种，是岂为伟大国民之汉种。呜呼汉种！汉种虽众，适足为他种人之奴隶；汉地更广，适足供他种人之栖息。汉种！汉种！不过为满洲人恭顺忠义之臣民。汉种！汉种！又由满洲人介绍为欧美各国人之奴隶。吾宁使汉种亡尽，杀尽，死尽，而不愿其享升平盛世，歌舞河山，优游于满洲人之胯下。吾宁使汉种亡尽，杀尽，死尽，而不愿其为洪承畴，为细崽，为通事，为买办，为绎干地球各国人之下。吾悲汉种，吾先以种族之念觉汉种。

执一人而谓之曰：“汝亡父，非真汝父也，为汝父者，某某也。”

其人莫不立起而怒，以得其直而后已。又一家人，父子、夫妇、兄弟，相居无事也，忽焉来一强暴，人其室，据其财产，又奴其全家人，则其家人莫不奋力死斗，以争回原产而后已。夫语人有二父而不怒，夺人之家产而不争，是其人不行尸走肉，即僵尸残骸。吾特怪吾同胞，以一人所不能忍受之事，举国人忍受之；以一家所不能忍

受之事，举族忍受之，悲夫！满洲人入关，称大清朝顺民；联军破北京，称某某国顺民；香港人立维多利亚纪念碑曰“德配天地”；台湾人颂明治天皇功德曰“德广皇仁”。前之为大金、大元、大辽、大清朝之顺民既去矣，今之为大英、大法、大俄、大美国之顺民者又来。此无他，不明于同种异种之观念，而男盗女娼，羞祖辱宗之事，亦何不可为！

吾正告我同胞曰：昔之禹贡九州，今日之十八行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黄帝之子孙，神明之胄裔，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之名誉乎？中国华夏，蛮夷戎狄，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区分人种之大经乎？

满洲人与我不通婚姻，我犹是清清白白黄帝之子孙也。夫人之于家庭，则莫不相亲相爱，对异性则不然，有感情故耳。我同胞岂忍见此莫大之奇辱，而无一毫感情动于中耶？爱尔兰隶于英，以人种稍异，故数与英人争，卒得其自治而后已。谚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又曰；“狼子野心，是乃狠也。”我同胞其三复斯言；我同胞其有志跳身大海洋中，涌大海洋之水，以洗洁我同胞羞祖辱宗男盗女娼之大耻大辱乎？

曰国民，曰奴隶，国民强，奴隶亡。国民独立，奴隶服从。中国黄龙旗之下，有一种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杂糅不一，以组织成一大种。谓其为国民乎？吾敢谓群四万万人而居者，即具有完全之奴颜妾面。国民乎何有！尊之以国民，其污秽此优美之名词也孰甚！若然，则以奴隶畀之、吾敢拍手叫绝曰：“奴隶者，为中国人不雷同，不普通，独一无二之徽号。”

印度之奴隶于英也，非英人欲奴隶之，印人自乐为奴隶也。安南之奴隶于法也，非法奴隶之，安南人自乐为奴隶也。我中国人之奴隶于满洲、欧美人也，非满洲、欧美欲奴隶之，中国人自乐为奴隶耳。乐为奴隶，则请释奴隶之例。

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不耻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曰奴隶也，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居处，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不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如获异宝，登天堂，夸耀于侪辈以为荣；及樱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栗，至极其鞭扑践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他人视为大耻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无怒色，无忤容，怡然安其本分，乃几不复自知为人。而其人亦为国人所贱耻，别为异类，视为贱种，妻耻以为夫，父耻以为子，弟耻以为兄，严而逐之于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隶之公同性质，而天下之视奴隶者，即无不同此贱视者也。我中国人固擅奴隶之所长，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谏夫，日日演其惯为奴隶之手段。呜呼！人何幸而为奴隶哉！亦何不幸而为奴隶哉！

且夫我中国人之乐为奴隶、不自今日始也。或谓秦汉以前有国民，秦汉以后无国民。吾谓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数千年来，名公巨卿，老师大儒，

所以垂教万世之二大义，曰忠，曰孝，更释之曰：“忠于君，孝于亲。”吾不解忠君之谓何。

吾见夫法、美诸国之无君可忠也，而斯民遂不得等伦于人类耶？吾见夫法、美等国之无君可忠，而其国人尽瘁国事之义务，殆一日不可缺焉。夫忠也，孝也。是固人生重大之美德也。以言夫忠于国也则可，以言夫忠于君也则不可。何也？人非父母无以自生，非国无以自存，故对于父母国家，自有应尽之义务焉，而非为一姓一家之家奴走狗者，所得冒其名以相传习也。

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自汉末以迄今日，凡一千七百余年，中国全土，为奴隶于异种者，三百五十八年；黄河以北，为奴隶于异种者，七百五十九年。呜呼！黄帝之子孙，忍令率其嫡亲之同胞，举其世袭之土地，为他族所奴隶者，何屡见而不一。“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纡青拖紫，臣妾骄人”，“二圣青衣行酒会，九哥白马渡江来”，忠君忠君，此张弘范、洪承畴之所以前后辉映也，此中国人之所以为奴隶也。

曾国藩也，左宗棠也，李鸿章也，此大清朝皇帝所溢为文正、文襄、文忠者也，此当道名人所推尊为中兴三杰，此庸夫俗子所羡为封侯拜相，此科举后生所悬拟崇拜不置者。然吾闻德相毕士麻克呵李鸿章曰：“我欧洲人以平异种为功，未闻以残戮同胞为功。”嗟夫！吾安得起曾、左百闻是言！吾安得起曾、左以前之曾、左而共闻是言！吾安得起曾、左以后士曾、左，上自独当一面之官府，下至不足轻重之官吏，而亦共同是言！夫曾、左、李三人者。亦自谓为读书有得，比肩贤哲之人也。而犹忍心害理，屠戮同胞，为满洲人忠顺之奴隶也如是，其他何足论。吾无以比之，比之以李自成、张献忠，吾犹嫌其不肖，李、张之所以屠戮同胞，而使满洲人入主中国也，李、张因无常识，不读书，又为明之敝政所迫，而使之不得不然，吾犹为之恕。曾、左、李三人者，明明白白知为汉种也，为封妻荫子，屠戮同胞以请满洲人再主中国也，吾百解而不能为之恕。某氏谓英人助满洲平太平天国。亡汉种之罪，英人与有力焉。呜呼！是又因乌及屋之微意也。

曾、左、李者，中国人为奴隶之代表也。曾、左、李去，曾、左、李来，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眼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举一国之人，无一不为奴隶，举一国之人，无一不为奴隶之奴隶，二千年以前皆奴隶，二千年以后亦必为奴隶。同胞乎！同胞乎！法国议院中，无安南人足迹，英国议院中，无印度人足迹，日本议院中，无台湾人足迹。印度人之为奴隶也，犹得绕红布头巾为巡捕立于上海、香港之十字街头上，驱策中国人以为乐。然吾试问我同胞，曾召于地球面积上，择一为巡捕之地，驱策异种人以为乐？面包一块，山竽一碟，此因非洲黑奴之旧生活也，同胞！同胞！其重思之！

吾先以一言叫起我同胞曰：国民，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肢体努力，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法人革命前之奴隶，卒收革命之成功。美洲独立前之奴隶，卒脱英人之制缚。此无他，能自认为国民耳。吾故曰：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非然者，天演如是，物竞如是，有国民之国，群起染指于我中士，我同胞其将由今日之奴隶，以进为数重奴隶，由数重奴隶，而猿猴，而野豕，而蚌介，而荒荒大陆，绝无人烟之沙漠也。

近人有乐府一首，名《奴才好》云：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切勿胡乱闹。满洲入关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惯了，他的江山他的财，他要分人听他好。转瞬洋人来，依旧做奴才。他开矿产我做丁，他开洋行我细崽，他要招兵我去当，他要通事我也会，内地还有甲必丹，收赋治狱荣巍巍。满奴作了作洋奴，奴性相传入脑胚，父诏兄勉说忠孝，此是忠孝他莫为。什么流血与革命，什么自由与均财，狂悖都能害性命，倔强那肯就范围。我辈奴仆当戒之，福泽所关慎所归。大金、大元、大清朝，主人国号已屡改，何况大英、大法、大美国，换个国号任便戴。奴才好！奴才乐！世有强者我便服。三分刁黠九分媚，世事何者为龌龊？料理乾坤世有人，坐间风云多反复，灭种覆族事遥遥，此事解人已难索。堪笑维新诸少年，甘赴汤火蹈鼎镬，达官震怒外人愁，身死名败相继仆。但识争回自主权，岂知已非求己学。奴才好！奴才好！奴才到处皆为家，何必保种与保国！

革命之教育 邹容

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

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之加坡拿里，为国民增祸乱。

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

革命者，国民之天职也；其根底源于国民，因于国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今试问吾侪何为而革命？必有障碍吾国民天赋权利之恶魔焉，吾侪得而扫除之，以复我天赋之权利。是则革命者、除祸害而求幸福者也。。为除祸害而求幸福，此吾同胞所当顶礼膜拜者。为除祸害而求幸福，则是为文明之革命，此更吾同胞所当顶礼膜拜者也。

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此千古不易之定论。

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虽然，欲行破坏，必先有以建设之。善夫意大利建国豪杰玛志尼之言曰："革命与教育并行。"吾于是呜于我同胞曰："革命之教育。"更译之曰："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

今日之中国，实无教育之中国也，吾不忍执社会上种种可丑、可贱、可厌嫌之状态，以出于笔下。吾但谥之曰："五官不具，四肢不全，人格不完。"吾闻法国未革命以前，其教育与邻邦等．美国未革命以前，其教育与英人等，此兴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见也。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我国擅其有也。不宁惟是：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统一，试读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诛杀贵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内修战事，外抗强邻。上自议院宪法，下至地方制度，往往于兵连祸结之时，举国糜烂之日，建立宏猷，体国经野，以为人极。一时所谓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流血之巨子，其道德，其智识，其学术，均具有振衣昆仑顶，濯足太平洋之慨焉。吾崇拜之，吾倾慕亡，吾究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要不外乎教育耳。若华盛

顿，若拿破仑，此地球人种所推尊为大豪杰者也，然一华盛顿，一拿破仑倡之，而无百千万亿兆华盛顿、拿破仑和之，一华盛顿何如？一拿破仑何如？其有愈于华、拿二人之才之识之学者又何如？有有名之英雄，有无名之英雄，华、拿者，不过其时抛头颅溅热血无名无量之华、拿之代表耳！今日之中国，固非一华盛顿、一拿破仑所克有济也，然必须制造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其庶乎有济。吾见有爱国忧时之志士，平居深念，自尊为华、拿者，若而人其才识之愈于华。拿与否，吾不敢知之、吾但以有名之英雄尊之。而此无量无名之英雄，则归诸冥冥之中、甲以尊诸乙，乙又以尊诸丙，呜呼，不能得其主名者也。今专标斯义，相约数事，以与我同胞共勉之。

一、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中国之一块土，为我始祖黄帝所遗传，子子孙孙，绵绵延延，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当共守而如替。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

一、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若尧、舜，若禹、稷，其能尽义务于同胞，开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故吾同胞视之为代表，尊之为君，实不过一团体之头领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后世之人，不知此意，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冠、巨盗，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甚至使成吉思仟、觉罗福临等，以游牧贱族，入主我中国，以羞我始祖黄帝于九原，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与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

一、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政治者，一国办事之总机关也，非一二人所得有之事也。譬如机器，各机之能运动，要在一总枢纽，倘使余机有损，则枢纽不灵。人民之于政治，亦犹是也。然人民无政治上之观念，则灭亡随之；鉴于印度，鉴于波兰，鉴于已亡之国罔不然。法律者，所以范围我同胞，使之无过失耳。昔有曰：“野蛮人无自由。”野蛮人何以无自由？无法律之谓耳。我能杀人，人亦能杀我，是两不自由也。条顿人之自治力，驾于他种人者何？有法律亡观念故耳。由斯三义，更生四种：一曰养成上天下地，惟我独尊，独立不羁之精神。

一曰养成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辟之气慨。

一曰养成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

一曰养成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

論種族與人民 阿道夫-希特勒

有些真理显而易见，但普通人却视而不见，或至少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时，这些真理就像从盲人身边擦肩而过一样，而当有人突然发现人人都应该知道的事情时，人们会感到非常惊讶。周围有成千上万个哥伦布的鸡蛋，只是哥伦布的鸡蛋更难找到。

因此，人类毫无例外地在大自然中徘徊，自以为无所不知，然而，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就像盲人一样，忽略了他们活动最显著的原则之一：地球上所有生物物种的内在隔离。即使是最肤浅的观察也表明，有限的繁殖和繁衍形式是自然界无数生存意志的几乎铁律。每一种动物只与同一种类的同伴交配。山雀与山雀交配，雀与雀交配，鹳与鹳交配，田鼠与田鼠交配，家鼠与家鼠交配，狼与母狼交配，等等。

只有特殊情况下才能改变这种情况，主要是圈养的限制以及同一物种之间无法交配的其他情况。但大自然会竭尽全力与之抗争，最明显的抗议方式要么是拒绝让杂种继续生育，要么是限制其后代的生育能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自然会剥夺它们对疾病或敌对攻击的抵抗力。这是很自然的。两个身高不等的生物杂交，其后代的身高介于父母双方的身高之间。这意味着后代的身高将高于父母中种族较弱的那个，但不会像父母中种族较强大的那个那样高。

因此，后代在与种族较强大的那个的斗争中会失败。然而，这种交配违背了自然界普遍存在的提高生命质量这一意愿。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因为优等和劣等的结合，而是前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强者必须统治，不能与弱者融合，从而牺牲自己的伟大。只有天生弱者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但他只是一个弱小而有限的人；因为如果没有这条法则，所有有机生命的一切可想象的高等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普遍存在的种族纯化本能不仅导致不同种族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而且导致同一种族内部存在明显的界限。

狐狸永远是狐狸，鹅永远是鹅，老虎永远是老虎，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最多在于个体在力量、能力、聪明、敏捷、耐力等方面的差异。但你永远找不到一只狐狸会对鹅产生人性的感情，就像没有猫会对老鼠产生友善的情感一样。因此，它们之间的争斗并非源于内心的厌恶，而是饥饿和爱。在这两种情况下，大自然都冷静地观察着，甚至感到满意。为了每天的面包而进行的斗争使弱者和病弱者以及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屈服，而雄性为了雌性而进行的斗争只允许最适者繁殖，或者至少给他们这样做的机会。但斗争始终是促进物种健康和抵抗力的手段，因此也是其向上发展的原因。如果这个过程有所不同，那么所有进一步和更高的发展都将停止，相反的情况将更快出现。因为劣等者总是比优秀者数量更多，如果生活和繁殖的条件相同，劣等者繁殖的速度会更快，最终优秀者将不可避免地退居其次。因此，必须做出有利于优秀者的修正。

但大自然会通过让弱者承受艰难的生活条件来处理这个问题，弱者的数量已经受到限制。大自然不会允许弱者随意繁殖，而是根据强壮和健康程度进行新的无情选择。但正如她不希望弱者与强者交配一样，她更不希望高种族与低种族融合，因为否则的话，她可能花费数百年或数千年的所有其他高繁殖工作将突然前功尽弃。

历史经验提供了大量证据。它以惊人的清晰度表明，在雅利安人的血液与劣等种族混合的每种情况下，结果都是作为文化旗手的民族的终结。北美洲的人口主要由日耳曼人组成，与有色人种混血的程度较低，呈现出与中美洲和南美洲不同的文化和人文。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主要由罗曼人组成的移民与土著居民混血的程度有时很高。仅从这个例子中，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混血的影响。美洲大陆上种族纯正且未混血的德国人已经崛起成为主人；只要他们不成为乱伦的受害者，他们就会一直成为主人。简而言之，任何种族杂交的结果总是如下：

a）降低较高种族的水平，

b）身体和心理衰退，从而开始缓慢但确定的衰退。 造成这种发展无异于违背永恒造物主的意志。作为罪过，这种行为必将受到惩罚。人类试图反抗自然的铁律，违背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原则。

因此，违背自然的行为必将导致人类的灭亡。当然，现代和平主义者在这里提出了同样的老反对意见，这既愚蠢又典型地体现了犹太人的思维模式："人类正在征服自然！"数以百万计的人盲目地重复着犹太人的胡言乱语，最终真的以为自己是自然的征服者；然而，他们拥有的不过是一种想法，而这一想法实在不堪一击，根本无法用来想象世界。人类尚未以任何方式征服自然，充其量只是抓住了自然那巨大、永恒的谜团和秘密的面纱的一角，试图揭开面纱，但事实上人类并未创造任何东西，只是发现了所有东西，人类 并不统治自然，而只是凭借对自然法则和秘密的了解，成为那些缺乏这些知识的其他生物的主宰——因此，一个想法无法克服人类诞生和生存的条件，因为想法本身只取决于人类。没有人类，世界上就没有人类的思想，因此，思想总是依赖于人类的存在，并依赖于为这种存在创造条件的所有法则。

不仅如此！某些想法甚至与某些人息息相关。这尤其适用于那些内容并非源自精确的科学真理，而是源自情感世界，或者用当今人们习惯的优美而清晰的表达方式来说，是反映了一种"内心体验"的思想。所有这些想法都与冷酷的逻辑无关，而是纯粹的情感表达、道德观念等，它们与它们赖以生存的人们的存在息息相关。

但是，这些种族和民族的存续是这些思想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如果有人真的希望和平主义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取得胜利，那么他必须利用一切手段支持德国征服世界；因为如果情况相反，那么最后一个和平主义者将很容易与最后一个德国人一起消亡，因为另一个世界几乎从未像我们的人民一样，对这种违背自然和理性的胡言乱语产生兴趣。所以，无论你是否喜欢，如果你真的想要发动战争，你就必须去找和平主义者。这就是美国救世主威尔逊的初衷，仅此而已。

至少，这是我们的德国梦想家的信念——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事实上，当最高层的人征服并征服世界，成为地球的唯一主人时，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的想法也许是对的。这种想法缺乏产生有害影响的可能性，以至于其实际应用变得罕见，最终变得不可能。因此，先奋斗，然后也许是和平主义。否则，人类已经超越了发展的顶峰，结局不是任何道德观念的统治，而是野蛮，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嘲笑，但这个星球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已经在太空中旅行了数百万年，如果人们忘记了他们之所以能够拥有更高的存在，不是因为少数疯狂意识形态者的想法，而是因为对铁一般自然法则的了解和无情应用，那么它可能会再次这样做。今天，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所欣赏的一切——科学、艺术、技术和发明——都只是少数国家的创造性产物，也许最初只属于一个种族。所有这些文化的持续存在也取决于他们。如果他们灭亡，地球的美丽将随他们一起沉入坟墓。例如，土壤对人的影响可能很大，但影响的结果总是不同的，这取决于所涉及的不同种族。

一个栖息地的低生育率可能会促使一个种族达到最高的生产力水平，而对另一个种族来说，这只会导致最严重的贫困和最终的营养不良，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后果。人们内心的性格对于外界影响的感觉总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导致一些人饥饿的因素可能会促使另一些人努力工作。过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消亡了，只是因为原始的创造者种族死于血统中毒。

这种衰落的最终原因总是忘记了所有文化都依赖于人，而不是相反，为了保护特定的文化，创造它的人必须得到保护。但这种保护必然受到必要性的铁律以及最好和最

强者的胜利权利的约束。想要活下去的人必须战斗，不想在这个永恒斗争的世界中战斗的人不配活下去。即使这很艰难，但这就是现实！但迄今为止，最艰难的命运是降临在那些认为自己可以战胜自然的人身上，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在嘲笑自然。

困难、不幸和疾病是自然的回答！那些错误判断并无视种族法则的人，实际上是在剥夺自己的幸福，而幸福似乎本该属于他们。他们阻碍了优秀种族的胜利，从而也阻碍了人类进步的条件。他们回到了无助的动物阶段，背负着人类的敏感。争论哪一种或哪几种人种是原始的人类文化承载者，从而也是我们所说的“人类”这一概念中所有事物的真正缔造者，是徒劳无益的。

提出当下的问题更为简单，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几乎所有人类文化、艺术成就、科学和技术都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但这一事实可以得出并非毫无根据的结论：雅利安人是人类文明的缔造者，因此代表了“人类”一词的典型意义。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他那明亮的额头时刻闪耀着天才的神圣火花，不断点燃那把火，而正是这把火照亮了沉默的秘密之夜，引领人类走上成为地球上其他生物统治者的道路。如果人类被消灭，那么也许几千年后，地球将再次陷入黑暗，人类文化将消失，世界将变得荒凉。如果将人类分为三类——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和破坏者——那么只有雅利安人可以被视为第一类的代表。他们是人类创造的基础和墙体的源泉，只有外部形式和颜色是由各个民族各自的性格特征决定的。他为全人类的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基石和蓝图，只有执行方式才与各个种族的特性相符。例如，再过几十年，整个东亚将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其最终基础将像我们一样，既有希腊精神，也有日耳曼技术。只有外在形式——至少部分——会带有亚洲的特质。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日本正在将欧洲技术纳入其文化，而是欧洲科学和技术正在被日本特色所点缀。实际生活的基础不再是特定的日本文化，尽管它决定了生活的色彩，因为对欧洲人来说，由于内在差异，它更明显地体现在外部。相反，它是欧洲和美洲的巨大的科学和技术工作，因此也是雅利安人的科学和技术工作。

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东方也可以追随人类总体进步的脚步。这是为生存而奋斗的基础，也是为生存而制造武器和工具的基础，只有外表逐渐适应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从今天起，没有更多的雅利安人的影响到达日本，让我们假设欧洲和美国灭亡了，那么日本在科学和技术上的崛起可能会持续很短的时间；但几年后，源泉就会枯竭，日本人的性格会得到保留，但今天的文化会变得僵化，并重新陷入七十年前被雅利安文化浪潮唤醒的沉睡中。因此，正如今天的日本发展得益于雅利安起源一样，在遥远的过去，外国的影响和外国的精神也曾唤醒当时的日本文化。

最好的证明就是这些想法后来变得僵化和死板。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一个民族失去了其最初的创造力，或者文化领域第一次发展所依赖的外部推动力和物质来源不复存在的时候。如果一个民族从外国种族那里接受、吸收和同化其文化中最本质的元素，然后在外部影响停止后变得僵化，那么这样的民族可以被称为“文化承载”民族，但绝不是“文化创造”民族。从这个角度对各个国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它们几乎无一例外都不是文化创始民族，而几乎都是文化承载民族。他们的发展总是呈现出以下画面：雅利安部落征服了数量往往少得可笑的异族，在新的地域特殊的生活条件（肥沃

的土地、适宜的气候等）的刺激下，以及大量低等可用人力资源的助力下，他们逐渐开发出了沉睡的智力和组织能力。

在几千甚至几百年后，他们创造了最初带有其自然内在特征的文化，并适应了土壤和被征服者的特殊性，正如上文所述。但最终，征服者违背了最初遵守的保持血统纯正的原则，开始与被征服的居民混居，从而终结了自己的生存；因为天堂中的人堕落之后，总是会被逐出天堂。一千多年后，前主人种最后的可见痕迹往往表现为征服者种族中留下的浅肤色，以及作为原始创造者曾经创立的固化文化。正如征服者的肉体和精神在征服者的血液中消失，人类文化进步的火炬之火也熄灭了！正如前主人的肤色通过前主人的血液保留着微弱的光辉，前主人的创造也照亮了文化生活的黑夜。它们在一切回归的野蛮中闪耀，并时常唤醒那些目光短浅的旁观者，让他们看到当代人的形象，而他们看到的只是过去的镜子。

这样，他们可能会第二次，甚至更多次与古代文化导师的种族接触，而他们可能对之前的接触没有任何记忆。原始主人种的其他成员会不自觉地转向新的现象，以前只有在强迫下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来完成。新的文化浪潮出现并持续，直到其承载者再次被异族血液所吸收。未来的文化和世界历史学家将承担起研究这一问题的任务，而不是像当今历史学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沉溺于对外部事实的复制。

然而，从“文化承载”国家的发展轮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地球上真正的文化奠基者——雅利安人——的诞生、发展和消亡。正如日常生活中，所谓的天才往往需要外力推动才能脱颖而出，在民族的发展历程中，特定种族的天才也是如此。在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中，即使伟人也会显得微不足道，很难从周围的人中脱颖而出。但一旦出现其他人会感到绝望或误入歧途的情况，不起眼的普通人就会突然展现出他的天赋，这往往会让那些在单调的中产阶级生活中见过他的人感到惊讶。

观察这种现象的最佳时机莫过于战争。在需要的时候，当其他人绝望时，突然从看似无害的孩子身上涌现出英雄，展现出无畏的决心和冷静的思维。如果这个考验的时刻没有到来，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个没有胡须的男孩身上隐藏着一个年轻的英雄。天才的出现往往需要某种推动力。命运的沉重打击将一个人击倒在地，却突然将钢铁击碎，当日常生活的外壳破裂时，隐藏的核心便展现在震惊的世界面前。

世界挣扎着，不愿相信看似相同的物种突然变成了不同的生物；这个过程在每个重要的人身上都会重复。尽管发明家只有在发明之日才能成名，但认为创造力是在那一刻才出现在他身上的想法是错误的——真正有创造力的人从出生起，额头就闪烁着天才的光芒。

真正的天才总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习得或教导的。但正如已经强调的那样，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种族。富有创造力的民族总是具有根本性的创造力，即使这种创造力在肤浅的观察者眼中并不明显。在这里，外部认可也只能在成就之后才有可能，因为世界其他地方无法识别天才本身，只能看到其以发明、发现、建筑、绘画等形式出现的可见表现；但在这里，世界其他地方也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接受这一知识。就像在某个杰出人物的一生中，只有特殊场合才能激发其卓越或至少是超凡的才能，使其努力付诸实践一样，在某个民族的一生中，只有特定条件出现时，才能真正发挥其现有的创造力和能力。

这一点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载体——雅利安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一旦命运将他们带到了特殊的环境中，他们现有的能力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并形成有形的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建立的文化几乎总是由可用的土壤、特定的气候和被征服的人民决定。然而，后者几乎是最决定性的因素。文化活动的技术前提越原始，就越需要有人类助手，这些助手在组织和应用时必须取代机器的力量。如果没有使用劣等人的可能性，雅利安人将永远无法迈出迈向其后来文化的第一步；正如如果没有他懂得驯养的某些动物的帮助，他永远无法达到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而现在，他已逐渐能够不用它们了。

“摩尔人尽其责，摩尔人可以走了”这句话不幸有着过于深刻的含义。数千年来，马必须为人类服务，为人类的发展奠定基础，而如今，由于机动车的出现，马本身变得多余。再过几年，马将停止活动，但如果没有马之前的配合，人类可能很难取得今天的成就。因此，劣等人的存在是形成高级文化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因为只有他们能够弥补技术辅助的不足，而如果没有技术辅助，高级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人类的第一种文化更多地是基于对驯服的动物的使用，而不是对劣等人的使用。只有在征服了被征服的种族之后，动物才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动物先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人类才被征服。因为起初是被征服者赶着犁地，而马是跟在犁地的人后面。但只有和平主义的傻瓜才会认为这是人类堕落的标志，而不知道这种发展是最终达到这些传教士现在向世界宣扬其无稽之谈的起点所必需的。

人类的进步就像攀登一座无尽的阶梯，不先走下阶梯，就无法登上更高的阶梯。因此，雅利安人必须遵循现实指引的道路，而不是现代和平主义者梦想的道路。但现实的道路是艰难的，尽管它最终会带领人们到达其他人希望到达的地方，但不幸的是，在现实中，它却让人们离目标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

因此，第一批文明出现在雅利安人与低等民族接触并征服他们、让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的地方，这绝非偶然。他们成为新兴文化中最早的技术工具。但与此同时，雅利安人必须遵循的道路也清晰可见。

作为征服者，他征服了劣等人种，然后根据他的意志和目标，规范他们的实践活动。但他通过指导他们从事有用但艰苦的劳动，不仅挽救了臣民的生命，甚至可能让他们拥有比所谓的“自由”更好的命运。只要他无情地维护主人的观点，他不仅仍然是真正的主人，而且还是文化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因为这一切完全基于他的能力，因此也基于他的保护。

一旦被征服者开始自我提升，甚至可能在语言上接近征服者，主仆之间的鲜明界限就会消失。雅利安人放弃了血统的纯正，失去了自己在天堂中的位置。他在种族混合中越来越低，逐渐失去了越来越多的文化能力，直到他最终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身体上开始像被征服者和土著人，甚至比他的祖先更像他们。

有一段时间，他仍然可以依靠现有的文化资产生活，但后来僵化开始，他最终陷入默默无闻。文明和帝国就是这样衰落的，为新的形态让路。种族混合和随之而来的种族标准降低是所有文明衰落的唯一原因；因为人民-民族灭亡，不是因为战争的失败，而是因为失去了那种只有纯种血统才有的抵抗力量。这个世界上所有劣等种族都是刍狗。但世界历史中的所有事件都只是种族自我保护的本能的体现，无论好坏。

种族与人口政策 格哈德·瓦格纳

世界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政策和行动最感兴趣，这些政策和行动涉及其对种族和人口概念的新理解。

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可以把那些对新德国在这些方面的措施做出反应的人分为几类，他们或是不理解、不确定、反对，甚至是敌视。

一类人是移民和无知者。我把他们归为一类，是因为我们要忽略他们。即使神明也无法与无知和愚蠢抗争，移民的谎言已经变得如此荒谬和低劣，以至于在国外越来越难找到轻信者。

另一个群体由学者和科学家组成，这个群体的人数正在不断减少，即使在国外也是如此，这一点从外国和国际科学协会的各种决定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协会赞同我们的种族卫生措施和遗传政策。

对我们来说，血统和种族学说首先不是生物学领域的重要且有趣的研究课题，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事物和生活问题的态度。

然而，比这两个群体更重要的，是那些因坚持另一种世界观而拒绝或反对我们的人。

那些以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学说为基础，建立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无法理解，我们如何能够推翻他们“经济和金钱”的偶像，用德国人和德国民族取代他们，成为我们民族社会主义建设和复兴进程的核心。

其他团体以基督教虔诚的名义，以两种信仰的名义，警告他们的信徒警惕民族社会主义的遗传和种族学说的错误，以及第三帝国所采取的措施的错误。对于那些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外国传教士，我有一个请求，无论他们是在国内公开还是秘密地开展活动：当你们穿上任何一种宗教的圣袍，宣称“你们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时，请关心你们的王国，把这个世界中王国的责任交给我们。请允许我们根据我们的法律和需求组建我们的德国国家。

我的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民族社会主义人口和种族政策的原因。我们要拯救一个濒临灭绝的民族，带领他们回到人类理性认为通往未来千年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反对种族和生物衰落带来的三大危险，它们在过去多次摧毁国家、民族和文化，如果当时没有及时抵制它们。因此，我们必须解决这三个问题：出生率下降、人民中患病和不健康基因增加以及人民血液与外国和无关民族的血液混合，特别是与犹太人血液混合。第 4 和第 5 点规定：

“只有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民族同志只能是具有德国血统的人，与宗教信仰无关。因此，犹太人不能成为公民。”

“非公民只能作为客人居住在德国，必须遵守针对外国人的法律。”

《纽伦堡法案》用“帝国公民”取代了“国家公民”的概念。这本身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它本身并不能实现党纲的要求。

然而，《纽伦堡法案》使得犹太血统进一步渗入德国民族机体变得不可能。对于种族立场根植于血统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一历史性决定涉及的范围之广，使得有关犹太人的法律中其他所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规定都变得不那么重要。

《纽伦堡法案》如果不涉及所谓的德籍犹太混血儿（即半犹太人和四分之一犹太人）的地位问题，那么它就是不完整和不完整的。这种杂种混血儿不受欢迎，立法的目标是尽快从生物学和政治学上消灭他们。婚姻条例将导致这一结果。四分之一的犹太人只能与血统纯正的德国人结婚，而半犹太人，如果他选择不信仰犹太教，或者按照我们的说法，与犹太人结婚并因此加入犹太民族，则只能在得到内政部和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的许可后，才能与德国人结婚。

我们毫不意外，事实上，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纽伦堡法案的出现为犹太人及其盟友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可以大声疾呼“德国野蛮人”。花时间研究这些五花八门的抱怨是不值得的。我们处理犹太人问题属于德国国内政策，但我们希望许多外国奥运嘉宾能够亲眼看到“可怜的犹太人”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悲惨处境。

我们对自己的血统和种族之间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不会妄下这种判断，这种判断只能来自自认为高于种族和人类的立场。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无可争议的。这是任何种族政策的基础、理由和义务，我们认为，没有种族政策，欧洲乃至全世界将永远无法实现和平。

这对于保护和发展地球上所有生命是必要的。

更荒谬的是，有人反对我们关于对基因病患实施绝育的法律，认为可以在未经他们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对他们实施绝育。我们认为，让智力低下（如弱智）或缺乏自由意志（如精神病患者）的基因病患做出这样的决定是荒谬的，更何况我们已经控制了他们使用金钱和其他死物的能力。让他们做出关于生育和子女的更重要的决定是荒谬的。

至于你们这些来自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评家，我们拒绝你们评判我们阻止劣等生命是否正确，而你们却提倡在生命成长时，只要母亲、医生或其他人愿意，就可以无限堕胎。

我相信，当我们消灭不值得存活的生命时，我们拥有良好的道德感，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毒瘤正在无情地杀害成千上万宝贵生命时。

但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关注的不仅仅是防止不适宜基因的传播。同样重要的是，甚至更重要的是，旨在保护和促进国家宝贵基因的措施。

大量其他措施旨在促进健康和体能，保持德国人民的军事和生产准备状态，并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加以推进。

国家的职责是通过法律措施保护人民的健康，并确保这些政策得到执行。运动的目的是赢得人民对这些政府政策的支持，并重新建立人们对自身、家庭和人民的责任感。全体人民的权利和需求高于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

国家负责确保健康，而党则负责提供领导。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维护和提高德国人民的体质。

因此，我们的理想并非基于经验丰富的国家医生的法律法规和裁定，而是基于德国人民的医生——老家庭医生，他们尊重自然，懂得利用自然的治愈能力——而过去人们往往忽视这种能力。当然，他也了解学术医学的方法。由于他了解种族卫生学，因此在治疗个体时，他永远不会忘记整体。

预防对医生来说比治疗更重要！他不仅想在生病时成为忠实的助手，还希望在人们健康时成为顾问和朋友。比起最有趣、也许是最赚钱的疾病，他更乐意看到一个孩子快乐地向他跑来。

历史告诉我们，从长远来看，人民不会因经济或政治、自然灾害、战争或内战而毁灭，但历史上每个民族衰落的最根本原因都是其体质和健康被破坏。许多民族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包括种族同胞的巨大生命代价，但几代人之后又恢复了元气，因为他们的生育能力没有受到损害，对生活的意志依然健康而坚强。一个战败民族的子宫里常常会孕育出健康的孩子，他们长大后成为复仇者和解放者，带领人民走向新的辉煌和新的胜利。

健康和力量只赋予一个民族一次，一旦失去，就永远无法挽回，这与被摧毁的城市和荒芜的土地不同。

在这方面，看看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的情况很有价值。

尽管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官方统计数据和报告中并未提及，但各种公告和报纸文章都表明，俄罗斯的卫生状况正变得越来越灾难性。

在莫斯科领先的示范诊所，床上用品破旧不堪，床垫也像大多数医院一样完全破旧。

1935 年 7 月 7 日的《真理报》对危害工人健康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控诉，并提供了 1934 年上半年莫斯科测量仪器厂因不健康的工作条件导致的疾病数量，令人痛心。

从种族卫生的角度来看，尤为痛苦和严重的损失是 300 万到 350 万本应出生在我们最优秀的人（那些留在荣誉战场的战士）身上的未出生婴儿。他们本应结婚生子，成为现在所缺少的坚强一代的父母。

1936 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1935 年结婚率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与 1935 年第一季度相比，结婚率下降了 10.4%。与此同时，统计数据还证明了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事实，即与去年一样，出生率的下降与结婚率的下降并不平行。降幅仅为 1.4%，略低于去年。

我们的所有努力和政策都必须以保持这些有利的出生统计数据为目标，并加强这些数据。

关键问题是，我们能否成功达到每对夫妇平均生育三到四个活产婴儿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民族的生存。**国家的责任是提供法律措施，特别是经济措施，以减轻如今对多子女家庭造成的沉重负担。**

如果我们不能成功改变德国人民的这种内在态度，那么我们所有的生育政策努力——无论多么慷慨——都将毫无用处，毫无希望。

只有当德国人民将强大的政治意愿与对生活的坚定信念相结合，保持人口数量和种族，才能确保其军事实力、自由、荣誉和未来。

国家政策造福整个种族 亚瑟-古特

人类是无限漫长的系统发育的结果，这一认识不再局限于个别学者，而是开始影响整个国家，人们开始思考遗传和选择的规律，思考自身的基因构成。我们自豪地回顾人类取得的众多技术成就，以及人类在道德和文化方面取得的不可阻挡的进步。如今，我们知道人类的进化始于组织极为低下的生物，而如今，这种部落发展的上升趋势正受到退

化的威胁。数千种动物物种也经历了漫长的进化，但恰恰是因为如此，它们还是灭绝了，原因在于个别器官（例如猛犸象的象牙）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或者动物本身变得巨大，例如巨型恐龙。

在人类中，也有一个器官异常发展，即大脑，它使人类能够适应各种生活条件并取得成功。但大脑不是服务于物种的器官，而是服务于个体的器官，在当今所有文明民族中，它危及物种的保存和繁衍，因为文明人用理性来对待建立家庭和生育。据说，我们的伟大卫生学家、地区医生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曾将出生率的下降视为退化的迹象，并说道："我认为人类有一天会因自愿停止繁殖而从地球上消失，这并非不可能！"

因此，在我们弄清楚"为种族服务"的含义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解决一个问题，即文明民族、我们的种族以及我们的人民是否面临退化的危险，即数量减少和基因构成恶化？即使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毫无疑问，我们的整个文化、经济和成就完全取决于种族健康。正是因为我们的日耳曼祖先实行了种族选择，日耳曼部落才得以取得伟大的文化成就。迄今为止，我们的政治家们对我们民族的有机遗产关注得太少了。他们满足于照顾物质和文化产品，却没有意识到这些完全取决于我们民族的种族和遗传生物遗产。

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国民经济，也不是自由主义的货币经济体系，而是民族生物学，即我们有机遗传价值观的特征。

文明国家的傲慢人民也应该接受遗传学理论；因为我们知道，不仅所有的身体特征，而且思想和灵魂的所有病态以及好坏倾向都是合乎规律继承的。

因此，任何科学地承认孟德尔定律及其遗传规则的人，都必须承认种族概念本身以及种族政策的必要性！虽然我们的祖先或多或少对物种和种族的发展有着自然的控制，就像所有生物一样，但这种控制随着文明和人类智慧的发展，一代又一代地逐渐丧失。

在自然界中，就像在原始民族中一样，有两种推动力在促进物种和种族的繁荣：繁殖本能，它导致不顾个体地繁殖；以及生命选择，它通过淘汰抵抗力较弱和劣质的个体来促进种族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物种的本能和自然选择是种族发展的天然守护者。

在原始民族中，公众对个体毫不关心，而在文明民族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个人的自私却日益获得超越自然遗传和选择的力量。其结果是出生率本身下降，而由于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不健康、种族素质低的人比基因健康、种族素质高的人繁殖得更快，导致不健康、种族素质低的人数量增加。

但是，当文明通过中和自然选择的力量，导致劣等者受到优待并大量繁殖时，我们称之为逆向选择。正是这种逆向选择，加上与异族人的无节制混合，导致了退化。

选择和逆向选择可能以多种方式发生作用。因此，举例来说，所有疾病都可以被视为自然选择的一种手段。例如，如果精神疾病患者被禁止在庇护所内繁衍后代，或者他们过早地死于白痴或自杀，那么他们就会自我淘汰，严重畸形或幼稚症也会导致他们无法生育和繁衍后代。然而，反过来，文明及其成就，特别是在医学领域，抵消了这种自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提醒大家，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选择（免疫力的强弱、体质的耐力测试），以及通过产科和各种形式的护理来抵消选择，可以限制疾病的风险。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成就，而只是想从理论上弄清其后果。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例子：考虑一下唇裂、腭裂、马蹄内翻足、髋关节脱位的手术，或者通

过其他医疗措施中止选择。医学和医疗技术对人类的帮助越大，后代就越需要它们。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结婚年龄偏大，这是导致有价值和有才华阶层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

晚婚和独身是造成白人在生物斗争领域中相对于其他种族失去竞争力的反向选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应考虑酒精、尼古丁和其他成瘾性药物的影响，它们对生殖细胞的损害和影响是我们目前还无法忽视的。我们仍然不知道兴奋剂甚至 X 射线（即使剂量很低）或其他射线会在多大程度上损害生殖腺，因为正如动物和植物实验所揭示的那样，遗传物质的缺陷是隐性遗传的（重叠的），因此只有在后代中才会显现出来。无论如何，逆向选择的影响如今随处可见，导致宝贵种族走向灭绝。因此，举例来说，**大城市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坟墓，不仅从政治意义上，而且从身体和道德意义上来说都是如此，那里充斥着各种诱惑、令人上瘾的药物、性病、文学产品、表演和诱惑。除此之外，还有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选择，来自下层阶级的人才向上层阶级发展，而中层阶级则向上层阶级发展，这些人立即做出反应，保持单身或无子女，因此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又从民族的生命之流中消失了！然而，这样一来，中下阶层必然会被不断淘汰，因为有才华和成功的人不断减少，直到只剩下平庸之辈。**

细心观察学校和大学的人声称，他们今天已经能够发现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即使（这也是要反对的），通过学术的大规模生产，智力上优越的职业水平确实已经发生了平庸化，但毫无疑问，人才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应该指出的是，特殊人才只能从大量平庸的人中脱颖而出，这一点从伟人几乎都是晚生子女且来自大家庭这一事实中可以明显看出。即使一对父母身上仍然存在宝贵的遗传特征，但在一胎或二胎制下，自然不会给这些父母足够的机会进行有利的组合。遗传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身体和心理特征都是由两个基因的结合产生的，一个来自父亲，另一个来自母亲。

因此，如果父母具有良好的遗传特征，那么生育的孩子越多，这种婚姻中天赋出众的孩子出生的可能性就越大。除了晚婚和性传播疾病对生育的限制外，还应在此背景下提及对教育的过高估计、对科学活动的过分追求以及追求社会进步，这些因素转移了人们对保护物种的关注。然而，最重要的是，避孕是导致生育率下降和优秀民族灭绝的主要原因。它表现为人工流产或使用避孕药具，正如健康女性的人工绝育手术已经大规模开展，其规模之大超乎我们的想象。

这种故意节育的原因有很多，例如经济原因、社会因素、渴望获得认可和追求社会地位提升，但另一方面，营养不良、多子女家庭的不利因素，以及偏爱少子女或无子女家庭。除了心理和情感原因，我们还必须考虑：懒惰、自私、个人主义以及缺乏生育意愿，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心理和道德问题。因此，如果我们不成功阻止这种发展，那么在我们国家，出生率下降和民族素质下降最终会导致我们的衰落，这并不奇怪。让我们回顾一下，1900 年左右，德国人口出生率仍有 200 万，而 1932 年只有 978000，1933 年只有 956915；我们不要忘记，低死亡率只是表面上的增长，实际上，在计算生命平衡时，每年已经出现了 30 万儿童的出生赤字。如今，当人们在报纸上看到“柏林出生率上升”时，这多少有些误导性；因为 1933 年底一些城市出生率上升，通常并不是因为人们想要孩子，而是因为商业堕胎者和妇女害怕受到惩罚，不再像以前那样敢于经常堕胎。

如果我们仍然允许不健康、有遗传疾病和缺乏社会性的群体比健康和有价值的群体繁殖更多后代，那么作为医生，我们必须承认遗传和选择法则不再适用，文明的逆向选

择已经充分生效。下面的例子说明了人口衰退和退化的速度有多快：**假设一个国家里白人占 50%，黑人占 50%，白人平均生育 2 个孩子，而黑人平均生育 4 个孩子。在 3 到 4 代，也就是大约 100 年后，这个国家的人口将 94%是黑人，6%是白人。**

如果我们允许 50%的遗传病患者、反社会者和混血儿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中，后果可想而知。**现代战争已经成为大规模反向选择的一种手段。**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经济、金融和法律体系仍然源于自由主义时代，我们的世界观也出现在上个千年，最终导致了自然选择的逆转，并因此成为文明国家衰落的原因。阻止这种发展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对种族的责任。只有当我们清楚地了解反选择和种族消亡的原因，并勇于通过基因健康和种族护理来扭转这些原因，我们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环顾欧洲，我们发现其他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的出生率至少是我们的两倍，未来可能会超过我们。例如，亚洲的蒙古人在生物学方面就远远优于我们。因此，现在是白人，首先是德国人，回头与其它民族进行生物斗争的时候了，无论从数量还是体质上！

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行政机构开始关注其保护物种和种族这一实际任务！过去，人们常说，每个国家都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然后衰落。人们将一个国家的生命与人的生命进行比较，比如，人必须经历青春期、成年期和老年期。然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并不像钟表一样需要停滞不前。一个国家如果有勇气和决心，就可以永远存在下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国家灭亡的原因除了战争和瘟疫之外，还在于社会和文化变迁，因为在一个衰落的国家，繁衍和生活的条件被摧毁，其必然结果是人口减少、种族混血、种族退化，最终导致国家和文化的衰落。但仅仅认识到这些表面原因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各个民族的生活状况，才能在这方面带来改变。

动物和植物界中，生命的意义在于物种和种族的保存。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人类，尽管人类傲慢地拒绝承认这一点。每一种植物都在为阳光和阳光而战，每一种动物都在捍卫自己的生命，适应生活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保护物种和品种！然而，雅利安人却被否定生命的教条和文明的结果所引导，导致思维的逆转。

如果想要阻止文明民族的消亡，就必须阻止一切阻碍物种和种族保存的行为，促进一切有利于基因健康和种族价值提升的行为。这是“为种族服务”，也是国家及其机构能够完成的最大任务。但迄今为止，在国家和经济政策领域以及社会立法领域，行动方向却恰恰相反。国家和经济耗尽了平原地区最宝贵的资源，不加区别地鼓励工业化和城市化，却没有考虑到大量人口因此背井离乡，与家人和祖国分离。社会立法照顾到了个人。老年和伤残保险应运而生，无数健康和意外保险计划也相继出台。很快，所有东西都投保了，但人们却忘记了，这扼杀了个人生活的意志，摧毁了家庭观念，破坏了婚姻和家庭共同体。

由于个人可以在任何地方满足自己的需求，例如，在生病时，健康保险公司会为他介绍医院，并在他年老时提供帮助，因此他既不需要结婚，也不需要孩子来照顾他，就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如果他不给自己增加家庭负担，他就能更好地度过一生！“结婚生子的人都是傻瓜”，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信条！但当每个人都这么想时，当这种世界观和生活观成为人们的共同财产时，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的国家将因人口老龄化、老年人比例过高而消亡，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将崩溃，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也将崩溃。我们无意废除社会

制度，但必须认识到，儿童和家庭不仅对维持人口数量必不可少，而且必须被视为国内经济市场中重要的消费因素，此外，它们还是社会立法和社会保险制度得以持续存在的先决条件。当我们考虑到如今 15 岁以下儿童的人数比 1910 年少 450 万，但就业人数却比 1910 年多 1000 万时，我们才意识到失业问题的严重性。然而，我们需要增加 900 万到 1000 万 15 岁以下儿童，才能恢复到 1910 年劳动适龄人口与儿童的比例。

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儿童作为消费者缺失了，那些原本需要工作来满足这900万至1000万儿童需求的人如今都失业了，也就是说，儿童是家庭父亲的负担，但在国家预算和国内经济市场中，儿童是消费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雇主。试想一下孩子的消费：食物、各种消费品、家居用品、衣服、鞋子、玩具、保姆、教师、女教师，甚至母亲，她们今天不在家，没有教育孩子，反而给劳动力市场增加了负担。如果我们认为可以继续推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旧式社会政策，如果我们只考虑临时重组社会保险机构，那么我们还没有理解民族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像元首作为政治大师那样，直捣邪恶根源!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归遗传生物学，将基因健康、多子女的家庭置于国家、财政和社会政策的中心，弗里克部长在人口和种族政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了这一要求，并将其作为政府计划!

如果国家不能同时确保有效均衡负担并恢复家庭失去的营养空间，那么让每个孩子都承担间接税，这对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多子女家庭来说，最沉重的负担恰恰是食品和日用品的消费税，而当烟草、酒类等奢侈品或奢侈品被征税时，未婚无子女人群则发出抗议之声。当穷人、未婚者和无子女者被征收一些与抚养孩子的成本相比微不足道的特殊税时，人们发出哀叹，但当每个孩子的抚养成本增加，家庭人均消费减少时，却无人关心，最终，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饥饿开始蔓延！我们不应该继续要求那些已经不知道如何养活自己的孩子的人缴纳更高的社会福利金，而那些在晚年依靠这些被抛弃家庭的孩子养活的人却不用缴纳更多的社会福利金。

人们很容易忘记，只有足够多的年轻人承担起责任，养老金才能维持下去。因此，为了维持国家和人民的生存，有必要在许多领域进行重组，尤其是在卫生政策、卫生管理、医疗保健和一般治疗艺术领域。一直以来，都有医生和人们关心治愈疾病，帮助生病的可怜人。到了上世纪末，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有必要对公共卫生进行根本性的监管，并处理家庭、住宅和其他环境中健康与危害健康因素之间的关系。

人们可能也认识到，早期的政府通过制定针对病人、弱者或身心不健全者的治疗和福利措施，降低了死亡率，但在建设性的人口政策方面却未能取得成功。他们忘记了将遗传学和自然选择的发现作为公共卫生和国家政策的中心，从而将遗传健康的家庭作为公共卫生和国家政策的中心。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不仅经济和总体国家政策崩溃，出生率也急剧下降，家庭和家庭观念遭到破坏。联邦各州的卫生管理部门不仅落后于医学科学的发展，而且缺乏统一的立法和目标。整个医疗行业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因为它们只把个人作为帮助和措施的目标。医学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整个医疗行业缺乏对遗传健康和整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追求，缺乏为种族服务的意愿。

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是为国家和个人提供种族和民族健康服务。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对公共卫生系统进行标准化，并重新制定我们的社会政策和保险制度的目

标，以共同确保我们民族的生存和种族的发展。尽管我们已经成功地使我们的民族比以前更加关注未来，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必须对总体医疗保健给予最大的关注。有必要维持有关流行病的立法，以防止传染病和流行病的传播，即使有时放松以前的严格卫生规定似乎是可能的。

因此，公共卫生系统和整个医疗行业应继续努力预防疾病，并促进人民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必要像过去一样继续教育我们的年轻人健康生活和锻炼身体。然而，目标不应是达到最佳状态，而是增强全体国民的身体素质，达到良好的平均水平，在不过度训练和造成伤害的前提下锻炼身体。公共卫生官员在体育俱乐部、学校和全国协会的教育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例如，过度运动可能会导致内脏受损，尤其是对妇女和女孩而言。我们需要的不是世界著名的女运动员和女战士，而是那些长大后又要做家庭主妇和母亲的德国女孩。当体育活动导致参与者生病或丧失能力时，它就不再是体育锻炼了。我无法从成为话题的体育活动中找到任何美好的东西。当年轻女孩扭曲着脸、伸出舌头、跌倒在终点线后冲过终点线时，这难道是一种美好的景象吗？我们所追求的必须是平均性能的提升，而巅峰性能绝不能沦为夸张或哗众取宠。毋庸置疑，护理和治疗必须仍然是医生、医院和医疗专业人士的首要任务。没有人会因为患者可能没有遗传价值或反社会而期望医生不认真对待。每个医生都有道德义务帮助个人和人类。然而，在照顾和治疗个人的同时，医生有责任时刻牢记，他们不能忽视整个国家和健康人群的重要需求。因此，在未来，我们不仅要注重个人卫生，即照顾好个人的健康，还要考虑整个民族的福祉和繁荣，并注重种族卫生，即照顾好下一代。

因此，公共卫生官员的任务除了采取现有措施预防流行病和治疗疾病外，还要关注遗传和种族健康。为此，有两种可能：

1. 淘汰遗传性疾病或防止遗传疾病和反社会后代的产生；
2. 促进遗传健康或优待、支持和鼓励遗传健康和种族 有价值家庭。民族社会主义政府在执政的第一年就已经开始行动，通过了预防遗传性疾病法和打击惯犯和性犯罪者的措施法。

根据第一项法律，成立了遗传健康法庭和高级法庭，由两名医生和一名法官决定是否将某人视为法律意义上的遗传病患者。因此，这些法庭的任务非常艰巨，即消除遗传性疾病，从而实现民族复兴。正如第一项法律迅速实施后，将大大限制遗传性疾病患者的繁殖以及身体和精神残疾者的出生，第二项法律旨在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保护德国人民免受惯犯和性犯罪者的侵害。国家过去是如何处理惯犯的?他们反复被捕、受审，经历漫长的诉讼程序，最终只被判处短期监禁。他们往往还会获得缓刑，以便很快被释放回到人群中。因此，这些人嘲笑法庭和国家当局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一从监狱里出来，就立即开始从事犯罪活动。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警方总是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抓获这些惯犯并定罪。这种情况今后将有所改变，因为现在可以将这些惯犯进行预防性拘留或送入劳改所。然而，特别重要的是，可以对性犯罪者实施阉割。我们知道，过去曾发生数千起针对小女孩和妇女的性犯罪，在许多情况下，虽然实施了惩罚，但这些有病态倾向的人还是被放回了社会。现在，法院可以决定对危险的性犯罪者实施阉割，从而确保消除这些人的冲动，可以说这是一种治疗。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德国妇女和女孩将受到保护，免受这些犯罪行

为的侵害，这与以前的方式完全不同。此外，这些安全措施的实施也将使罪犯无法将其病态犯罪倾向传递给后代。这些法律措施的道德目标比迄今为止所谓的基督教博爱更值得珍视，因为这些措施不仅希望防止当代家庭遭受痛苦，而且可以说将博爱和关怀扩展到后代。

为了促进德国血统人群和家庭的基因健康，有必要逐步对德国的基因遗产进行盘点，并逐年完善，以便卫生部门和婚姻顾问能够为夫妻双方在婚前提供合理的建议。这项基因清查工作将是卫生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设立基因和种族护理部门，才能切实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只有当卫生部门能够对个人的基因健康做出判断时，才有必要进行婚姻立法改革，要求婚前领取结婚证。这样一来，登记处将转变为家庭办公室，以便在其中创建家庭记录。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实施继承和种族立法，教育人们关注遗传健康和种族意识。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法律规定的价值首先在于，整个德国人口开始反思遗传健康和种族归属。总有一天，只有健康且来自良好家庭的德国女孩才能结婚，反过来，**这些女孩的父母只有在确保女儿未来的丈夫也具备相同的遗传条件时才会同意这门婚事。**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成功解决失业问题，不能为德国家庭重新赢得必要的食物保障，那么仅靠这些措施是不会有任何成效的。这些经济问题的解决与妇女问题的解决以及人口本身的健康增长密切相关。只有通过让更多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成为家庭主妇和母亲，从而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压力，才能解决失业问题。只有我们成功地实现了多子女家庭负担的更公平分配，只有当生育少子或未婚不再值得时，我们的国家才会经历生物和经济上的崛起。因此，从长远来看，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一个人口政策问题。只有从这一广泛的角度看待失业问题、妇女问题和整个社会保障问题，才能找到持久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尤其是德国妇女和女孩，她们应该全心全意、冷静地支持德国政府的目标；毕竟，只有当妇女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回归家庭，并且生计和生活得到保障时，她们才有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也是合理的。这些措施不可能在一年或一夜之间实施。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了这些措施的开端，例如婚姻贷款，以及在有限程度上，健康的农村定居点。然而，农村定居点尤其需要从促进继承和种族关怀的角度来看待，以实现大城市的放松，并将宝贵的血统重新引入农村。从历史经验，特别是从我们的日耳曼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解决农民问题、保护农民，是一个国家生存所依赖的任务。

从我们国家的早期历史中，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日耳曼祖先在基督教前时代就拥有高度的乡村文化。现在是时候揭露其他所有历史记载都是谎言了。福尔哈贝尔试图在讲坛上把历史篡改成真理，但这一事实不会因此改变。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像日耳曼部落那样，道德纯洁和家庭荣誉的声誉更高。毫无疑问，北欧最优秀的血统与德国土地的结合必须尝试。赫尔曼·伦斯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如果农民没有强壮的骨骼、坚韧的神经和健康的血液，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饥饿、瘟疫和战争会消灭我们。在三十年战争之后，我们再也不会崛起。如果没有德国精神在我们村庄的茅草屋顶下继续存在，那么罗马-法兰克-法国文明带给我们的民族性格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因此，尽管经历了战争和瘟疫，德国农场一直是德国人民坚持自我、奋起直追的地方！因此，元首为我们的人民再次扫清了道路，功不可没。根据达雷的观点，土地应该再次成为我们生活的来源，成为我们优良血统的保存和繁衍的健康基础。土地应该再次成为家庭法的一部分，受到国家的保护。然而，作为回报，国家必

须要求土地所有者为其提供健康且数量充足的子孙后代。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再次重申祖先关于贵族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再次确保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日耳曼遗产作为新的贵族得到保护。

我们必须再次践行“为种族服务”的理念,回归祖先令人钦佩的世界观。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人类世袭不平等,并据此得出结论,根据世袭价值和血统对人群进行不同的划分,从而确保贵族阶层拥有优秀的领导者,并在一夫一妻制下拥有道德高尚的配偶。**既然遗传学让我们了解了自然遗传的规律、多样性和可能性,那么我们应该鼓起勇气采取行动,这在基督教时代之前的数百年乃至数千年里,对于我们的日耳曼祖先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我们今天仍然从中受益。我们的整个文化,在日耳曼民族和文化的土壤上发展起来,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日耳曼部落遵守婚姻和家庭法,遵守血缘和土地之间的联系,并将其保留在宗教情感中。如果那些聪明绝顶、博学多才的人对此一笑而过,如果其他种族和民族无法理解,那么这最终只能证明这种行为和理解是受血统约束的。恢复专业公务员制度的法律标志着种族政策的开始,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正如弗里克部长所说,该法律的目标是:“德国人领导下的德国属于德国人”。这是对外国渗透的防御;德国人只能由德国人来统治!因此,**讨论种族问题并不意味着贬低他人,而是对外国渗透的防御,也是堕落和混血的危险的警示,正如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堕落和混血总是导致民族和文化的衰亡。**

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赢得乡村和城市中民族灵魂的认同,不能成功地保护传统和种族,不能成功地满足生活的生物需求,那么仅凭经济措施是无法拯救我们的德国民族免于消亡和种族灭绝的。为此,我们必须不再高估教育,并让年轻人相信,构成生命价值的是健康的家庭,以及让家庭和整个国家在未来过上幸福生活。正如达雷(Darré)追求“新的血统和土地贵族”一样,这座城市需要一群道德高尚、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他们为其他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我们必须努力改革学校和大学系统,引入兵役和劳动服务,但通过缩短高等学校的学制来弥补失去的时间。我们必须让受过教育的 20 多岁年轻人刚刚步入职场并组建家庭。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他们逐渐消失。为种族服务意味着教育我们的年轻人保持纯正的传承,尊重异性。必须让我们的男女青年明白,他们有责任将纯正的传承传递给后代,就像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一样。我们需要的是道德高尚的女性;但德国必须要求其男性和年轻男性尊重德国女孩和德国妇女,将她们视为德国孩子的未来母亲!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生育意识,因为我们对母亲这一概念本身怀有敬意,从而对国家的命脉怀有敬意。因此,每个遵守种族纯洁规则并选择合适的婚姻伴侣,努力改善家庭并使种族和物种向上发展的个体,都是在为种族服务。

家庭和种族问题的研究必须再次成为祖先和后代之间的永恒纽带。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来对待我们的任务,那么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我们不仅必须推行社会政策,还必须推行种族政策，那些不想这样做,而是嘲笑或破坏它的人,还没有理解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含义,没有权利领导国家或政治。我们不仅希望保护我们人民的生存和身体健康,还希望通过遗产和种族关怀,超越日常生活,思考永恒和神圣。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赢得我们人民的灵魂,追求我们种族的崇高,成功和进步是不可能的!

对死后生活的信仰可以理解为人类灵魂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在子女的延续中找到了生物学上的解释！那些没有子女的人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已经永远离开了，但那些拥有足够子女的人却通过子女而永存，直到家族灭绝，直到一切物种和种族灭绝！但德国民族必须继续生存下去；因此，我们必须向年轻人发出呼吁：不仅要准备为德国而死，还要为德国而活；因为"你并非独自生活，你是民族和祖国的成员！"

血与土：民族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瓦尔特-达雷

从迄今为止所教授的宪法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传统观点：一个国家由以下要素组成：

1. 人民，
2. 人民所居住的国家领土，
3. 国家权力机构。

人们早已认识到，国家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人民"、"领土"和"国家权力"不仅是每个国家的外部特征，而且它们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正是人民、领土和国家秩序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首先构成了国家的特征，并赋予了它鲜活的生命力，即把一个组织问题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因此，在特定领土上生活着什么样的人，以及该领土上的人民建立了什么样的国家政权，这绝非偶然。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至少在我们看来，国家的特征并非是对人民和领土拥有无限权力，而是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生命力、土壤形态、领导者的意志力和国家结构性质相互渗透并融合为一个整体的特殊方式。

在这方面，我们不应忘记，国家还受到其边界之外多种力量的影响，它必须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抵御这些外部影响。我们想强调的是，我们国家的特性既不是像殖民帝国那样由外国领土决定，也不是由只服从国家权威的外国人民决定。相反，我们的国家重心在于其自身的生活和人民，也必须在此基础上发展其国家结构。土壤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国家任务；同时，它们提供了使国家权力发展成为可能并限制其发展的自然力量，并决定了其性质。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一直是科学和宪法考虑的主题，如今在党和当局的合作中，以及在公共行政划分为国家行政和自治任务中，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作为自治的一个例子，我在此仅提及民族社会主义食品经济的社团结构。在这方面，农产品市场是在公法自治协会的帮助下组织的，以满足国家粮食安全供应的公共需求。在这种自我管理中，国家整体利益所需的国家目标与国家前景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经济力量的有序自我管理，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人民与国家力量相互交织的一个实际例子。

长期以来，人们也认识到并赞赏国家与人民之间在血缘意义上的内在联系，这尤其要归功于浪漫主义和德国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能够将其人民和国家的概念与这些思想传统联系起来。在我们这个时代，国家与领土之间的联系也得到了科学的阐明；我在这里想到的是地缘政治领域的工作，它研究了空间对历史事件的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揭示了值得作为未来政治家知识基础的联系。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科学界对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尚未给予充分关注，至少没有从土地对人和

社区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受生命法则支配的宿命关系方面进行研究。人们与其所生活的土地之间的联系远不止土壤的性质、土壤产量和土壤宝藏对经济以及该民族文化的物质条件产生自然影响这一事实。对早期历史和现代种族的研究已经指出了土壤类型和地形对于人类定居历史的重要性。

但是，让我们超越土壤对特定种族和特定民族生活条件的一般影响，来探讨一个民族如何以特定方式塑造其与土壤的关系，以何种形式拥有和管理其本土土壤。土地法决定了土地和土壤与人民生命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土地法也决定了国家的内部结构。这一基本事实还可以扩展为：土地法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国家的未来。我甚至可以说，无论是日耳曼国家还是印欧日耳曼国家，在从历史上消失之前，都经历过土地法的变革。这些国家的衰落总是伴随着土地法的变革，而他们自己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很少关注这一点。斯巴达的情况最能说明这一点，斯巴达人世袭土地的命运与斯巴达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世袭土地正是由利库尔格创立的。我们对斯巴达的这些联系有如此清晰的认识，是因为布索尔特（Busolt）对这些联系进行了详细研究并阐明了其含义，但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目前，我们对其他印欧和日耳曼国家的研究还不多。但只要从土地法与印欧和日耳曼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入手，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我的论断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些联系是如此决定性和重要，以至于我认为应该为每个德国大学设立一个教授职位。土地和财产适用法律的政治影响尤其体现在土地和土地上的工作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

耕地不会像经济增长时期的一批股票或其他动产那样带来快速利润，而是需要根据土壤性质进行持续维护。土地管理的这种特殊性一直与快速变化的所有权相抵触，并有利于土地法的巩固，例如在法律史上，将个人财产权转换为土地的紧急和世袭权利。特别是，农业迫使农民家庭在田间劳作，从而将成长中的后代牢牢地与土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家庭服从于土地法则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由此又产生了这样的习俗或法律：即只有一位血缘继承人可以继续经营农场，这样就不会因遗产分割而违反农场和农田的法律。如果我们将这种需要所有者特定生活方式和日常工作的不动产与银行中的可动资本进行比较，这种对比可能会清楚地表明，这种可动资本无法为下一代的工作指明方向，也无法像农场所有权一样形成一种强制性的传统。

因此，土地是固定传统和持续习俗的载体。这赋予了土地法其政治意义。任何治理的可行性都取决于某些基本的持续性法则，而这些必要的特征在农村人口中比在受经济形势驱动的非农村人口中更容易或更专一地发展。因此，可以理解的是，早在历史记录中，土地权就是国家兴衰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东部邻国革命转型中的土地改革更是成为事件的核心。我可以说，直到今天，俄罗斯国家仍然将其土地宪法视为国内政治权力的核心。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对于第三帝国的建设而言，前瞻性的、持久的土地宪法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在《基本法》的影响下，农村的稳定受到彻底破坏的威胁，与农村人口的价值背道而驰。债务的可能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负担，以及对受外国影响支配的不可估量、不受监管的市场依赖，使农民越来越受外国债权资本的控制。虽然《德国民法典》（BGB）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债权资本及其债权人，但该法典甚至不再包含“Bauer”一词，这个词是所有永久事物的原始术语，更不用说关注农民的权利了。因此，民族社会主义立法的任务是制定一部新的、坚实

的土地法，并通过有序的市场营销确保农村企业的经济生存。然而，如果我们想充分理解土地法在当今德国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更深入地研究，不仅要了解稳定、坚实的农业宪法的价值，还要了解农业对我们的人民意味着什么。与其他国家的农业政策相比，民族社会主义农业政策的特殊性在此显而易见。

对我们而言，将土地法的支柱与国家的结构紧密联系起来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体现土地所有权的政治意义；因此，我们将所有农民和农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公法组织——帝国农业协会，该协会在人员和行政方面与国家和党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责任还包括创造经济条件，不仅维持国内农业，而且使其生产力实现最大程度的提高。就在几年前，德国农业的未来还被认为是一种基于美国模式的农业形式，即一种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以经济状况为依据、按照资本主义盈利模式计算的农业经济体系。众所周知，美国的农业现在已经崩溃了。如果我们的农业真的基于这种农业，那么今天大多数农场将处于闲置状态，土地将被荒废，我们可能无法进行生产斗争。相反，德国农业今天正处于生产斗争之中，以确保我们的粮食独立，即确保我们自己的土地能够满足人口的最低需求，从而减轻我们的外贸平衡负担，并释放进口工业原材料的支付手段。这是民族社会主义农业政策与其他国家（如法西斯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农业政策共同追求的目标。

然而，我们的做法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们将经济政策目标与人口和文化政策的必要性相结合，简而言之，我们以民族社会主义的统一和主导思想为出发点，使政治与经济相互协调。民族社会主义的农业政策不仅关注粮食经济，还关注保护作为国家血液来源的农民。

毕竟，这最后一个因素具有决定性的根本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日耳曼国家，血液只有在农村世代相传，而远离农村生活会导致人口锐减。如果打个比方，可以说一个民族的血液就像涌泉一样从农场涌出，但迟早会在城市里干涸。这条规律不适用于以游牧为基本特征的民族，比如犹太人。另一方面，它无条件地适用于日耳曼血统，可以真正被称为日耳曼人命运的铁律。

民族社会主义的农业政策正是基于这些基本理念而制定的。通过同样的措施，它试图保证整个国家的粮食供应，并维持农场和农民家庭作为国家血液来源的能力。我们知道，农村人口出生率高于城市。1927 年，根据维持人口所需的出生率计算，德意志帝国平均出生率不足 10%：相比之下，农村地区出生率仍高出 13%！1933 年，以每 1000 名常住人口计算，居民少于 2000 人的社区（即农村社区）的出生率为 18%，在人口规模介于 20 万至 400 万的城市中，每 1000 名居民中只有 14.5 名活产儿，而在大城市中，每 1000 名居民中只有 11.2 名活产儿。然而，这不仅仅关乎我们国家的人口数量，还关乎我们赖以辛勤工作和取得成就的基因构成的保护。在这方面，随着大城市文明的发展，人们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这带来了危险。瑞典人口学家、乌普萨拉大学的隆德伯格教授曾将城市称为“陷阱”，优良遗传特征的携带者被诱骗到城市，几代之后，他们的遗传特征就会消失。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观点的可怕程度。德国人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他们的遗传特征，这些特征根据环境变化，知道如何完成手头的任务：这同样适用于所有领域，无论我们考虑的是文化、艺术、政治、经济、

技术、手工艺等。自由民主主义认为才能可以被教育取代的幻想如今已被证明是空洞的。但我们知道，天赋取决于遗传。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国家就只有一个绝对优势，那就是德国血统的遗传价值。德国拥有这一优势，并将继续凭借这一优势培养出应对未来百年挑战所需的领袖和发明家，从而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没有物质上的经济繁荣，没有世界的宝藏，都无法像德国人民今天拥有的宝贵遗产那样保障他们的未来。我们为我们国家生存的所有领域做了资产负债表和统计，但遗憾的是，还没有为我们国家生活的生物基础做。我们甚至还没有根据我们国家身体完美的生物资产负债表制定生物预算。就像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一样，我们与财富的来源毫无关系，而且像他一样挥霍着宝贵的血液，就像挥霍金钱一样。我们冷酷地看着宝贵的血液荒芜或几乎枯竭，在这方面，我们就像一个傻瓜，把珠宝全扔到海里，那里最深，没有人会再看到它们。

在这种情况下，古斯塔夫·弗伦森（Gustav Frenssen）在《海鸥与老鼠》（第 247 页）中讲述的一段话让我想起了真正的革命性观点："一个聪明人告诉我，他在图林根旅行时，在火车上看到一个年轻人，他的外表酷似歌德，他认为在图林根及周边地区可能不止一个歌德的后裔。我认为确实如此，并说："可惜这样的人不多。总有一天，那些劣根性的人会因宗教和道德而失去生育能力，像歌德这样的人会要求很多孩子。"弗伦森说得够多了！即使我们无法立即接受这位思想家诗人提出的最后一条智力要求，因为其新颖性，但如果我们不想做点什么来改变我们的农村血源因现行法律而枯竭的事实，那么我们就是傻瓜，而这条法律正在我们国家非农村地区被毫无意义地浪费。尽管历史证明我们的文化受日耳曼血统的影响，而日耳曼血统的活力又取决于土地法，但这一切仍然发生了。自由资本主义精神及其自由的土地法是上世纪农村人口外流的基础，尤其是那些有进取心和勤劳的人。自由资本主义鼓励人们只追求利润；由于世界经济发展始于自由资本主义，也因自由资本主义而发展，城市商业职业的利润前景广阔。但对于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土地和劳动成果是否有市场，如果有，价格会如何波动，这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自由主义的土地法对拥有农场和田地的重视程度与拥有证券所体现的动产并无二致，并允许两者享有同等的法律待遇和继承权。《德国民法典》（BGB）从法律角度巩固了自由主义，从而对德国农民实行了专制统治，但同时也对德国人民对血统法的肯定实行了专制统治。

农民的儿子和学者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从一开始就正确地认识到我们立法中这个危险的漏洞，该漏洞出现在 19 世纪。我引用他 1820 年发表的著作《从更高、更人道的立法角度谈森林和农民的养护》中的一段话："人们必须自由，但当棍棒、石头和森林 像风中的羽毛一样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然后又传回来，当即使最坚固的东西也变得易变和短暂时，那么法律就无法让人们的态度变得不可动摇。但最简单、最密切地维护着人民这一核心力量的两大阶层是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工匠。但是，当农民的农场和牲畜在乡村轻易地被出售，当行会解散，贸易自由化受到推崇，行业最后的严格规定和纪律被打破时，这些核心力量就会丧失一切稳固性和道德约束力。对于一个在自由的盲目眩晕中步履蹒跚的时代，我们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并非一切事物都拥有自由的外表和名字。"

在另一处："很少有人考虑到，如果你让一切事物自由，那么任何事物都不会保持自由，而必然会出现一种瓦解和放荡的状态，扼杀自由萌芽。这就是真正自由的秘诀，即约束和敦促人们遵守纪律和秩序，以及恒久和持久的神圣情感，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公民，这需要许多客观的约束，以及首先与外界事物相关、仅在第三和第四层与他相关的制度。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的观点大致如此。民族社会主义农业政策的任务源于这一见解：一方面，必须消除农民中的自由资本主义情绪，必须创造条件，让农民及其子女重新为自己的同类感到自豪，并忠于农民的生活法则，而不是受资本主义对经济机会的追求所引导。只有培养农村精神，我们才能希望让宝贵的农业子弟留在土地上，留在新老定居点。这样我们才能直接防止优秀基因的灭绝。然而，农村人口转变态度的前提是将农业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分开，并发展符合农业自然条件的稳定经济体系。另一方面，有必要制定符合农村生活规律的土地法。如果农村的思维方式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就无法长期维持，也就是说，如果农村的思维方式的发展和延续受到继承法的阻碍，因为继承法对耕地和财产进行了法律上的均分。

民族社会主义的农业立法同时满足了这两个目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和有利于农业的土地法。市场组织为所有农产品制定固定价格并确保销售。因此，它为农业企业重新建立了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使农民不受股票市场和经济状况波动的影响，并使他们能够自由地为国家的粮食供应服务。

农民的驱动力不应是通过片面增加这个或那个生产部门来追求短期最大利润，而应是通过尽可能全面地利用农场所有资源来追求总产量的提高。这也符合农场法和德国农业的最佳传统。继承权是本土经济体系的法律保障，符合相应的土地法，而土地法也是基于德国的农村传统。农场和田地不是一代人可以随意处置的资本，而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遗产，要传给子孙后代，这符合日耳曼人的农村思维。德国古老的法律传统认为土地不属于动产。在世者必须管理和维护遗产，并有权从中获得收入以满足需求。当法律与农村思维渐行渐远，将农民的财产视为可分割的遗产，就像一笔钱一样时，农村习俗也认可了这一观点。在许多地区，转让合同习俗保留了农场不可分割的继承权。但是，法律允许分割，而农村传统不允许分割，这种差异使农村习俗和精神濒临灭绝。

这一点在 19 世纪的众多继承法中尤为明显。尽管这些法律旨在将农场转移给继承人，但补偿金额的计算表明，在大多数继承法中，农场基本上被视为遗产的一部分，并根据继承人人数计算共同继承人从该遗产中享有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农场已经被视为资本，其价值（即使扣除所谓的继承人"预付款"）也要进行分配。如果农村传统得以恢复，即农场为家族服务，不仅为现在和过去，也为后代服务，那么农场必须明确排除在资本主义的继承或定居计算之外。这为继承农场开辟了道路，根据旧习俗和旧法律，农场收益可用于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并为此目的在法律中予以明确。现在，作为离任继承人的农民后代再次获得了根据收益获得食物和职业培训的权利，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在农场避难的权利。因此，家族对农场的权利得以保留。通过这种方式，一种新的但非常古老的日耳曼法律所有权概念被引入农场，旧习俗与现行法律之间的联系得以恢复。

与继承农场相关的法律概念与农村和民族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相一致，确保了习俗和个人农村观对个案法律形成的影响： 土地必须肥沃，农民必须有能力，农场必须享有荣誉。这些术语的解释和应用由法院负责，农民与法官共同参与其中。这尽可能在法律上保证了法律与习俗的和谐，并建立了适合农村思维的法律基础。人们通常不太了解的是，农民战争时期农民提出的一个古老要求终于得到了重视。正如一个国家通过法律认识自己的价值一样，单个庄园也通过法律认识自己。因此，家庭农场的继承权是农民自信的基础，也是加强和保护农村荣誉感的基础。我已经强调了民族社会主义农业政策中所有措施之间的联系。我们已经看到了粮食经济问题与农民问题的联系，并且将农民视为滋养阶层和民族血液的源泉。将经济、法律和人口问题纳入整体任务并使之成为焦点的一条主线，其根源在于民族社会主义对农民和农场、人民和耕地之间重要联系的看法。

这让我回到了开始。我们的人民与土地之间的联系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来理解，也不仅仅是国家权力分配的问题。我们的人民与土地之间的联系植根于我们人民的农村特征，以及日耳曼意义上的农民与其耕地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土地可以带来稳定的收成，使耕种它的家庭能够获得永恒的持续性，就我们所知，这是永恒的。耕种土地的家庭能够实现这种永久性，前提是它能够以与农业相适应的法律和经济形式维持自身和土壤。农业立法的目的，无非是在当前国民经济条件下执行我国农民生活的这一法则，并以当今所需的形式确保其实施。民族社会主义的土地法和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及其市场组织正是基于此。

在人口和经济领域，粮食供应方面的国家保障也是基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血缘和土地的统一性法则是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概念的基本原则。这种基于血缘和土地的国家概念与所有其他国家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使血缘，即种族，成为其世界观的核心，也是其所有政治考虑的基础。

在这方面，我想起了苏维埃国家反农民、反种族、但彻底的民族主义概念，以及法西斯国家的概念，虽然它肯定了农村人口，但否认了血统问题。如果从统一的、独特的农业宪法整体中抽取个别部分，并试图将其转移到完全不同的领域，而那里没有相同的自然和意识形态条件，那将是一个错误。因此，在讨论商业经济结构时，必须拒绝“经济继承农场”的口号。因为世袭农场的创建并非为了稳定某种经济形式，即农村经济。农村经济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保护，但出于民族主义的原因，从自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值得保留。相反，世袭农场的创建只是为了在未来数百年中保留我们的血统。重要的是保留血统，保留性别，而不是经济形式。根据我们历史上的所有经验，这种血脉只能在农村的土地上代代相传，而不是在城市里。此外，农民还必须得到经济上的保护，因为他必须时刻应对天气的不确定性，而在城市里，这种不确定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人们可以在建筑物中不受天气的影响。因此，我认为，在商业经济领域谈论“经济世袭农场”是对民族社会主义农场和世袭农场的歪曲。如果商业部门中的企业应该受到保护，免受继承权的分割，或者出于健康的中产阶级政策，希望将企业保留在一个家族中，那么继承权足以确保企业由一个孩子继承。但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必要淡化民族社会主义对继承农场的概念，将其变成相反的概念，即不再提

及或强调其为后代保留血统的实际任务，而是强调保留企业的经济形式，从而实现非常扭曲的表述。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世袭”的概念，在某些公共场合中反复讨论过。

从纯粹的法律角度来看，旧世袭和今天的《民族社会主义继承农场法》之间没有根本区别，甚至没有一点细微的差别。只是这两个机构成立的条件和目标不同。在《帝国遗产法庭法》中，德意志民族希望在未来数个世纪内保护其生存，因为经验告诉它，它必须依靠农民来维持其种族存续。德国农民数世纪以来一直保护着国家的生存，直到今天，立法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另一方面，领地的目的是通过保护家族免受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日益明显的土地征用，从而稳定对家族有利并支持其统治的家族。因此，这两种制度具有保护血统（即血缘）免受经济动荡影响并因此稳定血统的共同基本理念。但《帝国遗产农场法》出于民族精神而制定，旨在保护整个德国民族，因此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继承遗产法的前提是领土公国，为了稳定公国，世代致力于公国的家族享有特权。

因此，《帝国遗产农场法》具有社会主义倾向，而继承权的前提是恢复领土-君主封建制。就其本身而言，《帝国遗产农场法》现在足以将家庭与土地联系起来，就像继承权曾经做到的那样，即使是在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这对德国人民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尽管如此，如果有人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帝国遗产农场法》之外，是否还可以设立一种继承权，那么只能说明，某些圈子仍然希望在未来能够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占据特殊地位，因为他们曾经在不同的宪法条件下做到了这一点。这些圈子完全忘记了，只有他们对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贡献与对前领土统治的贡献一样卓越，他们才能得到丰厚的回报。民族社会主义政府准备采取这种态度，这一点在冯·兴登堡家族财产的案例中得到了证明。我宣布民族社会主义政府准备沿着这条路线继续前进，并为国家和民族提供卓越的服务提供卓越的奖励，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符合民族社会主义的原则，即那些为德国人民服务承担更多义务的人也应被允许享受相应的特权。然而，如果不对国家做出至少是等价的回报，却要求从现状中获得过去的特权，这是毫无意义的。

尤其是考虑到德国人民的记忆并没有糟糕到忘记 1918 年的灾难是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失败，以及——这也许在这里更重要——那些负有责任且享有特权的，尤其是前恩将仇报者，并未出现在阿道夫·希特勒自由运动的死者名单中，这些死者用鲜血洗刷了耻辱，而当时的负责人在政治上失败，毕竟助长了这种耻辱。此外，应该牢记，正是由于数百人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旗帜下牺牲，才有可能重建法律秩序，从而建立有序的宪政国家，保护我们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害。因此，我对当前关于继承遗产的讨论不抱任何同情，因为这些讨论缺乏民族社会主义意义上的任何与业绩或血统相关的条件。《帝国遗产农场法》确实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即如果大型农场满足第 5 条规定的条件，也可以将其视为继承遗产。然而，这需要证明家族在传承价值或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当今地位的贡献方面的价值，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统的质量及其保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将一些符合《帝国遗产农场法》要求的较大地产变成了世袭农场。然而，对于家族中有犹太血统的人来说，无论他们的名字多么动听，无论他们在历史上多么受人尊敬，遗产农场法对他们都不适用。因为遗产农场法着眼于德国的未来，希望保护人民的血统，这也意味着保持血统的纯正。不幸的是，实践表明，

个别大地主对《帝国遗产农场法》的抵触往往是因为他们害怕暴露家族谱系中以前刻意隐瞒的犹太血统缺陷，因此申请将他们的财产认定为遗产农场，从而冒着申请被驳回的风险。

如今，根据我的丰富经验，我只能建议，在处理《帝国遗产法》的反对者时，如果可能，应首先弄清他们的家族树，追溯到曾祖父母，然后再认真对待他们的反对意见。由此，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元首的副手、党同志鲁道夫·赫斯在 1933 年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上表示，民族社会主义的意义仅在于应用种族科学时，他同时也在说，对于民族社会主义来说，种族问题不仅是理解世界历史的关键，正如一位诙谐的犹太政治家在其小说中所述，种族问题还是民族社会主义所有政治考虑的核心。

但是，由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人民所生活的地区的空间条件，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血统”和“土地”的概念正在成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基本理念。

农民与国家 瓦尔特 达雷

根据有机结构原则构建的国家不得不承认两个基本事实作为其存在的先决条件：1. 充满生命力并赋予其特性的人类，

2. 生存空间，血与土是所有有机结构国家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这种状态下的经济问题只能参照这些先决条件来解决，也就是说，它们是：隶属于血与土的思想然而，我们正站在世纪的发展的尽头，这一世纪代表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即血与土是必须服从于经济及其规律的东西。这种经济理论是由哈登伯格介绍给我们的，它被自由主义进一步发扬，最后止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对孪生兄弟，而他们只是面皮不同而内心一样罢了。因此，可以说，一个以血与土的思想为基础、按照有机主义原则构建的国家形式，必定是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国家的绝对对立面。此点是很重要的!肯定国家的有机性的人也因此寻求国家的独立性，因为：任何[对国际或资本的]依赖关系迟早都会妨碍国家按照其特性生存。

国家的独立性问题首先是由以下可能性决定的：自给的粮食供应没有任何一种依赖会像对粮食的依赖那样，对一个有生存意愿的国家造成如此大的伤害：这可以使它完全瘫痪。一个民族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保证有独立的粮食供应：它有足够的空间通过自己的生产力来养活自己。从血与土的角度来看，粮食供应的问题可能是政府要面对的要务。因此，政府将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农民身上，他们本身就是种地产粮的人，而这将使农民成为国家的基石。这也是有道理的，原因如下：一个按照有机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其文化和经济成就本身都依赖于粮食。因此，那些提供粮食的人可以被称为人民身体中的生命力。但是，一个民族不仅要为生活而吃，而且要真正地生活，也就是说，它要考虑到拯救未来。这实质上是一个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的问题。现在，人们发现，城市不利于建立大家庭，城市家庭会在一段时间内消亡。相反，很明显，特别是在日耳曼民族中，在健全的经济和道德条件下，土地显示出几乎无限的生命和生育能力。由此产生的血流从土地中涌出，流向城市，并在那里消亡。然而，人民身体中血的源头无疑是土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农民，农民，根本上就是农民，他们是人民之血更新的源泉。如果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相应的德国国家理念，那么在重建我们的帝国时，可以预期有四项非常有指导意义的重要任务：

1. 我们必须计划和准备一个政治组织，使农民成为新国家的基石。

2. 与几乎所有其他职业群体相比，农民在经济力量的自由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时地利。因此，农民必须得到一定的经济保护。此外，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教育体系必须使农民有可能获得足够的知识来完成他们的任务。最后，国家的任务是教育农民，使他们不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土地上的劳动，而且将其视为对德国人民的一种光荣的义务。

3. 如果农民要成为人民身体血液更新的可靠来源，就必须制定法律，保护家庭，并允许新的农村家庭再次成为真正的根基，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根基。作为回报，农民可以授予国家权利，要求农民之间只允许那些能保证健康后代的婚姻。否则，农民应该成为人民身体血液更新的来源的想法将是空谈。

4. 如果有一股永远年轻的血液从农民那里流向人民的身体，我们也可以说，农民将国家根植于土地之上；庄园和农庄是人民的身体让它的根渗透到土壤的地方。这意味着，可用的地缘政治空间对一个按照有机原则构建的国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如果人要保持健康，空间和人必须彼此和谐相处。今天，我们是"没有空间的人"。因此，对我们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谐，只有不和谐：我们的生存空间太小了!今天在德国，人们非常害怕提到东方问题。然而，德国人民无法避免地要面对这个问题。斯拉夫人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麻木地看着以前纯粹的德国城市被我们的人民遗忘的时候，我们呆呆地看着，心有不甘。为什么过去几个世纪中的其他德国定居点——布雷斯劳、柏林、斯德丁，甚至是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就不应该是这样的呢？但这样做就意味着要铤而走险。德国人民无法避免与正在前进的东方进行生死攸关的斗争。我们的人民必须为这场斗争做好准备。

在这场斗争中，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解决办法：绝对的胜利!此外，血与土的理念赋予我们道德上的权利，要收回尽可能多的东方土地，以实现我们人民的身体和地缘政治空间的和谐。把国家建设成一个有机体意味着肯定血与土的理念：对血的意义的认识使我们重新尊重土壤。但这种认识必须从根本上放弃普遍存在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念。可以说，血与土的概念给德国人民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决定。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到目前为止，有一个政党不仅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些关系，而且有勇气将其意志的方向定舵在一个为生存斗争的国家理念上，并承担一切代价：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运动。

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对这个党的最无意义的指控[它经常被提出！]莫过于它敌视农民和农业。另一方面，我们认识到，"血与土"的概念——这听起来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但其实不然——这表明目前对"农民阵线"的呼吁是错误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国家以前的运作使德国农业陷入了目前的绝境，因为农业相对于的其他职业群体来说，在一个以纯经济观点为基础的国家里永远无法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地位。

《凡尔赛——道斯——扬格》加速了德国农业的衰退现状，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现在，不仅是农业在衰退，而且几乎所有的德国产业都在衰退。今天，组建"农民阵线"就像在一艘沉没的船上建立工会，以便在船沉没时为船员中的每个职业群体争取尽可能平等的经济权利一样“合理”。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农民阵线"，而是一个

"德意志阵线"，这个阵线将首先拯救德国，使其免于破产，并建立一个让德国人感到有归属感的国家。

阿道夫-希特勒已经认识到了这项任务，他成功的秘诀在于他有能力始终如一地、有力地完成和证明这项任务已经完成！

国际的欺骗 罗伯特-瓦格纳

正如世界经济的自由主义幻梦已开始化为乌有，今天，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妄想也在明确无误的命运的猛烈冲击下分崩离析。

马克思主义从自由主义那里继承了国际思想，这一世界犹太人的古老愿望。自由主义整天梦想着他们的世界公民、国际谅解、和平主义和国家联合，而马克思主义则要求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下通过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

种族研究可以证明，所有的国际理念都可以追溯到犹太血统，最终追溯到犹太人。除了犹太人，还有谁会对国际有真正兴趣？组织在国家中的人民当然不会！国际理念对国家的人民来说，意味着危及他们自己的生命和利益，但对生活在国际之上的犹太人来说，则是通往向他们要求的统治世界的道路。

尽管如此，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赢得了群众，更多的是出于它所承诺的社会主义，其次则是它的国际主义愿望，以及其对无产阶级的困境厚颜无耻的利用。

无产阶级已经离开了自己祖国的土地；它在自己人民的物质祖国中没有直接的、个人的份额。自由主义时代不负责任的愚蠢而懦弱的政策剥夺了它的这一份额。因此，犹太人成功地让无产者相信，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祖国。因此，马克思主义也成功地给无产阶级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世界上的无产者相互之间的关系比无产者与有产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民族社会主义将摧毁这一谬论。即使财产上的一无所有者也有自己的祖国，并依靠自己的祖国生活。如果他对土地没有直接的个人份额，那么他所吃的食物、所穿的衣服、为他遮风挡雨的住所、为他提供生活的工作、他的所有物以及他所享受的教育都是他对祖国的间接份额。如果无产者并不直接占有他在物质祖国中的个人份额，这并不是某些人否认或者背叛祖国的理由，而应作为为其争取物质份额而战的充分理由。民族社会主义将走这条路。我已经说过，它的理由不是征用人民，而是让人民重新获得财产。**只有扎根于自己故土的人民才能享有他们梦想的自由。如果今天，千百万民族社会主义者与其民族的物质祖国的联系并不比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更直接，但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却仍高于一切，那么，这就肯定是民族社会主义将战胜国际社会主义的标志。**

不过这也必然成功，因为迄今为止，除了国际犹太人手中的黄金国际之外，每个国际都被证明是违背自然、不真实和无效的。

德国社民党（S.P.D.）或德国共产党（K.P.D.）给德意志的体力劳动者带来了什么？更高的工资？八小时工作制？更多的政治权利？诚然，全世界，特别是德意志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已经说了很多，写了很多，**然而一切所谓的社会成就却实际上都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取得或争取的，而恰恰是其对民族的否定，对于任何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对军事政策的否定，常常是使得体力劳动者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的原因！**然

而，更具决定性的问题是：如今我们所谓的社会成就还剩下什么？高工资根本没成为工资，而是变成了穷人的救济金。八小时工作制变成了零时工作制，即完全失业。政治权利被埋没在社会登记簿和尘封的档案中。德国无产阶级的苦难从未像现在这样可怕。德国的劳动者成了低保领取者，成了乞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成功。当我们被告知这一切都是因为战争失败时，我们不禁想问：国际呢？国际在哪里？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国际不就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妄想了吗？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为阻止战争做了什么？法国做了什么？英国呢？意大利呢？历史的血脉和传统比马克思主义的空想世界更为强大。我们人民在战争前线的共同战斗和共同生活，就是马克思主义道德上的死亡，也是即将到来的民族社会主义人民国家的思想起源。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自 1918 年以来去了哪里？法国、英国的无产阶级为德国的所谓阶级同志做了什么？马克思主义苏维埃俄国的帮助在哪里？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在哪里？我们记得，战争失败后，德国的体力劳动者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了英国体力劳动者的罢工。我们还记得，在 1921 年，德国无产者用他们自己的饥饿换来了俄罗斯无产者的拯救，使他们免于在所谓的苏维埃天堂忍饥挨饿。我们的回报呢？德国人从来都只是外国人的牺牲品。只有他们相信了自由主义的误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因此，今天只有德国人要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买单。马克思主义不了解民族，它只了解自己的所谓阶级。这一点必须说清楚，尤其是在足够多的政治幼稚分子相信，有了社会民主党就能重新赢得德国的独立，有了共产党就能领导德意志人民实现民族解放的时候。

如今，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确主要打着民族的幌子进行宣传活动。例如共产党在 1930 年德国国会大选时提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并一直坚持到现在。而社会民主党人在有人否定民族观念的时候，也会发表民族的和爱国主义的演说，并假装受伤和荣誉受辱。但是，如果民族社会主义没有深入我们的人民大众，那么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也会感到不得不这样做呢？然而，归根结底，最直接的政治思维必然揭穿这些马克思主义骗子的真实面目，即当他们被问及为什么他们的行为不与他们自己提出的民族理念相吻合时。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欺骗人民的学说。它目前在民族外衣下的伪装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有力的证明。然而，它也证明，仍然有足够多的德意志人允许自己被他们欺骗。

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解放德意志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对苏维埃俄国及其军队的完全错误的认识。这样的盲目相信忽视了以下几点。

布尔什维主义在精神上的表现就是犹太精神。假设德意志人民能够通过布尔什维克化，从凡尔赛条约和杨格计划那里获得解放。在解放之后，最受伤的莫过于那些拥有炽热的民族之心但却被迫去加入到布尔什维主义当中的人民。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德国的土地将不再属于德国人民的这一事实。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就像每一种精神一样，需要其天然的血缘基础。但正如苏维埃俄国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表明的那样，布尔什维主义完全是犹太人和外国的。因此，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将要看到的德国，会是一个犹太人和其他外来种族的以及一个非文明的德国。最伟大的雅利安人最崇高的美德曾经在那里安家落户，而现在劣等民族的堕落将在那里蔓延。外在的纽带将被内部的恐怖统治通过非人的专政和杀人政治所取代，而专制和凶残统治的任务只能是消灭雅利安人和基督教的一切。**人的自由将让位于马克思平均主义的野**

蛮横行。总而言之，玩弄杀人的思想是疯狂的，至少在政治上是非理性的。任何一个在政治上值得认真对待的人，会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真的能把我们从凡尔赛条约中解放出来吗？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想要取代自由民主时代的世界观。根据其国际立场，它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民族，而是在威胁着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仍然可以忍受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甚至可以无动于衷地看着亚洲的布尔什维克化，但布尔什维主义对德国的征服意味着对西方国家的直接威胁。然而，这种威胁意味着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西方与东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冲突。因此，德国将成为战场。目前，这场战争的结果毋庸置疑是西方获胜。新的布尔什维主义世界观的狂热以及所谓的俄国军队的价值也不能掩盖这一点。凡尔赛条约将继续生效，而为了执行凡尔赛条约，胜利的西方军队将再次在德国建立民主制度。

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了解民族；相反，它的任务必须始终是消灭民族。这一点也可以从下文中得到证明。即使我们不知道最初的人种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认识到，地球上居住着五个人种，白人、黑人、黄人、棕人和红人，其中可能有两个是混血种。毫无疑问，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例如，白种人是最主要的种族，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即使是其中一个大种族中的各族也不尽相同。在这一点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谁会否认这一点呢？可能只有一个不诚实的人会这么做！这样的差异也是由血缘的多样性造成的。我们民族的文化与黑人部落的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必多说，不过英国文化与意大利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同样显而易见。**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和价值观都与某些种族或民族的存在息息相关。如果我们想保留这些文化和价值观，就必须保留它们的承载者，即相应的血统。当然也不能说民族之间的种族界限可以在精神上弥合！**

正是精神被血缘所束缚。法国人、德意志人、俄罗斯人、犹太人的精神是有本质区别的。与所有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对自然概念的混淆和种族破坏相反，根本不存在国际精神和国际灵魂，而只有国际智慧。而这反过来又与犹太教和与其有关的杂交产物存在于各民族之中，以及犹太教凭借这种智慧征服各民族的统治权力地位息息相关。

犹太民族是一个混血种族；它是由三大种族的血液混合而成的，最初是一个闪米特混血种族，与在小亚细亚的白人、黑人和黄种人曾经有过接触。它通过其种族宗教所要求的近亲繁殖脱离了闪米特人，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知的犹太民族是由白人、黑人和黄种人，尤其是白人和黑人长达千年的血缘融合而形成的。因此，犹太民族带有白人、黑人和黄种人的基因。仅这一点就为犹太人对世界的适应和国际性创造了生物先决条件，这种国际性同时也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性，因为正是这种国际适应性才足以称为犹太人的特殊性。因此，只有当各大种族以犹太人为榜样，通过血缘关系实现融合后，所有人的国际性才能成为现实。

然而，这个国际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必须是犹太性的，因而这个国际也将必然成为犹太民族的国际，尽管打乱人类种族是上天创造的想法令人厌恶和反感，但在犹太影响的领导下，这一想法正在实现。这就是所谓“上帝选民”的秘密所在，他们希望未来整个世界的犹太化，从而实现其统治世界的梦想。犹太人通过向各个民族赋予它的世界观，为他们的精神发展指明方向，从而加速了这一巨大的解体进程，而我们正是这

一进程的见证者。自由主义就是犹太人的世界观。其创始人斯宾诺莎是犹太人，其革命先驱也是犹太人。马克思主义也已经打上了犹太传统的烙印。布尔什维主义是完美的犹太精神。但德意志的保守主义也是犹太人算计的结果；它是犹太人施塔尔的理论。

因此，几个世纪以来，是犹太人决定了白种人的精神方向。

迄今为止，德国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为雅利安种族的核心对犹太强暴进行了最激烈的抵抗。德意志精神和犹太精神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只有德国才拥有创造性的力量，为白种人的精神发展指明新的、捍卫种族的方向。阿道夫·希特勒是雅利安种族的救世主。在他的领导下，德意志仍将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化种族的核心，并将成为这个种族的主心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通过消灭民族的血缘价值观来消解民族的犹太主义学说。民族社会主义则是维护雅利安种族的人民并使其前进和向上发展的学说。如果犹太人认为他们必须杀死别人以保全自己的种族，那么我们的人民就有千百倍的权利，甚至有千百倍的义务杀死他们。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创造的嘲弄，而民族社会主义则是对天意的钦佩和尊重。正如犹太教保证犹太民族在尘世中永生一样，民族社会主义也意味着德意志民族在尘世中永生。

那么，国际在过去背叛了我们的人民，它现在也不能帮助我们，它未来将给我们的种族带来死亡。它的概念不是无产阶级的统治，而是犹太种族的统治。

欧罗巴阵线 SS 手册，1944 年 2 月

这场战争对欧洲人民的影响越严重，就越能激发他们的能量，让他们行动起来。过时的政府观念在这场战争的影响下烟消云散，仿佛从未存在过。凡尔赛条约中人为划分的国家被粉碎，在苦难和眼泪中，一个新时代诞生了。我们只是推动欧洲人民前进的洪流中的一朵浪花。种族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正在撼动欧洲人民，并推动他们进入新的国家生活形态。在布尔什维克扩张的冲击和敌人卑劣的轰炸下，欧洲人民正不可抗拒地团结在一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共同体意识正在形成，而这种意识在过去欧洲唯一明显的繁荣时期从未出现过。将欧洲现在的状况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欧洲各国和人民所经历的状况进行比较是错误的。当时，革命浪潮席卷了落后的欧洲，在反动首相梅特涅的领导下，欧洲缺乏一个明确的理念，奥地利领导下的欧洲国家体系摇摇欲坠，不堪一击。如今的欧洲不再仅仅局限于对过去的保护和捍卫。它意识到自己的日耳曼传统，打破了陈旧的国家边界，将人们团结在一起。旧世界在西方和东方都有敌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只是陈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病态表现。新欧洲由社会主义和种族革命思想的能量所推动。因此，它同时处于防御和进攻的状态：进攻，因为它反对一个病态和过时的世界，而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社会主义不仅是帝国的一个国内计划，它以成就为基础，追求人类秩序，而且超越国家，包含欧洲人民的新秩序计划，以人民价值观的自由发展和历史成就为基础。

帝国理念的力量

如今，在武装党卫军中，有荷兰人、佛兰芒人、瓦隆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不久之后，其他民族也将让他们的青年穿上同样的制服，从而在党卫军的旗帜下组成欧洲阵线。党卫军是应时而生，它为欧洲未来的秩序奠定了基础。今天，当人们遇到武装党卫军中的荷兰人或爱沙尼亚人时，他们会对这个想法的力量

产生怀疑，但这些人比帝国内部的许多德国人更狂热、更坚定地拥护帝国思想。因此，我们认识到，这些人在东方的服务是帝国思想的钢铁浴。这些人与德意志帝国党卫军一起在东方**与布尔什维克作战**，他们抛弃了一切，包括那些仍然阻碍着没有经历过独特而艰难的战地生活的当代人的偏见。在与我们最艰难的对手的斗争中，帝国思想以其光辉之美重生。一种欧洲共同体意识正在形成，它不再像政治家们那样对陈旧的国家理论犹豫不决。这些欧洲志愿党卫军领袖和党卫军士兵是欧洲战线的先锋。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因为热爱祖国，他们内心深处忠于祖国，所以他们希望以一个新世界作为战争的奖赏，这个新世界由强大的帝国来组织，只有帝国才能拯救他们的祖国，保护他们民族的生命。当然，这些人只是他们民族中的少数。然而，世界历史总是由少数敢于尝试新事物的人创造的。犹豫不决是后来的事。人们必须翻阅一位志愿者的家族史，才能感受到帝国理念对这个年轻人的影响。例如，有一位弗莱明人。他在武装党卫军中作战。他的父亲是比利时殖民地的高级行政长官，现在为英国效力；他的祖父是比利时议会议员，是法国文化的狂热拥护者，反对家乡弗莱芒人的反对。他的孙子拥护德意志帝国和阿道夫·希特勒。这是多么鲜明的时代对比！元首的人格魅力多么强大！祖辈们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都远离这个帝国，而他们的子孙却宣称愿意为这个帝国而死，这说明了帝国和血统观念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党卫军的欧洲使命

党卫军正在逐渐承担起欧洲使命：它集结了觉醒的欧洲青年，共同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财阀。 任何认为党卫军因此丧失了原有特征或背离了帝国严格原则的人，都不了解席卷民族国家边界的民族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无论战争如何结束，当今欧洲没有人相信凡尔赛人为的国家体系会卷土重来，这种体系的存在完全是因为英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可以理解的是，这场战争的影响抹去了历史发展的表象，而历史发展往往只持续了几十年，现在欧洲大家庭的共同根源再次显现出来。日耳曼人的游牧生活以及从前在波罗的海、黑海、大西洋和北非之间的日耳曼人定居点，形成了欧洲的血统统一，并创造了我们所说的欧洲文化。这些民族的新秩序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和英国没有建立欧洲大陆政治新秩序的真正计划。他们今天已经把欧洲视为殖民地，打算在经济上加以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欧洲也毫无建树可言。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真正的民族，就像它无法接受“血统”这个概念一样。只有民族社会主义肯定了每个真正民族的根基。它知道，只有忠于祖国的人才能忠于帝国。阿道夫·希特勒的革命社会主义对欧洲而言，不仅意味着根据欧洲人民的历史成就和参与当前斗争的情况来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从这一运动的世界观中，就可以看出欧洲人民和国家与强大的德意志帝国领导层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密联系所具有的创造力和丰富内涵。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欧洲内部和外部的秩序只能来自民族社会主义历史观的深度。党卫军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铁环，环内的人怀着满腔热情，渴望在强大的日耳曼中部的领导下建立欧洲新秩序。没有这些人的参与，新秩序就无法诞生。我们的大陆仿佛被高烧所震撼；这是新时代的阵痛，它希望从欧洲民族大家庭的血液共同体和共同生活的社会主义秩序中崛起。

无论命运将我们引向这个目标的道路如何，无论我们可能遭遇怎样的挫折，目标本身是坚定不移的。这是唯一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党卫军知道，必须利用一切手

段，让欧洲东部的同志与西部的同志一样，共同成长为一个奋斗的共同体。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采取明智的处理方式，并发挥巨大的能力。党卫军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在完成实际任务时，要富有创造力和慷慨大方。党卫军必须足够灵活，根据每个民族的性质和历史来对待他们。我们的任务是将欧洲青年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坚强而坚定的战线。西方敌人不会为了更美好的世界而牺牲，因为他们不认可这个世界。东方的敌人只会给人民带来压迫和堕落。如果存在不可剥夺的人类价值，那么它们将由德军阵线来捍卫。我们这边有一个新的理念。如果我们保持坚强，并意识到这场斗争的全部历史责任，那么命运的天平最终会倾向我们这边。

血与土 瓦尔特-达雷

1. 血与土的统一

在科学关注于抽象地创造自然和历史生活所有结构的一般性和统一性的时代，国家被定义为国家权力、国家人民和国家领土的统一体。今天，我们必须加深对国家权力、国家人民和国家领土之间内在联系的理解，这种联系在每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即使这引发了人民与土地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仍然远远没有理解血缘和土地的统一，这是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国家的根基。对于血和土，我们不仅将其视为国家两个先决条件的外部联系，而且根据日耳曼人的世界观，它们以氏族和农场的形式形成了相互支撑的联系，构成永恒、持久的法律统一体。血和土的法律统一体对我们的人民意味着什么，以及在未来意味着什么，可以通过与游牧民族的法律进行对比来阐明。“

2. 对比：游牧民族

有些民族看待土地的方式与看待坚果/营养素的方式并无二致，即使只是暂时的，无需长期付出劳动。这些民族在任何土地上都能茁壮成长，只要能以任何形式进行有利的开发。因此，他们可以根据指导原则改变自己的位置：哪里好，哪里就是你的祖国。其他民族则与特定的土壤紧密相连，就像树木一样深深扎根于其中，只能冒着危险移植到不同的土壤中。

“——草原和沙漠是有利于这种易变类型形成的景观。它通过为牧群提供牧场和可供狩猎的猎物来养活人类。牧场根据气候和季节的变化而变化，迫使牧群改变牧场。人们跟随他们。他们是游牧民族，即流浪的牧民，被迫在草原或沙漠上使用无需播种即可生长的牧场，无论它在哪里。在这种游牧生活的基础上，流浪部落形成了特殊的宪法，即特殊的法律。

在沙漠、草原和冻原上，个人无法离开部落，而牧群从一个牧场迁移到另一个牧场，这使他与部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使他作为个人变得无助。这使他无法与自己的部族建立独立的个人生活，因为他无法坚守土地，为自己的家园打下基础。不断迁徙决定了部族必须遵循的生活方式，并迫使个人遵守法律，这是他和部族必须遵守的外在要求。

3. 农民与土地，这是财产法的基本关系

对于在其土地上坚定地以农民身份立足的各国人民来说，法律则完全不同。农民收获自己土地上的果实和牲畜的产量，这些并非仅仅是自然的馈赠，而是自己劳动的收获，

并非不劳而获，而是自己与自然力量共同激发和培育的成果。他并不觉得依赖部落，依赖整个人类，因为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他们必须通过突袭或集体狩猎为每个人提供战利品；相反，农民与他的土地和牲畜有着个人关系，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和照顾来服务它们。很明显，对于这个农民来说，财产的含义与游牧民族对猎物的占有完全不同，后者由部落分配，就像股东分红一样。

我们看到，农民的财产包括义务和权利、服务和拥有以及自由责任。战利品不会给领导者带来任何义务，因为它不是为了永久维护，而只是为了享受，也不会为如何处理战利品提供指导。因此，在未发展完善时，战利品权只是随心所欲处置战利品的权利，随着民法典的出现，这一法律概念已成为一般民法的财产概念。但游牧民族对分配给他的战利品的权利，以及农民对其农场和农田的权利，才是我们眼中所有创造性劳动与其工作之间关系的典范和基本概念，因此也是所有权概念的起点和形成的基础。权利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享受和消费，还包括维持创造生命的力量：所有者对其可支配资源的责任，无论是土地和牲畜、企业还是其他工作，以及通过这些资源为所有者提供的服务和维护。对于这种负责任的所有权概念，农民的贵族继承权再次成为指导原则。……[节选]

20、民族社会主义农民法

农民对自由资本主义崩溃后幸存思想的冲击试图通过国家资金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帮助农民的做法并未取得显著成效。他们向农民，尤其是负债的业主提供了帮助，使其免于土地被收回的威胁。但他们为新债务敞开了大门。农民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下生活，就像生活在异国他乡。

股票交易价格决定了单个生产者可以赚取多少，只有流动交易商才能蓬勃发展，而受制于固定自然条件的农民则无法生存。

德国农业的生存取决于能否根据农村经济的需求，组织与德国农业相关的整个经济，或者农民作为农民或佃农，是否必须完全转向特别适销对路的商品的商业生产，从而让大片土地荒芜；农村人口外流规模未知。，还是农民作为农场主或佃农必须完全转向特别适销对路的商业生产，导致大片土地荒芜；农村人口外流规模将不可估量。这不仅仅是将农民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的问题。农民阶级的生存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其他经济部门现在适应了农民经济的需求，就像农民经济以前由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决定一样。农业与整体经济紧密相连。农民阶层只能由整体经济来保护，因为整体经济尊重农民作为农产品购买者和信贷提供者的基本需求。这要求对农产品市场和农业信贷进行整体监管。

因此，农民的基本需求使得改变整体经济结构成为必要。农民成为攻击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世界的起点。然而，对经济结构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不仅是农民的生存，还有整个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德国 600 多万人的失业和绝大多数现有企业的衰落让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点。自由放任政策的彻底失败、对经济事件发展过程的不作为，都变得显而易见，要求国家为不负责任的经济体系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并要求国家前瞻性地控制未来的经济。民族社会主义重新确立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承认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注定要为人民服务，因此需要国家指导才能完成其任务。

基于元首的这一洞察力，民族社会主义得以重建经济并激发其中的创造力，而此前，这种创造力因无谓的自我毁灭而陷入瘫痪。保障国家粮食供应是重建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将农业与农产品的消费置于计划关系中，才能确保全国人民的温饱。这意味着从农民到消费者的路径免受不负责任的投机商的影响，价格由农民的固定需求和消费者的固定购买力决定，而不是由不可预测的投机游戏决定。农业政策证明，国家并未以任何方式干预真正的经济进程，而是纠正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造成的整个经济瘫痪。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仅受其自身幻想的阻碍。

21. 民族社会主义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则：

民族社会主义的土地政策并非旨在实现农业的最高利润，并利用各自的经济形势来提高价格，而是为了满足德国人民的需求，并为农民提供维持生计和养家的合理收入。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取消农产品贸易在定价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只要定价权掌握在贸易手中，就无法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是由贸易商自由操纵，而贸易商作为参与者，都依赖于游戏规则，无需承担责任。

为了巩固农产品贸易，使其承担起应有的分销任务，有必要防止证券交易所和自由市场经济让每个交易者相互竞争，并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竞争。因为这样一来，贸易或多或少地分解为众多个体交易者，他们最终在盲目混乱中追逐意外利润。民族社会主义的农业政策取代了这种混乱，制定了一项涵盖农产品从农民到消费者整个流通环节的法令。这种制度允许个人在其职责范围内完全自由地采取行动，但防止个人在其职责范围之外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有害影响。首先，民族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将所有参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营销的个人、协会和企业组织起来，其次，要求为其相互之间的自由市场关系建立固定的框架。从事农业或农产品营销的人员、协会和企业均被纳入帝国农业协会。市场调节为其相互间的市场关系提供了框架。

22. 市场调节与帝国农业协会的结构

市场调节的目的是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从而稳定消费者供应，同时确保农业获得固定收入。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确定农产品的固定价格，根据当地条件和市场记录方法（例如从土地交易中购买磨坊）确定不同的价格。另一项措施是将土地交易和农产品加工和制造业的企业合并为协会和经济联盟。帝国食品部长亲自下令合并或授权相关团体成员在自治和自负盈亏的基础上进行合并，这意味着所成立的协会可以调节价格、价格水平和价格幅度。其目的是在农产品公平价格的基础上建立加工和贸易的各个阶段。由于该法规的细节，请参阅本作品第三卷《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秩序》。

整个市场调控的基础是帝国农业协会本身的结构。它不仅接管了农业本身，包括其原有的经济政治组织和公法专业协会以及农业合作社，还接管了土地交易（批发和零售）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因此，帝国农业协会是一个大型自治组织，涵盖了为国民提供食物的经济分支。帝国农民领袖（目前兼任帝国粮食和农业部长）领导帝国农业协会。他有一个办公室，协助他处理基本事务和制定官方法规。帝国农民领袖的常任代表是帝国主席。帝国农业协会整个自治机构的中央办公室是行政办公室。

此外，帝国农业协会还按地区划分。最小的单位是当地农业社区，其次是地区农业社区。若干地区农业社区（通常是省或国家的地区农业社区）组成全国农业社区。这个自治组织的领导层基于领导原则。帝国农业协会的领导层，从地方农民领袖、地区

农民领袖、州农民领袖到帝国农民领袖，通常都是农民或农业专家，以荣誉身份担任官方领导职务。其中也有帝国农业协会的公务员和雇员，他们以本职工作为主。帝国农业协会（Reichsnährstand）的自治机构分为四个主要部门，包括中央行政办公室和每个地区的农民社区。第一部门负责帝国农业协会（Reichsnährstand）的成员及其相互关系。在此背景下，应该强调的是，帝国农业协会（Reichsnährstand）不仅包括独立的农民和农民，还包括所有从事农业工作的人，特别是农业工人和农业雇员。第二部门负责农业的技术推广。其活动领域包括前农业商会的工作。农业合作社归入第三部门。第四部门负责农业贸易和农产品加工。

23.《帝国遗产法院法案》中关于农业社区的规定

民族社会主义的农业政策将农民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中解放出来，为基于农业社区的经济奠定了基础，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实现稳定生产、稳定销售和固定价格。然而，只有农民自己摆脱自由资本主义思想，这种经济政策的措施才能长期实施。如果农民不回归与土地和血液紧密相连的农村生活方式，那么农村经济哲学（其目的不是追求利润，而是保护整体）如何成为重建我们经济的基础！在许多情况下，农村习俗得以保留，例如作为世袭习俗。农场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们并不要求获得农场价值的一小部分，因此他们没有将农场视为可分割的资本，而是估算其盈利能力，并根据所谓的兄弟姐妹的天数计算农场继承人应支付的金额。但在这里，法律也没有限制个人的主张。因为农民受民法典约束，而民法典是为城市交通量身定制的，甚至不再承认“农民”这一术语。如果这部法律适用于农场，那么农民的孩子应该拍卖农场，以便作为继承人平分收益，这也是“正确的”，债权人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将农民驱逐出他的土地，而无需考虑农民的支付能力，而且价格与农民的土地价值相比微不足道。任何犹太人都可以购买农场，任何农民都可以将农场卖给任何人，无需征得继承人的同意。如果恢复旧农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那么农民首先要做的是重新制定自己的农民法，并建立法院，农民可以在法院寻求并宣布农民正义。

因此，制定单独的农民法和单独的农民法院成为整个农业政策的基础。重点不是根据个人的某些想法或理想制定新的法律，而是恢复法律的有效性，因为法律在长达一千年的德国历史上为农民指明了方向，只是后来被外来法律和个人主义思想所取代。《帝国传统农场法》更新了日耳曼农民法。该法旨在维护农民家庭，并保障其在整个国家面前的责任。因此，人们可以感受到并认识到该法律具有直接约束力。《帝国遗产农场法》恢复了农村性别和农村土地的旧权利。只要农村能够产生合格的继承人，就不能将农村性别与农场分开。农村土地不能转化为金钱。它从根本上和外部是分开的，不受货币索赔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影响。在土地法规定的期限内，血缘和土地再次联系在一起。

24. 农民的荣誉

农民的荣誉不仅仅是职业荣誉或阶级荣誉；因为农民不仅仅意味着从事某种职业工作，也不仅仅意味着为了国家的利益与他人一起通过某种工作形成一种职业。作为一个农民，其意义远不止于个人的工作生活。

一个人生来就是农民，作为农民，他要在自己的农场抚养后代，并让那些不继承农场的人做好生活的准备。即使是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之子，也继承了农民的本性。作

为一个农民，其意义涵盖与土地息息相关的人们的整个遗传、经济和文化生活。过去，这种整体性被瓦解了。在历史进程中，农民失去了除耕种土地以外的所有责任和技能，因此他只能继续当农民。早在中世纪早期，政治领导权就从农民手中转移到了其他阶级。历史知识成为用拉丁语写作的僧侣们关注的问题，法学成为受过法律教育的罗马人的秘密知识。经济和市场管理完全掌握在城市和贸易手中。庄园主决定谁是继承人。

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农民重新获得了属于农村整体生活的权利。通过《帝国遗产农场法》，农民在重要事务上的管辖权也重新转移给了农民：继承管理局、继承法庭、负责二审的继承法院以及帝国继承法院均由农民和律师组成，继承法庭中，农民和律师各占一半。农民精神在《帝国遗产农场法》的引言中有所体现，对司法管理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根据该法，农民荣誉涵盖农民的所有行为和思想。它还决定了农民与全体人民的关系。农民的任务是确保人民的营养。帝国农民协会负责向元首汇报任务完成情况。农村经济政策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充分体现其意义。它必须保证德国人民能够自由地养活自己，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其独立于外国。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分配的控制，即对市场的调控，是出于所承担的责任。这也限制了农民的产品价格。

根据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与往年的丰收相比，1934 年的歉收本会导致该体系交易所的粮食价格暴涨。农业界的责任感要求谷物价格不应高于德国工人能够负担的面包价格。从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场来看，农业界做出了难以理解的牺牲。对于农业界而言，这意味着将自己融入整个国家，为国家服务。通过这种方式，农业界成为了德国社会主义的支柱。由于这种态度是出于对整体保护的农村精神，因此我们今天可以说：德国**农民的荣誉就是他的社会主义。**

通过农民的社会主义责任和荣誉，农场所有权有了自己的意义：农民不能像民法典允许的那样对待它。他必须妥善管理农场，供养家人，并让家人继续留在农场工作。因此，农民不能随意出售农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出于重要原因，农民才不得不出售土地。农民法庭（即世袭农民法庭）负责裁定是否存在此类情况。因此，任何土地的出售都需要获得法院的同意。如果农民不能妥善管理自己的事务，就会失去继续从事农业的能力。全国农民领袖可以向法院申请剥夺此类农民的继承权。如果一个劣质的农民被剥夺继承权，他就失去了对农场的管理和使用权，不能再称自己为农民。农场的管理权随后将转移给前农民的配偶或下一任 Ahnerbe。如果没有能够耕种的继承人，则可以根据帝国农民领袖的要求，收回农民对祖传农场的所有权，并将其转交给由领袖提议的能够耕种的人。这项严厉的规定旨在维护农业社区内部的纪律，从而维护农业荣誉。

25. 农村信贷和农村债务

农村荣誉也决定了农民个人与其经济交易伙伴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体系崩溃的情况下，基本上只有所谓的农业开发土地不动产信贷。这种信贷以抵押或土地抵押的形式，涵盖了土地在拍卖时可能实现的资本价值。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导致土地价格波动，当土地不再能带来任何收益，只剩下债务和税收时，土地最终几乎变得无法出售。因此，房地产信贷的“安全性”最终被证明是虚假的。抵押所涵盖的土地的资本主义销售价值几乎完全消失，债务远远超过了拍卖所能实现的收益。鉴于贷款资本已经损失，即

使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无法通过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来清算全部农业债务，因此国家不得不进行干预。

根据农业债务清算计划，东方定居援助、免于执行以及债务减免等措施有助于减轻前农业体系带来的债务负担。从民族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现在允许债务以旧的方式再次发生，并且新的信贷建立在崩溃的“实际担保”系统上，那将是不负责任的！如果迄今为止的实际信贷之路不再通向任何地方，那么帝国遗产法中规定的农村法律则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农民的信贷现在基于其农场的长期盈利能力、农村经济的稳定存在以及农民的信誉。农民的信誉保证了他会妥善管理农场。否则，他面临农场被分割的威胁，而另一位必须具备资质且能妥善管理农场的农民将取而代之。这确保了农场能够产生稳定的收入。

市场调节确保了他们能够以固定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当农场被继承时，它不能再被分割，因为它会全部传给一个继承人。其他继承人的维护权是基于农场创造收入的能力。因此，没有其他业务能像继承的农场一样可靠地保证债务偿还。过去，每个债权人必须考虑到农场落入他人之手、被取消赎回权或破产的情况。因此，他试图通过登记抵押来获得土地资本价值的权利。然而，这种价值是抽象计算的，被证明具有欺骗性。农场仍然是农民收入的永久基础，并确保农民获得贷款和债权人收回债务。当然，债权人不能无限制地提供信贷。“债权人”和“信贷”这两个词来自德语“glauben”（相信）和“vertrauen”（信任），指的是贷款人的责任。如果农民未能履行其债务义务，即使他如果管理得当本来是可以做到的，继承法庭可能会应全国农民领袖的要求，永久或暂时撤销农民对继承农场的管理和使用权，即驱逐农民。同样，地区农民领袖和农村法庭掌握着农民的荣誉和对失职业主的权力，这也确保了农民履行《帝国遗产法》规定的义务放弃继承权的继承人：他必须为继承人提供生活费，直到他们成年，并提供教育和嫁妆，使他们能够独立生活，具体金额和限额由农场的收益决定。

26. 德国农民的新组成：

《帝国继承农场法》涵盖所有构成营养供给且属于能够耕作的唯一所有者的农业企业。

耕作能力要求：德国或类似民族血统、德国国籍、农村荣誉和妥善管理农场的能力。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项资格，则该财产尚不构成可继承的遗产。如果将不属于有资格耕种该财产的人的财产、或所有者不是德国公民或犹太裔的财产、或属于多个所有人的财产转让给有资格耕种该财产的人，则可继承的遗产数量将增加。

分割这种占地超过 125 公顷的大庄园，因此不能成为世袭农场，也可以用来创建世袭农场。通过定居点建立新的德国农业社区比通过自由处置各自所有者来建立新的世袭农场更为重要。世袭农场的法律直接指向未来。封闭的农场继承制导致每一代农民的儿子都无法继承祖传农场，而渴望拥有新的土地。定居的任务是为这些农民的儿子创造土地。此外，所有可以被视为定居者的人都是那些原本来自农村、过去曾从事农业劳动或其他职业，并保留农村生活能力的人。

根据《帝国遗产农场法》，农民注定是德国人民的血脉之源。这意味着我们肩负着三重任务：首先，重要的是要保护农村生活方式，从而保护纯粹生活在农场中的农民身上的北欧血统；因为血缘和土地的传承是人民持续生存的持久基础。**其次，通过增加**

农村就业机会，让更多北欧家庭过上符合北欧生活方式的农村生活，从而提高北欧血统在人口中的比例。最后，农业社区为铸造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铸造工人是城市和其他行业得以生存的基础。在这三项任务中，德国农民的新组成处于中心位置。对于定居者来说，这是他们承担起德国农民全部任务的开始。

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土地政策的定居问题受到了特别关注。它从血缘和土地的统一开始，又回到这种统一。

节选自《纪律与秩序——民族社会主义伦理基础》

“如果父母教养良好，那么他们也能够生出教养良好的孩子。” 歌德

根据刚才所说，性欲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好像它站在塑造社会的力量之外，相反，它必须被纳入其中并为社会服务。神希望我们不要自由地传递我们的基因库，而要让强大的欲望强行影响我们。然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永远不可能是不受约束地追随自己的欲望，相反，他必须在斗争和紧张的情况下，将其用于服务于德国人民及其发展。在这个领域，没有权利过上充实的生活，只有一种高级秩序，一种适度和有纪律的责任。只有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逻辑地教导了这一点——能够将自己和自己在人民中的地位与自然秩序区分开来——才能在这个领域要求“自由”——这是放荡。我们越是把人民视为一个社会单位，**人民的促进和健康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任务，我们就越有义务使性生活适应人民的生活。**

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一个生活问题像性生活问题一样需要如此大量的重新安排和重塑，同时又如此具有争议性。在广大民间，仍然存在着一种禁欲主义的中世纪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性是污点和原罪，而他们的反对者则认为，任何与性有关的道德要求都是虚伪的。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自我保护的本能——它把我们拉向在生存斗争中无情地践踏每一个邻居的方向——尽管如此，它并没有阻止人们的形成，相反，它通过秩序、法律和习俗得到了升华。因此，性欲也应该适应人们的更高生活，这并不是因为它应该被视为“邪恶”或“有罪”，而是因为对性欲的适度约束是人们自我保护的需要。北欧民族的人们认为婚姻是一种生活形式，其中性服务于更高的生活秩序。因此，我们绝不能将这种浪漫主义归咎于塔西佗的观点，众所周知，塔西佗极力赞扬日耳曼人的贞洁。为民族社会服务的生活要求，也要求我们今天的生活。

婚姻是民族的生殖细胞。这句话无论被说得多频繁，以前却很少实现，但绝不会失去其有效性。婚姻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延续而多生孩子。只有在众多兄弟姐妹中长大的孩子才能早日学会融入由共同血缘决定的最小社区。在这里，自私的冲动首先被压抑，在这里，相互体谅和互利互惠是早期学会的。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只有在家庭中才能养育孩子——这比一般人认为的要重要得多，因为只有在这里，通情达理的母亲才能引导孩子忍受每个孩子都会经历的痛苦，独立生活，从而赋予孩子内心的坚定。当然，孩子们可以在国家收容所里以同样的价值观长大，但没有人比真正的母亲更了解自己的孩子。**母亲在母爱的陪伴下进行的必要的艰苦训练是无可替代的。**

如果婚姻是民族文化得以发展的基本价值，**那么夫妻的道德品格——婚前、婚内和婚外——必须坚定不移。婚前、婚姻和婚外生活不应拥有各自不同的价值，男女的价值观也不尽相同，相反，这三者必须服务于同一个伟大的任务。**在自由时代，婚前生

活领域撒的谎从未如此之多。认为应该告诉女孩或年轻男子，性欲的觉醒也需要立即得到满足，否则会导致健康问题的观点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没有什么比无节制的放荡或拙劣的唐璜更可怕的了。谁在这里早早屈服，谁就会很容易屈服于其他无情的荣誉和责任生活要求。就像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我们通过紧张和放弃变得更强大、更坚强一样，在这里也是如此。我们当然可以要求，对于二十五六岁的男女来说，禁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健康的婚姻来说，禁欲也是完全可取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还必须重新学习很多东西。拒绝年轻男子最热情的追求的女孩不应该被男人视为冷漠、无情、令人厌恶的布伦希尔德类型，相反，她们应该在男人眼中获得价值。长期而持久的追求应该是新德国男人的抱负。男人应该摆脱这样一种粗鲁的观点，即女孩的抵抗只是为了或多或少地被武力打破。最坏的男人并不是对女人，尤其是对未受伤害的少女时代保持着神圣的羞怯。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对永恒生育的猜测，其中个人人类伴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关于性问题的笑话应该在男人和女孩之间消失。**因为我们侵犯了我们的母亲，所以把给予我们生命的行为当作下流的玩笑，这是一种不光彩的下流行为。

以前所谓的双重标准的观点也是欺骗性的，这种标准要求女孩在婚前保持贞洁，而要求男人则不要求。即使女孩是接受者而男人是给予者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为不同的标准提供了正当理由，但自然差异并不意味着女孩和男人在道德品格方面存在根本不同的观点。如果双方都未受到影响地步入婚姻，那么双方都会给对方一份快乐的礼物，这份礼物存在于灵魂中，因为身体和心灵是不可分离的。

谁不提倡这种风度，谁就不能同时要求德国民族在种族上得到改善。如果女孩和男人深深地被自己是民族细胞的想法所束缚——他们希望用一生的努力来改善这个民族——那么他们就不能毫无节制地生活。他们必须从小就实行最严格的自律，就像他们希望锻炼身体以在体育运动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一样。如果男人和女人没有自律，选择氏族中含有劣势的伴侣，那么通过国家法律消灭基因劣势的后代又有什么用呢？以前，浪漫的爱情完全是由所希望的个人的美貌所滋养的。在未来，我们不会只看到身体、智力和其他优势的个体男人和个体女人，**我们还会观察兄弟姐妹、父母和亲戚，看他们是否能保证血液健康。**

未来会要求民族社会主义者做出多大的牺牲啊！**如果母亲的一个孩子受到预防基因病后代的法律的约束，她将无法逃脱民族社会主义法律的制裁。许多激情必须被克服，因为我们改善民族的意愿要求我们这样做。**这是我们可以努力实现的最高目标。我们希望在种族上变得更好，但我们希望将必要的选择分配给国家法律，而不是分配给我们生活的强制性法律。育种和选择的概念已被提升到道德和责任的领域。没有人可以贬低它们，除非他打算违背神的命令。

非婚生子女

婚前贞洁的要求绝不意味着缺乏**共同贞洁**这一快乐礼物的婚姻应该被诅咒。应该强调的是，在高要求及其实现中，婚姻双方都拥有一个无限牢固的支柱，这样，每一段婚姻，就像生活一样，必然会带来许多冲击，就更容易承受了。在非婚生子女的判断中，绝不应该声称每个未婚母亲都应该被抛弃，蒙羞受苦。我们不想自欺欺人：

许多女孩被认为是“光荣的”，因为她们找到了一个“聪明”的男人，或者因为她们自己很“聪明”，因为她们知道今天很容易获得的避孕秘诀。但其他人，在陶醉于当下或激情狂喜中忘记了自己，被认为是不光荣的，因为她们生了一个孩子。这一点必须明确说明。必须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难题：谁的地位更高，是与自己激烈斗争失败的女孩，还是献出自己生下孩子的女孩，还是屈服并实施避孕的女孩？我相信，相关列表的顺序包含了他们的价值程度。但让我们防止过早下结论！并非每个男人都是歌德、赫贝尔或赫尔曼·伦斯，即使许多男人非常乐意称他们为榜样来美化他们的行为。并非每个德国女孩都是克里斯蒂安·沃皮乌斯（Christiane Vulpius）或伊莉斯·伦辛（Elise Lensing），并非每个女孩在“堕落”之后依然伟大。

就我国民间大多数人的道德观而言，必须就非婚生子女问题作出如下陈述：由于我国民族出生率下降，主张非婚生子女应得到提倡，每个女性都应该生孩子，无论是否在婚姻之内，否则她就不是民族社会中具有充分价值的成员，**这种说法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每当领导人表达这一点时，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理解为最纯洁的理想要求，而不是对无拘无束生活的呼吁。这也将是对数十万德国女孩的侮辱，她们的未婚夫在世界大战中牺牲，因此她们像数十万母亲一样做出了牺牲。

“非婚生子女”的概念当然不包括婚前所生的子女。在德国许多地区，子女出生或女人怀孕是缔结婚姻的先决条件。但一般来说，在这里，不娶女人的年轻人也会受到鄙视和蔑视。

我们必须把非婚生子女及其地位放在与看待我们整体道德观相同的背景下看待。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类非婚生子女：

第一：孩子是在婚外出生的，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结婚。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些孩子可能很好，但他们不会在婚姻中长大。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会被送给亲戚；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会被送到陌生人那里。这样的孩子不知道母爱，因为母亲可能有工作，也没有兄弟姐妹。婚姻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教育共同体，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对这样的孩子产生影响。

第二：男人不娶女孩——要么是出于轻浮，要么是自负，要么是无聊。但是，哪个有自尊心的女孩会把自己交给一个不尊重她的男人，与他共度一生呢？正是以北欧为主的女孩只在婚姻中看到爱情生活的满足，为了自己，她们不会尊重那些因为上述原因而试图逃避这种满足的男人。但是，和第一种情况一样，孩子将退居第二位，她的生活将由母亲的痛苦所主宰，因为男人没有在她身上看到她身上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在她看来是实现她人生的最高价值。

第三：私生子是由一位不加思索就将自己献出的母亲所生。这种情况最为常见。因此，孩子不会从任何一方继承最高价值。因此，声称私生子的污点首先是由教会植入德国民族的，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相反，健康的民族判断是正确的，即大多数私生子的父母在最佳品格价值观方面并不堪称典范，因此也不会成为最有价值的民族同志。

但即使是这些私生子，命运也把他们召唤到了这个世界上。因此，**盲目地让私生子处于不利地位是错误的**，相反，父母双方都应该比以前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的立法以前完全不符合民族社会主义，因为它认为私生子只与母亲有关，或者母

亲的社会地位单独决定了抚养费的数额。根据资产阶级法律，一个工人阶级的父亲必须为一个富商女儿的私生子支付一笔不可能的钱。但在相反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女孩将不得不接受一笔来自上层阶级的父亲的微不足道的报酬。在这里，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首先要确保私生子不仅与母亲有血缘关系，而且与父亲也有血缘关系，并有权继承父亲的财产。当然，私生子不应该比合法的孩子过得更好；从法律上来说，这甚至不应该被视为相同。

这些要求必须在我们民俗条件的新发展中得到明确表达。也许其他人可以对婚姻的纯洁性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过着不那么拘谨的生活，但仍然不会堕落。德国人承受不起这一点。德国历史上的衰落时期同时也是道德生活品格最松懈的时期。任何经历过 1918 年 11 月 9 日和随后几周在德国经历的人都知道，这场毁灭性的起义对许多人来说，其主要意义在于摧毁了“虔诚羞怯的束缚”。在对德国人有价值的健康生活品格方面，我们只需做与德国十一月人所做的相反的事情。这样我们就会走上正确的道路。

生命法则——我们世界观的基础

“人类试图反抗大自然的铁律，从而违背了人类存在所应遵循的原则。因此，人类反抗大自然的行为必将导致其自我毁灭。”

生命法则

地球上的生命遵循着铁律：出生、成长、成熟、衰老和死亡构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并且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存在于我们心中。**这些法则适用于所有生命**，包括人类、动物和植物。此外，我们必须用以下词语来回顾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这些词语包括：**生存斗争、选择、生育、种族、遗传、环境影响和发展。**

为生存而战

任何生物都必须为食物和繁衍而斗争。在生存斗争中，必须维护自己的权利。生存斗争由三个因素决定：

1 天敌

2. 实际环境（气候等），

3. 其自身特点

在生存斗争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谁在这场斗争中消灭更多的人，谁就能维护自己的权利。

“谁想活下去，就让他去战斗，在这个永远斗争的世界里，谁不想战斗，谁就不配活下去。”

人类生活中的生存斗争不应与缺乏顾忌、施展空间、剥削等混为一谈。这些都是无能、不合群、堕落的表现。生命为这一法则增添了自然的社区意识或社区本能。

和平主义是对斗争法则最强烈的否定，精英是什么意思？

生存竞争导致优胜劣汰。那些自立门户的生物得以生存，并能繁衍后代，而那些不适合生存的生物则会被消灭。

“如果你太虚弱，你就不能成为一名铁匠。任何手指笨拙的人都无法成功地从事精密机械师的职业。许多职业需要特殊的智力。因此，人们可以普遍地说，几乎所有职业的成员都是不同方向的精英群体。”

生育能力意味着什么？

对于某些物种来说，它们的生育能力是生存斗争中唯一有效的武器。它们只有成群出现时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生育能力在民族冲突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东方目前的讨论表明了**一个民族的生育能力可能对另一个民族造成的危险。**最重要的是，高素质的民族必须遵守这条法则，否则他们就会注定灭亡。

“但最终，这样的民族终有一天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因为人类可以暂时违抗永恒的保护法则，但报复迟早会到来。更强大的一代将赶走弱者，因为对生命的终极追求将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个体所谓的人性所造成的所有荒谬的桎梏，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的人性，这种自然的人性摧毁了弱点，让位于力量。

前后汉书选 班固 范晔

西羌

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郡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民所侵夺，穷恚无聊，故悉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宜明威防。”世祖从之。十一年夏，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年，武都参狼羌反，援又破降之。永平元年，复遣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滇吾远去。余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辅。章和十二年，金城太守侯霸与迷唐战，羌众折伤，种人瓦解。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永初中，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民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同时奔溃，大为寇掠，断陇道。

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不能制，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副将五营及三辅兵合五万人屯汉阳。骘使尚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战于平襄，尚军大败，于是滇零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寇抄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朝廷不能制，而转运难剧，遂诏骘还师，留任尚屯汉阳。复遣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仁战每不利，众羌乘胜，汉兵数挫，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渡河。使北军中侯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

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

论曰：中兴以后，边难渐大。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倥傯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而鸟惊。故永初之间，群种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凌斥上国若斯其炽者也。呜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远诸华，薄其贡职，唯与辞要而已。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

马援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故微子垂泣于象箸，辛有浩叹于伊川也。

鲜卑

熹平三年，夏育为护乌桓校尉。六年夏，鲜卑寇三边。秋，育上言，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帝乃拜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议郎蔡邕议曰："书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猃狁、蛮荆之师，汉有阗颜、瀚海之事，征讨殊类，所由尚矣。然而时有同异，势有可否，故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齐也。武帝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征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积，藉天下之余饶，数十年间，官民俱匮。既而觉悟，乃息兵罢役，封丞相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武帝神武，将帅良猛，财富充实，所拓广远，犹有悔焉。况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乎？昔段颎良将，习兵善战，有事西羌，犹十余年。今育、晏才策，未必过颎，鲜卑种众，不弱于前，而虚计二载，自许有成，若祸结兵连，岂得中休？当复征发众人，转运无已，是为耗竭诸夏，并力蛮夷。

夫边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也。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书之诟。方之于今，何者为甚？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苟无蹙国内侮之患，则可矣，岂与虫蚁校寇计争往来哉！虽或破之，岂可殄尽，而方令本朝为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谏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执事，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犹为大汉羞之。'而欲以齐民易丑虏，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犹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纳贾捐之言，而下诏罢珠崖郡，此元帝所以发德音也。夫恤人救急，虽成郡列县，尚犹弃之，况障塞之外，未曾为民居者乎？守边之术，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论，严尤申其要。遗业犹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规，臣曰可矣。"帝不从，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千骑奔还，死者十七八，缘边莫不被毒也。

艺文志-诸子略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

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讦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民族是一个有机体　彼得-隆

民族社会主义在解决所有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基本上都试图认识到这些问题的**自然原因**，因此首先努力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把民族看作是自然赋予的东西，暂时不考虑历史上关于民族的一切发展，那么民族社会主义者对民族概念的概括就产生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民族的形成？其内在和外在的生命功能是什么？这些功能如何受到外部生活条件的影响？**正如我们在一开始所说的那样，个人的感官知觉与理性对感官知觉的心理加工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关系，理性使个人具有自我意识并对自我意识进行验证。只有在这个时候，意志才会被开启，向空间发出有生力量，以便在与毁灭的持续斗争中激活和确保自己的生命。**

如果我们撇开运动的问题和所有关于目的的考虑，我们就会发现每个有机体都在不断地变化或发展，其进程取决于它自身产生和发出的力量的强弱，或者它必须克服的力量的强弱。在保持自身力量的作用与外部力量的反作用之间的平衡的过程中，个体参与了为生命而进行的实际斗争，只有这种斗争才能使个体保持健康，如果健康被理

解为对当地生活条件尽可能完美的适应的话。如果我们把这种斗争理解为一种自然形式的运动，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有机体中观察到与第一种发展并行的第二种发展，即从胚芽开始，经过一连串快速的原始胚胎阶段，发展速度越来越慢，直到具有繁殖能力，并在此基础上确保后代。

我们喜欢把这称为高级发展，**却没有考虑到自然界并不了解人类的高低等比较概念。**但是，由于我们人类只能通过比较来获得知识，因此，如果我们比较挪威的洞穴和班图尼人（两者似乎都能很好地适应环境），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阶梯上，这个阶梯以单细胞生物为起点，以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无限为终点。然而，我们将不得不观察一种不仅在地点上不同，而且在时间上也大相径庭的发展，这种发展当然有理由被称为上等和下等。**如果生物不想成为大自然灭绝性选择的牺牲品，它就必须根据空间和时间来适应这些只有在斗争中才有可能实现的发展。人类这样做不仅是出于本能，也常常是出于理性。**

在他祖先的整个阶梯上，他要么是一个群居动物，要么已经发展成一个群居动物，因为只有与他的同类一起生活，才能为他提供无数的可能性，以弥补在适应环境方面的不足，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并使为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变得更容易承受。然而，这样一来，人类个体就不再是一个单体，而是变成了一个活跃的细胞体，它根据环境的相互作用调整自己的活动，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在群体中建立起来的可能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依赖于群体，并使他服从于分工的基本过程。

起初，他会本能地在异性身上寻求自我完善，但很快，他也会在理智上寻求将这种自我完善发展成一种在生存斗争中的集体有序的力量源泉。

婚姻就是这样产生的，通过婚姻，家庭成为一个国家的核心。“无序的部落是人类最初的群体形式”，这一理论如今已被科学界普遍抛弃，我们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甚至在原始民族中都找不到这种理论。事实上，在某些原始民族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种非常复杂有序的亲属制度，尽管男女之间的婚姻仍然被称为整体的生殖细胞，但这种制度将这种生殖细胞有机地融入氏族的结构中，以至于粗略一看很可能给人一种部落的印象，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是一个结构良好的社区机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为生存而艰苦奋斗的民族，如布须曼人，都是以永久性的单一婚姻生活的，毫无疑问，生活在北欧冰川期后荒凉气候中的前欧洲人也是如此。因此，永久婚姻并不仅仅是一个传统问题，而是一种生物本能的需要。家庭进一步结合成氏族，氏族进一步结合成部落，部落进一步结合成民族，这绝不是仅仅通过繁殖就能机械地实现的。相反，**促使个人组成家庭的类似动机，驱使较小的族群组成较大的族群**，而族群的有限规模基本上是由可获得的食物决定的，反过来，只有当人们有足够的空间进一步发展时，食物才是充足的。**如果缺乏食物，所有生物都会退化，数量过多的物种很快就会被大自然重新适应给定的食物供应。在这个过程中，最健康的生物自然会存活下来。然而，如果已经出现退化症状，近亲繁殖的恶果很快就会出现。大自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应对这些危险，比如在缺乏食物时进行迁徙（鸟类的迁徙；旅鼠的迁徙；人类的游牧行为），以及为了保持血液新鲜而进行近亲繁殖的本能（在鹿和狍子等群居动物中，成熟的雄性动物会在发情期离家出走；在人类中，图腾崇拜等）。**

人类的典型特征是在迁徙和对外婚姻中努力建立有机结构的群体，然后根据当地和当时的情况，形成松散或牢固的联合体。

然而，这取决于民族共同体的稳固程度，也取决于这一有机体是否也能发展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承认大自然是自己的老师，但在精神上渗透大自然，使大自然服从于自己，或充满爱意地模仿大自然。

文化是一种自我驯服。丛林中的采集者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缺乏远见卓识。草原骑手和沙漠猎人只能不完美地拥有它，他们的部落联系过于松散。只有定居的人类才有机会发展成为成熟的文明人。因此，在史前时代，当人类发现可以任意生火并开始饲养牲畜时，男人和女人就开始了共同的磨砺。然后，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不可分割的细胞**，而单靠这个细胞在户外是根本无法生存的；因为如果没有他的民族的文化成就，一个被驯服的有文化的人在沙漠中、在丛林中很容易成为死亡的猎物。

如果把民族本身理解为一个有机体，它可以被解释为产生于人的特殊动力和精神力量，并通过其细胞（即家庭和个人）有规律的力量交换来维持和发展自身，**那么民族社会主义就可以正确地将这种民族有机体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进行对比**，它认为后者是不自然的。

吃得过饱的细胞、肿瘤、有毒物质的积累、营养不良的细胞，总之，各种病理形态都是退化现象，与野生动物的身体相比，这些现象更容易影响驯服动物的身体，因为驯服动物越来越远离自然。同类细胞的增殖或人体内溃疡的形成，只能说明身体不再具有抵抗力而生病了。但是，把本应健康的细胞移植到同一个身体的病变部位是无法治愈这种疾病的；因为这些移植的细胞通常内部已经病变，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病变的身体，如果它们还没有病变，那么在病变细胞和病变结缔组织的环境中，它们也一定会病变。只有为仍然健康的部分提供充足的营养，并在整体框架内激发每个个体（也只能是个体）在完成任务时的力量和防御能力，才能从内部治愈身体。只有这样，身体才能重建营养过剩的细胞，排出所有毒素，从而重新正常地适应环境。

生物体根据分工原则工作。分工的前提是细胞的差异性。因此，民族社会主义拒绝一切平等主义，认为这是不自然的。因此，对民族社会主义来说，不存在妇女问题，因为它不把妇女与男子作为平等的竞争者来对待，事实上，它认为仅仅平等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也是无法回答的，相反，它把妇女作为必须完成大自然赋予她们的生物任务的生命来尊重和敬重，而这些任务必然与男子的任务不同。

无论是由于男性数量的减少，还是由于现有男性在生理上的退化，只要两性的融合是按某种计划进行的，这种使女性偏离其实际存在目的的非自然现象（通常只是迫于无奈）总是会给整个民族带来严重的损害。让妇女脱离与男人分工合作的自然原则，就是让她脱离自己，就是剥夺她作为文化传承者和创造者的王冠。妇女只有在自己的位置上，即在自己的壁炉边，在子女的陪伴下，才是伟大的，人类的伟大。这正是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再次将她安置的地方，也正是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团体最需要她的地方。因此，俾斯麦曾经说过："我认为，在德国母亲和妻子的家庭传统中，对我们政治未来的保障比在我们的任何堡垒中都要坚实。"

民族社会主义几乎不考虑高低、左右等相对性；相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它根据整体框架内工作表现的衡量标准进行评价。因此，工作成了民族的世俗宗教，从真正意义上说，是民族个体成员之间的连接组织。**只有劳动者才有权存在于民族之中，也就是说，人作为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在他能够根据自己的性情和能力做出最大贡献的地方工作，无论是用脑力还是用手。**

强迫的千篇一律会逐渐扼杀整个身体，因为单个细胞因此而缺乏发展其能力所需的空间。**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将人类的自利作为有机体框架内的一种驱动力加以利用，使其不至于逃向远方、毁灭一切，而是在各种力量的并行计划中寻找自己的道路，这些力量一方面作为道德责任的引力，另一方面作为群众的吸引力，将其指向中间有效的方向，从而使个人获得内在的真正自由。**

然而，自由是与被视为属于它的环境和平相处的幸福感，而这种内在的自由恰恰是以权力的双重约束意识为前提的；因为真正的不自由是不受约束的，是他的激情撕裂他的束缚的奴仆，是他缺乏控制的受控者，他对权力的奴性欲望剥夺了他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和平和指定的统治。

然而，自由不再仅仅是一种感觉，也是意志的一个恒定目标，如果这个目标被称为和平，那么实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在一个民族的人类合作之流中不断争取平衡，而统治则意味着领导者不会让其民族屈服于其意志之下，而是根据这个星球的规律为他们指明新的道路。根据其将民族视为一个组织的概念，民族社会主义将领导者理解为一个与其随从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人，就像随从与其领导者有机联系在一起一样。没有头和手，人体就无法生存；没有领袖，群众就束手无策。

这是米尼涅斯-阿格里帕（Menenius Agrippa）的古老智慧；国家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他们忽视了头和四肢这一天赋。**一个伟大的领袖，只有当他站在民族的肩膀上时，才是可想而知的**，而对于肩膀来说，只要它尽到了作为指导原则的责任，那么头顶戴着什么样的头套都无关紧要。成为领导者意味着成为活生生的榜样；因为腐化的影响和榜样总是自上而下地渗透。领导意味着行动，意味着确保整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为整体尽责。

民族社会主义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这种民族概念称为社会主义。

对他来说，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商业学说，例如沙夫茨伯里的那种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为了自己的幸福，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及其相应的颠倒原则来对待自己的同胞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意味着出于算计而践行道德。

不，对民族社会主义来说，社会主义既是一种认识，也是一项伟大的任务；即认识到大自然只致力于保护物种，保护民族，也就是保护人类的思想，而个体生命一旦体现了这种思想，并在其后代中延续了这种思想，不假思索；而任务则是将自己完全奉献给这种思想，为它而生，为它而死，并将它传递到永恒，因为大自然命令我们这样做。民族与种族如果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将民族视为的有机体，那么这最初只是一种抽象概念，对知识而言非常重要，并为民族社会主义关于个人与其民族关系的观点提供了基础。

如果我们将民族和种族这两个概念进行对比，一方面是为了确定德意志民族在其民族外观上的表型，另一方面是为了阐明其基因型，即与之相关的种族组合；因为不言而喻，基因的内在相互作用决定了外观。

历史表明，一个民族的产生过程有多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可以看到，**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起初只是无机地融合成某种形式的国家，这种国家自然而然地打上了征服者的烙印，但在种族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征服者的因素往往会被被征服者完全吸收而消失。历史还告诉我们，这种民族兴起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民族部落只有在血缘关系不再存在的情况下才会和平地联合起来，而即使在明显的征服民族中，除了利用被征服者为自己民族服务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努力，而且，如果被征服者不是同一种族，也从来没有真正打算将他们与自己的民族融合为一个民族。相反，即使是一个部落或民族的分裂群体，如移民群体，也会很快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在全国范围内封闭自己的群体，甚至反对母民族。古代欧洲印欧民族形成的国家，以及最近英国殖民地白人的独立，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防止各民族无限制地融合成一个人类群体，显然符合大自然的精神，我们在动物和植物世界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事实，其原因，如气候影响、生活条件等，无需在此讨论。我们还可以通过指出与民族社会主义相对应的非自然性来描述民族社会主义的自然性。**所有争取国际桥梁、理解或统一的努力，无论是理想性质的还是物质性质的，总是来自那些思想特别向组织方面发展、感情在种族或民族上堕落和根深蒂固的人。**其特点是，这种努力几乎总是被视为只是商业上的算计，而可能从来都不是英雄式的克服。在这些人之后，可能会有较小甚至相对较大的一部分人跟随他们；但事实总是证明，**人数远远超过他们并牢牢扎根于自己家园的民族社会的其他部分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会击退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使真正的国际不可能存在。**

在这里，我们决不能争辩说，在国际上奋斗的人们是那些向往人类更高发展理想的人们，他们实际上是战胜自然本身的先进和进步的人们。**正因为这种所谓的战胜自然，他们才会作为无根的人而灭亡；因为自然只给每个生物分配了地球上具有一定发展可能性的一定区域，只有在这里，它才能茁壮成长，只有在这里，它才能与同类生物和民族一起，将几千年的传统引向最高意义的发展。**即使是移植，也经常意味着对这种发展的粗暴干预，同样经常意味着倒退。

英国人有文化，美国人没有文化，或者只有借来的文化，也许只有在许多世纪之后，他们才会拥有自己的文化。植物之间不存在国际关系，动物之间也不存在国际关系，因此人类之间也不存在自然的国际关系。即使是上述的雌雄同类也有其非常明确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地球上所有种族之间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可能存在的生殖可能性很快就会被自然选择的自然效应所取代。

全人类的概念是一个抽象概念，在实践中几乎无法实现。**所谓人类，不过是地球历史上一小段时期内发生的事件的对应物。只有人类个体掌握了这些事件，并推动它们沿着特定的道路前进，而且只有当他们依靠其部落或民族的经验，并作为其种族和民族决定的祖先的遗传物质的承载者，将这些经验朝着特定的方向扩展和倍增时，他们才能凝聚起这样做的力量。**

一个民族通过一定地区的环境和自然状况，按照其遗传倾向发展起来，而其民族世袭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外在面貌、表型，并使其成为一个民族，正如这个词所说的那样，即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东西。一个民族的所有文化创造自然都是以民族为条件的。

国际文化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无论文化以何种形式出现，它都诞生于一个民族的灵魂，为自己创造情感形式，而这些情感形式恰恰反映了这个民族的灵魂，同时也与这个民族的灵魂同归于尽。因此，文化就像一个民族的外在和灵魂结构一样，只能用种族来解释。

我们之前曾把人类的文化描述为自我驯服，事实上，种族的出现与生物的驯服密切相关。与野生动物的祖先相比，我们在家养动物中发现了更多的种族。不过，可以理解的是，确定人种要比在生物学上区分物种和亚种困难得多。物种和亚种的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而品种却可以通过人工选择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有目的地培育出来。例如，如果我们将今天的德国牧羊犬与其四十年前的祖先进行比较，就会惊奇地发现，这种转变是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另一方面，大自然从某种原始鸟类发展出某些鸟类物种又用了多长时间！要确定猴子的本质并不容易，因为猴子的出现相对来说稍纵即逝，这给科学带来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只能不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完全否认人种的存在是荒谬的，近代犹太人卢尚教授就曾试图否认人种的存在；另一方面，将种族研究推向发现更多的人种和亚人种，直到最后宣布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物种，这也是一种相当无聊的游戏。真相就在中间。

人类中肯定有一些种族和变种，他们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精神上都表现出相当大的遗传相似性，他们对生活的要求的反应也非常相似。在有些人种中，某些遗传物质（包括身体和精神方面的遗传物质）会遗传下去，这些人种与其他人种的区别也比较明显。如果德意志民族，正如人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是由六个种族组成的，那么，根据任何相对的价值判断来剥夺其中一个种族的生存权，在生物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六个种族都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证明，他们都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成功地与这里的环境进行斗争。否则，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会被大自然消灭。如果我们还必须指出，根据科学定义及其物理可测量性，纯种人的数量在今天仍然非常少，而且在德意志民族中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种族混血，那么，如果这种混血只涉及这六个种族中的一个有价值的民族，那么从纯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什么值得抱怨的事情。

然而，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首先，如此大规模的种族混血会导致一个优秀种族延续民族的宝贵遗产因与另一个种族的劣等伙伴混血而被削弱或浪费，尤其是混血儿的价值通常低于其任何祖先，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被单方面赋予过高的价值。其次，血缘关系的后果是，这些杂交后代的灵魂生命也会表现出模糊不清的状态，这可能会给他们自身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对整个群体的福祉极为不利**，此外，从美学角度来看，杂交后代也是一种令人不快的现象，无论如何，正如动物育种领域所公认的那样，它们在自然美方面永远无法与纯种后代相提并论。今天，北欧人种的优势受到了高于其他所有人种的赞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可以说北欧人种的某些特点对整个民族的形成和保存产生了最好的影响。然而，北欧人种的这些特点，除了体格上的优势之外，还有英雄的品格和敢于牺牲的精神，以及谨慎、合作管理和真正领导

的聪明才智。毫无疑问，德意志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其历史进程中取得最伟大的成就，最古老的种族所具有的这些突出的遗传特征是主要因素。因此，今天著名的种族研究者们特别强调，**一个民族的命运无条件地取决于其种族特征的培养**，因此，他们在对其民族的未来表示严重关切的同时，也在预言种族卫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他们所说的"种族卫生"实质上是指在德意志民族中大力培养北欧人的遗传基因，而德意志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其最深层的性格特征中仍有自己的一部分。

出于对民族有机生活的承认，民族社会主义顺理成章地将自己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学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现在它又强调并捍卫自己民族的民族生活。**他的这种民族主义是原始的、自然的，绝不能与悲哀的爱国主义混为一谈，而且实际上要求社会主义作为其补充。根据这一理论，如果没有上述民族的社会主义分化，真正的民族主义是无效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一个没有组织分化的民族的各阶层，因此不与它和为它生活在任何牢固的关系中，不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也不再有任何维护民族利益的兴趣。**

此外，当民族社会主义在其种族理论中向民族展示北欧人的光辉形象，将其作为美丽、坚毅的躯体与丰富的英雄灵魂相结合的理想形象时，当它将种族卫生作为德意志民族真正内在复兴的前提之一时，**它希望运动的这些崇高目标不应被贬低为政治棋盘游戏中的愚蠢形象。**恰恰相反，民族运动的领袖们与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民族同志们有着种族亲情，并要求他们每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未来为德意志民族塑造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形象，即一个符合他们自己种族性格的形象。

同性恋问题

1933 年我们夺取政权时，我们遇到了同性恋俱乐部。注册会员总数为 200 万；保守估计，德国同性恋者人数高达 200 万至 400 万。我个人认为这个数字并没有那么高，因为我不相信俱乐部里的所有人都是真正的同性恋者。另一方面，我当然相信并非所有同性恋者都在俱乐部登记。我估计有 100 万到 200 万。100 万实际上是我们必须假设的最低数字；这是在这件事上允许的最小和最温和的估计。我请你们记住这一点。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德国人口大概有 6700 万到 6800 万，粗略计算，这意味着大约有 3400 万男性。因此，大约有 2000 万性能力强的男性（即 16 岁以上的男性）。估计的数字可能相差一百万，但这并不重要。

如果我假设同性恋者的数量为一两百万，那么显然德国男性中约有 7%、8% 或 10% 是同性恋者。如果情况依然如此，就意味着我们的民族（Volk）将被这场瘟疫摧毁（字面意思是“go kaputt”）。如果两性之间的平衡和均衡以这种方式被破坏，一个民族将无法长久存在。

此外，如果您考虑到我还没有提到的事实，即在女性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大约缺少 200 万男性（其中许多人在战争中丧生），那么您可以想象，200 万同性恋者和 200 万死亡者的数量有多么庞大，因此总共缺少大约 400 万有性能力的男性，这会打破德国的性别平衡并导致灾难。

我想和大家谈谈关于同性恋问题的一些想法。同性恋者中有些人持这种观点：我做什么不关别人的事，这纯粹是私事。然而，性领域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是个人的私事，

而是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意味着世界强国或瑞士化。一个生育许多子女的民族有资格获得世界强国和世界统治。一个优秀民族如果生育子女太少，那么肯定会走向坟墓，50 到 100 年后将变得无足轻重，250 年后将被埋葬。

然而，即使撇开这个数字不谈——我只谈了数字问题——这个国家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灭亡。我们是一个男人国家（Männerstaat），尽管这个男人国家有种种缺点，但我们必须坚定地坚持下去，因为男人国家的宪法是更好的。

历史上也曾有过女性国家。您一定听说过母权制这个词。亚马逊国家不仅在传说中，而且在现实中也存在。在浮雕中可以看到母权制宪法——尤其是在海上民族（字面意思是“海上民族”）中。我们可以追溯到我们的时代，它们的踪迹和出现。荷兰乐于让自己被女王统治，在荷兰，女儿（女王）的出生比儿子的出生更受欢迎，这绝非巧合。这并不是什么奇事，而是源于海上民族的古老本能。[译者注：在海上民族中，男人经常出海，因此女人往往异常独立，即使不是真正统治。2007 年银行业危机后，冰岛的观察家们注意到了这种趋势。主要是那里的妇女站起来要求惩罚银行家。]

几个世纪以来，几千年来，日耳曼民族，尤其是德国人，一直由男性统治。然而，这个男性国家现在正因同性恋而走向衰败。在政府领域，我看到了以下主要错误：国家、人民组织、军队以及与国家机构相关的其他一切，所有这些机构都是根据功绩获得职位的，与人性的缺点无关。即使在司法考试中“第一名”（Einser）偶尔获得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官职，也仍然是基于功绩的选拔。在这种情况下，选拔是根据功绩进行的,因为首先要参加第一名考试,然后是 Bruckeinser [考试],最后是第二名考试],等等。

在国家和经济领域，在女性就业的岗位上，没有一个诚实的男人能够声称这个职位完全是靠能力获得的。说实话，这里只有男人，因此可以非常平静地说——当你选择打字员时，你面前有两个候选人，一个非常丑陋的 50 岁，每分钟打 300 个音节，几乎是这个领域的天才，另一个 20 岁，种族健全（gutrassige），漂亮，但只打 150 个音节，你会——如果我完全误判你们所有人（sc. 不这么认为）——可能会带着认真的态度和一千个道德理由，因为另一个人年纪大了，很容易生病，无论如何，选择那个打音节较少的漂亮年轻 20 岁候选人。

好吧，人们可以一笑置之，因为这无伤大雅，而且毫无意义，因为如果她漂亮的话，她很快就会结婚；再说，速记员这个职位对国家来说并不重要；现在它还有其他人可以选择。

但是，当这一原则（不单单是就优点而言）——我现在要非常严肃地说——一种情色原则、一种男女性原则、一种性原则在男性国家中从一个男人传给另一个男人时，国家的毁灭就开始了。我将从生活中举一个例子。我要强调的是，我说的是：从生活中。我想插一句，我怀疑目前地球上有任何地方在同性恋、堕胎等领域获得了如此多的经验，就像我们在德国的秘密国家警察一样。我相信我们真的可以作为该领域最有经验的人发言。

议员 X 是同性恋，他不会根据择优原则选择政府职位所需的陪审员。他不会选择最好的律师，他不会说陪审员 X 可能不是最好的律师，但他得分高，有执业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种族方面看起来不错，意识形态方面也井然有序。不，他不会选择一位

合格的、长相好的陪审员，而是寻找一位也是同性恋的陪审员。这些人一眼就能认出对方。如果在舞会上有 500 名男士，半小时内他们就会相互挑选出那些性格相同的人。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

议员找出了得分最低、思想上也乱七八糟的评估员。他没有询问评估员的表现，而是向部主任推荐他，让他上任。他赞扬了他，并详细阐述了推荐的理由。评估员现在被聘用了，因为部主任从来没想过要询问更多细节，也从来没想过要更仔细地审查聘用事宜，因为从一开始，作为一名老官员，他就认为议员的推荐是基于优点的。评估员之所以被推荐，是因为他的性倾向与他相似，这种想法是普通男人想不到的。

事情不止于这两个人，因为评估员现在是一名政府官员，他将按照同样的原则行事。如果在一个男人国家里，你在任何权力位置上有一个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你肯定会在那里找到三、四、八、十甚至更多具有类似性格的人；因为一个人会吸引另一个人，注意这些人中是否有一两个正常人；他们基本上是该死的，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会毁了自己。让我给你举一个来自这个圈子的同志的例子，他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党卫队中校冯·沃伊尔施在西里西亚与同性恋冲锋队中校海涅斯和同性恋地方长官兼地方长官布吕克纳发生斗争时就在场。因为他是破坏这项美好协议的人，所以他受到迫害，并不是因为（正如人们所说的）他和我们不一样，而是因为道德、政治、意识形态——民族社会主义的理由。

因此，同性恋会破坏国家的一切优点、优点的一切基础，并摧毁国家的基础。这还不是全部：同性恋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精神病患者。他很软弱，在每一个关键方面都是懦夫。我相信他在战争中可以表现得勇敢；然而在公民勇气方面，他们是最懦弱的人。

与此相关的是，同性恋者撒谎是病态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不是撒谎，就像耶稣会士一样。耶稣会士撒谎是有目的的。他面带笑容地说着任何话，并且知道他在欺骗你。他有道德基础：为了上帝的荣耀；majorum dei gloriam。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圣伊格内修斯制定了一整套道德哲学，一种道德学说。

因此，耶稣会士在撒谎，他知道这一点；他一刻也不会忘记自己在撒谎。然而，同性恋者撒谎，他自己也相信。如果你问同性恋者某件事：你这样做过吗？答案：没有。我知道一些案例，我们采访过的同性恋者说：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宣誓，或者如果这不是真的，我愿立即死在这里。三分钟后，当我们借助证据对他说：“请问，还有这个？”[这个=无可辩驳的证据]时，他不幸没有倒下，还活着。

一开始我根本就不明白这一点。1933-34 年，我们像无知的傻瓜一样处理这些问题，因为那是一个对正常人来说如此陌生以至于难以想象的世界。海德里希集团领袖、我和其他一些人不得不在实地学习，而且这都是由于糟糕的经历。一开始我问自己这些家伙是不是在撒谎。今天我很清楚，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因此，我不再想问同性恋者：你能保证吗？我不再问了，因为我知道我会得到一个错误的说法。当他含着泪水说些什么时，同性恋者确信那是真的。根据我的经验，同性恋会导致绝对的精神错乱和疯狂。

同性恋者当然是各种敲诈勒索最合适的对象，首先是因为他本身容易被逮捕，其次也是因为他是个软弱的家伙，第三是因为他缺乏意志和勇气。

此外，同性恋者——我在此仅向你展示一些这方面的事情——有一种在所有领域，尤其是性领域交流的无法满足的欲望。你通常会发现，被抓住的人会不受控制地告诉你他所知道的所有名字。因为——我必须从他们的角度来说——男人之间的爱情没有忠诚，而男人之间则有忠诚，尽管同性恋者假装彼此相爱。同性恋者毫无顾忌地说出一切，并希望他能因此保全自己。

我们必须清楚，如果德国继续存在这种恶习，而我们又无法与之抗争，那么德国、日耳曼世界的末日就将来临。不幸的是，我们的生活没有我们的祖先那么轻松。他们这些少数的个案属于不正常类型。那个名叫 Urning 的同性恋者沉入了沼泽。在沼泽中发现这些尸体的教授们决心不去意识到，在他们面前的 100 个案例中，有 90 个是同性恋者，他身穿长袍，全身都沉入沼泽。这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不正常生命的灭绝。必须将其消除，就像我们拔出荨麻，把它们扔成一堆烧掉一样。没有复仇的感觉，但这个人必须离开。

我们的祖先也是如此。不幸的是，我不得不说，我们不再可能这样做了。在党卫军的框架内，我想非常清楚地解释以下内容。我强调这一点：我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这当然不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的，但你可以在与某个人的单独讨论中以对话的方式重复它：

如今，在党卫队中，我们每月仍有一例同性恋案件。整个党卫队全年大约发生八到十起同性恋案件。我现在决定：在每起案件中，这些人自然会被公开贬低、驱逐并移交给法院。在完成法院规定的惩罚后，我下令将他们送往集中营，并在他们试图逃跑时在集中营被枪杀。我会下令将此事告知该人所属的部队。我希望最终能与党卫队中的这类人一刀两断，这样我们至少可以保持党卫队中纯正的血统，并继续恢复我们为德国培养的这种血统。

但这并不能解决整个德国的问题。人们不应该对以下情况抱有幻想。如果我把同性恋者送上法庭，把他关起来，那么案件还没有结束，因为同性恋者出狱后和进监狱时一样是同性恋。因此，整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有在这种恶习被谴责的程度上，问题才得以解决，这与我们夺取政权之前的几年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我们在战前、战中和战后都有相关规定，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最好地说明这一点：1934 年，在我们在这一领域开展活动的前六周，我们向法庭提起的案件比柏林整个警察局 25 年提起的案件还要多。没有人应该说问题之所以变得严重只是因为罗姆。他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但问题在战前、战中甚至战后都很严重。

现在，你可以看到，通过国家和警察的措施，你可以控制一切可能的事情。我们可以控制妓女问题，与另一个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本身是相当无害的。对于一个文明国家来说，通过某些措施，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可持续的控制。我们将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慷慨，因为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想阻止所有年轻人走向同性恋，另一方面，又为他们封锁每一个[性]出口。这是疯狂的。最终，每一个在大城市与女孩见面的机会都被封锁——即使是为了钱——因此都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考虑所有这些因素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德国不幸地（多达三分之二）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国家。而乡村则不存在这些问题。乡村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其自然而健康的调节方式。尽管有牧师、基督教道德和一千年的宗教教育，年轻人还是从女孩卧室

的窗户爬了进去。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村里有几个私生子；其中有几个散布在村子里，牧师对此很高兴，因为这给了他一个布道的话题。男孩们和以前一样做同样的事情——不要被愚弄——就像我们过去做的那样。人们正确地建立了整个理论，即如果日耳曼女孩不幸在 26 岁或 30 岁之前没有结婚，那么她会一直当修女，但这只是一个神话。然而，血统法是严格的，任何男人和女人都不允许和血统低劣的人乱搞。这条法律被严格遵守。此外，还有一条规定非常严格：婚姻忠诚。如果妇女违反了这一点，就会被判处死刑。因为这样就有外来血统流入的危险。

那都是自然的；当时的社会秩序是清廉的、体面的，遵循自然法则，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的秩序那样违背自然法则。

正如我所说，属于这个领域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越是提倡早婚，越是让我们的男人能在 25 岁结婚，其他问题就越少：它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

然而，同性恋问题无法自行解决。显然，我可以——这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把德国所有的男妓关起来，关进集中营。这可以立即完成。我只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把 20,000 名来自大城市的妓女关起来，我是否能让其中三四千名足够年轻（17 至 18 岁）的人恢复正常生活，通过纪律、秩序、体育和工作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在很多情况下，这都是成功做到的。但是，一旦妓女不在了——我不会把同性恋者关起来——那么就有风险，数百万同性恋者会为自己寻找新的受害者。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会把这些 17 到 18 岁的男孩（除了那些已经被宠坏的男孩）全部集中起来，然后把他们带到一个营地。我们会努力让这些男孩重新变得理智，正如我所说，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已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所有这些并不能解决整个问题。我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我们不能让男性国家的质量和男性社会的利益因错误而减少。在我看来，我们整个生活都过于男性化了；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我们把不可能的事情军事化了，我们——我可以在这里公开地说——无法在任何事情上达到完美，无论是让人们排成队形，还是组织他们，或者让他们背上背包。当我看到女孩和女人——尤其是女孩——背着精心打包的背包穿过该地区时，我感觉好像我目睹了一场灾难。这会导致麻烦。当妇女组织、妇女社区和妇女联合会在一个地区活跃起来时，我认为这是一场灾难；这摧毁了所有的女性魅力、所有的女性尊严和优雅。我认为，如果我们这些愚蠢的男人想把女人变成逻辑思维工具，并教育她们一切，那将是一场灾难——我说的是一般情况，因为这不直接适用于我们（党卫军）。这只有在我们让她们男性化到一定程度，最终两性之间的差异和对立消失时才有可能。那么，通往同性恋的道路就不远了。

如果像前几年一样，学生会的工作就是从运动中挑选出一个榜样，把背包收拾得非常整齐，然后进行训练，那么我认为这是一场灾难。显然，我不需要学生会来做这件事。

我最近和新任学生会领导进行了交谈，并告诉他：“亲爱的谢尔，如果我发现你和你的同志们一起进行军事训练，那么你绝对把我当成了敌人。在学生宿舍里，你必须发挥智力和领导才能，让社会恢复秩序。”

我曾经看过一份学生报纸——我记得是萨克森学生协会的报纸；在这份针对年轻学者的脑力劳动的报纸的头版上，有八名男子排成两排，而精神领袖则检查方向（Richtung）。这本身就是士官、中士、连长或营长的工作，如果他只是习惯于一直检查方向的话。然而，这绝对不是知识机构的工作。如果有人从国外告诉我们，“你们真的只能当军人”，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太不准确。

现在的问题是：党卫军说这是命令。党也说这是命令。这些说法并不相互排斥。我们非常明确地是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秩序——现在谈到种族决定——绝对是北欧男人和他们亲属（Sippe）的宣誓社区。我们首先是一个士兵组织，不是，而是 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士兵组织，通过抚养和血缘与北欧血统联系在一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部落社区（Sippengemeinschaft）。以前有人会说：贵族协会（Adelsgenossenschaft）。我并不是故意用这个表达方式。但我想用它来说，我们的任务与人的培养（das Menschenzüchterische）有关，而政治秩序的任务与人民的政治领导有关。

当我清楚地认识到党是一个政治秩序的时候，它就必须越来越多地具有精神意义（字面意思是“内容”），而越来越少地具有军事意义，即背上背包、排队等等。这适用于甚至个人的细微差别。

我与党员莱伊就这些事情谈过很多次，他对此非常了解。例如，在纽伦堡政治领袖们的精彩集会之后，我问他：“你为什么要下达命令？我不会这么做。”战场上有 10 万名政治领袖。他们必须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如果命令：立正！升起旗帜！降下旗帜！10 万名士兵应该很好地执行。

“你们为什么不这样说：现在我们升旗，现在我们降旗!”完全是一回事，但这不是一种过于阳刚、军人、军事的说话方式。为什么在这种事情上必须下命令？以上只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

我又回到这一点。我说我们的生活太男性化了。我会举几个例子，你也许可以补充一些来自你个人经历和与不同孩子相处的经验。

我认为，当男孩们告诉母亲“当我们在希特勒青年团游行时，注意不要经过。我会向你打招呼，是的，但其他人会笑我，我会被认为是妈宝男和弱者。”时，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灾难性的。我认为，当男孩羞于见姐姐和母亲，或被要求羞于见女人时，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灾难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羞于见女人的是他最亲近的女人、他的母亲和正在成为女人的姐姐。当一个爱上女孩的男孩受到的嘲笑超过了正常水平，被说成不完全体面和胆小鬼，如果有人对他说：一个男人不喜欢女孩，他就不会喜欢她们。那时，他们只会和其他年轻人做朋友。男人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所以下一步［字面意思］就是同性恋。

这些是赫尔·布吕赫（一个臭名昭著的恋童癖者）的想法，这证明了：“一般来说，最伟大的爱情形式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有了这种爱情，才会生孩子；那是动物性的东西。最伟大的爱情形式是男人和男人之间升华的爱情。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由此而来的。”但这就是那些声称亚历山大大帝和俾斯麦是他们的人的可耻伪善。没有哪个伟人不被同性恋者自称是：凯撒、苏拉等等。我认为唐璜还没有被自称，但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是。现在，这以一种可口的形式提供给年轻人，他们已经处于

一个高度男性化的运动中，因为男性阵营，他们没有机会与女孩在一起。在我看来，我们走上同性恋之路并不奇怪。

我仅通过以下方式看到了根本性的变化：

1）这对于我们党卫军来说尤为紧迫：我们必须在对他们有影响的范围内，对党卫军的男兵和男童进行再教育，使他们成为有风度的男人或年轻的绅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划清界限，避免陷入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国的情况。我曾对一位英国妇女说，她觉得男人先问候女人太可怕了："在你这里，母鸡可能像在公鸡周围求爱一样！你觉得这和正常情况不一样吗？"女性享有特权的后果是，在美国，没有男人再敢看女孩，否则他将被带到婚姻法庭，并为此付出代价。在美国，同性恋绝对是男人的一种防御措施，因为他们已经沦为女人的奴隶。在那里，女人可以像斧头一样：她开始砍东西。她从来没有受到斥责：这是女性暴政的最好例子！

然而，我们并不存在男人的骑士精神被另一方夸大和利用的危险，因为德国女性的习惯和教育并不倾向于这样做。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年轻人永远成为有骑士精神的男人，成为为女性挺身而出的男人（Menschen）。

我最近对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位领袖说："你通常很不信基督教，但你对女性的态度却是最纯粹的基督教。" 150 年前，一所天主教大学的某人写了一篇博士论文，题目是："女人有灵魂吗？" 由此可见基督教的整个倾向：它旨在彻底摧毁女性，强调女性的低劣地位。我坚信，神职人员和整个基督教的全部实质是男性的色情联盟（Männerbund），目的是建立和维护这个有 2000 年历史的布尔什维主义。我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非常了解罗马基督教的历史。我坚信，消灭（ausrotteten）第一批基督徒的罗马皇帝所做的和我们对待共产党人完全一样。这些基督徒是这个大城市里最坏的酵母、最坏的犹太人、最坏的布尔什维克。

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罗马的尸体上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后来，基督教教会的神职人员在无休止的冲突中征服了雅利安教会，从 4 世纪或 5 世纪开始 ，他们一直渴望神父独身。他们依靠保罗和最早的使徒们贬低妇女是罪恶的，允许或推荐婚姻只是摆脱卖淫的合法途径——这是在圣经中——并且贬低生育子女是必要的罪恶。这种神职人员以这种方式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 1139 年神父独身制才完全实施。

我还确信，对于少数不想屈服于同性恋的人来说，尤其是乡村牧师，其中大多数（超过 50%）不是同性恋，他们的出路是在忏悔中为自己找到必要的已婚和单身女性；我认为修道院里的同性恋比例在 90%或 95% 到 100% 之间。

如果今天再次对牧师同性恋问题进行审判，如果我们像对待德国公民一样对待牧师，那么我将承诺在未来三到四年内保证进行 200 起或更多此类审判。审判未能进行，不是因为缺少案件，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官员和法官。我希望在未来四年内，将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表明教会组织在其领导层、其牧师职位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同性恋情色男性联盟（Männerbund），以此为基础，在过去 1800 年里一直在恐吓人类，要求人类做出最大的血祭，并且在过去发表的言论中表现出虐待狂般的邪恶。我只需要回想一下女巫和异教徒的审判。

认为女性低人一等的态度是典型的基督教态度，我们这些至今仍是民族社会主义者的人——其中许多人甚至是严格的异教徒——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一套思想。我知

道，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多党员认为，他们必须通过对女性非常粗暴和粗暴的行为来证明他们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特别坚定性和他们自己特殊的男子气概。

我还认识到，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种将妇女排除在所有活动和庆典之外的倾向。这些人抱怨妇女到处依附于教会，或者没有百分之百地被民族社会主义所吸引。然而，他们不应该抱怨，因为他们把妇女当作二等公民，不让她们参与我们的内心生活。如果她们没有完全被这种内心生活所吸引，那么任何人都不必感到惊讶。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如果运动、世界观得到妇女的支持，它就会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因为男人用头脑理解一切，而女人用感觉理解一切。在女巫和异教徒审判中，德国妇女，而不是男人，承受了更大的血祭。牧师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烧死 5000-6000 名妇女：正是因为她们在情感上坚守旧知识和旧教义，在情感上和本能上无法被劝阻，而男人已经通过逻辑和思想皈依了："没有意义。我们在政治上正在衰落。我适应了，我让自己接受洗礼。"

我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我认为整个运动都存在过度的男性化，而这种过度的男性化正是同性恋的温床。

我现在想问你们，你们是否有机会详细讨论这些想法——但不是在整个军官团面前——而是与某个人谈论这些事情。请确保我们的士兵——这是我发起的——在夏至庆典上与女孩们一起跳舞。我认为，我们现在绝对应该在冬天为年轻的候选人安排一场舞会，现在我们邀请的不是任何方面都不坏的女孩，而是最好的女孩，我们让党卫军有机会与女孩们跳舞，与她们一起快乐地玩耍。我认为这特别重要，因为[它有助于确保]没有人走上同性恋的错误道路。那将是一个消极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也很重要，因为有一个积极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让男人们有机会认识有价值的、种族健全的女孩，那么如果这个或那个党卫军娶了一个完全错误和种族上毫无价值的女孩，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

对于年轻人，我认为绝对有必要注意，16-17 岁的男孩不要和女孩一起上舞蹈课，或者在公共晚会上参加其他活动。15-16 岁——这是经验事实——是男孩处于临界点的年龄。如果他在舞蹈课上迷恋上某个女孩，或者在童年时迷恋上某个女孩，他就会被征服，就会远离危险的境地［即远离倾覆的危险］。在德国，我们真的不需要担心——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以前人们只会用笑声、俏皮话和下流笑话来谈论这个问题，但感谢上帝，这种情况已经停止了——我们过早地把男孩和女孩带到一起，鼓励他们发生性关系。不，在我们的环境、种族和人民中，16 岁的男孩认为［即性交］是他最纯洁、最干净、最理想的爱，而且［事实是］从他完全迷上一个女孩的那一刻起 - 我必须再次明确地说 - 与伙伴们一起手淫，与男人或男孩建立性方面的公共友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通常在女孩面前害羞。他受到人类的束缚（menschlich gebunden）。

所以在那一刻危险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需要给这种危险一个机会。我们必须制止我们今天在年轻人中以及在党卫军中可能存在的整个趋势，即嘲笑与女孩一起散步的男人、尊重母亲的男人和绅士般对待姐妹的男孩。这是同性恋的温床。

我的小组领导们，我认为有义务就这些问题与你们谈谈。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无法通过小册子和道德理论来解决。仅仅说："上帝，我们的人民真的这么坏吗？他们变得如此道德败坏真是太可怕了"，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

定的，那么我必须问，为什么我们仍然在这一点上做出努力。或者我们用否定的回答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人民在这方面有些地方被严重误导了……

先生们！被误导的性行为会带来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疯狂的事情。说我们是动物是对动物的侮辱，因为动物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关于正确引导的性行为的问题关乎每个人的生死存亡。

民族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基础　沃尔夫冈·舒尔茨

民族社会主义政策，以及其中可称为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是由元首和他召集来执行具体任务的人决定和执行的。如果想知道民族社会主义文化政策是什么，就应该看看这些人，看看他们做了什么，看看他们为了吸引负责任的同志而给出的指导方针，以及为这项工作铺平道路的立法。历史终有一天会描述和评价当时发生的一切。届时人们将能够撰写民族社会主义历史的一部分：民族社会主义文化政策。

行动的统一性由领导层的团结和组织有序的分级、党的纲领和运动出版物、共同经历的斗争时期以及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来保证。其两个基本理念是种族和民族。种族和民族的民族社会主义并非无条件地追求新观念，种族和民族观念也并非新观念。但它希望恢复国家以前被轻视的价值观，并且以一种全新的深度渴望和整体主张来实现这一目标。

通过元首发起并不断推进的运动，前所未有的先决条件得以存在，而权力也可以用来实现必要的目标。因此，整体情况完全不同，旧观念也因此获得了新的色彩和意义。我们不是从对社区、理论上的普遍主义以及与个人普遍概念的对比的推测出发，来推导民族社会主义，而是从我们当今的、历史的、种族的、生活因果制约的民族社区本身出发。这种取向是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甚至深入到骨髓。它要求这个群体根据决定其生存的力量来指导自己，如果这些力量得到正确使用，就能确保、净化和提升这个群体。利用民族群体的一切手段来为其任务服务——这就是社会主义。一个民族不会仅仅通过种族观念、仅仅通过对其血液价值的认识来传播自己，也不会通过由此产生的思想叛逆来传播自己，而只会通过掌握其所有生活条件，甚至经济条件来传播自己。

民族同志在掌握这种能力方面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正如他们本身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最大程度的多元价值得以确定和发展。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来说，适合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目标，对于德国人来说，与任何其他民族都有很大不同。我们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者，而是民族社会主义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被使用的。对伟大目标的坚定信念奠定了基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由此产生。它不仅受到这种信仰的滋养，还受到所有可用的知识的影响，这些知识必须为此目的做好准备，重新思考并认真检查其适用性。在这个过程中，不重要的东西逐渐消失，为新的总体任务服务的本质变得突出。民族的精神财富经历了一次全面的动员，获得了内在的方向和统一。种族和民族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与其根本重要性相符。旧的需求 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和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这两个名字说明了这一思想在德国历史上的根深蒂固。阿恩特是第一个用他鲜为人知的《民族比较史尝试》将欧洲民族史描绘成一幅血淋淋的画面的人。著

名种族思想史研究专家路德维希·谢曼（Ludwig Scheman）这样评价他："他满怀热情，比戈比诺（Gobineau）更谨慎，又比沃尔特曼（Woltmann）更激进，在基本理论方面已经备受期待。" 雅恩站在阿恩特的身边，他是第一个提出民族（Volkstum）概念和术语的人，将种族作为核心本质，并提出了三大要求：**种族纯洁、民族团结和思想自由。**这个三位一体是纯粹的、正确的和领先的；**对于有着矛盾灵魂的混血儿来说，他们带来了冲突，并阻止了民族的任何团结；精神仍然受到限制，外国势力将其置于自己的魔咒之下。这里的自由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实现个人内心的法则。对种族的关怀确保了民族的团结，并释放了其真正的、承载文化的精神。**

新认识

自阿恩特和雅恩以来，需求方面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在思想的净化和深化方面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今天，这不再仅仅是一种需求，而是我们正在努力满足它。对种族、民族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现了许多细节。比较语言学对印欧语系的民族分支进行了概述和介绍，比较人类学对北欧种族也进行了同样的研究。研究表明，印欧语系人和北欧种族具有相同的承载层。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已成为北方种族本质的体现。对人工制品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了这些认识。日耳曼和印欧日耳曼古代的精神遗产已被证明是出乎意料的丰富和宝贵的财富。从印欧日耳曼人到日耳曼人，一条清晰可辨的生理血统和精神道德统一线贯穿我们的日耳曼历史，并指向我们的未来。德国民族、其族群和职业的构成，来自各种极具价值的种族元素，而北欧种族核心的重要性，在农民阶层中得到了最坚定的维护，这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民众中遗传特征的分布一目了然，一些重要的遗传定律已经发现。所有这些成果现在终于需要得到利用，而且不言而喻的是，在民众处于困境、但同时也具有自我意识和觉醒能量的时代，我们需要采取最终行动，我们也将以坚定的决心切实利用这些成果。

四重文化政策验证测试

我们必须向四位伟大的见证者证明自己：

第一，我们的历史；

第二，我们的民族；

第三，我们的文化；

第四，我们周围的民族和文化。

我们眼前是德国的历史，它充满了辉煌的成就，但也背负着许多严重的失败。

人们应该思考乌尔里希·冯·胡特（Ulrich von Hutten）在 1818 年关于与土耳其人战争的演讲中所说的话："德国有强大的青年，他们胸怀大志，渴望真正的荣耀，但缺少指引和领导。因此，能量消失，勇气减弱，对行动的渴望在黑暗中逐渐消亡。"今天，我们有了领导者。旧的党派已经瓦解，各省、族群和职业已经团结起来，最近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实现了。我们眼前是充满天赋的德国人民，但同时也背负着许多缺陷。我们的人口政策必须消除这些缺陷，确保先天健康的生育，并抑制先天有病的繁殖。我们的种族政策必须支持我们民族的生育，而以前有人破坏它，是的，反对它。我们可以解决这两个任务；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遗传学，承认基因的存在和民众的种族因素，并洞察北欧种族的重要性。我们眼前是德国文化，它范围广阔，内

容丰富，即使没有在许多方面超越我们周围的所有民族的文化，也可以与之媲美。但是，这种文化作为财产还不能满足我们。我们不能仅仅保护已经取得的成就，防止其衰败；我们不能仅仅管理过去。我们当下的新想法和新意愿要求我们以全新的视角看待过去和未来的机遇，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并采取相应行动。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杂质、许多眼泪和裂痕，许多强加于我们且与我们的本性相悖的异己，它们让我们无法找到自我，也常常无法让我们获得完全的快乐。

因此，在对我们古老而强大的文化传承的欣慰认知之外，还伴随着一个振奋人心的要求：以文化为目标。驱逐外来文化，发展本土文化——这是一项长期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最终将再次赋予我们未来的任务。北欧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体现在古代的印欧日耳曼文化、日耳曼文化和德国文化进程中，这是世界历史证明，我们必须培育德国民族的核心元素，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德国未来的精神财富。

最后，我们审视周围的民族和文化，发现其中既有尊重和爱，也有深深的仇恨，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这些仇恨严重威胁着我们的生存。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朋友。我**们作为民族群体越健康，作为统一文化的承载者越自信，就越能找到友谊的理由。**北欧民族是我们的文化根基，但并不需要表现出所谓的北欧人的矜持，相反，它能够也应该成为沟通的桥梁。我们探索得越彻底，就越能清楚地看到，我们自古以来就与周围的人们紧密相连，共同组成一个伟大的文化共同体，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共同体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这一切都归功于同一个种族基础。正如民族社会主义是欧洲和整个白种人抵抗布尔什维克混乱的伟大堡垒，民族社会主义的种族和民族思想也是人民之间和平与和谐的最可靠保障，同时也是保护古老文明文化价值的保障。

历史与政治

反对使用民族社会主义的种族和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反对其中所包含的“战斗精神”和“行动主义”的疑虑，就像这种战斗精神所席卷的世界一样古老且毫无根据。那个过分聪明世界的代表和我们——我们彼此如何看待？我们崇尚政治意愿高于历史进程；他们声称历史进程总是独立发展，无需政治意愿，而且政治意愿也会形成历史进程。我们同样相信后者，只是在我们看来，它有着不同的含义。我们只喊出，一种反抗并凭借英雄般的决心去实现不可能的意愿——不仅使它成为可能，而且实现了它。我们相信，从这种认识中会产生新的意志驱动力，这种驱动力能够克服所谓的必然性，我们利用其中蕴含的自由；它们告诉我们，**一切都要服从必然性，反抗必然性是无济于事的。**但它们同时也否认了所有政治的可能性，就像它们自己的政治一样，结果同样糟糕。**历史应该是一辆碾过我们的车轮，想要抓住轮辐的人会被视为疯子。**只是，历史是一个生命过程，伟人的意志决定一次次介入其中，它与没有生命的轮子有什么共同之处？或者，历史应该按照固有的（“辩证的”）逻辑，通过正反两面的论点，达到更高的统一（综合）或更高的文化水平，而未来应该由这个决定，而不是由对有利或威胁现实的回答决定，这些回答要么及时找到，要么被命运所忽视？

对于思维薄弱、过度刺激的人来说，文化层次的顺序似乎就像因必要的冲动而变化和升级的东西，而文化应该是一个结构化的、独立的存在，它降临到人身上；人作为它的俘虏，而他是它的创造者，如果他累了，它就变得软弱。歌德也持同样的观点，

他认为必然性在更高层次上不断重复，就像螺旋上升。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等式，吸引着无数诡辩家走上这种不断升级的轨道，将世界历史中的数字简化为公式，甚至想借此预测未来。只是，犁头不能被发明出来，因为 500 年的任何理论都结束了，而是因为农民已经存在，他们想要它。历史像生活一样具有启发性，但主要是因为历史永远不会完全重复，而且因为每个历史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只发生一次，等待着征服它的主人。民族康复 人们仍然不知道所有的定律，尚未获得最终的洞察力，因此还不能应用已经掌握的知识，这种反对意见是值得欢迎的。人们特别乐意对遗传学及其在种族政策和人口政策中的应用提出这种反对意见。但研究永远不会结束，而必须永远继续下去。在所有其他科学领域，即使是在所谓的精确科学领域，如数学、物理和化学，也是如此。然而，技术从未停止过利用人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定律。经验与科学知识的增长会扩展并简化这些应用，但如果人们想要等待最终完全透彻的见解，那么这两者都不会出现，因为自然界的无限性决定了人类有限的智慧永远无法达到这种境界。因此，我们必须利用已有的遗传学知识，同时不损害未来可能出现的知识。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已知的方法培育出先天健康的品种，而且收获成果的速度也会更快，而且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实现许多只有付出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万事开头难，但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恰恰是这一点让那些从旧有损害中获益的人感到恐惧。那种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谬论仍然困扰着人们的头脑，并阻碍人们接受人类因其外表、基因和成就而存在不平等这一基本事实。由此产生的对人的评价被描述为更有价值的人的傲慢，是的，是不公正。人们将我们的愿望视为种族傲慢而加以鄙视，却没有注意到我们并不是根据种族来评判个人，而是根据成就。

但是，就整个人类而言，我们关注的是种族，因为北欧种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经受住了考验，其表现之卓越，足以让我们也选择这一种族来创造新的、甚至更伟大的成就。旧文化，尤其是印欧日耳曼民族的文化，曾创造过最伟大的成就，但最终未能确保自身的生存。它们已经消亡。**我们的文化也受到内部和外部威胁。我们能否实现目标？我们能否确保我们文化的生存，并能够发扬光大，将其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作为北欧人最后一批幸存者的我们，我们的种族乃至人类的文明，将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时间里面临危险，甚至可能就此消失。**

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么不仅我们得救了。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无与伦比的世界历史时刻，我们有决心让自己做好准备。

文化作为目标

对于那些把文化仅仅视为财产的人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对他们来说，德国国籍就像一个枕头，他们想躺在上面睡个安稳觉；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但同时也充满希望。我们希望精心呵护我们的国家，使其免受有害影响。有人嘲笑我们过于谨慎；有人说文化的魅力只在于其多样性。好吧，我们受够了这种过度刺激，我们将消除它。或者有人说： 文化必须发展，不能人为制造。**以前在我们中间泛滥的只是杂草，我们要消灭它们，让那些美丽而高贵的植物更好地生长，而它们在此之前往往枯萎甚至死亡。文化需要像森林、田野和花园一样得到呵护，而且这种呵护必须合理，符合自然规律，并使自然更加美丽有序。**

林业工作者、农民和园丁必须热爱自然，必须深入了解自然，还必须了解和学习很多自然知识，这样他们所负责的植物才不会生长得过于茂盛或变得荒芜。在市政建设、土地规划和古迹维护中，技术和历史知识同样重要。在贸易、生产、贸易领域，甚至在民族的学校和教育系统中，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任务都涉及道德和精神层面的最终需求。所有这些只有得到培育才能正确发展。对于这些任务中的每一个个体以及对于民族的许多其他文化任务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整体文化以及所有文化政策。热爱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解土地和资源的现实情况是基础，而那些以“无能为力”为借口的无动于衷的态度与我们格格不入。

通常，这只是伪装，各种团体和派系都打着这种幌子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且往往毫不掩饰。或者有人说我们对历史现实和既成事实毫无认识。然而，我们恰恰是从历史现实中得出种族和国籍价值的证明。当然，我们不承认既成事实。相反，只要我们还是德国人，我们就不会厌倦推动对一千多年审判的修改，因为审判之后，我们本应被剥夺遗产，被迫穿上号衣，身体最崇高的肢体会因此畸形。祖先的种族、语言、国籍、精神道德品质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所有试图消除这些的企图都未能得逞。我们从这种无价之宝中汲取了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且经久不衰的宝贵品质，并将其作为衡量文化成就内在价值的重要标准。**我们更倾向于那些从古老而真实的本质中萌发并与之契合的事物。**

但我们并不想要陈旧的东西，而是想要一些无条件的新东西，这些新东西仍然可以通过检验：正确性的检验。我们的新事物还必须符合我们的深刻见解和现实。为了研究现实，并充满活力地决心遵循通过研究得到认可的东西，这同样属于北欧人决定性的客观能力。

分类

因此，我们愿意证明任何可以证明的东西，并在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提出证据。但证据无法达到终极，它深不可测。尽管如此，它存在于我们心中，我们根据它行事，所有证据和理由都有其终极原因。民族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观，甚至更多。数百人可能为之献出生命，数千人可能为之洒下鲜血，数十万人随时准备为之献身。

众所周知，鲜血的牺牲尚不能证明真理，但却是对某种终极、永恒的义务的可靠证明。为一种理念献身的精神，在为了这种理念而活的精神中得以延续，并在克服日常生活的种种沉闷和障碍，将理念转化为行动的能力中经受考验。民族社会主义的种族和民族思想也赋予了这种力量。它不是因为被思考而赋予这种力量，而是因为被生活、认知、信仰和渴望而赋予这种力量。因此，它作为内在的联合而存在并发挥作用。为了对外描绘它，我们首先确定基本的东西，即我们追溯文化与遗传的联系，我们命运和自由的根源。然后，我们将视野从最亲近的环境——祖国和对祖国的热爱——扩展到世界历史和思想史的视野，以便从那里阐明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第三，我们讨论如何在种族和民族的基础上建立教育，以便使现在可能的事情和通往未来的道路变得清晰可见。最后，我们权衡：信仰、科学和欲望。

遗传与文化，种族、国籍与文化

如果我们谈论种族，那么，在物种内，如果一个更大的个体群体在许多基因（尤其是最重要的基因）的特殊且平衡的构成上达成一致，那么，他们也就认同了这些基

因所表现出的特征和特质。与身体和灵魂的统一相对应，它指的是身体和心理特征，在人类中，灵魂产生精神和道德力量，它还指精神和道德以及决定这些的基因。因此，种族是如此全面，以至于可能涉及各种科学来研究和描绘其本质的各个方面，包括其身体和心理、精神、道德、在当下的意义以及过去的作用。**种族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而自然科学的领域首先属于物理特征和特性。自然科学确实不能忽视心理特征，只是它们不是其实际和主要对象。**

然而，在人类中，心理特征会随着智力水平的提升而提升，因此人类科学与（心理）人类学相结合，而心理学和遗传学则搭建起一座连接生理和心理的桥梁，因为它们也研究心理特征和能力的遗传以及遗传因素。种族尤其属于自然史研究的对象。种族身体特征的遗传可以追溯到种族形成之初。在漫长的岁月中，种族基因保持不变，甚至一再出现种族混合。这些过程是自然过程，其发展历程构成了自然史。**种族是艺术科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心理、智力、道德特征与身体特征息息相关。心理（智力和道德）构成和表现与身体表现相对应，而且心理方面也是遗传的。但艺术科学考察和处理的是心理内容。**然而，作为自然科学的先决条件，对种族身体方面的洞察也是必要的。种族尤其是一个思想史的对象，因为种族的思想道德特征体现在其历史成就中，而思想史则研究这些种类繁多的文化成就。种族的自然科学和自然历史意义几乎只体现在动物身上，其中只有少数动物的智力水平开始变得对我们人类有意义。

另一方面，在艺术科学和思想史方面，种族在人类和人类成就的升级中，在民族和文化中，其智力道德意义逐渐凸显。我们可以将人们分解为不同的种族元素，在民族和文化中，发现其中所包含的种族内在态度的多样性。如果这种剖析（分析）是成功的，那么反过来，通过构成（综合），从种族元素出发来构建、解释和理解民族、民族性和文化也是可能的。

种族属性（Rassengut） 一个种族成员必须认同的基因，通过这些基因所形成的特征和成就，决定了这个种族存在的价值。这些特征和成就因此可以被定义为种族属性。关于这些种族特性的活动，现在人类与动物之间存在一个基本区别，不仅与人类最接近的哺乳动物（如类人猿）不同，而且与那些生活在类似组织中的动物（如蜜蜂、蚂蚁或白蚁）也不同：动物的生活几乎完全由本能支配，即使在群居或动物状态下，个体也会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动物之间几乎没有传授和学习。

另一方面，人类的驱动力几乎完全被提升到意识层面。模仿、沟通、帮助和表现自我的欲望以意想不到的力量蓬勃发展，并体现在对成就的认识上，即个体永远不会孤立，而是通过手势和语言与他人交流，后来还通过写作，从他人那里获得经验并添加自己的经验，将这种财产代代相传，最终甚至意识到自己在社区中的历史。鸟儿完全凭本能筑巢，即使它从未见过巢穴。同样，蚂蚁的行为也是纯粹本能的，甚至不需要任何交流。一群小蚂蚁建造的巢穴与其物种相符。尽管在某种或某种形成国家的昆虫中存在与人类文化极为相似的元素：语言、宠物、奴隶、花园和田野、麻醉品、葬礼等等，但老蚂蚁的指引和现有结构的榜样很可能对它们来说是不必要的。

但人必须重新学习几乎所有东西，如果人为地让他远离其民族遗产，那么他甚至远远落后于最原始的土著人，甚至无法用自己的语言交流。他是谁，取决于他人、其氏族、族群、民族以及与其民族交流经验与制度的其他民族的既有经验和制度。他继

承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特质，保证了他能够分享这些财富，前提是他必须去获取这些财富；然后他也可以增加财富，并将其传承下去。获取有价值的结果是一种传统，它引导人们利用他人发现的东西，新一代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蜜蜂有六边形的蜂窝，蜘蛛有八条腿的网，鸟儿有筑巢的习性，狐狸有家，人们有由种族决定的族群制度、经济形式、生活方式、宠物、器皿、武器和衣服、语言、艺术、文学和科学、宗教生活以及建立在这些细节基础上的整个文化。文化总是长期、持续和不断发展的传统所造就的。对这种发展和提升的每一次贡献、每一次发现、发明和改进，以及每一次传承，都是一种文化行为，并需要一个行为者，即承载这些文化成就的人，即创造、拥有、传承的人，简而言之，就是文化承载者。文化传承者和文化行为、成就者和成就之间的关系，就像基因和生物倾向的应用之间的关系。

只有朱利叶斯·罗伯特·梅耶（Julius Robert Mayer）才能用能量守恒定律丰富我们对无生命自然法则的认识，只有格里高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才能用遗传定律丰富我们对有生命自然法则的认识，只有歌德才能用《浮士德》丰富我们的文学，只有希特勒才能用国家统一丰富我们的民族艺术。幸运的结合需要特定的基因才能成就最高级别的成就，然而，这些成就只有在无数小成就和大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其中一部分是伟人自己取得的，但更多的是其他人取得的。因为即使伟大的成就也需要努力才能获得，如果自身努力不够，那么其他人也无法切实感受到。预见并铺平道路；但即使是农民对土地的耕种、生产工人的辛勤工作、尽职尽责的官员的平庸成就，也离不开这些文化传承者及其前辈的基因。每项文化成就都是这种基因、生物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特征的结果，而文化成就的价值则是衡量其赖以存在的特征价值的标尺。

然而，这些特性与种族息息相关，因此代表了一种种族属性，而文化成就作为这些特性的结果，只有被传承下去，才能保持其价值，因此是一种传统属性。人们将传承、流传甚至自身称为继承。人们应该想到歌德的话：“从父辈那里继承的东西，要努力掌握，才能拥有它。”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文化财产都是文化遗产。这种表达方式有其合理性。

只有当基因适合时，传统财产才能传承下去。如果缺乏基因，那么遗产就会被人遗忘，文化财产就会衰败。第一级和更高一级的种族财产 在遗传学理论的影响下，我们对遗产概念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人们将遗产定义为遗嘱人的财产、房屋、农场和财产。除了这些物质财产之外，身体心理特征和特性也是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这些特征在其中表现出来，其中一些特征只是偶尔表现出来，因此人们只在比喻意义上使用“遗产”这个词。今天，我们知道通过受精卵传递生物倾向和由此产生的特征的重要性，因此，血缘意义上的遗产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现实。如果人们谈论房屋、农场和财产的继承，那么现在从逻辑上讲，这似乎只是比喻意义上的。“继承”一词以及所有衍生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从外部物品和资产转向了物品的所有者、保存者和繁衍者，这是所有拥有、保存和繁衍的前提，也是新时代的重要成就。因为这是将知识道德的重心从结果转移到基于本质的原因上。但物质财产和知识财产（我们现在所说的继承只是象征意义上的）都与它们的持有者息息相关。原材料甚至矿山的矿藏也只是商品，只有人类存在，能够加工这些材料并掌握提取和利用这些材料的巧妙工艺，它们才有价值。 或者一个世袭的农庄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东西确实是物质财

产，但其中蕴含着精神道德的东西，这种东西通过物质财产表现出来，并一再向有理智的观察者昭示自己。文化的精神财富也是如此，它们也指向创造者和拥有者的本质和宝贵品质。物质财产和文化精神财富都是继承的财产，是这些继承财产的持有者的基因和特征的结果。

因此，文化财产的创造、保存、增加需要血缘特征。如果没有这些特征，文化财产将不存在，无法保存和增加。文化持有者的宝贵、文化创造性的特征是基础；继承的财产、他们的产品建立在这些特征之上。因此，我们有理由将基因特征的供应视为第一级种族属性，将传统价值视为更高一级的种族属性。第一级和更高一级的种族属性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不是直接遗传的，而只是由基因决定的。直接遗传的不是特征，而是生物倾向，或者更准确地说：反应方式，即有机体如何应对刺激和要求，对它们采取什么立场。每个特征和每项成就都是这种反应，它给出了一个立场，它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这同时也是价值评估和价值创造的最初阶段，如果给予更多的精神力量，就会达到有意识的阶段，并上升到智力的高度。然而，这些最初以及最高级的价值评估和财产创造是基于身体和灵魂的原始行为，因此是所有生物的生理心理结合。随后的反应和立场形成了种族属性，事实上，在种族属性第一级的完全无意识和基因最接近的阶段，是基于生物倾向、基因特征的，而在更高层次上，则是更高、更自觉的，最终通过这些特征和其中起作用的生物倾向的累积，经过深思熟虑和极大提升，形成了更高阶的种族属性。这些传统属性在最具天赋的种族中达到的量级越高，它们就会因为其高种族基因决定而变得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并从其环境条件中变得客观的、必需的。从实际中提取的有效性最终将表征最高阶的种族属性，我们仍将继续讨论这些属性。

更高（和最高）阶层的种族属性是不断增长的，是建立在第一阶层的种族属性基础之上的，就像房屋的故事和屋顶建立在地基和地下室之上。屋顶“更高”，但并不比地下室“更好”，两者相互依存，没有地基支撑，一切都会倒塌。音符与更高音符的关系可以作为另一个例子。音符一敲响，它们就随之响起，并决定音符的音调。

同样，当第一阶的种族属性在文化承载者身上产生影响时，更高阶的种族属性就会随之产生，并决定文化的独特印记。

但更高阶的种族属性并非“更高”或“更好”，它们也不可能独立存在。但任何此类比较都只能说明事物本身的一部分，而且这种说明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们是从无生命自然界（房屋、琴弦）中得出的比较，而第一级种族属性在更高一级种族属性中产生的结果则是有生命自然界中的一个过程，一个生命过程，因此具有其根本不可比拟的独特性。

其他生命过程也无法进一步说明这一点，而且这完全没有必要；人们必须自己坚持这一点。为了证明种族属性的一阶和更高阶之间的区别，现在也不必开始为文化成就赋予阶数。即使没有这样做，也很明显，例如蒸汽犁比轮犁更高阶，而轮犁又比简单的原始钩犁更高阶。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这样的序列，从而说明更高阶的含义。

人口和人口统计

“终有一天，全人类将被迫抑制人类能力的增强。物种，因为将不再可能调节土壤的生产力以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阿道夫·希特勒

问题

生育——不是经济、不是环境，甚至不是犹太复国主义——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换句话说，让一个国家完全控制其人民的生育，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权力，我们不妨不去尝试，因为任何其他类型的解决方案都无法最终解决。因此，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要求——在一切之上——国家拥有绝对的、无限的权力来控制生育。一个除了生育之外控制社会各个方面的国家，就像一个司机可以控制车内除了刹车之外的所有开关。

纷争的起因

“说实话！我们每个人不是都说过：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必须发生吗？人类未来难道不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吗？！”——鲁道夫·赫斯

好像这本身还不够可怕，石油峰值即将来临……

几乎所有战争都是由相互竞争的经济利益所驱动，特别是资源相对于需求的稀缺性。纵观历史，只有在资源极其丰富、所有需求都得到满足的时期，战争才会消失。然而，这些时期总是短暂的，因为每当一个社会获得新的资源时，它的需求很快就会相应增长，直到再次不满足。因此，实现和平的唯一根本策略不是增加供应，而是减少需求。

个人贪婪并不是需求不断增长的唯一因素。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因素是生育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基因贪婪。因为即使假设世界上每个人都愿意回到生存水平的消费，只要人口继续增长，需求就不会停止增长。因此，和平只有通过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愿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少人口才能实现。事实上，任何声称重视和平但人口却没有持续减少的国家都是在撒谎。此外，如果要真正有效，人口减少的速度必须快于资源消耗的速度。

“因此，对于那些真诚地渴望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人来说，最好的做法自然是尽其所能尽快将世界交给那些有远见的人；至少不要试图阻止他们征服世界。不幸的是，大多数和平主义者要么根本不想要和平，只是假装想要，要么想要和平，但只是在某些与和平的建立不相容的意识形态条件下想要和平。”——萨维特丽·德维

雅利安人的和平观建立在普遍的同情心之上，与所谓的“和平主义者”的和平观截然相反。我们并不声称和平会带来繁荣，但却指责对繁荣的渴望是永远阻碍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在战争之间的平静间隙中感受不到和平，就像我们在汽车加速驶向墙壁但尚未撞上墙壁时感受不到安全驾驶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会说“要爱，不要战争”；因为性会导致生育（这本身就是对即将出生的孩子和已经在这里的其他人的暴力），最终导致战争中丧生的人，生育者手上沾满的无辜鲜血比士兵还要多。

问题不断加剧，人口决定命运

“我确实相信艺术、音乐、文学、自然哲学等事物即使不能拯救我们，至少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么现在呢？现在我必须承认我不太确定。五千年来，这样的事情：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改变了吗？” – 大卫·迈亚特

我们对遗传特征重要性的立场很简单：对于个人来说，遗传特征意义不大；但对于群体来说，遗传特征几乎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我们当然鄙视那些将自己的卑劣归咎于

基因，从而不试图通过认真努力来弥补遗传缺陷的人。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历经许多代的群体来说，通过努力来弥补正是允许遗传缺陷通过欺骗任何本来可以消除这些缺陷的选择压力而继续积累的过程。对于任何选择过程来说，没有什么比候选人试图“玩弄制度”更适得其反的了。

希特勒曾说：“问题不在于人为地改善现有一代人——由于人类的特性，百分之九十九的改进都是不可能的——而在于从一开始就确保未来发展有更好的道路。”我们应该对那些通过认真努力弥补遗传缺陷的人给予应有的赞扬，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尽快寻求消除这种努力的需要。这只有通过人口规划才能实现。

总比没有政策要好，但这仅仅触及了国家对生育控制的全部潜力。

人口问题 + 人口统计问题

“由于劣等生物的数量总是超过优等生物，如果劣等生物拥有相同的生存和繁衍能力，那么它们的数量总是会增长得更快；最终的结果是，品质最好的生物将被迫退居幕后。因此，必须采取有利于品质更好的纠正措施。”——阿道夫・希特勒

如果人口规模是我们唯一的问题，那么解决办法就很简单：我们只需教育人们不要生育。事实上，人口过剩几十年来一直是当代人意识中的一个问题，许多人口减少的倡导者正是这样做的，并获得了大量志愿者。问题在于，自愿不生育的可能性与遗传生育力呈负相关。换句话说，自愿减少人口运动会留下一个由未自愿减少人口的人的后代组成的人口，这个人口比原来的人口更有可能具有更高的遗传生育力，因此不太可能产生新的志愿者。因此，从长远来看，自愿减少人口运动在结构上会导致志愿者耗尽。简而言之，如果不同时解决人口问题和人口问题，我们甚至无法解决人口问题。

“成千上万次，我们总是呼吁志愿者，一次又一次。而结果总是一样。……成千上万的人挺身而出，因此这种人材逐渐变得越来越稀缺。……他们的损失远不止是数字上的。随着他们的死亡，社会结构中代表我们人类最优秀品质的那一端已经太轻的天平现在迅速上升，另一端则因那些卑鄙的、臭名昭著的懦夫分子而变得越来越重——简而言之，构成我们人口中最坏极端的因素有所增加。”——阿道夫・希特勒

如果你是认真的，那么首先除掉那些不愿意的人。

因此，显然，解决这一双重问题必须依靠国家权力：禁止那些不愿意生育的人生育，并让那些愿意不生育的人再生育一段时间，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原始人口，而且可以同时减少遗传生育力。民族社会主义首先认识到国家在人口和人口统计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控制人口和人口统计是国家最重要的长期职能。

“我最近读到一篇由某位博士先生撰写的文章，他主张禁止在被占领区销售避孕药。如果有哪个疯子真的试图推行这项措施，我很快就会砍掉他的脑袋！鉴于当地居民的生育能力极强，我们应该非常乐意鼓励妇女和女孩随时采取避孕措施。因此，我们不应该禁止销售避孕药，而应该尽最大努力鼓励销售。我们应该向犹太人求助！他们有着无与伦比的商业意识，是做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 – 阿道夫・希特勒

但民族社会主义并非唯一认识到这些事实的政党，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小心地将我们与同样主张国家控制生育的敌人区分开来，因为他们不是盟友，而是最深层次的敌人。当国家控制生育成为必需时，我们将与他们展开一场关于人口统计学的意识形态较量，而人口统计学将不可逆转地决定世界的命运。

雅利安化，不是优生学

“伟大的哲学变革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转化为充满活力的生命。”——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

关于民族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弥天大谎是错误地将其与 20 世纪早期的优生学运动联系起来。首先，早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成立之前，英国和美国就根据弗朗西斯·高尔顿的著作提倡优生学。其次，民族社会主义选择性育种根本不是优生学，而是雅利安化，即基于雅利安理想的种族理想主义。优生学家们自己很快就意识到，民族社会主义的选择性育种概念与他们自己的概念大相径庭；早在 1934 年（即在美国正式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采取敌对态度之前），麦迪逊·格兰特就明确警告哈里·劳克林不要因为这个原因支持希特勒，而洛斯罗普·斯托达德（曾亲自采访过希特勒）认为民族社会主义的愿景在他看来令人困惑和难以理解。

公平地说，纳粹党内的许多人——最著名的是叛徒海因里希·希姆莱——要么不理解，要么不在乎优生学和雅利安化之间的区别，并因此造成了混乱。正如希特勒厌恶地回忆道：“有人给我看了一份由内政部起草的调查问卷，该问卷旨在调查那些被认为需要绝育的人。至少有四分之三的问题会让我慈祥的母亲答不上来。我记得有一条问题是：“为什么钢铁制成的船会浮在水面上？”如果这个系统在我出生前就被引入，我敢肯定我根本就不会出生！”

优生学和雅利安化唯一的共同点是反对无差别生育。理解两者差异的最简单方法是将无差别生育称为遗传自由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优生学是遗传保守主义，而雅利安化是遗传激进主义的一种形式。

优生学是在既定文化框架内监督促进达尔文适应性。它通常分为消极优生学（防止具有不利于既定文化特征的人繁衍）和积极优生学（鼓励具有有利于既定文化特征的人繁衍）。关键在于优生学将其对象锁定在既定文化中。人口越优生，其超越能力就越弱。优生人口只能沿着现有轨道以越来越高的能力“进步”。

“一个错误是坚持并努力应用不道德、不神圣的永恒斗争原则，或者现在通常、粗俗且相当错误地称为适者生存。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阶段：不仅能够有意识地、理性地理解变化和进化的过程，因为它们适用于我们人类，而且还能够利用我们的理解力、意志力和同理心以道德的方式改变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好。” – 大卫·迈亚特

老式的优生学家谈论最大化“人力资本”，表明他们认同人们仅仅是无休止的活动或进步（经济、学术、技术等）的驱动力。他们通常专注于智商测试分数和其他衡量在一个致力于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中“竞争”能力的指标。考虑到犹太人的平均智商测试分数明显高于非犹太人，而且他们确实利用自己的智慧来争夺权力，并且取得了与他们的数量不成比例的成功，这样的优生学家可能更青睐犹太人而不是非犹太人。有些人甚至警告说，智商测试分数对于维护民主很重要，然后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民族社会主义者——历史上最公开反对民主的人——对他们的论点不以为然。事实上，智商测试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被禁止，理由是重视智商测试分数反映了一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希望阻止这种世界观。

“尽管人们很容易认为犹太人的智力至少与其他种族相当，但犹太人完全缺乏文化民族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即理想主义精神。”——阿道夫·希特勒

更有想象力的优生学家谈到“超人类主义”或“后人类主义”，其术语本身就包含着同样的观点。在将他们所期望的进化描述为“人类到超人类/后人类”时，他们对超人类/后人类的概念本身就暗示着基于人文主义价值观（即在堕落的道路上进一步推进），并且——像所有“进步”的信徒一样——不知道何时停止，而不是认识到人文主义价值观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变身术！这肯定也是个好主意，对吧？

相反，雅利安人首先承认卑鄙的适应性的威胁。绝大多数提高生存能力的特质（包括毫无目的的求生欲望）在道德上都是负面的。战争期间，大自然青睐强奸犯而非非强奸犯，暴政期间，懦夫而非烈士，繁荣时期，追求财富的人而非追求真理的人，等等；在每种情况下，前者平均比后者多产或物质上更安全。用萨维特丽·德维最喜欢的案例研究来说，大自然青睐成吉思汗（如今有 16,000,000 多名遗传后裔），而不是希特勒（没有遗传后裔）。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大自然也青睐成吉思汗的性奴隶而非希特勒。让卑鄙的人变得更聪明的想法在我们眼中是可怕的，因为这会让这些人将更多的智慧用于追求卑鄙的目标，从而加剧我们的问题。

事实上，包括优生学在内的自然选择的逻辑结论是基因锡安，在这个世界上，奴隶主天生残暴，永远不会仁慈，而奴隶主天生卑劣，永远不会反抗，这样的世界永无止境。(“难道没有必要进一步证明我们的统治是上帝注定的吗？” –《锡安纪要》）卑鄙的适应性的后果是可持续的邪恶。

作为这种未来的坚决反对者，民族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将雅利安人的特征（即贵族的遗传品质）固定为我们的目标，并改变环境因素以促进其人口增长。相对于现有文化，雅利安化实际上是一个逆向发展的过程，因为它肯定会导致现有文化的终结。但这正是我们的目标。

概括：

1) 优生学确定了在遗传上促进既定文化发展所需的选择压力标准，然后在繁衍过程中强制执行这些标准。(“智力低下和精神错乱的阶层非自然地日益迅速地崛起，再加上节俭、精力充沛和优越阶层的持续限制，构成了国家和种族的危险，这是不可能夸大其词的。我觉得，在明年之前，应该切断和封存疯狂之流的源头。”——温斯顿·丘吉尔（犹太人））

2) 雅利安化决定了在遗传上体现新贵族文化所需的选择压力标准，然后在繁殖中执行这些标准。(“我们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还不是一个真正优越的物种，而只是一种将其更高智慧应用于任何动物都会达到的自私目的的生物：为了个人利益，最多是为了同类的利益。我们确信，单凭智力并不能证明人身上的任何真正优越性。能够并且确实——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人——宣告人类真正伟大的是同情所有生命；这不仅仅是智力上的承认，而是所有生命团结的感觉。” – 萨维特丽·德维）

3) 两者不能同时进行，因此必须选择其一。

种族卫生

“只有一种耻辱：尽管自己有病有缺陷，却仍然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阿道夫·希特勒

我们只关心以雅利安人理想为衡量标准的品质，并理解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血统的混合发生在史前时期，因此我们断然拒绝以“种族通婚”这种民族中心主义的说法来描述当今不同族裔背景的非犹太人之间的生殖配对，这是一个轻率且完全非民族社会主义的术语，起源于 1864 年大选之前的美国，是大卫·古德曼·克罗利（David Goodman Croly）的一种宣传恐吓骗局，归根结底是一个源自《塔纳赫》的犹太教概念。正如希特勒所承认的：“摩西律法其实就是保存犹太民族的教义。”此外，希特勒强调，我们绝对不应该试图模仿犹太人的这种态度：“我们看到犹太人和定居民族在伦理、人生哲学和对待他人的态度上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他们真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同样，‘保持种族纯洁’的理念也永远不能从犹太人转移到雅利安人身上。”

与此观点一致，**纽伦堡法案只针对犹太人，而非非犹太少数民族。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明确：“有一个基本原则。某些民族的德国化问题不能用抽象的思想和理论来研究。我们必须研究每个具体案例。唯一的问题是确定任何种族的后代是否会与德国人口很好地融合并改善其状况，或者是否相反（例如当犹太人血统与德国血统混合时），会产生负面结果。”**希特勒甚至幽默地回忆起他的部队对这一原则付诸实践的（过度）热情：“我收到的[德国士兵与外国女性结婚的]请求数量非常多。……大多数相关女性要么畸形要么丑陋，从种族角度来看，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因此，有记录显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与他们在交流项目中遇到的日本青年团成员配对（其中至少有一次生下了孩子）。埃米莉·申克尔从未因与苏巴斯·钱德拉·博斯的结合（生下一女）而受到严厉批评。希特勒亲自鼓励弗朗茨·维默-拉姆奎特娶毛里塔尼亚公主塔米拉。瓦尔特·伍斯特的妻子是一名伊朗学生。而且，与多民族汉斯·J·马萨奎等犹太复国主义叛徒关于对跨民族结合所生子女强制绝育的谎言相反，马萨奎本人从未试图绝育。同样，多民族的伊迪莎·霍恩在纳粹德国也拥有成功的演艺生涯。“莱茵兰混蛋”一词（被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无休止地引用为“纳粹种族主义”的所谓证据）甚至不是纳粹德国引入的，而是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创造和普及的。而针对他们的绝育运动经常被归咎于纳粹德国，实际上是威廉皇帝研究所（一个私人组织，其资金并非来自纳粹德国，而是由美国资助）的一项流氓地方举措。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你能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吗？），因此从未传播到莱茵兰以外。

马萨奎（右）在只允许雅利安人进入的公园。后来他加入了只允许雅利安人进入的 Bramfeld 拳击俱乐部。他还与当地女孩约会，包括一名党卫军军官的女儿，而且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二战后，他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作家，抱怨“纳粹种族主义”（大部分是虚构的）。马萨奎抱怨说他不被允许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同样多民族的沃纳·埃吉奥穆埃可以加入，而且确实加入了，因此这并不能证明纳粹德国存在种族歧视。

事实上，近亲繁殖的负面影响引起了希特勒的更多担忧，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职责是系统地推行种族政策。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哪怕只是为了对抗由于某种程度上血缘关系的结合而开始威胁我们的退化。”正是由于这种开放的态度，当时独立的种族理论家，如何塞·巴斯康塞洛斯（他预言最终将在北美和南美形成一个“宇宙种族”，其基础是监督所有到达那里的种族群体的融合）希望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取得胜利，并

因此从德国驻墨西哥大使馆获得了出版资金。（这些思想是在种族中心主义成为学术和大众话语规范的时代开创的。因此，人们只能想象，如果没有这种背景压力，这种反种族中心主义思想会受到多么少的限制。）

这是一位真正了解第三帝国历史的人。

我们仅从种族卫生的角度考虑，基于雅利安人特征的质量以及所涉及的两个人（可能是任何肤色或种族来源的组合）的整体身心健康以及微观遗传层面的生物兼容性（例如隐性缺陷）。 同族配对可以是卫生的或不卫生的，就像跨族配对可以是卫生的或不卫生的一样，因此种族问题是多余的。 例如，Tay-Sachs 病的携带者无论与非携带者还是与另一携带者生育都是不卫生的，因此根本不应允许其生育。 （即便如此，未来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禁止不卫生夫妇结婚，而只会禁止此类夫妇生育。）

因此，雅利安化可以看作是一种重建育种。 纳粹德国批准的试点项目展示了重建育种的力量，即赫克牛和赫克马，它们分别是古代野牛和塔尔潘的重建，通过对许多现代品种进行反向繁殖而实现。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转移到雅利安重建中，通过重新组合史前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雅利安人特征。

“以种族观念为基础建立国家的世界观最终必将成功开创一个更高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将不再只关注繁殖和饲养纯种狗、马和猫，而是将努力改善人类本身的品种。”——阿道夫·希特勒

“因此，为了提高世界各地人类生活水平，避免无谓的战争，全世界最应该立即采取的措施就是停止无差别地生育婴儿。”——萨维特丽·德维

解决方案

虽然人口必须尽快开始下降，但必须以人口统计学上合理的方式下降。归根结底，唯一应该生育的人是那些最愿意自愿不生育的人，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就最不愿意生育。他们的态度比其他人更无私、更英勇、更不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换句话说，他们是雅利安人，正是我们在人口统计学上需要更多人口的人，以便长期成功减少人口。

此外，只有那些天生认为生育是对出生的孩子施暴的人（例如那些本能地宁愿收养孤儿也不愿生孩子的人）才具有善待孩子所必需的高尚品德和服务精神。希特勒自己决定不生育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他说他把纳粹德国的所有孩子都视为自己的孩子。相比之下，那些将孩子视为保护自己后代的工具的人则暴露了他们的自私和缺乏同情心，这也必然会体现在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应该被允许生育的另一个原因（即使在没有人口紧急情况的情况下）。

那些可以通过金钱、名望或其他好处来激励生育的人，从定义上讲，都是非雅利安人，因此，这种奖励对优生学家来说可能有用，但对雅利安人毫无用处。激励雅利安人生育的唯一合乎道德的方式是建立一个系统，使他们生育的越多，出生的孩子总数就越少。例如，国家可以设定每年出生总数的初始最高限额。但随后，国家可以增加一条规则，即人口中预先指定的雅利安子集每生育一个孩子，就会将下一年的限额降低两个。这意味着，雅利安人生育每个孩子都会产生阻止一个孩子出生的净效应。因此，我们对人口减少的热情越高，我们生育的孩子就越多。（可以通过根据需要增加算术梯度来放大激励，例如，雅利安人生育每个孩子可能会阻止 10、100、1000 个孩子出生。）

潘多拉魔盒

“关于外太空的探索和定居——不久前，我曾得出结论，我们人类太卑鄙、太野蛮、太不文明，不适合这样做，而且，如果我们真的在地球以外进行这样的冒险，我们只会传播耻辱：传播我们傲慢的疾病。”——大卫·迈亚特

以色列月球飞船将携带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

太空定居对人口减少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如果在我们完全雅利安化之前，技术发展到允许在地球以外居住的水平，我们将失去对生育的控制，因为那些不在乎的人可以简单地在其他地方定居并繁衍后代。外层空间的庞大规模和几乎无限的定居可能性将使此后几乎不可能重新控制生育，而这样做的尝试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噩梦。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这种技术的出现，同时以最紧迫的方式追求上述人口和人口统计目标。

在神话中，众神给了潘多拉一个盒子，但告诉她不要打开它。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打开了盒子，从而将之前被关在盒子里的所有邪恶瘟疫释放到了人间。这些瘟疫一经释放，便四散而去，潘多拉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在恐惧中，她猛地关上盒子，就在希望——唯一能够对抗邪恶的力量——即将离开之前，世界从此被瘟疫肆虐，没有得救的机会。潘多拉是世界上第一个人类女性，而这个盒子是她的结婚礼物，因此，她释放的瘟疫正是人类本身。

几千年后，我们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雅利安人找到了盒子，并以民族社会主义的名义释放了希望，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人口和人口结构，就没有理由不能一劳永逸地将瘟疫送回原处。坏消息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找到了一个更大的盒子，盒子的盖子——太空旅行——他们现在想打开它，以便进入盒子外面的领土。

不要让我们耗费余生去追击整个宇宙的敌人，并几乎毫无希望地试图控制损害。

外太空定居的前景和所有敌对言论，这些言论都助长了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好奇心，必须在每一个转折点上揭露其真面目：这是在呼吁打开第二个潘多拉魔盒，这将引发一场无法控制的人类流行病——这一次不仅在整个星球上，而且在整个太空中。人类人口在几个世纪内从数百万增加到数十亿，而这还只是在地球上。如果考虑到太空可能提供的栖息地数量，我们不想处理我们将达到的数字。只有民族社会主义才能阻止这种情况，只有民族社会主义才能看到正在酝酿的危险，只有民族社会主义敢于阻挡洪流。你和我们在一起吗？

民族社会主义——生物学的世界观 海因里希-里斯-克努德森

“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正统观念，即人们认为所有有正确思想的人都会不假思索地接受的一套观点。虽然人们并不完全禁止发表这种或那种背离主流的观点，但“不这样做”是正确的。任何挑战主流正统观念的人都会发现自己被以惊人的效率压制了声音。无论是在大众媒体还是高雅期刊上，真正不合时宜的观点几乎从未得到过公正的对待。”

——乔治·奥威尔

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您经常发现很难与非民族社会主义者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您常常觉得这种对话根本不可能，你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当然，造成这种

可悲局面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敌人将民族社会主义宣传为人类邪恶的巅峰，在公众心中制造了这种印象。然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从他们幼年开始，他们就能通过电视生动地了解到自 1945 年“人文主义胜利”以来肆虐世界的各种恶意和残忍。

与上一代人相比，年轻一代对生活及其各种问题持更加客观的态度，这种趋势非常令人鼓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完全了解民族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也不意味着当他们被告知时就能理解。他们成长的世界刻意疏远一切自然价值和自然道德规范，教导他们一切都是相对的，真理与谎言之间的界限不复存在，因为没有绝对的事物，一切都取决于你选择如何看待它。在这个没有价值观的世界里，人们生活在精神真空之中，与现实世界、残酷的生物法则以及绝对的道德和社会义务完全脱节。在这种政治和哲学体系中，民族社会主义思想不可避免地被视为不可理解的异类。

与当今无忧无虑的相对主义（至少原则上所有观点都是可以接受的）不同，民族社会主义代表着人们不懈努力寻找绝对真理，并以此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然而，与空洞的哲学家和东方神秘主义者的模糊言论不同，民族社会主义基于常识，在现实世界中寻找论据，真理与谎言、善与恶的区别由事实决定，而非一厢情愿的想法和理论上的空想。因此，很明显，民族社会主义必须摒弃所有统治意识形态的概念和道德规范，这自然会导致难以弥合的理解鸿沟——原因很简单，民族社会主义者和那些受现行秩序思想左右的人之间没有共同的参照系。民族社会主义意味着与整个统治世界秩序的哲学基础进行绝对、不可逆转且毫不妥协的斗争。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们将尝试解释这种对决的含义。

正如前页所述，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理念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几乎无关。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它只是代表一些或多或少具有物质主义性质的集团利益。他们的目的只是拼凑出一个足够模糊空洞的政治纲领，以吸引必要的选票，从而在议会平台上建立“人民选举的代表”，他们可以以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也许还有他们的党员）尽可能多地谋取利益。民族社会主义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涵盖了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作为这种世界观的信徒，你会从同一个角度看待社会中的所有现象，因此每个方面都成为统一整体的一部分，就像你在各个领域的观点都是由同一统一原则决定的，这使你能够理解和解释生活的方方面面及其奥秘。因此，世界观是追随者对宗教、道德、政治、经济以及个人生活安排的态度的基础。当然，现在民族社会主义并不是唯一声称涵盖生存各个方面的生活哲学。其他例子包括所有宗教，它们原则上为每个信徒提供了在生活中的各种情况下指导其行为和态度的准则。

然而，如今，宗教不得不做出妥协，以弥合宗教教义与现实之间迅速扩大的鸿沟——在过去 500 年里，这种鸿沟导致旧世界的基督教国家世俗化程度不断加深，**如今，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西化政府脱离了严格的宗教社会结构，转而推崇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唯物主义。**一个社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并极力强调政治与宗教之间的统一，霍梅尼的伊朗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以色列，它基于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的宗教信仰，认为犹太人拥有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领土的神圣权利，因此，特别是最正统的团体拒绝任何对塔木德律法的轻微偏离。

该法律是旧游牧社会的产物，无法适用于现代工业国家，这导致许多典型的闪米特建筑规避了严格的宗教规则，例如安息日和 Shmitta 年，所有土地都应该休耕，但事实并非如此！类似的手段在阿拉伯国家也有，因为这些国家与贫困“作战”，所以斋月或多或少被永久废除了。所有这些“欺骗”的尝试都清楚地表明，在拥有西方技术的现代世界中，这些世界观完全不足以作为指导方针——它们不足以阻止追随者追求这种新生活，这种新生活不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而是成功寄生生活的结果。这种失败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宗教建立在盲目信仰而非现实的基础上。

自然，虔诚的基督徒也希望保留《圣经》作为一切思想的最终权威和焦点。因此，天主教会不断试图在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等传统天主教国家增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为此，它必须获得政治权力。然而，它的主要弱点是，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以及应强调基督教教义的哪些部分方面存在许多内部分歧。同样在北美，基督教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有基督教政党，他们试图将所谓的基督教价值观作为其政治纲领的一部分。然而，宗教在这些政党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这仅仅是因为基督教已经失去了对人们的控制——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在北方人眼中，基督教总是一种异类，他们对基督教的诠释往往与基督教精神相去甚远。如今，基督教已经沦为不合时宜的遗迹。以丹麦为例，该国 95%的居民都是路德教会的成员。然而，只有 2%的人会去教堂，而声称信仰基督教教义的人则更少。基督教作为一股精神力量，在人们心中已经消亡。然而，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人生哲学，它所代表的世界观支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们所在地区的其他政治思想则主要关注琐碎的行政和经济问题。这些思想与对生活的总体基本态度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着松散的联系，但就人的精神需求而言，它们在原则上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它们并不排斥任何宗教信仰——相反，它们总是强调完全的宗教自由，并声称宗教和政治互不相干，应该保持距离——仿佛宗教与政治相比是不重要的。因此，所有这些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成员可以是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无神论者或佛教徒。他们的宗教信仰被认为与他们的政治工作完全无关。他们团结一致，试图解决国家机器中一些定义明确的实际问题，但他们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精神目标。如上所述，这种分裂确实与宗教的本质相抵触，但宗教团体如果想对社会施加任何影响，就必须或多或少地接受这种分裂。

民族社会主义这种真正的人生哲学，绝对不容许将生活如此原子化地分割成互不相干的不同部分。民族社会主义能够通过应用其基本哲学的原则来解决社会中的所有实际问题，其追随者无需任何外来因素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民族社会主义本身就能充分解答人类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众所周知，宗教完全建立在信仰之上——这是它们引以为豪的！因此，上帝的存在、圣母无原罪、复活、第二次降临等都是无法证明的——当然，除非你接受上帝是《圣经》的作者，这是你必须相信的另一件事，尽管你可能有相反的证据。如果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相信，你就是怀疑论者——就像多疑的托马斯一样。

与这种无知而自豪的态度相反，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主义都声称建立在科学真理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是在书桌后发明的，书桌上摆满了学术和哲学书籍——但与现实或科学没有任何联系。仔细观察，马克思主义与任何宗教一样，都是建立在信**

仰之上的——即建立在完全不科学的信念之上，认为所有用两条腿走路、没有羽毛的生物都是平等的，以及认为决定历史的因素是生产条件，就像人们声称决定个人发展的因素是环境，而不是遗传。这当然是本末倒置。不用多费脑子就能明白，实际上，是人在塑造环境——建立社会秩序，包括生产条件——而不是相反。与其他哲学不同，民族社会主义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源于永恒的自然法则，这些法则与宇宙同时存在，自原始生物诞生以来就主宰着一切生命。

已故著名民族社会主义哲学家萨维特里·德维（Savitri Devi）在她的著作《闪电与太阳》（The Lightning and the Sun）中清晰而优美地阐述了这一点：**“从本质上讲，民族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超越了德国和我们的时代，也超越了雅利安人、人类本身和任何时代；它最终表达了自然界赖以生存和创造的神秘而永恒的智慧：原始森林、海洋深处和黑暗空间中的星球的非个人智慧 领域；阿道夫·希特勒的荣耀不仅在于回归了这种古老的智慧，还在于将其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实用再生政策。**

换句话说，民族社会主义并非阿道夫·希特勒所发明，而是对支配我们生活的自然基本法则的有意识表达。它基于对万物创造的无限热爱，对自然智慧的深刻、无条件尊重，以及保护生命（源于自然智慧）的强烈意愿。唯一的方法是根据这些基本法则来组织人类社会。因此，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就像反对万有引力定律或地球是圆的一样荒谬、不合逻辑！民族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将物理和生物定律应用于人类生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领域，就像它们今天应用于技术领域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社会主义是真正科学的——不同于任何其他世界观。它并不希望让现实符合任何先入为主的理论，而是让理论符合现实。因此，划时代的科学里程碑将立即反映在民族社会主义社区的现实生活中。

当然，我们有时可能希望这些定律有些许不同，但我们必须接受它们无法改变的事实。

自然定律无法通过联合国大会、美国国会或任何其他国家议会的投票来废除或修改！如果所有人类和所有种族生来平等，如果没有任何遗传因素支配和限制我们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也许一切都会变得简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且绝对不可能通过一厢情愿的想法改变这一事实，即通过假装这些法则不存在。在这样一厢情愿的想法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是一种致命的罪恶，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我们看看我们的敌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建立的社会时，这些后果就显而易见了。

他们一致将民族社会主义称为“邪恶的福音”——而他们自己统治的世界却正濒临经济和道德灾难，饱受通货膨胀、失业、犯罪、无意义的暴力、吸毒、污染、色情、腐败、饥饿和生态灾难的困扰——自 1945 年以来，这个世界只经历了 16 天的和平，而在此期间，有 3000 万人被屠杀。在这个令人沮丧的世界上空，笼罩着可怕的核战争威胁，它将摧毁地球上所有高等生命。 难怪人们总是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 不幸的是，这种恐惧和无助感在雅利安人聚居的地区最为普遍，因为那里的颓废和道德沦丧最为严重。

在这里，人们完全背离了所有健全的自然价值观，变成了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焦虑不安只能靠物质上的富足来缓解——他们一直在与经济混乱作斗争。尽管现代世界物质丰富，这些人却既不快乐也不满足。他们完全缺乏理想和热情，对未来也失去了

信心。雅利安人甚至不敢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由于看不到未来，他宁愿享受当下的奢华，也不愿保护自己的种族和文化。

他试图在这个污水池里为自己争取尽可能舒适的生活，唯一的希望是这场不可避免的灾难不要在他有生之年发生。因此，他只能被动地看着祖先的土地被外国人慢慢但稳步地占领，而入侵者还不知道他们疯狂的行为意味着所有文明的终结。这就是我们的敌人 1945 年向世界承诺的黄金时代——这就是他们在拥有绝对权力的四十年里所能够建立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前景确实令人沮丧。然而，事情不一定要这样发展。世界之所以陷入如此险恶的境地，完全是因为人类完全无视自然法则。

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当你意识到当前秩序的本质时，你不可避免地会觉得自己来自另一个星球。你无法参与这个系统，在这个社会框架内为生存而进行的日常斗争似乎只是徒劳的浪费时间。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我们设想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其基础是“自然界赖以生存和创造的不朽智慧”。只有在这种新的世界秩序下，生命才能在这个星球上长期生存。然而，为了建立这种新秩序，人类必须接受自己并非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事实。人类不是创造的主宰，而是自然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其他所有生物一样，必须遵守同样的法则。

同样，他还必须接受一个科学事实，即人类各民族不仅在外表上，而且在心理和智力特征上都有所不同，而且，归根结底，所有人类都是不平等的个体，他们的生活主要取决于遗传因素，而不是环境。这当然看起来“不公平”，但人类必须认识到，自然界中不存在我们通常理解的正义概念。作为人类，我们可以——也应该——建立一个以法律和社会正义为基础的社会，因为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因此他们有权要求法律给予平等的保护，免受经济剥削。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这是必要且自然的安全保障——事实上，这也是人类致力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需要这种保障。然而，我们无法创造生物学意义上的正义——正如我们无法创造生物学意义上的平等。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有些人年纪轻轻就遭受可怕、痛苦且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折磨，而另一些人却可以健康地活到一百岁，这似乎总是极不公平的——而且，即使那个 25 岁就去世的人拥有更卓越的智力，可以为人类做出比活到老的人多得多的贡献。无论我们对此有何感受，事实就是如此——尽管我们拥有高超的医疗技术——人类必须学会接受自然界并不认同我们的正义观，任何试图在来世引入某种神圣正义的做法都只能被视为逃避现实的荒谬尝试。

在这方面，民族社会主义的敌人经常声称，作为民族社会主义基础的生物学人性观是“不道德的”。

对此，我们只能回答说，这些反对者的所谓“道德”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们所依据的规范和价值观并非基于自然。对于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只有一种真理：自然法则。任何与这一真理不完全相符的事物都是绝对错误的！这当然意味着对基督教的彻底否定，因为基督教非自然的双重性是主流“道德”准则的基础——也是这一准则以自由/人文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为幌子的基础。根据基督教，人因拥有神圣的灵魂而在所有生物中享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这种灵魂是普遍的、非生物的。它不会因种族或个体而异，也不取决于个体的智力或其他任何心理或生理素质，更不会遗传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受自然影响。正是这种灵

魂使所有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平等的，无论他们做什么或是什么人，只要他们相信上帝。在基督徒看来，将人视为生物因素的产物是一种“贬低”。基督教认为，人的一生就是在神圣的灵魂（精神）与“物质”（即自然）之间不断斗争，或者从个人层面来说，就是与肉体（代表邪恶）斗争，只有战胜了肉体，才能在云端未知的天堂中获得永生。

尘世生活只是为来世做准备——要么进入亚伯拉罕的怀抱，要么坠入地狱，这取决于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抗争得有多成功。地球上的生命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只是眼泪的深渊。

因此，基督教的特点是对生命和自然的蔑视。它是一种失败者和梦想家的宗教，他们无法应对生活的挑战，只能苟延残喘，相信“最后的人将成为第一，第一的人将成为最后”，**因为基督教认为任何犯罪的无用之徒和智力缺陷的傻瓜比勤劳和有创造力的公民更有价值。它代表着一套规范和价值观，将处女置于母亲之上，将僧侣置于家庭之父之上，将弱者和受苦者置于强者和胜利者之上，甚至将死者置于生者之上。它蔑视生活中的任何快乐，将自我折磨和自我贬低视为积极的表现，认为人应该与肉体抗争，并接受自己生来就是罪恶的容器，因为人并非完全由精神构成。**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如此。基督教代表了一种变态的、厌世的、对生活的不健康态度，在任何健康的社会中都是不能容忍的。坦率地说，**基督教是一种精神上的艾滋病**，它摧毁了我们对抗非生物思维的自然免疫力。这是一种污染心灵的疾病，必须用一切手段与之抗争。与基督教徒不同，民族社会主义者应该活着。他应该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展现自己的个性，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应在生物性的界限内。

他不应一生跪在中东神灵面前，为生而入世的“罪孽”祈求怜悯和宽恕。我们希望看到自信、和谐、对自己和人生使命充满信心的人，而不是那些因“原罪”等厌世观念而恐惧、沮丧的人，这种观念只会让人生只剩下一丝乐趣：只要相信并忏悔，上帝就会宽恕你。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多元世界观否定绝对价值，导致人们变得自卑和绝望。

我们不是无神论者。我们相信神的存在，但我们的神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耶和华截然不同。对于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只有一位真正的神：不可捉摸的创造力，它无处不在地体现在自然界中。我们向这位神致敬，对自然法则的智慧表示崇敬和尊重。

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我们只听从大自然的召唤，只遵循大自然的道德准则，我们只知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试图反抗这种道德准则。虽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民族社会主义者当然完全清楚，人与所有其他生物体有一个特别的不同之处：人拥有独特的思维能力，能够进行抽象思考。这种能力使得人类能够避免或减轻其他生物必须承受的自然残酷。我们的大脑使我们能够治愈原本无法治愈的疾病，并找到许多自然法则的基本原理，从而能够利用其中的一些原理来造福人类，并（无论好坏）开发探索地球和利用其财富所需的技术。

不幸的是，当我们觉得无视自然法则比遵守自然法则更舒服时，我们的大脑也会让我们有意无视自然法则。**在原始社会，你会很快感受到这种违反法则的后果，但在高度发达的技术社会，你违反自然法则后，可以存活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不会感受到必然的报复。**然而，它们迟早会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到来，到那时，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很难弥补错误。最后，我们独特的大脑还赋予我们任何动物都难以企及的情感：

对未知的恐惧、对死亡的确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某种东西的迫切需求，这种东西能够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安全感，并让人看到生命中除了单纯地追求物质享受之外的意义。**这是宗教背后的需求，但与宗教不同的是，民族社会主义致力于满足这些尘世需求。**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的是，大脑和情感都不是孤立、非生物的因素，而是生物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人的身体特征一样，“精神”也受遗传方面的自然法则支配。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我们坚信，必须对整体社会进行组织，以便考虑到自然法则的方方面面。**因此，仅仅通过建立良好的经济生活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是不够的。还必须确保精神需求得到满足！**

人类的敌人经常声称，民族社会主义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强制和操纵的世界，个人被剥夺了自由和个性，只是为了成为无意识的大众的一部分。当然，这远非事实。事实上，这更接近于对民主的描述。**民主人士将人民视为一大群灰色人海，其中个体之间的差异被解释为偶然环境影响的结果，社会必须“纠正”这些影响，以使人们“社会化”，从而适应民主方式。另一方面，民族社会主义则尊重个人。我们知道，所有人在生物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拥有不同的天赋和能力。将所有这些个人天赋整合到社会框架内，是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只有这样，才能利用一个民族的全部智力资源——既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社会。然而，我们也知道，天才和进步从来不是来自大众，而是来自杰出的个人。**

只有确保个人有机会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尽可能自由地发现和发展自我，我们才能推动人类不断走向更高层次的完美。如果我们要解决民主制度实行后世界面临的巨大问题，这是必要的。显然，不可能将人们提升到超越其与生俱来的发展潜能的水平，因此，所有试图在各方面实现人人平等的愚蠢尝试，都必然会导致在最低水平上的统一，即压制所有智力或其他方面高于平均水平的人。这种趋势并非民族社会主义的产物，而是民主的产物，它不可能改善地球上的生活条件。

然而，任何培养精英阶层的尝试都被视为对民主制度根基的威胁，因为民主制度认为，每个人都不仅应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还应享有对公共事务的平等影响力，无论其是否具备必要的素质。这样的制度只会将国家引向深渊。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层将由国家最优秀的人才组成。只有他们才能解决出现的问题，并承担起责任。民主议会中的个人成员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所有决定都是通过投票做出的，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多数——无论他是否同意。

显然，议会为社会中最堕落的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型商业企业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寻找并培养最优秀的人才，让他们担任公司领导职位，而任何没有受过教育的政治骗子只要拥有合适的人脉，且不表现出过高的智慧，就能成为自己国家的总理或总统。这太可悲了！

这种否认人类个性和生物差异的做法也导致“基因卫生”概念被彻底压制。如今，卫生只是指洗手和刷牙。人类确实知道“遗传卫生”的原则，而且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培育马、牛、狗、鸽子、鹦鹉等——一切都遵循最佳遗传原则，但到了繁殖自己的同类时，人类却完全抛弃了这些原则——仿佛它们只适用于动物世界——甘愿导致人类的生物性全面退化。在自然状态下，每个种群都会受到生物选择的影响，这意味着最适合特定环境的个体会脱颖而出，而无法适应环境的个体则必须消亡。这是自然界

无情而残酷的法则之一，人类通过建立社会来缓解这一法则的影响，社会也为弱势群体提供了生存空间和保护，他们在发达的社会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如果我们完全无视自然法则的存在，我们也将走向灾难，因为我们将无法确保人口中必要的生物素质，以维护一个强大到足以保护弱者的系统。如果不考虑生命的生物学现实，我们将陷入弱肉强食的境地，最弱小的个体将最先灭亡。

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并非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意味着弱者被抛弃，听天由命。恰恰相反！民族社会主义是弱者免遭毁灭的唯一保障。然而，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弱者并非理想状态，而是必须与之抗争的对象，而只有通过相应的遗传卫生才能做到这一点。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将启发人们了解生物机制，从而确保人类恢复这方面的自然本能，使人类在生物学上取得进步。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人类已经达到了发展的最高峰。然而，为了使人类进一步发展，社会必须确保疾病和弱点不会通过遗传而延续下去。将痛苦转移给后代并在基因上破坏人口是一种对后代犯下的罪行！

与此同时，社会还必须确保有一个健康的环境，使由外部因素引起的疾病永远消失。我们不仅考虑社会环境和工作场所的条件，还考虑生态环境。在民族社会主义社会中，完全不能接受的是，唯利是图和贪婪的物质主义允许在食物和衣服中添加致病的人工添加剂，在家庭和公共建筑中使用不健康的合成材料，以及日益严重的地球、空气和水污染——更不用说将持续数十万年的致命放射性污染。这一切都是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对生命真正价值的彻底扭曲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遗传卫生和一般污染控制只是同一原因的两个方面：保护自然和生态平衡，以确保人类持续的精神和身体健康。如果没有健康的环境，即使最好的基因也会被破坏，而没有足够数量的这些基因，就没有人能够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良好的环境还包括健康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们可以和谐快乐地成长。而当前社会存在的另一个弊端是，这种家庭正在被非生物学的思维和女权主义者的胡言乱语所摧毁。

正如种族不同，性别也不同，认为男女在生物学上是平等的观点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他们之间的差异不是社会“性别角色”的结果，而是生物学角色的结果！女人生孩子并非巧合。她不仅在生理上适合这项任务，而且在心理上也是如此。作为新一代的母亲，她在社会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认为她必须通过加入劳动力队伍并在装配线上找到工作来“实现自我”，而把孩子交给他人照顾的想法是错误的！女性只有在履行母亲这一生理角色时才能实现自我。没有母亲，家庭就会崩溃。孩子们只能靠自己或接受国家教育。

当他们回到家时，没有人有时间陪他们。他们没有接受任何理想教育，从电视、不良音乐甚至更糟糕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偶像。他们以快餐为生，成为最恶劣的商业物质主义的牺牲品。也就是说，如果女性不选择避免生育，那么她要么使用某种“节育”工具，要么在怀孕后选择堕胎。当然，女权主义者声称，由男性照顾孩子，女性去工作，这同样自然。事实上，如果这同样自然，那么男性也会生孩子。

相反，女性生物学将始终意味着女性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她们不像男性那样稳定。更不用说那些需要一定体力的工作了。 犹太裔法国女权主义者伊丽莎白·巴丹特（Elisabeth Badinter）在一本新书（《L'un est l'autre》，意为“此即

彼”，由 0. Jacob 出版社出版，巴黎，1986 年）中要求将子宫和卵巢移植到男性体内以确保平等，这并不奇怪！一个社会如果有人读这样的书，那这个社会确实病入膏肓！

人类不仅是个体，也是社会存在，这是人类生物性的一部分，而他的社会本能超越了核心家庭。从人类最早开始群居，以便更好地抵御原始生存的危险。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人类几乎无法作为一个物种生存。换句话说，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生存的条件，而组织社会的冲动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有组织的社会，每个人都要忙于收集日常必需品。那么就没有多余的资源用于艺术、科学、教育或任何健康服务。高度的组织化是文化和技术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最高等文化总是由组织能力最强的民族创造，如雅利安人，这绝非偶然。

然而，在任何有组织的社会中，个人都必须适应与社区其他成员共享的规范，并且避免以有害于社区的方式滥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因为社区的发展才使得这些才能得以发挥。然而，团体内部的必要忠诚不能仅基于物质考虑。仅仅设立一个共同福利办公室是不够的。**在一个有着共同命运的团体中，放弃一些个人自由才是明智之举。这个团体由有着共同背景、共同规范和价值观、共同人生目标的人组成——他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都在同一个领土上生活，并捍卫着这片领土，因为他们希望保留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生物特征。正是这种愿望造就了与我们的民族天赋、观念、理想和价值观密切相关的文化——我们称之为民族灵魂的东西。其他民族拥有不同的天赋、观念、理想和价值观，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可能与我们的文化一样“优秀”，但对我们来说却是陌生的，正如我们的文化对其他民族来说一样陌生。**

谈论一种即将出现的、普世的、所有人都共有的“世界文化”是毫无意义的。一种并非自然形成的、无法反映一个民族灵魂的“文化”是对“文化”一词本身意义的否定，历史清楚地表明，每一个文明一旦无法保护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文化，而只是将碰巧遇到的任何外来文化元素进行吸收和整合，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一个由各种种族、宗教和哲学随意混合组成的社会，肯定不是当今人们所宣称的“精神和文化财富”的体现。它是一个荒谬的杂烩，其存在没有任何理由——这表明国家即将解体，所有规范和价值观都将彻底瓦解。

这样的社会是真正社区的堕落模仿——它不可能持久，因为临时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忠诚被对宗教和哲学观念的更强烈的忠诚所打破，而这种忠诚的基础并不在国家本身及其历史中。对社会的凝聚力构成最严重威胁的，莫过于生物意义上的种族混合，它总是与文化混合相伴而生，甚至成为文化混合的前提。文化本身的解体随时可能停止，一个民族可以重新找到自己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只要种族基因没有改变。然而，种族混合是不可逆转的——其后果是无法估量和灾难性的。事实上，自然界一直在朝着更大的种族多样性发展。通过不自然的种族混合，我们目睹了各种天赋被抹平，而这些天赋都是由种族决定的。当一个种族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发展，并基于其发展的特质建立了一个社区并创造了一种文化，那么与其他种族的混合意味着，几代人之后，杂种后代将失去理解其祖先创造的一切的条件。

不幸的是，由于种族混合，我们有很多机会研究我们所处的社会。拉丁美洲、印度和埃及都是很好的例子，希腊和罗马帝国也是如此。就像印度、波斯和埃及文化一样，希腊和罗马文明也是由北欧人为主的移民少数群体创造和维持的。这些高度发达的少

数民族首先压制了原来的多数民族及其文化，但后来他们逐渐屈服于前辈的数量优势。他们因无数次战争而元气大伤，失去了最宝贵的鲜血，又因西亚洲虚假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受到颠覆，他们逐渐给予被征服民族越来越多的公民身份，并从他们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带来新的奴隶和劳工——这些人在下一代被融合并获得了公民身份。

这肯定是一个熟悉的画面，不是吗？正是北欧民族的瓦解，将骄傲的希拉国[Hellas]变成了今天的希腊，将罗马变成了意大利——或者换一种说法：文明变成了混乱！在学校里，你仍然至少花一些时间教孩子们了解古代文化，但不会提及创造这些文化的人。

一个国家组织起来的能力可以完全消失，这似乎并不难理解。事实上，如今大多数自称为“罗马人”的人在种族上与强大的罗马人前辈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他们的祖先中有太多人居住在地中海以南！**如今，一提到种族生物学，就会遇到一大堆禁忌。研究种族生物学已经变得很“不正经”了**——如果你想要研究的是人类种族的话——甚至医生和所谓的人类学家对此也一无所知。想要了解这些知识都会对你的事业造成损害，所以何必在意呢？

因此，人们总是带着轻蔑的嘲笑坚持认为，不存在任何“纯粹的”白人种族，“雅利安人”只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名词，等等。这些论点当然并非完全错误，但结论却是错误的！欧洲不同种族确实混合过，但这是同一主要种族（即所谓的白种人）中密切相关的种族之间的混合，你可以称之为雅利安人种——前提是你明确说明你指的是什么！此外，这种混合（绝非完全混合）对欧洲人绝对有利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而且绝对没有理由通过进一步混血来延续这种分裂的过程。

无知的人还声称，为了避免“近亲繁殖”，种族混血是必要的。这当然是不符合生物学常识的。近亲繁殖仅指近亲之间的繁殖，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他们必然彼此相似。通过近亲繁殖，我们积累了各种遗传因素——好的和坏的。如果父亲和母亲携带相同的基因，那么后代很有可能（或有可能）将这些基因累加在一起，而如果我们几乎都携带不幸的基因，因此显然不希望这些基因累加在一起。积极基因的积累在这里并不重要：遗传性疾病的高发倾向并不能被其他积极品质所抵消。然而，近亲繁殖只会在非常小的群体中构成危险，比如在一个非常小的岛屿上，或者所谓的“皇室”或“贵族”家庭中。在拥有数百万人口的人群中，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存在近亲繁殖。

无论如何，添加种族外基因元素并不是避免近亲繁殖的好方法。这只会导致个体不和谐，因为父母之间的差异太大。对此，无知的人会反驳说，**在动物界似乎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在植物界，不同品种的杂交也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当然，这确实是真的，**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严格控制的杂交，科学家们事先已经确定了他们想要培育的具体品质。**

因此，在选择亲本时，您会考虑这个目的，选择那些拥有您想要杂交的最佳品质。当您有了后代，您会再次选择拥有您想要的大部分品质的那些个体。它们会被用于进一步的育种。剩下的只是被作为不可避免的浪费而屠宰。继续用这些个体进行繁殖会产生与期望相反的结果。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随意繁殖。如果误操作，必须销毁后代！

所谓的“杀人蜂”说明了杂交繁殖的严重后果。它们是试图创造一个具有高繁殖能力的强壮品种的人为产物。结果就是一群群极具攻击性的蜜蜂，它们根本无法为花朵授粉。其中一些蜜蜂意外地从实验室中逃出，如今它们已成为整个拉丁美洲和美国南部地区的严重威胁，部分原因是它们对动物和人类都极具危险性，因为它们会杀死任何移动的东西，而且它们还会取代普通蜜蜂，导致植物无法授粉。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如果必要的控制失败，种族混合会导致什么后果——再想象一下，人类种族的混合传播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可能没有人会建议对人类种族杂交采用与动物杂交相同的程序——更何况我们这里涉及的因素比动物复杂得多。决定人类能否满足社会需求的是性格、智力、创造力和内心和谐等因素，而不是身材、肉质或产奶量等容易定义的东西。众所周知，**混血会大大削弱这些品质。**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主张无限制种族混合的人都没有告诉我们，现在涌入雅利安世界的异族元素能够丰富白种人的哪些可取品质！无论如何，当前社会各领域瓦解的趋势都不可避免地让人们感到不安全和不快乐。只有在由具有相同文化、历史和生物学背景以及对未来抱有相同精神追求的人组成的真实、和谐的社区中，个人才能找到内心所需的安宁与安全感。只有在这里，人类才能感受到自己是更广阔整体中自然的一部分，感受到自己比个体本身更强大，并且当个体消亡时，整体仍将继续存在。就像个体出生前就已经存在一样。只有在这种命运共同体的国度里，人类才能找到他们一直追求的永生。我们的子孙和人民将永存，但这是我们仅有的永生。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可能就从未活过！

另一方面，如果人必须在民族共同体之外寻找自己的身份和人生目标，那么这个共同体就失去了意义，并不可避免地像婚姻一样分崩离析，因为婚姻中的伴侣除了居住地之外别无共同之处。

这是民族主义者的基本观点。

然而，团体内部的忠诚必须是相互的。不仅公民必须忠于社会，社会也必须忠于公民。因此，忠诚的前提是公正的社会条件和经济体系，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人被剥削，每个人都竭尽所能维护共同利益，以维护保障共同价值观、公民生命和幸福的秩序，并赋予每个人在人民永恒生命中的应有地位。

这是社会主义者的基本观点。

没有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是荒谬的，反之亦然：没有明确界定的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是没有意义的。今天，人们经常声称，民族社会主义的态度会导致战争和试图压制其他民族。**这绝对是胡说八道。事实恰恰相反。只有承认种族和文化差异的存在和可取性，才能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生物特性——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特性，就很难尊重其他民族的特性！**如果你否认种族差异的存在，那么很明显，你会不断试图将你认为最好的东西强加给其他民族，而无视他们的特殊性。**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都持有一种灾难性的观点，即：无论种族，只有一种文明适合所有人。**

这种观点是上个世纪欧洲殖民帝国的基础，也是当今不断将现代工业化世界贫瘠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强加给天真无邪的第三世界人民的基础。这些第三世界人民只看到表面的光鲜，却无法计算成本。这将成为他们的失败，就像我们的失败一样！消费社会只看到市场和消费者——在这里，统一是关键。

统一的客户群没有特殊需求，这使得生产更简单、更便宜，这意味着更大的销量和更高的利润。民族特性和不同的文化模式在这里是令人讨厌的，因此受到打击。对于跨国公司和连锁店来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只要他们能够消费。**他们完全无视人类价值。他们践踏人类价值。**对于民族社会主义来说，差异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我们希望维护这种秩序，包括种族、民族和个人之间的差异。

我们绝对不希望让某个黑人部落信奉我们的宗教、吃我们的食物或使用我们的法律。我们希望其他民族找到自己的未来之路。

当然，如果合作对双方有利，我们很乐意与他们合作，但我们不会打扰他们。**如果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路，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我们不寻求与任何人发生冲突——我们只想和平相处。然而，我们并非和平主义者。我们知道，有时每个民族都必须为生存而战。否则，民族就会灭亡，我们不能坐视不理，任由自己的人民被毁灭。如果我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我们必须捍卫自己，我们知道，只有建立由相互尊重的独立国家组成的新民族社会主义世界秩序，才能确保持久和平，使世界免于即将来临的核灾难。

如果世界不接受民族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的唯一希望，人类将面临毁灭。这是人类不断违反自然法则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不会终结宇宙。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地球和人类只是庞大机器中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部分。

如果我们消失了，过去一万年的各种文明也不过是无限永恒空间中微不足道的插曲——一个失败的实验。即使发生全面核战争，地球上的某些地方可能仍存在生物生命的基础，然后向更高形态的发展将重新开始。即使地球在这样的战争中或因其他原因被完全摧毁，在太空中某个遥远太阳系中另一个星球上的某个地方，也许在五万亿光年之外，很可能存在生命。**无论如何，大自然将永远存在——即使没有人类。即使没有生命，宇宙中仍然存在自然秩序。**

宇宙不会为人类制定任何特殊法则，如果人类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毁灭就是他们应得的，任何事物都无法改变这一点。然而，我们认为让这种情况发生是可耻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试图在最后关头让人们听从理智。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您愿意加入我们吗？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您的孩子。当然，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的生存正面临威胁。

您还能浪费更多时间吗？

跋：

意识形态的性质是不同于“道德与纪律”或自然法则的，民族社会主义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分类，民族社会主义基于个体的人与非个体的民族的自然发展需要，它应当被归类为种族本能，文本原于质，非文制质。而意识形态多数是学者的外来臆测，并常常受制于其人所居的时代———**以乱易整，不武**。

其次，意识形态是四职失分的直接结果，不是领袖的解决方案，是异族与商人的解决方案，而民主和平等是保证错误方案不倒的方法，民主抛弃了领袖，平等不可能负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不能代表世界各民族的愿望，社会主义是一种追求社会

正义的态度。各民族都具备追求它的能力，这种追求在历史上是一条忽明忽暗的线，天下大乱，于是有社会的选拔，然而它并没有持续下去，血缘制将对君主素质的要求转移到后天修身上，幸运的是，贵族的种子总会有些洒到不同职业的人身上，后者通常更具有社会正义的趋势，同时具有更进取的思维。

今天，出人意料的是，我们走的是古代先王的路，只不过绕了个远罢了，各个民族都会拥有自己的社会主义形式，不必等外来的解救。就像**马克思主义就是犹太民族的民族社会主义**，铁卫团是罗马尼亚的药方。

一个国家的形成，必须将权力授于族内的优秀分子，那么这个广袤的世界里，也是英雄的民族和商人的民族间的斗争。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具有绝对的民族界限的正义性与对虚伪政治思想的排斥性，一个民族之内可能有许多的民族社会主义派系，但是，他们强调的什么上下左右都是不重要的。如果想知道谁是对的，那也只能通过时间和结果判断。但是巴结人民，受制于人民的意见与舆论，总是做人民看法的奴仆，他们放弃了上天赐于的世界观的伟大武器。变成了一群以飘忽不定自命不凡的人，我们应当做人民意见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因为正确的秩序是确定的，从古到今。

民族社会主义是态度的基础，也是指导生活的基础，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即种族意义与精神上贵族化战胜无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证明与筛选了种族因素上优秀的人，敢于不向无知的民众低头的人，敢于战斗的人。我很高兴许多人今天是法西斯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他们是智慧的，不因犹太人的威吓而举枪投降，他们是有灵魂的，他们能教导自己，发现自己想要什么！——因为民族形式的思想高于意识形态，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结果，正如狗会狗叫，猪会猪叫一样，也可能是郑人买履罢了，意识形态骑到头上去了，意识形态的接受者是不是个人性的取决于其内容，一群个人性的确是破坏力，阻碍了民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一个民族不能被一种意识形态拯救，只不过是我们在选它们和创造它们罢了，也不一定合身。

一个不符合其民族灵魂的理念只能拥有集体个人主义的信徒——直接的结果是促进民族组织的破坏。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于其它政治理念的要点便是坚定的世界观代替了脆弱的理论——纠结致密的理论，实践的胜利就是理念的胜利。一个国家出现了成熟的法西斯蒂或是民族社会主义或是其它追求公益的民族主义运动只证明了一件事：他们民族或是意识形态或者自然秩序具体的理念种族层面上要遭到或者已经遭到危险。因为正常的民族组织的变化或进化不会引起民族根本命运的斗争。

唯一的道路就是先找到实际生物意义上的民族，文化与精神基于种族的本质，文化毕竟不是“武”化，是“文”化，是一种自我驯化，这一过程决定了外在，也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内在，民族社会主义所服务的民族必须很明白，主体民族的地位是国本，并不是拿钱换的，而完全是拿战争取得的。

社会正义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不甘从本质上灭亡的表现，哪怕从运动的教义来看，1848 年的革命里确实不乏民族斗争与民族主义，很快，它实际的精神冲出来撕烂了这些被利用的民族帷幕：**资本主义胜利了，在短暂而必要的民族主义情绪调动后，个人主义迎来了它的胜利，因为个人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但本身的民族生物基础是存在的，和个人主义是矛盾的，产生了民族社会主义——对个人主义两种形式的反

动，对犹太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一次挑战，我们的能力取决于我们的民族，而民族的任务是维护自身存在，只有战争与思想的战争——不论内外，可以自保民族无患。

任何意义上的民众，社会的斗争，都是自然等级被破坏的结果，**人们很明显不是平等的，平等是压迫者的疯狂，是不同职业的人之间更大的疯狂。**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我们所希望的领袖职业没有了，或者是还在我们之间奋斗着，**但毕竟有政客，于是开了一些先河，他们不懂得了职业的安排，他们本身来源于没被限制的经济阶级，短视且随意，和穷苦人们流血战斗，遇着便来着一个屠杀。**

一个伟大的国家只会拥有一种主要的种族，而不会是种类混杂的“臣民”。统一的种族——民族[Race—Nation]是统一与伟大的基础。包括财富在世界内的运用也是以族为壑。一切统一的国家机器，文化，动员，风气，经济，都源于一种种族——民族的独占性。很可以相信的是，和平主义的目的是限制民族的自然扩张需要以达到避战的目的，结局就是自行消灭人口，为表忠心，限制军备。很大一部分的优秀分子在摇篮里被扼杀了，直接地导致了种族活力的削减，进而只能从非“血与土”的间接方式如“贸易——国际——生产”的手段忽暗忽明地保佑余下的人。

一个国家的外策:宣传，行动，最好是坚决一致的，宣传上的妥协也是妥协；哪国要是真的认真执行和平主义政策，只能说他们没有一点脑子，连小聪明都没有。民族社会主义鼓励工人与农民对现行秩序的斗争，但我必须劝告:第一，他们不许里通外国，第二，消除匪性，过犹不及。工农兵商的斗争将为自己祖国的地位定了基础，但不能沦为妄自尊大的借口，协力越团结，这个民族就更伟大，一个民族的勃兴不可能依靠软弱而因可替换性而不负责任的资产阶级，很明显，民族同胞需要一个以众胜寡的大革命，充分发挥他们的生产性和智慧，而不是被作为一个被承诺或根本没有承诺的，金权下的死零件。

他们需要一个政治上的“领袖”防止他们被平等的剥削，无论是什么形式的领导，反正是以权固权，而不是钱，金钱不应当成为新的权力，我们要恢复人的权力。一个健全民族的总职业必须是完整的，因为每个人必须明确自己在秩序中的地位，拒绝，深刻地拒绝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国际金融的烟雾。至于具体的职位，社会竞争是必要的，遗传的规律更适用于整个民族

四职结构如下：　　注意：[如果统计职业成员数量的话只有三个]

1，领袖[第一职业]

2，贵族——经济委员会

维护经济正义，修订经济时务，培养职业荣誉，铲除阶级斗争，自身没有特别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经济团体或阶级的干涉

3，贵族[作为可选项]——官吏[第二职业]

4，劳动者与商人[第三职业]

还有不在范围内的亚人

民族基础和职业秩序完备是缺一不可的，不在民族基础上建立的职业秩序都会崩溃。我们认为这四者是因为然规律产生的，职业间在某方面的不自识会导致灾难，经济时代阶级的假象，旧的领袖职业倒下了，**但人们用一种愚蠢的制度阻止了新领袖总职业**

的产生，也就是真理开始由不相干的人决定了，至于很自由的第二职业与第三职业则是相互自由的憎恨与屠杀罢了，没有什么谁更正义。无产者的惟一变化是技术上的，时间上的，他们并不创造什么历史，只是对历史有所反应，他们无法改变协力体系，无法代替领袖职业停止职业斗争的职能。惟一的方法是重建领袖的总职业。凌驾于经济物质精神的团体之上，阻止第二，三职业轮流执掌政权，阻止分散在工农兵商中的亚人搞破坏，尽管这像火灾总会发生。

总职业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方法组织，使它克服亚人的煽风点火，使它明白不为第二种民族服务的道理。对外国民族的崇拜是一种尤其的危险。民族没有原罪，但他们必须为历史和今天负责，**政治的最终代表是民族，不是相同或是不同的主义，也不是政治的分歧。**

有以人心治人心的，无论采用了什么方法，最终都会失败，惟有借天道治人方能成功，即使臆断与以人类的不自然证其本身就该不自然也没有用，**天道是自然的，不会因为浩荡的游行队伍所改变，不会因法条所改变，故意的修改与规定是对民族创口上撒盐，罪上搭罪，以罪论罪。**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并不来源于已经处在蒙敝里的旧世界的思想家，而来自于不可否认的，构成人的自然基础。

一些古代的形式的确是符合当时的天道，它的腐朽不是因为这些产生这些形式的思路，而正是因为废天道的结果，一个步步相逼的过程，愈演愈烈。———今天的恶不过是封建君王尾巴的延续。疯狂的巴黎群众们推翻了国王，接过了继续反自然秩序的接力棒，新瓶子装旧酒，不断地重复。旧的社区崩溃了，“血与土”的固定也在松动。古代的优秀形式正在消失，新的却混乱而不连续，像多变的人一样。

我们如何认识历史？

阶级史观认为一切文明、科学、国家、军队什么的都是阶级矛盾的产物。

但我们是不会这么认为的，我们认为历史是自然秩序上升或下降的结果，其次是民族的斗争，两者相互影响而一者的变动可能是另一者的启发，自然秩序的升降完全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最表象可以看出来的，民族斗争则在于一种种族筛选与构成民族斗争这一单独的历史，自然秩序的变动将会影响民族斗争的方式与烈度，民族斗争也会影响自然秩序的升降，然后决定它们自己的命运，**这往往被一个民族的领袖职业所决定，领袖的职业之消亡与堕落必然导致其非人格化，进而平等于第二职业，平等于商人胥吏一类，变成了资本家或官吏的职业专政和职业间的激烈斗争，无论是第二职业还是第三职业，都是要求坐到第二职业逐利努力的位置上，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来原，**自 1848 年以来，几乎一切理论都是服务于这个目标，1848 年之后的世界，其实与那些末代君王们遵循同样的反民族原则。我们需要重建领袖职业，凌驾于经济职业之上而使他们完全服务于民族，进而恢复一定的自然秩序，建设四职完备的国家。

意识形态犹如一种寄生虫，我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不属于在大革命后在自然秩序已经崩溃的情况下才写作的意识形态作家们的作品**，它们是种族的自然，是自然秩序精神的延续。远古的种族斗争决定了绝大部分的种族分布，后世以战争，再后来出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意识形态的全球斗争，一切反民族意识与反种族的努力因为斗争的需要——犹太人与世界斗争的需要而被提出。

民族斗争的结果是塑造了历史，斗争的结果在于民族的内部时策与领袖职业的质量，人民的斗争是为了重建领袖的领导权，在尘世中好立足，而不是破坏民族结构，万世为奴。谁一直追随自然法则，哪个民族就能胜利，人民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只是对历史不断地有所反应和参与。

人民，并不仅限于“体力劳动者”或无产者。**而是同一民族或国家内所有依靠诚实活动而生存的人**，一个劳动与需要并存的共同体，是生产性的活动被约束下的经济所组织的对象，是民族存在的经济层面与数量层面的基础，是普世通用的政治起始条件。民族的另一面即为人民，任何民族皆为其特殊的民族性，民族灵魂，与四海皆准的人民性，物质的结合。民族性自有其生物学基础，当其人群相聚，并且以族类相排斥外人，再加以血与土的斗争:一个民族保护其显性与隐性生存空间的意志，应当是最强烈的

1. 土地
2. 种族
3. 经济
4. 文化

后二者为隐性生存空间，绝对受前两者控制，此四者是民族在生物学与文化意义上存在的基础。

文化首先会自觉地指导贵族与圣人教育人们，以扩大种族的精神，确定一种四海来王，八方向化的权力。并且，生存空间的标准是浮动的，主要随人地比例[物质祖国对人的满足]而动。一个民族的扩张，要么夺取广大的土地，给养同一血统的人，要么用经济，文化，社会的手段破坏它国的民族主义基础，使其唯一的领导力，“民族性质”消灭，进而利于入侵者寄生，失去了民族贵族的领导，自然要用人民[物质人]政治代替，然而人民政治的结果就是人民永远无法管理自己，无非是自己盲目性的奴隶，在最需要民族的地方，最需要专业化的地方——没有专业化，我们首先中了犹太社会主义这民族斗争的一箭，又中了如同多米诺骨牌的一万箭:一系列人民化与无产化的措施。

我们很明白，阶级斗争，也就是异化的职业斗争的启发者，进步运动的执行者的民族:犹太人，他们正在让奴隶跟主子一条心，以便合理的做主奴，以至于万世。

犹太人的民族性即为国际性，而他族对犹太人的斗争却不像犹太人征服世界那样自发和持久，“国际”在各民族间似乎取得了极大的胜利。

这一切，我向您承诺，都是暂时的，如果亚欧古老民族的血液没有被摧毁的话，如果东亚的“交领着装种族”[就是东亚的主人]在种族攻势下能够全面胜利的前提下……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犹太人就是杂交的产物！杂交是其世界政策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政治能力由其内的优秀成员决定，其成员的优秀与否与自身种族密切相关。政治的艺术就是民族性正确规划人民的艺术，反之则为民族斗争的牺牲品。这种行为一部上不受意识形态制约，一部分受到个人决策的充分影响。

民族，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分子或激进分子口中抽象的符号，而是实际存在于世间的组织，尽管和组成人民的是同一波人。人民是产生经济的人，没什么异议，民族作为经济的主人，而不会是阶级，它包括资产者与无产者。这里没有同胞的对立，只有协力的作用，经济本身并不可以作为一个根本目的。经济衍生的产物也是，一切经济的

目的必须为了民族而设立，不能囿于任何无产或有产的经济斗争中。这是民族性对盲目的人民性的控制，人类至今的艺术，绝不是经济活动产生的，而是种族，民族的作用。

人类间绝不是平等的，但又很难说高低贵贱，但是同胞总是要高过外国人。观看艺术品，是了解民族性质的途径，堕落的艺术，总是和世界上的亚人们相关，也和一个民族的内部斗争相关。然而技术与种族并没什么切要的联系，它是人民性的产物，它总是与人民对生存空间进行适应時产生。

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是有其生物意义与经济意义上的极限的，在广阔的地表上，已经根据这民族斗争的历史，分布与分化好了，远道而来的征服者，会因被征服者发生改变，要么因为经济上人民的要求，正义地脱离了作为同一民族容器的母国，而将这血液在另一片土地上发扬。

民族自有其自然分布，技术与物质渴望可以作为一针药剂暂时或长久地改变这一点，这通常作为外国的指令或是吸引力出现。以实现破坏种族的经济理由，挑起人民性质的妄动——不只有犹太社会主义希望的红旗标语，还有反民族的一切努力都开始了！

民族失去了对其财富与工具的统制运用，在技术极度膨胀的条件下，经济的技术:自由主义，终于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实际的实施上，分化了民族的成分，解体了更有组织的但是互不统一的民族组织，它们是根据一定时期里的，出于民族组织理念而形成的，例如:祠堂、分封制，行会，朝廷等，其僵化是其整体遭到攻击的理由，但是非民族政治直接替代了这种思路。通常情况下，民族斗争的用具是武器，但最具杀伤力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只有一种:意识形态，你们要明白，我们的任务是与一切意识形态斗争，民族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种族，道德纪律，而不是玩弄标签和笔法，我们是道德先于立场的人，这里讲的民族社会主义是民族政治的，不涉及民族特性的一般情况。它是原理，而不是在实施中受到种族灵魂影响的结果，而结果们又通常叫各种各样的名字——蓝衣社，铁卫团，国家法西斯党……它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民族与人民的纽带首先是统一的。

至于种族以及种族的美德，这如同鱼烂不可复全，丧失很难恢复，民众天生是有其种族根本的，个人不在民族里是不会启发的，这启发几乎在于教育以及参与服务民族的过程，这就是一个受到道德与纪律训练的人民性质活动的过程，形成民族共同体的过程。

民族斗争构成了世界历史，血统决定了其在斗争中的地位，英雄的民族世界观又与商人[逐利]的精神发生了斗争，这进一步确定了它在尘世中的地位与职责。由血统决定的政治与经济将权力赋予了在社会选择中的精英，当人们被技术的伟力迷倒的時候，这项自古以来的，没必要强调的原则被轻易地破坏了。民族社会主义并不是捏造的传统而是全世界生产性民族的正确道路，资本主义及犹太社会主义都是反民族的存在，没有一样物质或精神不打上民族本质的烙印。

迄今为止，一个民族的财富，不论职业之间愿意与否，都是各个职业共同创造的，从来没有头或者手能离开整体去工作。对一个国家主要责任的永远都有主体民族，并且应当占据主要的物质份额，他们物质上的祖国，即必须满足其人民性质的需要，正义的需要。保护种族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从反对反自然的国际主义开始，这一理念起

源于国际利益能勾连四海的愿望，最终要达到利用种族法防止不合适的人口出生以及消灭种族混杂发生的企图，因为我们已经知晓了种族在维系社会与文化存在的重要性。能影响种族的因素，至关重要的就是战争，牺牲的人多数情况下是优秀的因素，除非战争赢得的能抵过种族的损失，这叫求得生存的战争，一味的和平，各类生存空间的狭小，足可以使其限制人口和自我消磨，在精神也消灭了以后，只剩下了说其语言的居民，如果其没什么伟大的历史，或许真的要永世沉沦了。

至于从组织上对民族进行解体的社会斗争以及其信徒们，你们要清楚，流浪汉所躺的土地也是民族财富的一部分，他所避雨的房檐，也是其同胞的劳动成果，职业间的倾轧与无秩序造成的贫穷不是否认祖国的理由，而恰好是争取物质分额的理由，为什么要莫名奇妙地解散民族组织呢？唯物主义的经济化组织、例如阶级，**那么利用阶级推翻一切民族的事务是他们获得财富的原因吗？**如果不管他们承认与否，职业都在分化，即使他们不希望经济是官僚化的，但这一进程是不可避的，因为他们采用了反民族反生产性反领袖的政策，人类的组织形式仍然如此，没有因为意识形态政府的上台而轻易地改变自己，不论再怎么折腾。

我们应当要求用纪律与道德规范去限制个人能动性，好保障阶级斗争土壤的铲除。民族社会主义仍然承认私有企业，只要在不影响社会正义与种族健康的前提下，私有财产同样不会被消灭，这是我们去除无产化的条件，但它决不是神圣或不可侵犯的，有必要对危险的大资本家及金融势力进行制裁。如果他们的财富会转化为非劳动收入的前提，就必须予以没收。

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刻意斗争是没有理由的，分工是产生财富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任由剥削的，暴动的条件，不是一个激进分子们极好的借口。这人民性质的灾难，最终也和“人类”一样，在自由主义和犹太社会主义间来回地转换直到一颗缈无人烟的星球在宇宙中飞翔！

人类，这个机械总和的观念，平等不平等事物的观念，实际在朋友，亲戚，熟人面前不堪一击——我们在他们中看到了整个民族，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

同胞们，广大的世界并不从“人类”中获得灵魂与荣誉，因为民族从生物到精神方面是惟一创造了历史的组织。我们希望再次深刻地以道德与纪律为准绳，反对和消灭民族上空的意识形态幽灵。

一个民族的衰落，必然无法离开这几点：健康人口的减少，不适合出生的人口增加，种族的混杂。这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负担，还降低了种族的质量，拖累了对人民的承诺实施。作为一个必然对个人自由设限的社会，我们要求对不适合进行遗传的人进行禁止生育。这并不是残忍，这实在是为了多数人负责，种族政策是一切往后政策的生物学保障，是民族社会主义万世统治的基础。我们的政治界限是什么？是意识形态的派系吗，是理念的冲突吗？诚然这样的东西太浅薄了，更有立场先于道德的嫌疑，但这些浅薄的冲突是必然要经历的，从低劣到伟大，从下水道爬出来然后直奔斗争中心的过程，一开始，确实要经历政治团体之间的战斗到服从的过程，一个民族只能由一个主要的组织领导，这个组织应当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使同志们服从，有时甚是主动的服从，然后同时地打击自己的敌人，这个过程是组织的能力与理论的作用占半的，绝对不是像我这样的不入流作者起决定作用。

在斗争胜利后，我们会明白应当是一种思想主宰民族数千年，像是各路邪说相轻的年代是短暂的。政治的最终界限是民族，无论什么旗號，总是两个共同体的实际斗争。哪怕是和平，也是这里多生一个孩子，那里就少生了一个呢，民族斗争只有微弱与激烈之分，从来没停止过。经济，首先是人民的仆人，以在生存空间内自给为目的，必不可以伪造生产力，工厂生产的物件，全充作广告的附庸来激发对过度幸福的渴望，同时，人们向大城市过度的集中正在导致的纯经济化与堕落也必须解决，疏散大城市的人口。**我们对于经济的简单希望如下…**

1. 经济目的转向满足需求

2. 消灭现行的金权奴役，非劳动收入，如废除货币利息奴役制，保护民族劳动者的个人财产份额

3. 防止大资本控制中小企业，防止其匿名化或集体化。

我们的敌人也采取了如下行动，

1. 以股份制征服独立企业

2. 使其服从于银行，即“被选中的人”

3. 动员盈利的欲望

4. 通过股市收割“神圣的私有财产”，向反民族势力转移。

一般的生产者使用劳动来获取货币，作为换取产品的手段也证明了自己对经济有实际的贡献。而非生产获利者则将金钱视作一种高级商品，金钱本身就是价值，连真正创造价值的劳动也能轻易地去控制，金钱真正地变成了金权，几张实际上什么也不是的纸征服了经济。

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更加困窘，哪怕是生产性质的工业集团，也会成为劳动的独裁者，裂变到金融资本的心境了，当然，金融资本不必有什么可以令人填饱肚子的商品，只不过连续地把钱换了个位置，或是利用利息的不道德理由，用经济奴役的劳动打击了民族，但飞轮仍在机器上消磨，和工人农民们在无意义的还债劳动上痛苦地浪费宝贵的生命，造就了那些大金融家。这种情况下，“自己欠自己”的什么债券不用还是完全正当的，更别说什么外国条约。生产仍然不会停因罢工而停止，只会更糟，报应的更多是中小业主和劳动者自己，坐拥金山的人不会因为暂时停产而焦虑。高产量当然不是什么捉急的目标，重要的是消灭投机生产，我们在许多方面必须放弃财富的积累，有时候，实物比钞票更可靠，这得到的结果必然比一堆票证对民族带来的实际作用强。

反对所谓的民主，民主绝对是一种服从于金钱与盲目的运动。我们都知道，做事情要专业化，当老师要专业化，火车司机要专业化，都是钢铁，钢筋是建筑用的，手拷是控制人用的，这都是专业化，但是民主制度拒绝了这一点:在领导人民这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民主使用了选票，即产生了多数影响的金钱，选票由什么控制呢？由随机的群众；群众依什么投票呢？侯选者取悦民众的技巧，就像男人对女人发的海誓山盟一样，而民众又总是不悔改的，在期待与失望中过渡，中间有个票选的环节。君子不因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真理与谎言不因投票易其性，善誉者不掩无盐之丑，善毁者不掩西施之美。群众们又都不是政治家，矮子看戏，前面说好，我也说好。真理不取决

于多数或是少数，人类社会的斗争必然有其自然规律，如果诗人，飞行员不是票选出来的，那么国家领导人也不应该。

民主就是国家的拍卖会。至于社会选拔再培养领袖的原则，这里不多叙述。反对国际主义与阶级斗争，就是对这两种毒药进行抵抗，它的始作者是犹太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采用了不同的战术，对世界上的糊涂蛋一步步地展开了征服，为什么犹太人总是进步运动的领袖民族？是因为他们异于常人吗？是的！

犹太民族是反一切民族存在的“民族”，如果他们是一群单纯的经济人也罢，但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他们复杂的种族构成决定了其不受灵魂的驯化，他们从外界来确保自身的生存，在经济上依附他族，在道德上依附他物，在文化上循其旧制或随其居住地之流，但他们并不希望停滞于此，**如果对种族的混合破坏造就了犹太人，那么这种意识被他们已很好地继承了。他们几乎无意识地懂得扩大自己的队伍，不止自通过繁殖的结果，而且还有历史上犹大民族被制造出来的方法:推动削弱其它民族文化与种族基础的运动，促使其种族混杂。**

迄今为止一系列的进步运动都是犹太人扩大队伍，尤其是奴隶队伍的表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所占有的资金是现在的“进步主义”宣传经费。

经济上的全球化，即经济人与犹太人的需要，文化的纯粹人民化，去除种族因素后的经济效率化文化。这两点没有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是做不到的，不坚定和有偏差的民族上层建筑必然最终被国际所征服，然后利用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渴求，继续扭曲到反民族的目的，或者拿假的民族主义语言当聚宝盆。

资本主义制度是事实上的反民族，他们的一切民族政策都手段的，暂时的，而不是目的的，他们的经济是脱离了民族需要的，这导致了进一步破坏民族的阶级斗争。国际将外来人转化为公民，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与这些才来我们的土地上一年。五年，二十年的人平等？他们凭几代的努力才配和我们平等？一些外来种族的引入就是敌人拉低我们种族水平的手段。黄金国际是最有效的国际，它至少是犹太人的民族性。当人为的行为破坏了自然民族的构成及分布时，我们称其为对自然的侵犯。

喜爱阶级斗争的人认为根本属性是阶级性，但工农本质上就不是国际主义者，他是爱国的，他与他工作的土地发生了关系，在协力间做出了贡献，自私的国际斗士们抛弃了国家与民族后，他们就是经济人，如果他希望扩大自己同类的队伍，他们几乎成了精神本质的犹太人。

我们反对阶级斗争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过是国际主义宿命的一个条件。我们的经济要求将经济导向一个共同的给养维护民族的目标，将诚实的民族同志们团结起来，国家必须位居经济之上，它需要超越经济以达到不朽，在其治下，没有阶级之分，只有协力之别，经济依靠的是社会选拔的原则，而不是将国家本身作为经济官僚。

只消灭犹太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必须一齐消灭其土壤。利润必须为需求让位，不进口不必要的产品。我们和共产党人都希望工人夺取工厂，但我们希望工人能在市场中经营它并诚实获利。而不是共了产，丧失了生产性，活力被一层又一层更大的体制所消减。

另外，在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之前，国际援助只在支援民族主义的范围内。民族为意识形态控制，不论是放纵还是约束。意识形态的外力作用内力自觉经济与社会的空想

自然秩序奴役了个体，破坏了民族组织物质祖国与精神祖国的配合统一经济斗争，因为职业等级被破坏种族健康，以人使利利益在驱逐人，种族衰落至于世界上优等的民族，在技术上，如果条件相同，实则不相上下。

世界上的低等亚人们，他们又几乎是落后的，首先受制于生存空间，其次受制于自身种族，哪怕给他们条件也无用了，种族——民族的斗争已经靠着非技术的因素缩小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早期的斗争是决定性的因素，种族——民族最直接的竞争为世界上种族——民族的地位打下了基础，天生如此，犹大人作为亚人的一种，在智力与技术上实际并不落后，是因为犹太人是优等种族的反种族与民族化，是一种经济人化，这与种族决定的智力是两码事。

第二就是生存空间的影响：印第安人是活该造不出轮子吗还是因为南北美可恶的自然因素？又因为技术产生后不识得什么生存空间，西班牙人用旧大陆的火药与钢铁征服了印加帝国。

民族内提供生命力的首要因素即为农民，但这重要的部分在经济竞争中不占优势，有必要在经济上予以保护，有计划地将城市中过剩的人口转移到农村去，其意在固本，在于平衡种族成员分布，增强粮食供给。

工业与工人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能力，是与非劳动斗争的部分。商业则代表着一个民族自我分配的智慧，这三者的总和我们统称为民族同志。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反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政治力量的出现，人们就会在犹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循环，**我们的斗争是客观的民族组织与主观的个人臆想间的斗争。**屠杀人民的阶级斗争之发生是有其条件的：掌握着国家的人们终于放纵了经济，这民族的容器开始引入经济的奇想，作为打倒劳苦同胞的武器，那些官僚又算什么同胞？**他们是希望消灭民族的国家技术的官僚，在为世界政府这个大国家的到来做分区演练。**

非民族的法系不符合各国人民对公正的理解和需要，它们几乎是外国精神的嫁接，空洞的法学理论不足以彰显出学者门具有将法律的理智与道德的情感区别开的能力，只彰显出他们是多么与我们民族的自然情感相悖。我们要求法律优先保护成实，善良，勇敢的同胞，严厉阻止犯罪与二次犯罪的发生。在人民与民族的目光下，几段文字，法条，毫无意义，**实际的事物是不会因为人为规则改变的，国家实际不由他律。**

我相信，我们聚集在一种根本的理念底下，但我并不想说它是什么，一说，又要涉及到具体的政治派系，又要有一些不成熟的人，引以其作为政治家生命的“标签，来相互辨驳，相互轻慢。但事实是道德大于立场，双方依了自己的理论反对对方一切成就，是一种自欺欺人，不管成功不成功，或许又要摔的粉碎了。

我们有心里的简单思量，越简单的判断，意志越坚定，而不是遵从外部的刻版与灌输。我们今天能位居同一道战壕里，这已经高过派系间或大或小的偏见了。犹太社会主义是预备消灭一切民族的。那些政策指导下的自我屠杀就是证据，社会分裂与引入外人就是证据。同胞们互不以一个统一的标准认识对方即是苦难的来源，这个标准来源于我们的努力。

民族社会主义的一般形式是人类传统的赠品，一些古代的形式将会复兴，成为固国之本。社会主义不以国际为主导，为受益者，只能以民族为受益者，我们的一切政策

都是为了服务于民族，总有人指责我们用民族字眼转移矛盾，实际上它就是我们的目标，不需要任何质疑。

但我也必须解释为何:世人无不尚美而恶丑，文化告诉我们一百种接纳丑陋的方法，但文明告诉我们，我们要的是美，有灵魂的人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技术脱离了种族而无关乎美丑，而技术作为媒介必然影响内容——技术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对真实的内容有什么好处吗？

我们将社会主义视作艺术,“艺术的社会主义”,我们仍然追求人类自然秩序的一面，这是一个看似迂回但正确的顺序，顺序里包括了正确的目的，作为一种基于艺术而不是基于技术或假人的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在最符合自然规律地达到这个目标，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是天生的，靠的是内心而并非外物，在生活中的几点阴影触发了他。使他甘愿投入民族社会主义的权力本身，就是世界观的权力。我们相信民族社会主义才是保持世界上各种族——民族和平的方法，不可否认的是各种生产性民族间的职业人员彼此会更感同身受，但重要的是直击利害的本族的协力关系的发展，**国际主义的士兵就像两个醉汉吆喝着赶走家里人，在造就悲惨家庭的同时结交狐朋狗友。**

国际主义的性质就是世界的阶级斗争，世界的反民族化。犹太社会主义的统治的确可以胜利，一万年不被推翻，但又终究是悲惨的，人类除了技术，逐渐什么也没有了，哪怕是技术的进步也要慢慢消逝掉。至于他们的勇敢就像保卫妓院的打手一样。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来原于种族,**如果种族被破坏的很彻底,那么这门学说就失去了效力。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绝对不是无限的，应当到期为止，你现在看到的大多数民族社会主义意象几乎都是革命时期的，结束革命只意味着革命已经胜利了，只有失去世界观权力与失去政权的恐惧才导致了特定意识形态的“不断革命”。**

如果一个民族再也无法创造更高的文明，并且走向堕落的话，那么只能说明他们的**文化自古代就是是外来的**，在他们的历史里竭尽了这碗无源之水，或者他们已经劣化了，脱离了和自己祖先的联系，实际上你和你们的祖先是一个人，血缘的改变相当于易主。

某些民族和爱国言论喊得叮当响的人反而对自己的同胞漠然不视，我认为我们仍然应当为马列主义者留出一条归化的道路。

我这一切的行动不过是起源于对自己同胞的同情。

无论如何,民族社会主义将会统治下一个五千年。

本未倒置，则国亡。不单是国家，民族也要消灭掉了；中国人民如果还这样下去，只会沦为“说汉语的居民”。从历史与现实中来说，民族穷尽了世界上的一切斗争与自由，民族斗争的历史就是世界历史阶以斗争及其目标则为民族斗争的武器。

这里的阶级斗争是在犹太社会主义体系下的特殊行为，指犹太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义要战术，并非农民起义或恢夏正义的暴力行为。民族间与民族内各有差等，内外与内部差等的“道德”或血与土一类对外的行动与内部不同手段的修政是历史内容的概括。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等级的，考量办法为道德或贡献。但是职业间是协力的；它们不应该存在利益的重叠。而民族决定了它们的高下，但很明显的是，优等民族同样占据着最肥沃的土地，犹太人占领了“最便利的土地”混血儿似乎次一些，但我想说，犹太社会主义感动的并不是次等的种因素，而是民族内的数量因素，尽管劣

等民族更容易投入犹太社会主义的怀抱。但真真假假，不乏优秀拥护者的犹大社会主义是不会成功的它作为一种毁灭优秀文明而引以为豪的潮流，它平等，部分优秀者与真杂种，诚心与野心混杂在一起，行使这个平等又进步的学说，可惜，并不是规定和念经文，平等就产生了，自然界始终都保持不平等或是差异化，标榜平等是没有用的。伟大一定是要有一个权力，不论是政治还是艺术，凌驾于所谓经济平等之上，很明显，平等是经济的要求，或是能为一个民族的伟大负责任的人，就越是崇高，他实际上也离经济平等越远，越高，这是反“进步”的。堕落种族的因素在进步与平等事业中表现的更明显，进步事业与犹太社会主义互为表里，前者与后者的最终结果是同样的，一个必然导致另一个。

它们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头，它们是资本主义原则的更高发展，一样的否定民族的自我判断，因为大资本家本身也无法逃脱种族因素，这种因素在国际间最为明显，他们抹杀不平等理论的原因是，实际上的不平等或差异让他们可以击溃生产性质民族的经济，这是一层种族上的因素，但是当它们鼓次民族绝对平等而宣传阶级斗争的时候，一切都被混淆了，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剥削之一而不是其活动的根本原因。我们绝对不反对工人或农民夺取正义迫害奴隶的行为不会长久，因为我们知道同胞们的血腥战斗可以不为了犹太革命的既定目标而斗争，我们不应当是为了摧毁而生的，而是为了重建民族的领袖力量而站起来。种族是民族的构成基础，尤指生物学意义上的、世界上之所以取得的成果，都代表着明显的种族因素，在经济平等的驱使下，混血几乎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这是降低高等种族水准的原因。很显然的是，当今的人们和他们的种族感情也是分隔开的，前几千年的训练与坚守被经济民主所打败了，它的胜利不代表民族差等内外的保存。时至今日的或优或劣的文化创造，科技发明，实际来自于之前数千年所保全的种族。人类高于动物性的成就决不是依靠经济民主与物质公正的，只要香蕉足够，类人猿也将实现和平友爱。由于地球是有限的，民族斗争仍然激烈，并且真正的“国际”和“国际主义”是不存在的，当人们仿佛追求到了与自己同志实现的平等之时，幕后或“台前的“领袖”们仍然以希伯莱特有的坚韧不拔践行着犹太社会主义，他们在理论上是相信的，和其他民族的追随者们一样推行这理想。作为历史中少有的商业性质民族，他们反民族的平等进步经济民主大获全胜，毕竟“全世界的非犹太人们团结起来”这个口号传播的不是很广。犹太人将会以他们征服世界的理论为荣，但是犹太复国主义一定比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更加臭名昭著，哪怕有潜移默化，但当他们想显示自己，以直接的方式去做的话，他们就要挨上几棍，不过，殴打犹太人是各个英雄民族最后的悲壮行为；他们的其它方面已经被最基本的犹太议会，民主，经济思维方式占领了。

民族社会主义是一场世界观的斗争，首先，中国不要与亚非拉的人民必须站在一起，我们先要知道，我们不是什么世界上的弱小国家，即强国、大国应取强大的策略，一个复兴民族应取的最合适的贵族统治:民族社会主义，自然法则在政治上的应用。当越南在丛林中扼制了婆罗洲文明的扩张，我们就应该明白雅利安英雄和他的徒子徒孙没有战胜我们，我们的文化，文明，甚至于一个蕃邦。还不明白吗？我们是文明的创造者，高等民族。我们的信心只有一个:我们还没有很毁灭，在历史上犯了那么多错误，

我们也没有灭亡。但民族社会主义不是恢复之前的形式，而是形式的起，这是一个过程，现代化的过程。古今抑或中外。在此运动上一定有相似之处，即人穷则反本。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要录有三个；种族一民族的国家，职业协力的国家，优秀统治的国家。我认为，阶级争的上一个阶段是职业间斗争，民族社会主义坚决反对私己的阶级斗争，它的源头是以利益计的世界观，资本家压迫工人与罢工都作为阶级斗争来看待，实际上，分裂的职业——阶级无法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它便职业间有了重叠挤兑的空间，或是溢出本务的空间。我们的“优秀统治”即为凌驾于阶级之上的领袖阶层，社会主义意味着这种权力。国家不与匹夫争利，何比于盗贼？
我们要沉下气来，迎接子孙的胜利，尽管上一代人已成定势，但我们可以培养这个民族的后代。

民族社会主义政权必须居于企业之上，不进行官僚主义的社会化并不能代表我受到了大资本，财团的操纵，但是，犹太社会主义者认为只要保留了私有制国家就不得不向经济基础低头。我们今天否认了阶级，我们承认的只有劳动与非劳动的经济差异，劳动资本与脑力，体力的劳动者应当对非劳动获利的人，事发动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会推翻令人作呕的部分劳动资术家，也会诞生一批经济领袖，工人的利益将得到满足，在废除利息效隶制后，国民经济的目的将完全的供给需要的目的，当然政府会不可流的限制高分商品，控制消费等。在工业取得解放之前，农业必须成为种族的生命与更新的基础。由于农业在经济中的不利地位，必须予以保护，根据旧有民族理想中国民族社会主义的结构介绍，即轮回，贵族与古典民族主义，或民族性，与社会主义等级制。什么是轮回？它不仅仅是按源头形成形式，更是要创造新形式。这代表了历史上辉煌时刻的复活，甚至以此作为基础，创造出更高的文明。

春生秋杀，虽死无悔，我们必须相信历史的周期，命运不会同情，罗马的遗址与长安的砖瓦也是如此，它只是在给予优胜民族以奖励予衰亡民族以终止，归根结底是看人如何表现。似乎“衰亡民族”是一个从高空，抛下，装满鸡蛋的篮子，鸡蛋无能为力，因为它们抓不住衰落的原因，甚至连表象都看不出来。这种公正的判决是变化的，我们应当信仰一种始终被命运眷顾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世界观。民族社会主义那些“社会党”来原的前辈甚至是创始人们，起到的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它是一门从小到大，从十分幼稚到成熟的学说——甚至是后人比前人重要，现在，民主自由，阶级斗争，种族融合这幅即将要作为历史的三联画，已经为我们送上了彻底消灭的铡刀，毕竟种族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发源，一开始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并无如此高度与认识。不是因为打输了欧战，社会党上台，经济失策，只是因为作为民族，文化创造的贵族民族的原因。那么种族既然完全消灭变成了混和物，那么这种理念就可以失败了。作为帝国主义的国际资本主义秩序与阶级斗争互为表里，以期为犹太人征服世界，通过犹太人与犹太人的经典，但他们也不过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此消役长，不过最平等。我们没在玩沙盘游戏，轮回只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尽可能长的保持吧。

贵族，贵族社会主义，它代表的是教化作用，不是具体的计划与经济未端论证。即与控制所有人行为与世界观所衍生的装备。人必须有一个领袖，而这个领袖完全负责，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整体利益”可以当人们希望于整体本身时就错了，这是和“人类”一样，是一个被动的概念，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整体之上的人，不能出错误的最终体察

人员”。阶级斗争与犹太社会主义是基督教世界的结果，它只不过是从一开始到现在越来越大的问题的反映，问题的问题。

人们的目标应当先以生命为中心，但空谈自然没有用，民族社会主义是自然的理论与实践结果，尤其是在今天这种时代。但是，如果只怀念过去与过去的数据，那么我们和腐儒没甚区别了，简直是通灵术。今天大众们所议论的，九分是空话，本着这样，在不以平等为基础的投票之外，多数人是无裨益的，我们并不对今天追究不到的责任负责，我们的上下级之间是协作，我们只向自然秩序，民族仕会主义负责。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最重要的是诚实。与其社会化各层机构，不如社会化人，社会化值得社会化的人。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是牺牲，不是物质。

死人尚有一搏，哪怕那些最终要灭亡的政治呢？我们要做的是比他们做的更好而不是纯粹攻击，单纯的诋毁无建设性。

现实是这样:我们在实力与数量上均处劣势

2024 鸡西